

目录

[中譯本前言 2](#_Toc58922183)

[總編輯序 8](#_Toc58922184)

[圖表 9](#_Toc58922185)

[第一章 導言 16](#_Toc58922186)

[全國統一的形成 16](#_Toc58922187)

[制度變化 19](#_Toc58922188)

[經濟和社會變化 26](#_Toc58922189)

[隋唐和外部世界 30](#_Toc58922190)

[史料的問題 34](#_Toc58922191)

[第二章 隋朝，581—617年 42](#_Toc58922192)

[6世紀的中國 42](#_Toc58922193)

[開國者隋文帝（581—604[6]年在位）及其輔弼大臣 46](#_Toc58922194)

[隋代面臨的大問題 54](#_Toc58922195)

[混合的意識形態的形成 54](#_Toc58922196)

[建設新都 56](#_Toc58922197)

[中央政府的改革和人才的任用 57](#_Toc58922198)

[地方政府的改革 60](#_Toc58922199)

[土地分配和田賦 63](#_Toc58922200)

[繼承的兵制及其改革 65](#_Toc58922201)

[隋朝的律令 68](#_Toc58922202)

[邊防和領土擴張 69](#_Toc58922203)

[陳的滅亡和隋在南方權力的鞏固 70](#_Toc58922204)

[全帝國交通體系的創建 73](#_Toc58922205)

[煬帝（604—617年在位）的個性和生活作風 73](#_Toc58922206)

[煬帝在位時的問題 79](#_Toc58922207)

[儒學和學校的恢復 81](#_Toc58922208)

[建立洛陽新都 82](#_Toc58922209)

[全帝國交通體系的完成 83](#_Toc58922210)

[中國勢力的繼續擴張 85](#_Toc58922211)

[第三章 唐王朝的建立：唐高祖（618—626年在位） 98](#_Toc58922212)

[奪取政權的經過 99](#_Toc58922213)

[唐王朝對全國控制的擴展 102](#_Toc58922214)

[對內政策 107](#_Toc58922215)

[中央政府和官僚體制的形成 107](#_Toc58922216)

[中央政府對鄉村控制的擴展 110](#_Toc58922217)

[樹立財政權威和形成償付能力的努力 110](#_Toc58922218)

[法典的編定 111](#_Toc58922219)

[考試制度和學科制度的建立 112](#_Toc58922220)

[管理宗教集團的有力措施 112](#_Toc58922221)

[唐王朝與東突厥的關系 113](#_Toc58922222)

[玄武門之變和內禪 113](#_Toc58922223)

[第四章 唐政權的鞏固者唐太宗（626—649年在位） 121](#_Toc58922224)

[太宗朝的群臣 123](#_Toc58922225)

[朝廷的“地區性政治” 126](#_Toc58922226)

[國內政策和改革 127](#_Toc58922227)

[行政的改革 127](#_Toc58922228)

[地方官僚機構的改革 129](#_Toc58922229)

[修訂法典 129](#_Toc58922230)

[兵制的改革 130](#_Toc58922231)

[經濟政策 130](#_Toc58922232)

[旨在加強中央權力的政策 131](#_Toc58922233)

[關于建立“封建制”之爭 131](#_Toc58922234)

[大姓 132](#_Toc58922235)

[考試制度 133](#_Toc58922236)

[史 學 133](#_Toc58922237)

[圖書的搜集和圖書館 134](#_Toc58922238)

[對外關系 135](#_Toc58922239)

[東西突厥 136](#_Toc58922240)

[中亞綠洲 138](#_Toc58922241)

[吐谷渾和吐蕃 141](#_Toc58922242)

[薛延陀 142](#_Toc58922243)

[高 麗 142](#_Toc58922244)

[繼承問題的斗爭 144](#_Toc58922245)

[第五章 高宗（649—683年在位）與武后：繼承人與篡位者 152](#_Toc58922246)

[武后的興起 153](#_Toc58922247)

[武后的當權 156](#_Toc58922248)

[高宗的對內政策 166](#_Toc58922249)

[對外關系 169](#_Toc58922250)

[西突厥 169](#_Toc58922251)

[朝鮮半島 170](#_Toc58922252)

[吐蕃 175](#_Toc58922253)

[東突厥人的復振 175](#_Toc58922254)

[第六章 武后、中宗和睿宗的統治，684—712年 181](#_Toc58922255)

[準備時期，684—690年 181](#_Toc58922256)

[684年的大赦令 181](#_Toc58922257)

[恐怖統治 183](#_Toc58922258)

[行政改革 185](#_Toc58922259)

[周朝，690—705年 188](#_Toc58922260)

[中宗和睿宗，705—712年 195](#_Toc58922261)

[這一時期的回顧 199](#_Toc58922262)

[第七章 玄宗（712—756年在位） 206](#_Toc58922263)

[玄宗在位初期（713—720年）：姚崇和宋璟 211](#_Toc58922264)

[政府的政策（714—720年） 212](#_Toc58922265)

[中央政府的改革 213](#_Toc58922266)

[官員的選拔 214](#_Toc58922267)

[重訂法律 215](#_Toc58922268)

[財政問題 215](#_Toc58922269)

[反佛教措施 218](#_Toc58922270)

[710—720年的軍事改組 219](#_Toc58922271)

[玄宗及唐宗室 225](#_Toc58922272)

[玄宗朝中期，720—736年 226](#_Toc58922273)

[皇室的問題 229](#_Toc58922274)

[關于貴族的復起 230](#_Toc58922275)

[宇文融的崛起 231](#_Toc58922276)

[封禪與張說的垮臺 232](#_Toc58922277)

[蕭嵩和裴光庭的內閣（729—733年） 235](#_Toc58922278)

[裴耀卿：運輸改革和營田 236](#_Toc58922279)

[“調和班子”：裴耀卿、張九齡和李林甫 237](#_Toc58922280)

[裴耀卿和糧運改革 238](#_Toc58922281)

[國家“營田”和土地開墾 238](#_Toc58922282)

[張九齡和通貨問題 239](#_Toc58922283)

[財政制度的合理化 240](#_Toc58922284)

[各道按察使的設置 240](#_Toc58922285)

[對科舉考試的控制 240](#_Toc58922286)

[張九齡的下臺 242](#_Toc58922287)

[李林甫的掌權，736—752年 244](#_Toc58922288)

[玄宗與道教和密宗 245](#_Toc58922289)

[皇位繼承問題 245](#_Toc58922290)

[編訂法律 246](#_Toc58922291)

[兵制改革 247](#_Toc58922292)

[財政的發展 248](#_Toc58922293)

[李林甫的晚期：貴族結黨 249](#_Toc58922294)

[對邊鎮的控制 252](#_Toc58922295)

[楊氏家族和楊貴妃的崛起 252](#_Toc58922296)

[對外關系，720—755年 254](#_Toc58922297)

[吐 蕃 254](#_Toc58922298)

[中亞，突騎施族和阿拉伯人 255](#_Toc58922299)

[東突厥的衰落和回紇的崛起 256](#_Toc58922300)

[契丹和奚 258](#_Toc58922301)

[渤 海 259](#_Toc58922302)

[750—755年的對外發展 260](#_Toc58922303)

[楊國忠的掌權，752—756年 262](#_Toc58922304)

[玄宗朝的終結 265](#_Toc58922305)

[第八章 中唐、晚唐的宮廷和地方 282](#_Toc58922306)

[東北邊境 284](#_Toc58922307)

[安祿山之亂的經過 286](#_Toc58922308)

[叛亂后的權力結構 293](#_Toc58922309)

[德宗（779—805年在位） 299](#_Toc58922310)

[叛亂的后果 305](#_Toc58922311)

[德宗之治的晚年 308](#_Toc58922312)

[9世紀之初的藩鎮 310](#_Toc58922313)

[憲宗（805—820年在位）與藩鎮問題 314](#_Toc58922314)

[憲宗繼承者治下的藩鎮 323](#_Toc58922315)

[822年后的河北 327](#_Toc58922316)

[藩鎮制的衰落 329](#_Toc58922317)

[第九章 晚唐的宮廷政治 339](#_Toc58922318)

[安祿山之亂及其后果，755—786年 339](#_Toc58922319)

[唐代宗時代（762—779年）長安的政治現象 344](#_Toc58922320)

[唐德宗的改革企圖（779—781年） 348](#_Toc58922321)

[與河北諸鎮的戰爭（781—786年） 349](#_Toc58922322)

[內廷的發展，786—805年 351](#_Toc58922323)

[官僚集團的失勢（786—794年） 353](#_Toc58922324)

[德宗最后十年的統治（795—805年） 358](#_Toc58922325)

[順宗時代一次未遂的政變（805年） 359](#_Toc58922326)

[8世紀下半葉的對外關系 362](#_Toc58922327)

[憲宗時代的中央集權進程，805—820年 365](#_Toc58922328)

[中央集權化的制度保證 367](#_Toc58922329)

[憲宗初年的政治轉變 369](#_Toc58922330)

[憲宗朝廷的極盛時期 371](#_Toc58922331)

[憲宗末年的不和諧狀態 373](#_Toc58922332)

[9世紀中葉的朝廷，820—859年 377](#_Toc58922333)

[朋黨問題 379](#_Toc58922334)

[835年的甘露之變 386](#_Toc58922335)

[武宗朝（840—846年的李德裕） 389](#_Toc58922336)

[唐宣宗之治（846—859年） 394](#_Toc58922337)

[9世紀初期和中葉的對外關系 397](#_Toc58922338)

[第十章 唐朝之滅亡 409](#_Toc58922339)

[財政問題、鄉村的動蕩和民眾叛亂 409](#_Toc58922340)

[唐朝后期財政政策的背景 409](#_Toc58922341)

[社會不安和反抗的增長 410](#_Toc58922342)

[南方戍軍起義的爆發 411](#_Toc58922343)

[懿宗（859—873年在位）統治時期的朝政 420](#_Toc58922344)

[懿宗對佛教的支持 425](#_Toc58922345)

[僖宗（873—888年在位） 426](#_Toc58922346)

[皇帝和宦官 426](#_Toc58922347)

[僖宗時期的外廷：貴族統治的復辟 428](#_Toc58922348)

[社會問題與盜匪活動的增加 430](#_Toc58922349)

[盜匪團伙的社會構成和組織 431](#_Toc58922350)

[沖突的早期階段：王仙芝和黃巢 433](#_Toc58922351)

[僖宗在四川的流亡生活；阡能之亂 445](#_Toc58922352)

[晚唐時期中國權力的新結構 452](#_Toc58922353)

[帝國的聯合及其破裂 457](#_Toc58922354)

[昭宗（888—904年在位）和昭宣帝（904—907年在位） 461](#_Toc58922355)

[朱溫和五代的開始 465](#_Toc58922356)

[李克用和中國北部的外來占領 466](#_Toc58922357)

[10世紀的諸獨立國：十國 468](#_Toc58922358)

[后記 477](#_Toc58922359)

# 中譯本前言

本書原為費正清、崔瑞德主編的《劍橋中國史》的第3卷，本卷為崔瑞德編，其紀事起自隋朝滅陳（589年），止于唐之滅亡（906年），實際上是隋唐兩朝的王朝史。鑒于《劍橋中國史》現正陸續出版，同時本書又能獨立成卷，自成體系，故先予譯出，以饗我國讀者，并定名為《劍橋中國隋唐史》。

本書是一部結構嚴謹、資料豐富、內容充實的斷代史，在不少問題上有獨特的見解，自成一家之言。一部外國人編寫的大型隋唐史，能夠達到這樣的水平，是難能可貴的。我們相信，不僅對這一段歷史感興趣的讀者能夠從中看到西方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隋唐史的研究者也可作為參考。

本書的特點之一是，對隋唐史上有爭議的重要歷史人物和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乏新意，富有創見。

一 對歷史人物的評價

歷史人物評價是歷史科學重要內容之一。本書非常重視歷史人物的活動，它以人為經，事為緯，層次分明地展示了中國中古史中這一重要時期的豐富多彩的歷史，同時又剖歧析異，發人所未發，給人以啟迪。現舉數例如下：

隋煬帝 煬帝其人，歷來被封建史家貶為一無是處的暴君。近年來，雖然有一些學者肯定了他建東都、開運河等事跡，但總的來說，仍是褒少貶多。本書卻給煬帝以很高評價。盡管作者不否認煬帝驕奢淫逸，但認為他在中國帝王中絕不是最壞的。從當時背景看，他并不比別的皇帝更暴虐。煬帝很有才能，是一位有成就的詩人、獨具風格的散文家，還有點像政治美學家，很適合鞏固其父開創的偉業。本書認為，589年平陳時，他在建康的行為堪稱模范。其后他在促進南北文化再統一，向北方介紹南方佛教傳統等方面，都作出了貢獻。唐代的繁榮，應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繼承和改善了煬帝所開的運河，運河促使杭州成為繁榮的商業城市，并提高了運送軍隊和供應至任何有潛在反抗危險的地區的能力。在談到煬帝被否定的原因時，作者認為這是儒家修史者給他抹黑和民間傳說對他歪曲的結果。

唐高祖 長期以來，治史者認為唐高祖李淵是平庸無能之輩。近年來，國內史學界已逐漸清除籠罩在初唐史上的迷霧并肯定了李淵的建唐開國之功。在這一點上，本書也作出了有益的貢獻。本書認為，盡管李淵反隋時已年逾50，但他仍不失為一個有雄心壯志、生氣勃勃和干練的領袖人物。他策劃了太原起兵。他對李密和東突厥的外交攻勢，使唐軍得以勝利進軍并攻占隋都大興城。他推行的大赦、封官許愿等政策，有助于促進全國統一。唐高祖創立了初唐的制度和政治格局。以任何標準衡量，“武德之治”均稱得上是取得了突出成就，為唐王朝打下了堅實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基礎。李淵之所以遭到冷落，一是因為他執政期短，又夾在中國史上最突出的兩個人物隋煬帝和唐太宗之間。二是他的開國之功被唐太宗精心地掩蓋了。

唐高宗 唐高宗是唐史上一位重要人物。舊史卻將他描繪為懦弱的傀儡，在重要政治制度上建樹極少。有些學者也持類似觀點。本書不為這些傳統之見所囿，既指出高宗確有懦弱一面，又具體論述了他在法制等方面的建樹。和前輩相比，他的另一偉大政績是對科舉制進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控制物價的措施也收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并行用于有唐一代。唐朝這時的軍事力量和威望均達頂峰，甚至超過唐太宗時期。在高宗后期，武則天的地位基本上是不穩定的。她只能靠間接手段控制朝廷，并一直容易受到攻擊。

武則天 她是隋唐史乃至中國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千百年來，毀譽不一，至今猶爭論不已。本書在全面分析了她的作為后指出：中國傳統史學稱684—705年為“武韋之禍”，是“欠公道的”。因為首先，它忽視了武后篡位前所取得的成就的意義。其次，沒有確鑿證據能說明在她執政最后幾年以前，政府受其統治作風的危害。第三，武后時期農民生活比史學家經常斷言的更為良好。在人民中間，她可能是得人心的。只有很少的中國統治者，其生日能像武后那樣在農村節日中被人紀念至今。本書認為，武則天之受譴責，原因在于她的許多行為不符合儒家準則，如沉溺于佛教，延長服母喪期以提高婦女地位，派武延秀至突厥與默啜可汗之女結婚等。武則天的消極面表現在：她最后幾年的統治每況愈下；她的統治作風高度獨斷，以至當她失控時，行政結構立即出現裂痕，而她這時反而不能以其一貫的無情手段，斷然采取措施。對中外學術界有爭議的以下一些問題，作者也一一加以剖析。（1）支持和反對武則天的兩派斗爭問題。過去主要有兩種看法：陳寅恪認為這種斗爭是關隴集團與山東集團之間的最高權力之爭；另一種看法則認為是掌權的貴族統治階級與新興地主之間的爭權奪利。本書認為這兩種看法都有問題，都是對當時社會認識過于簡單化的結果。作者認為，這是維護既得利益的掌權者與以擁武為升遷手段的勢力之間的斗爭，武則天利用后者奪取了權力。（2）武則天遷都洛陽問題。本書認為，從政治和經濟上解釋這個問題，雖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很可能還有第三種因素，即她慘殺王皇后等人后，內心恐懼，無法再留在長安。（3）以周代唐問題。一般認為，武則天取國號為周可歸因于她追贈其父的封地（周）。但這種看法難以成立。她以周為國號是為了與古代周朝聯系起來，以前王莽等人也都采用過這種手法。她的目的是想建立周朝所達到的至治之世。（4）科舉取士名額的增加支持了武氏政體的問題。本書認為支持這種看法的史料很少。武則天在660年后十年間根本沒有開科取士。660—683年進士年平均數也僅18人。（5）武則天代表什么階級或集團的利益問題。本書不同意她為商人之女，所以就代表“新興的商人階級”的看法，因為其父及兄弟均仕于隋、唐。本書也不贊成武則天代表東部地區利益反對西北貴族的觀點，因她總是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的“貴族”出身。

唐德宗 本書認為，傳統史籍把唐德宗說成剛愎自用，貪得無厭，但又說他輕信和柔弱，兩種說法彼此矛盾。關于他允許宦官和節度使自行其是的記載也是夸張之說。所謂唐德宗779—781年的勵精圖治同樣是記載不實。實際上，他的政策和行為，表現了相當程度的內在連貫性。他志在振興中央權力，以使滿朝文武相形見絀。由于盡量保存現有中央權力并非易事，他必須與藩鎮作必要的妥協，這是審慎之策，不是人們指責的姑息之政。對唐德宗完全聽從家奴的指責，也不符事實，因宦官并未損害他，他一直是最高統治者。所謂外廷受宦官壓抑，這是史籍對宦官影響的夸大。

唐憲宗 “二王八司馬”事件，是唐中葉以降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史學界不少人認為憲宗上臺后大力鎮壓二王集團，是反對革新的保守派頭子。本書力圖抹掉投射在憲宗評價上的陰影，認為他對二王集團的處理非常慎重，除二王外，無人被處死。清洗范圍僅限于真正的參與者，而不像歷來那樣殃及親朋故舊，甚至與二王集團關系極密的韋執誼的岳父杜黃裳也被重用為宰相。憲宗鼓勵朝臣大膽講話，堅決削平藩鎮，選用武元衡等一大批50歲左右的優秀人物當宰相，實行一系列改革以推進軍事中央集權運動，在“中興”李唐過程中打開了德宗時代的僵局，所以他是唐后期幾乎重建“貞觀之治”的人。關于憲宗之死，作者認為，他被宮監陳弘志所弒的看法不可能獲得證實或反證。但他的死卻使宦官在擁帝問題上開始擁有大權。對于憲宗因服藥過量而卒的說法，儒家流行的看法認為這是道德墮落的結果，但本書認為，這種意見雖有理，但還不能讓人了解更重要的政治背景問題。總之，唐代宮廷陰謀，模糊不清，真假難辨。

李林甫 此人歷來受到責難，被視為“口蜜腹劍”的小人和促成李唐由盛而衰的罪魁禍首之一。本書雖不否認李林甫善搞政治權術，但說他是務實的政治家、精明的行政官員和制度專家。唐玄宗統治時期許多重大而有價值的改革，都是在李林甫和張九齡當宰相時進行的。李林甫時徹底修改了整個稅制和地方費用規定，使財政制度更切合地方實際，這確是一大成就。他修訂的全部法典，至14世紀初仍保持其權威性。李林甫的改革使朝廷行使權力比以往更順利、更有效率。李林甫執政時的政府對外連續取得了輝煌勝利。在姚崇、宋餬和張說任宰相時，首輔宰相是在積極參與政務的皇帝手下工作，而在李林甫漫長任期內，唐玄宗已不再起積極作用，故李林甫對朝廷的支配，遠比姚崇等人全面，楊國忠根本不能與他相比。有人說李林甫任宰相前與張九齡不和，因為后者反對他擢升，這種意見并無確證。所謂他的入相與武惠妃有關和他與裴光庭之妻私通的傳說，都可能出自虛構，因為當時史家大多仇視李林甫，所以盡量給他抹黑。

二 歷史事件

安史之亂 本書指出，過去不少人將“安史之亂”視為“在國內進行的外患”，因安祿山及其許多追隨者出身非漢族。這種看法雖不是毫無根據，但無說服力。陳寅恪發展了的夷狄論的變種觀點同樣缺乏足夠的證據。谷霽光從河北對唐廷的長期異化的角度來解釋叛亂的論據也無說服力。作者本人的看法是：“安史之亂”產生于基本上是“政治性質的若干牽涉面較小的環境”，它與“中國文化的敵人的大規模滲透，或長期的地方分離主義無本質聯系”。盡管人們都說“安史之亂”使唐由盛而衰，影響巨大，但語焉不詳。本書則非常重視這種影響及其引起的變化，這些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幾點：（1）軍方成了帝國生活中的主要力量。（2）地方行政結構被改組。（3）許多人取得了高官和社會威望。（4）國家財政結構崩潰。（5）土地分配制度受到致命打擊。（6）人口大規模南移。（7）喪失了對河北和河南大部分地區的控制。（8）江淮幾道取得新的關鍵地位。（9）唐帝國喪失了領土和威信。本書將這些變化貫穿到此后至唐亡的歷史論述中去，這樣做是很有眼光的。

牛李黨爭 這也是學術界長期爭論不休的重要問題。本書針對主要的分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關于“牛李黨爭”的起因，本書認為是出自始于憲宗時的個人恩怨。至9世紀20年代個人恩怨公開化，形成黨。黨不過是政治人物的松散結合體。因史載闕如，很難弄清產生朋黨的思想觀點和社會分化狀況。本書認為，朋黨領袖擁有政治權力，故能掌握想分享杯羹的追隨者。穆、敬、文三帝庸懦，不能遏制朋黨的發展。若宣宗直接繼憲宗位，朋黨之爭將會緩和得多，甚至會使人不知朋黨為何物。關于朋黨規模，日本學者礪波護編制的兩黨名單中，有幾人被列入或畫出，其標準尚可推敲。他關于門生故吏依附上層朋黨成員，朋黨結盟影響向下層發展，從而形成金字塔形式的看法，雖有某些正確性，但也有不少問題。本書認為，依附牛李兩黨主要人物的大垂直系統的派別集團是否存在，值得懷疑。有人想找出形成朋黨的意識形態基礎，本書建議最好把李德裕對李宗閔等的敵意追溯至808年的制舉。但是，將皇甫湜的對策文看成整個牛黨共同觀點的看法并不合適，因為他后來從政治舞臺上消失了。幾位最重要的領袖的文章也未將其哲學觀點和政治組合聯系起來，所以看不出是什么觀點和態度把這些人分為牛黨或李黨的。關于牛黨是主和派，李黨是主戰派的問題，本書認為，不應把李吉甫與李絳之爭，與十余年后的“牛李黨爭”等量齊觀，沒有理由把李絳視為牛黨的精神追隨者，也不應忽視牛黨成員卷入9世紀各種軍事斗爭。所以把牛黨宰相看成是和平主義者的觀點就未免簡單化了。很難想像9世紀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的小兵變，能對全面展開的朋黨之爭有很深的影響，也不能排除史籍中塞進偽造材料的可能性。陳寅恪等對“牛李黨爭”的社會學解釋，雖有不少理由使這一假設頗具說服力，但因文獻不足，很難說中舉者必出自寒素，庇蔭者定來自名門望族。想在朋黨上層作前后一貫的社會學區分，證據還遠遠不夠。

會昌毀佛 不少學者認為“會昌毀佛”是由于唐武宗佞道所致。本書不否認他是虔誠的道教徒，但認為武宗除有幾名寵幸道士外，似乎并沒有打算促成敵視佛教的“道教壓力集團”。一些歷史著作聲稱李德裕為武宗毀佛推波助瀾，也無充分證據，所講的動機更是含糊其辭。本書指出李德裕支持武宗毀佛的原因是：（1）它給國家財政帶來利益。（2）促進國家禮儀以支持他的活動。（3）削弱宦官仇士良之權。（4）可能受了843年政事鎮壓摩尼教的啟示。本書所說“會昌毀佛”的最重要原因在于經濟問題的看法雖非創見，但820年以后唐王朝的財政拮據與寺院的日益富足形成了鮮明對比，所以較有說服力。

大中興佛 有些論著言及唐宣宗一反武宗毀佛之策時，給人的印象是此后悉復舊觀，并一直持續至唐亡。本書認為，847年興佛詔令在后來受到了限制，政府采取了更慎重政策，具體表現在：裁減過分費用，只許在人口稠密處建寺，防止私度僧尼，加強對佛教的控制。這一政策延續了許多世紀。

本書的特點之二是它填補了隋唐史研究中的不少薄弱環節，乃至空白。

隋唐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盛世，也是當時世界上最文明最富強的帝國。這段歷史向來備受中外學者重視，研究成果也較多。以國內而言，解放后已出隋唐史專著七部，居斷代史之首。然而由于種種原因，研究工作不夠全面，隋末唐初、唐太宗、武則天、安史之亂、均田制和唐末農民戰爭等方面研究成果較多，唐后期、五代十國和思想文化等方面涉及較少，不少問題若明若暗。這種狀況近年來已有較大改變。本書不僅表示了要改變隋唐史研究詳略不均的意愿，而且確實將此意愿貫徹到實際編寫工作之中，并做出了顯著成績。這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以往的隋唐史，講皇帝事多，其他人物事少。本書對從唐高祖直至唐末的幾乎每個皇帝（特別是太宗、武則天、玄宗、德宗、憲宗和文宗）的宰相、大臣和重要歷史人物的主要事跡都做了簡要論述，從而大大地充實了當時政治史的內容。

（二）以往的隋唐史研究較少結合歷史人物的生平、性格等特點來評說其活動，而本書在這一點上做得較好。它使人們看到那些純屬個人氣質的種種因素在人的歷史活動中所起的作用。它避免了把豐富多彩的歷史寫得過于抽象的弊病，從而恢復了歷史人物本來的風采。本書對隋文帝、隋煬帝、唐德宗、唐敬宗、唐憲宗和唐宣宗等的論述，就是如此。

（三）本書在指出唐后期史料缺乏的同時，又盡量發幽鉤沉，積極探討過去隋唐史研究中涉獵較少或無人問津的研究課題，給人們描繪出唐后期比較清晰的輪廓。書中對唐德宗時崔造提出的以重新確立和加強中央職官權力為目的的786年改革、唐憲宗時裴彟的稅制改革、烏重胤建議的軍政制度改革、9世紀中央和地方關系的特點、監軍使制度、地方民團的建立和地方軍事化、晚唐時期中國權力的新結構、朱溫降唐后對宣武鎮的控制，以及885年李克用進攻長安時唐僖宗出逃情況等問題的論述，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本書的特點之三是，它在論述隋唐史時，沒有局限于隋唐史本身，而是將隋唐史放在中國古代歷史，特別是從漢至宋的歷史長河中去考察。通過這樣的宏觀探討，隋唐時期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等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就被揭示得比較清楚，讀者從而能對這一歷史時期的基本特點及它在中國史上的地位有比較清晰的了解。如在論述隋唐時期全國統一問題時，本書從秦漢帝國的崩潰、三國鼎立、西晉短暫統一、五胡十六國、南北分裂、隋唐統一、五代十國，一直講到北宋重新統一中國；在論述“安史之亂”及藩鎮割據時，也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從中國歷史上強調統一、反對分裂這一重大趨勢的角度進行剖析。在論述五代十國時，本書指出宋代中國的許多特征，如長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南中國沿海大量外貿，以及新文人階層在東南的集中，均應追溯至十國時期半個世紀的和平與穩定。宋代的另一些特征，則與北方發展有關。宋帝國的政治、軍事基礎在唐末已經打下，而使有宋一代感到苦惱的持久的外患，也顯然起源于唐后期。

本書的特點之四是它極其重視史料真偽和專題研究，并且廣泛吸取了各國的學術研究成果。

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由于自然和人為原因，現存史料不免有這樣那樣問題。歷史科學的任務，就是要去偽存真，還其本來面目，寫出真實的歷史。本書對待史料的態度比較嚴謹。在《導言》中，它對有關隋唐時期史料的來源、性質和價值等，聯系當時歷史背景，做了比較深入的分析，既指出了史料的珍貴價值，也指出了為尊者諱等缺陷。從本書的論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對史料既不輕信，又重視對原始資料的鑒別和使用。正因為本書是根據自己審慎選擇過的較為可靠的史料來論述的，所以它的論據比較扎實。

專題研究是綜合研究的基石。從本書的論述和大量注釋中，讀者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是在作者多年有關隋唐時期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專題研究基礎上寫成的。也正因為有這種較為深厚的功底，所以這部篇幅較大的斷代史才具有充實的內容和獨到的見解，而不是人云亦云。

科學研究總是在前人基礎上進行的。本書廣泛地吸取了英國、 日本、美國、法國以及中國的有關研究成果。本書之所以寫得較好，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作者們能將重視史料真偽、專題研究和廣泛吸取各國學術研究成果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本書各章篇幅長短不一，這說明它嚴格根據材料，有多少史料說多少話，因此內容翔實，論述有據。

本書注釋尤具特色，凡屬重要人、事都言之有據，有的注釋所列出處還不止一則，這就便于讀者檢索。注釋所引著作如加整理，就是一部很全的隋唐史參考書目。讀者可以從中了解世界范圍內長期以來隋唐史的研究概況。

當然，本書也存在一些問題，其中有的由于史學觀點不同，我們難以茍同，有的則為錯誤。具體表現在：

（一）本書在論述隋唐時期的農民起義時，除了宣稱裘甫的反抗為“真正的民間農民起義”外，把其他許多大大小小的民間的起義都稱為“叛亂”，反抗官府壓迫的人也幾乎一律被稱為“盜匪”。

（二）把吐蕃、渤海等地與日本、新羅等地相提并論。

（三）本書在論述歷史事件時也出現一些錯誤，或與中國傳統史籍記載不符，如將元文都等獻計使李密和宇文化及兩敗俱傷之事說成是王世充用的計謀；說李建成是被“砍死”的；把編《氏族志》的世家大族官員，說成是“其中無一人出身于世家大族”；把許敬宗對人講的話，說成唐高宗“命令許敬宗當朝宣稱”；把722年唐玄宗注《孝經》說成注《道德經》；安祿山當過捉生將，但被說成是“普通士兵”；把史朝義自縊而死說成“被殺”；把湖南監軍誘使桂州嘩變戍兵繳械，說成是唐王朝允許士兵在護送下返鄉，但“條件是他們應在湖南放下武器”；把尚君長等人被朝廷殺于長安，說成被宋威在當地處死；把劉漢宏劫官軍輜重說成劫王仙芝輜重；把885年李克用擊敗朱玫說成擊敗王重榮。在地名方面，有的重要地名未注今地名。有的地方的方位有誤，如把洛陽以西的陜州誤為位于“洛陽以東六十英里”；把河北臨漳的鄴城誤入河南，把今河南商丘的宋州誤入江蘇。

（四）本書在結構上也有不足之處。有些史事當寫未寫或少寫，有些可寫可不寫的則多寫。如五代只寫了后梁、后唐兩國朱溫和李克用的傳記式的史事，對后晉、后漢和后周只字未提，對十國的楚、南平、南唐和后蜀也未提及，對北漢只一筆帶過，對吳越、吳、南漢和閩的敘述僅寥寥數語，只有前蜀的內容稍為詳細一些。整個五代十國的篇幅僅六千余字，而唐玄宗一章就長達十萬言。另外，本書各章銜接得不夠緊密，出現了重復敘述同一人事的現象，重復二三次的不乏其例，而對“安史之亂”的重復敘述就更多了。

本書雖然存在上述的缺陷和不足，但瑕不掩瑜，它仍不失為一部有價值的斷代史巨著，值得一讀。

# 總編輯序

在英語世界中，劍橋歷史叢書自20世紀起已為多卷本的歷史著作樹立了樣板，其特點是各章均由某個專題的專家執筆，而由各卷學術地位較高的編輯中的主導編輯總其成。由阿克頓勛爵規劃的《劍橋近代史》共16卷，于1902—1912年間問世。以后又陸續出版了《劍橋古代史》、《劍橋中世紀史》、《劍橋英國文學史》以及關于印度、波蘭和英帝國的劍橋史。原來的《近代史》現在已被12卷的《新編劍橋近代史》代替，而《劍橋歐洲經濟史》的編寫正接近完成。近期在編寫中的劍橋歷史叢書包括伊斯蘭教史、阿拉伯文學史、論述作為西方文明中心文獻的圣經及其對西方文明的影響的圣經史，此外還有伊朗史和中國史。

就中國史而言，西方的歷史學家面臨著一個特殊問題。中國的文明史比西方任何一個國家的文明史更為廣泛和復雜，只是比整個歐洲文明史涉及的范圍稍小而已。中國的歷史記載浩如煙海，既詳盡又廣泛，中國歷史方面的學術許多世紀以來一直是高度發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幾十年為止，西方的中國研究雖然由歐洲中國學家進行了重要的開創性勞動，但取得的進展幾乎沒有超過翻譯少數古代典籍和編寫主要的王朝史及其制度史史綱的程度。

近來，西方學者已經更加充分地利用中國和日本的具有悠久傳統的歷史學術成果了，這就大大增進了我們對過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細的認識，以及對傳統歷史學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這一代西方的中國史學者在繼續依靠歐洲、日本和中國正在迅速發展的中國學研究的扎實基礎的同時，還能利用近代西方歷史學術的新觀點、新技術以及社會科學近期的發展成果。而在對許多舊觀念提出疑問的情況下，近期的歷史事件又使新問題突出出來。在這些眾多方面的影響下，西方在中國研究方面進行的革命性改革的勢頭正在不斷加強。

當1966年開始編寫《劍橋中國史》時，目的就是為西方的歷史讀者提供一部有內容的基礎性的中國史著作：即按當時的知識狀況寫一部6卷本的著作。從那時起，公認的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現、新方法的應用和學術向新領域的擴大，已經進一步推動了中國史的研究。這一發展還反映在：《劍橋中國史》現在已經計劃出14卷，這還不包括王朝以前的最早時期，并且還必須舍棄諸如藝術史和文學史等題目、經濟學和工藝學的許多方面的內容以及地方史的全部寶貴材料。

近十年來我們對中國過去的了解所取得的驚人進展將會繼續和加快。進行這一巨大而復雜的課題的西方歷史學家所做的努力證明是得當的，因為他們所在各國的人民需要對中國有一個更廣更深的了解。中國的歷史屬于全世界，不僅它有此權利和必要，而且它是激發人們興趣的一門學科。

費正清

崔瑞德

1976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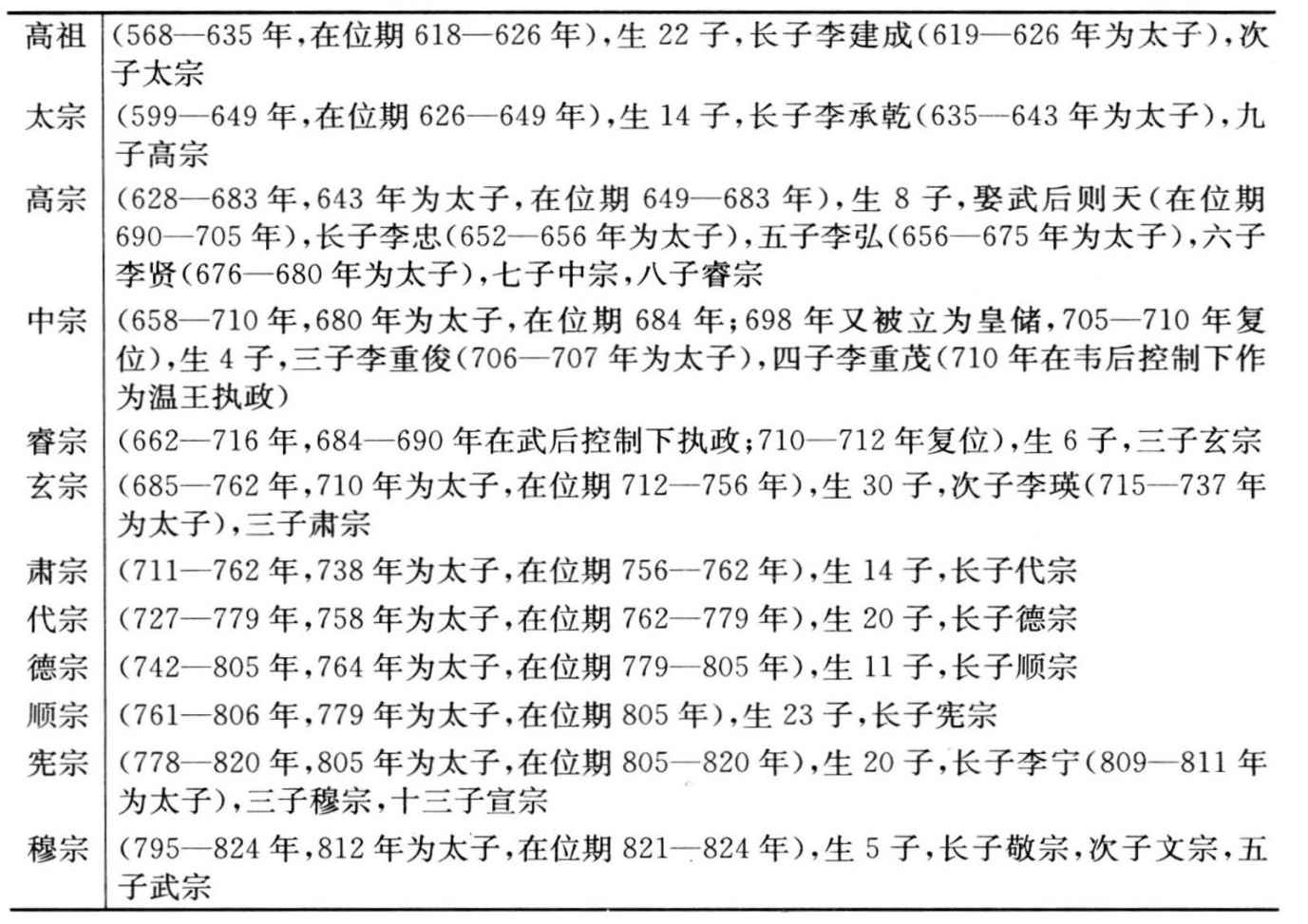
# 圖表

表1 隋帝及其在位期



注：詳細情況見慕阿德《中國歷代的統治者（公元前221年至1949年）》（倫敦，1957年），第34頁。

表2 唐皇室家系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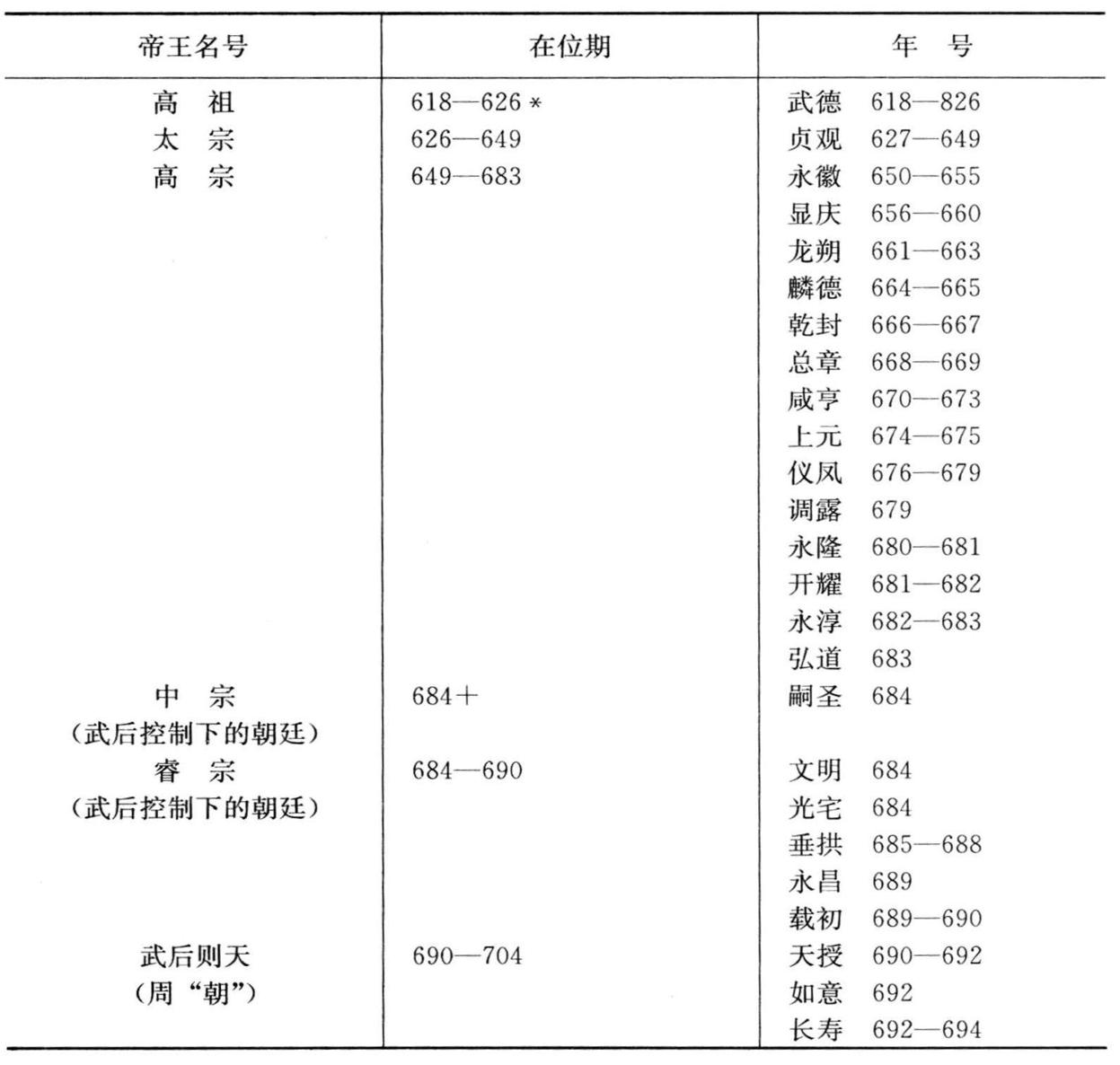


續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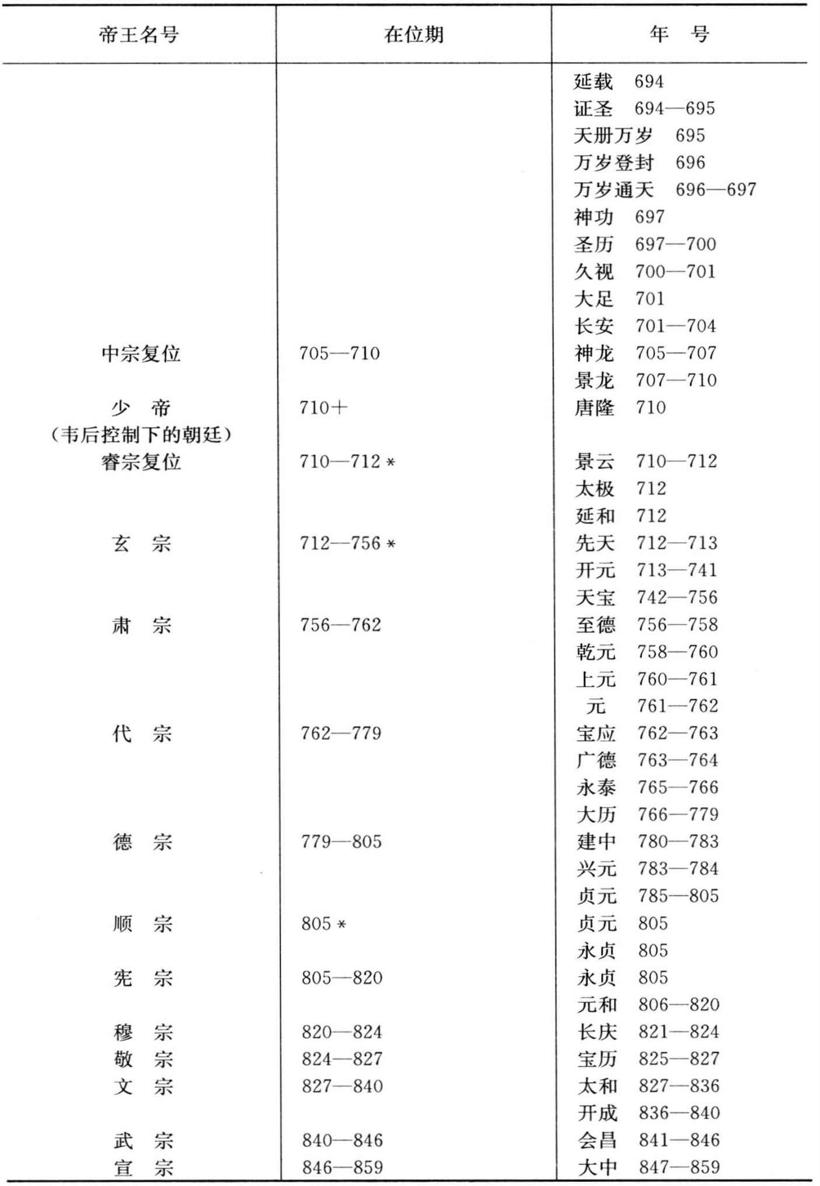


注：本表所列為在位的皇帝及未繼皇位的太子。其他諸王有被授予太子稱號作為哀榮的，實際上不是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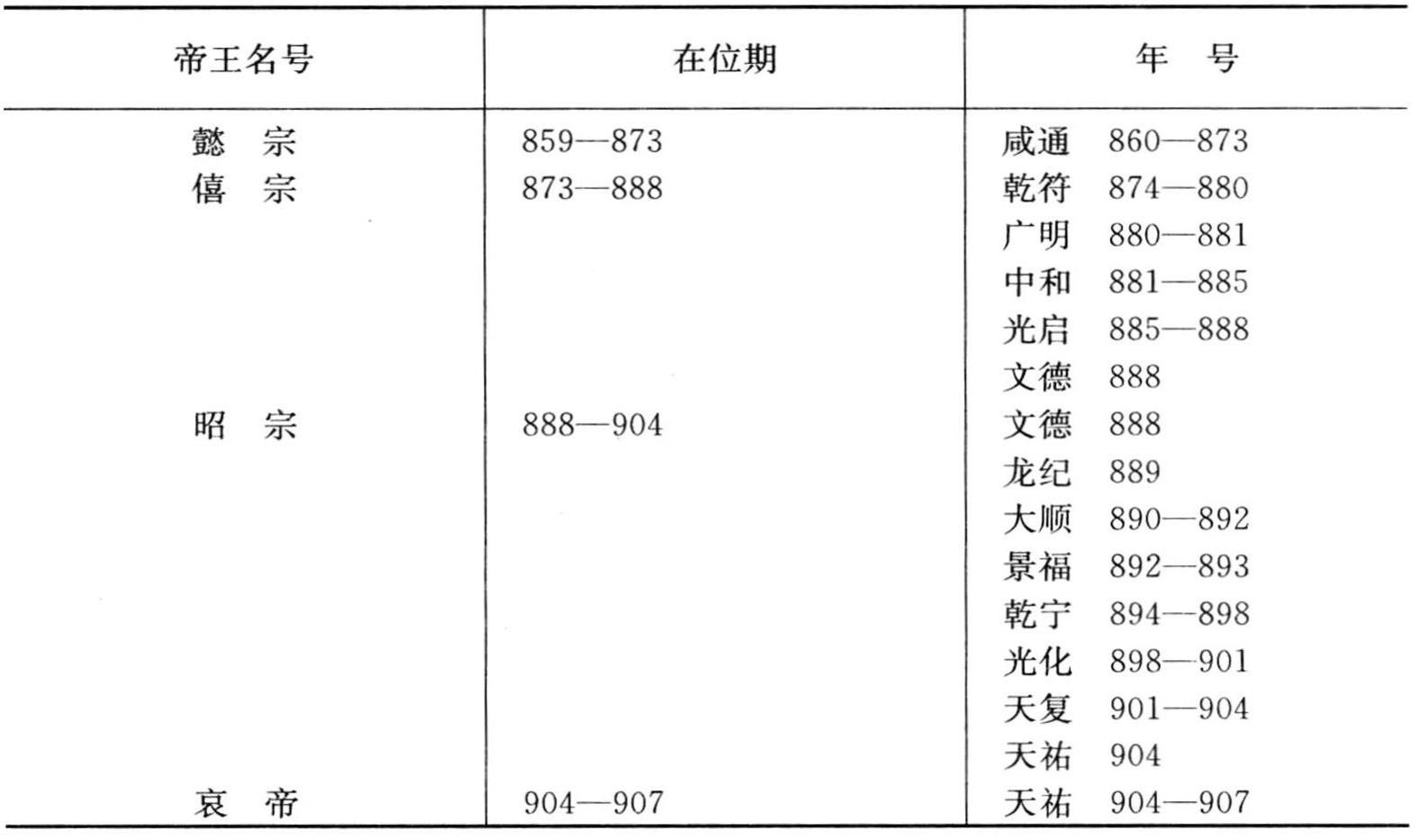
表3 唐代諸帝及其在位期



續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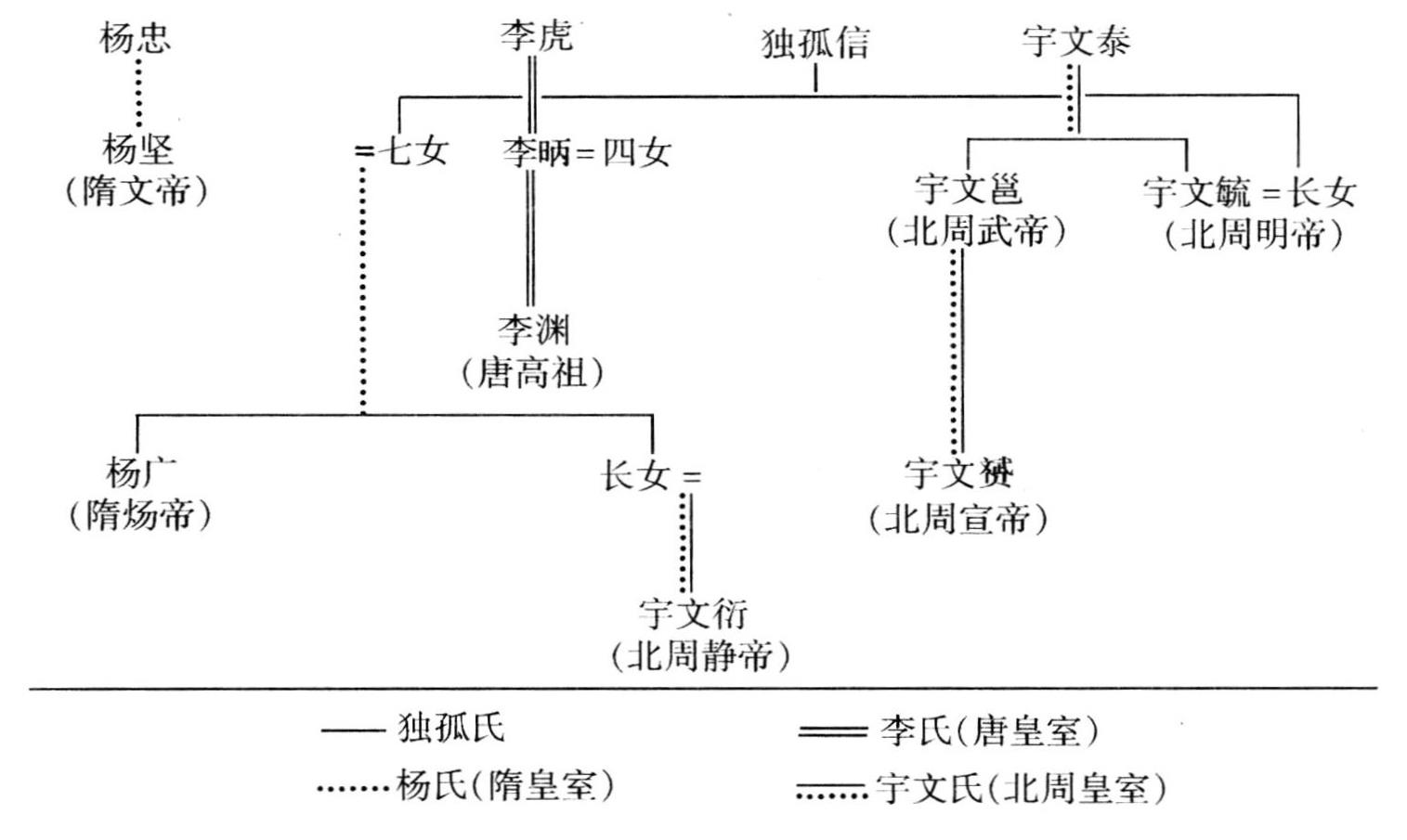


續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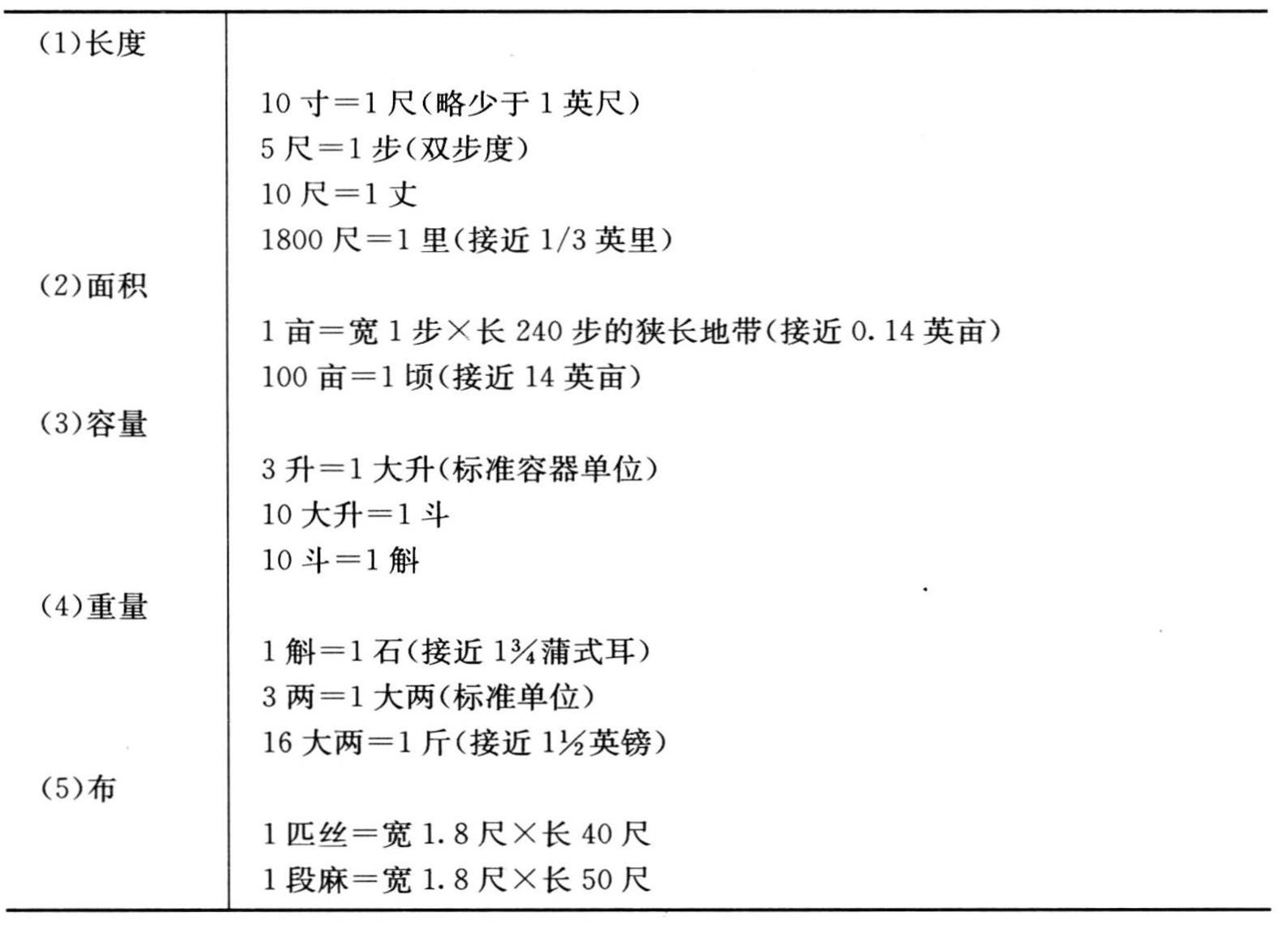
注：詳細情況見慕阿德：《中國歷代的統治者（公元前221年至1949年）》（倫敦，1957年），第54—62頁。關于詳細的歷法，見平岡武夫：《唐代之歷》（京都，1954年）。  
\*退位；  
＋被廢。

表4 皇室的聯姻關系



注：楊忠、李虎和宇文泰（分別為隋、唐和北周的皇室創始人）與獨孤信一起在西魏時期都當過高級將領，前三人之子娶后者之女為妻。

表5 唐代的度量衡制



注：詳細內容見S.巴拉茲《唐代經濟史文集》，載《柏林東方語言通報》，63（1933年），第49頁以后。

# 第一章 導言

論述隋唐時期（581—907年）歷史的篇幅占兩卷，本卷為第一卷。它旨在為讀者提供這一復雜時期的一部記敘體著作。在此期間，中國在政治制度、與鄰國的關系、社會組織、經濟以及思想、宗教和藝術生活的各個領域等方面都發生了廣泛的變化。下一卷將詳細論述制度、社會和經濟變化以及思想發展等大問題，并附有這兩卷的參考書目。

只要瀏覽一下這一參考書目，就可以看出許多近代的學者已對唐代進行了專門研究。中國學者因視它為中國政治力量和影響的鼎盛時期和在文化、藝術等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王朝而深為注意。日本學者之所以專心致志于隋唐時期的研究，不僅因為他們對這一時期有內在的興趣，而且因為在此期間日本深受中國制度的影響。結果，日本學者對隋唐時期的中國自然有一種深入和本能的了解，因為后者給他們自己的國家結構、法律、制度、藝術、文學甚至文字，都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西方學者也早就對這一時期著了迷，1753年耶穌會宋君榮神甫完成了第一部完整的西文唐代政治史；[[1]](#_1_Song_Jun_Rong____Tang_Dai_Shi)近幾十年，他們為促進人們對唐代的認識又作出了自己杰出的貢獻。

雖然隋唐時期比19世紀以前中國史中的任何時期更加受到近代史學家的嚴謹的研究，但最廣義的政治史卻被忽視了，而且被視為理所當然。令人奇怪的是，本卷論述的大部分內容甚至連近代的中國歷史學家也未詳細考察過。只有隋代、唐代初年、武后在位期、玄宗后期和9世紀的前幾十年才受到應有的嚴謹的剖析。至于其他的時期，最佳的概述依然是非常明晰、審慎和帶批判性的著作《資治通鑒》，此書為司馬光等人合寫，成書于1085年。[[2]](#_2_Guan_Yu_Si_Ma_Guang__Jian_Pu)隨著本卷編寫工作的深入，我們對這位史壇巨子的仰慕之情也與日俱增。編寫《劍橋中國史》的原來的目的是提供當前認識狀況的概要，但結果這幾卷的所有章節體現了對過去忽視的課題的新的研究成果。因此，有些成果仍是假設性的。但是把許多個別的專題的研究成果通過按年代排列的詳細記載聯系起來，這就突出了迥然不同的領域的發展之間許多未知的關系。我們確信，本卷將為讀者提供歷史的前因后果，這又將給下一卷更專門的研究增添新的意義。

通過本導言，我將扼要說明貫穿于這一時期并吸引過去學者注意的幾個主要論題，同時提請注意因我們掌握的原始材料的性質而引起的幾個復雜的根本問題，因為它們大大地限制了近代史學家的成就。本卷對各個階段的論述詳略不一，這與我們掌握的各階段文獻資料的多少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 全國統一的形成

在這幾個世紀中，最重要的一個長期歷史發展是始于重新建立了中國的大一統。在此之前，秦漢建立的統一帝國已經崩潰。2世紀后半期中央權威日益衰落，許多地方權力結構隨之成長壯大。2世紀80年代的黃巾之亂和其他民變及隨之出現的幾十年的內部沖突和近于無政府的混亂狀態，最終破壞了漢政府的有效的力量和權威。武力成了權威的唯一源泉，皇帝成了受武將控制的傀儡。強大的地方權貴在一定程度上維持著地方的穩定和法律秩序，他們個人擁有大量土地和眾多依附于他們的農戶和武裝門客。220年，當最后一位無權的漢帝讓位給他的一位大將時，中國分成三個地區國家，它們的中央政府都沒有全盛時期漢朝的那種毋庸置疑的權威。雖然晉在280年短期內重新統一全國，但新政權并無有效的力量，并很快成了嚴重內亂的犧牲品。幾乎不久，即在4世紀之初，北方被一批批異族的游牧民族所蹂躪，晉只作為一個地區政權而在南方茍延殘喘。入侵者在西北有吐蕃血統的羌和狄，在北方有匈奴及各種突厥人、準蒙古人和通古斯人。他們蹂躪了原來為中國最先進、最富饒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令人眼花繚亂地建立起一個個短命的小王朝。北方經受了一個多世紀不斷的戰爭、混亂、破壞和自然災害的苦難，才在440年由拓跋突厥人建立了一個穩定而統一的北方政權（北魏）。

雖然拓跋人在幾十年中試圖保持他們的文化特征，但他們與其前人一樣，發現自己不得不采用中國的制度并且與中國的社會精英合作。他們的傳統的部落貴族感到自己快被其中國臣民同化，于是做出了強烈的反應；隨之產生的緊張對立使北魏帝國分裂成兩個國家，即國中非漢族成分仍最為強大的西魏（557年成為北周）和東北的東魏（550年成為北齊）。最后，在577年，北周征服北齊，重新統一中國的北方，再度樹立起西北人的政治和軍事的支配地位。

這幾個世紀非漢族所占的政治和社會的支配地位給中國北方的社會和制度帶來很深的影響。各個外來統治王室的貴族經常與中國社會精英聯姻。特別在西北，那里出現的兩個貴族集團所形成的社會精英與傳統中國的統治階級迥然不同。這兩個集團一為山西中部和北部的代北貴族，一為其權力基地在山西西南、陜西和甘肅的強大得多的關隴貴族。它們的成員不但是混血兒，其生活方式也深受游牧部落風俗的影響；甚至到了唐代以后很久，它們之中的很多人仍既講漢語，又講突厥語；它們基本上是軍人集團而不是文人精英，過一種艱苦而多活動的室外生活；另外，如同其他游牧民族，它們的婦女遠比傳統中國社會的婦女獨立和有權威。

在東北平原，山東（太行山以東地區，即今河北、河南和山東）的幾個大貴族世家竭盡全力想保持它們作為漢代文化真正繼承人的社會和文化特征。它們注意不與外來的貴族通婚，在一定程度上不卷入宮廷的政治斗爭，在自己的地方根據地上保持強大的力量。

隋作為北周的后繼者而崛起。與北周的統治王室一樣，開國者楊堅（未來的文帝）的家族也是西北的關隴貴族。這個家族的成員曾先后為北魏和西魏效勞，而它本身就是一小批創建北周的強有力的家族之一。這批家族還包括獨孤氏（楊堅之妻的家族）和未來唐王朝的李氏，它們通過復雜的婚姻紐帶而互相發生關系和與北周王室發生關系。[[3]](#_3_Jian_Qian_Lie_Tu_Biao_4__You)根據以后發生的大事，隋朝雖然標志著中國歷史延續性的一個大斷裂，但帝國的繼承和創建在當時不過是一次宮廷政變，是西北的一個貴族家庭接替另一個家族即位。后來唐朝的繼承也不過是把皇位移向這一緊密結合的家族集團中的另一個家族而已。在7世紀和8世紀初期，隋室的楊氏、獨孤氏以及北周宇文氏王室的成員依然遍及各地，勢力極大。

隋不僅使由西北各貴族大族組成的小集團的政治優勢得以綿延，它還通過在前一世紀已被北方諸王朝所采用并行之有效的制度繼續組織它的帝國。在這一方面，唐朝也繼續沿著幾乎同一條路線走下去。因此，在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集團和政治制度方面都存在著從北魏一直持續到唐初的強有力的延續性。

隋文帝執政初期是在北方鞏固從北周接管的政體。不到幾年時間，隋朝便制定了新的法典，改造了地方政府的混亂體制并使之合理化，把京畿的官署和地方的衙門結合成由強有力的中央控制的統一的官僚機器，振興了國家的財政結構，沿北方邊境加強了對突厥人的防務。與北魏和其他北方王朝一樣，隋號稱是中國的合法統治者。隋文帝現在開始把它變成現實。

對南方的征服提出了幾個嶄新的問題。中國的南方最初被晉統治，后來又由幾個短命的王朝——宋（420—479年）、南齊（479—502年）、梁（502—557年）、陳（557—589年）——來統治，這樣一直搞了兩個世紀。南朝都以豪華奢侈的建康（今南京）為京都來發號施令，并被一小批強有力的貴族門閥及其武將所操縱。它們政治上不穩定，它們統治的時期不斷發生宮廷陰謀、政變和篡位，它們不時企圖收復北方，但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南朝的中心在長江下游，但在這幾個世紀的主要成就表現在中國人開始向江南地區移民，表現在安撫和同化那里的土著。

雖然南朝弱于北方，但在某些方面卻比北方先進。南方的大家族大都是從北方逃難來的，自以為與北人的氣質迥然不同，鄙視北人，認為他們粗魯、土氣，是半野蠻人。他們稱自己是漢文化的標準的繼承者，并發展了一種特別典雅的文體、自己的哲學和佛學學派以及自己的溫文爾雅的社會習俗。[[4]](#_4_Guan_Yu_Nan_Fang_He_Bei_Fang)但兩者最根本的差別并不表現在生活方式的不同和競相聲稱自己擁有更優秀的文化這兩方面。

3世紀和4世紀的混亂對北方產生了社會和經濟的深遠而持久的后果，大批人逃亡（特別從西北），希望在四川、淮河和長江流域等比較安定的地區避難和尋求新生活。數百萬人在4世紀的不斷戰爭中喪生。北方的大片土地遭到破壞，人口減少，耕地荒蕪，因此北方諸政體不斷地力圖鼓勵它們的人民利用土地獲益。在拓跋人統治下，奴隸制又大規模出現了，這又引起了社會混亂。北方的大部分地區又恢復了自給自足的耕作制，社會傾向于密集在由一個或幾個大族控制的小地方單位內。交易和商業衰落，貨幣被廢棄。北朝諸政體就是針對這種局面制定它們的制度的；它們征收實物，政府的大部分次要的職能都是通過勞役來完成的。

南方的土地一旦被開墾，就遠比北方的肥沃，產量就高得多；南方廣泛采用的水稻移植法使它能生產大量剩余糧食。貿易繼續發展，貨幣的使用也日趨廣泛。南方諸政權對商業實行課稅；貨幣在財政體制中起了比較重要的作用。

隋朝對南方的實際征服是比較容易的。當時南方有兩個政體。位于今湖北省的后梁曾是北周的附庸國，在587年很容易地被制服。位于南面和東南面的以建康為根據地的陳，經過了一次短暫的較量也在589年被征服，帝國的統一終于完成。實際的征服是以最小的流血犧牲和破壞完成的。開明的和富于想像力的政策又鞏固了這次征服，因為這些政策贏得了南方統治階級的效忠并把它們并入隋的官僚集團之中，而平民百姓并沒有額外增加負擔或完全受制于北方的土地制和稅制。到了7世紀初期，南方已成為財富和儲備的一個重要來源。在隋代的第二個皇帝煬帝統治期間，一個運河網絡被建成，它把長江流域與黃河和今北京附近的地區連接起來，從而使隋能夠以南方的糧食和物資來供養其宏大的都城大興城（今西安），并給北方邊境提供戰略物資。這就為南北方的統一提供了具體形式。

中國的重新統一證明是一個扎實而持久的成就，但隋王朝本身卻很快就每況愈下。隋朝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建立，進行一些巨大的公共工程（如建造長城和建設運河網絡）所付出的代價和造成的死亡，這些引起了國內的緊張，而國內的緊張又轉而引起普遍的苦難和不滿。由于煬帝妄想把中國的勢力擴大到原來漢朝的西北疆土和朝鮮北部（此時已是強大和組織完善的高麗國的領土），這又把事情弄得更糟。對高麗進行的一次次代價高昂但勞而無功的討伐造成了普遍的混亂，致使隋王朝的國力喪失殆盡。不過在隋滅亡以后，雖然有許多人爭奪權力，但把中國分裂成為若干地方割據的國家的任何現實的威脅再也不存在了。617年隋最后垮臺以后的問題是，哪一支叛軍能夠取代它而主宰全帝國。

甚至在勝利者唐朝時期發生的大事也證實了這一點。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國內安定以后，755年的安祿山之亂幾乎把王朝打倒在地，當時這一建于7世紀的強大而高度集中的政體證明已不能生存下去，除非它去與這次叛亂造成的強大的地方自治勢力妥協。中國有些最富和最重要的地區實際上已不受中央的控制。但它們并不企圖通過成立地方割據的國家以維護自己的獨立，而寧愿繼續留在一個統一的中國政體的結構之內。

后來，在9世紀后期，群眾普遍的不滿導致了災難性的黃巢叛亂，隨之使國家分裂成十來個地方政權。它們是唐后期地方割據的產物，這種獨立既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也是因為中央權力的徹底崩潰。它們多數是完全能夠生存的國家，大約過了70年宋朝才把它們之中的最后一國重新統一在自己版圖之內。但帝國終究會重新統一，這是被視為理所當然之事。北方的有些地方在10世紀初期也陷于異族鄰邦之手，淪陷時間達四個世紀以上。但它們一直被視為應待收復的外人統治之地。

總之，政治分裂被認為是萬物自然秩序臨時的失調，在適當時候通過一個新的中央集權政體的興起，這種狀態就將告終。安祿山之亂以后，當人們十分清楚地意識到中央權威的衰亡時，他們心目中不是把它比作晚近的分裂局面，而是比作周代后期，即周王的權威下降并受到封建主權力挑戰之時。人們以封建——即分權和把權力轉移給地方封建主——大勢來看待這一形勢，而不僅僅看成是帝國的瓜分。

因此，隋唐兩朝終于樹立了中國一體化的思想，即一個領土統一的帝國的思想。下面將要談到，它們還建立了唯中國的軍事和政治勢力馬首是瞻的外圍領土地帶；也許更重要的是，它們建立了由若干獨立國家組成的隔離地帶，中國的文化、思想體系、文學、藝術、法律和政治制度及使用的文字在這些國家中處于支配地位。

## 制度變化

隋唐時期發生的第二個歷時甚久的大變化是政治生活類型發生的徹底改變。從6世紀后期到11世紀這段時期，中國的社會和生活的各個方面起了徹底的變化，這只有從公元前500年至漢代初期的根本變化可以相比。甚至9世紀的歷史著作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組成有了完全的變化；在11世紀，沈括在尋找與隋代以前相似的社會秩序時，只好著眼于與他當時的中國迥然不同的印度社會。

在近代歷史學方面，內藤虎次郎在清朝已亡、中國的傳統秩序正在崩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首先研究了這一大問題。內藤認為，唐代和宋初代表著中國“中世”期的終結和“近世”中國的開始。這里的近世的意思是，那時開始定型的政府、行政和社會組織的類型基本上也就是傳至他的時代的那些類型。[[5]](#_5_Guan_Yu_Nei_Teng_De_Li_Lun__J)

他非常概括地闡述了這些變化的特點，現轉述如下：在漢亡以后的漫長的大分裂時期，中國已被若干貴族集團控制，它們在地方和全國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優勢是毋庸置疑的。它們不但壟斷了高級官職，而且大力推行強調出身和社會地位的官員薦舉制，這樣，它們的勢力就深深地在各級政府中扎下了根。它們一直是一個封閉的圈子，實行內部通婚，只有在取得政治利益時才與圈外的人結婚。有些貴族與北方的非漢族征服者聯姻，6世紀北方諸王朝及隋、唐的統治王室就是從這部分貴族中產生的。到此時為止，某個統治王室不過是一個特定的、暫時為帝的貴族氏族。保持巨大財富和權勢的其他大貴族氏族不過把皇室看做其中的佼佼者罷了。皇帝與同一社會出身的高級官員關系密切；一些重大政務是與他們在非正式會晤時決定的。因此，皇帝不得不通過貴族同伴并在與他們相互獲益的情況下進行統治。

在隋代，特別在唐代，隨著全帝國的再統一，這種狀況起了變化。貴族的力量逐漸衰弱，他們在政府中的地位被職業官僚所代替，這些職業官僚依靠自己的才能和教育程度并通過科舉登仕，成了統治王朝的代理人，而不是本社會集團的代表。這樣就擴大了統治集團的社會基礎，使出身于小家族的人也能進入官場。舊貴族逐漸消失。

隨著政府官員的這一變化，皇帝的地位也改變了，他再也不僅僅是貴族精英中的第一號人物，這些貴族精英中的一些人（如在唐代）甚至藐視皇室，認為它是社會的暴發戶。由于沒有貴族的挑戰，由于有了依靠王朝才能取得官職、權力和勢力的官僚集團，皇族以一種嶄新的面貌雄踞于普通社會之上，同時皇帝開始逐漸地擴大了他的專制權力，它在明代而達于極點。結果是皇帝與社會之間、皇帝與他賴以進行統治的官員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擴大了。

內藤只是很籠統地闡述了他的理論。他原來不是搞學術的歷史學家，而是一位從19世紀90年代起開始研究中國的新聞工作者和時事評論員。另外，他寫作時近代西方歷史科學才剛剛開始應用于中國的過去。他的觀點已被后來的學者作了許多修正和提高。我們現在對唐代社會的組成和對政治、制度變化的確切性質等方面的了解，遠比他的時代詳細。我們知道，“貴族”是一個比內藤想像的要復雜得多的社會階層，他簡略地談到的各種變化是逐步實現的，它們的最后結果要到11世紀才變得明顯起來。但是，內藤勾畫的總的輪廓，雖然主要憑直覺了解，對近代研究的發展來說卻仍是站得住腳的一家之言。

他的理論本質上是政治分析，雖然他把政治變化置于一個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廣闊背景中來考察。他的幾個后繼者，特別是接替他在京都大學執教的宮崎市定，并不那樣傾向于把重點放在政治發展方面，而是深入研究經濟和社會史中若干主要的基礎問題。[[6]](#_6_Li_Ru_Jian_Gong_Qi_Shi_Ding_D)他們還竭力想把中國的歷史納入世界史的總的發展類型中。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如此，他們組成的一個重要集團認為，雖然晚唐是中國歷史中的一個重大轉折期，但不如說它是奴隸社會階段和封建主義階段之間的過渡時期。我將在以后再論述這些問題。

解釋這一時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個大貢獻是偉大的中國史學家陳寅恪作出的。[[7]](#_7_Chen_Yin_Ke_De_Li_Lun_Zui_Zao)在戰爭年代重慶出版的兩部主要著作和20世紀四五十年代發表的許多論文中，他提出的關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個觀點遠比以往發表的任何觀點扎實、嚴謹和令人信服。在使我們了解這一時期方面，他的主要貢獻是對不同的對立集團和利益集團的分析，因為這些集團為唐代的宮廷政治提供了動力。他認為唐代是一過渡時期，在此期間統治皇室（其本身就是緊密結合的西北貴族中的成員）主持朝廷，這個朝廷開始時被同一社會集團的人控制，然后圍繞貴族中對立的地方集團分化，再后來由于舊貴族和通過科舉考試而成為職業官僚的新階級不斷摩擦而分裂。他認為科舉制度是為王朝提供官僚精英的一種手段，這些人依靠王朝而不是依靠高貴的世系和世襲特權取得地位和權力。陳教授及其支持者中的某些人主張，經過考試吸收的官僚集團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因于武后的審慎的政策，認為武后是旨在打破西北貴族對政治力量的壟斷的“外人”。有人提出過一些很無說服力的論點，試圖考證這些“新官僚”就是新興的商人和地主階級。

陳寅恪的觀點已受到詳細的質問：武后促使官僚集團內部產生一批科舉出身的官員的作用肯定被夸大，也許被誤解了；新官僚大部分從貴族的下層中吸收，后者的組成比他設想的要復雜得多；朝廷的黨爭只是偶爾圍繞著貴族集團和中舉士子的緊張對立才兩極化，而黨派大部分是某一特定問題造成的短暫的結合，而不是他設想的那種長期結盟；貴族保持的控制比他認為的控制程度更大，時間更長。[[8]](#_8_Yao_Le_Jie_Zhe_Fang_Mian_De_M)然而，他的分析對以后的研究證明是非常有成效的出發點。陳的分析經過巧妙的發揮和提高，已成了浦立本研究玄宗執政最后幾年唐代政治史這一最重要的著作的基礎，[[9]](#_9_Pu_Li_Ben____An_Lu_Shan_Zhi_L)此書的每一章節都很得益于陳的研究成果，雖然陳對具體問題的明確的觀點受到了挑戰。

陳寅恪不但注意對立的貴族集團之間和宮廷黨派之間的斗爭，他同樣提出了制度發展方面有創見和有洞察力的觀點。[[10]](#_10_Chen_Yin_Ke____Sui_Tang_Zhi)他確定了唐政府中出現的另一個根深蒂固的緊張局面：一方是隋唐從北方諸王朝（可追溯至北魏）繼承下來的制度，上面已經談過，這些制度是為比較原始和簡單的社會制定的；一方是出于把它們應用于重新統一的帝國中遠為復雜的形勢的要求。他指出唐代政府的各個方面是怎樣處于一個激烈變化的時期的，這些繼承的制度在此期間或被修改，或被更先進、更適用于新形勢的體制所代替。

在過去40年，大量研究這類制度變化的文獻問世了；現在已經清楚，如同其他方面那樣，隋唐橫跨兩個迥然不同的時期，激烈的變化發生在8世紀；但由于名稱的沿用，由于一些不再起作用和已經有名無實的機構制度的名稱的存在，這些變化常被弄得模糊不清。現在仍需要對個別的制度進行詳細研究，我們才能有把握地進行綜合，但對已經出現的主要研究路子我們可概述如下。

像上面已經提到那樣，隋代和初唐不是制度劇變或創新的時期。其真正的成就是修改現行的行政方法，以適應大大擴大的帝國的需要以及變化和變化中的社會秩序。這是一個使行政程序合理化、簡化和效益化的時期；是消滅冗員（例如在地方政府）和多余法律的時期。公元583年隋朝法典的篇幅是北周法典的三分之一，是南梁503年頒布的法典的五分之一。它又是行政活動進行法典化和正規化的時期，當時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對長治久安滿懷著信心，致使政治家們都傾向于以全帝國適用的統一制度和社會行為的持久準則來考慮問題，而不是用老經驗來處理出現的具體問題。

人們通常認為太宗之治（626—649年）是唐代“理想制度”的形成時期，是一個以良好和井井有條的施政著稱的統治期。8世紀后期和9世紀的作者在懷舊時當然把它說成是黃金時代。但事實上太宗在執政時并沒有制定新制度，政府的政策也沒有大變化。政府的基本結構、行政的細節以及政府干預的限度這一十分重要的問題早在隋代已被建立和解決，只是在唐高祖時期稍加修改后又被采用，并體現在624年頒布的一些法典化的法律中。

太宗的真正成就不如說是他進一步鞏固了唐朝的力量以及他個人的施政“作風”，后一成就使他能在高級官員內部不同的強大貴族集團中樹立牢固的優勢。他的最早的修史者之所以贊譽他，不僅僅是因為他在鞏固唐朝國內外的力量時作出了毋庸置疑的成就，更多的是因為他果斷堅強，同時又是明智仁慈的君主，一貫愿意傾聽他的一批親密而有才能的智囊的意見。事實上他被譽為一位明君，他行使權力的做法符合傳統儒家的道德倫理和反制度的理想，因而他同官員和傳統的歷史學家有心心相通之處。

在與大批大臣的日常會晤中，他的政府也對上層官僚廣開言路，努力使他們為王朝矢效忠誠，同時也加強了他們的團結精神。[[11]](#_11_Guan_Yu_Ta_Zai_Shi_Zheng_Zhe)

初唐政府是簡樸和節省的。晚至657年，唐朝只有13465個有官品的官員來管理可能超過5000萬的人口。兵制由民兵保持在最低水平上，這些隊伍是自給自足的農民，每年輪班服役。政府的日常工作盡量交給挑選的納稅人以勞役的形式去完成。中央對地方政府的控制已經牢牢地建立起來，地方的官員也被納入單一的官僚機構內，州縣的職位已不像分裂時期那樣由地方的望族把持。但是，中央雖然牢牢地控制到縣一級，人們公認中央的政策和干預只能在以下幾個很有限的活動領域內實行：法律和秩序的維持，司法、稅收及有關的人口登記和土地分配工作，以及對服兵役和勞役的勞動力的動員。由于地方官員自己不掌握強迫本地居民的武力，地方對政府政策的貫徹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縣官與大批基層的胥吏和村長協商辦理，后兩種人既是國家的小雇員，又是地方社會的代表。這樣做的目的是在京師頒布的政策和地方的可行性及承諾能力之間進行協調。過于高壓的干預政策是完全不可能的。執行法律太嚴酷的官吏更可能遭到責難和懲處，而不是受嘉獎。

因此，協調和調節是整個行政體制中的關鍵。在中央政府中，強大的貴族集團中的既得利益者仍然幾乎提供政府中的全部高級官員，所以皇帝要受到牽制，就像地方官員也被他施政的環境所牽制那樣。

這種平衡并沒有維持很久。太宗的軍事野心推動他向中亞擴張，并且又企圖收回漢代的滿洲和朝鮮的領土。他的繼承者高宗繼續進行這些征討，到了7世紀70年代，唐代已在波斯邊境建立了它的保護國，占領了塔里木和準噶爾，并在朝鮮打垮了高麗，不過卻未能如愿地把它并入帝國。由于這些征服活動以及需要建立長期的戍邊部隊以防御北方突厥族這個傳統的敵人和新出現的搞侵略擴張活動的吐蕃國，唐朝亟須建造巨大而昂貴的防御設施。在國內，官僚機器不斷擴大和日趨復雜。開支激增，有入不敷出的危險。稅制受到了壓力，政府不得不開征新課。

朝廷的政治平衡也被破壞。太宗有事必躬親的行政作風，他與官僚集團樹立的共同使命感，在他死后不久已不存在。繼承者高宗是一個病夫，他日益受到其無情的武后的支配，后者在他死后控制了朝廷，最后在691—705年期間自立新朝，自己稱帝（中國歷史中唯一的女統治者）。其政治制度恐怕不像傳統歷史學家聲稱的那樣混亂。但她的統治期在政治上引起了很大的變化。她的施政作風是專橫高壓，使用特務并不斷進行清洗。她企圖消滅李唐宗室的力量，使許多人被殺；她有意識地抑制王朝的主要支持者，即西北的世家大族。她使用任性和殘暴的施政方法，破壞了官吏階級的信心，并且給予她寵幸的一批批小人過分的權力。但出現了兩個重要變化。第一，在以前的朝廷中作用甚小的出身于東部平原大族的官吏，現在開始擔任高官，因而不同地區貴族集團之間的黨爭不再是政治中的主要因素。第二，從長遠觀點看更為重要的是，一批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的官僚精英開始在最高的宮廷機構中任職。[[12]](#_12_Guan_Yu_Ta_Zhi_Zheng_Shi_Shi)

科舉制不是她的創造。它始于隋，并在初唐小規模施行。武后本人通過考試吸收的人較少。新形勢之出現，部分是由于已經出現一批經過考試任職的官員，他們已有擔任高官所必需的高齡和資歷。此外，她本人似乎有意識地選拔中舉士子擔任朝廷的“清望官”（機要的咨詢和審議之職），這些職務是由低級人員擔任的。中式士子開始被起用為官僚集團中的一批精英，他們有希望青云直上并可長年累月在中央政府中供職。這些人大部分出身貴族，有的來自一直控制朝廷的“全國性貴族”中的高門大戶，有的來自有同樣悠久歷史的地方望族中的小“州縣貴族”。官僚集團中由此產生的緊張對立，與其說是像陳寅恪提出的那種階級出身不同的結果，不如說是官僚結構內對立的職能集團的分歧的產物。

當武后在705年垮臺和唐中興時，政府到處呈現緊張的征兆。但沒有立刻進行補救，因為武后的繼承者中宗證明是一個無能的統治者，受皇后韋氏的控制；而韋后與其親屬進行大規模的貪污活動，通過公開賣官鬻爵來擴大官僚集團。

在玄宗（713—755年）統治時期，王朝又處于堅強的領導之下，國家高度繁榮，文化輝煌燦爛，因此這一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中的幾個盛世之一。但在他執政期間，因以前幾十年的危機而必須進行的改革造成了一系列意義深遠的變化，它們即將激烈地改變中國的歷史進程。[[13]](#_13_Pu_Li_Ben____An_Lu_Shan_Zhi)

在中央政府內部，自隋代傳下來的門下、中書和尚書三省之間精心安排的權力平衡和職能分工遭到了破壞。在前幾代作為皇帝的非正式咨詢機構的龐大的宰相集團，這時的人數減到四人以下，他們兼有制定政策和最高行政長官的大權。門下省和中書省合而為一，成為代替兩者制定政策和草擬法律的單一機構。尚書省單純地成為政府的執行部門，它的首腦不再是宰相，也不參與對政策的磋商。這樣，宰相們行使近乎獨裁的大權的道路被打開了。[[14]](#_14_Jian_Sun_Guo_Dong___Tang_Dai)

皇帝不再定期與大批大臣商討政策，開始越來越依靠從集賢院和翰林院等文士薈萃之地出身的一批批年輕低級官員來幫助他起草文件和擬訂政策。他還開始使用宦官做他的私人代理人，以繞過正規的行政手續。這些發展開始破壞正規官僚體制的權力和影響，打破日常政務的有條不紊的秩序，制造皇帝與官吏之間的鴻溝；隨著玄宗日益倦于政事，轉而沉溺于宗教生活和尋歡作樂，這一鴻溝就加大了。

另一大變化是成立專司官署來解決緊急的行政問題，特別是財政問題。這些機構不編入正規的官僚組織，它們的掌管大臣擁有大權，能雇用大批人員，其中許多人還是專家。結果官僚集團內專業化和職業化日益發展，這就侵蝕了原來的信念，即認為官僚只須接受無官不會做的通才訓練，而讓下屬去搞專門技術。[[15]](#_15_Cui_Rui_De____An_Lu_Shan_Zhi)

財政制度的廣泛變動還與原有的統一行政的思想背道而馳。新稅按納稅人的財富分級征收，除了納稅人擁有的國家分配土地以外，還考慮他們的財產。地方的收入有了定額規定，以避免舊制中集中和復雜的會計手續。幣制被改革，運送華中和華南收入的運輸系統被改造。這些變化破壞了過去傳下來的簡單的財政制度的基本原則。[[16]](#_16_Cui_Rui_De____Tang_Dai_De_Ca)

同時，防御強大而機動的敵人的需要促使政府放棄了軍隊大部分是自給的舊的民兵制，而代之以長期服役的職業軍隊。他們大部分駐守在邊境的各常備軍中，這些常備軍在節度使統轄下組成強大的地方藩鎮。節度使對邊境某一戰略防區全面負責，這樣他們才能比中央指揮的體制更迅速有力地對外來的攻擊作出反應。在這一方面，新體制是成功的，但它幾乎使全部軍事力量集中在少數邊境將領之手。同時，民兵的腐敗使中央政府只有很少軍隊可資調遣。

755年安祿山叛變。此人為一個具有突厥和粟特混合血統的武將，并控制著東北三鎮。安祿山死后叛亂還在繼續，一直到763年才最后被平定。中國最富饒、生產力最高的河北道和河南道的大片地區遭受破壞，人口減少。戰亂擴大到長江下游和漢水流域。到叛亂平息時，中國人已放棄了南滿的立足點，整個西北（今甘肅）陷于吐蕃人之手，因為唐朝的邊防軍已被撤回保衛京師。但是，叛亂引起的最重大的長期性破壞卻是中央政府權威的嚴重喪失造成的。[[17]](#_17_Jian_C_A_Bi_De_Sen___An_Lu_S)

在大力鎮壓叛亂的過程中，藩鎮制的實行已擴大到全帝國，于是產生了新的一級地方政府。不像舊的州治，這些地方政府往往是能獨立生存的單位，還能嚴重地威脅中央的權力。北方的有些藩鎮能自行招兵買馬，河北的某些藩鎮甚至委給歸順的叛將指揮，處于半自治狀態，它們不向京師上繳稅收，自行任命官員，并宣稱有權世襲其節度使之職。這些是極端的例子，但要求地方自治和地方特殊化的力量到處在明顯地發展。剛從叛亂中掙扎生存下來的中央政府被迫將大部分責任交給地方，以求保持帝國的統一。

結果出現了一系列的制度變化，它們標志著中國行政的一個時代的結束。與各個地區的妥協是非常復雜的事，因為它們的力量、獨立程度和內部組織大不相同。在780年前，被若干權力很大的宦官、一個專橫的宰相和一批極有權勢的財政專使敗壞和控制的中央政府對這一局勢無能為力。后來，新帝德宗（780—805年）試圖在最重要的稅收和軍事方面糾正這種狀況，辦法是與地方達成協議，讓各地同意向中央繳納總的稅收定額，但征稅的具體辦法則由地方當局決定。結果是令人眼花繚亂的多樣化的局面。稅率各地不同，因此再也沒有“全國”一致的稅制可言。同樣，在其他領域也出現了各搞一套的局面。

德宗的政策以及試圖促使地方削減其軍隊的活動在東北激起了新的叛亂（781—785年），叛亂幾乎再次摧毀王朝，結果相持不下。[[18]](#_18_C_A_Bi_De_Sen____Dong_Bei_Zh)但在憲宗時期（805—821年），中央政權終于在很大程度上又樹立了權威；除了河北兩三個自治程度最高的鎮以外，它把鎮的制度納入了官僚體制之內。[[19]](#_19_C_A_Bi_De_Sen____Zhong_Xing)

但是，8世紀后期出現并正式表現于780年財政安排中的行政多樣化依然存在。對地方行政各行其是的這種默認使法典中法律的地位和重要性發生了激變，有些日本學者指出這一變化是政治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20]](#_20_Can_Jian_Li_Ru_Li_Bo_Hu_Zhi)在737年前，整個法典的法律——律、令、格、式——大致每隔15年就要修改一次以適應形勢。叛亂爆發后，唐令中涉及人口登記、土地、稅賦、勞役、兵制和地方行政細節的規定已經過時，因為這些制度或者已經作廢，或者隨著人口的大規模遷移及正規戶籍登記制的破壞而不得不被放棄。在記載令的典籍中依然保留了這些規定，例如土地分配的規定又載于兩個世紀后的《宋刑統》中，但它們與實際情況已毫無關系。但是，還沒有全面修改整個法典的企圖。即使先在8世紀70年代，然后在憲宗時期，中央政府在與地方的斗爭中確實恢復了權威，但它頒布新修法典之舉并不表明它擁有新的權力，而以前的唐代諸帝都是以此來宣稱新政體的正統性的。企圖對詔令形式的大量法律加以合理化的唯一活動是時不時地編纂其本原歸諸于737年法典化的律、令、格、式的《格后勅》。[[21]](#_21_Jian_Cui_Rui_De___Guan_Yu_Du)

這樣，在755年以后唐政府不但放棄了用于全帝國的統一規定和措施的想法，承認了行政的巨大差異性和多樣化，而且還放棄了這種統一和通用的規定和程序應該體現在適用于全帝國的一整套中央編成的法典化律令中的原則。再也沒有一套行政法能具有初唐法律的那種絕對權威，而且中央政府承認它再也不可能取得這種統一的準則了。

安祿山之亂以后若干年的地方割據和地方自治產生的影響，其廣泛程度遠遠超過地方政府行政多樣化和中央法典地位下降的影響。北方諸鎮的地位日益獨立，開始出現一種新的行政作風，即由武官去履行以前的文官職責。這一變化還標志著大量任用專業官員的開始。這就為宋初政府中正式的文官、軍人和財政部門的官員之間的分權提供了樣板。

中央政府也被迫另找出路。政府不能再從帝國的大部分地區直接征稅，也不能像以前那樣依靠勞役，于是開始通過國家專賣稅（先對鹽，后來對茶葉、酒和酵素）來籌措收入。這使它能夠通過經營這些商品的商人從它控制外的地區間接征稅。它開始對礦產品和商業征稅，從而放棄了傳統的原則，即認為一個穩定的國家的歲入應該是向農民開征的統一稅。這些新辦法與上述的稅收定額一樣，在以后許多世紀中一直是行政政策的長期特征。

隨著這些變化，制度也有了重大的發展。叛亂以后，許多已成立的政府機構被撤銷，官署廢置，官職變得有名無實。這種狀況在不斷變動之中，我們需要進行更深入地研究，才能分清哪些官署繼續行使職能，哪些官署已經失去作用。

現在可以肯定的是，對立的政治力量，諸如翰林院學士組成的非正式的智囊團以及宦官的權力，都在削弱各級正規官員的情況下不斷增長。在8世紀后期和9世紀，宦官的權力大大加強，當他們取得對神策軍——為皇帝提供主要力量以與地方軍抗衡的精兵——的控制時，其權力取得了一種新的表現形式。宦官有時還掌管皇宮的內庫，并開始在處理公文和傳達皇帝命令時起主要作用。這一職能在樞密院中被正式規定下來，院內年長資深的太監們還充當顧問，其作用很像外廷的宰相。傳統的史學家始終敵視宦官。他們的活動很難弄清，因為他們從不像朝廷官員那樣公開活動，而是采取間接對皇帝施加影響或利用同伙官員的手法來運用權勢。但在9世紀初期，他們的力量是如此強大，以致朝廷官員不得不讓有權勢的宦官卷入他們勾心斗角的黨派斗爭中。在9世紀，宦官幾乎決定每一次皇帝繼位的大事，而且可能不止謀害了一個皇帝。[[22]](#_22_J_K_Lai_De_Ao_Te____Tang_Dai)

朝廷官員的實權由于被宦官、翰林學士和獨立的財政專使的活動暗中破壞，并受到對他們施加壓力的節度使的外部挑戰，朝廷被激烈的黨爭所分裂。陳寅恪認為這是舊貴族和中舉士子之間再次爆發的緊張對立的結果，但礪波護反對此說。[[23]](#_23_Li_Bo_Hu____Cong_Niu_Li_Dang)不過，成為這一時期特點的尖銳對立和私人恩怨是活生生的現實。文宗力圖消滅宦官的勢力，結果使宮廷更加處于困境。835年，一次清洗宦官的企圖失敗了。宦官向其敵人反撲，對高級官員大開殺戒，力量反而更加強大。

管理新財政措施的司署是另一股敵對力量的來源。它們遠比玄宗時代的前輩更為強大。鹽鐵司終于控制了南方的全部財政制度，變得幾乎不受朝廷管制。度支司在北方幾乎有同樣權勢。這些機構連同其他的專司雇用大批低級雇員，而且像地方政府那樣，它們的屬僚不是按正規的官場程序由京師的吏部加委，而是直接通過專使本人的推薦（辟召）吸收進來。晚唐的大批官員通過這種方式或在地方政府任職，或在專門司署中任職。這種非正式的任用方式提供了進入仕途的嶄新的手段，因為許多這樣任用的人后來被中央政府承認為入流的正規官員。通過這一制度被任用的人有的來自叛亂前在文官中默默無聞的門第，而在各地的低級官員往往是出身微賤的軍人，很多人還是非漢族。財政專門司署還從商界吸收屬僚，而在以前，商人出身的人是一律不準擔任公職的。

這些發展遠比科舉制更能為眾多的人提供擔任公職的機會和開辟提高他們社會地位的途徑。在唐代，科舉考試不過產生一批官僚精英分子而已，其數量可能略多于全部官僚集團的10%。總之，其中大部分人出身于名門望族，都來自書香門第。在唐朝滅亡以前，這種情況沒有改變。科舉在唐代不是對任何有才能的人都開創了前程。它所能做到的是使出身于地方小貴族門第的人能夠擔任高官，并向一小批顯赫的“全國性貴族”原來在朝廷中壟斷的政治權力提出挑戰。另一方面，辟召的廣泛使用打破了中央政府對進入官場的途徑的嚴格控制，使一個嶄新的階級中的人們能夠取得在官場任職的前程，因為這些人由于出身和未受過傳統教育，在以前是被排除在外的。

這一變化雖有其廣泛的社會意義，但也不應加以夸大。正像許多應試士子是貴族子弟那樣，許多通過辟召而任公職的人同樣也是受過教育的精英人物。舊貴族世家也繼續提供官員和高級官職的補缺者，直到唐末都是這樣。在9世紀后期，它們在朝廷的勢力確有重整旗鼓之勢，但同時它們自己也進行了改造。它們在隋以前和隋唐過渡期間多變的局面和社會動亂中成功地生存下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們能依靠自己的地方根據地，因為它們在那里擁有大批地產和許多依附家族。地方根據地是它們取得穩定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基礎。但在初唐，情況起了很大變化。由于在一個具有不可動搖的權威的王朝統治下，它們的無可匹敵的政治力量非常鞏固，所以它們已能使自己成為京畿的精英集團，與唐王朝及其朝廷休戚與共，并且越來越依靠自己繼續當官為宦的潛力。在此同時，它們放棄了自己地方上的權力根據地。只要與自己同命運的王朝繼續存在，一切就順利，并且從外表看，它們依然與過去一樣有權勢。但當王朝力量瓦解時，它們的成員只能作為受過廣泛教育的文人學士而生存下來。它們作為“貴族”集體已被破壞無遺。[[24]](#_24_Jian_Sun_Guo_Dong___Tang_Son)在唐朝垮臺后的五代時期，甚至在嚴格模仿唐朝模式的南方諸國中，都沒有一個政體被唐初“全國性貴族”中的豪門之一所統治。

## 經濟和社會變化

安祿山之亂后的分權不但對政治制度和行政模式有深遠的影響，并且還加速了在隋唐安定繁榮時期已經開始的復雜的經濟和社會的變化。

自隋以來，江淮流域的人口不斷增加，而東部和東北大平原的舊定居區的人口卻因此減少了。不可能列出精確的數字，因為隋對南方人口的統計肯定是不完全的。但可以肯定，變化是大的。在609年，唐的淮南、江南、嶺南只有登記人口的12.4%。到742年，它們占登記人口的27.7%。增加的趨勢繼續并加快。到11世紀，這區域的人口已大大超過全國總人口的一半。

在此期間，在隋代擁有總人口一半以上的河北和河南（今河北、山東和河南三省）卻一落千丈。在隋亡后的內戰中，河北首當其沖，晚至726年，它擁有的人口仍少于其609年人口的一半。河南喪失的人口幾乎一樣多。在742年，整個東北只有它的隋代人口的70%左右。這一區域在755—763年的安祿山叛亂期間遭到嚴重破壞，在781—785年河北諸節度使崛起時期再度遭殃。在9世紀后期的幾次叛亂和國內沖突中，大平原再次淪為戰場。遲至11世紀末，河北的人家不到609年的一半。河南的戶數大致與隋代該地戶數差不多，但這主要因為它此時已有以后的宋代京都——欣欣向榮的大都市開封——及其周圍的工商業體系。它的農村人口肯定大大低于隋代。東北的相對衰落從以下事實更能看清楚：在同一時期，中國的總人口幾乎翻了一番。

作為中國文明最古老的定居中心和漢以來帝國政治中心的西北也相對地衰落了。河東（今山西）的人口在609—742年期間減少了20%，到11世紀末降到了隋代水平的一半多一點。關中（今陜西）在609—742年期間也喪失人口的10%，但隨即大致保持穩定，直到11世紀。四川的人口在609—742年期間翻了一番多，此后幾乎保持穩定。[[25]](#_25_Bi_Han_Si____Gong_Yuan_2__74)

于是，在整個這一時期，出現了有利于中國中部和南方的持久的人口再分布。但是，人口再分布的經濟影響大于單純數字說明的問題，因為在完成土地的開墾灌溉等最初的工程后，南方的生產力遠遠高于北方。南方與北方相比，氣候溫和，生長期長得多，生產遠為可靠，而北方則經常遭受旱澇及其他自然災害。在北方，雖然有發達的高級旱種技術和兩年三熟的耕作制，但傳統農業始終不能生產大量剩余糧食。生產力水平的普遍低下嚴重地限制了初唐國家的活動。它的政治中心一直在西北，這既是出于戰略的考慮，又因為那里在政治上是統治集團的故土。到8世紀初期，政府越來越依靠通過隋代的運河網絡從江淮運來的糧食。這時，南方已在大量生產剩余糧。

安祿山之亂后，隨著從北方逃難的人的流入，南方生產的農產品在全國的比重日益增加。這種情況對中央政府來說是極為緊要的，因為河北和河南部分地區的半自治地位意味著中央政府在那里的供應來源被切斷，而這一區域以前是收入的主要來源。到9世紀初期，只有長江流域和南方能定期向中央政府解繳稅收，政府日益依靠通過運河北運的南糧和物資來供養京師和帝國軍隊。京都長安周圍的地區在晚唐發現自身的經濟非常困難，因為自公元前3世紀以來所依靠的灌溉設施已經失修。

這些發展的結果是嚴重地對立，對立的一方是已經開始堅定地移向東南的帝國經濟中心，一方是戰略要求及純粹出于行政惰性的拉力——這是唐滅亡前把京師保留在長安的因素。武后已經東幸更靠近那些生產中心的洛陽，但她的后繼者純粹出于政治的考慮又搬回長安。開封在唐代已是重要商業城市和運河網絡的中心，在五代和宋代它就變成了京都，而自西周起就是皇權所在地的西北則逐漸衰落而成為一個死氣沉沉的區域。

另一個重大的經濟變化體現在土地所有制中。755年后戶籍制及以它為基礎的國家土地分配制的破壞，造成了土地使用權性質的徹底變化，這一變化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自3世紀以來，歷代王朝一再試圖推行各種國家土地分配制。最后一種為“均田制”，它最早行于北魏，隋唐經修改后繼續實行，它原來的目的是想通過慷慨地分地給農民，使之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和提高農民的生產力水平，同時又限制財產過分集中在個人手中。這一制度規定，土地被分配給男丁供他有生之年生產，而男丁必須向國家納稅和服勞役。通過均田制度授予的土地使用權限于擁地人的生前，而且只給使用權。對分得土地的處理是嚴格限制的。

這一制度始終未能很好地實行。均田法有許多漏洞，它容許官戶和貴族成員相當合法地積累大量地產。一般分配的土地有部分可以由擁地人的后嗣繼承，只要他們符合取得土地的條件。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大部分成了這類世襲的土地。如果南方實行過均田制，現在還不清楚那里（甚至在唐的鼎盛期）實行到什么程度；在北方的許多地方，土地不夠分配給完全有資格的個人。此外，在這一制度下，大部分農戶被授予的土地中有的是他們自己的。[[26]](#_26_Guan_Yu_Tang_Dai_Tu_Di_Zhi_D)

安祿山之亂后作為土地分配基礎的戶籍登記制的破壞，使政府完全不可能再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均田制，雖然它偶爾也大力把空地分配給無基業的農戶，并限制土地的集中。國家為保持土地使用和土地分配的控制權而做的這些努力證明是無效的，它實際上逐漸承認土地擁有者個人對他們的土地有所有權和自由處理權。政府口頭上仍然宣揚儒家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這一箴言，但實際上買賣土地的自由市場興起了，以后的王朝不能再成功地推行國家土地分配制，直到共產黨政權實行土地改革時為止。

這產生了廣泛的反應。安祿山之亂致使大批人民流離失所，破壞了河北和河南的大片地區并使那里的人口減少。許多土地被拋棄，或干脆被掠奪成性的地主占有，或從急于遷往更安定地區的農戶那里被賤價收買。由于法律和秩序的破壞，簡單的恫嚇就能把農民從其土地上趕走。用這種方式積聚的地產可雇用被剝奪了家產的農民耕種，他們提供了大量勞動力。這些人或被作為佃農使用，或干脆被雇為勞工。

莊園原來一直存在，甚至在推行均田制時也是如此，但莊園的所有權嚴格地限制在某些集團手中。他們是皇族、豪門世族與其地位使他們有資格擁有大產業的貴族和高級官員的家族、按均田制規定有特權擁有莊園的寺廟和道觀。但現在對所有人開放了，于是各種有權勢的人都能擁有莊園而不受現行法律的限制。這時不但有大量土地可以占有，而且還有許多出身卑賤并在地方政府和財政機構任職的人，他們不但有撈取私利以自肥的新機會，而且需要土地使他們的家族能得到穩定的經濟基礎，并使自己有權成為擁有土地的鄉紳。另一個創立家業的浪潮隨著843—845年武宗鎮壓大批佛門寺院而到來，當時寺院擁有的大量土地被國家出售。

大地產這時成了農村經濟中正常和普遍的現象。它們中的大部分由佃農耕種，而租佃本身開始以新的形式出現。租佃原來一直存在，不但初唐的大莊園有，甚至在通過均田制分配的土地上也有，農民可以把遠離家宅的地租給另一農民，本人可同時租入地點更近便的土地。除了寺廟的土地常由寺戶耕種這一特殊情況外，初唐的租佃一般必須有平等的雙方純經濟性的短期契約。到9世紀后期，有效期很長的協議成了正常現象，根據協議，佃農個人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地主，而這一發展導致宋代有些地方一種半依附性的租佃關系的成長。現在根本不可能以數字說明晚唐租佃的發展水平，但租佃肯定是很普遍的。租佃制與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情況結合起來，擴大了貧與富、地主與耕種者之間的鴻溝，并且促使農村產生了一種新的社會結構。[[27]](#_27_Jian_Cui_Rui_De___Tang_Song)

這個問題到宋代才發展到極點，但在9世紀時變化已經達到相當的程度。在中世紀中國史中，它造成的社會變化也許比任何其他問題更受到深入地研究，并且已有大批論戰性的作品問世。有些作者提出假設，把“莊園經濟”的出現或者比作日本莊園制的成長，或者比作歐洲莊園的發展。其他的作者提出晚唐標志著奴隸社會的結束和“封建主義”或“中世紀農奴制”的開始（奴隸社會的定義根據體現在初唐律令中個人對國家的“依附”關系作出）。還有一些作者仍認為過分強調租佃的依附性是錯誤的，并堅持地產的含義及租佃地產的制度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

這一激烈的論爭既結合企圖把中國納入普遍適用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某一模式的對立主張進行，又結合歷史的現實。但論爭有助于使人們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國經濟史中關鍵的變化時期。雖然租佃絕不是普遍的，但大地產的到處存在，無疑能引起重大的經濟發展。大土地主能開荒和開墾，以佃農為勞動力，就像唐以前的寺院利用其寺戶那樣。大地主能投資采用新工具和研磨機。甚至租種制對佃農的壓力也有助于雙季作物的發展，因為租種契約只涉及主要糧食作物。這些發展進一步加速了農村生產力的提高以及在唐末宋初隨之出現的經濟擴張。

此外，租佃制不是單純地對農民進行單方面剝削的制度。小農并非純粹因經濟上走投無路而成為鄰近有權勢的地主的佃戶。有權勢的地主能庇護其佃戶免遭稅吏的巧取豪奪。同時大地產作為一個經濟單位，能提供某種保證安全的辦法和在艱難時期生存的機會，而一個僅能糊口的小農自身可能就沒有這種辦法和機會。另外，這些變化是在權威完全垮臺和法律秩序遭到破壞這一背景下發生的。在9、10兩個世紀，一個小農發現，適度地犧牲個人自由以換取有權勢的庇護人的保護，這對自己大有好處。

事實上，租佃不過是晚唐人身依附和半依附關系全面興起的一個方面，這一趨勢與漢亡后大分裂時期出現的情況非常相似。此時出現了一種朝著小規模緊密結合的社會單位和整個社會結構中高度個人化的關系發展的總趨勢。作為任用官員方法的辟召的再出現是這方面的表現之一，這種方法在司署長官及其部屬之間建立了一種持久的庇護和被庇護關系。在地方節度使的官署中，辟召更表現為恩主與家臣、庇護人與被庇護人等非正式關系的更極端的形式，而且往往不受既定的官制的限制。在9世紀，有的節度使甚至收他所轄的將領為義子，這樣就以遠為強烈和私人化的孝道要求來加強隊伍的關系。有些鎮出現了世襲官職的情況，這是對隋唐任用官員的政策的徹底否定。

上述每一個發展都顯示出這樣的趨勢：一是形成作為社會內聚力基礎的小的地方單位；一是形成緊密結合的半家族性的社會集團，這些集團將以有條不紊的標準化的行政方法和全國的既定的官制來重建原來由一個強大而有效的中央政權提供但又喪失了的穩定。

就在當時這種崩潰的社會秩序的情況下，舊貴族進行了最后一陣忙亂的活動，他們面對壓倒一切的社會變化潮流，在維護社會上層搖搖欲墜的等級秩序的最后一次徒勞努力中，妄圖確立自己為公認的社會精英，并想再發揮貴族精英的作用而成為維持社會穩定的另一股力量的源泉，以取代中央政府喪失的權力。他們的企圖失敗了——雖然他們在朝廷中曾一度重整旗鼓。原因很簡單：他們此時已徹底與王朝融合為一體，在地方上再也沒有他們能夠退守的真正的權力根據地了。

中央權威的喪失以及隨之而來的分權和權力的地方化具有重要的社會和經濟意義。把政治權力分到各鎮治所，這意味著許多這樣的城市成了地區性大都會——有大批富裕官戶和從事服務行業的人的大規模行政中心。同時，在財政方面又給了各鎮新的自由，此舉意味著該鎮的歲入被就地使用而不是上繳京師。在被黃巢叛亂和以后的戰爭最后破壞之前，雖然人口超過100萬的長安仍是唐代最大的城市——在這方面它又高居世界之首——和高度發達的商業中心，但有幾個鎮的中心已發展成大城市。其中較重要的為長江中游的成都、江陵以及揚州、廣州和汴州（開封）。汴州在唐亡后，將成為第一個待選為全國首都的大商業城市。這些商業繁榮和行業俱全的大城市成了地區中心，小城鎮和地方集市網絡在它們的郊區發展起來，其中有些網絡還涌現在地方軍戍守的鎮的周圍。到9世紀，以地區市場體系為基礎的各級新的經濟定居地開始在現存的各級行政中心旁邊出現，從而使城市發展的過程呈現嶄新的面貌。[[28]](#_28_Guan_Yu_Cheng_Shi_Shi_Chang)

城市化的總過程以生產力的全面發展為基礎。人口的普遍南移不但提高了農業生產力水平，而且工業和手工業也開始在長江流域發展起來。結果，交易和商品流通量迅速增加。8世紀后期和9世紀是商人階級大展宏圖的時代；在此之前，漢以來歷代王朝在傳統的儒家抑商理論的影響下對商人實施嚴格控制，使他們深受苦難。政府以往力圖把交易限制在受嚴密管制的官辦市場中，地方當局調節商品價格和嚴格控制商人的一切活動。某些物品的經營受到限制，甚至被禁止。商行受到嚴密的監督，并被用作控制個別成員的手段。對商人的外出也謹慎地加以限制，他們不斷受到調查并被征收通行稅。此外，政府有意識地力圖壓低商人的生活水平，其措施是把他們登記為一個特殊集團，限令他們遵守嚴厲的反奢侈法，并禁止商人和工匠及其直系子孫進入仕途。

隨著中央權力的衰落，這些限制很快消失。官辦市場體系逐漸瓦解，認為商人一定是壞人和他們的行業玷污了他們的道德的傳統的敵視態度開始站不住腳了。甚至禁止商人之子擔任公職和在京師學堂就讀的嚴格規定也略有放松。由于擺脫了初唐施加的嚴厲的制度約束，商界開始緩慢地發展，到了晚宋，已產生了一個富裕、自覺并對自己的鮮明特征和特殊文化有強烈意識的城市中產階級。同時，以前富商和士大夫之間不可逾越的社會障礙開始崩潰，因為商人當官，官員也投資商業和參加經商的活動。[[29]](#_29_Jian_Cui_Rui_De___Wan_Tang_D)

晚唐的商界還發生了另一變化。在隋代和初唐，商人，不論是大貿易商或是地方的店主，甚至是京師的商販，往往是外國人，即粟特人、波斯人及后來的回紇人。他們是伸向中亞和中東的廣大的貿易網絡中的成員。外國人生活在自己的共同體內，如果不與中國人發生糾葛，就受自己頭頭的管制和遵守自己的法律。763年以后中國的西北陷入吐蕃之手，這種貿易中斷，因此外國人對中國國內貿易的控制慢慢地減弱了。

貿易的空前迅速的發展、商人的日益富裕和生產力的全面提高，逐漸導致官方對經濟的態度的根本轉變，而這種轉變再次標志著8、9世紀是一個時代的結束。在表面上，至少在公開頒布的政策中，對強調農業為“本”和農民為歲入主要來源的理論的傳統態度依然未變。但從這時起，不管歷代政府對這一古典正統思想的信念做何表白，以后通過對國家壟斷事業的管理，對有利可圖的工業的直接干預，對貿易稅的日益依賴，以及對城市居民征稅的政策，它們將始終與商業發生密切的關系。

但在政府的經濟政策中，最重要的一個變化是廢棄了原始幣制。在原來的幣制中，作為實物稅的絲帛連同銅幣一直被用作巨額支付的一種商品貨幣。舊幣制是南北朝時期遺留下來的，在初唐占很重要的地位，因為銅錢始終不能滿足商業的需要。安祿山之亂及其后果的影響在這里再次顯示出來。用于這一目的的稅絲的主要來源地原來是河北和河南，但它們此時基本上成為自治之地，不向京師上繳歲入。[[30]](#_30_Jian_Quan_Han_Yi___Zhong_Gu)不但王朝的絲帛的主要供應被切斷，而且在8世紀后期政府又發現了幾處重要的銀的來源，于是銀漸漸地開始代替絲而成為大筆交易的支付手段。同時，銅錢的供應也有改善，于是城鄉的貨幣經濟不斷發展。政府不鑄造銀通貨，也不管理銀錠的使用。這些事都交給銀匠去做，他們開始發展原始形式的銀行和信用制度。[[31]](#_31_Jia_Teng_Fan____Tang_Song_Sh)由此又可以看出，雖然歷代政府繼續聲稱通貨管理是國家實力的一個基本部分，但實際上很大一部分通貨卻在私商之手。后來貨幣政策的最重大的變化——紙鈔的出現——是由私人而不是政府促成的。

政府根據早已過時的理想的社會模式來控制經濟的企圖在各個方面都趨于失敗。作為集中控制農村人口的手段的國有土地分配制、對商業和商界的嚴密監督和對通貨的嚴格管制，都是傳統理論的主要特征，但在晚唐被放棄，以后的任何王朝都沒有成功地再予以推行。由于解除了這些束縛，再加上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和南方新領土的開發等因素的刺激，中國的經濟開始迅速發展，以致有些史學家認真地提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條件到晚宋時期已經成熟了。不管我們是否同意這種觀點，晚唐確是持續到蒙古人入侵時為止的經濟大變化的開始時期。

## 隋唐和外部世界

作為重新統一的中華帝國的主人，隋唐兩代都充分意識到自己是漢代的繼承者。在6和7世紀，它們想收復漢朝領土的雄心，為中國在越南北部的擴張，為一再發動旨在恢復中國對以前漢朝在南滿和朝鮮領土控制的征戰，和為占領位于通往中亞和西方的絲綢之路上的諸綠洲王國的行動提供了動力。

在南方，隋朝沒有遇到什么抵抗，在隋文帝企圖進一步向占婆深入擴張的行動失敗后，中國疆域的南限已確立在今之河靜區。在此以北的那部分越南地方自漢代起一直受中國的影響，此時已完全歸中國管轄。除了土著民族的分散的起義外，那里一直是唐帝國繁榮安定的一個部分。939年越南獨立，該地仍堅定地作為一個部分而加入中國文化區，以中國制度和法律進行統治，它的統治精英集團深受中國文化的熏陶，并使用中國文字。

在朝鮮，中國遇到更有力的抵抗。不像北越自漢以來中國對它在一定程度上繼續進行統治，北朝鮮和南滿被強大和組織完善的高麗國控制。高麗國對隋幾次企圖收復原來漢朝領土的行動進行的抵抗是如此猛烈，致使隋王朝因此垮了臺。唐朝在高宗時終于成功地征服了高麗，并把大部分朝鮮合并為中國的一個保護國達數年之久。但在不斷的抵抗面前，中國人的地位證明是不穩固的。他們的撤退使全朝鮮第一次統一為新羅國，而在滿洲和鄰近沿海區的原來的高麗的領土成了另一個強國渤海的中心地區。新羅和渤海都是穩定和組織完善的王國，嚴格地以唐朝為樣板。兩國的統治階級都使用中國文字，模仿中國的文體，信仰中國式的佛教和儒家思想。雖然這一地區與越南不同，對唐保持政治的獨立，但它也長期處在中國文化圈內。

日本的情況稍有不同。它處于漢朝所知道的世界的邊緣，隋唐對它并無領土野心，但中國影響已通過朝鮮傳入。在7世紀，日本人開始有意識地按照唐的模式組織他們的國家，全盤采用中國的文字和文學語言、中國的藝術形式、宗教、哲學、法律和制度。在唐代，中國在日本的影響達到頂點。雖然在以后的世紀中它受到本地興起的形式的挑戰，但到了唐末，中國的影響已牢固和長期地把日本納入其文化圈內。

文化同化的最后一個地區是西南，漢朝已經在這里實施一定程度的控制。在唐代，當地強盛的南詔王國代替了在現今云南省境內的混亂的部落集團。南詔對唐保持獨立，并且長時期對它抱有強烈的敵對態度。這一地區直到元朝才正式并入中國。但盡管互相敵對，本地區又相對落后，南詔也采用中國語言并沿用許多唐朝制度。它也成了中國文化圈的邊緣部分。

在隋唐，中國對東亞廣大地區的密切的文化影響就這樣確立了，并且直至近代那里還受中國文明的支配。這個區域里的國家與中國早期的任何鄰國迥然不同。在此以前，中國周圍的民族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組織制度和生活方式。這些部落民族有時非常強大，并入侵中國和短期侵占中國大片土地。但他們政治上不穩定，不能治理定居的農業人口；在文化方面，中國人有一切理由把他們當做“夷狄”而加以蔑視。而在唐代涌現的那些新國家在中國人的經驗中卻是十分新鮮的事物；它們的組織方式與中國相同，雖然規模要小得多；它們的統治者具有同樣的思想意識；它們用中文來處理公務，并采用中國的法律和辦事手續。雖然它們接受朝貢國的地位，實際上卻完全不受中國的管制。中國人在與它們打交道時，不得不以比以往更平等的態度對待它們。這就是宋朝與北方鄰國的對外關系的新形式的背景。

在北方和西方，唐朝面臨更常見的挑戰。在這里，中國政策的基本目的仍是兩個方面：（1）保護中國人定居區不受生活在固定的草原邊境以外的周邊游牧民的襲擾；（2）控制和保護經今之甘肅省和新疆省通向中亞、伊朗和西方的貿易路線。

在強大的北鄰突厥人面前，隋朝是幸運的，因為自6世紀中期以來已經控制自伊朗的薩珊帝國至滿洲的突厥人已分裂成兩個獨立的帝國，緊鄰中國的東帝國經常被派系和部落對抗搞得四分五裂。可是他們仍是令人生畏的，630年他們的垮臺是唐政權最終得以鞏固的重要一步。他們在7世紀80年代的復興又使中國人面臨嚴重的問題，中國人只有沿北部邊境構筑極其昂貴的防御體系才能遏制他們。最后，他們又成了自己內部紛爭的犧牲品，在744年被原來的附庸回紇人所壓倒。

回紇人證明遠不是那種惹是生非的鄰邦，他們甚至在唐發生危機時愿意提供雇傭軍援助。一般地說他們對經商更感興趣。在9世紀40年代，他們在北方干草原的支配地位又被許多定居在甘肅和近代新疆綠洲上的黠戛斯人（柯爾克孜人）代替，這時黠戛斯人已經放棄游牧生活而成為定居的務農者。

另一個令人頭痛的游牧鄰族是準蒙古族的契丹人，他們與其突厥附庸奚人一起居住在河北北部和近代的遼東之西的多山邊境中。在7世紀后期，他們變得十分強大，并且侵犯了中國的東北，從此，河北北部和河東就非保持鞏固的防御體系不可了。

通往中亞和西方的各條路線對隋唐來說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它們當然是通商要道，中國人就是通過它們出口絲織品以換取種類繁多的外國貨的。但當中國正處于其世界主義思想極為盛行、受到的外來影響甚于以前或以后任何時候之際，它們也是主要的文化聯系的環節。通過這些路線，許多中國的思想和技術傳向西方，但在隋朝和初唐時期，中國卻更多地從西方傳入思想和技術。中國的佛教是當時最活躍、最有影響和最先進的思想體系，它一直是從北印度和中亞諸國吸取新的推動力。其他新宗教，如拜火教、摩尼教、景教和以后的伊斯蘭教，也從伊朗和中亞傳入。除了這些思想影響外，傳入中國的還有音樂、舞蹈乃至金屬制作、烹飪這些技藝的新成果，以及諸如數學、語言學方面的科學和技術的重要成就。外國人，從印度僧人到波斯眼科醫生、粟特的賣藝人和商人，都可自由地進入中國。

為了確保這些事物所依靠的中亞通道，隋和唐都向西擴張，他們的軍隊接連征服一個個小綠洲王國并建立中國的保護國。到7世紀60年代，中國的力量在塔里木盆地、準噶爾盆地、伊犁河流域已經牢牢地扎了根，同時中國又建立了若干保護國，以控制今俄屬突厥斯坦的西突厥部落及原屬突厥人統治的位于河中地（外索克西亞納）、吐火羅和阿富汗的許多城邦。中國人甚至在北印度進行軍事干涉，雖然是小規模的。在高宗時期，中國政治力量更向西發展，達到了空前絕后的程度。

但這種擴張證明為期很短暫。幾年后，中國不得不放棄它的伊朗邊境和阿富汗境內的保護國。雖然在8世紀50年代以前中國軍隊遠至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以西，深入帕米爾和吉爾吉特等地作戰，同時中國人仍牢牢地控制塔里木盆地和準噶爾盆地，但他們在中亞的影響受到了在7世紀中葉崛起的兩個強大和侵略成性的敵國的挑戰。

第一個是吐蕃。7世紀前，雖然東漢時期的羌族已經造成了大破壞，后來住在青海湖周圍的吐谷渾已在威脅現在的甘肅西部，但西部邊境對中國人來說從來沒有重大戰略意義。西藏的環境過于嚴酷，不能吸引中國人去定居，在那里只有一些組織很差的落后的部落松散地居住著。

在7世紀，這一狀況有了改變。吐蕃一躍而成為一個強大統一的王國，并開始搞侵略擴張。從原來在南藏的中心，吐蕃人往西向帕米爾和往東向云南擴張，往北則侵犯中國在塔里木的新征服之地，并進而威脅中國通向西方的商路。然后，在高宗時期，吐蕃人又在今青海省滅掉了吐谷渾王國，那里原來是吐蕃人與中國在甘肅的領土之間的緩沖地。從此，吐蕃人在河西走廊和蘭州周圍經常威脅著中國人，因此唐朝被迫在這兩個地區長期重兵設防。755年后，當安祿山之亂迫使政府將戍軍東撤以保衛京師時，吐蕃人占領了現在甘肅省的大部分，他們從763年起一直留在那里，直到9世紀40年代。中國人駐守在塔里木和準噶爾的戍所與國內的聯系被切斷，它們后來被吐蕃人占領。

842年后，吐蕃國分崩離析，吐蕃人在以后幾年中逐漸從占領的領土上撤出，從此不再是中國人對外關系中的一個主要考慮因素。但吐蕃再也不是少數游牧部落居住的凄涼的荒漠。最后一個吐蕃王試圖破壞寺廟和命令佛僧還俗，結果垮臺了。吐蕃國亡后，大寺廟提供了政治權威，并在保持吐蕃人的文化特征方面出了力。

這一文化與中國的文化完全不同。盡管吐蕃與中國相敵對，但約在650—750年一段時期內，它似乎仍可能成為中國文化圈的一部分。它的貴族子弟被送往中國學習，吐蕃王朝與唐皇室聯姻，中國的書籍和工匠被帶往拉薩。但這種希望是短命的。在8世紀，吐蕃在文化上被一種本地文化所統一，這種文化使用來源于印度的文字，與尼泊爾和印度的文化關系遠強于與中國的文化關系。盡管有18世紀滿洲的征服，西藏受中國的影響甚小，這種狀況持續到我們今天的時代。

第二股向中國的中亞霸主地位挑戰的主要新興力量是大食（阿拉伯）人和伊斯蘭教。在7世紀，正當中國人已將其勢力盡量往西擴張時，大食消滅了薩珊帝國，然后逐漸吞并在吐火羅和河中地的一些四分五裂的城邦；這些城邦原來是突厥人的附庸，后來一度受中國人的保護。盡管遭到一些挫折，但到8世紀中葉，大食的政治統治以及伊斯蘭教的地位在吐火羅、河中地和拔汗那（費爾干納）區已很牢固。在751年，大食軍隊與唐朝軍隊在塔刺斯河遭遇，唐軍遭慘敗。此役本身不是決定性的，因為雙方都孤軍深入。事實證明，對中亞起決定性作用的大事是遠在中國內部的安祿山之亂。它促使中國軍隊撤離甘肅，在塔里木盆地和準噶爾盆地的駐軍也被棄之不顧，他們因吐蕃占領河西走廊而被截斷了退路。中國人再也不能干涉中亞之事，大食人得以鞏固他們的勝利成果而不用再擔心中國的對抗了。

842年以后吐蕃國亡，唐朝作出了明智的、但從長期看卻是嚴重的決定，不打算去收復原在遠西的疆土。結果，這意味著在18世紀清朝遠征勝利前，中國再也不能有效地控制敦煌和哈密以西之地。這還意味著中國永遠喪失了作為中國文化區的一部分的中亞。吐蕃人放棄的塔里木和準噶爾的幾個舊綠洲城市被回鶻人占領，這時回鶻人已被黠戛斯人從他們的草原故土趕出。集印歐、伊朗、印度和中國諸影響于一身的這一地區的豐富復雜的文化，在突厥人、中國人、吐蕃人、阿拉伯人和回鶻人的連續的沖擊下被破壞；在以后的幾個世紀中，從伊朗直至甘肅邊境的整個區域逐漸成為伊斯蘭教世界的外圍區，而不再是中國文化和中國政治勢力的前哨了。

在隋唐時期，中國的對外關系就這樣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在581年，中國面對的鄰國只有高麗才稱得上是一個有定居人口的、穩定的和組織完善的國家。除此之外，它的周圍是一些組織松散和無知的游牧部落民族，它們的文化發展階段明顯地落后于中國。這些民族，如6、7世紀的突厥人，有時能組成強大的聯盟，對中國構成嚴重的威脅，但這類部落聯盟都是短命和不穩定的，中國人能用行之有效的辦法對付：加強邊防，利用其內部分歧以破壞其團結。整個中國對外關系的傳統理論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和與這類鄰近民族的交往中產生的。

到了晚唐，局勢完全改變。舊類型的邊界只存在于北方，在那里農耕定居的中國領土和大草原之間的環境差異決定了中國與鄰近的民族必然有極鮮明的文化差別。但即使在北方，毗鄰的游牧民族此時已遠為穩定，并且自7世紀以來至少已經通文識字。在東北、南方和西南，中國的周圍是一些仿效中國的穩定的農業國，它們具有深受中國人影響的相當發展的文化。中國占支配地位的東亞文化圈已經形成。在西面，中國的政治影響和文化影響都被排除在吐蕃和中亞之外；在那里，高度典雅的文化已經發展起來，而吐蕃所受印度的影響和中亞所受伊斯蘭教的影響，都超過中國給予它們的影響。

中國人對與各個鄰近民族發展起來的這種種迥然不同的關系作出了實事求是的反應：他們有時單純地試圖征服；有時則成立保護國，冊封其首領和派中國顧問；有時試圖通過以“公主”（通常是皇室不顯要的姻親）和親，或給作為人質的王公以皇帝禁衛的職位，或讓王公在國子學就讀，來確保友好關系。對中國人來說，這種關系一直被視為中國對其“藩屬”民族實施宗主權的體現，藩邦來到長安進貢以表示它們的從屬地位，當然它們也受到豐富得多的賞賜。但這一基本概念中包括的實際關系顯然很廣泛，從完全的征服直到事實上的平等。可惜的是各種各樣的關系并沒有反映在中國人關于對外關系的思想中。不過，后來宋朝與強大的北方鄰國之間出現的更現實的體制的基礎已被打好——這主要是脅迫的結果。[[32]](#_32_You_Da_Liang_Tao_Lun_Tang_Da)

## 史料的問題

與任何更早期的中國歷史相比，現存的隋唐時期的記載是很豐富的。現在仍有完整的隋代正史《隋書》和兩部唐代正史《舊唐書》和《新唐書》。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對隋唐時期有非常詳細的記述，此書大量取材于上述三部史書和其他現已散失的著作，是傳統中國歷史學中最杰出的成就之一。此外，我們還有三部行政方面最早和最優秀的類書：杜佑的《通典》、《唐會要》和《冊府元龜》，它們像正史那樣主要根據原來史官編寫的記載，有條理地闡述政府運轉的情況。[[33]](#_33_Guan_Yu_Zhe_Yi_Shi_Qi_Zhu_Ya)雖然我們有這樣的材料寶庫可以利用，但唐代至今仍是近代的史學家幾乎完全依靠官修史書和取材于官修史書的著作來進行研究的中國歷史最后一個重大時期。因此，本書必須向讀者闡明這些史料的內在局限性，說明它們是本書在敘述的篇幅上如此不協調和不平衡的原因。

官修史書編寫的方法，與歷史學家寫史的基本思想前提一樣，將在下一卷詳細予以論述。簡而言之，歷史被認為是王朝和個別皇帝怎樣統治其帝國和完成天命的政治記錄。它還一定是皇帝賴以進行統治的大臣們和行政機器活動的記錄。這樣寫成的歷史是以朝廷為中心的記錄，所收大部分內容是統治者和向他獻策的最高級大臣的活動。撰寫歷史的意圖是提供一部欽定的大事“實錄”，供后世君臣們從中吸取教訓和找出自己行動的典范以“資治鑒戒”。所有政治言論都是追溯過去的，尋求理想的政府形式和與過去可比之處，因此史書是具有潛在政治意義的一種寫作形式。從事官方史書的編修更可以說幾乎都是一種有意識的政治行動；有時編寫受到極為強大的壓力，這是為了給后世提供能說明執政政體行動的合法性和正確性的近期大事記載。

史書的編纂是委托給一個復雜的官僚機構進行的官方活動，這一機構正式成立于7世紀。[[34]](#_34_Jian_Cha_Er_Si___Jia_De_Na)它開始的工作是每日編寫起居注，有時還補充皇帝同宰相們議事的記錄（稱時政記）的內容。這些零碎的記錄在每年年末加以匯編，又在每朝皇帝統治終結后用作編年實錄的主要基礎。實錄還收死于本朝的著名人物的傳記，這也就意味著對這一朝的統治和行政裁量得失。評價明確地以“史臣曰”形式寫成，附于每卷之后，但更微妙地表現在材料的取舍方面。實錄為唐代的一項創新，它也許是編寫官修史書中的最重要的階段；同時還須記住，實錄通常寫于皇帝死后不久（少數幾個皇帝則在在位時就著手編寫），當時一些當事人仍在政治舞臺上活動，前一朝代的許多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在王朝的各個時期，實錄被用來撰寫本王朝的完整國史，其中包括本紀、反映具體行政活動領域的志及列傳。前一個王朝終了，新的統治皇室就利用這些材料作為撰寫正史的基礎。

在這一背景下實際進行的修史工作與其說是文學寫作，不如說是不斷地對材料進行選擇、摘錄和編輯的過程。檔案文獻雖然經過刪節和編輯，但通常仍保持原來的文字。一般地說，記載是完整的和系統的；考慮到撰寫時的環境，它在敘述事件時非常客觀。修史者的個人意見明確地以文字注明，他的好惡主要表現在材料的取舍上。官方歷史學盡管有這一切實際的優點，但它卻使近代歷史學家面臨一些重大的問題。

一旦官修大事記的目的達到，據以成書的材料或是故意被銷毀，或是至少被世人忘卻。只有在原來的文獻偶爾被保存在其他地方的情況下，我們才能找到它的全文。檔案早已蕩然無存。除了以下兩種情況，我們現在已沒有像大部分時期的歐洲史中被視為當然的那種原始材料。我們所看到的是一種“為記錄”而寫的歷史，其目的是提供一種在編寫時期被認為是正確的解釋。近代史學家們必須以自己的、完全不同于古人的觀點來看待這些材料。對20世紀史學家極為關注的許多事情，傳統的史學家卻無一語道及。

這些史書很少敘及京師以外的事務或日常的政務。唐與宋的史學的巨大差別之一是：人們根本不可能寫出隋唐時期中國的任何地區的令人信服的歷史，也同樣不可能清楚地區分各地區差別很大的發展速度和以可靠的地區意識寫出這個時期的歷史。現存最早的方志出自宋代，那時學者對中國各特定地區的描述可能達到相當真實的程度，而在唐代，除去敦煌邊區這一極為特殊的情況，這是辦不到的。[[35]](#_35_Guan_Yu_Dun_Huang_Wen_Shu_Du)

這些史書由于是施政記錄，很少敘述關于被統治者的事。平民百姓——朝廷通過地方官員進行控制的農民、地主、佃農、商人、工匠和普通市民組成的整個復雜社會——只有在擾亂既定的秩序和成為行政對象時才被載入史冊。等級復雜的佛僧和道士除非成為立法對象，否則很少被提到，而這些人在各級社會中卻起著重要作用，并且集中了大量財富和權勢。

這些史書在記載中央政府和宮廷政治的大事時，往往非常詳細地敘述修史者本人也是其成員的現存官僚集團，而很少涉及在政府中活動的其他集團，因為對修史者來說，后者的活動或是無關緊要，或是有損于他們自己的利益。但近代史學家對這些集團卻很感興趣。專業行政人員一般不受文職士大夫的重視，因而很少被注意，雖然帝國往往要依靠他們才能順利活動。雖然在以后發展起來的文武官員之間的鴻溝尚未形成，軍人相對地說也幾乎不被人注意，并且對他們的描寫一般都用否定的語氣。在唐代后半期管理皇宮并在宮廷政治和軍務中起重要作用的宦官尤其受到敵視，因為修史者本人就是官僚，他們深刻地了解宦官對朝廷文官的權勢所構成的威脅。

這些普遍的局限性在本書論述的整個時期的全部官方記載中都存在，并且也的確出現在絕大部分傳統的史書中。另外，認清以下的情況也很重要：甚至在以朝廷為基礎的官方記錄的性質造成的這些局限性中，這些歷史對各代皇帝在位期的記述的質量和繁簡程度也大不相同。[[36]](#_36_Yi_Xia_Lun_Shu_De_Da_Bu_Fen)

現存的隋代的記錄——《隋書》——編于629—636年，它的志則補于656年。所以它成書于太宗在位期，當時新王朝急于要樹立其合法的地位。為了做到這一點，此書一般持有敵意，對煬帝時期的大事作了十分否定的敘述。之所以要突出煬帝的缺點，不僅因為他的腐敗的統治給唐朝的創建者提供了奪取皇位的借口，而且因為《隋書》的作者企圖以煬帝為例，勸誡太宗不要效尤。除了這些內在的偏見外，《隋書》的作者是在十分不利的條件下工作的，因為在隋朝滅亡之際的混亂中，和624年隋朝秘書省的藏書被運往長安時的偶然事故中，大部分隋的檔案被毀。

在唐代，上面簡略談到的官方記錄制度和史館官僚機構都是逐漸形成的。記錄定稿的正規的和按部就班的編纂程序（它成了以后王朝的規范）或多或少會使人對唐代的情況產生誤解。在唐代，只有起居注的編纂貫穿于整個王朝，它到805年以后才每年被編成日歷。時政記只在太宗時期、693年以后的短暫時期和796—862年間的斷斷續續的時期才有。有詳細規定的、各官署關于具體項目的定期奏表，在安祿山之亂后準予停止上報。

在847年以后的幾代皇帝時期，非常重要的實錄根本沒有編寫。有幾代皇帝的全部在位期或部分在位期有一部以上的實錄，其中有幾部實錄（特別是順宗時的實錄）曾引起激烈的爭論。國史的編寫經過也很復雜，但最后的版本在759—760年由柳芳完成。

除了韓愈寫的一部順宗的實錄外，所有早期的編纂記錄的情況我們都不知道。但也許更重要的是，756年以前的唐朝早期記錄全在那一年被毀，當時史館的館址在安祿山占領長安時被焚。唯一留下的記錄是史官韋述所寫并保存在他家中的國史的私人底稿。此書由柳芳續至玄宗時期之末，它不但為941年起開始撰寫的《舊唐書》的作者，也為從《通典》（成于801年）開始的各種行政類書的編者提供了初唐歷史唯一的重要材料。實際上，《舊唐書》似乎收了柳芳的國史的大部分內容，作為它記述唐朝前半期歷史的基礎。

柳芳的國史提供的記錄本身是很零碎和繁簡不一的。它是656年以來企圖創作一部王朝記錄的幾項活動的結果。早期的幾種國史，例如柳芳的國史，都是在政治危機時期寫成的。它們對唐初二帝和高宗初期，直至660年前后的記載是很完整的。關于高宗執政的后半期（此時武后的權勢日隆），特別是關于武后成了事實上的統治者和后來從691—705年自己稱帝的時期，國史的內容十分簡略。歷史對武后一貫持敵對和否定的態度。玄宗漫長的執政期的記錄也受到與它的匯編有關的因素的影響。當玄宗仍在皇位時，已有兩部早期的實錄被編成，一部的內容約到725年，另一部到741年，它們當然是歌頌玄宗的。這兩部實錄可能被用來編寫國史。導致安祿山之亂災難的玄宗在位的最后幾年的記載由柳芳在759—760年匆忙寫成，但他并沒有當時的實錄和起居注可供參考。柳芳是奉肅宗之命寫的，后者已篡奪他的父皇的皇位，須要在道義上為他的行動辯解。此外，為了修史，柳芳才被免去與叛亂者陰謀勾結的指控。結果寫出的內容無疑對8世紀40和50年代主持朝政的大臣們及對玄宗本人抱有毫不掩飾的偏見。有關這一關鍵時期的內容也很不完整；8世紀60年代有人企圖寫出較完整的記載，但由于缺乏重要的文獻材料，此舉毫無結果。

《舊唐書》和現存的其他重要史料的編修者掌握了以后時期（763—847年）的更多的文獻材料，因為他們有實錄作參考。不但正史提供了遠比以前數帝在位時更為詳細的內容，而且有許多實錄中的文獻材料也收入了行政的類書（特別是9、10世紀的《唐會要》和《冊府元龜》）。雖然這幾代的實錄為編修比較完整的大事記打下了基礎，但它們引起了其他問題，因為有時它們抱有強烈的偏見，并且在完成時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在唐代最后的60年，情況又惡化了。武宗以后的幾代都未編修實錄，941年《舊唐書》編修者掌握的從847年至唐末這段時期的主要材料是日歷。日歷可能不如早期幾代的起居注，因為后期唐代諸帝不再每日按時上朝，大量公務都在幕后進行，而不再進行起居注需要記錄的公開議事。更糟糕的是，這一時期另外的許多文獻材料和檔案在黃巢叛亂和以后的戰爭中被毀，因為這些戰亂實際上把長安摧毀了。修史者不得不依靠極少量的私人記載來填補空白。結果最后幾代皇帝的記錄質量很差，也很不完整；在修實錄階段才插入的許多傳記干脆空缺。

上述敘事內容詳略不一的情況在《舊唐書》中表現得最為明顯，此書直接而且幾乎全部取材于早期的官方記錄。《新唐書》的編修者和司馬光（他與他的合作者在撰寫《資治通鑒》及《考異》時系統地搜集了當時留存的一切歷史材料）發現自己不能擺脫《舊唐書》采用的基本材料。近代的歷史學家當然更不能做到這一點，因為11世紀仍存在并為司馬光及其同時代人所掌握的許多補充史料現在已經散佚。我們描述唐代各時期的詳略程度依然取決于上述的歷史編纂學因素。

不幸的是，除了收入主要唐史中的歷史記載缺乏均勻性外，可以作為補充材料的現存私人著作也有時代分布不均的現象。隋代和初唐殘留下來的私人文集比較少，在高宗和武后時期活動的學者和政治家的現存著作明顯地缺乏。我們知道他們之中的許多人有大量著作，但從7世約后半期殘留下來的數量是如此之少，以致人們不禁推測可能有過有意壓制他們著作的企圖。相對地說，700年以后留傳下來的數量較多。在760—850年期間，有大量范圍廣泛的私人文集。《全唐文》中遠遠超過一半的文章是在760—840年的80年中寫成的，對歷史學家有價值的重要政論文章甚至有更大部分寫于同一時期。這些論著使我們能夠填補這一短暫時期的官修歷史記錄的空缺，而對任何更早的中國歷史，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如上所述，唐代最后幾年的官修記錄十分缺乏，而傳下的這一時期的私人著作相對地說也很少，不過鑒于歷史記錄的質量甚差，現在存在的私人著作就特別重要了。

隋唐不同時期的材料如此嚴重不均，這對我們了解這關鍵的三個半世紀的發展總情況來說，很可能造成一種假象。學者們對經濟、人口、社會、政治和思想等幾乎各個方面的變化進行的詳細研究表明，8世紀后期和9世紀初期是激烈變化的關鍵時期。情況可能是，這一時期的原始材料比較豐富，此前和此后的材料則較少，這就使我們把注意力過于集中在這若干年。我們掌握的材料的殘缺不全性，使我們非常難以對整個唐代作出任何形式的統計分析，除非在從事這項工作的同時還對原始材料的性質進行過細的審查。

唐代還有其他兩種重要的材料流傳下來，我們可以以此補充官方記錄的不足。第一種是碑文。大量的石碑銘文從唐代傳至今日。許多重要的銘文收于作者的文集中；另一些從宋代起在碑文集中發表；許多未出版的碑文則以拓片形式藏于中國和日本等地。近年來，中國的考古發掘發現了許多碑文。對這些物證的系統研究尚未開始。但它的內容并不新穎，其中大部分為悼詞，與唐代著作中著名的悼詞相似。它們提供了許多舍此就不能知道的人物的詳細生平，但所祭悼的對象大都是精英集團中的重要人物，撰寫這些碑文的思想和信仰背景又與唐代歷史學家的相同。不過它們有時確實提供了可與歷史記載相印證的材料，提供了獨立于歷史進程之外的證據。當兩者能互相印證時，它們就幾乎一致證明了這些歷史的敘事是可靠的。

第二種獨立的補充材料是20世紀在敦煌、西北其他地方和中亞發現的大批當時的文書。其中最重要的是約1000年藏在敦煌一佛窟墻內并在1902年（可能更早）被重新發現的“佛窟藏書”。這些日期為406—995年的抄本，以及在干旱的西北（特別是在吐魯番）發掘不同遺址時所找到的同時期的有關文書，包含了許多官方文件以及涉及面很廣的寺院和世俗的文獻材料。這些材料對歷史學家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因為它們是無意地完整保存下來的原始文書，完全未受修史者和官方編修史書過程的影響。對我們了解唐代地方社會和完全在中央政府管轄范圍以外的各方面的活動來說，敦煌文書是非常寶貴的。我們對地方社會的職能和性質、寺院的社會職能、地方政府的運轉、家庭結構、土地的使用和租佃的性質等方面的大部分知識都來自這類材料。讀者將發現我們在本書的下一卷經常參考這些文書。這類物證雖然是非常寶貴和獨一無二的，但在使用它們時我們必須謹慎，因為西北邊遠區根本不能作為全中國的典型；根據那里的情況來概括全帝國，研究者往往會擔風險。

本卷使用敦煌材料的情況比較少，雖然這是我們了解唐代貴族結構和取得防務方面詳細知識的基礎。敦煌文書的重要性還表現在另一個方面。從敦煌和中亞發現的材料中有數量相當驚人的一部分可與正史和其他官方文獻匯編聯系起來。凡是能聯系之處，敦煌材料完全能獨立地證明，唐朝記錄的匯編和保存是準確可靠的。時間、頭銜、個人關系和政府活動，哪怕是最小的細節，能夠準確地互相印證；有時我們確能見到有幾份文書已轉載在其他史料中，并能從中發現轉載的文字相當準確和忠實于原文。敦煌的檔案實際上告訴我們，官方的記錄一般地說是可靠的和準確的，考慮到保存在唐代史書中的文字已經經歷了許多編輯階段，這確是很了不起的。修史者由于選擇所收的材料，更由于刪汰某些材料，因而使記錄偏頗。但盡管他們在撰寫時受到了政府壓力，盡管他們不得不服從正統思想的約束，他們在選擇記述的事物時仍謹慎地力求準確。

但我們也不應對修史者在記載這一時期歷史中的某些事件時顯然有偏向和偏見的事實視而不見。不但《舊唐書》，而且其他重要的史書和官方類書說到底也都取材于同樣的一些資料；這些資料都是政府專司記錄的史官所寫，這便意味著我們極難擺脫這些修史者的主見。最后，盡管我們掌握的材料，例如與我們了解的同時代的歐洲相比，單從數量上說很多，但我們不能忘記，歷史中一定有許多被史官隱瞞的事件；另外，還有許多人類活動的領域對近代受過西方訓練的歷史學家來說極為重要。但當時的史官或因視為理所當然，或因認為與公認的歷史標準內容無關，所以就干脆輕易地放過了。

[[1]](#_1)宋君榮：《唐代史綱》，載《中國論文集》卷15（1791年），第399—516頁；卷16（1814年），第1—365頁。雖然出版日期較晚，這部不朽的著作在18世紀中葉就已在北京寫成；1753年宋君榮把它寄回巴黎。《中國論文集》卷16還包括他論以下內容的幾篇論文：“論唐代的穆斯林”，第373—375頁；“論唐代的人口”，第375—378頁；“論西安的景教碑”，第378—383頁；“論唐代的西域諸國”，第383—395頁。

[[2]](#_2)關于司馬光，見浦立本《中國的歷史批判主義：劉知幾和司馬光》，載W.G.比斯利編《中國和日本的史學家》（倫敦，1961年），第135—166頁。又見浦立本《資治通鑒考異及730—763年的史料》，載《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學報》，13.2（1950年），第448—473頁。

[[3]](#_3)見前列圖表4。又見陳寅恪《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載《歷史研究》，1（1954年），第33—51頁。

[[4]](#_4)關于南方和北方社會精英的文化差別，見宇屋美都雄《南人與北人》，載《東亞論叢》，6（1948年），第36—60頁；此文轉載于他的《中國古代之家族與國家》（京都，1968年），第416—460頁。

[[5]](#_5)關于內藤的理論，見H.宮川《略論內藤的假設和它對日本的中國研究的影響》，載《遠東季刊》，14.4（1955年），第533—552頁；周一良：《日本內藤湖南先生在中國史學上之貢獻》，載《史學年報》，2.1（1934年），第155—172頁；浦立本：《中國史和世界史》，第一講（劍橋，1955年）；內藤的理論首先在其《中國論》（東京，1914年）發表，后又在其《概括的唐宋時代觀》（載《歷史與地理》，9.5 〔1922年〕，第1—12頁）一文中和在他死后出版的1920—1925年在京都大學講課的講義《中國近世史》（東京，1947年）中得到更充分的發揮。

[[6]](#_6)例如見宮崎市定的《東洋的近世》（京都，1950年）。

[[7]](#_7)陳寅恪的理論最早在1944年重慶出版的以下兩部著作中發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它們以后有幾種版本，現只能在陳教授近期的兩部文集中見到。編得極好的《陳寅恪先生論集》（臺北，1971年）只收他1949年前的作品。《陳寅恪先生論文集》（兩卷，香港，1974年；《補編》，香港，1977年）所收的作品較完全，但編得較差。

[[8]](#_8)要了解這方面的某些文獻，見崔瑞德《唐代統治階級的組成：從敦煌發現的新證據》，載芮沃壽、崔瑞德編 《對唐代的透視》（紐黑文，1973年），第83—85頁。

[[9]](#_9)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倫敦，1955年）。

[[10]](#_10)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11]](#_11)關于他在施政這方面的例子，見H.J.韋克斯勒《天子的鏡子：唐太宗朝廷中的魏徵》（紐黑文，1974年）。

[[12]](#_12)關于她執政時事跡的十分膚淺的記載，見C.P.菲茨杰拉德《武后》（倫敦，1956年；第2版，1968年），又見外山軍治《則天武后》（東京，1966年）；R.W.L.吉索：《唐代武則天皇后之生平及時代》，1975年牛津大學未發表的博士論文。

[[13]](#_13)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

[[14]](#_14)見孫國棟《唐代三省制之發展研究》，載《新亞學報》，3.1（1960年），第19—120頁；嚴耕望：《唐史研究叢稿》（香港，1969年），第1—101頁；周道濟：《漢唐宰相制度》（臺北，1964年）。

[[15]](#_15)崔瑞德：《安祿山之亂以后之鹽使》，載《大亞細亞》（新序列號），4.1（1954年），第60—89頁；礪波護：《關于三司使之成立》，載《史林》，44.4（1961年）。

[[16]](#_16)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2版（劍橋，1970年）。

[[17]](#_17)見C.A.彼得森《安祿山之亂后東北諸鎮之自治》，未發表之博士論文，華盛頓大學，1966年；浦立本：《安祿山之亂及唐后期長期存在的尚武精神的根源》，載于J.C.佩里、B.L.史密斯編《唐代社會論文集》（萊登，1976年），第33—60頁。

[[18]](#_18)C.A.彼得森：《東北諸鎮之自治》；崔瑞德：《陸贄（754—805年）：皇帝的顧問和朝廷的命官》，載芮沃壽、崔瑞德編《儒家人物》（斯坦福，1962年），第84—122頁。

[[19]](#_19)C.A.彼得森：《中興的完成：憲宗和諸鎮》，載于芮沃壽、崔瑞德編《對唐代的透視》，第151—191頁。

[[20]](#_20)參見例如礪波護之文《律令體制的崩潰》，載《中國中世史研究》（東京，1970年），第407—416頁。

[[21]](#_21)見崔瑞德《關于敦煌之唐代格殘卷的一點意見》，載《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學報》，30.2（1967年），第369—381頁。

[[22]](#_22)J.K.賴德奧特：《唐代宦官的崛起》，載《大亞細亞》（新序列號），1（1949—1950年），第53—72頁，以及3（1953年），第42—58頁；矢野主稅：《唐代宦官權勢獲得因由考》，載《史學雜志》，63.10（1954年），第34—48頁；劉逸永（音）：《神策軍與宮廷機構：755—875年》，1970年倫敦大學未發表博士論文；王壽南：《唐代宦官權勢之研究》（臺北，1971年）。

[[23]](#_23)礪波護：《從牛李黨爭看中世貴族制的崩潰與辟召制》，載《東洋史雜志》，21.3（1962年），第1—26頁。

[[24]](#_24)見孫國棟《唐宋之際門第之消榮——唐宋之際社會研究之一》，載《新亞學報》，4.1（1959年），第211—304頁；D.G.約翰遜：《中世紀中國的寡頭政治》（紐約，1977年）；P.B.埃布利：《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門第：博陵崔氏家族研究》（劍橋，1978年）。

[[25]](#_25)畢漢斯：《公元2—742年中國的人口普查》，載《遠東古文物博物館通報》，19（1947年），第125—163頁；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172—177頁；浦立本：《隋唐時期的人口登記》，載《東方經濟和社會史雜志》，4（1961年），第289—301頁。

[[26]](#_26)關于唐代土地制度已有大量文獻材料。截至1969年的最重要的材料已列于崔瑞德的《唐代的財政管理》一書。堀敏一近期的優秀研究著作《均田制研究——中國古代國家的土地政策與土地所有制》收有一份全面的參考書目。

[[27]](#_27)見崔瑞德《唐宋時代的土地使用權和社會秩序》，第一講，1961年11月28日，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倫敦，1962年）。關于進一步文獻材料見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堀敏一：《均田制研究》。

[[28]](#_28)關于城市市場的成長，見崔瑞德《唐代的市場體系》，載《大亞細亞》（新版），12.2（1966年），第202—248頁，文中引用了一些次要的文獻材料。

[[29]](#_29)見崔瑞德《晚唐的商人、貿易和政府》，載《大亞細亞》（新版），14.1（1968年），第63—93頁。

[[30]](#_30)見全漢異《中古自然經濟》，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0（1948年），第75—176頁；又見崔瑞德《晚唐的地方自治和中央財政》，載《大亞細亞》，11.2（1965年），第211—232頁；米切爾·卡蒂埃：《唐代的銅錢和織物》，載《東方經濟和社會史雜志》，19.3（1976年），第323—344頁。

[[31]](#_31)加藤繁：《唐宋時代金銀研究》（兩卷，東京，1924年）。

[[32]](#_32)有大量討論唐代周圍民族的中文史料的文獻，其細目見《劍橋中國史》第4卷之參考書目。這些二手文獻中很多試圖以中文材料補充本地的史料，來闡述這些鄰近民族的歷史。這類研究占1945年前西方關于隋唐時期著作的大部分。以后歷史學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國的內部發展，對外事務相對地說被人忽視，雖然有些按傳統方法寫的研究著作繼續問世。對唐代的對外關系和成為唐與外部世界關系基礎的概念，還沒有進行全面的研究。但在肖孚的研究中，特別在他的《撒馬爾罕金桃：外國珍異研究》（伯克利，1963年）和《朱雀：唐代的南方形象》（伯克利，1967年）中，對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的文化關系有大量研究成果。關于更廣泛的政治問題方面很一般但又很重要的評述，見楊聯陞《關于中國世界秩序觀的歷史評注》，載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68年）。

[[33]](#_33)關于這一時期主要史料的簡明準確的介紹，見戴何都《〈新唐書〉選舉志譯注》（巴黎，1932年）和《〈新唐書〉百官志、兵志譯注》（萊登，1948年）。雖然其中的一些枝節部分稍微過時，但總的說它們仍是優秀和可靠的作品。關于《資治通鑒》史料來源的詳細討論，見浦立本《資治通鑒考異》。

[[34]](#_34)見查爾斯 ·加德納《中國傳統的歷史學》（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38年）；楊聯陞：《中國官方史學的組織： 自唐至明撰寫正史的原則和方法》，載W.G.比斯利、浦立本合編《中國和日本的歷史學家》（倫敦，1961年），第44—59頁；洪煨蓮：《708年前之唐代史館》，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23（1960—1961年），第93—107頁。

[[35]](#_35)關于敦煌文書對歷史學家的獨特價值，見崔瑞德《7至10世紀的中國社會史》，載《過去和現在》，35（1966年），第28—53頁。

[[36]](#_36)以下論述的大部分內容系根據兩篇為1970—1971年耶魯大學召開的中國歷史學和比較歷史學討論會準備的論文。崔瑞德：《柳芳：一位被遺忘的唐代歷史學家》；《關于編纂唐代史的幾點意見》。

# 第二章 隋朝，581—617年

在6世紀的最后25年，中國在政治上已經分裂了將近300年，這是中國歷史中最漫長的分裂期。隋朝結束了這一分裂期，掃清了分裂期遺留下來的大部分制度上的瓦礫，并為一個新的統一國家和社會打下了基礎。以后的許多朝代都從隋的成就中得益，但最直接的受惠者則是偉大的唐王朝（618—907年），它建立在隋的基礎之上，并在近三百年的時期內，左右了整個東亞的文化和政治。

這一章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評價隋朝的成就，和如何對這一時期在中國歷史中的重要性作出估計。如同許多歷史學家所說，隋在結束舊秩序、清除幾個世紀積累的渣滓和建立一個新型的帝國等方面與秦朝（公元前221至前207年）一樣，但這樣說是不夠的。就事論事這無疑是對的，但我們只有在考慮了6世紀中國遠為廣袤的版圖和復雜性并初步衡量各種新力量——例如草原入侵者、佛教和道教傳播的影響——以后，才能了解隋朝各項成就的特點。

因此，我想將本章分成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有關6世紀中國的報道，它將展示出分裂時期遺留下來的某些外貌、文化差別和各具鮮明特征的生活類型。第二部分概述重新統一者和新秩序的創建者隋文帝的性格、生活作風、政治哲學和統治方式，另外還有關于他的主要顧問的簡要敘述。第三部分討論隋在建立新的統一的制度化秩序時面臨的主要問題和采取的措施。第四部分是對第二代皇帝——煬帝——的概述，內容與有關他的父親的敘述相似。第五部分報道煬帝在位時鞏固其政權的步驟、他創造的新事物和最后他的戲劇性的毀滅。

## 6世紀的中國

6世紀中國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的文化的多樣化及地區的和種族的差異和不相容性。在317年，當中國人的北方喪失給匈奴民族后，長江流域及以南在幾個世紀中已發展了一種獨特的文明。在“夷狄”控制了中國文化的發源地和中心地后不久，許多中國人——特別是上層階級的中國人——紛紛南逃。在地處亞熱帶、地形完全與北方不同和尚待殖民的南方，北人感到很不自在。在最初，他們被南方有基業的家族稱為僑人，而北人則反唇相譏，稱南人為土著，盡管這些土著繼承了以前的楚國或吳國的大部分獨特的文化。許多北人的舉止如同異鄉之客，滿懷戀鄉之情和厭世思想，夢想有朝一日重返故土。但收復故土的一次次企圖都歸于失敗，經過了幾十年乃至幾個世紀，移來的北人逐漸適應了環境，并參加了發展獨特的南方文明的活動。

文化保守主義有時逐漸演變成沙文主義，它是這一時期南方的特征（在本章，“南方”指的是沿長江中下游及其支流再加上東至杭州灣沿海的整個開化區）。它的表現有許多形式：公開宣稱自己繼承和保持了大漢（公元前206—220年）的遺產，即漢代的古典傳統、制度、文學風格、禮儀、音樂和風俗。事實上，許多這些傳統在南方的環境中已起了微妙而深刻的變化。建康（今南京）諸帝不顧他們政治上的虛弱，也要照搬漢天子的一套禮儀；學者為他們的古典學術的正統性，文人為他們作品文字的典雅而自鳴得意。整個上層階級為了表示他們合乎規范和通曉文學，試圖保存洛陽方言，這是他們的祖先一度在一個統一帝國的京師聽說的語言。[[1]](#_1_Li_Cha_De__Ma_Se____Guan_Yu_L)在南方的主要文明中心——揚州和建康周圍的長江下游——以外，移民的工作繼續進行：土著被消滅、同化或驅趕；中國的農業得以普及；村鎮寺院在荒蕪之地涌現出來。這就是正史中描述的景象的未被人注意的背景。在這幾個世紀中，這塊地區的中國農業、行政和稅收在遠比北方故土富饒的環境中緩慢發展，給主要的定居中心帶來了財富，使有的人能過上一種豪華雅致的上層生活。

到6世紀中葉，“南方”的生活方式已經出現，這里略舉它的幾個特點。有些北方紀歲的節日已經移植到南方；另一些每年奉行的習俗則以古代南方傳統為依據。這時的僑居者已發現他們愛吃的面食的代用品——大米。稱呼和迎候他人的方式已與北方的方式截然不同。南方的婦女更加深居簡出，納妾現象也比北方更普遍。南方的婚葬之事及舉行的一些禮儀遠比北方講究。北人重視幾代同堂，而南人則喜歡夫妻另立門戶。衣食及習慣都有它們明顯的南方風格。

中國分裂后不到一個世紀，“南人”之稱不再被用作“土著”的貶詞，而逐漸成為“中國人”的同義詞。[[2]](#_2_Yu_Wu_Mei_Du_Xiong___Nan_Ren)南人，包括北方來的移民，已經依戀于他們的作風、他們的溫柔的方式和南方山清水秀的景色。他們已經感到北人粗魯，對北方的習俗、古典學術和文學作品流露出輕蔑之意。一位南方文人說北方文學猶如“驢鳴犬吠”。人們從當時的民謠中，可以感到南方的某種溫柔和給人以美感的特質。以下即是一例：[[3]](#_3___Le_Fu_Shi_Ji____Juan_49_Di)

朝發桂蘭渚，晝息桑榆下。

與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

317年以后，北方較干旱的平原出現了另一種不同文明的演變。在一個多世紀中，北方屢次遭到異族爭奪領土的激烈斗爭的蹂躪。農民不斷被征去服兵役和勞役。掠奪居民聚居地和屠殺居民之事屢見不鮮，種族內部的暴力和仇恨也成了北方獨特的情況。在這種可怕的時代，有些中國的士紳門第由于它們能以擅長的政治和文學藝術向一個所謂的征服者效勞而得以幸存；它們往往通過與異族統治精英通婚，學習它們的語言和采用它們的某些生活方式來維系自己的脆弱的地位。許多中國農民已處于半農奴的狀態，并承受了橫征暴斂的負擔。所有階級都在朝不保夕的環境中生活。

386年開始躍居為地區性強國的北魏，逐步引進了一項穩定局勢的措施。早期魏國的鮮卑族統治者是強悍的騎士，多年來他們緩慢地采用了越來越多的中國的文明生活方式。早在398年，魏國的統治者命令在今山西北部的大同附近的舊居民區建立中國式的京都，其格局象征中國王朝的氣派，這體現了他們長期追求的目標。京城呈長方形，圍以朝著羅盤四個方向的城墻，有傳統的宗廟和大圓丘等。這些不久前的游牧騎士以此來表示他們成為中國式的統治者和使“仁風被于四海”的意圖。[[4]](#_4___Wei_Shu____Juan_2_Di_33__34)但通往這一目標的道路并不平坦，而且鮮卑族有返祖傾向的人也不時警惕這一趨向。魏的統治者們最初的制度安排是在自己的部落方式和一個農業帝國的必備條件之間進行調和。他們由此朝中國式官僚國家這一方向發展，雖然在這一機構中大部分高級職位和許多特權仍保留在鮮卑貴族之手。此外，對武功和軍職的重視遠遠超過了文職和文學才能，這部分地反映了他們的傳統，部分地反映了當時的需要。

全面的漢化措施在孝文帝執政時（471—499年）實行：廢除鮮卑族的迷信而代之以中國尊奉的信仰和習俗；采用中國特有的選拔制度；鼓勵與中國人通婚；進行土地改革——引進所謂的均田制；恢復儒家思想為國教，禁止在宮廷使用鮮卑語；采用中國的姓氏；也許最重要的是，從干草原邊境的故土遷向洛陽建都，這里是充分反映中國王朝權力之地。

這一系列漢化措施引起了強烈的反應，北方一批憤怒和懷有報復心理的集團聯合起來發動叛亂（“六鎮之亂”）。這次叛亂由依戀故土和祖制并對洛陽的漢化政體深為不滿的貴族領導，參與者為職業軍人，他們是流放在長城一帶的囚徒、戍卒和與其主人同樣心懷不滿的部落民組成的成分復雜的集團。這個集團在怨恨情緒和鮮卑民族沙文主義的推動下，于523年在中原發動叛亂。大屠殺隨之而來：一個鮮卑領袖殺了洛陽宮廷中的1000多名中國顯貴，其中包括皇太后。這里不再敘述以后發生的形形色色的勾結和陰謀。534年，鮮卑帝國分裂成兩部分：一為更加漢化的東魏，它以鄴城（河南）為都；一為漢化程度較差的西魏，以陜西南部關中平原的長安為都。550年，東魏改為北齊，556年西魏被北周替代。兩國為控制整個華北而展開了生死斗爭；557年北周打敗了它東邊的對手并奪取了它的領土——包括從長城至淮河流域的全部富饒和人煙稠密的平原。

在隋重新統一全國前的幾十年，被階級和財富差別激化的種族對抗在北方的兩國中特別明顯。戰爭、地方動亂和屠殺之慘使中國人和鮮卑人都感到生命和財產危在旦夕。東魏的創業人在537年談到了種族和階級對抗給他造成的困境。他指出他的許多督將的家屬都在西魏（那里在549年恢復了鮮卑族的姓氏），西魏的統治者決心誘使這些官員為之效勞。另外，他又嘲笑地說：“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梁武帝，502—549年在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他接著說若非蕭衍謹慎行事，他的督將就會跑到西魏，他的漢族士紳就會擁立南方的武帝。他問道：“人物流散，何以為國？”[[5]](#_5___Bei_Qi_Shu____Juan_24_Di_34)

盡管局勢如此緊張和混亂，北方的文明，特別是西北的文明，仍以鮮明的特點向前發展。它具有與眾不同的尚武精神色彩，不論是漢人或是“夷狄”，都崇尚武功，喜愛狩獵，喜歡良馬和獵犬獵鷹。北方對中亞和西亞的影響一直遠比南方開放，而且以后繼續如此，這種表現可以從雕刻、建筑、舞蹈、音樂和服飾中看出。可能是在草原傳統的影響下，北方的婦女要干活和擔負各種責任。一位南方的旁觀者描述說她們忙忙碌碌，操持各種家務，并為家庭利益對政治進程施加影響。北方的家庭一般保持一夫一妻制，大家庭是標準形式。中國的士紳門第非常認真地捍衛古典傳統，這不但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且也確保它們不致像農民那樣淪落到無人保護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對古典經籍注釋的進一步發揮當然是不可能的，能保持傳統就足夠了。據說北人比其南方的遠親更加開朗和坦率，他們的風俗和禮儀比較淳樸，衣著和稱呼也是如此。生活較南人艱苦。這可以從以下一首當時的北方民歌看出：

快馬常苦瘦，剿兒常苦貧。

黃禾起羸馬，有錢始作人。

（《幽州馬客吟歌辭》）

有一條劃分南北兩個區域的生態線有助于說明不久前才出現的南北歷史和文化的差別：線的北方是粟麥文化區，那里有成群的牲畜；線的南方是水稻種植區，那里有豐富的海魚和江、湖魚的資源。這兩個地帶的人口也大不相同。帝國在重新統一后，南方只有總人口的16%左右，并且幾乎完全集中在沿長江的主要中心；其內地基本上是未開發的荒野，那里有敵視外人的土著、難以逾越的自然障礙、瘧疾和其他疾病，使得以后幾個世紀中國的移民工作進展得既緩慢，又艱苦。

南北兩大地帶并不限于文化的差別。如上所述，南方包括一些漢人的居民中心和居民地帶，在它們之外是土著居住的內地，史料稱這里的形形色色的集團為“蠻”，它們是居住在今云南和貴州兩省大部分地區的操藏緬語的部落和居住在延伸至今越南的中國南方海岸的傣語民族。在西面較遠的四川，成都周圍的肥沃平原為漢人的主要定居中心。土著部落居住在周圍高地，沿西面多山的邊境則是西藏的部落民族。漢人與所有這些民族進行長期斗爭，時而殺戮他們，時而奴役他們，并慢慢地漢化他們的生活方式。少數派往土著區的中國行政官“被同化”，但其中大部分人不屈不撓地堅持工作，發展了各種各樣的殖民技術。但在6世紀，中國文化的中心很少遠離土著定居地，通婚是普遍現象；雖然記載當時種族歷史情況的材料尚未被充分利用，但我們可以設想土著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相當大的。

這一時期北方的特點是復雜的混合種族和混合文化：自3世紀后期以來，不同血統的民族一批批來到。它們與中國人和其他入侵民族通婚。盡管孝文帝采取漢化政策，但如上所述，設法重新樹立草原文化鮮明特征的反作用力依然存在。沿陸地邊境，北方的混合文化逐漸消失而讓位于草原民族的文化。在西部和北部的戍軍市鎮及著名的馬市，人們確實能看到控制這些市鎮的北朝力量的具體跡象，但人民——士兵、馬販子、商人和當地農民——可能普遍都是混血兒。

上面已提到北魏分成西魏和東魏。它們之間的邊境不僅是政治分界線，而且是一條已存在近兩千年的文化分水嶺。西魏的京都位于高原中心，三面環山，中國人稱之為關中。從東面看，它是一座天然堡壘，對中國其他地方的幾次征戰都由此開始。往西，西魏沿其北側為干草原和南側為山區的河西走廊向外延伸。北方西部這一地區的文化與草原文化較為接近，那里的人民是優秀的騎士和武士，人們在他們身上很難看到傳統的中國文化。

東魏在許多方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它位于淮河以北到長城的大平原上。這一黃河、淮河及其支流灌溉的地區在6世紀是中國生產力最高、人口眾多的定居區；當時它幾乎擁有中國人口的三分之二。雖然幾個世紀的外患和外來統治給這一地區留下了深刻的創傷，它仍比西魏保存稍多的中國古文化。由于遠為富饒和穩定，社會上層的生活往往是奢侈的，城市比中國西部和南部的要活躍和繁榮。

佛教從最初在中國出現以來已有約500年，它此時已成為表現于社會生活各方面的一大特征。佛堂和寺院星羅棋布，寺廟和佛塔的輪廓給城市上空增添了生氣。人們走不多遠，就會遇到成群的前往各大佛堂進香的僧眾或香客。南方和北方的統治者和上層人物都是佛教熱誠的施主，他們把大量土地和財富施舍給寺院，并經常把自己的宅院用于做佛事，宗教生活成了那些好冥想的、厭世的和尋求隱居生活的人的另一種抉擇。尼姑庵（有的非常富裕）通常成了名門遺孀或已死王公所有妻妾婢女的隱居之地。但民間形式的佛教也已深入農村，那里各種各樣的迷信組織大批涌現。農民遵循的全部古老的儀式都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因此農民和上層人物的生活都重視佛教的節假日。這樣，除了中國的傳統，佛教也充當了這些不同地區和不同文化的強有力的共同紐帶。

在隋朝崛起前的半個世紀，毗鄰江淮的地區曾是敵對力量的戰場。無數外交陰謀和連年戰爭的結果使得西北勢力穩步擴大。在長江上游，現今的四川地區在552年被西魏軍隊所攻占，這是梁朝某王力圖另立國家這一招災惹禍活動的結果。另一個梁王在長江中游的江陵設行都，他在那里作為梁元帝進行過短暫的統治（552—554年），他的朝臣討論了能否沿江而下返回仍在叛亂者侯景之手的梁朝故都建康及返回的時間。在554年，西北的一支強大軍隊南下直逼江陵，打敗了梁軍，俘虜并殺了元帝及其朝臣，屠殺了城中的大部分社會精英，并把幸存者押送至京師長安。西魏于是在長江中游建立了一個傀儡國家，其首府設在江陵。這就是后梁，它一直維持到587年隋伺機把它滅掉時為止。到了554年，西北政權就這樣控制了四川和長江中游的大部分地區（包括湖北富饒的平原）。

就在這樣半個世紀中，長江以南各地的權力斗爭已經變得曠日持久和錯綜復雜。侯景發動的殘酷的反梁大叛亂（548—552年）破壞了整個地區。他的軍隊占領并洗劫了京師建康，在洗劫中實際上消滅了南方的許多有財有勢的門第。激烈的戰斗隨之而來，在斗爭的過程中，侯景在552年被一個出身微賤的將領陳霸先的軍隊殺死。陳霸先在開始時滿足于與另一位得勝的將領分享權力和保持他們擁立的梁朝末代皇帝的合法外貌。但到557年，他清除了對手，廢黜了梁帝，并自立為陳朝的第一代皇帝。

但陳霸先及其繼位者所控制的南方，要比他們的建康的前輩控制的地盤小得多。四川和長江中游已經丟失。侯景的叛亂迫使許多地方領袖在村鎮筑壘自固，并集結自己的軍隊和在附近招兵買馬，最后就成了地方的大小豪強。陳消滅了其中的幾個，但對最強大的卻干脆通過適當的加封來承認他們的實際權力。

雖然陳王朝的力量有限，但它的第四代皇帝（569—582年在位）由于出現了一個良機而情不自禁地想收復長江以北早已被北方占領的一些富饒之地。北周從長安派一使節去見陳朝的統治者，建議兩國聯合進攻當時控制從長江以北直至長城的大平原的北齊帝國，如果聯合行動成功，兩國將瓜分這一帝國。陳朝統治者同意這一狡詐的建議，派軍隊北上，并在575年打敗了同時遭北周進攻的北齊軍隊。陳朝于是吞并了淮河和長江之間的富饒的土地。但領土的擴大為時很短，因為577年周滅齊后，就把強大的戰爭機器轉向以前的盟友，并把他們徹底擊潰。陳軍被打垮或被俘虜，大量戰爭物資喪失，建康王朝的力量被嚴重地削弱。周朝此時控制了整個華北、湖北和長江中游，再加上西部的四川省。陳朝由于其西側被人占領，由于侯景叛亂削弱了其內部控制和生產能力，由于其軍隊幾乎被北周擊潰，只剩下其先輩力量的一小部分。更增加陳朝困難的是，在583年即位的這位皇帝在中國史籍中以其驕奢淫逸和前后乖舛而臭名昭著。即使我們認為正史中對他的昏庸行為的描述有所夸大而置之不論（我們也必須做到這點），他仍是一個萎靡不振的廢物。在6世紀80年代的任何時候，從北方的角度觀察，陳朝看來一定是一個容易征服的對象。它之所以能茍延殘喘，最初是因為北周宮廷不穩，然后是因為隋朝的開國者（他在581年把北周推翻）忙于鎮壓反抗和鞏固其政權。直到588—589年，他才終于準備進軍南下，開始其恢復帝國政治和文化統一的漫長的征程。

## 開國者隋文帝（581—604[[6]](#_6_Yuan_Wen_Wu_Zuo_601Nian)年在位）及其輔弼大臣

創建隋朝并以帝號文帝執政的楊堅是6世紀典型的西北貴族。他的家族的故里在長安和洛陽兩個古都之間，為北方的非漢族王朝效勞至少已有兩個世紀；并且楊氏通過與非漢族的名門進行深謀遠慮的聯姻，以確保他們的地位不衰，特權長存。楊堅之父曾被北魏孝武帝（532—534年在位）封為貴族，西魏的建國者宇文泰因其在奪權時的戰功而加賞楊家爵位。楊堅在541年生于一個佛寺內。一個尼姑把他撫養到12歲，后來楊堅在回憶時親昵地稱她為阿阇梨（梵文為ācārya，意即導師）；他也上過為貴族和高官子弟設立的太學。據說他長腰短腿，為人莊重而又沉默寡言。當他剛上學時，他態度冷漠，甚至他的近親也不敢接近他。

與同階層的其他年輕人一樣，他很早就受騎術和戰術的訓練。他14歲就在宇文泰麾下任武職，在宇文泰及其繼承者時期青云直上。在566年，他娶北方非漢族中權勢最大的門第之一獨孤氏的女兒為妻。這樣，他在三十幾歲時已是一個有成就的、攀名門為親的軍人；他曾統率一支軍隊征齊，還擔任過文官，幾次得到賞識他的統治者的賞賜。楊堅得寵的標志之一是其女被選為太子宇文赟之妻。這一恩寵把他從與世無爭的舒適生活拉到權力斗爭的漩渦之中。

578年夏，剛剛滅了北齊并統一北方的北周的武帝（宇文邕）準備率精兵遏制突厥人在今北京附近的掠奪。在36歲時，他似乎要通過一次次的勝利來最后完成統一全中國的大業。但他突然患病，就在這一年的陰歷六月，關于他的兇耗被宣布了。由太子并為楊堅之婿的宇文赟繼位。579年陰歷二月，他舉行儀式遜位給其6歲之子，但仍擁有實權。人們很快就清楚，他也是傳統的變態專制君主之一，他們是長達300年的北方諸政權的禍根。楊堅對這個魔鬼的想法，我們現在還不清楚，但580年初夏宮廷中發生的事件迫使楊堅攤牌。這個“太上皇”強奸了一個親王的妻子，并迫使親王叛亂而死，于是這個不幸的遺孀被納為第五個妃子。后來有跡象表明他決心消滅楊堅的女兒，以便提升他的新王妃。由于她母親的激動的請求，她暫時得救，但不久事情就很清楚，宇文赟要自行其是，這意味著即使消滅楊堅全家也在所不惜。在這關鍵時刻，宇文赟患病，楊堅的朋友們矯詔命他來到宇文赟的病床前。宇文赟在以后的幾天內死去，死訊秘而不宣，直至楊堅的幾個朋友說服他代幼帝攝政。這是對王朝及其支持者的公開挑戰；攝政本身雖不是篡位，但它是沿標準途徑之一去建立新王朝的重要步驟。楊堅和他的幾個朋友無疑是在孤注一擲，他的妻子用一句古老的諺語“騎虎難下”勸他說，現在已到義無反顧之時了。[[7]](#_7___Sui_Shu____Juan_36_Di_1108Y)

楊堅立刻開始采取建立新王朝的進一步的行動。他在行動時極為殘酷無情。陰歷五月末，宇文家族的五位親王被召進京，名義上要他們參加其中一王之女與突厥可汗的結婚典禮。三天后，大部分宇文赟的嬪妃被迫削發為尼。皇太后和楊堅之女被赦免。后者同意其父的奪權行動，只要行動僅限于攝政，但公開反對他另立王朝的野心。陰歷六月初，宇文氏諸王——其中一人在被脅迫的情況下——來到京師并一直受到監視；七月當他們參加宇文赟的葬禮時，他們由楊堅的一個親屬指揮的6000名騎兵“護送”。由此可以證明，楊堅此時已經獲得統率京師精兵的將領對他事業的支持。但宇文家族在北朝中也是精于謀害和耍弄陰謀之道的，所以他們也以老于此道的手法進行反擊。在陰歷六月，宇文氏一王因陰謀反對攝政而被捕，并立刻被處決。在下一個月后期楊堅幾乎被宇文家族中的兩個親王暗害，這兩個人也被捕處死。

遠為嚴重的是，宇文家族的黨羽在北方的許多地方公開進行軍事對抗。六月，宇文氏的黨羽尉遲迥在原齊國國都鄴城公開向其部隊首先宣稱，他作為宇文氏的親戚和忠仆，將從有野心的楊堅手中拯救王朝。尉遲迥雖然年邁，卻是一名難以對付的軍人，他在552年曾為西魏征服四川。此外，他權力的地理中心正處于華北平原的心臟，他在那里能夠動用驚人的資源，并且在地方強大的氏族中還有一批強有力的潛在的追隨者。在陰歷七月中，另一批北周的勤王者參加了武裝的反楊堅行動。同一月的晚些時候，幼帝的岳父司馬消難公開宣稱與尉遲迥共舉勤王大業，并在長江中游以北的九個州找到了一批追隨者；他還在那里得到南方虛弱的陳國的支持。8月初，四川的總管王謙也起來反對楊堅。在偏遠的東北，一名原齊國官員與其突厥盟友一起準備與其他人聯合反對楊堅。楊堅的確被人步步緊逼，但他掌握了幾個相當有利的條件：他的關中平原根據地長期以來是遠征的跳板，只要他有取得勝利的跡象，他就能得到從北周繼承下來的強大的戰爭機器的效忠；他還掌握著統一領導和各個擊破分散敵人的優勢；何況后者只有地方的追隨者，各懷私心異志，缺乏協調的戰略。

但在580年7月的一段時期，雙方的勝負難卜；當時重要的地方和地區領袖依然舉棋不定，楊堅的任何敵人的有力行動都可能導致他的失敗。但杰出的高颎的歸附是決定性的（關于高颎，以后將予論述）。當楊堅的其他支持者借故不上戰場時，高颎率西北軍從關中來到華北平原。在那里，他東進打擊反對楊堅大業的最強大的敵人尉遲迥及其盟友。高颎使用傳統兵法中的許多計謀和圈套，在幾次序戰中告捷，很快就面臨部署在鄴城南城外的敵人主力部隊。他在那里使用了古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的策略以打亂敵人的戰斗計劃，使尉遲迥的隊伍驚慌失措，潰不成軍。年邁的尉遲迥逃到鄴城，最后因走投無路而被迫自盡。歷史學家通常把尉遲迥之敗歸咎于其主要參謀的無能和他起用前北齊將領的行動。但不管情況是否如此，高颎已摧毀了反對派的唯一重要的集結地，一些較小的反對者開始為勝利者下賭注了。在陰歷八月中高颎在鄴城的勝利和快到11月底四川王謙力量垮臺的這段時期內，主要的反對派力量土崩瓦解。一個月后，殘敵已被打垮。[[8]](#_8___Zhou_Shu____Juan_21_Wei_Chi)楊堅得力于高颎，而他的敵人又缺乏想像力和個人魅力，所以他繼續走運。

581年初期，楊堅在陰歷二月中稱“王”，他接受了帝王的徽號，身穿皇袍，開始上早朝，頒布大赦，宣布以隋為國號——此名來自北周給其父的封地。通過這些行動以及其他遠古傳下的禮儀，他宣布自己此時已正式受命于天。到這一年夏末，北周總共59王中的最后一人已被謀殺，這樣北周勤王者反擊的可能性大為減小。楊堅的奪權行動在極不利的形勢下成功了。但如果隋不準備成為另一個短命的政體，如果它要發展成一個穩定有效率的政府，還有艱巨的任務有待完成，而楊堅也為之獻出了他的余生。下面將論述楊堅及其最親密的輔弼大臣的品質。

楊堅的性格是多方面的。有幾方面可與傳統的中國價值觀和行為準則聯系起來，有幾方面可用他生活的時代和社會環境來解釋，有幾方面涉及他追求最高權勢的變態心理（這是相當普遍的），最后幾個方面則是他品質中特有的。前面已經談到，他是非常嚴厲和令人生畏的人，既無吸引力，又不熱誠，更談不上寬厚。布德伯格注意到，他的青云直上使他一生被自危感和自大狂所折磨，因而促使他去尋求一切他感到放心的形式和一切能得到上天眷顧的象征。當時他的家族和接近他的圈子中迷信佛教和盛行佛教這一特有現象促使他把注意力集中于向佛教尋求正統地位和個人安全的方面：宮內每晚都做佛事，楊堅、皇后和舉朝上下都參加。他的自危感使他對除幾個親信以外的所有人都產生懷疑，他似乎認為幾乎所有的兒子都是潛在的敵人——這種態度在突厥可汗中是很普遍的。他為人過于儉嗇，這一與他妻子共同的性格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變本加厲。傳說他把化妝品按定量分配給宮女，宮內未備有他需要的某種藥，也沒有他妻子需要的作為普通禮物的毛領——凡此種種都是儒家的歷史學家所津津樂道的。[[9]](#_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7)

楊堅易于發怒，有時在狂怒以后又深自懊悔。這顯然與他個人的自危感有關，到了晚年，與上面談到的追求最高權勢的變態心理有關。一次他在殿上鞭打一個人，然后又肯定此事與天子的身份不符，并主張廢除笞刑。但不久，他在暴怒時又用馬鞭把一人鞭打致死。他常常似乎對帝王應仁慈寬厚的呼吁充耳不聞，不加限制地施行當時普遍的酷刑。

除了上述的個人性格，還有形成他行政作風的其他一些特點。楊堅在探討問題，采納解決問題的辦法以及他的所厭所恨等方面都接近于儒家中主張君治的荀子一派，實際上接近于法家本身。據說他不重視《詩經》或《書經》；在他執政的后期，他關閉了全國的學校，原因是學生太多，太懶散，質量太差。他對標準的儒家道德說教很不耐煩，當他的一個主要儒家大臣勸他不要再處決剩下的北周諸王時，他大聲怒斥道：“君書生，不足與議此！”[[10]](#_1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他與中國所有的君主一樣，也受歷史和先例的約束。在一次重要場合，他說他遠不如偉大的周公，只有在量刑公正這一點上可與之相比。[[11]](#_1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又一次，有人勸他不要朝令夕改以致引起黎民不安時，他認為這是隱隱地把他與漢朝的篡位者相提并論而大發雷霆。他大罵并怒問其大臣：“爾欲以我為王莽邪？”[[12]](#_12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最后他承認——即使是躲躲閃閃地——歷史學家將對他蓋棺論定；當他的三子秦王楊俊死亡（死因很可疑）時，他的隨從要求立一石碑紀念死者，楊堅答道：“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13]](#_13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

雖然有這些局限性，又處于這種精神狀態，楊堅仍是一位堅強和有成就的統治者。他酷愛工作，并把大量文牘從議政殿帶回住處審批。他似乎經常干預各級政府的事務：插手（有時粗暴地）司法機構的工作；重新審理所有重罪判決，以之作為自己的職責；接見朝集使，并告誡他們要勤奮工作和成為有德之人；考察補缺者和官員的表現；贊譽有成績的官員，譴責疲沓和貪污；主持早朝，與大臣們討論國內外政策；巡視全國。從他的工作作風和從他對法律、對儒生和官員的總的態度可以看出，他受了法家傳統和當時常見的個人對佛教的信仰兩者兼而有之的強烈影響。

典型的法家思想表現在他推動政府集權化和合理化方面。關于這方面的情況將在下一節中詳細論述，但這里我們應注意，楊堅不滿足于因襲前人或用陳舊的辦法去解決他面臨的大問題。也許我過于以自己的想法去理解頒布581年法律的詔書前言，詔書寫道：“帝王作法，沿革不同，取適于時，故有損益。”[[14]](#_14___Sui_Shu____Juan_25_Di_711Y)加著重點的一句體現了典型的法家立場。20年以后，601年的一道詔書又明顯地表現了另一個法家原則：“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15]](#_15___Sui_Shu____Juan_50_Di_1324)在中間的若干年中，他肯定遵循了重賞重罰這一法家基本政策，但他一般還堅持另一個重要的法家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最清楚地表現在他對官員們請求寬恕其子秦王的反映中，當時（597年）已是垂死的秦王因貪污大量公款而獲罪，楊堅的答復很干脆：“法不可違。”當有人再次請求時，他答復道：“我是五兒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16]](#_16___Sui_Shu____Juan_45_Di_1240)他拒絕了這一請求。

楊堅還有許多實行嚴厲的專制和法家原則的材料，以上所舉僅為數例。但同時他也能對原來的忠誠隨從特別寬容，現舉一例如下。他最早的追隨者之一為北周的同僚，后者后來被封為刺史；在歉年，此人進行糧食投機，罪當除名為民（或皇帝認為適當的一切處分）。楊堅談到了他們之間的舊誼，并說：“言念疇昔之恩，復當牧伯之位，何乃不思報效，以至于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于是此人官復原職。[[17]](#_17___Sui_Shu____Juan_38_Di_1143)

后來做了文獻皇后的楊堅之妻生于一強大和早已漢化的匈奴氏族，這氏族與北魏的豪門通婚已有幾個世紀。她的父親獨孤信曾隨宇文泰西行并協助他建立西魏，即后來的北周。獨孤信于557年自盡，但其家族不久又東山再起。楊堅未來的妻子生于544年，取名伽羅（梵語為Kālā，可能是Kālāguru的簡寫），在566年結婚時，她得到楊堅鄭重的誓言，即他不與其他婦女生育子女。這與她作為具有強烈的一夫一妻制意識和愛好駕馭他人的鮮明性格的北方婦女所受的教養是一致的。她不是后宮的佳麗，但有文化和修養，還具有強烈的政治直覺。楊堅夫婦親密無間，宮內的侍從稱他們為“二圣”。在上朝時，皇后與文帝同乘御輦。她在議政大殿的門廳等候，并派一名宦官去觀察，以便向她報告。當她認為文帝決策不當時，她就提出忠告；當聽政完畢，兩個人就一起回宮。

獨孤一家早已信佛，而文獻皇后尤其虔誠，并且是一位熱心的施主。可以肯定，安排宮內晚間讀經的是她，督促王子受佛門訓練的也是她；有一情緒低落的王子非常虔誠，想要削發為僧，但未獲其父同意。她把清心寡欲的品質與宗教虔誠合二為一，這一點她頗肖其夫。但從史籍中可以看出，她具有穩健的判斷力，這至少在王朝最初10年左右使她能向文帝提出忠告。例如，有幾個官員曾引用權威性的《周禮》的內容，大意是官員之妻應聽命于皇后，并勸她遵循這一所謂的古制。她答道：“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18]](#_1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她與楊堅都堅決不讓她的家族掌握大權，不讓經常出現的所謂“外戚問題”搞垮楊家天下（讀者不難看到，楊堅家族正是通過這一途徑發跡的）。當她的一個母系親戚獲死罪時，楊堅想替她寬恕此人，但皇后答道：“國家之事，焉能顧私！”于是此人被論罪處死。但史籍又說她頗仁愛，“每逢大理決囚，未嘗不流涕”。[[19]](#_1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

可惜的是，能夠證明她到晚年才受變態的妒忌和復仇心理支配的這一假設的材料太少。我相信這種假設，但我論述的根據是一個近期的西方觀念（這對中國和西方的編史者都很陌生），即個性不是一個人生來就有的性格的合成，而是基本上隨著環境及人的成熟和年齡增長而形成的。有一個材料證實我的假設。第一個表現她真正的變態妒忌心理的有日期可查的事件發生在593年，當時她快到50歲了。[[20]](#_20_Ci_Shi_Fa_Sheng_Zai_Dang_Shi)此事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為它預示從此時起直到602年她死亡時她對宮廷施加了有害的影響。隋文帝被當時身為宮女又是其舊敵尉遲迥的孫女所吸引，屢幸其地。皇后選擇文帝下朝的時機秘密把她殺害。文帝發現后，大為震怒。“單騎從苑中而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余里。高颎、楊素等及追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為天子，而不得自由！’”[[21]](#_2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后來文帝夫婦重歸于好，但史籍一致記載從此時起，她病態的妒忌心理歪曲了她的判斷力，并使文帝長期以來認為很有幫助的她的忠告失去公正。例如每當諸王及朝臣之妾有孕，她總力促文帝將他們罷官或削爵。甚至忠誠的高颎因妻死后其妾懷孕，也遭到攻擊。[[22]](#_22___Sui_Shu____Juan_36_Di_1109)人們懷疑楊堅與他的這位最有才能和最杰出的大臣之間關系不斷惡化，皇后從中起了作用。但在599年當朝廷大臣請求斬高颎時，文帝回顧近期斬了幾名重要官員之事，并且在難得地傾聽了意見后說：“如果誅颎，天下其謂我何？”[[23]](#_23___Sui_Shu____Juan_41_Di_1183)越到后來，她對任何人的用意都產生懷疑，而她對事物的這些反應更加重了楊堅的天生好疑的個性。她刺探諸子的私事——特別是性方面的習慣；她和楊堅一起一步步地尋找理由把他們或貶，或殺，或作出其他安排，最后只剩她寵愛的楊廣，即未來的煬帝。

隨著文帝夫婦日趨年邁，他們做的佛事越來越頻繁和講究。做法事、賜齋、分賞僧侶禮物和向寺廟捐獻的次數更多了。佛事活動的高潮出現在601年。在這一年，楊堅有意識地模仿印度偉大的阿育王的行動，實現了一項精心制定的計劃，即同時在全國祀奉放在特制的佛骨瓶內的舍利。有名的高僧及其隨員攜帶由文帝親手裝在寶瓶內的舍利分赴30個州治。在全國同時祀奉時，文帝在京師召見367名做佛事的僧人，然后為他們和文武官員大擺齋宴。皇后當然參加這一大典的隆重的宗教儀式。她死于602年，一位宮廷史官立刻宣布她成了菩薩。文帝苦苦思念，對其妃嬪的動機產生懷疑；當他患病時，他悲痛地說：“使皇后在，吾不及此。”[[24]](#_24___Sui_Shu____Juan_36_Di_1109)楊堅的夫妻關系在中國歷史中很可能是獨一無二的。一個后妃在君主的大部分執政期間對他有如此強烈和持續的影響，這實在少見。以下我們談談核心的高級官員，他們也在比皇后較短的時期內影響著隋統治者的決策。

高颎（555？—607年）似乎出身于華北平原東北部一個不引人注目的家庭。其父曾為未來的皇后之父獨孤信效勞。當北周突然出現種族返祖傾向并明令所有的社會上層恢復鮮卑族之姓時，獨孤信將自己的姓賜給高颎之父。在兩個人長期而親密的關系期間，楊堅一直稱高颎為“獨孤”。高颎在16歲時開始在北周任職，576年因征齊有功而被擢升。他沒有參與一些人敦促楊堅陰謀奪取皇位的活動，但楊堅知道他的軍事才能和其他技藝，就設法爭取他。這是一個關鍵行動，因為當楊堅的其他追隨者畏縮不前時，高颎主動請戰去進攻楊堅的政敵。如上所述，高颎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他在新王朝中的地位因此也很高。他接受了一系列艱難的任務，都完成得很出色。他率軍征伐突厥人并取得勝利，監督新都的建設（見下文），制定了征伐陳朝的宏偉戰略，并向那里勝利進軍（晉王為名義的統帥）。他在掌權的20年中對隋朝的成功作出的最大貢獻可能是在財政管理方面。他制定了稅收登記的新標準和成立了負責這一工作的機構；在隋朝這些年采取的財政措施方面他可能都做了工作。在9世紀初期著書并使用法家評價標準的杜佑把高颎與管仲和商鞅并列；管仲通常因在公元前7世紀使齊國稱霸而受人贊譽，商鞅則是為秦國的崛起打下基礎的宰相。杜佑對高颎的偉大之處評判說，盡管他處于連年戰爭和分裂以后的亂世，但他通過制定的登記制度、貨幣改革和其他的措施，成功地把隋朝的納稅人口從589年的400萬戶增加到606年的890萬戶。[[25]](#_25___Tong_Dian____Juan_7__Shi_T)

627年，唐代第二個皇帝太宗對留用的前隋代官員一致盛贊高颎做宰相的政績這一事實大為驚異。這促使他去閱讀高颎的傳記，從而證實了他們的評價。他說：“朕比見隋代遺老，咸稱高颎善為相者，遂觀其本傳，可謂公平正直，尤識治體。”[[26]](#_26___Zhen_Guan_Zheng_Yao____Jua)從記載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高颎是一位有才能的戰略家，一位講求實效和效率的行政官員，一位在制定隋的政策中起著重要作用和全面負責執行這些政策的明智的襄贊大臣。他與其主公文帝一樣，也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作為一個信佛的居士、武士和實干家，他與隋朝以李德林為代表的儒家官員形成鮮明的對比；李德林是楊堅的另一個顧問（見下文）。

受到如此恩寵的人不可避免地遲早會招到皇后的疑忌。也許早在589年，當高颎阻撓晉王（楊廣，后來的煬帝）想占有陳朝統治者的寵妃的企圖時，他就被引起了猜疑。但在598年再次展開遠征遼東的辯論后，他被授權擔任實際的指揮，漢王則任掛名的統帥。軍隊遇到洪水并為瘟疫所苦，無功而返；于是漢王告訴其母，說高颎想殺死他——文帝也偶爾聽到這一明顯的讒言。于是，誹謗的網絡在這位大臣周圍張開了。當五位卿相向楊堅保證高颎無辜時，他們都得到降職的下場。在楊堅快到60壽辰時，利用他的恐懼心理搞欺詐是極為容易之事，由于一件所謂高颎聽信兇兆的傳說，事情終于得逞。結果，在皇后瀕死的前夕，她成功了；高颎被罷官——但在此前的一次動感情的宴會上，每人（包括皇后！）都噙著眼淚，宴會完畢，楊堅對高颎說道：“朕不負公，公自負朕也。”[[27]](#_27___Bei_Shi____Juan_82_Di_2491)高颎被煬帝官復原職，但不久因失寵而被殺。

楊素 在文帝時與高颎和蘇威分掌大權的楊素（死于606年）的出身與楊堅相似。他們的故里在一地，而且是遠親；兩個人都是典型的地方貴族，所受的教育主要是“夷狄”文化。他的姐姐嫁給一個非漢族家庭。在青年時代，他勤奮好學，而且酷愛女色。他的美髯使他具有勇武的英雄氣概。的確，他對隋政權的鞏固貢獻最多的是他的戰功。他的事業始于北周的軍務，在征服北齊之役中表現了他的勇猛。在580年關鍵的夏季中，他密切配合楊堅的奪權行動，協助他打垮了當時統治王朝的支持者。他在隋朝的第一個職務是御史大夫。在策劃征陳時他非常活躍，指揮隋的水師很有成就，因此他得到豐厚的賞賜和14名婦女——戰敗的陳朝統治者的姐妹和嬪妃。征服陳朝不久，楊素殘酷并有效地平定了南方反隋的叛亂。據說楊素的軍隊戰無不勝，他確保勝利的緊急措施既簡單又殘忍：他的部隊中凡在敵人進攻面前潰退者，一律就地處死。他對付突厥人同他在中國的征戰一樣成功；他作戰的特點是放棄傳統的、帶防御性的戰術，主張進攻性的騎兵突擊和不斷騷擾敵人。他堅持在記載戰役時，應始終突出他的作用，而不惜奪別人之功為己有。

楊素在朝廷上也是殘酷無情，是一個能伺機取勝和工于心計的機會主義者。在下節論述律令時將會看到他怎樣利用法律清除敵人和提高自己的事例。據《隋書》記載，他與皇后一起，進行了一系列消滅其他王子和舉晉王楊廣為太子的陰謀。又據《隋書》得知，他參與了加速楊堅之死和阻撓楊堅重立前皇太子以代替楊廣這一為時已晚的企圖的秘密陰謀。[[28]](#_28___Sui_Shu____Juan_48_Di_1288)盡管楊素以前侵吞公款和濫用勞力，他仍被委以在洛陽興建新都之重任。在606年他死去時，他與其子孫積聚了無數財寶、絲帛、房屋、封地和美女以及許多崇隆的爵號。他最后為王朝用兵是604年鎮壓漢王反楊廣繼位的叛亂。楊素為隋文帝的“出謀劃策的人物”。他的名字與全面的改革措施無關，幾乎只與遠征和軍務有聯系。他魯莽無情，傲慢自負，但以那暴力年代的標準來衡量，他是隋王朝的忠仆。

蘇威（540—621年）是隋文帝時權勢最大的三個人中的第三人。他是高颎推薦給楊堅的。蘇威的父親是著名的蘇綽，此人曾任西魏建國者宇文泰的主要文職顧問。根據零星的記載，北周作出的所有行政工作的改進都應歸功于蘇綽，因為其主公畢竟是一個來自北方邊境的粗魯而無文化的軍人。蘇綽推行一種不尋常的文化借鑒模式。他知道由于孝文帝輕率地進行漢化，魏在沖突中已分裂成兩個王朝，因此他不能向其鮮卑的主公建議再照此辦理。但所有實現井然有序的文官之治和穩定的集權政府的樣板都因其出于中國傳統而可望不可即。那么，他依靠什么模式而不致觸怒其主公？他首先引進了申不害和韓非子的實用的法家學說——這是許多世紀以來求實的政治家的主要思想。這使蘇綽立刻受到嘉許。此后他必須努力說服其主公：有一個中國的集權化模式，它未受漢代以后諸國的失敗和權宜之計的影響。它就是《周禮》提供的模式，書中規定了國家和社會的標準等級，這樣就把宇文泰的向往與古周代的理想秩序聯系了起來。556年，蘇綽的后繼者盧辯在重新命名北周的全部官署時，設法使這一模式具體化。[[29]](#_29___Zhou_Shu____Juan_2_Di_36Ye)同年，梁朝最后一個統治者被北周打垮，并被北周的那些傀儡國家所代替。這是對正統的“漢朝繼承者”，甚至是對東魏的一個嚴重打擊，因為后者是孝文帝向漢代以后諸國借鑒制度的繼承人。544年，蘇綽制定了他的“六條詔書”，并以詔書形式頒布，這是一種治國和行政的手冊，它是奉宇文泰之命寫成，以便“革易時政，務弘強國富民之道。”[[30]](#_30___Zhou_Shu____Juan_23_Di_382)它是一本如何按實際情況施政的問答或手冊，宇文泰曾命令其官員熟誦此書，否則就削奪他們的官職。“六條詔書”的思想是摻雜了實際經驗和法家行政學知識的儒家倫理學說。

楊堅及其全部主要顧問都在北周當過官，他們都受到蘇綽的改革和“六條詔書”的影響。高颎說他本人正繼續履踐這一傳統，并且特別敬重蘇威，因為他是蘇綽之子。蘇威在擔任許多重要官職時做了大量工作，并對隋早期的改革出過力。但他多次得寵和失寵。當楊堅決心把冒犯自己的人問斬時，蘇威設法勸阻，楊堅在恢復平靜后就對他表示謝意。他為人清廉，但在討論國策時不能容忍不同意見；即使他為一些小事受挫，也總是堅決斗爭。他還為煬帝效勞，以后又在隋滅亡以后的幾個叛軍政體中任過職。他活到88歲。《隋書》記載，他是許多法律典章的作者，但這些都被認為粗糙瑣碎，缺乏長期性法律必須具備的那種精確性。《隋書》又說，“時人以為[蘇威]無大臣之體”。[[31]](#_31___Sui_Shu____Juan_41_Di_1190)他立身于隋廷，但能使人追想蘇綽的流風余韻，這種作用可能比他作為顧問和大臣產生的影響更加重要。

隋文帝朝的其他官員的權勢均遠遜于上述三人。他們之中的許多人是楊堅的親屬，而且如下所述，絕大部分人的階級、籍貫和教育背景與楊堅的相同。他的最高級顧問中只有一人完全掌握儒家的思想遺產和來自東部平原，并曾在那里為北齊效勞。此人就是李德林（530—590年）。李德林出身于書香門第，據說在很早就表現出通曉古代典籍的才能。他在科場取得秀才的功名，北齊在實行古老和腐敗的薦舉制的同時另立了科舉制度。他于是在王朝擔任不同的職務，其中以起草詔令和編修王朝史的責任最重。556—557年，當北周征服并吞并北齊時，李德林被送往西邊的北周首府長安，在那里被委以起草詔令和法規之責，因為這些東西需要一個東部的人加以潤色；有人推測這些文件旨在鞏固北周對被征服的北齊土地上的人民的統治權。

李德林被爭取去支援楊堅開創新王朝的大業；在偽造以幼帝名義頒發的要求楊堅攝政執掌文武大權的詔書的過程中，他起了主要的作用。在580年緊張的夏季，他給楊堅出了許多好主意，然后以他深厚的古文造詣，用古雅和令人信服的文字，絲絲入扣地宣布周的滅亡和隋朝的建立。這之后不久，他單獨反對全部殺害前統治王室之王的建議，為此，楊堅罵他為書生，不足與議此事。據《隋書》記載，從此他的升遷較慢，其品位繼續低于核心集團的顧問。[[32]](#_32___Sui_Shu____Juan_42_Di_1199)但他被授權起草隋的新法規。589年，李德林因一項控制地方的計劃而與高颎和蘇威對立，他認為此計劃將重新引起已為廢除鄉官的措施所糾正的一些弊病（在下節將予論述）。他再次失敗，這一計劃付諸實施，但一年后因不可行而被放棄。

李懷疑有些隋的官員出于叛逆的用心和個人打算而阻撓立刻對陳的征討。對此，他寫了《天命論》一文，他在文中運用關于古代典籍、口頭傳說和歷史先例的淵博知識，論證了隋帝此時已合法地取得天命；反對隋帝就是反對古代圣賢的智慧，反對歷史先例，而且實際上就是反對蒼天本身，因為蒼天明確地顯示了天意的各種征兆。這篇論文與其他夸大其詞地敘述權力轉移和建立隋朝的文章一樣，顯示了他在使用儒家材料和其他傳統以使權力地位合理化和正當化方面的精湛技術。他的文學才能在文帝的顧問中是獨一無二的，所以他能獨樹一幟。

自隋建國以來，李德林力促其主公南征。其傳記盛贊他在這次勝利的遠征計劃中的功績，但傳記并未提供計劃的詳細內容。據說文帝興高采烈地許下諾言，說一旦征服了陳，他將以榮譽和財富厚賜李德林，“使之山東無及之者”。[[33]](#_33___Sui_Shu____Juan_42_Di_1207)應該注意的是，文帝沒有許諾按照賞賜其西北追隨者的規格來賞賜他；事實上當陳被征服時，李德林得到的是“授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戶，賞物三千段”——真是夠吝嗇的！以后他又與文帝意見相左，于是在591年到州任職，直到599年亡故。

李德林顯然是一個能力很強的人，在制定關鍵的行政程序和法律文獻方面，楊堅最大限度地利用他的專才。但他又很固執和拘泥成規，作為一個原北齊的臣下和儒生，他在文帝周圍的剽悍善騎、講究實際的西北人中找不到天然的盟友。因此，當他屢次觸怒文帝時，他在晚年被貶到地方工作。

以上是第一代隋帝的主要顧問：皇后，一個虔誠、有妒忌心的愛管閑事的知己；高颎，能力很強，多才多藝，能制定文武兩方面的政策，并努力在京師的官署或在戰場上貫徹；楊素，凡是貴族都用得著的打手，隨時準備執行其主公的命令而不管死人多少；蘇威，一個有名人物之子，盡管有種種過錯，是一名忠誠和有效率的朝廷官員；李德林，一個儒家文人，只有當他在禮儀、古代典籍和歷史方面的學識能為篡位的隋朝提供合法的依據時，他才被使用。在這核心圈子以外也有形形色色的有用人才，文帝長期或短期地在正式官署或在特殊使命中加以任用。他所能物色和使用的所有有干勁的和有能力的人，都被用來對付新王朝面臨的一大批難以處理的問題。

## 隋代面臨的大問題

### 混合的意識形態的形成

首先論述意識形態這一題目并不意味著意識形態比本節以后談到的其他實際問題更加重要，而是因為它比隋初的其他問題更全面，對各方面更具滲透性和更抽象。國家的意識形態給予其他一切措施以特色和微妙的影響，但在已知的任何結果中卻很少表現為決定性的因素。它既是決策者的設想和心理傾向的組成部分，也是他們操縱的輿論的組成部分。如同隋朝的其他成就，我們在這里必須考慮它的歷史背景。

隋朝的混合意識形態中的儒家因素原為漢儒的思想、價值觀、習俗和禮儀，在漢朝滅亡以后政治動亂和分裂的三個世紀中，它們持續未衰。這些內容又分成若干亞傳統。最明顯的是使帝權正統化的非常細致的禮儀和象征的程序。在前面概述的李德林的事跡中，這一正統被用來滅周立隋，同時以最大可能避免天下大亂。禮部在屢次頒布的律令中進一步發展了它，并使之長期化。表面的和明顯的形式是天子遵守的禮儀，其中南郊春祭和在典籍規定的太廟中祭祖是明顯的例子。在這亞傳統中，隋取紅色和五行中之火；隋帝因此在南郊祀奉炎帝。這是與大漢的另一個象征性的聯系，因為漢也以火之“德”進行統治。這些聯系以及一切天子應該小心翼翼地履行的禮儀活動，對樹立隋帝的統治權，特別對擴大隋帝對包括陳朝在內的統治（那里仍熱誠地保存漢朝的傳統）是非常重要的。

儒家思想的第二個亞傳統是在道德和倫理制度方面。大部分蘇綽遺留的傳統關系到政體和社會全體的道德完善。楊堅很快放棄了北周設置的古代官職稱號，但強烈地支持儒家主張的倫理原則和社會的等級秩序。在隋代初期，王朝就對其行為成為儒家德行榜樣的人加以褒獎：恪盡孝道的子孫和不再娶嫁的鰥夫寡婦被豁免課稅和勞役。孝道——等級秩序的基礎——對楊堅尤其有吸引力。蘇威引用其父蘇綽之言，大意是人們若讀一卷《孝經》，就足以樹立本性并足以治國。[[34]](#_3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不久，據說楊堅命令他過去的一個支持者閱讀《孝經》，因為此人誤入魔道，并有不孝行為。楊堅在與李德林最后決裂前的一次爭論中，與往常一樣大發雷霆，他喊叫道：“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據古典籍，‘五教’為父義，母愛，兄友，弟恭，子孝）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35]](#_35___Sui_Shu____Juan_42_Di_1208)

第三個亞傳統為古典學識。如上所述，楊堅有反智力的傾向，不大利用不能直接用于促進帝國社會和道德的完善、不能用于天子履行的禮儀職責或不能用于培養有能力行政官員的那種儒家思想。他迫切需要有文才和獻身精神的官員來為他的新集權官僚機器服務，而儒家的經書課程是培養文才的標準途徑。儒家的經書又是政治思想的基礎；它們包含了論述政策的立場和論證的基本內容。6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楊堅一再降詔以吸收才德兼優之士進入他的官僚集團；他獎勵具有古典學識之人，命令諸州各選拔三人（工匠和商人除外）來京師深造、應考和任職，要求各州縣“搜揚賢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識治亂”之人。[[36]](#_36___Sui_Shu____Juan_2_Di_51Ye)但他似乎對結果深為失望。601年陰歷六月，他下令關閉大部分講授儒學的學堂。詔令的部分內容流露出他對儒家思想的態度，他寫道：“儒學之道，訓教生人，識父子君臣之義，知尊卑長幼之序……朕撫臨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學徒，崇建庠序，開進仕之路，佇賢雋之人。而國學冑子，垂將千數，州縣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錄，空度歲時，未有德為代范，才任國用。”[[37]](#_37_Tong_Shang_Shu__Di_46__47Ye)據《隋書》，同日，頒舍利于諸州。

本章的前幾部分已經敘述了佛教滲透于社會各階級的情況，并指出佛教對楊堅及其心腹一生的強烈影響。在隋朝的混合意識形態中，其佛教傾向即使不是主要的，也必然是強有力的。楊堅曾在北周擔任官職，曾看到武帝從574年起大力推行消滅佛教、道教和一切儒家典籍沒有認可的宗教儀式的措施。僧侶和道士都要還俗，同時他們的廟宇、經卷和偶像都被銷毀。楊堅和他的妻子曾經庇護一個當過他幼年時代老師的尼姑，當武帝命令進行鎮壓時，楊堅很可能在被征服的北齊某地任職。他可能看到了受鎮壓影響的各種集團中的不滿情緒日趨增長的情況，這些集團是：還俗的僧侶，他們的生活方式已被明文禁止；俗家的施主，他們對僧道和寺觀的施舍和朝圣已成為其生活內容的一部分和渴望超度的表現（其中有許多有權勢的文武官員）；最后是大批靠佛門寺廟為生的繪畫人、工匠、抄經者和供糧者等。578年陰歷六月武帝死后，排佛活動稍有放松，但直到楊堅立隋時才停止；最后佛教又得以振興。

對楊堅和隋廷大部分官員來說，佛教只是個人信仰；這里的問題是，佛教在混合的意識形態中起什么作用。作用之一是，它成了輔助性的法律。儒家傳統以其所有的禮儀和象征的說法使楊堅成為天子，而佛教則具有創造上蒼恩寵和賜福的理想統治者形象的豐富的民間傳說。有許多把楊堅與這一形象聯系起來的文字，以下為其中一段：“又皇帝大檀越，雖復親綜萬機，而綜道終日，興復三寶，為法輪王。”[[38]](#_38_Ju_Fa_Jing_He_Shang_Yu_594Ni)文帝的許多與佛教有關的活動都突出了他作為理想的君主和佛教的捍衛者（轉輪王），及向佛門大量施舍和向其臣民示范的樂善好施的施主（大檀越）的作用。正如文帝在585年所言，他的作用使他成了菩薩的代理人：“佛以正法付囑國王，聯是人尊，受佛囑付。”[[39]](#_39_Fa_Lin_He_Shang_Zuo___Bian_Z)他在45個州普遍興建大興國寺，以使他一步步地獲得最高權力，它們提醒地方的臣民，在大興城有一“菩薩天子”在進行統治。這對他鞏固其中國東部的統治和遠征陳朝的準備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他登位不久，開始讓僧侶重入佛門，但要求這些人完全合格，而且必須受京師的大興善寺的有力控制，該寺以一位“律師”為住持。經過訓練和受戒律的僧侶對國家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們興辦慈善事業，為國家的興盛祈禱，做其他具體的佛事（如祈求降雨和止雨，祈求制止瘟疫，為皇室列祖列宗求福），總的來說，這類活動為國家及其當權的皇室調動了巨大的無形力量。

隋朝佛教的第三種作用表現在它是各地各階級人民的共同信仰這一方面，因此它是漫長的大分裂時期以后的統一力量。在文帝統治的初期，他就大彈此調，并在他整個在位時期一再重申：“用輪王之兵，申至仁之意，百戰百勝，為行十善。”[[40]](#_40_Fei_Chang_Fang_Bian____Li_Da)在早期的另一詔令中，他又說：“好生惡殺，王政之本。佛道垂教，善業可憑……宜勸勵天下同心救護。”[[41]](#_41___Xin_Xiu_Da_Cang_Jing____Ju)這一主題思想在他征服南朝后特別被強調，因為此時必須說服南方的僧俗順從征服者的旨意。601年，正當他效法阿育王廣分舍利之時，他頒布詔令并特別熱情地指出：“朕歸依三寶，重興圣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使當今現在愛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42]](#_42_Dao_Xuan_Bian____Guang_Hong)隋朝御用佛教的這三種作用或主題思想使整個佛教意識形態帶有一種獨特的色彩，這在中國的編年史中是獨一無二的。

含有佛教內容的道教在5世紀或更早已經形成，到北周574年壓制宗教時，道教已奉老子為主神，其化身及遺物也被放進圣殿祀奉。道教按佛教模式發展了道觀、道士和道姑的圣職、圣地、經卷和神學。楊堅掌握政權后，立刻撤銷了周的禁令。雖然據說楊堅稱帝后很少利用有才能的道士，但仍用一學有專長的道士制定第一部隋歷。我猜想，由于此人的影響楊堅才選用開皇為隋第一個年號。586年，他命一個起草公文的得寵文人撰寫碑文，把碑安放在安徽的老子的“出生地”；同時他命令一個高級官員在現場調查歷史遺跡并建造一座新的祠址。帝王尊奉老子和關心其神壇的情況至少可追溯到165年，因此隋文帝不但贏得道教信徒的支持，而且表現了他有權恢復漢代諸帝之后已消失的禮儀。

在楊堅為數甚少的涉及道教的公開聲明中，同樣強調了佛教記載中提到的關于帝國統一和諧的論調。他早期命令在中國五岳（道教在那里一般有優先權）建造僧寺的詔書宣稱：“朕敬道之潛移默化之神力，以登太虛之境。朕奉釋氏一不可分之真髓，老子追求一體之理念。”[[43]](#_43___Bian_Zheng_Lun____Juan_3_Z)但這種提法為數較少；他更常提到的是他對道家教義顛覆性潛力的認識和對它的鎮壓措施。人們如非法利用占卜和所謂的左道旁門，都將遭到嚴厲的鎮壓。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帝末年，新京師有僧寺120個，而道觀只有10個。

在發展混合意識形態時，隋文帝以上述的主導思想和重點，有選擇地利用三教的價值觀、禮儀和象征說法。如果要確定何種主題占支配地位，那就應推萬物有機的和諧這一基本的中國價值觀念——這是隋朝在幾個世紀的戰亂和分裂的背景下必須努力爭取的目標。

### 建設新都

如同對許多世紀以來的中國人那樣，對隋朝的開國者來說，建設新都的決定是一件特別隆重的大事。因為國都是意識形態的象征，是天子統治天命所定疆域的中心。國都的位置和設計不但必須符合歷史先例，而且必須符合中國人用來適應上天和自然意志的各種象征性的制度。楊堅在漢朝的古都奪得政權，那里經過許多世紀的分裂，曾經再三地被洗劫、焚毀和重建。在此期間，它成了許多短命王朝的國都，其中大部分（如北周）的統治皇室和社會精英為非漢族。此城不大，也不對稱，已經古老和破落，飲水也帶澀味；它充滿了被殺害者的幽靈，也勾起了人們對連續的政治失敗的回憶。在執政的第二年，楊堅和他的心腹顧問開始討論遷都的可行性，陰歷六月的一份詔令總結了贊成遷徙新都的所有論點。新帝向其臣民保證，他已研究了歷史的先例，經占卜得到了肯定的答復，并且已瞻星揆日，卜食相土。他在要求其黎民承擔這項工程時說道：“謀新去故，如農望秋，雖暫劬勞，其究安宅。”[[44]](#_44___Sui_Shu____Juan_1_Di_17Ye)

他命宇文愷負責建造新城的計劃，此人是當時搞建筑工程的最杰出的行家之一。他與所有協助建城的人都來自北方，具有混合血統；其中有的新近從中亞遷來，其中一人有拜火教的名字。所有的人都敞開思路大膽創新，從中國古代典籍的要求中各取所需。結果國都規模空前，設計新穎。

此城位于舊長安的東方和南方。夯實的外圍土城呈長方形，按羅盤方位布局但面南，東西長5.92英里，南北寬5.27英里。城內按職能分成四區，皇城位于中央，背靠北城墻，內為皇帝的居住地、太極殿、宮廷、幾個小議政殿和宮內侍從的居所。皇城南面隔著寬闊的斜坡是另一圍有城墻的區域，那是行政城，政府各官署就分布在其內的街道上。行政城為一項創新，因為以前的國都與近現代的巴黎和倫敦相似，政府的建筑分散在城的其他區域。在這兩個建筑群和外城城墻之間，排列了108個有長方形圍墻的建筑群（這一數字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即9天之數乘以12時辰之數）；其中106個為供居住的坊，排列在11條南北向和14條東西向的大道上。各坊坊內有兩條街，交叉呈十字形，坊四面的中央各有一城門。另外兩個有圍墻的建筑群為市場，一在西城，一在東城。它們是有官監督的城市商業中心。

城的主軸是一條南北向的寬闊大街，它從正北有五個門洞的主門通往行政城的中南門。如果一個官員取得了能夠通行的官品，他就能穿過行政城直達皇城巨大的南門廣陽門。隋文帝就是在此門樓上俯觀戰敗的陳朝顯貴的。京城和皇宮都以隋文帝在稱帝前所受的封地命名，因此稱大興城和大興殿（作為隋朝的都城，大興之稱富有吉祥之意，它可能使人想到“大興”早已消失的漢朝光榮的業績）。

當村落被清除，城墻拔地而起，城市的外形剛剛構成時，文帝就遷入（皇宮首先完工）。此時正值583年陰歷三月。在有些人的眼中，此城的宏偉輪廓對一個掌權未滿三年的君主來說，未免有些鋪張。楊堅也知道它的內部空蕩蕩，缺人居住，于是采取種種措施吸引人們前來定居。他命令諸王子和皇親國戚在城的西南部建造他們的王府，以推動其他人也來營建。他向捐助和建造佛寺的任何人都賞以御制牌匾。有一史料記載，某人拆除其舊長安城中的房屋，以木料建造新城的寺廟。文帝親自把最佳的位置留給京師佛道寺觀：在南北大道的東面，大興善寺占了整整一個坊。穿過大道，在較不繁華的西面則為道教的玄都觀。到了文帝執政的末年，他眺望其國都，可以看到100多座佛道寺觀。隨著陳之滅亡以及它的精英從其國都遷到大興城，那里的居民無疑增加了。但在文帝末年，甚至可以說到隋亡之時，城的大部分地區仍無人居住，也未竣工。近代發掘的遺址經確定是隋都外城的一段，發掘者發現城的建筑有趕時間的跡象。[[45]](#_45_Jian___Kao_Gu_Xue_Bao_____3)直到偉大的唐帝國繼承隋朝，并改進了京城與廣袤而相對穩定的帝國各地的交通，此城才得到充分的發展。

隋朝初期如此規模的建都工程表明了隋的創建者及其顧問的信念，即他們相信他們的王朝會比以前的政體具有更大的影響，更能長治久安。至少關于前一點，事實證明他們是正確的，因為唐朝繼承他們以此城為都，并在此地統治中國和整個東亞幾乎達300年之久。

### 中央政府的改革和人才的任用

當隋朝創建者接管北周時，他繼承了一個中央政府，其官員的職稱和職能已經有意識地按照《周禮》的模式被古典化了。但在這擬古門面的背后，實權仍被一個軍事貴族寡頭政治集團的成員所掌握，他們大都是鮮卑人，或具有混合血統。據統計，大約95%的北周高級官員為非漢族。[[46]](#_46_Shan_Qi_Hong____Sui_Zhao_Gua)文帝本人就是在這一體制中成長的，他的大部分友人和主要參政大臣也來自這一集團。他似乎從一開始就決定了中央政府的新結構和從新帝國的許多集團和地區吸收統治精英。

在他執政的第一年陰歷二月，他取消了北周官員的職稱，并宣布他的意圖是要遵循偉大的漢和曹魏（220—265年）兩個帝國的前制。事實上，他的大部分官署和職稱都模仿北齊，而北齊的官署和職稱則是5世紀后期北魏實行激進的漢化政策的反映。雖然如此，遵循漢魏前制的命令還是進一步證明，隋朝有雄心使自己成為一個比漢魏以后的地區性國家更偉大、更持久的政體。

王朝初年出現的中央政府機構包括許多有漢代名稱的官署，但這一機構的許多方面是新的，已經預先呈現出唐代中央政府的輪廓。在最高層為三師和三公，按照周初的模式，他們應該是皇帝的最高顧問。事實上，這些職務并無職能可言，而且往往長期空缺；有時皇帝把這些崇高的稱號和豐厚的俸祿賜給他要削奪其實權的人；有時又把它們封賞給皇親國戚。權力最大限度地集中在下一級的三省，即尚書省、門下省和內史省（后來為內書省）。尚書省最為重要，因為它管轄六部，即吏部、民部、禮部、兵部、刑部和工部。除三省六部外，隋還設立御史臺、都水臺（后稱都水監）和九寺（其中包括太常寺、光祿寺和宗正寺等）。此外，隋還設國子寺（后為國子監）和監察帝國工程和生產的機構。這些官署的主要官員都有規定的稱號和各級屬員人數，對每個官署任職官員所必需的官品也有具體規定。

這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結構，但缺漢代官僚機器中一個最高級的關鍵位置——丞相。文帝決定不設此職，下文將談到，他寧愿親自與三省的高級官員討論政務。實際上他本人就是丞相。因此，官僚集團在缺乏一個擁有全權的政府首腦的同時，還缺乏一個代表整個官僚利益的最高仲裁者和代言人。煬帝也照此辦理，如果有區別的話，他比他父親擁有更多的行政實權。

如果要整理出一個對稱的組織機構表（其官署的名稱能相應地使人聯想起漢代及更早的傳統，而且其中大部分從新近滅亡的北齊的實踐中沿襲下來），那是比較容易的。但對隋來說，真正的問題在于吸收新的精英，吸收充實各級官署、分擔隋王朝面臨的重大任務和與隋共命運的人。在吸收官員的過程中，新政體必須考慮各種各樣性質不同的因素。地方利益和地區對立在長期的分裂和戰亂之后異常牢固。有牢固地位的豪門往往代表它們自己的和本地區的利益。因此在文官政府和長期占支配地位的軍人兩者的利益之間必須搞某種平衡，漢族和其故土為草原的民族之間的裂痕在其他一切有沖突的利益集團之間普遍存在——它們之間的矛盾由于長期通婚和制度漢化而有所緩和，但潛伏的緊張狀態隨時都能爆發成對抗行動。最后，在有行政經驗的人中還存在忠誠的問題。有的人在北周勝利前曾在北齊任職，在589年以后，當委派某南方人任職時，政府必須考慮他的忠誠。“補缺者對隋的忠誠程度如何？”這個問題常使文帝縈繞于懷，而且在隋朝鞏固其政權前的幾年中特別重要。

幫助文帝奪權或在很早就擁護他的核心集團成員參與隋朝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并且是吸收廣大行政精英的積極代理人。這個集團包括上面討論過的四個心腹顧問。所有的成員都是三省的高級官員，都有資格參加廷議和商討重大國務的不那么正式的會議。除去暫時留任的北周遺老和在隋末動亂中短期任職的人外，這個集體還有18人，其中五人為皇親。簡略地考察這個集團的組成，也許對讀者有所幫助。

在隋以前的某個王朝任職的人中，有11人（如同文帝本人）為北周官員。其中14人之父曾在北魏或其繼承國之一效勞——在北周任職的比率很高；總的說父親的職位遠遠低于其子。只有一人是南方人，任命他是因為他是煬帝皇后的兄長。從籍貫上看，15人來自西起天水經京畿地區東迄洛陽這條東西向的較狹窄的地帶。其中五人的故土位于靠近這條地帶中心的文帝的出生地。18人中共有八人與統治皇室通婚或有血緣關系。[[47]](#_47_Shan_Qi_Hong____Sui_Zhao_Gua)

在文化方面，這些人中大部分與其主公一樣是中國人，但又是特殊的北方類型的中國人。總的來說，這一核心集團由精于騎射和重行動的強悍無情的人、有才能的將領和經驗豐富的行政官員組成。他們的儒家學識一般地說是粗淺的，對漢文化和哲學的知識也很差。只有一人——李德林——是完全夠格的文人，他來自東部平原，受過扎實的漢學和歷史的教育。草原人的長期統治反映在他們個人的文化方面，雖然來自“漢族”家族的人與來自非漢族家族的人之比為8∶1。這與可比的北周權力集團形成鮮明的對比，北周的比率為2∶1，非漢族家族占多數。[[48]](#_48_Shan_Qi_Hong____Sui_Zhao_Gua)

對于中央政府中的其他官員，隋又是如何選拔和任命的呢？從文帝執政開始，他就決心集權，這一政策在他設立的國家機器中得到反映。對五品以上官員的任命，大臣會議先選出候選人向隋帝推薦，如果隋帝批準，就下詔書任命。[[49]](#_49___Tang_Hui_Yao_____Guo_Xue_J)以這種方式選用的官員在整個政府的上層——三省、六部、御史臺和九寺等機構——任職，各部屬員可能由吏部選定。吏部為任命六品以下一般官員的主要機構，吏部的尚書和侍郎因此是政府中很有權勢之人。

如果討論一下六部的尚書，我們就會對中央政府運轉的情況有一較清楚的認識。在六部的46名尚書中，65.2%的人出身于漢族家庭，28.2%出身于非漢族家庭。他們之中的42人是北魏（13人）和北周（29人）官員的子孫。只有三人有北齊的經歷，他們都在民部，負責帝國的稅收和土地分配。工部的非漢人比率最高，占部的尚書人數的45.5%。這一情況可以用某些非漢族家庭中鮮明的建筑工藝的創新傳統來解釋。第二個高比率的部為兵部，非漢族民族的尚武傳統可以說明他們在部內的勢力。前面談過的六部中最為重要的吏部只有12.5%的非漢族尚書。尚書們的籍貫與政府最高級官員的籍貫相似：46人中的30人來自從天水至洛陽那條由西向東的狹長地帶；其次，來自山西的有七人，其余的人則分別來自華北平原。

隋朝政府在其最高兩級顯然不能代表北方的不同地區，更不能代表南方。雖然其漢族和非漢族的組成比率與北周的情況正好相反，但與兩帝的籍貫和階級相同的人和家族仍占很大優勢。雖然文帝和煬帝都不在官署中安插外戚，但一有可能，他們就傾向于起用皇親，華陰的楊氏家族高度集中在政府的上層機構；皇親還優先擔任地方的總管。既然中央政府上層機構存在嚴重的狹隘性，那么隋又采取什么措施來擴大統治階級的基礎呢？

首先，隋統治者取消州刺史和其他地方官員的任命權，而將這一權力交給吏部。然后，他們逐步采用其他措施以使集中的任命權有效地實施。措施之一為“回避法”，它規定州縣官員不得在其原籍任職。另外還以兩個法令加以補充：一為禁止下級官員在地方政府中再度擔任已經擔任過的職務；另一個則規定主要的地方政府官員任期為三年（后來為四年），屬員的任期為四年。在594年，被委任的地方官員不得帶父母或15歲以上的兒子赴任，以免在他行使職權時對他“施加”不正當的影響。此外，還需要對地方官員的政績進行年終考核，并根據評定的結果升降賞罰。為了維護新的官吏體制，隋帝又采用了幾種對策。一是皇帝親自巡視，文帝就花了很多時間考察地方官員的行政效率，一次他削去一縣官的官職，因為地方耆老語言失當。另一個對策是他指派巡視州縣政府的官員，使之充當隋帝“遠布之耳目”。[[50]](#_50___Sui_Shu____Juan_66_Di_1562)第三個對策是派專使調查某一特殊情況，然后上報。第四個當然是利用御史臺，它擁有大權，不但能查訪官員的公務，而且還了解他們的私生活，如有不良行為，即行彈劾。據說，隋朝的御史“察舉無所回避，彈奏無所屈撓”。[[51]](#_51___Bei_Tang_Shu_Chao_____1888)從幾個御史的列傳看，此說并非夸張之詞。

這一嶄新的體制帶有嚴厲的理性色彩，這反映在新體制以最大的決心去結束官員生涯中世襲特權的統治和推行考核官員表現的新標準。如果要成功地做到這一點，它意味著要設法起用新人，而不限于只任用長期壟斷官職的特權家族。隋文帝可能確實采用了西魏政治家蘇綽提倡的政策，它宣稱“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52]](#_52___Zhou_Shu____Juan_23_Di_386)正是采用了這一政策，隋朝才得以集中人才，這些人相對地說擺脫了陳舊的束縛，能夠適應新標準，能在新的集權專制政治中如魚得水。集中人才的需要形成了隋朝的科舉考試制度，它是實行到1905年的帝國選拔制度的先驅。可惜的是，關于隋制的詳細材料很少，但它的大致輪廓還是可以勾畫出來的。

582年初期，隋文帝命令“貞良有才望者”擔任官職。587年，他又命令各州每年選派三人進京等待任命（商人和工匠除外）。這意味著在589年征服南方后，全國每年有900個名額。人們注意到，隋與漢不同，前者為各州規定標準名額，而不考慮它們的大小和人口多少。587年，他又命五品以上的京官和州刺史考核候補者，并按品質才能把他們分成兩類。[[53]](#_53___Tong_Dian____Juan_13_Di_81)我認為，595年的一次考試最早提到了功名和筆試，當時，舉行的是秀才科考試。[[54]](#_54___Yu_Hai_____Hua_Wen_Ben__Ta)宮崎市定認為，這是地方每年舉行的考試和授給考生的功名的名稱。各種材料都未具體說明這次考試的進行方式和內容，但從一篇傳記，我們大致可以了解考試是如何進行的。杜正玄“舉秀才，尚書（可能是吏部尚書）試方略，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55]](#_55___Sui_Shu____Juan_76_Di_1747)

中央政府還為應試士子另開了明經和進士兩種考試。秀才考試顯然需要廣泛的一般學識，明經考試則測驗應試者掌握某一典籍的程度，而進士考試則主要考文才。宮崎認為，三種功名考試的等級以秀才為先，其次是明經，再次是進士。[[56]](#_56_Gong_Qi_Shi_Ding____Jiu_Pin)根據考試的成績，最初的任命的官品與唐代相同，很可能從八品到九品。吏部可能每隔三年定期在京師舉行考試。此外，還有奉欽命舉行的特別考試，中試者取得比秀才更有聲望的秀異功名。這種考試顯然不定期地在各州治舉行，例如589年、603年、609年和614年的幾次。

以上簡略地敘述了隋為確保新的人才充實政府而制定的復雜的制度。一切證據證明，文帝和煬帝都對考試的實行有強烈的興趣；兩個人都委派正直有才之士進吏部任職，并且在詔書中一再堅持應用政績標準來任命和提升官員。嚴密的行政、控制和告誡仍都繼續需要，因為不講人情的選拔制原則——雖然它始于漢制——與滲透在儒家倫理中的家族和個人聯系背道而馳。在隋代，選拔制的原則在實行時還必須對付根深蒂固的貴族特權的反抗。這將在下一節進一步探討。

### 地方政府的改革

當隋朝興起時，它繼承的地方行政制度是過時而無效率的，這是幾個世紀南方和北方層出不窮的弊病造成的結果。有的學者認為，產生的部分問題應追溯到公元前106年，當時西漢修改了從秦沿襲下來的高度集中的地方行政制。這個制度設郡和縣兩級地方政府，兩者都直接對京師負責。漢在它們之上加了刺史一級。每個刺史負責視察若干郡。如果東漢政府及其后的諸國能保持強大的中央權力，嚴重的困難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但中央的軟弱無能，再加上權力下移到地方這一流行的傾向，造成了州的設立使它成為京師和郡之間的正式行政建制。

大分裂的大部分時間戰亂不止，在這種情況下，刺史既負責文職，又掌握州的軍務。除了州外，又出現了精心設置的府。在隋初，一個最高等級（根據人口）的州的長官可以有文武官員323名。[[57]](#_57___Sui_Shu____Juan_28_Di_783Y)在文武僚屬雙軌制的發展過程中，文官的權力逐漸被軍人接管。主要原因是，在這一連年戰爭的時期，州官的主要責任是維持治安和率兵打仗；因此其軍人僚屬的地位就日趨重要。隨著軍職僚屬的權力日益擴大，他們接管了文官的大部分職能，文官的權力逐漸縮小。[[58]](#_58_Bin_Kou_Zhong_Guo____Lun_Suo)刺史實際上有任命他們的僚屬的大權。他們可以任命所轄郡縣的官員，而只是形式上請求朝廷的批準。他們的許多軍人僚屬還在州縣兼職，這些人中的大部分就是刺史的朋友、門客或親戚。因此，隋朝繼承的是一個花費巨大、冗員過多的地方政府體制，它長期地擴散文武大權，從而削弱了中央在地方的權力。

進一步的弊病又同時在北方和南方發展起來。這就是濫設地方機構而不顧地方是否需要，行政是否合理，機構內被任命的官員都能獲得官俸、土地、津貼和豁免權，這些待遇大部分都取自當地的百姓。556年，北齊的文宣帝一心想改革這一制度，他描述了地方機構設立過濫的情況。他注意到豪門大族濫用它們在中央政府的地位而設置州郡，而王公、宮女和宦官出于貪婪，則收受賄賂以促成其事。詔書說，結果百室之邑被宣布為州，三戶之民即可成為郡。[[59]](#_59___Bei_Qi_Shu____Juan_4_Di_62)

在南方，一系列不同事件產生了相似的弊病。自312年以來從華北平原逃往長江流域及以南的半殖民地區的漢人像所有的遷移者那樣，移植了許多故土的名稱。朔州即為一例，它轄有五個郡，但移設到南方后，占地不足800平方英里。[[60]](#_60___Shang_Shu_Gu_Wen_Shu_Zheng)曾經統計，南北兩地的州數從漢末到隋初增加到22倍，郡數增加到6倍半。[[61]](#_61_Yan_Geng_Wang____Zhong_Guo_D)很明顯，這些機構與其說是地方的行政單位，不如說是為日益增多的官員的利益而存在的大小獨立王國，這些官員出于私利或為其恩主的利益，所想的只是搜刮民脂民膏。

583年，楊尚希在其奏疏中，令人信服地分析了新登基的隋帝接管的行政亂攤子的狀況：地方行政單位成倍發展，官員激增，稅收少得可憐，農民受壓迫，等等。他指出任命的官員數與黎民之比，有如十羊九牧。[[62]](#_62___Sui_Shu____Juan_46_Di_1253)文帝在最早的改革詔書中，命令當時他控制的地區取消所有的郡——有500個以上。這樣，他又恢復了始于秦的地方兩級制。征服南方后他又進行同樣的改革。煬帝時期的郡（即原來的州）數減到190個，所轄的縣總共1255個，平均每個郡管轄6個以上的縣。每個郡和縣治理的平均地區大為擴大，結果是行政費用減少，稅收增加。

583年的最早的改革法令還對九級官品的官員擔任郡縣職務的任命做了規定。任命由京師的吏部作出。這些官員的政績每年要受到考核，刺史和縣令每3年（后來為4年）要調任，下級官員調任時期則為四年。郡縣按人口多少被定為九等，各按等級支俸糧，每年兩次，另外有權從官田取得收入以支付與官署有關的公私費用。地方單位所轄的人口數決定其官俸的等級。最后，第一個改革法令把地方政府上層長期各自為政的文職和軍職人員統一在郡的管轄之下；府的名稱被取消，它所有的官員（包括軍人）都被認為是郡的文職和行政人員的一部分。

595年的第二個改革措施是命令剩下的舊州官署一律撤銷，它們的職能早已被軍人接管。這一改革完成了北齊和北周過去采取的類似的措施（雖然沒有這次徹底）。隋及以后的各王朝繼續使用起源于大分裂時期軍事機構的官銜，許多地方政府其淵源可追溯到這一措施。雖然殘存的官銜是軍事性質的，但根據隋的規定，其職能純粹是文職的。[[63]](#_63___Sui_Shu____Juan_28_Di_792)這些就是隋朝為地方行政體制合理化、減少官員人數和使他們受中央政權控制而采取的步驟。但如果隋朝不把長期以來已分散在刺史手中的軍權集中起來，這項措施的大部分早就失敗了。這個問題將在論述軍事改革時予以討論。

地方行政改革的成功與否歸根結底取決于被任命的人，他們的質量又取決于任命官員的標準和方式。這方面隋朝又繼承了一項過時和腐朽的制度。地方和基層體制的中正制起源于漢末的混亂時期，當時教育制度和官員的選拔制都已崩潰。當時，這些中正通常還擔任其他職務，他們受權根據特定地區候選人在當地的聲望、家庭地位、才能、品德和與社會的一致程度分成等級，把他們選入帝國的官僚機器。有幾年，中正之職實際上被大貴族壟斷。薦舉的條件往往是首先考慮候選人的家世（以官方的譜牒為準）和權力關系，其次是中正個人的好惡。南方和北方都被這一制度所束縛；不過北方直到5世紀后期北魏采取漢化措施時才實行，又因北周改制而有所削弱。6世紀，北方兩名官員（羊烈和畢義云）為爭兗州大中正而互相攻訐。義云自我吹噓門閥說：“我累世本州刺史，卿世為我家故吏。”羊烈答：“卿自畢軌被誅以還（在3世紀），寂無人物。近日刺史，皆是疆場上彼此而得，何足為言。豈若我漢之河南尹，晉之太傅，名德學行，百代傳美。”[[64]](#_64___Bei_Qi_Shu____Juan_43_Di_5)這次交鋒說明了家世對部分地由中正制薦舉所產生的任命的巨大影響。

隋在583年取消中正制，撤銷了各級中正的職務（可能還有隨著此制的發展而配備的職務），而以中央吏部的任命來代替這一制度，同時如上所述，還以吏部專司每年的考核（或者皇帝在高興時親自考核）來確保新措施的實行。《通典》以法家的語氣總結了這一變化：“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65]](#_65___Tong_Dian____Juan_14_Di_81)我們看到的史料通常都是把頒布法令的行動當做措施的實現，很少涉及貫徹的詳細情況。在改革法令頒布6年以后，李德林堅決反對另設一級官員的建議，他爭辯說：“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于六七百萬戶內，詮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其才，乃欲以一鄉之內選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難得。”[[66]](#_66___Sui_Shu____Juan_42_Di_1200)這使我們大致看到任用人才的種種困難，而這些困難可能要花10年或更長的時間才能克服。

隋中央政府還必須處理另一個問題：在有關政策事務和行政表現方面，它如何與派往各地方政府任職三年的官員保持密切的聯系。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隋建立了朝集使制。各州派代表出席御前的專門集會。在京師時，他們住在城東南的專區。集會在每年陰歷二月、七月和十月的十五日舉行。我們對唐代朝集使制的情況了解得比較詳細，唐每年有這種集會。唐代的朝集使一般是刺史和其他高級官員，他們除了帶貢品以外，還應帶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來到京師。每個地方單位的官員的表現要經過考察，然后被召見。隋代的儀式可能比較簡略，至少在隋初是如此。一次，隋帝對集會的地方代表講話，并向他們推舉某縣令為模范，因為他的施政被評為京師附近地區的佼佼者。他的講話依然是儒家的老生常談，其內容如下：“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朕若置之不賞，上天宗廟必當責我。卿等宜師范之。”[[67]](#_6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據記載，隋帝于是提升他為州刺史。承認和獎勵模范行為的結果，據說能使地方官員稱職，百姓日益繁衍富庶。除了儒家的說教外，這些一年三次的集會顯然對地方行政和官員的表現提供有效考核的機會，就地方官員的職責對他們進行一次再教育，并公開進行獎懲以使教育的內容能深入這些人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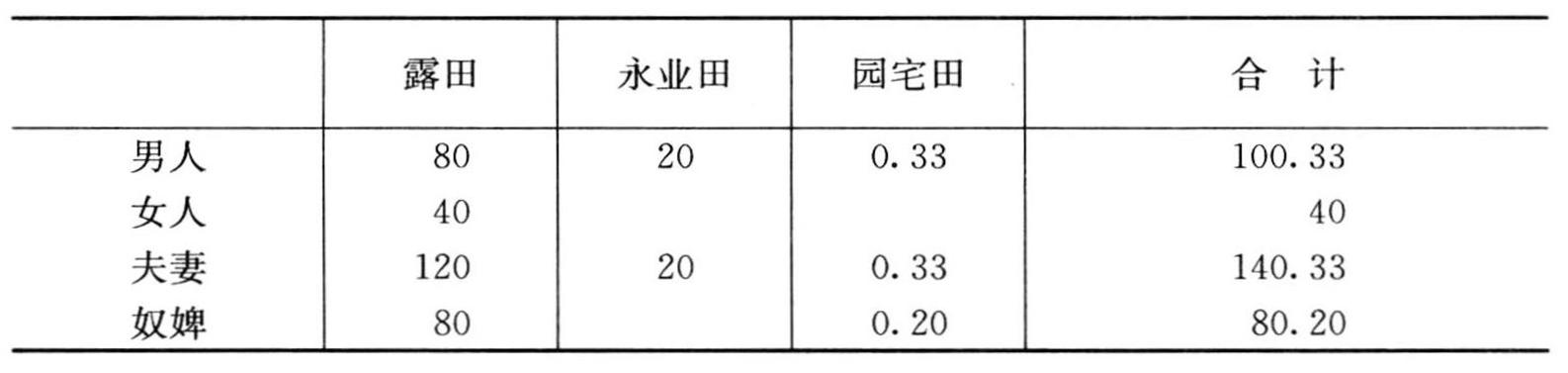
對隋改革意義的評價各不相同，但在許多方面，史料的記述是明確的。第一，地方官改由吏部任命——這一措施北齊已經部分地實行——的改革，結束了若干世紀以來任命權分散在州府地方政府手中的狀態，從此開始了集權的新時代。第二，恢復了兩級地方政府制以代替三級制，并規定標準以使中央政府能決定地方行政單位的規模和性質，及時結束大分裂時期的混亂和弊病。第三，中央政府任命官員，這對有牢固勢力的貴族門閥的利益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因為它們習慣于控制自己地盤內的官員；中正制的取消和選用官員時家族世系標準的失效進一步加強了中央政府的權力。宮崎市定認為這些改革是“革命性”的，結果從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團中引起了導致王朝垮臺的對抗。[[68]](#_68_Gong_Qi_Shi_Ding____Jiu_Pin)不管人們是否同意這一論點，這些改革對中華帝國以后的歷史產生了持久的影響。第四，科舉考試制的采用（雖然它還屬于初級形式）開始了一種任人唯賢的制度，這對中華帝國以后的發展也有深遠的影響。第五，科舉制被用來抵消隋中央政府的“圈內集團”性質，開始在這一巨大帝國的各地任用精英人物。第六，州刺史文武職能的分離在煬帝時期完成，這項改革標志著政府職能合理化和鞏固中央政府手中權力的最后步驟。

### 土地分配和田賦

如果不能適當地為分配田地和征收以農產品為基礎的賦稅作出安排，中華帝國的歷代王朝都不能繁榮興旺。隋朝也不能例外。早在582年，當北方還遠沒有鞏固，文帝就頒布了一套新法令。據說它們大部分以北齊的條例為基礎，而這些條例又是根據486年北魏孝文帝采用的均田制。隋規定定期把土地分配給平民。土地分成以下幾類：（1）露田，由將成年和成年（隋規定的范圍是從17—59歲）的受田人持有和耕種，以后要退還當局再作分配；（2）可以繼承的永業田，它通常種植桑麻；（3）園宅田，它也可繼承。這些法令規定的基本分配情況見表如下：[[69]](#_69_Bai_Le_Ri_____Sui_Shu___Zhon)

另外一部分土地則分配給有爵位和（或）有官職的人，這種地又分成兩類：（1）可繼承之地，其面積最高達1萬畝，最低為40畝。這不是實際賜數，而是個人被準許擁有的限額；（2）屬于某個官署的官田，其收入用于在職人員部分俸祿和用于公共行政及建筑等。這一固定而十分嚴格的制度實際上是怎樣實行的？現在人們對唐代均田制的情況有所了解，但對隋代的情況知道得很少。似乎可以合理地假設，這一制度的實行遠不如法令的條款令人想像的那樣公平。有材料證明，在人口稠密的地區，分配給每人生前耕種的地往往不足法令的規定數，我們也沒有證據能說明在南方并入帝國后那里也實行了分地于民的制度。此外，負責均田制和負責為該制度的實施提供統計基數的土地和戶籍登記冊的官員本人也渴望擁有土地，并且貪婪成性。其中的大部分人更可能破壞而不是維護這一制度。

表6 隋代土地分配情況表（單位：畝）



（1畝＝0.14英畝；據統計，1932年中國每家平均有地21畝。）

這類制度在任何政體開始時都能最順利地得到實施，因為當時從過去敵對的爭奪皇位的人和沒落的社會精英那里沒收的土地使皇帝能得到大量的來源以供分配。隋朝也不例外。但早在592年，在人口較多的地區保持原先慷慨的分配數量（原先旨在使空地得到耕種）的困難出現了。文帝在這一年已注意到中央各地人口過多和糧帛缺乏，并且批駁了大規模移民的建議，于是派官員去平衡擁有土地的數量。在人口較多的農村，男丁只能得20畝。而不是582年法令規定的80畝。我們可以猜想，豪門和佛寺除積累的土地以外已經開始兼并可供長期分配的剩余土地。這是唐帝國面臨的重大經濟問題之一，它最后促成了均田制的廢棄。

但是隋制的實施可能很細，582年的法令明確規定平民繳稅和服勞役應根據他們擁有或占用的土地。當時隋朝的標準稅率分為三種：（1）田賦每年每戶納糧3石；（2）繳納規定寬度的絲帛或麻布20尺（以前為40尺），外加絲絮3兩或麻線3斤；（3）男丁一律每年服勞役20天。第一、二兩種稅分別向男丁耕作的露田和向勞動婦女開征。第三種的對象為男勞動力。17歲以下或59歲以上的男人、有官階和爵銜之人和堪作儒家品德表率的人都免除這些義務。[[70]](#_70_Zhe_Xie_Huo_Mian_Zai_Tang_Da)

稅制的大部分漏洞與記錄的弄虛作假有關，例如，男丁假報為“嬰兒”或“老人”；假造戶籍，虛報其大部分成員為“奴仆”，以逃避納稅和徭役。585年，文帝命地方官員調查戶口登記。如果所報不實，地方里黨之長將受發配遠地的懲處。這些措施還規定在戶主名下逃避納稅和服勞役的戶主的遠親應另行登記而為戶主。通過這些措施，稅冊增加了164.1萬個納稅人。[[71]](#_71___Sui_Shu____Juan_24_Di_681Y)

大約就在此時，高颎向文帝提出糾正地方里正、黨長弄虛作假的措施，這一建議被文帝批準；高颎堅持，由于這些人的上下其手，官府不可能取得納稅臣民的正確名單。他建議擬定一種標準的表格以記錄稅收，而視察的官員每年正月初五去地方，組成以三或五個黨（每黨125戶）為單位的團，并根據標準的表格把諸戶及其納稅義務加以分類。[[72]](#_72___Sui_Shi____Juan_24_Di_681Y)

隋的財政政策以向農民征收糧和織物的實物稅為基礎，國家根據均田制，爭取確定土地的可行的產量。通過地方行政的改革，隋爭取實行有效率和比較節約的管理，直至縣的一級。但整個制度的運轉取決于能否對農村人口保持某種控制，而農村人口，舉例來說，也自然而然地一有可能就設法逃避稅收和勞役，隱瞞非法獲得的土地，囤積和隱藏余糧。582年頒布的新法令采用經過長期考驗的方針來處理這一問題，辦法是設立地方組織，每個組織各設一負責人，最小的單位為保（5戶），最大的為黨（125戶）。更大的地方單位為鄉（500戶），于589年出現，以取代許多被撤銷的小縣。設立這些組織的目的在于在集體受制裁的威脅下進行互相監督，以防止違法行為，特別是逃避稅收和徭役的行為。隋一度授權鄉長裁決他們所轄的戶之間的訴訟。這一措施在590年被取消，因為事實表明，當時它引起了徇私和受賄的弊病。我們沒有掌握這一互相監督的制度準確實行的材料，但我們應注意到，上述的地方上各種稅收登記和稅額分配的責任名副其實地落到了由戶組成的各級地方單位的負責人身上，而且法令規定瀆職者要受罰。也許不妨采取這樣的看法，這個制度證明是有效的——當然要付出許多人命代價；它還有助于增強隋文帝的財政實力。

除了這一精心制定的制度外，隋朝還在585年和596年命令建立義倉網絡，規定農戶平均每年向義倉繳糧0.7石。關于這一地方單位（社，漢代為25戶）的規模、社司的性質和職能以及這一制度實行的有效范圍，我們都不清楚。但我們知道建立義倉的目的是在歉收之年為地方提供救濟糧，而且后來它們確用于這一目的。總的是，它們提供了一個糧食儲備的主要網絡，以補充政府用來儲藏以后使用的稅糧的五大糧倉之不足；在隋朝鼎盛期，義倉藏糧在1000萬石與“數”百萬石之間。杜佑在評論藏糧、繳稅的布帛和其他商品時指出，“豐厚亦魏晉以降之未有”。[[73]](#_73___Tong_Dian____Juan_7_Di_42Y)

### 繼承的兵制及其改革

與其他事物一樣，隋的兵制大部分繼承以前的北朝。我們應該記得，北魏（386—534年）在一次大動亂后被推翻，結果在北方出現了兩個不同的政體：東魏和西魏。它們的后身分別是北齊和北周，兩者為爭奪北方的霸權而成了勢不兩立的敵人，直到577年北周戰勝其東面的敵人時為止；這就強行重新統一了北方，并使篡奪周的權力和創建隋政權的人在四年以后繼承了統一的局面和一個組織完善的軍事機器。隋朝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使用武力在589年打垮了虛弱的陳朝，以后隨著全國的平定，它又進行了逐步使政府非軍事化和減少現有軍隊的改革。到了隋末，由于遠征高麗的需要，這一趨勢完全逆轉；遠征招致了隋的滅亡。

6、7世紀最有爭議的制度之一為府兵制。我們討論的這一時期的府兵并非民勇，而是一種很特殊的“地方管轄的部隊”。我們必須先回頭簡略地敘述一下北魏和北周的歷史，以便了解這一制度的發展情況。在北魏的最初幾十年，它已在北部邊境一帶部署了部隊，以確保魏帝國的防務和不致受游牧部落敵人的侵襲。根據北魏的軍事傳統，沿邊境的各部隊都從有聲望的部落抽調，其將領往往是鮮卑貴族。這些由世襲軍人組成的精銳程度不一的部隊常常通過部落或準部落的紐帶而與其將領發生關系。北魏的漢化在這些部隊中引起的反應是不難想像的。一些一度趾高氣揚的部隊仿效漢人，成了罪犯的淵藪、貪官污吏的溫床和既無地位又有叛逆心理的社會階級。這些邊境人民對在洛陽的北魏新都（從494年起）受恩寵的同族弟兄的叛亂究其本源是一次社會叛亂，歷史學家稱之為“六鎮之亂”。叛亂始于524年，它蹂躪了華北平原，瓦解了北魏的社會結構，結果產生了兩個敵對國家。其中之一的西魏534年建于古關中平原（陜西省南部），那里是征服中國的傳統跳板。

西魏王朝的創建人宇文泰（505—556年）有意識地把關中用于這一目的，并且很快采取步驟去組織其軍隊。從一開始，他就仿效北魏的軍事模式。他的軍隊規模不詳但可能主要是鮮卑軍人的近衛軍駐在京師（長安），是歸魏主直接指揮的中央軍。這些軍隊西魏打算用作打擊力量。但事實很快證明他們不能勝任這一任務，特別是王朝在543年慘敗于東魏之手后更是如此，當時估計折將400，損兵6萬。這次慘敗迫使西魏求助于漢族的人力資源；同年，它開始主要從陜西和甘肅征募漢族的鄉兵，以補充自己缺額的軍隊。這些兵不單純是應征的農民，而且還是當地漢族豪腴已經組成的地方部隊的士兵，雖然他們的職責完全是地方性的。經過新的征募，他們成了西魏兵制的組成部分，而歸96個儀同府管轄；這些儀同府又組成48團和24軍，各有相應的分等級的指揮結構。[[74]](#_74_Ju_Chi_Ying_Fu_____Bei_Zhao)早在唐代，學者們已認為這種組織是府兵制的開始。[[75]](#_75_Li_Fan__Si_Yu_827Nian_____Ye)這一論斷有一定的道理，因為儀同府的軍隊確為地方控制，雖然它最初是中央指揮結構的組成部分。但以后我們將談到，府兵制的性質變化得很快，所以有關它的性質的任何概括必須慎重對待。

西魏繼續征募漢族地方軍，主要的兩次是在546年和550年。漢族士兵在西魏軍隊中占了壓倒優勢，以致未漢化的鮮卑領袖不得不采取有力的措施以協助鮮卑族將領保持其地位。549年，在5世紀末大力漢化時期已經采用漢姓的邊境非漢族精英，奉命恢復原來的部落姓氏。554年王朝命令，凡其家族在北魏漢化時期被授予漢姓的軍官恢復鮮卑姓，甚至漢族將領也要采用鮮卑姓。此外，某個將領麾下的士兵也都應以該將領之姓為姓。[[76]](#_76_Jian_Gu_Ji_Guang___Fu_Bing_Z)這一旨在恢復傳統鮮卑族部落關系的企圖表現了異族王朝對喪失自力更生以后被迫依靠漢人資源這種內在危險的關心。[[77]](#_77_Bin_Kou_Zhong_Guo____Xi_Wei)這當然是任何征服王朝必須設法擺脫的困境。

556年，宇文泰死后一年，西魏被北周接替，如上所述，后者恢復了中國形式的政府。恢復部落方式的進程告終，軍隊甚至更牢固地被中央控制。軍隊主要通過設立許多儀同府而擴大了。此外，京師在周圍構筑了一個防御要塞體系。這一強大軍事體制的控制權并沒有掌握在武帝宇文邕手中，他只控制一支小近衛軍。軍隊的真正的統帥是武帝的堂兄弟宇文護，他作為丞相，還控制了文官政府。作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他決定王朝的一切軍務。他甚至從近衛軍中抽調大批士兵駐守自己的宅第。573年，武帝下令暗殺宇文護，終于重新控制了政府。兩年后，為了準備對北齊進行迫在眉睫的征戰，他命令軍隊來一次大動員。漢族士兵又被就地征募。但這一次王朝不是從建成的漢族部隊吸收，而是在普通農民中征集。[[78]](#_78_Ju_Chi_Ying_Fu____Fu_Bing_Zh)武帝又命令在文官當局的名冊中勾銷新入伍士兵的姓名；同時，為了加強他個人對軍隊的控制，他又下令從此稱所有的士兵為侍官。這些士兵免除一切規定的稅賦和徭役，并且先于唐代制度，必須定期在京師服役。征募工作是成功的，正如史籍所述（當然有些夸張），“是后夏人半為兵矣”。[[79]](#_79___Sui_Shu____Juan_24_Di_680Y)這樣征募的地方軍充實了二十四軍，并在北周于577年武力重新統一北方時起了一定作用。我的“起了一定作用”的提法是經過考慮的，因為這二十四軍的士兵——即府兵——只是20萬名重新統一全國的大軍的一部分，雖然他們可能是最精銳、最有紀律的一部分。軍隊的其余部分則是多種多樣的，其中包括新近投靠北周的草原民族部隊，以及從陜西、甘肅和四川征調的部隊。勝利的成果之一是強迫東部平原的4萬戶世襲的軍人家庭在關中定居。

勝利后四年，隋朝建國者接收了北周政權及其兵制。但在他執政的早期，他就下令對皇帝親自指揮的軍隊進行一次大改組。當575年宇文邕命二十四軍的全部士兵都稱侍官并歸皇帝親自指揮時，他們的人數當然已經激增。但他并不打算把這些部隊并入其正規的近衛軍中。楊堅把它們全部改組成4個衛和8個府，從而改進了這一笨拙的雙重制。[[80]](#_80_Ju_Chi_Ying_Fu____Fu_Bing_Zh)除了中央指揮機構外，他還在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地區設立總管府，它們各自全面管理一個區（有的包括幾個州，有的超過10個州）。這些地區由中央任命的高級將領負責；有時被任命的將領兼任他們所轄區的文職行政長官。

與以前的王朝一樣，隋朝京師的12個衛和府由鮮卑族上層和軍事化的漢族家族的將領指揮。山崎宏對隋朝軍事精英的組成作了分析，現將其結果略述如下。他只考察了12個衛的60名其官品相當于六部尚書的大將軍，發現在整個隋代，漢族（可能其家庭受鮮卑族軍事傳統的強烈影響）占53.3%，非漢族占40%，其余人的情況不詳。在這60名大將軍中，曾為北周效勞的不少于52人，他們之中的46人的祖或父都曾為北魏（7人）或北周（39人）效勞。這些數字證實，北周軍事精英對隋朝的兵制具有很大的影響。當我們考察這些將領的籍貫時，發現他們的分布比高級文官更廣。26人來自陜甘區，24人來自東北，5人來自南方，其余的人不詳。南方的將領在王朝后期出現；他們不是出身于南方的軍人門第，而是靠功績取得了這樣高的地位。在王朝最后幾年，他們奉命指揮煬帝為遠征高麗而召集的南方部隊。值得注意的是，關中和華東之間籍貫的分布比較均勻，這可能反映所需的將領要“了解”來自駐守各地的部隊中的士兵。[[81]](#_81_Shan_Qi_Hong____Sui_Zhao_Gua)這又促使我們去注意人力資源的問題。

隋朝中央軍事機器征募的府兵兵員最初的來源有二：（1）世代當兵的軍戶，同于北周府兵制中的軍戶；（2）被選出專門供應兵員而無徭役義務的普通戶。對征集的不同兵種的服役期長短和次數不完全清楚，但當正常動員或臨時緊急動員時，京師的軍隊顯然要從地方統轄的軍隊中抽調兵員，而不使用未經訓練的服勞役的人。這一早期的隋制因它利用世襲的軍戶和地方的軍事組織而與早期的府兵制有淵源關系，但由于590年的法令，它與過去的關系被沖淡了。所以這一法令標志著隋代軍事史的分水嶺。

專家們對此法令中的某些內容有很多爭論，但其重要的部分似乎是明確的。文帝在談及近期內戰的災難時，哀嘆任意動員兵力的弊病及被征入伍的人及其家庭因此所受的苦難和生命的不安全。他于是說：“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賬，一與民同。”[[82]](#_82___Sui_Shu____Juan_2_Di_34__3)這一法令（頒發幾個月后帝國就重新統一）體現了文帝的幾個目的。總的目的是使全國非軍事化和加強文官的社會控制力量。詔令中明確指出的第二個目的是使整個華北平原——那里一直可能是反當局的中心——非軍事化，同時繼續保持關中和河東的軍事指揮機構。第三個目的顯然是要消除前幾十年混亂的軍事態勢造成的動蕩局面。第四個目的則更微妙，我們必須從隋的其他措施來推斷，這就是要在軍人中消除世襲特權，如同他試圖在官場中消除世襲特權那樣。最后，最初的府兵制原來只適用于異族王朝統治的北方這一特定環境，因此對一個一心想恢復漢朝光輝業績的王朝來說，它并不合適。在這一詔令以后，12個衛和府從那些由地方挑選、訓練和管轄的人中征集士兵，他們在整個成年時期服役。這是唐代府兵制的原型。

除了使華北平原非軍事化外，王朝還想出其他平定全國的辦法。595年，文帝下令沒收帝國的全部武器，并以法令規定私造武器者將被懲辦；但隋的策動一切軍事行動的地區關中又不受此限。為了防止水上叛亂，文帝在598年下令沒收南方所有長30尺以上的船只。

軍事制度第二個大改革是煬帝在605年下令進行的。這一改革旨在把兵力進一步集中，歸中央指揮機構控制。命令的主要特征是，總管府統率的所有部隊從此直接歸京師12個衛和府控制。平定南方后，總管府的數字已經減少，但在604年仍有36個，其中兵將最多的府集中部署在北部和西北邊境。除了把這些部隊納入中央軍事機構外，煬帝又下令把儀同府的名稱規范化。從此，地方軍事單位都稱鷹揚府。[[83]](#_83_Ju_Chi_Ying_Fu____Fu_Bing_Zh)

在第二次軍事制度改革后，隋已牢牢地控制了國內的部隊。王朝在軍事上面臨的一個大問題依然是來自北方的外患。在王朝最初幾年，北方邊境遭到突厥和吐谷渾的嚴重襲擾，所以那里需要大批軍隊。為了緩和供應問題，文帝下令在長城外設屯田以供應軍糧。他命令一個以嚴酷聞名的高級將領負責此事，據說屯田進行得很成功。在利用沿西北邊境的要塞化的村落來對付邊境游牧民入侵的努力方面，文帝則沒有那樣幸運。他只能采用另一種由來已久的邊境政策：疏散草原的游牧民和保持軍事前哨網絡。對付游牧民族威脅華夏的傳統防線當然是長城。在前人做了大量事情之后，隋的統治者繼續大力對它進行整修和延伸，并派人駐守。這項工程在文帝登位時就開始，當時本地的“夷狄”被動員每年需在城上服20天徭役。同年，文帝命一名心腹大臣動員3萬名勞工建造（或重建）一段長城。但這只是開始，因為在586年，被動員的勞工達11萬人；在587年，達10萬人；在607年，有100多萬人建造鄂爾多斯和今陜西省之間的一段由北向南的新長城；在608年，被動員的勞工超過20萬人。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勞動者只進行每年必須的20天強迫勞動。大部分長城都是在以前殘留的基礎上重新修建的。建筑材料是傳統的夯實的土和曬干的土磚。

隋朝的軍事建制是令人矚目的。它能輕而易舉地應付小規模的入侵和驛亂，又能部署精兵進行大戰役。612年集合兵力并供應100多萬大軍遠征高麗的能力證實了這一制度的效率，雖然這次遠征的結果是災難性的。產生這種效率的關鍵在于集文武大權于京師和隋帝本人手中。隋的兩代皇帝深知以前分裂時期的幾個世紀的歷史教訓，這最明顯地反映在他們的軍事政策方面。

### 隋朝的律令

凡是具有想在中國永葆基業這一雄心的王朝，都必須采取步驟重定法規。從很早時期起儒家人物就爭辯說，如果統治者及其代理人確具美德，法律就成為多余。但他們發現這類情況甚少，于是也像持其他主張的人那樣認為，為了有條不紊地行使權力，當局必須編制法律。當隋朝掌握政權時，它就采取長期以來理想和現實之間的這種妥協辦法。隋朝制定的法典對以后的幾個世紀仍產生影響。

在開皇元年，隋帝就下令負責法律和禮儀的朝廷大臣修改原來的法規，并制定新法典。他們的報告上呈隋帝，隨即在同年陰歷十月，共有1735條條款的新律被及時頒布。新律減免了舊律中許多最苛殘之法，如梟首、車裂和鞭刑。詔令在最后以威嚴和充滿希望的語氣寫道：“雜格嚴科，并宜除削。先施法令，欲人無犯之心，國有常刑，誅而不怒之義。措而不用，庶或非遠，萬方百辟，知吾此懷。”[[84]](#_84___Sui_Shu____Juan_25_Di_711)

兩年后，隋帝又命令盡量簡化新律，于是原來負責的官員將條款減到500條，這就是開皇律。在負責這一工作的官員中，要算裴政學識最廣，影響最大；他原在南朝的梁從事司法工作，江陵失守他被俘后又在北周掌司法之職。白樂日認為，在把南朝和北朝的法律傳統綜合成可行的開皇律時，他的淵博學識和經驗起了主要的作用：開皇律的基本結構采用北齊律，內容則從魏、晉、南朝的齊，特別是從梁的法律中吸收。[[85]](#_85_Bai_Le_Ri_____Sui_Shu___Zhon)因此，從它的新穎和簡化的形式及其內容的歷史淵源來看，它作為重新統一的中國的法律是很合適的。

開皇律保持四種刑罰：（1）死刑；（2）流刑，通常有強制勞動期（有時到邊境服兵役）；（3）就地強制勞動；（4）杖刑。對于一切官員，隋律準許依次以銅的斤數作為罰款折罪。官員可以官俸抵作罰款或以降職折罪。對官員最嚴厲的懲處是削職為民，以后他們就須按規定納稅和服徭役。因此開皇律保持了古法中官民有別的做法，其源至少可追溯到《周禮》（漢代加以系統化的典籍）。

按照文帝的性格，他不滿足于只頒布新律。在586年，他召集地方命官至京，以考核他們是否懂得新律的條款。因為地方長官在其轄區有司法權和行政權，日常的審理和懲處是他們正常職責的一部分。但這種自主權不包括新律規定的幾種嚴重罪行。它們歸御史臺審理，御史大夫不但負責調查和起訴，而且還全面監督帝國的全部官員。[[86]](#_86_Bai_Le_Ri_____Sui_Shu___Zhon)由高級官員和法律專家組成的大理寺則審議嚴重罪行的書面證詞，決定罪行性質，提出最后判決，由隋帝宣判。大理寺可能主要是上訴或受理疑案的法庭，而尚書省的刑部則判決法律有明文規定的案件。

盡管迅速制定了法典并教導官員們如何應用法律，官僚們仍留戀陳舊的、往往是腐敗的方式。文帝試用了許多緊急辦法。他一次因有人瀆職而大怒，竟廢除了地方和京師一切法律專業人員的職務。他一再試圖告誡和規定法律程序，對京師的搶劫還試行他自己的那種懲罰性判決：凡搶劫值一個銅錢以上的物品的人，應被公開處決。他殺了有小過失的、拒不揭發罪行的和接受小額禮物的官員。以下行動十分符合他的性格：他每季復查所有囚犯的情況，在秋分（處決犯人之時）復查各地上報的懸而未決的刑事案件。開皇律雖比以前的法律簡單和寬大，但仍不能迫使官員們自覺遵守，更不能遏制大貴族的任性行為。確實，在整個實行過程中，法律經常被濫用。《隋書》在提到大理寺兩名喜阿諛奉承的官員時寫道：“候帝所不快，則案以重抵。”他們又深知如何取悅隋廷的心腹謀士楊素，其中一人每次在街上遇見楊素時，“而以囚名白之，皆隨素所為輕重。其臨終赴市者，莫不途中呼枉，仰天而哭”。[[87]](#_87___Sui_Shu____Juan_76_Di_716Y)

開皇律現在只存殘卷，但人們充分了解，其內容出色地綜合了大分裂時期的法律傳統。唐律直接以它為樣板，并且通過唐律，它又是中華帝國以后法令的模式。王夫之在17世紀對隋律令作了不尋常的評論，他寫道：“今之律其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也，政之澤遠矣。千余年間，非無暴君酷吏，而不能逞其淫虐，法定故也。”[[88]](#_88_Wang_Fu_Zhi____Du_Tong_Jian)

對治理國土具有同樣重要意義的文獻是可能在582年陰歷七月頒布的法典化的隋令。它包括與官場、官僚機構辦事程序、土地和稅收規定及日常行政章程有關的條款。雖然開皇令已不復存在，但在其他著作中仍可找到大量引文。它涉及的范圍、篇幅和分類似乎又是624年頒布的第一套唐令的前身。開皇令像其他律令匯編那樣，遵照詔令補充和修訂。在討論關于均田制、稅制和軍事體制的管理時，我們已經提到了具體的規定。

雖然煬帝下命匯編他執政時期的律令（在607年頒布），但它們似乎亦步亦趨地遵循開皇律令的模式，而且主要的編纂者的確也是編纂以前律令的著名人物。煬帝的功績在于他把隋律500條全面減為200條。但據說由于王朝要應付征伐高麗失利而帶來的危機，刑罰的寬大就轉為嚴酷。[[89]](#_89___Sui_Shu____Juan_25_Di_717Y)

### 邊防和領土擴張

一位8世紀的年代史編者列出了隋朝武力克敵制勝的幾個戰場：在南方征服了陳朝；在北方成功地打擊了突厥；在西方征服了吐谷渾；在邊遠南方占領了占婆；在東方征服了流求。[[90]](#_90_Li_Fan____Ye_Hou_Jia_Chuan)他應該補充殘酷地鎮壓南方和西南土著及最后極力想迫使高麗投降的記錄，但后一個軍事行動結果災難性地失敗了。在中國本土樹立華夏權力的唯一的軍事行動是對陳朝的征戰，關于此戰役將另行敘述。隋朝部署重兵的另外幾個主要場所針對的是這樣一些地方和民族：早期的中國決策人認為中國對這些地方和民族的控制對帝國的安全非常重要，而且它們在中國的王朝強盛時期處于它的統治之下。地理決定了對上述的許多地區的行動，但歷史也是有強烈影響的因素。如同采取的其他許多政策那樣，隋試圖重現久已消失的漢代的武功，重新樹立中國在東亞的中心地位和至高無上的權威。隋在按照漢朝模式重振地區性權威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它在許多戰線上取得了赫赫戰功，恢復和發展了納貢制，這種制度應被視作中國處理與不同鄰邦的關系的一整套靈活的政策和策略。以下是隋朝如何對付中國周邊幾個較重要的地區和民族的情況。

當未來的文帝仍為北周的官員時，突厥已作為一個嚴重的威脅出現于北方。他們在眼花繚亂的草原部落戰爭中引人注目，到了6世紀50年代他們已實現了對從滿洲的遼河直至波斯邊境一塊遼闊地區的松散但令人生畏的控制。他們通過對農耕民族的成功的掠奪和對中國通往西方的絲綢之路的控制而日益富強。他們在政治上分成東西兩個汗國，西汗國臣服于東汗國。東汗國之中心在今外蒙古（原文如此。——譯者）的鄂爾渾區，西汗國于夏冬之季扎營于西突厥斯坦氣候宜人的地方。

西汗國在涉及挹怛、拜占庭和薩珊王朝波斯的一系列復雜的遷移過程中日益富強，而東汗國則蔑視分裂的中國北方，并為自己的利益而對它進行操縱。北周帝卑躬屈膝地請求娶東汗王之女，他在565年攀得這門親事；每年北周要送給突厥人10萬段絲緞。長安的突厥居民受到盛情款待和周到的眷顧。東面的北齊則緊張地傾府庫之財討好突厥人，因為他們擔心突厥人會站在敵國北周一邊。突厥的統治者從鄂爾渾的大帳，洋洋得意地打著中國天下的主意。據說他幾次對他的隨從說：“我在南兩兒（指北周和北齊兩帝）常孝順，何患貧也！”[[91]](#_91___Sui_Shu____Juan_84_Di_1865)582年，在突厥大規模地侵襲今陜西和甘肅的部分地區后，文帝像往常那樣明確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往者魏道衰敝，禍難相尋，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逐安危。”[[92]](#_92_Tong_Shang_Shu__Di_1866Ye)

如果這一大突厥帝國的勢力繼續統治北方的邊境和整個中亞，那么隋就不能在這些地區重振華夏的聲威，而且很可能被迫采取防守的姿態，就像以后面對契丹的宋朝那樣。但命運之神偏袒隋朝。西突厥汗國落到達頭之手，此人易沖動而且好斗，在582—584年期間先發制人地取得原應歸東突厥統治者擁有的可汗稱號。此后，兩個突厥帝國不再聯合，雙方經常交戰。而且由于582年新可汗經過爭奪后即位，東帝國提供了中國政治家們長期以來習慣利用的機會。他們時而又支持某一可汗，時而又支持反這個可汗的一方，因此東突厥人的政治統一被破壞無遺。同時他們又設法不使東帝國瓦解而使達頭有可能以武力統一兩個帝國。當達頭于601年威脅隋都和在602年進攻鄂爾多斯區的一個中國的傀儡可汗時，他企圖做到這一點。但當他遠離其根據地時，西帝國因一次叛亂而分裂，叛亂者為其主要的部落鐵勒。我們可以認為，中國的代理人做了出色的工作；達頭在603年銷聲匿跡。他的孫子只能在其帝國的極西部樹立政權。在隋朝的其余時間里，中國人主要對付東突厥的可汗。格羅塞在總結隋的成就時說：“在蒙古，如同在西突厥斯坦，隋朝未采用大軍事行動而只用傳統的計謀，就粉碎了突厥人的力量，它消滅了桀驁不馴的可汗，而只把那些被冊封的可汗扶上臺。”[[93]](#_93_Le_Nei__Ge_Luo_Sai____Cao_Yu)

盡管隋在早期獲得一些成功，但在北部和西北邊境突厥依然是主要的強大游牧力量。在本章的后面的部分，我們將討論煬帝處理這一問題的情況。

#### 越南

在漢代，交州（今河內—海防地區）是一個繁忙的港口和中國文化在邊遠南方的前哨。但在6世紀時，以建康為都的幾個虛弱王朝再也不能控制這一地區，于是一個有安南和中國混合血統的地方長官就自己建立了王朝。文帝派強悍和久經沙場的將軍劉方收復交州，當地王朝的最后一個統治者在602年投降。占婆（林邑）國在近代安南的沿海一帶，其國都在今之峴港以南。它也已中斷了與建康的虛弱的陳朝的朝貢關系，但在595年，其王梵志謹慎地遣使獻方物。但對他來說不幸的是，在5世紀中國人的一次成功的掠奪中產生了一種傳說，即占婆多奇寶，取之不盡。以貪婪聞名的文帝一反慣常的謹慎，命劉方率有作戰經驗的將領及水陸之師進攻占婆。梵志部署巨象作戰。但隋軍攻破其都，設法拿走了王室列祖列宗的金牌位，歸國時，入侵軍隊受到一次瘟疫的打擊，包括劉方在內的大批官兵喪生。隋企圖直接治理占婆的若干地區的努力是短命的，梵志不久重新執政，即“遣使謝罪”，此后據說“朝貢不絕”。[[94]](#_94___Sui_Shu____Juan_82_Di_1833)但對交州以南的整個行動是一次代價高昂的失敗，隋的殘師所能炫耀的只是盜取的祖宗牌位、幾箱佛經和一批被俘的樂師。[[95]](#_95_Qiao_Zhi__Ma_Si_Pei_Luo____Z)

### 陳的滅亡和隋在南方權力的鞏固

在本章的前一部分，我已描述了建康的南陳政體的虛弱和領土日益淪喪的情況。文帝繼承了北周大為擴大的版圖，建康的王朝因喪失了四川和長江以北的全部領土，其側翼受到包圍，因此從581年起，就只能茍延殘喘了。在長達六七年的時間內，楊堅一心對付東突厥人的威脅（見上文）和致力于改革和鞏固政權等問題。但他即位剛一個月，就任命他的兩名最有成就和令人生畏的將領總管與南陳接壤的長江下游邊境，據說他們在那里開始準備以后的進攻。楊素后來被任命為湖北四川邊境的長江地區的總管，開始建立遠征的水師。同時，糧倉制正付諸實施，運河體系的第一段工程已經開始。587年，文帝滅亡傀儡國家后梁，直接控制了長江中游。在此期間，他傾聽了大臣們征陳的許多建議。雖然他似乎注意聽取意見，但他最后還是采納了他以前的老學友崔仲方的計謀。

有人猜想，此計劃之所以吸引楊堅，是因為它詳細周密，并且列出了許多應急的對策。588年，文帝給了陳主一封加蓋御璽的信，上列一個暴君的20條罪行，表明取其領土并非罪過，實乃天意。同時文帝又下詔書，以道德和政治的理由為即將發起的進攻辯解。他在詔書中指責陳朝背信棄義，驕奢淫逸，殺害忠貞的諍諫之臣和其他罪行，并且提到了一些明顯表示觸犯天怒的自然異常現象。他在整個南方分發了30萬份詔書，以期軟化抵抗力量。這很可能是早期在心理戰中使用“宣傳品”之一例。

589年初期，遠征開始。一切都按照在長期準備過程中精心制定的計劃進行。從四川至東海，裝備精良的軍隊攻擊陳朝。最扣人心弦的時刻是在楊素指揮的艦隊和防守的南陳艦隊在長江三峽交戰之際。楊素指揮有幾千艘船的“黃龍”艦隊，在黑夜偷偷地靠近南陳的艦隊，黎明時南陳的艦隊被南岸和北岸的陸軍突然襲擊，徹底戰敗。在下游，陳的將領在長江安置鐵鏈，以期摧毀隋的艦隊。但楊素和另一隋將取陸路摧毀了保護安置鐵鏈的柵欄。在決戰中，楊素的四艘裝有撞角并由四川人駕駛的大“五齒”船摧毀了陳的防御艦隊。楊素駛往武漢，與秦王俊指揮的大軍會合，后者從襄陽直逼漢水流域。小股部隊渡長江逼近建康之東面和南面，然后向陳都進軍。晉王楊廣和高颎統率的主力軍從淮河正南的壽陽（今安徽壽縣）東移，渡過建康以東的長江。陳軍以重兵防守通往其國都的幾條通道，但他們缺乏統一的戰略，他們的最高統帥陳后主，仍舊昏庸無道——如果我們相信史籍記載的話。在京城的北門防御還在進行，但一個陳的將領卻向隋軍打開了南大門，并對其士兵說：“老夫尚降，諸軍何事？”[[96]](#_96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當陳朝的許多權貴以應有的尊嚴迎接勝利者時，陳后主及其兩個寵妃卻被發現藏在一個枯井中。他們不光彩地被拖了出來。陳后主最后被帶往隋都，在604年死去。

隨著陳后主的被俘，長江沿岸的陳的地方長官都向隋軍投降。只有建康以東和以南的諸地仍在堅持，但他們最后被隋的水師征服，這支水師從今東海附近的一個港口抵達海岸而在今上海附近登陸。平定偏遠南方的戰役意味著要對付一批批土著部落和分散的漢族聚居地。一次，晉王命被俘的陳后主寫信給一個部落首領，說陳已亡，他應向隋效忠。結果南方的全部部落首領均投降，并都得到應有的承認和賞賜。隋共接管了30個州、100個郡和400個縣，即整個長江以南的華東地區。隋帝下詔毀掉曾充當南朝的京城達282年之久的整個建康城；其城墻、宮殿、寺廟和房屋都要拆毀，土地則恢復為農田。陳后主父子、貴族和高級官員都被押往隋都。在隋都，陳朝的高級貴族和他們珍藏的財富被帶到隋宗廟的列祖列宗的牌位前。幾天后，陳后主及其200名貴族大臣被帶到皇城的大門前。文帝在門樓上俯瞻。經過了一番開場白后，他宮內的一名官員宣讀了他的詔書，內容是指責陳后主及其官員不能相輔，致使其國毀于一旦。“叔寶及其群臣并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97]](#_9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詔書宣讀完畢，隋帝就寬恕了他們。最后的盛典是隋帝給凱旋歸來的軍隊大擺筵席。這次對所有人共賞賜布3000萬段。

對陳朝上層人物的寬大是隋旨在逐漸緩和南方敵對情緒的策略的組成部分。陳朝中央政府的有些官員被吸收進隋的官制，陳后主得到很好的照顧，他幾個兒子在北方邊境區被賜給土地。對民眾有更直接影響的措施是，隋在原陳朝的各地區免稅10年。人們懷疑隋朝官員能否有辦法收到任何稅收。原來陳的行政單位大部分以隋的州和縣來代替，陳的官員被隋任命的官員取代。在岑仲勉對隋的州官進行的大量研究中，我未發現陳原來的州官被隋重新任命。在該著作中，我注意到隋在589年和590年期間重新命名或建立了30個州（陳原來共有42州）；所知的州刺史都是北人。[[98]](#_98_Cen_Zhong_Mian____Sui_Shu_Qi)如果我們回想起在南北朝分裂時期發展起來的文化差別和語言的不同（文帝和被俘的陳后主兩個人甚至因此不可能交談），就能看清楚勝利者和戰敗者之間的沖突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有兩件事引發了沖突。一是蘇威提出的對行為背離儒家準則的人稍加懲罰之事，這就是關于“五教”的奏疏。所謂“五教”，我認為是關于對上司和長輩應表示何種適當敬意的道德說教。一是謠傳隋朝正計劃把南朝陳的人民全部遷往西北。于是許多地方爆發了叛亂。隋朝官員遭到攻擊：有的被割而食之，有的被取出內臟。據說當地人對被害人說：“更能使儂誦五教邪！”[[99]](#_9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叛亂的規模有的有數千人參加，有的達數萬人，真是亂上添亂。

殘酷無情的楊素再次應詔鎮壓。在艱險的地理環境中經過多次激烈的戰斗，楊素設法在長江下游和東南沿海區征服了叛亂者。裴矩（本章將詳細敘述此人情況）在偏遠的南方也戰勝了叛亂的部落集團。揚州被賦予特殊的地位，稱為江都。晉王楊廣任揚州總管，負責整個東南的軍務。在約10年中，楊廣實際上是東南的總督，并且理所當然地對所采取的鞏固措施負責。關于這些措施，有許多我們不甚了了或者毫無所知，但關于他對南方佛教的政策，我們卻有大量材料。

被毀壞的建康城幾個世紀以來曾經是皇室和貴族的佛教中心。甚至它被侯景叛亂者洗劫后，許多大佛寺仍得以在城內重建，在南朝的陳統治的34年中，據說在其全部國土上建造的寺廟達1232座。但此時一些慷慨的施主——皇室、貴族和官員——已被帶到北方，寺廟已被破壞，建康和地方上的許多僧人處境極為困難。但正如前面論意識形態的一節所述，隋朝爭取利用佛教來打破地區壁壘和文化壁壘。早在590年，隋帝的一份詔書中就曾命令重新委任南方僧人的圣職。一位曾在南陳時動員僧人服役進行軍運的老律師開始“凈化”僧人，即挖出那些有名的具有反隋和叛逆情緒的人以及那些對宗教職守懶散的人。592年，天臺宗創建人智img（他曾在陳的朝廷中講道）寫信給晉王，抗議破壞建康的寺廟或把它們用作俗事的行動。智img收到一封措辭和緩的復信，但是資助許多寺廟的施主已經離開。有材料證明，隋朝把南方許多佛寺撥給官方使用。

但晉王逐漸成為南方僧人和佛寺的虔誠和體貼的施主。他命令他的軍隊收集因侵陳和以后的內戰而散落在各地的佛經；在揚州王府的建筑群中設立一個專門收藏精選的經籍的館堂；其余的經卷經過手抄，增至903580卷，然后被分發給揚州及其他各地有功德的佛寺。他在揚州建立4個道場，召集學識淵博的佛道兩教教士充當一段時期的王府的僧侶。智img死后，晉王成為天臺宗主要佛寺的正式施主。意義最重大的事也許是揚州的建設規劃，此規劃開始給揚州添加它后來所具有的某些色彩和光輝，同時又賦予了建康作為文化中心長期擁有的那種繁榮和吸引力。隨著僧侶的南來北往，對南方僧人表示的特殊恩寵以及官方對信仰的贊助，反隋的情緒逐漸緩和，最后幾乎化為烏有。[[100]](#_100_Zhong_Ben_Shan_Long____Sui)

### 全帝國交通體系的創建

雖然人們通常把開鑿運河與第二代隋帝聯系起來，但實際上這一網絡是他的父親文帝開始建造的。584年當文帝剛進入新都時，他就命宇文愷設計一條運河，從京都東流至渭水與黃河匯合處附近的潼關要地。[[101]](#_101_Zhang_Kun_He____Sui_Yun_He)這一運河名廣通渠，它的開鑿是因為了兩種壓力。一種壓力是京師區域缺糧（由于人口的增加而更加嚴重），糧食必須從東部肥沃的平原運來。第二種壓力是，在京師正北東流在黃河大彎處與黃河匯合的渭水受到淤積和季節性枯水的威脅，新運河提供了一條較可靠的水路。文帝的詔書如同宣布建造新都計劃的詔書，宣稱徭役勞動者的短期辛勞會得到更多的報酬，即保證新運河既用于官運，也可用于私運，會帶來很大的方便。他還希望代北（今山西省）的資源將由汾水水運而下，然后經黃河上游，最后通過運河被運到京師。廣通渠的工程迅速完成，這可能是因為此渠的路線大部分沿著一條漢代運河，后者在700年前是出于同樣的目的建成的。當589年，長度接近100英里的廣通渠竣工時，文帝親自出京城視察，并賞給各監督徭役的官員適量的絲緞。隋還在渠的東端建了廣渠倉作為主要的儲糧地，當歉收時可由此運糧供應京畿或其他地區。

這是運河工程的開始；而到了隋朝的第二個皇帝，才把開鑿地區性的重要運河轉到建設全帝國的水運體系。對此我們將在后面予以討論。

## 煬帝（604—617年在位）的個性和生活作風

楊廣，歷史上稱隋煬帝，生于569年，為楊堅與其非漢族妻子所生的次子。我們可以設想，在他12歲以前的少年生活中，致力于他的階級和時代的共同追求，學到了中文的基礎知識，具有正規的佛教信仰（他和他的弟兄童年都有佛名，有一個甚至想剃發為僧），受過騎戰和狩獵的訓練。他的本紀說他勤奮好學，精于文學，還記載他非常嚴肅，舉止端莊。他父親的篡位完全改變了楊廣及其四個弟兄的生活。他們從朝廷大臣之子的那種舒適的、可能顯得平凡的童年生活一躍而去過6世紀的宮廷生活。他們成了王，取得了封地和顯赫的爵號，但他們也變成了圍繞權力中心進行陰謀詭計的工具，在那里，官員、宮廷的寵妃、術士、和尚和庸醫們各為私利而勾心斗角。前文已經談到，楊廣的雙親為自己的青云直上而感到不安甚至恐懼，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至尊的地位是靠篡奪、暴力戰爭和大規模的屠殺取得的。他們很容易猜疑，而且這種心理也易被人利用。皇后活像一個清教徒，有著變態的妒忌心理；她不斷干預諸子的生活，他們稍微違背她的嚴格標準就遭到責難。文帝也著了魔似的擔心，某個兒子一旦成人，就將成為一心要取代他的集團和朋黨的中心人物。在他的五個兒子中，只有楊廣未受到雙親的冷落。下文將會看到，這不完全是偶然的。

楊廣的第一個官職是新設的華北平原北部的行臺尚書令。他當時只有13歲，文帝派飽經風霜的文武官員協助他，他們有權，并用權來約束那位受照顧的幼童。約在同時，文帝也許出于一統天下的謀略，在后梁為其次子尋找配偶，后梁當時實際上是隋在長江中游的衛星國。經過占卜，前統治皇室的一個女兒、原建康梁朝諸帝的后裔被選為楊廣之妻。這位年輕的姑娘受過很好的教育，聰明好學，很有文才。楊廣愛她，并尊敬她。作為蕭后，她是楊廣的終身伴侶和知心人。很可能她給他介紹了南方的生活方式，并促使他熱愛南方，幾乎到了著迷的程度。[[102]](#_102___Sui_Shu____Juan_36_Di_111)

前文已經討論了589年隋征服陳朝的情況。楊廣名義上是遠征軍的統帥，但制定復雜的軍事和海軍作戰計劃的工作主要由高颎和其他久經沙場的將領負責。據說高颎反對楊廣納被俘的陳后主的寵妃，據說此事使楊廣從此對他父親的主要謀臣懷恨在心。但另一方面，楊廣在被征服的建康的行為堪稱模范：他公開處決了降服的陳朝的幾個有名的酷吏，并封閉了陳的倉庫，所以無物被偷盜。在祝捷中他得到豐厚的賞賜，并一度返回北方任所。當原來南陳的一些地方爆發叛亂時，楊廣代替其弟被任命為東南的總管，駐營江都（今揚州）。他在任九年，每年至京師向父皇述職，在600年，一度任遠征突厥人的統帥。他在南方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和復雜的：緩和南方的怨恨和懷疑，在軍事占領后推行合理的行政，打破阻礙南人成為忠于隋室臣民的許多政治和文化隔閡。他為達到這些目的而采取的措施與京師發出的關于被征服的南方的總的命令相輔而行，其中包括589年頒布的關于在原來陳的土地免稅10年的命令，598年關于南方所造船只不得超過30尺以防水上叛亂的命令。楊廣集中全力進行可稱之為文化戰略的活動，旨在說服南人，說他們的新統治者并非夷狄，而是具有和珍視同一文化遺產的開化人。在這一戰略中，他個人的教育是他的本錢；他所講的日益流利的南方主要方言吳語和他的出身名門的南方妻子無疑也是有利條件。

他赴任之時是在到處出現的武裝反隋叛亂被楊素血腥鎮壓以后，所以各地反隋的情緒高漲。南朝的陳和貴族長期以來一直是佛教慷慨的施主，此時僧人（許多人已參加反隋的武裝起義）發現已無贊助人，只能設法在建康和其他地方已毀滅的和半空虛的寺廟中謀生。楊廣立刻著手另建一都以代替將近3個世紀中一直是南方的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建康。他從新都江都下了幾道命令，要求收集和重抄在戰爭和以后的內亂中分散在各地的佛經。他在江都建造佛寺和藏經之館堂。他還召集南方著名的高僧至江都的寺院從事宗教和學術工作。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天臺宗創建人智img，他在以前長期受南陳皇室的贊助。

591年后期，楊廣在江都給1000名南方僧人廣設齋席。在齋席后，年輕的楊廣跪受智img為居士作的“佛戒”，并接受佛號：總持菩薩。智img回天臺山寺院后，楊廣繼續贊助那里的寺院，并定期與這位大住持通信。智img給楊廣寄去南方僧侶的幾個請求：一是要求楊廣停止拆毀原陳都中的寺廟，對此楊廣只作了含糊的答復；一是請求地方上兩座保存高僧圣骸的寺廟不受嘈雜的驛站交通的打擾，這一請求被批準；一是智img本人的關于驅散1000名僧人前來聽他講經的集會的報告——據推測，這一行動是出于“安全”的原因。當智img送楊廣一頂天冠時，晉王寫了一封感謝信：“愛逮今制思出神衿，圖比目蓮（菩薩之徒，以法力著稱）……冠尊于身，端嚴稱首。跪承頂戴，覽鏡徘徊，有飾陋容，增華改觀。”[[103]](#_103___Guo_Qing_Bai_Lu____Juan_2)

在楊廣與智img的多次通信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當時性格中的某些方面：關于佛經的知識面很廣，其宗教的感情似乎是真誠的；有強烈的政治直覺（為了爭取南方的高僧而把奉承、引誘和贊助等手段巧妙地結合起來），這樣做還可能會取得雙親的歡心。

楊廣在南方的文化策略絕不限于佛教。雖然佛教是他求助的最有影響的傳統，但他在江都仍建造兩座道觀，并請南方學識淵博的道長主持。他還召請曾為陳朝效勞的著名的儒家學者來江都在他主持下講課和寫作，其中一人在楊廣的贊助下匯編了120卷關于禮儀方面的巨著。除了儒道佛三教的“代表人物”外，他還聚集了100多名南方的著名文人。顯然這不僅是進一步緩和南方精英反隋情緒的巧妙行動，而且也是很合他心意的事。他喜歡結交文人，其中得寵的也許是柳img，此人一度是后梁的官員。柳img潤色年輕的晉王的文章，并勸他學文不要以庾信（513—581年）為模范。柳img是楊廣深受恩寵的酒伴，據說他的談話具有詆毀性和鼓動性。這種關系在以后一直保持下去，這也可以認為是楊廣轉向南方文化的表現之一。

雖然隋在南方的行政情況并無大量記載，但南方以后沒有發生叛亂和他在江都任期很長的事實，說明隋在南方的治理取得了相當的成就，文化再統一的許多措施也應歸功于他。

600年，在他去朝廷后即將返回江都時，楊廣向母后告別。他發現她正為她的長子，即皇太子楊勇的行為大發雷霆。楊勇的正妻在591年突然神秘地死去，他繼續迷戀其他寵妃，并與她生了四子。皇后曾派人監視他，所獲的報告更給她那清教徒式的一夫一妻制情緒火上添油。據《隋書》記載，楊廣看到他們日益疏遠的情況是一個良機，于是他回到江都就與其心腹策劃促使他的兄長垮臺的陰謀。這種策劃意味著密謀和玩弄花招；對主謀及其同伙來說，它既有巨大的風險，也有機會獲得豐厚的報酬。參加楊廣集團的一個比較直言不諱的人說：“若所謀事果，自可為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104]](#_104___Sui_Shu____Juan_61_Di_147)

人們不可能知道關于以后事件的記載的可信性如何，但狡詐無情的楊素顯然是主謀。足夠的“證據”終于被編造出來，以欺騙生性多疑的文帝，以致他最后向集合在宮內某殿的朝廷大臣和皇親國戚頒布廢黜皇太子楊勇的詔書。據說楊廣則小心翼翼地給年邁的雙親以一個勤奮、虔誠、忠誠和實行一夫一妻制的年輕人的“假象”，這在遠離國都的地方是很容易做到的；因此他取得了渴望已久的東西。600年陰歷十一月，他被宣布為皇太子，此后不久他一家遷回京師。

正在此時，文帝度過了他的59歲生日，這是中國最隆重的生日，因為那里經常以60為周期紀年。他準備以孔雀王朝偉大的阿育王為榜樣，在全國供奉舍利，舍利在他生日那天——601年陰歷六月——被同時送到30個州治。新太子表現了他應有的虔誠，并在京城的東南部建造了一個宏偉的佛寺，同時邀請有學問的僧人來此佛寺，其中三分之一來自江都他的寺廟，除了三人以外全來自江淮流域。[[105]](#_105_Shan_Qi_Hong____Yang_Di_Zhi)這樣，他在向北方介紹南方的佛教傳統這一方面作出了貢獻。602年楊廣的母親死去，在葬禮中露面的主要是他的寺廟中的著名僧人。

皇后死后，文帝逐漸把管理國務的工作移交給太子。當他在京師西北約100英里的仁壽宮避暑時，他把一切事情都交給楊廣處理。603年，文帝聽信了妖術的所謂證據，貶黜了四子，證據還引起了他對五子漢王楊諒的忠誠的懷疑。604年夏，文帝患病。根據文字記載，太子及其心腹楊素加速了文帝的死亡，而且還扣下了文帝的再立楊勇為皇太子的臨終遺書。人們有理由懷疑其中的某些記載，不過雖然大部分證據有傾向性，楊廣或其心腹之一似乎仍有可能加速了他父親的死亡。八天后楊廣登位，成為隋朝第二代皇帝。他的幼弟漢王楊諒在東部叛亂，楊諒的謀士力勸諒在富饒的華北平原——原北齊的領土——割據稱霸。但諒優柔寡斷，事實證明他不是楊素的對手，后者擊潰了他的軍隊并將他俘獲。新帝施恩免楊諒死罪，但他不久“死于獄中”。

對這個歷史上稱為隋煬帝的人的性格刻畫是非常困難的，除了一些模糊的感覺外，人們不能期望在集中把他說成是古典的“末代昏君”的大量被篡改的歷史和傳奇后面，對此人的實際情況有更多的了解。歷史文獻把文帝的謹慎節儉與煬帝的放蕩揮霍進行對比，但從下面建設東都和完成運河體系這一節可以看出，這種鮮明的對比過分夸大了。民間文學把煬帝描繪成荒淫無度的人——以各種異想天開的方式沉迷于女色。但人們會發現，即使懷有敵意的修史者也不能掩蓋這一事實，即他的正妻，一個聰慧和有教養的婦女，從未遭到他的冷落而被宮內其他寵妃代替，她始終被尊重，而且顯然受到寵愛。隋煬帝畢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鑒賞家、一位有成就的詩人和獨具風格的散文家，他可能有點像政治美學家，這種人的特點可用以下的語言來表達：“的確，自欺欺人也許是一個規律，因為帶有強烈的藝術成分的政治個性具有一種炫耀性的想像力，它能使其個人的歷史具有戲劇性，并使一切現實服從野心勃勃的計劃。”[[106]](#_106_Ha_Luo_De__La_Si_Wei_Er)的確，他從他的勤奮的父親手中繼承了一個統一和繁榮的帝國。他計劃武力擴大帝國的領土和影響，并付諸行動。但他的這些夢想和遠征既不是狂想，也不是沒有前例的。它們倒不如說充實了他父親已經仿效而他本人設法去完成的漢帝國的模式。只是由于他最后一次冒險行動的災難性的失敗，他的過去給人以恐怖的形象，他執政的全部歷史才遭到了歪曲。當我們考察了他的政治作風以及他的高級官員和親密顧問，我們也許就能更多地看到他的復雜的性格。我們首先應注意蕭后，雖然她顯然是他的知心人，但卻不像他的母后那樣起著積極的政治作用。

我們如果看到山崎宏所列的隋朝上層文武官員的表，就會發現煬帝任命官員的作風與其父非常相似。兩者似乎都具有同樣的傾向，即任命親屬和同鄉，總的來說，任命有混合血統的西北貴族。有幾個人在父子執政期間都擔任要職。例如宇文愷，此人為善搞工程的人才。他計劃和建設過隋的新都，并繼續從事建設項目：運河、皇宮、幾段長城以及煬帝向突厥人炫耀的行殿和大帳。他在遼河設計了一座橋梁以用于對高麗的首次遠征；在612年死亡時，他任工部尚書。另一個為楊堅父子效忠的大臣為牛弘——一位長髯和語言遲鈍的沉著的西北人。他具有非凡的事跡。在隋初，他說服文帝開始系統地收集中國的文化遺產（如同漢代很久以前所做的那樣），即搜集在大分裂的動亂時期分散在各地的書籍。他建議通過收買或沒收，以取得私人的藏書；而秘書省的藏書又成了《隋書》中經籍志的基礎，這也是我們了解南北朝時期文獻的基本指南。牛弘是發展隋律的主要人物，并任禮部尚書至少有三年之久。白樂日認為他在編纂隋的法典時起了主要作用。[[107]](#_107_Bai_Le_Ri_____Sui_Shu___Zho)從599年到他在601年死去前，他是威望很高的吏部的尚書，因為吏部擁有隋帝授予的選拔、任命和提升官員的大權。在牛弘負責選拔制時，《通典》說他優先考慮的是個人的品質而不是文才。[[108]](#_108___Tong_Dian____Juan_14_Di_8)下文將要談到吏部的權力在煬帝時期稍有縮小。這位隨和并顯然是清廉的大臣與煬帝是莫逆之交。當煬帝為太子時，他們互贈詩文，據說牛弘曾被召進內宮參加有皇后在場的酒筵——這是一種特殊的恩寵。當他死于江都時，煬帝深為悲痛，并將其遺體運到極西的故土。

我們還可以繼續描述那些效忠于煬帝的高級的和有威望的官員，但約從609年起，行使權力的地點及關鍵的決策地點已從以前的行政官署和其中的官員那里轉移出來。煬帝的特點是一貫好動。他有三個都城：西部的國都大興城，華北平原南部的洛陽和他所喜愛的、并在那里任了9年總管的江都。他經常乘船沿運河往返于3個京都之間，并攜帶許多隨從。此外，他常往北去長城視察防務或與突厥可汗談判；608年，他帶隨從浩浩蕩蕩去親祠五岳之一——山西的恒山。609年，他從河西走廊出發親征吐谷渾。煬帝是個不肯安定的人；他對日常行政顯然不屑一顧而喜歡巡行各地。更重要的是，他好向其臣民炫耀王朝的富強及親自了解地方情況。據記載，他在609年曾說：“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南北朝時期）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在場的一朝臣答道：“此其所以不能長世。”[[109]](#_10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對當時的煬帝來說，天子的巡行幾乎是一種生活方式，因此他在全國建造了許多離宮，以便他在巡行過程中能休息一天或一周。

這種生活作風意味著他不可能效法他父親的那種特有的方式，按嚴格日程和有條不紊地主持政務——這種方式只適用于隋國都中按職能劃分的各區。據記載，他的一個朝臣曾向他建議“無得效高祖空自劬勞”，煬帝也同意他的意見。[[110]](#_110___Sui_Shu____Juan_61_Di_147)不管這一記載是否屬實，但上述的具體環境、他本人的個性和一些有心計的朝臣的遷就等因素所形成的力量，使他越來越依靠日益縮小的心腹顧問集團。這個集團最后當然使煬帝為它所用，同時，其成員助長了他的利己主義，迎合他的偏見和“清除”那些向他提出建議的具有獨立精神的人。我們必須先論述后一種情況，才能轉而敘述這一核心集團的作用。

有一人略與后一種具有獨立精神的人的類型不同。楊素——我稱他為文帝的心腹謀士——在為煬帝粉碎漢王楊諒的叛亂時得到煬帝的厚賞，因為楊諒是對煬帝即位的唯一的嚴重威脅。楊素得到高官和顯赫的爵位及豐厚的收入，但——如果我們相信史籍記載的話——他對煬帝為取得帝位而進行的一系列陰謀“知情太多”。在606年，當他得病時，據記載，煬帝派御醫前往，設法使楊素一命嗚呼。這個老武夫知道他的處境，服“藥”后突然以其最后的佛教的虔誠對其親戚說：“我豈須更活耶？”[[111]](#_111___Sui_Shu____Juan_48_Di_129)他遺留大量財產，這無疑證明了他的貪婪，而且也證明了兩個皇帝對他的賞識，他們每當需要他執行一項特別困難和見不得人的任務時，就知道他的價值和代價了。

文帝執政時的重臣和將領高颎曾因獨孤皇后的讒言而被貶。煬帝即位后，立刻讓這位老人復職，并授予顯赫的官銜。607年，高颎及他一代的其他官員直言不諱地批評新帝的政策及朝廷的風氣。這些批評被及時稟報，結果高颎獲死罪，其子被流放到邊境。隋朝最有才華和成就的將領之一并在征陳時與高颎同起重要作用的賀若弼同時也被指控。他被處決，其妻兒則淪為國家奴隸并被發配到邊境。文帝時另一個有非凡才能的高級官員，當時擔任禮部尚書的宇文img也受牽連，落了個相似的下場。《隋書》對他情況的評述可能也適用于其他的高級政治家：“img既以才能著稱，歷職顯要，聲望甚重，物議時談，多見推許。帝頗忌之。”[[112]](#_112___Sui_Shu____Juan_56_Di_139)年邁的薛道衡當時可能是最重要的儒家學者，煬帝初期，他從地方被召至京師任要職。但他盛贊先帝的成就，甚至提起高颎之名，由此可見此人很不圓通。煬帝在盛怒之下把他交給有司。他心存僥幸，希望能得到皇帝的公正待遇或寬大，但老儒生被處以絞刑，其妻及兒女被流放至中亞。這些人或因是煬帝父親的心腹，或因他們有不受制約的盛名及直諫，或因其他各種個人的不明的原因，都失去了煬帝的恩寵并因此遭到迫害。可能除了楊素外，這些官員都習慣于傳統的勸諫方式和在公開召見時議政。但如上所述，煬帝喜歡以另一種方式作出決定。這種方式決定了另一種官員能夠知道煬帝的秘密和分享他的權力。現在讓我們更仔細地考察煬帝的核心集團。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在核心集團中成為最有權勢的人是南方人。虞世基是陳朝官員之子，在隋征服前曾在陳朝任職。煬帝即位，這個不起眼的人開始青云直上，不久他擔任了相當于機要秘書的職務。由于煬帝的施政作風，必須有人起這一作用。《隋書》在敘述這種作風和虞世基的作用時寫道：“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庭決。入閤之后，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為敕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113]](#_113___Sui_Shu____Juan_67_Di_157)據《資治通鑒》記載，吏部雖然以牛弘為首，另有七名高級官員輔助，“然與奪之筆，虞世基專之，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色而已”。[[114]](#_11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他受賄之事未見于其他史料，但他的權力是在這種安排下取得的。他不能提供好建議。《隋書》在關于煬帝于615年在雁門被突厥人圍困的一段文字中記載，在全力突圍失敗后，虞世基勸其主激勵士氣，給他們賞格。他為煬帝起草詔書，宣布停止征伐高麗。煬帝批準這些措施。但當士兵突圍，煬帝隨即食言，沒有分發許諾的賞格，同時再次宣布征遼。據記載，這標志著煬帝失“信”于朝野。他的機要秘書伴隨他直至末日來臨，并同死于行刑人之手。[[115]](#_115___Sui_Shu____Juan_67_Di_157)

煬帝的施政作風需要一個主要的謀士，他發現裴蘊是合適的人選。裴蘊是南梁官員之孫，其父為南陳官員，被隋所俘而為文帝效勞。裴蘊因父在北方，就秘密請求文帝讓他在陳朝充當隋朝的內應；陳亡后，他受賞歷任要職。煬帝在一系列任命中對他進行考驗，最后讓他進入核心集團。裴蘊為人極為殘忍。隨著他權力的擴大，他擔任御史大夫，并且日益侵犯司法權。613年，當楊素之子楊玄感叛變時，叛亂很快被鎮壓，但煬帝的信心卻大為動搖。因此他下命搜索所有有任何牽連的人，裴蘊均無情地一一追捕。《隋書》記載，數萬人被殺，財產全被充公。據說他縱容殺害年邁的薛道衡；當核心成員中的老資格成員蘇威試圖委婉地告訴煬帝關于帝國中叛亂的范圍時，裴蘊即策劃把這位受尊敬的政治家罷了官。

宇文述是非漢族的北方人。他在北周時建有軍功，并協助文帝鞏固政權。他率大軍3萬征陳，經歷了艱苦的戰斗，并取得輝煌的戰績。在戰斗中，他遇到當時的晉王楊廣，楊廣對這個軍人深為賞識，因為他的背景與楊廣本人很相似，經楊廣的請求，宇文述在江都王府附近任職，后來楊廣又讓他參與讓自己即位的陰謀。當陰謀得逞，宇文述得到厚賞，楊廣登帝位時他又得到厚賜。608年宇文述將吐谷渾趕出他們世代居住的故土，俘獲其首領和男女約4000人，使之淪為奴隸。從609年起，他與上述數人就成了隋帝核心集團的成員。據記載，宇文述無恥地濫用其職權，其貪婪的欲望是無止境的，他是朝廷中令人望而生畏的人。凡聽到有稀世之珍，無不據為己有。與中國歷史中常見的情況一樣，他的貪婪伴隨著赤裸裸的阿諛奉承，只要看一眼主公的臉色，他就知道他需要什么建議（對君主或帝國來說可能不是最佳的建議），然后提出。這一情況的可信程度可以討論。但宇文述接受了幾個艱巨的任務。他第一次率軍遠征高麗慘敗后，一度被削職為民。但一年后當他赴西北時，又奉命征剿最早的叛亂者楊玄感。他擊潰了楊玄感的軍隊，并把楊的首級呈獻煬帝。在616年后期，煬帝采納宇文述的建議退居南都時，宇文述得病死去。在此之前，他曾請求煬帝寬恕當時被軟禁在家的他的兩個兒子。其中一子不久就率一股人馬殺害了煬帝。宇文述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軍人，也許與其說是一個主要的戰略家（裴矩就起這一作用），不如說是一個勇猛殘忍的戰將。這類人在官僚修史者寫的傳記中常常受到不應有的否定。

蘇威被人們認為是文帝的智囊團成員。在煬帝時，我們發現他有時得寵，有時受到嚴厲的責難；他為人狡詐，有野心和貪污行為，執行過一系列艱巨的民事和軍事任務，但他的權勢可能遠不及核心集團的其他成員。他的一生是有代表性的：為文帝和煬帝效勞，在弒煬帝的人手下任職，后來又協助其他的政權爭奪者。他在87歲時死于其長安的宅第。

裴矩為核心集團中最關心外事和蕃夷事務的成員，已有學者對他進行詳細的研究。[[116]](#_116_Fu_Li_Ci__Ye_Ge_Er____Pei_J)透過模糊的史料我們可以說，他似乎是一個比較正直的官員，老謀深算似不如楊素或裴蘊，冷酷自私似不如虞世基。他是今之山西省人，在北齊長大；北周滅齊，當未來的隋文帝前來接管一個州時兩個人相遇。隋建國后，直至隋文帝派他南下解廣州之圍時為止，裴矩擔任了一系列的次要職務，廣州當時正處于土著叛亂者的壓力之下；他遠征告捷，殺了叛亂的首領，并以傳統的方式將“二十余州”的土著置于他們自己首長的管轄之下。當他北返時，他得到賞賜和擢升。從此他主要關心突厥，并普遍關心北部和西部的邊境。他奉命計劃和執行遏制突厥人的軍事和外交活動，似乎干得很有成效。在文帝末年，他受賞擔任了重要的文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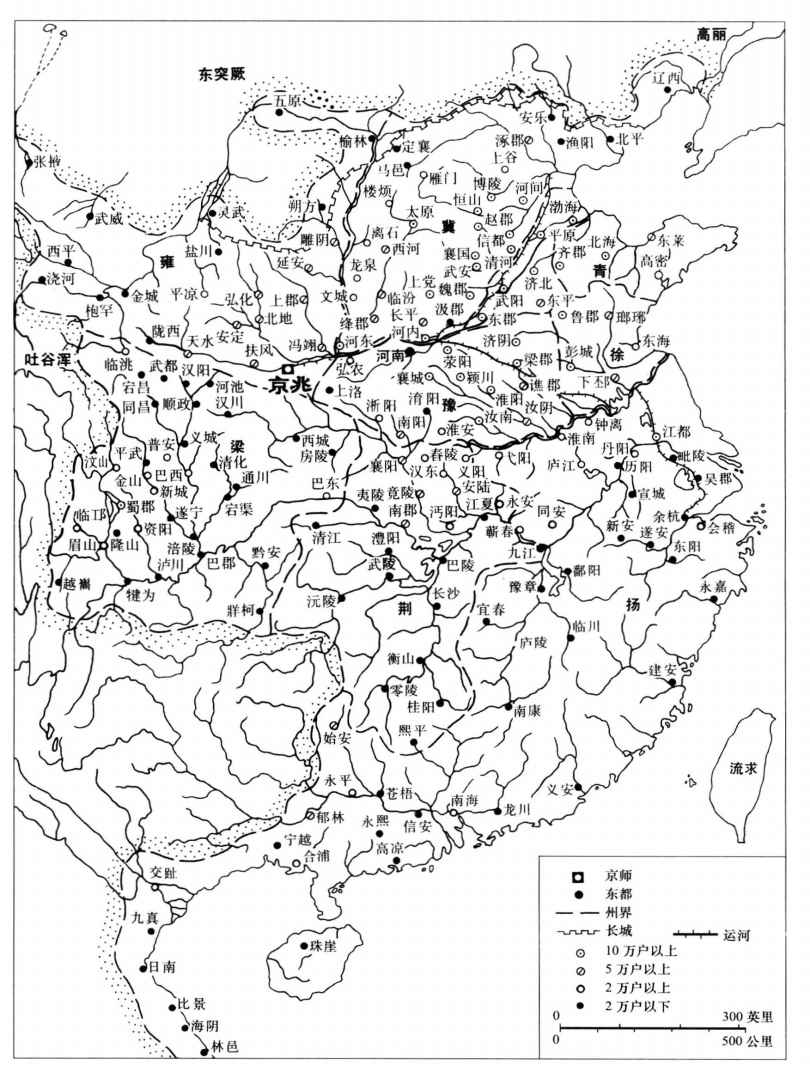
煬帝即位，裴矩立刻成了他在邊境問題和國外民族方面的主要顧問。在履行職責時，裴矩前往今甘肅省的邊境貿易站，在那里收集關于亞洲腹地的情報。他是一個不知疲倦的地理學家和人種學家；他向主公呈獻《西域圖記》，書中描述了中國西面約40個“國家”的特點，同時概略地敘述了通往“西洋”的主要貿易路線。《圖記》附有詳圖。他的政策性建議是使用和平方式——主要是中國的財富和威望——以盡量爭取這些民族或盡量影響它們的代表人物。但裴矩也力促煬帝遠出建立邊戍哨所和貿易集鎮，迫使某些民族集團臣服。例如在608年，宇文述武力奪取了河西走廊南面的吐谷渾領地，把它分成若干中國行政單位，把因犯“輕罪”而判處流放的中國人遷到這里定居。究竟裴矩是這些對外冒險事業的主要推動者，還是煬帝未經他的建議就進行這些活動，這仍是問題。《資治通鑒》編者的一段特別顯眼的文字說，煬帝在607年聽了裴矩之言后一時沖動，竟夢想仿效秦始皇和漢武帝的豐功偉業征服整個中亞。為了在隋朝京都與亞洲腹地之間迎送使節，隋極力榨取當地的民眾，司馬光作了結論性的指責：“卒令中國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倡導也。”[[117]](#_11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所以它之荒誕不經似乎是毫無疑問的。我們將在本章的最后一節再敘述裴矩的事跡。

以上概略的介紹雖然簡短，仍足以說明煬帝核心顧問集團中每個人的特點。這些人使他能按他自己的作風來處理政務，他們幾乎都伴隨他無休止地在全國來回巡行。應該注意的是，除了裴矩（可能還有蘇威）外，他們都是處理實際事務的官員，而不是起任何“勸諫”作用的政策顧問，但儒生認為在國家大事中平衡帝王和官僚權力時，“勸諫”作用是必不可少的。這一可能真正導致國家滅亡的結構，肯定使以后的（全是儒家的）史學家對煬帝苛加指責。

## 煬帝在位時的問題

在轉到煬帝在位時的問題和政策前，我們可以先考察要論述的這段時期，即從他605年登位至617年被貶黜的時期，是否可以作一定的劃分。人們有理由認為存在這樣一個轉折期，它應在609年前后。司馬光稱這一年為“隋世之盛，極于此矣”，他指出了有條理的和穩定的行政單位——190個州和1225個縣；指出了帝國廣袤的版圖，估計東西達3100英里，南北達4938英里（按每里相當于三分之一英里計）；最重要的是，他指出了它眾多的人口——將近900萬個登記戶，或約5000萬人。[[118]](#_11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但人們還有理由認為，這一年前后標志著煬帝執政的政治基調發生了變化。在609年以前，煬帝似乎全力采取以下幾項措施：進一步鞏固從其父親繼承下來的帝國，促進帝國繁榮富強；獲得其臣民的擁戴。609年以后，他全力貫注于對外擴張，對高麗的征服簡直發展到著迷的程度，對國內問題則相對地放松，同時日益依賴他的核心顧問集團。以下是對幾個措施的簡單的考察，它們也許能反映他執政前期的狀態。



地圖1 隋代中國（609年）

他執政最初幾年的行動是一個新統治者典型的和預料得到的行為：封其妻為皇后；指定皇太子；全國大赦；選擇典禮用的顏色和服裝，等等。但另外一些早期措施卻遠不是典型的。他對在與漢王楊諒進行的短暫而激烈的戰爭中被殺的人的家庭，均免稅10年。他下令撤銷原來存在于許多州的總管之職。他宣布要親自大張旗鼓地恢復傳統的儒學（詳情見下文）。他下令制定遠不如文帝的法典嚴厲的新律，在制定過程中他命令暫停執行“十惡之條”。命令重訂新律的夸張的言辭可以反映出他思想感情中的某些內容，即他開始認為自己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專制君主，一個明智的統治者，一個天下的主宰。“朕虛己為政，思遵舊典，推心待物，每從寬政……一眚掩德，非所謂也。”[[119]](#_119___Sui_Shu____Juan_25_Di_717)

他在位的第二年，在東都的南中門宣布全國大赦和免稅。這一年稍晚些時候，他頒布規定：凡未通過科舉考試取得官品的官員，必須有突出的才能方可被薦舉擢升。同年，他繼續建造他父親已經開始建造的糧倉，一些大的設施也在洛陽附近竣工。年末，他頒布詔書，向值得后代尊敬的過去的統治者表示敬意，同時哀嘆他們陵墓的破落狀態；他撥給每個陵墓勞役，由附近的10戶承擔，負責修理和保護。這一年裴蘊又在南北朝時期的幾種音樂傳統中大規模收集樂曲、樂器和樂師。這些傳統留存于曾得到幾個國家支持的世家之中；裴蘊淘汰一些無能之輩，精選了最佳的演奏者，并授予他們太常寺的等級和職位。煬帝非常高興，這當然是因為音樂不但令人愉快，而且他作為天子在履行保持天下和諧統一的職責時，音樂又起著作用。音樂在最古的典籍中就已被提到，在漢代被列入帝王祭祀的山川神祇之中。608年陰歷八月，煬帝從太原北上北岳恒山，在那里，他在黃河以北諸州刺史和裴矩召集的十來個中亞王國代表的面前舉行了隆重的祭祀以祈求帝國的富強——這種祭祀的傳統可追溯到神話中的圣人帝舜。祭祀后他宣布大赦，返京途中又下令巡行所經之地免稅一年。

史料對他早期這幾年喜愛奢侈豪華和大肆炫耀的行為作了大量敘述。我傾向于認為這些都言過其實，但關于他對3個年長資深的批評者采取的粗暴行動并在607年將他們殺害之事，我認為并無夸大；而這一年正是頒布刑罰較輕的新律之時。這些嚴酷的措施預示著以后幾年不幸地加劇的暴虐行動方式的來臨。即使我們姑且假定處決先皇的3個主要政治家的指控有一定的根據，609年年邁的薛道衡因含蓄地批評時局而被蓄意判處死罪之事，也肯定使煬帝的執政由此進入了更黑暗的第二階段。

### 儒學和學校的恢復

文帝晚年，對培養可能成為政府官員的年輕人的官辦學校很失望。601年陰歷六月在他生日之時（那天他仿效阿育王宣布在全國舉行佛教盛典），他頒布詔書，大量減少儒家學校（見前文）。在回顧他對這類學校寄予厚望及儒學在培養道德和實際才能時的價值時，他抱怨京師和地方學生過多而且懶散，既不能發展成為道德的典范，也不能成為潛在的官吏。因此他撤銷了州縣的學校，京師的三個學舍只保持其中之一，并削減國家支持的學者，人數從1000減至70。文帝在其晚年對所有儒學項目的支持也減少了。

煬帝即位時，他作為一個文人已略有名聲，在揚州期間已是儒家學者的庇護人。他為人精明，當然認識到作為尊老敬上這一民眾道德基礎和作為帝國秩序所派生的一切象征性表現的紐帶的儒家傳統的價值；這些象征性的表現包括季節性的祭典、向祖先和神祇的祝福和祈禱及天子向蒼天祈求天下和諧的一切禮儀。他在位第一年，就在一份夸夸其談的詔書中表示要扭轉他父親的政策，它在開頭寫道：“君民建國，教學為先，移風易俗，必自茲始。”然后他回顧了南北朝時期學術傳統中斷的情況，并與他統治的和平、繁榮和統一的時期進行對比。他又命令專使在全國搜羅有學有才之士，挑選合適的人才任職，由國家津貼學有專長之人，“即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最后他命令恢復京師學堂的講學（其他的地方學校我們知道也已恢復）。“教習生徒，具為課試之法，以盡砥礪之道。”[[120]](#_120___Sui_Shu____Juan_8_Di_64)同年早些時候，奉命視察各州的專使除了其他任務外，還要發現有模范行為、文才出眾和學有專長的人，經過考察，再把他們送往京師。據《隋書》記載，結果遠近儒生紛紛前來，并被組織起來互相辯論學術問題。一名高級官員給他們排列名次，上報隋帝。因此許多寒士得以重振門庭；典籍研究盛極一時，南北的傳統兼容并包。古代的典籍都被注疏。但《隋書》繼續說，這一復興為時甚短，重點很快轉向四夷的外事和武功方面。[[121]](#_121___Sui_Shu____Juan_75_Di_170)《資治通鑒》對煬帝有利的記載甚少，但其中一段說他在執政晚期增設宮內秘書省官員120名，由學者任職。這又引出了關于煬帝搞學術活動的一段追述性的記載。司馬光說他成年后好讀書和著述。他命100名學者在其江都的王府搞編纂工作，在他執政期間這方面的興趣一直沒有衰減。大興城和洛陽建有大藏書殿，而最終的成果則是規模宏大的秘書省，在洛陽藏有珍本，藏書總數達37萬余卷。為了讓兩京的宮、省、官府使用，他下令建造藏有節錄本的觀文殿。[[122]](#_122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煬帝常關心帝國儒教的禮儀，這些隆重的典禮使至高無上的權力引人注目。學者們是關于這些典禮的公認的權威。例如，他們為皇帝選定吉日進行祭祀；在命令尋找并列出至圣孔子的后裔的同時，608年授予孔子新的尊號；定出恒山祭祀及其他許多典禮的正當禮儀。在首次遠征高麗的前夕，煬帝在今北京附近的大本營按傳統舉行了出征前皇帝主持的三次古代的祭祀。

煬帝的記載在儒家禮儀、學術和教育方面都遠比具有特點的文帝統治時代更能引起人們的興趣。也許這不足為怪，因為早有人注意到，儒生在武力奪取政權時毫無用處，但在幫助統治者保持江山時卻起了理想的作用。煬帝時代的儒生在一定程度上一度起了這種作用，但從612年開始，暴力事件將把他們從所從事的工作和職位中趕走，以致他們又要再次等待改朝換代的時期。

### 建立洛陽新都

文帝死后一月，曾得到父親寵愛而在東部平原養精蓄銳的文帝幼子漢王楊諒發動了叛亂，被令人生畏的楊素所鎮壓。同年末，煬帝宣布在控制東部平原的洛陽建設東都。次年（605年）早期，他任命宇文愷與楊素和楊士達（煬帝的堂兄弟）重建該城。勞工是從東部平原的百姓征募的，工程進展很快。當竣工時，煬帝將原來州治的居民及“數萬”戶富商和商人遷入以充實重建的城市。607年，他命河南諸州輸送工匠家庭至洛陽居住，這樣，可利用的技工定額人數就翻了一番。他專設12個坊來容納他們。

煬帝因在重建新都時大肆揮霍而受到道德論者的譴責，但如果看到他自己對此舉的論點和地緣政治學的合理性，人們就會發現充足的理由。在兩份命令建設新都的詔書中，他提到在這一地點建都的著名的先例：周公約在公元前1100年在那里建東都；漢高祖盛贊這一地址。他還提到那里也是東周和東漢的國都，漢之主要繼承國在312年該城淪于“異族”之手前也建都于此地。494年漢化的北魏帝也選此城為新都。他提到周在東方建立第二個根據地的必要性，因為從那里可以控制被征服的商（約公元前1100年）；他舉近期他兄弟漢王叛亂之例來證明同樣的需要；關中區作為基地過于偏僻，難以由此遏制東部的反抗者。此外，洛陽是水陸運輸的自然中心及儲藏和轉運貢糧的要地。這些因素也促使唐朝在將近300年期間以洛陽為東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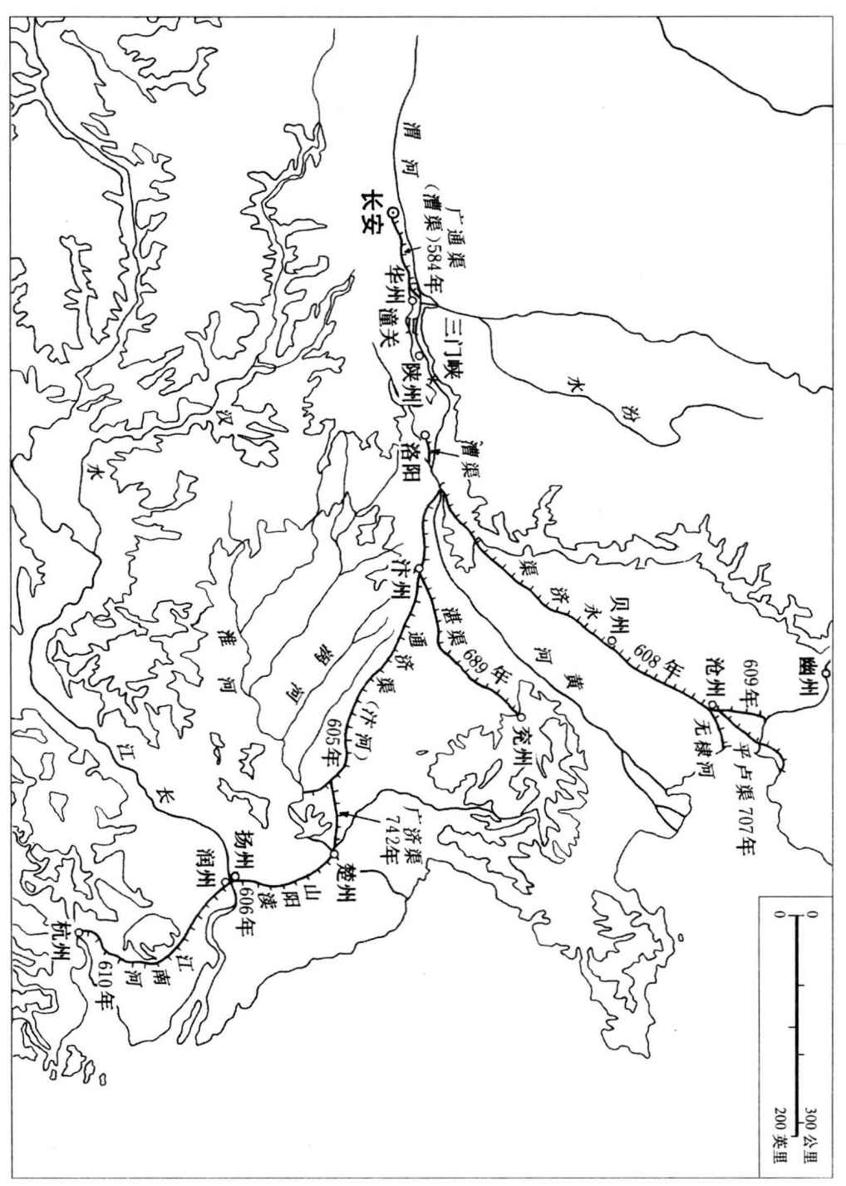
我們對第二個隋都的詳情知道得很少。根據新發掘出來的外城，隋唐時期的洛陽的大小約為西京的一半。它內部同樣分為三個有城墻的建筑群：北面的皇城；在它南面的行政區；城的其余部分形成分為若干坊的不規則的U字形，洛水在東流至與黃河匯合處的半途經過其南城墻。此城總的輪廓與其前身——在洛陽的北魏國都——相似。它不像西京大興城那樣被重新建造。只是在隋帝想帶他的貼身隨從臨時在那里居住時，它才似乎成了“國都”；這里沒有明代兩京制特有的重復設置高級官僚機構的任何跡象。但它在戰略上和經濟上是一個重要城市。對東部平原中這一被神話和歷史蒙上神圣色彩之地的精英來說，它更是帝王權威的重要象征。

### 全帝國交通體系的完成

雖然煬帝因在建城和建宮時窮奢極侈而受到嚴厲的指責，但他開鑿運河的工程是最受儒家史學家痛恨和批判的目標。許多世紀以來，傳奇小說的作者從有偏見的歷史著作中取材，而且層層地加以夸大。我們在閱讀時必須設法透過這些夸大之詞，參照煬帝采取的經濟和政治策略，以更嚴肅的措辭和文字來描寫運河開鑿的規模。

命令開鑿一條運河的詔書是在煬帝執政的第一年（605年）頒布的。運河名通濟渠，它使洛陽與淮河畔的泗州相連，并與從淮陰往南通向揚州邊上的長江的古渠道連接起來。這條漫長河渠的各段幾乎都沿著以前各河渠的流向；應該注意的是，這條河渠和該系統其余部分的開鑿是在平坦的沖積平原上進行的。工程無疑需要進行大量的疏浚工作和新的建設，如果這些河渠如史料記載，確實傍靠綠樹成陰的帝國驛道，那就需要征募大批勞力。《隋書》記載，為了開掘此河渠北部較長的一段，煬帝動員了百萬以上的勞工，同年稍晚，他為從淮河至長江的一段又征募10萬以上的勞工。如果這些數字不是按任何一段時間做工的人數計算，而是按每人20天服役期的總數計算，那么它們比較可信。[[123]](#_123_Yang_Lian_Sheng____Zhong_Hu)還有往南延伸的一段。610年，煬帝命令開鑿從揚州對面的長江往南至杭州灣頂端的運河。它約長270英里。但許多段也是沿著現有河流或以前河渠的河道建造的。

但在所有的河渠中，最長的為永濟渠，它的起點也離洛水與黃河的匯合處不遠，流向東北。發源于山西的沁水被引至此渠，而沿途則從其他河流補充水量，一般是黃河的支流。它的盡頭就在以后的大運河的終點處，即今北京的附近。工程開始于608年，當時“百余萬”人被動員進行這一工程。《資治通鑒》中有“男丁不供，始役婦人”的記載。[[124]](#_12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此河渠的南段也是沿古運河的路線開鑿的。



地圖2 隋唐時期的運河體系

詳情請參閱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劍橋，1970年），第182—189頁。

如果人們看過中國的地形圖和對定居的農業已有所了解，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些運河，再加上自然的水道，保證了隋能獲取所有最富饒地區的資源（只有四川除外，但它與京都有一條相當完善的驛道相連）。我們現在沒有關于隋代船運的稅、糧和布的數字，但大糧倉儲糧充足，有幾個糧倉成了隋末奪權斗爭的重要戰利品。唐代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于它繼承和改善了這一運河體系。通往東北的永濟渠之開鑿，不但是為了運來河北的稅收，而且部分地出于重要的戰略目的，即在需要軍隊防御北方和東北部區域時供應兵員。此渠還有政治用途。如上所述，中國經過長期的分裂后，此時才靠武力被重新統一。新君主在全帝國炫耀其財富和威嚴的能力是重要的有利條件；當然，把軍隊和供應以船運至有潛在反抗危險的地區的能力則更重要。長江南面的中國東南部已處于移民定居的過程中；運河系統延伸至杭州，舉例來說，就大大促進了杭州的發展，使它從一個邊境前哨地一躍而為繁榮的商業城市。[[125]](#_125_Ma_Bo_Le____Zhe_Jiang_Kao_G)

如果運河系統的這些具體優越性給我們以深刻的印象，中國的歷史著作卻沒有反映這些觀點。《隋書·食貨志》描寫了開鑿通濟渠的605年煬帝從洛陽巡行至揚州的情景：

又造龍舟鳳img，黃龍赤艦，樓船篾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腳，衣錦行幐，執青絲纜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以上給樓船，九品以上給黃篾舫，舳艫相接，二百余里。所經州縣，并令供頓。獻食豐辦者，加官爵，闕乏者，譴至死。

該書在文后列了向全國征用物品的清單，接著便是一段非常夸張的敘述：

征發倉卒，朝命夕辦，百姓求捕，網罟遍野，水陸禽獸殆盡，猶不能給，而買于豪富蓄積之家，其價騰涌。是歲，翟雉尾一，直十縑。[[126]](#_126___Sui_Shu____Juan_24_Di_686)

對上述文字和當時的一些史學家及近代史學家看到的運河系統的具體優越性之間的矛盾，我們又做何解釋呢？撰實錄和修史的儒家官員一般不贊成中央權力過度擴大和統治的君主無節制地使用這種權力；他們的重農經濟觀看不到經濟發展的好處；他們的政見和他們的歷史記載強調對外軍事冒險的勞民傷財和害處。歷來皇帝既是所有官員必不可少的盟友，又是自然的對手（不論多么隱蔽）。就不得善終的煬帝而言，這種潛在的敵意就表現在以上所引的文字中。

### 中國勢力的繼續擴張

由于隋代兩個皇帝的對外政策的連續性沒有突然中斷，所以我在前面已對隋朝與幾個國外民族的關系作了總的敘述。我論述了對占婆的入侵，它實際上始于文帝而終于煬帝；論述了對付東突厥人的成就，但他們在煬帝時依然是一個問題。另一方面，向西的擴張（包括征服吐谷渾和把他們趕出世代居住的放牧領地）、對東中國海的遠征和與日本的建交則是煬帝時代歷史的部分內容。雖然文帝在598年對高麗進行了短期的災難性的水陸遠征，但他滿足于高麗統治者的形式上的臣服，拒絕再作進一步的干預。煬帝直到他最后毀滅，一直對該地區懷有更大的野心，這將在后面進行敘述。通常中國歷史中的評價是：文帝在處理對外關系時謹慎明智，而煬帝則任性放縱。但在他們執政時期，邊境有兩種戰爭：一種是要確保東亞新帝國在地緣政治上的支配地位；一種則出于掠奪的欲望或個人的獵奇心理。漢的中央政治和文化秩序優于所有國家，這不但證明它理應防御，而且也證明它有理由使弱小民族受它的支配，根據這一古老的傳統，前一種戰爭是師出有名的。后一種戰爭規模和代價較小，同樣是一種可追溯到秦始皇的古老傳統，表現為帝國專制君主縱情于獵奇和對異國珍奇的愛好，不惜讓國家派兵出征。現在讓我們探討這兩種對外干預的行動。

#### 流求

關于名為流求的島嶼的確切地點已有很多爭論。日本學者普遍認為此名稱指的是臺灣；赫格瑙爾和幾個中國學者持另一種觀點，認為在隋代它是從菲律賓遠至日本的東中國海中所有島嶼的籠統名稱。610年，當煬帝最初派軍“平定”流求未遂時，他就指定將領在今浙江地區征募一支新的攻擊部隊。結果隋軍遇到頑強的抵抗。史籍記載兩種遠征結果：（1）通常的凱旋之說。中國軍隊得勝，打敗并處決了流求王，中國將領俘獲大量奴隸回國，獎賞和提升得勝的將領；（2）戰敗之說。抓獲戰俘后，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兵力過于擴散，入侵兵將因染病而死者十之八九。不管人們采納何種說法，史籍一般都未說隋準備在東中國海諸島上鄭重地或長期地建立政權。

#### 日本

日本的情況則迥然不同。自漢以來，它一直接受中國的文化影響，文化影響大部分通過朝鮮傳入，它在那里有相當的影響。在南北朝時期，日本諸藩至少名義上向北方的主要王朝納貢。當他們知道中國重新統一時，日本人當然注意了解大陸新秩序的詳情。開皇時期（581—600年），日本可能已派使節至中國，但第一個正式使節在607年到達。使者稱煬帝為“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并說他帶一批佛僧前來學佛法。他然后遞呈其君主的一封信，信的開頭是“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煬帝對這種無意的冒犯深為不快，于是吩咐“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盡管出現這種失禮，中國人仍在次年派了一個級別相當低的使節去日本，他帶回前所未有的關于日本的完整和準確的報道。使者顯然順利地離開，這時所發展起來的關系對于日本的文化史是有非常重要的影響的。[[127]](#_127___Sui_Shu____Juan_81_Di_182)

#### 吐谷渾

在東突厥帝國全盛時期，吐谷渾早已是突厥人的附庸。他們在青海湖周圍有牧地，其地位于通往玉門關沿線一些衛戍市鎮之南，幾個世紀以來，他們對這些市鎮進行襲擾。608年，他們受鐵勒部的攻擊，其可汗派一使者要求臣服于中國并得到援助。煬帝派兇悍的宇文述率軍前往“歡迎”。吐谷渾一見這支歡迎的軍隊就四方潰逃。中國人發動進攻，取首級數千，俘獲其首領，并使男女約4000人淪為奴隸。據《資治通鑒》記載，“其故地皆空，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州、縣鎮戍，天下輕罪徙居之”。[[128]](#_12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這次“征服”與其他的征服一樣，沒有維持到隋的滅亡，這樣，吐谷渾就必須由后來的唐王朝再去對付了。

#### 突厥

前面已經敘述東西突厥人的帝國分裂成兩個獨立和經常火并的帝國的情況，這對隋朝來說是一件幸運的事。

在煬帝全盛時期，西突厥人對他似乎是一個次要問題，一個以少量代價即能為中原帝國所用的累贅。他們當時所占的領土緊靠中國西部，但他們祖先的遼闊帝國已不復存在。他們的可汗處羅的母親本是中國人，她留在隋都充當人質和中國與西突厥人之間的調解人。610年當處羅表現出獨立的愿望時，隋帝采納裴矩的意見另立一對立的可汗射匱，后者成功地把處羅及其騎兵趕出其領地。處羅的中國母親被派往他在西面的避難地，說服他來到隋都，在那里他受到隋帝矯揉造作的隆重接待。他帶著一批隨從在612年前留在隋都，可能被作為備用的潛在的對立可汗，用以對付東突厥人或向力量日增的射匱挑戰。處羅與其騎兵隨煬帝對高麗進行第一次遠征，因戰功而受到厚賜。煬帝希望在處羅故地重立他為可汗，但因隋亡而沒有實現。

但占有大致相當于近代蒙古草原領土的東突厥帝國卻對中國北方邊境的中部構成了威脅。如前所述，隋很早就開始修建和擴建長城；煬帝在607年建造或重建了一段漫長的呈L形的長城。其較長的一段與黃河南北向的河道平行，蜿蜒于今山西和陜西省之間；較短的一段大致沿山西北部邊界由西向東，與原來早就存在的長城相接。但要遏制突厥人，僅靠城墻是不夠的，所以煬帝不時采用一種或幾種中國的傳統策略：讓突厥可汗的子侄住在隋都受“教育”；讓部落在中國領土上定居；和親政策；封贈和廢黜可汗稱號；朝貢和中國回贈禮物；定期在指定地點進行以物易物貿易（一般以中國的絲綢換突厥的馬匹）；各種政治陰謀。煬帝依靠的邊境政策專家為裴矩，他利用他在極西城鎮張掖（甘州）和敦煌的任命，為其主公收集情報并成功地在部落間施展陰謀，收買或威脅它們使之成為中國的臣民。607—608年煬帝在西北和西部邊境的巡行有助于說明隋朝與邊境民族關系的復雜性和裴矩的作用。

607年初期，當隋煬帝開始首次西北的巡行時，他先派裴矩前往敦煌。煬帝來到長城西北段之內的榆林。他在那里的豪華的行宮接受啟民可汗（前已被裴矩爭取到中國一邊）和義城公主的朝見。可汗向隋帝呈獻馬3000匹，隋帝回贈絲綢13000段。與這次高級的物物交換同時進行的是禮節性的互訪（隋帝幸啟民的大帳），互贈禮物和互相致意。608年，煬帝準備極西之行，裴矩作了周密的準備。隋帝的這次巡行是成功的。在陜西某地，他接見了高昌王（他長期在突厥的影響之下）、伊吾吐屯設和西胡27國的代表。據裴矩的傳記，這些臣服的民族“皆令佩金玉，被金罽，焚香奏樂，歌img喧噪。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填咽，周亙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129]](#_129___Sui_Shu____Juan_67_Di_158)裴矩當然是炫耀中國富饒的種種表演的舞臺監督。據記載，這些愚昧的牧民為之嗟嘆，隋帝大悅。

在這些措施背后，隱藏著隋的現實政治的具體目標之一。這就是進一步削弱突厥人，不讓他們與其東西的其他部落集團結盟，在可能時，還把他們用作打擊隋朝其他潛在敵人的力量。例如當605年契丹侵入中國后，隋帝派一中國將領率一支兩萬名東突厥騎兵的部隊迎戰。契丹人大敗，其婦女和牲畜被分賞給突厥人。608年，突厥人準備參加中國人對伊吾的中亞綠洲的進攻，該地一度是漢代衛戍集鎮，位于穿過亞洲腹地的北路上。這一次，突厥的盟軍顯然沒有露面，但隋軍占領該地，建立新的要塞，然后留軍駐守。這次遠征并無驚人的理由，而是為了使亞洲腹地各族在與中國人貿易時免除長途跋涉之勞。

607年，隋帝幸啟民可汗之都，可汗因高麗國來了使者而陷于嚴重的困境，于是盡力設法使使者朝見來訪的隋帝。像潛在敵人之間秘密來往的這類證據總是會使中國人驚慌不安的。裴矩建議其主公命令高麗使者：回國后告訴高麗王立刻親自來隋廷致敬；如果不來，中國人將率領一支突厥軍去嚴懲他的可鄙的國家。牛弘立即奉命明確告訴使者。使者將此訊息帶回本國，高麗王拒絕作出表示臣服的應有的姿態。中國的權威受到蔑視，隋朝遲早必定要使用大軍去討伐這一犯上之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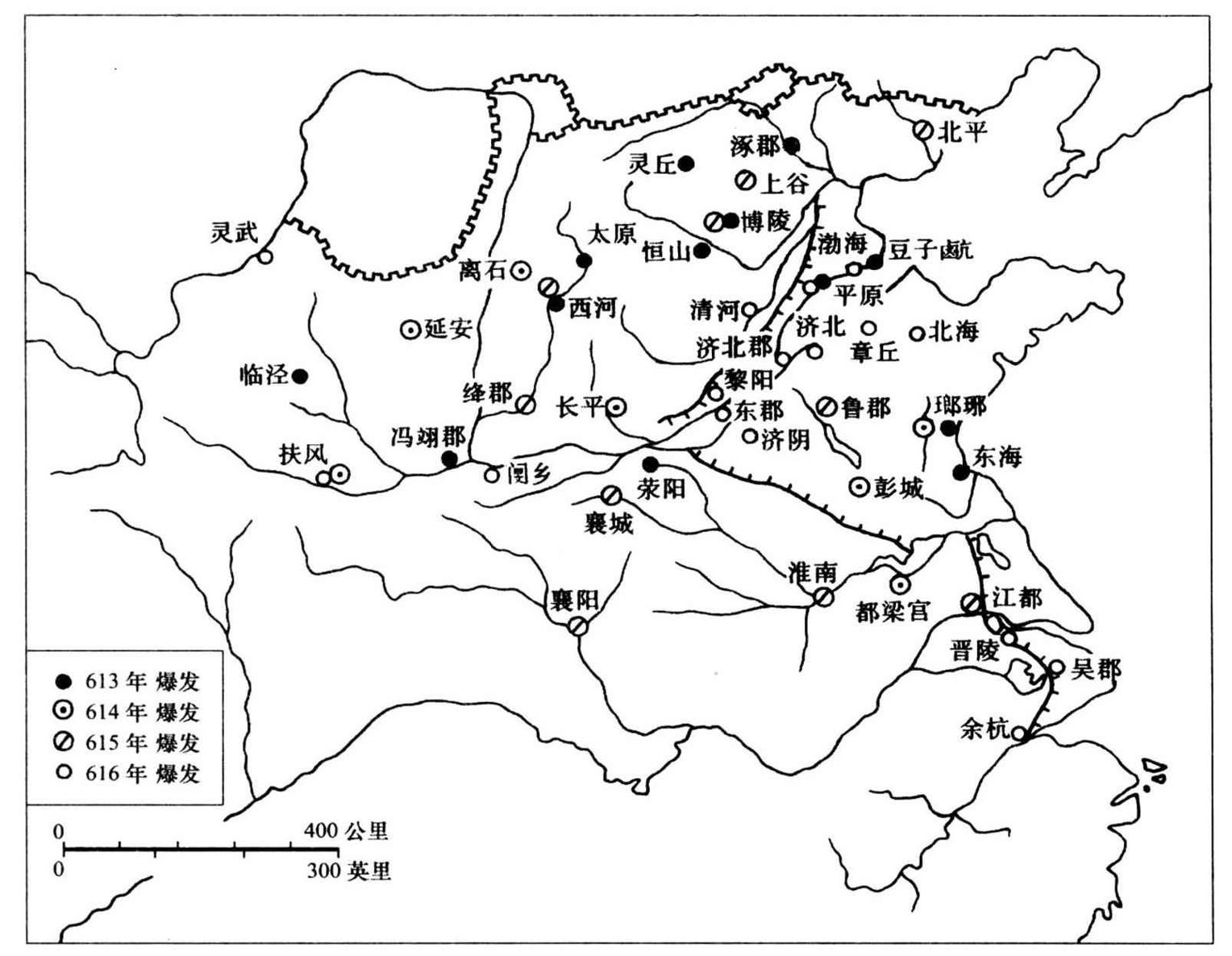
裴矩向其主公提出的建議只能有兩種解釋。其一是他認為高麗會很快屈服，因而要讓這個完全開化的地區恢復其相應的朝貢國的地位。另一種解釋則是他預計會遭到抵抗，但抵抗會很快被雇傭的突厥軍粉碎，然后高麗可以成為帝國的組成部分。他注意到漢代曾經征服過這一地區，并把它劃分為三個郡。他提醒煬帝，文帝曾試圖征服高麗未遂，因為戰地統帥無能。他指出高麗是“開化”的，因此容易并入中華帝國，但此時他們竟派使者去向微不足道的游牧的啟民可汗大獻殷勤！他雖然有廣泛的經驗，卻沒有對東北地區最直接的認識知識，所以沒有說勝利是不可能輕易取得的。裴矩為人機敏，深受公認的價值觀念的熏陶，熟悉對立和沖突地區的情況，但他對他許諾會輕易取得勝利的那個地區卻完全不了解。

他的計劃中出問題的第一件事是未能實現使用東突厥雇傭軍的打算。609年，聽話的啟民可汗來洛陽晉見時死在那里。其子始畢繼承他被封為汗，同時獲得大量禮物并與一個中國公主結婚。但始畢遠比其父精明。當裴矩開始施展慣用的手法，又把始畢之弟樹立為一敵對的可汗以削弱突厥人時，始畢就轉而與隋為敵，立刻停止晉見隋廷。這樣，對高麗的討伐就得由中國人獨自承擔了，同時，中國人的北方和西北邊境安全的不穩定性正在增長。

#### 高麗

在7世紀初期，高麗國占有今遼河東部的滿洲和朝鮮半島的北部，其國都就在現在的平壤。朝鮮半島的大部分分成西南的百濟和東南的新羅。北方的王國曾向北魏及后來的北周、北齊納貢。但為了對高麗侵襲遼河以西地區進行報復，隋文帝在598年發動了最后遭到失敗的水陸進攻。高麗此時在軍事上是強大的，但它對中國的潛在威脅更因其他因素（除了與東突厥人結盟這一因素之外）而成倍增長和更加復雜化了。高麗以北是一個稱為靺鞨的好戰的通古斯部落聯合體，它參加了高麗渡過遼河的侵犯。遼河的下流為契丹，它在605年曾入侵河北，但如前所述，被中國人指揮的東突厥軍所擊敗。但契丹單獨地或與它的不受約束的鄰邦結盟后，依然是一個威脅。此外，已有學者提出一種假設，遠處西京的隋廷擔心高麗在河北地區可能產生強大的軍事影響，因為從北齊時期起那里的分裂情緒遠沒有消失。[[130]](#_130_Yue_Han__Jia_Mi_Sen____S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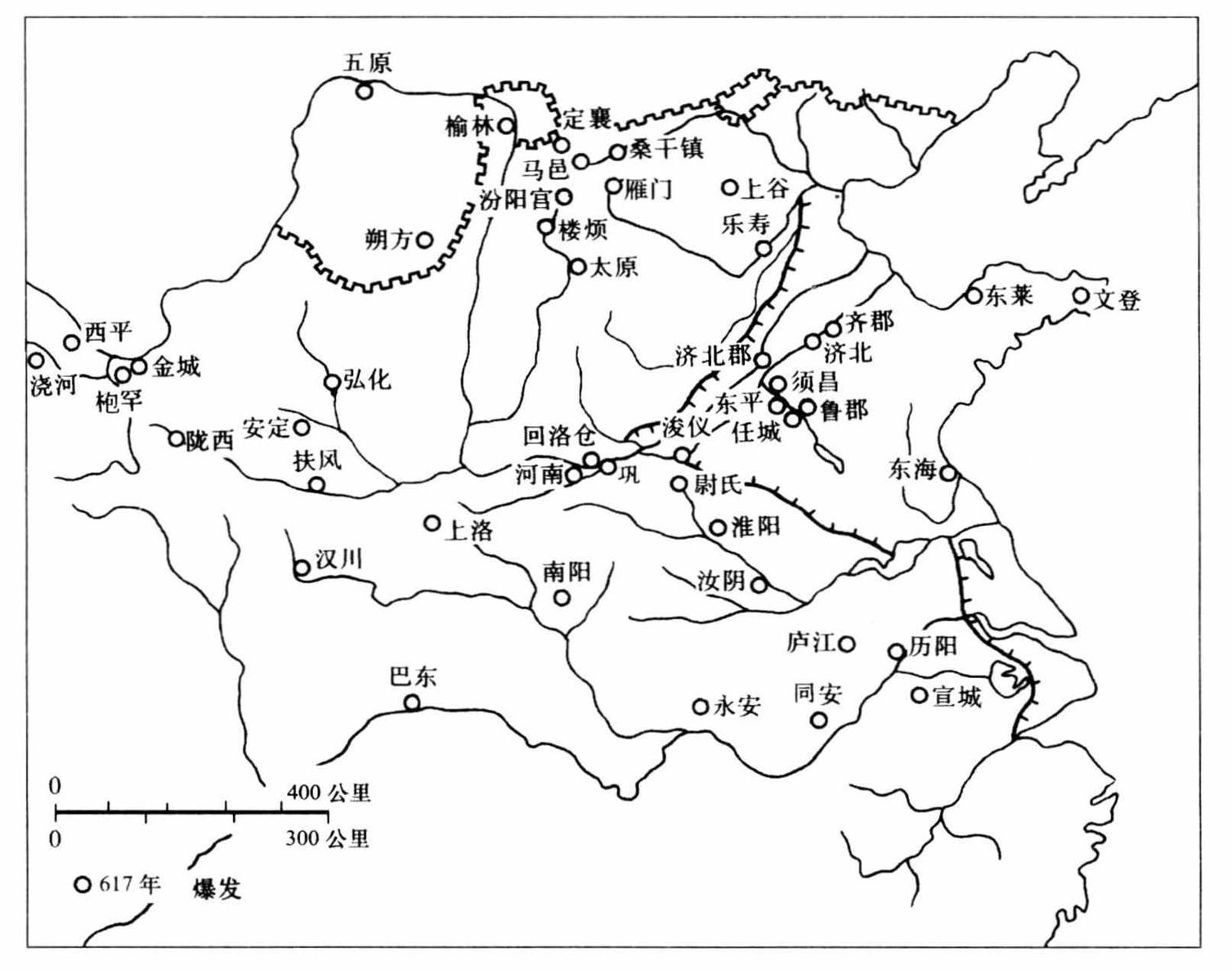
煬帝的意圖可能是等漫長的永濟渠——連接中國心臟地區與北京的大運河的主渠——竣工后才“討伐”高麗。不管是否屬實，永濟渠于609年竣工。610年，以富戶為對象的戰爭特稅開征，軍事準備工作迅速進行，有龐大的后勤支援的大軍（《隋書》說這是歷史上最大的一支）集結在今北京地區的涿郡。黃河平原的一次水災淹沒了40個州，打亂了計劃，并引起征募人員的逃亡。但在612年正月，隋帝及其將軍和一支龐大軍隊準備從陸路進攻，而水軍則從海上進攻。隋帝舉行了應有的祭祀（前文已予描述），并為此頒發了冠冕堂皇的詔書。在詔書中，煬帝適當地以古代的圣賢統治者和偉大的帝王為比喻，堅持隋朝具有美德、支配天下的力量和豐功偉績。他嚴厲指責高麗王拒絕臣服，為人奸詐，勾結契丹、靺鞨侵犯隋的領土，等等。[[131]](#_131___Sui_Shu____Juan_4_Di_79)裴矩作為戰略顧問，隨他征討，杰出的工程專家宇文愷在遼河架了橋，大軍向前推進。所訂的計劃是迅速直逼高麗國都，但沿遼河東岸諸城頑強抵抗，直到夏末大雨使軍事行動不可能再繼續進行。煬帝在8月末撤軍返回洛陽，據說損失慘重。回都后懲辦了幾個戰敗的將領，并加強了他的統治。



地圖3 隋末的叛亂（613—616年）

613年正月，他宣布第二次動員，并在夏初北行，打算第二次遠征高麗。賓板橋注意到了這一年早期國內叛亂次數增加這一不祥之兆；其中七次主要集中在611年黃泛受災區。[[132]](#_132_Bin_Ban_Qiao____Tang_Zhao_D)煬帝又渡遼河，但在戰斗中，傳來當時的禮部尚書并在永濟渠南端負責一供應中心的楊玄感（楊素之子）叛變的消息。楊玄感的叛變是重要政治人物中最早的背叛，而且它發生在離洛陽不遠的帝國心臟附近。煬帝派最優秀的將領宇文述從東北戰場返回鎮壓叛亂。隨之引起了一場短暫但激烈的內戰，楊玄感的軍隊戰敗，他的首級送給在戰地的煬帝，由他驗明；但社會結構、稅制、府兵制和供應制被嚴重破壞。而煬帝竟宣布在614年作第三次遠征，但從這次叛亂和下半年爆發的八次分布得很廣泛的叛亂來看，實在令人驚異。宣布前他召臣僚進呈意見，但據《隋書》記載，竟“數日無敢言者”。[[133]](#_133___Sui_Shu____Juan_4_Di_86Ye)于是他在陰歷二月又頒布詔書，但這一次卻帶有自我辯解的語氣。他說他一貫全心全意履行帝王的職責和致力于武功；他引了（虛構的）商朝成湯52戰的前例，此外又補充了東漢光武帝的武功。他說他痛恨戰爭，對以前幾次戰役犧牲的生命表示悲痛，命令收集和安葬戰死兵將的遺骸，并建立道場，“恩加泉澤，庶弭窮魂之冤”。[[134]](#_134___Sui_Shu____Juan_4_Di_86)準備工作開始進行，盡管物資和馬匹不足，許多應征士兵沒有報到，隋軍又渡過了遼河。沿河據點再次固守，但隋軍滲入了平壤的城郊。614年較晚時期，高麗王在嚴重的困境中派使者要求投降，使者隨帶一名投靠高麗的隋將。隋的先鋒要攻取平壤和俘獲高麗王，但被煬帝召回。煬帝再次命令高麗王到隋廷表示敬意。但高麗王沒有前來。煬帝又命令準備第四次遠征，但此時國內叛亂不斷爆發，對外的冒險行動不得不到此結束。

促使煬帝再三進行這幾次勞民傷財的毀滅性遠征的動機是：他的帝國威嚴和帝國地處宇宙中心的觀念；他想恢復漢代光輝業績的迫切愿望；他自認為對所有敢于抗拒中國移風易俗的仁愛影響的人必能取得偉大勝利的想像；他對裴矩和其他軍人言之成理地提出的現實政治的考慮。他在反復發生的災難面前堅持討伐的原因似乎是清楚的。但失敗的原因長期以來是一個探討的問題。近來，約翰·賈米森總結了他本人、陳寅恪及其他學者的解釋。這些解釋大致歸納如下：（1）地形和氣候有利于防御者。進攻的目標地形險惡，部分地區森林茂密，那里夏季有傾盆大雨，隨之嚴冬很快降臨；入侵者的戰斗季節只是從4—7月雨季開始之時。（2）高麗的戰略家由于熟悉地形和以一年的大部分時間備戰，能夠頑強地防御。他們防御的中心是從遼河河口的安市附近往北延伸至東岸的一批有城墻的市鎮。他們反復牽制圍攻的軍隊，直至嚴冬的侵襲迫使他們撤退。（3）從中華帝國首都至戰場的距離是驚人的，將近1000英里。例如，楊玄感叛變的消息用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才傳給在地戰的煬帝。高麗在這方面取得有利條件。四、隋使用水軍得不償失而且愚蠢，高麗則有良好的海防。[[135]](#_135_Jia_Mi_Sen____San_Guo_Shi_J)在唐太宗進行災難性的遠征時，這些因素繼續起決定性的作用，只是在中國人說服和“協助”高麗的南鄰新羅開辟第二戰線時，形勢才發生了變化。



地圖4 隋末叛亂（617年）

#### 結局

隋煬帝先回到洛陽，然后在614年陰歷十月返回西京，他立刻下令在城的西中門外磔裂投降高麗的將領。然后他企圖像平時那樣處理帝國事務。在新的一年，即615年，煬帝賜宴官員。據《隋書》記載，他接見了突厥、新羅、靺鞨、契丹和亞洲腹地諸國的貢使。正月稍晚，他招待南方和東方諸土著民族的代表，并分賜禮物。陰歷二月，他在詔書中回顧了遠征的勞累和破壞，但敦促人民各安其業。他說，他們經歷了所有苦難，“今天下平一，海內晏如”。[[136]](#_136___Sui_Shu____Juan_4_Di_88)但實際上帝國一片混亂。官兵在十幾條戰線作戰，力圖遏制和消滅叛亂者。煬帝在建于太原附近的汾陽宮度夏。夏末北巡時，他幾乎被始畢可汗率領的東突厥軍所俘，后來逃入雁門城。記載所述不一，有的說守城者表現恐慌和不滿，有的說有人輕率地提出逃跑或把敵人趕走。但附近的各刺史顯然得到勤王的命令。城雖然被解圍，但煬帝卻驚慌失措，他的信心嚴重動搖，以后變得越來越消沉了。

我們不清楚他當時了解帝國處境的程度，但帝國日益被無數地方叛亂者控制。他的特殊的統治作風必然會使其核心集團設法對他隱瞞全部嚴酷的事實。根據一種記載，他的顧問一味對他含糊其辭和不置可否，甚或干脆撒謊。有一人因直言而在議政庭上被鞭笞致死。616年夏，經宇文述的力勸，煬帝乘新建的運河船隊至江都。他留下官員負責北方，即帝國的中心，但他本人則永不復返。他在江都最后的日子是憂郁的。他備受恐懼和猜疑的折磨，不能忍受帝國的消息，更不能為帝國采取任何行動。617年，他的兩個孫子被北齊的對立叛亂者擁立為他的繼承人，其中之一給他一個響亮的空頭銜——太上皇。618年，他在浴室被宇文化及所殺，宇文化及是他父親無情地取代的皇室的后裔，又是他最信賴的將領宇文述之子。

儒家修史者對煬帝道義上的評價的確是苛刻的，因為他們把他描寫成令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在民間傳說、戲劇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觀眾的隨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人民生活在一個無節制地使用權力、有豪華宮殿和享有無限聲色之樂的世界中，只能產生這種感情上的共鳴。在中國的帝王中，他絕不是最壞的，從他當時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他很有才能，很適合鞏固他父親開創的偉業，而他在開始執政時也確有此雄心。但是他希望歷史會肯定他的執政以及他追求豪華壯觀的欲望，這就使他的判斷力不能發揮出來。那種驕奢淫逸的作風只能使阿諛奉承之輩得勢，而他周圍確有這樣一批人，這對他是致命的。遠征高麗——這種企圖的目的我相信是合理的，即使是傳統的——隨著每次失敗，卻使他越來越著迷，而著迷對于擁有最高權力的專制君主及其統治的人民來說往往是致命的。

盡管有著這次悲劇性的大災難以及隨之而來的內戰，但在經歷了最漫長的大分裂時期之后隋終于重新統一了中國，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隋朝消滅了其前人的過時的和無效率的制度，創造了一個中央集權帝國的結構，在長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區發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識，這一切同樣了不起。人們在研究其后的偉大的唐帝國的結構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時，不能不在各個方面看到隋朝的成就，它的成就肯定是中國歷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

[[1]](#_1_1)理查德·馬瑟：《關于六朝時期洛陽和南京方言的一點意見》，載周策縱編《中國人文學科研究文集》（麥迪遜，威斯康星，1968年），第247—256頁。

[[2]](#_2_1)宇屋美都雄《南人與北人》，載《東亞論叢》，6（1948年），第36—60頁；重載于其《中國古代之家族與國家》，第416—460頁。

[[3]](#_3_1)《樂府詩集》卷49，第7頁，四部叢刊本。

[[4]](#_4_1)《魏書》卷2，第33—34頁。

[[5]](#_5_1)《北齊書》卷24，第347—348頁；白樂日：《〈隋書〉中的食貨志》（萊登，1953年），第258頁。

[[6]](#_6_1)原文誤作601年。——譯者注

[[7]](#_7_1)《隋書》卷36，第1108頁；彼得·布德伯格：《北朝史瑣談》，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3（1939年），第260頁；芮沃壽：《隋的意識形態》，載費正清編《中國的思想和制度》（芝加哥，1957年），第79頁。

[[8]](#_8_1)《周書》卷21（尉遲迥、王謙和司馬消難的列傳）；《資治通鑒》（古籍出版社本，北京，1956年），第5407—5431頁；布德伯格：《北朝史瑣談》，第258—265頁。

[[9]](#_9_1)《資治通鑒》卷175，第5447頁。

[[10]](#_10_1)《資治通鑒》卷175，第5436頁。

[[11]](#_11_1)《資治通鑒》卷178，第5558頁。

[[12]](#_12_1)《資治通鑒》卷177，第5527頁。

[[13]](#_13_1)《資治通鑒》卷178，第5558頁。

[[14]](#_14_1)《隋書》卷25，第711頁。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15]](#_15_1)《隋書》卷50，第1324頁；湯承業：《隋文帝政治事功之研究》（臺北，1967年），第60頁。

[[16]](#_16_1)《隋書》卷45，第1240頁；《資治通鑒》卷178，第5558頁。

[[17]](#_17_1)《隋書》卷38，第1143頁。

[[18]](#_18_1)《資治通鑒》卷175，第5446頁；《隋書》卷35，第1108頁。

[[19]](#_19_1)《資治通鑒》卷175，第5447頁；《隋書》卷36，第1108—1109頁。

[[20]](#_20_1)此事發生在當時尚未竣工的仁壽宮。

[[21]](#_21_1)《資治通鑒》卷178，第5565頁。記載中此事物的日期為599年，我認為似乎晚了。

[[22]](#_22_1)《隋書》卷36，第1109頁。

[[23]](#_23_1)《隋書》卷41，第1183頁；《資治通鑒》卷178，第5568頁；《北史》卷7，第2491頁。

[[24]](#_24_1)《隋書》卷36，第1109頁；《北史》卷14，第533—534頁。

[[25]](#_25_1)《通典》卷7，（十通本，上海，1936年），第42頁。

[[26]](#_26_1)《貞觀政要》卷5，（原田本，東京，1962年），第152頁。

[[27]](#_27_1)《北史》卷82，第2491頁；《資治通鑒》卷178，第5567—5568頁。

[[28]](#_28_1)《隋書》卷48，第1288頁。

[[29]](#_29_1)《周書》卷2，第36頁；《周書》卷24，第404—407頁；昌西·古德里奇（富善）：《蘇綽傳》（伯克利，1953年）。

[[30]](#_30_1)《周書》卷23，第382頁。

[[31]](#_31_1)《隋書》卷41，第1190頁。

[[32]](#_32_1)《隋書》卷42，第1199—1200頁。

[[33]](#_33_1)《隋書》卷42，第1207頁。

[[34]](#_34_1)《資治通鑒》卷175，第5439—5440頁。

[[35]](#_35_1)《隋書》卷42，第1208頁。

[[36]](#_36_1)《隋書》卷2，第51頁。

[[37]](#_37)同上書，第46—47頁。

[[38]](#_38)據法經和尚于594年送呈的《經卷目錄》，載《大正新修大藏經》卷55，第149頁。

[[39]](#_39)法琳和尚作《辯正論》卷3，載《新修大藏經》卷52，第509頁。

[[40]](#_40)費長房編：《歷代三寶紀》卷12，載《新修大藏經》卷49，第107頁。

[[41]](#_41)《新修大藏經》卷49，第108頁。

[[42]](#_42)道宣編：《廣弘明集》卷17，載《新修大藏經》卷52，第213頁。

[[43]](#_43)《辯正論》卷3，載《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09頁。原書未找到此引文，現按英文譯出。——譯者

[[44]](#_44)《隋書》卷1，第17頁；《資治通鑒》卷175，第5457頁。

[[45]](#_45)見《考古學報》，3（1958年），第79—94頁，關于該遺址的初步考古發掘報告。

[[46]](#_46)山崎宏：《隋朝官僚的性質》，載《東京教育大學文學部紀要》，6（1956年），第17頁。

[[47]](#_47)山崎宏：《隋朝官僚的性質》，載《東京大學文學部紀要》，6（1956年），第15—25頁。

[[48]](#_48)山崎宏：《隋朝官僚的性質》，載《東京大學文學部紀要》，6（1956年），第17—23頁。

[[49]](#_49)《唐會要》（國學集本叢書本，北京，1955年）卷74，第1333頁。

[[50]](#_50)《隋書》卷66，第1562頁；湯承業：《隋文帝政治事功之研究》，第105頁。

[[51]](#_51)《北堂書鈔》（1888年本，1962年臺北重印）卷62，第2頁。

[[52]](#_52)《周書》卷23，第386頁；白樂日：《〈隋書〉中的食貨志》，第291頁。

[[53]](#_53)《通典》卷13，第81頁。

[[54]](#_54)《玉海》（華文本，臺北，1964年）卷115，第9—10頁。

[[55]](#_55)《隋書》卷76，第1747頁；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之研究》（京都，1956年），第521頁。

[[56]](#_56)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之研究》，第520—524頁。

[[57]](#_57)《隋書》卷28，第783頁。

[[58]](#_58)濱口重國：《論所謂隋的廢除鄉官》，載《秦漢隋唐史研究》（東京，1966年）卷2，第778頁。

[[59]](#_59)《北齊書》卷4，第62—63頁。

[[60]](#_60)《尚書古文疏證》（皇清經解續編本，1888年）卷6下，第30頁；岑仲勉：《隋唐史》（北京，1957年），第3—4頁。

[[61]](#_61)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臺北，1961—1963年）卷4，第896頁。

[[62]](#_62)《隋書》卷46，第1253頁。

[[63]](#_63)《隋書》卷28，第792—793頁；濱口重國：《論所謂隋的廢除鄉官》，《秦漢隋唐史研究》，第781頁。

[[64]](#_64)《北齊書》卷43，第576頁。

[[65]](#_65)《通典》卷14，第81頁。

[[66]](#_66)《隋書》卷42，第1200頁。

[[67]](#_67)《資治通鑒》卷175，第5448頁。

[[68]](#_68)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之研究》，第542—543頁。

[[69]](#_69)白樂日：《〈隋書〉中的食貨志》，第215頁。

[[70]](#_70)這些豁免在唐代仍繼續實行，見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劍橋，1970年），第26、146頁。

[[71]](#_71)《隋書》卷24，第681頁；白樂日：《〈隋書〉中的食貨志》，第154頁。數字有疑問，見白樂日著作第218頁。

[[72]](#_72)《隋史》卷24，第681頁；白樂日前引著作，第154—155頁。

[[73]](#_73)《通典》卷7，第42頁。

[[74]](#_74)菊池英夫：《 北朝軍制中的所謂鄉兵》，載《重松先生古稀紀念九州大學東洋史論叢》（福岡，1957年），第108—109頁；濱口重國：《西魏的二十四軍與儀同府》，載《秦漢隋唐史研究》（東京，1966年），第205頁。

[[75]](#_75)李繁（死于827年）：《鄴侯家傳》，引自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1975年），第16—20頁。

[[76]](#_76)見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上海，1962年），第34—37頁；濱口重國：《論西魏時期之恢復胡姓》，載《秦漢隋唐史研究》（東京，1966年）卷2，第737—759頁。

[[77]](#_77)濱口重國：《西魏的二十四軍與儀同府》，載《秦漢隋唐史研究》，第230頁；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第37頁。

[[78]](#_78)菊池英夫：《府兵制度之發展》，載《巖波講座世界歷史》（東京，1970年）卷5，第414頁。

[[79]](#_79)《隋書》卷24，第680頁。

[[80]](#_80)菊池英夫：《府兵制度之發展》，第416—417頁。

[[81]](#_81)山崎宏：《隋朝官僚的性質》，第44—58頁。

[[82]](#_82)《隋書》卷2，第34—35頁。

[[83]](#_83)菊池英夫：《府兵制度之發展》，第418頁。

[[84]](#_84)《隋書》卷25，第711—712頁；白樂日：《〈隋書〉中的刑法志》（萊登，1954年），第77頁。

[[85]](#_85)白樂日：《〈隋書〉中的刑法志》，第149頁。

[[86]](#_86)白樂日：《〈隋書〉中的刑法志》，第25頁。

[[87]](#_87)《隋書》卷76，第716頁；白樂日前引著作，第89頁。

[[88]](#_88)王夫之：《讀通鑒論》卷19，第2頁；收于《船山全集》卷10，第7991頁。

[[89]](#_89)《隋書》卷25，第717頁；白樂日前引著作，第92—93頁。

[[90]](#_90)李繁：《鄴侯家傳》，引自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第43頁。

[[91]](#_91)《隋書》卷84，第1865頁。

[[92]](#_92)同上書，第1866頁。

[[93]](#_93)勒內·格羅塞：《草原帝國》（巴黎，1948年），第135頁；又見諾亞米·沃爾福德之英譯本《新不倫瑞克》（新澤西州，1970年），第89頁。

[[94]](#_94)《隋書》卷82，第1833頁。

[[95]](#_95)喬治·馬斯佩羅：《占婆王國》（巴黎和布魯塞爾，1928年），第82—85頁。

[[96]](#_96)《資治通鑒》卷177，第5508頁。

[[97]](#_97)《資治通鑒》卷177，第5516頁。

[[98]](#_98)岑仲勉：《隋書求是》（北京，1958年），第134—332頁。

[[99]](#_99)《資治通鑒》卷177，第5530頁。

[[100]](#_100)塚本善隆：《隋對江南的征服與佛教》，載《佛教文化研究》，3（1953年），第1—24頁。

[[101]](#_101)張崑河：《隋運河考》，載《禹貢》，7（1937年），第201—211頁；白樂日：《〈隋書〉中的食貨志》，第159—161頁。

[[102]](#_102)《隋書》卷36，第1111—1113頁；芮沃壽：《隋煬帝的個性和定型的言行》，載芮沃壽編《儒家信仰》（斯坦福，1960年），第49—56頁。

[[103]](#_103)《國清百錄》卷2，載《大正新修大藏經》卷46，第807頁。

[[104]](#_104)《隋書》卷61，第1470頁。

[[105]](#_105)山崎宏：《煬帝之四道場》，載《東洋學報》，34（1952年），第22—35頁。

[[106]](#_106)哈羅德·拉斯韋爾：《心理學和政治學》（芝加哥，1930年），第50頁。

[[107]](#_107)白樂日：《〈隋書〉中的刑法志》，第162—163頁。

[[108]](#_108)《通典》卷14，第81頁。

[[109]](#_109)《資治通鑒》卷181，第5644頁。

[[110]](#_110)《隋書》卷61，第1470頁。

[[111]](#_111)《隋書》卷48，第1292頁。

[[112]](#_112)《隋書》卷56，第1391頁。

[[113]](#_113)《隋書》卷67，第1572頁。《隋書》卷41，第1188頁，證實了核心集團的構成。

[[114]](#_114)《資治通鑒》卷181，第5624頁。

[[115]](#_115)《隋書》卷67，第1572—1573頁。

[[116]](#_116)弗里茨·耶格爾：《裴矩的一生及其著作》，載《東亞雜志》，9（1920—1922年），第81—115、216—231頁。

[[117]](#_117)《資治通鑒》卷180，第5635頁。

[[118]](#_118)《資治通鑒》卷181，第5645頁。關于人口數字的解釋已有大量討論。見畢漢斯《公元2至742年中國的人口普查》，載《遠東古文物博物館》，19（1947年），第160—161頁；浦立本：《隋唐時期的人口登記》，載《東方經濟和社會史雜志》，4（1961年），第289—301頁。

[[119]](#_119)《隋書》卷25，第717頁；白樂日：《〈隋書〉中的刑法志》，第91頁。

[[120]](#_120)《隋書》卷8，第64—65頁。

[[121]](#_121)《隋書》卷75，第1707頁。

[[122]](#_122)《資治通鑒》卷182，第5694頁。

[[123]](#_123)楊聯陞：《中華帝國公共工程的經濟特征》，收于其匯編《中國學概覽》（1969年），第203—204頁。

[[124]](#_124)《資治通鑒》卷181，第5636頁。

[[125]](#_125)馬伯樂：《浙江考古隊的簡要報告》，載《法蘭西遠東學院學報》，14（1914年），第5頁。

[[126]](#_126)《隋書》卷24，第686—687頁；白樂日：《〈隋書〉中的食貨志》，第54—55頁。

[[127]](#_127)《隋書》卷81，第1825—1828頁；R.角田、I.C.古德里奇：《中國斷代史中的日本》（帕薩迪納，1951年），第28—36頁。

[[128]](#_128)《資治通鑒》卷181，第5641頁。

[[129]](#_129)《隋書》卷67，第1580頁；耶格爾：《裴矩的一生及其著作》，第97頁。

[[130]](#_130)約翰·賈米森：《三國史記和統一戰爭》，加利福尼亞大學未發表博士論文，1969年，第20—32頁：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77頁。

[[131]](#_131)《隋書》卷4，第79—81頁。

[[132]](#_132)賓板橋：《唐朝的建立：隋之滅亡和唐之興起》（巴爾的摩，1941年），第43頁。

[[133]](#_133)《隋書》卷4，第86頁。

[[134]](#_134)《隋書》卷4，第86—87頁；山崎宏：《隋之高句麗遠征與佛教》，載《史潮》，59（1953年），第1—10頁。

[[135]](#_135)賈米森：《三國史記和統一戰爭》，第32—34頁。

[[136]](#_136)《隋書》卷4，第88—89頁。

# 第三章 唐王朝的建立：唐高祖（618—626年在位）

隋朝末年義兵蜂起，公元617年隋軍中最強大的將軍之一唐公也起兵響應。唐公的軍隊進逼隋都，摧毀了它的防御，并奪取了京城。六個月以后，他在那里建立了后來幾乎延續三個世紀的新王朝，它與漢代并稱為中華帝國的兩個黃金時代。由于隋代在差不多30年前已經結束了中國分裂割據的局面，所以當李淵接著在全國建立穩固的中央政權的時候，他幸運地繼承了隋王朝這一份大家業。李淵新王朝的制度便是在前朝遺留下來的堅實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

和中國歷史上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王朝的大多數叛亂領袖一樣，李淵也不是一個平民，而是一個出身顯赫世家的貴族。他的先世可以確切無疑地上溯到他的祖父，即作為八柱國之一的李虎：八柱國是曾在6世紀50年代襄贊宇文泰建立北周國家時的主要將領。李氏家族在那個時候聚居在武川鎮，它是北魏的拓跋國家在長城塞內（今大同附近）的一個防戍據點，也是宇文泰的老家。李虎的祖先目前史學界尚未完全弄清。唐皇室自稱，李虎祖父是李熙，他的父親是李天賜，這兩個人都是北魏（386—585年）的著名軍事將領，因此李虎的家是出自西北著名的隴西李氏，即出自在5世紀初年統治過甘肅西部的西涼小王國的王族（西涼在420年被匈奴消滅）。西涼的創建者李昞原是漢代抗拒匈奴的名將李廣的后裔，也是當地著名的氏族之長，李廣的子孫在敦煌郡世代為郡守。西涼覆滅以后，它的末代國王之子李重耳逃往南部中國，后來就在拓跋氏北魏供職，當了刺史。李熙據說就是李重耳之子。

唐皇室自訂的家譜意在表明他們是出自漢代的名門，同時還是西北的望族。可是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唐代史書作為確切事實所提供的這個世系，其實只是一個精心的編造。據認為，李氏家族同西涼王室毫無關系，也同隴西望族李氏毫無關系，它不過是中國東部家族的一個小支派，即河北趙郡李氏：這個支派定居在拓跋氏北魏治下的西北，與非漢族的部落貴族實行廣泛的聯姻。據認為，從李虎先祖中的兩個人——李初古拔和李買得——的名字可以看出，這兩個人要不就是襲用了漢族的李氏姓，要不就是被賜姓李，而他們的名則依然故我，也許是鮮卑族的。[[1]](#_1_Jian_Chen_Yin_Ke___Tang_Dai_Z)

可是不管它的最初淵源何在，李氏家族在6世紀下半葉卻是極重要的一個貴族。在宇文泰創建北周的其他贊助者中，還有突厥望族成員獨孤信和隋文帝的父親楊忠：他們的家族間有著聯姻的關系。獨孤信有幾個女兒。大女兒嫁給了宇文泰之子，即北周的第一個皇帝明帝（557—561年在位）。他的七女兒嫁給了楊忠的兒子楊堅，即后來的隋文帝（581—604年在位）。他的四女兒嫁給了李虎的兒子李昞，這對夫妻在566年生下了李淵。[[2]](#_2_Guan_Yu_Gen_Ju_Jin_Nian_Lai_F)因此，李淵不僅是著名武人的后代，也不僅是統治中國西北部的漢—鮮卑—突厥貴族的混血兒，而且他通過他的母親又同北周及隋兩家皇室有著緊密的關系。

李氏家族還是最高品級的世襲貴族。李虎在北周之初的558年被封為唐公。他的兒子李昞承襲了爵位，后者在572年死后這爵位又傳給了六歲童子李淵。

隋王朝執掌政柄以后，李淵備受隋文帝的恩寵，而他與文獻皇后的近親關系又使他能官居高位。李淵于581年開始作文帝的侍衛——千牛備身，后來陸續做過畿輔地區或中國西北戰略要地的刺史或郡守。在煬帝時期，他仍然做著許多重要的郡的郡守。后來被召還京師，委以殿內少監和其他朝廷要職。

613年，李淵43歲的時候任衛尉少卿，負責京師的兵器和兵器庫，并且在煬帝的第二次遠征高麗時承擔監管向東北前線（今遼寧省）運送軍需之責。

也就在那一年稍晚些時候，即在三年零星不斷的騷亂和劫掠之后，不滿于政府的楊玄感（文帝的主要顧問楊素之子）起兵于河南北部之黎陽，從而爆發了反隋的第一次大叛亂。[[3]](#_3_Jian_Bu_Mu_Chao_Feng___Yang_X)

楊玄感本人好文，喜歡結納文學賓客之士。他也和李淵一樣，是隋帝國的社會精英人物，并且與皇室是遠親。他官至禮部尚書，而且在遠征高麗之初就受命在隋軍的主要供應基地黎陽督運軍需。楊玄感盡管出身于有特權的貴族門第，卻也沿襲了他父親同文帝及煬帝之間的猜忌和惡感，而且他也像當時和后世的人那樣深信，楊素是煬帝在606年授意毒死的。在討伐吐谷渾的那一次失敗的戰役中，他就曾被人勸阻不要參加609年的叛亂。這時他認為他身處群情鼎沸之地，而這種不滿情緒是611年黃河大水災的后果，也是609年征發民工修筑北段運河（永濟渠）引起的百姓的痛苦和煬帝遠征高麗之役從災區征調了大量農民的行動造成的。早在613年初期，今山東省黎陽之東就已連續爆發了農民暴動。楊玄感利用了人民對高麗之役的普遍反對和對煬帝本人的廣泛不滿，糾集叛軍向東都洛陽進發，并將它圍困起來。

隋煬帝被迫放棄對高麗的征討而集中兵力平叛，叛軍被優勢官軍迅速平服。楊玄感被俘虜并被殺害，他的家屬和隨從也無情地被殺戮殆盡。這次叛亂只延續了不足兩個月。

可是就在那一年，叛亂仍是此伏彼起，頻頻發生。不少于8起武裝起義的消息從各個不同地區傳來。李淵從東北被調往陜西治軍，以保衛通往京師的要道。在西北，一個名叫白榆妄的叛亂者引起了甘肅的騷亂，從而破壞了隋朝騎兵所仰賴的國家的馬匹放牧場地；另外，在613年和614年叛亂也在鄰近京師西面的扶風郡發生。這些小叛亂都很快被撲滅，但它們的殘余分子仍逍遙法外，而且隨著政權和秩序的進一步瓦解又爆發了許許多多或小或大的紛亂和叛亂（見地圖3）。

615年和616年李淵又接受了另一軍事要職，這一次是在河東（今山西省北部），他平定了當地許多股匪，而且勝利地抗拒了突厥人對邊境的侵犯。為了酬賞勛勞，煬帝于617年初提升李淵為太原留守（李淵自615年以來一直屯駐太原）。他的指揮部即設在晉陽。

這時，煬帝自己南下去他的行都——江都，他對北方大部分地區已失去有效的軍政控制。李淵的新任命不過是在事實上確認他在今天的山西省境內已經行使的軍事權力罷了。[[4]](#_4_Jian_Bin_Ban_Qiao___Tang_Zhao)但是，直到此時為止，李淵仍是隋王朝的忠心耿耿之臣和極有價值的支持者。

## 奪取政權的經過

在李淵接受新任命于晉陽的時候，由于隋煬帝的靡費無度，濫征徭役，以及屢興討伐高麗之師和防御突厥人卷土重來所造成的大量傷亡，天災人禍交困，引起了廣大人民和許多隋朝官吏的強烈不滿。群盜蜂起，叛亂很快遍及全國（見地圖4）。當不斷加劇的叛亂警報頻頻傳到太原府的時候，李淵的朋友和軍事顧問們紛紛認為隋朝統治已危如累卵，都勸他趁機起事，創建新王朝。

李淵幾乎處于一次領導有成功把握的叛亂的理想地位。他的家世和人望都無可挑剔：他是一個與皇室攀親的貴族，而且在他51歲之年已侍奉過隋朝兩代皇帝而達到他漫長而順心的宦途的頂峰。他是中國北部產生一個個王朝統治者的那個社會精英集團中的一個成員。作為太原留守，他有強大的軍事和戰術上的優勢地位，因為他所控制的這個地區在中國歷史上被認為實際上是堅不可摧的，可以很方便地從這里對長安（隋大興城）和洛陽這些傳統的政治中心發動進攻。

李淵還能夠贏得廣大民眾的歡心，這是因為約在614年有圖讖預言李氏當興，繼起為王，而且這說法在民間已家喻戶曉。至少李密所領導的另一支反隋叛亂便是受了這一預言的影響。李淵也知道有此民謠，因為它已在晉陽人民中間傳開。[[5]](#_5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8)

由于姓李，李淵自然也受到隋帝的猜疑。615年一位術士警告皇帝說，有一李姓者不久當為天子，因此隋煬帝在全國大殺姓李的人；這樣的清洗包括他的最高級將領在內，例如有權勢而門族強盛的李渾及其一族的32人便都被清洗；其他遠親被放到邊地。李淵也一定知道他在隋朝的位勢已岌岌可危，也知道隋王朝既然明顯地處于日薄西山的境地，他很有可能自建王朝，代之而興。

李淵那一代人對儒家的忠君思想中毒不深，儒家是禁止人們背叛前朝而改事新朝的。李淵和李淵的同時代人在思想上忠于社會秩序遠甚于忠于一家一姓的某一王朝。因此，在617年陰歷五月他動員了他太原府的軍隊，并開始向京師進發。

令人有點感到驚異的是，李淵在太原起事中的作用的程度和性質，只是到最近時期才有新發現。按照新、舊《唐書》和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傳統說法，李淵是一個碌碌無能之輩，而且暮氣沉沉，胸無大志。相反的，他的次子李世民（617年時年17歲）倒被說成一位高超的軍事領袖：有魄力，有進取心，英明天縱。因此，后來成為唐代第二位皇帝（唐太宗）的李世民在這些記載中就成了創建唐王朝的大功臣。

按照正史的傳統說法，617年李淵被任命為太原府留守時，李世民就已開始與劉文靜共謀反叛大計（劉文靜時為晉陽令，但因涉及與反叛者李密聯姻而被隋煬帝下令囚系獄中）。李世民會劉文靜于獄中，想發起一個運動以統一有不滿情緒的人民，進而一舉掃蕩已處于垂死狀態的隋王朝。當李淵第一次聽到這種想法時未十分在意；他畢竟與隋的帝室有姻親關系，何況又是王朝的主要捍衛者。但是，李世民賂囑晉陽宮監裴寂把煬帝的晉陽宮女弄來陪侍李淵，而沒有告知她們的身份，以此迫使他父親表態。當李淵得知他卷入了這一罪當處死的行為時不得不同意了他兒子的計劃，勉強地起兵發動叛亂。傳統的敘述還強調指出，在后來奪取隋朝都城的戰斗中，李世民在導致唐朝勝利的軍事戰略和領導才能方面，功勞都高人一等。

歷史學家近年經過對正史中所記關于此事的材料重新加以研究后，得出了新的結論：有些重要情況可能是在唐太宗統治時期因太宗本人的堅持而編造出來的。根據其他材料，特別是根據從前被忽視的唐代初年的史料《大唐創業起居注》，歷史學家已經能夠對唐朝創立史的傳統說法中的某些偏見和歪曲之處做出訂正。[[6]](#_6_Jian_Bin_Ban_Qiao___Wen_Da_Ya)

《大唐創業起居注》的作者溫大雅是太原府人，是唐王朝建立的目擊者。他的翔實記述著重指出，正是李淵本人策劃了太原叛亂，也正是他的英明統率使唐軍在奪取隋都的戰斗中取得了勝利。溫大雅筆下的李淵不同于傳統史書上的李淵；溫大雅的李淵是一位勇敢的領袖、剛烈的對手和足智多謀的戰略家。根據《起居注》的說法，十幾歲的李世民不僅在叛亂事件中只起到次要作用，甚至他在王朝建立中的貢獻也并不多于他的長兄，即后來成為太子的李建成。溫大雅的《起居注》告訴我們，甚至在617年年中太原起事之前，李淵已開始圖謀不軌。另外，激起李淵雄心的事件也是一清二楚的。最早發生在616年的一件事是當時李淵受命剿捕太原地區的盜匪。太原這個地方在傳統上又與傳說中的圣君唐堯聯系在一起，因為傳說堯曾在一個名之為唐的地方住過。唐還是李淵作為國公的封地，雖然像諸如此類的爵位那樣，國公的爵位也無統治領土的實權。當唐公李淵接受新任命時，他認為他的爵銜與職務的巧合簡直是天降吉祥。[[7]](#_7_Wen_Da_Ya____Da_Tang_Chuang_Y)第二年他當了太原府留守時，李淵對李世民說：“唐固吾國，太原即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為天與。與而不取，禍將斯及。”[[8]](#_8___Qi_Ju_Zhu____Juan_1_Di_3Ye)《起居注》還提到民謠《桃李章》及該民謠關于下一個中國統治者將姓李的預言對李淵的影響，因為《起居注》引用李淵的話說：“吾當一舉千里，以符冥讖！”[[9]](#_9_Tong_Shang_Shu__Di_15Ye)

617年陰歷五月初，李淵傳諭給在山西南部供職的長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叫他們就地再招募軍隊，同時命令次子李世民和劉文靜等人也在太原招兵買馬。他們在十天之內招募了幾乎一萬人，屯駐在晉陽的興國寺。

李淵一不做二不休，決定清洗他班子中的不穩定分子。當李淵被任命為太原府留守時，隋煬帝給他指派了兩個副手——王威和高君雅——來協助他，這無疑是為了監視他。李淵曾經利用他們暫時離開太原的時機而為自己征募了兵馬，但他認為他們會馬上對他的招兵買馬起疑而向隋帝報告。因此，他把建成和元吉召到太原來以后，在5 月15日借口兩個副手潛引突厥人入寇太原地區而逮捕和殺害了他們。[[10]](#_10_Zheng_Shi_He___Zi_Zhi_Tong_J)

可是，在李淵能夠放心地發動戰斗以前，他必須對付東突厥人——這是在戈壁南北居住的一個極為強大的部落聯盟，此時橫行于中亞并控制著從遼寧到蒙古的長城以北的地區。在隋朝末年，東突厥是亞洲北部睥睨一切的勢力，自從613年以來，中國西北部出現的許多叛亂者都向突厥稱臣，以取得突厥人的支持。東突厥的始畢可汗則分別給這些叛亂者封以皇帝或可汗的稱號。他也給叛亂者供應士卒、武器和馬匹，希望從隋朝的覆亡中謀取利益。[[11]](#_11_Xia_Mian_Lue_Ju_Ji_Wei_De_Da) 615年后期，當隋煬帝定期巡狩長城的時候，東突厥人在山西的邊疆城市雁門圍困煬帝達一個月之久，[[12]](#_12_Gen_Ju_Zheng_Shi__Zhe_Shi_Yo)而且不久前還幾次入侵山西和太原地區。617年，他們又加強了壓力，這次是與劉武周勾結在一起；劉武周在617年初已在山西北部自己稱帝，并已被突厥領袖封為可汗。當李淵逮捕他的兩位副將時，突厥在撤退之前曾進抵晉陽城下。

很明顯，李淵在能率領叛軍前進以前，他必須先解除東突厥人及其盟友進攻他的后顧之憂。他因此寫信給始畢可汗，偽稱他之起兵意在恢復帝國的秩序，使能重建中國人和突厥人之間的友好關系。他說，這樣做會對各方面都有利。他與可汗達成了協議，即如果他贊助唐兵義舉，始畢可汗可取得全部為唐戰斗的戰利品。這個協定是由劉文靜出面談判的。[[13]](#_13_Jian_Bin_Ban_Qiao___Tang_Zha)

李淵力排眾顧問的意見，用了下對上行文的“啟”字，辭氣甚恭；這表示，他和其余某些叛亂一樣，可能已決定在名義上成為突厥人的藩屬。但是，當始畢可汗要求李淵拒絕效忠煬帝而應自己稱帝時，李淵卻予以謝絕。相反的，他告知可汗，他準備擁立煬帝之孫代王楊侑為帝（楊侑當時已在隋都）。不管李淵之向東突厥人稱臣是真是假，雙方確是建立了某種友好關系，因為在他離開太原的前夕，始畢可汗贈送了1000匹馬，后來又給了他幾百名士卒和另外數千匹馬。

一處理完東突厥人的問題，李淵就建立了他的軍事戰斗組織——大將軍府。他的成員絕大多數是太原附近隋朝的文武官員。李淵的大部分軍將在開始時都是因為這些官員的支持才得以征集并得到供應，因為他們原來都是隋朝鷹揚府的軍官，現在只不過把他們的士卒轉手交給李淵指揮。[[14]](#_14_Jian_Bu_Mu_Chao_Feng___Li_Yu)晉陽宮監裴寂也以隋宮倉儲中的大量糧秣、武器和甲冑供應唐軍。

617年陰歷七月初，李淵和他的兩子世民與建成率軍3萬從太原出發，而命另一子元吉留守太原。他們的目標是隋大興城；此地是一個古都，并且是陜西南部關中地區的戰略要地。

唐兵遇到隋軍的強烈抵抗，并且在通向潼關要塞的汾河流域途中被夏季的大雨所阻，李淵下令他的軍隊暫停前進。[[15]](#_15_Gen_Ju_Wen_Da_Ya_De___Qi_Ju)他現在接到了河南洛陽附近一位叛亂領袖李密的書信，[[16]](#_16_Li_Mi_De_Chuan_Ji__Jian___Ji)要求二李結成同盟。李密出身西北貴族，原是隋朝的一低級官員，現為李淵的強勁對手之一。他早年原為楊素的門生，613年離開隋都后參加了楊素之子楊玄感的叛亂。他在楊玄感戰敗以后逃走，煬帝撤往南都后，從616年起他成了在洛陽周圍地區的諸叛亂集團聯盟的領袖。當他建議與李淵結盟的時候，他已經控制了河南的大部和河北的南部。

李淵擔心的是，如果李密知道了他的計劃，他會阻止他向大興城進軍。他因此寫了一封卑辭和違心騙人的書信，說他是隋朝的忠義臣民，他之所以起兵只是為了重新建立秩序，并矢口否認他有比做唐國公更大的野心。與此同時，他還假勸李密自己努力取天下，他說：“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司牧，非子而誰！”李密被這封信吹捧得昏昏然，因此應允李淵向隋都進發而不加阻攔，但這個決定使李密后來為之追悔莫及。[[17]](#_1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

617年約陰歷八月中旬大雨已停，唐兵在突厥可汗送來的2000馬匹和500軍士的援助下，迅速打破了隋軍在霍邑的抵抗，并繼續向南推進。[[18]](#_18___Qi_Ju_Zhu____Juan_2_Di_13)陰歷九月，唐軍抵達黃河，他們留了一部分人馬圍住扼守從山西和汾水通往陜南平原這一要道的隋兵據點蒲州，其余兵馬則跨河而進。當他們渡河的時候，他們遇到了大隊隋軍，即予以擊潰。這時潼關以內的重鎮華州的州官投奔李淵，他把永豐倉獻給了唐軍，至此，通往大興城的道路已被打通。

當李淵進入京畿地區的時候，又有由李淵之女李氏（柴紹之妻，后為平陽公主）和他從父弟李神通在京師周圍招募幾千名士兵前來投靠。他的女兒已經糾集了一支大軍，她用的辦法是在大興城附近散財，以收買從其他更加動亂的地區逃來的民眾的心，另一辦法是與京畿地區的群盜和叛亂者結盟。陰歷十月，聯合起來的唐軍號稱擁眾20余萬，在大興城外扎下了營寨。[[19]](#_19___Qi_Ju_Zhu____Juan_2_Di_25Y)

圍困了首都以后，李淵精心部署了最后的攻擊。當最后攻擊約于五個星期以后發動之時，居民開始有挨餓之虞。617年陰歷十一月初九，李建成的部下雷永吉的部隊攻破城墻，奪取了城市。[[20]](#_20___Qi_Ju_Zhu____Juan_2_Di_27Y)李淵曾嚴令保護隋朝皇室的安全。然后按照原來的計劃行事，煬帝的年幼的孫子楊侑被立為傀儡皇帝（稱隋恭帝），雖然唐兵的將軍們都要擁立李淵自己為帝。早已逃往南都——即長江岸上的江都——的隋煬帝則背上了一個太上皇的虛銜。

次年初，李淵又對東都洛陽大舉進攻。[[21]](#_21_Jian_Bu_Mu_Chao_Feng___Sui_T) 618年陰歷五月二十日，即他下令逮捕兩名副將和太原順利起兵一周年之際，李淵廢黜了隋朝傀儡幼帝，自己登極成了新朝的開創之主。李淵——以后我們即按他的謚號稱之為唐高祖——按其世襲封號而改國號為唐。依照歷來習慣，他選自己的年號為武德。雖然唐高祖也建都于大興城，但他易名為長安，此又為漢代及以后南北朝時期許多位于附近的王朝的古都名稱。高祖的長子李建成被立為太子；次子李世民被封為秦王；元吉封齊王。

## 唐王朝對全國控制的擴展

此時，唐王朝已占據了隋都城、陜西（關中）和山西（河東）的部分地區。但是，它依然是許許多多地方政權中的一個政權而已。它也不是唯一稱帝的政權。在隋末唐初有兩百多個叛亂組織互相打來打去，不過其中只有十支人馬有可能建立穩固的政權和問鼎中原。其余叛亂者不過占據小城鎮，俟機投靠可能的勝利者，只想至少撈取一些地方權勢。許多地方仍然受制于隋朝的文武官吏，這些人或仍然忠于煬帝，或只是想保持他們的地方勢力。在另外一些地方，當地紳士階層也起兵反對盜匪和內戰，他們準備隨時支持那些能給該地區帶來和平穩定的人。唐高祖的任務是一方面盡量取得這些小叛亂者、隋朝官員和紳士領袖人物的支持，一方面就是摧毀他的主要對手們的力量。他達到第一個目的的辦法是，他精明地既搞大赦，又搞封官許愿，又搞特賞；而為了達到后一個目的，他則不斷擴充自己的兵力，精心地予以部署。

總的說來，唐朝的綏靖工作實施得相當克制。那些率部帶著領土投降的人以及許多在戰場上被打敗的人，都被給予特赦。甚至有些叛亂領袖已被處決，但其隨從一般都給予寬大處理。戰敗的軍隊被吸收進唐軍，而重要叛亂領袖的軍隊也往往在原來軍官的帶領下原建制地參加唐軍。[[22]](#_22_Li_Ru_Ke_Jian___Qi_Ju_Zhu)這就無疑地使得叛亂領袖們甘愿轉而效忠唐王朝。隋朝地方官吏大多除授原官，而某些地方性的盜匪或叛亂領袖的事實上的權力又常常因被任命為唐朝的刺史而被合法化了。[[23]](#_23_Li_Ru_Ke_Jian___Jiu_Tang_Shu)由此可見，唐高祖力圖獲致原來叛亂領袖的忠誠，同時又使地方行政有一定的延續性，使法律和秩序得以維系而不墜。

除了委以地方官職之外，唐朝皇帝還給效忠者以其他刺激。每次戰斗結束之后他都很細心地犒賞他的軍隊。[[24]](#_24___Qi_Ju_Zhu____Juan_2_Di_15)他也對投降的叛亂分子大加賞賜，并且常常封以爵銜。他對某些重要的叛亂領袖甚至賜以李姓，由此給予這些人以很高的榮譽，使他們在朝班中位居前列。[[25]](#_25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尤其重要的是，一旦從前的敵手參加了唐朝的政府，唐高祖就明確地顯示了他用人不疑的寬大胸懷。之所以有大量的人向唐王朝投降，其原因不僅在于唐王朝擁有壓倒優勢的軍事力量，而且也在于唐高祖給自己樹立了一個寬容、大度和值得信賴的統治者的形象：他只想寬恕別人和忘記一切，以求恢復中華帝國的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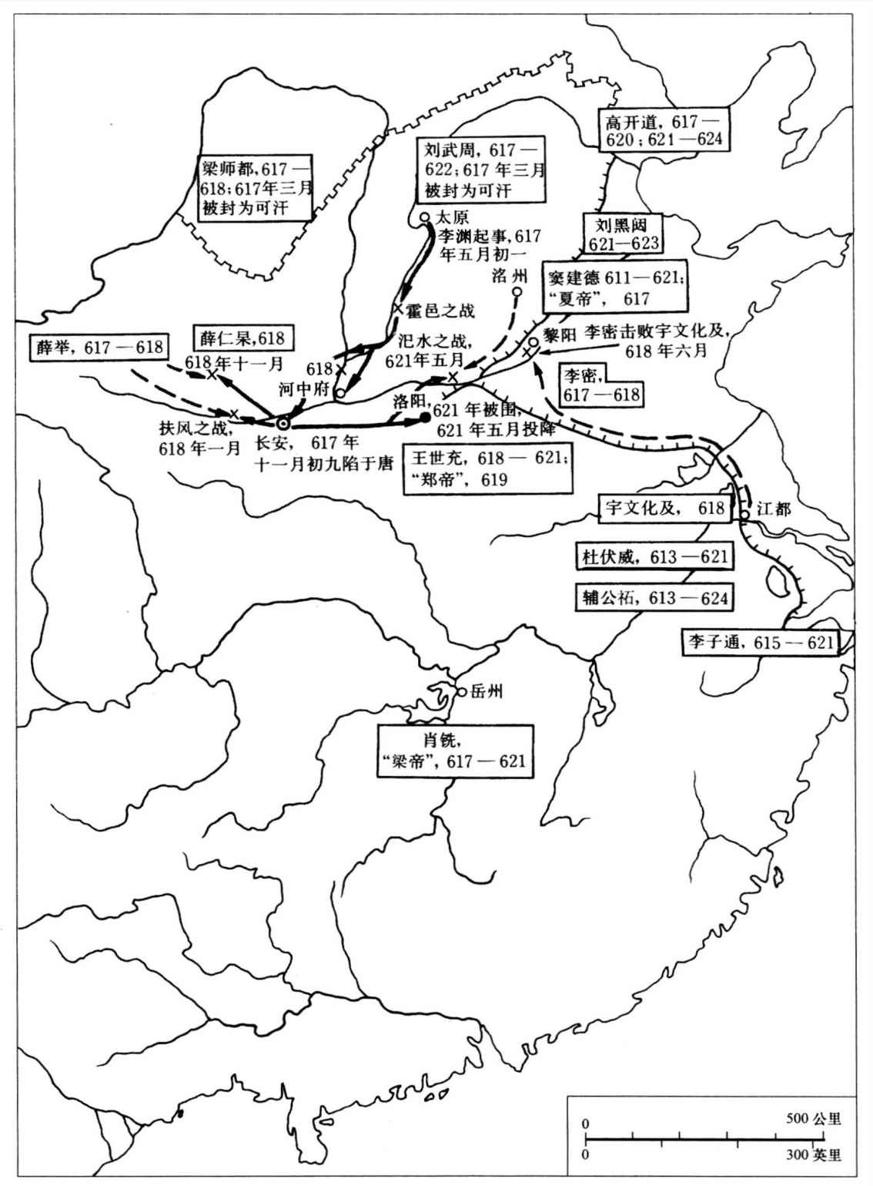
617年后期緊接著奪取大興城之后，唐王朝立即開始了征服中國其余部分的軍事活動。戰斗一直延續了十多年，但主要的抗拒力量已于624年初期被制服。奉命外出討伐叛亂的唐軍稱為行軍。他們不是常備軍，而是視情況需要而特設的軍隊。建立這種部隊的辦法是：在地方或地區兩級的老百姓中征兵；另外也吸收打敗了的敵軍部隊；后來還動員唐王朝的民兵部隊。

唐王朝在長安建立政權的時候，國內的主要敵對勢力有如下幾股。在京畿西北，位于唐王朝根據地能夠隨時予以打擊的距離以內的是甘肅叛亂者薛舉[[26]](#_26_Chuan_Ji_Jian___Jiu_Tang_Shu)（617—618年）的勢力。在長安以北，位于鄂爾多斯邊境上的是突厥的藩臣梁師都[[27]](#_27_Chuan_Ji_Jian___Jiu_Tang_Shu)（617—628年）。在山西北部的為劉武周[[28]](#_28_Chuan_Ji_Jian___Jiu_Tang_Shu)（617—622年），他被始畢可汗贈以可汗之封號并已自己稱帝。高開道[[29]](#_29_Chuan_Ji_Jian___Jiu_Tang_Shu)（617—620年和621—624年）控制今北京地區，自稱為燕王。河北的中部和南部在竇建德[[30]](#_30_Chuan_Ji_Jian___Jiu_Tang_Shu)（611—621年）手中，他于617年建國稱為夏，自己稱帝。魏公李密（617—618年）原追隨楊玄感，已如上述，他控制了河北南部和洛陽以東的河南地帶。洛陽本身則被隋軍將領王世充[[31]](#_31_Chuan_Ji_Jian___Bei_Shi____J)所占據，他是618年陰歷五月后以一個隋朝傀儡皇帝的名義實行統治的。618年初煬帝被弒以后，揚州周圍和淮河及長江流域的隋王朝殘余部分被弒君者宇文化及[[32]](#_32_Chuan_Ji_Jian___Bei_Shi____J)所控制，他也是以隋王朝的另一名傀儡皇帝的名義進行統治的。江蘇和浙江沿海是李子通[[33]](#_33_Chuan_Ji_Jian___Jiu_Tang_Shu)（615—621年）的地盤，南京地區長江流域則建立了杜伏威[[34]](#_34_Chuan_Ji_Jian___Jiu_Tang_Shu)（613—621年）和輔公祏[[35]](#_35_Chuan_Ji_Jian___Jiu_Tang_Shu)（613—624年）政權。南方政權中最富強的政權是自稱梁帝的蕭銑[[36]](#_36_Chuan_Ji_Jian___Jiu_Tang_Shu)（617—621年），他控制了整個長江中游和大部分南部中國。上述每一位領袖都采取了某種措施以穩固地控制一個相當大的地區，并且擁有相當數量的軍隊。

最初對唐王朝的軍事挑戰來自西北的叛亂者薛舉，他從617年年中以來控制著大部分甘肅地區，并且自己稱了皇帝。他曾經想自己奪取京師，但受到了這一年被突厥人支持的另一叛亂的牽制。當唐軍奪取隋都的時候，他的軍隊已進抵渭水，并且占領了附近的扶風，此地原為早期爆發兩次反隋叛亂的地方。618年初，李世民奉命率軍趕走了盤踞扶風的薛舉軍。他輕而易舉地打敗了由薛舉之子薛仁果統率的軍隊，把他們往西趕到了甘肅邊境，但李世民馬上回師首都，沒有乘勝追擊。薛舉于是計劃與突厥軍及另一叛亂分子梁師都（他的根據地在陜西北部鄂爾多斯沙漠的邊境地帶）結成聯盟，準備向大興城進發，但是唐高祖用賄賂突厥領袖莫賀咄（他后來以頡利可汗著稱）的辦法挫敗了這個計劃。這一年的晚些時候，薛舉又單獨從西北向長安推進，他重創了派來抵抗他的劉文靜的唐軍以后，又去奪取首都。對唐軍來說很幸運的是，薛舉在618年陰歷八月計劃發動攻勢的前夕突然病故。其子薛仁杲繼續其事業，但薛仁果同他父親的那些老臣宿將的關系鬧得很緊張，因而叛軍內部士氣低落。他從長安地區撤退，以鞏固他在西部地區的地位。618年的陰歷十一月，李世民包圍了薛仁杲的位于京師西北甘肅邊境的涇州營寨。戰敗后，薛仁杲的許多軍官帶著士卒投奔唐軍，他也不得不迅即投降李世民。他被解往長安處決。唐王朝在西邊的主要威脅已被解除。次年，甘肅的另一叛亂首領李軌[[37]](#_37_Chuan_Ji_Jian___Jiu_Tang_Shu)也被俘，這就最終鞏固了唐王朝對西北地區的控制。

可是，東北平原——即河北—河南地區——的軍事形勢卻是最后決定唐王朝究竟成為一個地方政權，還是能夠統一全國的因素。唐王朝還只控制了甘肅、陜西及大部分山西地方：它擁有隋帝國的政治上和戰略上很重要的西北地帶，但其人口還不足隋代的四分之一。在隋代，大平原上的河北和河南是中國最富庶之地，它們養活了中國全部人口的半數以上。與此同時，淮河流域和華中的長江流域變成越來越重要的糧食產地，而運河的興建則把這些地區和京師連接了起來。沿著運河航線，在河南和河北南部建造了幾個大糧倉，以貯存糧食和備轉口運輸之用。它們都是早期幾次叛亂攻擊的目標。對于一個想重新統一全國的王朝來說，牢牢地控制富庶的東部平原是絕對不可少的。唐高祖的最強大的四大對手——即李密、王世充、宇文化及和竇建德——占據了這個地區的關鍵地帶。

隋朝將領王世充于617年年中被煬帝派來防守他的東都洛陽。當煬帝于618年初期被他的將軍宇文化及刺殺于江都的消息在這一年陰歷五月到達洛陽時，王世充擁立煬帝的另一幼孫楊侗繼位為隋朝傀儡皇帝，和李淵所立的傀儡皇帝一樣，也稱為恭帝（已見上述）。雖然叛亂者李密經過長期努力而仍然未能奪取洛陽，但他控制了洛陽周圍的許多地方，包括重要基地黎陽在內，而且還繼續威脅著洛陽本身。當在南方擁立另一位隋朝王子為傀儡皇帝的宇文化及率軍從江都北上向位于河南北部的李密的主要基地黎陽城進發時，王世充用計想使他們兩敗俱傷，自己坐收漁人之利。王世充的洛陽政府寬恕了李密，作為回報，李密應與王世充共同反對刺殺煬帝的人。李密必須保衛他的黎陽基地，同時他還相信，他能很好地利用這一緩和的關系，最后除掉王世充并控制整個河南—河北平原。因此，他接受了特赦，經過在洛陽的一段時間的調解以后，他率軍對軾君者打了幾次勝仗，摧毀了后者的大部分軍隊，并且強迫他向北撤退到大明府。



地圖5 唐之武功

王世充因而越來越關心李密日益增長的勢力；可是李密受他的主使而得到從寬處理，在洛陽又獲致高官，并且對宇文化及連打了幾次勝仗。618年陰歷七月，他借口據報有人陰謀反對他，在洛陽發動了一次先發制人的突擊，清除了他的政敵，把李密拒之城外。雖然李密曾經擊退宇文化及，并迫使他從黎陽地區撤退到河北南部，但正如王世充所希望的那樣，他的兵力在戰斗中消耗過多。王世充在這時很細心地在洛陽集結了軍隊，他抓住時機猛烈地向李密已經削弱的軍隊發動了攻擊。根據一項記載，王世充有一個士兵酷似李密；王世充命將這士兵綁起來，在戰斗高潮中他把這士兵展示于李密軍前，李軍便潰不成軍。李密既已徹底戰敗，此時只得逃往長安托庇于唐王朝了。唐高祖在618年陰歷十月接受了李密及所率殘部的投降。[[38]](#_3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

王世充戰勝李密之后，得意洋洋，野心勃勃。他現在已完全控制洛陽，于是便任命了一批高級官員，其中包括隋朝大臣蘇威。619年陰歷四月，他廢除了傀儡隋恭帝，自己取而代之，改國號為鄭，并且建年號。最初，王世充因在戰場獲勝而得以實際上主宰河南全境，但后來由于他自己殘暴的統治和唐軍的壓力不斷加大而引起的內部紛爭，他不斷失利。621年初，他被迫退至洛陽城下，李世民圍城，并迅速使城中陷于斷糧之境。王世充認識到事態的嚴重，他這時想同他的叛亂伙伴竇建德結成聯盟。

竇建德是最早起兵反隋的叛亂者之一，他是在611年拿起武器的。到了這時，他勝利地占有了河北北部和山東的廣大地帶，并于617年在這里自稱夏王，建都于河北南部的洺州。他的政權因秩序良好，他本人又因禮賢下士和生活簡樸而被人稱道。619年初，他俘獲并斬殺了刺殺隋煬帝的宇文化及——此人曾先逃離李密，后來又從唐軍手中逃脫。這一年稍晚些時候，竇建德驅軍過河北西南部，打敗了唐高祖之從弟李神通所領的唐軍，并占領了原屬李密的強大據點和位于河南北部的黎陽倉。他曾受到王世充的攻擊，因為王世充認為他之占領黎陽是對自己領土的威脅，但是，他們雙方又感到有暫時聯合起來的必要。竇建德認識到，唐王朝如果攻取了洛陽，會使它在東北平原上獲致重大的軍事優勢，從而會危及他自己的生存。他因此同意帶領一支部隊去救援這座被圍困的城市。

李世民的策略是先攻較強大、但因長途行軍而疲憊不堪的竇建德，在打敗了竇建德之后再去對付王世充。621年陰歷五月，李世民大勝竇建德軍；竇建德本人負傷，并在戰斗中被俘。當竇建德于四天后被押到洛陽城下時，王世充已別無他路可走，只有投降唐軍。這一次違反了唐高祖一般寬待被俘對手的政策，竇建德在解往長安后被斬首，王世充則在放逐的途中被殺。

歸根到底，唐高祖在爭奪東北平原的斗爭中比他的敵手們占有很大的優勢。山西和陜西是很可以閉關自守而在軍事上比較安全的地區，他在這里能夠保存實力，蓄積資源，靜待對手力量的耗竭。反之，河北河南地區的叛亂者所處之地無天然防線，并且處于持續不斷的軍事壓力之下，這種軍事壓力來自互相征討，也來自日益強大的唐軍對他們的進攻。他們被迫將很多力量用于防御。甚至要在幾條戰線上分散兵力。結果，他們不能彼此發動有效的攻勢，特別是對唐軍不能發動這種攻勢。

攻占洛陽和東北平原的結果使國內的力量對比最后變為有利于唐高祖，因為他清除了他的最強大和最有組織的幾位敵手。但是，強大的叛亂軍隊無論在北方還是在南方都還在活動，而且時不時地有反對唐朝新政權的新集團參加他們的行列。在作為唐王朝老營的山西北部，劉武周建立了一個叛亂政權，它在622年以前一直困擾著太原府地區，并一再以突厥人為后援，入侵太原地方。

但是，對唐朝政權構成最嚴重的新挑戰的卻是在東部平原崛起的力量。竇建德的黨羽由于害怕遭到他們原來領袖同樣的命運，他們在621年后期在河北發動叛亂，其領袖是竇建德原來的一個將領劉黑闥。這次叛亂在623年初被平息，但這只是在劉黑闥重新從唐軍手中奪回了東北平原大片土地以后的事。[[39]](#_39_Chuan_Ji_Jian___Jiu_Tang_Shu)甚至在這一叛亂被鎮壓下去以后，河北北部也依然在另一叛亂分子高開道的控制之下：此人一度于620年降唐，次年又叛亂，最后于624年才被除掉，被他的一個軍官所殺。

不管怎樣，全帝國還是逐步地落入了唐王朝的永久統治之下。621年后期，前梁朝的皇室成員和自立為梁帝的蕭銑（他自617年起即控制了湖北的大部分、湖南、江西和廣東，因此是中國南部最強大的統治者），在長江中游他的首都岳州投降了唐軍。[[40]](#_4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緊接著，擁有浙江和江蘇南部廣大地域的李子通降唐；他是被另一準備降唐的叛亂分子杜伏威打敗才投降的。622年，占有山西北部的劉武周被他原來的庇護人——東突厥人——所殺。隨著高開道之死于河北和輔公祏的建康政權在624年的最后被蕩平，對唐政權的大規模抵抗已不復存在。唐高祖于是宣布正式大赦天下，并為他的統一而安定的帝國頒布了新律令。[[41]](#_41_Quan_Wen_Jian___Ce_Fu_Yuan_G)

## 對內政策

唐王朝的開國皇帝有時被形容成一個平庸之君和一個勉為其難的政務家，把他說成很喜歡畋獵游樂，而不屑做令人厭煩的日常行政工作的人。像他那個階層的大多數人一樣，唐高祖精于騎射，當然就喜歡狩獵，過著活動量大的生活。他也被他朝廷中清教徒式的儒家人物們批評，說他極盡聲色之好。作為皇帝，他有時確實以個人愛好和憎惡來任免官職。有一次，他因賞給他的寵幸一個官職而使朝廷群情嘩然。[[42]](#_42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

后來的批評家們批評他對人偏私不公，批評他易聽朝中的閑言碎語或者后宮的婦人之言。他確實愛發脾氣，有時過于專斷并急于下令施罰。例如619年，他懷疑他太原時期最早的支持者劉文靜有謀反嫌疑，就立即將他處死。[[43]](#_43___Jiu_Tang_Shu____Juan_57_Di)

可是，他的這些性格特點不會使他的灼然可指和給人印象深刻的成就黠然失色，因為他重建了一個強大和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并且國運綿延幾乎達3個世紀之久。唐王朝在高祖治下勝利地建成了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制度：它們不僅成了唐代的標志，在許多方面繼續深深地影響了直至20世紀的中國的文明，并且還為受中國深刻影響的東亞新興諸國——日本、朝鮮和越南——提供了基本制度的樣板。

### 中央政府和官僚體制的形成

唐高祖在戰火紛飛的內戰中要重建一個能行之有效的中央政府，必然會遇到很大的困難。例如，在617年唐軍攻克隋都的時候，紙張極為緊缺，官吏們只得利用以前隋朝和北周的文卷的反面來書寫。[[44]](#_44___Tang_Hui_Yao____Juan_56_Di)隋朝的國庫和倉儲本來就幾乎空無所有，后來又由于唐高祖喜歡大賞他的支持者而弄得更加空虛。在最初，很難吸引適當的人選來政府供職，這一跡象表明，許多人懷疑唐軍能撐持多久，所以寧可等到內戰形勢更明朗的時候。但是當唐王朝逐步擴大的領土統治權顯示了它的軍事力量，恢復了它的財政地位并漸漸獲得民眾信任的時候，這些困難就逐漸被克服了。

唐朝中央政府的基本結構承襲了隋代所用的三省制度。這個制度包括門下省和作為決策及顧問機構的內書省（后來改名中書省）以及作為主要執行機構的尚書省。隋朝覆滅以后，這三省的組織形式尚未達到后來那樣精確分明的程度，它所屬的各官署的職權常常是重床疊屋，或者未予嚴格劃分。在高祖統治的初期，這個體制帶來了越來越多的麻煩，導致了行政混亂，高祖有時得親自頒布詔令，而不是經過正常的官署渠道辦理和發布。可是，三省制度逐步被合理化，在唐太宗中葉，每一省的職能都得到明確的分工：中書省知制誥；門下省有封駁之權；尚書省及其六部則負責施行。[[45]](#_45_Jian_Sun_Guo_Dong___Tang_Dai)

唐高祖時代的中央文官體制比起唐代后來的規模來說是很小的，它在最高層相對地說也是不拘禮儀的，這反映了皇帝本人及其所任命的官吏之間出身大致相仿。因為高祖在建立新朝代的過程中還感到把握不大，因此他任命的行政班子都是最信得過的人：他的密友；太原起事和攻占隋都中的他的老臣宿衛；他的親朋故舊。高祖的12名宰相中，不少于八人都同隋室或唐室有姻親關系。[[46]](#_46_Jian_Zhu_Shan_Zhi_San_Lang)高祖的很多最高層文武官員都是他的太原軍事幕僚中的舊部。[[47]](#_47_Jian_Bu_Mu_Chao_Feng___Tang)事實上，唐高祖的中央高級官員不外乎由下列三種人組成：他們作為隋朝的官吏，有老經驗；或者是北周、北齊或隋代官吏的子孫；或者是以前各朝代皇室的后裔。因此，唐王朝的秉政對以前各朝各代的統治精英集團沒有形成重大的挑戰，更不能說它是一次社會革命。[[48]](#_48_Jian_Bu_Mu_Chao_Feng___Tang)

唐高祖的朝政被很少數高級顧問所把持，其中大多數人的出身與唐王朝創建者相同，并且在他的叛亂初期諸階段和他有牽連。毋庸置疑，他的朝臣中最有權勢的人物是裴寂（569—628年）。[[49]](#_49_Chuan_Ji_Jian___Jiu_Tang_Shu)裴寂原為前朝一個刺史的兒子，幼孤，由其兄撫養長大。他在隋煬帝手下任過許多職務，最后做了晉陽宮副監，唐高祖便是在這里起事的。裴寂在唐王朝建立的最初階段中提供了寶貴的幫助，他所得的酬勞也甚為可觀。高祖登基以后，他被任命為右仆射、知政事；終高祖統治之世未嘗去職。但他沒有什么將才，在綏靖戰爭中經常吃大敗仗。[[50]](#_50_Jian___Zi_Zhi_Tong_Jian____J)但是，高祖厚待裴寂，視之為個人至交，經常給予各種賞賜，甚至在視朝時引與同坐。這種個人關系又因高祖之第六子納裴寂之女而更加牢固。

朝中另一位大權勢人物是蕭瑀（575—648年）。[[51]](#_51_Chuan_Ji_Jian___Jiu_Tang_Shu)他是后梁明帝之子、隋煬帝皇后之弟，在隋代歷任很多官職，隋煬帝當太子時授太子右千牛之職。隋朝末年，他任職于西北諸州鎮，曾在此地抗擊過甘肅叛亂者薛舉。高祖攻取隋都以后，蕭瑀納土來降，被酬以殊勛。從618—623年，他先是內書令，而后又與裴寂同為尚書省仆射。蕭瑀是一個忠心耿耿的行政官員，對同僚持嚴厲批評態度，總是苛求于人，被許多朝臣所厭惡和憚服。但是，唐高祖很重視他，重用他，讓他和裴寂一起制定了于624年頒布的行政法。

第三位大臣是命運不濟的劉文靜（568—619年），[[52]](#_52_Chuan_Ji_Jian___Jiu_Tang_Shu)他在高祖治下或許有同樣顯著的功業。他是太原起事的堅決支持者和定策人之一，在唐高祖第一次組織政府時，任門下省納言（侍中）和宰相。可是，在618—619年的多次綏靖戰役中，劉文靜證明善于帶兵，結果他和裴寂之間產生了個人恩怨。唐高祖認為這是對他的政權的不忠，于是采納了裴寂之言，即應該把他作為對唐王朝潛在的危險而清除掉。劉文靜在619年陰歷九月被處決，這一事件幾乎從最初起就引起所有歷史學家對高祖的批評，認為他偏聽偏信了不實之詞，對恩信諸臣沒有一碗水端平。

陳叔達（635年卒）[[53]](#_53_Chuan_Ji_Jian___Chen_Shu)本是南朝陳宣帝（569—582年在位）之第十六子，在隋煬帝時曾任門下省給事中，后被外放。在唐軍進攻隋都時他參加了唐軍，成為唐高祖的幕賓。從619—626年，他又歷任門下省納言和宰相之職；雖然對他的政治作用不太清楚，但顯然這是高祖推行政策用心良苦的一個例子，即他要在最高層職位上盡量容納各主要地區的代表性人物。陳叔達似乎廣為庇護了愿意投效唐朝政府的南方文學之士。

隋室成員楊恭仁[[54]](#_54_Chuan_Ji_Jian___Jiu_Tang_Shu)曾率領隋軍鎮壓過楊玄感叛亂。他是一位誠實正直的官吏，與煬帝朝中大臣不合，因而被派往河南去鎮壓盜匪。他被打敗，便逃往江都，接受了弒君者宇文化及的任命。楊恭仁在河北作戰時被一交戰的叛亂領袖逮住，后者把他送往長安以示投效之意。唐高祖對他非常好，封他為公，從619—623年任他為納言，此后三年又做了內書令。因此，他從619—626年是當然的宰相。他在朝中以行乎中庸見稱，是一位秉性溫厚、不貪財賄、一絲不茍的人物。更重要的是，他體現了隋政權的延續性。這一點因下面的事實而更加突出：繼任他為納言的是隋煬帝朝中的兩位大臣，即一為裴矩（從624—625年在職），[[55]](#_55_Chuan_Ji_Jian___Sui_Shu____J)一為煬帝著名的顧問宇文述之子宇文士及（從625—626年在職）。[[56]](#_56_Chuan_Ji_Jian___Jiu_Tang_Shu)

與正直誠實的楊恭仁截然相反的是唐高祖的最后一位主要顧問——封倫（封德彝）（568—627年）。[[57]](#_57_Chuan_Ji_Jian___Jiu_Tang_Shu)封倫為隋朝一刺史之子，也是北齊顯官的后代，是河北地區的東北部人。他在隋文帝末年拜在楊素門下，楊素委他為內史舍人。到了煬帝時代，他結納虞世基，歷史學家都責備封倫，說他敗壞了煬帝的政府，加重了法令的苛酷和蒙蔽上聰。封倫隨煬帝游幸南方，結果變成了宇文化及弒君的黨羽。宇文化及任命他為自己政權的納言。但是，當宇文化及敗在李密手下時，他和宇文化及之弟宇文士及逃往長安，投降了唐軍。雖然唐高祖最初對他懷有敵意，但封倫以“密計”贏得歡心，并被任命為中書侍郎。后來，他還升任中書令（前后兩次，620—621年；623—624年），還帶宰相銜。從621—623年，他當上了民部尚書這個關鍵性的職位。

封倫后來還當了唐太宗對王世充作戰的顧問，在此以后他表面上繼續支持太宗。但他完全是個投機分子，因為在爭嫡的斗爭中他似是又秘密地幫助過唐太宗的敵手。但無人知曉此事，直到他在627年死后才露了馬腳。他把此事瞞得密不透風，甚至唐太宗在即位以后還任命他為右仆射（626—627年）。

盡管封倫被后世儒家道德派歷史學家所詬病，盡管人們在把他與魏徵等大臣相比時對他大加貶抑，但他也顯然有他的才干。他在投唐以前就有了長期在政府當顧問和在決策機構中工作的經驗，而且據說，他在民部尚書任內的作為還頗得當時人士的贊譽。

以上就是唐高祖周圍少數顧問中的主要角色，他們都是參與最高決策的人。當我們在更大的范圍內考察唐高祖時代的高級大臣時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大多數人都與唐皇室出身相類似。大多數人都是北朝和隋王朝的世家大族。高祖治下的45名顯宦中，有27人曾仕于隋，大多數人都在高位。其余人中的大多數之父與祖，或者在隋朝做官，或者在隋朝以前的朝代做官；只有四個人的先世曾給南朝效勞。[[58]](#_58_Bu_Mu_Chao_Feng_De___Sui_Tan)后來唐太宗皇室的近侍集團也大致是這個比例。[[59]](#_59_Ke_Shi__Zai_Ta_De_Wen_Xue_Gu)

人們也可以從中清楚地看出，對政府統治精英中的各個地方集團作過平衡的努力，特別是要避免發展成為隋王朝特點的西北人士占優勢的情況。[[60]](#_60_Wei_Ke_Si_Le____Chu_Tang_Zhe)

如下所述，這種人事上顯著的繼承關系還與基本政策上同樣的繼承性相配合。

唐王朝以這種方式組成的官僚體制，是它的力量的一種源泉。它的成員們絕大多數都有從政經驗。大部分高級官員都與皇室有關系，這有助于加強唐王朝的統治，而他們所體現的唐王朝的五湖四海的廣泛性則能消除全國不同人士的疑慮，從而促進國家的重新統一。

### 中央政府對鄉村控制的擴展

對于外地的行政，唐高祖建立了州以取代隋代的郡。這僅僅是個名詞的改變，因為隋代本身早在589—607年間也已使用了州的名詞。縣仍然是州治下的下一級行政單位。州、縣的長官分別定名為刺史和縣令。我們不能確知武德年間有多少州，但是據說，唐高祖想對原來的叛亂者、隋朝官吏和唐軍的勛臣宿將酬以官職，他建置了多于隋代（190個州）一倍多的州，而且也大大增加了縣的數目。[[61]](#_61_Ju___Tang_Hui_Yao____Juan_70)可是皇帝沿用隋代的辦法，仍然把地方官員的任命委之于中央政府中的民部。

地方行政單位的設置，并不意味著國家可以馬上恢復正常的文官統治。唐高祖時代軍事活動不斷，皇帝在他統治的大多數年代中把他的國家置于嚴格的軍事控制之下。他不僅需要維持12支大常備軍以保護都門鎖鑰，而且在全國各地建立了總管府（624年以后稱為都督府）。[[62]](#_62___Tang_Hui_Yao____Juan_68_Di)這不是什么新發明，因為隋朝就建立了這種兵制，而許多叛亂者在隋朝末年的戰亂中也曾自號總管。總管府有43個，地位在該地區文職之上，對境內的一切軍事問題擁有全權。它們的轄境很大，每個總管府能號令數州；最大的總管府稱為大總管府，所號令之州達39個之多。

除了這些總管府之外，政府在唐朝初年還建立了地區的機動行政組織（行臺）：它們位于陜西東部、山東和四川，以及長江中、下游的戰略要沖。它們主要是戰地政府機構，臨時成立起來以協調地方行政和落實政府的政策。這些行臺都被委給唐王朝最可靠的支持者節制；李世民本人就曾主管過兩三次行臺之責。一旦正式行政機構開始順利運轉，行臺在幾年內便撤銷了。

唐王朝還不失時機地設置地方軍事部隊，使之提供可靠的、以地方為基礎的人力資源，以滿足王朝的軍事需要。他們在這方面所沿襲的政策可以上溯到西魏于543年所作出的決定，即征調地方兵力來補充它空虛的部隊。在關中的京兆地區建立的府有261個。[[63]](#_63_Ju___Xin_Tang_Shu_____Juan_5)在唐王朝初建的數年內，當兵馬倥傯之際，這些關中的府兵被置于保衛京兆的十二個軍的統領之下。十二軍在高祖末年被解散之后，這些府兵仍被保留了下來，但改歸保衛京師的衛來領導。[[64]](#_64___Xin_Tang_Shu____Juan_50_Di)盡管關中是中國最軍事化的地區，有些地方據說是十男中有九人服兵役，但全國其他地方也建立了府，總數最后達到633個。

每一個府都有一整套軍官編制，并按很嚴格的軍事方式組織起來。它們的規模有三種：每個單位或800人，或1000人，或1200人。隋代在590年曾公開下令，所有以地方為基地的士兵應直接置于當地文官的管轄之下，唐代則與此不同，它把府作為單獨的軍事單位，不過士兵們也要在平民戶口中注籍。但唐代也有繼承隋代政策的方面，即把這些地方部隊直接置于京師控制之下。為了保證對他們的控制，唐王朝下令，府應該輪流派送兵士去長安服兵役。636年，這些地方部隊又改名為折沖府。到了這個時候，中央政府已經牢牢地控制了全中國，它能信賴這些自給自足的地方部隊，因為任何單個的府都很小，已不能對朝廷構成威脅，但卻又是能招之即來的可靠的人力來源。[[65]](#_65_Jian_Du_Qia___Tang_Dai_Fu_Bi)

### 樹立財政權威和形成償付能力的努力

唐王朝草創之際最緊迫的問題之一，是征集資財以供軍需和支付日益增多的官僚的俸祿，因為唐朝的行政控制已遍及全國。最初，唐軍擄掠的戰利品和從隋王朝的金庫及倉廒中所獵取的財物成為唐高祖收入的主要來源，但是很顯然，政府的財政收入得有比這更持久的措施才行。

618年，皇帝制定了一個制度，使京城或各州的官署能擁有一定數量的資金，以便投放于貿易或放貸取利。這些錢交由通常是商人出身的特殊的“吏胥”掌握，由此取得的利益用于政府支付官吏的俸金。也就在這一年，皇帝又開始為京城和各地方的官署設置職分田，使其地租成為它們現任官吏的薪水的一部分；又設置了公廨田以提供官署的管理經費。這種以田地作特殊基金來支付官吏薪俸和辦公經費的辦法是取法于南朝的經驗。[[66]](#_66_Jian_Ju_Chi_Ying_Fu___Guan_Y)

作為獲致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方法，在619年和624年的法律中，唐高祖恢復了由國家控制土地使用和土地分配的均田制度，這是在北魏時期建立的一種制度，后來在北朝和隋代都一直沿用。這個制度的細節將在本書下一章予以討論，建立這個制度的用意是要根據成年男性納稅人的年齡和社會身份保證給他們一定數量的土地，并限制個人手中所擁有的土地數量和他們自由處理土地財產的權利。[[67]](#_67_Guan_Yu_Zhe_Ge_Tu_Di_Zhi_Du)與此同時，政府還建立了一種直接稅制，即租庸調制，它規定每一個登記在籍的納稅人都得支付一定數量的谷物、布匹，并定期服勞役。可是在唐高祖時期，租庸調制在全國的實施程度和貫徹這一稅制的階段尚未充分弄清楚。但應該注意，唐高祖的基本財政政策是嚴格模仿北朝的，因而不太重視非農業部門的經濟。在中國南方已司空見慣的貨幣稅，也沒有起多大的作用。這整個制度對所有納稅人的稅務負擔采取一刀切的辦法，而不管他們的實際處境和他們所在地區的實際情況如何。[[68]](#_68_Jian_Cui_Rui_De___Tang_Dai_D)

自從漢代滅亡以來，隋代第一次試圖給中國北方提供一個可行的貨幣制度，但事實證明，它是很不夠的；在隋朝后期隨著公共秩序的瓦解，偽造貨幣之風十分猖獗。其結果是，人民使用各種商品以取代錢幣。621年，皇帝開始鑄造其大小、輕重和成色都劃一的新鑄幣。新幣取名為開元通寶；終唐之世它都是法定貨幣。[[69]](#_69_Jian_Cui_Rui_De___Tang_Dai_D)

雖然在8世紀以前唐代并未對商業課稅做過系統的努力，但從唐王朝建立之初它即對貿易實行嚴格的控制，特別對首都和各州城這些大市場更是如此。除了從隋代傳下來的長安的三大都會市場以外，皇帝還命令各州及都督府自設官辦市場。為管理京師和地方大城鎮市場所設的官被稱為市令；市令負責維持秩序，登記所有商店，監督度量衡，決定批準的價格表，保證出售貨物的質量。[[70]](#_70_Jian_Cui_Rui_De___Tang_Dai_D)

唐高祖也繼續實行隋朝的發展水利和運河體系的政策。624年在陜西建成了一套給水系統，它引黃河水澆地8萬多英畝，次年在陜西建造了一條漕運運河，它有助于京城的物資供應。[[71]](#_71___Tang_Hui_Yao____Juan_89_Di)

### 法典的編定

當唐高祖最初起兵太原時，他頒布了一系列寬厚法令以緩和隋煬帝那一套嚴刑峻罰；而在617年攻取了大興城以后，由于他想贏得城內人民的忠順，他迅速公布了一套只有12條條款的很簡易的法令，大約是仿漢高祖的約法三章，作為其新王朝開始的一種寬厚姿態。這些法令減少了處死的罪行，只限于兇殺、暴力搶劫、開小差和叛逆等行為。[[72]](#_72___Jiu_Tang_Shu____Juan_50_Di) 618年正式建國，他立即增加了53條法令，它們都是取自隋文帝的開皇行政法與刑法，取代了后來隋煬帝的嚴苛而繁雜的法律。[[73]](#_73___Jiu_Tang_Shu____Juan_50_Di)隋律是581年“新法”（完成于583年）的修訂版，它的淵源很多，分別來自北魏、晉、北齊和梁朝的法律。也是在618年，皇帝任命了一個高級委員會來編纂唐王朝的大型刑法和行政法法典。它于624年陰歷三月呈上御覽，四月份頒行天下，被稱為新武德律；它極像開皇律，也包含有500條款。因此這部初唐律令大致上是經過隋代合理化處理三國南北朝時期的法律的成果，并無多少新內容。不過，這個委員會不僅包括隋代大理寺的原來正卿，也至少包括兩位顯赫的南方人，因此它也做了一些努力來吸收南方行政實踐中的特點。[[74]](#_74_Jian_Ren_Jing_Tian_Sheng___T)

除新武德律以外，呈交給皇帝的還有一套行政法——即30卷令；還有行政細則——即14卷式，它使高祖建立起來的新型政府和制度有了法律效力和一個標準的法典形式。正如皇帝在頒行它的詔書中所說，“永垂憲則，貽范后昆”。[[75]](#_75___Tang_Da_Zhao_Ling_Ji____Ju)在這一點上唐高祖確實是成功的：由他的委員會所起草的唐律，除了略有修訂外，一直到14世紀都具有權威性，而且為越南、朝鮮和日本等國的第一部法典提供了樣板。至于在中國本身，根據定期修訂的法律精心制定行政法律程序的活動一直是唐代在下一個世紀所關注的大事。

### 考試制度和學科制度的建立

唐高祖究于何時重新推行隋朝的科舉制度，這個問題尚不清楚，但是到了621年，競爭各種功名的士子已云集于京城應試。[[76]](#_76___Xin_Tang_Shu____Juan_44_Di)可是，如果認為科舉考試在唐朝初年有很大影響，那就錯了。第一，那時中式的士子與唐朝全部官吏的數目相比為數極少。第二，雖然唐高祖時代有幾位高官曾在隋代中過舉，但那些在唐代中舉的人當時還很年輕，在他們的宦途中開始時尚處于下僚。高祖時代的頂層官僚之所以取得這樣的位望，通常是由于他們要么與皇室沾親帶故，要么在建立唐王朝的過程中曾建功立業。如果他們也有人有了功名，那純粹是巧合。最后，貴族的權勢還十分強大，許多官員是靠祖蔭得的官。

為了滿足那些想應科考的人，唐高祖在長安重開了隋代的三種學校，即國子學、太學和四門學；所有這些學校都著重教授經書。它們最后都受627年開辦的國子監的管理。626年，它們總共只有學生342名，他們幾乎都是皇室、貴族和品級最高的官員的子弟。只有最低級的四門學才除外，略有放松。[[77]](#_77___Tang_Hui_Yao____Juan_66_Di) 624年，唐高祖下令在各州縣一律設立學校。[[78]](#_78___Xin_Tang_Shu____Juan_49Xia)

### 管理宗教集團的有力措施

在三國南北朝大分裂時期，道、釋二教變成了頹廢官吏階層哲學的和宗教的主要寄托。這種宗教也在平民百姓中廣有徒眾，而且創立了道士、僧尼的巨大宗教社團。它們對歷代的中央政權構成了日益嚴重的挑戰，是由于以下幾點：它們擁有巨大的物質財富、土地、寺院和廟宇，擁有珍貴金屬所制造的圣物；宗教社團的成員實際上宣布不承擔對國家、自己的家庭和社會的一切責任，因而使國家蒙受大量的人力損失；在寺院土地上作為農奴勞動的依附家庭和依附男女數目龐大。

隨著隋代的重新統一中國，特別是在唐代，儒家思想又變成了官吏們關心的大事，因為他們現在正全力鞏固他們在這新建立的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權內的權力。釋、道、儒為了取悅知識分子精英人物而展開了尖銳的爭奪人心之戰；在唐朝初年，這三方的代表人物經常在朝廷上展開激烈的辯論，由皇帝親自主持其事。

621年和624年，太史令、中國的保守派代言人傅奕在奏疏中攻擊佛教為外來的和有害的宗教，因為它把數以萬計的男女都誘入不參加正常社會活動的歧途，因此他請皇帝在中國廢除佛法。[[79]](#_79___Tang_Hui_Yao____Juan_47_Di)唐高祖自然不愿對如此聲勢浩大的佛教進行干預，不過佛教和道教擁有日益增長的經濟勢力，這不能不使他像前人那樣產生憂慮和擔心。

直到626年陰歷五月，皇帝才采取有效措施反對佛教，同時他也設法對道教組織實行了更大程度的國家控制。他限定了京城和各州的佛寺和道觀的數目；在京城，他把佛寺的數目從120個減到3個；道觀從10個減到1個。各州只許各設一座佛寺和道觀。凡不真正屬于宗教組織之僧尼，均應著令還俗。[[80]](#_80___Tang_Hui_Yao____Juan_47_Di)這些指示幾乎沒有來得及付諸實行，因為它們在三個月以后撤銷，那時李世民攘奪了政府的權力。唐高祖的喪失權力可能同他對佛教和道教采取高壓措施有關。我們至少知道，李世民的隨從人員在他掌權以前就曾在文字和口頭上為佛教辯護，所以這足以表明，李世民及其一伙當時正在爭取全國佛教信徒的支持。[[81]](#_81_Jian_Rui_Wo_Shou___Tang_Tai)

## 唐王朝與東突厥的關系

唐高祖之治的大部分時間都專注于國內事務和新王朝制度的建立工作。但是在唐代初年，最大的威脅不是來自國內的敵手，而是來自一個外族政權——東突厥人。唐高祖充分了解唐王朝還處于軍事軟弱的地位，所以經常賄賂東突厥人不要侵犯唐朝領土，也不要他們幫助已宣布成為突厥附庸的那些叛亂者。他在位期間，給突厥可汗大量送禮是常例。但是，唐高祖的收買政策并不十分順利，因為突厥人索賄的胃口越來越大。他們派往長安的使者并不尊敬皇帝，反而把京城搞得烏煙瘴氣。其中有這樣一個例子：唐高祖被迫允許東突厥的使節們刺殺了西突厥的曷薩那可汗；后者從前曾向唐王進貢，此時正在長安。不僅如此，東突厥人還勾結北方各叛亂者再次進犯中國。

在計劃于619年初期進犯中國的前夕，始畢可汗死了。他的兒子尚未成年，因而由他的兄弟接任為處羅可汗——他不久于620年死去。處羅可汗由另一兄弟頡利可汗（620—630年在位）繼位，此人在高祖年間和唐太宗初年被認為是唐王朝的大患。

622年，頡利率領號稱15萬人的大軍進犯唐王朝原根據地太原，但被太子建成和李世民統兵擊退。突厥人屢屢進犯京城長安的周圍地區，形勢變得如此嚴重，以致京師在624年后期不得不實行戒嚴。根據傳統的記述，高祖曾認真地考慮把都城遷到更安全的地方以避突厥人之鋒，他并且派過一個官員去勘察新都幾個可能的地址。[[82]](#_82_Chuan_Tong_De_Shi_Xue_Jia_Zh)次年，原已于622年解散了的十二個軍又重新建立，以便對付突厥人的威脅。625年年中，頡利可汗又率大軍再次攻擊太原，使唐軍受了很大損失。甚至在高祖統治的最后幾個月內，東突厥還在攻打北方邊境，因此皇帝不得不命令地方官員加固城垣，多挖護城河，嚴加防備。

雖然唐高祖歷來受到后世種族中心論的中國歷史學家的嚴厲批評，說他在唐朝初年屈從于突厥人；雖然他的收買政策未能擋住突厥人接二連三的進犯，但他確在王朝危急的時期成功地買得了安全。這個喘息時機，首先使唐軍在進入隋都時免除了腹背受敵之虞，后來又使唐軍鞏固了在陜西的力量。它還使唐朝能夠在太子建成的指揮下開始籌劃北方邊境的防御工作，這雖然不能完全阻止突厥人的入侵，卻為漢人在唐高祖在位的余年堅強有力地抗拒突厥人的進犯打下了基礎。

## 玄武門之變和內禪

與唐高祖逐鹿的群雄紛紛敗于戰陣，朝廷上也已形成一種相對穩定和寧靜的氣氛，這時以太子建成及支持他的幼弟李元吉為一方，以建成之弟李世民為另一方的早在戰爭時期即已潛滋暗長的仇恨終于表面化了，并且發展為你死我活的權力斗爭。

建成和元吉兩個人在正史上都被說得無甚是處。根據這些史書的記載，元吉酷嗜射獵，在戰陣上反復無常，又是個好色之徒和一個虐待狂；太子建成則冥頑不靈，桀驁難馴，沉湎酒色。這些貶詞至少是傳統史料中這一時期的記載對他們故意歪曲的部分結果。例如，宋代大歷史學家司馬光（1019—1086年）就深知當時的實錄對建成和元吉有偏頗不實之語。[[83]](#_83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

到了621年，李世民由于戰勝了竇建德和王世充而聲譽驟隆，太子建成則因大部分時間在北方邊疆防御突厥人，未能樹立同樣的聲望。也就在這一年，唐高祖把李世民的地位提高到全國其余一切貴族之上，命他掌握東部平原文、武兩方面的大權，并且命他開府洛陽。李世民立即組成一個聽命于他的約有文武官員50人的強大的隨從人員集團，其中許多人來自東北部平原原來已被他消滅的敵人營壘；他開始向太子建成的高于他人的地位挑戰了。[[84]](#_84_Bu_Mu_Chao_Feng____Sui_Tang)

李世民很可能也從其他方面威脅建成。621年他設立了自己的文學館，其中有18位學士當他的國事顧問。文學館的創辦很可能提醒太子建成，世民有繼登大寶的野心。[[85]](#_85_Tong_Shang_Shu__Di_217Ye_Qi)

從這時起，建成想方設法挖李世民的墻腳，把后者班子中的幾個人調往別的崗位上去。[[86]](#_86_Bu_Mu_Chao_Feng_Zai_Ta_De)與此同時，他招募兩千多名少壯人員來增強他在長安的力量，這支力量稱長林兵，因為他們駐扎在太子住地東宮內的長林門附近。建成與他的反李世民的同盟者元吉還獲得高祖后宮中許多妃嬪的支持，她們在不間斷的宮廷陰謀中在皇帝面前給他們說好話。另一方面，李世民因有軍務經常不在首都，他在長安城內和宮廷內部沒能成功地得到支援。但他卻在洛陽的軍政官員中建立了支援的基礎，以此來與太子建成在長安的優勢相抗衡。[[87]](#_87___Jiu_Tang_Shu____Juan_69_Di)

最初，太子建成的策略進行得很得手。可是624年陰歷六月，原任太子東宮侍衛的慶州總管楊文干謀反。據說，有人曾勸楊文干應為太子建成起兵并擁立太子為帝；是時太子正留守京城，唐高祖則住在離宮。陰謀被揭露，太子建成和楊文干分別從長安和戍地被召赴行宮。當高祖的使者到達時，太子建成拒絕了一位部屬勸他奪取帝位的進言，反而前往行宮請求皇帝寬恕。可是，楊文干卻舉兵反叛。按照史書上的某些記載，唐高祖答允立李世民為太子，并派李世民和另外幾位將領率兵去討伐楊文干；官軍一到，楊文干即為其部下所殺。

與此同時，太子的支持者李元吉、后宮的妃嬪們和宰相封德彝（封倫）等人成功地掩飾了整個事情的真相；而且盡管太子的幾名顧問和李世民的至少一位隨從都被放逐，李建成仍被遣回長安當太子。有些歷史學家很懷疑李建成是否真正與聞這次事件，而且至少有一位現代學者相信，指控李建成的罪名是李世民及其同黨羅織起來的。[[88]](#_88_You_Ruo_Gan_Zheng_Ju_Biao_Mi)

唐高祖曾想法緩和諸子之間日益緊張的關系。他試圖讓李建成和李世民脫離直接接觸，并且曾作過某些微弱而不成功的努力以彌補他們之間的裂痕。但是，他陷入了宮廷內和朝堂上精心策劃的爾虞我詐的交叉火網之中而不能自拔，每一方都設法詆毀對方，而唐高祖本人對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態度又極端搖擺不定，對他們的態度看來取決于他們各自成功地利用他的程度。同時，局勢也急轉直下，直到最后以兵戎相見。

到了626年，李世民對李建成和李元吉耍弄花招所取得的成就越來越驚恐不安，因為后二人意在使皇帝反對他，并且想挖空他的一幫人馬。楊文干事件后不久，唐高祖得知李世民的覬覦之心日漸增強，他便召李世民進宮并明白地告訴他，他不可能從高祖本人那里得到什么幫助。[[89]](#_8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李世民的兩個最重要的謀士房玄齡和杜如晦，已因建成和元吉玩弄陰謀而被開革。他的將軍尉遲敬德被建成和元吉雇人行刺，幾乎喪生，而當他后來被他們在朝中詆毀時又是經李世民說情才免于一死的。當突厥人于626年初入侵邊境時，經建成提議，元吉被派往抗御突厥人；他隨身帶走了李世民手下最優秀的將軍們和精銳士兵。建成和元吉并且厚賂李世民的關鍵人物，希望他們倒戈相向。唐高祖似乎并不反對他們搞這些名堂。最后，據說李建成想毒死李世民，雖然對行事的時間——甚至對這個事件本身——都一直有人爭論不休。

一個時期以來，李世民的最有影響的官員們曾敦促他對他的兩個兄弟采取強硬的立場。但是，他在制定進攻性策略時行動是緩慢的。可是，他謙恭下士，慷慨大方地籠絡了洛陽地區的地方軍事精英人物（豪杰），而且用自己的一干人馬警衛著這個城市。可能他是在想，如果一旦被迫逃出京城的話，他可利用洛陽做避風港，或者用它作為反對建成和元吉的基地。

最后，刺激李世民采取行動來反對他的兄弟們的事件終于出現：據他的探子報告，他們計劃在李世民送元吉出征突厥人之際將他殺害。這時，他秘密地把扮成道士的房玄齡和杜如晦召進他的營地以協助他制定計劃，同時，他又賄買玄武門禁軍將領常何，使之聽命于己。玄武門位于長安北面城垣之中心，是出入禁城的要道。由于它地處沖要，所以禁軍都駐扎在它的左近，以負責防止任何敢于政變的嘗試。[[90]](#_90_Jian_Chen_Yin_Ge___Tang_Dai)

陰歷六月初三，李世民謊奏說建成和元吉淫亂后宮。唐高祖即對此事進行按驗。次日一早，高祖的一個妃嬪把李世民對他們的控告通知建成和元吉，他們便決定不去朝廷而徑自去見皇帝求情，因此打馬直奔皇宮，想為自己辯護。

可是正在這時，李世民領著12名[[91]](#_91_An_Zhao_Bu_Mu_Chao_Feng_Zai)心腹部署在他此時已控制的玄武門陣地。當建成、元吉到達宮門入口處玄武門時，他們被伏兵襲擊。建成被李世民砍死；元吉則被李世民的軍官尉遲敬德所殺。建成和元吉的隨從于是對玄武門發動攻擊，但當兩位被殺主子的頭被拿來曉示眾人時，他們的攻門努力便即刻瓦解了。

在玄武門之變的前不久，唐高祖表現了頗不利于李世民的態度：他曾允許把李世民的幾個要員調走，同時他也默默地看著建成在京城發展部隊，使它的人數明顯地多于李世民的部隊。[[92]](#_92_Jian_Fu_Le_Cheng___Xuan_Wu_M)緊接著玄武門的事變，李世民派了他的可靠的將軍尉遲敬德（即唐高祖前不久要處死的人）去向皇帝報告政變的結果。據說，在玄武門事件發生時，高祖正在宮內的湖面上劃船。這時，尉遲敬德身穿全副甲冑荷戈而至（這一行動通常罪當處死），把高祖兩個兒子的死訊告訴了他。李世民用了這一戲劇性的手法告訴他的父親：唐廷內的潮流變了，他現在完全控制了局勢。[[93]](#_93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

玄武門事變之后僅僅三天李世民便被立為皇太子，從他父親手里接過政府的實際控制權。陰歷八月初九，唐高祖可能是由于被脅迫而放棄了皇位，李世民便做了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后來在中國歷史上被謚為太宗）。與此同時，唐高祖被尊為太上皇。

唐高祖遜位之后，無論在事實上或名義上都變成了退隱皇帝，只偶爾出席宮廷禮儀。關于626年以后的年代他們父子之間的關系到底如何，我們知道的很少，但是，當時事變所引起的創傷似未治愈。632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訴陳：年邁的高祖住在宮城西部狹窄的大安宮內；雖然它去太宗之宮咫尺，但太宗已經好久沒有去省視他了。馬周還進一步指責說，當太宗要去夏宮避暑時，高祖卻被留在長安受熱天的煎熬。[[94]](#_94___Jiu_Tang_Shu____Juan_74_Di)可是，后來太宗也要遨請高祖和他一起去避暑時，高祖謝絕了。太宗于是在宮城的東北面建造大明宮作為他父親的避暑離宮，但高祖在施工期間卻一病不起，而于635年陰歷五月死去，沒來得及住進他的離宮。另外一件事情也一定很重要，即唐太宗給他父親建造的陵寢明顯地小于他為他妻子所建造的宏偉的陵墓，他也打算把那里作為自己的安葬之地。這一舉措的含義肯定對唐太宗的一位官員有所觸動，他譏諷太宗為不孝。[[95]](#_95___Xin_Tang_Shu____Juan_97_Di)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唐高祖是中國一切史書中最受貶低的一位君主。他的聲譽之所以蒙受損失，第一是因為事實上他的統治時期很短，而且是夾在中國歷史上兩個最突出的人物的統治期的中間：他前面的統治者是大壞蛋隋煬帝，他后面的則是被后世史家視為政治完人的唐太宗。第二，已如上述，是因為他建立唐王朝的功績被他的接班人精心地掩蓋了。實際上，唐高祖舉兵反隋時盡管已年過50，上了年紀，他仍然不失為一個有雄心壯志而又生氣勃勃的和干練的領袖人物。有充分材料可以證明，他具有不凡的抱負，而且毫無疑問，恰恰是他策劃了太原起事，并勝利地引導唐軍進抵隋都。他對李密和東突厥人的外交攻勢使得唐軍能奪取大興城，并且使得唐軍能組織和加強在陜西的力量而無虞敵軍的阻礙。后來，他的大赦、封官許愿和大加賞賜的政策，再加上李世民在戰場上的勝利，有助于使新王朝取得很多必要的支援，并且促成了全國的重新統一。也正是唐高祖其人建立了初唐的制度和政治格局。武德之治，從任何現實標準來衡量，都算得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從其結果來看，唐王朝已經打下了堅實的行政、經濟和軍事基礎。總而言之，唐高祖為他兒子的輝煌統治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礎。

[[1]](#_1_2)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1944年初版，在《陳寅恪先生論集》（臺北，1971年）中重印時作了某些修訂，見第109—117頁。陳氏的論據不是最后定論，但他的論證非常有力，尚無人做出令人信服的反駁。

[[2]](#_2_2)關于根據近年來發掘的碑銘對于這些家族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可看岡崎敬《隋趙國公獨孤羅墓志銘考證》，載《史淵》，83（1960年），第40頁上有一張很明晰的系譜圖。

[[3]](#_3_2)見布目潮風《楊玄感的叛亂》，載《立命館文學》，236（1965年），第91—95頁。

[[4]](#_4_2)見賓板橋《唐朝的建立：隋之滅亡和唐之興起》（巴爾的摩，1941年），第79—80頁。

[[5]](#_5_2)《資治通鑒》卷183，第5709頁。見賓板橋《關于民謠中的李氏興王之說》，載《美國東方學會學報》，61（1941年），第272—273頁。

[[6]](#_6_2)見賓板橋《溫大雅：唐代歷史的第一位記錄者》，載《美國東方學會學報》，17（1937年），第368—374頁；羅香林：《唐代文化史》（臺北，1955年），第1—29頁；李樹桐：《唐史考辨》（臺北，1965年），第1—98、276—309頁；福井重雅：《大唐創業起居注考》，載《史觀》，63.4（1961年），第83—88頁。

[[7]](#_7_2)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卷1，毛晉《津逮秘書》版（此下簡稱《起居注》），第1頁。

[[8]](#_8_2)《起居注》卷1，第3頁。

[[9]](#_9_2)同上書，第15頁。

[[10]](#_10_2)正史和《資治通鑒》的傳統說法，把這次行動歸功于李世民。但溫大雅指出，逮捕這兩個副手的軍隊實際上是由另一位將軍統領的，雖然他們名義上是歸李世民節制。見《起居注》卷1，第9頁。

[[11]](#_11_2)下面略舉幾位得到突厥人支持的主要叛亂人物：薛舉、李軌、劉武周、竇建德、梁師都和高開道。另外尚有許多次要叛亂人物。

[[12]](#_12_2)根據正史，這事又涉及李世民。但李世民此時只是一個15歲的男童，而按照溫大雅所說，恰恰是李淵帶兵解了煬帝之圍。見《起居注》卷1，第1頁。又見賓板橋《唐朝的建立》，第49頁注82。

[[13]](#_13_2)見賓板橋《唐朝的建立》，第99—100頁；李樹桐：《唐史考辨》，第217頁。

[[14]](#_14_2)見布目潮風《李淵集團的構造》，載《立命館文學》，243（1965年），第27—29頁。此文重印于布目潮風的《隋唐史研究》（東京，1968年），第112—149頁。

[[15]](#_15_2)根據溫大雅的《起居注》卷2（第12—14頁），李淵的軍隊為大雨所阻，當時他正在等候突厥人已答應送來的馬匹，而且還擔心謠傳的劉武周計劃對他太原根據地的襲擊，所以他曾準備放棄他的遠征，只是被他的諸子勸阻才未下達撤退命令。

[[16]](#_16_2)李密的傳記，見《舊唐書》（卷53）和《新唐書》（卷84）及《隋書》（卷70）。關于他的政權，見布目潮風《李密在隋末叛亂中的動向》，載《史學雜志》，74.10（1965年），第1—14頁；經增訂收于《隋唐史研究》，第53—100頁。

[[17]](#_17_2)《資治通鑒》卷184，第5743頁。

[[18]](#_18_2)《起居注》卷2，第13—14頁。據溫大雅所述，在霍邑之戰和唐兵奪取大興城的整個戰役中，李建成和李世民都是唐軍的帶兵將領。但是在兩部《唐書》中，李建成被貶低，而突出了其弟李世民的作用。

[[19]](#_19_2)《起居注》卷2，第25頁。

[[20]](#_20_2)《起居注》卷2，第27頁。又見羅香林《唐代文化史》，第10頁；李樹桐：《唐史考辨》，第279—280頁。

[[21]](#_21_2)見布目潮風《隋唐史研究》，第263頁。

[[22]](#_22_2)例如可見《起居注》卷2，第16、23頁。

[[23]](#_23_2)例如可見《舊唐書》卷69，第2521頁；卷57，第2301—2302頁；《起居注》卷2，第19頁。

[[24]](#_24_2)《起居注》卷2，第15—16頁。

[[25]](#_25_2)《資治通鑒》卷187，第5840頁。

[[26]](#_26_2)傳記見《舊唐書》卷55，第2245—2247頁；《新唐書》卷86，第3705—3707頁。

[[27]](#_27_2)傳記見《舊唐書》卷56，第2280—2281頁；《新唐書》卷87，第3730—3732頁。

[[28]](#_28_2)傳記見《舊唐書》卷55，第2252—2255頁；《新唐書》卷86，第3711—3713頁。

[[29]](#_29_2)傳記見《舊唐書》卷55，第2256—2257頁；《新唐書》卷86，第3714—3715頁。

[[30]](#_30_2)傳記見《舊唐書》卷54，第2234—2242頁；《新唐書》卷85，第3696—3703頁。

[[31]](#_31_2)傳記見《北史》卷79，第2660—2664頁；《隋書》卷85，第1894—1898頁；《舊唐書》卷54，第2227—2234頁：《新唐書》卷85，第3689—3696頁。

[[32]](#_32_2)傳記見《北史》卷79，第2654—2658頁；《隋書》卷85，第1888—1892頁。

[[33]](#_33_2)傳記見《舊唐書》卷56，第2273—2275頁；《新唐書》卷87，第3726—3728頁。

[[34]](#_34_2)傳記見《舊唐書》卷56，第2266—2268頁；《新唐書》卷93，第3799—3801頁。

[[35]](#_35_2)傳記見《舊唐書》卷56，第2269—2270頁：《新唐書》卷87，第3724—3725頁。

[[36]](#_36_2)傳記見《舊唐書》卷56，第2263—2266頁；《新唐書》卷87，第3721—3724頁。

[[37]](#_37_1)傳記見《舊唐書》卷55，第2248—2252頁；《新唐書》卷86，第3708—3711頁。

[[38]](#_38_1)《資治通鑒》卷186，第5813—5817頁。

[[39]](#_39_1)傳記見《舊唐書》卷55，第2258—2260頁；《新唐書》卷86，第3715—3718頁。

[[40]](#_40_1)《資治通鑒》卷189，第5934頁起以下諸頁。

[[41]](#_41_1)全文見《冊府元龜》卷83，第30—31頁。

[[42]](#_42_1)《資治通鑒》卷186，第5834頁。

[[43]](#_43_1)《舊唐書》卷57，第2293—2294頁；《資治通鑒》卷187，第5861—5862頁。

[[44]](#_44_1)《唐會要》卷56，第961頁。

[[45]](#_45_1)見孫國棟《唐代三省制之發展研究》，載《新亞學報》，3.1（1957年），第39—41頁。

[[46]](#_46_1)見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大阪，1967年），第29頁。對高祖及其子女婚姻關系的異常詳盡的研究，又可見布目潮風《隋唐史研究》，第314—367頁。

[[47]](#_47_1)見布目潮風《唐朝創業期的一個考察》，載《東洋史研究》，25.1（1966年），第3—15頁。此文重印于《隋唐史研究》，第154—167頁。

[[48]](#_48_1)見布目潮風《唐朝創業期的一個考察》；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第15—33頁。又見《劍橋中國史》第4卷中池田溫所寫的一章；崔瑞德：《唐代統治階級的組成》，載芮沃壽、崔瑞德編《對唐代的透視》（紐黑文，1973年），第47—84頁；韋克斯勒：《初唐政府中的宗派主義》，載《對唐代的透視》，第105頁。

[[49]](#_49_1)傳記見《舊唐書》卷57，第2285—2289頁；《新唐書》卷88，第3736—3739頁。

[[50]](#_50_1)見《資治通鑒》卷187，第5867頁，司馬光干脆稱他為懦夫。

[[51]](#_51_1)傳記見《舊唐書》卷63，第2398—2404頁；《新唐書》卷101，第3949—3952頁。

[[52]](#_52_1)傳記見《舊唐書》卷57，第2289—2294頁；《新唐書》卷88，第3733—3736頁。

[[53]](#_53_1)傳記見《陳書》卷28，第372頁；《南史》卷65，第1589頁；《舊唐書》卷6，第2363頁；《新唐書》卷100，第3295—3926頁。

[[54]](#_54_1)傳記見《舊唐書》卷62，第2381—2382頁；《新唐書》卷100，第3926—3927頁。

[[55]](#_55_1)傳記見《隋書》卷67，第1577—1584頁；《北史》卷38，第1387—1393頁；《舊唐書》卷63，第2406—2409頁；《新唐書》卷100，第3931—3934頁。

[[56]](#_56_1)傳記見《舊唐書》卷63，第2409—2411頁；《新唐書》卷100，第3934—3936頁。

[[57]](#_57_1)傳記見《舊唐書》卷63，第2395—2398頁；《新唐書》卷100，第3929—3931頁。

[[58]](#_58_1)布目潮風的《隋唐史研究》（第153—197頁）對統治階層進行過深入而充分論證的分析。

[[59]](#_59_1)可是，在他的文學館中有很大一批南方人。見福澤宗吉《文學館學士》，載《熊本大學教育學部紀要》，1（1953年），第40—44頁。

[[60]](#_60_1)韋克斯勒：《初唐政府中的宗派主義》，第87—120頁。

[[61]](#_61_1)據《唐會要》卷70，第1232頁，627年有州360個。《資治通鑒》卷192，第6033頁，開列了這一年的州名，但此表有許多不合理的情況，比如它包括了7世紀后期才建立的州，所以沒有反映627年的真實情況。事實上，唐高祖時代甚至建立了更多的州、縣，總數遠遠超過了隋代的一倍。《舊唐書·地理志》（卷38—41）很詳細地反映了唐高祖年間地方行政的變化，但還沒有哪一位學者試圖重新整理出這一復雜而變動不定的情況。很清楚，有許多建置是在618年以后，但又約在624年后陸續裁撤，而在唐太宗的627年大加裁并。

[[62]](#_62_1)《唐會要》卷68，第1192頁；《舊唐書》卷38，第1384頁。后者說它們建于邊境或戰略要地。

[[63]](#_63_1)據《新唐書》（卷50，第1325頁）說有261個府；《唐會要》（卷72，第1298頁）說有361個府。

[[64]](#_64_1)《新唐書》卷50，第1324頁。

[[65]](#_65_1)見杜洽《唐代府兵考》，載《史學年報》，3.1（1939年），第9—10頁。

[[66]](#_66_1)見菊池英夫《關于南朝田制的一個考察》，載《山梨大學教育部紀要》，4（1969年），第1—44頁。

[[67]](#_67_1)關于這個土地制度，可看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2版（牛津，1970年），第1—6頁。關于這個問題的大量文獻材料，見該書所開列的書目。

[[68]](#_68_1)見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24—28頁。

[[69]](#_69_1)見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66—70頁。

[[70]](#_70_1)見崔瑞德《唐代的市場管理》，載《大亞細亞》（新版），12.2（1966年），第202—248頁。

[[71]](#_71_1)《唐會要》卷89，第1619頁；《冊府元龜》卷497，第7頁。

[[72]](#_72_1)《舊唐書》卷50，第2133頁；《資治通鑒》卷184，第5762頁。

[[73]](#_73_1)《舊唐書》卷50，第2133—2134頁。

[[74]](#_74_1)見仁井田陞《唐令拾遺》（東京，1933年），第12—13頁。

[[75]](#_75_1)《唐大詔令集》卷82，第470頁。

[[76]](#_76_1)《新唐書》卷44，第1163頁；《唐摭言》（《叢書集成》版）卷15，第159頁。見福島繁次郎《唐代的貢舉制》，載《中國南北朝史研究》（東京，1962年），第58—65頁；戴何都：《〈新唐書〉選舉志譯注》（巴黎，1932年），第160頁。

[[77]](#_77_1)《唐會要》卷66，第1157頁；《資治通鑒》卷185，第5792頁。

[[78]](#_78_1)《新唐書》卷49下，第1314頁；《資治通鑒》卷185，第5792頁；《唐大詔令集》卷105，第537頁；《全唐文》卷3，第1—2頁。

[[79]](#_79_1)《唐會要》卷47，第835頁；《資治通鑒》卷191，第6001—6002頁；見芮沃壽《傅奕與對佛教的抵制》，載《思想史雜志》，12（1951年），第33—47頁。

[[80]](#_80_1)《唐會要》卷47，第836頁；《舊唐書》卷1，第16—17頁；《記古今佛道論衡》，載《大正新修大藏經》卷52，第381頁。

[[81]](#_81_1)見芮沃壽《唐太宗和佛教》，載芮沃壽、崔瑞德編《對唐代的透視》，第245—246頁。

[[82]](#_82_1)傳統的史學家指出，經李世民勸阻，這一計劃未付諸實施。見李樹桐《唐史考辨》，第55—60頁。

[[83]](#_83_1)《資治通鑒》卷184，第5738頁《考異》；《資治通鑒》卷190，第5960頁《考異》。

[[84]](#_84_1)布目潮風：《隋唐史研究》，第189—256頁，特別是第218—249頁。

[[85]](#_85_1)同上書，第217頁起以下諸頁；福澤宗吉：《文學館學士》。

[[86]](#_86_1)布目潮風在他的《隋唐史研究》（第296頁起以下諸頁）中討論了太子建成以下的這些安排。

[[87]](#_87_1)《舊唐書》卷69，第2515頁。關于建成與世民敵對雙方各擁有的支持者的問題，見陳寅恪的《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杰”》，載《岑南學報》，12.6（1952年），第1—14頁；章群：《論唐開元前的政治集團》，載《新亞學報》，1.2（1956年），第290頁；李樹桐：《唐史考辨》，第134—135頁。

[[88]](#_88_1)有若干證據表明，太子建成是被誣枉的。見《資治通鑒》卷191，第5986頁《考異》。李樹桐走得更遠，他認為傳統記述都是唐太宗的支持者及后世史家——特別是許敬宗所精心編造出來的。可是在《隋唐史研究》（第276—281頁）和《玄武門之變》（載《大阪大學教育部集錄》，16 〔1968年〕，第29—32頁）中，布目潮風反駁了這種看法，但他并未提出具體理由。

[[89]](#_89_1)《資治通鑒》卷191，第5990頁。唐高祖告訴李世民說：“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耶！”

[[90]](#_90_1)見陳寅格《唐代政治史述論考》，第140—143頁。

[[91]](#_91_1)按照布目潮風在《玄武門之變》中的說法，李世民所帶領的人是12名，而不是傳統記述中的9名。

[[92]](#_92_1)見傅樂成《玄武門事變之醞釀》，載《文史哲學報》，8（1958年），第174—175頁。

[[93]](#_93_1)《資治通鑒》卷191，第6011頁。

[[94]](#_94_1)《舊唐書》卷74，第2613頁。

[[95]](#_95_1)《新唐書》卷97，第3871頁；見韋克斯勒《天子的鏡子：唐太宗朝廷中的魏徵》（紐黑文，1974年），第136—137頁。

# 第四章 唐政權的鞏固者唐太宗（626—649年在位）

后來的太宗李世民為高祖次子，600年生于今陜西省武功縣。[[1]](#_1_Tai_Zong_Sheng_Nian_You_Ji_Zh)他母親出身于一個極有權勢的氏族——竇氏。竇氏的姐姐是楊廣（即隋煬帝）的夫人。它和隋、唐的皇室一樣，是一個含有異族血統的氏族（其原始姓是紇豆陵氏），[[2]](#_2_Yao_Wei_Yuan____Bei_Zhao_Hu_X)它在初唐時期一直非常有權勢，出了兩個皇后、六個王妃、八個駙馬和一大批高官。[[3]](#_3___Jiu_Tang_Shu____Juan_61_Di)太宗的母親生長于她舅父北周武帝（他的妹妹是她的母親）宮中，據說李淵在那里的一次射箭比賽中和她訂了婚；她死于614年。[[4]](#_4___Jiu_Tang_Shu____Juan_51_Di)

童年時代的李世民，自然只是一個貴公子，不可能受到任何準備將來做帝王的特殊教育。他受的肯定是當時上流階級的典型儒家教育，因為后來他做皇帝時表現出他深通經、史，而且是一個書法家。李氏家族具有強烈的北方民族傳統，當然是佛教信徒，高祖的幾個兒子都有佛教的乳名。但和大多數的漢—突厥混血貴族一樣，太宗早年受的教育側重武術，尤重騎射。當時的史書里充滿了關于他的勇敢和富有軍事天才的故事。他擅長騎術，裝飾他陵墓的他所喜愛的六匹駿馬的浮雕，現在仍然被保存著。

和他的兄弟們一樣，他很年輕的時候就接受了第一次戰爭考驗。當他還只十幾歲時就隨他父親多次出征，平定發生在今山西省內的各種叛亂和抗擊東突厥人的入侵。據傳統記載，太宗僅僅15歲時就曾率領一支人馬，在山西北部長城的雁門救出被東突厥包圍的隋煬帝。這個故事歷來被看做太宗第一次出現于歷史的記載，但恐怕不可靠。[[5]](#_5_Bin_Ban_Qiao____Tang_Zhao_De)

李世民的身份在唐朝的最初年代基本上還是一個軍事將領。作為一個英勇而常勝的指揮官，他的品格形成于他奪取帝位的多年的艱苦野戰時期。他確實有帝王之姿，在朝廷上顯得很莊嚴威武。他好沖動，易被激怒，當他發怒時面色紫脹，使周圍的人不寒而栗。他在處理突厥事務上的成功，多半應歸功于他堅強的個性和英雄的風度。

太宗認為，是人，而不是天，決定人們的命運，他采取的理性主義態度是與這一時期的傳統信念背道而馳的。例如，他即位不久全國各地的官員不時奏報樣瑞和兇兆，他駁斥說：“安危在于人事，吉兇系于政術。若時主肆虐，嘉貺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庶征不能致其惡。”[[6]](#_6___Tang_Hui_Yao____Juan_28_Di)后來，他命令在一個不誤農時的日子舉行太子的冠禮，而不顧有人關于此日不吉的勸告。[[7]](#_7___Zhen_Guan_Zheng_Yao_____Yua)他曾嘲笑以前很多服食丹藥求長生的帝王。

太宗是一位非常自覺的帝王，深切關心他留給后世的形象。我們知道，他企圖改動實錄關于唐朝創業的敘述和玄武門之變的記載以提高他的歷史形象。太宗的許多公開的舉止，與其說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說是出自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贊許的愿望。

毫無疑問，太宗具有作出戲劇性和炫耀性姿態的才能。我們現舉一件逸事為例來說明他喜歡做作的習慣：628年，京畿地區發生蝗災。他到皇宮北部的御花園中親查災情。他抓起一把蝗蟲叫罵道：“民以谷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于是他舉起這把蝗蟲往口邊送，準備吞食，侍臣們阻止他說，“惡物或成疾”。他坦然回答：“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說著，把蝗蟲吞吃了。[[8]](#_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9)

太宗在位初期，一直表現出對民眾的同情和對朝臣意見的尊重。他為缺乏治國的才能而經常表示擔憂，并聲明由于他早年從事軍旅，沒有受過做帝王的教育。他曾說：“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匠，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遍知乎！”[[9]](#_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9)

太宗就這樣在群臣面前采取謙恭下士的態度，渴望學習，盡力征求他們的意見和坦率的批評。

盡管表面上顯示出謙虛，但在626年陰歷八月九日他即位之后，事實證明他是一位精力充沛和才能卓越的政治家，同時也是一位優秀的軍事統帥。雖然比起他父親高祖來，他相對地缺乏文治經驗，可是不久他就給唐政府帶來一種新鮮的、事必躬親的和有吸引力的作風，這種作風基本上建立在他個人的明察、過人的精力、勤奮不息和善于用人的基礎之上。

他傾注于治國方面的精力是驚人的，并且要求群臣也和他一樣。他的宰相們輪流在中書、門下省值宿，以便能不分晝夜地隨時召對。當諫書多起來時，他把它們粘在寢室墻上，以便能對它們審查和考慮，直到深夜。

他謹遵儒家的教導，使士大夫參與國事并有權有責，而且事實證明，他對文人的諫諍和壓力非常敏感而負責。他虛心征求群臣和顧問的坦率批評，并誠心誠意地利用他們的批評改善政務。他即位不久，就使諫官參加門下和中書兩省大臣們的國事討論，以便有失誤時可及時糾正。[[10]](#_10_Tong_Shang_Shu__Di_5031Ye)他還使所有的官員都可議論政事而不必畏懼，并使他們能更方便地直接向皇帝提出建議和請求。

太宗不只對群臣有上述的一般要求，而且還和他們建立了密切的個人關系，這就是讓他們覺得，在制定政策和處理國事方面，他們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如果我們看到太宗在傳統史書中的形象常常被理想化了，這不僅是由于他自己力圖影響歷史的記載，而且還由于史官們也受到作為士大夫所應有的責任感的影響，他們當然會把一個如此關心他們本階級而且行為近乎儒家思想的皇帝偶像化。

太宗即位初年所自覺遵奉的另一個儒家美德就是節儉。他嚴格地削減了大型公共工程，以減輕民眾的勞役負擔和賦稅。他在即位后幾個月內對群臣說：“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11]](#_1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_1)這樣地宣揚節儉和關心民眾福利，自然使朝廷的儒臣們高興，也使他大得民心。

627年陰歷元旦，太宗取年號為“貞觀”，后世歷史家對他的被理想化的施政畫卷尊之為“貞觀之治”。它證明是一個非常有影響的樣板，激勵了后世如乾隆皇帝、忽必烈汗和日本的德川家康等各種各樣的統治者。

可是這個理想的形象只適用于太宗在位的初期。到了7世紀30年代的中期，隨著國家力量的強固和帝國邊境的擴展，太宗對他自己的治國之術變得越來越自信，獨斷專行和自以為是開始發展。他早年的節儉和愛惜民力的經濟政策讓位于大修宮苑和廣興公共工程之舉了。

629年和630年，諫官們一再勸告，不要大規模地重修洛陽的隋代宮殿，因為這樣就易蹈隋末的覆轍，可是在631年，太宗仍命令整修隋代宮殿；但當他看到完工后的宮殿過于華麗時，又下令把它拆毀。[[12]](#_12___Tang_Hui_Yao____Juan_30_Di)在同一年，太宗重修鳳翔府的隋代仁壽宮，[[13]](#_13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_1)隨著又建造了不少于四個新的宮殿：即建于634年的大明宮，[[14]](#_14___Tang_Hui_Yao____Juan_30_Di)后來成為皇帝的主要常居之處；建于637年的飛山宮；[[15]](#_15___Tang_Hui_Yao____Juan_30_Di)建于640年的襄城宮；[[16]](#_16_Tong_Shang)建于647年的玉華宮。[[17]](#_17_Tong_Shang_Shu__Di_555Ye)我們舉一例以見工程之大：襄城宮的建造，用了大約200萬個工時。即使是這樣費工，當641年竣工時太宗發覺它是建立在暑熱和不合意之地，又命把它夷為平地，并把主持建造的將作大匠降了級。[[18]](#_18___Tang_Hui_Yao____Juan_30_Di) 647年，大量公共工程的費用成了推遲預定在次年舉行封禪的原因之一。[[19]](#_1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_1)

太宗放棄節儉的方針也表現在別的方面。他在即位初期，很少舉行他父親和他弟弟元吉喜愛的那種隆重的大狩獵活動。這種狩獵，與其說是單純的捕獵活動，不如說是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對當地人民來說是勞民傷財的事情。但在太宗在位的后半期，狩獵又變成了經常的事，使他長期離朝在外。637年，有一個皇子因沉溺狩獵而被降黜。太宗在朝宣稱：“權萬紀（皇子的老師）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御史柳范冷冷地回奏說：“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于是太宗悻悻地退朝回宮。[[20]](#_20___Jiu_Tang_Shu____Juan_74_Di)

在7世紀30年代初期，太宗的群臣中有人對他放棄早年的具有特色的行事方針開始表示不滿。到了637年，這種擔心的呼聲更大而且公開化了。在那一年，馬周抱怨勞役日重和太宗日益不關心民眾，呼吁恢復早年的政策。[[21]](#_21_Tong_Shang)魏徵在次年也陳訴說，自627年以來太宗的施政作風變了，越來越獨斷、自負和浪費。[[22]](#_22___Wei_Zheng_Gong_Jian_Lu)

隨著太宗權力的日益鞏固，他開始更加專斷而不顧群臣的意見。他過去和群臣建立的某些良好關系有了裂痕；他開始對批評置之不理，并威嚇那些和他意見不同的人們。648年，他的宰相房玄齡臨終時難過地說，現在朝廷已無人敢犯顏強諫了。[[23]](#_23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太宗過去對顧問大臣們的謙虛態度已為帝王的專斷所取代。他晚年經常炫耀自己早年的武功。他自己認為已超過以前的其他偉大君主，而他的群臣也以阿諛之辭來滿足他的驕傲。

雖然太宗終其生未能實現他早年的崇高理想，可是他的拔高了的形象和“貞觀之治”的概念一直是有力的政治象征，不僅終唐之世如此，而且對整個中國歷史說來也是如此。

## 太宗朝的群臣

在最高級行政官署中，太宗集中了一批優秀的大臣。這些人大多數是在其父執政、或為秦王時的文、武幕僚。但有兩個杰出人物是例外，即做過被害太子建成的顧問的魏徵和王珪；此事雄辯地證明了太宗用人唯才，可以不管其人過去的歷史背景。他曾經這樣寫道：“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為轅，曲者以為輪，長者以為棟梁，短者以為栱桷。無曲直長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猶是也。智者取其謀，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無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無棄材，明君無棄士。”[[24]](#_24___Di_Fan_____Cong_Shu_Ji_Che)

這位青年天子用人通常是選擇與他志趣相投的人。他逐漸罷免了高祖時代的舊人，而起用自己的年輕支持者；他還大規模地斥退身為高官的皇親國戚，唯一著名的例外是他的內兄長孫無忌。他的最高級官員幾乎都是原來富有吏治經驗的人和從前歷朝官員的子孫。太宗即位以后，朝廷中的高級官署都有些人事變動，但尚未見新的官僚階級出來掌權。[[25]](#_25_Zhu_Shan_Zhi_San_Lang____Tan)

在整個太宗時期，他最親密和最信任的顧問之一是他的內兄長孫無忌（約600—659年）。長孫無忌出身于北魏勢族，大約和太宗同時生于洛陽，童年時期就和太宗的關系很好。他參加了唐高祖向隋都進軍的隊伍；事實證明他是個很有軍事才能的戰略家，并且后來隨太宗平服山東平原。作為太宗完全忠實可靠的支持者，他幫助太宗策劃反對其弟兄的政變，而且是把他們殺死在玄武門的少數人之一。

太宗即位后，內兄長孫無忌被任為尚書右仆射領宰相銜。他妹妹當上了皇后，死后謚為“文德皇后”。長孫無忌在所有的群臣中最受尊崇，特許他出入宮禁，不受限制。由于他的權勢過大，曾被指控為擅權并被迫辭職，但依然做皇帝的顧問。自633年以來他在群臣中享有最高的（雖然是名譽性的）稱號——司空和司徒；而且他對皇帝的影響依然沒有減弱。643年，他以個人的巨大影響解決了繼位之爭，使之有利于未來的高宗。從645年直到太宗晚年，他再度掌門下省和尚書省的大權，并負責修訂律令。太宗死后，在他的指導下完成了這項工作。他和褚遂良一起同受太宗顧命。太宗臨終時盛贊長孫，并要求褚遂良保護他，使他免受誹謗和危害。長孫無忌和太宗的終生友誼和合作以及和太宗的姻親關系，使他特別受到太宗的器重和成為群臣及顧問中的最有影響的人物。[[26]](#_26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

太宗群臣中的第二號人物是房玄齡（578—648年）。他出身于齊州（今山東省）的一個家族，他父親在隋代做過刺史，他本人在17歲的未冠之年即考中進士。在隋代，他歷任地方和中央的高官，并在隋都做吏部侍郎。太宗占領長安后不久，他作為一個富有經驗和能干的官員加入了太宗的侍從行列。他成了未來皇帝的長期伙伴，總是伴隨太宗出征，充當顧問和秘書。

太宗為秦王時，他給太宗引薦了一批人做幕僚。這些人大部分是當時的山東人，并且往往是被太宗平服的東北平原的敵手們的舊官吏。房玄齡和長孫無忌一同策動玄武門之變，太宗即位后，他繼續做太宗的顧問和私人秘書，起草詔令；據說他起草的詔令即使是初稿，也如同宿構。

如果說長孫無忌基本上以個人的方式起作用，是皇帝的心腹謀士，那么房玄齡則是一個卓越的實干家。他和杜如晦（見下文）一起，薦舉了一批高層官員，完善了基本行政制度（他們從629—630年共同負責尚書省的工作）。房玄齡和杜如晦的名字成了辦事公正、行政有效的同義語。房玄齡做尚書左仆射13年（629—642年），是太宗朝任期最長的宰相。

房玄齡是一位特別講求實際和正直的顧問大臣，他的影響比清教徒式的魏徵（見下文）更大，因為魏徵喋喋不休的道德說教，往往最后被束之高閣。房玄齡則在必要時自動讓步，而且有時過于順從皇帝。但他很務實而又得人心，他的裁斷公正寬厚，見解穩健，深為皇帝和僚屬所歡迎。他是朝廷中安定和中庸之道的主要源泉，特別在太宗晚年日益驕傲時更是如此。雖然他謙柔而沒有很大野心，但在整個太宗時期他是僅次于長孫無忌的權勢人物。[[27]](#_27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

與房玄齡齊名的杜如晦（585—630年）出身于西北望族：和太宗的其他高官一樣，他也生于一個官僚家庭。他的祖父曾在北周和隋做過官，他本人在隋代做過地方上的小官，后來辭職。唐興后不久，他參加了太宗的幕僚集團，與長孫無忌和房玄齡一樣隨太宗參加了征討東北平原的戰役。他也參與了玄武門之變，很可能參與了襲殺太宗兄弟們的行動。太宗十分相信杜如晦的決斷力，以致對房玄齡說，所有的重大政府決策都需要杜如晦的支持。杜如晦和房玄齡彼此取長補短，同心協力。不幸的是他身罹不治之癥而死于630年，正當他的權力的頂峰時期。[[28]](#_28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

和這兩個有決斷力并講求實效的政治家形成鮮明對比的大臣是呆板而缺乏幽默感的魏徵（580—643年），此人代表太宗朝政治集團中強調儒家道德標準的一派。魏徵出身于河北南部的一個小官吏的家庭，祖先在北魏和北齊做過小官，隋末，魏徵做了起義領袖李密的幕僚。618年末，李密降唐，魏徵也隨著到了長安。后來做太子李建成的幕僚時，他支持李建成反對李世民并為建成出謀劃策。李建成在玄武門被殺后不久，魏徵和李世民進行了一次對話，其時他表現出驚人的直率。當李世民問他為什么和建成、元吉發生爭吵時，他說他們不聽他的勸告：如何對付他們的野心勃勃的現在已取得勝利的弟兄，他說：“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李世民據此斷定，這個倔強坦率的人大有用處，于是任命他為自己的幕僚。

一個月之后李世民即位，魏徵被任為諫議大夫并授以榮銜。后來，他又任太宗個人的使節，到東北平原與殘余的敵對集團談判和平。魏徵對這個任務非常適宜，因為他以前支持過一個主要叛亂者。他可用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表明新政權對李世民或唐王朝從前的敵對分子均可不咎既往，一樣任用。除去這類“外交”使命之外，魏徵還參與了朝廷的其他活動。他參加了幾個學術項目，如編制《新禮》（又稱《貞觀禮》），他和房玄齡一起于636年把這部書呈獻太宗；他又在629—636年期間和其他史官合編了唐以前幾個朝代的史書（見下文）。

但魏徵很少參與實際的行政和決策工作，他并不是以作為從事實際工作的政治家而成為當時和后世的有代表性的人物。魏徵一直以一個不屈不撓的道德家和無所畏懼的諫諍者而著稱；中國人確實認為魏徵是太宗群臣中最杰出的人物。637年的魏徵的一份諫疏足以說明他的直率。這是應太宗之問而談到太宗早年和當前統治的比較時所說的話。他坦率地指出：“昔貞觀之始。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猶悅從諫。自茲厥后，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29]](#_29_Jian_H_J_Wei_Ke_Si_Le___Tian)

魏徵在朝廷起了清廉剛直的表率作用和限制皇權的作用。他是成為太宗時期政治特色的一個象征，這個特色就是君臣以誠相待，彼此坦率地交換意見。魏徵在后世的學者、文官之中所以享有盛譽，肯定是由于他所起的這種作用，這種作用很符合他們的利益和價值觀。[[30]](#_30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

另一個大臣是倔強而難以相處的蕭瑀（575—648年），他是在太宗時繼續任職的高祖的少數大臣之一，主要起著道德說教的御史的作用，但不像魏徵那樣享有死后的榮譽。他經常吹毛求疵，并與同僚們爭吵，終于觸怒了太宗，以至于627年末被免除了宰相之職。但他依然保留了他的高官地位。630年他任御史大夫，在這一年又一度做過短期的宰相；在635—636年又出任宰相。太宗尊重他似乎是由于他的行政經驗，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廉潔和耿直的品質，雖然他的性格好斗，和同僚們的關系又不好。643年，在繼位之爭的倫理危機之后，他又被任為宰相和太子（后來的高宗）少師。他擔任這些官職直到646年，當時他要求退休做和尚，公然和太宗發生口角，于是被外放到地方。在整個太宗執政時期，他依然是一個有權勢的人物，雖然在政治上常常表現為消極的力量：一種不安定的因素，但又是一股其道德情操和剛正不阿的品質，是絕不可等閑視之的勢力。[[31]](#_31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

在太宗晚年，另外一些人物開始在朝廷顯露頭角。魏徵死后，他的體現“帝王之心”的作用由褚遂良（596—658年）承擔下來。褚遂良是南方人，他父親褚亮在陳、隋兩朝做官；因介入流產的楊玄感叛亂而被貶謫到西北，在那里他變節倒向叛亂者薛舉一伙。619年薛舉死后，他們父子投唐，褚亮成了太宗個人文學館里的成員。褚遂良是一個天才的學者、有名的書法家和歷史家。他在太宗朝歷任秘書省的文學“清要”官職，如起居郎和諫議大夫。他掌起居注時，以抵制太宗想影響起居注內容的企圖而聞名。643年在繼承問題的爭議上，他支持后來的高宗做太子，其后，他做了太子的師傅。他作為皇帝的顧問，起了積極的作用；他對內主張溫和政策，對外反對擴張政策。647年，他當上宰相，在中書、門下兩省享有高位。太宗臨終時，他和長孫無忌受太宗顧命。

在太宗晚年，褚遂良確是一個有力的人物。不幸的是，當他成為高官時，太宗已不再聽取道德說教了。但他無疑依然和皇帝保持良好的關系并對皇帝施加相當的影響；他在朝廷上有很高的個人威信，這種威信持續到高宗時期。[[32]](#_32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

以上我們所說的人物雖然在高祖創業時期做過短暫的軍事將領，但基本上是文官政治家。太宗朝還有兩個有影響的武官。

頭一個是李靖（571—649年），他生于西北的京畿區，他祖父和父親是北魏和隋的地方官。他自己也在隋朝做官多年，是太宗最老的親密伙伴。李靖在長安被唐軍占領后投唐，在唐王朝初年曾統軍平服中國南部的幾個叛亂政體。625—626年他和東突厥作戰。太宗即位后，他歷任朝廷各種高官，但也被派出征，與薛延陀和東突厥作戰。630—634年他出任宰相，代替杜如晦而和房玄齡一起共管尚書省，所以對皇帝顯然很有影響。他雖然在634年后期帶著榮譽高級職位引退，但在次年他又統軍成功地在庫庫淖爾地區（青海）擊敗吐谷渾。以后的年代，他繼續以一個有勢力的人物影響著皇帝，直到649年他去世時為止。[[33]](#_33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

另一個武將在朝廷起著雙重作用的是更年輕的李世勣（594—669年）。他出身于今山東省的一個地方官家庭，本姓徐，青年時期參加了翟讓領導的起義，在靠近洛陽的地區活動。后來在李密手下做軍官，李密降唐后，受魏徵的勸說歸唐，這是619年的事。在唐軍平服河北和山東的戰爭中，他是一員主要將領，僅次于李世民。高祖晚年，他在原來的唐軍基地山西北部的太原做軍事長官，防御突厥。太宗非常相信他適于這個任務，他在太原這個重鎮任軍事長官直到641年，并在629—630年平服東突厥的戰爭和事后安置突厥降民事務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太宗曾這樣說過，李世勣之抗擊突厥“其為長城，豈不壯哉！”

641年，他任兵部尚書時被召回朝廷。同年，他一度率軍遠征薛延陀（見下文），此后就在朝廷過安定生活。643年他做了宰相，直到太宗末年都留在這個位置上。這一時期他多半外出征討，一是在644年出征高麗，一是在646年抗擊薛延陀。雖然最后這幾年他沒有在朝廷，但依然是一個對朝廷政治有影響的人物，因為他不僅是宰相，643年后還是太子詹事。太宗晚年對李世勣應該繼續忠于他（太宗）的繼承者一事非常關心。[[34]](#_34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

李靖和李世勣是整個7世紀一直相當普遍的那種官員的代表人物，在內是朝廷文官，在外是戰場武將，如成語所說的“入相出將”那樣。這些官員提醒我們，新興的唐朝統治集團也一樣要出自這樣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里，領導者不僅需要成為干練的行政官員和學者，而且還要如皇帝本人那樣嫻于武事。

## 朝廷的“地區性政治”

中國歷史家傳統地把太宗的統治時期描繪為一個理想的治世，其特色是君臣間的魚水關系和官僚機構中良好的團結精神。只在一次事件中，即643年的繼位之爭中確實表現出強烈的宗派現象。可是如所有的行政系統一樣，太宗的官僚機構也是容易出現緊張關系和內訌的。

關系緊張的根源之一，是被近代中國和日本學者所特別強調的統治階級內部的地方集團的對立。陳寅恪和谷霽光[[35]](#_35_Pu_Li_Ben____An_Lu_Shan_Zhi)都過于重視唐代皇室疏遠東北人特別是疏遠河北人一事。他們把這種疏遠追溯到北魏分裂為北齊、北周的時候，但是對此他們顯然是夸大其詞。河北確曾有好幾年抗拒唐王朝的征服，幾乎可以肯定，唐王朝對中國人口最稠密的這一地區的地方領導是不放心的，因為它阻止了太宗在那里多設折沖府。[[36]](#_36_Du_Qia____Tang_Dai_Fu_Bing_K)太宗自己對這個地區也了解得很清楚，因為他曾負責平服河北，也不信任這里有叛亂可能的民眾。此外，他的被殺的兄弟建成和元吉的很多黨羽都出身于東北地區。

但另一方面，太宗曾勸告高祖對這一地區莫為已甚。而且不管他們的懷疑和表面上的態度如何，高祖和太宗都起用過很多東北家族的人做高官。即使高祖在太原起義時的武臣幕僚中，也有四分之一的人出身于東部的河北和河南兩道。[[37]](#_37_Jian_Bu_Mu_Chao_Feng___Sui_T)排他的東北貴族精英集團（山東四姓）的成員之一崔民干，做過高祖的門下侍郎；看來這是特意在其他地區（其中包括東部平原）出身的人與西北地區（關隴）出身的人之間搞平衡。還有，他為女兒擇婿一事也可以說明高祖對東北地區的人并無過甚的偏見。在他稱帝之前，他的年長的女兒們都嫁給了西北貴族成員，在這之后，他的兩個幼女卻嫁給了河東地區（高祖開始掌權的地區）一個最大家族的成員。[[38]](#_38_Tong_Shang_Shu__Di_317__341Y)

在唐初的年代太宗在中國東部作戰，并長期以洛陽為中心，他引用了很多東北平原出身的人作幕僚。在626年玄武門之變以前，當高祖命他回洛陽以便把他和他的弟兄們分開時，太子建成反對，理由是世民的黨羽都是山東人，一旦他被遣返洛陽就不會再回朝廷了。[[39]](#_3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627年，魏徵被派往東北地區作協調當地領導人和唐朝關系的工作。太宗即位后，繼續從全國各地招用他的高級官員，以防止任何一個地區集團控制主要的行政部門。[[40]](#_40_H_J_Wei_Ke_Si_Le____Chu_Tang)

太宗對社會地位優越的山東貴族門閥（四姓）有眾所周知的反感，但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這種反感不是針對他們的籍貫——不管怎么說，這樣家族中的大多數已經逐漸形成一批京畿的社會精英——而是針對他們的自高自大，排斥別人，和自以為他們的氏族高于皇族等表現。沒有確鑿的事實說明太宗對這個小小的——雖然是極有勢力和影響的——集團的反感竟然發展到針對以此地區為其傳統勢力基地的所有人們的程度。

最后，事實不僅清楚地表明，以前的西北貴族在太宗時代已經失去了他們在朝廷的絕對優勢，高級官僚來自全國各地；而且它還清楚地表明，高官的籍貫和地區性集團在制定政策時都沒有起重要作用。在許多問題上意見的尖銳對立都不是由于有關高官們的籍貫不同；的確，在某些與東部諸道有關的問題上，東北部出身的大官的主張反而不利于他們的故鄉。但也很顯然，太宗非常了解這種地區性集團的嚴重性。他委任高官的方式表現了對這個問題的警覺；他似乎有意避免實行針對任何特定地區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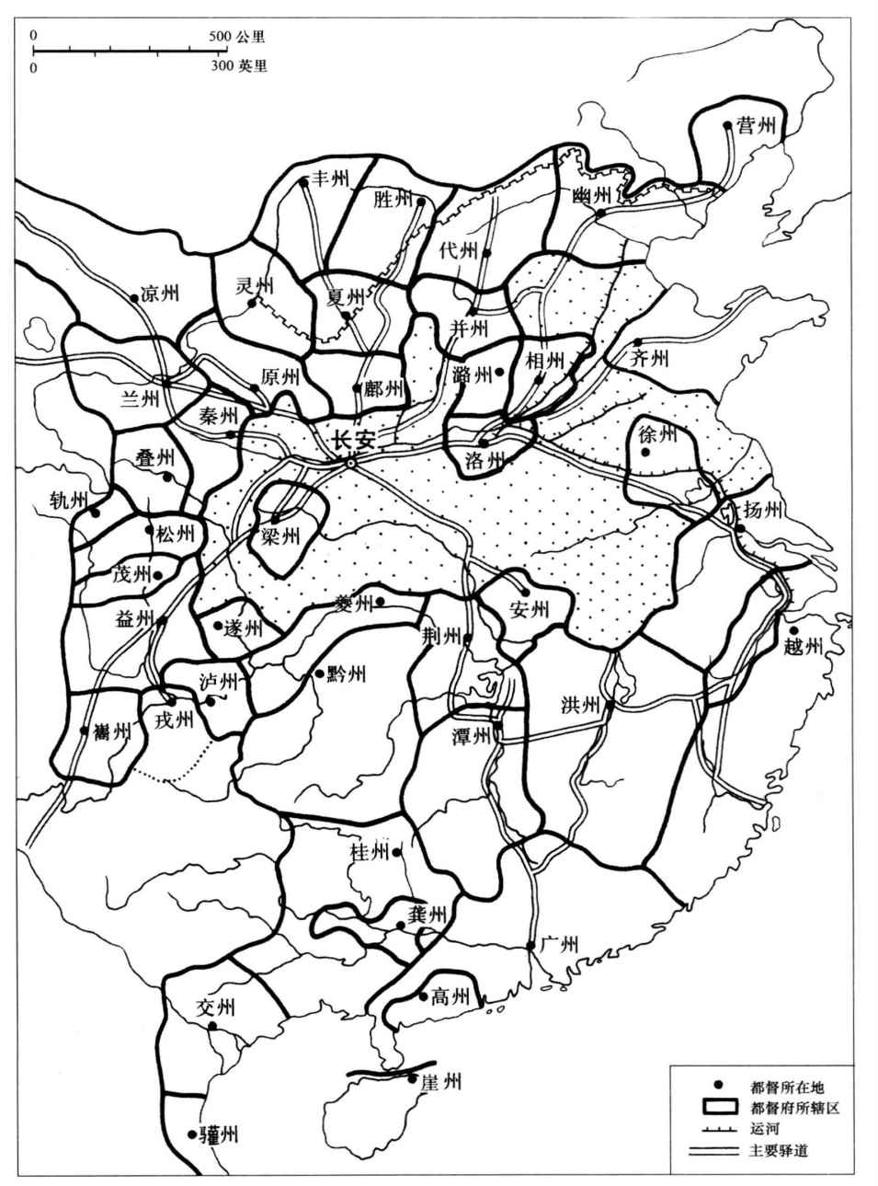
但是，這種地區利益看來并沒有給任何長久的政治分化提供基礎，也沒有產生地區性派系。[[41]](#_41_Guan_Yu_Zhe_Yi_Wen_Ti_De_Xia)在太宗在位的大部分時間里，沒有任何政治問題曾把朝廷分裂成長期的派系集團；相反，這時期的政治界線并不涇渭分明，政治上的效忠很不固定，而且基本上是因人而異的。只是在643年隨著繼位問題產生的尖銳分歧才使宗派主義表面化了。但即使如此，直到太宗晚年它依然是一個比較小的問題，沒有嚴重干擾政治的進程。

## 國內政策和改革

626年陰歷八月九日太宗即位時，中國已經統一，新王朝的基本制度和政策也已經確立和付諸實施。這位年輕皇帝的任務是鞏固和發展他父親的成就。在太宗在位的23年中，他對所繼承的行政和立法結構進行了檢驗、改進和使之合理化，同時制定了一些新政策以應付疆土日益擴大的帝國的急需。

### 行政的改革

到太宗即位時，國家的行政組織已失去平衡。高祖曾經大封皇室的大多數成員和許多外戚以及那些曾支持他獲得政權的人們。他還新設許多州縣，讓那些曾幫助創建唐王朝的人們治理，作為犒賞。到626年他遜位時為止，貴族數目激增，州縣數已是隋朝的兩倍多。



地圖6 唐代中國（639年）

據嚴耕望，《唐史研究叢稿》（香港，1969年）第237—284頁和第284頁地圖繪制。

太宗有條不紊地力圖限制這個官僚機器急速膨脹的形勢。627年，他命房玄齡裁減京師的文、武官員，因為“官在得人，不在員多”。[[42]](#_42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_1)在地方上，太宗在位的頭幾年，以大規模合并州縣的方法大力裁減行政分支機構。

通過高級的都督府（設立于624年以取代總管府）管理地方行政，至少理論上仍在繼續。在639年，都督府的總數是43個，它們管理邊疆地區和國內的戰略要地。總的說來，這些都督府管理全國358個州中的大約272個州；這一體制的主要職能是協調軍事任務，它所轄范圍不包括京畿的地區、黃河和淮河之間的區域、河北中部、河東西南部（今山西）、長江三角洲及四川東部。但都督府對所轄諸州的全面管理基本上是有名無實的。經過幾十年的和平之后，它們的權力變成了具文，僅相當于州一級而稍為重要而已。[[43]](#_43_Yan_Geng_Wang____Tang_Shi_Ya)

太宗重新把全國劃分為十個稱為“道”的行政區域，即西北的關內和隴右；北部的河東和東北的河北；華中的河南、淮南、山南和劍南；南方的地廣人稀的江南和嶺南。沒有常設行政機構和常任官員管理這些區域。它們不是新的行政單位，只是便于皇帝派出的觀察使不定期地視察道內各州地方行政工作的巡行區。[[44]](#_44_Dai_He_Du____Zhong_Guo_Tang)

### 地方官僚機構的改革

唐以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對于同一級官職來說，京畿的遠比地方的受尊重，到唐高祖時期還是如此。武官常被任命為刺史或縣令；地方的屬吏當資歷已夠“入流”時常被任命在地方任職，而京畿的官如犯了錯誤，常被貶謫到外地以示懲罰。地方官即使位高任重，也常被看做流放，因此志大心高的人總把當地方官看做自己仕途上的挫折。

太宗試圖改變這種情況，提高地方官的地位和改善地方行政管理。他親自考察每個地方官的經歷，把他們的姓名貼在自己寢室的屏風上，名下注明功過事跡，據此進行黜陟。637年，太宗接到一份關于地方行政積弊的奏疏，開始親自選擇刺史的候選人，并命中央官員都可推薦新人擔任縣令。[[45]](#_45___Tang_Hui_Yao____Juan_68_Di) 634年[[46]](#_46___Tang_Hui_Yao____Juan_77_Di)和646年，他兩次派遣專使到全國巡視考察地方行政，并責成對地方官提出黜陟意見。在646年的考察中，幾千名地方官因政績不好而受處分，其中有七人因犯罪而被處死。[[47]](#_4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

貪污行為不僅限于地方政府。在高祖時期，朝廷大臣受賄已成為眾所周知的弊病。太宗對此很是懊惱，曾用暗中派人行賄的辦法考驗他的廷臣是否廉潔。這種辦法當然引起軒然大波。太宗于是當眾賞賜那些受賄的人，使貪官們蒙垢含羞。在太宗在位期間，通過這種辦法，受賄——甚至接受習慣上的酬謝——有所收斂。

### 修訂法典

太宗一直關心刑法的執行，當他即位的頭幾年尤其如此。據說，他即位不久就覺得他父親制定的法律中有很多條文過苛，因此下令減輕對某些罪行所訂的嚴刑。朝廷經常就法和倫理問題、刑罰的哲學問題、嚴法和寬法孰優孰劣等問題開展討論。看起來，太宗大體上贊同寬厚政策，廢除了一些苛酷刑罰。630年，對肉刑作了嚴格規定，拷問已被限制；[[48]](#_48___Jiu_Tang_Shu____Juan_50_Di) 632年，自古以來的刖刑被廢除而代之以流刑。[[49]](#_49_Zi_627Nian_Yi_Lai__Guan_Yu_D)次年，為了停止匆促處死和錯判，太宗命令，死囚須經三次復奏才能執行。[[50]](#_50___Jiu_Tang_Shu____Juan_50_Di)

法典的修訂也繼續進行。早在627年，裴弘獻就建議太宗修改624年高祖的律令中的大部分條文。[[51]](#_51___Jiu_Tang_Shu____Juan_50_Di)太宗命房玄齡、裴弘獻和各類司法官員修訂法典。過了10年，以房玄齡為首的一個組織才完成了這個任務。637年初，將這部名為《貞觀律》的法典送呈太宗，它大量減少了判處死刑或流刑的罪行，減輕了許多輕罪的刑罰。同時，令中的行政法也被修改擴充成30卷1590條，作為補充條例的式也增加了內容。最后，第一套格也完成了。這些法典化的法律起初是以詔令和個別法令的形式頒布的。經過整理、修改和歸納，總計為18卷700條，它們體現了618年以來頒布的大約3000個詔令中的法律和程序的實質性變化。[[52]](#_52___Tang_Hui_Yao____Juan_39_Di)太宗對法律的興趣經久不衰，他臨終的遺囑還吩咐他的繼承者再次修訂法典。[[53]](#_53___Tang_Da_Zhao_Ling_Ji____Ju)

### 兵制的改革

高祖時期兵制的進展已如上述。這里再說太宗進一步改進現行軍事組織的問題。636年，太宗將現行的民兵組織改稱“折沖府”，其兵員就是所謂“府兵”。折沖府總數大約為633個，大抵集中在京畿地區。僅關中一帶就有261個；其余的幾乎都分布在河東和河南西部的洛陽附近。在這些地區，府兵一定包括很大比率的男丁。河北和河南這些人口稠密的大平原折沖府很少，華南和華中就更少了。

每個折沖府由800人到1000人或1200人組成，配備有軍官和行政官員。每個折沖府的指揮官都是高品級官員。其結構是10人一伙，50人一隊，200人一團。這些府兵包括騎兵、騎射兵和步兵；他們還有自己的馱騎。武器、裝備和口糧自備，甲冑和復雜的武器則由折沖府的武庫供給。

靠近京師的折沖府分屬于12衛，它們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兵力，府兵分期輪番服役，保衛京師。

除了服役保衛京師外，府兵在農閑時期還要受軍訓，每年冬末以大狩獵的形式舉行正式軍事演習。士兵的服役年齡從20歲到60歲。在服役期間免除賦稅和勞役。

也有少數折沖府設置在邊境，但在唐初，顯然有專職的長期戍兵駐守邊境。這些戍兵，特別是騎兵，有很多是在630年東突厥戰敗后參加唐軍的突厥人，以及隨后定居在北方邊境的歸順的突厥人。

可是，在進行重大的征討時這些兵力是不夠的，這時政府不僅要動員府兵和匆忙組成“行軍”，而且還要從一般平民中征兵。[[54]](#_54_Pu_Li_Ben____An_Lu_Shan_Zhi)

一般認為，府兵是由舊貴族門第出身的人統率的。雖然勇武的西北貴族集團在高級文官中明顯地失去了優勢，但大部分的折沖府（至少占總數的三分之二）分布在關隴、代北貴族集團以前占支配地位的今陜西、甘肅和山西中北部，這里也是他們的老家。府兵和為出征所征集的士兵都應該從富裕之家挑選，由于享受免稅免役的恩惠，所以服役與其說是強制征集，倒不如說是一種特權。

### 經濟政策

太宗行政上的一大失敗是在全國推行的財政制度。609年的隋代戶數差不多是900萬，到了高祖時代下降到不足200萬，到了太宗末期，仍在300萬以下，不到隋代戶數的三分之一。這個差別并不表示實際人口災難性的下降，而是說明作為課稅根據的人口登記的松懈和低效率。漏籍最厲害的地方是全國最富、人口最多的河北和河南兩道，那里的登記數分別只為隋代人口的17%和10%。幸虧太宗施政相對節儉，因為全國約有三分之二的應納稅的人逃避了課稅而未受到懲罰。[[55]](#_55_Pu_Li_Ben____Sui_Tang_Shi_Qi)

但到太宗時，伴隨著隋末內亂和唐初統一戰爭而來的經濟凋敝開始有了好轉。唐王朝建立后的頭幾年，物價高漲，糧食缺乏（因而禁止釀酒）。即使在太宗即位之后，糧價依然很高而且糧食供應不足，以至在京師以外工作的高級官員奉命只好把他們俸祿中的糧食部分運送回家。保守的官員如魏徵，幾年來一直以隋末戰亂帶來的經濟惡果還沒有消除為論點，勸阻皇帝不要推行好大喜功的政策，如不要舉行勞民傷財的封禪大典和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擴張。

但到了630年前后，由于多年來的國內和平、農業豐收和施政正確，局勢有了明顯好轉。一個使人民取得一定抗災能力的新的重要措施是628年在各州建立義倉，積谷以備荒年。[[56]](#_56___Jiu_Tang_Shu____Juan_49_Di)639年，在一些主要大城市建立了常平義倉以調節糧價，避免暴漲。[[57]](#_57___Tang_Hui_Yao____Juan_88_Di)

由于經濟的普遍穩定和改善，國家逐漸繁榮，開始積存大量儲備。在新的繁榮基礎之上，太宗有能力實行更積極的、干涉別國的對外政策，進行多次橫掃中亞大部分地區和進兵朝鮮的戰爭。

雖然經過這些戰爭，但經濟依然繁榮，直到太宗的繼承者高宗時期，物價保持低而穩定。政府比較節約，軍事建置實際上也是通過府兵制而自給自足，這實際上是把處于相對貧乏和無生產力地區的京師的影響減到了最低點。太宗以后諸朝，長安的供應成為主要的后勤問題，而太宗時則大不相同，每年只需較少量的糧食（約20萬石），主要從河南大平原漕運到長安。太宗以后十分重要的南方的稅糧，在太宗時并不運到首都，而是折成布匹或貨幣以減少運費。

## 旨在加強中央權力的政策

太宗最關切的是確保唐王朝的長治久安，使它能免遭后漢滅亡以來各個短命王朝的命運。因此他斷定，在與國內的其他對立集團相處時，中央權力，特別是皇室權力，必須加強。

### 關于建立“封建制”之爭

627年的后半年，太宗就如何使國祚長久一事征詢群臣的意見。年邁的蕭瑀建議，應恢復使夏、商、周三代國祚長久的封建制。[[58]](#_58___Tang_Hui_Yao____Juan_46_Di)

唐代學者設想，封建制基本上是分權政體，封地的權力已下放給世襲的封建主，他們被封為皇帝的藩屬。郡縣制與此相反，它是由中央政府派職業官員直接治理全國的領土。

蕭瑀的建議引起了歷久不息的熱烈爭議。大多數朝廷官員完全反對恢復封建制。禮部侍郎李百藥指出，周代所以國祚長久是由于天命，而不是由于封建制度，況且到了后期，周就極度衰弱了。另外一些官員則指出了實行封建的后果。魏徵的反對理由是，實行封建將縮小王畿，大量減少國家的歲入，以致無力供給官吏的俸祿。他和馬周還指出諸侯無道的危險和可能發生的國家防務問題。[[59]](#_59_Tong_Shang_Shu__Di_824__827Y)

于是實行封建的計劃暫時被擱置。但關于封建的主意顯然給太宗以有力的影響，所以封建這個政治論題在太宗在位期間幾次被提出。631年，有旨命官員們起草一個詳細的規定，使皇族和杰出的官員據此可被任命為世襲的邊境鎮守之官。[[60]](#_6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可能是由于朝廷中所有派別的反對，這個規定依然沒有實行。但到了637年，這個計劃終于被重新提出。21個皇子被分封為世襲都督或刺史，分配到各州作“藩翰”，雖然分配給他們的地方有很多在東北平原和內地各處。14名杰出的大臣，包括一大部分朝中顯貴，也被任命為世襲的刺史。我們毫不清楚這件事實行到什么程度。但可以肯定，這是一個被大大沖淡了的封建制，它不過是在正常的官僚機構中設立一批數量不多的世襲官職罷了。

對這個被削弱的“封建制”，反對的意見依然不絕于耳。[[61]](#_6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朝中大臣們幾乎無人離開崗位到他們的“封地”去，而且他們也不愿意去。639年，長孫無忌和房玄齡上書辭謝他們的職位，理由是自漢改封建為中央控制的郡縣制以來，復古已毫無意義；皇族和以前的開國功臣未必能勝任這些行政重任；他們的子孫很可能證明不能擔任這些職務，或可能在繼承時年紀太小，不能防止外人奪權。[[62]](#_62___Jiu_Tang_Shu____Juan_65_Di)

面對這一派反對意見，太宗讓步了，并降詔緩行刺史的世襲分封之議。[[63]](#_63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但皇子的分封似仍在繼續實行，[[64]](#_64_Jian_642Nian_Chu_Sui_Liang_D)太宗依然向往于“封建制”。他晚年時，在給繼承者立下的政治遺言和寫于648年的《帝范》中，再次提到這個問題，并斷言：如果不分封皇族，皇室就不能占有足夠的土地。但這必須保持平衡，不能過度，以免削弱中央的力量。[[65]](#_65___Di_Fan____Juan_1_Di_3__8Ye)

作為政治權力的一種可供選擇的形式，或作為一個可能醫治積弊的藥方，“封建制”在太宗以后也討論過，但真正土地分封的實行，也就是分給地方以實權而不是只給一個空頭銜，則再也沒有被認真地考慮過。

### 大姓

太宗在企圖鞏固他的王朝權力時所面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對貴族集團——特別是稱之為“四姓”的集團——樹立皇族的絕對支配地位。“四姓”集團大都出自中國東北部，由于它們的成員已有好幾代在朝中做高官，所以在5世紀時已經取得優越的社會地位。后來，這些氏族以它們在地方上的政治和經濟影響，以它們保持的所謂“純正”的中國傳統文化，以它們嚴格遵守的一切儒家禮儀細節，尤其重要的是以它們內部的通婚關系，加強并保持了它們的特權地位。它們的社會優越感發展到竟把6世紀的半異族西北皇族輕視為社會的暴發戶；而且唐皇室也被劃歸于暴發戶之列。[[66]](#_66_Guan_Yu_Zhe_Ge_Wen_Ti__Ke_Ca)

632年，太宗命他的幾個大臣編纂一部全國有名氏族譜系的概要。在唐初，“四姓”氏族中只有極少數的成員在朝做官，他們的經濟地位已下跌到被迫和“四姓”以外的人通婚的程度——當然，代價要相當。雖然他們在地方上依然擁有巨大的特權和勢力，可以和中央政府爭奪權勢，但太宗完全可以期待，一旦氏族按照它們的政治身份和社會地位排列，皇族及其主要支持者應遠遠排在“四姓”之前。

編纂工作由太宗的一些資深的官員擔任，其中沒有一人出身于世家大族；這項工作包括仔細審查支持每個家族權利的文獻。

可是，概要編完后，主要的編纂官高士廉把書呈獻皇帝，太宗看到高祖時的大臣、山東（今河北、河南、山東一帶）“四姓”之一的崔民干的氏族竟高居第一位，而皇族居第三位，立刻勃然大怒。這清楚地表明，在唐初，社會地位仍然與政治權力無關。太宗因此否定了這一工作，命令從新編纂，新編要求排列氏族的地位要和其成員在唐朝官僚機構中的官職直接聯系起來。

這一本題為《貞觀氏族志》的修訂本，于638年編成后送呈皇帝。它把皇族和最高級官員的氏族排在第一位，高祖和太宗的母系親戚排在第二位，崔氏排在第三位。[[67]](#_67_Xiang_Qing_Ke_Can_Kao___Jian)

這是一個有意識的政治行動，它試圖貶低東北貴族世家的社會地位和名望，同時公開肯定李氏和李氏支持者的崇高地位。可是“四姓”的社會威望似乎沒有受到什么損害。太宗的最有名的三個大臣房玄齡、魏徵、李世勣都和“四姓”氏族聯姻，雖然皇帝力圖貶低他們的社會地位。[[68]](#_68___Xin_Tang_Shu____Juan_95_Di)甚至遲至9世紀的文宗皇帝還在哀嘆，盡管李（唐）氏君臨天下已經200余年，可是想和皇族聯姻的人還是比想和舊“四姓”氏族聯姻的人少。[[69]](#_69___Xin_Tang_Shu____Juan_172_D)

### 考試制度

太宗治下的唐政府，繼續用科舉出仕和提倡學術的辦法來鼓勵文人階級。

太宗即位后，舉行官方考試的次數大大增加。幾乎每年都有來自各地的應試者參加考試，并受到皇帝的親自接見。[[70]](#_70___Wen_Xian_Tong_Kao____Juan)太宗命京師和各道供給應試者的衣食，并頒布規定考試科目的詔令。

雖然如此，應試者的人數還是不多，中試者一年只十多人。為了給應試者提供學習的條件，京師建立了在國子監指導下的學校系統，[[71]](#_71___Tang_Hui_Yao____Juan_66_Di)負責所轄五個學校的課程；五個學校之中的三個，即國子學、太學和四門學建立于高祖時期。這些學校經過擴大和增加新校舍，足以容納2000多學生。[[72]](#_72___Tang_Hui_Yao____Juan_35_Di)另外的兩個學校是在太宗時期增設的，即628年建立的書學和632年建立的律學。[[73]](#_73___Jiu_Tang_Shu____Juan_3_Di)由于教學內容不同，這兩個學校面向下級官員和平民的子弟，他們不能指望做高官。

此外，朝廷還設立了一所專門學院——弘文館；它只讓皇族成員和高級官員的子弟入學。[[74]](#_74___Tang_Hui_Yao____Juan_64_Di)弘文館的前身是太宗在高祖時期建立的文學館；弘文館與文學館一樣，也有一個另外的職能，即充當太宗個人的咨詢機構和秘書處。它也是后來具有同樣職能的幾個機構的先驅，這幾個機構是武后時的北門學士、玄宗時的集賢院，尤其是翰林院；翰林院的成員自8世紀最后的幾十年以來成了重要的政治顧問。[[75]](#_75_Guan_Yu_Han_Lin_Yuan__Ke_Can)

隨著學校的擴大，幾千名學者和學生自各道進入長安，京師到處舉辦經史的講習。甚至對做皇帝“飛騎”的青年精英分子也提供教員講授經學，如果他們證明有能力，也準許應考。[[76]](#_76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

教育領域的這種活躍氣氛必然導致經學解釋上的各種矛盾，結果，太宗不得不下令編纂正統的經籍注疏。太宗命大學者顏師古校訂經書本文，638年，命孔穎達和其他學者作詳細的疏義。642年初稿完成，但還需要進一步加工，續訂工作一直繼續到7世紀50年代。這些經文和疏義就是眾所周知的《五經正義》，它依然保留著權威性，并為唐代的儒家經典教育奠定了基礎。[[77]](#_77_Guan_Yu_Jing_Xue_De_Xiang_Qi)

### 史 學

經書的標準文本和疏義的產生只是官方主持的學術活動形式之一。另一個可與它媲美的學術成就是編纂唐以前各朝的正史與建立官方修史的制度。[[78]](#_78_Guan_Yu_Tang_Chu_Shi_Xue_De)唐以前的官修史不幸已有好幾個世紀被忽視，不論在北朝和南朝都是如此。作為使新王朝合法化的根據，被看成是奉行天命的唐以前各朝的紀錄就是重要的證明材料。此外，高祖，尤其是太宗，都非常清楚歷史典型和前例的力量。舉史事為例和作比喻是當時討論政治的普遍形式。

編纂北魏、梁、陳、北齊、北周和隋各朝史書的工作始于622年，但由于朝廷致力于其他事務和指導不力，修史工作中斷，一直沒有完成。629年，太宗建立了一個新的修史組織，以房玄齡負總責，魏徵任主編；它于636年完成了梁、陳、北齊、周和隋朝各史。編修北魏歷史的工作因已有6世紀中葉的初稿，所以放棄了。但這項工作在636年以后繼續進行。新的晉代的歷史成于644—646年。636年修的那些史書中沒有大分裂時期諸王朝的志，但到656年太宗的繼承者高宗時期，這些志終于完成并送呈皇帝。

修史工作出現很多困難。如修新的晉史時，史官必須考慮現存的18家晉史。在寫此后的歷史時，梁、陳、北齊的紀錄雖然完備，但更重要的北周和隋的紀錄則一片混亂。隋代的很多檔案被王世充在洛陽毀掉，而更多的檔案是從洛陽往長安運送隋代圖書和紀錄的船只在黃河沉沒時損失的。太宗的史官盡力用私家的藏書和前朝皇族保存的紀錄彌補這一缺陷。他們親自訪問這些家族的成員，[[79]](#_79___Wei_Zheng_Gong_Jian_Lu)并搜集其他人的回憶錄，其中一人是以記憶力強而馳名的醫生。[[80]](#_80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91_D)

修史工作在一個欽定機構中進行，它與成立于629年的一個全新的政府組織——史館——合作。史館不僅負責編纂前代的歷史，還要隨時編纂本朝的歷史紀錄。

國家建立史館成為中國持續到20世紀的一個長期特征，而且編纂本朝紀錄的基本步驟也確立于唐初。[[81]](#_81_Xiang_Qing_Ke_Can_Kao___Jian)人們常忽視這一非常了不起的創新。前此的王朝史雖然也是由史官在皇帝主持下編寫并利用了國家檔案，但它仍是學者的私家著作。在太宗治下，修史——或者不如說是官方修史——成了一個官方任務。同時，歷史也成了集體學術項目，它作為一項日常工作，在大臣的指導下由文學侍從之臣來編寫。另一創新之舉是建立編纂本朝歷史紀錄的新制度。唐朝是編纂本朝諸帝“實錄”的頭一個王朝，這主要又是受到太宗的鼓勵，因為他一心想給后世留下他的歷史形象。

這種新的官修史工作很快就發展出了一個不受皇帝干預的真正而獨立的理想意識；而且就在太宗在位時期就發生了皇帝和史臣之間關于實錄內容不同意見的摩擦。但官方控制也給國家以歪曲紀錄的權力。例如，我們看到官方紀錄怎樣歪曲了太宗在創業中的作用和隱瞞導致玄武門政變的事實。

### 圖書的搜集和圖書館

622年，隋朝皇室藏書的十之八九在用船從洛陽運往長安的途中沉沒于黃河。劫余所存不過14000部，總計約9萬卷。高祖和太宗時期都致力于彌補這個災難性的損失。622年，高祖下令搜求死去學者們的藏書以充實皇室的收藏。到太宗即位時弘文館的藏書已有20多萬卷，學士們用了幾年時間把這些書分為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在整個太宗時期，他下令繼續搜求珍貴的和古代的書籍，并打算審正珍貴書籍的本文。在太宗晚期，他購買了一個有名的晉朝學者的藏書，全國各地學者也被鼓勵向皇室的圖書館獻書。[[82]](#_82___Jiu_Tang_Shu____Juan_80_Di)

這些學術項目吸引了官員中一大批學者精英人物參加。有很多參加過修史、解經，并在文學和學術崗位上任職的人，在太宗死后都躋身顯要。這樣的學術項目，使唐王朝得到了精英文人的擁護。

和佛教僧徒的關系[[83]](#_83_Xiang_Qing_Ke_Can_Kao___Jian)

除了官僚階層以外，最有勢力的集團恐怕就是佛教僧徒，太宗不得不面對他們所加于一個強大的集權政制的威脅。

太宗個人對佛教的態度看來是很消極的，他從不像虔誠的隋文帝和煬帝那樣大行布施和庇護僧徒。可是太宗清楚地認識到疏遠佛教團體（尤其是在他還沒有鞏固他自己的政權時）的危險性。因此，他作為皇帝的頭一個行動就是廢除他父親晚年提出的嚴厲的反佛教措施。此外，他給佛教以有限的庇護，讓僧徒在宮中行佛事，給幾千名僧尼以度牒。他還命令寺院給為唐朝戰死的人作法會，要他們祈求神靈護衛國家和保證國家的興盛，但這些措施的終極目的是世俗的和物質的。皇帝對佛教精神境界的興趣僅限于與國家利益一致的方面。

甚至自太宗初年起，他就清楚地表示了要控制佛教寺院活動的決心。627年，他采取行動以反對一個多年來的積弊，即以非法出家作為逃避賦稅的手段；629年，他下令對非法出家的僧徒要處以死刑。太宗的反佛教措施愈演愈烈。至少在一件事上他的措施是空前的。631年，他成了中國頭一個禁止僧尼受親生父母致拜的皇帝，因為這種舉動違反世俗社會的風習。雖然在633年他在佛教徒和他們的有勢力的支持者的壓力下接受勸告，廢除了這個命令，可是這一行動表示了這位皇帝對佛教教義產生的社會影響的關心。637年，他又命令男女道士在國家主持的一切典禮上都要居僧徒之上。同年，他還發布了一份攻擊佛教的告諭，說它是一個外國宗教，以詭詐和神怪誘騙輕信的群眾；又說，粗淺的佛教教義比不上淵奧的中國傳統的道教。同年的第三個措施是頒布“道僧格”，它提出了一個官方管制僧徒行為的世俗法律體制，而以前僧徒僅受體現“毗奈耶”（戒律）之中的宗教紀律的約束。639年，太宗命令僧徒遵守《佛遺教經》中規定的嚴格的行為準則，這部經據說是闡述佛臨死時的教導。這個命令嚴格限制僧徒參與世俗的和政治的事務，并以皇帝給予法律力量的宗教戒律來補“道僧格”之不足。

雖然以這些正式的措施控制僧徒和限制僧徒的世俗活動，但太宗無意消滅佛教。他繼續讓僧徒為兩個虔誠的隋代皇帝作忌日法會，并在634年命令把長安的一座宏偉的弘福寺獻給他自己的母親，以作紀念。太宗本人也參加寺中法事，并鄭重地對僧徒說明，他對道教的尊崇是必然的，因為皇室李氏是道教祖師老子的后裔。

但這些調和姿態是表面上的，太宗對僧徒和佛教基本上沒有好感，遲至646年太宗還指責佛教是庸俗而無益的信仰，它過去迷誤了許多帝王，而且用許偽愿的辦法欺騙人民。

與太宗關系最密切的僧徒是偉大的朝圣旅行家玄奘（600—664年）。玄奘在629年離開中國，在印度生活了15年之后于645年回到中國。玄奘回國后成了中國佛教史上的偉大人物之一，負責翻譯瑜伽學派（即中國所謂的法相宗）的主要經典。佛教史料強調太宗非常看重玄奘，并指出這種感情來自皇帝個人的信仰。

但沒有跡象表明，太宗對玄奘的興趣是由于后者倡導了新教義。他感興趣的是，玄奘是唯一對印度和中亞的地理、風俗、物產和政治等方面有知識的人。太宗確曾勸過玄奘還俗，在朝廷做官。此議雖不果行，但玄奘卻被說服留在長安的弘福寺從事他的繁重的譯經工作，而皇帝則對此提供優厚的津貼。

玄奘有三年沒有再見到皇帝。649年，在太宗死前不久，玄奘曾陪伴太宗到避暑離宮。據說太宗以未能早遇玄奘以弘揚佛法為憾事。太宗是否說過這樣的話是可疑的；如果說過的話一定是臨終時的皈依，因為此話和太宗畢生對佛教組織與佛教教義的敵視態度是格格不入的。[[84]](#_84_You_Jian_Wen_Si_Tan___Tang_F)

### 對外關系

漢代曾短期地控制東起朝鮮北部，西至塔里木盆地西邊，南到越南北部的一大片領土； 自此以后繼續興起的王朝都夢想恢復這個泱泱大帝國。隋代在幾個世紀的大分裂以后已開始恢復漢帝國的疆域，只是由于內亂才中斷了這一嘗試。太宗平定中國后，第二步就想以臣服周圍國家的方法來推行隋代對外進取的未竟之業。

當太宗初期，唐朝的經濟力量還很弱，所以他聽從顧問們的勸告不輕用武力。因此他對很多鄰國采取懷柔政策，有時以下嫁公主（實際上不是皇帝自己的女兒）的手段進行和親，[[85]](#_85_Dai_Mi_Wei____La_Sa_Hui_Yi)有時以外交手段破壞這些國家的內部團結。但所有這些情況很快就變了。630年，從前的北亞霸主東突厥汗國的滅亡在北部邊境造成了一個巨大的權力真空地帶，并且除掉了中國外部的最大威脅。這個新形勢，加上國內經濟實力的巨大增長，給太宗提供了一個執行大規模對外擴張政策的機會。

### 東西突厥

太宗最大的軍事成就在于平服東突厥，完全消滅了他們的軍事力量，因而從此改變了北亞的整個均勢達半個世紀之久。太宗成功地把唐和突厥的關系徹底翻了過來。高祖當時曾向突厥稱臣，現在卻親眼看到自己的兒子成了天可汗，即成了所有突厥人的君主。

但太宗成為天子后初次和東突厥的沖突并不太順手。626年陰歷八月末，太宗取得皇位后才幾個星期，隋末殘存的最后一個叛亂者梁師都勸說突厥入侵中國，顯然是想利用玄武門之變后太宗支持者和他兩個被殺兄弟的支持者之間出現的不和。東突厥的首領頡利可汗（在位時期620—630年）和他侄子突利可汗于是聯合他們的兵力，率領一支據說有10萬人的軍隊取道涇州（在長安西北約75英里）侵入現在的陜西省，抵達距京師西十多英里的渭河邊。涇州的守將是羅藝，他和被殺的太子建成關系很好，突厥所以能這樣快地進逼京師，表明他可能只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86]](#_86_Jian_Li_Shu_Tong___Tang_Shi)

據傳統說法，這時太宗用了一條計謀，把頡利可汗和他的主力軍隔開，并以他的一小支人馬把可汗包圍，然后勸誘可汗講和。按照傳統習慣，在渭水便橋上殺白馬為盟以后，據說突厥就退兵了。

但有證據表明，太宗不僅沒有俘獲突厥可汗，而且被迫送給突厥大量財寶以求退軍。有一條史料說，太宗聽從他的將領李靖的“空府庫”的勸告，以求突厥退軍；以后太宗無可奈何地提到此事時說它是“渭水之辱”。[[87]](#_87___Xin_Tang_Shu____Juan_93_Di)

但此后不久，東突厥的勢力急劇下降。627年，臣屬于突厥的薛延陀、拔野古、回紇等起兵反抗突厥的統治。同年的較晚時期，突厥境內遭大雪災，大部分牲畜死亡，從而引起了可怕的饑荒。628年，突利未能鎮壓反叛的種族，頡利就把他囚禁并處以鞭答。兩個首領的分裂更進一步消耗了突厥的力量。引起內部不和的另外的原因是：頡利嚴重地依賴粟特人和其他中亞人作行政官員，隨之便產生了突厥朝廷安土重遷的趨勢。突厥中的保守分子把這看做對傳統游牧生活的威脅，群起反對。

突利被釋放之后就秘密計劃謀反，他致函太宗要求許可他來長安。628年陰歷四月，突利為頡利所攻，請求唐軍援助。太宗決定不干預，認為如果他袖手旁觀，突厥就會被內訌搞得四分五裂。可是太宗確想利用這個機會與梁師都算老賬，后者此時占據現在陜北的河套，而突厥人也已不能保護他。628年春，唐軍包圍了梁師都的營帳，梁師都為自己的部下所殺。

太宗又以冊立近來反抗東突厥統治的各部所選出的新首領為可汗的辦法，進一步削弱了頡利的力量。新可汗毗伽承認唐朝對他的宗主權，也向唐朝進貢。很多以前臣屬頡利的部族，都轉向了新首領毗伽可汗。

到了629年，頡利竟處于這樣的困境，以致這一年的后期他公開宣稱自己是唐朝的藩屬。太宗不理會他這一姿態，此時他相信勝利已經在握，就派遣十多萬大軍在李世勣、李靖的率領下出征頡利，頡利的營帳這時設在戈壁（大漠）南部，被唐軍攻取，同時殺死許多人畜。頡利起初逃走，但在630年初他被唐軍追獲，押送到長安，當了政治人質了卻余生。

630年春，西北各部族首領到長安朝見，請求太宗接受天可汗的稱號；這個稱號含有最高宗主權和仲裁他們之間糾紛的權力的意義。雖然有些學者認為此舉結果產生了一個正式的政治體制，[[88]](#_88_Ru_Jian_Luo_Xiang_Lin___Tang)但這個意見很不可靠。不過在長安舉行的頌揚天可汗的典禮卻非常隆重，同時中國人還充分利用了這個稱號，因為他們認為它體現了——不管實際含義為時多么短暫——中國和突厥的命運的完全逆轉。

關于如何處理東突厥滅亡后的遺民的政策，朝廷出現了一場經久而熱烈的辯論。太宗采取了中書令溫彥博的建議，決定把突厥遺民安置在河套南部的中國境內。其部落應拆散，使之散居在中國的各個州縣從事農業；同時他們要接受中國文化的“文明影響”，以便最后失去自己的文化特性，永不成為中國的威脅。

許多朝廷中的名臣，其中包括顏師古、魏徵、李百藥等有名儒家學者，都反對把突厥人引進中國，特別是反對把他們安置在京師附近的地區，因為突厥的本性絕不能被中國生活方式同化，也不會受中國文化價值的影響。他們建議不如把突厥人安置在他們的草原故土，但在政治上分裂他們，以使他們不可能對唐構成軍事威脅。[[89]](#_89___Tang_Hui_Yao____Juan_73_Di)

皇帝的意見終于占了上風，決定把突厥遺民安置在中國境內，大約10萬人分布在從河北到今之陜西的中國邊境。最后大約有1萬人到長安定居，他們的幾個部落首領被封為唐朝的將軍。

和卓柴達木的8世紀的突厥碑文詳細地描述了被征服的突厥人的命運：[[90]](#_90_Le_Na__Ge_Luo_Sai____Cao_Yua)

突厥貴人的子孫淪為了中國人的奴隸，他們的清白的女兒下降到奴婢身份。貴人放棄了他們的突厥封號，接受唐朝的封號，臣服于中國可汗，為他盡力奉職五十年。對于他，他們曾遠征到東至日出外西至鐵門關。但他們把他們的帝國和政府機構都獻給了中國可汗。

太宗得天之助，消滅了東突厥帝國。他在鄂爾多斯和今內蒙古的邊境建立了強固統治之后，開始對西突厥使用同樣的分裂和征服政策。這時，他又大大得益于近來破壞突厥政治統一的嚴重的內部分裂。當東突厥在隋代和唐初屢次威脅中國的時候，西突厥正專心經營西方：它和拜占庭帝國聯合，壓迫波斯。高祖曾想和西突厥結好，用東西兩方夾攻的方法威脅東突厥可汗。但東突厥越衰微，西突厥越強盛。到了太宗時期，統葉護可汗統治下的西突厥統轄有東自今甘肅省長城西端的玉門關，西至薩珊王朝的波斯，南至克什米爾，北至阿爾泰山的廣大地區。

630年，統葉護所屬的一個部落叛亂并殺死了他，西突厥帝國因而崩潰。634年，西突厥沿著伊塞克湖和伊犁河分裂成由兩個集團控制的西東兩個聯盟，它們分別是弩失畢和都陸。

太宗巧妙地利用傳統的“以夷制夷”政策，以保持西突厥內部的不和。641年，他冊立統治西部聯盟的沙缽羅葉護可汗。作為對此事的反應，西部突厥帝國東部聯盟的統治者都陸可汗（在位時期638—651年）很快地入侵在他的對手統治下的幾個中亞綠洲，不久，又用計刺殺了沙缽羅葉護可汗。舊西突厥汗國再度統一以后，都陸可汗拘留唐使臣，并入侵甘肅的中國邊境。

642年，西突厥內部的幾個部落不滿意都陸可汗的統治，派使者到長安，請求另一個可汗做他們的統治者。太宗抓住這個機會，又冊立了另外一個新可汗，乙毗射匱。結果，都陸可汗很快失去了他所屬的大部分部落的支持，被迫逃入吐火羅國。乙毗射匱可汗遣貢使到唐朝請婚，以加強他和中國的關系。太宗默許了他的要求，條件是要他割讓五個塔里木盆地中的綠洲給中國作聘禮，其中的龜茲（庫車）、于闐（和闐）和疏勒（喀什噶爾）大概不是可汗給的。[[91]](#_91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94Xi)總之，太宗已經著手要以武力征服這個地區了。

### 中亞綠洲

隨著西東兩突厥帝國的衰微和滅亡，太宗有可能對塔里木盆地的諸綠洲王國建立中國的宗主權，其中有些王國的居民是印歐語民族。這些綠洲的燦爛文化是受伊朗、印度、阿富汗和中國諸文化的影響而培育成的；諸綠洲對唐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因為“絲綢之路”就通過這里。中亞、波斯、東羅馬帝國的商人通過這條路到達中國；因此，對這條路的控制是唐帝國政策的一個主要目的。

頭一個歸順唐朝的大綠洲是最靠近中國的、溫暖而富饒的高昌（喀喇和卓），它位于今新疆省東部的吐魯番附近。它受到的中國文化影響比其他綠洲國家更多。自498年以來，高昌國由其祖先（可能是中國人或半中國人）麴氏王朝統治，但到7世紀初期它已高度中國化了。在隋代和唐高祖時期，高昌處于西突厥的統治下，但630年隨著統葉護可汗之死，它日益處于東突厥處羅可汗次子阿史那社爾的勢力之下。630年，高昌王麴文泰和他的王后一同到唐朝，受到盛情接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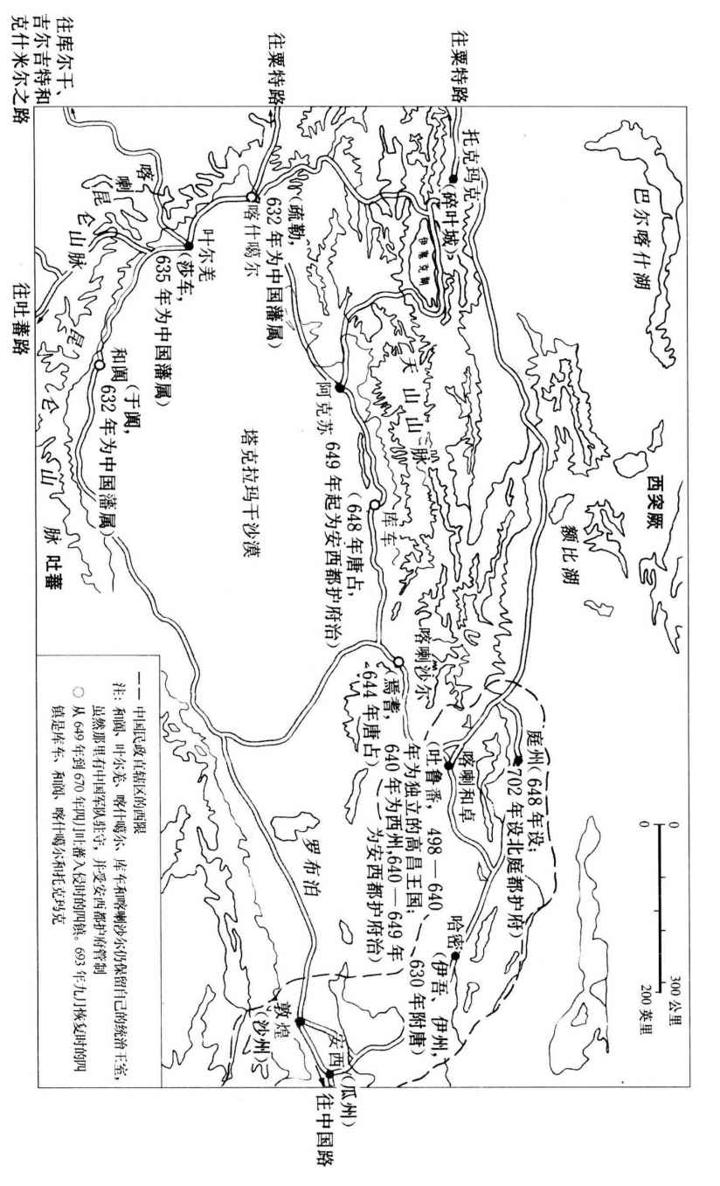
可是麴文泰回國幾年后，他開始封閉絲路，這是由于塔里木盆的此時發生了一個深刻的政治變化。636年，阿史那社爾決心到長安做唐朝的將軍。自638年以來，阿史那社爾在高昌的統治地位被西突厥東部聯盟的首領都陸可汗所取代。由于都陸的支持，高昌王才敢于藐視唐朝。從西方帶著貨物去往長安的商人不能繼續前進，高昌以西各國的貢禮也被截留。[[92]](#_92_Dao_Qi_Chang____Tang_Zhao_Zh)

由于這些困難，638年太宗準許高昌西南的另一個綠洲小國焉耆（喀喇沙爾）另開一條橫越沙漠到中國邊境的南路。麴文泰于是聯合西突厥攻擊焉耆和另一個綠洲小國伊吾（哈密），后者位于高昌之東，為通往長安的必經之路，近來改變它對西突厥的效忠而轉向唐朝。太宗命麴文泰作為一個藩臣親自來朝，但麴文泰置之不理。638年陰歷十二月，太宗命侯君集率軍遠征高昌。起初麴文泰把唐軍會跨越這么廣大的沙漠地帶遠征他的王國當做可笑的念頭，但他沒有料到侯君集的堅毅精神，當他聽到唐軍已近在眉睫時，據說他驚恐而死。西突厥曾應允高昌，如果后者遭到進攻就給予援助，于是派出一支援軍，但在唐軍到達時援軍竟轉頭逃跑。640年陰歷八月，麴文泰的兒子高昌新王舉國向侯君集投降。

太宗決心把高昌并為中國的一部分。[[93]](#_93___Tang_Hui_Yao____Juan_95_Di)魏徵和褚遂良二人極力反對中國直接統治這個綠洲王國，因為它離中國太遠，需要很多中國部隊駐守，在征集戍兵和供應上都有困難。魏徵堅決否認這個地方的歸并能使中國得到任何實利。[[94]](#_94___Wei_Zheng_Gong_Jian_Lu)但太宗對這個勸告置之不理。高昌成了中國的一個州——西州，其后不久，唐在那里設立了安西都護府以治理周圍地區。都護府兼管文、武兩方面的事務，使用中國文官而由一支常備軍支持。它是太宗及其繼承者所建立的幾個治理承認中國權力的外國民族的機構中的頭一個。[[95]](#_95_Guan_Yu_An_Xi_Du_Hu__Jian_Da)它所轄的區域從甘肅極西的敦煌（沙州）直到西面的焉耆邊境。

受印歐文化影響的焉耆，自632年以來就是唐朝的朝貢國，可是它很快因中國在緊靠它的、相距不到100英里的西州設立都護府和駐軍而不安。因此它和西突厥聯盟并停止向中國朝貢。結果在644年后期，安西都護郭孝恪出征焉耆，俘虜了國王，打敗了西突厥的援兵。于是焉耆恢復了對唐朝的朝貢關系。648年，焉耆國王被他的一個從兄弟推翻，當時為唐朝效勞的突厥首領阿史那社爾再度侵入該國，另立了一個王室成員做國王。新國王恭敬地自稱是一個忠于唐朝的藩屬。

不僅焉耆感到日益增長的中國勢力威脅著中亞。它的西面是龜茲（庫車）綠洲，龜茲是塔里木盆地所有王國中受印歐文化影響最深的綠洲。國王蘇伐雖然名義上是唐朝藩臣，卻援助了644年焉耆的反唐叛亂，停止向唐朝納貢。648年，阿史那社爾在處置焉耆后，就進軍攻占龜茲的都城，將龜茲置于安西都護郭孝恪統治之下。以后不久，龜茲的殘余勢力聯合西突厥部落奪回國都，殺死郭孝恪。但阿史那社爾的軍隊很快重占該城；在另外五個龜茲的大城陷入他手之后，其余的城也都投降了。11000多名降服的居民死于刀下，作為對郭孝恪之死的報復。焉耆和龜茲的征服對中亞的印歐文化和文明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從此它再也沒有恢復。[[96]](#_96_Ge_Luo_Sai____Cao_Yuan_Di_Gu)



地圖7 太宗進入中亞圖

這些國家的臣服意味著唐朝統治了幾乎全部塔里木盆地，因為有三個西部綠洲國家在幾年以前已經自愿臣服于唐朝，它們是：疏勒和于闐（632年臣服）莎車（葉爾羌，635年臣服）。649年初期，安西都護府的治所從高昌西移到龜茲，建立了歸它節制的龜茲、疏勒、于闐和焉耆四鎮，從而控制了中國在塔里木盆地的領土和今蘇聯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境內伊塞克湖周圍的地區。[[97]](#_97_Yi_Lai_Xian_Tai_Lang____Zhon)

### 吐谷渾和吐蕃

青海湖周圍地區和今青海省的黃河源頭是吐蕃化的鮮卑族——吐谷渾——的故鄉。隋煬帝在608年曾把他們從故鄉趕出，但當隋末國內大亂時，吐谷渾趁中國衰弱又恢復了他們的舊領土，并再次侵襲中國西北邊境的諸州。唐朝興起以后，吐谷渾可汗伏允曾率兵幫助高祖攻擊甘肅的“叛亂者”李軌；高祖把伏允的兒子、被煬帝扣在中國作人質的伏順送還，作為報答。此后，吐谷渾和新王朝繼續保持比較親切的關系，直到634年他們的使臣在從長安朝貢后的歸途中掠奪中國邊境時為止。唐太宗命年老的伏允可汗親自到唐朝，但伏允未予置理。結果，可汗的一個兒子與唐“公主”的婚約被取消，吐谷渾于是入侵中國西北邊境以圖報復。

634年后期，太宗大興問罪之師，命李靖和侯君集率軍進政吐谷渾。五個月以后，唐軍多路分兵西進，經過幾百英里的荒無人煙之地，在青海湖東北黃河源頭附近追及吐谷渾，幾次戰敗吐谷渾軍，并俘獲其貴族多人和幾十萬頭牲畜。但伏允可汗經過沙漠逃往于闐。唐軍緊追不舍，但他未被捕獲，最后被其士兵所殺，或者自殺身亡。

伏允之子伏順為伏允嫡妻所生，過去因在隋朝作人質而沒有被立為太子。這時，伏順廢了原來取代他的太子，自立為君，舉國投唐。太宗認為伏順成長于中國，易受唐朝的政治影響，因而滿意地承認他為新可汗。

但吐谷渾的政局依然不穩定。高度漢化的伏順得不到他本國人的支持，繼續要求唐軍幫助以維系他搖搖欲墜的政權。盡管有中國的幫助，但在635年末，伏順被他的下屬所殺；在太宗朝余下的時間里唐軍多次進入吐谷渾境內以圖穩定政局，但是迄無成效。[[98]](#_98_Jia_Bu_Li_Ai_La__Mo_Er____Co)

雖然中國顯然對這一事情不甚了了，但吐谷渾局勢不穩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來自擴張中的吐蕃聯盟的日益加大的政治壓力；7世紀30年代以來，吐蕃一直在蠶食吐谷渾的屬部。

直到隋代，吐蕃是被許多兇猛好戰的部落所占據，它們就是中國人所說的土波、土魯波或最常見的通稱吐蕃，他們之間內戰不息。但在6、7世紀之交，吐蕃的中、南部諸部（拉薩周圍）在一個首領論贊索的統治下統一起來，論贊索的兒子松贊干布（在位期為605？—649年）成功地把全吐蕃統一成一個緊密的聯盟。

到了唐初，吐蕃人把領土從南面的喜馬拉雅山擴張到南山山脈，還從克什米爾邊境擴張到四川的邊緣。在高祖時，吐蕃已開始對中國西北邊境施加壓力，在623年，又侵犯隴右道（甘肅）邊境的一個州。634年，它與唐朝建立外交關系，并派使臣進貢。這是整個唐王朝時期約100個這類官方和非官方使團中的頭一個。

幾年以后，吐蕃王松贊干布聽說唐朝的“公主”們曾嫁給突厥和吐谷渾的可汗，他也因此要求同享這樣榮譽。不幸的是，太宗因低估了吐蕃的力量和侵略性而拒絕了這一要求。于是吐蕃進攻四川西境的松州，在唐軍以慘重的損失為代價把他們趕走之前，他們以強大兵力圍困了松州數日。這次進攻雖然被打退了，可是中國也認識到了必須和這個可怕的新鄰國周旋，所以當641年松贊干布再次請婚時便立即應允。[[99]](#_99___Tang_Hui_Yao____Juan_97_Di)

這次和親帶來了中國和吐蕃此后20年的和平關系；吐蕃在此時期逐漸鞏固了它已占有的吐蕃文化區，并發展成為一個直到9世紀中葉都是中國最成問題的鄰邦。雖然經歷了640年和641年的事件，太宗的朝廷對中國西部邊境這個新威脅的程度之大還無所體會。

### 薛延陀

薛延陀是鐵勒15個部中最強的一部；鐵勒為突厥民族，原住今新疆北部（準噶爾）的烏倫古河和塔爾巴哈臺流域。[[100]](#_100_Yi_Qian_Xue_Yan_Tuo_Bei_Ren)太宗初年，薛延陀和另一鐵勒屬部回紇起兵反抗它們的統治者東突厥，并集合鐵勒的其余部落，由它們共同控制。如上所述，這次叛亂是唐朝征服東突厥的一個有利因素。

東突厥遺民被安置在中國北部邊境以后，薛延陀占據了從鄂爾多斯到鄂爾渾河的原來東突厥的領土。

641年，突利可汗的一個弟弟企圖行刺皇帝（太宗），于是唐朝想把突厥人遣回他們的游牧故地。但薛延陀堅決反對他們回來，又把他們趕回中國。后來，太宗又把突厥人遷到長城以外，這只能使薛延陀攻擊他們，并開始經常襲擾中國邊境。

薛延陀可汗是個暴君，臣民都痛恨他。645年，回紇人發動了一次針對他的起義，太宗決定利用這個機會發動進攻，不僅要消滅薛延陀的力量，而且要消滅所有的鐵勒部落的勢力。唐朝、突厥及其他非中國民族的聯合大軍剛一到達，薛延陀可汗就逃走了，后被回紇部民殺死。一旦薛延陀的新可汗向唐朝稱臣，其他鐵勒部落也紛紛效法。646年秋，太宗到長安之西受降并接受它們的貢禮，同時刻石立碑，親自作詩紀功。

### 高 麗

隋煬帝三次試圖征服這個朝鮮的王國高麗未遂，并在征討過程中毀滅了他的大帝國。幾次戰爭也使高麗蒙受嚴重損失，戰爭的瘡痍到618年高麗嬰陽王（在位時期590—618年）死去和異母弟榮留王（在位時期618—642年）繼位時還沒有痊愈。高麗的權力轉移與中國建立新王朝同時，所以兩國的友好關系得以恢復。619年，高麗再度承認中國的宗主權并忠誠地向唐朝納貢。過了三年，榮留王接受高祖的建議，交換雙方在隋代遠征時的俘虜。高麗共遣返了約1萬中國戰俘。[[101]](#_101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99S)但很多中國人在隋末大亂時逃到朝鮮避難，在遣返戰俘后，還有相當多的中國人留在高麗。在7世紀20年代，高麗謹慎地沿遼河西岸建造大量堡壘，以防中國人再度入侵。這條防線用了大約10年的工夫才完成。

唐朝和高麗雙方都有足夠的理由要謹慎行事。高祖在位的大部分時間忙于平定國內叛亂，中國的經濟還沒有從10年內亂中恢復過來，唐朝還沒有任何能力進行對外冒險。而高麗則希望有一個和中國持久友好的時期，以便收復在抗隋戰爭中被南部新羅、百濟所奪去的領土。

可是隨著太宗對唐朝的軍事力量越來越自信，隨著中國經濟的恢復，隋煬帝在高麗的災難性失敗對太宗來說逐漸變成了一個難以忘懷和帶挑戰性的問題。到了641年，太宗公開對朝廷說，高麗在漢武帝時曾是中國的一部分，如果唐朝從陸、海兩方進攻，高麗可能再度被征服。[[102]](#_102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同年，他似乎已采取了一個實際步驟，即派職方部郎中陳大德偵察高麗的軍事勢態和防御工事，作為唐朝進攻的第一步；職方部為負責收集情報，測繪邊區地圖和維護邊境防御設施的中央機構。

一個對高麗發動戰爭的借口是在642年出現的，當時長安得到消息說，負責沿遼河修筑堡壘并以對中國強硬聞名的泉蓋蘇文，在高麗朝廷的黨派斗爭中獲勝，并在發動的一場政變中殺死了榮留王（他名義上是唐朝的藩臣）和他的100多支持者，泉蓋蘇文立榮留王的弟弟大陽王之子寶藏王為新王（在位時期642—668年），自立為軍事統帥——大莫離支，執行更加擺脫中國影響的獨立政策。

太宗雖有了干涉高麗的足夠理由，但還沒有立刻采取行動。他提醒他的朝臣，進攻高麗的不可缺少的基地東北平原，仍遭受著20年前內亂所造成的經濟破壞。

可是不久，朝鮮發生的幾件事迫使他攤牌。三個朝鮮王國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緊張，高麗對中國的態度越來越敵對。643年的后期，聲稱是中國藩屬的新羅報告唐朝說，高麗聯合百濟在幾條戰線攻擊新羅，并切斷新羅貢使前往長安的路線。太宗用外交手段阻止高麗侵略新羅的行動無效，泉蓋蘇文甚至拘留一個唐使。太宗于是決定親自征討這個犯上的國家。

出征高麗的計劃在太宗的大臣中是不受歡迎的，他們不禁回想起隋煬帝在朝鮮戰爭中的慘重失敗。太宗最親密的顧問長孫無忌強烈反對任何遠征，褚遂良極力諫止太宗親征。唯一似乎贊成入侵朝鮮的宰相是太宗最有權勢的大將李世勣，他提醒朝廷，由于以前沒有采取強硬手段對付敵人，以致它后來悔恨不已。

盡管朝臣們反對，太宗還是決心實行自己的計劃，644年秋，開始精心準備遠征。大部分軍隊被調到東北，一部分軍隊奉命探測高麗在遼東的防御。建造了400艘船往東北運糧。幾個月以后，太宗前往洛陽，那里是他到前線的第一站。他在洛陽召見并詢問了以前的隋朝官員、曾參與過隋煬帝進攻高麗的鄭元璹。雖然鄭元璹告誡太宗，唐軍將遇到供應上的困難，并且事實證明，高麗具有守城能力，但太宗依然充滿勝利的信心。[[103]](#_103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太宗在洛陽向全國發布了一份詔書，宣告討伐高麗的道義上的理由：泉蓋蘇文是個弒君者和專橫暴虐者，他侵略忠誠的中國藩屬新羅，因此必須受到懲罰。實際上，太宗所以念念不忘高麗可能有其他更為重要的原因。唐王朝要完成隋煬帝的未竟之業和收復中國的舊疆這種雄心壯志起了一定的作用。戰略上的考慮也起了作用，因為出現了高麗統一整個朝鮮半島的危險，而中國的利益在于保持朝鮮分裂，防止它與東滿洲的靺鞨或與日本聯盟。此外，太宗在643年的繼位爭論（見下文）后碰到了嚴重的個人危機，因而感到有必要離開朝廷親自行動。

645年春太宗到達前線，進攻開始。太宗親率大軍和他的大將李世勣直驅遼東，[[104]](#_10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同時由大將張亮率領海軍43000人分乘500只船從海道進攻高麗首都平壤。在開始時，一切順利。在遼東獲得鼓舞人心的進展，陰歷五月，唐軍攻克了曾頂住隋煬帝幾次遠征的高麗重鎮遼陽（遼東城），從而使進展圓滿結束。遼陽是在中國人修筑了一條橫越遼河沼澤地帶的堤道后攻下的。[[105]](#_105_Tong_Shang_Shu__Di_6220Ye)但看來太宗犯了一個戰略上的錯誤，因為他沒有放下遼東的不太重要的目標而深入朝鮮半島占領平壤。太宗可能想依靠海上入侵去占領這個目標。但看來他這個計劃失敗了，中國史料對其結果幾乎始終沒有提及。

在遼東，太宗的軍隊被阻在遼陽西南的重鎮安市城。在經過兩個月的無效進攻之后，太宗考慮到即將來臨的朝鮮的嚴冬，不得不命令撤軍。即使這樣，在歸途中唐軍還是遭到大風雪的襲擊，死了幾千人，整個遠征以災難性的失敗而告終。

太宗討伐泉蓋蘇文的失敗，使后者對中國的態度更加傲慢。他開始拘留唐使并重新入侵新羅。647年初，太宗再度進攻高麗。和以前一樣，唐軍在牛進達和李海岸統率下取得一些進展，甚至在一次大戰中戰敗高麗軍，但結果還是不能取得決定性勝利。

這位皇帝依然決心與高麗周旋到底。647年的晚期，太宗命令四川及其以南諸道建造龐大的艦隊，準備大規模入侵高麗。記載太宗晚期的史書生動地描述了這些地區民眾的苦難，他們為了從財政上支持建設海軍，承擔了沉重的勞役和繁苛的賦稅。648年，四川甚至發生一起小叛亂。[[106]](#_106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648年陰歷六月，太宗宣稱將在次年以30萬大軍徹底粉碎高麗。甚至他的老朋友和顧向，宰相房玄齡臨終時懇求，請他放棄這次消耗國力的和師出無名的遠征，他也沒有聽從。[[107]](#_107___Jiu_Tang_Shu____Juan_66_D)

當第二年太宗去世的時候，以打擊他的可惡敵人為目的的決定性遠征尚未發動起來，他所嘗到的唯一一次大失敗的苦果尚余味未盡。

征服高麗的慘敗雖給太宗本人蒙上一層陰影，但幾乎沒有削弱唐朝在亞洲的日益增長的力量。由于帝國邊境的擴展和聲威遠播，邊遠的民族，如住在中國極北部（可能是在中西伯利亞）的骨利干族、住在烏拉爾東部的赤發碧睛身材高大的高加索種族吉爾吉斯（結骨、黠戛斯）族，開始源源不斷地向長安進貢。遠在中國之西的國家也遣使前來。638年，波斯薩珊王朝的最后一個王伊嗣侯三世也派遣他的兒子卑路斯到長安，可能是請求中國幫助抗擊正在侵略其王國的阿拉伯人。太宗沒有允許，伊嗣侯和他的王朝因而滅亡。943年，太宗接見拂菻（拜占庭帝國的敘利亞省）王的使臣，據說這是東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二世派往中國的使臣。到太宗時，長安已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都市。它接待了來自亞洲各國的使臣，居住著許多不同種族的民族，它的學院和寺院也給高麗、新羅、百濟、吐蕃和高昌等國的王室子弟提供了學習的機會。[[108]](#_108___Tang_Hui_Yao____Juan_35_D)

隨著大批外國人流入長安，外國貨、外國娛樂、外國風俗和外國宗教也同時引進。佛教在這時已在中國長期流行，當然不再是外來宗教，但到太宗時期，由于最有名的中國朝圣者玄奘的回國，佛教與其印度及中亞根源的關系又得到恢復和加強。據17世紀發現的781年立于長安的一塊石碑記載，在此以前不久，景教僧阿羅本（可能是羅本〔Reuben〕）在635年曾來唐并受到太宗的歡迎。看來，太宗對這種宗教是喜歡的，所以下令把阿羅本帶來的景教經典譯為漢文。

## 繼承問題的斗爭

在太宗朝的前半期，太宗的家庭生活相對平靜，只是由于636年他的妻子兼密友文德皇后長孫氏去世才有了波折。在7世紀40年代初期，隨著他兒子們都已成年，兩個皇子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繼位斗爭。這場沖突是太宗自己無意中促成的。兩個對手一個是文德皇后所生的長子太子承乾，一個是魏王泰。有關這一時期的正史說李泰是文德皇后的第四子，但其他史料說他可能比他“大哥”承乾還年長，而且可能是太宗的另一個妃子所生。[[109]](#_109_C_P_Fei_Ci_Jie_La_De____Wu)

雖然承乾因患嚴重腿病而跛足（可能是痛風或畸形足），可是在太宗剛即位后不久的626年陰歷十月就立他為太子了。[[110]](#_110___Jiu_Tang_Shu____Juan_2_Di)太子顯然聰明而能干，并且一到成年太宗便開始讓他處理日常事務，當太宗離京時命他留守京師。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對中國的朝廷官員來說，承乾的行為顯得在某些方面不正常和有失體統，很可能是精神失常。承乾不遵守中國的習慣和傳統，口說突厥話，他和他的仆從都穿突厥服裝。當朝廷官員們批評他這種粗野和不體面的行為時，他公然蔑棄中國禮法，竟打算殺害他們，由于沒有成功，他的這些活動當時沒有泄露。[[111]](#_111_Guan_Yu_Cheng_Gan_Zhi_Shi_D)

甚至在639年以前，當承乾的越禮行為尚未最后成為公開丑聞時，太宗已明顯地在所有皇子中表現了對魏王泰的偏愛。[[112]](#_112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李泰聰明而有魅力，并且秉承了太宗的許多優秀品質。太宗在很多方面都表示喜愛李泰。936年，當其他皇子被封為世襲都督赴任時，太宗破格地允許李泰不外出任職，而為他建立了一個類似太宗自己早年在洛陽建立的機構——文學館。642年，李泰在新建的王府廣招文學之士，每月的花費甚至超過了太子。[[113]](#_113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李泰當然會把太宗有增無已的恩寵當做有希望繼位的征兆。他左右的一幫年輕而有非分之想的官員也希望他代承乾為太子，以便附驥沾光。承乾的日益反常的行為看起來是有可能導致他被廢棄。李泰左右的這一伙人中有房玄齡的兒子房遺愛和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

因此在繼承問題上，在太宗朝廷中第一次出現了兩大勢力集團，一個支持承乾，一個支持李泰。為了防止官員分化成兩個各懷擁立目標的對立集團，太宗宣稱，如果因故廢了承乾，承乾的尚在襁褓中的幼子將繼承乾之位。

在這期間，太宗用各種方法改進太子的行為，方法之一是在643年初期指定剛直而重道德倫理的魏徵為太子的老師。但改造承乾的希望微乎其微，于是太宗決心不使太子受其左右親信的壞影響。643年初期，他殺了太子的三個親信，一個是太子的寵侍歌童，另兩個是以異端誘惑太子的道士。

太子懷疑自己和孌童的關系是李泰告訴太宗的，并對太宗的日益嚴厲的態度越發警覺起來。于是他計劃殺害李泰和除掉他父親。參加太子這個計劃的有杜如晦的次子、他的長期親信杜荷和在征討高昌之役中因行為不端受處分而心懷不滿的將軍侯君集、太宗的異母幼弟并對太宗的屢次訓斥日益厭煩的性格粗野的漢王李元昌。

幸虧另一個皇子齊王李祐謀反失敗，使李承乾的陰謀還未實行就暴露了。李祐叛亂計劃的參與者之一紇干承基就是承乾指使謀殺太宗的人。紇干承基揭發了太子的陰謀，使朝廷更加吃驚。643年陰歷四月，承乾被廢為庶人，囚禁在現在的貴州邊境，死于644年末。[[114]](#_114___Jiu_Tang_Shu____Juan_3_Di)承乾的支持者的下場更壞。漢王元昌奉命自殺，杜荷和侯君集被斬首。[[115]](#_115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雖然太宗以前曾宣布不廢除承乾子嗣的繼承權，可是他特別寵愛李泰；隨著承乾的被廢，他現在宣布有立李泰為太子的打算。李泰的追隨者當然熱烈支持；但太宗的有權勢的老臣長孫無忌卻極力反對這個計劃，主張立當時快滿15歲的李治為太子。于是朝中分為對立的三派：即原來支持承乾而現已瓦解的一派；支持李泰的一派；以長孫無忌及其他大臣為首的支持李治的一派。[[116]](#_116_Sun_Guo_Dong____Tang_Zhen_G)

但是，因皇帝的意見受到最有勢力的顧問們的反對和由此產生的對政治安定的威脅所造成的艱難局勢，很快得到了解決。李泰本人開始暗地里威嚇李治，因李治過去和新近被處死的漢王關系很好。隨著新陰謀的暴露，太宗沒有其他選擇，只有被奪李泰的爵位并把他驅逐出京。這種家事的煩惱使得太宗的精神瀕于崩潰。他抱怨三個兒子和一個兄弟都背叛了他，只是由于褚遂良的阻攔他才沒有飲恨自盡。

對于繼承問題，太宗沒有什么選擇余地了。由于李治受到有影響的大臣們長孫無忌、褚遂良和房玄齡的有力支持，太宗于是在643年陰歷四月正式立李治為太子。同時，為了使李治受到嚴格的教導，一批有很大權限的官員被任命為他的老師，其中包括長孫無忌、房玄齡、年老而固執的蕭瑀和李世勣；同時另有一批地位較低但有才能的官員被派在太子府中任職，以使滿朝文武都能團結一致地擁戴他。

可是太宗仍然認為，他是被迫作了錯誤的選擇，而且懷疑意志軟弱的李治不能有效地治理國家。643年末，太宗又想以另一皇子吳王恪做太子；李恪的母親是隋煬帝的女兒。[[117]](#_117___Jiu_Tang_Shu____Juan_65_D)李恪英武像他父親，太宗自然被他吸引。但長孫無忌再度干涉，他批評太宗反復無常，并堅持認為李治會成為一個卓越的統治者。正像中國歷史家很早就指出的那樣，長孫無忌可能有意擁戴李治，但他支持李治是希望李治一旦即位他自己將能繼續左右朝政。[[118]](#_118_Sun_Guo_Dong____Tang_Zhen_G)

因此，繼承問題再無變動，649年陰歷五月，享年不足50歲的太宗在久病后去世，李治即位，成為唐代的第三個皇帝高宗。

對一個盛世來說，太宗晚年是個不幸的結局。當645年發動給他蒙上一層失敗陰影的遼東戰役時，太宗患了一種精力耗竭的衰弱癥，以致很多日常工作不得不由太子代勞。雖然他早年曾屢次嘲笑過去那些執迷不悟地尋求長生和靈丹妙藥的帝王們，但他現在極力想減輕病痛，也找來一個印度巫師那羅邇娑婆寐治療。[[119]](#_11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太宗越來越仔細地研究他過去的成就，并且關心他的兒子到底會成為一個什么樣的皇帝。為此，他寫了一部四卷本的政治遺言《帝范》，揭示了他對于為人之君的理想。

雖然太宗的統治以低調告終，但它是唐代的第一個鼎盛時期，而且在某些方面在整個中國歷史上是無與倫比的。他留給他的繼承者一筆龐大的遺產：合理和高效能的行政機構、繁榮的經濟及廣大的國土。雖然他在高麗的失敗投下了陰影，但在一定程度上全國出現了自漢朝全盛時期以來所沒有的興旺景象，一個充滿自信的、安定的和繁榮的局面。顯然，太宗時代的清平之治一定會使那些在他死后的不穩定的甚至危險的年代中繼續供職的官員們產生深沉的追思。

隨著時間的流逝，太宗的威信和榮譽也隨之增長。對后世的中國文人來說，太宗代表了一個文治武功理想地結合起來的盛世：國家由一個精力充沛但聰明而謹慎的皇帝治理，他牢固地掌握著他的帝國，同時又一貫謙虛耐心地聽取群臣——這些大臣本人也都是卓越的人物——的意見。太宗的施政作風之所以被人推崇，不僅由于它的成就，而且由于它接近儒家的納諫愛民為治國之本這一理想，另外還由于它表現了君臣之間水乳交融的關系。

在武后統治的黑暗日子里，當群臣之間的良好而坦率的關系為惴惴不安和無窮的清洗及恐怖所取代的時候，就出現了要恢復太宗之治的理想。安祿山之亂以后，當大大地削弱了的中央政府被迫采用各種只求茍安的權宜之計時，當皇權旁落而由宦官或私人仆從玩弄權柄時，太宗之治就顯得無比的強盛和成功了。

后來，吳競在705年編撰名著《貞觀政要》，記述了太宗和群臣有關國家長治久安之策的討論，編者希望在武后統治了半個世紀之后，太宗的行政作風能予以恢復；此書成了帝王資治的基本手冊，后世探求治國之本的帝王們及極力說服皇帝納諫的大巨們都熱心研究。此書也為朝鮮人和日本人所愛讀，后來被譯為西夏、契丹、女真、蒙古和滿洲等文字，以供西夏、遼、金等朝的統治者參考。它形象化地體現了太宗之治的作風，因此風靡東亞，成了強有力的政治理想。

還有一件有趣的事值得注意，《貞觀政要》有一部軍事方面的姊妹篇《李衛公問對》。這部書的現在形式很像宋初的偽作，但也包含一些真的內容，它記述了太宗和他的名將李靖討論的各種戰略問題。[[120]](#_120_Guan_Yu_Zhe_Bu_Shu__Jian_Bi)此書竟被塑造成一部與《貞觀政要》形式相同的著作，以顯示太宗在軍事上也堪為楷模；這件事本身就突出了后世對他的特別崇拜之情。在后世人眼里，太宗朝文治武功并盛，既空前又絕后。

[[1]](#_1_3)太宗生年有幾種不同的說法，即有從生于597年到生于600年四種年頭的說法。

[[2]](#_2_3)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1955年），第175頁。

[[3]](#_3_3)《舊唐書》卷61，第2369頁。

[[4]](#_4_3)《舊唐書》卷51，第2163—2164頁。

[[5]](#_5_3)賓板橋：《唐朝的建立：隋之滅亡和唐之興起》（巴爾的摩，1941年），第49頁。

[[6]](#_6_3)《唐會要》卷28，第531頁。

[[7]](#_7_3)《貞觀政要》，原田種成編印（東京，1962年）卷8，第241—243頁。

[[8]](#_8_3)《資治通鑒》卷192，第6053—6054頁；《貞觀政要》卷8，第241頁。

[[9]](#_9_3)《資治通鑒》卷192，第6034頁。

[[10]](#_10_3)同上書，第5031頁。

[[11]](#_11_3)《資治通鑒》卷192，第6026頁。

[[12]](#_12_3)《唐會要》卷30，第551—552頁；《資治通鑒》卷193，第6079—6080、6088頁。

[[13]](#_13_3)《資治通鑒》卷193，第6088頁。

[[14]](#_14_3)《唐會要》卷30，第553頁。原名永安宮，635年改名大明宮。

[[15]](#_15_3)《唐會要》卷30，第560頁。

[[16]](#_16_3)同上。

[[17]](#_17_3)同上書，第555頁；《資治通鑒》卷198，第6248頁。

[[18]](#_18_3)《唐會要》卷30，第560頁。

[[19]](#_19_3)《資治通鑒》卷198，第6248頁。

[[20]](#_20_3)《舊唐書》卷74，第2615—2618頁。

[[21]](#_21_3)同上。

[[22]](#_22_3)《魏鄭公諫錄》，王獻功刊本（長沙，1883年）卷1，第23頁。

[[23]](#_23_3)《資治通鑒》卷199，第6260頁。

[[24]](#_24_3)《帝范》（叢書集成本）卷2，第15—16頁。

[[25]](#_25_3)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大阪，1976年），第33—42、123頁；布目潮風：《隋唐史研究》（東京，1968年），第231—250頁。

[[26]](#_26_3)傳記載《舊唐書》卷65，第2446—2456頁；《新唐書》卷105，第4017—4022頁。

[[27]](#_27_3)傳記載《舊唐書》卷66，第2459—2467頁；《新唐書》卷96，第3853—3857頁。

[[28]](#_28_3)傳記載《舊唐書》卷66，第2467—2469頁；《新唐書》卷96，第3858—3860頁。

[[29]](#_29_3)見H.J.韋克斯勒《天子的鏡子：唐太宗朝廷中的魏徵》（紐黑文，1974年），第147頁。

[[30]](#_30_3)傳記載《舊唐書》卷71，第2545—2562頁；《新唐書》卷97，第3867—3882頁；又見韋克斯勒前書。

[[31]](#_31_3)傳記載《舊唐書》卷63，第2398—2404頁；《新唐書》卷101，第3949—3952頁。

[[32]](#_32_3)傳記載《舊唐書》卷80，第2729—2739頁；《新唐書》卷105，第4024—4029頁。

[[33]](#_33_3)傳記載《舊唐書》卷67，第2475—2482頁；《新唐書》卷93，第3811—3815頁。

[[34]](#_34_3)傳記載《舊唐書》卷67，第2483—2489頁；《新唐書》卷93，第3817—3822頁。

[[35]](#_35_3)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倫敦，1955年），第75—78頁；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重慶，1944年），第19頁以下；谷霽光：《安史亂前之河北道》，載《燕京學報》，19（1936年），第197—209頁。

[[36]](#_36_3)杜洽：《唐代府兵考》，載《史學年報》，31（1939年），第142—158頁；菊池英夫：《關于唐折沖府分布問題的一個解釋》，載《東洋史研究》，27.2（1968年）。

[[37]](#_37_2)見布目潮風《隋唐史研究》，第114—115頁之表。

[[38]](#_38_2)同上書，第317—341頁。

[[39]](#_39_2)《資治通鑒》卷191，第6004頁。

[[40]](#_40_2)H.J.韋克斯勒：《初唐政府中的宗派主義》，收于芮沃壽、崔瑞德合編《對唐代的透視》（紐黑文，1973年），第87—120頁。

[[41]](#_41_2)關于這一問題的詳細情況，見上引文章。

[[42]](#_42_2)《資治通鑒》卷192，第6043頁所說官員數目為643人；《新唐書》卷46第1181頁所列為730人，包括中央和地方；參考戴何都《〈新唐書〉百官志、兵志譯注》（萊登，1947年），第2頁注1。

[[43]](#_43_2)嚴耕望：《唐史研究叢稿》（香港，1960年），第237—284頁；此書也列了一幅639年都督府的分布圖。

[[44]](#_44_2)戴何都：《中國唐代諸道的長官》，載《通報》，25（1927年），第222頁。

[[45]](#_45_2)《唐會要》卷68，第1197頁。

[[46]](#_46_2)《唐會要》卷77，第1411—1412頁。

[[47]](#_47_2)《資治通鑒》卷198，第6234頁；《唐會要》卷77，第1412頁。

[[48]](#_48_2)《舊唐書》卷50，第2139頁；《新唐書》卷56，第1411頁。

[[49]](#_49_2)自627年以來，關于斷肢之刑的爭論持續好幾年，見《唐會要》卷39，第707—708頁；《舊唐書》卷50，第2135—2136頁。

[[50]](#_50_2)《舊唐書》卷50，第2139—2140頁。

[[51]](#_51_2)《舊唐書》卷50，第2135—2136頁；《唐會要》卷39，第707頁。

[[52]](#_52_2)《唐會要》卷39，第707頁；關于式和格的頒行，見《舊唐書》卷50，第2136—2138頁。

[[53]](#_53_2)《唐大詔令集》卷11，第67頁。

[[54]](#_54_2)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61—63頁及第140—141頁的注；戴何都：《〈新唐書〉百官志、兵志譯注》，第30—65頁、761—773頁及他處；賓口重國：《從府兵制到新兵制》，初發表于《史學雜志》，41（1930年），又收于作者的論文集《隋唐史研究》（東京，1967年）卷1，第3—83頁。

[[55]](#_55_2)浦立本：《隋唐時期之戶口登記》，載《東方經濟和社會史雜志》，4.3（1962年），第290頁及以后諸頁；崔瑞德：《晚唐的地方自治和中央財政》，載《大亞細亞》（新版），11.2（1965年），第211—232頁，特別是213頁。

[[56]](#_56_2)《舊唐書》卷49，第2122—2123頁；《唐會要》卷88，第1611—1612頁。

[[57]](#_57_2)《唐會要》卷88，第1612頁。

[[58]](#_58_2)《唐會要》卷46，第824頁。

[[59]](#_59_2)同上書，第824—827頁。

[[60]](#_60_2)《資治通鑒》卷193，第6089頁。

[[61]](#_61_2)《資治通鑒》卷195，第6145—6161頁；《唐會要》卷47，第829—830頁。

[[62]](#_62_2)《舊唐書》卷65，第2450—2451頁；《唐會要》卷47，第829—830頁。

[[63]](#_63_2)《資治通鑒》卷195，第6146頁。

[[64]](#_64_2)見642年褚遂良的諫書；《唐會要》卷47，第831頁。

[[65]](#_65_2)《帝范》卷1，第3—8頁。

[[66]](#_66_2)關于這個問題，可參考崔瑞德：《唐代統治階級的組成——從敦煌發掘的新證據》，收于芮沃壽和崔瑞德合編的《對唐代的透視》（紐黑文，1973年），第47—85頁和第83—85頁的參考書目。

[[67]](#_67_2)詳情可參考《劍橋中國史》第4卷中池田溫所寫的一章；此外還可參考竹田龍兒《關于貞觀氏族志編纂的一個考察》，載《史學》，25.4（1952年），第23—41頁。

[[68]](#_68_2)《新唐書》卷95，第3842頁。

[[69]](#_69_2)《新唐書》卷172，第5205—5206頁。

[[70]](#_70_2)《文獻通考》卷29，第276頁；《太平御覽》卷629，第1頁。

[[71]](#_71_2)《唐會要》卷66，第1157頁。

[[72]](#_72_2)《唐會要》卷35，第633頁；《資治通鑒》卷195，第6135頁。

[[73]](#_73_2)《舊唐書》卷3，第42 頁；《新唐書》卷48，第1267—1268頁；劉伯驥：《唐代政教史》（臺北，1958年），第93頁。

[[74]](#_74_2)《唐會要》卷64，第1114—1115頁。

[[75]](#_75_2)關于翰林院，可參考A.比紹夫《翰林》（巴黎，1964年）。

[[76]](#_76_2)《資治通鑒》卷195，第6153頁。

[[77]](#_77_2)關于經學的詳情，可參考《劍橋中國史》第4卷中麥克馬倫所寫的一章。

[[78]](#_78_2)關于唐初史學的詳情，可參考上注所引之書。

[[79]](#_79_2)《魏鄭公諫錄》卷4，第42—46頁。

[[80]](#_80_2)《舊唐書》卷191，第5096頁。

[[81]](#_81_2)詳情可參考《劍橋中國史》第4卷中崔瑞德所寫的有關政府制度的一章。

[[82]](#_82_2)《舊唐書》卷80，第2729頁。

[[83]](#_83_2)詳情可參考《劍橋中國史》第4卷中S.溫斯坦所寫的一章。

[[84]](#_84_2)又見溫斯坦《唐佛教形成時期帝王的庇護》，載芮沃壽、崔瑞德合編《對唐代的透視》，第265—306頁；芮沃壽：《唐太宗和佛教》，第239—263頁。

[[85]](#_85_2)戴密微：《拉薩會議》（巴黎，1952年），第1頁注2；鄺平樟：《唐代公主和親考》，載《史學年報》，2.2（1935年），第28頁注19。

[[86]](#_86_2)見李樹桐《唐史考辨》（臺北，1965年），第257頁。

[[87]](#_87_2)《新唐書》卷93，第3814頁；《資治通鑒》卷191，第6019—6026頁；王讜編：《唐語林》（上海，1957年）卷5，第152頁；李樹桐：《唐史考辨》第8章。

[[88]](#_88_2)如見羅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收于《唐代文化史》（臺北，1963年），第54—87頁。

[[89]](#_89_2)《唐會要》卷73，第1312—1314頁；《貞觀政要》卷9，第284—287頁；《魏鄭公諫錄》卷2，第8—12頁。

[[90]](#_90_2)勒納·格羅塞：《草原帝國》，諾亞米·沃爾福德英譯本（新不倫瑞克，1970年），第92—93頁。

[[91]](#_91_2)《舊唐書》卷194下，第5183頁；威廉·薩莫林：《十二世紀前的東突厥斯坦》（海牙，1964年），第59頁。

[[92]](#_92_2)島崎昌：《唐朝征討高昌國的原因》，載《中央大學文學部紀要》，14.4（1958年），第62—83頁。

[[93]](#_93_2)《唐會要》卷95，第1702頁。

[[94]](#_94_2)《魏鄭公諫錄》卷2，第13—14頁。

[[95]](#_95_2)關于安西都護，見戴何都《中國唐代諸道的長官》，第31—32頁。

[[96]](#_96_1)格羅塞：《草原帝國》，第100—101頁。

[[97]](#_97_1)伊瀨仙太郎：《中國西域經營史研究》（東京，1955年），第187—201、243—246頁；戴何都：《中國唐代諸道的長官》，第31—32頁。

[[98]](#_98_1)加布里埃拉·莫爾：《從北魏到五代時期的吐谷渾》（羅馬，1970年）。

[[99]](#_99_1)《唐會要》卷97，第1730頁；《資治通鑒》卷196，第6164—6165頁。吐蕃王國不僅要求通婚，還要求能讀寫漢文的人；吐蕃王室成員被派往長安上國子學。高宗初期，吐蕃還要求派人能傳授養蠶、釀酒、造紙和蓋碾房技術的技工。

[[100]](#_100_1)以前薛延陀被認為是Syr Tardush族，鐵勒被認為是Tolos族，但現在這個說法被證明不可信。關于他們的最早的突厥語名稱還沒有一致意見。

[[101]](#_101_1)《舊唐書》卷199上，第5321頁。

[[102]](#_102_1)《資治通鑒》卷196，第6169—6170頁。

[[103]](#_103_1)《資治通鑒》卷197，第6213頁。

[[104]](#_104_1)《資治通鑒》卷197，第6214頁。

[[105]](#_105_1)同上書，第6220頁。

[[106]](#_106_1)《資治通鑒》卷199，第6261—8262頁。

[[107]](#_107_1)《舊唐書》卷66，第2464—2466頁；《資治通鑒》卷199，第6260頁。

[[108]](#_108_1)《唐會要》卷35，第633頁。

[[109]](#_109_1)C.P.菲茨杰拉德：《武后》（倫敦，1955年），第215頁注9；松井秀一：《圍繞擁立武后的問題》，載《北大史學》，9（1966年），第16頁注48；岑仲勉：《唐史余瀋》（北京，1960年），第10—11頁。

[[110]](#_110_1)《舊唐書》卷2，第31頁；《新唐書》卷2，第27頁。

[[111]](#_111_1)關于承乾之失德，見《舊唐書》卷76，第2648—2649頁；《資治通鑒》卷196，第6189—6190頁。

[[112]](#_112_1)《資治通鑒》卷194，第6119頁。

[[113]](#_113_1)《資治通鑒》卷196，第6174頁。

[[114]](#_114_1)《舊唐書》卷3，第55、57頁；《新唐書》卷2，第42—43頁。

[[115]](#_115_1)《資治通鑒》卷197，第6193—6194頁。

[[116]](#_116_1)孫國棟：《唐貞觀永徽間黨爭試釋》，載《新亞書院學術年刊》，7（1965年），第39—49頁。

[[117]](#_117_1)《舊唐書》卷65，第2453頁；《資治通鑒》卷197，第6206頁。

[[118]](#_118_1)孫國棟：《唐貞觀永徽間黨爭試釋》，第46—50頁；《舊唐書》卷76，第2666頁。

[[119]](#_119_1)《資治通鑒》卷200，第6303頁；《唐會要》卷82，第1522頁；《舊唐書》卷3，第61頁；參考陳祚龍《論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溫泉碑拓本》，載《通報》，46（1958年），第376—396頁。

[[120]](#_120_1)關于這部書，見彼得·A.布德伯格未發表的博士論文《古代中國的戰爭藝術——〈李衛公問對〉研究》（伯克萊，1931年）。

# 第五章 高宗（649—683年在位）與武后：繼承人與篡位者

太宗對太子李治是否能有效治國的懷疑，被證明是有充分根據的。太宗的第九子李治是長孫氏文德皇后的幼子。李治生于628年陰歷六月十三日，633年封為晉王，643年立為太子。649年陰歷六月一日在其父靈柩前登基時尚不滿21歲。李治以廟號“高宗”知名于史。[[1]](#_1___Tang_Hui_Yao____Juan_1_Di_3)

盡管有計劃地為李治登基作了種種準備，如委派精心挑選的師保，撰寫針對帝王的禁令以指導他的行動，但事實證明李治是一個無能和優柔寡斷的所謂好皇帝。

新皇帝在位初期曾認真地試圖仿效其父親行之有效的施政作風。他厲行節約，免去狩獵和奢侈的宮廷宴會，尋求坦率的規諫并重與朝臣共同議事。但太宗的那種事必躬親的領導作風所要求的品質和純屬于個人的力量是高宗不具備的。高宗的無能，至少在他在位后期，可以部分地歸因于他的多病；經常發作的暈眩和視力的損壞使他喪失了工作能力。但無論如何，即使他是一個健壯和果敢堅強的人，他的環境也與他父親的完全不同。由于年輕和缺乏經驗，他被朝廷中一大群年長而又在他父皇統治下已經樹立了自己勢力的政治家所包圍。其中有幾位是他當太子時的老師。就高級政策與宰相們展開非常隨便的私人討論，這是太宗時代制定政策的固定形式，而高宗只是這個曾經多年親密共事的集體中的年輕的新成員。高宗要想對他的朝臣進行真正的統治恐怕是非常困難的。事實上，他不能像他父親那樣領導和激勵官員們，而只能“端拱無言”。[[2]](#_2___Tang_Hui_Yao____Juan_56_Di)

高宗繼位不久即立其嫡妻王氏為皇后。王皇后的娘家是太原極有權勢的家族，也是中國最大的貴族之一；王家和皇族及山西另一個大族柳氏都有姻親關系。但王皇后未生子嗣，所以在她舅舅柳奭影響下，她勸皇帝立另一妃子所生的年歲最長的王子陳王李忠（643—664年）為太子。皇后希望控制他，因為李忠母親在宮中的地位很低。長孫無忌經勸說也表示同意，李忠便于652年陰歷七月被立為太子。[[3]](#_3___Tang_Hui_Yao____Juan_4_Di_4)

高宗初期的統治受三位年長權重的政治家——長孫無忌、褚遂良和李世勣——為首的宰相集團控制。在新皇帝繼位后，高宗的舅舅長孫無忌已辭去尚書右仆射之職，但仍保留宰相的職位。褚遂良在高宗時拜為尚書省仆射，也是宰相。太宗逝世時，按太宗生前的安排，李世勣被派到地方任都督，以考察他對高宗及王朝的忠誠。他無可挑剔地通過了考驗，當他接到命令時，不回家便立刻赴任。[[4]](#_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9)他不久被召回朝廷任尚書省另一名仆射；以后他要求解除這個職務，但仍擁有宰相身份。

這三位年長的政治家都是太宗忠實的臣仆，與別的宰相一樣，在643年的繼位爭執中都是高宗繼位的有力支持者。他們的統治繼承了太宗推行的政策，少有更張。

高宗繼位不到三年，朝廷因發現房遺愛密謀反對皇帝而受到震動，房遺愛是已故大臣房玄齡的次子，在643年繼位爭執中曾經是太宗之子李泰的支持者。房遺愛娶的是太宗之女，即驕傲專橫的高陽公主。房玄齡在648年年中死后，其長子房遺直被指定為唯一的繼承人。高陽公主曾強迫遺直按一般習俗與她丈夫分家，但沒有得逞；高宗繼位以后，她又多次慫恿遺愛在皇帝面前挑起爭論。高宗為房遺愛的執著所激怒，下令把他們兄弟二人都放逐到外地。

于是，高陽公主煽動房遺愛與朝廷的其他不滿分子謀反，其中有與高祖女兒結婚的薛萬徹，有其女與遺愛之弟結婚的李元景和太宗的駙馬柴令武。陰謀于652年12月高陽公主誣告房遺直犯罪時敗露；在后來由長孫無忌主持的調查中，她自己丈夫的陰謀真相大白。所有參與者都被處決和賜死，連不幸的房遺直也被降職。

在與房遺愛有牽連并不久即被處決的人之中，有長孫無忌曾勸太宗不要立為太子以代替高宗的吳王李恪。其他許多被處決的人或是以前支持過李承乾或李泰即位，或是與他們有過間接聯系。房遺愛事件很可能不只是反對皇帝的陰謀（如果陰謀確實存在的話），而更像是集中表現在太宗末年繼位問題上的派別斗爭的繼續。[[5]](#_5_Sun_Guo_Dong____Tang_Zhen_Gua)不論從哪方面看勝利者都是長孫無忌，他成功地清除了幾個在他強烈擁護高宗為太宗繼承人時已經樹立的政敵。但是長孫無忌勝過政治對手的日子太短了。因為他和膽小的高宗在朝廷上不久便面對著一個遠為強大的、機敏的和肆無忌憚的對手。

## 武后的興起

美貌誘人的武曌給高宗在位34年的大部分時間，甚至給7世紀其余的時期投下了她的影子。

每一件與這位著名女人有關的事都籠罩著疑云，因為她干的事都與儒家士大夫階級的理想相對立——女人干預公共事務；隨心所欲地施政；蓄意利用宗派主義；殘酷地報私仇；完全不顧道德和原則地操縱政治。對于她的統治，歷史記載從一開始就抱有敵意和偏見，而且材料又極殘缺不全。和唐代任何相當的時期相比，她統治的半個世紀的政治生活的詳細情況，人們知道得更少。

對于這位敢于推翻李唐皇室并像男人一樣潑辣地實行統治的女人，盡管儒家歷史學家都進行惡毒攻擊和抱敵對態度，但是武曌顯然具有特殊的才能，對政治具有天賦，并且非常善于操縱宮廷的權力結構。她之所以能非凡地攫取到權力，是由于她的杰出的才能、堅毅的決心和識別人的能力，再加上她的冷酷、肆無忌憚和政治上的機會主義。她對敵人和對手表現出的殘忍和報復心，這在中國歷史上很少有人能與之相比。

唐代的歷史學家因為是在事后寫書，并且都是從事后的認識出發，他們記載太宗時期的各種事件時就好像已經預料到有朝一日會發生武曌搞垮唐朝的大災難。[[6]](#_6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9)648年年中，金星多次出現于白晝，宮廷占星術士解釋說這意味著會有女人短時期地登上皇位。與此同時，女性統治者“武王”將在李唐皇室三世以后取而代之的流言開始在百姓中流傳。太宗對宮廷主要占星術士的進一步詢問透露，所指的這個女人已作為皇室親屬進入宮內，她將在30年內統治整個中國并殺掉幾乎全部皇室成員。太宗以他特有的直率方式提出要處決占星術士所懷疑的全部對象，但后者堅持說天意不可違，事情就這樣放下了。

后來才與預言有牽連的武曌已于640年前后進宮，當時她只有十幾歲，為太宗的“才人”（第五等妃嬪）。她是高祖于太原府起兵反叛時最早的支持者武士彟的女兒。武士彟出身于太原地方的望族，由于身為第四子，故沒有像他哥哥那樣進入官場，而是做木材商人經商。他曾在家鄉任隋朝民團組織的小官。高祖登基以前于617年多次去過他家，并受過他的反隋鼓動。事實證明，武士彟是天才的軍事戰略家，高祖起事反隋時，他身為行軍司鎧，在攻打隋京師的戰役中起過重要作用。[[7]](#_7_Bu_Mu_Chao_Feng____Sui_Tang_S)為了酬謝他的功勞，高祖派他擔任工部尚書的要職，約四年后又提升為兩個重要的州的都督。由于他對唐朝的貢獻，他被封為“公”，高祖還給他從隋皇室楊氏家族的旁系中選了第二位妻子，以示殊寵。武曌就是這一對夫婦所生，約生于627年。[[8]](#_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9_1)

近代史學家對武曌的出身做了很多研究。如下面所說，有人強調她是商人之女，因此她便代表“新興的商人階級”。但上面說過，她父親實際上出身于當地地位很高的傳統士大夫家庭，他的兄弟們都在隋朝做官，而他本人則為唐高祖的高級官員。有人主張她代表東部（山東，即河南及河北）地區的利益，反對在初唐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西北（關隴）貴族。但如上所述，她出生于太原地區，此地的貴族有其自己的特征（它當時以“代北”集團知名），并傾向于與西北貴族建立比河南、河北世族更緊密的聯系。此外，由于她母親的緣故，她也是西北貴族中顯赫的隋皇室楊氏家族的后裔。而且從她后來生活中的事件可以得知，她總是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的“貴族”出身。

高宗才8歲時，他母親文德皇后即于636年死去，他繼續住在后宮。他很可能在武曌進入太宗后宮不久即與她有所接觸，特別是646年太宗讓未來的高宗住到與自己相鄰的宮苑以后。傳統的史料含糊其辭地暗示，高宗和武曌在太宗健在時即已發生不正當的親密關系。[[9]](#_9___Quan_Tang_Wen____Juan_199_D)

又據傳統記載，太宗死后，武曌依例出宮到一座佛寺削發為尼，而且按照慣例，她本應與世隔絕以度過余生。后來，高宗在太宗周年忌時來此廟行香，他看到了自己一直懷有深情的武曌。在此之前皇帝已寵幸蕭淑妃，蕭已為他生下一子。王皇后對蕭淑妃深為妒忌，希望弄個對手來奪取高宗對蕭淑妃的寵愛。為此她命武曌留發，并說服丈夫召武回宮作“昭儀”。

上述事件發生的日期不甚清楚，宋代史學家司馬光確定武曌回宮的年代是654年，[[10]](#_1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_1)但肯定有誤，因為武曌在654年前已為高宗生了至少一個，可能還是兩個兒子（見下文）。起碼有一位當代史學家已提出，她根本沒有當過尼姑，高宗在他父親死后立刻讓她進入自己的后宮，雖然這是完全違反禮儀規定的。[[11]](#_11_Li_Shu_Tong____Tang_Shi_Kao)但是，整個情節撲朔迷離，很難弄個水落石出。

不論武曌是否曾為尼姑，也不論她確在何時進入后宮，她顯然于652年給高宗生有一個兒子（也可能是兩個）。[[12]](#_12_Tong_Shang_Shu__Di_311__313Y)她以她的魅力迷住、進而完全控制了高宗，她開始向高宗施加越來越大的影響。王皇后擔心自己的位置，并意識到武曌是遠比蕭淑妃更為危險的對手，因此轉而與昔日的對手聯合起來展開誹謗武曌的活動。但對武曌的對手來說很不幸，武曌搞陰謀的手段遠比她們高明。傲慢的王皇后對后宮的眾多妃嬪抱有無法掩飾的蔑視心情，并且在她成為皇后以后在宮里和朝廷上樹敵太多。武曌于是與皇后的敵人聯合，收買妃嬪們充當自己的耳目，要她們把皇后和蕭淑妃的一切活動告訴她，因此她每每能操勝券。與此同時，高宗又提升了她的妃嬪級別。

盡管高宗寵愛武曌，盡管皇后依然無子，高宗仍無意廢黜王皇后。廢后是重大的政治決策，因為王氏家族既有權勢，又有很好的社會關系。而且皇后有最有權勢的元老重臣做靠山。因此武曌只能找一個借口使皇帝讓她靠邊站。654年，這個機會到來了。前不久武氏生了一個女兒，無子的皇后經常逗著小公主玩。一天，皇后已離去，武曌偷偷將嬰兒悶死。皇帝來到后，武氏裝作情緒很好，讓皇帝看視女兒，當發現嬰兒已死時，她又裝得十分驚訝。侍女稟告皇帝，剛才皇后曾和他女兒一起玩過，從而讓高宗自己得出某種結論。高宗本人是否確信王皇后的所謂罪行，不得而知。但是，不管真相如何，武曌似乎已達到她的目的；皇帝決定，如能爭取到大臣們的默許，就決定貶黜王皇后，并封武曌為后。

他首先試圖爭取朝廷上最有權勢的人物，即他的舅舅長孫無忌，提拔后者的三個兒子當官并給大量賞賜，但長孫無忌不為所動。與此同時，武曌開始鞏固自己的地位。王皇后的舅舅及主要的支持者柳奭自652年以來即為中書令和宰相，但于654年6月降為吏部尚書。第二年，皇后又遭另一打擊，她母親柳氏被禁止進入皇宮，理由是她和皇后曾使用厭勝，試圖制服武曌。不久以后的655年陰歷七月，柳奭被貶到四川一個小州任刺史，他就這樣離開了政治舞臺。[[13]](#_13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_2)

與此同時，與長孫無忌不和的中書舍人李義府正要被流放到四川擔任小官，為了使自己免于流放，他狡猾地伺機奏請皇帝貶黜王皇后而以武曌代替她。李義府因此得到赦免并在中書省得到提升，武曌的其他支持者也公開站出來支持她當皇后，他們之中有禮部尚書許敬宗（592—672年）。

元老重臣長孫無忌和褚遂良強烈反對任何廢黜王皇后的企圖，另兩位剛升為大臣的中書令來濟和門下侍中韓瑗也持同樣態度；來濟和韓瑗都已在653年升為宰相。在其他自高宗繼位初期就當上宰相的人中，只有尚書省仆射于志寧不反對廢后。唯一鼓勵皇帝廢后的資深大臣是李世勣，他認為立何人為后是皇帝的家庭問題，外人沒必要過問。老臣李世勣曾在高祖和太宗兩朝任司空，643年以來即為宰相，他對百姓，特別是對東北平原的軍人有巨大影響，他的介入無疑使朝廷的力量對比偏向武曌一邊。[[14]](#_14_Chen_Yin_Ke____Lun_Sui_Mo_Ta)

這一轉折點使高宗興奮，他命令許敬宗當朝宣稱：“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欲立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15]](#_15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皇帝為了強調他對武曌的反對者的不滿，他遠謫褚遂良為今日湖南某州的都督。

655年陰歷十月，朝廷下詔指控王皇后和蕭淑妃陰謀毒殺皇帝。因此她們被貶為平民，其家庭成員被剝奪了一切職銜，并被流放到瘴癘之地的嶺南。當月19日，武曌正式被立為后，[[16]](#_16___Tang_Hui_Yao____Juan_3_Di)第二年元旦，她的位置因己子李弘（652—675年）取代了由王皇后提議立為太子的李忠而得到最后的鞏固。[[17]](#_17___Tang_Hui_Yao____Juan_4_Di)為了宣布王朝政策已發生重大變化，朝廷改元“顯慶”。

關于高宗時期朝廷分成支持與反對武曌的兩派，已有人提出幾種解釋。近代歷史學家陳寅恪認為，對立的派別代表了不同地區的貴族利益集團。按照他的理論，李唐家族從6世紀初期興起之時便與集中于中國西北地區（陜西和甘肅）的許多大家族（即所謂“關隴集團”）建立婚姻紐帶，這些家族自西魏以來已在北方成為統治階級的核心。“關隴集團”內部的復雜的婚姻關系已組成了一個忠于皇室的關系網；當高宗試圖廢掉這個貴族集團成員之一的王皇后而代之以該集團以外的武曌時，這個關系網就顯露出來了。按照陳寅恪的觀點，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和來濟之反對武曌，是由于他們都是關隴集團成員。而武曌的支持者像李世勣等人，則都出身于其他地區。他們大多來自東北平原，很多人進入官場是通過科舉制度，而不是憑借貴族的世襲特權。他們是陳寅恪稱之為“山東集團”的成員。按照這種論點，王皇后和武曌之間的爭奪就不僅僅是宮廷內部之爭，而是反映了兩個政治精英集團（關隴集團和山東集團）之間奪取最高權力的政治斗爭。[[18]](#_18_Chen_Yin_Ke____Ji_Tang_Shan)

后來許多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從已樹立牢固勢力的貴族統治階級與5世紀末實行均田制后產生的新興地主階級之間的權力爭奪的角度，來看待有關立武曌為后的沖突。他們堅持，到高宗時期，通過均田制和巧取豪奪兩種手段，已有大量的土地易主，以致產生了一個要求能進入官僚階層的獨立的地主階級。唯一能使他們達到目的的手段是科舉制度，雖然應考者人數過多。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宣稱，武曌的低賤出身導致她反對貴族而去支持新興地主階級和商人的掌權要求。這些人當然反過來也支持武曌。[[19]](#_19_Hu_Ru_Lei____Lun_Wu_Zhao_De)

上面說過，關于武曌真正出身的證據使這兩種論點非常值得懷疑，因為這兩種論點的依據都是對當時社會過分簡單化的認識。不論是擁武派或是反武派的成分，都不像它們所假設的那樣純而又純。事實上，雙方成員的籍貫和社會背景相當復雜多樣。例如，武曌的支持者李義府出身于極西的四川地區，既不是西北，也不是山東。同樣，王皇后的支持者來濟是中舉的士子，而武曌的黨羽李世勣則出身于門閥世族。[[20]](#_20_Song_Jing_Xiu_Yi____Wei_Rao)

事實上，這種地區因素很可能遠不如純粹個人的或政治上的合作那么重要。除了李世勣，武曌的支持者在高宗的政府里只是中級官員，而王皇后的支持者卻都盤踞要津，擁有實權。從這個角度看，關于擁立武曌的斗爭可以看成是那些已掌權的、要保持政治現狀以維護既得利益的人與那些把擁立武曌當做自己升遷手段的人之間的斗爭。武曌是否打算提高某個權利集團的利益是十分可疑的，更不可能按照某個經濟上的階級的利益行事，因為很清楚，她認為自己本來就是最高層貴族的成員。倒不如這樣認為，她利用了一群有野心的中級官員的不滿情緒和抱負來幫助她取得權力，后來則報答了他們的支持。只要這些個別人對她不再有用處，她就會馬上棄之如敝屣，貶黜他們，甚至毫不猶豫地處死他們。

## 武后的當權

新冊封的皇后不失時機地向反對擁立她的人進行打擊報復。當上皇后僅一個月，她就殘忍地害死了原來的王皇后和蕭淑妃，割掉她們的四肢，讓她們死在酒甕里。657年春，她再次調褚遂良到離京師更遠的今廣西的一個州任都督。同年晚些時候，她命令死黨許敬宗和李義府誣告曾強烈反對她為后的中書令來濟和門下侍中韓瑗與在廣西的褚遂良共謀反叛。

不幸的褚遂良再次被貶，這次是調到中國本土以外的河內西南一帶。遂良向皇帝求情，提醒他自己曾長期為高祖和太宗效勞，在643年又支持高宗繼位。但是高宗甚至沒有閱讀他的奏折的耐心。658年，褚遂良在流放中死去。他的所謂的同黨韓瑗和來濟也被發配到邊遠地方任職，并規定終生不許返回朝廷。657年陰歷八月，許敬宗被任命為宰相以代替他們，他任此職直到670年退休為止。

許敬宗（592—672年）不是像皇后的另一主要支持者李義府那樣的單純的機會主義者，盡管他也同樣受到歷史學家的苛評。[[21]](#_21___Jiu_Tang_Shu____Juan_82)許敬宗出生于南方的杭州，其父是隋朝有名的官員。許敬宗是一位出色的學者，他是隋朝極少數獲得高等學位（秀才）的人之一，曾短暫地當過小官。他父親被隋煬帝的刺客宇文化及殺死，而許敬宗先后為李密及唐朝效勞，并成為太宗私人學士之一。太宗時期，他在門下省和中書省中歷任要職，從事國史的編撰工作。645年，他成為太子的老師之一（來濟已是太子的另一個老師）。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對未來的皇帝有影響。649年他當上宰相，但不久即因受誹謗而降為地方官員。

許敬宗于657年再次任宰相時已經65歲了，作為皇后的主要支持者，他不久就起到了從前元老重臣長孫無忌所起的作用。許敬宗學識淵博。他曾參與編纂唐以前歷代王朝的歷史、本朝高宗及太宗的實錄、全國重要人物的家譜（詳下）、大部頭的類書《文思博要》及其他許多項目。他留下厚厚80卷的個人文集。他是為武后提供歷史先例及行政管理經驗的重要人物，另外，他本人也是很有效率的行政官員。

許敬宗再次任宰相以后，宰相的隊伍依然很小。在高宗繼位后一直任大臣的一批人中，只有長孫無忌、于志寧留任。除了武后的支持者許敬宗和李義府外，只有出身于河北地區的年長學者杜正倫是宰相，他與許敬宗一樣，是隋朝的秀才，在太宗時期的中央政府中顯赫一時，后來不幸成為太子李承乾的老師。在對待太子的問題上由于頂撞了太宗，他于642—643年極不公平地被流放到很遠的南方。656年他被召回長安后不久，便被任命為宰相和戶部尚書。

在公開反對武曌當皇后的人中，只有長孫無忌仍為宰相。但武后的權力仍有一定限度，幸存于朝廷的反對派一直設法想搞垮她及其支持者。武后的支持者之一中書令李義府于658年后期的失勢使反對派得到一點鼓勵。

李義府（614—666年）出身于河北的官宦之家，太宗統治初期在科舉中中式，并已穩穩當當地升為中書舍人。李義府精于寫作，曾與許敬宗合作撰寫國史和編纂晉史。我們在前面已看到，他在656年通過支持武曌篡奪后位的活動，挫敗了長孫無忌想把他流放到外地的企圖。結果，他在655年陰歷七月當上宰相。不過事實證明他是非常腐敗的，他相信武后會無限度地保護他，便憑借這一點很快地濫用職權。據說在薦舉和選拔官員方面他大肆貪污，他和家人公開賣官鬻爵，而在兩性生活方面也時有丑聞。但盡管如此，他照樣不斷得到皇帝的支持，并于657年陰歷三月升為中書令。

但李義府的行為在658年末成了公開的丑聞，以致那年陰歷十一月，當他與同為宰相的杜正倫在皇帝面前激烈爭吵時，高宗借機把他們二人都貶到地方任職。

長孫無忌及其黨羽如果以為這件事會鞏固他們的位置，那么很快便證明他們錯了。659年陰歷四月，武后終于發起了搞垮他的行動。兩個小官韋季方和李巢被指控組織敵對集團，其后在由許敬宗監督的司法審訊中，據稱被告之一曾與長孫無忌共同策劃反對皇上。許敬宗向皇帝提出他的舅舅竟會謀反的確鑿理由，并且添油加醋地列舉大量歷史先例以達到貶黜這樣一位有權勢、在朝廷上受到廣泛敬仰的人物的目的。高宗雖然最初不相信這些指控，但仍違心地在未經傳訊長孫無忌的情況下把他發配到今貴州省的邊境地區。

徹底清除武后的反對者的機會很快來到。另一位長期擔任宰相的于志寧，由于他對高宗更立新后的建議未置可否，被外放到地方擔任高官。664年他74歲時獲準退休，第二年死去。其他人便沒有那么幸運。甚至連以前發配到地方的官員也未能幸免。柳奭、韓瑗（有點尷尬的是，他證實在不久前已死）和長孫無忌的侄子長孫恩奉命從流放地返回京師，就指控他們搞陰謀一事接受進一步的審訊，在途中即被殺死。最后，長孫無忌一案又被提出，他被迫在流放地自盡。

隨著太宗時期最后一位宰相的清除，許敬宗成為剩下的唯一的宰相。未與武后為敵的盧承慶、許圉師和任雅相三人于659年陰歷五月當上宰相。盧承慶（595—670年）出身于河北的書香門第，長期從事財政工作，這時被任命為戶部尚書以代替杜正倫。但第二年就因為戶部未能征集到足夠的賦稅而被派到地方任職，后來雖然沒能返回中央，卻一直身任高官。許圉師（？—679年）是唐高祖幼年時期的小伙伴、唐朝初年平定長江流域時被殺的許紹的小兒子。許圉師在唐朝初年科舉考試中成為進士，居官后政績出色。任雅相似乎主要是武將，曾一度任兵部尚書。661年陰歷四月，他擔任遠征高麗戰役的指揮官，在662年初期的戰事中被殺。659年陰歷八月，李義府也當上了宰相，武后在朝廷上仍需要李義府的支持，因而說情把他赦免并從流放地召回。

這時政府作出了一個重大變動。褚遂良和于志寧作為政府主要行政機構尚書省的仆射，都是當然的宰相。他們免職以后，無人繼任，尚書省至少在以后的16年里沒有首腦。政府的各行政組織因此不能直接參與宰相們審議國家政策的工作。皇帝和皇后可與之商榷朝政的宰相的隊伍一直很小。太宗時期常有8名以上的宰相，現在只有5人，隨著盧承慶于660年免職又減少到4人；任雅相在661年離朝征伐朝鮮后只剩下3人。這3人是許敬宗、腐化的李義府和許圉師。662年末，許圉師因試圖掩蓋其子在狩獵時誤殺一人之事，被李義府逼迫離職，由上官儀（？—664年）代替。上官儀是隋煬帝末年被殺于揚州的隋朝大臣之子。為了避難，他當了和尚，是享有盛名的學者和作家。太宗初年，他被舉薦參加進士考試，先后在一些搞學術的崗位上為太宗效勞，有時為皇帝的文章作些潤色工作。高宗時期，他是秘書省少監，以文章和詩聞名于世。他之所以當上宰相，可能是由于他在高級官員中平庸無能而官聲上尚無瑕疵。

這些變化表明，武后的支持者的權力已得到鞏固。有一段時間，皇帝的健康狀況不好。657年，他被迫到離宮休息，只能隔日上朝一次。[[22]](#_22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660年陰歷十月以后，皇后的位置實際上已變得不可動搖，當時高宗顯然得了一次嚴重的中風，致使他一度局部癱瘓，而且視力嚴重衰退。[[23]](#_23_Tong_Shang)雖然他康復了，但仍有幾次嚴重的復發。武后得益于自己的精明和銳利的政治敏感，在皇帝幾次患病期間，治理帝國十分順手。總之，皇帝的意志過于軟弱，即使在健康時也不能阻止他那位難以對付的皇后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他本人和他的朝廷。到660年末，武后事實上已是帝國的統治者，雖然無此名義。[[24]](#_24_Tong_Shang_Shu__Di_6322Ye)

但她還沒有為所欲為。她的支持者李義府從流放地返回朝廷后的幾年，再次過著使他在658年以前臭名遠揚的那種丑惡、腐朽的生活。他的墮落和瀆職竟使武后也感到是個政治負擔。663年，他家庭的胡作非為再次成為朝廷上的議題，李義府甚至不向皇帝求情而打算蒙混過關，他因而被流放到中國南方的疫病區，三年后死在那里。當時，武后由于不再過于依靠他的支持，而且她的位置也遠比五年以前鞏固，所以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去挽救他。

那一時期反對武后的力量似乎以656年封為梁王的被廢黜的前太子李忠為中心，他們把李義府的倒臺誤解成為皇帝最終向武后的權力進行挑戰的信號。他們制定了一個把她也一網打盡的大膽計劃。

在此以前，一生深受宗教和巫術影響的武后被一個道家術士所吸引，特準他可自由出入皇宮見她。長期以來，中國人對皇室成員或朝廷命官參與巫術感到非常恐懼，認為他們理應受到最嚴厲的懲處。唐律規定它為“十惡”之一的大罪，對這種罪行，給予高級人士的任何法律特權都不適用，而且這些罪行都明文規定不在赦免之列。[[25]](#_25___Tang_Lu_Shu_Yi____Juan_1_D)因此，664年李忠王府原先的一個宦官把事情報告給皇帝時，看來高宗認為這是擺脫皇后支配的方便借口。

皇帝召來宰相、中書省侍郎上官儀（曾為李忠的顧問）“討論”這件事。不出高宗所料，上官儀建議以她的罪行為由廢黜武后，皇帝命令上官儀就此起草詔令。但武后已從她眾多的皇宮耳目中得到于她不利的消息，她沖進皇帝的居室以阻止事態的發展。膽小如鼠的高宗不敢與她面對面爭辯，而是膽怯地宣稱廢黜她的計劃完全是由上官儀策劃的。

這樁不幸事件的結局簡單而又殘酷。一貫忠實的許敬宗指控上官儀、前太子李忠和首先告發武后的宦官共謀大逆。主犯被處決，并且再次清洗與這些敵人有可疑聯系的全體朝臣。他們全被貶黜或發配到邊遠地區。

從這以后，武后的政治統治是確定無疑的了。她的統治也公開化了。皇帝上朝時她總坐在一旁，前面用簾子遮住，甚至監視皇帝所處理的每件細務。宋代大歷史學家司馬光對此總結道：“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殺生，決于其口，天子垂拱而已。”[[26]](#_26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高宗至此幾乎完全無權，武后的反對派全被清除。

但是，武后的統治也不僅僅是搞宮廷陰謀和運用靈活的政治策略去處置反對她的人。她的主宰朝政也包括參與制定新政策。第一個成果是657年末把洛陽定為永久性的東都。[[27]](#_27___Quan_Tang_Wen____Juan_12_D)朝廷事實上已于太宗時期分三次遷到洛陽。但在657年，它被正式定為第二個首都，而不是朝廷的行宮。每個部和每個衙門都在洛陽設分支機構，662年甚至還在那里辦起東都國子監。從此，整個朝廷經常遷往新都去處理公務，長期成為定制。雖然在空蕩蕩的京師始終保留著一個小小的留守政府，但實際上不但整個皇室及其隨從，而且中央政府的全部行政機構在這幾次遷移中也轉移一空。

幾次遷都不但造成了很大的混亂，而且耗資巨大。眾多的扈從人員給所經之地帶來了貧困，他們經過的地區通常可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免繳賦稅，這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所造成的破壞。高宗時期，朝廷遷往洛陽不少于七次；高宗統治在建立新都后的26年中，約有10年在洛陽上朝。682年，朝廷最后一次遷往洛陽。683年后期高宗死后，武后永久性地把朝廷遷往洛陽，一直到701年。

朝廷在東、西兩個京都之間來回遷移，使帝國財政極度緊張。洛陽需要建造許多新的宮室和官署，以提供一個京都的必要設施。耗資巨大的工程在高宗時期不斷進行。因此，進行這一新的和花費極大的工程，一定是事出有因。

對遷都有各種各樣的解釋。首先是政治上的解釋。長安是西北地區的自然中心——當西北貴族集團已處于統治地位時，它是文職官僚機構的自然政治中心。指定在公元前1000年前已成為帝國政治勢力所在的東部平原附近的另一個中心為新都，這本身是一個象征性的表示，即西北政治勢力的全盛期已經過去了。遷都又是一個旨在取悅于許多東北出身的官員的行動，他們在高宗時期當上了高官，并且算得上是武后最熱心的支持者。

第二種解釋純粹是經濟方面的。長安位于比較貧窮和生產不發達的地區，易遭受長期的嚴重干旱。從外地供應長安谷物既困難，費用又極大。供應洛陽的朝廷便容易得多，因為它直通隋朝修建的復雜的河渠網系。[[28]](#_28_Quan_Han_Sheng____Tang_Song)

這兩種解釋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沒提供完整的答案。在朝廷遷往洛陽時期，長安地區有時是繁榮的，而新的東都有時卻遭受饑荒災害。很可能有第三種因素常常決定了遷都，這一因素就是被傳統歷史學家所強調的武后的情感和精神狀態。據說在駭人聽聞地除掉王皇后和蕭淑妃以后，迷信的武后常看到她們的鬼魂作祟，因此她感到繼續住在長安是不能忍受的。[[29]](#_29_Cen_Zhong_Mian____Sui_Tang_S)

武后的迷信和對宗教的沉溺還產生了其他后果。在成為其親密伙伴的男、女術士的影響下，武后越來越熱衷于宗教的儀式和符咒。她摒棄傳統，創造新的標記，以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來鞏固她的地位和她實際控制的王朝。高祖和太宗均用一個年號來代表他們的統治，武曌當了皇后以后，高宗統治時期改元不少于13次。662年，中央官僚機器的許多主要職官名稱改為古稱，到670年才恢復原來的形式。674年，皇帝和皇后采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使用的莊嚴稱呼：“天皇”和“天后”，武后想用這種稱號使自己和她丈夫的統治與以往中國歷代君主的統治有所區別。

另一種宣告他們統治的輝煌成就的形式是舉行古代意義最深遠、最隆重的封禪典禮。祭祀儀式在位于今山東省的中國主要圣岳泰山的山腳下和山頂上舉行，儀式象征性地對天地宣告，皇帝在人世的任務已勝利地完成。由于封禪具有深遠的意義，而且很多皇帝擔心舉行這種儀式會因無充分理由而變成妄自尊大，因此在中國歷史上這項活動只進行過六次，最后一次是在56年。[[30]](#_30_Sha_Wan____Tai_Shan_____Ba_L)太宗曾三次計劃舉行封禪儀式：632年，被魏徵勸阻；641年，太宗已達洛陽，由于出現彗星而被勸阻，沒有繼續行進；648年，因一次不合時宜的洪水取消了儀式。[[31]](#_31___Tang_Hui_Yao____Juan_7_Di)

659年，許敬宗在皇后的要求下上奏高宗，建議他舉行封禪祭祀。[[32]](#_32_Tong_Shang_Shu__Di_95__101Ye)因為幾百年來沒有舉行，祭祀的具體形式基本上已被遺忘，需要討論和決定，經過長時間拖延之后，高宗終于于666年陰歷元旦在山腳開始了復雜的禮儀，第二天清晨上山完成儀式。盡管沒有婦女參與的先例，但武后仍違反傳統，計劃扮演一個主角，于是她率領嬪妃及皇族親眷作為第二隊以表示她具有與皇帝平起平坐的合法地位。[[33]](#_33___Tang_Hui_Yao____Juan_7_Di)

高宗統治后期，武后鼓動他在洛陽附近的圣岳嵩山和其他圣岳舉行同樣儀式。嵩山的儀式安排在676年冬，但因吐蕃入侵而未果。后又安排在679年末，但又因與突厥人的糾紛而被取消。武后又在683年安排了第三次，但由于皇帝生病而不得不取消。[[34]](#_34___Tang_Hui_Yao____Juan_7_Di)

武后迷戀古代禮儀的另一例可在668—669年的一個提案中看到，這個提案主張恢復建筑“明堂”的古制。“明堂”是向上帝獻祭的建筑，它的設計適合舉行最重要的禮儀，同時也是一個朝覲大殿。在明堂舉行的儀式將反映皇帝（當然也包括皇后）的世俗權力以及與天的和諧關系。但負責討論應建成什么樣的大堂的學者們未取得一致意見，這個計劃因此被取消。武后直到高宗死去，自己當上最高統治者，才成功地建起了明堂。[[35]](#_35___Tang_Hui_Yao____Juan_12_Di)

武后不論怎樣著迷于把王朝與超自然力量聯系起來，她還要確保王朝與統治階級的世俗關系的加強，以有利于王朝。

如前所述，在太宗時期，638年編成的《氏族志》試圖列出全國的大姓并進行分等。皇后自己的家族武氏，因為社會地位較低而未能列入。很清楚，這是一個必須糾正的遺漏。659年末，多半是在皇帝直接命令下，許敬宗奏請注意《貞觀氏族志》中這個嚴重的缺點，為此下詔編輯200卷的新《姓氏錄》。高宗親自作序并確定應遵循的等級序列。武氏及其他皇妃的家族安排在第一等級中，這是可以預料到的。但新志有很大變化，它只收唐代五品以上官員的家庭。從前長期依據的“家庭出身”和社會承認的原則被取消；新志遠比舊志充實，因為它的范圍擴大到當時興起的統治官僚階級。[[36]](#_36___Tang_Hui_Yao____Juan_36_Di)

同時，政府再次針對有社會威望的山東大族“四姓”采取行動，它們原來已是太宗的《氏族志》反對的目標。這一行動并不損害眾多東北人在高宗統治下享有的總的有利地位。這些東北人盡管來自同一地區，但大多只具有次一等的社會地位。自太宗下詔試圖削減山東大姓的特權以來，他們的社會地位并沒有明顯下降。他們繼續大規模地進行內部通婚，要求那些想與他們聯姻的外姓人付出大量財禮，甚至干脆拒絕求婚。另外，他們之中的大多數已移居京師，在京畿的社會中組成了一個緊密的社會集團。659年山東大姓之一拒絕了行為放蕩的李義府的求婚，于是李勸高宗下詔禁止7個大族的11個家系（他們形成了令人羨慕的圈子）之間的內部通婚。這個集團并不包括山東大族的全部，但包括了那些需要控制其特權的氏族。王皇后的氏族就是其中之一。同時對準許的財禮數量實行嚴格的限制，這種限制不是與家庭的社會地位，而是與姻親的官品相聯系。[[37]](#_37___Tang_Hui_Yao____Juan_83_Di)然而，這些大族似乎很容易躲過這些限制，繁盛景況不減當年。

這些措施有助于武后鞏固她在朝廷上的地位。但在皇帝生前由后妃直接控制政府尚無歷史先例，依然存在一股忠于唐皇室的官員們內心反對的暗流。只要這種情況仍然存在，武后的地位就始終不穩定，因此她尋求那些能給她帶來威信和影響的集團——特別是文人和佛、道僧侶——的效忠。

高宗統治初年，他已對文人進行大規模的保護，其方式是在京師集中學者編輯了一批大部頭的文學匯編。幾個在太宗時期開始的大項目已告完成：成為現在的《隋書》中的“志”的《五代史志》已在629年開始編寫，在656年完成；[[38]](#_38___Tang_Hui_Yao____Juan_63_Di)同年，后來成為官方正史的李延壽私人編撰的《南史》和《 北史》也上呈給皇帝。[[39]](#_39___Tang_Hui_Yao____Juan_63_Di)至此，早在622年就開始組織撰寫的唐以前的官方歷史宣告完成。[[40]](#_40_Tong_Shang_Shu__Di_1090Ye)唐朝的實錄也在繼續編撰。656年，長孫無忌和令狐德棻完成了高祖和太宗兩朝的實錄，作為正式的唐朝歷史。[[41]](#_41_Tong_Shang_Shu__Di_1092Ye)許敬宗孜孜不倦地繼續這項工作，寫了高宗最初幾年的實錄，在659年把它呈獻給皇帝。[[42]](#_42_Xu_Jing_Zong_Bian_Zhuan_De_T)

另一個延續到高宗初年的大項目是對儒家經書的標準注疏（《五經正義》）的最后校訂。此書的大部分已完成于7世紀40年代，但《易》、《書》、《詩》、《禮記》和《春秋》及其注疏《左傳》在653年才被批準和頒行全國。其他經書的正義也完成于以后幾年。[[43]](#_43_Xiang_Qing_Jian_D_M_Mai_Ke_M)

隨著這些項目的完成，特別是在許敬宗初任大臣的幾年中，皇帝又發起撰寫一系列新著作。以下簡要列出656—663年期間在他的指導下呈送給皇帝的著作：656年，皇帝撰寫的130卷并附有詳細注釋的關于統治者的政策和職責的論述；658年，一部關于西域的60卷大型圖籍，其中收有派往吐火羅和康國（撒馬兒罕）的使臣帶回的材料；同一年，一部長達1000卷的文集《文館詞林》；661年，另一部630卷的文集《累璧》；同年，李善為大型總集《文選》作的標準注疏，這是普遍施之于文學教育的基本著作；663年，一部由太子李弘的老師主編的大型文學名著匯編《瑤山玉彩》問世，計500卷。[[44]](#_44___Tang_Hui_Yao____Juan_36_Di)上述項目與欽命的巨大佛經翻譯工作同時進行（見下文）。

朝廷對世俗的和佛教的學術所作的這種慷慨贊助似乎在665年突然結束。在此前后，武后開始實行對文學的個人贊助，她組織起自己的學者班子，命他們從事為她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的工作。他們編了《列女傳》，還有表達武后關于君臣大義的《臣軌》——該書后來成為所有科舉應試士子的必讀課本；另外有與《臣軌》同為一類的《百僚新戒》及音樂和禮儀方面的著作《樂書》。[[45]](#_45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武后在進行這些學術項目時雇用私人學士集團，其中還包藏著禍心。從7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他們形成了一個秘密的秘書班子，名為“北門學士”；這些人開始為皇后起草奏折，對政策的制定作出決定，而決策本應是宰相們的職責。[[46]](#_46___Tang_Hui_Yao____Juan_57_Di)

國家不只庇護文人學士。它也對在社會上有更多追隨者的佛、道僧徒團體給予庇護。[[47]](#_47_Guan_Yu_Gao_Zong_Yu_Fo_Jiao)

我們已經說過，武后把宗教象征和儀式當做使自己的政體合法化的手段，我們現在就回過頭來看看她與一批真真假假的宗教顧問的迷信關系。指出這一點是值得的，因為她和高宗都沉湎于宗教，雖然他們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

高宗統治初期，他有些勉強地繼續實行他父親對佛教的保護。太宗的贊助與國家的支持使偉大的朝圣者玄奘得以完成一項大規模的重要工作，即把他從印度帶回來的梵文經典譯成中文。

但盡管有這種庇護，以及他在公開場合表現的虔敬行為，高宗本人對佛教的態度即使不是敵視的，也是十分冷淡的。655年他下詔命令佛教僧侶服從普遍的法律，而不是根據637年專門頒布的《道僧格》來審理他們。此舉引來了僧侶們（其中包括高宗非常敬重的德高望重的玄奘）的抗議風暴，以致高宗只好收回成命。玄奘還提出了太宗曾確立道士的地位優于佛徒的問題，但皇帝對此不感興趣。657年高宗又提出了長期存在的問題，即佛教僧侶是否應承認社會上正常的等級關系，是否應服從雙親及君主。657年的詔令禁止僧侶們接受父母或其長輩的致敬，后來由于公眾的抗議，朝廷還是做出了妥協。662年，高宗要求朝廷討論僧侶們應尊敬父母及皇上這一更廣泛的問題，而他以前的高祖和太宗對此都無力解決。經過僧侶們的強烈抗議，朝廷展開了辯論，兩種意見勢均力敵；妥協的解決辦法是僧侶們應尊敬父母而不必尊敬皇帝，這又引起了不斷的抗議，致使詔令不能實行。

盡管高宗在就這一基本政治問題在與僧侶們的正面沖突中失敗了，但當他在664年（其時玄奘已死）中斷了遠沒有完工的龐大的翻譯工作時，他給了佛教真正而持久的打擊。高宗逐漸不再注意佛教，而開始對道教表現出越來越大的熱誠；這種轉變似乎從660年起就開始了。玄奘死后，幾個道教術士對皇帝施加了強烈的個人影響，并在朝廷上得到了官職。

皇帝用比偏愛個別術士更積極的形式表示對道教的支持。例如，666年完成了封禪祀典以后，老子又有了更為顯赫的新頭銜，[[48]](#_48___Quan_Tang_Wen____Juan_12_D)各州奉命既建佛寺，又建道觀（第一次）。[[49]](#_49___Tang_Hui_Yao____Juan_48_Di)道教就這樣得到了佛教多年以來就有的國家資助的寺院網絡。675年，皇帝下令編輯第一部道教典籍匯編。678年，他把道士置于宗正寺的管理之下，以正式承認皇室與老子之間的虛構的親緣關系。[[50]](#_50___Tang_Hui_Yao____Juan_49_Di)同時，道家主要經典《道德經》被列為參加科舉考試的必修科目，與儒家經典不分上下。

但從664年放棄了翻譯佛經的計劃以后，高宗還是謹慎地避免采取可能與勢力強大而又組織嚴密的佛教僧、俗人等發生沖突的任何步驟。他在宮中展開了兩種信徒之間的辯論，668年在一場特別尖刻的交鋒后，他下令銷毀偽造的《老子化胡經》，因為它宣稱如來佛與老子實際上是一個人，此事一直是引起爭吵的原因。

就在此時，對佛教的庇護改由皇后接手。她出身于虔信佛教的家庭，那些希望接近皇帝的佛教徒顯然把她看成是贊助人和保護人。武后也是宗教建筑的主要贊助人，在她當皇后時期，她主持在龍門石窟里鑿刻了大量的佛像。

674年，她終于成功地廢除了太宗關于在宗教儀式上重道輕佛的詔令。從此以后，兩種信仰地位平等。這是691年武后取得最高權力之后最終把佛教立為國教的第一步，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步。

所有這些措施也是重要的政治行動。皇帝和皇后用這些措施確立了他們作為兩種宗教的庇護人的地位，這兩種宗教的影響已擴展到整個帝國和各級社會。

皇后需要具有這樣廣泛基礎的支持，因為666年完成了封禪祭祀以后，朝廷上的政局出現了對她不完全有利的變化。

大約在這段時期，皇后經歷了一場涉及她的武氏家族成員的危機，因為他們在她當上皇后以后都做上了高官。當時，這些人感到自己的地位和個人權勢已很穩固，開始不想再以武后為靠山，開始不太尊重她的母系親屬、仍然極有權勢的原來隋朝的皇室楊氏。666年陰歷八月，皇后只得采取行動對付他們，處死兩個異母哥哥和一個叔叔，謊稱他們毒死了皇帝當時寵愛的魏國夫人，她是皇后姐姐之女，已與廷臣賀蘭越石結婚。傳聞說，魏國夫人是武后本人毒死的。[[51]](#_5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664年上官儀垮臺后，許敬宗是剩下的唯一長期擔任宰相的人，他繼續代表武后的利益，行使不容挑戰的權力。但他畢竟是72歲的老人了，而最高一級政府在日益增多的財政和軍事問題面前顯然需要加強。665年，朝廷任命了一小批新宰相，但他們在一兩年后都被免職，被兩位高宗的最有成就的將軍姜恪和劉仁軌所取代，他們經常離開朝廷去遠征。667年，皇帝感到缺乏可靠的參謀，就任命了一批能力很強的新宰相，他們至少恢復了進行正規朝政程序的門面。

新宰相無疑不是統治階級中的新成分的代表，但也不是聽命于武后的傀儡。楊弘武是隋朝謀士楊素的侄子，因此與武后之母是親戚。趙仁本是來自河南西部的陜州的世族，他在御史臺和吏部有出色的政績。李安期的祖父和父親在隋朝和初唐先后任中書令，他少年時即為奇才，后來連續擔任高官。他還在7世紀40和50年代從事國家的各種文學事業。他出身于河北北部的望族。這個宰相班子其余的兩名成員也來自河北，戴至德（？—679年）是太宗時期著名宰相戴冑的侄子兼養子；張文瓘（605—677年）是李世勣的門生，出身于7世紀后期產生許多高官的一個河北氏族。盡管已知新班子的成員中只有張文瓘參加過科舉考試，但他們都是杰出的學者。

667年末，李安期被派到地方任職，第二年，已經很老的楊弘武死去，趙仁本與許敬宗鬧翻，被免去宰相之職。但是戴至德和張文瓘在679年和678年（原文如此。——譯者注）分別死去以前一直任宰相，使政府得到多年缺乏的那種行政上的延續性。

任命這批新的宰相可能與朝廷開始面臨因朝鮮戰爭而逐年增長的花費所引起的嚴重內政問題有關。例如在666年，中國最富裕和人口最多的河北，全部稅收都被送到遼東供給征伐高麗的軍隊使用。[[52]](#_52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政府試圖通過使用劣錢（見下文）來解決問題，這證明是一個災難。668年、669年和670年一系列的饑饉和自然災害使局勢變得更壞。皇帝被迫砍掉各種靡費的建設；670年，問題竟發展到使武后表示要放棄后位——當然這只是一種毫無誠意的姿態——以平息上蒼之怒。[[53]](#_53_Tong_Shang_Shu__Di_6365Ye)

這時皇后又經歷了兩次家庭危機。第一次在670年陰歷九月，她的因有顯貴親屬而在朝廷上成為她重要幫手的母親死去了。[[54]](#_54_Tong_Shang)第二次是武后的姐姐（已于666年被害）的兒子賀蘭敏之卷入了一樁重大的丑聞。在此之前，武后已把賀蘭敏之的姓改為“武”，這樣他就能在她的幾個異母弟兄被殺后，承襲她父親的頭銜。但以追逐女性而臭名遠揚的敏之行為越軌，他誘奸了已中選為太子妃的楊思儉的女兒。武后總是迅速除掉使她陷入困境的同伙中的不良分子，于是就把敏之發配到遙遠的南方殺死，隨即又清洗了他的已知的同伙。[[55]](#_55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同年，即670年，武后失去了支持她最久和最忠實的幫手許敬宗；他在78歲時退休，兩年后死去。幾乎立刻就出現了反對他的活動。一部分廷臣表面上以他的冷酷行為為由，想授予他不受尊敬的謚號，因為他曾發配自己的兒子去遙遠的南方，還把女兒嫁給南方部落首領之子以換回大量彩禮。許的傳記也提到他無法無天和貪婪的聲譽；673年，朝廷下令修訂他編撰的國史，刪掉書中不實之詞和不實之情。許敬宗把持朝廷達15年，尤其是他使武后能夠取得最高的政治權力，所以這種反映是對他的自然的反感。

不過，正當武后的影響看來要削弱時，皇帝的健康狀況再次惡化。672年末，太子奉詔監國；皇帝病情一度好轉后，太子在673年陰歷八月又不得不承擔受諸司啟事之責。這一年，皇帝的健康狀況如此不佳，以致召來著名的道家老醫生孫思邈給他治病。第二年，即674年初期，皇帝病情嚴重，朝廷正式討論武后應否臨時掌管政府。

這個動議由于受到眾朝臣和宰相們——特別是郝處俊和李義琰的強烈反對而未能通過。朝廷此時由相當龐大而穩定的一個宰相集團控制：他們是戴至德、張文瓘、李靜玄和幾乎一直在指揮作戰的將軍劉仁軌。他們至少在表面上開始使行政工作程序恢復正常，盡管武后通過她個人的秘書班子繼續對朝政施加影響。

674年后期，武后公開地廣泛籠絡人心，她的奏議提出12點對庶民和政府官員均有所讓步的改革主張。各種主張多半只表達了虔誠的愿望而不是實實在在的政策，但它們仍反映了對當時各種問題的一種敏銳的理解。其要點如下：“一、勸農[[56]](#_56___Xin_Tang_Shu____Juan_76_Di)桑，薄賦徭；二、給復三輔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費力役；六、廣言路；七、杜讒口；八、王公以降皆習《老子》；九、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十、上元前勛官已給告身者，無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稟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進階申滯。”以上主張基本上包括在一個詔令之中，并予以發布。它們以泛泛之論來處理那些長期存在的問題，旨在贏得官員和納稅人的歡迎。另外，它們還表現了武后對提高婦女地位的興趣及皇帝獻身于道教的跡象。675年，朝廷又作出進一步的讓步，即取消由于支付朝鮮和西北戰事的軍費而征課的捐稅。

675年，又有人提議恢復政府“正規的”形式，這時戴至德和劉仁軌被任命為尚書省的左、右仆射，而自7世紀50年代后期以來尚書省就已缺少主要首腦。這個動議使政府的行政機構在宰相們審議高級政策時重新得到了發言權。

在676年又增加了一批新的宰相。他們是前宰相來濟的兄長、揚州人來恒。高智周（602—683年）為另一位來自江蘇南部的南方人，已通過了進士考試，長期在學術部門擔任高官，在7世紀50年代參加過幾項龐大的文學作品匯編工作，曾擔任太子的老師。李義琰（死于688年）也是進士，出身于河北的名門望族。他早年是李世勣的門生，665年到朝廷擢升高位以前長期在地方任職。高宗很尊敬這位學識淵博的名人。他是674年反對武后攝政的動議的主要人物之一。最后一位是薛元超，他出身于山西南部的望族，是一位早熟的青年學者，得到太宗寵愛，與皇室的一個地位較低的公主結婚，高宗做太子時，他曾在太子府任職，又是《晉書》的編撰者。高宗登位后，薛元超先后在門下省和中書省任要職，顯然他會位至三公。664年上官儀被處決時，他卻被貶并流放到很遠的南方，674年獲赦免，立刻當上朝廷高官，在683年年中因身體狀況不佳而不得不退休以前，他對皇帝也有極大的影響。

這些宰相都是名聲清白的大臣，他們在7世紀80年代以前使朝廷出現了一個顯著穩定的領導集團。但那時，武后已通過北門學士獲得了自己控制和影響朝廷議事的手段。北門學士的主要人物有劉祎之和元萬頃，他們充當了她的私人代理人和私人秘書，漸漸干預起許多原來應由宰相們關心的事情。

675年，皇后取得權力的主要障礙因太子李弘突然死亡而消失了；太子不僅被皇帝本人寵愛，而且還受到朝廷上下一致的贊許和愛戴。[[57]](#_57___Jiu_Tang_Shu____Juan_86_Di)在皇帝最近患病期間，他十分勝任地管理各項事務，他死前不久經常站在皇帝一邊反對武后。幾乎就在他臨終前，他還就被殺的蕭淑妃的兩個女兒所受不公平的待遇與武后公開爭論過，因為這兩個女兒已被幽禁在宮中20年而沒有結婚。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李弘是武后毒死的。太子死后，皇帝向朝廷宣布：他只是因為患病，才沒有傳位給太子，為此他采取了一個不平常步驟，即謚李弘為“孝敬皇帝”，仿佛他真的當過皇帝似的。[[58]](#_5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太子的位置立刻由武后所生的皇帝第六子雍王李賢代替，對此我們可作一簡短的回顧。[[59]](#_59___Tang_Hui_Yao____Juan_4_Di)

武后當時清除對她具有潛在威脅的其他皇室成員。675年，一位低級妃子給皇帝生下的第三子李上金，因捏造的罪名被流放到湖南的蠻荒之地。[[60]](#_6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第二年，即676年，蕭淑妃所生的第四皇子、愛好學術的李素節，有試圖影響他父親的表現。自666年以來，武后就謊稱他生病而不讓他上朝，676年，他因賄賂公行的莫須有罪名而被流放。[[61]](#_61_Tong_Shang_Shu__Di_6381Ye)

677年，一個由著名大臣組成的很強的新班子成為新太子的顧問，679年當皇帝又因病不能親政時，太子負責政務，表現得非常明敏，因而贏得了很高的贊譽。武后在除掉李弘后，現在又面臨一個潛在的對手。

第二年，皇后著手對付李賢。在此以前不久，另一個術士明崇儼已得到皇帝和武后兩個人的寵愛，他曾私下預言太子不適合繼位，而武后另一個兒子卻有未來統治者的相貌。679年陰歷五月，明崇儼被盜賊殺死，兇手始終沒有抓到。武后認為李賢對此事有責任。[[62]](#_62_Tong_Shang_Shu__Di_6390__639)她開始譴責太子，并命她的馴服工具“北門學士”編寫《孝子傳》和《少陽政范》作為對他的直接告誡。朝廷和后宮開始流傳謠言，說太子不是武后的兒子，而是7世紀40年代與武后一起進宮的她的姐姐韓國夫人之子。

李賢是個好色之徒，他與他的幾個家奴有不正當的關系，因而引起官員們的不滿。武后為此向皇帝正式抱怨，皇帝于是派三名高級官員薛元超、高智周和新任宰相裴炎調查此事。在調查過程中，他們在太子的馬廄里發現了幾百套盔甲，于是斷定太子在策劃政變。也在受審訊的太子寵奴指控太子害死了術士明崇儼。

皇帝非常寵愛李賢，對指控他的罪行顯然是半信半疑，仍想赦免他。武后卻把自己的意愿強加給皇帝，于是太子被貶為庶民并被幽禁在長安。太子后來流放到四川，幾年后被迫自殺。很清楚，公眾對此案疑慮重重，因為皇后下令在洛陽公開燒掉發現的盔甲，以便讓百姓和官員看到太子的罪證。[[63]](#_63___Jiu_Tang_Shu____Juan_86_Di)

許多有名人物在李賢的倒臺中受到株連。宰相張大安，被謫流放四川；兩位王子img王李煒和曹王李明被流放到很遠的西南地區；另外幾位大臣曾是李賢的老師，他們雖然后來都被赦免并官復原職，但對他們的指控損害了他們的權力。[[64]](#_6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680年陰歷八月二十三日，皇帝第七子、武后的第三胎英王李哲被立為太子。[[65]](#_65___Tang_Hui_Yao____Juan_1_Di)

以后的幾年，朝廷的局勢保持相對穩定。新太子是14歲的孩子，不能在政治上起積極作用。這時皇帝的健康很不穩定，因此不再對從不屈服的武后構成威脅，而武后似乎也滿足于皇帝作名義上的君主。681年，在674年公開反對武后攝政的郝處俊被皇后巧妙地免去了宰相之職，而當了太子的老師。這個差事的風險是不言而喻的。

那時整個帝國處于長達幾十年的巨額軍費造成的財政危機之中。后來大量宮室和公共建筑的新工程又使這個問題更加尖銳。物價上漲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批農民逃往未開發地區試圖逃避納稅，而饑荒和干旱的報告頻頻傳來。朝廷幾乎沒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除了作出減少鑄造已經短缺的錢幣的災難性決定外，朝廷提出解決王朝財政問題的唯一的積極建議就是打算賣掉皇宮馬廄中的馬糞。[[66]](#_66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當皇帝健康時，他把注意力放在一些小事上，如派人遠至長江去搜尋稀有品種的竹子等等。他再次處于武后的影響之下，又開始準備一系列新的封禪祭祀，這次打算輪流在五岳舉行。676年和679年的兩次已經作好了安排，但因前線又出現了麻煩而被取消。后來武后計劃在684年新年舉行，以表示上蒼對高宗統治的最后的認可。

但在683年后期，皇帝的病情惡化，因此封禪大典又被取消。[[67]](#_67___Tang_Hui_Yao____Juan_7_Di)皇帝正遭受暈眩和失明之苦，可能還得了另一次中風。一個為他治病的醫生建議放血。皇后反對，但高宗堅持放血，結果他得以重見光明。[[68]](#_6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詆毀武后的人喜歡用這一事件來證明，她不希望高宗康復而希望他死去。但是，那時她丈夫已不再是她取得最高地位的威脅，況且始終存在著一種危險，即他的繼承人證明要擺脫她的控制。

盡管高宗病情暫時有所緩解，但不久又更加惡化。683年陰歷十二月初四，他召見右相裴炎，授以遺詔，命令太子在他的靈柩前登基，年輕的皇帝有不能單獨決定的軍國大事，應與武后協商解決。[[69]](#_69___Tang_Da_Zhao_Ling_Ji____Ju)他在同一天死去。

## 高宗的對內政策

高宗在位時間比他父親和祖父加在一起的時間還要長，他常被貶為在重要的政治制度上建樹極少的統治者。但高宗時期，對管理上的革新需求不多：基本的政府機構已于高祖時期設立，太宗又加以改進和使之合理化。高宗繼承的是一個穩定的國家，它具有一套順利地發揮作用的制度，一個受集權的法制約束的行政體系，其中各官署的職責都由法律作了周密的限制和規定。制定出的兵制和財政制度把中央政府的直接干涉減少到最低限度。政府主動實行的政策被嚴格地限定在維持秩序、處理軍事任務以及管理土地制和稅制等方面。事實證明，這套行政體制具有非凡的持久性，在缺乏堅強的上層直接領導時又具有明顯的彈性。它經受住了高宗統治的緊張時期、武后篡權時期和她垮臺后唐皇室恢復時期的考驗。它的設置是為了使它能在最低限度的中央積極指導的情況下繼續發揮作用。

這一種制度化的行政機器的基礎是制定成套的法律和行政法規，以使政府能順利地運轉，而這正是整個高宗統治時期所不斷關心的事。

太宗對繼任者的遺訓之一就是修訂唐律和行政法規使之適應形勢。[[70]](#_70___Tang_Da_Zhao_Ling_Ji____Ju)這件事已完成：651年，以長孫無忌為首的一個由高級官員組成的組織把奉敕修訂好的律、令、格、式的新版本奏報皇上。651年陰歷九月的詔令向全國頒布新法。[[71]](#_71___Tang_Hui_Yao____Juan_39_Di)新法經過全面修訂，成為唐代一系列法律當中最重要和影響最大的法律之一，它稱為《永徽律令》。第二年，高宗又組織了另一個有幾名法律專家在內的組織，以編寫一部能用于法制教育的詳細的刑法官方注釋。這部形式稍作變動而成為流傳至今的《唐律疏義》，在653年陰歷九月完成并被送呈皇帝。它經過小的修改后在幾個世紀中一直是刑法的權威性的注疏。[[72]](#_72___Tang_Hui_Yao____Juan_39_Di)

這些不朽的著作完成以后，在高宗時期有人為了使法典適合當時的形勢而作了系統的努力。這項工作包括把原來在詔令中頒布的格編成法典，并對為執行法律而制定的詳細規定——式進行小的修改。665年，當全部官署的名稱改動了以后，高宗命令刑部的主要官員修改格和式。[[73]](#_73___Jiu_Tang_Shu____Juan_50_Di_1) 676年政府又下令對法律進行意義更為深遠的修改，這次不僅修改格和式，而且也修改行政法的主要部分（令），這項工作在677年初期完成。[[74]](#_74___Tang_Da_Zhao_Ling_Ji____Ju)高宗去世后不久，又進行了一次修訂。[[75]](#_75___Jiu_Tang_Shu____Juan_50_Di)

因此，高宗統治時期肯定沒有忽視法律。相反，法典以大致12年的間隔期，經過仔細修訂并使之順應時勢，這比唐代任何時候都更正規。

這個時期個別法學家和注疏家也相當活躍。朝廷上兩位杰出的官員趙仁本（667—670年任宰相）和崔知悌完成了私人選編的案例《法例》，它后來普遍使用于7世紀的法律學校。崔知悌的這部私家著作成了一部使用方便的現成的法律摘要，以致在667年被禁止在朝廷使用。[[76]](#_76_Cui_Rui_De____Dun_Huang_Chu)

高宗另一個遠比他的前輩偉大的政績是重新建立科舉制度，并在他統治時期更多地通過科舉制起用官員。[[77]](#_77___Wen_Xian_Tong_Kao____Juan)中舉和應試的人數開始迅速增多，科舉制的影響開始在最高一級官僚機構中表現出來。高宗的幾個宰相都有功名，相當數量的官員開始以這種方式走上仕途。但不能夸大這個趨勢。官員中中舉的人依然是少數，大部分官員仍靠世襲的特權入仕，甚至靠更普遍的方式從胥吏升任。例如在656年，不少于1400名胥吏有資格進入正途，而同一年只有22人通過進士考試。[[78]](#_78___Jiu_Tang_Shu____Juan_81_Di)

經常聽說，通過科舉制征用人才是有意識地試圖增加對武后新政體的支持，因為這給統治階級帶來新的社會成分，但支持這種論點的材料很少。能參加科舉考試的人來自兩種途徑：或來自京師的國子學，但能進入這些國子學的幾乎都是勛貴和高級公卿子弟；或是被他們所在的州當做“貢品”送上的。后一條路是寒士能指望參加科舉考試的唯一途徑，中舉的人不多。例如在670年，11個中舉的進士中只有一個是來自地方；在681年的51人中只有一人，在682年的55人中只有一人。[[79]](#_79___Tang_Zhi_Yan_____Cong_Shu)

有關所謂的高宗和武后故意利用考試來改變官僚隊伍社會成分的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652年、653年、663年、669年、671年、672年和676—679年暫停實行科舉制。相反，在唐朝的其余時期，除了少數例外，每年都舉行科舉考試。換句話說，在武后660年完全控制了朝廷以后，她本應該忙于通過科舉制吸收新的統治精英，但她卻有十年根本沒舉辦科舉考試；而在665年，所有的應試者——至少參加進士考試的人——都未中選。只在670年、673—675年和682—683年有較多應考人中舉。660—683年通過進士考試的年平均數僅為18人。[[80]](#_80___Wen_Xian_Tong_Kao____Juan)

高宗統治時期的真正成就，不是想改變統治階級內部社會力量的對比這一難以作為定論的企圖，而是對科舉制本身進行一系列大改變。651年，隋朝和初唐最高級的秀才考試中斷。此前取得秀才功名的人極少。除了太宗時期設立的法律和書法（實際為語言學和古文書學）兩科外，656年又新設一門新的專科數學考試和一所為該科培養考生的專門學校。數學考試與原有的兩種考試一樣，是專為低級官員和庶民的兒子舉辦的。但在658年，所有的專科學校和專科考試都停辦。662年它們又在雇傭其中舉者的政府部門的控制下恢復：大理寺管法律學校，太史局管數學學校，秘書省管書法學校。671年，這幾所學校可能又變成了國子監的一部分。[[81]](#_81_Dai_He_Du_____Xin_Tang_Shu)

科舉考試僅僅使中選者得到當官的資格（出身），但有更多的人通過其他途徑也得到了這種權利。例如，在657年，估計有資格當官的人三倍于他們能得到的官職。為了從取得當官資格的人當中選人擔任實職，選舉制被采用了。如同太宗時期和高宗初期，這項制度帶有極大的隨意性。669年，裴行儉制定了實行選舉制度的詳細規定，這項規定在唐朝其后的時間決定了官員的選拔和升遷。[[82]](#_82___Tang_Hui_Yao____Juan_74_Di)據說武后用“糊名”來確保選舉制度的客觀性，這樣，候選人的身份和社會出身就不能影響選拔的結果。

科舉制本身在681年也經歷了一次很大的改革，從而再次確定了唐朝其后時間的科舉形式。直到此時，“明經”和“進士”兩科考試已變得非常相像。兩者都是讓應考人完成專題文章，只是題目不同（明經科考經書及其注疏，進士科考政治事務）。681年的改革給兩種考試帶來了徹底的變化。明經科此時要求完全掌握經文（678年以來它包括道家的《道德經》，也包括傳統的儒家經籍）及其傳統疏義。它基本上成為一種強調死記硬背的考試。新的進士科也要求有一定的經籍知識，但不那么詳細；另外要求考生依式寫出詩賦等文學作品，同時還要寫政治和哲學論文。從此以后，進士功名的取得比明經困難得多，因而其威望也遠高于后者，而在以前，人們則更重視明經的資格。[[83]](#_83_Xiang_Jian___Jian_Qiao_Zhong)

另一個創新在高宗時期雖屬罕見，但對后世產生了極大影響，這就是658年第一次在皇帝本人命令下為特定應試人舉行的殿試。[[84]](#_84___Tang_Hui_Yao____Juan_76_Di)在以后各朝，殿試幾乎和進士試同樣被看重。

因此，國家的首要的官員選舉制在高宗時期得到了徹底改造。8世紀盛唐時期實行的選舉制度基本上是高宗時期傳下來的。

高宗實行的建設新都、不斷擴大官僚隊伍，尤其是經常進行大規模征戰等等政策，給帝國的財政帶來了持久的和不斷增長的壓力。

高宗的主要的財政問題是太宗時期早就遺留下來的。人頭稅這一基本稅制如果要有效地推行，就需要詳細登記一切戶口，以確定誰該納稅。在隋朝，609年登記的超過900萬戶。太宗時期已不到300萬戶。[[85]](#_85___Ce_Fu_Yuan_Gui____Juan_486)這種驚人的銳減不是由于隋末唐初內戰時期人口大量死亡，而純粹是由于地方政府沒有對人口進行全面的登記。甚至在高宗統治的初期，登記的戶數也只有380萬戶——當然這遠不足實際人口的一半。[[86]](#_86___Tang_Hui_Yao____Juan_85_Di)可見有近逾一半的人口未被登記，因此就不納稅。高宗像他父親一樣，也知道這個問題，但是，雖然在654年和677年對登記制度進行了幾次小的改進，基本的問題仍沒有解決。

對稅制沒有進行改革，雖然帝國的某些地區獲準以谷物以外的貨物納稅，以減少漕運到京師的費用。后來656年，政府又試圖消除黃河三門峽引起的運輸堵塞，和開辟從東北部平原運漕糧去長安的更方便的路線，但未能奏效。[[87]](#_87___Tang_Hui_Yao____Juan_87_Di)672年沿渭河流域通往長安的河渠得到了改善，[[88]](#_88___Tong_Dian____Juan_10_Di_56)但往長安的谷物運輸仍既費錢又費工。

隨著行政費用和官方消費的增長，國家的經濟形勢從整體上看已經惡化。太宗時期一般來說是繁榮和物價低廉時期，這種情況延續到7世紀60年代初期。但是，在此以前，官鑄貨幣明顯供不應求。大規模的私鑄成為一個主要問題，特別是貨幣經濟基礎最牢固的長江流域更是如此。660年政府曾試圖折價收買私鑄幣，[[89]](#_89___Jiu_Tang_Shu____Juan_48_Di)但不論這個措施也好，或者對私鑄進行前所未有的嚴懲也好，都沒有成功地解決這個問題。

666年，情況惡化到了危機的程度，當時政府不顧一切地企圖滿足壓倒一切的財政需要，有意識地降低新鑄銅錢的成色，讓金屬含量與一般銅錢相同，但其面值卻大了10倍。[[90]](#_90_Tong_Shang)但隨后出現的對貿易的破壞是如此嚴重，以致新幣在發行的第二年年初就被收回，這個考慮不周的措施嚴重地搞亂了經濟。[[91]](#_91___Tang_Da_Zhao_Ling_Ji____Ju)

高宗統治后期的顯著特點是持續多年的歉收。670年，谷物嚴重短缺，致使政府禁止釀酒。[[92]](#_92___Ce_Fu_Yuan_Gui____Juan_504) 7世紀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歉收、洪水、干旱、蟲災和饑饉接踵而來，一直達到危機的程度。680年，糧價之高，前所未有，[[93]](#_93___Tong_Dian____Juan_7_Di_40Y)政府認為高物價是流通貨幣過多的結果，因此大量減少鑄造新幣，對私鑄的懲辦也比以前更加嚴厲。[[94]](#_94___Jiu_Tang_Shu____Juan_48_Di)與此同時，從原有登記地區逃往其他地區而成為不登記、不納稅的占地者的流民占有令人不安的比例。高宗是在經濟和財政危機依然沒有得到解決的情況下去世的。

雖有這一總的失敗，高宗的政府仍提出了控制物價的措施，并取得部分成功，它們后來繼續使用于整個唐朝。政府周期性地從自己的中央谷倉中拿出谷物以低價賣出，679年甚至用谷物換回私鑄錢。更重要的措施是639年在部分重要城市進一步發展常平倉，655年，京師成立了常平署，在物資供應充分時以高于當時市價的價格買回商品，物資短缺時再以低于市價的價格賣出，使物價浮動保持在一定限度內。后來每個州都設立了這種糧倉。[[95]](#_95___Tang_Liu_Dian____Juan_20_D)太宗時期設立的義倉也保留下來，作為對付本地饑荒的安全措施。651年以后，義倉儲備糧的征收基礎是各戶財產的估算數額，而不是耕地面積，這可能是在稅冊中的土地材料不完備的緣故。[[96]](#_96___Tang_Hui_Yao____Juan_88_Di)

## 對外關系

不管對高宗統治下的國內政治作出什么樣的評價，唐朝的軍事力量和威望在這個時期都達到了頂峰，甚至超過了太宗時期。在短暫的幾年中，唐朝控制的中華帝國的領土比它以前和以后都更為廣闊，長安的影響已達到中亞和東亞的大部分地區。但由于越來越嚴重的財政困難困擾著帝國內部，高宗和武后在進行這些征服時，濫用中國軍事力量，超過了合理限度，并且過分延長了唐朝的防線。這種情況，再加上中亞和北亞新的強國的崛起，最終迫使中國收縮自己的邊境。高宗統治的最后幾年，唐帝國的大部領土再次淪陷于“夷狄”之手，有些地區甚至被他們長期占領。

### 西突厥

主要由于太宗的精明外交，在他死去時西突厥的力量已被內部沖突嚴重削弱，咄陸可汗被身為唐代封臣的乙毗射匱代替。咄陸垮臺之際，他的部下阿史那賀魯逃往中國，后成為中國軍隊的將軍，并任隴右（甘肅）一個州的都督。但賀魯一聽到太宗死去的消息，立刻背叛了唐朝，向西侵略乙毗射匱的領土并把他推翻。他宣布自己為沙缽羅可汗（統治期651—657年），并在自己的統治下重新統一了西突厥帝國。他在短時期內就控制了整個塔里木盆地，并擁有伸展到帕米爾以外直到波斯邊境的廣闊領土。

突厥人多次跨過中國邊界入侵，迫使高宗派部隊遠征沙缽羅可汗。經過幾次長達數年的未決勝負的戰斗，657年唐朝將軍蘇定方終于在伊塞克湖附近的一次戰役中擊敗西突厥軍隊，沙缽羅逃往塔什干，但塔什干人把他交給了中國人。

后來高宗再次把西突厥劃分為都陸和弩失畢兩個部落聯盟，并立兩個臣服唐朝的對立的可汗為它們的首領。西突厥在伊犁河谷和伊塞克湖的故土分別置于唐朝兩個都護府的管轄之下，它們的管轄范圍與西突厥帝國以前劃分的東、西兩部分大致相符。從前歸新疆西部、俄羅斯突厥斯坦和奧克蘇斯河流域的西突厥人控制的外國人，也在659年和661年正式接受中國人的轄制。唐帝國的版圖于是從中國海一直達到波斯邊境，其中中國轄制的一部分新領土稱為波斯都督府。但新領土十分遼闊，唐軍分布的力量又非常單薄，因此唐王朝權力的這種進一步擴張只能維持一個短暫時期是不足為奇的。665年初，都陸和弩失畢兩個部落聯盟反叛了擁唐的可汗，再度從中國手中取得了獨立。

唐朝這次向西部擴張，正在波斯的政治局勢出現全局性的變化之后。太宗統治時期，波斯薩珊王朝被阿拉伯的入侵摧毀。波斯國王伊嗣俟三世在638年派使團向太宗求援以抵抗阿拉伯人。率領使團的國王之子卑路斯王子在長安定居，其后高宗統治時期他成立了波斯人的流亡政府。高宗還允許他在長安建一座襖教寺廟。按照一種說法，高宗于677年派出中國軍隊幫助王子重獲王位。但中國軍隊護送卑路斯最遠只能到龜茲，然后便返回唐朝。事實證明，卑路斯復位的企圖完全失敗了，他回到長安后死在那里，大批波斯少數民族滯留在中國的京城。

高宗時期，中國第一次與征服薩珊王國的阿拉伯人建立了聯系。第四位哈里發奧斯曼派出的第一個阿拉伯使團在651年向唐廷貢獻方物。

### 朝鮮半島

太宗曾希望649年的大戰會最終征服高麗，但太宗臨死以前親自取消了這次戰役。這反而加強了高麗的獨裁者泉蓋蘇文的侵略野心。655年他攻擊滿洲南部的契丹人，后者已于648年公開承認自己是中國的附庸。656年，泉蓋蘇文聯合朝鮮半島西南部的百濟王國入侵北面的新羅，占領了新羅30多個城鎮。同時，新羅試圖說服高宗與它一起消滅高麗的力量。這個計劃對高宗來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由于新羅已迅速地引進了中國文化中的許多內容，并且按照中國的路線確立它的制度，這一建議就加倍地吸引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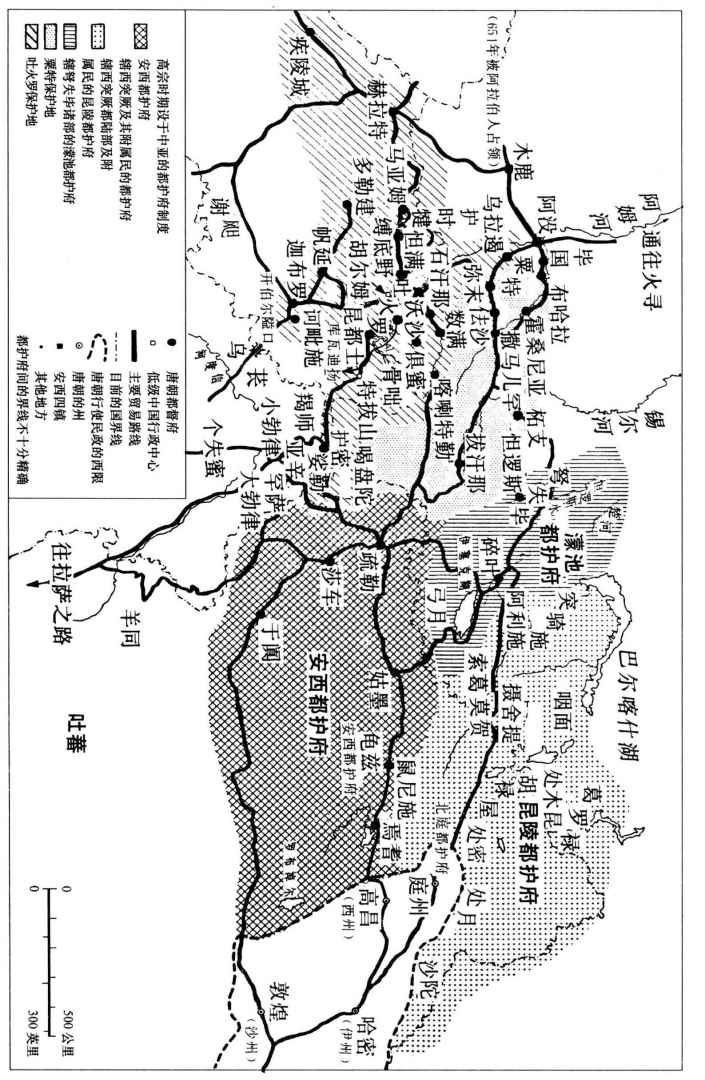
這兩個盟國決定從兩個方向進攻小國百濟，然后把它當做入侵高麗本土的基地。到了660年，充分的準備工作已經完成，中國大將蘇定方率領號稱10萬人的大軍出山東半島渡黃海，在百濟的首都、錦江邊的泗沘城附近登陸。同時有5萬大軍從新羅沖破百濟西部的防線，然后圍攻泗沘城。由于被包圍，百濟國王逃出都城，他兒子以該城和國土投降了唐軍。百濟皇室成員在長安當了人質，中國官員在1萬名中國占領軍的支持下被派往這一被征服王國的全國。

以奪取的百濟為基地，高宗（或是武后，她已在丈夫最近患病時接管了政府）策劃中國軍隊從百濟和遼東同時進軍，對高麗進行幾面夾攻。蘇定方指揮的遠征軍從北面深入高麗腹地，圍攻平壤。但在百濟的中國軍隊被一次叛亂牽制住，不能參加進攻。新羅的支援又太遲，蘇定方的部隊被迫撤回。百濟的抵抗運動由一位名為牟岑的將軍領導，他短期地恢復了王室，直到663年后期才最后投降。叛亂者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后者在錦江口與中國人進行的一次大海戰中損失了400多條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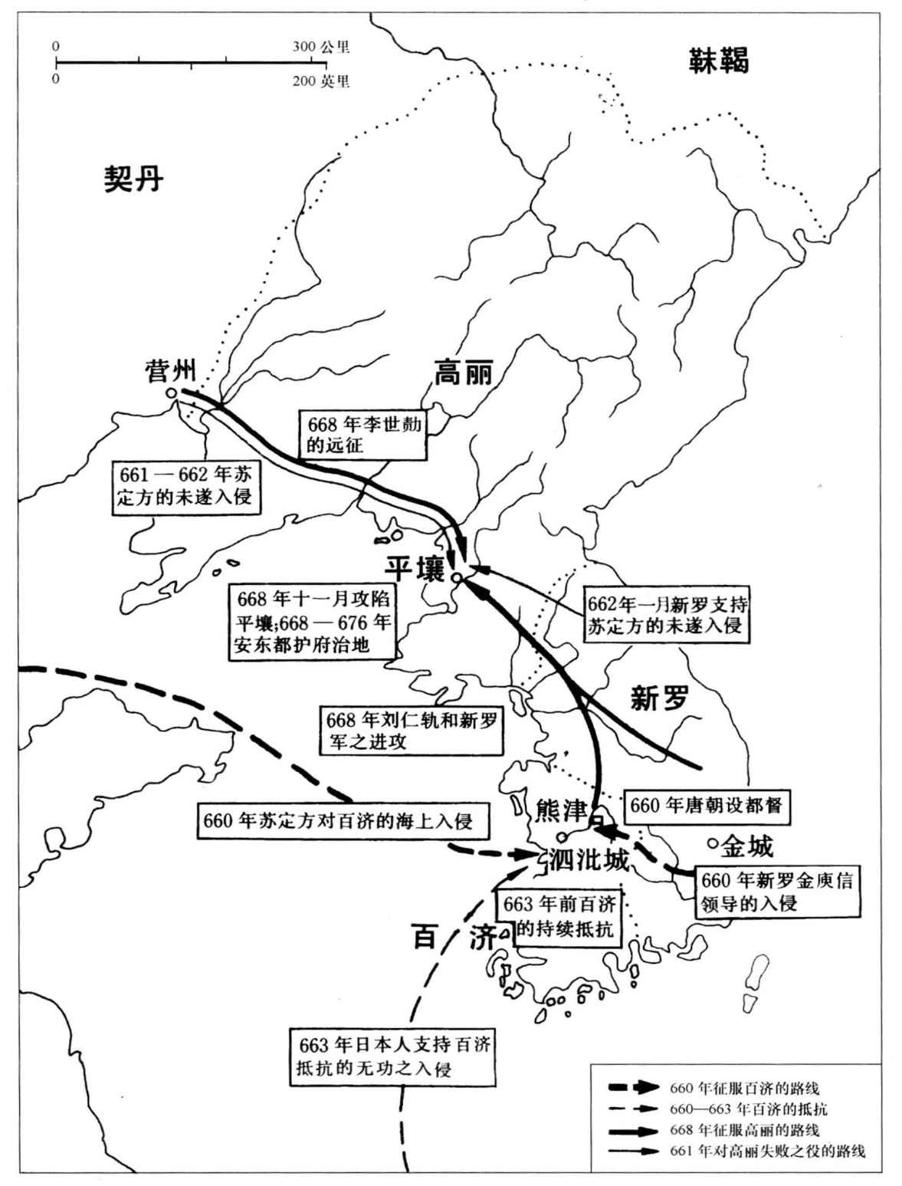
666年年中，泉蓋蘇文之死以及繼任者與其兩個弟兄的內部爭斗，使形勢變得對中國人有利。當新首領請求中國人協助對付他弟兄的反叛時，唐朝的反應是以年邁的李世勣率軍對高麗發動水陸大戰。新羅的一支大軍從南面配合進攻。668年陰歷九月，唐朝的一系列勝利達到頂點，這時李世勣經長達一個月的圍攻后攻陷高麗首都平壤，帶著20萬俘虜（其中包括高麗國王）返回中國，并把高麗國王獻到太宗墓前祭奠。一個有兩萬駐軍的都護府在平壤設立，以治理被征服的高麗王國。

軟弱的高宗能如此成功地完成導致隋煬帝和唐太宗災難性失敗的重大軍事遠征，這似乎令人奇怪。但高宗享有兩個其前輩所沒有的有利條件。第一，泉蓋蘇文死后，高麗國內發生內亂，其防線遭到嚴重的削弱。第二，唐朝軍隊占領了可從海上得到供應的百濟作為基地，便能迅速打擊高麗的心臟地帶，開辟第二條戰線。唐朝軍隊不必再依靠穿過遼東的漫長的陸路，這條路夏天遇雨非常泥濘，又為過早來臨的嚴寒所苦。

但唐朝不能長時間享有軍事上的優勢。670年，高麗反抗占領軍的叛亂成功地使王室得以復辟。[[97]](#_9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盡管四年以后叛亂被鎮壓下去，但反對中國占領的抵抗在高麗持續不斷。抵抗受到企圖在朝鮮半島上建立統治的新羅的支援；新羅這時已開始侵占百濟從前的領土。676年，中國人被迫把平壤的都護府撤至遼東更安全的地帶，[[98]](#_9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所有的中國官員都從高麗被召回。678年，高宗經勸說停止對新羅發動大戰，理由是對吐蕃的防御已成為比控制朝鮮更為急迫的事情。[[99]](#_99_Tong_Shang_Shu__Di_6385Ye__G)新羅已在幾年內占領了百濟和高麗南部的大部。[[100]](#_100___Tang_Hui_Yao____Juan_95_D)同時，唐朝越來越注意離本國較近的嚴重得多的軍事事務。由于大量的兵力投入對付西面吐蕃人的戰役，朝廷無力再派更多的部隊去朝鮮遏制前盟友的侵略性的擴張，因此占領和統治朝鮮的計劃被取消。



地圖8 高宗時期中亞的保護地



地圖9 高宗對朝鮮的幾次干預行動

### 吐蕃

中亞的一個大變化是吐蕃的大規模擴張。吐蕃的大規模擴張始于偉大的吐蕃王棄宗弄贊，甚至順利地持續到他650年死去以后。吐蕃的力量朝各個方向滲透，進入西藏高原西部、云南和四川的邊境地區以及尼泊爾，往北進入塔里木和現青海省的肥沃的牧場（當時是吐谷渾的領土）。在7世紀60和70年代，高宗朝廷的主要精力放在高麗戰爭方面，對吐蕃的日益增長的威脅有一段時間未能給以充分的注意，結果聽任西部邊境發生了極為重要的戰略性變化。

660年吐蕃人攻擊吐谷渾。663年他們再次發動進攻，把吐谷渾人趕出他們青海湖周圍的故土。吐谷渾國王在絕望中懇求中國人給以援助，但遭到拒絕。當吐蕃和唐朝領土之間唯一的緩沖國被吐蕃摧毀時，高宗就是這樣袖手旁觀的。隨著吐谷渾的被征服，吐蕃就能自由出入甘肅邊境和塔里木盆地。

670年，吐蕃開始蠶食唐王朝從前在四川邊境部族地區設立的各邊境州。再往西，吐蕃人又與殘存的西突厥部落之一弓月結盟，大舉侵犯中國在塔里木盆地的領土。665年，吐蕃與疏勒國王聯合進攻于闐，切斷了通過塔里木盆地的南部通道。670年，在于闐國王的援助下，吐蕃向北進攻，占據了唐朝安西都護府所在地龜茲以及焉耆。中國人因此被迫從吐魯番以西的大部分塔里木盆地撤退，并放棄了安西都護府和控制著塔里木諸土邦的安西四鎮。[[101]](#_101_Yi_Lai_Xian_Tai_Lang____Zho)

但是吐蕃對塔里木盆地的控制并不十分穩定。673—675年，與吐蕃和他們的西突厥盟友吵翻的疏勒、于闐和焉耆等國的國王重申他們對唐王朝的效忠，于是安西都護府得以重新設立。與此同時，中國人對通往西面的另一條穿過天山山脈以北的準噶爾和伊犁河谷的路線加強了控制。677年當吐蕃在西突厥可汗的援助下再次入侵塔里木時，中國仍保持對此路線的控制。679年，中國軍隊打敗了西突厥，俘虜了西突厥可汗并進軍碎葉，在碎葉筑城設防。同年，吐蕃人被趕出塔里木盆地，安西四鎮（此時包括取代焉耆的碎葉）再次設立。

但是，唐軍在對付吐蕃從青海湖周圍的前吐谷渾領土對甘肅構成的遠為嚴重的威脅時，則不那么成功。670年，旨在奪回中國在這個重要地區失去的土地而由薛仁貴領導的一次大戰遭到慘敗，唐朝的遠征部隊幾乎全軍覆沒。676年，吐蕃國王的死導致一系列的內亂，高宗希望利用這個有利的機會進攻吐蕃。他被勸阻，但兩年以后，另一支由李敬玄指揮的8萬人的中國軍隊奉命進攻青海地區，但也失敗了。中國軍隊受到重創。吐蕃人繼續襲擾邊區，并鞏固他們對青海地區的控制。680年又占領四川西北的戰略要地安戎，使他們能牢牢地控制四川和云南邊區諸部落民族。

在高宗末年，唐廷對吐蕃已拿不出任何積極的政策。從677年起，保衛崎嶇難行的現甘肅和四川的西北邊境需要建立一支更龐大的常備軍，盡管那里建立了屯田組織而使部隊能夠部分自給，但事實證明那里的后勤供應是困難而又昂貴的。同時，吐蕃的擴張卻大大地加快了。[[102]](#_102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

### 東突厥人的復振

679年，在太宗摧毀東突厥可汗國幾乎半個世紀后，突厥各部在長城外今山西省北部叛唐。叛亂于681年末被鎮壓，雙方兵力的損失都很慘重。但是682年末，頡利可汗的后代阿史那骨咄祿可汗（即鄂爾渾河碑銘上的頡跌利施可汗）統一了東突厥人余部。他在鄂爾渾河上游的故土成功地重建了東突厥人的國家。他在對抗中國人時得到了突厥人阿史德元珍的援助；后者的家族早已效忠于唐王朝，他本人也已接受了中國教育。在高宗的余年，東突厥人在他們的聯合領導下繼續侵襲今山西、陜西和寧夏諸省的邊境地區。這種邊界戰事造成雙重損失，因為唐朝騎兵需要的大量戰馬大部分產于這個地區。[[103]](#_103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

當高宗在遺詔中命令太子處理國家重要事務時應與皇后協商時，他一定是有意地要確保武后在他自己在位時期建立的政治統治能夠繼續下去。很可能他已得出結論，中國一旦又被邊界糾紛和國內的財政危機所困擾時，它在武后堅決的、哪怕是殘酷無情的控制下要比在年輕和缺乏經驗的皇帝控制下更好。

新皇帝的登基典禮往后拖延了幾天，在此期間，武后在裴炎的協助下作了安排，以便通過門下省和中書省來處理政務。新皇帝（廟號中宗）登基時，武后就成了皇太后，但大權絲毫未減。在下一章將會談到，中宗繼位后幾個月就被迫退位，由他的弟弟繼承皇位，但一次宮廷政變又使后者成了傀儡。武后終于成為整個的帝國無與匹敵的統治者，李唐皇室70年的統治就這樣結束了。

比起她意志軟弱和優柔寡斷的丈夫來，武后才是太宗傳統的真正繼承人。但后世的歷史學家如果不根據武后在高宗死后的行為來衡量她對高宗的控制，就不能弄明白高宗的統治。人們常把她在660—683年的治理與她在7世紀80和90年代實行的恐怖和恫嚇政治混為一談。但事實并非如此。她通過宮廷政變或搞宮廷陰謀積極而公開地干預政治，在高宗生前只有四五次，后來只是作為皇帝背后的勢力來確立和維持她的地位。她完全可以成為中國真正的統治者，但她只是通過皇帝和他的朝廷行使她的權力。高宗在去世前仍保留著相當大的個人權力。他得到了由朝廷卿相形成的強大勢力的支持，他們強烈反對武后任何使她地位合法化的企圖。對官僚集團有計劃的清洗還沒有進行。高宗生前，受害者僅限于那些在宮中，或在她的親戚中，或在皇室中，或在朝廷官員中對她施加影響控制皇帝的行動構成威脅的人。指出這一點并不是否認她對決策無可懷疑的權力和影響，或是否認她在必要時為了達到目的而采取非常冷酷無情的手段，而只是想說明她在683年以前和以后是用迥然不同的手段達到她的目的的。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高宗統治時期不是沒有制度上的改進，國內也出現了持續的和平，雖然為了軍事遠征和其他政策花費了大量的賦稅和人力。高宗統治時期，人民基本上沒有表現出不滿的跡象，只是在最后10年，無限制的軍費和為擴大的及不斷增加的官僚隊伍而必須提供的開支才開始把很重的負擔強加給群眾。高宗時期軍事取得了輝煌的成功，但這些成功使帝國的兵力過于分散，由于新的敵對國的出現，帝國的軍隊又被迫后退而處于防守。到了683年，帝國甚至已經喪失一部分太宗征服的邊界領土，并且正在經歷一場重要的內部危機。

但是，它不是傳統歷史學家所攻擊的高宗及其作威作福的皇后在其統治末年的那種危機。各種史書基本上都是那些本人即為朝廷官員的歷史學家所作的關于中央政府活動的朝政記錄，而高宗統治時期中央政府最高層的行為對于這些歷史學家來說顯得是災難性的轉折點。太宗與其朝臣目標的一致、宰相之間坦率公開的議政以及成為太宗政治特點的親密的君臣關系，早已消失無余。代替它的是一個缺乏堅強領導的朝廷，在那里，討論被壓抑，官員中充滿了恐怖、不安全、猜疑、相互誹謗和不斷傾軋的氣氛。政策是由武后和她的私人寵幸決定的，然后強加給皇帝和朝臣，政府的正規形式早已無人理睬。

然而，即使在朝廷，也不是一切都一無是處。高宗統治的后半期，有一批能力很強的宰相為他效勞，為了彌補武后在655—664年攫取權力時造成的損失，他們也作了一定的努力。直到高宗統治后期，武后的位置基本上是不穩定的，只能依靠間接的手段控制朝廷。她一直易受攻擊，她的地位是靠個人的控制而不是靠任何堅實的制度基礎來維系的。不過，她鮮明地把自己確立為高明而機智的政治家，到高宗統治后期，她的權力地位已經不可動搖，以致在高宗死后她可以穩操勝算地成為中國不可置疑的統治者。

[[1]](#_1_4)《唐會要》卷1，第3頁。

[[2]](#_2_4)《唐會要》卷56，第961頁。

[[3]](#_3_4)《唐會要》卷4，第41頁；《舊唐書》卷86，第2823—2835頁。

[[4]](#_4_4)《資治通鑒》卷199，第6267頁。

[[5]](#_5_4)孫國棟：《唐貞觀永徽間黨爭試釋》，載《新亞書院學術年刊》，7（1965年），第39—49頁。

[[6]](#_6_4)《資治通鑒》卷199，第6259—6260頁；《舊唐書》卷69，第2524頁；《新唐書》卷94，第3837頁。

[[7]](#_7_4)布目潮風：《隋唐史研究》（京都，1970年），第307頁；《全唐文》卷249，第7—8頁；李嶠：《攀龍臺碑》，載《全唐文》卷249，第7—8頁。

[[8]](#_8_4)《資治通鑒》卷195，第6134—6135頁；《全唐文》卷249，第1—17頁；《文苑英華》卷875，第1頁以后。關于武曌與高宗的關系，見R.W.L.吉索《唐代武則天皇后之生平及時代》，未發表博士論文（牛津，1975年）。

[[9]](#_9_4)《全唐文》卷199，第1—2頁。

[[10]](#_10_4)《資治通鑒》卷199，第6284頁。

[[11]](#_11_4)李樹桐：《唐史考辨》（臺北，1965年），第313—335頁。

[[12]](#_12_4)同上書，第311—313頁；郭沫若：《武則天》（北京，1962年），第123頁。

[[13]](#_13_4)《資治通鑒》卷199，第6285—6288頁。

[[14]](#_14_4)陳寅恪：《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杰”》，載《嶺南學報》，12（1956年），第7—8頁。

[[15]](#_15_4)《資治通鑒》卷199，第6292頁。

[[16]](#_16_4)《唐會要》卷3，第27頁；《全唐文》卷11，第25頁。

[[17]](#_17_4)《唐會要》卷4，第41頁；《舊唐書》卷86，第2824、2828頁；《唐大詔令集》卷27，第93頁；《唐大詔令集》卷28，第98頁；《文苑英華》卷443，第8頁；《全唐文》卷12，第2頁。

[[18]](#_18_4)陳寅恪：《記唐山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載《歷史研究》，1（1954年），第35—51頁。

[[19]](#_19_4)胡如雷：《論武曌的社會基礎》，載《歷史研究》，1（1955年），第85—96頁；橫田繁：《武后政權成立的前提》，載《東洋史研究》，14.4（1956年），第25—46頁。

[[20]](#_20_4)松井秀一：《圍繞擁立武后的問題》，載《 北大史學》，11（1966年），第1—6頁；松井秀一：《唐代前期的貴族》，載《歷史教育》，14.5（1966年），第41—42頁。

[[21]](#_21_4)《舊唐書》卷82；《新唐書》卷223上。《新唐書》把他歸入“罪臣”一類。

[[22]](#_22_4)《資治通鑒》卷200，第6303頁。

[[23]](#_23_4)同上。

[[24]](#_24_4)同上書，第6322頁。

[[25]](#_25_4)《唐律疏義》卷1，第七條第五惡，“不道”。

[[26]](#_26_4)《資治通鑒》卷201，第6343頁。

[[27]](#_27_4)《全唐文》卷12，第6頁。

[[28]](#_28_4)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重慶，1944年）；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2版（劍橋，1970年），第84—87頁。

[[29]](#_29_4)岑仲勉：《隋唐史》（北京，1957年），第142—144頁。

[[30]](#_30_4)沙畹：《泰山》（巴黎，1910年），第18—20頁。

[[31]](#_31_4)《唐會要》卷7，第79—95頁。

[[32]](#_32_4)同上書，第95—101頁；《舊唐書》卷23，第886—887頁；《資治通鑒》卷200，第6316頁。

[[33]](#_33_4)《唐會要》卷7，第98頁。

[[34]](#_34_4)《唐會要》卷7，第101—103頁。

[[35]](#_35_4)《唐會要》卷12，第283—285頁。

[[36]](#_36_4)《唐會要》卷36，第664—665頁；又見池田溫在《劍橋中國史》第4卷中所寫的一章；池田溫：《唐代氏族志的考察》，載《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13（1965年），第3—64頁；崔瑞德：《唐代統治階級的組成：從敦煌發掘的新證據》，載芮沃壽、崔瑞德合編《對唐代的透視》（紐黑文，1973年），第47—85頁。

[[37]](#_37_3)《唐會要》卷83，第1528—1529頁。

[[38]](#_38_3)《唐會要》卷63，第1092頁；對這些志的簡要介紹，見白樂日《〈隋書〉中的食貨志》（萊頓，1953年），第5—7頁。

[[39]](#_39_3)《唐會要》卷63，第1092頁。

[[40]](#_40_3)同上書，第1090頁。

[[41]](#_41_3)同上書，第1092頁。

[[42]](#_42_3)許敬宗編撰的唐代前三位皇帝統治時期的歷史有許多偽造的地方，許的作品送呈高宗后，高宗發現了這些偽造。見《唐會要》卷63，第1093頁。

[[43]](#_43_3)詳情見D.M.麥克馬倫在《劍橋中國史》第4卷中的論述。

[[44]](#_44_3)《唐會要》卷36，第656—657頁。

[[45]](#_45_3)《資治通鑒》卷202，第6376頁。

[[46]](#_46_3)《唐會要》卷57，第977頁。

[[47]](#_47_3)關于高宗與佛教的關系的詳情，見S.溫斯坦在《劍橋中國史》第4卷中所寫的一章。

[[48]](#_48_3)《全唐文》卷12，第13頁；《唐大詔令集》卷78，第442頁。

[[49]](#_49_3)《唐會要》卷48，第850頁；《 舊唐書》卷5，第90頁；《法苑珠林》，載《大正新修大藏經》卷53，第1027頁。

[[50]](#_50_3)《唐會要》卷49，第859頁；《佛祖統記》卷39，載《大正新修大藏經》卷49，第369頁。

[[51]](#_51_3)《資治通鑒》卷201，第6350頁。

[[52]](#_52_3)《資治通鑒》卷201，第6351頁。

[[53]](#_53_3)同上書，第6365頁。

[[54]](#_54_3)同上。

[[55]](#_55_3)《資治通鑒》卷202，第6367頁。

[[56]](#_56_3)《新唐書》卷76，第3477頁；《舊唐書》卷5，第99頁；《資治通鑒》卷202，第6374頁。

[[57]](#_57_3)《舊唐書》卷86，第2830頁。

[[58]](#_58_3)《資治通鑒》卷202，第6377頁；《舊唐書》卷86，第2829—2830頁；郭沫若：《武則天》，第125頁；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1959年）卷1，第137頁。

[[59]](#_59_3)《唐會要》卷4，第42—43頁。

[[60]](#_60_3)《資治通鑒》卷202，第6377頁。

[[61]](#_61_3)同上書，第6381頁。

[[62]](#_62_3)同上書，第6390、6397頁。

[[63]](#_63_3)《舊唐書》卷86，第2831—2832頁；《唐會要》卷4，第42—43頁；《資治通鑒》卷202，第6397頁。

[[64]](#_64_3)《資治通鑒》卷202，第6398頁。

[[65]](#_65_3)《唐會要》卷1，第4頁。

[[66]](#_66_3)《資治通鑒》卷202，第6400—6401頁。

[[67]](#_67_3)《唐會要》卷7，第101—104頁。

[[68]](#_68_3)《資治通鑒》卷203，第6415頁。

[[69]](#_69_3)《唐大詔令集》卷11，第67頁。

[[70]](#_70_3)《唐大詔令集》卷11，第67頁。

[[71]](#_71_3)《唐會要》卷39，第701—702頁；《文苑英華》卷464，第5—7頁；《唐大詔令集》卷82，第470—471頁。

[[72]](#_72_3)《唐會要》卷39，第702頁；《舊唐書》卷50，第2141頁。

[[73]](#_73_3)《舊唐書》卷50，第2142頁；《唐會要》卷39，第702頁。

[[74]](#_74_3)《唐大詔令集》卷82，第471頁；《文苑英華》卷464，第7—8頁；《唐六典》卷6，第18頁；《舊唐書》卷50，第2142頁；《唐會要》卷39，第702頁。

[[75]](#_75_3)《舊唐書》卷50，第2143頁；《唐會要》卷39，第702頁；《文苑英華》卷464，第8頁。

[[76]](#_76_3)崔瑞德：《敦煌出土的唐代〈水部式〉殘卷》，載《大亞細亞》（新版），6.1（1956年），第25頁。

[[77]](#_77_3)《文獻通考》卷29，第276頁。

[[78]](#_78_3)《舊唐書》卷81，第2751頁；《文獻通考》卷29，第276頁。

[[79]](#_79_3)《唐摭言》（叢書集成版）卷1，第8頁。

[[80]](#_80_3)《文獻通考》卷29，第276頁。

[[81]](#_81_3)戴何都：《〈新唐書〉百官志、兵志譯注》（萊頓，1947年），第454頁注8。

[[82]](#_82_3)《唐會要》卷74，第1347頁。

[[83]](#_83_3)詳見《劍橋中國史》第4卷。

[[84]](#_84_3)《唐會要》卷76，第1386頁。

[[85]](#_85_3)《冊府元龜》卷486，第11頁。

[[86]](#_86_3)《唐會要》卷85，第1557頁；《冊府元龜》卷486，第12頁。

[[87]](#_87_3)《唐會要》卷87，第1595頁；《新唐書》卷53，第1365頁。

[[88]](#_88_3)《通典》卷10，第56頁；《冊府元龜》卷497，第8頁。

[[89]](#_89_3)《舊唐書》卷48，第2095頁；《唐會要》卷89，第1623頁。

[[90]](#_90_3)同上。

[[91]](#_91_3)《唐大詔令集》卷112，第582頁。

[[92]](#_92_3)《冊府元龜》卷504，第5頁。

[[93]](#_93_3)《通典》卷7，第40頁；《資治通鑒》卷203，第6410頁。

[[94]](#_94_3)《舊唐書》卷48，第2095—2096頁；《唐六典》卷22，第29頁；又見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290頁注8。

[[95]](#_95_3)《唐六典》卷20，第19—22頁；《舊唐書》卷44，第1890頁；《唐會要》卷88，第1612頁；《冊府元龜》卷502，第22頁。

[[96]](#_96_2)《唐會要》卷88，第1612頁。

[[97]](#_97_2)《資治通鑒》卷201，第6363頁。

[[98]](#_98_2)《資治通鑒》卷202，第6397頁。

[[99]](#_99_2)同上書，第6385頁；關于朝鮮戰爭和隨后朝鮮統一于新羅的論述，見約翰·C.賈米森《〈三國史記〉和統一戰爭》，加利福尼亞大學未發表論文，1969年。

[[100]](#_100_2)《唐會要》卷95，第1711頁。

[[101]](#_101_2)伊瀨仙太郎：《中國西域經營史研究》（東京，1955年），第245頁。

[[102]](#_102_2)《資治通鑒》卷202，第6396頁；關于吐谷渾衰落的最好的論述，見加布里埃拉·莫萊《從北魏到五代時期的吐谷渾》（羅馬，1970年）。關于西藏內部的歷史，見佐藤長《古代西藏史研究》（東京，1958—1959年）；J.巴科：《西藏歷史介紹》（巴黎，1962年）；石泰安：《西藏文明》（倫敦，1972年），第56—64頁。

[[103]](#_103_2)《資治通鑒》卷202，第6388頁。

# 第六章 武后、中宗和睿宗的統治，684—712年

## 準備時期，684—690年

683年陰歷十二月作為中宗登上皇位的唐朝第四個皇帝不過是高宗和武后的第三子。由于他繼位的希望一直似乎很渺茫，所以在此之前他既沒有為此受到培養，也沒有在當皇太子的短短的三年中為他新的尊嚴地位作準備；可能出于這一原因，他父親的遺囑才規定讓有經驗的武后繼續施加政治影響。嚴格地說，她的干政只被容許在“軍國大事之未能決者”方面，但她立刻表示，以皇太后的身份作榮譽而無實權的退隱，她是絕不甘心的。這一心意的第一個表示是她違反遺囑的規定，未使中宗立刻在“梓宮前”繼位；在拖延加冕的整整一個星期中，她既暴露了自己的野心，也表示了她對自己兒子是否適宜繼位有某種憂慮。人們對新君主的性格知道得太少，所以無法判斷他母親的懷疑是否有根據，但即使在他一生的這個階段也已很清楚，他至少已經繼承了他父親的弱點，并已受他的妻子韋后的支配。他登上皇位不到一個月，就提升他岳父韋玄貞為宰相。

這一任命造成了中宗統治的第一個危機。不滿意她兒媳膽敢抗衡的武后是不歡迎這個任命的，而那些期望隨著武后的銷聲匿跡會恢復他們傳統權力的官僚們也不歡迎它。最反對這一任命的官員為裴炎，他出身于山西的紳士名門，通過科舉制青云直上而成為中書令。高宗死前不久，他把所有議事從門下省轉到中書省，從而成功地樹立了自己的領導，并且當他被選中去接受垂死的高宗的遺詔時，又發現自己的威信進一步有了提高。關中精英集團中最強大的韋氏參加政治生活必然會損害他的利益，所以他強烈反對對皇后父親的任命。中宗對此反應非常魯莽：“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1]](#_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0)裴炎對如此強烈的反駁大吃一驚，就迅速報告武后，她便認為此話是言為心聲。她召集朝廷百官，責備她兒子有叛逆的用心，然后平靜地宣讀廢黜皇帝的詔令，這時御林軍就將他拉下御座。次日，在執政剛滿六個星期后，他被更聽話的22歲的弟弟睿宗所代替。

廢除中宗和武后在690年建立周朝這兩者的合法性沒有被像偉大的宋代理學家朱熹——他的《通鑒綱目》 自13世紀以來一直是中國的歷史教科書——等正統史學家所承認。他們認為中宗直到710年死去時一直是合法的君主。盡管有這種歷史的傳統看法，但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權力無疑是操于武后一人之手。在684年，唯一的問題是她究竟還懷有什么其他野心。

武后本人似乎也不注意去平息人們的懷疑。從一開始，她就鄙棄了以前關于牝雞司晨的庸識淺見，在放逐中宗及其懷孕的韋后去湖北的房州（房陵）后，她便公開在朝廷主持政務和履行禮儀的職能，甚至不屑“垂簾”。她封她的長侄至兼她父親的繼承人的武承嗣為皇嗣，并且不顧裴炎等大臣的警告（說她開始像漢代篡位的呂后），決定在洛陽為她的得到追封的祖先立武氏七廟。這一行動是沒有先例的。事實上，它僭取了帝王家族的特權，并且剛好證實了人們的擔心，即武后不久將不滿足于以她的傀儡兒子的名義進行統治。它與684年的大赦令一起，成了以后李敬業叛亂事件的導火線。

### 684年的大赦令

在敘述這場起義以前，簡單地考察一下大赦令的內容是有益的，因為它是許多大赦令的典型。[[2]](#_2_Quan_Wen_Zai___Quan_Tang_Wen)在整個唐代，這類文獻就像在吉慶盛典中論功行賞和赦免重罪這一本意那樣，也被用來頒布重要的行政措施。在武后統治時期，頒布大赦令的次數頻繁得異乎尋常，例如在684—705年期間年號變動了16次，每次都頒布大赦令。它們構成了一種有用的史料形式，從中不但可以看出國內的狀況，而且可以了解武后政府的若干總的方針路線。

684年的大赦令首先改變了政體的外表象征：此后旗幟將是紫飾金色，某些官員將穿不同的官袍和佩戴不同的標志。和長安相比，武后一直偏愛洛陽，它被定為“神都”，那里的皇宮定名為“太初”。此令反映了武后對命名的深切關懷。所以它又聲稱某些官職的職稱有缺陷，必須予以改變。關于新選用的名稱有的可追溯到第一個周王朝的傳奇時代，另一些則使人聯想到道教神話中的仙境。當時有人杜撰了道教的幾個名稱，例如鳳閣（中書省）、鸞（一種神鳥）臺（門下省）和肅政臺（御史臺），這些均不見于中國史籍。武后之母被尊為太后，這一頭銜的明顯含義是，武后本人出身于帝王世家。這些儼然與新王朝開國之初的大典相似的措施引起了憂慮和反對。

大赦令的第二部分盛贊黎民的厚德，厚賞年邁之人，并且提出要救濟貧困和寬恕某幾類罪犯。在承認賦稅過重——特別是兩京周圍地區的賦稅——的同時，武后答應減輕負擔。為了表示她的儉樸，她遣退了許多宮中的仆婢；為了表示她尊重孝道，她答應讓有迫切愿望的邊境戍軍回家，不中斷祭祖。像這些一般大赦令中最常見的規定在武后時期特別多，并且被傳統的歷史學家非難為“籠絡人心”的應急手段。馬克思主義學派則傾向于把它們視作民眾反對貴族和大地主分子的階級斗爭手段。它們一定深受當時平民的歡迎。

最后部分試圖解決當前施政中的問題。武后說，近幾年領土的擴大已經引起了各道原來過得去的行政質量的下降，京師以外貪污成風。御史臺將設立一個新部門，以嚴密監督各道和經常進行視察。另一個弊病是規避賦稅和徭役，隨著近幾十年國內安定而出現的人口激增，這一問題因行政的混亂而更加嚴重了。為了與登記不實和在人口統計數字上玩花招等現象作斗爭，政府擬對行政單位進行一次嚴格的復查，如縣和州的人口分別超過原來的1萬戶和3萬戶的限額時，政府就另設新的縣和州。人口的增長和再分配是7世紀后期的一個大問題，雖然武后對此非常注意，并且曾一度企圖對道的制度進行大規模的改組，但抱敵視態度的史書否認她在這方面的貢獻。[[3]](#_3___Jiu_Tang_Shu____Juan_94_Di)在這一大赦令中，她還承認了軍事領域中的弊病。其中主要的弊病一是升賞不當造成的士氣低落，一是把基本上是防御性和臨時性的府兵變成半永久性和職業性軍隊后造成的過長的服役期。此外，許多富人只是捐官而從不赴職。武后命令有關官員懲處這些犯法行為，但她似乎忽視了這一問題更廣泛的含義。最后，她強調了用儒家靈丹妙藥來解決行政困難，即吸收“有德之士”擔任文官。所有高級官員都要舉薦一個適合當官的人。沒有一個唐朝統治者像武后那樣深深地依賴這一措施；這一措施連同她經常采用的除科舉制以外的其他吸收人才的方法，使得官員人數大量增加。自657年以來，批評已經越來越多，所以武后在此大赦令中被迫作出反應：干脆不承認官僚機構已變得太大。

大赦令中所列的行政問題絕不是詳盡無遺的，但也許足以說明初唐的某些制度的退化情況。原因有幾個：國內的長期安定既造成了人口增長，又造成了經濟和商業的發展；擴張主義的對外政策已使邊境行政和防務需要新的形式。像科舉制那樣的其內容本質上是社會性的其他一些發展已經引起了很不平靜的情緒，一些人特別是因為“突然展現的前程”而很不平靜，這些人因不是出身于初唐的貴族門第，已被摒于迅速擢升為高級官員的大門之外。簡言之，太宗的“遺產”已經過時，而武后也不是創新者。最抱樂觀態度的歷史學家只好承認，她沒有使她繼承的制度合理化；但另一方面，她采取的重大政策——加強帝王特權和中央權力，征服“外夷”，“籠絡人心”——合在一起卻暴露了制度的種種缺點。她留給玄宗的財富（主要表現為新形勢下的一種新的和高效率的辦公形式）才使真正的改革成為可能。在她統治的開始，她沒有這種有利條件；此外，她在整個掌權時期受到了自己是婦女這一生理事實的牽制。儒家反對女性統治這一禁令的嚴厲性意味著她的地位永遠不能被人接受；[[4]](#_4_Jian_Yang_Lian_Sheng___Zhong)她很快為自己的安全而惶惶不可終日，從而使她把自我保護和自我炫耀置于其他一切之上。造成了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李敬業的叛亂。

### 恐怖統治

叛亂者的領袖為征服高麗者和武后的早期支持者李世勣的孫子。李世勣已死于669年，他積累的榮譽保證其后裔能取得很高的威望和得以憑特權進入仕途，而李敬業已在官場中開始了他的事業。但最近，他已駐節位于長江和大運河相交處的揚州。[[5]](#_5_Guan_Yu_Tang_Dai_De_Yang_Zhou)在這個商業中心的傲慢但又懶散的氣氛中，他的大部分親密伙伴也一樣是因各種過錯被罷官的出身名門和有聲望的人。他們當然都伺機恢復自己失去的家業；到684年年中武后的雄圖尚未大定，這種形勢有助于創造一次起義的理想氣候。

叛亂者的目標是不明確的。雖然公開的目的是中宗復位，但他們又另立一人并在名義上把他抬為首領，稱此人為中宗的兄長，即已死的李賢（他長得很像中宗）。因此，敬業很可能無意讓中宗復位，為了掩蓋自己改朝換代的野心，就借用這個被廢黜的統治者的名字以爭取支持者。出于同樣的原因，他企圖給武后抹黑，于是他的支持者駱賓王為他寫了一篇出色的檄文，[[6]](#_6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90Sha)其文開始如下：

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后房之嬖……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

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押邪僻，殘害忠良。殺姐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

他繼續以一系列的歷史隱喻詳細敘述婦女左右以前歷朝政體的惡果，強烈呼吁同僚們與他一起造反。

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是用氣慣風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

公等……或膺重寄于話言，或受顧命于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勛，無廢大君之命……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檄文的陳述當然是很不確切的，不過它很可能反映了當時的許多信念。敵視武后的史學家們極易用它作史料，有的指控也已見于其他有聲譽的史書之中。檄文之傳布既廣泛又迅速；據記載，武后在叛亂初期已見到一份檄文。她的反應既典型，又能說明問題。她說她的大臣們是多么愚蠢，竟讓像檄文作者那樣有文才的人在地方上流落不偶！但盡管檄文寫得很妙，卻不能吸引許多人同情叛亂事業；不到三個月，起義就被粉碎。叛亂失敗的部分原因是，武后推行了獎賞抵制叛亂的人和寬恕協從的叛亂者的政策。更重要的原因是李敬業作為一個指揮將領有著種種缺點。一名副將有幾次敦促他在山東—河北地區尋求支持，并說，在那里可以發現最優秀的戰士和反對武后“獨裁”的最強烈的不滿情緒。[[7]](#_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0)近來的研究傾向于認可這一策略，指出在整個唐代，這一地區歷來厭惡來自長安的統治，特別在經濟困難和夷狄入侵時期，這種情緒幾乎達到分離主義的程度。但李敬業卻決定滯留在江蘇的根據地，這里除了最初隨他叛亂的10萬之眾外，他的兵力再也不可能增強。當三倍于他的帝國軍隊來討伐他時，勝敗不久便見分曉；如果說這次叛亂的規模如此，它引起的后果卻遠不如叛亂本身嚴重。但在武后看來，真正的危險來自叛亂者與朝中人士的關系。在那一年陰歷九月當起義處于高潮時，裴炎被捕，并被控犯了叛逆罪。

當時的這一指控是指與叛亂者合謀和在武后預定前往龍門萬佛洞的途中策劃把她劫持；在缺乏可靠證明的情況下，他有罪或無辜的問題成了大量歷史論戰的題目。[[8]](#_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0)幾乎可以肯定，武后是相信他有罪的；從她的反應判斷，影響是深遠的。裴炎的朋友們愿代他死，武后在不耐煩地駁回這種傳統的辯護時，行動迅速果斷，她說：“朕知炎反，知卿等不反！”裴炎在市場上被屈辱地處死了，而膽敢為他辯護的人中最有名的“突厥之所憚”的程務挺將軍也在他軍中未發抗議的情況下被斬首。這時，李敬業已戰敗并被部將所殺，武后用褻瀆他祖父的墳墓和剝奪他家族一切榮譽的方式來泄憤。據一份史料記載，在這以后她召集滿朝文武官員申斥說，她為國不遺余力地操勞，每個官員能取得如今的地位都應該感謝她。她以三個被殺的敵人為例下結論說：“此三人者，不利朕，朕能戮之。卿等有能過此三者，當即為之；不然，須革心事朕，無為天下笑！”[[9]](#_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0)大臣們均伏地叩頭。

但她既被背叛過一次，就決定要更加確保它不再發生。為此，她實行了一種令人膽戰心驚的恐怖統治，這只有她的馬克思主義辯護士中最可鄙的人為她辯護。它的根源難以追溯，大部分史籍認為它始于中宗被廢黜之時；當時一名“飛騎”得到厚賞，因為他揭發了那些為愛好游戲的皇帝下臺后喪失額外收入而抱怨的同事。雖然在此以前已有跡象表明，武后通過經常的貶職和調職，企圖把忠于她的人調到周圍，但這是斷然處決宮廷以外的反對派的最早文字記載。通過對李敬業叛亂的鎮壓，御史臺和刑部的一些官員上臺掌了權，他們的傳記在正史中被列在“酷吏”一類。以周興和來俊臣為首，他們張開了由耳目和告密者組成的網絡，并在特設的獄中，通過偽造、酷刑和來俊臣在其令人厭惡的《羅織經》中描述的其他方法逼取“供詞”。[[10]](#_1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在686年初期，又設官掌管銅匭，從而使這些酷吏的活動變本加厲。這一制度一直實行到唐朝結束。[[11]](#_11___Tang_Hui_Yao____Juan_53_Di)銅匭是為這一官署建造的，它有四個口，任何有所企求的人都可將文字投入其中一口。第一個口用于自薦和促進農業或人民福利的計劃；第二個口用于對政府的批評；第三個口用于對不公正的訴苦；第四個口則用于報告預兆、預言和密謀。原意可能是對恐怖的嚴酷性的后果進行補救和宣揚武后對黎民的關懷。但不久，銅匭不過成了匿名的、但往往是虛假揭發的一個容器。

不能對這種恐怖說什么支持的話，但在另一方面，千百年來傳統史學家對它不斷的譴責可能過分了。[[12]](#_12_Zui_Jin_Qi_De_Yi_Ge_Li_Zi_Sh)如果全面地看，似乎可以說，恐怖行為產生于有充分根據的恐懼。甚至在了解恐怖的種種弊病以后，武后仍繼續讓它存在下去，因為她看到了它的用處：用它可以對為反對女性統治這一僵硬傳統而斗爭的人進行恫嚇；還因為她知道她有能力控制恐怖統治的最厲害的暴行。作為一種歷史現象，恐怖具有種種含義，而修史者的憤怒情緒使他們忽視了這些含義。

一個結果當然是政治空氣的改變。沒有一個大臣能夠阻攔武后而不擔心自己會被送交秘密警察，因此就沒有一個大臣能像魏徵等大臣爭取太宗那樣把她爭取過來。眾所周知，太宗不止一次撤回詔令以尊重大臣的異議。688年劉祎之拒絕了一份未經自己的中書省認可的詔令，武后被“我所引之人”的忘恩負義行為激怒，立刻命令他自殺，否則他就被處死。[[13]](#_13___Jiu_Tang_Shu____Juan_57_Di)這種統治“作風”的事例還很多，傳統史學家們很喜歡把它們與“貞觀之治”進行對比。[[14]](#_14_Li_Ru__Jian___Jiu_Tang_Shu)

第二種由恐怖統治派生的一系列后果是社會性質的。也許因為武后記得，平民百姓曾經拒絕支持叛亂和她發現高級官員中有人與她為敵，所以她對后一個集團進行報復。一種史料在談到597年的最后清洗時說，她的大部分受害者是“海內賢士名流”，實際上是指中央政府五品以上的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而不是指諸道官員。[[15]](#_15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因為對他們的指控一般是煽動叛亂，所以懲處株連到他們的家屬（放逐或淪為奴隸）和涉及他們的財產（加以沒收）。即使受較輕指控的人的子弟也不準參加科舉考試，而近時的研究指出，組成初唐上層貴族大部分的幾百戶高傲的貴族門第在這一時期嚴重衰落。雖然在中宗復辟前后有幾次大赦，有的家族恢復元氣要用幾代人的時間，并且它們與較下層的社會競爭高官的力量永遠被削弱了。[[16]](#_16_Shou_Hai_Zhe_Zhong_You_Tai_Y) 7世紀80年代的一些詔令產生了迥然不同的社會含義，詔令授權告密者可以公費從全國各地前來揭發。從此，前所未有的事情——不識字的平民因告密而擔任高官，奴仆揭發主人等——大量出現。官員們警告武后說，這些措施將引起全國大亂，使平民的生活不安定和朝不保夕，這里所指還必須包括專使在各道搜捕不忠分子和流放至嶺南這種漫長而慘苦的赭衣塞途所引起的動亂。[[17]](#_17_Bin_Kou_Zhong_Guo____Tang_Wa)有好幾年武后對這些異議置之不理，這可能是因為她看到這些政策帶來的補償性的好處。它們可以到處提醒人們注意中央政府的權力以及在它之上還有她本人這一事實。

最后必須承認，在恐怖統治中，司法制度在非常嚴重的考驗下幸存下來。不公正現象的確存在，但主要是在秘密警察用酷刑或答應對受害者家屬寬大的方法逼取供詞和處理案件時產生的。武后常主持審訊或復核重要的案件；當像徐有功等大膽的御史面陳執法不當時，他們幾乎無例外地得到支持。[[18]](#_18___Jiu_Tang_Shu____Juan_85_Di)當武后在697年處決了她最后的秘密警察后，她為自己竟受她的大臣們的蒙騙而推行不正當的重刑而表示了遺憾，她很可能是真誠的。[[19]](#_1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恐怖的開始有時被認為是武后企圖篡位的明確的跡象。但另一方面，也有跡象表明在以后幾年，她本滿足于繼續以睿宗的名義進行統治，從而使自己至少能部分地避免歷史的譴責。跡象之一是，在685年她納了第一個面首，此人是她女兒太平公主引見的一個粗壯的脂粉（和春藥）貨郎。此事迅速成了一件公開的丑聞。為了使他的未凈身之軀得以在宮內容身，她就讓他出家，并放肆地立他為中國最有名望的白馬寺的住持。新僧——歷史上稱薛懷義——立刻帶領一幫暴徒在京城稱霸，侮辱官員和欺凌道士。在她有病的丈夫生前一直忠貞的武后似乎已陷入著迷的狀態。她與他單獨廝混的時間越來越多，并且經常在激怒的大臣面前竭力為他的“怪僻行為”開脫。686年初期，她提出要還政于睿宗，但據歷史記載，后者“知〔武后〕非誠心，奏表固讓”。很可能她不是出于真心實意，但事實是從那時起，她再也不像以往那樣把注意力放在單調而繁瑣的日常政務上了。這個僧人受她的寵幸幾乎達10年之久，而他反過來也在幾個方面為她效勞，如當過與突厥人作戰的將軍，在688年擔任所有唐代建筑中的燦爛明珠——明堂——的主持人時，他表現得更為能干。[[20]](#_20_Guan_Yu_Ming_Tang__Jian_C_P)

### 行政改革

但不應下結論說，武后迷戀這個僧人后就變得不問政務了。如果說在她一生最不穩定的時期中的統治作風日趨個人決斷和她的尋歡作樂變得更加公開，她在行政方面的警惕性卻沒有放松。對突厥人和吐蕃人的日益加劇的威脅進行了幾次征討，并改組了安北都護府。[[21]](#_21___Tang_Hui_Yao____Juan_73_Di)在民事方面，她在685年又修訂了律令，[[22]](#_22___Tang_Hui_Yao____Juan_39_Di)授權御史監督佛僧在京師的日益發展的經濟活動，并且在整個這一時期又設立了新的行政單位以處理人口——特別是江南的人口——的流動和增長。官僚機器也大大地發展了。在反映武后不埋沒有才之士的關懷方面，在正規的考試外還特持“殿前試人”，每年選拔更多的人來效勞，并且紳士和平民都獲準自薦。[[23]](#_23___Ce_Fu_Yuan_Gui____Juan_639)政府在京師和各道設立了新的官職：常平令、左補闕和左拾遺等。六部的官員也增加了，行政工作的質量一度有所改進。同時，武后對文學的興趣表現在以她的名義刻印大部頭文學匯編方面。據說她推動了新翻譯她敬奉的華嚴宗經卷的計劃，后來當她在洛陽任命于闐的高僧實叉難陀時還參加了編輯工作。[[24]](#_24_Jian_Lian_Tian_Mao_Xiong___Z)在這一時期，京師的四個藏書館每年必須送呈藏書的書目。[[25]](#_25___Tang_Hui_Yao____Juan_35_Di)

武后對日益加劇的經濟困難也表明有所認識，雖然她的解決辦法是零碎的和基本上無效的。自666年因鑄新幣失敗而引起了商業混亂以來，中國的物價一直在上漲，到高宗去世時米價比繁榮的7世紀30年代幾乎高達百倍。另外，連年歉收，再加上防務開支的增加、文官隊伍的擴大和逃稅行為的蔓延，給政府增加了越來越大的壓力。到677和678年，財政問題達到了危急的程度。處理這種局勢的前例并不缺乏，而且還有大臣的建議，但武后寧愿依靠一些權宜之計去解決問題。684年當政府已無力支付下級官僚全部官俸時，她反而為政府增加額外的官員。[[26]](#_26___Tang_Hui_Yao____Juan_91_Di) 687年華北的大部分為饑荒所苦，在遙遠的嶺南道出現了武裝抗繳增稅的事例。[[27]](#_2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鎮壓是迅速和有效的，但苦難的根源卻被忽視。武后的最大的失敗是她提不出經濟政策，這樣說可能符合事實。

盡管這些年有許多行政活動，但武后把她主要的活動放在尋求支持和安全方面。活動的一個方面是建立告發制；另一個則是經常頒布旨在贏得民心的措施。這樣的大赦令有三次，雖然只有689年頒布的最后一次的全文現還存在。[[28]](#_28___Quan_Tang_Wen____Juan_96_D)鑒于當時的財政問題，它似乎是非常慷慨的。全國的窮人、孝子孝女和在戰爭中喪子的戶都得到酒、絲帛、牲畜和糧食的賞賜。欠稅被免除，以吸引那些逃避登記的農民回來種地；在新平軍征討突厥之役中受難的地區和在興建明堂時受榨取的地區被免稅一年。地方官員要抑制不得人心的商人階級的越來越厲害的鋪張，并保護那些因兒子服兵役而衰落的門庭免受土地攫取者的壓榨。當武后在大張旗鼓地“籠絡民心”時，她還開始給她自己制造帝王的靈光。廟宇、宮殿和公共工程在洛陽到處出現；在它的中心，宮廷和武后的隨從隊伍變得越發豪華。唐都長安很快相形失色。武后經常在公開場合露面，主持莊嚴隆重的禮儀，并且企圖在公眾的心目中把自己與光榮和經常襲用其禮儀的昌盛的古周朝聯系起來。這一過程的高潮發生在689年中國空前輝煌的敬奉寶圖的儀式中。[[29]](#_29_Jian___Zi_Zhi_Tong_Jian____J)

寶圖是一白石，上有“圣母臨人永昌帝業”數字。它是688年在洛水發現的，所有史料一致認為它是武后之侄武承嗣所偽造，此人是她篡位的最堅定的支持者。甚至像司馬光等敵視她的史學家也沒有假設武后本人曾參與此事，她的虛榮心和她對祥瑞常常表現出的輕信完全可能使她相信預言指的就是她本人。它無疑是使她下決心篡位的重要因素，也許是決定性的因素，因為從發現它開始，她的種種行動不容許有別的解釋。她率領朝廷全體官員前往天壇，宣稱洛水為神圣之河，所以禁止在那里捕魚；她自封為“圣母神皇”。無性別含義的“皇”字是一個意味深長的選擇。然后她開始計劃一次豪華的盛典，以便正式敬奉這一祥兆，并把年號改為“永昌”以應此預兆。她計劃把這些盛典與新完成的明堂的啟用結合起來舉行，并下令全國名流應一律在洛陽集合慶祝。這當然也包括廣泛地分散在全國各地擔任刺史的李氏皇室的旁支成員在內。

對唐室諸王來說，邀請是不受歡迎的。在最近幾年，他們已越來越被排斥而不能在政治上起任何有意義的作用；一份史料指出，他們已無寸土之地為己有。諸王很了解京師的事件，顯然也清楚他們作為武后實現其野心的障礙，處境很危險，所以他們甚至可能在接到召赴京師的通知前正在策劃對策。[[30]](#_30___Jiu_Tang_Shu____Juan_76_Di)但是他們是在得知武后正在準備死亡陷阱這一警告后才突然行動的。他們理解，集體拒絕參加慶典也會獲罪，就決定謀反。在起義中能鼓動人心的人物是睿宗的叔祖、四川通州的刺史李img。他偽造詔書和派密使分赴四方的親戚，在時間緊迫和交通困難的情況下協調起義。但由于一個過急地在河北的博州（高宗之侄李沖在那里任刺史）征募軍隊的行動，計劃被破壞。我們已經注意到，這一地區有強烈的好戰傳統和分離主義傾向，所以可能是最適宜這類冒險的地方，可是李沖所能征募的軍隊不超過5000人。[[31]](#_31_Pu_Li_Ben_Zai_Qi___An_Lu_Sha)加之這些人也不熱心，在第一次受挫時就已潰散。在帝國主力軍到達時，叛亂已告結束，李沖也死于自己的部將手下。在洛陽附近的豫州，刺史是李沖之父、武后之內兄弟李貞，當知道他兒子的行動已使他遭殃時，他感到自己只能造反了，于是他用盡一切手段征募了幾千人。這些人在勤王軍到達前四下逃竄，隨著李貞的戰敗和自殺，所謂的諸王之亂很快結束。[[32]](#_32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這次起義是國內對武后的最后一次反抗，雖然它幾乎不構成真正的威脅，但過度恐怖的懲罰卻持續到691年的相當一段時期。直到那時，李氏宗族不論有罪無罪都遭到蓄意的殺戮。只有流放在遙遠的南方的少數兒童得以幸存。傳統的史學家一致譴責武后的殘暴，但也勉強承認在粉碎叛亂時，她得到全國的支持。

李氏宗族中最有聲望的成員在利用一些矯造的詔旨時也未能喚起人們對他們事業的很高熱情。甚至總是批判武后的司馬光也專門指出，李貞集團中有官品的500名成員除一人外都是被脅迫參加叛亂的。[[33]](#_33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對武后來說，她平息起義的成功進一步證實她一定得到上蒼的庇佑。688年陰歷十二月，她穿戴帝王服飾，主持推遲了的盛典，據一份史料記載，它是“唐興以來未之有也”的盛典。在典禮中，祭祀她父親的規格相當于開國之君，而禮儀不言而喻是模仿古周朝的。多年來，武后一直把她與這一最受稱頌的周王朝聯系起來，并模仿它的官職稱號、建筑、典禮和歷法。正像李氏皇族曾宣稱老子為它的祖先那樣，她也把著名的周武王當做自己的始祖。因此事實似乎是，她選自己的王朝的名稱為“周”，可能不是因為追贈她父親的封地為周，而是為了與古代周朝聯系起來。不只是像王莽這樣的篡位者，在她以前的有野心的統治者都用過同樣的手法。她的目的是，至少象征性地重新建立據歷史聲稱已在第一個周代達到的至治之世。[[34]](#_34_Yi_Ban_Ren_Wei_Xuan_Ze_Ta_De)

兩個更深入的步驟為篡位鋪平了道路。首先是頒布一批代替常用字“日”、“月”等舊字形的新字，這可以看做武后把自己與傳奇中的中文造字者相比的含蓄的行動。在一份造新字的法令中，她回顧在文字系統的漫長歷史中，方塊字已變得如此復雜，以致許多存在的字甚至連學者也不認識。因此，作為一個持續改革的開端，她造了12個保持字的起源和能說明其真實意義的新字。例如，她的名字的新字為“曌”，其組成部分表示天體照亮下面的空處。她說，它象征“天下來歸資朕之政”。[[35]](#_35_Chang_Pan_Da_Ding_De___Wu_Zh)敦煌和當時的碑文，甚至日本的證據都表明，這些字在中華世界中廣泛流行，并且不時被新字補充。深受歷史學家批評的這些杜撰的字反映了武后對象征符號的持久的興趣，并且還可以被視為一種宣傳行動，雖然這一行動必然地只限于文人階級。對廣大的平民來說，他們需要另一種信仰，佛教滿足了這一要求。

只是到近期，歷史學界才了解大乘教的信仰和實踐是多么深入地滲透進唐代的平民生活之中。當時一部不重要的《大云經》有兩種現成的譯文。[[36]](#_36_Guan_Yu___Da_Yun_Jing_____Ji)經中包括彌勒佛即將下凡為女神和君臨全世界的預言。流傳至今的一個版本對她的時代作了令人目眩的諾言，它描述道：“谷米豐熟，快樂無極。人民熾盛，無有衰耗病苦憂惱恐怖禍難……鄰比諸王，咸來歸屬……爾時諸臣即奉此女以繼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37]](#_37___Da_Fang_Deng_Wu_Xiang_Jing)根據大部分史料，武后的僧人面首薛懷義發現了經文，作了適當的注釋，并指出長期等待的下凡的神竟是他的庇護人！[[38]](#_38_Guan_Yu_Zhe_Yi_Shi_Jian_De_G)武后表示驚奇，但當然高興；她立刻頒布了這一教義。在一次對佛僧廣施恩澤的令人驚愕的行動中，她在全國各州興建國家維護的大云寺，其中有的是新建的，另一些則是現存并受帝王庇護的寺廟。9名編寫注疏的高僧被封為縣公，并得到高級官員的服飾；1000多名佛僧被授予圣職。武后后來將“慈氏越古”加在她的頭銜之中。[[39]](#_39___Jiu_Tang_Shu____Juan_6_Di)

這時一切準備就緒。690年陰歷八月，武后形式上拒絕了要她登基的三次連續的請愿，其中的一次請愿書上有6萬余人的姓名。但當她得知她的象征——鳳凰——已出現在皇宮上空，一群赤雀也翱翔在覲見殿周圍，她認識到天意不可違。睿宗退位。武后莊嚴地成了堂堂的周代的“圣神皇帝”。婦女成為中國的皇帝，這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

## 周朝，690—705年

同時代的人并沒有把周朝看成是唐朝延續性的截然中斷。在705年唐代中興的一份文告中，中宗在談及武后時說：“亶聰成德，濬哲應期，用初九之英謨，開太一之宏略。”[[40]](#_40___Quan_Tang_Wen____Juan_17_D)在同一文獻中，他繼續爭辯說，實際上沒有發生變化，她恢復了唐的基本政策，在促進教育，興建學校寺廟，量才錄用官員，主持許多文學和歷史匯編，重新寬恕那些使她受蒙騙而被酷吏迫害的人等方面，不過在為李氏宗族工作，如此的贊揚竟出自武后長期剝奪其繼位權的人之口，這件事本身是驚人的；但更加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對待這次篡位的“官方路線”。只是在20世紀，更具體地說，根據陳寅恪最初提出的假設，周朝不僅代表了一種政治變化，而且代表了一種意義重大的社會革命；從此以后歷史學家才開始改變傳統的觀點。[[41]](#_41_Chen_Yin_Ke____Tang_Dai_Zhen)當前中國學術界流行的觀點認為，武后是被剝削階級反對唐代社會中的貴族和地主分子的斗士，而日本的歷史學家近來則設法認定有一個“新興”階級，武后企圖取得它的支持，以代替不能寬恕的傳統貴族的支持。[[42]](#_42_Jin_Lai_Zhong_Guo_Li_Shi_Xue)但在關于唐代史料性質的幾大問題得到解決以前，有關社會階級及與它相聯系的論題必然是得不出結論的。

在唐室諸王之亂失敗后，周代的改朝換代進程進行得很順利，沒有遭到反對。武后迅速制定了新王朝的行政細則并定都洛陽。早在7世紀60年代，她和高宗已在一份詔書中認定洛陽在交通和供應方面優于長安；而中國的經濟中心向南面和東面的逐漸轉移從此又加強了這些優勢。[[43]](#_43_Quan_Han_Sheng_De___Tang_Son)當武后選洛陽為都時，她一定意識到自己與唐都及那些已調到那里任職的忠于唐朝的氏族斷絕關系的好處。作為安全的額外措施，據說她從關中的長安周圍地區遷移10萬戶去充實該城。[[44]](#_44___Ce_Fu_Yuan_Gui____Juan_486)有才能的官員像徐有功、狄仁杰和李昭德等人也來到新都，正像《資治通鑒》在少見的一段贊揚文字中所解釋的那樣，這是因為“〔武后〕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45]](#_45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部分是由于這些官員的影響，部分是由于“民心已定”，武后幾乎立刻著手緩和恐怖統治。[[46]](#_46_Tong_Shang_Shu__Di_6485Ye) 691年，特務頭子周興被聲名更為狼藉的副手來俊臣請去，要他或是供認曾參與最近一次陰謀的事實，或是投入自己的甕中。[[47]](#_4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他被“逼供”后，在放逐途中被以前一個受害者的家屬所殺，次年，有850名他的仆從被審訊、判刑，并在政治舞臺上消失。武后表現出，她既能在以前滿不在乎地支持這些酷吏，也能在以后滿不在乎地處理他們，但具有典型意義的是，她繼續讓來俊臣及其黨羽為她效勞。

不久，他們不是被武后而是被武后的長侄武承嗣所用；后者已被指定為武后之父的后嗣。[[48]](#_48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83_D)他與更加狡猾的堂兄弟武三思一起約在670年已來到京師，但在高宗死前一直不引人注意。從高宗去世起，他已成為勸進者中最堅定的人，顯然他把自己看做是他姑母的繼承人。武家的勢力迅速發展；在新王朝的最初幾年，由于武氏中的幾個成員被授予高級文武官職，所有的成員都被封為王和得到實封，[[49]](#_49_Jian___Jiu_Tang_Shu____Juan)他們都牢固地樹立了最有力的地位。在691年，雖然睿宗保留了皇嗣的頭銜，但武承嗣卻信心十足地發起了一場要求宣布他自己為太子的請愿。

整個朝廷陷入一片爭吵聲中。武后對她侄兒的請求表現得很驚奇，所以在朝廷廣泛征求意見。有的人大膽直言反對武承嗣；但其中大部分人遭到流放，甚或死于他的心腹來俊臣之手。唐皇室利益最重要的維護者是李昭德，他是從小士紳通過科舉考試發跡的另一種“新”型官員；此人是如此剛直不阿，以致一次他把一名其繡袍違背了節約規定的官員鞭笞至死。[[50]](#_5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692年，他成功地使武后相信讓她家屬擁權過重的危險性；不到一周，她剝奪了其中三人——包括武承嗣——的一切政治權力。當她侄兒怒沖沖地前來抗議和污蔑李昭德時，她平靜地對他說：“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51]](#_5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事情到此結束，但只是暫時的。如果說這一次武后對她家屬抱敵視態度，但其他幾次她的態度又迥然不同，竟讓他們在公開典禮中做她的助手，還命他們統帶她的幾支大軍。為了防止出現睿宗被指定為她的繼承人的猜想，她小心翼翼地懲辦了那些與他關系過于密切的人；693年，她放肆地害死了他的兩名寵妃。其中一人就是未來的玄宗之母。

對她的這種行為可能有兩種解釋。其一是武后確實被自己的氏族和諸子爭奪繼位權之事弄得焦頭爛額。結果，狄仁杰的論點——集中在母子紐帶和有朝一日她需要后嗣的祭祀兩方面——才使相持的形勢有利于她的長子。但第二種解釋同樣可以講得通。她把決定拖延至698年，因為繼位問題是平衡和分裂大臣中不同利益集團的很有價值的手段。

如果事實真是如此，它只能被視作武后整個執政期間表現的政治技巧的一個方面。她的主要目的是擴大對宰相們的皇權，在這方面她是十分成功的。宰相在唐王朝開始時被授予中央三省首腦的職位。它逐漸也被授予其他高級官員，所以宰相的人數可從有3到15人不等。[[52]](#_52_Jian_Dai_He_Du____Xin_Tang_S)他們的職責范圍是輔弼天子，指導官員和掌管政務，從而使宰相成為最重要的官員。[[53]](#_53_Yan_Jiu_Zai_Xiang_Zhi_De_Zui)到7世紀中期，已經出現觸犯帝權的強烈的集團意識、主動性和愿望的種種跡象。這些特征明顯地表現在圍繞廢黜高宗第一個皇后的爭論方面。太宗沒有極力反對這一傾向，似乎已習慣只把自己看做群臣之首，因此儒家的歷史學家從此就對“貞觀之治”大加歌頌。這些歷史學家之蔑視武后，既是由于她使用了獨斷專行的手段以阻止大臣權力的發展，又是因為她是一個婦女和篡位者。她半個世紀的統治造成了皇帝和宰相之間的一種新關系；要衡量她的政治技巧，人們會發現，她幾乎使人覺察不到而做到了這一點，因為采用的方法一般沒有超越傳統的框框。

例如，任免權無疑是皇帝的一個特權，而武后使用它時有她的特定的目的。在太宗的23年統治期中，被任命的宰相有21人，每人的平均任期為7年。從684—705年，66人被任命，平均的任期只有兩年。60歲以下被任命的為數甚少，職務的調動空前頻繁。甚至唯一得到武后充分信任的大臣狄仁杰在他擔任宰相的3年中也擔任了不少于7個不同的職位。臨時任命和在京師外執行長期任務的情況比以前更加頻繁；部門職能的自然重疊使武后取得在集團內部制造對立和分裂的機會。她常常把像狄仁杰和李昭德那樣的杰出人物與自己家族中的平庸之輩和道教的術士一起安置在相應的職位上。當697年來俊臣最后被處決時，她竟聽任一個捏造的罪名把來俊臣的主要敵人李昭德同樣處死。武后的宰相中有高達驚人的80%的人從高級職位上被迫撤下來，有的人被流放或處死，有的人干脆被降級任用。太宗時這樣的人占33%。在她統治時，官僚的高級圈子中一直存在著一種朝不保夕的氣氛；令人感興趣的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劉知幾最早的文學作品之一是696年的一首賦，它向那些一心向上爬的人提出種種危險作為警告。它名為《思慎賦》。

其他傳統的控制辦法也是為了達到同一目的。武后精心制定了專門的獎賞制度，它旨在提醒人們，榮譽的取得不但靠科舉中試或靠成為高官顯宦，而且還靠在職時取悅于統治者。像清代多產的史學家趙翼就有時稱贊她能接受大臣的規勸和批評。[[54]](#_54_Jian_Zhao_Yi___Nian_Er_Shi_Z)但是一經考察就可以弄清楚，她始終劃清對她自己的批評與限制帝王特權的企圖這兩者的界線。李昭德一次取笑那塊她奉為祥瑞的白石，因為她重視這塊白石的“赤心”。當李昭德觀看時，他說：“此石赤心，他石盡反邪？”她與其他人一起也為之解頤。[[55]](#_55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在另一次，她的寵臣吉頊堅持提出繼位問題，雖然眾所周知，她把此事視作“家務”。她告訴他，太宗曾對她談到一匹不能馴服的新馬。她冷冷地看著吉頊說，“朕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撾，三匕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這個大臣顫抖退出。[[56]](#_56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有時武后干脆摒斥宰相的議政，她寧可依靠她的寵臣和女兒太平公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依靠一個通稱為“北門學士”的非官員顧問集團。它是后來翰林院的前身，不但為武后草擬以她的名義發表的大部分文學作品，而且還協助決策。當宰相們阻撓興建明堂的奢侈計劃時，武后干脆繞過他們而依靠這些學士。武后之治的矛盾現象是：存在一個發展和擴大的官僚集團，而同時它的上層又正在被削弱和限制。一個日益發展的官僚階層遇到了武后這位對手，這可能是在她被廢黜時只有一個大臣哭泣的原因吧。

武周的最初幾年相對地說是平靜的，恐怖的緩和帶來了處理若干老問題的機會。在邊境，突厥、吐蕃和西南蠻諸部落正為進行了相當時期的內訌所苦；在690—694年期間，超過35萬名“蠻夷”前來中國避難。兩名有才能的將軍王孝杰和唐休璟說服武后，收復678年喪失的“四鎮”的時機已經成熟。在692年陰歷十月，他們在西面擊潰了吐蕃軍，并在龜茲重建安西都護府。[[57]](#_5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可是在朝廷，武后對嚴重的行政問題表現得認識不夠，自己忙于匯編文學作品及設立新職位以安插和濫用官員，再就是忙于與佛教打交道。她又為自己加了“慈氏越古金輪”的頭銜；她一改唐王朝重道輕佛的做法，甚至禁止殺生。在這一時期，她對這一印度宗教的庇護說明了面首和尚對她的影響；這個和尚的愛好似乎已趨向在明堂周圍的寺廟群主持秘密的、有時是血腥的禮儀。[[58]](#_58_Zhe_Xie_Li_Yi_Zai_Fei_Ci_Jie)由于五方雜處，這些禮儀被稱作“無遮”會，但它們似乎在懷義和尚死后即煙消云散。以后，武后又重新庇護華嚴宗和此時迅速發展而深受歡迎的禪宗。[[59]](#_59___Wen_Xian_Tong_Kao____Juan)

她的庇護還擴大到科舉制度。武后一貫重科舉制而輕靠各種特權進入官僚集團的方式；在689年，她首創君主親自策試貢士的做法。[[60]](#_60___Chen_Gui_____Jian_Yu___Con)武后顯然看到科舉制能為統治者的利益服務，因為在693年，她用幾年前自己編寫的《臣軌》“經”以代替舉子的必修課程《道德經》。這個文獻以太宗的《帝范》為模式。它體現了武后的政治哲學，主要包括從儒家和道教經籍中精選的引語，分列于“至忠章”和“利人章”等標題之下。至少前言是武后本人寫的，正文包括有關帝國政策的結構十分嚴密的觀點，反復提出如下的格言：“父子雖至親，猶未若君臣之同體也”；“夫人臣之于君也，猶四支之載元首，耳目之為心使也”。它不斷地強調忠誠，強調國家的權利高于個人。在705年前，每個應試士子被要求牢記這一著作。最后，在695年武后取消了她本人以前在掄才考試過程中采用的糊名法。這樣做的原因不詳。但這一措施可能與那一年出現的問題有關，因為容許一定范圍的徇私舞弊是堵塞批評的一個權宜之計。還有許多事情可以批評。武后與懷義面首的關系已日趨冷卻，這部分是因為他的行動越來越驕恣，部分是因為她已找到了一名合意的儒家醫生來代替他。懷義和尚是一個易沖動的人，他在695年的新年朝賀中被公開冷落后，就縱火焚燒明堂。熊熊烈火把明堂焚毀；雖然武后公開譴責不慎的匠人，但她知道誰應該負責，于是決定行動。她駁回了公開審訊的做法，因為這不利于她重建明堂的決定，而且還會帶來令人難堪的證詞，所以她采納了太平公主的計劃，把這個和尚誘至宮內并秘密處死。隨著他的死亡，武后對佛教的態度似乎改變了。她去掉了“慈氏越古”的稱號，終止了殺生的禁令；在她的年號中，在皇宮及諸如重建的明堂等新建筑中，開始使用像“天”那樣的儒家字眼。但這些建筑絕不是按儒家精神興建的。史書中也有“用財如糞土”的記載，御史們也經常提出耗盡民力和國庫的警告。武后的奢侈是否像歷史告訴我們的那樣具有毀滅性，現在沒有辦法作出確切的估計。

雖然帝國仍舊繁榮，人民繳稅一般沒有怨言，但在武后后期已有人對財政事務越來越關心和開始打算處理帝國面臨的日趨嚴重的財經問題。695年，李嶠上疏提請注意浮逃戶的數字日增，他們出于種種原因從登記地出逃，作為未登記的占地者在其他地方定居。他提議規定這些人向當局投案的期限。他們或可以重返故地，或在他們的定居地登記，但不論何種情況，都要成為正式登記的納稅者。新政策不僅由地方官員推行，而且要受中央政府派往各道的御史的監督。武后批準了這一計劃，而且御史也實際上被任命了。但計劃受到朝廷幾名大臣的阻撓，最后被擱置下來。然而它在8世紀初一定被恢復執行，因為人們從敦煌和吐魯番發現了當地官員執行這類政策的有關文書。這些文書的日期是從702年和703年起，當時李嶠又成為朝廷中的主要人物。[[61]](#_61_Jian_Tang_Chang_Ru___Guan_Yu)

在8世紀的最初幾年，由于商業日益重要而引起的問題也受到相當的注意。通貨問題顯然更加嚴重了。在7世紀90年代中期私鑄成風，政府是如此缺乏金屬，以致必須熔化農具去建造京中一座新的方尖塔。從701—704年，某些私鑄錢獲準使用，作為應付通貨長期短缺的一個措施。703年，曾有對商人和貿易征稅的企圖，但它被朝廷的傳統主義分子所阻。[[62]](#_62_Jian_Cui_Rui_De___Dui_Shang)造成國庫真正嚴重枯竭的兩個因素——迅速擴大的官僚集團的俸祿和防務費用——尚未達到嚴重的程度。

但從695年起，防務費用開始成為大問題。在前一年，北突厥的新可汗默啜已開始在邊境襲擾，并從此折磨中國達好幾年，時而掠奪，時而又要求歸順；時而叛亂，時而又要求和親。[[63]](#_63_Guan_Yu_Mo_Chuo__Jian_Le_Nei)在他的統治生涯的開始階段，他順從綏靖；在695年，當武后將注意力轉向吐蕃的更嚴重而緊迫的威脅時，他被收買，得到了一個中國的“公”的封號。自7世紀60年代以來，吐蕃已一直在進行它的領土擴張，但隨著幼王（贊普）在676年登位，實權落到了屬于論氏的大臣們的手中，統治者對他們也難以控制。[[64]](#_6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 695年秋，最有權勢的大臣論欽陵率軍侵入中國，次年春天在離長安不到200英里的地方打敗了王孝杰和婁師德率領的中國大軍。武后立刻降了二將的級，但這一年爆發的大規模的契丹反叛使她不能〔對吐蕃〕作進一步的報復。

這場叛亂是當時朝廷完全沒有料到的，因為契丹自648年被太宗并入松漠都護府以來，一直平靜無事。[[65]](#_65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99Xi)契丹人在這里享受很大程度的自治，他們之中的李盡忠和孫萬榮升任很高的職務。但他們在中國官員的管轄下并不是一貫走運的，這時的中國都護是一個冷酷和傲慢的人，在此地不久前的一次饑荒中，他沒有提供救濟物資，并“視酋長如奴仆”。[[66]](#_66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他們便舉兵叛亂，在一周內兩名首領武裝了數萬人。官方的反應是迅速的。28名將領率領數目不詳的軍隊奉命征剿，但在今北京附近的第一次大戰斗中幾乎全軍覆沒。這次戰敗是一大震動，它的規模造成了危急局勢。次月，一份詔令提出大赦和重賞那些愿意參軍的罪犯或私人奴隸，這一提議是如此異乎尋常，以致她的一名官員氣吁吁地說它有損國基。同月，當契丹人在今北京周圍地區筑壘自固時，突厥人侵入今甘肅的涼州，仍占領隴右的吐蕃利用這一局勢要求中國軍隊從“四鎮”撤出。

武后很少因她的對外政策而受到稱贊，但在這次危機中她表現出的冷靜和果斷完全值得贊賞。郭元振使她相信，論族在吐蕃人中日益不得人心，于是她順應時勢，派使者前往就和親和交換領土進行談判，而使者的真正目的是挑撥離間。默啜因地位穩固而要求優遇，他的野心提供了解決問題的鑰匙。這個突厥人一定很熟悉中國的宮廷政治，因為他在以前已經提出，如果武后愿將她女兒太平公主嫁給他并收他為養子，他就攻打契丹。這時武后答應考慮這些條件，同時又頒發了承認他為可汗和封他為帝國將領的證明。默啜把這些榮譽視作受寵遇的標志，于是利用李盡忠之死進攻契丹的基地，并帶走了不在那里的領袖的家屬和生活用品。這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即促使契丹人南下侵入中國；同月，他們新聯合的軍隊抵達營州邊界，在冬季被阻。據史書記載，“河北震動”；[[67]](#_67_Tong_Shang_Shu__Di_6510Ye)但即使如此，人民拒絕了契丹人要他們參加廢黜武后的圣戰的號召。

697年在陰郁的氣氛下開始。默啜已變得不耐煩了，于是又開始掠奪中國的邊境諸州。同時，一個與名門望族有關系的刺史劉思禮被一個術士的夸夸其談的預言所惑，組織了一次奪取皇位的陰謀。他吸收了一批京師官員，但在他們能夠行動前，此事被泄露。全神貫注于契丹威脅的武后已不能容忍，便讓到處插手的來俊臣去對付這些密謀者。正好來俊臣一直在等待這一機會，于是大搞擴大化，株連無辜。受害者“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皆族誅之，親黨連坐流竄者千余人”。[[68]](#_6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朝廷又被猜疑和恐懼的氣氛所籠罩。

約在這時，同父異母弟兄張易之和張昌宗這兩個重要人物的出現又增添了新的內容。這兩個美貌青年“皆傅粉施朱，衣錦繡袍”，[[69]](#_69___Jiu_Tang_Shu____Juan_78_Di)靠與太平公主和被認為與武后本人通奸而得寵，從而平步青云。[[70]](#_70_Guan_Yu_Zhang_Shi_Xiong_Di_D)雖然武后年約70，但據史籍記載，她善自涂澤，以致“左右不覺其衰”。可能在這時使她長出新齒和新眉的自然精力和春藥，增加了朝廷中關于他們關系性質的謠傳的可信性。[[71]](#_7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張氏弟兄的權勢迅速超越了一切；據說甚至武氏的子弟也“爭執鞭轡”。[[72]](#_72___Jiu_Tang_Shu____Juan_78_Di) 697年初期，武周朝廷出現了種種不正常的現象：來俊臣和二張都為了自己的目的威脅其他官員；武后在考慮已用了870噸青銅的九鼎的鍍金問題；而同時契丹則勢如破竹地進入現在的北京地區。

這時朝廷被默啜的新要求所震驚而要考慮現實了，他的要求是：割讓單于大都護府和遣返以前在帝國內六個州定居的突厥人。在隨之而來的朝廷的一次大辯論中，武后開始時傾向于李嶠和田歸道的“強硬路線”，但契丹的威脅迫使她支持綏靖派。[[73]](#_73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她勉強送給默啜大量賄賂，并答應皇族聯姻，以期至少暫時使他得到滿足。隨著夏季的即將來臨，她派兩支大軍（其中一支兵力20萬）征討契丹，這時形勢發生了變化。只有很少中國人參加了叛亂；契丹的首領因一次外交的錯誤而與默啜疏遠，而且他的基地也已斷送給突厥人。這個消息傳到了已與中國人交戰的叛軍那里；當非契丹族部落民嘩變時，士氣低落的軍隊崩潰了。那些在潰退中免遭殺戮的人逃到吐蕃人那里避難。契丹叛亂終于被平息，但這是在耗費大量人力財力和河北大部分地區遭到破壞的情況下取得的。

武后的成功又使政治氣氛緩和下來。來俊臣第一個消失，他的下臺是自食其果。他權欲熏心，竟同時指控李氏和武氏兩個皇室成員都在搞陰謀。太平公主的狡詐幾乎不亞于她母親，她領導被控者進行反指控，并且進行得相當妥善，以致武后最后被迫同意將來俊臣處決。整個京師為他的死而慶賀，甚至在暴民將他的尸體撕成碎塊時，官員們就開始上報他的種種不公正的行為。武后終于相信，首先她承認自己已經受騙，誠懇地答應結束恐怖統治。這次她決意這樣做，以狄仁杰和吉頊為首的大臣們迅速行動，立刻提出繼位這一微妙問題。698年陰歷三月，中宗及其韋后從他們的流放地被召至洛陽。武后已決定帝國將再次由李氏家族來繼承。

這一決定使武氏利益集團深為失望。據說武承嗣不久因懊惱而死，但不是在他目睹其子武延秀去與默啜之女結婚這一不光彩的場面之前。正統的官員們惶惶不安地抗議，其中一個最直言不諱的官員說道：“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這個批評者張柬之被貶至遙遠的邊境區，直至704年才回來領導一次復辟政變。對武后來說，派侄孫前往突厥的行動證明是一次嚴重的失策。精明的默啜當時已認清武后無意答應他的幾個主要要求，于是利用這個親王的來臨作為借口，以便用武力來實現這些要求。他以侮蔑性的公函對朝廷猛烈攻擊，抱怨所收禮物的質量低劣，他嘲笑與武氏聯姻的想法，因為他認為武氏是小姓，不如自己的門第。他最后說：“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唯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74]](#_7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698年秋，他率軍沿契丹正西面的一條路線，穿過耗盡元氣的河北入侵中國。武后設法喚起全帝國進行另一次大行動，征募了一支三部分組成的、估計達45萬人的軍隊。當這次大軍也不足以阻止機動的夷狄時，唯一的解決辦法似乎只有征募更多的人。這次人民抵制了。連續的征兵總共只招到1000人，武后最后被迫打出王牌。在一片引人注意的吹擂聲中，中宗被宣布為太子和河北幾支軍隊的統帥。史籍可能夸大其詞地記載說，5萬人立刻響應這一號召，在同年陰歷九月末，狄仁杰能夠率領一支10萬人的軍隊奔赴戰場。隨著軍隊的到達，默啜撤退了；他帶著40萬大軍忙于為自己擴大在長城以北的草原上的勢力。司馬光黯然指出，“西北諸夷皆附之，甚有輕中國之心。”[[75]](#_75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在10年內，他控制了從滿洲邊境直至伊犁河流域的整個亞洲腹地。

這正是死里逃生，但武后除了在河北和河南建立專門的常備軍外，沒有采取防止危機再發生的措施。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最明顯的是，朝廷一致力求結束代價高昂的遠征和干涉主義的對外政策，同時一致支持狄仁杰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其次，武后在699年初期的一場大病后，似乎滿足于吃老本和享樂了。最后，邊境的威脅開始迅速減少。當年夏季，吐蕃的幼王終于行使他的王權，對論族及其支持者進行打擊并打敗了他們，殺死了數千人。雖然內訌削弱了吐蕃人的力量，但他們在次年仍對中國大舉進攻。結果證明是一場災難。唐休璟將軍在六次大戰中打敗了他們，使他們潰不成軍。武后然后命郭元振掌管隴右道的涼州這一戰略中心，他與繼任的唐休璟在那里干練地治理了10年，擴大和加固了中國的領土，贏得了吐蕃人的尊敬，并給這一地區帶來了很大的繁榮。702年，吐蕃人恢復對中國的朝貢，并要求和親。不久，吐蕃與它屬下的民族的內部糾紛、幼王的死亡和7歲的統治者的登基，確保了又一個安定的時期。

直到702年春季，中國才聽到有關致力于建立對西突厥人統治的默啜的消息，當時他率領一支大軍沿傳統的突厥入侵路線侵入北都（即太原）的周圍。正當組織反攻時，他又撤軍；次年夏季，他要求將他女兒嫁給皇太子的一個兒子。這個要求當然被拒絕，但有跡象表明，對一個地位不重要的公主的婚姻是做了某種安排的。703年，中國人在托克瑪克（碎葉）淪于西突厥人之手后被迫再度改組安西都護府。但默啜在鳴沙（今寧夏南部的中衛附近）最后一次大勝中國人后，不再在中國制造麻煩。他不斷忙于對付其附屬部落的起義，直到716年他在遠征北拔野古人時死去為止。

武周朝廷的最后幾年被張氏兄弟所左右，也被官僚集團企圖推翻他們的種種活動所支配。特別在700年狄仁杰死后，武后是如此迷戀她的兩個面首，對他們真是有求必應。以前十分罕見的包庇和腐化當時變得很普遍，武后的名望也隨之下降。699年，她為二張設置新的機構控鶴府，以使他們的地位合法化——鶴是道家仙人常用的交通工具。雖然設置的公開目的是提供有才華的文件草稿和文學作品匯編，但它很快就墮落為類似男性后宮的場所——如果朱敬則的奏疏可信的話。[[76]](#_76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到700年年中，它已變成了一個制造鬧宴、賭博、酗酒、反常勾當和荒誕行徑的丑聞的地方，又是以后幾個世紀富有想像力的小說家們取得素材的富礦。武后盡管健康狀況日趨不佳，卻經常出席，雖然她越來越在京師外約60英里的三陽宮尋求更省力的娛樂。

她沒有采取約束這些寵幸小人的行動，甚至當關于他們賣官鬻爵的行徑、浮華炫耀的生活作風以及災難性的干政的怨言不絕于耳時也是如此。在受到整個官僚集團痛恨的情況下，二張竟然還疏遠了武氏和李氏家族；對前者，他們主張讓李氏成員繼位，對后者，他們告發了中宗的兩個子女，即他的長女和他與韋后所生的獨生子，兩個人因批評二張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這也使二張失去了在他們的女皇保護人死后生存下來的唯一機會。與兩個具有最高地位的家族中的一個聯合也許可以拯救他們，但他們反而愚蠢地把自己孤立起來。

這一家庭悲劇發生后不久，在701年冬季，武后返回長安，準備在那里住兩年。史籍均未說明原因，也許這是出于健康的緣故。這更可能是象征性的遷移，打算表示帝國不久將重歸于唐室。她在長安頒發文告，以終止所有反對她的叛亂者的危險處境，并且為有一個成員犯罪的家庭恢復已被剝奪的政治權力。遷移的最后一個目的可能是要減輕在洛陽積聚的反對她所寵幸的人的壓力。最后一點，她失敗了。

二張的主要敵人是一個名魏元忠的直言不諱的元老政治家，在他多事的生涯中，他已經遭受多次關押和流放。他或是通過二張的奴仆，或是通過一個弟弟，或是直接向武后抱怨，曾經幾次打擊二張，并已隨朝廷前往長安。二張懷疑他的用心，當703年年中他們的女皇保護人患重病時，他們決定先對他進行打擊。[[77]](#_77_Dui_Wei_Yuan_Zhong_Shen_Xun)他們無中生有地指控他主張武后退位；同年陰歷九月，唐代最有名的一次審訊開始了。整個朝廷全力證明魏元忠無罪，但只有當后來成為玄宗最杰出的大臣之一的張說改變作偽證的主意時，指控才表明是絕對虛假的。

但是武后決定壓制正義和為她寵愛的人挽回面子，為此她把魏元忠和張說二人都發配到南方，這就使她威信掃地。這一如此不符合她性格的行動可能決定了她的命運。高級官員看到了二張權勢炙手可熱的程度，同時也認識到打倒他們的必要性，否則他們自己的命運就會被或真或假的臨終遺詔所決定。有的官員走得更遠。如果不能把專擅武后寵愛的兩個可鄙的寵物打倒，那么武后本人必須下臺。陰歷十月初期，朝廷返回洛陽。

在這時，武后最后顯示了她的干勁，她通過放棄建造一座昂貴的佛像、撤換一批貪官和在嶺南發生嚴重抗議后提高道的行政級別的為時已晚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她的衰退中的威望。但她的所作所為都不能掩蓋二張的問題。她經常生病，只有二張能進入她的內寢，同時粗暴地打發一些失望的大臣們離開。在秋季，張昌宗在一次對他家族的幾個次要成員受賄的指控中受到牽連，盡管他明顯地有罪，卻只處以輕微的罰金。朝廷再次為之震動。部分地為了進行安撫，武后把既忠于唐、又有聲望又干練的張柬之提升為宰相。張此時已80歲，他的漫長生涯中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半失寵的情況下在京師外度過的，并且他策劃倒武后的活動已進行了相當的時間。只有他最親密的幾個心腹才知道他的計劃已進行得很順利，而大部分官員繼續把攻擊矛頭針對二張，試圖以合法手段把他們消滅。704年陰歷十二月，他們指控張昌宗犯有叛國重罪，當連武后“控制”的法庭也不能開脫他時，她就采取了特恕的辦法。反對派這時才認識到武力是唯一的出路。在705年正月后期，他們行動了。主要的密謀者張柬之、崔玄img、敬暉、桓彥范和袁恕己把身不由己的中宗哄勸出東宮，并帶了500名御林軍進入玄武門。[[78]](#_78_Zhe_Zhi_Ke_Zhui_Su_Zhi_Tang)他們在庭院內遇見張氏弟兄，把他們就地處決。在他們進入皇宮前，披頭散發和狂怒的武后擋住了他們的去路。她迅速了解局勢后，就以輕蔑的字眼對顫抖的兒子和其他密謀者講話。然后她返回臥床，她半個世紀的權力到此結束。

## 中宗和睿宗，705—712年

從各方面的觀點看，唐代中興的第一個10年是令人沮喪的。武周末年因貪污和行政普遍廢弛而號召的徹底改革干脆沒有進行。相反，這幾年出現的只是在日益惡化的財政和行政局勢下展開的激烈的權力斗爭。除了那些想在暴政中尋找客觀教訓的人外，傳統的歷史學家普遍不注意這一時期。

但是，近來已有人企圖論證這一時期具有更重要的歷史意義。有一篇這樣的文章，它確定了三個與皇帝爭權的集團。[[79]](#_79_Jian_Gu_Chuan_Dao_Xiong___Co)它們是受寵的大臣、皇室和外戚。從中宗登基起，后兩個集團特別活躍，它們的自我擴張和結黨的企圖與前一世紀的行政傳統是那樣背道而馳，以致它們的活動把行政搞得一團糟。在它們爭奪權力的過程中，它們的成員各自建署開府，出售員外官和書吏的委任令，同時大大地增加它們控制的“封邑戶”和收入。它們的行動損害了迄今受到尊敬的文人階級的利益，他們被迫搞裙帶關系和靠諂媚求得提升；并為庶民階級的興起提供了動力，他們這時可以通過捐納進入官場，而不用再熬過漫長的科舉考試過程。商人和地主是最大的受益者。

史料的性質顯示這類分析具有很大的暫時性，但這一時期的簡短的年表至少能顯示為什么會作出這些推斷。

在中興時期，兩個主要人物是中宗的韋后和她的面首，即被廢黜的武后的小侄子武三思。韋后是一個淫蕩和有野心的女人，據一種史籍記載，她之所以能完全駕馭丈夫，是因為他要感謝在流放期間她給予的支持；據說他曾答應，一旦他復位，就把全部權力給她。[[80]](#_80___Jiu_Tang_Shu____Juan_51_Di)通過成為她的面首，無恥的武三思在他姑母倒臺后仍能幸存下來，并且施展與中宗朝的心腹謀士上官婉兒同樣的才能，從而進一步加強了他在新秩序中的地位。上官婉兒是詩人兼官員上官儀的孫女；上官儀在664年參與了廢黜武后的陰謀，結果不但自己被殺，而且使全家淪為奴隸。上官婉兒就這樣開始了在宮中當奴婢的生活，但她憑借真正的本事，升到了類似武后私人秘書的地位，約從698年起，起草了許多武后的官方文件。由于她的經驗和才智，她被推薦給新主子，名義上被封為昭容，不過她的作用是顧問和秘書性質的。此黨的最后一個成員是21歲的安樂公主。由于她生于去房州的途中，又是韋后的唯一活下來的子女，所以中宗對她非常溺愛。705年，她嫁給武三思之子武崇訓。

這是一個重要的聯盟，它鞏固了帝國最大的兩個家族的關系；更重要的是它助長了武三思的得意的詭計。在為自己取得最高權力的野心的推動下，他已設想出一個大膽的計劃，即在開始時通過他兒媳進行統治；所以在完婚后他就立刻開始促進任命她為皇儲的活動！以前從沒有人提出這樣的建議，朝廷為之愕然。盡管不久前已有婦女統治的傳統，但被任性的公主稱之為“山東木強田舍漢”[[81]](#_8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的魏元忠糾集大批支持者阻止了這個計劃，所以暫時保住了中宗與一妃子所生的次子（原文如此。——譯者）、當時的繼任者李重俊的地位。計劃的這一折挫沒有嚇倒武三思，但卻使他知道，強有力的大臣們仍可能是一個危險。為了阻止任何進一步的對抗，他決定對整個官僚集團進行恫嚇；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狠狠地打擊了最有威望的官員，即復辟政變中的5個帶頭人。他們之所以成為自然目標，不但因為他們是宰相和全國的英雄，而且還由于他們曾經企圖抑制武氏家族的腐化和濫施封賞。通過韋后，武三思在705年先把5人提升為顯赫但無實權的王，到同年年底，把他們貶謫到遠離京師之地的借口也被找到了。年邁的武后看到她侄子如此迅速地占了絕對上風并且準備重新實施她以前的某些措施，她一定會面露笑容的吧。她寬厚地原諒了她的敵人并放棄了皇帝的頭銜，在705年陰歷十一月死去。她的謚號為則天。

武三思繼續推行他的陰謀。朝廷中剩下的在威望上可與自己相比的人物是前帝睿宗和睿宗的同胞太平公主。兩人都似乎滿足于不過問政治；為了保證他們繼續不干政，武三思給每人10萬戶的巨大收入。[[82]](#_82___Xin_Tang_Shu____Juan_83_Di)唐制規定，接受這種實封的人，本人收取歲入的三分之二，中央政府只收三分之一。[[83]](#_83_Jian_Ren_Jing_Tian_Sheng___T)在整個這一時期，武三思及其朋友和繼承者們為自己撈得了大量的封賞，因此到玄宗登基時，國家的大部分歲入，特別是富饒的河南河北地區的歲入，都落入了私人手中。[[84]](#_84_Jian___Xin_Tang_Shu____Juan)封賞的大部分是非法的，因為它們都超過了唐令規定的限額，而在這種情況下，賞賜給公主的法定限額僅為300戶。[[85]](#_85___Tang_Hui_Yao____Juan_5_Di)但沒有人提出異議。兩個月后，太平公主和其他六個公主獲準自己開府，規模與“親王”的府同。[[86]](#_86_Yi_Ge_Gong_Zhu_Zhi_You_Zi_Ge)通過把這些職位售給出價較高的人，她們不但增加了自己的財富，而且培植了幾批主要忠于她們的官員。武三思使用了同樣的方法，在706年初任命了2000多名員外官；據一份史料記載，另外有1000名宦官被任命為七品以上的官員。[[87]](#_8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這些員外官的性質模糊不清，但在正統官員看來，對他們的任命是很不得人心的。當時一個道的同僚致函魏元忠，列舉“十失”，并警告說，今之政府快走向災難，因為它在科舉制中受賄和貪污，因為它存在宦官和無能的官員，因為它不能阻止公主們自己開府，因為它沒有抑制貴族的驕奢淫逸。[[88]](#_8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魏元忠非常清醒而且感到了很大的壓力，所以沒有向任何人提供此信。

朝廷在706年冬返回長安，武三思和韋后在那里加強了擁立安樂公主為皇儲的活動。處境不幸的人是中宗與另一個妃子所生的第三子李重俊。韋后及其支持者恨他，對他很不尊重。不用說，他變得越來越不安，于是在707年秋他決定行動。他在有經驗的將領李多祚和300名御林軍的支持下進入武三思的府第，把他和他的一個兒子，即安樂公主之夫殺死。他然后轉向皇宮，但在那里就不那么得手。中宗帶著妻子和女兒，已設法設置路障并躲在玄武門城樓中。當這批密謀者來臨時，他表現了難得出現的勇氣。他戲劇性地向士兵們發出呼吁，說服他們把矛頭轉向其首領。李多祚當即被殺；前皇太子在到達突厥邊境時才被殺。

政變的失敗和武三思之死沒有使政治空氣發生什么變化，不過從此他那個宗派的陰謀中已沒有他那種精心安排的特點了。當新寡的安樂公主幾乎立刻開始與剛回國的武延秀發生不體面的亂倫之事時，整個朝廷為之震驚。事情似乎是，他在默啜和北突厥人那里逗留期間習染的“夷狄”外貌和習慣使她著了迷。他們在708年的婚禮是如此浪費，以致大部分官員推測安樂公主已被內定繼位，于是有的人退居幕后搞反對活動，有的人則競相向她獻媚。政府一片混亂，由于安樂公主愚蠢地企圖誹謗睿宗和太平公主，隱藏著的緊張根源已經露頭。707年，他們輕易地洗清了自己，但安樂公主卻愚蠢地破壞了武三思政策的精髓，即不疏遠太平公主。

707年到710年的時期主要處于令人不安的休戰狀態。韋后和她的女兒分享攫取的權力；前者的面首連續不斷，后者在一個與她志趣相投的婦女小集團的參與下，通過出售委任狀和所謂的斜封官來增加自己的財富。[[89]](#_89_Zhe_Xie_Bi_Duan_Ji_Wen_Zhong)任何社會地位的人付3000錢就能度為僧尼，付此數的10倍就能成為一個公主府第的官員。需要的人很多，因為這兩種職位的特權包括勞役和主要稅賦的豁免，從而為富商和地主提供晉升的絕好機會。幾位公主和她們的朋友因為攫取京師周圍的土地和競相建造豪華的別墅，所以很不得人心。她們使河流改道，破壞農業，還取窮人的子女為奴隸。上官婉兒是引人注目的，她是主持選拔應試士子的第一個婦女。可以預料，她所喜愛的是像崔湜那樣文才優于行政能力的人。她創設了一個新的文學學院，還主持了一個鋪張的社交性集會，文章比賽的優勝者在那里可以得到金、帛的獎賞；[[90]](#_9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她與朝廷的其他人一起，在佛教的建筑上浪費了大量錢財。一名正直的官員韋嗣立告誡說，雖然民力耗盡，糧倉空虛，但新寺廟卻不斷出現，小廟花三五萬錢，大廟則高達數百萬錢。[[91]](#_91___Jiu_Tang_Shu____Juan_88_Di)他的抗議連同其他同樣的意見都被置之不理。即使沒有賣官鬻爵的事，官僚集團的擴大也是突出的。各種史料沒有作出真正的估計，只說兩京通過科舉的人達“數萬人”。一名官員對任命的大批員外官深為厭惡，他上疏抱怨說，“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于錫”。[[92]](#_92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官場中的貪污如此盛行，以致當一個大膽的官員免除1400名持有非法委任狀的人之職務時，他竟受到同僚的排斥。正規的政府官署不得不與許多與之競爭的政治集團分享權力，而擁有正式的和非常任命的官員的人數之多達到了令人反感的程度。[[93]](#_93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但還有一些人等待了多年，才靠行賄、公開購買或偶爾靠自己本事謀求到了職位。

政治生活似乎已到了極度消沉的時刻，但事態還在發展。太平公主永遠不會寬恕韋黨想消滅她的背叛行徑，已穩步地在培植支持她的力量，在此同時她還擴大了對她同胞睿宗的影響。約從709年年中起，她還開始引起她的另一個同胞兄弟中宗對他妻、女的不正當行為的懷疑；到710年初期，中宗公開流露了他的不滿。韋后開始為自己的地位擔憂了。陰歷六月，皇帝突然死去；據一些歷史學家說，他是被他妻子或女兒在他喜愛的糕點中下的毒所害。[[94]](#_9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這一指控并無實據，但韋后確實隱瞞了他的死亡。直到她命自己的親戚擔任關鍵的軍職和把中宗僅存的15歲的兒子李重茂扶上皇位時為止。他即將統治兩個星期。

廢黜他的政變的成功通常歸功于未來的玄宗李隆基，原因與唐之建立歸功于太宗相似。[[95]](#_95_Jian_Di_San_Zhang_H_J_Wei_Ke)與他祖父一樣，玄宗也親自插手干預了他這一時期的歷史，以確保任何史料都不能與這種官方解釋有矛盾。但種種事實卻暗示了不同的解釋。陰歷六月十二日晚，李隆基及其少數追隨者（包括太平公主之子）再次把玄武門的禁軍爭取過來，殺死了韋黨首領，強行闖入宮內。倉皇出逃的韋后、正在打扮的安樂公主和想改投主子的易變的上官婉兒被殺。這是一次順利的行動，但它需要錢和權力。25歲的李隆基則兩樣都沒有；他當時任衛尉少卿，作為睿宗與一個妃子所生的第三子，他是沒有前程的。政變顯然是太平公主策劃的；如果還有任何懷疑的話，兩天以后，這類懷疑就煙消云散了。她傲慢地打斷了一次朝覲，把年輕的皇帝拉下皇位，并把睿宗召來。睿宗也許是在真正勉強心情下再次進行統治的，而實權卻轉到了武后女兒的手中。沒有人敢抗議。

有一個時期，太平公主似乎將步她母親篡位的后塵。她的寵臣被安插在國家最高級的崗位；未得她首先批準，睿宗甚至拒絕考慮任何措施。“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系其一言……趨附者門庭如市。”[[96]](#_96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只有一件事太平公主沒有成功。她預期體弱的同胞會長期統治，所以沒有插手立嗣之事。人選為睿宗的有合法權利的長子李成器和李隆基二人，后者因領導政變有功而成為候選人。睿宗猶豫不定，但已在敦促李隆基登位的某些大臣的呼吁，再加上其長子的無私，使他不必作出困難的決定。710年陰歷六月，未來的玄宗成了皇太子。沒有關于太平公主反對這一立儲的記載，但不出幾個月，她發起了一場詆毀他的陰險的運動。她抱敵對態度的原因不詳，也許是因為他表現得過于能干了。幾乎從他任皇太子時起，有獨立精神的高級官員似乎有了信心。諸公主府的官屬被取消；唐休璟和張仁愿等忠于唐朝的有威望官員又控制了關鍵的軍職；當時最受人稱道的宋璟和姚元之正在處理科舉制中的積弊，取得的成就使“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97]](#_97_Tong_Shang_Shu__Di_6652Ye)當他們罷了數千名斜封官的官職和削減中試的名額80%時，睿宗支持他們的努力。皇太子本人一直未被人注意，但他的聲望日隆，同時對太平公主的攻擊也隨之與日俱增。他的日益擴大的支持者隊伍力促他采取反對她的行動；雖然他非常了解她權勢的范圍，不能魯莽行事，但他幾個朋友的熱情幾乎毀了他。宋璟和姚元之擅自行動，說服睿宗把太平公主派出京師，以結束家庭的爭端。他勉強同意暫時將她流放，于是她就居住在濮州的附近，但她的勢力幾乎沒有縮小。皇太子知道她把自己的放逐歸咎于他，所以經常擔心報復。在一次企圖使她息怒的行動中，他要求將自己的盟友宋、姚二人分別貶逐到外地。她立刻抓住這一機會，以自己的人去取代他們，《資治通鑒》對此后的種種事件作了簡明的敘述。斜封的官職被恢復，“自是綱紀紊亂，復如景龍之世矣”。[[98]](#_9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 711年晚秋，已經打算放棄皇太子之位的李隆基完全投降，請求將她姑母召回京師。她同意回京，在幾個月中，7個宰相中就有5個是她的人了。

睿宗對事態的這些發展不是視而不見的，并且日益有所醒悟。在712年，他因自己不能控制局勢而精神受著折磨，到了仲夏，蒼天以一顆明亮的彗星來示警。皇帝覺得這一跡象有其用意，當宮廷的占星術士證實了他的解釋時，他宣布了讓位于兒子的決心。這時太平公主強烈反對，但無濟于事。她設法強行達成一個妥協，即睿宗成為“太上皇”，保持任命高級官員和決定死刑的控制權；但在同年陰歷八月，玄宗登上皇位。

這時，輪到太平公主焦慮不安了。她的權力仍極大，控制著大部分的文武官員。[[99]](#_99_Tong_Shang_Shu__Di_6682Ye)但她在新帝統治下，很難期望無限期地保持有利于她的平衡。她的支持者經常敦促她對他采取行動。最后，她拋棄了以往行之有效的忍耐和謹慎，求助于毒藥，但玄宗防衛嚴密，逃脫了毒手，但他非常清楚，太平公主一人應對此負責。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和解這時是不可能取得了。

713年夏季，她被迫企圖發動一次武裝政變。她以一貫的謹慎擬定了計劃；如果她是男子，能夠親自執行計劃，她很可能成功。相反，她必須依賴別人，而玄宗則通過其中一人得到了警報。陰歷七月初，正好在實行密謀的前一天，他冷靜地逮捕了幾個首犯，在武德殿把他們斬首。三天后，公主本人在她的府第被賜死。她的死亡可以被恰當地視為一個時代的結束。以后再也沒有這樣多的婦女如此長期地影響中國的政治生活了。

## 這一時期的回顧

中國傳統歷史學對684—705年這一時期的態度可以用宋代史學家袁樞作為最鮮明的代表，他稱它為“武韋之禍”。[[100]](#_100_Jian_Yuan_Shu___Tong_Jian_J)前面已經提到這種說法的某些理由，很少近代的史學家會不同意這種說法適用于韋后的時代。但作為對武后統治時的描述，這就有欠公道了。

首先，它忽視了她篡位前的成就的意義。武后掌權的中國，王朝通常不過延續兩三代；通過應用并擴大控制和集權的手段，她成功地形成了有生命力的和長期持久的統一。在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她尊重合法繼承的威信；她的奪取皇位，從流血和破壞的角度來衡量，在所有的改朝換代中是最不激烈的一次。它把國家從更糟的境遇中拯救出來，當然，這點是可以爭辯的。

其次，袁樞的觀點有嚴重的偏見。幾乎與所有的傳統歷史學家的觀點一樣，它因與士大夫的看法和價值觀完全一樣而大為遜色。[[101]](#_101_Guan_Yu_Zhe_Yi_Wen_Ti_De_Qi)對他來說，歷史是說教的，他的目的是要使未來的統治者相信，武后對大臣們的專斷是“災難性”的。但是沒有確切的證據能證明，在她統治的最后幾年之前，政府受到她統治作風的危害。太宗官僚集團中特有的集體精神被破壞，但即使對這一批評也應抱保留態度。上層的官員被嚴厲地抑制，他們的特權也受到限制；但在低級官員中，他們的社會背景和地域背景比以往遠為廣泛，而且晉升的面也更大。在整個唐代，各種考試只提供了全部官僚集團中約10%的人，但只根據這一基數而低估它們的重要性則是錯誤的。它們——特別是進士考試——的威望是很高的，功名的取得正迅速變成取得最高官職的標準資格。[[102]](#_102_Jian_Chen_Deng_Yuan___Guo_S)標志之一是，有功名的宰相的比率從高祖時的7%上升至太宗時的23%，上升至高宗和武后時的35%，上升至武周朝的40%。此外，科舉制可作為一種重要象征。對一切有資格參加的人來說，特別對提供大部分中試者的低級貴族來說，它就是提高社會和經濟地位的關鍵。[[103]](#_103_Suo_You_De__Xin__Guan_Yuan)對高級貴族來說，它是保持他們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它推動了這兩個集團的官僚化和城市化，因此它在削弱它們以前那些地方的、離心傾向的特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最后，考試普遍地促進了文學和教育。準備考試的人遠遠多于通過考試的人，有資格當官的人遠遠多于當官的人，在686—689年期間，當時的魏玄同估計，有資格當官的人的十分之一成功地取得了官職。[[104]](#_104___Tong_Dian____Juan_17_Di_9)這樣，就留下了大批可用于地方一級教育和行政方面的尚無官守的候補者。

武后統治的許多非儒家特征也有助于造成她在歷史中的壞名聲。經典的儒家哲學包括許多反對婦女參政的禁令和同樣多的反對婦女篡位的禁令。武后之所以受譴責，不但是出于這些原因，而且還由于她溺愛佛教，延長服母喪的時間使之同于服父喪的時間以提高婦女的地位，和派男“新娘”前往突厥。她的擴張主義的對外政策同樣是非儒家的。當時針對她的軍事冒險所作的勸諫幾乎無不提到經典中反對耗費國庫民力的告誡，或是把所謂的“浮逃戶”這類問題歸咎于遠征。這種意見有對的一面，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夸大。近世的研究指出，為了逃避稅役而躲避登記的家庭在武后時期只限于少數邊緣地區，到以后幾朝才擴大到中國內地。[[105]](#_105_Li_Ru_Jian_Zhong_Chuan_Xue)另外，遠征的軍費必須比照不很明顯的長期效益來衡量。國內經濟的促進、技術和藝術的交流、貿易的增長和引導剩余精力向外發展等成就只是這些比照的幾個方面。

最后，必須記住，傳統歷史學家的種種評價很少注意群眾的境況。在武后時期，府兵制負擔較輕和遠離外來入侵路線的農村地區是安定和繁榮的。[[106]](#_106_Guan_Yu_Fu_Bing_Bu_Dui_De_F)農村沒有出現動亂，兩次叛亂運動也都沒有得到支持，這就提醒人們，農民的生活秩序比抱敵對態度的歷史學家經常斷言的更為良好。在人民中間，武后甚至可能是得人心的。近來在四川出土的一塊可能是10世紀的石碑寫道：“其間以水旱災沴之事，為軍民祈禱于〔武〕天后之廟者，無不響應。”只有很少的中國統治者，其生日能像武后的生日那樣在每年的一個農村節日中被人紀念至今！[[107]](#_107_Wu_Hou_De_Ren_Xin_De_Shang)

在消極的一面，武后統治的最后幾年每況愈下。她的統治是高度獨斷的，以致當她失去控制時，行政結構立刻開始出現裂痕。她不但對此視而不見，而且不能以她一貫的無情手段為后來者提供什么根基。她的被廢黜留下了一個讓幾個平庸的競爭者沒法填補的真空；在統治集團內部隨之產生的沖突中，衰落越來越快。沖突不限于在皇帝同皇室成員結成的黨派和外戚結成的黨派之中進行，而且還存在于官僚集團內部。

在武后統治的整個時期，貴族通過諸如排外性的內部聯姻的手段成功地維護了自己的社會聲望，并且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已與通過科舉制發跡的“新”人在官場中日益嚴重的侵犯進行斗爭。通過在吏部和門下省保持高度的控制，他們已經為唐代中興時預期的貴族復興準備好了一切。[[108]](#_108_Jian_Zhu_Shan_Zhi_San_Lang)武后曾經反對這一集團，而支持地位較低的地方精英集團，并且幫助其中許多人擔任高級職務。但是到了后來，主要反對她并導致她被廢黜的，卻正是這些受過她恩寵的人，這就顯得矛盾了。原因有幾個，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上面提到的官僚沖突的存在。官僚們自己正在受到武后的“酷”吏和那些在她最后年代通過不正當手段進入官僚集團的人的挑戰。員外和斜封官人數的增加、在連續兩個統治時代中由于婦女擅權而造成的官僚宗派的形成，使一個原已嚴重的問題更趨嚴重。韋后和太平公主的垮臺和對她們所支持的弊病的改革，使玄宗贏得了一個重新統一的官僚集體的支持。他準備很好地使用這個官僚集體。

[[1]](#_1_5)《資治通鑒》卷203，第6417頁；《舊唐書》卷87，第2843頁。引文為中宗對裴炎提出他授予其岳父的官職太高這一抗議的答復。

[[2]](#_2_5)全文載《全唐文》卷96，第11—16頁；《文苑英華》卷463，第6—11頁。

[[3]](#_3_5)《舊唐書》卷94，第2993—2994頁；《新唐書》卷123，第4367—4370頁。

[[4]](#_4_5)見楊聯陞《中華帝國的女統治者》，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23（1960—1961年），第47—61頁；陳寅恪：《武曌與佛教》，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2（1935年），第137—148頁。陳寅恪文引了許多取材于古代傳統的參考材料。

[[5]](#_5_5)關于唐代的揚州，見全漢昇《唐宋時代揚州經濟情況的繁榮與衰落》，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947年），第149—176頁。

[[6]](#_6_5)《舊唐書》卷190上，第5006—5007頁。駱賓王檄文載《全唐文》卷199，第1—2頁；《文苑英華》卷646，第11—12頁。

[[7]](#_7_5)《資治通鑒》卷203，第6426—6427頁。這一策略是魏恩溫提出的，此人其他情況不詳。

[[8]](#_8_5)《資治通鑒》卷203，第6425—6426頁；這一段的《考異》考察了相對立的證據。在其《武則天》（北京，1962年）中把裴炎寫成壞人的郭沫若在劇本的附錄（第144—145頁）中討論了這一問題。

[[9]](#_9_5)《資治通鑒》卷203，第6432頁。引自早期的《唐統記》（收于《考異》）。司馬光否定這一情節。

[[10]](#_10_5)《資治通鑒》卷203，第6439—6440頁；《舊唐書》卷186上，第4838頁。關于來俊臣和周興，見《舊唐書》卷186上，第4840—4842頁。

[[11]](#_11_5)《唐會要》卷53，第956—959頁；《資治通鑒》卷203，第6437—6438頁。

[[12]](#_12_5)最近期的一個例子是林語堂的歷史小說《武夫人——一個真實的故事》（倫敦，1957年），作者在書中的一個署名的腳注中提出了一個不尋常的意見，即武后是一個可與斯大林和成吉思汗相比的大劊子手。近期的中共史學家則走向另一個極端，他們原諒武后的恐怖統治，認為她是單純地為了保存自己。例如，見呂振羽《史論集》（北京，1962年），第174頁以后；吳晗：《燈下集》（北京，1961年），第140頁以后。

[[13]](#_13_5)《舊唐書》卷57，第2296頁；《資治通鑒》卷204，第6444頁。

[[14]](#_14_5)例如，見《舊唐書》卷186上的酷吏傳；又見林語堂《武夫人——一個真實的故事》，第134—140頁。

[[15]](#_15_5)《資治通鑒》卷206，第6512—6513頁；《舊唐書》卷57，第7頁；《舊唐書》卷186上，第4849頁。

[[16]](#_16_5)受害者中有太原王氏的成員、隴西的李氏、宇文氏和著名的譜系學者路敬淳。

[[17]](#_17_5)濱口重國：《唐王朝的賤人制度》（京都，1966年），第218—244頁。

[[18]](#_18_5)《舊唐書》卷85，第2817—2820頁；《新唐書》卷113，第4188—4192頁；《通典》卷169，第894—897頁；《冊府元龜》卷616，第1—8頁；卷617，第13—16頁。

[[19]](#_19_5)《資治通鑒》卷206，第6523頁。

[[20]](#_20_5)關于明堂，見C.P.菲茨杰拉德《武后》（倫敦，1956年），第131—132頁。關于明堂在唐代發展的文獻，見《唐會要》卷11—12，第271—300頁。

[[21]](#_21_5)《唐會要》卷73，第1309、1315頁；《資治通鑒》卷203，第6435頁。

[[22]](#_22_5)《唐會要》卷39，第702頁；《舊唐書》卷50，第2143頁。

[[23]](#_23_5)《冊府元龜》卷639，第20頁；《通典》卷15，第83頁；《唐會要》卷75，第1376頁；《唐會要》卷76，第1390頁；《文獻通考》卷29，第272頁。

[[24]](#_24_5)見鐮田茂雄《中國華嚴思想史研究》（東京，1965年），第107—149頁。雖然鐮田主要注意她對華嚴宗的態度，但也提供了她與總的佛教關系的許多材料。

[[25]](#_25_5)《唐會要》卷35，第643—644頁。

[[26]](#_26_5)《唐會要》卷91，第1652頁。

[[27]](#_27_5)《資治通鑒》卷204，第6445頁。

[[28]](#_28_5)《全唐文》卷96，第16—22頁；《文苑英華》卷463，第1—6頁。

[[29]](#_29_5)見《資治通鑒》卷204，第6448—6449頁。武后高度重視這一祥瑞，以致她正式稱它為天授圣圖，并采用“天授”為其新王朝的第一個年號。

[[30]](#_30_5)《舊唐書》卷76，第2661頁。

[[31]](#_31_5)浦立本在其《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75—81頁）中回顧了初唐河北道的特殊情況，并附完整的參考材料。

[[32]](#_32_5)《資治通鑒》卷204，第6449—6452頁，載于《舊唐書》卷64，第2431—2432頁和卷76，第2661頁以下的諸王的傳記中所舉的細節可以補充這一記載。關于叛亂的后果，見《資治通鑒》卷204，第6457頁。

[[33]](#_33_5)《資治通鑒》卷204，第6451頁。

[[34]](#_34_5)一般認為選擇她的國號為“周”的原因是，它是追贈武后之父第一個封地的名稱。有幾個原因使這個解釋不可能成立。我要感謝谷川道雄，他的《周隋革命本末——周禮國家的悲劇》一文（載《古代文化》，18.5 〔1967年〕，第89—94頁）首先提出了另一種解釋，并且舉了先例。見R.W.L.吉索《武則天的正統性》，為1975年6月在阿西洛馬爾召開的中國歷史正統性會議準備的未發表論文。

[[35]](#_35_5)常盤大定的《武周新字之研究》（載《東方學報》〔東京〕，6 〔1936年〕，第5—42頁）對新字作了充分討論。關于更簡明的敘述，見內藤乾吉《敦煌發見唐職制戶婚廄庫律斷簡》，載《石濱先生古稀紀念東洋學論叢》（大阪，1989年），第339—342頁。

[[36]](#_36_5)關于《大云經》，見矢吹敬輝的明確的研究著作《三階教研究》（東京，1927年），第685—761頁。關于佛寺，見塚本善隆《日中佛教交流史研究》（東京，1944年），第25—31頁。安東尼奧·福特的《七世紀末中國的政治宣傳和意識形態》（那不勒斯，1977年）為一部非常詳盡的研究，并附一切有關文字的完整譯文。又見R.W.L.吉索《武則天的正統性》。

[[37]](#_37_4)《大方等無想經》，載《大正新修大藏經》卷12，第1107頁。

[[38]](#_38_4)關于這一事件的各種佛教和非佛教的記載有許多矛盾說法，見S.溫斯坦在《劍橋中國史》第4卷中的論述。

[[39]](#_39_4)《舊唐書》卷6，第121頁；卷183，第4742頁。

[[40]](#_40_4)《全唐文》卷17，第10頁。

[[41]](#_41_4)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1946年），第14頁；重印于《陳寅格先生論集》（臺北，1971年），第120頁以下。

[[42]](#_42_4)近來中國歷史學家中發生了一次論戰，從中反映了吳澤、袁英光和齊陳駿之間的分歧，礪波護的《隋之貌閱及唐初之食實封》（載《東方學報》〔京都〕，37 〔1966年〕，第154—156頁）對之進行了討論。

[[43]](#_43_4)全漢昇的《唐宋帝國與運河》（上海，1946年）詳細討論了這一問題。

[[44]](#_44_4)《冊府元龜》卷486，第33頁。

[[45]](#_45_4)《資治通鑒》卷205，第6478頁。

[[46]](#_46_4)同上書，第6485頁。

[[47]](#_47_4)《資治通鑒》卷204，第6472頁；菲茨杰拉德：《武后》，第137—138頁。

[[48]](#_48_4)《舊唐書》卷183，第4727—4729頁。武后在665年和666年間已把其異母同胞弟兄及其子放逐。當時，其姐妹之子賀蘭敏之被指定為其父封地的正式繼承人。他在670年失寵和死去后，武后的異母弟兄武元爽之子武承嗣從嶺南流放地召回代替賀蘭敏之，為她父親繼續武家香煙。

[[49]](#_49_4)見《舊唐書》卷183，第4729頁；《唐會要》卷90，第1639—1640頁。

[[50]](#_50_4)《資治通鑒》卷205，第6491頁。這件事很不尋常，因為受害者侯思止是來俊臣的一名親密助手。

[[51]](#_51_4)《資治通鑒》卷205，第6483—6484頁。

[[52]](#_52_4)見戴何都《〈新唐書〉百官志、兵志譯注》，第4頁以后。

[[53]](#_53_4)研究宰相制的最詳盡的著作是周道濟的《漢唐宰相制度》（臺北，1963年）。

[[54]](#_54_4)見趙翼《廿二史劄記》（臺北，1974年）卷19，第415—417頁。

[[55]](#_55_4)《資治通鑒》卷205，第6484頁；《舊唐書》卷87，第2855頁。

[[56]](#_56_4)《資治通鑒》卷206，第6544頁。

[[57]](#_57_4)《資治通鑒》卷211，第6487—6488頁。關于安西都護府，見大谷正直《安西四鎮的建立及其變遷》，載《白鳥博士還歷紀念東洋史論叢》（東京，1925年）；伊瀨仙太郎：《中國西域經營史研究》（東京，1955年），第190—204頁及以后。

[[58]](#_58_4)這些禮儀在菲茨杰拉德的《武后》（第133—134頁）中作了描述。見鐮田茂雄《中國華嚴思想史研究》，第122頁；S.溫斯坦：《唐佛教形成時期帝王的庇護》，載芮沃壽、崔瑞德合編《對唐代的透視》（紐黑文，1973年），第297—306頁。

[[59]](#_59_4)《文獻通考》卷29，第272頁。

[[60]](#_60_4)《臣軌》，見于《叢書集成》卷893。

[[61]](#_61_4)見唐長孺《關于武則天統治末年的浮逃戶》，載《歷史研究》，6（1961年），第90—95頁；內藤乾吉：《西域發見的唐代官文書研究》，載《西域文化研究》，3（1960年），轉載于他的《中國法制史考證》（東京，1963年），第223—345頁。

[[62]](#_62_4)見崔瑞德《對商業課稅的一種儒家觀點；703年的崔融奏疏》，載《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學報》，36.2（1973年），第429—445頁。

[[63]](#_63_4)關于默啜，見勒內·吉羅《突厥帝國：骨咄羅、默啜和默棘連諸汗（680—734年）的統治》（巴黎，1960年），特別是第49頁以后；勒納·格羅塞：《草原帝國》（巴黎，1948年），第155—158頁；諾亞米·沃爾福德的英譯本，第107—110頁。

[[64]](#_64_4)《資治通鑒》卷206，第6539頁。

[[65]](#_65_4)《舊唐書》卷199下，第5350頁。

[[66]](#_66_4)《資治通鑒》卷205，第6505頁。

[[67]](#_67_4)同上書，第6510頁。

[[68]](#_68_4)《資治通鑒》卷206，第6513頁。

[[69]](#_69_4)《舊唐書》卷78，第7頁。

[[70]](#_70_4)關于張氏兄弟的傳記，見《舊唐書》卷78，第2706—2708頁；《新唐書》卷104，第4014—4016頁。

[[71]](#_71_4)《資治通鑒》卷205，第6487頁；卷206，第6539頁。武后與張氏弟兄之間關系的確切性質在同時代的史料中敘述也不完全明確。但《舊唐書》（卷78，第2706—2707頁）所引朱敬則的奏議清楚地說明這種關系是公開的丑聞。

[[72]](#_72_4)《舊唐書》卷78，第2706頁；《資治通鑒》卷206，第6514頁。

[[73]](#_73_4)《資治通鑒》卷206，第6516頁。

[[74]](#_74_4)《資治通鑒》卷206，第6530—6531頁。

[[75]](#_75_4)《資治通鑒》卷206，第6535頁。

[[76]](#_76_4)《資治通鑒》卷206，第6538、6546—6547頁；《舊唐書》卷78，第2706—2707頁。其名稱可能來自武后的信念，即張昌宗是再生的王子晉（即王子喬），后者是道教的神仙，據說他騎白鶴升天。

[[77]](#_77_4)對魏元忠審訊的主要記述載《資治通鑒》卷207，第6563頁以后。菲茨杰拉德的《武后》（第174—177頁）有英譯文。更詳細的情況見各參與者的傳記。

[[78]](#_78_4)這支可追溯至唐朝初期的部隊在622年已被名為御林軍；見《唐六典》卷25，第20頁；戴何都：《〈新唐書〉百官志、兵志譯注》，第556、833—835頁。它的成員一般與皇帝有某種私人關系；從他們的社會排他性看，衛士們似乎已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政治覺悟。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第39頁以后，再版本第143頁以后）提出在玄宗以前他們為什么是每次政變的決定性因素的種種原因。

[[79]](#_79_4)見谷川道雄《從武后末年到玄宗初年的政爭——對貴族制研究的一個看法》，載《東洋史研究》，14.4（1956年），第54—60頁。

[[80]](#_80_4)《舊唐書》卷51，第2171—2172頁；《資治通鑒》卷208，第6584—6585頁。

[[81]](#_81_4)《資治通鑒》卷208，第6608頁，《考異》。

[[82]](#_82_4)《新唐書》卷83，第3651頁；《唐會要》卷90，第1638頁。

[[83]](#_83_4)見仁井田升《唐代的封爵及食封制》，載《東方學報》（東京），10.1（1939年），第1—64頁。

[[84]](#_84_4)見《新唐書》卷118，第4264頁；《文苑英華》卷609，第8—9頁。這一問題以及它與當時其他弊病（如雇用大量員外）的關系，在礪波護的《隋之貌閱及唐初之食實封》（第165—178頁）中有簡明的論述。

[[85]](#_85_4)《唐會要》卷5，第51頁；《新唐書》卷83，第3650頁。

[[86]](#_86_4)一個公主只有資格設立一個管理其實封收入的機構。王公不但有大得多的實封管理機構，而且有一批老師、一個大的王府管理機構和一大批個人護衛及宮廷禁衛。見戴何都《〈新唐書〉百官志、兵志譯注》，第629—645頁。

[[87]](#_87_4)《資治通鑒》卷208，第6601頁。關于員外官，任命的確切性質現在仍是一個問題。礪波護在《隋之貌閱及唐初之食實封》第172頁以后已對不同的論點進行了討論。

[[88]](#_88_4)《資治通鑒》卷208，第6601頁。此信為其他情況不詳的官員袁楚客所寫。

[[89]](#_89_4)這些弊端及文中隨即談到的弊病，在《資治通鑒》（卷209，第6623—6625頁）中有詳細的描述。看來，任命斜封官的證書沒有通過門下省和中書省，見《資治通鑒》卷209，第6625頁。關于對佛教建筑的贊助，見雅克·熱內《五到十世紀中國社會中佛教的經濟面貌》（西貢，1956年），第281頁。

[[90]](#_90_4)《資治通鑒》卷209，第6622頁。

[[91]](#_91_4)《舊唐書》卷88，第2870頁。這份在709年春遞呈的奏疏全文載于《全唐文》卷236，第6—8頁。

[[92]](#_92_4)《資治通鑒》卷209，第6624頁；《舊唐書》卷101，第3155頁。

[[93]](#_93_4)《資治通鑒》卷209，第6633頁。

[[94]](#_94_4)《資治通鑒》卷209，第6641—6642頁；《舊唐書》卷51，第2174頁。

[[95]](#_95_4)見第三章H.J.韋克斯勒的論述。

[[96]](#_96_3)《資治通鑒》卷209，第6651頁。

[[97]](#_97_3)同上書，第6652頁。

[[98]](#_98_3)《資治通鑒》卷210，第6664頁。

[[99]](#_99_3)同上書，第6682頁。

[[100]](#_100_3)見袁樞《通鑒紀事本末》（國學集體叢書本），第178頁。

[[101]](#_101_3)關于這一問題的清楚明了的討論，見白樂日《作為功利主義官僚的指南的歷史》，載W.G.比斯利、浦立本合編《中國和日本的歷史學家》（倫敦，1961年），第78—94頁；芮沃壽編：《中國的文明和官僚》（紐黑文，1964年），第129—149頁有此文的英譯文。

[[102]](#_102_3)見陳登原《國史舊聞》（北京，1958年），第117頁以后；岑仲勉的《隋唐史》（北京，1957年）在第181頁以后論述了各種考試的聲望。

[[103]](#_103_3)所有的“新”官員，甚至那些被任命擔任朝廷最受尊敬和最負責的“清望”官職的人，絕不是都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見《唐會要》卷67，第1131頁。

[[104]](#_104_2)《通典》卷17，第94頁。

[[105]](#_105_2)例如見中川學《唐宋客戶研究》，載《東洋學報》，46.2（1963年），第97—110頁。

[[106]](#_106_2)關于府兵部隊的分布，見菊池英夫《關于唐折沖府分布問題的一個解釋》，載《東洋史研究》，27.2（1968年），第1—31頁。浦立本著《安祿山之亂的背景》有府兵分布的地圖。一般地說，華中、華南和東部平原的部分地區沒有府兵的負擔。

[[107]](#_107_2)武后得人心的上述這些跡象被郭沫若著《武則天》（第135—137頁和154—155頁）所引。郭沫若企圖證明武后生在四川，比傳統的日期晚幾年，但說服力不強。

[[108]](#_108_2)見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大阪，1967年），第78頁以后。

# 第七章 玄宗（712—756年在位）

唐代諸君主中在位期最長的玄宗帝是一位非常能干的統治者，王朝經過了幾十年的篡位、權力衰落和政治腐敗的苦難，他又使它的力量達到了新的高峰。[[1]](#_1_Zhe_Yi_Zhang_Bu_Duan_De_Yi_Yu)對生活在他退位以后苦難動蕩的幾十年的中國人來說，他的執政期代表著一個已失去光輝的黃金時代，一個政績彪炳、安定繁榮和在國內外同樣取得成就的時期。但是他的統治以悲劇和災難告終，這一結局主要是他自己的一些幾乎摧毀這個王朝的行動和政策所造成。對在8世紀50年代后期撰寫玄宗期歷史的歷史學者來說，他是一個悲劇中的英雄，他在執政開始時政績顯赫，但后來被野心和狂妄引入歧途，以致帝國的行政和資源過分緊張，最后以退出政務來結束他支離破碎的統治。[[2]](#_2_Cui_Rui_De____Liu_Fang__Yi_We)

但所有學者都認為，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統治者，他給當時的歷史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此外，他多才多藝：他精于音律、詩文和書法，是許多藝術家和作家的庇護人。他還精通道家哲學，成了道教的主要保護人；盡管他早期的措施對佛教組織不利，但后來仍深深地沉溺于密宗佛教。作為一個普通人，他似乎與弟兄和家屬都有很深的情誼，甚至他執政時期的正式記載，也把他描繪成一個十分親切、體貼臣屬和直率多情的人。就在他去世的一代時間中，出現了大量與他名字有關的半傳奇故事和民間傳說，而他對楊貴妃的那種招致不幸和災難的感情成了中國文學中一大悲劇主題和無數詩詞、小說和戲劇的內容。

但他出生時并無任何繼承大統的指望。[[3]](#_3_Guan_Yu_Xuan_Zong_De_Zao_Qi_S)李隆基在685年生于洛陽，為睿宗之第三子；他的父親名為皇帝，實為傀儡，宮廷被令人生畏的武后所支配和操縱。李隆基的生母為竇氏皇后，出身于7世紀唐宮廷中權勢很大的家族，又是睿宗的妃子。按慣例，李隆基在687年被封為楚王，由于他為人直率，受到武后的寵愛，但他的處境很快就惡化。688年爆發的李氏諸王的叛亂引起了針對皇族的一系列清洗，690年武后出于自己的利益，誘使傀儡皇帝睿宗退位而自己稱帝，改國號為周。

睿宗及其諸子實際上被幽禁宮內，與世隔絕。693年初期，兩名私自朝見被廢黜之帝的高級官員因這種魯莽行動被公開處決，[[4]](#_4___Jiu_Tang_Shu____Juan_6_Di_1)同年年末，睿宗的劉后和隆基的生母竇妃——兩個人都出身于極有權勢的家族——被武后以勾結術士，陰謀用巫術謀害她的捏造的罪名斷然處死。[[5]](#_5___Jiu_Tang_Shu____Juan_51_Di)李隆基及其弟兄都被貶爵，受到苛刻的待遇。高宗留下的長孫，即與他們同時被囚禁的李守禮，經過了半個世紀仍患有屢次挨打的后遺癥。[[6]](#_6___Jiu_Tang_Shu____Juan_86_Di)

698年，武后最后決定在她賓天之后皇位歸回李氏家族。684年在位不到兩月就被廢黜而讓位于睿宗的遜帝中宗被指定為皇儲，睿宗及其子女由于這時已更不可能繼位，就被解除監禁。最初他們得到一座洛陽的王府，701年又遷往長安東部興慶坊的巨宅。在8世紀的初年，李隆基歷任右衛郎將和尚輦奉御。

705年，年邁的武后終于被廢，中宗即位。李隆基任衛尉少卿，負責管理京師的軍械。708年，他任山西東南戰略要沖潞州的別駕后，仍保持衛尉少卿的職務，這一定使他在長安的兵員中擁有相當的勢力。中宗時的政治局勢非常緊張和動蕩不安。皇帝是通過政變掌權的；707年，中宗的三子李重俊曾發動一次未遂的叛亂；政治權力又落到宮內的韋后及其女兒安樂公主之手，在她們的把持下，貪污腐化、裙帶關系和任人唯親之風盛行。政治失修，怨聲載道。

710年李隆基及諸王被召至京師參加為全國大赦舉行的南郊大祭。這時他為了積極參與政治，開始吸引隨行的學者和官員。他在京師和潞州的有些追隨者開始認為他可能有九五之貴。[[7]](#_7___Jiu_Tang_Shu____Juan_8_Di_1)

他的機會來臨之快遠遠出于他的預料。710年陰歷六月，韋后由于擔心她的地位受威脅，將中宗毒死，并偽造遺詔指定他最小的第四子李重茂繼位。韋后以皇太后之尊主政。為了確保她的地位，她下令動員5萬大軍防衛京師，由其兄長韋溫指揮，同時她的幾個堅定的支持者被派往關鍵的關中、河北和河南諸道進行控制。[[8]](#_8___Jiu_Tang_Shu____Juan_7_Di_1)

在中宗生前，反對韋后的主要力量來自前帝睿宗及其令人生畏的姐妹、武后之女太平公主。韋后此時企圖任命睿宗為宰相，以爭取他為自己效勞。總之，他是一個萎靡不振和胸無大志的人，不可能主動采取行動。但太平公主卻繼承了她母親的堅強性格，此時正策劃一個陰謀，為了防止失敗，她故意瞞著睿宗進行。在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簡、佛僧普潤、一名控制京師外戰略要地朝邑縣的默默無聞的官員劉幽求以及禁軍中三名中級將領的協助下，李隆基組織了這次政變。在710年陰歷六月十二日夜，即韋后立年幼的李重茂為帝之后的第十六天，李隆基及禁軍將領率北軍中一支分隊通過御苑進入宮內，御苑總監鐘紹京率他的匠人也參加這一行動。軍隊涌進玄武門，殺死了韋后、安樂公主和韋黨的主要成員。其余的人在以后幾天問斬。政變一旦大功告成，睿宗立刻得知，第二天他正式登基。[[9]](#_9___Jiu_Tang_Shu____Juan_8_Di_1)

李隆基被封新王爵并被任命為宰相，他的密謀同伙劉幽求和鐘紹京也得到封賞。這時朝廷開始了解決政治問題的工作。這方面最突出的也許是立儲問題；陰歷六月二十七日李隆基正式被指定為太子，這主要是因為他領導了這次政變。他的兄長李成器本來是當然的法定繼承者，卻把這一權利拱手讓給了李隆基。[[10]](#_10___Jiu_Tang_Shu____Juan_95_Di)

事實證明睿宗是一個無能的君主，主持朝政時優柔寡斷，而左右朝廷人物則是皇太子和太平公主。睿宗對他們言聽計從，在他作出任何決斷前，常問他的大臣是否已與他們商討過。希望像她母親那樣控制朝廷的太平公主很快發現皇太子是一個有力的對手，于是經常企圖削弱他的勢力。

但在睿宗執政的最初幾個月，皇太子保持著更強大的地位。710年陰歷七月中，中宗時期留下的宰相中除了韋安石和蘇瓌外，其余的人都與韋后發動政變后她任命的大臣一起被貶逐到地方任職。[[11]](#_1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他們被一個新的集團代替，其中薛稷[[12]](#_12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和崔日用[[13]](#_13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不久被解職，因為他們經常公然與朝廷意見不合。活躍在宮廷的另外兩個領袖人物為姚元之（后改名為人們通常所稱呼的姚崇）和宋璟，他們在玄宗執政的最初幾年成了左右政務的大臣。

姚崇[[14]](#_14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651—721年）在677年通過殿試后開始了官場生活，并且擔任過一系列軍職。在契丹入侵河北時，他的行動得到武后的賞識，于是被任命為兵部侍郎，后在698年任宰相。在武后于705年喪失權力前，除了短期負責前睿宗王府的事務外，他一直擔任宰相。他曾參與清除張氏弟兄的政變，對武后的下臺深感懊喪，因為他曾長期效忠于她。在中宗時期，他擔任過幾種不同的地方職務。

宋璟[[15]](#_15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663—737年）具有一個有成就的儒家士大夫所特有的生涯。他為河北一個低級官員之子，在679年或680年通過進士考試，時年僅16歲，因而贏得了文才出眾和善于寫作的名聲。他通過御史臺轉任中書省的舍人。他以剛直不阿著稱，武后對他的能力評價甚高。在武后朝末年他任御史中丞，參與過企圖彈劾張氏弟兄的活動，二張為了報復，曾企圖刺殺他。中宗執政之初對他恩寵有加，擔任過黃門侍郎之職，但他后來與武三思不和，被調到地方任各種要職。

姚崇和宋璟因此是兩個互相取長補短的人物，一個是務實的政治家，善于處理實際事務；另一個是嚴格掌握原則和清廉正直的人，具有堪為道德楷模的真正品質。睿宗朝廷需要這兩種人的品質。這兩位大臣通過打擊前朝最嚴重的弊病之一和取消武后及安樂公主作出的一切冗濫任命，開始了他們的一項改革計劃。此舉引起了一陣騷亂，因為幾千名官員——其中許多人是付了現錢才得到晉升的——發現自己被剝奪了官職。在年末宋璟主持選拔文官和姚崇選拔武將的考試中，他們清除官場無能之輩的意圖變得更明顯了，當時有資格出任官職的人數達萬余人，但除了2000人之外全部落選。

在他們當權時，睿宗的皇位仍不完全安全，陰歷八月，他不得不鎮壓由中宗次子譙王李重福發動的起事；后者在李隆基的政變成功時，也曾策劃反韋后的叛亂。李重福的起事只吸引了很少的支持者，并毫不費力地被平定了，但他作為中宗的合法嗣子本來有充分的權利繼位。[[16]](#_16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這一事件突出地說明皇族在繼承皇位爭端中的地位并不是牢固的。

睿宗皇位的不安全是太平公主蓄意造成的，她此時正在開始堅持皇太子之兄李成器的權利。幸運的是，諸王之間的手足之情極深，因為在睿宗復位后，皇太子的四個弟兄都受權統率宮內各禁軍，禁軍幾乎與唐代的所有政變有牽連，因此能夠以武力來影響皇位繼承的改變。在711年初期，姚崇和宋璟知道睿宗的長子李成器和高宗留下的長孫李守禮都比皇太子有更充分的理由繼承皇位，于是就勸諫睿宗應把他們派往地方任職，以挫敗太平公主的陰謀；另外二王應指揮皇太子自己的禁衛；太平公主夫婦應遠離朝廷，前往東都。睿宗同意把諸王從禁軍的崗位上撤下來，但拒絕將公主放逐到洛陽。[[17]](#_1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此時一個甚至更極端的措施被提了出來。皇帝一貫輕信，為人又迷信，他被術士預言武裝政變迫在眉睫的警告弄得惶恐不安，于是就問大臣們采取什么措施來防止這一政變。張說在姚崇的支持下，提出應由皇太子監國。二月初二，皇太子奉命監國；他有權決定六品以下官員的任命和勞役以下的一切懲處。[[18]](#_18___Jiu_Tang_Shu____Juan_7_Di)

太平公主這時被迫行動。兩名官員——其中一人來自太子宮內——經過利誘，起來反對取消韋后和安樂公主授予的一切冗濫任命，理由是這對先帝的錯誤將是公開的詆毀，他們還提請注意，由此已引起動蕩不安。太平公主為他們的呼吁推波助瀾，而意志一貫薄弱的睿宗終于讓步。陰歷初九，姚崇和宋璟被解職和調往外地。他們的改革企圖和皇太子對宮廷的控制到此結束。[[19]](#_19___Jiu_Tang_Shu____Juan_7_Di)

在711年的大部分時期中，朝廷被韋安石[[20]](#_20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651—714年）所左右，此人與韋后同族，考取過明經，從700年起任武后的宰相，直至她交出政權時為止。中宗登基之后，他除了短期被免職以外，繼續任宰相直至706年。然后他失寵，但在709年陰歷八月又被任命為門下侍中。韋后政變期間他繼續留任，然后退休擔任太子少保，直至710年末。他堅定地抵制太平公主爭取他支持的一切企圖。

這幾個月的第二個宰相為李日知[[21]](#_21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715年），此人為洛陽地區的進士，他官場生涯的大部分時間從事司法工作，在武后清洗的最可怕的日子中贏得了公正仁慈的名聲。在中宗執政的末期任黃門侍郎，韋后則任命他為宰相，在710年全年留任，大部分時間還兼任御史大夫。

三名特任宰相在他們的手下工作：張說[[22]](#_22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667—730年），689年殿試及第，出身于洛陽的一個小官員家庭。他在武后時擔任過幾個朝廷的官職，在他卷入張氏弟兄反對魏元忠的轟動一時的事件時，他已升為鳳閣舍人。由于拒絕作不利于魏元忠的偽證，他被放逐至嶺南。他被中宗召回，升任兵部侍郎兼修文館學士，修文館是門下省中擁有文學專才的機構，負責編纂和起草國家文獻。郭元振[[23]](#_23_Qi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656—713年）是河北人，在太學攻讀后18歲中進士，后來當上宰相的薛稷和趙彥昭就是他的太學同窗。他在任第一個職務時就深深地陷入困境，但武后被他的外表和能力所動，就派他出使吐蕃。他在吐蕃邊境和中亞任總管，享有盛名。睿宗即位后他被召回，受命作防御突厥人的準備。任命他是沿襲了武后和中宗時的做法，即在他們的宰相中包括一名資深的軍事將領。第三人與前兩個人迥然不同。竇懷貞[[24]](#_24_Qi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713年）是宰相竇得玄（663—666年任職）之子，出身于最高貴的氏族之一。他靠庇蔭出仕，在整個武后執政時期在地方任職，贏得優秀行政官員的名聲。705年他被召至朝廷，出任御史大夫。他因阿諛奉承和受安樂公主之寵而臭名遠揚。韋黨垮臺，他被流放至地方，但不久就被召回當了殿中省監。這時他一心迎合太平公主，在任宰相時，每天從朝廷前往公主府，向她報告議政內容和刺探她的意愿。

這個班子除了韋安石外，一般都按照太平公主的利益行事，所以姚崇和宋璟實施的官僚集團的改革很快就被破壞無遺，盡管朝廷有人提出異議。圍繞皇太子和李成器的勾心斗角繼續展開，后者的女兒被封為公主，準備與東突厥可汗默啜進行王朝聯姻。陰歷四月，睿宗向朝廷卿相宣布，他希望讓位給皇太子，但太平公主的黨羽之一則勸他說，禪位為時過早。但詔書終于頒布，它規定皇太子要參與所有最高國務的討論。

但皇太子仍處于對手們的強大壓力之下，在陰歷五月，他甚至提出將位置讓給李成器，并要求睿宗把太平公主召回長安。

睿宗和太平公主此時都很關心宗教，公主對佛僧慧范十分敬重，慧范利用她的庇護，大量盜竊和侵吞財產。當御史大夫揭發慧范時，公主就把這個御史貶至州里任職。[[25]](#_25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同時，睿宗的兩個姐妹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和他一樣是道教的虔誠的信徒，并成了女道士，睿宗開始為她們在長安西北部緊靠后宮之處建造兩座豪華的道觀。散騎常侍魏知古和中書侍郎李又對工程毀滅房屋和浪費大量勞力之事提出異議。除了皇后的寵臣和指揮工匠勞動力的竇懷貞外，所有大臣都反對這一計劃。但睿宗我行我素，完成了這兩項工程。[[26]](#_26___Xin_Tang_Shu____Juan_83_Di)

這一時期唯一有積極意義的政策是進行地方政府的改革。按察使巡察的道，全國分為15個，以代替原來的10個。同時它還計劃設置新的一級地方行政，即一個區域所有的州均歸都督管轄，全國設24個都督。但這些改革遭到反對而取消，因為新都督會擁有帶危險性的權力，朝廷不可能進行控制。[[27]](#_2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

到711年陰歷九月，甚至皇帝也知道了宰相們的缺陷。他召集他們，以帝國的狀況——受旱澇災害打擊、庫藏空虛、官僚機器又日益膨脹——為由，把他們痛斥了一頓，并把他們全部罷相，但他們仍在中央官署中擔任要職。

四名新宰相被任命了。新門下中丞為劉幽求，他曾參與推翻韋后的密謀。在此以前他與姚崇和宋璟一起，擔任了短時期的宰相，此后先后擔任戶部尚書和吏部尚書，在吏部任職時，他要為新涌現的浪潮一般的不正當和不適宜的任命負責。他的同僚為魏知古、陸象先和崔湜；在新的一年，即睿宗改新年號以表示改變政體以后，又增加了岑羲和竇懷貞，后者可能由于太平公主的堅持而被重新任命，以充當她的代理人。

魏知古[[28]](#_28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_1)（647—715年）為河北人，約在686年中進士。他通過在宮廷任職，在8世紀初武后時期升為門下省侍郎，后來在尉衛寺任少卿（未來的玄宗皇帝也在這里任職），同時兼任睿宗王府的司馬，這樣他就在其早期生涯中與皇帝和皇太子有了接觸。中宗即位之初他任吏部侍郎，他在吏部因薦舉有才之士而享有盛名。706年，他因丁母憂退隱，后來擔任州官。711年，他遷任散騎常侍，在列舉當時許多迫切問題——特別是帝國的財政困難——的兩份措辭尖銳的奏疏中，激烈抨擊睿宗為其姐妹建造道觀。睿宗對他關于建造道觀的抨擊置若罔聞，但在任命他為宰相后，又命他兼戶部尚書和左庶子。在一個充斥政敵的政府中，他一直是皇太子堅定的支持者。

陸象先[[29]](#_29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665—736年）為南方蘇州望族的成員，他的父親從663—665年曾作過武后的宰相。在武后時，他由殿試出仕，然后在朝歷任清要之職，快到中宗執政的末期，他升為中書侍郎。

崔湜[[30]](#_30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_1)（671—713年）出身于河北望族，為太宗朝著名官員和在648年一度任宰相的崔仁師之孫。他在699年中進士，年輕時就以著述享有盛名，在中宗朝初期升為考功員外郎。他參與了桓彥范、張柬之和其他大臣清除武三思的密謀。但崔湜向企圖消滅的對象出賣了這些密謀者，706年當他們被逐出京師時，他還布置他表兄周利貞去殺害他們。崔湜此時成了武后的女官上官婉兒的面首，因而臭名遠揚；在中宗朝內，他與上官婉兒和安樂公主緊密勾結。由于她們的影響，他升至中書省侍郎和吏部侍郎；他與同僚鄭愔一起賄賂公行，致使任命制度成了一時的丑聞。他終于被彈劾罷官，但幾乎立刻被召進京，任尚書左丞。韋后掌權后他任宰相，但在睿宗登位后被罷官。他此時成為太平公主的追隨者。由于她的活動，盡管他有不光彩的歷史，但仍被任命為宰相。現在，他把一切政務都秘密通報公主。

712年正月增加的兩個大臣，一個是同樣可鄙的竇懷貞，另一個是岑羲，[[31]](#_31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_1)后者是太宗朝著名官員岑文本之孫。他原籍河南西南部，本人為進士，在武后執政的末期升至中書令。中宗時他在吏部任職，在這一貪污腐化溫床中，他以一塵不染知名于世。韋后曾任命他為宰相，但當睿宗登基后，他被派出任州刺史，后來又任戶部尚書。

太平公主這時占有強有力的政治地位，但朝廷的總的形勢正在惡化。外患即將來臨。劉幽求以一名新都督代替帶兵保持東北邊境的安寧達20年之久的薛訥，從而帶來了災難，因為新都督立刻投入了對契丹和奚的一次毫無必要的遠征，結果戰敗，自己也喪生。四川的土著發動叛亂。與突厥可汗的和親未能實現。睿宗無意執政的情緒日趨明顯，最后決定讓位于皇太子，這是712年陰歷七月一顆不祥的彗星的出現促成的。

雖然太平公主企圖勸阻，皇太子也試圖促使他重新考慮，但決定不可能改變。他的兒子玄宗在陰歷八月初三正式即位，并舉行應有的儀式：定新年號為先天，立其妻王氏為后，進行大赦。但睿宗雖然正式退位，太平公主卻誘使他極不正常地保持大權。雖然玄宗此時作為新帝要每日主持朝政，睿宗依然是太上皇，每五日就親自上朝，自己保留任命全部三品以上高官的大權，并決斷最重大的案件和政務。[[32]](#_32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

新帝和太平公主之間的形勢這時是嚴重的。朝廷中大部分的大臣是她的追隨者。劉幽求得到玄宗的批準，這時與皇宮禁軍的將領之一策劃刺殺公主的陰謀。但事情敗露，劉幽求被捕，發配嶺南，崔湜在那里試圖把他殺害；盡管劉幽求在710年救過崔的性命，但兩個人的關系這時不好。[[33]](#_33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

713年陰歷正月，東北的軍事形勢又突然惡化，玄宗御駕親征的安排已經就緒，邊境也已集結大軍。但結果他未成行，這也許是宮廷的政治形勢使他不可能離開。[[34]](#_3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同月，隨著蕭至忠被任命為宰相，他的地位更加不利。蕭至忠[[35]](#_35___Xin_Tang_Shu____Juan_5_Di)（？—713年）出身于山東東南部的一個名宦門第，在武后的朝廷曾經顯赫一時。在中宗時，由于他的家族與韋后的家族有密切的姻親關系，他享有特殊的恩寵。在任吏部侍郎后，他在707年成為宰相，直至710年韋后政體垮臺時為止；710年他之得以逃避懲處，主要是由于太平公主的說情。出乎他朋友意料的是，他這時成了公主的得力的黨羽。

太平公主現在通過她的同胞手足太上皇，已能操縱重大事務和影響重要的任命，并得到了大部分宰臣和朝廷大部人員的支持。713年陰歷六月，她、竇懷貞、岑羲、崔湜、蕭至忠、當時為玄宗宮府官員的前宰相薛稷、京兆少尹、宮內禁軍的幾個將領及她寵愛的佛僧慧范密謀毒害玄宗，然后公開取得政權。但是，其他因公主權勢日增而驚慌不安的官員勸玄宗現在必須采取果敢行動。當魏知古透露公主正在策劃叛亂時，玄宗與他兩個兄弟李范和李業及一批心腹決定先發制人和殺死密謀者。陰歷八月初九，[[36]](#_36_Ju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 300名經精心挑選的精兵在原為玄宗的私人奴仆王毛仲將軍率領下逮捕了密謀者。蕭至忠、岑羲和幾個從犯被就地正法。竇懷貞自盡。薛稷和崔湜被賜死。公主逃入一寺院，但三天后投降，獲準自盡。她的幾個兒子全被處死，只有薛崇簡除外，因為他曾幾次勸阻公主策劃陰謀。沒收公主在有權勢時多年積累的大量財富和財產的工作花了幾年時間才完成。[[37]](#_3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次日，即713年陰歷七月初四，睿宗正式放棄了他剩下的權力。[[38]](#_38_Tui_Wei_Zhao_Shu_Jian___Jiu)

玄宗這時成了名實相符的君主。他只有28歲，自發動反韋后政變以來經歷了陰險的政治陰謀和不斷斗爭的3年，成了他統治時期政治史中不可分割的序幕，并對他的國事處理具有持久的影響。

## 玄宗在位初期（713—720年）：姚崇和宋璟

隨著太平公主之死，所有的宰相除了魏知古外，或被處死，或被迫自盡。玄宗任命郭元振和張說來代替這些人。郭曾為活躍的密謀分子之一，張為鼓動玄宗進行打擊的大臣之一。陰歷九月，劉幽求成為第四個宰相。然而這個班子是短命的。陰歷十月，皇帝命令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但演習未按計劃進行。郭元振負有責任，因此被流配嶺南，只是因為張說和劉幽求的求情，他在夏季才沒有被處死。[[39]](#_39___Jiu_Tang_Shu____Juan_97_Di)

玄宗這時召見姚崇——他是710年試圖進行改革的帶頭人并提出了廣泛的改革計劃（下面將另予討論）——并任命他為宰相和兵部尚書，代替那個倒霉的郭元振。張說與姚崇一直不和，所以反對對他的任命。為了避免勢必發生的不和，玄宗就將張解職，在713年年末派他到地方任職，同時又調劉幽求擔任一個閑職。他們被盧懷慎[[40]](#_40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716年）代替，盧為門下侍郎，是河北一個大族的成員，曾中進士，擔任過武后和中宗時期的御史。姚崇對前一政權的唯一遺老魏知古的才能評價不高，所以在714年陰歷五月設法解除了魏的職務，把他調到工部。[[41]](#_41___Jiu_Tang_Shu____Juan_98_Di)

現在只有兩個宰相，其中姚崇無疑是處于支配地位的人物。[[42]](#_42___Jiu_Tang_Shu____Juan_96_Di)盧懷慎對他完全唯命是從。這些就確定了在玄宗在位期間一直實行的一種新的施政形式：只用為數甚少的宰相，通常只有兩三人，其中一人在制定政策時起決定性作用。宰相們通常留任幾年，以前幾十年所特有的任期經常變化和不穩定的情況這時已成過去。姚崇和盧懷慎一直掌權到716年年末，這時盧病故。他被源乾曜[[43]](#_43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731年）短期替代；源為河北的進士，是拓跋魏皇室遠支的后裔，在中宗時任御史，710年以來在地方歷任要職。713年，他被玄宗的寵臣姜皎薦舉，在尚書省擔任很高的職位。然而幾乎不久，姚崇本人也患病，在716年陰歷十二月被迫去仕。[[44]](#_44___Jiu_Tang_Shu____Juan_96_Di)在721年死亡前，他在朝廷仍有很大的影響，玄宗常征求他的意見，但在制定政策時他未進一步起積極作用。[[45]](#_45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2)

他薦舉宋璟繼承他的職位。宋璟在710年任宰相時是他的同僚同時又任廣州都督。宋璟是一個可以指望采用基本相同的政策的人。716年末，宋璟和門下侍郎蘇颋[[46]](#_46___Jiu_Tang_Shu____Juan_96_Di)（670—727年）接替姚崇和源乾曜任宰相。蘇颋為做過中宗和睿宗時期宰相的蘇瓌之子。他中進士并通過殿試，以精于著作和學識淵博著稱。在武后時期他當過御史，后任門下省和中書省舍人。玄宗命他歷任宮廷要職，并委任他起草和撰寫帝國的文獻。宋璟，如同他之前的姚崇，是占支配地位的大臣。他是一個原則性很強和果斷的人，負責制定政策，而蘇颋則具有使他的計劃以最有效的形式落實的才能和經驗。他們擔任宰相一直到720年，他們的免職標志著玄宗朝第一階段的結束。[[47]](#_47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

雖然這些年與睿宗在位的不穩定時期和玄宗第一年大臣頻繁更替、黨派尖銳對立之時很不相同，但它們在人事方面有明顯的延續性。從710—720年，每個有相當地位的宰相都經過科舉，通常中過進士或通過殿試。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世代官宦，但不是最大的豪門世族；大部分人來自武后時期政治權力中心的洛陽地區或河北、河南。他們都在武后時期初涉仕途，大部分在朝廷供職，特別在御史臺供職的多。只有一次，在710年政變后不久，一個圈外人士得到任命，他就是密謀分子之一的鐘紹京，被任命為宰相。但他不多幾天就被免職，因為同僚們提出異議，說他原為胥吏出身，不宜任此職。

他們大部分是杰出的學者和優秀的行政官員。只有崔湜和竇懷貞被中宗時期朝廷的腐敗嚴重污染。睿宗的大臣大部分雖然缺乏創見，卻是值得尊重的人，不過在他們為之效忠的朝廷中，皇帝簡直沒有權威，不能提供領導，他們自己的任期也朝不保夕，政治又不斷受到皇親國戚及寵臣們的干擾，所以他們是難以有所作為的。姚崇和宋璟的經歷和背景完全相同，他們有幸在一個堅強果敢而且愿意給他們更大權力和行動自由的皇帝手下秉政。玄宗初期高級官僚的狀況反映了武后善于發現人才的一大功勞，同時又說明她的科舉制度已經選拔了一批有才能的官僚精英。玄宗現在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就是通過這些人進行的。

### 政府的政策（714—720年）

713年末，姚崇任長安以東的重要的同州刺史。當時正奉命舉行大軍事操練，方圓300里的刺史按例都應出席，但玄宗仍專門召喚姚崇。玄宗和姚崇一起騎馬打獵，然后討論政治。他問姚崇是否愿出任宰相。姚崇答復說，除非玄宗接受十條改革綱領，否則就難以從命。綱領的內容是：皇帝應以仁愛治天下而不是靠嚴刑峻法的威懾力量；不進行軍事冒險；行使法律應不論親疏，同樣嚴厲；禁止宦官參政；禁止開征苛捐雜稅來取寵于皇帝；禁止任命皇親國戚在中央政府任職；樹立皇帝以前因與大臣們關系過分親密而受損的個人權威；容許大臣們直諫而不用擔心專橫的懲處；停止建造佛寺道觀；清除外戚過分的政治權力。玄宗同意，姚崇接受任命。[[48]](#_4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714年玄宗面臨的重大政治問題在睿宗時早就明顯地出現了，姚崇所提的十條建議在前10年已出現在其他許多奏議之中，但他現在是在皇帝的地位開始強大得足以能設想進行這樣一次全面改革之際有說服力地向玄宗提出的。不是每一條都能立刻實行，但總的說714—720年的政策都來源于他的建議。

姚崇所提的這些制度上的改革旨在在一個強有力的君主和他的朝廷之間創造一種更健康的關系，如果他的政權要得到最杰出的政治家的支持，這種關系是必不可少的。在武后執政時期，特別在7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宮廷政治中獨斷專行、官員職務不穩定和惶恐不安的情況有所發展。隨之而來的中宗的宮廷政治也同樣獨斷專行和不穩定，當時的局勢由于貪污腐化和裙帶風盛行而進一步惡化了。現在人們普遍感到擺脫了迷惘，并且向往變化和懷念太宗的盛世之治。這種向往唐朝“中興”和向往它的政策在道義上得到振興的情緒成了這一時期奏疏中經常出現的主題，促使史官吳兢（他因政客的不斷干擾而不能完成編纂武后實錄的任務）轉而撰寫《貞觀政要》，此書是把太宗皇帝所作所為多少理想化了的記載，從而成了烏托邦式理想統治的著名范本。[[49]](#_49_Guan_Yu___Zhen_Guan_Zheng_Ya)幾乎毋庸置疑，吳兢撰寫此書，并不是單純地歌頌作為君主的太宗之美德，而是把它作為振興政權的范本，使皇帝的權威不容反抗，但君臣之間又能推心置腹，相互信任，共謀國是。

在這一方面，714—720年的改革是緊緊地遵照姚崇的建議進行的。皇帝的權威和行政的穩定恢復了。原來風紀蕩然的吏治現在重建了團結精神，廣泛的制度變革工作已開始進行。

### 中央政府的改革

玄宗以前幾代君主朝政不穩定的主要原因是宰相太多，其中許多人的任期又很短。在唐初，宰相有兩類。中書令、門下侍中和尚書省仆射為當然宰相，如果所設之職全部有人擔任，共6人。此外，其他高級大臣、在戰時偶爾還有突出的將領，也可能任特任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中宗和睿宗時期，這樣的任命為數很多，其中許多人的任期只有幾個月。在韋后當權的短暫時期，同時任職的宰相人數不少于17人，如果要有效地處理政務，這個班子是龐大臃腫的。

削減人數的步驟在睿宗時期已經開始進行。到710年末人數減到6人，到睿宗執政時又減到4人。713年玄宗總攬政務后人數又從4人進一步減到2人，其中一人為當然的宰相。

人數的這一減少又伴隨著重大的形式變化。在7世紀的最后25年，中央執政的主要機構尚書省的地位已經逐漸下降。到武后朝末期，授予尚書省仆射同平章事所擁有這個或那個頭銜的做法已成慣例。在711年，這一通例已被正式規定，從此除非有特別任命，仆射不再是宰相。713年末，這一規定又被重申，仆射稱丞相。[[50]](#_5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

此外，由當然宰相擔任的高級職務空缺的現象變得普遍了。例如，714—724年，無尚書省仆射，而在714—720年，門下侍中和中書令從未同時在職，所以只有首席宰相依據職權任其中一職，而由另一宰相任另一省的副職。

這一情況導致門下省和中書省職能的逐漸合并。它們逐漸變成一個協調的組織，既負責制定和起草政策，又負責法規的檢查和復審。它還充當一小批與皇帝一起負責重大決策的宰相的秘書處。總之，權力穩步地集中于宰相們，特別是集中在德高望重的宰相之手。

根據宋璟的建議，在717年陰歷十月實行的另一個重要措施是試圖恢復公開處理朝政的做法。在武后時期，許多事情都在私下解決，尤其是御史們有權避開負責保存記錄的起居注史官進行秘密彈劾。這種做法現在被禁止，除了機密之事外，一切事務的處理都在朝廷公開進行，并由史官予以記錄。[[51]](#_5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2)

進一步的重大變化是御史臺的改組。自684年以來，掌肅正行政的御史臺已分成兩部分，一部分負責中央政府的官員，另一部分負責在地方任職的官員。這一情況反映了在官僚體制內部兩部分精英集團的界線日益明顯的傾向。一部分幾乎只在京師任職，其中包括許多通過科舉進入仕途的人；另一部分則在地方任職，而且任期往往很長。在713年，這一界線不復存在，御史臺被改組成單一的機構，如同唐初。御史臺的這一改組標志著試圖系統地重新統一官僚機器的活動的開始。[[52]](#_52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

### 官員的選拔

如果企圖恢復官僚集團的效率和風紀，就必須先處理官員選拔的問題。[[53]](#_53_Jian_Pei_Nei_Luo_Pu__He_Bo_T)事實上，存在兩個關系很密切的問題。較直接的一個問題是消除中宗朝因受賄而任命大批冗員所造成的危害。除了這些人不適宜擔任高級職務外，他們的任命——大部分人任京師的高級職務——使中央政府龐大臃腫，給支付官俸的當局添加巨大的財政負擔。這些額外的任命還影響了另一個也許是更嚴重的問題：擴大了京師和地方官員之間的巨大鴻溝，從而危及自隋以來所定官員可在京內外互調而擔任品位相當職務的原則。在武后時期，對中舉士子的日益重視，使得有前途的年輕人越來越靠正途去開拓前程，他們通常在擔任京畿縣令以后，就能繼續在朝廷任職。我們只要看看睿宗朝宰相們的經歷，就會驚異地發現，他們之中大部分人在地方任職的經歷是何等地少。另一方面，地方職務雖然收入多，官品也高，但官僚中的佼佼者避而不就，而是由那些按資歷從胥吏擢升的人、在京師各部失利或失寵的人，或政治上暫時不得意的人充任。

甚至在最有利的情況下，有前途的年輕人都有意識地拒絕在地方任職。在韋后時期，官員在京師取得盡管是有名無實的官職要容易得多，配備地方官署官員的工作卻很困難。自7世紀90年代以來，對這個問題的怨言不絕于耳；709年韋嗣立曾建議，凡過去未擔任刺史和縣令的官員，均不得在中央各部各寺擔任高官，但此建議沒有成功。

前面已經敘述姚崇和宋璟在710年曾企圖清理冗員的問題，結果在次年他們的政策反而來了一個大倒退。714年以后，姚崇開始處理選拔有才之士在地方任職這一更大的問題。714年初，幾乎就在他擔任宰相之職以后，便有詔書規定，從京師選拔有才能的官員去地方擔任刺史和都督應永為法式，而有良好政績的刺史和都督則應調至京師。

姚崇在這方面受到年輕多才的專使張九齡[[54]](#_54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的壓力。后者為702年進士，來自廣州以北的邊遠南方韶州城；由于張說的賞識，他謀得一個官職，后來參加過兩次殿試，一次在707年，一次在712年，后一次由玄宗親自主持，他在應答時提出了關鍵的選才問題。張九齡在715年陰歷五月呈遞玄宗的一份十分詳細的奏疏中又重提此事，其中特別強調地方職務，尤其是遠離京師的那些職務的人選，同時力主官員任某職的時間不宜太長。[[55]](#_55_Qi_Xin_Zai___Wen_Yuan_Ying_H)

715年陰歷六月，玄宗再次頒詔，命令互調京畿和地方官員，并實行按察使每年對地方官員的政績進行考核、由吏部和戶部批準的更徹底的制度。政績優良者有資格在京師任職，以前未在地方擔任刺史或縣令的人均不得在中央政府任職。[[56]](#_56___Tang_Hui_Yao____Juan_75_Di)

但盡管有這些詔令，盡管皇帝決心要提高地方官員素質，官員們依然不愿在京外任職。716年初期，玄宗在抱怨最近幾次考試的結果之后，召集所有新任命的縣令——他們的素質之差是有名的——進宮，就他們的施政計劃進行面試。他們的答復是如此不能令人滿意，以致45人被遣送回籍學習，而負責選拔文官的官員本人也被派往地方擔任幾年刺史，盡管他們的官聲很好。[[57]](#_5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深深地卷入這些改革之中的張九齡似乎冒犯了姚崇，這也許是因為張九齡是與姚崇不和的張說的門生。雖然進行改革部分地是由于張九齡的鼓動，他本人卻于716年后期退隱回原籍，這顯然是因為不得志。

選拔合適的官員一事并不是地方政府面臨的唯一問題。朝廷此時清楚地了解到在中央政府和州之間再設一級行政組織的必要性，它不但有助于評價地方官員的品格，也能監督他們的施政。唐代初期，全國分成10個道，御史們定期被派往各道視察地方的行政。706年，這些御史被采訪使代替。在711年，曾有把帝國改組成15個道和在州以上另置一級長期性地方行政區的企圖。但這一企圖失敗了；在714年，重新對以前的10個道各任命采訪使（現稱按察采訪處置使）。[[58]](#_58_Guan_Yu_706Nian_De_Zhuan_Shi)但盡管有玄宗的提高地方行政的那種干勁和在選拔過程中對采訪使規定了任務，但他們在716年被撤銷了。

### 重訂法律

在720年以前一段時期進行的行政改革的內容幾乎完全是恢復和貫徹7世紀武后建立統治前奠定的行政準則。這些改革已經體現在685年前定期修訂和重新頒布的一整套法典，即律、令、格、式之中。685年以后，武后未作進一步的修訂，雖然編成了體現修訂法典的立法《格后長行敕 》。武后垮臺后，705年在唐休璟、韋安石和蘇瓌的主持下，徹底修訂所有法典的工作才得以進行。710年睿宗登基后，下令重新修訂，同時指定一個包括許多法律專家在內的編纂組織負責。新的法典在712年陰歷二月編成并頒行。[[59]](#_59___Tang_Hui_Yao____Juan_39_Di)

713年末，姚崇和盧懷慎領導一個被指定修訂令、格和式的組織，這部分法令與行政事務有關。修訂的法令于715年陰歷三月完成，然后被頒布執行。它后來被稱作《開元前令》。

在宋璟和蘇颋擔任宰相時，詔令又命再作修訂，這一次包括刑法在內。有些曾協助姚崇的法律專家也參加了這一工作，編纂工作成于719年，陰歷三月其成果送呈玄宗過目并被公布。它通常被稱作《開元后令》并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因為它的大部分內容收入《唐六典》，此書給我們提供了唐代行政法的詳細內容。[[60]](#_60___Tang_Hui_Yao____Juan_39_Di)

因此，從710—719年的十年是制定中央行政法典的重要時期，這種法律旨在把中國再度置于一個精心制定的統一行政規定和實踐的體制之下，所以這十年對恢復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帝國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 財政問題

在概括從中宗在位的后半期和睿宗時期起遺留下來的弊病的一切奏議中，一個反復提到的內容是國家的財政資源不足、收入減少和缺乏儲備積累這一問題。在武后末期，政府曾打算重新登記人口。戶稅和地稅兩項新的稅收開始提供大量補充收入，同時有人已公開議論從貿易和商界征稅。[[61]](#_61_Can_Jian_Cui_Rui_De___Tang_D)但總的來說，人們尚未密切注意全面的財政政策。

當武后遷都洛陽時，帝國的財政已經大有好轉。東都靠近中國東部產糧的富饒平原，對它的供應遠比長安方便和經濟。武后本人于701—703年返回長安之行是出于政治壓力；而中宗長期遷都長安也是如此，因為韋后的政治根據地就在關中。政府向西北的這次遷移重新引起了供應京畿這一巨大的后勤問題，因為京畿的人口將近百萬，又位于資源比較貧乏、氣候嚴酷而變化無常的地區；那里的人口逐漸減少，而其中大部分戶口又在府兵中服役，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免予納稅。[[62]](#_62_Jian_Quan_Han_Sheng___Tang_S)

向長安運輸供應是一個困難的問題。雖然隋煬帝的運河體系已經為東部平原提供了一個極佳的運輸水系，因為它把長江與淮河和黃河連接起來，又接通了黃河與近代天津附近的地區，但溯黃河和渭水而上把糧食和物品送往長安的運輸卻被黃河河道的淤塞，尤其是被三門峽巨大的激流險灘所阻。在高宗時期，曾打算靠近這些激流險灘筑路，還打算沿峭壁修拉纖的小路，以便船只能被拉過險灘，但這些計劃都沒有實現。雖然與渭水并行的通往長安碼頭的運河在672年被疏浚和改善，但從洛陽到長安的運輸依然是困難和昂貴的。[[63]](#_63___Tong_Dian____Juan_10_Di_56)甚至在高宗統治初期的全盛時期，每年運往長安的稅糧似乎只有20萬石左右，[[64]](#_64___Xin_Tang_Shu____Juan_53_Di) 657年以后，關中的饑荒總是導致朝廷遷往洛陽，這樣做代價很高。

武后把朝廷長期定在洛陽，這樣就更加忽視了這一段運輸體系，同時使為大平原服務的主要運河體系也日益衰敗。到玄宗登基時，在運河與黃河匯合地的大壩和水閘閘門已經失修，不能通行。

同時，中宗時期的特征是饑荒連年不斷。705年的一次大洪水使河北的17個州受災，同時淹沒了渭水流域。706年發生了一次嚴重的旱災，它從冬季持續至707年夏初，結果造成了關中、河北和河南的饑荒。708年和709年又發生嚴重的饑荒，當時糧食必須通過陸路用大車從大平原和從江淮地區運往長安。[[65]](#_65_Jian___Jiu_Tang_Shu____Juan)

早在中宗初期，李嶠和宋之問已力促他永遠遷都洛陽，現在大臣們又重提此議，但韋后利用她對皇帝的影響，加以阻撓。崔湜企圖另辟一條跨山區經商州的通往南方的路線，這個嘗試是一次災難性的和勞民傷財的失敗。[[66]](#_66___Jiu_Tang_Shu____Juan_74_Di)

中宗之死沒有解決這一問題。睿宗和玄宗的新政權仍很不穩固，所以不可能離開長安，而自然災害循環反復，不斷發生。711年，河東汾水流域發生一次大地震，很多人喪生。712年春長期干旱，另一次在夏初。712—713年渭水流域和長安京畿區發生嚴重饑荒。714年又有一次嚴重干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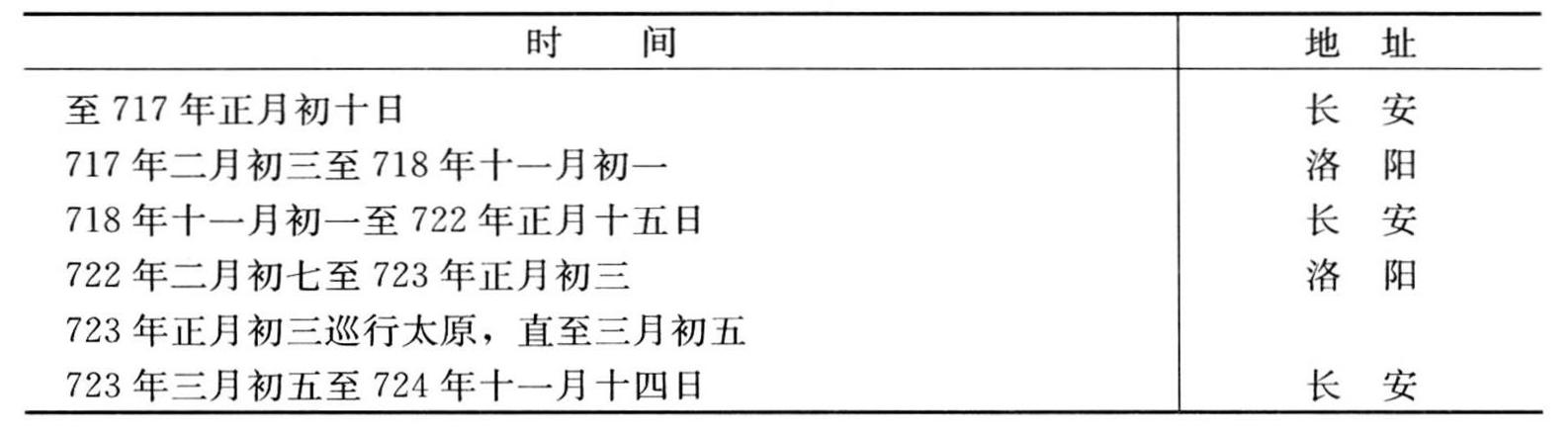
713年玄宗決定遷都洛陽，但他與太平公主之間的政治危機使此行不可能實現。[[67]](#_67___Ce_Fu_Yuan_Gui____Juan_113)但是運輸體系終于有所改進。陜州刺史李杰被任命為水陸轉運使，奉命用陸路拉纖來改造三門峽上游的陜州與洛陽之間的漕運。這一工程大見成效，結果它能每年運糧100萬石，此數為高宗時期的五倍。714年，李杰重建汴渠和黃河匯合地的水閘，從而恢復了從南方到洛陽的直達交通。[[68]](#_68___Tong_Dian____Juan_10_Di_57)

盡管有李杰的這些成就，對長安的供應問題依然是嚴重的，部分地是由于關中和西北的軍事編制日益龐大，部分地是由于京畿區繼續歉收和缺糧，該地在714年遭到破壞性的颶風的襲擊，然后又發生嚴重的旱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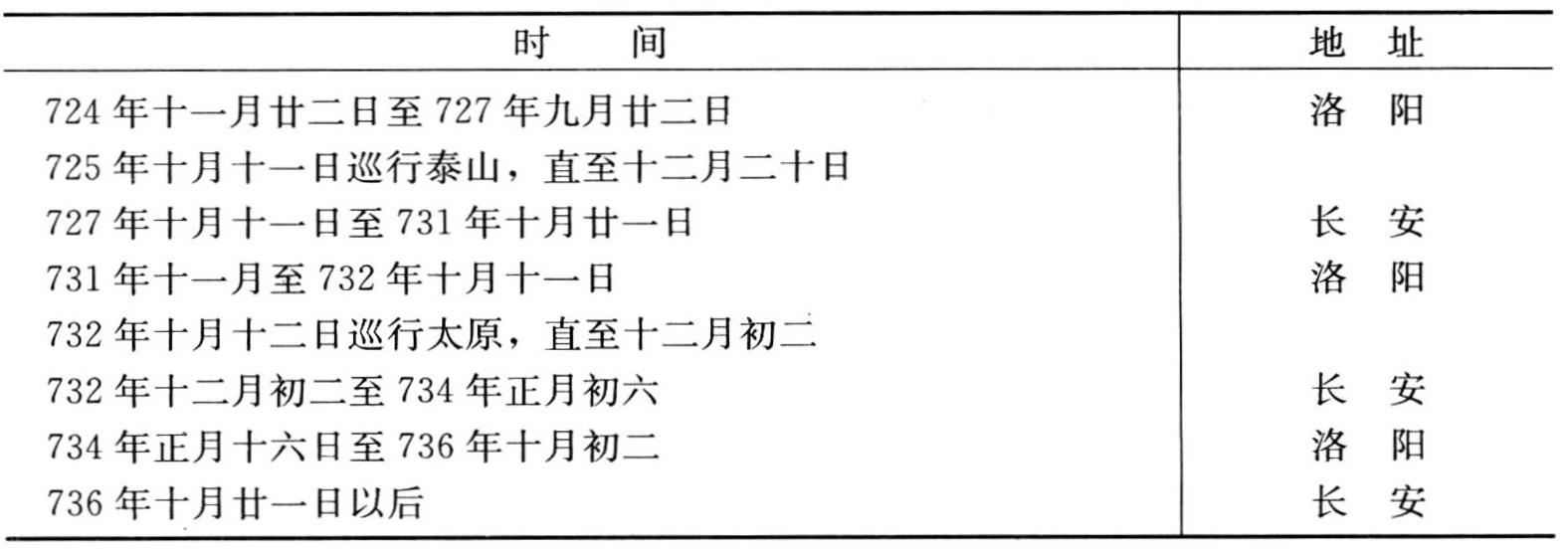
但自然災害的損失不限于關中。在玄宗朝初年，提供國家大部分歲入的大平原也深受打擊。715年，河南河北有大的春澇，然后在夏季又發生蝗災。716年，東部平原甚至遭受更嚴重的蝗災，廣大地區的糧食全部損失。716年和717年，洛水流域有嚴重的澇災。在717年，河南中部的大部分地區被淹，洪水破壞了大片種糧區，并淹沒汴渠邊的鞏縣。河南和河北的這些洪水和自然災害的后果特別嚴重，因為這兩個地區是中國人口最密、生產力最高的區域，政府依賴它們的收入的程度也最大。

717年初，勢在必行的事情終于發生，玄宗被迫將朝廷遷往洛陽。與經常一樣，此行路途艱難，代價高昂，時間又長；玄宗一行用了24天才抵達洛陽，朝廷留在那里直到718年冬。在以后的20年中玄宗共在洛陽度過9年，朝廷的遷移不下10次，搬動花了很大的代價，并把政務嚴重打亂。由于規模擴大，管理日趨復雜，這些遷移的費用越來越高，它們必然耗費了國家的大量資源。[[69]](#_69___Jiu_Tang_Shu____Juan_96_Di)

表7 玄宗朝廷的所在



續表



救濟饑荒

政府認真地采取了與饑荒作斗爭的措施。714年陰歷九月，一份詔書命在全國擴大從655年起在京師實行的常平倉制。這些糧倉在豐足之年以高于正常市場價格的價格購進糧食，在饑饉之年以低于時價的價格出售儲糧；這是一種旨在減輕因價格過分動蕩而造成農民困苦的措施。719年，又一份詔書命令在北方諸道以及長江流域和四川的大城市建立這類糧倉。每個州撥給專款作為資金。

同時，原來的義倉制也被改革。各州通過這些義倉應該保存根據地稅征收的儲糧。但挪用這些糧食作為一般歲入運往京師的做法已成慣例。716年，這種做法被禁止，儲糧只準作救濟饑荒之用。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發展。到玄宗末期，在義倉儲存的糧食儲備相當充足，特別在最易發生饑荒的關內、河東、河北、河南諸道更是如此。這些儲糧在很大程度上緩和了8世紀30和40年代自然災害的沖擊。[[70]](#_70___Jiu_Tang_Shu____Juan_49_Di)

稅制

玄宗初期的財政問題并不僅僅是運輸征收的糧食和布帛到京師的困難造成的。長期存在的收入不足的局面仍在繼續。因不完善的人口登記而使稅冊漏登大批應該納稅的人這一主要的基本問題，在7世紀90年代變得嚴重了；這一嚴重局勢只是由于武后并不怎么連貫的重新登記的措施才部分地得到緩和。711年，韓琬重提此事，[[71]](#_71___Tang_Hui_Yao____Juan_85_Di)但在玄宗執政初期，政府未采取行動，不過在使地方行政更有效率之前，這項工作的確是難以進行的。

幾乎與喪失歲入的形式同樣重要的是富戶的數量龐大，它們的稅雖然按規定繳納，卻被指定用于貴族（他們是皇親國戚和武后、韋后時期授予貴族稱號和封地的許多官戶）的食實封。這一問題的規模難以用數量表示，但709年韋嗣立的奏疏估計有60余萬成年納稅者（占當時總數的8%）被分配給封地的擁有者，這些封地所收的絲稅超過太府寺。同年另一種估計列出一個數字：140戶貴族享有實封，從54個州取得收入，并選州內最富之戶來履行義務。[[72]](#_72_Wei_Si_Li_De_Zou_Shu_Zai___Q)在河南最富的一些地方，采邑戶尤其是一個問題。確定為采邑戶被普遍認為比應征入伍更加糟糕，因為在饑饉之年可能得到的減免納稅的待遇，采邑戶常常被故意地取消。在有些地區，這造成了嚴重的不公平和促使許多被確定的戶出逃，從而加劇了未登記的人口的問題。[[73]](#_73_Guan_Yu_Feng_Di_De_Wen_Ti__J)

玄宗對此不能立刻有所作為，因為實封與貴族稱號一起是世襲的，不能一筆勾銷。然而他確實放棄了不分青紅皂白濫封貴族的做法，并把實封減到最低限度，其戶數常常只是象征性的，遠遠低于律令的規定數。但這一制度依然有效；玄宗本人就多子多女，共有59個子女，每人必須被給予貴族稱號、管理王府的機構和一份封地，這樣就給帝國財政平添了沉重的負擔。

玄宗在即位初年也極力公開表示他在杜絕鋪張和不必要的開支。714年陰歷七月他頒布了嚴厲的節約法令，內容是禁止織錦，禁止穿刺繡之衣和戴珠玉飾品。此詔甚至對后妃也不例外，為皇宮制造物品的織錦坊被關閉。同月稍晚，為了平息關于玄宗正在為后宮選美的謠言，他把大批閑著的宮女遣送回家。[[74]](#_7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

這時開始開征的一種稅收的輔助形式是鹽。710年和713年，專使被任命去管理山西東南部的鹽池。但這種形式純屬地方的權宜措施。[[75]](#_75___Tang_Hui_Yao____Juan_88_Di)

貨幣

自7世紀以來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官鑄的錢奇缺。約從679年起，政府已削減了鑄錢，在武后在位的整個時期，華中和華南出現了大規模的地方性私鑄，其中甚至還牽涉一個未來的宰相。682年，規定私鑄錢幣者要處以死刑，但收效甚微；從701—704年，政府被迫準許公開使用優質的私鑄錢，以滿足商業的最低需要。705年，規定沒收犯禁者的財產以代替死刑。713年，一位大臣抱怨京師流通的錢質量低劣，以致不宜在其他地方使用。但貨幣的需要量增長得太猛，遠遠超過了官錢的供應量，所以政府被迫準許私鑄錢流通，以免貿易呆滯。

隨著宋璟在治政上得勢，政府在717年終于企圖處理這一問題，并實行以前關于私鑄的嚴格禁令。死刑被恢復，718年的一份詔書重申了禁令，御史蕭隱之被派往淮河流域和黃河流域這兩個私鑄最盛行的中心，企圖收集和銷毀非法的錢幣。但禁令和蕭的使命都歸于失敗，結果導致物價大波動、商業暫時停滯、民眾不滿和宋璟垮臺。最后，政府不得不放松禁令。問題依然沒有解決。[[76]](#_76_Jian_Cui_Rui_De___Tang_Dai_D)

### 反佛教措施

在韋后去世之時，佛教已長期從國家和貴族那里得到無與倫比的庇護，其權勢和財富已經盛極一時。公元711年辛替否上奏睿宗，請他注意佛教寺院聚積的大量財富以及富人通過充任僧人或沙彌逃避納稅和其他義務的方法。睿宗與他的姐妹一樣，是虔誠的道教信徒，已把道教置于佛教之上，[[77]](#_77___Quan_Tang_Wen____Juan_18_D)并且不斷深受道士的影響。他下令調查佛教寺院擁有的土地和水磨，并命令凡是非法取得的土地一律由國家沒收。[[78]](#_78___Quan_Tang_Wen____Juan_19_D) 712年，他又下令拆除那些未得官方認可的寺院。[[79]](#_79___Fo_Zu_Tong_Ji_____Zai___Da)

玄宗登基后，在姚崇的鼓動下也迅速采取反佛教的行動，姚崇以前在河北任職時，曾以反對佛教寺院聞名。[[80]](#_80___Jiu_Tang_Shu____Juan_96_Di) 713年的詔書禁止豪門大戶建造私人寺廟或“功德院”，因為這些已經成了逃避納稅和各種形式的徭役的手段。[[81]](#_81___Tang_Hui_Yao____Juan_50_Di) 714年陰歷五月，在姚崇提請玄宗注意為了同樣目的公然不正當地濫用遁入空門這種現象后，對佛僧的大規模調查開始了，結果使3萬余名僧尼還俗。次月，政府明令禁止建造新寺院，同時嚴格控制對現存廟宇的翻新。[[82]](#_82___Tang_Hui_Yao____Juan_47_Di)

玄宗不但打擊佛教界的物質基礎，而且試圖把佛僧的活動限在廟內并禁止他們公開講經，后一個措施可能與這一世紀初期幾份詔書中公開宣布鎮壓的各種宗教叛亂者的集團有關。[[83]](#_83___Quan_Tang_Wen____Juan_26_D)他還企圖使用由來已久的方法，要佛僧孝順其父母，換句話說，就是要承認他們自己沒有完全脫離正常的社會關系和擺脫對當局的義務。在這方面，他并沒有比他的前人取得更大的成就。[[84]](#_84___Jiu_Tang_Shu____Juan_8_Di)他的其他反佛教措施的成就是難以估計的。玄宗肯定仍不滿足，因為在8世紀20年代他又推行了新的措施，這將在以后論述。

### 710—720年的軍事改組

玄宗時代中國對外關系中的重大事件在下面將予充分論述，這里只需提供詳細的材料來說明防務政策發生變化的背景。在睿宗執政之初，唐朝在邊境面臨幾個很突出的問題。

在極西部，武后在692年決定維持對塔里木盆地諸國和對準噶爾的牢固控制，這使中國人負擔了相當沉重的軍事義務。在塔里木盆地，以龜茲為大本營的安西四鎮提供了一支分駐于重要城市的“保護性”力量，但這些城市仍保留著土著統治者。這些部隊防衛這一地區，使之免受南方的吐蕃以及西突厥、特別是北方突厥的強大的部落聯盟突騎施的壓力，同時也為了對付阿拉伯人從西面侵入河中地區所構成的潛在威脅。在這里駐軍的主要目的是控制經塔里木通往中亞、克什米爾和北印度的商路和經近代阿富汗通往伊朗的商路。

更往北，中國的軍隊和分遣隊分駐在沿天山北側經伊犁河谷和費爾干納通往中亞的路線上。哈密和吐魯番綠洲還駐有中國的守軍，那些地方在太宗時期被征服，并正式歸中國文官治理。在這些地區有一定數量的中國定居者（其中許多是強制遷來的罪犯和家庭），但絕大部分人口仍是非中國人。這一在今烏魯木齊附近、以北庭都護府為中心的地區必須加以守衛，以防西面的突騎施、北面的黠戛斯和東北的突厥的侵犯。

8世紀初期駐在西面的守軍總數約為5萬人，這意味著中國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牢牢地控制經甘肅西北綠洲這條供應他們的路線。在這里，唐朝面臨的最強大和最咄咄逼人的敵人是吐蕃人。在7世紀后半期，吐蕃國已經征服和逐漸并吞了在今青海省的原吐谷渾領地。從這一富饒的放牧區，吐蕃人能直接對甘肅西部的敦煌直至四川這一弧形的中國邊界施加壓力。為了對付這一威脅，中國人自7世紀70年代起逐漸設立永久性的衛戍部隊和分遣隊，它們以軍墾為后援，使部隊在這一交通困難的地區至少能部分自給。直接的吐蕃侵略在700—702年的一次慘敗后結束，此后發生的內亂和吐蕃幼王的登基暫時迫使吐蕃人把精力集中在內部事務方面。從707—710年與中國人的長期和談，在睿宗即位前不久以和親結束。吐蕃人能夠從唐朝廷取得非常有利的條款；和談的部分內容是把黃河上游稱之為“九曲”的領地割讓給吐蕃，這一地區對武后時建立起來的防務體系是極為重要的。吐蕃人可以由此直接威脅長安周圍的京畿區，它的喪失大大地削弱了中國的戰略地位。

714年，吐蕃人要求締結一個正式的和約，玄宗同意。但和約剛締結，吐蕃人就攻擊蘭州，造成很大的破壞。雖然在714年后期吐蕃人遭受了決定性的失敗，中國人從此能夠控制其邊境并再次建立起防御工事，但吐蕃人這種欺人的背信棄義使玄宗產生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痛恨，并多年不愿再作任何和平安排。[[85]](#_85_Guan_Yu_Yu_Tu_Fan_De_Guan_Xi)

沿關中和河東兩道的北部邊境，唐王朝面臨的是游牧民族宿敵東突厥人。691年默啜可汗登上汗位后，突厥又發展成一個令人生畏的強國，到8世紀初期，它在從滿洲邊境直到西方的費爾干納的整個草原地帶稱霸。突厥人在武后時期屢次襲擾中國邊境，但中國人在705年慘敗于他們之手后，就沿黃河北道建立了昂貴的、由常備軍和永久性堡壘構成的防務體系，以重兵駐守，從而有效地遏制了進一步的大規模入侵。同時，基本上以他個人統治為基礎的默啜的“帝國”受到西面和北面的臣服民族的日益加強的挑戰，所以在睿宗登基時，默啜在全力進行他在極西部的戰役。從711年起，他不斷與唐王朝進行和親談判，以期支撐他在其臣服民族中的衰落的權力；714年，雖然他攻打了中國西面的北庭諸前哨，但他從未嚴重地威脅中國本部的邊境。716年他的死亡進一步削弱了突厥人的力量，他們的許多附庸部落紛紛投向中國。以后北部邊境的動亂并不是突厥人造成的，而是來自已在北部關中和河東（今陜西和山西兩省）的中國領土上定居的突厥族和其他游牧民族的集團；駐守在這一區域的強大的邊防部隊負責對付它們內部的暴動以及來自草原的襲擾。[[86]](#_86_Guan_Yu_Tu_Jue_Ren__Jian_Cen)

從696—697年，生活在今河北和遼東省邊緣地帶的兩個游牧民族——突厥血統的奚族和準蒙古族的契丹人——在東北崛起，構成了強有力的威脅，當時他們已把中國人趕出南滿并侵入河北。他們被趕回后，由于得到突厥的援助，就像新興的振國（后來的渤海，由在南滿的高麗殘余組成）那樣成了突厥的附庸。他們多年來被幽州（今北京）都督薛訥所阻。薛在711年調任后，新督愚蠢地企圖對他們發起進攻，結果造成了一段時期的嚴重對抗。[[87]](#_8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但到714年，鑒于默啜的力量明顯地衰落，奚和契丹都決定作唐朝的屬國。717年，中國在東北的地位又牢固地樹立起來，并在位于現代遼東的營州恢復了都督府，719年還在那里派駐強大的軍隊。[[88]](#_88___Jiu_Tang_Shu____Juan_39_Di)

因此，這段時期對中國的防務政策來說是相對安定和有成就的，部分的是因為鄰近的幾個最具侵略性的強國每況愈下，部分的是因為武后和中宗時構筑的永久性的防御工事起了作用，部分的是因為唐朝一般采取了和解性的外交政策與和親手段。姚崇和宋璟都經常力促玄宗在對外關系方面要謹慎從事；玄宗也許需要克制，因為714年吐蕃入侵以后，他計劃親自領兵進行大規模的討伐，只是由于邊境將領的勝利才未成行。717年，宋璟甚至反對把中國的管轄擴大到遼東，因為這是不必要的負擔。

然而，雖然這10年中國人沒有采取任何侵略性的擴張政策，但他們仍不斷在易受攻擊的北方和西北邊境一帶構筑防御工事。到722年，據張說估計，軍隊總數已增加到60余萬。[[89]](#_89___Jiu_Tang_Shu____Juan_97_Di)在玄宗初期，極力加強兵力的地區是隴右（甘肅南部）、河東和東北，這是一些能使中國境內關鍵的道遭受外來威脅的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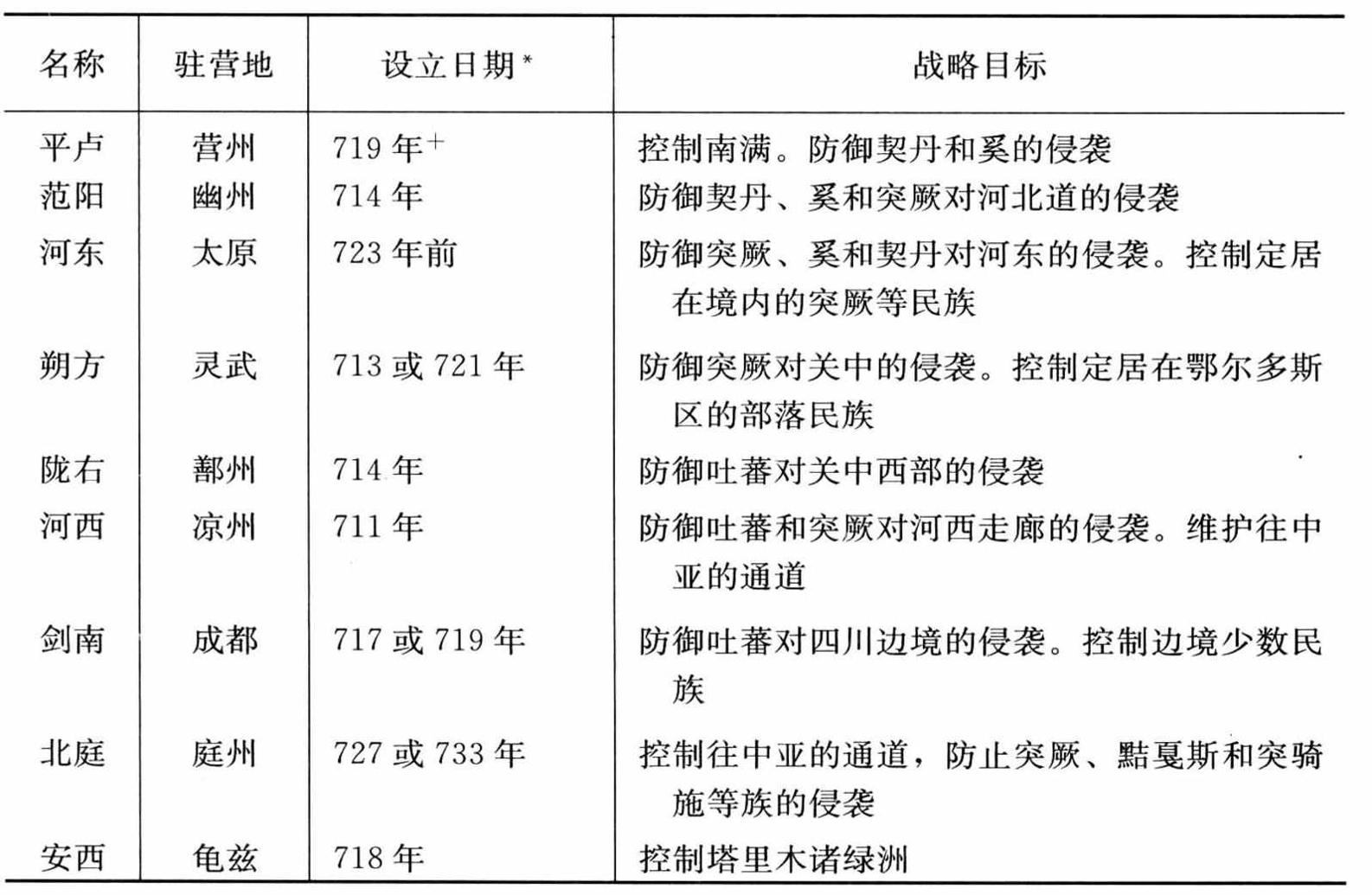
但比單純建立邊防軍更加重要的，是對他們的控制和部署的變化。在所有的邊境區，盡管它們的戰略位置迥然不同，中國人仍面臨著一個共同的危險因素。他們的潛在敵人吐蕃人、突厥人、契丹族和奚族都是高度機動的游牧或半游牧民族，他們的目標不是永遠征服中國的領土，而是對邊境地區進行突然襲擊以掠奪糧食和其他物品，并擄俘居民為奴，特別是搶走牲畜和馬匹。只有吐蕃企圖長期征服中國的邊境領土，但即使在當時它也是很有限度地進行這一活動的。

這類一般不很持久的戰爭尤其需要指揮的靈活性和作出迅速反應的可能性，它還需要龐大的邊防軍，因為所有這些民族能夠把數以萬計的精于騎射的軍隊投入戰場。要對付這類挑戰，像唐初建立起來的那種唐代軍事體制是很不夠，也不能適應形勢的。整個軍事組織高度集中。無數以幾百人駐守的小的鎮（或戍）已在邊境成立，置于地方行政的控制之下。但萬一出現超過規模很小的地方沖突，中央政府就必須集結“行軍”。這種軍隊的組成部分是通過動員隸屬于各衛的府兵，部分是通過大規模征兵。通常政府必須從京師禁軍的將領中任命出征期間的統帥及其部屬，但有時從正式的官員中任命，其中許多人能隨時出將入相。這種完全特殊的組織必然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組成。所有動員、訓練、向前線運兵、兵員的供應和裝備等工作都必須臨時完成。當需要進行計劃周密的反攻或大規模討伐時，它證明可以應付裕如。但如果要對只有有限目標的機動靈活的敵人的攻擊作出迅速的防御反應，這一制度實在太慢，太不方便。到大軍到達邊境時，敵人一般早已撤回自己的境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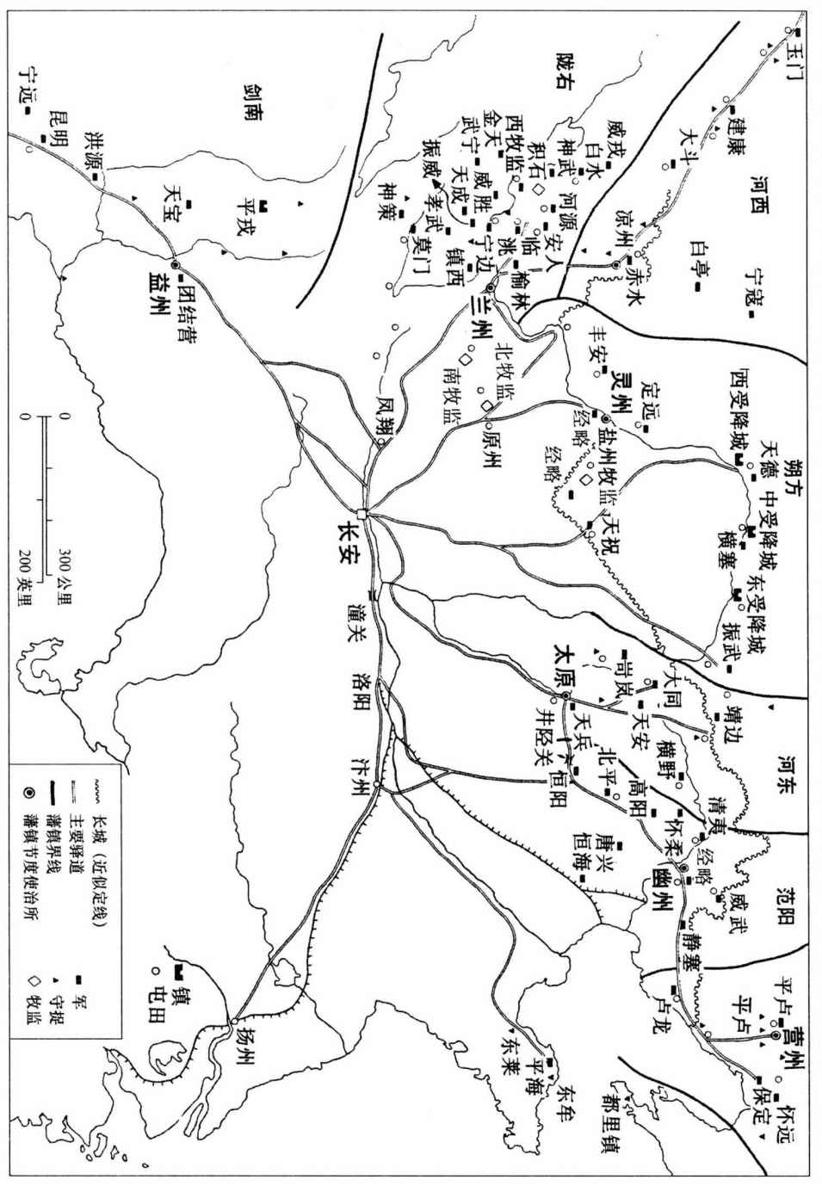
在高宗和武后時期，防務因成立大批長期的邊防戍軍而得到加強。這些軍隊一部分是有長期任務的府兵，但長期服役的健兒的人數日益增加，他們之中——特別在騎兵中——有的人是非漢族人。這些常備軍最早設在吐蕃邊境的西北和中亞；從7世紀90年代起，河東和河北北部邊境一帶也部署了這種軍隊。但即使這些軍隊中最大和最訓練有素的力量，在孤立無援時也不能抵擋一次大進攻。

隨著睿宗的即位，邊防不但得到足夠的兵力，而且還有一個經過協調的指揮機構；如果遭到進攻，這一機構能夠迅速部署這些部隊而不會有一成不變的制度所帶來的那種等待中央政府任命戰地統帥和動員野戰軍的長期延誤。從710年和711年起，任命長期的節度使以指揮各防區的做法逐漸成為定例，而根據傳統，以前各防區是歸遠征軍的總管指揮。這一制度并不是一下子在全邊境實行的，而是在以后10年中逐漸發展而成，但在8世紀20年代初期，北方和西方邊境已被組織成九大藩鎮。這些可見之于表8和地圖10。

表8 玄宗時期的邊境藩鎮



注：\*不同的藩鎮設立的日期很不相同，人們往往很難確定，日期是指授予節度使頭銜的時間，或是指正式設立藩鎮的時間。  
＋平盧雖然單獨設藩鎮，但在742年前總的說受范陽節制。



地圖10 玄宗時期的軍事編制

部分根據浦立本的《安祿山之亂的背景》（倫敦，1955年）地圖2制作。本圖未標出北庭和安西兩個邊西藩鎮，或河西的極西部分。劍南軍事組織的材料非常混亂和矛盾，事實證明不可能在地圖上詳細標明。

以上各“藩鎮”的節度使擁有一大批他直接指揮的部屬和軍隊（通常稱經略軍），對規定數目的邊州軍務有完全的管轄權，并且能指揮該地區所有獨立的軍、鎮和小分隊。歸節度使調動的兵力十分龐大，其數從2萬直至9萬余人。對如此眾多的兵員的維持造成了后勤支援的大問題，由于運輸口糧和物資到邊境地區的困難，這些問題就更加嚴重了。后勤供應由支度使負責，他們受權掌握大量中央政府的資金，以購買軍糧、軍衣和軍用裝備。許多軍隊高度依賴軍隊自己耕種的地方屯田。這些田地由營田使經營管理。在最初，這些職位由專門的官員擔任，但從8世紀20年代初期起改由節度使兼任；節度使另外配備有專門知識的部屬來處理這些后勤和財政問題。729年后，范陽的軍隊部分地通過海運得到供應，因而范陽節度使另負海運的專責；而朔方的節度使則控制連接其各地軍隊的黃河上游的河運，同時還掌握地方鹽的生產。

節度使歷年取得的非軍事職能還不止這些。朔方的節度使在734年，后又在746年兼任關內道的采訪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個遠比他們實際的邊境藩鎮廣大的地區管理民政。從737年起，劍南（四川）的節度使甚至兼有鄰近山南西道采訪使的頭銜。725年，政府正式承認把節度使的藩鎮納入行政體系的做法，節度使獲準使用“木契”，使他們正式有權進行重大的財政轉賬和個人指揮大軍。節度使身邊有時有一監軍，監軍通常是御史，但737年后有時是宦官，他負責報告節度使的行動和維護朝廷的利益。但一般地說，節度使獲準有很大的行動自由和選用自己部屬的權力，不受文官政府繁瑣行政手續的不當的掣肘。

邊境藩鎮的組織在玄宗初期逐步形成，它們的情況肯定不一樣。至少在732年前，在設立永久性新藩鎮的同時，政府仍在動員野戰軍和任命其統帥。軍隊的固定建制、小分隊和軍隊的人數及支撐他們的固定財政撥款都是直到737年才被確定下來的（下面將予論述）。

在初期，直到8世紀30年代中期或更后，除了西部各藩鎮外，大部分節度使為高級文官，他們兼任其他高級職務，希望在任期滿后調至中央政府。例如，范陽最早的五個節度使都曾一度擔任過宰相。許多這類官員雖然身為文官，但可能在武職中幾乎度過他整個官宦生涯，而且是與許多將軍一樣的職業軍人。但他們仍渴望在中央政府擔任高官。他們的任期一般比較短，在藩鎮的時間很少超過4年，然后又重任文官。因此這些最強大的軍隊是牢牢地受朝廷控制的。

只有位于中亞的安西和北庭及吐蕃邊境的河西和隴右諸藩鎮是例外，因為那里邊境戰爭的危險不斷出現。這里文官很少接受帶兵的任務，這項工作一般由職業軍人去做。這些將領鎮守的時間一般比其文官同僚更長。他們通常根據需要在西面的藩鎮中調動，但很少擔任文職。他們的部屬也幾乎全部是職業軍人，由此產生了一批久經沙場和在戰斗中得到鍛煉的將領，他們的戎馬生涯全在邊塞度過。到8世紀30年代，人們發現這些人都在北部邊境的諸鎮任職。

事實證明，新體制眼下對防務體系作了最有價值的改進，并且在玄宗鞏固政權的最初的關鍵幾年有效地保衛了中國。但它確實使壓倒一切的兵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只要皇權不受挑戰，他們仍是王朝的忠仆，一切平安無事。但他們仍是產生危險的潛在根源。當玄宗在716年，后來又在729年任命諸王為名義的節度使時，他也許意識到這種危險。諸王留在京師，由擁有節度使全權的副大使履行他們的職責。行政工作的進行實際上沒有變化；這些正式的任命象征性地說明，節度使仍是皇帝的臣仆，而不是半獨立的地方統治者。[[90]](#_90_Dui_Bing_Zhi_Gai_Ge_De_Di_Yi)

### 玄宗及唐宗室

玄宗在他執政開始時面臨的最大問題也許是如何結束皇族成員、宮中后妃和外戚對宮廷政治的不正當干涉。他是在太宗時期顯然十分鞏固的皇帝權力已被削弱和侵蝕半個多世紀以后登基的。以前連續三個皇帝都完全受他們的皇后或女眷的支配，并且聽任宮廷陰謀以及個人寵信的人物和外戚成員破壞政治發展進程。他以前每一代皇帝的統治都被激烈的繼位爭端搞糟，這些爭端把朝廷弄得四分五裂，結果沒有一個原被指定為皇太子的王子真正登上皇位。

要緊的是，不能再讓后妃支配政治。每當發生這種情況，它不但給帝皇的權威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而且導致政治的普遍不穩定。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皇家婦女沒有公認的政治地位，她們只能秘密和間接地施加影響和壓力，來左右政務的發展。

一切外界的勢力都可以通過皇室婦女間接對皇帝起作用，因為她們能在皇帝閑暇時不受嚴格的宮廷禮儀接近他。地位高的后妃都出身于大貴族門第，她們的近親常常深深地卷入宮廷政治斗爭之中。與皇帝兒女攀親的姻親也有相似的背景，因此皇室就陷進了與京畿地區大貴族門第的復雜的聯姻網絡之中。雖然宮廷婦女身居深宮，由宦官守衛或管理，但這種隔絕狀態與以后相比還是很松的。唐代的上層婦女享有很大程度的獨立，所以當時宮廷婦女無疑與宮外的親屬和社會保持密切的接觸。這類聯系也是一種潛在的危險。

另外兩個集團也能方便地接近后宮成員。第一種人是宦官，他們享有作為皇帝家奴的特權地位，但在8世紀開始時，除了像皇帝寵信的宦官高力士[[91]](#_91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他在反韋后的政變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這類特殊人物外，相對地說依然無權。第二種人是僧道之流。宮廷的婦女歷來虔誠，是佛寺道觀和個別僧人的慷慨施主，有的僧人通過這種方式在宮廷取得很大的權勢。

玄宗的王皇后[[92]](#_92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出身于太原的望族。她的父親王仁皎（651—719年）曾是一低級的禁軍軍官，在玄宗成為皇太子后，他因皇親關系而升至一個高級但不重要的職位。王皇后的孿生弟兄王守一是玄宗推翻太平公主及其黨羽時的密謀者之一。玄宗在未得勢時與他交往甚密，后來他娶了睿宗的七女清陽公主。雖然兩家聯系甚密，玄宗對王守一又欠了特殊的恩情.但王氏家族從未得到任何重要的官職。王守一擔任過殿中少監及太子少保。父子二人都被封為公，積聚了巨額財產，但玄宗小心翼翼地不授給他們任何有權勢的職位。[[93]](#_93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83_D)

王皇后不能生育。由于當務之急是盡快解決繼位問題，所以在715年之初，玄宗之次子郢王李瑛被指定為太子。[[94]](#_94___Tang_Hui_Yao____Juan_4_Di)李瑛為玄宗的趙麗妃所生。出于某種原因，劉華妃所生的長子李琮未被提名。人選之確定可能是因為趙麗妃善于歌舞，自708—709年在潞州時期就受到玄宗的專寵。

另外還有玄宗的弟兄們和他的叔父李守禮，太平公主在睿宗時期就曾提到他們的皇位繼承權問題。

前面已經談到，姚崇和宋璟在711年已經試圖解決這一問題，辦法是禁止皇室諸王統領禁軍，因為這種部隊使他們取得發動政變的兵力。對公主的配偶也下了類似的禁令。后來，玄宗的弟兄和李守禮被任命擔任一般是在長安附近的幾個重要的州的刺史或都督，同時在朝廷擔任并無實權的禮儀性職務。這一措施在714年被正式規定，安排應有兩個親王在朝，三月一輪換。[[95]](#_95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把諸王調離京師的目的不僅是阻止他們本人發動政變，更重要的是防止他們被朝廷中尋求皇室傀儡的對立黨派所利用。他們受命管領很重要的州；例如李成義在防御契丹的關鍵時刻是幽州（北京）刺史。但諸王參與州的行政管理的程度是值得懷疑的。至少李守禮就把公務交給他的副手處理，自己則以狩獵、飲酒、聽音樂和尋歡作樂度日。[[96]](#_96___Jiu_Tang_Shu____Juan_86_Di)

不論這一政策對帝國幾個最重要的區域的行政帶來多么不幸的后果，但它確使諸王擺脫了宮廷的陰謀。幸運的是，玄宗與他的弟兄手足情深。714年，他把他們以前在長安共住的一座王府擴大和改建成自己的離宮（南宮或興慶宮），并分贈諸弟兄各一座附近的王府，以便互相訪問。諸王形成一個多才多藝的家族，他們專心于文學、音樂、學術以及唐代貴族珍視的那些上流社會的運動，并且還有許多與皇帝相同的愛好。[[97]](#_97___Jiu_Tang_Shu____Juan_95_Di)

與皇帝最親密的親王是李成器，他也熱愛音樂和戲劇，經常與皇帝擺酒設宴，狩獵，打馬球和斗雞作樂。李成器對政治深感興趣，特別獲準每年把他自己一年的大事記送交官方的修史者。這是一項嚴肅的工作，每年送交的記載多達數百頁，但仍存在一種默契，即他從不想與皇帝討論當前的政務，也不想形成任何政治派別。[[98]](#_98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弟兄之間的親密關系是溫暖的私交關系，它并不意味著諸王以任何方式分享玄宗的權力。

同時皇室以驚人的速度在擴大。玄宗有59個子女，其中許多人生于他登基之前。再下一代人數甚至更多。他30個女兒的子女的情況無記錄可查，他們自然應算做駙馬的家屬。《新唐書》中的皇族譜系列了他29子中的20個，孫子共94人。但這些只是總數的一小部分，因為其中大部分或被分封，或擔任高官。我們已知，他的第四子有子女55人，第六子有58人，第二十子有36人。這些孫輩中，有34人被封為郡王，24人為國公，如果這些人全按719年唐律規定接受足額的封地，單單他們的歲入就吞沒了將近25萬戶的稅。他們收的津貼肯定不是足額的，往往只收到象征性的封地，但對諸王的支撐和維持顯然成了一個沉重的負擔。726年以后，皇帝在城的東北角專門為諸王建立一座王宅。這一為王子建造的建筑群稱十王宅，它因最早在那里定居的諸子而得此名。十王宅后來擴充到北面的御苑內；737年的一個時期，王朝又在同一區為皇帝的孫子營造一群院宅，稱百孫院。[[99]](#_99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07_D)

從此，皇室的子女都在宮內成長，但當他們被封后，他們不是像以前那樣在宮外得到宅第，而是在這一建筑群中分得自己的院落，他們就與其家庭在那里居住，并受中央的監督和由皇宮供應一切用品。這樣就對皇室成員作了進一步的限制，并便于皇帝遏制他們的活動。各王另立皇族新“房”并自定禮儀的舊制也到此結束，這是諸王地位衰落的一個標志。[[100]](#_100___Xin_Tang_Shu____Juan_70Xi)

## 玄宗朝中期，720—736年

720年正月，宋璟和蘇颋失去權力。宋璟因在命令御史臺處理大量積壓案件時采取高壓手段而引起了普遍的不滿。這一丑聞甚至被皇帝的徘優嘲諷一通，皇帝本人也認為宋璟有嚴重錯誤。但他被撤職的直接原因并不是這一丑聞，而是限制淮河和長江地區私鑄的災難性失敗及其代理人蕭隱之御史在推行這些措施時的嚴厲和不人道的方式。這一切引起了極大的不滿，以致皇帝免去宋璟和蘇颋的宰相之職，并把蕭隱之撤職。宋璟和蘇颋都留在朝廷，前者得到有名無實的最高品秩，后者擔任禮部尚書。蘇颋不久外放任劍南的節度使和采訪使，在那個以艱巨聞名的職位上取得卓越的政績。宋璟在朝廷得到元老的待遇，722年，他任留守，負責長安的事務，724—725年朝廷遷往洛陽時又任此職。[[101]](#_101___Jiu_Tang_Shu____Juan_96_D)

隨著宋璟的失權和不久的姚崇之死，一個時代結束了，這一時期的官方歷史的作者柳芳描述這個時代的特點如下：“姚崇、宋璟、蘇颋等皆以骨鯁大臣，鎮以清靜。朝有著定，下無覬覦。四夷來寇，驅之而已；百姓富饒，稅之而已。”[[102]](#_102_Liu_Fang____Shi_Huo_Lun)

這是一個鞏固的時代，一個明智地運用皇權的時代，一個克制的時代，尤其是一個沒有對外進行勞民傷財和野心勃勃的冒險行動的時代——正如9世紀初白居易的一首諷刺詩所言：“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

對玄宗以后的唐代作家來說，如果這不是整個唐朝的鼎盛期，也是玄宗在位時的鼎盛期。但在許多方面，在以后的10年和更長的時期中，人們可以看到姚崇和宋璟時期許多政策的繼續和進一步發展。

720年正月被任命的新宰相為源乾曜和張嘉貞[[103]](#_103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666—729年）。源乾曜在姚崇罷相之前一度與姚同任宰相。張嘉貞則是一個北京地區的世代名門之后，他的先祖在隋代已在河東西南（今山西）的濮州定居。他在686年前后的明經考試中得中，但在第一次授職中因有過錯而被撤職。后來在8世紀初期，他被推薦擔任去河東道視察的一個御史的非正式助手，這位御史用他起草奏議，并把他推薦給武后。武后對他印象很深，就任命他為御史。在兵部和中書省任職后，又擔任重要的道的都督之職；在玄宗時他任并州長史，在那里贏得了官風整肅的政聲。717年，他在太原建立一支3萬人的大軍（天兵軍）以監視在默啜汗死后就向唐投降并定居在河東北部的許多突厥人，張嘉貞就在該道任節度使。

雖然新宰相都沒有姚崇或宋璟的那種形象，但兩個人都因對職守兢兢業業和確立健全的行政而見稱于時。721年陰歷九月，在老對手姚崇死后幾天，張說被起用為第三個特任宰相和兵部尚書。他自713年被撤去宰相之職以來，先后在一些道擔任要職，政績卓著；最后他接替張嘉貞而任太原天兵軍的節度使。[[104]](#_104___Jiu_Tang_Shu____Juan_97_D)

有一段時間張說的大部分工作與軍務有關。從722年陰歷四月至723年陰歷四月，他任朔方軍節度大使這一要職。朔方藩鎮控制著緊靠長安北部的關中邊境。722年后期，張說在那里與叛亂的突厥人作戰，因為這些突厥人在黨項人的支持下前一年在鄂爾多斯地區崛起，這時又發動叛亂。張說平定了叛亂，并把繼續住在中國邊境內的鄂爾多斯地區的5萬非漢人遠遷到今河北和河南省交界處的內地。[[105]](#_105___Jiu_Tang_Shu____Juan_97_D)

隨著邊境問題的解決，張說建議大量削減當時號稱60余萬的邊防軍。他提出讓其中的20萬人解甲務農。張說認為邊將在設法擁兵自重，皇帝雖有所猶豫，但仍被說服，同意了他的計劃。同時張說又提出一個方案來代替以府兵短期配備各衛的舊制度。他要求把驍勇善戰的彍騎軍（他們不承擔一切特殊任務）吸收到各衛和北門軍中，以加強京師的防御。[[106]](#_106___Jiu_Tang_Shu____Juan_97_D)

723年初期，張說和張嘉貞發生嚴重爭吵。多年前，張嘉貞在兵部是張說的部屬，但現在他作為右相已不愿再屈己就人。張說對此心懷不滿；當張嘉貞的弟兄因瀆職獲罪而張嘉貞本人又拒絕向皇帝表示悔悟和請罪時，他被解除宰相之職，懷著對以前同僚的怨恨被外放出任刺史。張說接替了他的中書令之職。[[107]](#_10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代替張嘉貞的人選是王晙。[[108]](#_108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如同張說的情況，這一任命似乎是有意識地讓一名有經驗和有權勢的軍事領袖廁身于宰相之列。與張說一樣，王晙被任命為兵部尚書和特任的宰相；一個月以后，他就任朔方節度使，前往邊境赴任，并視察河西、隴右、河東、河北及自己掌管的朔方諸藩鎮的兵制。他不參與朝廷的事務；723年陰歷十二月，他被貶為長江流域一個州的刺史，因為有人指控他結黨和重用親戚。[[109]](#_10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

從張嘉貞之撤職直至726年初這段時期，朝廷完全被張說控制。這是最后一任內閣，在此期間，政務仍被在武后時已擔任高官并繼續推行許多從她開始的政策的大臣所左右。直到此時，玄宗的全部宰相都通過科舉考試，大部分來自洛陽地區或東北。

姚崇時期推行的集權化政策這些年仍在繼續實施，而張說進行的兩大改革又把相權牢固地樹立了起來。722年末的命令規定，宰相得享受300戶實封的歲入。[[110]](#_110___Tang_Hui_Yao____Juan_90_D)這是第一次給他們提供實職俸祿以外的收入，并承認宰相的職務不再是兼職的咨詢性任命；因為在以往，宰相應在午前完成任務，其他時間應在他的省（或部）工作。次年，這一新情況被制度化。以前宰相的會晤地政事堂被改為正規的宰相官署即中書門下，宰相們的政策建議即以此名義送呈皇帝。宰相的官署開始有自己的分成五房的僚屬，它們分管吏務、樞機政務、軍事、財政和司法。[[111]](#_111_Jian___Zi_Zhi_Tong_Jian)

中書省和門下省的職責界線多年來變得越來越模糊，現在更加糾纏不清了。以前原由各自秘書班子履行的起草和審議的職責現在改由各院——特別是隸屬于中書省的集賢院——的班子負責。[[112]](#_112_Guan_Yu_Ji_Xian_Yuan__Jian)集賢院在718年成立，在725年被改組和改名，當時由張說領其事。它的成員都是兼職的干練官員，受宰相和皇帝之命草擬文告和充當學術顧問。[[113]](#_113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

這些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們給宰相們提供有效地控制政務所必需的個人支持，當只有一個強有力的宰相——皇帝的主要顧問——時也是如此。它們還使皇帝能夠任用各院的學士起草文件和擬訂政策，避免正規的官僚機器制造的拖拉和積壓。雖然在開始時集賢院學士（他們在中書省管轄之下，雖然管轄比較松散）普遍地就以這種方式被使用，但皇帝的其他私人秘書則從翰林供奉選調，直接隸屬于皇帝。738年后，這些人被學士院學士代替，學士院學士開始越來越多地為皇帝起草詔令。這些發展為唐王朝以后政務處理的重大改變奠定了基礎。

源乾曜和張說繼續貫徹和加強推行的另一個政策是試圖讓更多有才能的官員到地方政府任職，并確保中央政府中的大臣有地方的行政經驗。由于源乾曜本人對此深有感受，所以他在720年就任宰相后，就要求把他的任京官的三個兒子中的兩個調到地方。[[114]](#_114___Xin_Tang_Shu____Juan_127)這一規定擴大到在京任職的文武官員的家族，他們的許多親屬被調到地方任職。

720年陰歷五月，已在717年停止活動的按察使被重新恢復。721年，在京的每個高級官員和所有州刺史都奉命審查一個縣令官署的政績，然后建議對縣令的獎懲。[[115]](#_115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 722年，政府采取措施以保證增加地方官員的官俸，同時削減給高級京畿官員隨從的津貼。另外，皇帝本人在這幾年的巡行中也召見地方官員，有時給失職者以降級處分。[[116]](#_116___Tang_Hui_Yao____Juan_91_D)

725年初期，皇帝挑選在京的11名杰出官員——包括源乾曜的任大理寺丞的侄子——出任州刺史。在任命時皇帝設盛宴招待朝廷百官。但甚至在這樣公開的場合仍有一個被選派的官員不愿外調，玄宗大為惱怒，于是就把他貶黜。在朝廷為官的吸引力仍大于使地方獲得良好吏治的需要。[[117]](#_11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

### 皇室的問題

有明顯的跡象表明，玄宗在位初年建立起來的政治平衡正日趨不穩。皇帝決心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的第一個跡象出現在他與自己家族的關系方面。720年陰歷十月，皇帝的四弟李范被牽連進一個奇特的事件中。李范是著名的潛心于學術的學者、書法家、古文物收藏家和藏書家，又是與許多學者交往甚密的庇護人。他現在與他妹夫（即睿宗幼女霍國公主之夫）裴虛己一起被控不正當地查閱預言吉兇的巫書——這一指控通常是含蓄委婉地指策劃取代皇帝的宮廷陰謀。裴與公主離婚，被放逐到遙遠的嶺南。同時，李范的兩個親密的文人助手被貶至地方工作，原因是他們違背了皇帝最近的禁令，即諸王、駙馬及其家庭成員不得與其近親以外的人進行密切的社會交往。另外，所有術士不得進入官宦之家。[[118]](#_11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

李范本人未受到任何懲處，在726年死前，與皇帝的關系依然很好。但在720年和721年，前此10年在地方任職的諸王都被召進京，長兄李成器擔任太常寺卿，李成義被授予威望很高的司徒的榮銜。其他諸弟則在太子府任職。這種情況的發生，可能應部分地歸咎于諸王對他們州的職守毫不熱心，源乾曜在716年曾經對此有過抱怨。但更可能的是，皇帝感到他們與自己的諸子一樣應該留在京內，以便監管。

725年，他的另一弟李業也與一件涉及皇甫恂和韋賓的十分類似的事件有牽連：皇甫恂為殿中監；韋賓為李業的內兄弟，又是太子府的重要官員，太子娶他的另一個姐妹為妻。他們被控向術士卜問休咎。這一次的后果更為嚴重。韋賓被鞭笞致死，這也許是因為他是主犯，也許是因為他與皇太子瓜葛太深而使他成為參與宮廷陰謀的十分危險的潛在敵人；皇甫恂被放逐至嶺南。但李業及妻子又逍遙法外。李業繼續任太子少保，在734年極盡哀榮地死去。[[119]](#_119___Jiu_Tang_Shu____Juan_95_D)

比他弟兄的問題甚至更加嚴重的是皇后的地位。他即位初期，后宮中以元獻后和武惠妃最受寵愛。元獻后是隋朝大臣楊士達的曾孫女，武后之母也來自這一門第。元獻后于710年被選入后宮，生一子（后來為肅宗帝）一女。她與張說聯系密切，她的女兒就嫁給張說之子為妻。但在玄宗登基后不久她就去世。[[120]](#_120___Jiu_Tang_Shu____Juan_52_D)玄宗后來特別迷戀另一個妃子武惠妃，她為他生下四子三女。武惠妃是武后的近親武攸止之女，她的母親也出身于無處不在的楊氏大姓。[[121]](#_121_Jian_Huo_Hua_De__Lie_Wei)

王皇后的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是姜皎，在玄宗朝的頭10年中，他是皇帝貼身的親密寵臣，與源乾曜又是姻親。在722年，皇帝與無兒女并日益被冷落的王皇后的關系趨于緊張。皇帝因她無子女，就與姜皎秘密商量將她廢黜，但姜皎把此事透露給皇后。娶皇后之妹為妻的一個皇族低級成員報告了姜皎的這一輕率行動。玄宗處以鞭笞并把他放逐，他死于途中。[[122]](#_122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

皇后這時比以往更有理由擔心自己的地位，她一心想生出一個兒子來維護她在宮廷的地位，雖然皇帝還沒有最后決定讓別人代替她。她的胞兄弟王守一這時安排一個和尚為她作法畫符，以保證使她生子。當724年陰歷七月此事敗露時，王皇后被貶為民。王守一被流放，與皇室之妻離婚，最后奉命自殺。但前皇后沒有另受懲處，而在宮內另住一地，在陰歷十月死在那里。其他的妃嬪都喜歡她，皇帝本人也后悔將她貶黜，就像他后來后悔對姜皎的懲處那樣。[[123]](#_123_Jian_Yu_Da_Gang___Liang_Tan)

與張說發生過沖突、此時任戶部尚書的前宰相張嘉貞也受王守一之案的牽連，被外放到浙江任刺史。王皇后的貶黜可能出于政治動機；有人主張，與武家有長期親密關系的張說一直支持武惠妃反對皇后，但這主要是推測。可以肯定的是，皇帝沒有封武惠妃為后，她仍為惠妃（一等寵妃），不過她家族成員得到的那種榮譽和升遷卻相當于皇后家族的待遇。726年稍晚些時候，他打算封她為后，但當他宣布這一意圖時，有人反對，認為此舉不明智，因為她的家族曾經是唐王朝的宿敵，還因為既然她不是皇太子的生母而有自己的兒子，封后之后可能會使繼位問題陷入危機——事實證明這一預言十分準確。皇帝生前從未封她為后，雖然她無疑仍保持第一妃子的地位。

### 關于貴族的復起

8世紀20年代初期最重大的政治變化也許是作為一支活躍的政治勢力的關中舊貴族的重新崛起。第一個明顯例子是宇文融的嶄露頭角（詳下文）和李林甫在政治舞臺上的出現。貴族對那些保衛經過考試選拔和在武后時期開始當官的東部人利益的老衛士進行挑戰，從而造成了下一個10年的尖銳的政治分化，雖然對立集團的界線絕不像有些人提出的那樣涇渭分明。

除了8世紀20年代貴族在全國范圍內重新崛起外，還有其他跡象表明，有嚴密界限的貴族的舊思想正在復活。在這一世紀初期，在太宗時期最受人關注的宗譜已經重新時興起來，在玄宗在位的整個時期它吸引了許多學者，其中包括許多最著名的官方史學家。劉沖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中宗時期提議編一部全帝國最有名望的家族的官修宗譜大全。重要的是，他提出它不應根據以擔任唐代官員為收錄標準的659年的《姓氏錄》，而應根據638年的《貞觀氏族志》編纂，因為后者更注意傳統的社會地位。在前一世紀雖然容許改變家族的地位，但這時的情況似乎是，在名門大族面臨武后時期吸收的出身較低的人的政治挑戰時，新的宗譜匯編可能旨在重新樹立這些大族的社會地位。

不像以前的匯編，這部作品是委托給包括劉沖（他的家庭有專門編修宗譜的長期傳統）和劉知幾在內的官方修史者編寫的。它修成于713年，并在同年送呈玄宗，其篇幅不少于200卷。編寫的態度顯然是慎重的，因為作者們奉命校正和使之符合當時情況，然后把它頒行于全國。在723—726年期間，著名的史學家韋述又加以補充，結果寫成長達20卷的補編，名為《開元譜》。從實用意義上說，還不清楚修志的實際意圖是什么。劉沖的奏疏提出，這個項目意味著要區分士大夫與平民的出身，不過唐代的任何材料都沒有官方鼓勵這種區分的記載。但從16世紀起，在一批中國宗譜著作中保持著一種持久不衰的傳統，即在717年頒布一個詔令，規定26個大家族的突出地位，并禁止其成員與這些家族以外的人通婚。在整個玄宗在位期間，宗譜研究繼續發展；749年，當貴族的地位已經提高了十多年時，李林甫頒布了《天下郡望姓氏族譜》，它似乎表明通婚只限制在這一集團內部。[[124]](#_124_Jian_Cui_Rui_De___Tang_Dai)

因此從玄宗朝初年起，政府似乎已在支持舊貴族的社會權利，在8世紀20年代以后，高級官員中的舊關中貴族成員的人數穩定地增加，當然，玄宗一定早在即位之初就開始吸收他們了。

貴族政治勢力的另一個源泉無疑是與皇族結成的復雜的姻親網絡。根據掌握的諸王的婚姻材料，他們幾乎都與關中和河東南部地區一小批名門氏族通婚。有些家族不斷地與皇室通婚。例如，娶睿宗之九女并在720年因與李范牽連進丑聞而被流放的那個倒霉的裴虛己有一個弟兄娶皇族成員為妻，其子也與皇族通婚。另一個弟兄之子和孫也被選為駙馬。他的從兄弟裴巽是睿宗之七女薛國公主的第二個丈夫（她的前夫王守一724年在他姐妹王皇后遭貶后被處死）；他的孫子也成為玄宗的一個幼女之夫。

楊氏、竇氏和薛氏及隋朝的宗室提供了許多唐皇室的配偶；單單前隋皇室的一支，就連續三代有成員為皇室配偶。與唐皇室結成婚姻網絡的另一個例子是8世紀40年代脫穎而出的韋堅的家族。他的一個姐妹嫁給李業（玄宗之弟），另一個姐妹嫁給皇太子李瑛，而韋本人則娶皇帝的寵臣姜皎之女為妻。

值得注意的是，一再被選為皇室成員配偶的家族中有許多人在殿中省、東宮或在為皇帝服務的官署中任職。但皇室不可能只與專為宮廷服務的一小批朝廷精英通婚；皇室的關系有廣泛得多的政治含義。玄宗的有記載可查的32個女婿中，已知與唐代宰相有親戚關系的不少于19人。玄宗的三個女兒就嫁給了源乾曜、張說和蕭嵩這三位宰相之子。把女兒下嫁張說之子（他后來成為玄宗重要的寵臣）一事說明，這種聯姻不僅僅面向大貴族，因為張說的氏族是默默無聞的，8世紀50年代的宗譜學家拒絕予以收錄。同樣，在玄宗在位的后期，公主也曾下嫁給他的寵妃楊貴妃的較無名望的家族的成員。

### 宇文融的崛起

傳統的史學家認為，8世紀20年代初是玄宗執政的轉折時期：軍事的勝利助長了他對外擴張的野心，同時他又放棄了早期的儉樸和克制，這時玄宗開始處于一批批因擬訂使他能實現其目標的財政政策而得寵的大臣們的影響之下。宇文融[[125]](#_125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就是其中的第一個人，歷史學家對他進行了無情的指責。

但當宇文融在721年出現于政治舞臺時，朝廷已面臨對玄宗的宏圖毫無幫助的和不可避免的財政問題。戶籍冊列有應履行租庸調稅義務的人口及他們通過均田制取得的土地之數量，但幾十年來已有人抱怨戶籍登記制嚴重地被忽視。忽視的部分原因是沒有系統地對各家各戶進行再登記和對原來登記的內容進行修正；部分原因是全國許多地方原來的課稅和土地制度很不完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逃亡戶的問題日趨嚴重，一些人為了逃避納稅和勞役而離鄉背井，在其他地方定居而沒有登記，所以未予課稅。同時，大地產的數量大量增加，其中許多為出身較低的官員所有，他們需要地產以穩定他們的經濟地位。例如，據張嘉貞的傳記記載，他在朝廷卿相中以不追求大房地產聞名。利用因緣時會的人不但有暴發戶，而且有歷史悠久的名門成員。例如，出身于東北世家并在8世紀20年代曾任包括刑部尚書在內的各種高級官職的盧從愿因積聚大量地產而臭名遠揚，最后因這一名聲而未能當上宰相。

721年，宇文融首先提出應全面檢括所有未登記的逃亡戶。他是北周皇室的后裔，通過世襲特權而不是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由于源乾曜的庇護，此時正擔任御史。經過廷議，朝廷頒詔，限令未登記的定居者在百日內向官府投案，然后或是重返故里，或是在所居地重新登記。未投案者將被集中并運往邊境。這一措施似乎未認真執行，并且遭到一定程度的抵制。723年宇文融又擬訂一個新方案，它規定向官府投案的未登記的定居者可以免稅六年而繳一種特殊的“輕賦”，這樣，那些占地者就能以非常有利的條件取得正式的地位。為了推行這一措施，宇文融被特命為勸農使，并配備一批有專才的判官，他們作為額外的御史被派往全國各地監督此方案的實施。

這一方案取得很大的成功，甚至得到漏登戶本身的歡迎。724年，宇文融的班子又增加了判官，最后，不少于80萬個未登記的戶及相應數量的漏登土地列入了簿冊。這個措施的重要性是明顯的；這些家庭約占726年登記的7069565戶總人口的12 %。玄宗對此非常高興；725年，宇文融升任戶部侍郎，并開始在朝廷起重要的作用。[[126]](#_126_Guan_Yu_Yu_Wen_Rong_De_Fang)

但方案引起許多人的反對。皇甫憬和楊相如上奏說，這樣會引起人民的困苦，并會鼓勵地方官多報未登記的占有地者數字來取悅朝廷。但宇文融得到源乾曜和中書省舍人陸堅的有力支持，反對者都失寵。甚至在方案付諸實施后，異議繼續不斷，直至皇帝被迫就此事專門進行廷議，而在討論時又有人反對。

這一方案不過是全面貫徹一個已經施行了兩個多世紀并詳細載入玄宗早期精心修訂的律令中的制度罷了，但竟會引起這樣一場騷動，實在令人費解。反應部分是經濟性質的：如果這一制度被忽視，那么應該推行它的官員就成了主要受益者，因為這樣能使他們大量收買土地和吸引原來被迫離鄉背井的家庭為他們勞動。當然，反應部分也是政治性質的：宇文融是貴族，不屬于自武后時代起就控制朝廷和占突出地位的科舉出身的官僚集團。他還主張用合理的制度來解決朝廷的重大財政問題，而不是采用張說力主的那種導之以德和齊之以禮的政策。同時，張說與同僚宰巨源乾曜的關系開始趨于緊張，如上所述，后者為宇文融的支持者。但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反對與其說是針對重新登記，不如說是針對進行再登記時使用的非正規制度的方法，即專門任命宇文融為勸農使，并為他配備一批助手，使這些人擺脫本應通過它們進行這類改革的各級官僚機器而自行其是。在玄宗朝較早的時期，地方已使用專使來改造運輸體系和組織鹽的生產，所以這種非正規的組織不是新鮮事物；但宇文融的改革是一項全國推行的重大政策，它突出了這類特權對原有的官僚機構所構成的威脅。

宇文融方案的成功使玄宗能夠以正規的租庸調這一公認的正統方式來為他的國家提供資金，并且能把漢代一度推行和專使劉彤在721年奏議后作出的關于恢復鹽鐵專賣計劃暫時擱置下來。同年，姜師度已經成立軍墾以開采河東道南部的鹽池，同時，已調到四川任節度使的蘇颋也奉命開采該地的鹽池以作財源。如果在全國范圍內采用這些政策，它們對行政現狀構成的威脅就會比宇文融檢括農戶政策的威脅嚴重得多。[[127]](#_127___Jiu_Tang_Shu____Juan_48_D)

### 封禪與張說的垮臺

張說曾經鼓勵玄宗恢復許多象征王朝中興的禮儀。722年陰歷二月，皇帝被迫把朝廷遷往洛陽。在返回長安時，張說說服皇帝長途繞道前往潞州、太原和汾陽（潞州是玄宗過去任地方官之地；太原是高祖開創唐王朝之地；而汾陽是他祭祀后土之地，這一儀式在漢武帝時制定，但久已中斷）。繞道后，皇帝任命他為中書令，從而成為右相，以此來肯定他的地位。[[128]](#_128___Tang_Hui_Yao____Juan_10Sh)

同年陰歷十一月，玄宗在長安南部舉行盛大的祭典；又在張說的建議下，對皇帝祖先的祭祀作了若干變動。在舉行這些重大的禮儀活動時，都頒布大赦令；南部的祭祀還舉行大酺（公開的狂歡聚飲）；酺在各道治地持續3天，在京師則持續5天。[[129]](#_129___Tang_Hui_Yao____Juan_8_Di)

724年陰歷十一月，在張說的帶頭下，朝廷要求皇帝舉行國家禮儀中最威嚴隆重的儀式，即在中國的五岳之首的山東泰山舉行封禪祭典。雖然源乾曜反對此議（這一分歧逐漸導致兩個宰相的公開分裂），皇帝仍采納，并宣布于次年陰歷十一月舉行封禪；張說奉命設計應有的儀式。為了確保不致發生突厥人利用皇帝離京而朝廷又在山東之際侵犯邊境的可能，朝廷同意要求突厥人和其他邊境民族派代表參加。

724年后期，朝廷又已遷往洛陽。725年陰歷十月，皇帝攜大批官員、皇親、外族領袖和無數隨從浩浩蕩蕩啟程前往泰山，走了將近一個月才抵達該地。

皇帝的巡行行列沿路長達若干里，每經一地，周圍數里的農村都遭到了破壞。祭祀后，他們來到附近孔子的故鄉和孔廟又舉行祭典，然后返回洛陽；這次取道另一條更南的路線，因為無論哪一個富饒之地，也負擔不起數周內兩次駐蹕的費用。[[130]](#_130___Tang_Hui_Yao____Juan_8_Di)

祭祀取得了巨大成功，也是張說的勝利，他奉命為封禪盛典寫了頌詞刻在山上；726年初，他開始編新的禮儀法典。但一些與禮儀有關的事件導致了他的垮臺。如前所述，他曾與源乾曜就祭典之事爭吵過。他還反對宇文融推行重新登記各道人口的措施。在祭祀期間，他把最好的差事交給他自己的追隨者，實實在在地提升參加盛典的文官，而只授給武將虛的榮勛，因而觸怒了朝廷中的許多人。曾在中書省張說手下任職并作為他的被保護人的張九齡極力提請他謹慎從事。但張說我行我素，他的人事委派引起了普遍的不滿。

726年初，張說反對皇帝選用靠蔭庇進入仕途的東北貴族崔隱甫（？—736年）為御史大夫，理由是他認為崔缺乏文才。張說提出多年來與之關系融洽的崔日知應任此職，而崔隱甫更宜任武職。但玄宗嚴拒張說的提議；崔隱甫被任命為御史大夫，而張說之友崔日知則被任命為禁軍的將領。[[131]](#_13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張說此時面臨的是一個其御史大夫和中丞宇文融均為他的公開敵人的御史臺。另一個中丞為李林甫[[132]](#_132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752年），他是皇族的遠親，在科舉考試中也沒有中式，他的官宦生涯是通過在禁軍中任職開始的，他通過宇文融的薦舉而獲得了在御史臺的官職。敵對集團對御史臺的控制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因為只有他們才有權彈劾任何大臣而不管彈劾對象的地位多么顯赫。張九齡力促張說采取措施自衛，但張說顯然感到很安全，他答復道：“鼠輩何能為！”

他繼續反對宇文融及其同僚。725年末，玄宗同意宇文融關于改革選拔程序的建議，以一個人數眾多的負責任命的銓選官組織來代替吏部的三名高級官員。據推測，這是阻止張說再專斷地任命官員的臨時措施，因為在張說下臺后的第二年，舊制又被恢復。張說對付他政敵的辦法是干脆扣押他們的奏議。

762年陰歷四月，張說被崔隱甫、宇文融和李林甫彈劾，罪名有：受賄、向術士問吉兇和濫用職權謀求私利。玄宗命以近來與張說不和的左相源乾曜為首的一批高級司法官員進行調查。罪狀似乎可以確立，但玄宗經其忠誠的宦官高力士的勸說后作出決定：鑒于張過去對國家有大貢獻，只免去他的宰相職位，保留其他實職。[[133]](#_133___Jiu_Tang_Shu____Juan_97_D)

李元紘[[134]](#_134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733年）被指定接替張說的位置，他是西北貴族世家的后裔和696—698年期間曾任武后宰相的李道廣之子。他靠蔭庇進入仕途，是玄宗時期被任命的第一個無科舉功名的宰相。玄宗登基初年，當太平公主和竇懷貞企圖占有某佛寺的水磨時他奮起抵制，因此知名于時。后來他贏得了尤善理財的優秀行政官員的美譽。725年，他已取代反對宇文融政策的楊璟而擔任戶部侍郎，如果沒有張說的反對，他是本來可以擔任尚書的。他顯然是宇文融的支持者，也主張推行類似的合理化的財政政策。他被任命后就時政詳加奏稟，所以深得玄宗的贊賞。

在短期內，源乾曜和李元紘牢牢地控制著朝廷，宇文融和他的伙伴控制著御史臺，使重新登記的政策逐步完成。

陰歷九月，杜暹[[135]](#_135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680年以前？—740年）被任命為第三個宰相。杜暹出身于河南的士大夫之家，舉明經；按照常規，他的官場生涯從大理寺和御史臺開始，而從716年起是在邊遠的西部度過的，他在那里成功地抵御了突騎施部和于闐叛亂統治者對安西都護府（龜茲）的侵襲，從而在部落中很有名望。因此他與先前的張說和王晙一樣靠顯赫的武功擔任宰相，而這正是源乾曜和李元紘完全不具備的。

在此期間，張說在朝廷仍有影響，凡有重大問題，玄宗都與他商議，所以宇文融和崔隱甫經常擔心他會東山再起。726年，玄宗擬封武惠妃為后的計劃遭到反對而未實現，反對的理由是她的支持者張說會因此而有功，從而重新獲得權力。727年初，宇文融和崔隱甫又展開攻擊，一再指責張說。在朝廷這次不斷的沖突中，玄宗顯然對雙方都感到不耐煩，就命張說退隱，命崔隱甫回故里照顧老母，并任命宇文融為河北的一個刺史，負責那里的治澇和開墾計劃。[[136]](#_136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退隱后，張說指導編纂一部新的禮儀法典以代替7世紀編成的那一部。在徐堅——此人曾協助他擬定封禪祭典的禮儀——為首的一個禮儀專家大班子的協助下，張說繼續從事這一工作，直至去世。成書的責任落在蕭嵩肩上；732年，這一長達150卷的巨著終于完成，定名為《開元禮》。[[137]](#_137_Guan_Yu___Kai_Yuan_Li____De)

雖然造成不和的一個根源被清除了，但杜暹和李元紘之間意見的經常相左仍使朝廷不能平靜。張說雖然正式致仕，728年二月仍被任命在集賢院任職，從事編修這一時期的官方歷史。玄宗又開始通過派遣宦官就每個重大問題征求他的意見。[[138]](#_13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728年陰歷十一月，蕭嵩[[139]](#_139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約669—749年）被任命為另一個特任宰相。他是梁皇室的后裔，也靠蔭庇出仕而沒有什么文才和文學造詣，但姚崇對他有很高的評價，終于升任尚書左丞，后又任兵部尚書。762年，他任朔方節度使，并成功地抵御了吐蕃對西北的大舉侵襲。

729年陰歷五月，皇帝對杜暹和李元紘之間長期的不和感到厭煩，就把兩個人都貶為刺史，同時又降源乾曜為尚書左丞，留在朝廷使用，但不再是宰相。蕭嵩任門下侍中（自張說致仕以來，此職一直空缺），從而成為資深的宰相。被召返京任戶部侍郎的宇文融此時升為門下侍郎及特任宰相，而裴光庭[[140]](#_140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676—733年）則任中書侍郎及特任宰相。裴光庭出身關中望族，娶武三思之女為妻，他的父和祖父都為名將，本人在705—706年中明經考試。他連續在兵部和鴻臚寺任職，并曾提議讓突厥族和其他外族派代表參加封禪祭典。雖然他得中科舉，又是貴族，但根據他后來的選拔政策，他反對對官僚集團中的中式的精英人物破格提升。[[141]](#_141___Xin_Tang_Shu____Juan_108)

這樣，新閣全部由貴族組成，這是玄宗即位以來的第一次，玄宗初期占支配地位的集團以三年前張說的失勢為先兆，此時完全失去了光彩。宇文融在三個宰相中權勢最盛。他已長期邀得特殊恩寵，自李元紘被免職后，皇帝非常需要他的理財才能。

朝廷已經連續進行幾年戰爭（特別是與吐蕃的戰爭），因而軍費激增。另外，許多自然災害打擊著帝國。726年，東部平原有大洪水，許多人淹死。727年秋，范圍更廣的洪水襲擊了河北，許多地方的莊稼未及收割就被毀壞。726—728年又連續發生嚴重旱災。這一時期氣候的嚴重失常延續至736年前后。這些災害沒有波及容易發生干旱饑荒的京畿地區，但卻影響了東部平原這塊提供歲入的最富饒地區。727年初冬，朝廷在東部發生災難性的水災后，被迫從洛陽遷回長安。[[142]](#_142___Jiu_Tang_Shu____Juan_8_Di)

雖然宇文融的地位看來很安全，但有些官員對他懷恨在心，因為他使用個人助手而不用正式任命的官員來實施他的計劃，使這些人感受到威脅。但他卻信心十足地認為他能很快解決帝國的問題，同時委任了幾個杰出的人物。年邁的宋璟掌管尚書省，部分原因也許是為了安撫文士，他的門生裴耀卿（下文將予介紹）任戶部侍郎。但主要通過皇帝個人恩寵取得權力的宇文融此時卻自不量力，與另一個新得寵的皇族信安王李祎發生沖突，受到致命打擊。李祎是太宗的曾孫。[[143]](#_143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玄宗初年他曾在幾個重要的州任職，卓有政績；后來他一度退隱，但在727年繼蕭嵩被任命為十分重要的朔方鎮的節度使，直至735年，在此期間，他先后與吐蕃和契丹作戰，取得重大勝利。宇文融既害怕他擁有的很大的兵權，又擔心他對皇帝日益增長的影響，同時還可能防備他會加強蕭嵩的政治地位而對己不利。因此，他就照搬以前對付張說的辦法，安排御史李寅彈劾李祎。但這個御史預先通知了李祎，李祎立即上奏玄宗。當李寅后來將彈劾呈上時，皇帝怒加駁斥。信安王未受非難，宇文融反而被貶為河南的汝州刺史。他擔任宰相只有100天。[[144]](#_144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05)

在憤怒中貶黜宇文融后，玄宗才意識到他已沒有能為帝國理財的大臣。于是他召見裴光庭和其他大臣，要求他們提出貶黜宇文融后應采取的措施。其余的宰相無言答對，但他們意識到，宇文融即使在地方任職，對他們的權力依然是一個威脅，于是急忙揭露他組織私黨和他兒子的所謂受賄行為。他再次被貶往嶺南擔任小官，但即使在那里，他的政敵們也不放過他。一年多以后，司農寺指控他727年在一州的任職期間大量貪污。他被削職和發配至今廣西的一個邊遠地區。他病死在途中。[[145]](#_145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 蕭嵩和裴光庭的內閣（729—733年）

在穩妥地清除了宇文融之后，蕭嵩和裴光庭仍牢牢地控制著朝廷，雖然兩個人的關系并不和諧。730年，裴光庭采用一個改革“選”制的措施。當時實行的那一套復雜規定原來是他父親裴行儉在669年推行的。但多年來在任命重要官職時，個別有才之士——特別是有文才的人——是主要的考慮對象，而資歷和漫長的任職期則被忽略。此外，吏部的官員把大部分時間用于對京畿區的高級官職作重大任命，而忽視了對遠為眾多和同樣重要的地方低級官職的任命。裴光庭此時對所有官職推行一種“循資格”的制度，同時命令對胥吏擔任流外官的任命應由中央政府詳加審查。[[146]](#_146_Dai_He_Du_____Xin_Tang_Shu)這些措施部分地似乎是自713年以來企圖完成的把地方官員像中央政府官員那樣置于嚴密控制之下的工作的繼續。它有利于無數從胥吏起家的從事日常工作的人。但這一措施又打擊了選拔中舉士子精英隊伍的過程中的特權地位。它使后一種人為之嘩然，他們的最年長的代言人、退隱的宋璟極力反對新措施。但抗議未起作用，這個措施得以推行，中式士子的地位進一步被削弱。

713年，皇帝自己的侍從也開始制造問題。玄宗不但深受外廷官員中的寵臣的影響，而且也受形形色色的心腹的影響。前文已經談到這些人中最突出的姜皎在722年毀滅的過程。后來，皇帝對另一個類型迥異的王毛仲[[147]](#_147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也倍加賞賜和寵愛。王毛仲是一個出身寒賤的職業軍人。他有高麗血統，7世紀高宗遠征時他的家族淪為奴隸，當玄宗為地位較低的王子時，王毛仲成了他個人的奴仆。王毛仲在協助玄宗打擊太平公主后，得到了厚賞、最高的名義職務和禁軍中的一系列任命。在8世紀20年代后期，他在為軍隊騎兵籌集軍需時成績卓著。729年他娶禁軍中另一個名將之女為妻。朝中的幾個大臣對此提出異議，因為這樣做會使他控制宮中禁軍和北軍的權力過大，但玄宗不予理會。730年，他與北軍中一批將領的關系非常密切，他們利用他個人對玄宗的影響肆無忌憚地進行一切非法活動。王毛仲本人要求擔任兵部尚書。皇帝的拒絕使王毛仲大為不滿。

同時，王毛仲又與跟玄宗關系密切的宦官集團發生沖突。宦官中的高力士乘機向玄宗進言，指出王毛仲及其一伙將領構成的威脅，他們一起控制著京都最強大的軍隊——北軍。玄宗開始行動了；731年初王毛仲和他的幾個兒子以及幾個同伙將領被貶往邊陲的道擔任次要的職務，以后不久，王毛仲奉命自盡。[[148]](#_14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這一行動似乎粉碎了曾在玄宗初期起重要政治作用的北軍的力量。它還助長了日益成為皇帝的心腹代理人的宦官的權勢。但他們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高力士在將近半個世紀中一直是皇帝忠實可靠的奴仆，[[149]](#_149_Guan_Yu_Shou_Yu_Gao_Li_Shi)所以在玄宗時期，宦官不可能像以后幾朝那樣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勢力。

### 裴耀卿：運輸改革和營田

730年，重大經濟政策的新倡議者裴耀卿[[150]](#_150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681—743年）在朝廷中嶄露頭角。他出身于西北的世家，少有奇才，在武后時中童子特科。中宗朝他在睿宗的王府工作，后又在各地方任職，有突出的政績。729年，經宇文融的薦舉他被任命為戶部侍郎，但因宇文融也隨之被貶黜，他似乎沒有到任。730年任宣州（今安徽南部）刺史時，他上疏詳細陳述應如何改造長安運糧的運輸體系，即把通往京師的路線分成若干站，以免邊遠的府的稅糧船必須全程進京。[[151]](#_151___Tong_Dian____Juan_10_Di_5)玄宗對此未采取行動；但731年朝廷又被遷往洛陽一年，供應長安的問題顯然現在非得一勞永逸地解決不可了。

730年，裴耀卿又提出解決以前宇文融的再登記措施已部分解決的“逃亡”戶問題的建議，辦法是命這類戶按村社在空地或未開發之地定居，并讓它們按邊境普遍存在的屯田模式組織營田。這些營田在逃亡戶居住地建立，如果當地沒有土地，這些流浪者就被運往待開發地區。這一計劃與所建議的運輸改革一樣沒有被采用。[[152]](#_152___Tang_Hui_Yao____Juan_85_D)但裴耀卿提出的這兩項計劃在幾年后實現了。

同時，蕭嵩和裴光庭在后者于733年死去前繼續掌權。蕭嵩（其子娶一公主為妻）薦舉王丘代替裴光庭，王丘本人是中宗一女兒之夫，出身于關中名門。王丘雖然與蕭嵩友好相處，但謝絕這一職位，提出應任命韓休[[153]](#_153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673—740年）來代替他。韓休與王丘一樣，既是西北貴族的成員，又是及第舉子，以文才著稱。在8世紀20年代后期，他負責起草皇帝的詔令，并已升任為尚書省右丞。

事實幾乎立刻證明，韓休在朝廷是一個有闖勁和自以為是的人。他一貫堅持原則和道義，頂撞玄宗而毫不讓步，要求撤換禁軍中一個玄宗寵愛的將領，并經常與較隨和的蕭嵩沖突。玄宗看重他的耿直無私，但朝廷兩個宰相的經常爭吵最終迫使他結束這一很不愉快的局面。733年陰歷十月，在韓休任職只有七個月以后，兩個宰相都被撤換；韓休被調任工部尚書，蕭嵩調任尚書省右丞相。[[154]](#_15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他們的組閣未取得突出的成績，雖然在733年陰歷六月對裴光庭的選用官員的嚴格規定的實施有所放松。吏部獲準許在客觀情況許可下不考慮他規定的根據資歷和任職期選拔的原則，中央對任命地方胥吏的控制也放松了。但由于根據資歷提升的原則對官員中除精英隊伍以外的所有官員都有利，他的制度仍被廣泛采用，大批人員繼續從胥吏被提升為正式官員。

733年，宋璟最后從朝廷退隱，他自從不擔任宰相以來，曾經繼續對玄宗施加有力的影響，并且支持京畿官僚集團中科第出身的精英。[[155]](#_155___Jiu_Tang_Shu____Juan_8_Di)由于張說已死于730年，這意味著保護在武后時期已經地位很高的士大夫的最后殘余勢力已經消失。

### “調和班子”：裴耀卿、張九齡和李林甫

玄宗任命裴耀卿和張九齡作為他的宰相以代替韓休和蕭嵩，他們分別成為黃門侍郎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裴耀卿不久前重提運輸體系改革的建議，他之所以被任命，也許是要使建議得以付諸實施。運輸體系的改革急需進行。任命新宰相以后不過幾個星期，朝廷再次被迫遷往洛陽，裴耀卿獲準落實他的計劃，這在下文將予論述。裴耀卿既是貴族，又是宇文融薦舉的財政政策方面的務實的擁護者，雖然他科場的記錄是無懈可擊的。新宰相張九齡是對立利益集團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出身于一個默默無聞的官宦之家，其故里在邊遠南方閉塞的嶺南道；他參加過科舉考試，其升遷主要是由于張說的友情和庇護。張說在726年失勢后，他在州任職，但在731年玄宗命他在秘書省工作，同時為了利用他杰出的文才，又任命他為集賢院學士。此時他撰寫外交文書和起草詔書。733年陰歷五月，即在裴光庭死后，他一度任中書侍郎。

734年陰歷五月張九齡和裴耀卿分別升為中書令和門下侍中，因而成了不折不扣的宰相。同時，宰相班子中又加進了李林甫。李林甫為皇室的遠親，是皇帝心腹姜皎的外甥，靠蔭庇進入官場。他與一批精英文士的關系不好；例如，源乾曜就對他這個年輕人評價不高，歷史學家又指出了他作為一個學者的許多缺點。但他曾擔任過一般應由文士擔任的幾個“清望”官職、國子司業、御史中丞，后來又歷任刑部和吏部的侍郎，以富有效率的行政官見稱于世。

李林甫曾在裴光庭手下任吏部侍郎，當時后者正推行有爭議的銓選方法；裴光庭死后，這些措施停止執行，李林甫即被調至中書省。故他曾與宇文融和裴光庭密切合作過，他們被公認是文士名流的敵人。

有人認為李林甫升為宰相前與張九齡不和，或認為張九齡極力反對李的擢升，但都沒有確鑿證據。后來的有些歷史學家聲稱確有其事，并把李林甫升任宰相之事歸因于玄宗所寵的武惠妃；又說李林甫與裴光庭之妻私通，后者是武惠妃的隔代表姐妹，但這些說法很可能是虛構的；因為當時的所有歷史學家都非常仇視李林甫，競相盡量給他抹黑。[[156]](#_156_Guan_Yu_Zhe_Ji_Nian_Fu_Za_D)

不管張九齡和李林甫是否在734年前就已成為敵人，他們這一領導班子不久就發展成個人間的激烈斗爭。他們的同僚裴耀卿時而支持這一方，時而支持另一方，但總的說他一心致力于糧運體系的改革。李、張二人都深受玄宗尊重：李林甫是一個精明的行政官員和制度專家，張九齡則繼張說起道德的勸導人及正統禮儀和政治才智倡導者的作用。李林甫是一個善于搞政治權術的人，擅長耍陰謀和駕馭人。張九齡是一個有名的難以相處的人，拘泥，固執，礙事，并且對一些小的原則問題斤斤計較；他心胸狹窄，偏見很深。尤其突出的是，他熱烈地信奉一種思想，即文學造詣和學術成就是擔任高級官職的必備條件，并且公開蔑視那些沒有自己那種書香門第背景的人。他最瞧不起的是軍人。

宰相之間既然有這種分歧，麻煩是不可避免的，他們的對立日趨激烈，因為它集中反映了自8世紀20年代以來越來越厲害的持久斗爭，斗爭的一方是通過科舉考試成為官吏的文士精英，一方是舊貴族成員和官僚集團中精于專業的官員。我們在下文將會看到他們的分歧有多大。但更令人驚奇的是，許多重大和有價值的改革竟是在他們雙方共同的任期內進行的。

### 裴耀卿和糧運改革

在733年后期裴耀卿和張九齡出任宰相時，長安周圍的地區被連續降雨毀損莊稼造成的饑饉所困擾。8世紀30年代初期似乎是一個連續發生嚴重自然災害的時期，730—732年發生了大范圍的洪水。733年初期，只得派高級官員往各地進行救災。幾乎在裴、張二人掌權后不久，即在734年初，朝廷被迫遷往洛陽，大臣們奉命前往河北道南部諸受災的州，去分配救濟品和供來年使用的種子糧。

裴耀卿現在放手實施730年提出的改善京師糧食供應的措施。他被任命為江淮河南轉運都使，擁有從黃河轉運糧食的全權，其權在所有地方官之上。他負責一個有副使二人和大批屬員的常設使署，他們直接控制著一個管理轉運糧食的倉庫、船隊和陸運大車的復雜組織。因此，他如同以前的宇文融那樣，成了一個正規官僚機器以外的組織的負責人，所不同的是，他負責的是一個有許多屬員的長期的龐大組織。

通過他的改革，從運河與黃河匯合地運糧至京師糧倉的工作不再由收稅糧的州地方當局負責。這就節省了地方運稅糧船運輸的時間，同時減少了付給地方當局運糧的費用。糧食此時卸入河陰龐大的新糧倉群；河陰是汴渠和黃河的匯合地，由此糧食沿黃河和渭水通過水路逐站運至長安。在每站的終點，糧食儲藏在轉運倉內，以便在適當時機運至下一站。河陰、北部平原的貝州和洛陽都有大量的儲糧。但對長安的供應路線不再在陸路從洛陽運至三門峽下流的黃河邊的陜州。運輸路線直接溯河而上，在三門峽附近需要陸上短途拉纖，但路程只有5英里，而舊路線上的這一路程則長達80英里（見地圖2）。

新體系很收效，它在以后的10年又得到改進。州當局不再負擔舊體系引起的變化莫測的費用和人力浪費；每年轉運至長安糧倉的糧食大為增加——至少是舊政權時可能達到的兩倍；總的運輸費用也大幅度減少。[[157]](#_157_Guan_Yu_Qi_Yun_Shu_Ti_Xi_De)

幸運的是，運輸的這些改進恰好在關中地區連續豐收之時；737年，那里的糧食是如此豐足，以致頒布的幾個詔令容許當地百姓以糧納稅，并授權地方當局以“和糴”方式（即以高于市場價格購糧的救濟措施）收購糧食。737年，向長安運糧的工作暫停，但運輸體系依然保持，并在玄宗朝以后的年代，充分供應京師的需要。當朝廷在736年后期遷回長安時，因出現了富足的新形勢，它就長期留在長安。洛陽仍是東都，但再也不是政府的所在地了。

### 國家“營田”和土地開墾

前面已經談過，裴耀卿在此以前曾主張建立國家管理的營田，作為一種安置許多剩余的“逃亡”戶和開墾耕地的手段。734年后期，張九齡被派往河南西南，在那里建立一批位于淮河北部諸支流流域的大規模的營田，專種水稻。在這一世紀更早時期，幾項大的開墾計劃已經付諸實施，但張九齡似乎在設想規模十分宏偉的發展。使用中央管理“營田”這一辦法，也許是因為所需要的大規模的排灌工程在一般情況下規模太大，非地方當局所能負擔。與裴耀卿一樣，張九齡也被任命為河南開稻田使去監督這一計劃的執行，而這項工作并不屬于原有政府機構的職權范圍。事實證明，張九齡的營田既無利可圖，管理又麻煩，所以737年他失勢后，營田計劃不得不放棄，土地被分給農民所有。[[158]](#_158_Jian_He_Bo_Te___Ba_Shi_Ji_C)但在一個人口增長特別迅猛和由此可將糧食方便地運往兩京的區域內灌溉和耕種大面積肥沃的稻田方面，這個計劃的確是取得了成績的。

### 張九齡和通貨問題

在718—720年宋璟災難性地試圖處理私鑄問題以后，通貨的狀況進一步惡化了。732年，政府為了解決由于錢幣短缺而引起的種種問題，命令凡數額巨大者，一律混合用現金和商品來支付。[[159]](#_159___Tong_Dian____Juan_9_Di_15) 734年陰歷三月，張九齡建議玄宗放棄國家對鑄幣的壟斷和準許任何人自由鑄造。這一激進的建議引起一片激烈的反對聲。李林甫、裴耀卿及裴氏的助手蕭炅共同呈上一份措辭尖刻的奏疏，強調控制鑄幣是皇帝最重要的權力源泉之一，對經濟的控制不應以任何借口而予以放棄。崔沔和劉袟也呈上長篇論證嚴密的奏疏，提出同樣的論點，并且爭辯說，這一措施干脆會導致劣質錢泛濫。張九齡被迫放棄這一計劃。[[160]](#_160___Tang_Hui_Yao____Juan_89_D)后來信安王李祎重提此議，但再次遇到強烈反對，致使它立刻擱淺。[[161]](#_161___Xin_Tang_Shu____Juan_54_D)

### 財政制度的合理化

作為宰相，李林甫從735年后期直至736年陰歷七月還兼任戶部尚書。在此期間，他把注意力放在復雜得不可思議的和曠日持久的工作程序方面，按照程序規定，稅賦、征兵人數、勞役、軍費和各州各政府部門的各種開支必須每年重新加以估算。這牽涉大量文牘工作——李林甫聲稱每年必用紙50萬張；而且這一制度的復雜性造成許多弊病，并使百姓對自己應承擔的義務心中無數。

736年初期，李林甫與朝集使和新任命的采訪使討論這一問題，并要求徹底修改整個稅制和關于地方費用的規定，于是擬定了整套正規的規定，其中顯然包括各州的稅賦定額，并且收在長達五卷的匯編《長行旨符》中。此后，戶部——實際上是它所屬的度支司——只要每年下令定下每個地方當局準許花費的數額就行了。[[162]](#_162___Tong_Dian____Juan_23_Di_1)

改革的細節不詳，不過各地的差別一定很大；但這顯然是行政合理化的一個重大步驟，它使帝國的財政制度更緊密地切合地方實際情況。它還是一大創新，因為政府悄悄地放棄了要求稅率和勞役以及財政管理實施細則全國一致的總原則。

### 各道按察使的設置

急于想改進地方行政并使之合理化的官員不止是李林甫一人。前面已經談到，自玄宗登基以來，朝廷一直全神致力于提高地方行政的效率和吸收較優秀的官員。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是有效地進行中央監督和控制地方行政。自706年以來，按察使（即巡察使）不時被派往全國的10個道。733年，帝國重新劃分為15個道，把幾個較難控制的地區分成更易管理的行政單位，以便視察。734年陰歷二月，即在張九齡奏議以后，各道常設的按察使制度被建立，此制繼續存在到玄宗退位以后。[[163]](#_163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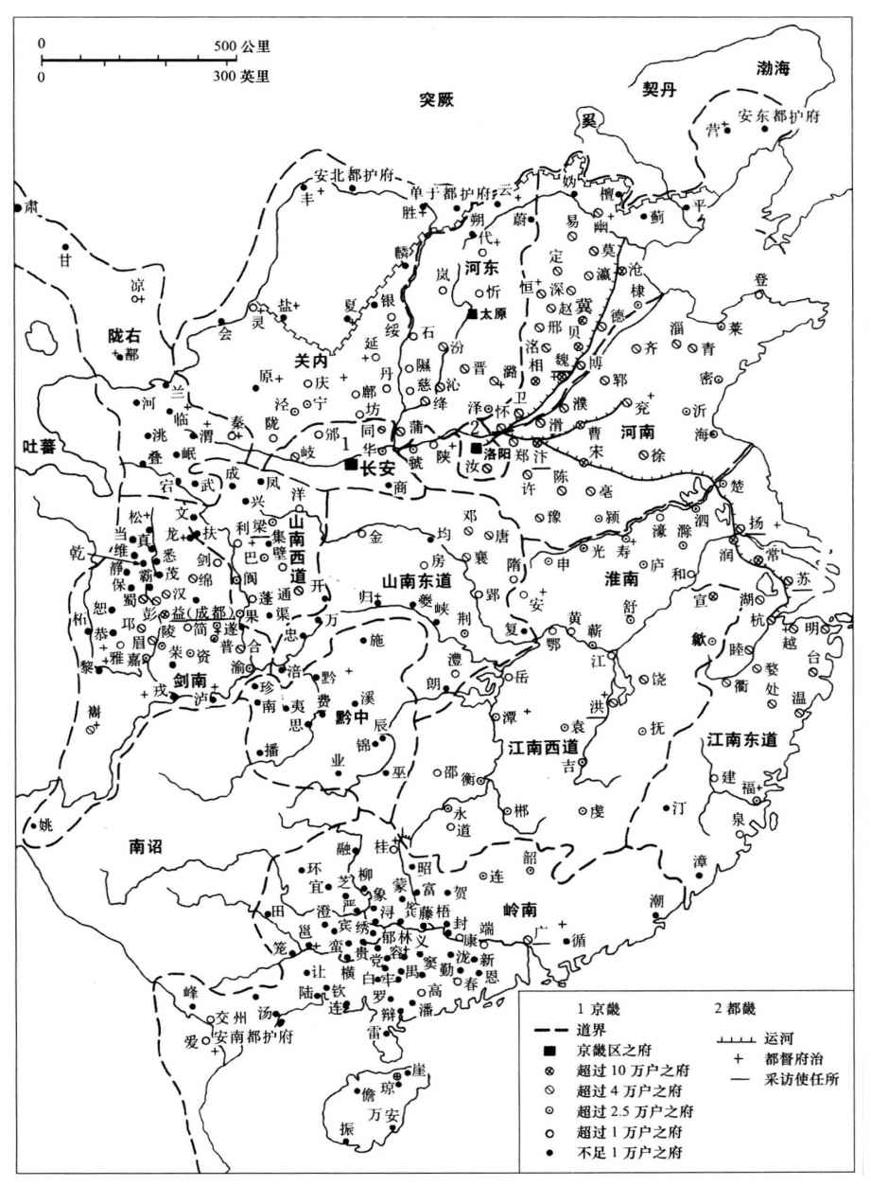
這一改革的直接目的是為了有效地處理地方上饑荒和救災措施等問題和對遷移戶的控制；新按察使還要監督地方官員的工作，以確保他們能有效地分配土地，實施稅法和勞役法以及不濫用他們的權力。這一新措施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在中央政府和州之間設立了一級常設的中間權力機構。但新設的按察使署純粹是一個咨詢性的視察機構，負責貫徹總的行政標準。它們被明令禁止干預日常事務和地方活動的實際進行；它們沒有行政權和道的實際民事司法權。

但有時它們超越自己的權限。750年，按察使被提醒：他們是視察員，不是執行官員；因此他們不應去處理事務，或者充當向朝廷轉呈奏疏的渠道。[[164]](#_164___Tang_Hui_Yao____Juan_78_D)

因此，不應認為這是另設一級地方行政機構。

### 對科舉考試的控制

前面已經談到，裴光庭在733年死后，他的根據資歷和經驗選拔官員的一套規定已被放棄。得到張九齡支持的蕭嵩對此事負責。



地圖11 唐代中國（742年）

圖中劍南道若干州的位置與《中國歷史地圖集》所列有出入。——譯者

只有考慮到科舉考試項目是多么重要，特別是考慮到張九齡深深地了解它作為衡量公認的學術造詣和文才這一標準的重要性，人們才會期待應在這一領域進行種種改革。第一項改革措施雖然與張九齡的姓名無關，但可以說一定是由他倡議的。733年陰歷五月裴光庭死后不久，詔令第一次準許各州學校中有才能的學生（他們是低級官員的子弟）進入國子監的四門學就讀。地方的應試者，像張九齡本人那樣在考試時與京畿的學生相比一直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為后者已受過國子監中一流學者的指導。雖然地方應試者自玄宗初期以來已取得較大的成就，但這一措施使他們更可能在平等的條件下進行競爭。[[165]](#_165___Tang_Zhi_Yan____Juan_1_Di)

在此之前，選拔合格人員擔任官職（選）和給予應試者以出身機會（舉）的制度由吏部掌握。結果吏部成了最有權勢的部，它的尚書和兩個侍郎對那些取得官職的人和被任命擔任要職的官員施加巨大的影響。除了皇帝親自任命高級官員（或者實際上經過宰相的建議由皇帝任命）外，他們能夠影響整個官僚機器的結構。

另一項重大改革在736年實行。這一年初期，未中式的士子和負責考試的官員發生了嚴重的爭執。這些考試一般原由吏部的一個低級的員外郎管理。現在決定，考試應完全脫離吏部的選拔程序。從此，禮部侍郎受權負責出任官職的考試。[[166]](#_166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這樣就大幅度地削減吏部控制官員出仕和他們關鍵的早期生涯的壟斷權。

### 張九齡的下臺

盡管有這些十分可觀的積極成就，張九齡和李林甫就一些具體問題一再發生對立。第一次發生在735年初期，它涉及主張倫理道德的儒生（如張九齡）與制度和法律政策的鼓吹者（如李林甫）之間傳統的爭論問題之一。爭論發生在某人的兩個兒子謀殺一個御史的案件上，御史對此人的處分負有責任。此人兩個兒子認為父親所受的懲罰實屬冤枉，就殺害御史為父報仇，他們也因此被捕。這類似乎是常見的復仇案件引起了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因為兒子為父報仇根據“禮”的經典的規定可以說是正當的，但同時這種行為顯然觸犯了刑法。在復仇案件中當道德和法律有抵觸時當局很難解決，以致在武后時期的一個著名案件中已有人認真提出，應命令犯案者一方面因孝道而受到公開的贊許，同時他又因觸犯法典而應被處死。這一次果然不出所料，張九齡竭力主張釋放犯法者，因為他們出于道義感而為父報仇；而李林甫和裴耀卿則都認為維持法律、秩序和刑法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意義。玄宗也持同樣的態度，殺人者被處死。[[167]](#_167___Tang_Hui_Yao____Juan_188)

另一個經常造成摩擦的原因是繼位問題。武惠妃在玄宗的后妃中仍最有權勢，但她自己仍不能被指定為后，也不能以自己的一個兒子去替代皇太子。736年，她聲稱皇太子和其他諸王計劃殺害她和她的兒子（即玄宗特別寵愛的李瑁），然后廢黜玄宗。玄宗打算廢太子及諸王，但由于此事非同小可，所以就征求幾個宰相的意見。據謠傳，李林甫是由于武惠妃的影響而掌權的，并且曾答應支持她以她的兒子代替皇太子；他通過一名宦官鼓動玄宗采取這一行動，聲稱這是皇室內部之事，玄宗本人的意愿應為首要因素。武惠妃又傳話給張九齡，說如果他助一臂之力，她就支持他繼續擔任首相。但張九齡一貫堅持繼位穩定的重要性，主張對未來的皇帝進行系統的訓練。他進言反對廢黜諸王，并且懷疑他們身在深宮而又在玄宗的監視下有策劃任何這類陰謀的可能性。他拒絕武惠妃的建議，并把此事報告玄宗，但玄宗似乎不能以任何方式斷定此事的真實性，所以不了了之。[[168]](#_16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雖然這一次張九齡的看法占了上風，但到736年，他對玄宗的影響似乎減弱了。他肯定是一個難以相處的咨詢大臣；即使對他頌揚備至的傳記也承認他性情急躁，動輒與人爭吵，所以玄宗的其他朝臣不喜歡他。他對道德問題的一貫堅持還開始采取直接批評政治的方式。此時，玄宗早期的那種忠于自己政治責任的精神開始動搖，日益怠于問政。736年秋，張九齡呈上一份關于儒家經世治國術的冗長說教《千秋金鏡錄》，企圖恢復玄宗對政務的衰退了的興趣，并鼓勵他為全國進行充分的道德領導。[[169]](#_169___Quan_Tang_Wen____Juan_288)

張九齡堅持，施政權應保留在像他那樣的士大夫手中。他反對那些從日常佐僚中提升起來的人，但對軍人尤其藐視，并多次就涉及軍人晉升之事與李林甫公開爭吵。735年，玄宗提出任命幾年前與吐蕃作戰時贏得幾次重大勝利和不久又大敗契丹的張守珪為特任宰相，就像他以前任命薛訥和王晙那樣。曾經反對與契丹交戰和主張“外交”解決的張九齡便起來反對指派張守珪擔任宰相的任命。[[170]](#_17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736年當張守珪在洛陽報捷時，契丹和奚再度起來反抗中國人，他的屬將安祿山率兵對他們進行一次損失重大的懲罰性討伐。張守珪返回大本營后最初打算處決安祿山，并把此事上報玄宗。但后來他改變主意，要求朝廷批準寬恕安祿山。張九齡力促玄宗下令將安祿山處決；當安祿山后來造反并且危及唐帝國的存在時，張九齡的這一行動為他日后贏得了具有遠見卓識的名聲。[[171]](#_171_Tong_Shang_Shu__Di_6814__68)

736年后期，擬定讓牛仙客任六部之一的尚書的任命又引起了爭端，牛仙客為朔方節度使，他作為一個軍人和軍事行政長官而享有盛名。張九齡竭力反對，斷言牛既無必需的行政經驗，又無擔任高級職務所需要的能力。玄宗于是提出給牛仙客授實封。張仍堅決反對，因牛不過履行了一些他認為是日常工作的職責而已，不應授予他特殊的賞賜。玄宗再也不能忍耐，他指責張以牛仙客出身卑賤為理由進行反對的虛偽性，因為張自己也不是出身于名門望族。張九齡這時公開亮明他的偏見：“仙客邊隅小吏，目不識書。”玄宗不為所動，牛仙客得到了分封。但是，張九齡卻成功地阻止了牛仙客在中央政府擔任高官。張與牛仙客并無私仇，約在同時，他在為牛父寫的墓志銘中還盛贊牛仙客。他之所以反對牛仙客晉升，無非是因為牛是軍人，帝國中央機構不該有他的位置。但這一事件還有另一個原因。牛仙客的提升得到李林甫的支持，因為牛仙客具有擔任行政長官的才能。[[172]](#_172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不久，兩個人又就朝廷從洛陽遷回長安之事發生爭吵。735年末，玄宗在關于糧食供應已有改善的報告的鼓勵下，已決定在736年新的一年之初返回長安。但遷移被推遲至736年陰歷十月（此時莊稼大概可以安全收割到手），后來又被推遲到737年陰歷二月。但一心急于在長安履行祭祖禮儀的玄宗因為兇兆突然決定在736年初秋收割莊稼完畢前提前遷移。張九齡和裴耀卿反對，因為這可能會引起御駕所經地區的百姓的嚴重困苦。但李林甫又支持玄宗，聲稱兩京是他輪流居住之地，他可以自由選擇遷移的時間。[[173]](#_173_Tong_Shang_Shu__Di_6822Ye)

玄宗接受李林甫的建議，朝廷在736年陰歷十月二十一日返回長安，這是最后一次遷移。陰歷十一月二十七日，張九齡失勢。他的朋友和門生、曾在他手下任中書侍郎的嚴挺之在此之前引起李林甫的敵意，因為嚴挺之使曾在運輸改革中擔任裴耀卿的助手、剛被任命為戶部尚書并且與李林甫關系密切的蕭炅丟了官。蕭炅被免職的理由是他有作為一個學者的各種缺陷。嚴挺之由于試圖干預對自己前妻之夫王元琰貪污案的審理，此時面臨李林甫的報復。李林甫指控嚴挺之偏祖，當張九齡為嚴挺之辯護時，他也在嚴的屈辱中受到牽連。

此事的結果是，張九齡和裴耀卿都被免去宰相之職而擔任尚書省的仆射，這個職位早已成為級別雖高但無實權的閑職。[[174]](#_174_Tong_Shang_Shu__Di_6824__68)裴耀卿留在朝廷，直到743年死去；在此期間他偶爾也過問政務，但再也沒有什么實權。張九齡的情況則迥然不同。李林甫顯然把他在朝廷的繼續存在視為對自己地位的潛在威脅。737年陰歷四月經張九齡推薦而任職的一個御史因攻擊李林甫的同伙宰相牛仙客（張九齡以前曾阻撓對他的提升）而被貶黜。李林甫乘機把張九齡貶到地方，任長江中游荊州的長史。[[175]](#_175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雖然張九齡的職務和官品仍很高，并得到顯貴的封號和實封，但再也沒有回京，他死于740年。

## 李林甫的掌權，736—752年

李林甫現在是朝廷無可爭辯的主宰，他所代表的貴族利益穩定地處于上升階段。第二個宰相為牛仙客，[[176]](#_176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他的任期從736年后期至742年死亡時為止。牛仙客當然不是貴族成員。他出身于關中一個從未有人當官的默默無聞的人家，他的官宦生涯開始得也極為平常，是從胥吏轉入流內的。他曾在一個縣令屬下任佐吏，在縣令調到隴右藩鎮時已讓他當助手。在隴右，他為節度使的屬僚，既是一員軍事將領，又是行政官員。他在隴右，后來又在河西任節度使時（729—736年），在為軍隊建立行之有效的后勤體系工作中有突出的成績。在河西時他幫遙領節度使之職的宰相蕭嵩代行節度使職權，總管一切軍政，后來又自己任節度使。736年，他調任關中以北極為重要的朔方鎮的節度使。

因此，牛仙客是一個完全新型的宰相。他不是第一個被提升為宰相的將領，以前薛訥、王晙和蕭嵩在玄宗初期因軍功而當過宰相。但與他們不同的是，牛仙客既不是出身名門，又沒有擔任任何文官的經驗，甚至也沒有在中央政府任何軍事部門任職的經歷。他是第一個通過邊鎮新體制而升任宰相的人，他的任命標志著邊陲將領日益卷入朝廷政治的時期的開始。

牛仙克當上宰相后，繼續任朔方節度使直至740年后期；而在739年，他還總管鄰近的河東鎮。在738年，李林甫也兼任西北的隴右和河西的節度使，保留這些頭銜分別至742年和740年。[[177]](#_177___Tang_Hui_Yao____Juan_78_D)雖然這些藩鎮的日常行政都由副手處理，但在李林甫掌權的最初幾年，政府的軍務就這樣成為宰相們直接關心的要事，宰相們個人保持著保衛關中京畿道的關鍵邊鎮的控制。在739—740年期間，這兩個宰相個人控制的軍隊總數超過30萬人。

但是盡管牛仙客有軍事經驗和對軍事將領有影響，他在朝廷卻不能采取獨立的政策；他是李林甫的人，僅此而已。他不像一般的宰相，既沒有宮廷政治的經驗，也沒有官場內一個普通文官在仕途中必須建立的關系網。他也沒有一個有權勢的家族做后盾。但是事實證明他是一個杰出的和有效率的行政官員，謹慎地實施和貫徹李林甫的政策，并且超然于宮廷的爭端之外。

李林甫新政權從這一意義上說是恢復到玄宗初年只由幾個宰相支配政務的狀態，但也存在著重大差別。在姚崇、宋璟和張說當宰相時，首輔宰相是在一個積極參與政務處理的皇帝手下工作的。但在李林甫的漫長任期內，玄宗越來越只關心自己的家事，日益沉溺于道教和密宗佛教，并且逐漸不再起積極的政治作用。因此，李林甫對朝廷的支配遠比他的幾個前任全面，這種形勢使英國學者浦立本認為，從736年起至752年李林甫死亡時止，這段時期的特點是李林甫的“獨裁”。

### 玄宗與道教和密宗

前面已經談到玄宗初年各種反佛教寺院的措施。這些措施繼續實施到8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722年，政府對寺院土地進行登記，并限制僧侶永遠擁有的財產的數量。727年，它又減少鄉村未經登記的小祠壇；729年，禮部的祠部開始造冊，全面登記所有的佛僧以確立佛僧的地位和防止濫發度牒。736年，對佛僧的管理轉由掌管藩邦事務的政府機構鴻臚寺負責，這等于宣布佛教為外來信仰而把它放在次要地位。[[178]](#_178_Guan_Yu_Zhe_Xie_He_Qi_Ta_De)

與此相反，次年道觀受到尊重而被置于宗正寺的管轄之下，理由是唐皇室自稱是老子的后裔。如同他的父親和姐妹那樣，玄宗早就對道教發生興趣。在整個在位時期，他尊奉許多有名的道士。726年，各家各戶奉命須保存一本《道德經》，[[179]](#_179___Xin_Tang_Shu____Juan_44_D)玄宗還親自為它作注。[[180]](#_180_Jian___Tang_Hui_Yao____Juan) 732年，各州奉命建立一座尊奉老子的道觀。自675年以來，參加進士考試的士子必須把《道德經》作為經典學習（只有武后執政的一段短暫時期例外），參加明經考試的士子似乎也要應試《道德經》。這一時期官方文書引用道教經籍的情況屢見不鮮。

8世紀40年代初期，玄宗對道教的公開贊助出現了一個新的轉折。741年，玄宗命令設立專門研究道教的學校，命名為崇玄學，把它們作為國子監的一部分，以使考生按照明經科的模式，為參加關于道教經籍的專門考試（道舉）做準備。[[181]](#_181_Jian___Tang_Hui_Yao____Juan) 742年，這些經籍都起了崇高的新名，并且都有官修的注釋。747年，《道德經》正式被宣布為最重要的經籍。從743年起，老子被授予一系列越來越崇高的稱號。此外在742年，玄宗采用新年號天寶，它具有道教的含義，以表示其天命的統治的性質有了變化。

玄宗還對在他在位期間傳入中國的密宗佛教有很大的興趣。印度密宗大士善無畏于716—735年間在京師工作，翻譯了許多佛經，并為玄宗舉行密宗的佛事和唪誦經咒。另一個印度密宗大士金剛智從719—740年也在京師逗留，他的法術給予玄宗以很深的印象，因而被封為“國師”。中國的兩位密宗佛教的倡導者為一行和不空，前者以其天文和數學知識聞名，后者曾受到玄宗慷慨的布施。[[182]](#_182_Jian_Zhou_Yi_Liang___Zhong)

盡管玄宗試圖限制佛教的影響，但密宗佛教吸引玄宗不是偶然的，因為密宗使用法術、咒語和魔法在許多方面與道教的相似，而朝廷的密宗大師們確被指望在喚雨和治病方面與道教術士們爭高低。

道教和密宗佛教都不鼓勵玄宗積極過問公共事務。兩者都鼓勵修身養性。在這些影響下，玄宗對他日常的職責越來越不關心。但他不過問朝政的行為應該說是逐步的，肯定不應完全歸咎于他信仰的道教。玄宗不像以后幾個他的繼承人（也確與他的偉大前人唐太宗不同），除了幾次國喪時期外，他繼續每日緊張地上朝聽政，直至755年他已經70歲時為止。沒有一個皇帝（不管他是什么超人）能保持玄宗早期的發展速度，而且在40多年中不見放慢。傳統的史學家們的指責大部分針對玄宗迷戀道教，對這個問題我們也許應該注意的是，到742年玄宗已經57歲，而且已積極勤于政事達30個春秋了。

### 皇位繼承問題

幾乎在張九齡被貶出朝廷不久，武惠妃的女婿楊洄又指控皇太子和鄂王李瑤、光王李琚及皇太子的內兄薛銹（又是玄宗三女之夫）正策劃謀反。宰相們再次被召征詢意見，但李林甫對玄宗說，此事純屬家事，他與他的同僚不應干預。玄宗于是廢太子并把薛銹流配，后來又命他們全部自殺。諸王之母和妻族的許多親屬也被流配。[[183]](#_183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07)

武惠妃此時實現了她的野心，繼位問題懸而未決，但她的勝利證明是短暫的。她死于737年陰歷十二月，據民間傳說，這是受害而死的諸王的鬼魂作祟所致；她死后被封為后。玄宗當時既無皇后，又無皇儲，因為玄宗并沒有按照武惠妃的計劃讓她的兒子壽王李瑁繼位，盡管李林甫想竭力促成此事。

在一年多的時期中，繼位問題依然不能解決。玄宗有意立三子忠王李玙（元獻后所生）為太子，但長期未作決定。最后他采納其寵幸的宦官高力士的意見，即李玙年長，他的繼位權不容易被人反對。[[184]](#_18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在玄宗初期就未被立為太子的李琮，這次又未被考慮，可能是他沒有子女。他收養前太子幾個年幼的兒子為自己的子嗣。738年陰歷六月李玙被指定為太子，并正式舉行儀式，次月全國大赦。繼位問題在玄宗以后的年代沒有變化，李玙在756年繼位，他就是人們熟悉的廟號為肅宗的皇帝。

### 編訂法律

像李林甫這樣的如此關心行政的井井有條和系統化的宰相，自然會直接注意順應形勢，修訂法律，并且對行政法當然尤為注意。事實上他從事這一工作已有數年。除731年裴光庭和蕭嵩頒布一系列《格后長行勅》外，法典一直沒有被重新編訂或使之適應形勢；頒布《格后長行勅》的公開目的是要消除由于立法變化而條款又未列入修訂的行政法典所引起的種種反常現象。在此以前已有人抱怨法典條款因應用比擬和援例而被忽視的情況。

734年，李林甫奉命修訂和整理全部法典。他會同一批法律專家，對法律進行了扎實和周密的修訂工作。被刪除的無關緊要的條款不少于1324條，另外2180條得到修正。經修訂的法典于737年送呈皇帝，計有：律12卷及其疏義30卷；令30卷；式20卷；《新開元格》10卷。這些法典在737年秋向全國頒行。

這證明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法律修訂，因為這是唐代最后一次系統地重編全部法典的活動。這次制訂的法典實行的時期特別長，因為它一直到14世紀初都保持著權威性，雖然其間作了若干較次要的校訂。但也許更重要的是，這次修訂法律是唐代最后一次試圖提供包括在令和式中的標準化的、全國一致的行政法規的活動。在唐以后歷代皇帝時期，地方活動的日益多樣化使這一工作不可能進行下去。

李林甫及其同僚在送呈法典的同時還呈上按門類摘編以便查閱的《格式律令事類》，計40卷。

各項新的法典的重要性在于，李林甫在它們頒布后專門請求降詔宣布，凡737年陰歷五月末之前頒布的詔書中提到的一切未收入新法中的條款不再具有法律效力。[[185]](#_185___Tang_Hui_Yao____Juan_39_D)整個法典的制定過程清楚地顯示了李林甫處理行政問題的那種有條不紊和精確的方法，以及對行政程序進行徹底的合理化改革的決心。

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法律匯編為《唐六典》，它成于李林甫掌權的最初幾年。這一匯編工作有一個漫長和多變的過程。玄宗最初在722年已命令集賢院搞一部同名的匯編；名稱中的“六典”原系比照《周禮》的題材結構，原來的作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與張說在8世紀20年代初期使禮儀法典化的努力有關。這項工作一直沒有完成；在蕭嵩領導時期，開始了匯編現在這種形式的工作，即準備搞成一部有關政府機構行政法的提要，后來張九齡也參加了匯編；他失勢后，李林甫負責它的完成。它最后成于738年，739年陰歷二月被送呈玄宗，然后向全國頒布。[[186]](#_186_Jian_Dai_He_Du___Miao_Shu_T)

它在一個多世紀中一直作為一部最方便的權威性的行政法提要而被人使用，甚至在它闡述的許多制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或機構被新官署代替后也是如此。

### 兵制改革

節度使統率的邊境藩鎮體制這時已完全建立，如上所述，李林甫和牛仙客本人都遙領很重要的邊鎮。737年，兵制有兩個重大變化。第一，節度使奉命與中書門下協商，以便一致確定適合于各鎮戰略需要的邊防軍的建制。人們現在仍能相當詳細地了解約從742年起的這一建制的情況，當時帝國供養的邊防軍共達49萬人，另有8萬余騎。[[187]](#_18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同時，帝國總的軍事建制共為574733人，其中包括各種府兵和宮廷軍隊（關于這些軍隊，將在下面論述）。人數略超過總人口的1%。這些數字表明，雖然帝國武裝了一支名實相符的強大的軍隊，但受節度使控制的軍隊不少于帝國兵力的85%，幾乎是帝國有戰斗經驗的士兵的全部。中央政府沒有與之相比的兵力可供調遣，這一事實解釋了李林甫和牛仙客為什么抓住他們掛名節度使的控制權不放的問題。

第二個甚至更重要的變化是把邊防軍改成全部由長期服役的健兒組成的職業軍。變化的過程經歷了幾十年，但737年頒布的一份詔書命令，邊境諸鎮的所有士兵應在原征募的士兵和未登記戶的成員中長期雇傭那些合格的和愿意服役的人。那些志愿服役的人得到的津貼高于標準，并享受免稅數年的特別待遇。原攜帶家眷前往邊境的人還可分得房屋和田地，以使他們能長期定居。這意味著舊征兵制的最后廢棄；舊制規定，被挑選前往邊境的士兵有的是府兵，有的是平民，他們的平均服役期為三年。其中有人因企圖得到獎賞，愿當健兒留在邊境，但這一制度造成了未經訓練的新兵經常代替久經鍛煉的士兵的情況，而且常常帶來苦難。[[188]](#_188_Dai_He_Du_____Xin_Tang_Shu)改革似乎迅速見效。738年初期的一份詔書宣稱，長期雇用邊境健兒的辦法使兵源充足。征兵支邊的措施被取消，那些仍在邊境鎮服役的征召士兵被解散和遣返故里。[[189]](#_189___Zi_Zhi_Jian_Tong____Juan)

這些龐大的邊防軍造成了在嶄新秩序下的財政和后勤供應問題。邊防的費用在714—741期間增加了5倍。部隊的被服、裝備及糧食、軍需的補給，都需要巨額資金。國家收入的大部分糧食用于軍糧和戰略儲備。大量人力資源用于軍隊的口糧和軍需的運輸工作。

隨著永久性的職業軍隊的建立，情況就更為復雜，費用也進一步增加。原來在戰場因戰功得到有節制的賞賜的士兵，此時開始要求得到官職和名義上的官品，使他們能獲得應有的一切封賞和特權。為了戰爭勝利，這種慷慨的賞賜使防務支出有增無已。在742—755年期間，軍費增加了40%或50%。

政府繼續鼓勵在邊境建立屯田；牛仙客也擴大了他曾在關中西北采用的“和糴”制（和糴制在那里還被用來提供民用糧食）。[[190]](#_19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但這些措施不能制止軍費的繼續增加。

與此同時，京師的軍事組織也發生很大的變化。在7世紀最后幾十年，輪番從不同的府兵抽調兵將的古老的禁軍制開始蛻變。過去顯赫一時的禁軍的地位逐漸降低，除了少數精銳的單位，玄宗時期的禁軍都不足額，素質也差，并且主要由朝中有關系的和不懂軍事的文官擔任軍職。

禁軍作為由皇帝直接調遣的主力部隊的位置已被自662年以來稱為御林軍的“北軍”所接替。這就是永久服役的——許多人是世襲的——警衛皇宮的精兵。他們在武后時期得到加強，到中宗時期，御林軍的人數超過1萬人，完全壓倒了禁軍。

禁軍缺員的現象在722年已明顯得令人不安，當時為御駕巡行泰山舉行封禪儀式的準備工作正在進行；在723年，張說如前文所述已開始征募一支稱為常從宿衛的龐大部隊。通過吸收以前的禁兵和其他愿意輪番服役的合適的士兵，常從宿衛的兵力擴大到12萬人。725年，它被改名為彍騎，然后拆散，把兵將作為受過訓練的新鮮血液分別輸送到各禁軍之中。但后來他們又被分配在御林軍；除了充當皇帝和太子警衛以及為京師執行治安任務的少數特種部隊外，禁軍作為一支有戰斗力的軍事單位已不復存在。

但這并不是說北軍此時已成為一支歸皇帝控制的強大力量。在731年涉及王毛仲和禁軍一些將領的危機以后，北軍似乎有意識地被削弱了。雖然在738年有兩支稱龍武軍的北軍加入了御林軍（顯然是為了加強御林軍的力量），但是它們的成員大部分是長安富裕的商人和城市居民，他們以前已經服役，因為軍隊的士兵既可不納稅，又可不去邊境服役。這些人后來雇傭替身或派仆人代替他們當兵。作為一支軍事力量，北軍越來越不足道。當玄宗末期最迫切需要他們出力之時，他們成了廢物。[[191]](#_191___Tang_Hui_Yao____Juan_72_D)

在張說的722—723年改革以后，府兵并沒有取消。但隨著邊防軍和京師的北軍的日益職業化，府兵的作用消失，他們不過是紙面上的部隊。749年，李林甫下令制止府兵來京師服役。命令說，府兵近來不過是名義上的建制，既無組織、軍官、武器和裝備，也無糧食。[[192]](#_192_Tong_Shang_Shu__Di_1299Ye)

府兵的消失意味著放棄了自北魏以來流行的一種思想；它主張，通過對農民進行正規訓練的方式，國家可以經濟地保存一支有戰斗力的軍隊，因為農民兵自給自足，但又能與禁軍一起履行正規的職責，并在需要的時候能很快地組成軍事單位。在李林甫掌權時，邊防軍和京師的北軍都幾乎全由職業軍組成，國家則直接負責供養它們。

但是，還存在一種新型的稱之為團練或團結的地方治安軍。它們不是全國范圍的組織（如府兵），而是由地方組織并用于地方防務。士兵純屬業余，以種地為生，在農閑時則受訓練。他們不必在京師或邊境服役，只是組成歸地方刺史管轄的地方治安軍。他們在697年契丹入侵時在河北最先出現，后來又出現在受外患威脅的其他區域以及西北、長安周圍和四川；四川的地方軍組織規模似乎更大，那里已組成了一支以成都為中心的約1.4萬人的部隊。[[193]](#_193_Pu_Li_Ben____An_Lu_Shan_Zhi)

新的兵制為中國提供了對付外來威脅的極為有效的防御。在李林甫掌權的初期，鄰近的最強大的兩個民族吐蕃和契丹被打敗并處于守勢。同時突厥汗國也覆滅。但新兵制的花費極大，并使權力集中在節度使之手，以致中央政府再也沒有力量去對付他們了。

### 財政的發展

當李林甫仍與張九齡分掌大權時，最重要的財政改革，即貫徹《長行旨符》規定的工作，已在進行。到8世紀40年代初期，盡管因軍事擴張而軍費激增，帝國的財政狀況仍很良好。726年登記的人口數只有7069565戶，在732年達7861236戶（45431265人），在742年達8525763戶（48900800人），在16年中增加了21%。這部分地反映了宇文融的再登記措施的長期效果，部分地反映了人口的自然增長，部分地反映了地方行政效率的提高。因此政府可以依靠比以前有明顯增加的歲入。此外，8世紀20和30年代可怕的連續自然災害似乎沒有再出現，40年代總的說是農民比較富足的時期。

8世紀40年代期間的稅制大為松弛。[[194]](#_194_Jian_Chi_Tian_Wen___Tang_Da)現存的敦煌戶冊證明戶口的登記日益放松，造成這一情況的部分原因是，在李林甫早期的改革中已確定了各州固定的稅收定額。741年的一份詔書取消了每年對各戶成員的嚴格核查，而代之以三年檢查一次。在744年，規定把男丁應充分納稅和服勞役的年齡從21歲提高至23歲。

這一制度出現了一些弊病。742年及以后744年頒布的詔令企圖制止各戶為減少自己應征稅的數額而分割家庭財產的現象，這項稅收此時已成為國家日益重要的財源。對這些戶應征收的稅額不得不在741年，后來又在745年從嚴執行。[[195]](#_195_Cui_Rui_De____Tang_Dai_De_C)土地制也產生了越來越嚴重的弊病；735年的詔書又正式推行均田制，以防“百姓無處安置，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莊田，恣行吞并”。但這一措施收效很小；752年，政府又對那些積聚大產業的人進行了一次類似的打擊。[[196]](#_196___Ce_Fu_Yuan_Gui____Juan_49)

運輸體系進一步得到改善，使糧食和物資的運輸方便得多。741年，政府曾有穿過三門峽開鑿一條航運河渠的打算，同時對揚州附近的汴渠南端進行了其他的改善。在741—743年韋堅任水陸轉運使時，建造了一條與渭水平行的新運河，以供漕運船只通往他建有新碼頭的長安。運往京都的糧食和貨物又大量增加，在744年達到400萬石。他還整頓了地方的運輸供應，讓富戶為漕運船只和載運的物品作保。[[197]](#_197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

韋堅是下一個10年出現在朝廷的一批新的貴族財政專家中的第一人，這些人也像宇文融那樣因他們在玄宗末年的政權崩潰中所起的作用而受到歷史學家的苛評。在財政的一個領域中，貴族的支配——實際上是一個家族的支配——自玄宗即位以來一直持續不斷。從713—733年，隋皇室的一個后裔楊崇禮長期任太府寺卿，在他90歲退隱時，他的兒子楊慎矜和楊慎名分別任太府寺卿和司農寺卿，前者掌管一切錢帛的收入，后者掌管一切糧食收入。[[198]](#_198___Jiu_Tang_Shu____Juan_48_D)楊慎矜深深地陷進了李林甫那一派。當李林甫掌權時，楊氏家族掌握了處理全帝國歲入的大權。

李林甫試圖在制度上解決的另一個問題是長期存在的通貨問題。737年，第一個諸道鑄錢使被任命，全面負責全帝國鑄錢的工作。此職一般由御史擔任。8世紀40年代初期，楊慎矜接管了鑄錢司，進一步加強了他對財政管理的控制。[[199]](#_199___Tang_Hui_Yao____Juan_59_D)通貨的供應暫時有所改善，但在8世紀40年代后期私鑄風又趨猖獗，752年，政府又企圖取締劣質錢的流通。但事實證明，這一措施與以前的同類措施一樣未能收效。[[200]](#_200_Cui_Rui_De____Tang_Dai_De_C)

### 李林甫的晚期：貴族結黨

742年陰歷七月，牛仙客死去。直到此時，李林甫的行政已取得顯著的成功。他的行政改革使帝國政府的運轉比以往更加順利和有效率。他的政權是繁榮的，對外敵連續取得輝煌的勝利。此外，它沒有在官僚集團內進行任何清洗。貴族們取得了穩固的權力，代表士大夫利益的最后兩個主要老人宋璟和張九齡已經死去，其他幾個前宰相中的裴耀卿死于743年，蕭嵩已被貶到地方。官僚中的儒家學者被精心地排斥而不能擔任任何有真正權勢的職位。但盡管如此，李林甫和牛仙客掌權的六年總的說是朝廷的安定時期。

隨著牛仙客之死，局勢發生了變化，而且嚴重地變壞了。被任命代替牛仙客的新宰相是李適之（？—747年）。[[201]](#_201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他與李林甫同樣是皇族成員，實際上屬于太宗直系中地位較高的一支。他也沒有參加過科舉，705年通過在禁軍中任職起家。在玄宗時期，他先后擔任一些州的職務，以行政干練見稱，并擔任河南尹，在那里完成了重要的治澇工程。從739—741年，他是幽州節度使，然后被召進京任刑部尚書。他顯然是遠比牛仙客更難對付的對手。情況可能是：或是玄宗為了抵消李林甫日益擴大的權力，所以親自任命他為宰相，或是玄宗受了另外敵對貴族集團的勸誘才作出了這一任命。確實如同玄宗最后10年那樣，任命李適之的詳細情況也因這一時期的歷史記載（這些記載對李林甫懷有明顯的敵意）少得驚人而模糊不清。不管任命李適之的目的是什么，一個以一系列血腥清洗告終的激烈的黨爭時期由此產生了。

李適之立刻成了一個有才能和有野心的、感到自己被李林甫所挫的貴族集團的領袖。他們的主要人物有：韋堅（？—747年），他由于他的運輸政策和財政方面的成就，深受玄宗本人的賞識；裴寬，他繼李適之從742—744年任幽州（范陽）節度使，然后任戶部尚書；裴敦復，他在743—744年期間在浙江沿海肅清海盜，然后被任命為刑部尚書；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他在隴右與吐蕃作戰取得了重大的勝利。[[202]](#_202_Pei_Dun_Fu_He_Huang_Fu_Wei)他們結成了一個令人生畏的集團，在財政和防務這兩個關鍵領域有強大的勢力。

744年，當時任吏部尚書的李林甫（此職使他平時能左右一切任命）因選才考試的一次丑聞而丟了臉。由于任人唯親，他在御史臺的一個親密同伙之子（此人是有名的不學無術之徒）得了最高分。這引起了一陣強烈的怨言，但朝中無人大膽直言，因為任何抗議都意味著對李林甫的批評，但有一名官員說服了當時任東北范陽和平盧兩鎮節度使的安祿山向玄宗報告了此事；這是邊將第一次干預朝政的行動。玄宗親自重新對應試士子進行考試，那個名列榜首的人交了白卷。吏部的兩個侍郎被不光彩地外放到地方；李林甫本人雖然未受懲處，但此事損害了他的威望。[[203]](#_203_Jian_Pu_Li_Ben___An_Lu_Shan)

從744年起，李林甫開始沉重地打擊他的政敵。他試圖向玄宗進讒以使李適之名譽掃地，然后又挑起裴寬和裴敦復的不和，結果兩個人都被外放到地方。745年他煽起對以李適之為首的刑部的官員的嚴厲調查；745年陰歷九月，他又把韋堅從財政和運輸的使署調到刑部任尚書，從而使他不能再對玄宗施加影響。[[204]](#_20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韋堅的財政的職務轉給了楊慎矜[[205]](#_205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此人為當時與李林甫關系親密的太府寺卿楊崇禮之子。

到那時為止，黨爭是沿著公認的不流血的政治方式進行的。但從746年初起，情況發生變化，一系列你死我活的清洗開始了。746年正月，當時任節度使坐鎮隴右和河西的皇甫惟明來京報告與吐蕃作戰時又取得了勝利。他在朝廷當玄宗之面批評李林甫和贊揚韋堅。李林甫唆使楊慎矜向玄宗報告，說皇甫惟明和韋堅與太子一起策劃發動政變和讓太子登基的陰謀。

密謀的真相當時模糊不清。但皇太子的指定原來肯定受到李林甫的反對。皇甫惟明早已是皇太子的密友；韋堅是皇太子的內兄，以有政治野心見稱。此外，對于因得到一個統率靠近京師14萬名精兵的將領的支持而出現這樣的政變威脅是絕不能等閑視之的。結果，韋堅和皇甫惟明被捕受審，但指控他們的案件得不到證實，于是他們離京出任刺史。皇太子未受影響。李適之本人未受任何牽連，但他與皇甫惟明和韋堅的密切關系使他憂心忡忡，以致他要求辭去宰相之職。他的要求得到恩準；令人不免奇怪的是，鑒于當時的形勢，他竟能在東宮得到一個閑職。從此他不再積極參與政務。[[206]](#_206_Pu_Li_Ben____An_Lu_Shan_Zhi)

陳希烈[[207]](#_207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接替了他的宰相職位。此人出身于河南的一個無名家族，本人顯然未參加過科舉，但仍享有作家和學者的盛名。他精通道家學說，并大大地助長了玄宗對道教的興趣。從731年起，他繼張說為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并協助玄宗起草國書和為玄宗潤色文學作品。他為人柔弱圓通，無實際政治經驗，在752年死前不久，對李林甫一直唯命是從。李林甫開始在家中處理公務，陳希烈不過在作出的決定上副署而已。陳希烈也繼續從事他的學術活動，被任命在秘書省任少監。

雖然李林甫是朝廷的絕對主宰，但擔任高級官員的韋堅的弟兄此時為韋堅竭力向玄宗求情，并要求皇太子支持他們的請愿。玄宗仍相信太子忠誠無辜而不給予任何處分，但對韋堅及其同僚非常惱怒，因為他們本來應該為自己幸免于死而慶幸。李林甫此時又指控韋堅和李適之結黨。于是韋堅及其弟兄連同許多親屬均被放逐到邊遠的南方。李適之被調到地方，他們的其他支持者，如裴寬和河南尹李齊物也被貶至地方。太子本人惶惶不可終日，要求準許休掉韋堅之妹。[[208]](#_208_Tong_Shang_Shu__Di_6873__68)

清洗至此仍未結束。746年末，另一場涉及皇太子的所謂陰謀震動了朝廷。皇太子的長妃之父杜有鄰與自己的女婿柳勣發生口角，因為后者企圖指控他偽造圖讖以使他丟臉（可能間接地把皇太子也卷了進去）。但他的指控出了紕漏。他和他的一個朋友被李林甫在御史臺的一個同黨審訊，結果，杜有鄰和兩個指控者均被處死，他們的家屬被放逐到遙遠的邊境。其他受株連的人有：曾為柳勣庇護人的王子李邕和薦舉柳勣的裴敦復（裴因與柳勣勾結而在747年初期被鞭笞致死）。后來，臭名昭著的御史羅希奭被派往貶所處決韋堅、皇甫惟明及其追隨者。李適之服毒自盡；他的一子被殺，許多同僚被貶。李適之的追隨者中唯一幸免一死的顯要人物為裴寬，他退出了官場并獻身于宗教。[[209]](#_20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在這些陰謀和清洗中，李林甫最忠實的支持者之一是財政專家楊慎矜，他已為自己清除了職業的對手韋堅，同時又大手大腳地提供錢財以供玄宗日益奢侈的私人生活之用，所以深得玄宗的寵愛。李林甫開始對他勢力的發展感到不滿，兩個人的關系變得越來越對立。楊慎矜還與王鉷[[210]](#_210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為敵，王鉷是太原一個望族后裔中一名高級官員的私生子。從736年起，他在御史臺和戶部任職，從事一系列的專門的財政工作，以善于搜刮民脂民膏和嚴厲推行“和糴”制聞名。如同以前支持楊慎矜那樣，李林甫一貫支持他；而楊慎矜此時卻一再冒犯和貶低王鉷，盡管后者在御史臺擁有強有力的地位。[[211]](#_21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這時，楊慎矜求教于一個術士，后者勸他在鄉村購置產業，作為在預言的政治動亂即將發生時避難之用。王鉷得知他們的交往，于是揭露楊慎矜與這些預言有牽連，且更具體地揭露了他策劃復辟隋王朝（他是隋皇室的后裔）的叛亂。楊慎矜被捕，在御史臺的李林甫的代理人在他家中栽證陷害他，楊慎矜及其兩個也任高官的弟兄被迫自盡。他們的幾十名同伙和同僚像以前的清洗一樣又受株連和懲處。[[212]](#_212_Tong_Shang_Shu__Di_6879__68)王鉷接任了楊慎矜的工作，此時他上升到了已能對玄宗施加很大影響的地位。他控制了財政方面的許多專門司署。他征收的大量稅額超過了李林甫精心規定的歲入定額，他把這些收入轉到玄宗的私囊，從而更進一步助長了玄宗驕奢的生活。王鉷與以個人清廉著稱的楊氏家族不同，他無恥地利用自己的地位大發橫財。

李林甫在消滅了一個潛在的對手，即財政專家楊慎矜以后，此時又企圖搞垮另一個邊境將領，因為此人的成就和在朝廷的勢力與以前的皇甫惟明一樣，開始危及李林甫自己的支配地位。此人即王忠嗣，[[213]](#_213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他從742—746年已控制朔方和河東兩鎮，后來繼倒霉的皇甫惟明而任河西和隴右的節度使，在那里防御吐蕃十分成功。但他是一個謹慎的將領。當玄宗在747年命令進攻青海湖之東的吐蕃要塞時，他勸告說，這個要塞堅不可摧。于是另一個將領奉命進攻，但王忠嗣拒不參加，當戰斗不可避免地得到災難性的結果時，他受到了指責。王忠嗣在皇宮內長大，與諸王——特別與皇太子——的關系甚為密切。李林甫利用玄宗的不快乘機攻擊皇太子，并指控王忠嗣已答應協助皇太子登上皇位。王忠嗣被捕受審，但這一次指控實在站不住腳，以致連玄宗也不相信。但王忠嗣仍被派往西南任職，他的助手突厥將領哥舒翰則代替他負責邊境的指揮。[[214]](#_21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這一時期激烈的黨爭陰謀的勝利者是李林甫，但黨爭既削弱了他自己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也在幾個重要方面削弱了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中央的官僚集團被李林甫清洗的暴力所動搖，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暴力嚇倒；大批杰出的人物死了，或被斷送了前程。國家的財政依然控制在貴族理財專家王鉷之手，但他不同于前幾任的宇文融、韋堅和楊慎矜，只關心謀取自己在朝廷的優勢和貪污自肥。

### 對邊鎮的控制

強大的邊境將領干政的威脅得以避免，但代價很大。在發生涉及皇甫惟明和王忠嗣的“陰謀”以后，李林甫斷定，讓那些可能有干預朝政野心的高級的和有才能的官員控制邊境藩鎮，實屬危險之舉。從748年起，他硬要玄宗推行一項精心制定的政策，即把邊境將領置于非漢人節度使之下。這些節度使被認為是比漢族更優秀的軍人，他們的野心也被認為只在軍事而不在政治方面。[[215]](#_215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到751年，除四川劍南以外的所有藩鎮都受外族將領的指揮。自744年起，安祿山控制范陽和平盧，從751年還指揮河東。他的堂兄弟安思順從747年年末起指揮河西，從750年起又指揮朔方。突厥將領哥舒翰從747年后期起坐鎮隴右，而在極西部，高麗血統的將領高仙芝掌管了安西。

在這些人中，最強大、在其藩鎮培植勢力最久的將領為安祿山。[[216]](#_216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他具有粟特和突厥的混合血統，是默啜可汗軍隊中一名粟特軍官之子。安祿山在張守珪指揮的西北邊防軍中當兵，733年張守珪調到幽州時，他作為僚將隨往。739年張守珪被貶，由李適之接任幽州節度使。安祿山在平盧時地位僅次于王斛斯。741年李適之被召回長安；王斛斯成為幽州節度使；安祿山被提升指揮當時仍隸屬于幽州的平盧。次年，即742年，平盧獨立為鎮，安祿山任節度使。在此期間，他與從742年直至744年陰歷三月任幽州節度使的裴寬關系密切。因此，安祿山與李林甫的兩個對頭都有密切的聯系。裴寬被召回長安以后，安祿山又兼任范陽（幽州）節度使。他在743年和744年已入京朝覲，并且如前文所述，卷進了一件轟動一時的案件。到747年當他再次進京時，他在東北已經樹立非常牢固的地位，而且具有強大的力量。他和妻子被授予尊貴的稱號，他還擁有御史大夫的榮譽職位。雖然他力量強大，但他個人仍非常畏懼李林甫，這種關系在這些動亂的年代里對維持朝廷的穩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 楊氏家族和楊貴妃的崛起

隨著后宮政治造成的楊氏家族的崛起，宮廷事務中又添進了另一新的內容。[[217]](#_217_Guan_Yu_Yang_Gui_Fei_Ji_Qi)武惠妃死后，玄宗在后宮似乎暫時還沒有一個恩眷不衰的寵妃。在8世紀40年代初期，他似乎已迷戀上了壽王李瑁之妻楊玉環；李瑁為武惠妃的寵子，他在738年未被立為皇太子。741年楊玉環離開了丈夫，自愿度為女道士，住在宮內，745年當她正式與再婚的壽王分居后，玄宗召她進了自己的后宮，封她為貴妃。從此，她完全左右了皇宮。雖然她兩次被短期地放逐出宮，但玄宗對她迷戀之極，以致每次放逐后就立即召她進宮。

楊貴妃是來自四川的一名地方官之女，她與玄宗早期寵愛的元獻皇后同樣出身于華陰的楊氏氏族，又是隋皇室的遠房后裔。楊貴妃的家族以出美人著稱，她聰慧多才，與玄宗同樣熱愛音樂和舞蹈，而且自己又能歌善舞，事實證明她與她的也很受玄宗賞識的姐妹們是善于利用政治影響的行家，她家族的幾個成員都得到勛位和在朝廷任高官。在8世紀40年代后期，她成了安祿山的密友，751年她收這位奇胖和魁梧的將領為義子。關于他們和她的姐妹以及關于安祿山顯然可以自由出入宮禁的宮廷中的淫逸放蕩的丑聞不脛而走。但這些傳說在許多方面是不可能的，是以后虛構的，它們也是以玄宗和楊貴妃為主角的大量半傳奇傳說的一部分。重要的事實是，在安祿山最后叛亂以前，她和玄宗兩個人同安祿山的個人關系一直很密切。

在楊貴妃較遠的親戚中，隔代堂兄弟楊铦擔任鴻臚寺卿，另一個楊錡擔任御史并娶武惠妃之女太華公主為妻。第三個更為陰險的人物是楊釗，后來玄宗賜給他人們所悉知的名字國忠[[218]](#_218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楊國忠為一小官員之子，年輕時放蕩無行，為宗里所鄙，于是去四川從軍，后任一地方的低級官員。他在四川得到一位富有的地方有才的文士鮮于仲通的庇護，鮮于后來在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739—746年任節度使）的幕府中擔任重要的行政官員，為楊國忠謀得了推官之職。在四川的這些年中，他結識了他的遠親——楊貴妃的家屬；他還因勾引她的一個妹妹而被控。

當楊貴妃作為玄宗寵妃的地位正式確立后，章仇兼瓊和鮮于仲通決定用楊國忠為代理人以保住他們在劍南道的地位，于是派他前往朝廷。由于與楊貴妃的關系他來到京師時被任命為監察御史。他作為李林甫的忠誠和熱心的親信，參與了746—748年的清洗。章仇兼瓊由于楊氏的勢力，在746年陰歷五月被任命為戶部尚書，并擔任了其他的職務。他在四川的節度使之職被原戶部侍郎郭虛己接替；郭任此職直至748年，在此期間由鮮于仲通任助手。當郭虛己回長安時，鮮于在748年接任節度使。

這樣，楊國忠由于他的堂姐妹和親戚的影響，在746年以后得以迅速鞏固他在京師的地位，同時他又與他早年供職的四川保持牢固的聯系。由于這種特殊的地區關系，劍南（即四川）一直是李林甫的指派非漢族將領任節度使的政策從未得以實施的唯一邊境藩鎮。

在此期間楊國忠沒有與李林甫公開破裂，但從749年起，他像王鉷那樣能夠對李林甫進行挑戰，因為他可以指望從玄宗和楊貴妃那里得到個人的支持。749年，他把京兆尹蕭炅貶黜出朝廷，此人先后是裴耀卿、李林甫及李在御史臺的一個朋友宋渾的長期同伙。李林甫此時也無力幫助他的朋友。楊國忠在戶部的度支使署擔任一系列職務，并得到15個以上的專職頭銜（其中大部分是屬于財政方面的），所以其權力很快就與王鉷不相上下，后者也就成了他的政治追隨者。[[219]](#_21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752年，王鉷被清除出政治舞臺。他與其弟王銲召術士詢問自己為帝王的前景，后來擔心此事泄露，就將此術士和一個公主的知情的兒子審判處死。王銲的一個朋友此時正策劃控制龍武軍（北軍）和清除李林甫、陳希烈和楊國忠。玄宗獲悉這一陰謀，就命王鉷逮捕陰謀者。王鉷警告其弟即將被捕，于是密謀者出逃。在王鉷和楊國忠帶領軍隊的追趕下，造反者最后走投無路，被高力士率領的飛龍小兒俘獲。

楊國忠此時揭露王鉷也參與了陰謀。但玄宗不信王銲的叛逆行為，而李林甫又為王辯護。因此玄宗下令恕免王銲之罪，但為了保留留各方面的面子，他通過楊國忠命令王鉷正式承認其弟之罪并請求寬恕他。但王鉷拒絕照辦，這下激怒了玄宗。陳希烈這一次就不聽命于李林甫了，他這時公開指控王鉷叛逆，要求將他處死。王氏兩兄弟被楊國忠和陳希烈審訊，審訊結果不但使被挫敗的陰謀真相大白，而且還弄清了他們以前起過作用的謀害人的情況。752年陰歷四月，王鉷奉命自盡，王銲被杖死在朝堂。王鉷諸子被放逐到邊遠的南方，后來被處死，大量家產被沒收。[[220]](#_22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此事的結果對李林甫的地位是一個嚴重打擊，因為他曾薦舉王鉷任職，又曾為他的叛逆罪名辯護。他這時不但面臨曾企圖在指控王鉷時把他株連在一起的楊國忠和陳希烈的公開對立，而且還受到強有力的將領哥舒翰的仇視。

## 對外關系，720—755年

傳統歷史學家對玄宗的主要批評之一是，當他即位初期帝國的防御已得到加強和帝國隨之采用消極的防御政策后，他的雄心導致他日益改用一種國力所不能負擔的主動的、干預性的對外政策。當然，隨著714年吐蕃戰敗而出現的相當平靜的幾年以后，軍事活動在他在位的中期和后期大大地增加了。但這肯定不是像太宗后期和高宗時期那樣的蓄意的領土擴張時期。在玄宗的這些日子中，唐朝對來自兩個最強大和最富侵略性的鄰國——契丹和吐蕃——的壓力作了反應，與它們進行了持久的大規模戰爭。同時，中國對外關系的總格局由于以下的因素而起了變化：在滿洲（渤海）和云南（南詔）出現了強大而穩定的國家；傳統的北方敵人突厥族最后消失；基本上對唐朝友好的回紇人取代突厥族而成為蒙古草原的主人。

### 吐 蕃

吐蕃依然是中國最難對付的鄰國。714年戰敗后，吐蕃人穩步地鞏固他們的王國；721年，隨著幼王的成年和705年以來控制吐蕃的宰相和太后之死，吐蕃的宮廷政治出現了明顯的轉折。722年，吐蕃朝著新的方向重新向外擴張，入侵西部的小勃律（吉爾吉特）。小勃律和鄰近的大勃律（巴勒提斯坦）對中國人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因為它們是疏勒（喀什噶爾）經明鐵蓋山口通往迦濕彌邏（克什米爾）和印度河谷的要道。它們自武后時期起已是中國的朝貢國。吐蕃的占領將使吐蕃人控制帕米爾地區，使他們能直接與突騎施部或阿拉伯人接觸，從而威脅中國人在中亞的地位。

面臨吐蕃的入侵，小勃律王向中國求助。一支中國軍從疏勒前往援助，吐蕃人被擊退。但他們仍控制著大勃律。

這次沖突似乎對中國西部邊境沒有直接影響，但與吐蕃的關系不久在玄宗的朝廷成了一個政治問題。在725年封禪祭典以后，張說敦促玄宗與吐蕃長期議和以減少隴右和河西的大量邊防開支。但玄宗征詢了在724年已主張深入吐蕃領土進行打擊的好戰的河西節度使王君img的意見。結果他沒有采納張說的和議意見，開始計劃對吐蕃進行一侵略行動。

725年，一些吐蕃人參與突騎施對塔里木綠洲的襲擾。從726—729年，敵對行動又在中國邊境發生。吐蕃人屢次襲擊河西走廊的中國領土，而中國人則再三打入青海湖區。從728年秋季起中國人取得了主動，軍隊贏得了一次次輝煌的勝利，并占領了幾個主要的吐蕃要塞。吐蕃人求和，在以前因吐蕃人的背信棄義而仍對他們不信任的玄宗最后被說服同意議和。730年和約商定。吐蕃王承認中國的宗主權，吐蕃的邊境將領奉命停止對中國領土的侵襲，一塊刻有和約條款的石碑矗立在邊境。和平持續了幾年。兩國互派使者，邊界被劃定，邊界柵欄也被建立。此外，在這些年中，唐朝專心致志于同東北的契丹進行持續的戰爭。

但是，和平在736年遭到破壞。吐蕃人又進攻小勃律，雖經中國人抗議也未停止。帕米爾地區的形勢甚至比722年更加危急。玄宗有好幾年曾力圖取得經帕米爾地區通往伊朗和西方的南方諸路的控制，因為粟特由于突騎施的干涉又受到來自阿拉伯人的壓力而處于完全混亂的狀態，同時傳統的北方商路也受到威脅。這一對峙還有另一個形式。在734—735年，北庭（準噶爾）的唐軍與突騎施之間已爆發戰爭。突騎施的可汗娶了一名吐蕃的公主，而吐蕃王的一個妃子又是康國（撒馬爾罕）的公主。這樣，對吐蕃—突騎施的結盟或對更討厭的吐蕃—阿拉伯在中亞的結盟的由來已久的恐懼又出現了。

由于無力阻止吐蕃對小勃律的進攻，中國就在東面發動進攻，吐蕃人在那里因被和約和中國與吐蕃將領之間的誓約所麻痹，對進攻毫無準備。737年中國人進犯青海湖區，738年吐蕃的反攻被擊退，河西、隴右和劍南諸節度使奉命與吐蕃人全面作戰。中國人從甘肅深入今之青海省。四川的軍隊在開始時戰果不大，但在740年得到當地羌族部落民的幫助，占領了關鍵的吐蕃要塞安戎，因為這些部落民對吐蕃的行政官的勒索已感到厭煩。盡管出現堅決的反攻，中國保持了戰果，這樣，唐朝又控制了在680年喪失的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地區。

739年，在拉薩保持一定程度的中國文化影響的吐蕃王后金城公主死去，741年吐蕃人企圖利用在長安為她舉行葬禮的機會締結新的和約。玄宗沒有同意，于是吐蕃人在741年夏季開始發起一系列果敢的進攻，并重新控制了青海湖區。他們奪回固若金湯的石堡城，并入侵甘肅邊境的中國領土。

在以后幾年，皇甫惟明及其繼承人王忠嗣，進行了一次次的邊境戰爭，穩步地加強了隴右和河西兩鎮的中國防御設施，這兩個藩鎮到742年時已控制了17個軍，兵員共達14.8萬人。皇甫惟明和王忠嗣都在宮廷的黨爭中被株連，747年隴右歸突厥將領哥舒翰管轄。749年，他率領從隴右、河西、朔方和河東諸鎮抽調的大軍，最后攻占了石堡城，但中國人傷亡很大。該地成了新的中國軍隊的駐地，在以后幾年中國人在西北新成立九支長駐軍隊，并開辟屯田來供養它們。753年哥舒翰再次大敗吐蕃，收復了稱之為九曲的黃河上游的大部分。

8世紀的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當中國人在吐蕃邊境進行大規模戰爭時，吐蕃的西陲又形成了與唐朝直接對峙的形勢。吐蕃在736年攻擊小勃律后，穩步地鞏固它在帕米爾的地位，許多山地小王國與長安斷絕往來并成了吐蕃的屬國。在塔里木的中國將領曾經不時攻擊吐蕃人，但毫無結果。746年，在安西任職的高麗將領高仙芝對小勃律進行了一次引人注目的討伐，他率領1萬名騎兵通過帕米爾最高的幾個山隘。吐蕃人被趕走，中國軍隊駐在小勃律，中國對帕米爾諸國的影響得以恢復。吐蕃這時又轉而窺測小小的劫國，使駐在小勃律的中國軍隊的供應線有被截斷的危險。750年高仙芝又進行一次討伐，占領了吉查爾，最后遏止了吐蕃想在帕米爾建立統治的企圖。

755年，吐蕃王死，吐蕃朝廷派使節前來，尋求與唐朝建立友好關系。中國使節也被派往吐蕃去冊封新王和轉達唐皇的吊唁。吐蕃的威脅不論在中國邊境還是在西面，似乎都暫時被遏制了。但安祿山之亂的爆發和隨之而來的中國軍隊在吐蕃邊境的撤離，又揭開了中國吐蕃關系史災難性的新篇章。

### 中亞，突騎施族和阿拉伯人

自玄宗初年以來，伊塞克湖和巴爾喀什湖之間西突厥族各部居住的地區已被一個名突騎施的部落及其令人生畏的蘇祿可汗所統治。雖然蘇祿可汗已在717年正式臣服于中國人，但在同一年他還是襲擊了邊境并進攻阿克蘇及塔里木盆地的其他地方。719年，唐軍已被趕出碎葉（托克瑪克）的哨所，喪失了在天山山脈之北的大片領土。

幸虧蘇祿這時西進占領富饒的粟特諸城邦國。蘇祿是在粟特最后建立阿拉伯統治的偉大的阿拉伯將領庫塔伊巴死后不久崛起的。阿拉伯人堅決的推進暫時被擋住了；突騎施族前去支援粟特人進行抵抗。在724年，在阿拉伯史學家稱為“渴日”的戰斗中突騎施大敗侵略河中地區的阿拉伯遠征軍。這一挫折使阿拉伯向東的擴張中止了約50年；從724—727年，突騎施深入粟特國境，遠至康國（撒馬爾罕）本土。726年，突騎施為防衛骨咄（帕米爾以西）而與阿拉伯人交戰；阿拉伯人直到730年才開始認識到突騎施的力量。

唐朝感到應該安撫蘇祿，于是在722年安排把唐朝的“公主”（實際上是西突厥名義可汗的一個女兒）嫁出和親。同時，中國的安西都護府（塔里木盆地）和北庭都護府（準噶爾）的防御設施不斷地得到加強。718年，安西成為一節度使駐節之鎮，北庭在727年也照此辦理。到8世紀30年代，它們各自擁有兩萬名的守軍，給養部分來自屯田，部分地來自與中亞貿易的商人所繳的過境稅。

這些預防措施之所以必要，不僅是由于蘇祿本人明顯的軍事力量，而且是由于他與中國的兩大最強大的宿敵東突厥和吐蕃聯姻。725年，他插手支持于闐王的反唐叛亂。叛亂很快被平定，但蘇祿與中國的安西副使結下私仇，他與吐蕃盟友一起掠奪塔里木盆地，圍攻龜茲，進攻高昌區。但突騎施基本上仍只插手中亞事務，730年，蘇祿與唐朝媾和。突騎施的力量幾乎完全依靠蘇祿個人的領導和他給他的部落領袖提供無數掠奪物的能力。到8世紀30年代，他與諸子和酋長們的關系日趨緊張，同時他得了一次中風，一臂不能動彈。但他被迫繼續征戰。731年，他又進犯粟特，企圖打敗阿拉伯人和奪取富饒無比的康國（撒馬爾罕城）；他差一點兒成功，在被迫撤軍前重創阿拉伯人。

在西面受阻后，蘇祿又在735年和736年進攻中國北庭和北塔里木的據點。這一次他遭到慘敗，于是又被迫議和。因此他在737年又重新西撤，阿拉伯人已在那里進攻位于經過帕米爾的南路的要沖骨咄。蘇祿與從粟特和吐火羅的幾個屬國抽調的部隊渡過烏滸水，抵達阿拉伯重要的前沿基地巴爾赫。雖然蘇祿的軍隊人數大大超過阿拉伯人，但他們被徹底擊潰。

這是蘇祿及突騎施力量沒落的開始。部落的對立造成了危機；738年蘇祿被一個爭權者謀害。在隨之而來的混亂中，這些部落中的一派請求中國人援助，于是中國人會同拔汗那（費爾干納）王平息了突騎施之亂。這一地區取得了全面的政治解決，拔汗那、柘支（塔什干）和佉沙（基什）諸王都得到中國的封號。中國人企圖在西突厥人中立一新可汗以便對突騎施進行控制，這又引起一次動亂，但744年的又一次討伐最后打垮了突騎施人，并在伊犁河流域和碎葉區重建中國的權威。到750年，這里成了中國的強大的基地，高仙芝由此就能進一步向中亞擴張力量，最后在那里與阿拉伯人直接對峙。

被內部斗爭搞得四分五裂的突騎施不再是唐朝的威脅。在8世紀50年代，他們日益受到住在巴爾喀什湖之南的北鄰葛羅祿部的壓力。葛羅祿部曾參與回紇人推翻東突厥之戰，但后來又與獲勝的回紇人不和，此時開始向西南遷入突騎施的領地。

### 東突厥的衰落和回紇的崛起

716年默啜可汗之死引起了東突厥人內部一段不穩定的時期，在此以前，他們的力量已因許多臣服民族的變節而減弱。新的小可汗匐俱不久就被默啜之侄、杰出的將領闕特勤廢黜，后者把除年邁的暾欲谷以外的默啜的家族及其衙官全部殺害。闕特勤以新可汗（中國史料中稱默棘連或毗伽）代替匐俱，新可汗從716年一直統治到734年。在716年和717年，突厥領地瘟疫肆虐，于是與蒙古北部諸臣服部落的一系列血腥戰爭爆發了；結果烏古思諸部逃往中國避難。

毗伽成為可汗后，立刻想進犯中國，但被顧問們勸阻。他于是妄想使其部落民過定居生活，自己則想住在中國式的圍有城墻的都城內。這一計劃被暾欲谷勸阻，他認為這一發展會破壞突厥人的民族特點和使突厥人喪失對付中國人的力量——機動性。同時，毗伽建議與中國人媾和。玄宗予以拒絕，并在718年計劃糾集東面的契丹和奚族、西北的拔悉蜜和黠戛斯以及臣服于突厥的形形色色集團，對突厥發動一次協同進攻。720年秋，進攻在中國將領王唆的指揮下進行。計劃同時直搗突厥大營的行動是一個錯誤。拔悉蜜先于中國大軍抵達，結果被擊潰。突厥人于是開始襲擊河西走廊的中國定居地和西面的北庭都護府。

在721—722年期間，和解終于達成：可汗同意事玄宗為父，突厥的朝貢使團和使節定期來中國朝廷。毗伽幾次要求娶中國的公主，但始終沒有得到同意。8世紀20年代后期出現邊境糾紛時，吐蕃要求突厥人一起進攻中國，但毗伽拒絕，原因也許是中國人已在朔方建立大規模的邊境集市，突厥人和其他邊境民族可以在那里獲得大量中國絲綢。

731年 闕 特勤死，玄宗派使者前去吊唁，并派中國匠人為闕特勤之碑刻漢文紀念。達成的親切的妥協顯然對突厥人和中國人都有利。734年，毗伽被他的一個大臣毒死。

在8世紀30年代初期，這一政治平衡受到契丹和奚族的叛亂的威脅（見下文），它們拒不接受中國屬國的地位，轉向突厥效忠。突厥人似乎不愿意直接插手，從而危及與中國的良好關系，雖然在733年有些突厥軍隊協助契丹兵作戰。然而在734年突厥人幾次向渤海王建議，希望結盟反對契丹，但沒有成功；735年，他們自己攻打奚和契丹，但被打敗。突厥人肯定已深深地陷入東北的這一危機之中，唐朝發現單單契丹已是強大和意志堅決的敵人，就十分謹慎地不讓突厥人直接參加對抗。

伊然繼毗伽為可汗，他不久死去，由其弟登利可汗繼位，后者是被毗伽遺孀控制的兒童。這兩個可汗繼續與玄宗的朝廷保持朝貢關系。741年，穩定的局勢被破壞，登利被他的一個將領東殺所殺，東殺另立毗伽的一個兒子為可汗。但新可汗很快就被骨咄葉護殺害，他的弟弟被繼立為統治者，但又被謀殺。葉護于是自立為可汗，但拔悉蜜、回紇和葛羅祿群起反對，把他殺死。拔悉蜜人企圖立自己的可汗，但突厥人另立殺害登利可汗的兇手之子烏蘇米施為可汗。中國人派使者要他效忠，但被拒絕。他的朝臣反對這一行動，烏蘇米施在遭到拔悉蜜和其他部落的攻擊后出逃，在744年被拔悉蜜部所殺，并被傳首長安。

突厥人此時完全處于無政府狀態。烏蘇米施之弟被立為白眉可汗，但其他突厥人另立拔悉蜜之主為對立的可汗。中國人利用了這一混亂。朔方節度使率軍進入草原，打垮了東面諸部。同時，葛羅祿部和回紇部殺了拔悉蜜的可汗，回紇的首領骨力裴羅控制了該國。745年回紇殺了最后一個突厥可汗白眉，將其首級送到中國朝廷。毗伽的令人生畏的遺孀率部投誠玄宗。突厥帝國滅亡。

導致突厥人滅亡的部落聯盟是很短命的。最初在叛亂中為首的拔悉蜜在744年被其他部落所滅，拔悉蜜的首領逃往北庭尋求中國的保護。此后不久，葛羅祿也臣服于回紇，回紇的統治者骨力裴羅此時成為原先被突厥人統治的整個草原區的無可爭辯的主宰。746年，玄宗封他為懷仁可汗，批準他為統治者。

747年，他的兒子磨延啜繼他為可汗；磨延啜鞏固了回紇對其前盟友的霸權地位，并建都于合刺八刺哈孫城。回紇人以前原為游牧民族。磨延啜此時采取了716年毗伽可汗曾為突厥人設想的步驟，即給他的臣民建立一個固定的首府，回紇人逐漸開始定居和務農，同時他們的首府和磨延啜通過中國人和粟特人在色楞格河畔建造的另一個城市成了活躍的商業和手工業中心。回紇人從未成為定居的民族。在840年他們的帝國滅亡前，他們多半依然是牧民。但他們很快發展了遠比突厥人在鼎盛時期更為復雜和先進的社會和經濟秩序。

對唐朝來說幸運的是，他們一直保持與中國的友好關系。在玄宗在位的最后幾年，他們建立了正規的朝貢關系，并且奠定了在下一世紀將把雙方連接起來的有利可圖的商業關系基礎。

### 契丹和奚

中國對南滿控制的重新建立、717年營州的強大的平盧軍的建立和714年契丹王和奚王的重新歸順，使東北開始了一段相對安定的時期。這種局勢是由唐“公主”與契丹王和奚王的一系列王朝通婚支撐的。貢使定期來到中國的朝廷，貿易在營州十分繁榮。此外，在東滿洲出現的強大而穩定的國家渤海（詳見下文）有助于進一步穩定東北，而突厥人的總的消極態度避免了外來民族在這一區域構成的傳統戰略威脅，即對整個北方邊境的聯合進攻。最后，唐朝在東北的防御設施極為強大。696年契丹入侵后建立的五個軍在玄宗初期得到三個軍的補充，在729年又增加了兩個軍。它們歸范陽節度使指揮，到8世紀30年代，歸他直接調遣的軍隊達9.1萬人。此外，平盧軍和南滿的其他軍隊也歸他節制。范陽是所有邊境藩鎮中實力最強的一個，這是朝廷見到契丹和奚構成的潛在威脅而采取的一個重要措施。

這一區域外表的平衡實際上掩蓋了高度動蕩的政治局勢。契丹的局勢尤其如此；718年李失活死后，契丹在八年中走馬燈似的有四個王上臺。契丹朝廷的實權掌握在大臣可突于手中，他廢立了幾個王，大權在握。8世紀20年代后期，他與一朝貢使團來長安朝廷，遭到宰相李元紘的粗暴對待。他對中國人懷有很深的怨恨；他在730年殺契丹王，迫使作為王妃的中國“公主”逃到營州的駐軍那里，然后自立為契丹的統治者。他脅迫其鄰近的奚族參加叛亂，并歸順突厥的毗伽可汗。

雖然中國朝廷決定討伐他并下令大量征兵，但有效行動直到732年才開始。信安王李祎全面指揮一次同時從幾個方面進攻可突于的戰役。經過幾次挫折，李祎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給對方造成大批傷亡，抓獲很多俘虜。可突于徹底戰敗，率殘部逃進熱河山區，同時他以前的同盟奚族向唐投降，恢復了原來的屬國的地位。

但契丹根本沒有滅亡。733年春，有突厥友部參加的契丹大軍駐營于渝關塞外。新任范陽節度使的薛楚玉派軍進攻，但大敗而歸。同年稍晚的時候，在最近與吐蕃交戰中戰功卓著的張守珪接替了薛楚玉。可突于被張的盛名所懾而被趕走；他試圖通過詐降來贏取時間，同時向西北撤退，指望與突厥人會合。張守珪此時策反了一個與可突于不和的契丹將領李過折。李過折殺害了可突于及其許多支持者，將其首級送呈中國朝廷。

735年玄宗承認李過折為契丹的領袖，并封以各種表示他的臣屬地位的官職。契丹問題似乎得到解決。但和平希望很快又破滅。在同年年底以前，可突于的殘余黨羽在涅禮的謊言煽動下，殺害了李過折及其大部分家屬。同時，突厥人進攻契丹和奚，但被擊退。中國朝廷寬恕了涅禮并批準他為契丹王。但在736年初期，奚和契丹又不服中國的節制。張守珪的將領安祿山率軍進擊，但被戰敗。次年，張守珪大敗契丹。隨之而來的是一段戰爭的間歇，但雙方未達成明確的和解。

738年秋，張守珪的兩名屬將矯稱張守珪的命令，使營州主將在橫水進攻奚。進攻失敗。張守珪企圖掩蓋真相謊報勝利。真相泄露，張在隨之而來的丑聞中被貶，職務由李適之接替；李率軍在740年秋打敗了契丹和奚。

局勢到這時候終于變得比較安定了。唐的防御體系得到加強。743年河北建立了兩支新軍，平盧建立另一支軍隊；在742年，原歸范陽節度使指揮的平盧改為負責中國在南滿地位安全的一個獨立藩鎮。743年契丹和奚國派使者至長安，唐朝廷也顯然決定試探和解，因為在745年，中國又有公主嫁給了契丹王和奚王。

但在745年末，兩王殺害了中國的王妃并謀反。自742年起已任平盧節度使并在744年以后同時指揮范陽的安祿山平息了他們的叛亂。746年，中國朝廷冊封了契丹和奚國的新王。和平關系得以恢復：749年奚使者來到長安，契丹使者則于750年相繼來到。

終玄宗之世，奚和契丹的問題仍未解決。雖然這些部落沒有大舉侵入中國境內，但中國人企圖控制它們的活動也沒有結果。它們一直是強有力的威脅，它們的存在說明唐朝在東北保持龐大的軍事制度是完全有道理的。

### 渤 海

玄宗在位期間，唐朝與以前很少直接交往的中滿和北滿諸民族發生了關系。唐朝已偶爾接待來自生活在東西伯利亞、庫頁島可能還有堪察加的形形色色來歷不明的民族的使團，并與滿洲和黑龍江流域的民族有定期交往。在唐初期，北高麗和今遼寧和吉林兩省東部形成高麗國的領土。在高麗之北，許多室韋亞族居住在今黑龍江的西半部，它們屬于與契丹有關系的蒙古族，而在今黑龍江省東半部和黑龍江下游則是有通古斯族血統的靺鞨的領地。北高麗人口的大部分也屬于靺鞨血統。

隨著高麗的衰亡，其原來的領地成了權力真空。在南部，一個組織甚差的“小高麗”國在新統一的新羅國和遼河流域下游中國人定居區之間的地區勉強維持生存。高麗統治集團的大部分已被高宗遷移，有的到中國各地，但大部分則在營州地區居住。當696年契丹入侵河北從而中斷中國在東北的行政時，由來自濊貊統治階級和高麗靺鞨部落的民族組成的一個集團叛亂，在前高麗將領大祚榮率領下逃到今吉林省的松花江上游。大祚榮在那里自稱振國國王，并使自己成為突厥的默啜可汗的一個藩屬。

到705年，中國朝廷得知他已成功地在東滿洲建立一個強大的新國家，于是決定承認它，希望中國在與奚和契丹作戰時，它會成為一個同盟。使者你來我往，但與契丹和奚的戰爭切斷了雙方的交往，直至712年，這時中國承認大祚榮為渤海王。新的渤海國開始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繁榮的王國，它的組織如同新羅那樣嚴格仿效中國的模式。定期的朝貢使團被派往長安，為了促進貿易，它還作了專門安排。

719年大祚榮死，他的兒子大武藝繼位，他統治渤海直至737年。雖然朝貢關系沒有中斷，但在8世紀20年代，雙方關系趨于緊張。渤海王采用自己的年號，放棄唐朝正朔，以表示獨立于唐朝之外；渤海朝廷于是分裂，一方為親唐派，一方為以渤海王為首和謀求更獨立的路線的保王派。

唐朝對渤海的日趨強大越來越憂慮，并開始尋求同盟以抵消它的力量。渤海幾代國王以前曾被北部鄰族——黑龍江流域的靺鞨族——打得大敗，唐朝開始與這些以好戰著稱的部落建立聯系。726年，靺鞨派使者前來朝廷，中國人在黑龍江流域建立一邊境行政區，由中國的軍官充當部落首領的顧問并組織了一支部落軍隊。

渤海王當然會以憂慮的心情看待這些事態發展。726年，他命他的弟兄大門藝（此王從705—712年曾在唐朝廷當人質）率軍對黑龍江流域的靺鞨族進行一次先發制人的打擊，以防止唐和靺鞨的南北夾攻。大門藝反對這一計劃，說這樣會背叛他們的霸主唐帝國，他逃到了玄宗的朝廷。

渤海王派使者要求處決大門藝。玄宗企圖蒙騙使者，說大門藝已被流放嶺南，而事實上他被派往中亞任職。真相泄露之后，渤海王大怒。732年他派海軍出征，襲擊山東半島的中國重要港口登州，攻占了州府，撤軍前把刺史殺死。

玄宗此時決定對渤海采取激烈行動，他與也因強大的北鄰的崛起而感到威脅的新羅王擬訂計劃，準備中國軍隊從營州、新羅軍從朝鮮半島北部進行聯合夾擊。戰爭的結果是一次慘敗。733年中國人因與契丹重新出現糾紛而放棄了這次戰役；新羅軍也在高麗北部山區被暴風雪所困，在未與渤海軍遭遇前就損失大部分人馬，最后被迫撤軍。734年玄宗致函新羅王，敦促他一有機會就向渤海進攻，同時雙方締結了協同防御的協定，結果唐朝等于正式放棄了它以前在高麗征服的土地上的長期權利。渤海王為報私仇，繼續反對大門藝；他企圖派人在洛陽暗殺大門藝，但企圖失敗，刺客被捕。

但更冷靜的意見終于占了上風。在8世紀30年代，突厥人屢次與契丹發生糾紛，734年他們要求渤海與之結成聯盟，以對付此時又承認中國宗主權的契丹。渤海王也許意識到，作為契丹領土上的主宰的突厥人會成為比唐朝更具有侵略性的鄰邦，所以拒絕了這一建議。735年，渤海派遣由一個王子率領的朝貢使團前往長安，作了表示正式臣服的行動。從此使團歲歲來朝。

737年，其政策導致與唐朝關系破裂的大門藝（原文如此，應為大武藝——譯者）死亡。渤海諸王中最偉大的大欽茂（死后的謚號通稱大文王）繼位。他在位的57年使渤海的國力達到最高峰，而且取得了很高的文化水平。在他統治下，渤海在制度和文學文化方面成了唐朝亦步亦趨的翻版，很像新羅和日本已經做到的那樣。它成了中文作為行政和文學通用語的東亞中國文化圈的一部分。雖然渤海與新羅及日本同樣完全獨立，唐朝政策也無力干涉它的內政，但朝貢關系的形式仍被謹慎地保持著。渤海王和新羅王正式接受唐朝廷的封號，他們的王后和太子也是一樣。兩國使者定期到唐朝廷祝賀新年，他們朝貢后得到回贈的中國產品則更加昂貴精美。

渤海崛起后，唐朝在東北面臨新的形勢。新羅和渤海既不是在發展程度上明顯低于中國的部落民族，也不是在生活方式和社會組織上完全屬于異族的游牧帝國。它們都是定居社會，完全是像中國本身那樣組成的中央集權官僚王國；唐朝廷必須與它們一起創造一種新型的關系，即要接受一種遠比與以往任何鄰國相處時都更為平等的關系和更為共同的文化。

### 750—755年的對外發展

直至8世紀40年代為止，對邊境事務的處理基本上是成功的。吐蕃的邊境已經穩定，以前喪失的重要戰略地區已被收復。經塔里木、伊犁河流域和帕米爾通往中亞的各條路線都得到保護。草原被比較和平和友好的回紇人控制，契丹和奚民族的威脅被成功地遏制了。漫長無比的邊境防務在人力和供養方面都是代價昂貴的。但唐朝成功地達到了它的目的，玄宗時期的戰役很少是中國對鄰邦的侵略政策或擴張野心引起的。

但約在750年，中國在經過十年勝利的征戰后遭到了一次次嚴重的軍事挫敗。751年，曾在小勃律和拔汗那之役取得輝煌勝利的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最后與阿拉伯人在咀邏私（塔拉斯）水交鋒，被打得潰不成軍。[[221]](#_22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戰斗本身并無重要意義。但它對未來的影響是十分嚴重的，因為它使阿拉伯人處于有力的地位，當安祿山之亂后中國在突厥斯坦的守軍開始處于孤立然后又遭到吐蕃的侵襲時，他們就得以向中亞擴大勢力。751年安祿山也慘敗。750年，安祿山的軍隊在東北邊境又已與奚和契丹交戰。據歷史記載，這些敵對行動是安祿山蓄意挑起的，其目的是想取得輕而易舉的勝利，然后向玄宗邀功請賞；戰爭以中國的勝利告終。安祿山于750年后期回京后被厚加賞賜，即獲準可自行鑄錢這一無與倫比的榮譽。751年返回東北后，他準備大舉征討契丹，于是率領自己的6萬名軍隊和一支奚騎兵對付契丹。遠征的結局是一場十足的災難和安祿山大部分部隊的喪失。[[222]](#_222_Tong_Shang_Shu__Di_9608__99)盡管這次慘敗主要是安祿山過分自負引起的，玄宗個人對他仍如此寵愛，以致他未受到任何懲處。

就在這一年，唐朝在云南也遭到同樣的慘敗。中國人在這里面臨新興的南詔國：中國人曾鼓勵南詔的興起，以期在對付吐蕃時它會充當中國的盟友。8世紀30年代后期，蒙舍（南詔）統治者皮邏閣逐步將統治擴大到今云南的6個土著王國（六詔），此舉得到劍南節度使王玙的默許和援助。739年，他在今大理附近建都，并以重兵設防。南詔王和太子得到中國的封號，于是與中國朝廷建立了封建的關系。[[223]](#_223_Guan_Yu_Nan_Zhao_De_Jue_Qi)

750年，云南太守張虔陀企圖掠奪南詔的使者。南詔王閣羅鳳不甘忍受這種待遇，因此張虔陀在一份密奏中詆毀他。閣羅鳳大怒，在750年攻打云南府，殺死張虔陀，奪取這個地區受中國人保護的32個土著部落州。

受楊國忠庇護的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已在四川穩步地建立了他的權力基地。他此時決定率軍大舉征討南詔。751年夏初，他派軍隊8萬夾擊大理。閣羅鳳提出愿意歸還所占的領土，但鮮于拒不接受此建議，仍奮力發動進攻。結果是一場災難。閣羅鳳大敗唐軍；鮮于仲通死里逃生，唐軍傷亡6萬——許多人死于疾病。楊國忠對玄宗隱瞞真相，詭稱取得了重大勝利。但這次魯莽的遠征使中國在四川的地位非常虛弱。閣羅鳳馬上向吐蕃稱臣，于是吐蕃和南詔的結盟在以后威脅著西南的邊境達40年之久。[[224]](#_224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97)

中國經過十多年不斷的勝利后重新出現的這一邊境問題促使李林甫在751年初期設法讓自己遙領朔方節度使，而實際的指揮權則操在助手李img之手。四川的這場災禍以后，楊國忠在751年陰歷十一月決定讓自己擔任劍南節度使，以鞏固自己在四川割據的權力基地。[[225]](#_225___Tang_Hui_Yao____Juan_78_D)

752年初期，李林甫又遭到楊國忠及其同伙的攻擊，原因是他對朔方負有責任。752年春安祿山集結一支20萬騎兵的大軍以報他被契丹戰敗之仇。作為他計劃的一部分，他曾要求得到奉信王李獻忠——實際上是一個不愿在安祿山麾下效勞的原名阿布思的突厥降將——統率的朔方鎮大批騎兵的援助。安祿山對阿布思有宿怨，阿布思自然擔心安祿山會把他殺死。阿布思沒有參加征討契丹，反而叛亂；他襲擊了朔方的軍械庫和糧倉，然后逃進大草原。

安祿山此時取消整個遠征。阿布思原為李林甫的朔方節度使副使，所以楊國忠、陳希烈和哥舒翰都企圖要李林甫對阿布思的叛亂負責。雖然他們沒有得逞，但李林甫被迫辭去朔方節度使之職，而轉由安祿山的堂兄弟、已為河西節度使的安思順擔任。[[226]](#_226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從這時直至755年，從鄂爾多斯到滿洲的整個北部邊境被安氏兄弟所控制，他們此時仍是李林甫的支持者。

以后不久，李林甫企圖對楊國忠進行反擊。自鮮于仲通對云南的未遂入侵以來，唐與南詔的邊境糾紛不斷。李林甫此時要求楊國忠傾聽四川黎民要求他承擔起節度使職務的緊急呼吁。楊國忠和楊貴妃向玄宗求情；玄宗堅持命令楊國忠赴任，但答應很快會把他召回朝廷擔任宰相。

但這是李林甫最后的孤注一擲之舉。他已經病入膏育。一個術士告訴他如果能再見玄宗一面，他就可康復。盡管侍從們反對，玄宗仍同意見面；但李林甫這時已病得甚至不能行君臣之禮了。楊國忠就在出發至四川赴任之際被召回，李林甫在臨死前把未來的帝國事務托付給他。幾乎不久，李林甫在掌權19年以后死于752年陰歷十一月二十四日。[[227]](#_22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楊國忠立刻被任命為宰相。753年初期，他重新指控李林甫與阿布思的叛亂有牽連。后者已被回紇打敗，他的殘余支持者已為安祿山效勞；安祿山派他們的首領之一到朝廷報告：李林甫曾收阿布思為養子。玄宗下令調查。李林甫仍未被埋葬，但在753年陰歷二月，他被追奪所封的一切官品和官職；他在職的后嗣被削職為民，并被流放到邊遠的南方和西南的邊境，50多名近親和同伙被株連。他的財產被沒收，他的棺材被打開，珍貴的殉葬品被取走；他得到的只是平民的葬禮。[[228]](#_22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楊國忠和陳希烈又得到新的封號，以獎賞他們在這次骯臟的報復行動中的作為。

隨著李林甫之死，帝國已沒有一個堅強和負責的領導人。20年來，朝廷已習慣于他的堅強的控制； 自746—748年的幾次清洗以來，大部分可以遞補的領導人或者已經死亡，或是在地方任職。玄宗早就不再起君主的積極作用，此時，只能走一條最省事的道路，即聽任楊國忠去行使最高政治權力，而楊國忠盡管善于宮廷政治的權術和對玄宗有個人的影響，卻根本不能與務實的政治家李林甫相比。

前40年的政治發展已把空前的權力集中在宰相之手。但為了確保這一體制能順利地運轉，皇帝必須保留他更換宰相的權力和意愿。像李林甫和陳希烈享受的那種漫長而不正常的任期使替換越來越困難，因為在職者的勢力不但愈加根深蒂固，而且把一些人提升為高官（他們一般有希望成為在職宰相的繼承人）的按部就班的正常途徑堵塞了。楊國忠就這樣繼承了一個朝廷的高級官職，而他和楊貴妃只要仍得到玄宗的寵愛，他實際上是不會垮臺的。

## 楊國忠的掌權，752—756年

從752年年末至玄宗遜位，楊國忠就這樣一直是朝廷中左右一切的人物。除了宰相之職和中書令的實職外，他又兼任吏部尚書（李林甫自739年起就兼任此職），從而使他取得任命文官的控制權。他還繼續掌管許多在李林甫時期逐步設置的財政專署，這樣又使他完全控制了帝國的財權，因為戶部此時既無尚書又無侍郎。陳希烈依然是左相，他在李林甫的末年多少表現出有些獨立性，他還不是應予認真對待的政敵。此外，在李林甫垮臺之前，他被撤除了按慣例由左相擔任的兵部尚書的兼職。

但是，朝廷的勢力顯然被邊鎮節度使的巨大權力所壓倒。在安祿山叛亂之前的最后幾年，安祿山和楊國忠之間的關系日趨緊張，前者由于控制了北方和東北的邊鎮，對帝國構成了巨大的潛在威脅，后者則牢牢地支配著京師和朝廷。楊國忠此時孤注一擲，試圖為自己建立地方基地和軍事后盾，以與安祿山的力量相抗衡。

楊國忠想鞏固他的劍南節度使地位的企圖并不特別成功。四川遠離朝廷，交通不便，它的軍事編制又比較小，遠不如東北諸鎮完整，而楊國忠的黨羽鮮于仲通向南詔進行領土擴張的企圖也落了個災難性的結局。753年設立了由何復光節制的一個強大和擁有全權的嶺南藩鎮，使之從南面威脅南詔，但此舉收效甚微。754年夏對南詔重新發動入侵，其結果是又喪失了約全部人馬的四分之三。[[229]](#_22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楊國忠迫切需要的是一個強有力的軍事盟友。他選中了唯一與安祿山明顯為敵的突厥將領哥舒翰，[[230]](#_230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此人是西北隴右和河西兩地的節度使，并已在753年陰歷八月被封為王。他與安祿山的堂兄弟朔方節度使安思順長期不和；雖然在快到李林甫臨終時玄宗試圖讓宦官高力士去彌合雙方的分歧，但這反而使局面更加惡化。安祿山和哥舒翰曾在朝廷公開激烈爭吵。

哥舒翰擁有龐大的軍隊，總數達14.3萬人，他們久經沙場，在戰斗中得到鍛煉，在吐蕃邊境的十多年中常常取勝。754年，他的軍隊大加擴充。隴右建立了八支新軍，河西在755年初也建了一支新軍。[[231]](#_23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753—754年的冬季，安祿山急于加強他在玄宗心目中的地位，來朝廷祝賀新年。楊國忠告訴玄宗，安祿山肯定要謀反，并建議召見他以考驗他是否忠誠。當召見令發出時，出乎楊國忠意料的是，安祿山應召而至，向玄宗表明他的永遠不變的忠誠。玄宗對他大加賞賜，并比以往更加信任，雖然皇太子也與楊國忠一起警告說，安祿山可能謀反。使事態更加糟糕的是，玄宗甚至提出應任命安祿山為特任宰相，只是在楊國忠提出了關于安祿山只字不識不宜肩負此重任的緊急請求后，這一任命才未實現。結果，安祿山只當了尚書省仆射，這一職務當時是通常授給前宰相的閑職。[[232]](#_232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但安祿山仍獲得一個削弱楊國忠和哥舒翰力量的職務。他被任命為閑廄使和隴右（哥舒翰控制的藩鎮）群牧使。雖然安祿山三鎮兵力多于哥舒翰的軍隊，但河西和隴右的軍隊卻能更充分地得到騎兵的配備；此外全國騎兵所依賴的大片的國家牧地都集中在隴右和長安西北今陜甘兩省的地區。安祿山通過這一新任命的官職能為自己軍隊挑選幾千匹一流戰馬，以彌補自己軍隊的不足。[[233]](#_233_Tong_Shang_Shu__Di_6923__69)

在安祿山在京逗留期間，楊國忠對他的敵意已是昭然若揭，以致安祿山在754年陰歷三月回范陽鎮時，曾晝夜乘船兼程行進，途經任何城市都不下船，因為擔心楊國忠會派人追趕和拘捕他。[[234]](#_234_Tong_Shang_Shu__Di_6924Ye)宰相和帝國最有力量的將領之間的對抗形勢此時顯然已無法扭轉。但玄宗仍相信安祿山的個人忠誠，朝中無人再敢指出他謀反的可能性了。

安祿山來朝廷的結果是使楊國忠能為自己清除高級官員中的一個敵對集團，其中的成員與玄宗關系密切而且對他有相當影響。刑部尚書張筠和太常寺卿張垍兩兄弟為張說之子。[[235]](#_235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張筠在京畿和地方任職時政績卓著。他長于寫作，早就有擔任宰相的野心，但一直被李林甫壓制。李林甫死后，他成了陳希烈的支持者，希望能夠接替陳的位置。張垍在8世紀20年代也在朝中歷任顯宦；玄宗對他特別寵愛，把寧親公主下嫁給他，并準許他住在宮內的一個府第里。玄宗把他當作起草詔書的私人秘書和精通重大禮儀的人。當陳希烈請求批準辭職時，他也希望取代陳而擔任宰相，看來玄宗也確有此意。另一個弟兄為門下省給事中張埱。但張氏弟兄的權力與其說依靠他們的高級職務，不如說是來自張筠和張垍所任的翰林院供奉之職。

前面已經談過，玄宗在8世紀20年代有意識地發展集賢院，來為自己提供一批年輕有為之士，使他們能協助他從事各種文學寫作和準備、起草國家的重要文件。集賢院最初由張說掌管，后來被陳希烈接管，但仍保持它的重要地位。但在玄宗后期，它受到另一個由年輕有為之士組成的翰林院的挑戰。翰林院與集賢院不同，是直屬皇帝本人的一個宮廷機構。它最初由一大批作家、詩人、風水專家、占卜者、佛道僧侶、藝術家、畫家、書法家甚至棋師組成，這些人是使皇帝生活更加充實愉快的翰林待詔。738年，翰林院新設一學士院。學士院的重要性很快超過原來的翰林院，它是為皇帝處理國務和起草文件的個人的機要處；在這一職能方面，不久就代替了集賢院。[[236]](#_236_Guan_Yu_Han_Lin_Yuan_De_Fa)張垍是學士院首批成員之一，院址就設在宮中他的府第內。到754年，張筠也成為供奉。因此他們很有影響，很接近玄宗。

張垍實際上曾起草任命安祿山為宰相的詔書，但由于楊國忠的反對，詔書從未被付諸實施。754年陰歷三月安祿山離京時，玄宗的大太監高力士為他送行；高向玄宗稟告，安祿山離京時非常不滿，因為他知道玄宗原來打算任命他為宰相，但最后沒有做到。楊國忠猜測此事只能是張垍或他的某個弟兄向安祿山透露的。玄宗大怒，因為翰林院學士必須嚴守機密，張垍及其弟兄都被貶往地方擔任次要職務。[[237]](#_237___Jiu_Tang_Shu____Juan_97_D)

這一年晚些時候，楊國忠在政治上又贏得了一個勝利。陳希烈再三要求辭去宰相之職，754年陰歷七月玄宗在楊國忠的贊同下予以批準，因為楊國忠與這個同僚已經不和。玄宗希望吉溫代替陳希烈，此人兇殘陰險，在746—748年的清洗中曾是李林甫的主要代理人之一，并在御史臺任職多年。吉溫此時已成為一個安祿山的支持者。這一年早些時候，安祿山曾要求他擔任自己的群牧副使，同時還策劃提升他為兵部侍郎。楊國忠在想到必須與如此一名危險的同僚對抗時，不禁驚慌失措，所以他反對玄宗的人選，并成功地讓年長的吏部侍郎韋見素擔任吉溫的上司兵部尚書并成為特任宰相。[[238]](#_23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韋見素[[239]](#_239_Chuan_Ji_Zai___Jiu_Tang_Shu)（687—762年）是名門出身的進士，他在睿宗登基前的王府擔任低級官員，所以玄宗了解他的整個成年生活。他在京師歷任高級職務，以為人隨和溫順著稱。正如楊國忠所希望的那樣，他證明不過是一個傀儡而已，他副署楊國忠作出的命令時從不懷疑。

754年晚些時候，楊國忠又清除了另一個敵人，他就是深得人心和能干的皇族成員和京兆尹李峴。據某些記載，他把自753年以來影響長安的連綿陰雨歸咎于李峴，從而達到了清除的目的。其他記載則指出，楊國忠派密探弄清了一件牽涉到安祿山的陰謀后，強迫李峴的京兆府官員去襲擊在京的安祿山的府第，在那里發現了安祿山計劃叛亂的證據。安祿山的兩個代理人安岱和李方來都被處死。安祿山大怒，向玄宗申訴，玄宗為了安撫安祿山，就給理論上應負責任的官員李峴以降級處分。[[240]](#_24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他還使河東太守兼采訪使韋陟失寵，此人為著名學者，官聲極佳；楊國忠擔心玄宗可能計劃調他進京擔任宰相。韋陟被指控挪用公款，于是御史們前往進行調查。韋陟愚不可及，竟賄賂吉溫為他說情，同時又寫信給安祿山求助。此事被揭穿以后，楊國忠不但能把韋陟貶往邊遠的南方，而且又能把吉溫調出京師，然后把他處死。安祿山因此在中央政府中損失了一員干將，他要求寬恕吉溫的呼吁未被理會。[[241]](#_24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次年初期，不敢再親自來朝的安祿山派一名副將前來，要求批準以非漢族將領取代許多漢族將領。楊國忠和韋見素以此作為安祿山計劃謀反的確證，要求玄宗拒絕此議。[[242]](#_242___Xin_Tang_Shu____Juan_118)但是玄宗發怒了，他下詔照安祿山的要求任命新將領。宰相們于是提議召安祿山來朝廷和擔任宰相，但他所領的諸藩鎮應予分割并劃歸漢族將領節制，以剝奪他的實權。最初，玄宗傾向于按他們的意見辦理，而且必要的詔令也已擬就。但在詔令發出之前玄宗又作了進一步考慮；他派一名宦官前往安祿山駐節之地，要他弄清安祿山是否真正在計劃謀反。這名宦官得到安祿山的大量賄賂，所以回稟說安祿山一直完全忠于王朝。因此，玄宗命楊國忠和韋見素不要再用這類指控去打擾他。

但在755年初春，門下給事中裴士淹被派往河北巡視，據推測此舉是一個預防措施。[[243]](#_243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同時，安祿山又在與契丹和奚交戰，并在陰歷四月報捷。[[244]](#_244_Tong_Shang_Shu__Di_6932Ye)他究竟是想重新取得玄宗的歡心，還是在自己謀反時希望使外敵置身事外，則不得而知。安祿山留在范陽的大本營內，屢次稱病，拒絕接見玄宗的使者。當裴士淹抵達時，他一直等了三個星期安祿山才同意接見，甚至接見時他仍受到冷遇。

同時，楊國忠在京師繼續打擊浮在面上的安祿山的支持者，并且經常企圖制造安祿山有二心的證據。新任的京兆尹把安祿山的府第圍困，逮捕了安的一個代理人；經御史臺審訊后此人被秘密處死。安祿山的一個兒子安慶宗娶一個郡主為妻，并在朝廷任供奉。他秘密通知安祿山所發生的這些事。安祿山此時更加驚慌，當玄宗的親筆詔書召他回長安參加陰歷六月其子婚禮時，安祿山稱病拒絕進京。

陰歷七月安祿山奏稱，他要進貢馬3000匹，每匹馬配備兩名馬夫，由22名安祿山的非漢族將領帶領。河南尹達奚珣向玄宗提出警告說，他推測這些人可能會參加一場政變，所以建議讓安祿山等到冬季送馬，而且馬夫由政府提供，這樣就可以不動用安祿山的軍隊。現在，連玄宗也意識到安祿山可能有謀反之意了，就在此時，這一年早些時候他賄賂玄宗所派宦官之事真相大白。這名宦官被處死；另一名宦官攜帶給安祿山的詔書前往范陽，詔書內容如同達奚珣的建議，并邀請他在秋末玄宗依例在溫泉逗留期間來見玄宗。當玄宗的使者抵達范陽時，安祿山坐著接待，甚至拒絕按慣例表示敬意，幾天后使者被打發回長安。沒有再被接見。[[245]](#_245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事情現在很清楚，叛亂只是時間的問題了。在755年陰歷十一月初九，安祿山率領由同羅、契丹、奚和室韋諸部落民組成的軍隊和分隊造反，他聲稱已接到諭旨，命他去平定叛亂分子楊國忠。

## 玄宗朝的終結

在戰爭開始階段，安祿山取得了完全的勝利。[[246]](#_246_Guan_Yu_An_Lu_Shan_Pan_Luan)他的10萬多名主力軍經河北迅速南下進攻，實際上未遇到抵抗，同時命屬將留守幽州（范陽）、營州和山西北部的代州等叛亂基地。一個月后不久，他們就已進入河南。

叛亂消息在幾天之后傳到朝廷。楊國忠甚至在這時還在安慰玄宗，說叛亂在幾天內就會結束；又說只有安祿山本人要謀反，他的部隊并不是心甘情愿地追隨他的。但對王朝威脅的這種盲目低估立刻證明完全是錯的；玄宗經過了開始時的驚慌失措和不相信以后，就派效忠于王朝的將領前往洛陽和河東南部去全力征募和訓練部隊，同時剛從塔里木盆地的安西返京的封常清則被派往洛陽去準備防務，以對待叛亂者。封常清匆忙集結一支6萬人的部隊，并切斷了河陽的黃河大橋以阻擋叛軍的推進。但安祿山在此地下游渡過黃河并進逼汴州（今開封），于陰歷十二月攻陷該城。就在此時，安祿山得知玄宗已把他兒子處死，還迫令他妻子自盡。他一怒之下便屠殺了汴州的全部守軍。汴州為運河體系的主要港口之一，它的失守切斷了朝廷的南方供應線；安祿山派一名部將留守汴州，自己率軍攻洛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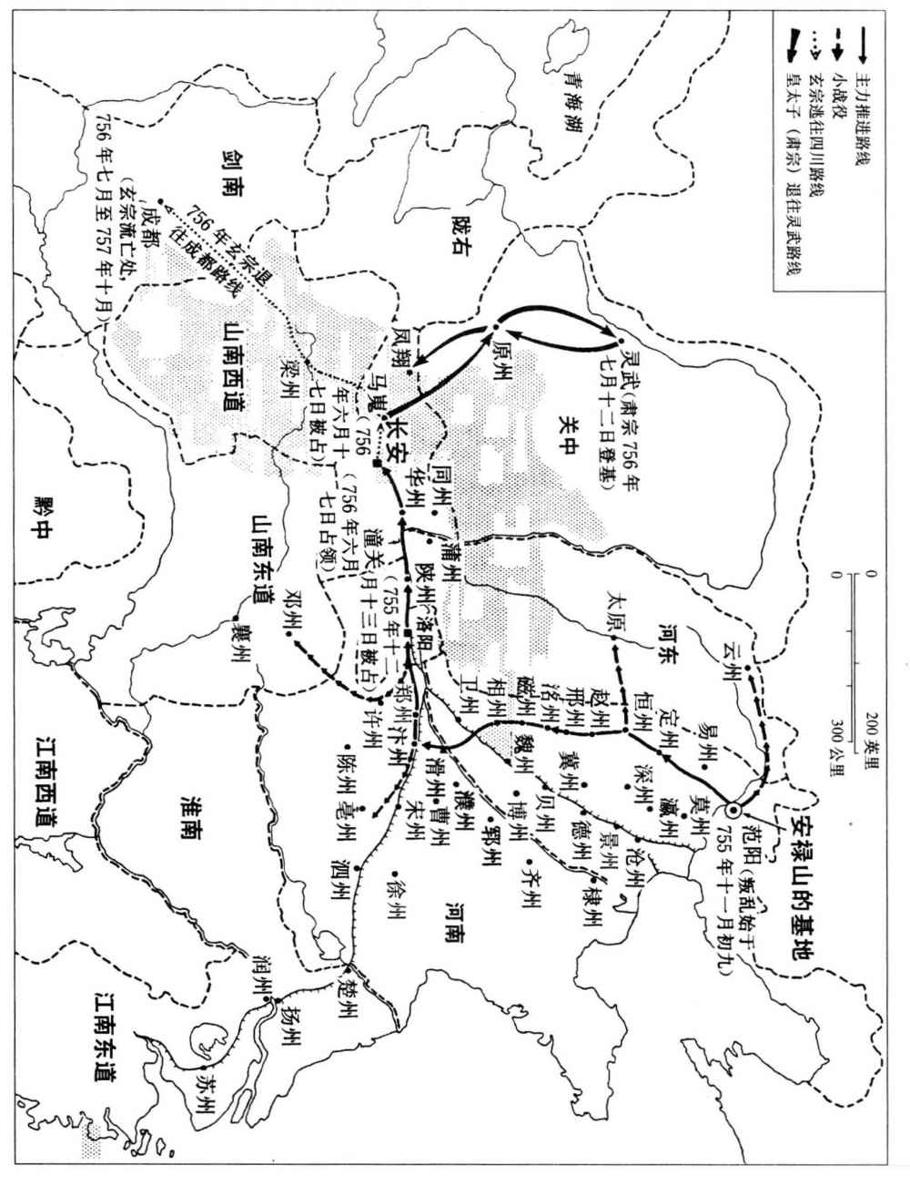
封常清的新兵組成的軍隊根本不能與叛軍匹敵，屢戰屢敗。洛陽的河南尹達奚珣在755年陰歷十二月十三日向安祿山獻城投降。同時，封常清已先退到陜州，接著經過一次血腥的慘敗后，又退到實際上難以攻破的潼關，這是入侵者進入關中和京城長安之前的最后一個可守之地。他在這里與曾在中亞身經百戰的英雄并已在準備防務的高仙芝會師。叛軍終于被擋住，他們的主力在陜州東面數英里之處安營扎寨。

安祿山因攻下洛陽而達到了他的第一個目的，于是開始準備建立他自己的長期統治的王朝。756年初，他自立為新王朝大燕之帝，同時宣布新年號和著手任命大臣以組織自己的中央政府。不少唐朝的有聲望的官員支持他。同時，他的軍隊出擊并占領了河南北部周圍的地區。

安祿山在河南北部第一次遇到堅決的抵抗。汴州東面和東北面的濮州和曹州在叛軍面前巋然不動，雍丘縣一個足智多謀的地方將領的頑強抵抗使叛軍不能向陳州南進。為了阻止叛軍向西南進入長江中游，鄧州節度使魯炅奉命指揮一支基本上由黔中（今貴州）和嶺南的非漢族部隊組成的大軍。雖然安祿山在756年陰歷五月把他擊退并圍之于鄧州，但他得到一支經藍田關的來自京師的部隊的救援，叛軍被迫北撤。

叛軍不但在南方遭受挫折。在河東的極北部，一支輔助的叛軍試圖西進攻打黃河的北套地區。他們屢敗于郭子儀之手，郭子儀的勤王軍收復了代州，并控制了關鍵的戰略要沖東陘關。

但安祿山的主要問題卻在河北。在叛軍向洛陽首次沖擊時，他們沒有有步驟地降服或占領這個道，而只是留為數不多的守軍控制通過太行山的井陘關，以防勤王軍從河東進入河北。幾乎不久，在恒州刺史顏果卿及其堂兄弟德州刺史顏真卿的領導下，一個組織松散但范圍廣泛的勤王運動在河北發展起來。這一起義有切斷洛陽的叛軍與其北方基地幽州的聯系的危險。到756年正月，正在計劃親自率軍對潼關發動決定性大進攻的安祿山發現，除了河北最北的幽州周圍的叛軍基地和該道西南角緊挨洛陽附近的地區外，他已喪失了對全河北地區的控制。河北中部和東部約有人口1200萬的17個州匆忙地組成了約20萬人的軍隊，他們宣布效忠于唐朝。



地圖12 安祿山之亂

顏果卿派出代表，企圖爭取幽州基地叛軍將領倒向勤王的事業。但安祿山得知這一密謀，很快就處決和替換了他的將領。叛軍這時對顏杲卿的恒州據點同時從南北夾攻。經過激烈戰斗，恒州失守，顏杲卿被俘，然后被送到洛陽處死；叛軍又控制了沿太行山山麓南北大道上的各個州，在那里進行血腥的報復。安祿山與他北方基地的交通線得以恢復，但勤王軍仍牢牢掌握河北中部和東部平原的一些人口稠密和富饒的州。

同時，長安朝廷由于叛軍的推進在潼關受阻和南面的叛軍被牽制而得以喘息，它為了確保帝國的安全，已經采取了十分激烈和具有極其嚴重地長期影響的措施。當叛亂的消息被證實時，朝廷立刻決定撤出西北的全部常備軍，只留下維持地方秩序所需要的少量守軍。這一撤軍沒有立刻產生影響，因為吐蕃王剛死，吐蕃急于想維持和平。但從長期觀點看，從河西和隴右撤出大量軍隊的行動將使西北和中國在中亞的統治聽憑吐蕃人和回紇人的擺布，并標志著中國將在今后的幾乎一千年中喪失了對塔里木和準噶爾的控制。

但玄宗別無其他選擇。京師的軍隊人數很少，訓練又差；在京畿區征募和訓練新兵需要時間；在洛陽周圍的最初幾次遭遇戰表明，這些匆忙征募的新兵無法與安祿山的老兵相匹敵。西北的邊防軍是唯一能與叛軍相比的有戰斗經驗的部隊。緊靠長安之北原受安思順節制的朔方鎮大軍仍忠于王朝，并由郭子儀指揮。郭子儀原為安思順麾下的將領，雖為著名的職業軍人，卻是一個出身名門的高級官員之子。安思順的另一個有契丹血統的將領李光弼被任命為河東的代理節度使。

但是最為重要的是對集結在潼關的保衛京師的軍隊的指揮。玄宗對封常清和高仙芝不能打敗叛軍之事非常惱怒，已斷然地把兩個人處死。不久前是隴右節度使而且在威信上只有他能與安祿山相匹敵的哥舒翰被任命為集結在關中的所有部隊和潼關守軍的統帥；同時各道都奉命征兵，準備對洛陽發動全面進攻。但哥舒翰病重，不能有效地進行指揮，而他的副將們又經常爭吵不休。

755年末和756年初期，朝廷為了便于組織防御以對付叛軍進一步的推進，開始任命指揮國內各道的節度使和受叛軍威脅的地區的防御使。這類任命越來越多；中國內地新藩鎮的設立導致了一連串中央權力下放的措施，這是唐朝后期的最重要的變化之一。

到756年陰歷二月，叛軍仍在河北握有主動權，并已企圖重占中部平原各勤王軍控制的州。叛將史思明在這里已開始圍攻深州，鄰近諸州勤王將領解圍都告失敗，損失慘重。為了解救深州，李光弼通過井陘關進入河北，在陰歷二月十四日奪取重鎮恒州。這就為勤王軍提供了河北的一個據點，使之能從河東控制極為重要的井陘關，并再次切斷叛軍從北方南運給養的主要路線。史思明停止圍攻深州而去對付這一新的可怕敵人，但被擊敗而不得不北撤至定州。

同時，顏真卿在河北的東部已取得對包括自己的德州及貝州（它是設有東北諸軍大軍需庫和軍械庫的主要供應基地）和博州在內的廣大地區的控制。他的部隊移向西南去攻占魏州。山東北部的青州刺史賀蘭進明也征集了一支勤王軍，渡過黃河與顏真卿會師，并且有力地負責指揮作戰。到陰歷六月，地方的勤王軍已攻占冀州，控制了河北平原的中部富饒區。

史思明已對恒州李光弼的部隊進行有力的反攻，并把他們圍得水泄不通。李光弼向郭子儀求援，陰歷四月初，郭子儀率軍經井陘關與李光弼會師，從而組成了一支超過10萬人的大軍。四月初十，勤王軍投入戰斗，大敗叛軍，并迫使史思明北逃至定州，使另一個叛將蔡希德往南撤至邢州。勤王軍占領了趙州。

五月初期，安祿山下令從洛陽地區和幽州的北方基地調兵增援史思明，企圖把李光弼和郭子儀趕出河北。陰歷五月二十九日，兩軍在嘉山遭遇，擺開陣勢進行大戰。叛軍一敗涂地，傷亡甚眾；史思明幸免于難，逃往定州，李光弼跟蹤而至，把他圍在定州。

從此，河北的許多州又群起反對叛亂的刺史，倒向勤王軍一邊。安祿山此時處境最為困難。他既不能進入關中，又不能向南面突破；他已經喪失了大部分兵將，同時勤王軍一占領河北，就會切斷他與北方的聯系。他經過認真的考慮，干脆放棄洛陽，退回幽州老巢。

朝廷這時處于有力的地位，因而出現了能在幾個月內平定叛亂的良機。但宮廷的陰謀決定了事態朝相反的方向發展。楊國忠的地位日益不穩，因為反對楊國忠及其黨羽是安祿山自己謀反的公開辯詞，也是倒向叛軍的許多變節行為的理由；所以潼關主帥哥舒翰擁有的左右一切的兵權使他有如芒刺在背。楊國忠的敵人曾企圖說服哥舒翰，希望他或是請求將楊國忠處死，或是干脆把他殺掉。哥舒翰拒不聽從這類建議，但楊國忠卻在主力軍后面部署了兩支軍隊，名義上作為萬一潼關失守時的第二線，但實際上是保護自己免遭哥舒翰可能發動的打擊。但哥舒翰要求這兩支軍隊應置于他的全面指揮之下。六月初，他把它們的一個將領召至大本營后斬首。楊國忠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不穩了。

奏報此時開始傳到朝廷，說面臨潼關官軍的叛軍已經兵力空虛，他們已被削弱和筋疲力盡。玄宗命哥舒翰發動正面攻擊，奪取陜州，進而收復洛陽。哥舒翰非常正確地加以拒絕，說他的軍隊的防御地位固若金湯，而叛軍在其他幾條戰線則節節敗退。他得到河北的戰地指揮官李光弼和郭子儀的支持，他們正準備北上打擊幽州的叛軍老巢。但楊國忠力促玄宗迫使哥舒翰進攻；宦官使節們帶了玄宗的個人命令前往哥舒翰的大本營。哥舒翰除服從外別無其他選擇，無可奈何地命令部隊轉守為攻。陰歷六月初七，他們在黃河河岸和群山之間的狹隘地帶遭到叛軍的伏擊，被徹底擊敗。至陰歷初九，叛將崔乾佑已占領潼關，從此在他的部隊和長安之間無險可守。帶了少數人馬在戰斗中逃生并企圖組織殘部負隅頑抗的哥舒翰被自己的部下所迫而向安祿山投降。

哥舒翰部下有人在初九來到長安，向玄宗報告了危急的局勢。玄宗召集大臣們商議，楊國忠建議玄宗退到四川，因為他已命他的家鄉劍南道（四川）的副使在那里準備了避難地以備朝廷應急之需，還因為叛軍實際上是攻不破那里的。陰歷十一日和十二日，大部分官員和許多平民已從長安逃往山區和周圍農村。當一小批官員在陰歷十三日上早朝時，他們發現玄宗已帶了精心挑選的護衛騎兵星夜秘密出逃，只有楊國忠、少數高級大臣、楊貴妃及其親屬、幾名皇室成員和幾名玄宗的貼身宦官隨行。大部分高級官員和許多皇族都被遺棄在京師。

玄宗是在非常艱苦的情況下從長安出逃的，護送的士兵桀驁不馴，他們對造成潼關禍災的罪魁禍首楊國忠特別怨恨。陰歷十四日，玄宗一行抵達馬嵬驛，他們在那里遇到一批擋住楊國忠之路和開始向楊訴說缺糧之苦的吐蕃使者。有些護送士兵指控楊國忠與外藩策劃叛國，就群起而攻之，把他和他的家屬殺死。秩序暫時恢復后，護送的將領要求玄宗還應處死楊貴妃。完全無能為力和聽憑嘩變部隊擺布的玄宗別無其他選擇，無可奈何地命他忠誠的大宦官高力士把她絞死，這樣，護送的士兵才被安撫下來。

隨著楊國忠及其家屬之死，一場就玄宗四川之行是否適宜的爭論同時出現，因為四川被楊國忠以前的支持者所控制。有人建議玄宗應撤往西北或太原，去集結支持力量，還有人則建議他們應回長安（它直到陰歷十七日才被叛軍占領），準備困守。但玄宗已決心去四川避難，于是決定繼續前往成都，同時皇太子被說服留在關中，以便在北方集結和組織抵抗力量。皇太子帶領2000人的一小支護衛部隊以急行軍首先抵達關中西部的原州，然后前往朔方鎮大本營所在地靈武（靈州，今寧夏銀川），于陰歷七月九日抵達該地。三天后，他在官員們的勸說下僭越帝位。史書上稱他的廟號為肅宗。

肅宗立刻開始在關中組織勤王軍（除了長安周圍的渭水流域地區，該道的大部分仍在勤王軍手中），并開始從回紇、吐蕃、塔里木甚至遠及拔汗那的幾個保護國那里召集支援力量。

得到上皇稱號的玄宗這時仍在赴四川的途中，對所發生的這些事情毫不知情。他在陰歷七月二十八日抵達成都，隨從減少到1300人，然后舉行了建立流亡朝廷的儀式。直到陰歷八月十二日，通告肅宗僭越行為的使者才抵達成都。被楊貴妃之死受到內心折磨和弄得筋疲力盡的年邁的皇帝毫不猶豫地同意了此事，于是在陰歷十八日派自己的大臣們隨帶皇權的象征物前往肅宗的大本營。唐代最漫長和最光輝的玄宗之治到此結束。

玄宗在成都留到757年陰歷十月，這時已是在郭子儀從叛軍手中收復兩京以后，肅宗把他請回長安，迎接時禮儀隆重。他開始住在他喜愛的興慶宮，后來在760年陰歷七月，他搬入皇宮內，這可能是因為朝中還有許多人效忠于他，他可能作為黨派陰謀的中，心人物，對他的繼位者構成潛在的政治威脅。他死于761年陰歷四月，享年77歲。

本章的敘述大量取材于新、舊《唐書》和司馬光在11世紀作的《資治通鑒》所描述的大事。重要的是，讀者必須注意某些情況，其中之一是這一時期的歷史編纂在材料上影響我們對事件的理解。《舊唐書》（成書于945年）提供了幾乎這一時期的全部基本材料；《新唐書》（成書于1060年）使用某些遺聞軼事加以補充；《資治通鑒》（成書于1085年）則對它們進行了重新整理和嚴謹的批判性的鑒別；《資治通鑒》編者當時掌握的某些材料已經散失。

但關于756年以前的時期，《舊唐書》的編者不過是完整地轉載了柳芳在759年完成并上呈肅宗的最后一部唐朝國史。他們沒有什么其他材料，因為史館所藏關于唐朝以前幾個皇帝在位期的官方檔案，包括起居注、實錄以及較早的國史，都已在756年安祿山占領長安期間被付之一炬。

在這場浩劫后幸存下來的唐王朝前期的唯一主要記載是史官韋述作的一部國史稿。這部史稿記述的確切時間范圍還不能肯定，但它幾乎肯定敘事至741年（開元期最后一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話。玄宗朝的早期在他在位時已分別被記載在《今上實錄》和《開元實錄》中：前者共20卷，于8世紀20年代在張說和唐潁的指導下編成；后者共47卷，在742年以后某個時期編成。《開元實錄》特別被提到，說它已毀于756年的大火，[[247]](#_247___Tang_Hui_Yao____Juan_63_D)但由于韋述于8世紀30年代已在史館工作，他可能已使用這些材料來編寫他的國史稿。

當柳芳在758年奉命撰寫國史時，他可能已掌握一部根據早期實錄寫成的玄宗朝早期的記載；這些實錄由于是在玄宗在位時所寫，它們一定是以贊譽的語氣寫出來讓他過目的。為了完成這部直至756年的歷史，柳芳的工作十分困難。大部分材料已經散失，無法尋找；我們知道，在8世紀60年代曾有編一部玄宗朝新實錄的企圖，但大部分文獻已經無法找到。此外，柳芳是在政治形勢異常困難的情況下寫作的。他在新帝肅宗的指使下撰寫，而肅宗已通過明目張膽的篡位而把玄宗廢黜，所以需要把他父親在位的最后幾年說成是一個行政不當的時期，以便為他的行為提供道義上的理由。但同時玄宗本人仍在世，他后期的幾個為首人物仍在活動和掌權。安祿山發難的這場叛亂仍未解決；柳芳本人的地位也很不保險，他因在756年附逆曾被處以流放，之所以匆忙地予以緩刑，是為了讓他從事歷史寫作。

我們知道，柳芳所寫的歷史在送呈肅宗過目時受到嚴詞批評。760年后，于休烈（他補上了肅宗本紀）和令狐峘對史稿作了一些小的修訂。柳芳本人并不滿意，于是又改弦更張，私下編寫了《唐歷》一書（現已遺失），在書中增添了一些細節。

但柳芳的760年的國史基本上被《舊唐書》的編纂者吸收到他們所寫歷史的早期部分之中，而且大部分是逐字照錄的。因此，關于玄宗時期的記載內容是不均勻的。約在741年前，它有充分的文獻依據，而且一般的是頌揚；他對玄宗的最后若干年則材料較少，語氣特別帶有批判性。這種不平衡不但明顯地表現在本紀中，而且也表現在列傳中。8世紀40和50年代的許多高級官員的傳記都很簡短，而且材料很少。其他的官員根本沒有傳記。朝廷中活動的主要人物都沒有留下可與張說和張九齡的文集相比的詳盡的個人文集，以解決正史中玄宗最后年代缺乏材料的問題；二張的文集使我們能夠非常詳盡地填補8世紀20和30年代的歷史空白。

因此，在對玄宗時期進行研究時，我們就處于只能依靠不充分的材料的境地，而且編寫他的歷史的客觀情況也使這部歷史的可靠性受到懷疑。如同所有前人所做的那樣，我在這一章重新展示了柳芳提出的辦法，即把整個玄宗時期分成三個階段：（1）政權鞏固時期；（2）日益受到宮廷緊張形勢妨礙的積極參政時期；（3）玄宗不再起積極政治作用和朝政被李林甫和楊國忠控制的最后一段時期。但讀者應該記住，柳芳的記載是奉命為強制性的政治目的撰寫的，寫作的情況又非常特殊和困難。我們永遠不能了解8世紀40和50年代許多大事的幕后真相，這是因為材料干脆已經不復存在了。但是，我們至少應該認識到在我們掌握的史料中存在一些應予說明的問題。[[248]](#_248_Guan_Yu_Xuan_Zong_Shi_Qi_Sh)

[[1]](#_1_6)這一章不斷得益于兩位學者的研究成果。第一位是已故的陳寅恪，他關于唐代政治的各方面的研究為近代的唐史及其制度史的工作打下了基礎，他1948年前的作品收入《陳寅恪先生論集》（臺北，1971年），《陳寅恪先生論文集》（兩卷，香港，1974年）則收得更全。第二位為浦立本，他的《安祿山之亂的背景》（倫敦，1955年）經過了20年，依然是詳細記述唐代各時期的政治史中的佼佼者。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經常取材于此名作。關于玄宗中期，佩內洛普·赫伯特的《張九齡的一生和著作》很有用（劍橋大學未發表的博士論文，1973年，以下簡稱赫伯特《張九齡》）。

[[2]](#_2_6)崔瑞德：《柳芳：一位被遺忘的唐代史學家》，1970年耶魯大學中國歷史學和比較歷史學討論會未發表論文。

[[3]](#_3_6)關于玄宗的早期生活和登位的情況，見霍華德·列維《王如何成為皇的：玄宗之即位（713—755年）》，載《漢學雜志》，6（1958年），第101—121頁。其早期生活的主要材料來源載于《新唐書》卷8，第165—171頁。

[[4]](#_4_6)《舊唐書》卷6，第123頁；《資治通鑒》卷205，第6490頁；《舊唐書》卷186上，第4839—4840頁。這些記載的時間和細節有出入。

[[5]](#_5_6)《舊唐書》卷51，第2176頁；《資治通鑒》卷205，第6488頁。

[[6]](#_6_6)《舊唐書》卷86，第2833頁。

[[7]](#_7_6)《舊唐書》卷8，第165—166頁。

[[8]](#_8_6)《舊唐書》卷7，第150頁；卷51，第2174頁；《資治通鑒》卷209，第6441—6442頁。

[[9]](#_9_6)《舊唐書》卷8，第166—167頁；《新唐書》卷5，第116頁；《資治通鑒》卷209，第6643—6648頁。

[[10]](#_10_6)《舊唐書》卷95，第3010頁；《資治通鑒》卷209，第6650頁。

[[11]](#_11_6)《資治通鑒》卷209，第6652頁；《舊唐書》卷7，第154—155頁；《新唐書》卷5，第117頁。

[[12]](#_12_6)傳記載《舊唐書》卷73，第2591—2592頁；《新唐書》卷98，第3893—3894頁。

[[13]](#_13_6)傳記載《舊唐書》卷99，第3087—3089頁；《新唐書》卷121，第4329—4331頁。

[[14]](#_14_6)傳記載《舊唐書》卷96，第3021—3029頁；《新唐書》卷124，第4381—4388頁；張說作墓志銘，載《全唐文》卷230，第8—11頁；《文苑英華》卷884，第1—3頁。

[[15]](#_15_6)傳記載《舊唐書》卷96，第3029—3036頁；《新唐書》卷124，第4389—4394頁；顏真卿的墓志銘載《全唐文》卷343，第1—8頁；補志載《全唐文》卷338，第22—24頁。

[[16]](#_16_6)《資治通鑒》卷209，第6653頁；卷210，第6654—6655頁；《舊唐書》卷86，第2835—2837頁；《新唐書》卷81，第3594—3595頁。

[[17]](#_17_6)《資治通鑒》卷210，第6662—6663頁。

[[18]](#_18_6)《舊唐書》卷7，第156頁；卷8，第168頁；《資治通鑒》卷210，第6663頁。

[[19]](#_19_6)《舊唐書》卷7，第156頁；《資治通鑒》卷210，第6663—6665頁。

[[20]](#_20_6)傳記載《舊唐書》卷92，第2922—2958頁；《新唐書》卷122，第4349—4351頁。

[[21]](#_21_6)傳記載《舊唐書》卷188，第4926—4927頁；《新唐書》卷116，第4241頁。

[[22]](#_22_6)傳記載《舊唐書》卷97，第3049—3057頁；《新唐書》卷125，第4404—4411頁；張九齡作墓志銘，《全唐文》卷292，第13—16頁。

[[23]](#_23_6)其傳記載《舊唐書》卷97，第3042—3049頁；《新唐書》卷122，第4360—4366頁。張說：《行狀》，載《全唐文》卷233，第1—7頁。

[[24]](#_24_6)其傳記載《舊唐書》卷183，第4724—4725頁；《新唐書》卷109，第4100頁。

[[25]](#_25_6)《資治通鑒》卷210，第6665頁；《舊唐書》卷7，第157頁；《新唐書》卷5，第118頁。

[[26]](#_26_6)《新唐書》卷83，第3656—3657頁；《資治通鑒》卷210，第6665頁；《舊唐書》卷98，第3061—3063頁；《全唐文》卷237，第12—14頁；《唐會要》卷50，第871—875頁。

[[27]](#_27_6)《資治通鑒》卷210，第6666頁；《唐會要》卷68，第1192—1196頁；《新唐書》卷49下，第1131頁；《舊唐書》卷38，第1358頁。

[[28]](#_28_6)傳記載《舊唐書》卷98，第3061—3064頁；《新唐書》卷128，第4413頁。

[[29]](#_29_6)傳記載《舊唐書》卷98，第3064—3069頁；《新唐書》卷116，第4236—4237頁。

[[30]](#_30_6)傳記載《舊唐書》卷74，第2622—2624頁；《新唐書》卷99，第3921—3923頁。

[[31]](#_31_6)傳記載《舊唐書》卷70，第2540頁；《新唐書》卷102，第3967—3968頁。

[[32]](#_32_6)《資治通鑒》卷210，第6673—6674頁；《舊唐書》卷8，第168—170頁。

[[33]](#_33_6)《資治通鑒》卷210，第6676—6677頁；《舊唐書》卷97，第3041頁。

[[34]](#_34_6)《資治通鑒》卷210，第6696—6697頁。

[[35]](#_35_6)《新唐書》卷5，第120頁；《舊唐書》卷92，第2971頁；傳記載《舊唐書》卷92，第2968—2971頁；《新唐書》卷122，第4371—4374頁。

[[36]](#_36_6)據《資治通鑒》卷211，第6683頁之《考異》，應為陰歷七月初三。根據下文，應為七月初三。——譯者

[[37]](#_37_5)《資治通鑒》卷211，第6681—6686頁；《舊唐書》卷8，第169頁；《新唐書》卷83，第3651—3652頁。

[[38]](#_38_5)退位詔書見《舊唐書》卷8，第169—170頁。

[[39]](#_39_5)《舊唐書》卷97，第3048頁；《舊唐書》卷96，第3023頁；《資治通鑒》卷211，第6687頁。

[[40]](#_40_5)傳記載《舊唐書》卷98，第3064—3069頁；《新唐書》卷126，第4415—4418頁。

[[41]](#_41_5)《舊唐書》卷98，第3064頁；《資治通鑒》卷211，第6700頁。

[[42]](#_42_5)《舊唐書》卷96，第3025頁；卷98，第3068頁。

[[43]](#_43_5)傳記載《舊唐書》卷98，第3070—3072頁；《新唐書》卷127，第4450—4451頁。

[[44]](#_44_5)《舊唐書》卷96，第3025頁。盧懷慎的臨終奏疏還提到宋璟的名字，《舊唐書》卷98，第3068頁。

[[45]](#_45_5)《資治通鑒》卷212，第6739頁。

[[46]](#_46_5)《舊唐書》卷96，第3025—3026頁；《新唐書》卷124，第4385—4386頁。

[[47]](#_47_5)傳記載《舊唐書》卷88，第2880—2882頁；《新唐書》卷125，第4399—4403頁。

[[48]](#_48_5)《資治通鑒》卷210，第6688—6690頁；《新唐書》卷124，第4383頁。關于姚崇的十條改革建議，見《全唐文》卷206，第14頁。

[[49]](#_49_5)關于《貞觀政要》，見原田種成《貞觀政要研究》（東京，1965年）；溫斯頓·劉易斯：《貞觀政要：研究早期唐代政府的材料來源》，香港大學1962年未發表的碩士論文。

[[50]](#_50_5)《資治通鑒》卷210，第6692頁；《唐會要》卷57，第990頁；《舊唐書》卷8，第172頁；《新唐書》卷46，第1185頁。關于宰相制的變化，參見嚴耕望《唐史研究叢稿》（香港，1969年），第1—101頁，此書最早出版于1952年；孫國棟：《唐代三省制之發展研究》，載《新亞學報》，3.1（1960年），第19—120頁；周道濟：《漢唐宰相制度》（臺北，1964年）。

[[51]](#_51_5)《資治通鑒》卷211，第6728—6729頁。

[[52]](#_52_5)《資治通鑒》卷203，第6421頁；《唐會要》卷60，第1041頁；《新唐書》卷48，第1237頁；《唐六典》卷13，第3頁。

[[53]](#_53_5)見佩內洛普·赫伯特《七世紀后半期中國的文官選拔》，載《遠東史論文集》（堪培拉），13（1976年），第1—40頁。

[[54]](#_54_5)傳記載《舊唐書》卷99，第3097—3100頁；《新唐書》卷126，第4424—4430頁。傳記連同徐浩的墓志銘（載《全唐文》卷440，第13—18頁）及1960年發現的墓志銘均被譯成英文，載赫伯特的《張九齡》中。

[[55]](#_55_5)其信載《文苑英華》卷670，第1—2頁；《曲江集》（四部叢刊本）卷16，第9—11頁；姚的答復載《文苑英華》卷689，第1頁；《曲江集》卷16，第11—12頁。715年的奏疏載《曲江集》卷16，第5—9頁；《文苑英華》卷676，第1—5頁。

[[56]](#_56_5)《唐會要》卷75，第1360頁；卷81，第1501頁；《冊府元龜》卷635，第226—236頁；參見714年更早的詔令，載《冊府元龜》卷211，第6694頁。

[[57]](#_57_5)《資治通鑒》卷211，第6716頁；《新唐書》卷45，第1176頁。

[[58]](#_58_5)關于706年的專使，見《唐會要》卷77，第1415頁；《新唐書》卷49下，第1311頁；《通典》卷32，第184頁；《唐大詔令集》卷103，第524—525頁。711年的改革，見《資治通鑒》卷210，第6666頁。714年再任命按察采訪處置使之事，見《資治通鑒》卷211，第6697頁。

[[59]](#_59_5)《唐會要》卷39，第702頁；《舊唐書》卷50，第2149頁；《通典》卷165，第871頁；《冊府元龜》卷612，第10—11頁。關于睿宗時期編訂法典的情況，見仁井田升《唐令拾遺》（東京，1933年），第17頁以后的導言；滋賀秀三：《關于漢唐間法典的一些考證》，載《東方學》，17（1958年），第27—43頁。

[[60]](#_60_5)《唐會要》卷39，第703頁；《唐六典》卷6，第18頁；《舊唐書》卷50，第2138、2149—2150頁；《新唐書》卷56，第1413頁；《通典》卷165，第871頁；《冊府元龜》卷612，第12頁。

[[61]](#_61_5)參見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2版（劍橋，1970年），第28—31頁；崔瑞德：《對商業課稅的一種儒家觀點：703年的崔融奏疏》，載《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學報》，36.2（1973年），第429頁；唐長孺：《關于武則天統治末年的浮逃戶》，載《歷史研究》，6（1961年），第90—95頁。

[[62]](#_62_5)見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重慶，1944年）。

[[63]](#_63_5)《通典》卷10，第56頁；《冊府元龜》卷497，第8頁；卷498，第15頁。

[[64]](#_64_5)《新唐書》卷53，第1365頁。

[[65]](#_65_5)見《舊唐書》卷37；《新唐書》卷35—36中關于自然災害的材料。

[[66]](#_66_5)《舊唐書》卷74，第2623頁。

[[67]](#_67_5)《冊府元龜》卷113，第18—20頁；《唐大詔令集》卷79，第451頁。

[[68]](#_68_5)《通典》卷10，第57頁；《唐會要》卷87，第1595—1601頁；《冊府元龜》卷497，第8頁；《舊唐書》卷100，第3111頁。

[[69]](#_69_5)《舊唐書》卷96，第3023—3024頁；《資治通鑒》卷211，第6726—6727頁；《唐大詔令集》卷79，第452頁。遷都的詳細情況，見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第25—31頁。

[[70]](#_70_5)《舊唐書》卷49，第2124頁；《唐會要》卷88，第1612—1613頁；《冊府元龜》卷502，第22—24頁。崔瑞德的《唐代的財政管理》第193頁列舉了這些儲備的規模。

[[71]](#_71_5)《唐會要》卷85，第1561—1562頁；《新唐書》卷112，第4165—4166頁。

[[72]](#_72_5)韋嗣立的奏疏載《全唐文》卷236，第6頁；《舊唐書》卷88，第2871頁；《資治通鑒》卷209，第6634頁；《唐會要》卷90，第1642—1644頁。韋又引了宋務光的奏疏，載《全唐文》卷268，第22—23頁。

[[73]](#_73_5)關于封地的問題，見仁井田升《唐代的封爵及食封制》，載《東方學報》（東京），10.1（1939年），第1—64頁；礪波護：《隋之貌閱及唐初之食實封》，載《東方學報》（京都），37（1966年），第153—182頁。

[[74]](#_74_5)《資治通鑒》卷211，第6702—6704頁。

[[75]](#_75_5)《唐會要》卷88，第1608頁。

[[76]](#_76_5)見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74—76頁。

[[77]](#_77_5)《全唐文》卷18，第9—10頁。

[[78]](#_78_5)《全唐文》卷19，第3頁。

[[79]](#_79_5)《佛祖統記》，載《大正新修大藏經》卷49，第373頁。

[[80]](#_80_5)《舊唐書》卷96，第3022頁。

[[81]](#_81_5)《唐會要》卷50，第878頁。

[[82]](#_82_5)《唐會要》卷47，第826—827頁；《全唐文》卷26，第27頁；《資治通鑒》卷211，第6696頁。

[[83]](#_83_5)《全唐文》卷26，第10頁；卷30，第10—11頁；卷29，第5頁。關于715年河北的教派起義，見《新唐書》卷5，第124頁；《舊唐書》卷8，第175頁；《資治通鑒》卷211，第6710—6711頁；《唐大詔令集》卷113，第588頁。這些記載提到教徒白衣長發。敦煌的《戶部格》殘卷（S.1344號）引了674年、695年和702年的類似的詔書。這些材料說明有些教徒受過很高的教育。

[[84]](#_84_5)《舊唐書》卷8，第172頁。關于對待佛教政策的更詳細的情況，見S.溫斯坦在《劍橋中國史》第4卷中所寫的一章。

[[85]](#_85_5)關于與吐蕃的關系，見伯希和《古代西藏史》（巴黎，1961年），書中把《舊唐書》卷196上和下及《新唐書》卷216上和下譯成法文。最佳的批判性研究載于佐藤長的《古代西藏史研究》（兩卷，京都，1960—1961年），此書把中文史料與J.巴科、F.W.托馬斯和Ch.圖森編譯的《敦煌文獻中有關西藏史的材料》（巴黎，1940年）中的藏文編年史互相印證。

[[86]](#_86_5)關于突厥人，見岑仲勉在《突厥集史》（兩卷，北京，1958年）收集的詳盡的史料；劉茂才（音）的《關于東突厥史的中文資料》（兩卷，威斯巴登，1958年）翻譯了主要史料。勒內·吉羅的《突厥帝國：骨咄羅、默啜和默棘連諸汗（680—734年）的統治》（巴黎，1960年）主要根據突厥史料寫成。

[[87]](#_87_5)《資治通鑒》卷210，第6672—6673頁。薛訥曾在710年打退了一次奚族的入侵，《資治通鑒》卷210，第6659頁。

[[88]](#_88_5)《舊唐書》卷39，第1521頁；卷185下，第4814頁；《新唐書》卷39，第1023頁。

[[89]](#_89_5)《舊唐書》卷97，第3053頁；《資治通鑒》卷212，第6753頁。

[[90]](#_90_5)對兵制改革的第一流的研究作品為濱口重國的《從府兵制到新兵制》，此文最早在1930年發表，重載于《秦漢隋唐史研究》卷1，（1966年），第3—81頁。以后又有大量的作品。浦立本的《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61—74頁）提供了早期研究的簡明總結。《巖波講座世界歷史》，5（1970年），第407—439頁中菊池英夫所寫的優秀的一章，《府兵制度的發展》提供了這一研究領域的更近期的狀況。

[[91]](#_91_5)傳記載《舊唐書》卷184，第4757—4759頁；《新唐書》卷207，第5858—5861頁。

[[92]](#_92_5)傳記載《舊唐書》卷51，第2177頁；《新唐書》卷76，第3490頁。

[[93]](#_93_5)《舊唐書》卷183，第4745頁。

[[94]](#_94_5)《唐會要》卷4，第43頁；《舊唐書》卷8，第174頁；《資治通鑒》卷211，第6707頁；《舊唐書》卷107，第3258頁。

[[95]](#_95_5)《資治通鑒》卷211，第6703頁。

[[96]](#_96_4)《舊唐書》卷86，第2833頁；據卷8，第173頁記載，他們把責任下放給他們的副手。

[[97]](#_97_4)《舊唐書》卷95，第3011頁。

[[98]](#_98_4)傳記載《舊唐書》卷95，第3009—3013頁。

[[99]](#_99_4)《舊唐書》卷107，第3271—3272頁。

[[100]](#_100_4)《新唐書》卷70下，第2147頁。

[[101]](#_101_4)《舊唐書》卷96，第3034頁。

[[102]](#_102_4)柳芳：《食貨論》，載《文苑英華》卷747，第10—12頁；《全唐文》卷372，第5—7頁。參見《舊唐書》卷9，第235—237頁之“玄宗本紀史官評語”，它肯定也為柳芳所寫。

[[103]](#_103_4)傳記載《舊唐書》卷99，第3090—3093頁；《新唐書》卷127，第4441—4444頁。

[[104]](#_104_3)《舊唐書》卷97，第3058頁。

[[105]](#_105_3)《舊唐書》卷97，第3053頁；《資治通鑒》卷212，第6746、6752頁。

[[106]](#_106_3)《舊唐書》卷97，第3053頁；《資治通鑒》卷212，第6753頁。

[[107]](#_107_3)《資治通鑒》卷212，第6755頁。

[[108]](#_108_3)傳記載《舊唐書》卷93，第2985—2990頁；《舊唐書》卷111，第4153—4157頁。

[[109]](#_109_2)《資治通鑒》卷212，第6755—6757頁。

[[110]](#_110_2)《唐會要》卷90，第1644頁；《資治通鑒》卷212，第6753頁；《新唐書》卷127，第4450頁。

[[111]](#_111_2)見《資治通鑒》卷212，第6758頁。

[[112]](#_112_2)關于集賢院，見池田溫《盛唐之集賢院》，載《 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19.2（1971年），第45—98頁。

[[113]](#_113_2)《資治通鑒》卷212，第6755—6756頁。

[[114]](#_114_2)《新唐書》卷127，第4450頁；《資治通鑒》卷212，第6740頁。

[[115]](#_115_2)《資治通鑒》卷212，第6740、6745頁。

[[116]](#_116_2)《唐會要》卷91，第1653頁；《資治通鑒》卷212，第6755頁。

[[117]](#_117_2)《資治通鑒》卷212，第6763頁。

[[118]](#_118_2)《資治通鑒》卷212，第6751頁；《舊唐書》卷95，第3016—3017頁。

[[119]](#_119_2)《舊唐書》卷95，第3018—3019頁；《資治通鑒》卷212，第6741—6742頁。

[[120]](#_120_2)《舊唐書》卷52，第2184頁。

[[121]](#_121_1)見霍華德·列維《唐玄宗的寵妃武惠妃》，載《通報》，46（1958年），第49—80頁。

[[122]](#_122_1)《資治通鑒》卷212，第6751頁；《舊唐書》卷59，第2334—2337頁；《新唐書》卷91，第3793—3794頁。

[[123]](#_123_1)見俞大綱《兩唐書玄宗元獻皇后楊氏傳考異兼論張燕公事跡》，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1931年），第93—101頁。

[[124]](#_124_1)見崔瑞德《唐代統治階級的組成：從敦煌發現的新證據》，載芮沃壽、崔瑞德編《對唐代的透視》（紐黑文，1973年），第47—85頁；以及此書所引的其他文獻材料。

[[125]](#_125_1)傳記載《舊唐書》卷105，第3217—3222頁；《新唐書》卷134，第4557—4559頁。

[[126]](#_126_1)關于宇文融的方案，見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30—32、49—50、178—182頁；鈴木俊：《關于宇文融的括戶》，載《和田博士還歷紀念東洋史論叢》（東京，1951年），第329—344頁；礪波護：《唐的律令體制與宇文融的括戶》，載《東方學報》（京都），41（1970年），第263—288頁。

[[127]](#_127_1)《舊唐書》卷48，第2106—2107頁；《唐會要》卷88，第1603頁；《冊府元龜》卷493，第14頁；《通典》卷10，第59頁。

[[128]](#_128_1)《唐會要》卷10上，第213頁。

[[129]](#_129_1)《唐會要》卷8，第105—108頁；《舊唐書》卷8，第186頁；《新唐書》卷5，第130頁。

[[130]](#_130_1)《唐會要》卷8，第108—118頁；《舊唐書》卷23，第891—904頁；卷8，第188—189頁。

[[131]](#_131_1)《資治通鑒》卷213，第6771頁；《舊唐書》卷185下，第4821—4822頁；《新唐書》卷130，第4497—4498頁。

[[132]](#_132_1)傳記載《舊唐書》卷106，第3235—3241頁；《新唐書》卷223上，第6343—6349頁。

[[133]](#_133_1)《舊唐書》卷97，第3054—3055頁；《資治通鑒》卷213，第6771—6772頁。

[[134]](#_134_1)傳記載《舊唐書》卷98，第3073—3075頁；《新唐書》卷126，第4418—4420頁。

[[135]](#_135_1)傳記載《舊唐書》卷8，第3075—3077頁；《新唐書》卷126，第4420—4422頁。

[[136]](#_136_1)《資治通鑒》卷212，第6772、6777頁；《新唐書》卷125，第4409頁。

[[137]](#_137)關于《開元禮》的編纂情況，見《大唐開元禮》（東京，1972年）第822—823頁中池田溫的編者注。

[[138]](#_138)《資治通鑒》卷213，第6782頁。

[[139]](#_139)傳記載《舊唐書》卷99，第3093—3095頁；《新唐書》卷101，第3949—3952頁。

[[140]](#_140)傳記載《舊唐書》卷84，第2806—2808頁；《新唐書》卷108，第4089—4091頁；張九齡的墓志銘載《典江集》卷19，第3頁。

[[141]](#_141)《新唐書》卷108，第4090頁。

[[142]](#_142)《舊唐書》卷8，第191頁。關于726—728年的災情，見《舊唐書》卷37及《新唐書》卷35和卷36等處。

[[143]](#_143)傳記載《舊唐書》卷76，第2651—2653頁。

[[144]](#_144)《舊唐書》卷105，第3221頁；《資治通鑒》卷213，第6787—6788頁。

[[145]](#_145)《資治通鑒》卷213，第6767—6788頁；《舊唐書》卷105，第3221—3222頁。

[[146]](#_146)戴何都：《〈新唐書〉選舉志譯注》（巴黎，1932年），第262—265頁；《唐會要》卷74，第1348頁；《冊府元龜》卷630，第6頁；《資治通鑒》卷213，第6789頁。

[[147]](#_147)傳記載《舊唐書》卷106，第3252—3255頁；《新唐書》卷121，第4335—4336頁。

[[148]](#_148)《資治通鑒》卷213，第6792—6793頁；《舊唐書》卷106，第3253—3255頁，卷190下，第5037頁；《新唐書》卷121，第4336頁。

[[149]](#_149)關于授予高力士及其家族的榮譽，見《資治通鑒》卷213，第6793—6794頁。

[[150]](#_150)傳記載《舊唐書》卷98，第3079—3083頁；《新唐書》卷127，第4452—4454頁。

[[151]](#_151)《通典》卷10，第56—57頁；《冊府元龜》卷498，第16—17頁；《 舊唐書》卷49，第2114—2115頁；浦立本的《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183—184頁有英譯文。

[[152]](#_152)《唐會要》卷85，第1563—1564頁；《冊府元龜》卷495，第20一21頁。其他史料記載這一計劃為宇文融提出，實誤，見佩內洛普·赫伯特《八世紀初期中國的營田》，載《遠東史論文集》（堪培拉），11（1975年），第37—77頁。這一問題在本書第2章討論過。

[[153]](#_153)傳記載《舊唐書》卷98，第3077—3079頁；《新唐書》卷126，第4432—4439頁。

[[154]](#_154)《資治通鑒》卷123，第6803頁。

[[155]](#_155)《舊唐書》卷8，第200頁。

[[156]](#_156)關于這幾年復雜的宮廷政治，見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54—55頁；赫伯特：《張九齡》，第165—190頁。

[[157]](#_157)關于其運輸體系的改革，見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87—89頁；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34—35頁。裴耀卿的詳細的奏議，載《唐會要》卷87，第1587頁；《通典》卷10，第57頁；《冊府元龜》卷498，第17—18頁；《 舊唐書》卷98，第3080—3081頁。浦立本之作第185—187頁有英譯文。

[[158]](#_158)見赫伯特《八世紀初期中國的營田》，第71—75頁。

[[159]](#_159)《通典》卷9，第15頁；《冊府元龜》卷501，第4頁。

[[160]](#_160)《唐會要》卷89，第1625—1626頁；《冊府元龜》卷501，第4—5頁；《舊唐書》卷48，第3097—3099頁；《新唐書》卷54，第1385頁。關于這一政策及隨之產生的爭論，見佩內洛普·赫伯特《唐代關于國家壟斷鑄錢的爭論》，載《通報》，62.4—5（1977年），第253—292頁。

[[161]](#_161)《新唐書》卷54，第1385—1386頁。

[[162]](#_162)《通典》卷23，第136頁；《唐六典》卷3，第43頁；《唐會要》卷59，第1020頁；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100—101、332頁。

[[163]](#_163)《資治通鑒》卷213，第6803頁；《玉海》卷18，第26頁；《唐會要》卷78，第1420頁；《唐大詔令集》卷100，第510頁；《冊府元龜》卷162，第11頁；《舊唐書》，第200頁。見赫伯特《張九齡》，第278頁。

[[164]](#_164)《唐會要》卷78，第1420頁。

[[165]](#_165)《唐摭言》卷1，第6頁；《新唐書》卷44，第1164頁；戴何都：《〈新唐書〉選舉志譯注》，第171頁。

[[166]](#_166)《資治通鑒》卷214，第6814頁；《唐大詔令集》卷106，第549頁；《唐會要》卷59，第1024—1025頁；《冊府元龜》卷639，第246頁。

[[167]](#_167)《唐會要》卷188，第4933—4934頁；《資治通鑒》卷213，第6976—6977頁；卷214，第6811—6812頁。

[[168]](#_168)《資治通鑒》卷214，第6823—6824頁；《舊唐書》卷107，第3259頁；卷106，第3236頁。

[[169]](#_169)《全唐文》卷288，第1—2頁；《資治通鑒》卷214，第6821頁；見赫伯特《張九齡》，第175—177頁。

[[170]](#_170)《資治通鑒》卷214，第6811頁。

[[171]](#_171)同上書，第6814—6817頁；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116—118頁注68。

[[172]](#_172)《資治通鑒》卷214，第6822—6823頁。

[[173]](#_173)同上書，第6822頁。

[[174]](#_174)同上書，第6824—6825頁。

[[175]](#_175)《資治通鑒》卷214，第6828頁。

[[176]](#_176)傳記載《舊唐書》卷103，第3195—3197頁；《新唐書》卷133，第4555頁。

[[177]](#_177)《唐會要》卷78，第1437頁。

[[178]](#_178)關于這些和其他的反佛教措施，見《劍橋中國史》第4卷中S.溫斯坦所寫的一章。

[[179]](#_179)《新唐書》卷44，第1164頁。

[[180]](#_180)見《唐會要》卷36，第657—659頁。玄宗在722年第一次作注（《舊唐書》卷8，第183頁）并向全國頒布。735年，附注八卷編成（《冊府元龜》卷53，第16頁）；743年御注被重編。

[[181]](#_181)見《唐會要》卷77，第1403—1404頁；《唐摭言》卷6，第6頁；《舊唐書》卷9，第213頁；卷24，第925—928頁；《新唐書》卷44，第1164頁。

[[182]](#_182)見周一良《中國的密宗》，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8（1945年），第24—33頁；大部分傳統史學家把玄宗不積極過問朝政的行為全歸咎于道教，但柳芳是第一個指責釋道兩教的御用史學家。《舊唐書》卷9，第236—237頁。

[[183]](#_183)《舊唐書》卷107，第3259—3260頁。

[[184]](#_184)《資治通鑒》卷214，第6832—6934頁。

[[185]](#_185)《唐會要》卷39，第703—706頁；《舊唐書》卷50，第2150頁。

[[186]](#_186)見戴何都《描述唐代行政制度的唐六典》，載《亞洲雜志》，263（1975年），第183—201頁。

[[187]](#_187)《資治通鑒》卷214，第6829頁；卷215，第6837頁。

[[188]](#_188)戴何都：《〈新唐書〉百官志、兵志譯注》，第672—673頁。

[[189]](#_189)《資治鑒通》卷214，第6832頁。

[[190]](#_190)《資治通鑒》卷214，第6830頁。

[[191]](#_191)《唐會要》卷72，第1300頁。

[[192]](#_192)同上書，第1299頁。

[[193]](#_193)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69—70頁；戴何都：《〈新唐書〉百官志、兵志譯注》，前言第3—5頁；《資治通鑒》卷215，第6850頁；《唐六典》卷5。

[[194]](#_194)見池田溫《唐代的戶冊和有關文書》，載芮沃壽、崔瑞德編《對唐代的透視》（紐黑文，1973年），第121—150頁。

[[195]](#_195)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32頁。

[[196]](#_196)《冊府元龜》卷495，第23—26頁。

[[197]](#_197)傳記載《舊唐書》卷105，第3222—3225頁；《新唐書》卷134，第4560—4562頁。關于他的改革，見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90頁；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36—37頁。

[[198]](#_198)《舊唐書》卷48，第2086頁；卷10，第3225頁；《新唐書》卷134，第4563頁。

[[199]](#_199)《唐會要》卷59，第1022頁。

[[200]](#_200)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76頁。

[[201]](#_201)傳記載《舊唐書》卷99，第3101—3102頁；《新唐書》卷131，第4503—4504頁。

[[202]](#_202)裴敦復和皇甫惟明都無傳記。關于他們的簡單介紹，見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163—164頁注22和23。

[[203]](#_203)見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84頁。

[[204]](#_204)《資治通鑒》卷215，第6864、6868頁。

[[205]](#_205)傳記載《舊唐書》卷105，第3225—3228頁；《新唐書》卷134，第4562—4564頁。

[[206]](#_206)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88—90頁。

[[207]](#_207)傳記載《舊唐書》卷97，第3059—3060頁；《新唐書》卷223上，第6349—6350頁。

[[208]](#_208)同上書，第6873—6874頁。

[[209]](#_209)《資治通鑒》卷215，第6874—6875頁。

[[210]](#_210)傳記載《舊唐書》卷105，第3228—3232頁；《新唐書》卷134，第4564—4567頁。

[[211]](#_211)《資治通鑒》卷215，第6879頁。

[[212]](#_212)同上書，第6879—6882頁。

[[213]](#_213)傳記載《舊唐書》卷105，第3197—3201頁；《新唐書》卷133，第4551—4555頁。

[[214]](#_214)《資治通鑒》卷216，第6877—6883頁；《舊唐書》卷103，第3199—3200頁。

[[215]](#_215)《資治通鑒》卷216，第6888—6889頁。

[[216]](#_216)傳記載《舊唐書》卷200上，第5367—5372頁；《新唐書》卷225上，第6411—6421頁。關于他的出身和事業，見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7—23頁和第82頁以后；戴何都的《安祿山史》（巴黎，1962年）提供了《安祿山事跡》的詳盡加注的完整譯文；《安祿山事跡》為姚汝能所作的一部敘述安祿山事跡的9世紀初期的著作。

[[217]](#_217)關于楊貴妃及其家庭，見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92頁以下。霍華德·列維：《楊貴妃事跡》，載《通報》，45（1957年），第451—489頁；此文有《舊唐書》（卷51，第2178—2181頁）和《新唐書》（卷76，第3493—3496頁）中她傳記的譯文；又見列維《楊貴妃的家族背景》，載《漢學雜志》5.2（1957年），第101—118頁；《一個杰出皇帝的后宮寵妃》（臺中，1958年）；《長恨歌：楊貴妃之死》（東京研究社，1962年）；《楊貴妃之中選》，載《東方》，15（1962年），第411—412頁。

[[218]](#_218)傳記載《舊唐書》卷106，第3241—3267頁；《新唐書》卷206，第5846—5852頁；關于他的出身，見《資治通鑒》卷215，第6867—6868頁；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164—165頁，注47、48。

[[219]](#_219)《資治通鑒》卷216，第6896頁；《舊唐書》卷106，第6頁。

[[220]](#_220)《資治通鑒》卷215，第6910—6912頁；《舊唐書》卷105，第3230—3232頁。

[[221]](#_221)《資治通鑒》卷216，第6907—6908頁。

[[222]](#_222)同上書，第9608—9906頁；《舊唐書》卷200上，第5369頁；《安祿山事跡》（1910年本），上，第11頁；戴何都的《安祿山史》，第111—115頁；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96—98頁。

[[223]](#_223)關于南詔的崛起，見邁克爾·布萊克默《云南南詔的崛起》，載《東南亞史雜志》，1.2（1660年），第47—61頁；藤澤義美：《西南中國民族史研究》（東京，1969年）。

[[224]](#_224)《舊唐書》卷197，第5280—5281頁；《唐會要》卷99，第1763—1764頁；《資治通鑒》卷216，第6901—6902、6906—6907頁。

[[225]](#_225)《唐會要》卷78，第1437頁；《資治通鑒》卷216，第6909頁。

[[226]](#_226)《資治通鑒》卷216，第6910頁；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101、167頁，注87。

[[227]](#_227)《資治通鑒》卷216，第6912—6914頁；《舊唐書》卷106，第3239—3241、3243—3244頁。

[[228]](#_228)《資治通鑒》卷216，第6917—6918頁；《舊唐書》卷106，第3241頁。

[[229]](#_229)《資治通鑒》卷216，第6918頁；卷217，第6926—6927頁；《唐會要》卷99，第1734頁；《舊唐書》卷9，第228頁。

[[230]](#_230)傳記載《舊唐書》卷104，第3211—3215頁；《新唐書》卷135，第4569—4574頁。

[[231]](#_231)《資治通鑒》卷216，第6919頁。

[[232]](#_232)《資治通鑒》卷217，第6922—6923頁。

[[233]](#_233)同上書，第6923—6924頁。

[[234]](#_234)同上書，第6924頁。

[[235]](#_235)傳記載《舊唐書》卷97，第3057—3059頁；《新唐書》卷125，第4411—4412頁。

[[236]](#_236)關于翰林院的發展情況，見F.A.比紹夫《翰林》（巴黎，1963年），第6—9頁。

[[237]](#_237)《舊唐書》卷97，第3058頁；同上書，第6925頁。

[[238]](#_238)《資治通鑒》卷217，第6927—6928頁。

[[239]](#_239)傳記載《舊唐書》卷108，第3275—3278頁；《新唐書》卷118，第4267—4269頁。

[[240]](#_240)《資治通鑒》卷217，第6923頁和《考異》；《舊唐書》卷112，第3343頁。

[[241]](#_241)《資治通鑒》卷217，第6929頁。

[[242]](#_242)《新唐書》卷118，第4627頁；《資治通鑒》卷217，第6929頁。

[[243]](#_243)《資治通鑒》卷217，第6929—6934頁。

[[244]](#_244)同上書，第6932頁。

[[245]](#_245)《資治通鑒》卷217，第6932—6934頁。

[[246]](#_246)關于安祿山叛亂的情況，敘述最清楚的作品為浦立本的《安祿山之亂和唐后期長期存在的尚武主義的根源》（載于J.C.佩里、巴德韋爾·史密斯編《唐代社會論文集》〔萊登，1976年〕，第33—60頁）。關于安祿山的基本史料，戴何都的《安祿山史》和霍華德·列維的《安祿山傳》有譯文，后者把《舊唐書》卷200上的傳記譯成英文。以下敘述基本上取材于《資治通鑒》卷217—218。

[[247]](#_247)《唐會要》卷63，第1095頁（于休烈奏議）。

[[248]](#_248)關于玄宗時期史料的詳細情況，見浦立本《資治通鑒考異和730—763年的史料》，載《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學報》，13.2（1950年），第448—473頁；崔瑞德：《柳芳：一位被遺忘的唐代史學家》。浦立本認為韋述的國史稿終于玄宗即位之初，雖然他引證的一些材料說明韋述也寫了較后面的時期。作為一名史官，韋述幾乎肯定參加了《開元實錄》的編纂。

# 第八章 中唐、晚唐的宮廷和地方

8世紀中葉以后中國出現的強有力的地方分權體制是755—763年安祿山之亂的直接后果。在唐朝成立以后，這場叛亂無疑是唐王朝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叛亂把一個集權、富饒、穩定和遼闊的帝國搞成斗爭不休、不安全和分裂的國家。歷史學家早就認為它是唐朝史的一個轉折點；在近幾十年中，它甚至被認為是整個中國史中的一個大轉折點。不過在叛亂本身及其后果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相稱。雖然這種大內亂必定產生嚴重和深遠的后果，但是難道一件基本上是軍事的事件會造成把唐王朝截然分成前后兩個時期的深刻變化嗎？

實際上，安祿山之亂后中國的變化的局勢不僅僅是叛亂所造成，而是有它早已在進行的發展根源。正如本書前幾章所指出的那樣，自唐朝開國以來，它的政制已經經歷了重要的變動。這些變化在與初唐政體性質迥然不同的政體形式出現以前就已存在。但是必須把長期的變化與叛亂本身的特定根源區別開來。雖然當叛亂發生時，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和充當了強烈的催化劑，但這一事件絕不是不可避免的。

說到那些區別初唐和中唐的變化，我們須要在這里回顧一下與755年出現的危機及由此造成的政治分裂狀態有關的變化。最重要的是8世紀第一個25年為鞏固中國對外的地位所采取的步驟。在遭受7世紀最后幾十年和8世紀初的重大挫折后，為維護一個從南滿至帕米爾、從內蒙到越南的已經擴大的帝國新政制結構發展起來了。這些變化把唐帝國置于一個與半個世紀前太宗遺留下來的機制迥然不同的基礎之上，它成了一個通過歷次大征戰（一般是勝利的征戰）創建的，以及靠王朝無與倫比的威信、外交和僅僅是不牢固的外圍防御維系的帝國。這些變化是日益增長的外來軍事壓力——主要來自復興的東突厥人、契丹人和吐蕃人——直接造成的。唐政體在與這些強大和組織良好的鄰邦的經常沖突中，被迫逐步建立永久性的大規模防御體系。但這一體系經過一段時期后獲得了充分的進攻能力，這一事實有助于掩蓋它開始時的防御性質。

這一發展的根據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民族利益（區別于帝國及其將領們的個人雄心），對此已有人提出疑問。[[1]](#_1_Guan_Yu_Wan_Tang_Ji_Song_De_D)但是批判者往往忽視了基本的戰略考慮，即迫使中國人把軍事力量擴大到遠遠超過他們可能定居的范圍以外的考慮。只有這樣，高度機動的游牧鄰族才能被遏制，而不至于迅速和破壞性地滲入內地。另一個動機可能是維護對外貿易的交通，雖然由此產生的貿易遠遠不足以彌補這類政策造成的巨大費用。總之，重要的是，在邊境維持龐大兵力的這一政策當時并沒有人認真提出疑問。[[2]](#_2_Wei_Yi_De_Li_Wai_Shi_Zhang_Sh)對當時的人來說，這一政策似乎一直是必要的，理由是它取得了全面的成功，而且唐帝國有能力負擔它的費用而不至于造成資源的不應有的緊張。

這一政策的采用意味著再也不可能依靠從前以混合兵源的部隊（府兵、職業軍人和罪犯）充當小股守軍的制度了。可以設想，在進入7世紀之際其戰斗力已受限制的府兵制絕不可能維持大規模的長期邊防戍軍。一種新型的軍隊必須建立起來，以提供當時需要的更龐大更長期性的部隊。在8世紀的最初幾十年，邊境常備軍的規模明顯擴大，最后至少達到5倍于前一世紀的水平。在8世紀40年代軍隊人數將近50萬，[[3]](#_3___Jiu_Tang_Shu____Juan_38_Di)這一數字與廣袤的作戰區對比肯定不算巨大，但它確實代表了到當時為止正規地部署在中國邊境的軍隊的最大數字。軍隊的成分必然發生了大變化。如此龐大的軍隊只能由長期服役的軍隊組成。這意味著軍隊的充分職業化，這個過程遠遠早于政府在737年宣布長期服役為定制之時。

邊境行政管理制的基本變化也伴隨著軍事方面的變化而產生。變化前的習慣做法是臨時任命將領來指揮大戰役和邊境行動。正常的邊境行政工作由其權力被精心地限制的官署掌管。現在新常備軍需要一種新的指揮機構，它能使這些軍隊在特定的邊境廣泛地區相對獨立地行動。每個邊境區（藩或藩鎮）歸一個接替行軍大總官、都護和都督的節度使管轄，但他一般保留著這些頭銜。[[4]](#_4_Pu_Li_Ben____An_Lu_Shan_Zhi_L)除了軍事職務外，新的節度使還擁有地方行政、財政和供應等方面的文職權力。這種把權力集中于一人的變化完全背離了以前的慣例。但是做不到這些，邊防軍就不可能得到適當的戰地指揮和后勤支援，而這些軍隊又往往必須在遠離中國內地之處作戰。在這些情況下，中央政府顯然必須極為慎重地選拔官員去擔任這些擁有大權的職務，并且要在他們中間定期輪換，以防個人與某一藩鎮的關系發展得過分牢固。

后來擔任節度使的官員的類型起了變化，這使中央政府對這些問題甚至更加敏感了。在一開始，在高級文武官員之間并無涇渭分明的界限，被任命為節度使的人一般為文官，他們在邊境藩鎮任職期滿后，能夠指望返回朝廷。他們完全擁護朝廷既成的權力結構，而且他們就是正規的等級官僚集團的成員。但約從730年起這些擁戴朝廷的官員逐漸讓位于另一種往往有廣泛的邊境生活經驗的職業軍官。許多人是行伍出身，他們所取得的擢升在以前是不可能得到的。許多人還是非漢人；鑒于唐朝一貫在邊防軍中使用大批部落民，這種現象是不足為奇的。人事上的這種變化有其實際的原因，即希望通過使用職業的軍事專才來取得最佳效果。[[5]](#_5_Dan_Pu_Li_Ben____An_Lu_Shan_Z)

但新制度的成就中孕育著一種抵消其力量的因素；大權日益落入邊境將領之手所包含的危險卻被人忘記了。

以節度使統率的形式出現的軍事力量的分布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后果。第一，伴隨著府兵制的衰落而出現的藩鎮制在抵御外患方面的成就導致了一切有戰斗力的軍事力量在內地的消失。京師保持有一支軍隊，但其素質變得如此之差，以致成了人們的笑柄。第二，中國的絕大部分兵力此時部署在沿漫長和容易滲透的北方邊境延伸的五個藩鎮。按其大小，這五個藩鎮依次是：范陽（北河北）、隴右（南甘肅）、河西（甘肅—寧夏北部）、朔方（甘肅—陜西東部）和河東（北山西）（見地圖10）。它們基本上是邊境藩鎮，但范陽和河東主要由地方供養，比其他幾個北方藩鎮較少地需要中央政府的直接支持，不過河東自給的程度比范陽稍差。另一個藩鎮劍南（四川）也是如此，但在安祿山之亂前它擁有的兵力相對地說還不算龐大。[[6]](#_6_Can_Jian_Ci_Chu_De_Can_Kao_Ca)

正如邊境的新形勢造成邊境行政制度的變化那樣，國內的各種發展——人口的增長、遷移和流亡的日趨頻繁、稅冊之過時、行政手續的日益復雜、非經常性的不法行為（再加上官僚們怠于職守的長期存在的傾向）也促使內地行政的變動。部分的解決辦法是像邊境那樣設立一種較高級的行政單位，以管轄一個包括許多州的地區。由于朝廷不愿把實權正規地交給任何這類大行政單位，所以這種官署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從一開始它的職能就被設想為應是監督性的，而不是具有執行性質的。最后在733年，帝國被劃分成15個道，各置采訪處置使。[[7]](#_7_Dai_He_Du____Zhong_Guo_Tang_D)這只是搭起了道的制度的架子，不過在以后安祿山叛亂的年代，采訪處置使才逐漸對其管轄的州縣越來越主動地行使權力。

在8世紀前半期政府所作的制度改革似乎進行得很順利。它們使帝國能夠取得最大的疆域和國力，使國內達到高度的穩定，并且能夠保持一個可以接受的中央集權。玄宗朝被人懷念為唐代最光輝的時期，這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當時的政治家卻沒有看到中央對地方事務的強有力的控制（而這種控制正是整個地方行政結構及土地分配、稅制、勞動力動員和征兵等工作的基礎）在逐漸放松；更不可恕的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仍沒有意識到他們在邊境建立的龐大的軍事建制所包含的種種危險。

## 東北邊境

東北邊境的強大邊境藩鎮的成長，與中國對外的和軍事的總政策是完全一致的。自7世紀末契丹和奚對河北大舉入侵以來，它們持續的壓力需要唐朝在這里保持強大的兵力。大約到742年，范陽及其附屬的平盧藩鎮有兵力13萬，它們形成了堅強的防御堡壘，而且還有不容忽視的打擊力量。但這并沒有導致任何大的領土擴張。雖然中國人終于在東北重建了遠至遼河的控制，但這遠沒有完成7世紀隋煬帝、唐太宗和唐高宗的目標。[[8]](#_8_Jian_Ri_Ye_Kai_San_Lang_Zai_Y)范陽的領導權如同其他邊境藩鎮那樣，日益落到職業軍人手中。以前這些人在那里很少能指望升遷到低級和中級官員以上，但現在他們之中能力最強的人發現能夠升任最高的官職。

在這一背景中，我們必須先考察一下安祿山的事跡。[[9]](#_9_Guan_Yu_An_Lu_Shan_De_Shi_Ji)安祿山為粟特族和突厥族的混血兒，從青年起就在中國軍隊中服役，他的擢升無疑歸功于軍功。在他四十來歲時，他已取得一個職業軍官的最高和最有權勢的地位：在742年成為平盧節度使；在744年又任鄰近的范陽鎮節度使。他身兼兩職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兩鎮需要最緊密的協調。但容許他在這兩個職位上留任達12年以上則是很不正常的（節度使的正常任期為三年），何況同時他又有兼職（750年兼河北采訪使，751年兼河東節度使），從而使他成為東北不容挑戰的長官。讓一個人能集如此大權于一身，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朝廷在授權這一基本任務方面顯然已經變得草率從事了，所以安祿山才能取得為自己招兵買馬的良機——如果他愿意，他還能選擇違抗朝廷這條道路。

安祿山之所以如此受寵，部分原因在于他自己的性格和過去的經歷。雖然絕大部分史料——主要在叛亂進行時期寫成——把他描繪成肥胖的小丑，但他仍是一個在漫長的鎮守期間保持東北邊境安全的有成就的軍事將領。另外，他還兢兢業業地建立與朝廷各方面的關系，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事實上，權勢炙手可熱的宰相李林甫在752年死亡前，玄宗在臨近悲慘的結局時，仍然對他恩寵有加。鑒于他集權力和榮譽于一身，很可能從8世紀40年代中期起，他被認為是一個不可缺少的人物。從朝廷總的發展形勢看，這些都不是偶然的：安祿山的崛起及其地位的鞏固與玄宗不再積極領導國務和強大的節度使日益參與朝政的情況是一致的。

在玄宗朝的最后20年中，玄宗究竟提供了多少積極的指導，這是很難回答的。他越來越依靠強有力的人物：在朝廷，李林甫在734—752年這段非常長的任期內是宰相和實際的獨裁者，以后接任的楊國忠幾乎同樣獨裁；在邊境，東北的安祿山和西北的哥舒翰在很長的時期內都同時掌握幾個藩鎮。另外，從8世紀40和50年代朝廷的政治爭吵和角逐中，人們也明顯地可以看出玄宗對日常的政務越來越不加過問了。

在這些情況下，比帝國其他官員能更直接行使地方和軍事權力的節度使都不免卷進操縱政治的角逐之中。但這帶來了邊境將領——或至少那些有足夠的野心和機智在政治領域中縱橫捭闔的邊境將領——干預政治的危險。李林甫之死是一個轉折點，因為只有他擁有在帝國其他實權人物中間保持平衡所必需的毋庸置疑的權力和威望。他死后，在導致叛亂的最后幾年中出現了安祿山和楊國忠之間你死我活的激烈斗爭，這一斗爭只有玄宗的有力行動才能解決，但他的消極態度反而助長了斗爭的發展。在這種形勢下，撤換安祿山的各種企圖不能簡單地再被看成是替換一個任期早已屆滿的將領或讓他退隱的事情。楊國忠本人很可能主張加強中央控制邊境將領的總政策，但安祿山認為，如果替換他的企圖得逞，這只會使楊國忠取得更大的權力。

但是，盡管歷史學家對宮廷政治斗爭表現出強烈的興趣，卻不能為叛亂的起源提供圓滿的或令人滿意的解釋。古往今來許多評述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安祿山及其許多追隨者的非漢族出身方面，他們堅持這些人生來（或被養成）桀驁不馴和貪婪成性。這些人所受的中國文化的影響甚為膚淺，所以不甘心接受傳統約束而一心渴望征服和掠奪。因此，安祿山之亂被視為“在國內進行的外患”。[[10]](#_10_Zhe_Yi_Guan_Dian_Gou_Cheng_D)雖然這一觀點并非全無根據，但它也不能提供有說服力的解釋。它假設在作為中國兵員來源的不同民族中存在一個共性，而沒有看到在它們中間存在的語言和文化上的重大差別。其次，它假設所有“胡人”接受中國文明的程度都很低，而實際上隨著接觸時間的長短和接觸質量的高低，同化的程度也大不相同。邊境城鎮的長期居民——可能已與漢人婚配，或是第二代或第三代漢化“胡人”——不可能作出與來自草原的新遷入者相同的反應。再次，它忽略了一個簡單的事實，即安祿山麾下包括許多漢人，而另一方面，回紇人和其他“夷狄”后來證明也屬于唐王朝最堅定的捍衛者。

近年的兩大論點試圖參照一些地區的特征來解釋叛亂。已故的陳寅恪發展了夷狄論的另一深思熟慮的變種論點：8世紀初期異族的遷入河北導致了最后使東北社會“胡化”的過程。這一過程到8世紀40年代已發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充分了解這一形勢的唐朝廷只有樹立一個“羯胡”（安祿山）作為保持控制河北和東北的唯一辦法。因此，陳寅恪所看到的夷狄因素不僅涉及安祿山及其所屬的兵將，而且還涉及整個這一地區的人口。[[11]](#_11_Jian_Chen_Yin_Ke___Tang_Dai)除了這類文化解說的高度主觀性連同它的模糊和帶激情色彩的“胡化”觀念外，陳寅恪這一引人注意的假設沒有足夠的證據作為依據。他的叛亂前的證據所指的不是整個河北，而只是具體地指邊境地區；他用的叛亂后的材料——這是他論證的大部分依據——則錯誤地把一些具體的后果歸因于主觀設想的文化變化，而不是歸因于這一區域取得的事實上的政治自治。

谷霽光提出的另一個主要的解釋迥然不同，他的論點稍經修改又被浦立本采納。兩個人都從河北（在東北）對唐朝廷（在西北）的長期異化這一角度來解釋叛亂，這一異化過程主要是朝廷對該區的歧視政策造成的。根據這一理論，安祿山是作為這一地區的感情和利益的代表出現的。[[12]](#_12_Gu_Ji_Guang____An_Shi_Luan_Q)但關于朝廷和河北道之間長久分裂的證據不夠充分，而且幾乎都來自7世紀的材料。此外，成為這一論點前提的河北地區支持叛亂的廣泛基礎始終不明顯——不論在叛亂前、叛亂時和叛亂后都是如此。

我的觀點是叛亂產生于基本上是政治性質的若干牽涉面較小的環境，它們與中國文化的敵人的大規模滲透或長期的地方分離主義無本質的聯系。這場叛亂其實并不是產生于任何大的社會危機。在叛亂開始時，河北道除了提供基地外并未卷入。引起這場叛亂的原因要在邊境形勢中而不是在河北道內尋找。雖然邊境藩鎮的建立和以后的發展使得它可能對唐統治皇室進行挑戰，但關鍵的一個發展是指揮機構逐漸被那些很難被認為是唐統治階級的成員的人所控制。這些人為職業軍人，地方觀念強，社會出身往往很低，所以形成了一個與正規官僚集團顯著不同的集團。[[13]](#_13_Tang_Dai_Guan_Fang_Li_Shi_Zh)朝廷和它的邊將之間的社會和文化差距不一定產生敵對，也不會使叛亂成為不可避免的事。但它能使一個強有力的將領純從自己的私利出發去尋求其袍澤的支持，并對他們認為很少有共同點的朝廷宣戰。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場叛亂最好用到玄宗朝快結束時已經形成的政治軍事結構的變動來解釋。

安祿山極不可能像我們掌握的大部分史料所聲稱的那樣早就有謀反的計劃。事實上，他潛在的敵對行動似乎只是到李林甫死后他看到楊國忠對他的地位構成威脅時才開始的。不過在他鎮守邊境的漫長時期，他顯然已乘機擴大和鞏固了他個人的權力及他指揮的軍事力量。他通過合法的和非法的方式擴大其軍隊的規模，并建立了一支絕對忠誠于他的8000假子的精兵——這是五代私人軍隊的前身。據說他還從邊境外征募許多新兵（這些人不可能有強烈的忠君思想）和采取提拔和濫賞的慷慨政策，這些都是為了加強他與部下的關系。他憑借自己受玄宗寵愛的有利條件，甚至直接控制了西北主要牧馬中心之一，這就保證他能得到騎兵馬匹的充分供應。最后，通過他在東北的漫長的任期和兼任的河北道采訪使之職，他能影響東北文武官員的任命。[[14]](#_14_Can_Jian_Ci_Chu_Suo_Lie_De_C)這樣，到他與朝廷決裂時，他擁有一個強大富饒的地區基地，并已建立了一支龐大和訓練有素的、其核心由效忠于他個人的追隨者組成的軍隊，它與其說是屬于皇帝的，遠不如說是屬于安祿山的。可以毫不過分地說，到755年，安祿山控制的藩鎮已經出現了他叛亂后自治和半自治地方政體的主要特征，雖然這些特征尚有待于向帝國的內地滲透。

當安祿山相信他已失去玄宗的支持，失寵又一定會發生和迫在眉睫時，他才最后與朝廷決裂；他又堅信自己擁有足夠的力量去推翻王朝。對于他的希望來說，關鍵是要進行迅速和決定性的打擊；因此他的戰略核心是立刻占領政治中心地區。這樣就會使統治皇室威信掃地，也許還能使它垮臺，從而使安祿山成為最可能的繼承者。安祿山的信心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統率的部隊在開始叛亂時約為20萬人，其中15萬人被動員去參加重大戰役。由于留守平盧鎮的約2萬名士兵倒戈和河東道的一些部隊沒有參加叛亂，他的總兵力立刻減少了。安祿山對自己在河北的控制和對他的進攻力量估計過高，這一戰略歸于失敗，隨之而來的是在帝國的心臟地帶自始至終激烈地進行的消耗戰。

勤王軍的人數遠為眾多，但這一優勢毫無用處，原因有二。第一，如前所述，幾乎全部帝國的兵力都分布在邊境沿線，這樣內地已沒有多少訓練有素的部隊能抵擋安祿山的進攻。所以安祿山的軍隊在遭到堅決抵抗之前經河北過洛陽而所向披靡。此外，最精銳的政府軍被牽制在偏遠的邊境，要花相當長的寶貴時間才能被調回，而這樣做又顯然會削弱或被迫放棄邊境的陣地。第二，在叛亂的第一階段，勤王軍的戰略需要不加選擇地使用兵力。他們再三在廣闊的前線進行正面進攻以期制服叛軍，但最后都不但以失敗告終，而且因大量損兵折將而嚴重地妨礙了以后的行動。結果，隴右、河西和朔方三大西北藩鎮的久經沙場的部隊都大為損耗，只有朔方軍作為一支完整的部隊還能繼續作戰。

### 安祿山之亂的經過

叛亂持續了7年以上，從755年12月至763年1月。從純粹的軍事角度看，它可以分為五個明顯的階段，每個階段都被幾場決定性的或有潛在決定性的戰斗所決定。它們是：

（一）755年12月至758年6月叛軍最初的勝利階段，它以叛軍在潼關的進攻受阻和勤王軍在叛軍后方河北的起事告終。

（二）756年7月至757年11月叛軍占優勢及其軍事力量和地域控制處于鼎盛的階段。

（三）757年11月至759年4月政府收復京都和接近平息叛亂的階段。

（四）759年4月至762年10月叛軍重新崛起和隨之而來的長期僵持階段。

（五）762年10月至763年1月政府最后進攻和取得勝利的階段。

這是一場長期和激烈的沖突，其結果幾乎到最后仍不能肯定。但沖突中間存在軍事上相對停頓的漫長時期，例如從757年秋至758年秋政府收復兩京以后，事實上760年全年和最后戰役前的18個月這幾個時期都是這樣。因此嚴格地說，叛亂期不應被認為是連續不斷戰斗的7年，而應該是帝國一直處于全面戰時體制的漫長的時期。

雖然戰斗的間歇有種種原因（指揮的變化、進一步征募兵員的需要、甚至天氣），但主要的原因無疑是后勤的問題。每一次陣地的大變動都需要對供應線作新的部署，而這正值帝國財政結構完全崩潰之時。在這一方面，叛軍的日子可能比中央政府好過些，盡管他們控制的地區較小。河北是堅固和可守之地，靠近主要的沖突地區。相比之下，政府發現自己被奪去了主要的收入來源：河北當然已經喪失；河南的部分地區被叛軍占領，而且已被戰爭破壞；與長江諸道的聯系由于叛軍破壞了汴渠的幾條交通線而基本上被切斷。此外，玄宗時期積累的大量剩余糧食和物品在叛軍占領兩京時大部分已被毀掉。在這些情況下，政府被迫從三個來源取得有限度的正常歲入：關中本地的生產（但只在758年以后才有挹注）；從南方跨秦嶺經漢水運來的少量資源；一切能從四川通過陸路運來的物資。在其他方面，政府只能采取短期的權宜措施：賣官鬻爵和出售委任狀，操縱通貨，開征商業稅和生產稅。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在非常拮據的情況下與叛亂作斗爭，這有助于解釋它作戰的時斷時續的緩慢的節奏。

領導問題也影響沖突的進行。下文將談到，政府有時因為不能對自己的戰地軍隊和它在地方掌權的代表進行控制而嚴重地受到損害，但至少從756年秋季起，它在中央仍保持領導權的延續性和穩定性。叛亂政體則并非如此。有四人相繼任叛軍的領袖，但每人（不包括安祿山本人）都殺害了他的前任才取得指揮權。每人都僭號稱王，力圖使他的權力合法化。安祿山未能利用其最初優勢的事實和流傳至今的對他的各種描述，都說明在755年他的鼎盛期早已過去。他在757年初期遇刺，其子安慶緒接替他，控制叛軍直至759年春。史料把安慶緒說成是一個平庸之輩，但他的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洛陽政權不能從河北叛軍地區得到足夠的支持，這些地區那時在他后來的繼承者史思明的控制之下。史思明任叛軍領袖后證明是一位杰出的將領，如果不是他的兒子史朝義在761年春通過與人合謀將他殺害，他很可能推翻唐朝。雖然史朝義堅持與龐大的勤王軍對抗直到762年的相當長一段時期，但結果他在年末在帝國軍隊最后的進攻下被消滅。且不說這四人的個人性格如何，領導權的不斷地和激烈地變化顯然使叛軍難以保持任何鞏固的團結和凝聚意識。

安祿山最初的戰役取得重大勝利。在一個月內，他已占領了河北、河東的幾個部分以及包括東都洛陽和黃河中段航道的河南北部。這時，河北勤王軍的聯合抗擊和在潼關匆忙集結的帝國軍隊阻止了他的迅速推進，使他不能直驅西京長安。盡管遭到這些挫折，他仍在756年的陰歷新年初一在洛陽稱帝，國號為“大燕”。朝廷那時正在為動員抗擊，為從北方和西北邊境召回部隊，為征募新的人力資源和授予地方官員額外的兵權而作出瘋狂的努力。

事實證明，這些應急措施中有一項具有特別深遠的影響。朝廷在企圖為其匆忙集結的部隊提供指揮機構時，求助于以前為用于邊境而發展起來的節度使制的模式。第一個內地節度使是在叛亂爆發后不久時為河南道任命的。[[15]](#_15___Jiu_Tang_Shu____Juan_9_Di)由于節度使結構早就適用于戰斗中的主動靈活的指揮而不同于歸朝廷節制的臃腫的軍事組織，它在其他地區推行的理由就不難想像了。但是，節度使制從一開始就有意使之在高度獨立的情況下發揮作用，而且基本上體現了一種軍事分權體制。在一些重要方面，它是與嚴密的中央控制的原則不相容的。雖然在一開始，它在帝國內地的擴大使用單純是一種軍事上的權宜之計，但這一制度被準許長期有效，并為地方在以后的兩個世紀提供了全面的行政和軍事的基礎。

河北勤王軍的行動是對叛亂者的一大打擊。這些起事從755年末到756年后期幾乎持續了一年，它們使安祿山停止西進，并且本來完全可以在早期把叛亂鎮壓下去。安祿山通過河北已迅速推進，很少系統地采取牢牢控制該道的措施。他顯然相信，他留在幽州（今北京）和留在平盧鎮境內的滿洲邊境的守軍能控制這一區域；此外，他有充分理由對及早取得勝利抱有信心。但是在他通過河北后一個月稍過，河北勤王運動風起云涌并且迅速從東面的德州（在今河南的德州[原文如此——譯者]）和西面的鎮州（正定）向外蔓延。有的地方，起事由一些安祿山認為不必予以替換的刺史領導，而另一些地方，領導起事的則是把安任命的刺史殺掉或趕走的較低級的官員和地方領袖。河北多一半的州起來反對叛亂者；雖然它們之間很少協調行動（它們各自的兵力也很弱），但它們的確保持了密切聯系，這樣就有助于發展運動。勤王者的目標不僅是不讓叛亂者控制他們本人的州縣，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切斷安祿山在洛陽的主力軍和幽州叛亂基地之間的聯系。他們當然知道，如果沒有中央政府軍的援助，不論時間長短，他們抵御叛軍的可能性實際上是不存在的。[[16]](#_16_Guan_Yu_Qin_Wang_Qi_Shi_De_Z)

勤王運動的運勢變化很大。756年初期，隨著叛亂者第一次軟弱無力的鎮壓活動的失敗，大量正規軍從安祿山在河南和北方的軍隊中抽調出來，迅速重新占領許多地方。但是李光弼和郭子儀率領的正規政府軍從河東（今山西）經太行山幾個關隘抵達河北，從而又激起了新的起事浪潮。接著在這一年的初春，平盧的一些部隊出人意料地倒向政府，叛軍的地位又趨惡化。[[17]](#_17_Ri_Ye_Kai_San_Lang_Zhi_Wen)這就迫使河北的叛軍后備軍駐守幽州。勤王軍在擊退叛軍的同時，于756年中期已經控制了橫跨河北直至沿海的地帶，完全收復這一區域的可能似乎出現。但是朝廷的大部分人卻不能敏銳地看到更大的戰略可能性，反而全神貫注于通往京師的各要道的形勢，因為政府軍正在潼關與叛軍主力相持不下。最強大的政府軍在那里不與叛軍交鋒。政治考慮支配著這些朝廷大臣的觀點。他們擔心，如果政府經過連續幾個月的努力而顯然不能徹底粉碎叛亂，就會大大地動搖人民的信心。還存在朝廷官員和潼關統軍將領之間的嚴重戰略分歧，從中人們同樣可以看出在文官和武將之間、朝廷和邊將之間的那些首先導致叛亂的對立和不同利益。

結果，以楊國忠——他對安祿山的敵意無疑促使叛亂爆發——為首代表朝廷文官利益的一方占了上風。756年陰歷六月，朝廷下令，命軍隊全面出擊，這在政治上是權宜之計，但在軍事上是草率從事的莽撞行動。[[18]](#_18_Dai_He_Du____An_Lu_Shan_Shi)結果政府一方大敗：參加進攻的18萬官軍大部分遭到伏擊，被分割和消滅。政府因缺乏完整的后備軍，不能在叛軍和京師之間的地帶再進行防御。幾天后，玄宗及其朝廷出逃，長安被叛亂者占領。玄宗前往四川避難，在一個經常加以戲劇化的插曲中，楊國忠與他的堂妹楊貴妃在途中被不滿的部隊所殺。同時，皇太子，即未來的肅宗，撤往西北的靈武，以期在那里集結支援力量。

在許多人看來，老皇帝此時已威信掃地，所以皇太子在下一個月的僭位掌權普遍被人接受。在肅宗流亡朝廷召集的部隊中，有在河北作戰的部隊；征召的行動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促使河北勤王軍抵抗的崩潰。勤王運動的活動中心一一喪失，這樣就實際上結束了唐朝在那里的權力。東北邊緣平盧的勤王守軍被孤立，最后在762年，他們通過海路撤至山東。潼關的一場災難性的戰斗必須被視為一個重要轉折點，因為它使叛亂者時來運轉，使王朝幾乎崩潰，并使戰爭無限期地延長下去。

但是從長期看，關鍵的因素證明是全國大部分地區繼續留戀唐統治皇室。這種忠誠在下一年中受到嚴重的考驗，當時肅宗的朝廷遭受一系列嚴重的失敗，只有一些小的勝利稍稍有所彌補。一切努力都集中于收復長安這一唯一的目標。756年秋，然后又在757年春，勤王軍對占領長安的叛軍發動進攻，但都被擊退，損失慘重。在南方，叛軍穿過秦嶺，直趨漢水邊的襄陽，雖然他們朝東南向淮河的推進在宋州（今商丘）被持續到757年秋的英勇的抵抗所阻。[[19]](#_19_Guan_Yu_Chang_Qi_Wei_Gong_So)

再往南，動亂也出現了。在潼關敗后面臨政權可能垮臺的情況下，玄宗已把帝國的幾大地區交由諸王子控制，極力企圖依靠皇族的忠誠來維系王朝。他的一個兒子李璘例外地已至長江中游鎮守，在757年初期舉兵叛亂。也許李璘預期自己會成功地領導唐朝中興，所以溯江而下奪取富饒的長江下游地區；但他被迅速打敗和殺死。同時在邊境，外鄰開始利用中國的內亂來侵吞當時仍由唐朝控制的地方。主要的受益者為吐蕃和南詔。前者侵入隴右（甘肅），限制了唐朝與中亞的交往；后者在四川進行蠶食。但是甚至在極南方（包括安南），非漢族部落也起來叛亂，迫使中國當局撤離。

雖然朝廷虛弱無能，但暫時占有軍事優勢并控制河北、黃河，遠至長安的大部分渭水流域和大部分河南（中國最最富饒和人口眾多的區域）的叛亂者卻沒有另立取代唐朝的穩定的政體。雖然由于材料很少，人們不可能推測他們的政策，但顯然他們取得的支持很少，并一直被視為是些粗魯的邊境軍人而已，除了進行軍事征服外，根本無權統治。也許安祿山在一開始未能取得全面勝利的事實足以使他的希望趨于破滅；斗爭一旦拖延下去，王朝就能夠利用剩余的巨大力量和支持，其中大部分是無形的。這件事本身就證明了唐朝至755年的統治的成功。但叛亂者的眼光短淺的政治頭腦一定也起了作用。另一個因素是叛亂者領導內部的離心離德，隨著安祿山在757年初的遇刺，分裂達到了最嚴重的程度。[[20]](#_20_Jian_Dai_He_Du___An_Lu_Shan)其子安慶緒繼承指揮可能恢復了洛陽大本營的和諧，但此事卻疏遠了在河北繼續帶兵的安祿山一代的將領，其中最著名的是史思明。事實證明，當時河北和洛陽兩派已經公開化了的爭吵幾乎是致命的。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叛亂者在洛陽建都后，始終只對長安表示一種消極的興趣，即不讓唐朝得到它而已。除了他們的東北淵源外，他們是否也認識到渭水流域越來越不適宜充當政治中心？

隨著757年秋政府軍發動的進攻取得勝利，事態似乎發生了決定性的轉變。轉變始于英勇善戰的回紇雇傭軍率先大舉進攻以后在陰歷九月收復長安，這是他們在叛亂期間兩次決定性貢獻中的第一次。經過了一系列的勝利，進攻在陰歷十月收復洛陽時結束。叛軍不得不放棄鄰近地區（其中包括他們最近已經占上風的河南南部和東部），退到黃河以北。叛軍大本營被迫撤回河北西南的相州（安陽）。政府肯定作了有成效的軍事努力，但它的成功主要是由于河北的叛軍不能為其西面的軍隊提供足夠的支持。這些失敗以及兩京的喪失在當時公開地把叛亂者分裂成兩個對立的陣營：相州的安慶緒和幽州的史思明。到758年初期，叛亂者的前途顯得如此渺茫，以致史思明本人宣布向皇帝投誠。朝廷由于不能最后消滅他，不得不滿足于他名義上的投降，所以就封他為原官。

在收復洛陽后不久，朝廷實際上停止了主動的軍事行動。它的資源暫時耗盡，朝廷的政治家們認識到，叛亂者此時雖被牽制在河北，但仍十分強大，不能一舉消滅。總之，政治家普遍的期望是：最壞的逆境已經結束，唐皇室已被保存下來，現在可以進行必要的重建工作了。758年頒布的大赦令寬恕了除少數有名首領以外的所有叛軍。[[21]](#_21_Guan_Yu_Zhe_Yi_Zheng_Ce_De_J)這是有意識地愈合國內分裂的企圖，但它也為促使叛軍內部倒戈以削弱敵人力量的戰術目的服務。

在758年的大部分時期內，政府表現的有限的軍事主動性令人費解（除了它自身繼續虛弱這一理由外）。秋季發動的新進攻把叛亂者趕出黃河，但安慶緒率領的叛軍主力部隊成功地撤至壁壘森嚴的相州大本營以確保自身安全。政府軍采用一種極為謹慎的戰略，不在乎取得對河北其他地區的控制，而只把該城圍困起來。圍城持續了整個冬季；到759年春，圍城者和困守者同樣筋疲力盡。同時，朝廷對北方的叛將史思明的不適當的處理（可能是史思明軍事上的老對頭李光弼的過錯）又促使他背離朝廷。他再次叛亂，率軍南下。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他襲擾圍困相州安慶緒的政府軍，最后在陰歷三月與他們進行對陣戰。雖然據說他與政府軍的力量對比不到1∶10，但他的軍隊仍把所謂“九節度使”的勤王軍徹底擊潰，迫使他們一路撤至洛陽。史思明于是進而消滅安慶緒及其支持者，為自己取得了叛亂的大燕朝的皇位。[[22]](#_22_Dai_He_Du____An_Lu_Shan_Shi)在當時，驚慌失措的朝臣把占壓倒優勢的政府軍的慘敗歸咎于缺乏一個受權的最高統帥以指揮和協調幾支軍隊的將領的行動，雖然這不能完全解釋這次戰敗，但是在以后的幾十年內，因各個節度使在聯合作戰中各自為戰而引起災難性后果之事，則是不乏其例的。

這樣，剛在一年多以前似乎幾乎完蛋的叛亂又進入了另一個階段，它的結束變得遙遙無期。759年秋洛陽和汴州陷落，政府命運進一步惡化。從此以后，時而一方主動出擊，時而另一方主動進攻，但雙方都未取得任何明顯的勝利。長時期的對峙一直持續到761年初期。也許就在這一叛亂階段，出現了對現存政治和社會秩序最有害的后果。雖然朝廷幸虧沒有其他危險的僭號者出現，但它本身卻不能恢復元氣。汴渠源頭幾個關鍵地區的喪失和汴渠本身的失修，排除了從長江各地取得大量收入和運輸軍事物資的可能。因此，朝廷能取得收入和支援的地區依然是十分有限的，面對這些地區，政府不得不采取越來越嚴厲的措施。[[23]](#_23_Wu_Zhang_Quan____Tang_Dai_No)由于曠日持久的戰爭，叛亂者盤踞的河北地區一定非常困窘，但自756年以來已沒有大的戰斗，此時它可能已從最初叛亂造成的困境中恢復過來，并且又變得比較富饒了。

從長期看，具有同樣嚴重后果的是，對地方的控制越來越多地從中央當局手中喪失。這些年的記載充滿了嘩變和小叛亂之事，它們幾乎都出于個人的野心和對抗，而不是為了宏圖偉業。政府一再因這類與主要叛亂活動或叛亂政權毫無關系的動亂而分散精力和受到牽制而不能實現它的主要目標。759年晚期，接著又在760年初期，在漢水流域和長江中流爆發了相當規模的叛亂。760年后期，長江下游又有一次大起事，761年和762年的四川也有起事，但這遠遠不是所有的動亂。地方權力斗爭、暗殺和公開蔑視秩序的事例甚至更多。

這類目無法紀的行為常常使人難以分清敵友。例如，長江下游地區諸城市遭受的唯一一次嚴重戰禍發生在760—761年冬季鎮壓劉展叛亂的時期。前來鎮壓叛亂者的政府軍在揚州和楚州這兩個富饒無比的商業城市胡作非為，大肆掠奪和殺戮而不受懲處。數千名外國商人被殺。[[24]](#_24___Xin_Tang_Shu____Juan_144_D) 762年，由征苛刻的稅的企圖引起的民眾起義也遍及長江下游地區。袁晁領導的叛軍據說總數即近20萬，他們蹂躪了浙江的大部分，直到763年陰歷四月才最后被鎮壓下去。

在中央政府的眼中，比這些叛亂甚至更加嚴重的現象是地方將領日益不請示京師就擅自行動的傾向。這些地方當局從朝廷往往已得不到指導和真正的幫助，而只能自己臨時設法滿足地方的需要，例如在財政方面就是這樣。但在其他方面，它們干脆對朝廷的指令置之不理。總之，由于戰爭艱難地進行而沖突又無結束的跡象，對王朝政權的一種信任危機顯然發展了，它轉而又妨礙政府作出粉碎叛亂的決定性的努力。

叛亂者當然一定繼續希望帝國權力全面崩潰。至少，史思明的將領們期待達成一項妥協的解決辦法，容許他們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地方的權力范圍。但無論如何，消耗戰既拖垮了中央政府，也拖垮了叛亂者。可能為了尋求新的供應來源，史思明在761年初期又對勤王軍的領地發起進攻。事實上，是叛亂者而不是政府軍差一點有了決定性的突破。761年4月在洛陽附近的又一次大戰中，他們擊潰了政府軍，并且威脅要沿黃河向西發動另一次進攻。但史思明不久被其部下所殺。[[25]](#_25_Jian_Dai_He_Du___An_Lu_Shan)這對叛亂者來說是一個大災難。他的死亡使發動新攻勢的前景趨于破滅，并且也使叛亂長期所抱的勝利希望煙消云散。如同安慶緒，我們的史料對史朝義也不注意，但我們應該認識到，叛亂者在他的領導下有一段時期依然是強大的。直到進入762年相當長一段時期，境況才不利于他，并且又像安慶緒那樣，他最后被他的一些高級軍事將領的背叛所解決。現在正在為第四個首領效勞的這些人發現，保全個人性命的要求優先于效忠的要求。

762年陰歷三月新帝代宗在長安登基，但他的繼位對沖突的進程沒有什么直接的影響。可是他登基后隨即頒布大赦，以重申肅宗的寬大政策，這對結束叛亂起了直接的作用。[[26]](#_26___Ce_Fu_Yuan_Gui____Juan_88)叛亂的結束是突然來臨的。可以確定戰爭最后階段的日期從762年的初期或中期開始，但不論在那一年的初期力量對比可能發生了何種變化，政府的大捷和大量失地的收復都只是秋季攻勢的結果。陰歷九月，派往回紇可汗的使者發現，史朝義已在試圖說服回紇人進行反唐的干預。唐帝就派曾以女兒嫁給可汗為妻的仆固懷恩前往回紇朝廷；仆固在那里說服可汗參加對史朝義的協同進攻。對朝廷來說，再次向回紇尋求軍事援助的行動肯定是它經過6年連續的戰爭和內亂后在虛弱和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采取的一個措施。[[27]](#_27_Guan_Yu_Hui_He_Cha_Shou_Pan)

決戰以陰歷十一月叛亂者在洛陽城外的慘敗告終。洛陽又被收復，然后同樣遭到勤王軍和回紇人的蹂躪和掠奪。史朝義在這次戰斗中人馬大量喪失使他處于嚴重的劣勢。這次戰敗對他主要的戰地將領的影響同樣是重要的，因為盡管叛亂者在河北仍擁有重兵，但這時將領們相信他們的事業已經失敗。他們一一背叛史朝義而向皇帝投順。史朝義接連敗北，最后被趕往河北的北面。當763年初期他抵達安祿山原來在范陽的根據地時，守將把他摒于城門之外。他被迫逃入契丹和奚族之間的邊境，根據一個記載，他終于自盡而死。隨著他的死亡，叛亂結束。

叛亂是在沒有任何最后的和決定性勝利的情況下結束的，這種方式反映在763年河北建立的新權力結構方面。肅宗和代宗幾年來都積極地鼓勵叛軍首領們自動投降。在叛亂后的處理中，叛亂的全部責任由安、史家族及其直接支持者承擔。所有其他的叛亂者都準許為唐王朝效力，許多叛亂頭目被批準在原轄地任官。[[28]](#_28_C_A_Bi_De_Sen____Pu_Gu_Huai)朝廷不但愿意赦罪和保證安全，而且還確保叛亂將領的權力和官階，其原因有二，它幾乎不惜一切代價地急于結束敵對行動；它預料一旦和平和現狀得以確立，就能夠控制以前的叛亂將領。這一政策在唐王朝第一個10年進行得很順利。但在這時這種政策的實施結果就不像預料的那樣。當然，主要叛亂將領的倒戈最后促使叛亂迅速瓦解。但河北——中國人口最多和最富饒的道之一——這時一分為四，并且落到了被代宗朝廷任命為節度使的前叛亂將領手中。政府與其說是鎮壓叛亂，倒不如說通過妥協的解決辦法來結束叛亂。在河北，妥協的代價證明是昂貴的。

在全帝國，占主導的心情是松了一口氣，而不是歡欣鼓舞。以前人們很多次對勝利抱有希望，結果反而失望。現在“勝利”已經來臨，但“勝利”是暗淡的，是通過代價十分昂貴的回紇盟軍的干預和對叛亂者的全面寬大取得的。

全帝國處于混亂、多事和分裂的狀態。實際敵對行動的結束使政府面臨大量緊急的問題。第一種傾向是想重建755年的狀況，因為很少人——雖然他們看到了局勢的嚴重性——能認清幾年叛亂的事態已把國家和社會改變到什么程度。這些變化已使簡單地恢復舊制度成為不可能之事。以下幾方面可以說是最重要的變化。

（一）軍事化已經大規模實行。武將們行使大權，支配著地方行政和占有所有主要的戰略要地。大批的人——可能超過75萬——都武裝起來。在以后半個世紀，甚至程度較輕地在王朝以后的其余時期，軍方一直是帝國生活中的主要力量。

（二）地方行政的結構已被改組。到763年，節度使和觀察使控制的政體已在整個帝國成為處于中央政府和舊州縣之間的常設權力紐帶。這些地方政體發展成為本章下文討論重點的自治和半自治形式。

（三）新的社會成分被引進政治領導之中。通過作為軍人取得的戰功或在準軍事政府中效勞，許多人在官僚體制中升至高位；或者取得了以前沒有機會取得的財富和社會威望。

（四）國家的財政結構已經崩潰，需要新的方法來籌措收入。地方的稅收記錄已被銷毀、散失和過時。到763年，政府完全缺乏重新推行舊的高度集權制所必需的嚴密的行政控制，適合新形勢的新方法已開始在叛亂期間逐步形成。

（五）叛亂造成的動亂給了土地分配制最后的打擊；原土地分配制再也不能限制地產的擁有或控制財產的轉移，甚至再也不能起土地登記制的作用。隨著社會總的失調，它的最后消失使地產大量轉到新主人手中。

（六）人口大規模地遷移。河北和河南許多遭受戰禍的地區的人口部分地減少，許多人遷往江淮及江淮以南。

（七）政府喪失了對河北和大部分河南地區的有效控制，它們這時在前叛亂地方長官手中成了帝國內部的一批半自治的道。這樣就使帝國喪失了對它的25%—30%的人口的控制以及大量的收入。

（八）長江和淮河兩流域的幾個道取得了新的和關鍵性的地位。由于中央政府在其他地區實施的控制有限，這一區域因其增長的人口和巨大的生產力而成為王朝主要的收入來源。結果，運送收入至京師的運河體系成了朝廷的絕對生命線，沒有它，朝廷就沒有物資和資金。

（九）在對外方面，帝國令人悲嘆地喪失了領土和威信。隨著撤離軍隊和文職官員以應付內部危機，四周的邊境收縮了。中國喪失了對中亞的控制，雖然孤立的中國前哨遠在那里苦撐了若干年。更重要的是，近代的甘肅和寧夏兩省被吐蕃人占領。這使帝國的政治中心比以往更容易受外來的攻擊。

到763年，這些變化已清楚地被人覺察。不管口頭政治家們如何空喊“中興”，這些變化是不可逆轉的，并且排除了任何真正恢復政府舊政策和舊行政程序的可能。在幾年內這一事實已經變得很明顯，所以政府被迫試行新制度。這些制度往往與傳統的政治模式（它建立在能在全帝國推行統一行政措施的強大中央集權國家的存在之基礎上）南轅而北轍。初唐的舊秩序一去不復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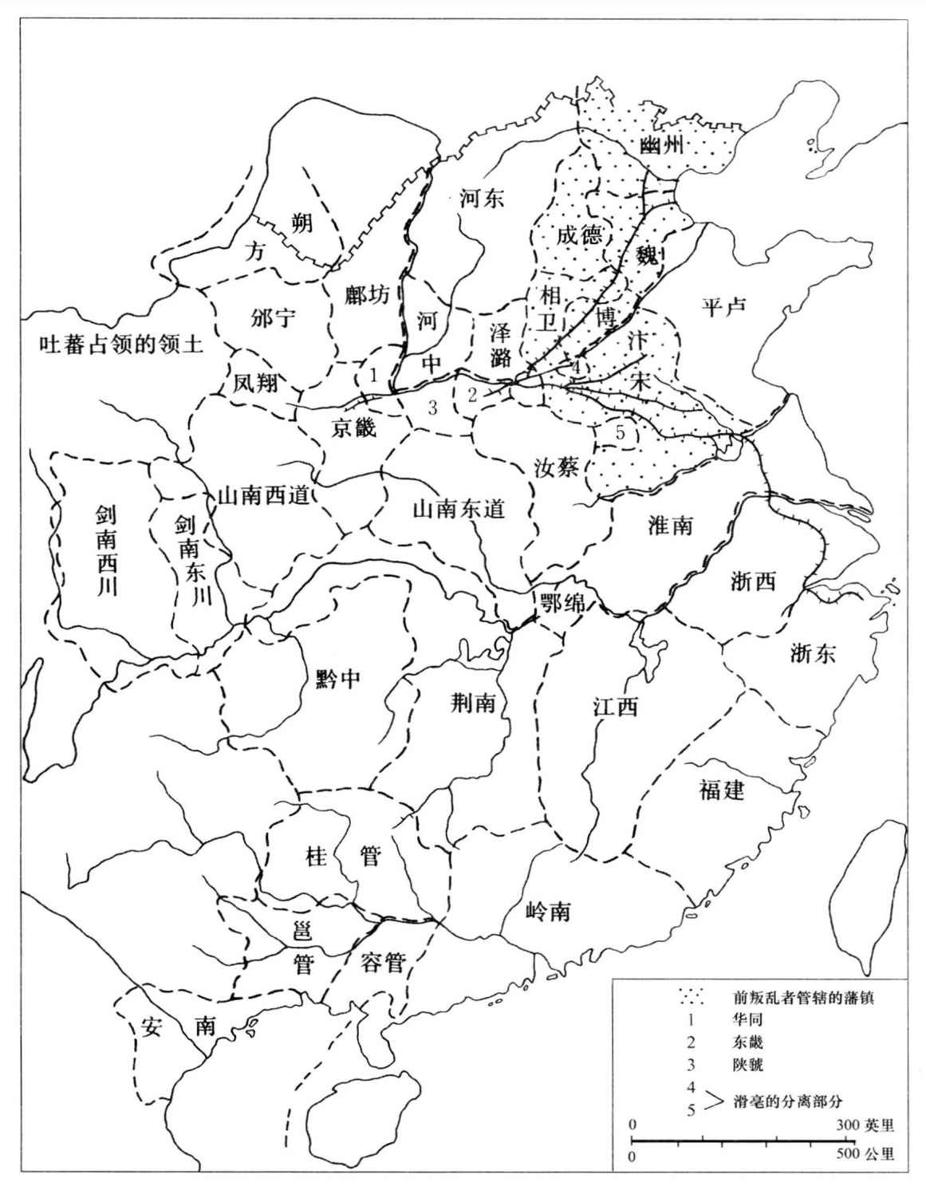
### 叛亂后的權力結構

安祿山叛亂的直接的和可見的遺產是一個大為削弱的中央政權管轄下的不穩定的總形勢。在幾個地區，特別在不斷遭受戰禍和將有長期和艱難的重建工作的河南北部，物質的破壞是嚴重的。在其他曾發生過重大的、但只是停停打打的戰斗的區域，如關中、河東南部和河北，最嚴重的后果是征用人力造成的，因而是短期的。這時全體民眾面臨的具體困苦主要只能推測；但有充分材料證明，當時存在大規模的破壞、荒蕪和人口減少。政府自身被各種各樣的困難——嚴重的資金短缺、混亂的官僚機器、破壞的交通、吐蕃構成的嚴重的外來威脅和浙江發生的一次危急的（顯然是民眾的）叛亂——所困擾。但一些事件表明，其中最難處理的問題是曾經確保王朝生存下來的那種手段，這就是為了行使分散的權力，動員資源和進行戰爭而在內地建立起來的軍事藩鎮。[[29]](#_29_Zui_Wan_Zheng_De_Dan_Du_Lun)

前面已經談過，這些藩鎮之建立是專門為了應付軍事的緊急情況。但在叛亂的過程中扎下了根后，它們這時已形成了京師大門以外的主要權力中心。一方面，軍事力量無疑使節度使們能夠對朝廷堅持自己的權利，甚至藐視朝廷。在歷史著作中，他們通常被形容為桀驁不馴和追求權勢的武將。另一方面，客觀情況本身，即政府的緊密結合和高度集權的舊政制的崩潰，也需要比過去更大程度地把權力下放到地方一級。因此，新的地方政體的發展也可以被看成是對緊急需要的一種積極反應，這一點已被叛亂以后若干年新的地方行政單位的建立所證實，而它們以前在這些地方是不存在的。例如，764年和765年，從荊南和江西這兩個大的舊置道分離出更統一、更緊密的湖南和鄂岳的措施肯定是由于當時的行政能力不能勝任所致，而不是像以后的情況那樣是出于削弱軍事上強大的藩鎮的愿望。唐王朝只是在付出了高度分權的代價后才得以幸存下來。

叛亂結束時的行政安排是建立約34個新的地方藩鎮（見地圖13）。以后幾十年新藩鎮繼續增加，其數在45—50個之間。[[30]](#_30_Cen_Zhong_Mian_De___Sui_Tang)新藩鎮的建立和復雜的轄境的變動使763年以后唐朝的行政地理非常難以捉摸。但叛亂平定后最初幾年存在的30個藩鎮實際上都以這種或那種形式保存下來，到785年，所有比較重要的藩鎮都已形成。大小的差別很大，有的只包括兩個州，有的則有12個或更多。地位和行政結構的不同也使事情復雜化。

最初，大部分藩鎮（幾乎是華北的所有的那些鎮）由節度使管轄，他們都兼有觀察使的權力。后一種職務是玄宗時代的采訪處置使的直接后身，但這時它擁有廣泛的行政權力。按理說，節度使應擁有常備軍供他們指揮，在理論上是為了執行他們的軍事任務。這里情況又有很大差別，有的鎮只有軍隊數千，而有的鎮則多達7.5萬—10萬人。觀察使領導的鎮的各類軍隊都很少，這類官員一般兼有都團練使或都防御使的頭銜，從而在必要時有權在地方行動中動員軍隊。在安祿山叛亂結束時兵員總數（包括邊防軍）可估計為85萬人左右，這不包括當時已被解散的府兵。[[31]](#_31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7Xia)但在這種高度軍事化的情況下，朝廷卻沒有一支任何規模的中央軍隊可供調遣。從軍事上說，政府幾乎完全依賴忠于王朝的節度使的軍隊，但這些軍隊不論設置在邊境沿線或分布于整個華北，都不在它的直接權力之下。



地圖13 唐代的地方建置（763年）

從一開始，內地幾處軍隊大集結的繼續存在（甚至在和平恢復后仍如此）妨礙了想重新樹立中央權威的任何堅定和有效的活動。情況確實如此，原因有二：地方戍軍常常是動亂的根源；更重要的是，他們為爭取獨立地位的有野心的地方領袖提供力量。地方部隊內部的嘩變和動亂是經常的，這些情況有時是暴虐和無人道的領導造成的苦難引起的，如764年河中和775年河陽的情況；但由于單純的個人對抗和軍紀敗壞造成的這些情況至少同樣經常，如770年的湖南和774年的汴州就是如此。[[32]](#_32_Jian___Zi_Zhi_Tong_Jian____J)雖然它們助長了總的不安全感，并且它們一直有發展成大暴亂的危險，但這類動亂的影響主要是地方性質的。受這類戍軍支撐的基本自治的地方政治權力的出現則是另一回事。這些勢力為了有效地控制帝國的要地，最后甚至為了取得那里的主權，很快向中央政府進行挑戰。軍事力量不但支持它們的野心，而且為它們的領袖賴以在領地中取得充分完整的控制提供了手段。這樣，從那些長期在中央控制之外的地方政體，我們可以發現從以原來派在該地區的軍隊為基礎的狹隘的軍事權力發展成真正在地方割據稱雄的明確跡象。甚至像魏博和昭義那樣的藩鎮（前者不受節制，后者效忠朝廷），情況也是如此，它們的軍隊只是在安祿山叛亂以后的時期通過大規模征募和訓練地方居民以后才變得難以對付。

中央政府是非常了解軍事力量分散的種種危險的。但它缺乏消滅這種現象或對地方勢力施加任何嚴密的中央控制的手段：各地的軍事領袖和一般士兵都激烈反對這類政策。因此它對諸如戰時英雄郭子儀提出的取消軍事藩鎮的建議和對文官獨孤及提出的緊縮所有內地各地的軍隊規模的建議，都無實施的企圖。[[33]](#_33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2)隨著叛亂后局勢的明朗化，有人認識到，為了抵消不直接受中央控制的藩鎮力量。在直接受中央控制的幾個藩鎮保持龐大的駐軍是絕對必要的。隨時由中央政府調遣的大部分兵力分駐在西北邊境沿線。總的說，這些軍隊造成的問題比內地軍隊少，這無非是因為他們駐守的地區很貧困，而且人口稀少，所以深深地依賴中央政府的供應和資金。可是安祿山之亂以后時期第一個政治軍事大危機卻在邊防軍中發生，這場危機雖是短命的，但卻有深遠的影響。

叛亂時期其功勛可與郭子儀和李光弼媲美的杰出英雄仆固懷恩是一個具有回紇血統的職業軍官，曾指揮過結束叛亂的最后的掃蕩戰。作為西北地方軍的指揮官，他在帝國勝利后的幾個月中依然是軍界最有實力的人物。763年秋，當他帶領回紇可汗及其朝臣在參與鎮壓叛亂后回國時，他和他的貴賓發現河東節度使不讓他們進入太原。節度使提出的借口是安全預防措施，但私仇可能是這次糾紛的根源。在這次發生的激烈爭吵中，仆固不無理由地感到朝廷不給他足夠的支持。結果，當他在等待報私仇的時機時，他命令朔方軍在河東消極觀望，盡管吐蕃有入侵京師西面之勢。吐蕃人763年11月確實跨越邊境時，他們迅速地打垮了面臨的有限抵抗；由于附近各鎮的節度使和仆固本人都沒有響應要求支援的緊急呼吁，吐蕃人進而占領長安。朝廷在7年中第二次出逃，這一次東逃至黃河河畔的陜州避難。由于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無力據守京師，吐蕃人在兩周后就撤走。唐朝人的生命和財產遭受一定的損失，但更為巨大損害的則是和平重新來臨后剛剛有所恢復的帝國威望。[[34]](#_34_Bi_De_Sen____Pu_Gu_Huai_En_H)

結果，事情變得很明顯：第一，政府再也沒有完全可依賴的軍隊可供調遣；第二，它的主要目標必須是防御來自吐蕃人的外來威脅。仆固懷恩被宮廷策劃的陰謀趕下了臺，他的朔方戍軍指揮官的職務由郭子儀接替，同時對邊防軍的多少更有效的新部署也得以進行。仆固懷恩逃往在今寧夏境內的靈武，并在764年秋與吐蕃人聯合，為他們領路和領導新的入侵。這一次深入中國領土的打擊未取得持久的收獲。在下一年，他組成了吐蕃人、自己的回紇人和其他部落民族的一個廣泛的聯盟準備入侵中國。但對唐朝來說幸運的是，他在入侵期間得病，不久死去。在這整整的10年中，吐蕃人每年秋季進攻邊境，這些襲擊構成了安全、后勤和士氣方面的嚴重問題。隨著吐蕃的威脅，名義上友好的回紇人表現出模棱兩可和不明確的態度。這種外來威脅嚴重地妨礙了政府在中國內地恢復中央對不同的區域權力中心的控制的努力。

在開始時，政府對哪些地方當局會響應它的指令和哪些地方會拒不服從是不完全清楚的。與各地的關系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才趨于明朗，并且因考驗和錯誤判斷而更加清楚。每一次的最終考驗是中央政府選任各鎮節度使的能力的大小。在長江流域及以南，政府穩定地保持這種權力，雖然那里偶爾發生嘩變和動亂，卻不存在真正的軍事問題。在北方，類型則很不一致，至少在最初是完全不能預測的。雖然在某一特定時期政府掌握了對大部分地方節度使的挑選權，但在面臨有力的地方（軍事）反對時，它通常不能對某鎮強加它的人選。可是在安祿山之亂后的10年中，它確實在一些困難的、或有潛在困難的局勢中成功地作出了一些人事變動。例如在764年，它設法安全無事地把一名前叛亂將領從汴渠邊的戰略要鎮汴州調到一個比較次要的地方，而以一名效忠王朝的將領接替；767年，它使用武力在陜西東南的華州清除了一名拒不聽命的節度使，因為此鎮太靠近京師，使它放心不下；773年它任命自己選擇的節度使去控制河北的黃河邊上雖小但很重要的義成軍，并頂住了當地守軍要求任命他們自己的一個軍官的壓力。

同時，中央政府在實施一項有關的政策，即在把地方的權力交還文官時也有一定的進展。在叛亂結束時，各地的長官（不論其具體官稱是什么）有近75%是軍人。到779年的代宗末年，這一比率已減少到約五分之三。這些成就主要在南方取得，因為在許多北方藩鎮，由于戰略的原因，強大的軍事力量的存在是必要的，職業軍事領導的保持不會帶來不能接受的安全風險。[[35]](#_35_Zhe_Xie_Jie_Lun_Gen_Ju_Wu_Ti)

但是盡管政府在有些情況下有所進展，但在其他情況下它卻沒有力量將其意愿加在與地方軍人相勾結并加以利用的有野心的節度使身上。763年在襄州（在漢水邊上），765年在平盧（當時是平盧軍已被調去的山東一個重要藩鎮的名稱）和767年在四川（那里全是“效忠”的鎮），政府對地方將領之間的權力斗爭被迫袖手旁觀，然后給得勝者獎以節度使的正式任命。在前叛亂者領地的第一起這類事例發生在768年的幽州，當時節度使被刺。朝廷對自己的軍事實力和威信感到有足夠的信心，以致派了自己的一名高級官員去掌管該地。但是地方駐軍的一次武力炫耀就足以迫使他返回，然后那名刺客就得到合法的批準而成為節度使。四年后當他也不得善終時，朝廷不打算干預，而是經過了相當長的一段觀望期，才正式批準繼任人選。

政府直到775年才對一個拒不聽命的藩鎮采取大的軍事行動，但即使在當時它也只是在最狂妄的挑釁后采取行動的。這一危機發生在河北是不足為奇的，那里的魏博在前安祿山的、精明和足智多謀的副將田承嗣的領導下已成為四個藩鎮中最強的一個。775年，田承嗣企圖接管鄰近的一個已經更換節度使的相衛鎮。如果這一行動成功并被群起效尤，帝國就會發生混亂。因此政府命令附近的9個藩鎮對田承嗣發動一次征討。它們之中有的非常愿意行動，以便取得一份戰利品。它們還可能都得到朝廷的資金。中央政府的主要目標是牽制甚至降服魏博，但它一定還希望這次沖突有助于削弱一些不很聽話的藩鎮。

這些目標只被完成了一部分。田承嗣通過兼用計謀、外交和及時的勝利，能夠保持他的軍事地位。此外，其他強大的藩鎮節度使終于認識到，他們的長遠利益只是與田承嗣的利益而不是與朝廷的利益相通。結果，在贏得了一些大小適當的領地后，幽州、成德和平盧諸鎮妥協并最后放棄征討。這雖然導致朝廷在776年早期完全停止作戰而沒有降服魏博，但它至少已經使魏博不能為所欲為。魏博雖然面臨眾寡懸殊的不利形勢，總的說喪失了很少的領地，但它取得的半個相衛鎮（它此時不再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補償了它在其他地方的損失。此外，它已經有說服力地顯示出個別有強大武裝的藩鎮的防御生存能力，尤其在河北的藩鎮更是如此，因為朝廷在對那里的個別節度使采取任何行動時，能指望得到的支持很少。[[36]](#_36_Guan_Yu_Zhe_Yi_Shi_Jian__Jia)

那一年（776年）的晚些時候，朝廷的確成功地利用了一批聯合的地方軍消滅了一個有潛在危險的地方領袖。一個不出名的將領李靈耀在汴州的節度使死后已經奪取了那里的控制權，并且立刻開始執行一條傲慢的獨立路線。對在汴渠邊上的戰略要地出現的這種行為，朝廷簡直是不能容忍的。為了消滅他，朝廷發動了一場戰役，并且很快取得勝利，盡管不知悔改的魏博節度使對叛亂者提供了援助；在汴州地區，朝廷作出了嶄新的行政安排。

但在這類情況下，參加戰役的藩鎮從勝利中取得的利益往往與中央政府一樣多。這顯然是中央政府被迫完全依靠地方軍而不依靠中央控制的軍隊所造成的幾大惡果之一。這一次，已經強大的平盧是全面的勝利者，它從戰敗的對象那里取得5個新的州。

因此，在整個這一時期，朝廷試圖控制有較多駐軍和占地理優勢的藩鎮的記錄最多也只能說是不平衡的。到代宗執政結束時，至少有6個藩鎮不受中央任何值得一提的控制，它們是：幽州、魏博、成德（河北北部和中部）、平盧（山東）、襄陽（湖北北部）和淮西（河南西南）。在這些地方，節度使是當地決定的，朝廷不過在事后予以承認（成德實際上不能算例外，因為在那里帶兵的李寶臣的任期從他叛亂時算起）。也許長期在一個篡權者手中的劍南西川（四川西部）也應包括在這一類藩鎮中，雖然它采取反朝廷姿態的時間要晚得多，并且又是在不同的領導之下。所有這些藩鎮在處理內部事務時都不受朝廷的干涉，所以必須恰當地把它們視作自治單位。正如歷史學家司馬光所說：“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37]](#_3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

顯然只有有實力的現實情況才能導致唐朝政體接受這種局勢。它這樣做了，但又保存了帝國的統一和自己居于唯一正統地位的權力，這簡直可以說是了不起的。原因在于它能牢牢地控制四個對它的生存絕對重要的區域。這些關鍵區域的第一個當然是京畿的關中道，那里的資源雖然減縮，但它作為國家的政治中心仍是至高無上的。第二個關鍵區是西北的邊境區，它是掩護京師使之避免帝國面臨的最大外來威脅的盾牌。第三個是長江淮河流域，這一區域有迅速擴大的生產力、增長的人口和繁榮的商業，因此已成為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第四個是運河地帶，它包括那些從南方運輸稅收所必經的幾個鎮（四川是這類區域的第五個，但有爭議；雖然它是守衛西面和西南邊境的要沖，但它與中央政府的命運的關系，并不像上面所談的四個區域那樣有決定性意義）。由于四個區中的兩個因戰略的原因而非常重要，所以它們需要集結重兵，這樣隨之產生了控制的問題。我們已注意到，西北的邊境藩鎮缺乏足夠的地方資源基地，所以沒有爭取擺脫中央政府的能力。但沿運河有大量駐防部隊的諸鎮則是另一回事。它們非常反復無常，需要以極為巧妙的手段加以處理；顯然它們基本上不向中央貢獻稅收。

因此，像陳寅恪指出的那樣，唐朝在8世紀后期和9世紀的統治之得以幸存，實質上只是因為它成功地維系了西北—東南的軸心。[[38]](#_38_Chen_Yin_Ke____Tang_Dai_Zhen)長江流域是王朝賴以繁榮的經濟基地，但遠離唐的政治中心長安，這是造成嚴重緊張的一個原因，但這種情況之形成顯然有充分的歷史原因。這種地緣政治學的考慮也說明了這個時期和以后時期國家財政所表現的特殊形式的原因。代宗朝的后半期（約從770—780年），繞過地方節度使而又不影響他們征收直接稅的鹽的專賣給中央提供了約一半收入。此外，780年采用的兩稅法是在一個分權帝國的情況下產生的，同時也是在承認了這些情況的前提下被推行的。[[39]](#_39_Cui_Rui_De____Tang_Dai_De_Ca)

與單純的軍事控制問題一起，中央當局還面臨各地的具體行政問題。這些問題由于各節度使與中央政府的關系模糊不清而復雜化了，甚至在順從中央控制的地區，它們也造成了困難。事實上，代宗時期的大部分成就必須被看成是單純地表現在帝國的大部分地方恢復了一定程度的行政秩序這一方面。

混亂的幾年使許多人得以在地方任職，根據以往的標準，他們擔任這些職務是不夠格的，但現在又不易被取代。任命官員的常規已被破壞，并悄悄地被放棄。節度使們提升自己的助手和心腹，往往繼續不顧這些正常程序。官員的正常輪換和例行提升也已被破壞。上述情況與由于總的資金短缺而引起的精簡人員和減少俸祿的因素一起，必然嚴重地降低行政的質量和損害正規官員集團的風紀。嚴格的監督和正常的政績考核也不可能實現，特別是因為普遍認為公務的處理可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節度使被授予在自己轄區內考核官員的明確責任，但他們對網羅忠于自己的追隨者的活動比對作出客觀的評價往往更感興趣。此外，系統地監督節度使本人的制度也已不復存在。例如，長期以來的苦難根源之一是節度使擅自非法征稅；但由于他們獲準在地方上有很大的行動自由，所以人們要揭露具體的、顯然應受譴責的事例是不容易做到的。

總地說，財政造成了一個困難問題，因為國家對人口的行政控制能力大為削弱。舊的人丁簿和稅冊的喪失、破壞和過時，使登記的戶數不到300萬戶——只是叛亂前總數的三分之一。[[40]](#_40___Tang_Hui_Yao____Juan_84_Di)結果，恰恰在比以往更需要進行積極的行政活動時，能取得的歲入反而銳減。此外，重新登記人口和使稅冊的材料符合實際的情況可能是行政工作中最艱難的任務。即使在7世紀最有利的形勢下，在隋亡以后全部重新登記人口的工作幾乎花了一個世紀。

中央政府頒布了許多詔令和公告，努力想解決這些問題，但它們或者仍是形同虛設的規定，或者被半心半意地執行。在代宗的大部分年代，中央政府無力采取任何重大的主動行動，一種對地方行政的十分自覺的放任主義政策終于逐漸被人們接受。這一政策與從764—777年任宰相的元載尤其有關。[[41]](#_41_Jian_Lu_Si_Mian___Sui_Tang_W)在這一時期的史書中，元載因他在這些年中對中央行政的獨裁控制和對佛教的庇護而受到強烈的批評，他公開的貪婪和腐化也被含蓄地認為是對各鎮缺乏積極的政策的一個原因。但是，在他掌權時期，朝廷卻得到可喜的穩定，并且他至少一度成功地消滅了自肅宗時期起支配朝廷的宦官勢力。

元載對藩鎮采用的政策是實用主義的。他也許比任何人更能認清朝廷只有有限的選擇余地，所以決定采取一條謹慎和妥協的路線，其目的在于維持國內和平和逐步恢復中央的權力。毫無疑問，在他的眼中最緊急的大事是防衛國家免遭外敵的侵犯：吐蕃人最近已進犯京師，并仍占領西北大部分地方；另外還有威脅程度較小的表面友好但難以控制的回紇人。這一政策的主要目標完成了，但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價。地方政體，特別是擁有重兵的政體，能夠有機會牢固地樹立自己的勢力和使它們與所控制的領地和人民的關系正常化。這樣，叛亂造成的分權在代宗在位期間逐漸制度化了。不但地方政體如此，甚至為中央利益服務的機構，如有才華的行政官劉晏在這一時期設立的從而成為朝廷的主要財政支柱之一的鹽鐵使署也是如此，而劉晏在管理它時，則是在獨立于朝廷的高度自治的（實際上是區域性的）基礎上進行的。

隨著元載在777年的失寵，出現了針對各地問題的短暫的立法風。它旨在讓州刺史重新起更充分的文官作用，同時又保護他們不受節度使的欺凌。此時他們已不能再兼任團練使，各個州擁有的軍隊人數受到嚴格的限制。同時節度使不得停止刺史的工作，未向朝廷報告不得批準他們離境，或另立自己的人去補缺。[[42]](#_42_Jian___Tang_Hui_Yao____Juan)這一法規可能沒有任何大的直接影響，但實際上朝廷在775年對田承嗣和在776年對李靈耀的主動干預后，它的確表現了一種新的信心和贊成采取更強硬政策的日益增長的情緒。這種政策被代宗的繼承者德宗幾乎從一開始就加以采納。

## 德宗（779—805年在位）

德宗在779年中期人們期望恢復唐朝力量和光榮的熱烈心情中登上了皇位。沒有什么問題能阻撓他的繼位。新帝已經成熟，但尚不滿40歲，他為人聰慧，精力充沛，因而受人尊敬；國內整個局勢相對地說已經趨于穩定。在他統治之初，他雖然沒有碰到緊迫的危機，但對國家的不可靠的財政基礎以及國家對全國財政的不扎實的控制卻有著充分的認識。從他登基后幾乎立刻實施的政策來看，他可能早就相信實施更加有力的政策是行得通的。在許多方面他是正確的，這一事實卻因以后發生的事件而鮮為人知。他放在第一位的要務是財政改革。

780年初期兩稅法的采用一般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史中的大事之一。近代的研究揭示了新稅制基本上是以前幾十年發展的實踐和政策為基礎，因而沒有什么真正的新內容，但這也不能減輕它的重要意義。[[43]](#_43_Guan_Yu_Zhe_Yi_Gai_Ge_De_Zhu)我們只要對這一改革提出幾個人所周知的特征就夠了：把現存的紛雜的稅制統一成一種基本稅，根據當地情況在每年兩次征稅（由此產生了這一令人誤解的名稱）中繳納一次；根據財富和財產分等征稅，而不是向所有納稅者按統一的稅率征收；稅額一部分征現錢，雖然稅的實物仍占絕大部分；取消各地本地戶和新來戶之別。這些特征充分證實新稅制對當時變化的經濟情況作出了反應。

但只有在找到了從地方取得歲入的適當機制的情況下，新稅制才能提供足夠的歲入。在這一方面，新稅的組成確實順應了當時存在的情況。它通過地方份額制而得到推行。

根據這種地方份額制，地方當局在管理財政事務時有很大程度的自由，但它們必須繳納地方當局和中央政府在事先互相商定的稅收份額。實際上，中央政府放棄了進一步對全國財政進行嚴密的中央直接控制的局面，作為報償，它定期定額取得歲入。這些份額反映了形形色色的行政慣例和不同的社會狀況，政府在確定份額和放棄稅率一致的局面時，默認了當時存在的賦稅負擔不均的情況——這一點后來遭到嚴厲的批評。在實際處理地方征收的歲入時，兩稅法的改革把無疑已在使用的手續制度化了。歲入的分配在州一級分成三個特定部分：留作地方開支的部分（留州）；送交上一級政府的部分（送使）；上繳中央國庫的部分（上供）。與新政策的其他方面一樣，這一做法成了沿用到唐末的定例。為了推行改革，朝廷委派授予特權的官員（黜陟使）到帝國的11個大區與地方長官直接接觸并商定份額。由于正常的官僚渠道遠不宜推行涉及面如此廣泛的新措施，德宗于是使用了專門任命和可信賴的代理人。

德宗想恢復中央權力的基本目標不但需要增加中央本身的收入，而且要全面加強對財政機構的控制。但是一些歷史學家（其中有著名的日野開三郎）則走得更遠，他們爭辯說，實際上新稅制的每一個特征都含有削弱地方權力的手段。[[44]](#_44_Te_Bie_Jian_Ri_Ye_Kai_San_La)但它是否有這一具體明確的意圖，這也是值得懷疑的。例如，出于財政的目的通過消滅本地戶和外來戶之別，地方當局能向他們征稅而不上報中央政府的潛在的納稅人無疑大大地減少了。可是中央政府的首要目的肯定是單純地要從這一明顯的稅源擴大自己的稅收基礎。特別要指出的是，德宗清楚地認識到，在落實這一措施時，不論它有何失誤都是無關緊要的，因此，新稅制是與當前政治現實的有意識的妥協，它打擊地方的力量，但只是間接地打擊。此外，由于不能指望在搞自治的藩鎮充分貫徹這些政策，那些難以定性的表面上服從中央的地區就成了這一措施的真正貫徹對象，那些地方在執行中央政策時幾乎是半心半意的，它們的財政機構提供的收入也比較少。

但是即使有這些保留意見，這一全面的新稅制的采用無疑地從德宗的統治一開始就為他樹立了一個堅強的、有改革精神的君主的形象。推行兩稅法的結果幾乎立刻導致了長安新政權與地方的自治勢力的第一次摩擦。780年初期，被派往與河北三鎮商談的黜陟使指示魏博將其軍隊從7萬人減至3萬人，可能此數是規定藩鎮擁兵的最大限額。這名專使在河北可能越權行事；也可能他在朝廷的命令下以此試探地方政體的反應；也可能這些專使所受的權限確實比現存文獻記載的要更加廣泛。結果，命令不但被拒絕執行，而且被節度使田悅（田承嗣的接任者）所利用，因為他能把自己打扮成受朝廷解甲的威脅而危及生計的士兵的保護人。由于政府很快打算削減地方軍隊的流言已經傳開，這件事一定給人們以強烈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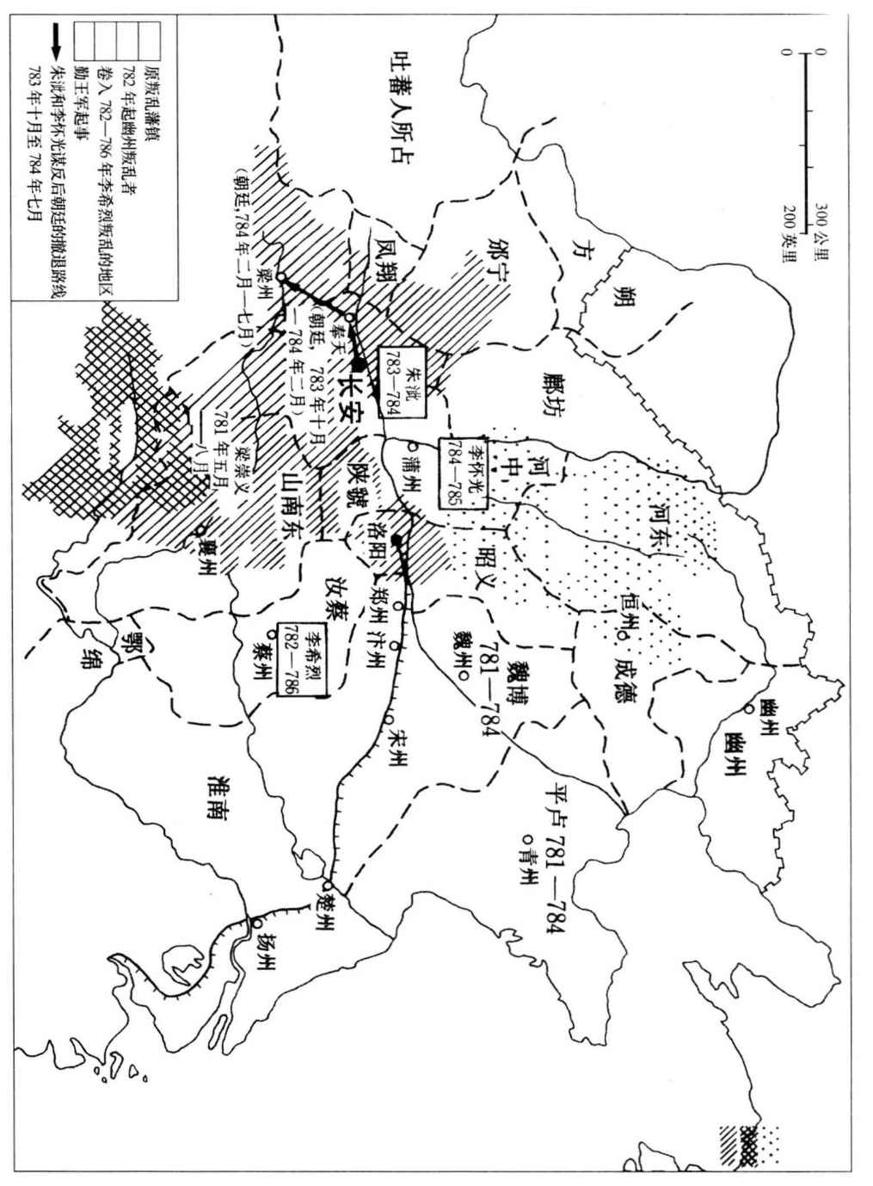
德宗還力圖明確地亮明他的態度： 自治的藩鎮與其他藩鎮對朝廷同樣有正規的財政義務。他登基不久，就拒收平盧節度使的一筆厚禮。然后在780年春，當平盧節度使（再次）和魏博節度使上呈德宗大批“貢”品時，皇帝大造聲勢，把錢財作為正式稅收轉交國庫。德宗從一開始還力圖重新對地方高級官員本人進行控制。779年后期，他成功地把西川的一個統治已有14年之久但其忠誠已成問題的節度使召回朝廷并將他拘留。780年春，他當機立斷地懲處并撤換了西北涇源鎮的一個篡權者，而不像代宗在以前所做的那樣承認他的指揮權。甚至位列鹽運使之首的那位受人尊敬、辦事特別干練的劉晏也證明不是必不可少的：那一年夏天，他被貶和處決，他的以揚州為基地的行署也部分地被解散了。

德宗即位的第一年末，最強有力的地方領袖人物確信，他遲早會對他們采取行動。他們的利益當然是維持原狀，而這正是德宗此時威脅著要加以摧毀的。總的說來，他們的目的是很有限的。與近代的軍閥一樣，他們基本上只想讓他們在自己的地盤上自行統治。在這一方面，在他們控制的百姓心目中，很難說他們有什么合法性。偶爾我們也能從史籍中發現少數敦促這些藩鎮服從皇帝意志的建議；但真正抵制地方統治的活動很少出現。為了通過成立統一戰線來保持其特殊地位，在代宗朝的后期，其中四個藩鎮締結了反朝廷的聯防公約。它們是魏博、平盧、成德和襄陽四鎮，最后一個位于漢水，它盡管資源有限，卻在篡權而成為節度使的梁崇義的治下抱有獨立的野心。在這些年間，幽州和淮西對朝廷采取一條和解的路線，但前者由篡權者朱滔所統治，后者由李希烈統治。因此它們不應與那些真正聽命于中央指令的藩鎮相混。

在這些情況下，隨著德宗采取了日益嚴厲的態度，局勢必然趨于緊張，以致發展到汴州在781年初期加固防御設施時流言蜂起，說朝廷在準備討伐平盧，而后者也轉而動員自己的軍隊以保衛自己的地盤。可是真正交戰的原因卻在成德的李寶臣死后不久形成，李是在安祿山之亂結束時被任命為節度使以控制其地盤的原來叛亂者中最后的一人，但此時朝廷拒絕批準其子李惟岳接任節度使之職。雖然成德的同盟者施加壓力，但德宗絕不讓步，這樣就使李惟岳處于一個篡權者的地位。顯然，只有通過武力才能把他清除，當他的盟友看到城墻上的文告時，他們就準備支持他反抗朝廷。此事觸發了從781年持續到784年的一系列的東北藩鎮之亂，而在河南和西北的一些次要的叛亂則一直持續到786年。[[45]](#_45_Pan_Luan_Ben_Shen_Ji_Zhu_Bu)

人們常常譴責德宗在挑起一次武裝對抗時過于莽撞，但應該看到，他對局勢的最初估計絕不是沒有道理的。雖然成德、魏博和平盧組成的陣營咄咄逼人，但這個陣營卻面臨著西面三個忠于王朝的強大藩鎮：河東、昭義和宣武（汴州），在北方它還面臨更強大的幽州。從780年初期起與吐蕃關系的緩和而最后導致在783年締結的一項正式的條約，使朝廷能夠把西北的軍隊重新部署到東北。雖然朝廷希望通過專門處理，以使襄陽的梁崇義不參加叛亂，但有人假設，即使他謀反，他也容易被周圍忠于王朝的藩鎮所牽制。當時德宗的主要錯誤與其說是在這個時候采取行動，倒不如說他未能認識到他的目標應有限制，進行時應該深思熟慮。叛亂諸鎮的目標不過是保存自己。它們的要求在最壞的情況下是希望保持自己的地盤和使自己的軍政組織完整無損；充其量也只是想適度地擴大領土。魏博在775—776年已經表明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

沖突的第一階段對朝廷來說是成功的。意義重大的是，新擴充的神策軍第一次在這場討伐藩鎮之戰中起了重要作用。雖然叛亂的藩鎮結了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支援，但總的說結盟軍不得不各自為戰。它們之中最弱和最孤立的要算襄陽，它不能進行什么真正的抵抗，而且于781年秋在淮西鎮占優勢的勤王軍面前垮了臺。在河北，魏博的田悅想占領太行山以東昭義的幾個重要的勤王的城鎮，但在圍攻時遇阻并于781年年中大敗而歸。782年初的又一次戰敗使他被圍于自己的治地魏州。在北面，成德的重要將領之一張孝忠在關鍵的戰略城市易州的倒戈，甚至在戰斗發生之前就嚴重地削弱了成德的力量。張孝忠隨即投奔了由節度使朱滔率領的幽州軍，并在782年初期大敗成德軍，這樣就危及了成德的生存并促使李惟岳遇刺身亡，而在最初，斗爭就是由于他的接任問題引起的。殺他的刺客為高級將領王武俊，他篡奪了成德節度使之職，立刻向朝廷投誠。在南面，李納在前一年他父親死后就成了平盧事實上（但未經朝廷批準）的領袖，他沒有實現奪取運河控制權的第一個目標，從此他發現自己處于強烈的軍事壓力之下。到782年春，他也謀求與朝廷和解。結束叛亂的前景在望，只有魏博依然公開叛亂，它的解決只取決于朝廷提出的條件了。



地圖14 河北諸鎮之亂（781—786年）

本地圖圖例標記與實際形勢有某些出入，現按原圖復制，未加改動。——譯者

但德宗及其顧問們卻滿懷信心地認為，他們還可以采取強硬路線。成德奉命被分成幾個部分，分由王武俊、張孝忠和另一個投向朝廷的成德將領節制。王武俊還奉命為即將與魏博作戰的河東軍和幽州軍提供后勤支援。幽州不久取得對原屬平盧的德州和棣州的控制。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的軍隊雖曾消滅梁崇義，但他根本沒有取得領土。李納謀求和平的努力也遇到了粗暴的拒絕。總之，朝廷不但像有些人指責的那樣沒有適當地犒賞支持者，它還想占領和長期削弱那些敵對的藩鎮，但不打算不適當地加強那些曾用軍隊使朝廷取得勝利的人的地位，從而確保中央政府能夠進一步加強自己的力量。

肯定是因為朱滔看清了這些目標，他才在782年春改變了立場。的確，他對分贓不均感到不滿：他沒有擴大自己的地盤；他取得的州都在遠處，這并不表示他的力量真正有所增加。基本的問題是被圍的魏博節度使通過使節向朱滔提出的論點挑起的：“且今上英武獨斷，有秦皇、漢武之才，誅夷豪杰，欲掃除河朔，不令子孫嗣襲。”[[46]](#_46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41_D)他還指出，魏博之完整存在對幽州的安全至關重要。所以朱滔的改變立場顯然對他本人有利。王武俊之遭遇甚至更加清楚。自他投誠皇帝后，他未被任命為原成德鎮的節度使，結果成德反被分割，他只成了團練使，所轄不過兩個州。另外，他還必須給其他軍隊供應大量給養。因此，經過了一次次談判后，他決定拒絕朝廷的安排，參加了朱滔解救魏博的行動。自安祿山之亂后，河北的幾支主力第一次組成區域聯合戰線。此時，東北的戰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雙方的兵力都集結在魏州附近，782年年中一支勤王大軍在那里遭到慘敗，這實際上標志著朝廷想把河北諸鎮納入中央直接控制的希望化為泡影。但在當時，還沒有人預見到這種前景，朝廷仍保有對河北南部兩個州和中部四個州的控制，所以仍堅持它的行動。結果出現了長期對峙的局面，一直持續到782年末和783年的好幾個月份，中間只有幾次通過河東向河北北部的勞而無功的進攻。很可能朝廷對拖垮叛亂的策略充滿希望。雖然京師的局勢從782年年中起迅速惡化，但在783年初期之前，來自南方的運河運輸仍足以供應戰地的軍隊。另外，德宗完全認識到，他若不想大丟面子，這時絕不能使討伐半途而廢。叛亂者這時也沒有采取新的軍事主動行動，但在782年后期，他們與平盧的李納聯合行動，想搞政治獨立。他們在魏州東部的一次正式儀式中，各人僭稱王位，在自己的地盤中自封為王：朱滔自立為“冀王”，王武俊稱“趙王”，田悅稱“魏王”，李納稱“齊王”。他們追溯過去的封建時期，在自建的小朝廷和職官中一本周代古制，并有意識把自己的領地打扮成周代的封建王國，只對天子作象征性的服從。但這一行動在實際上并無多大變化，主要是想在自己的藩鎮內為自己取得某種可接受的合法性。他們模仿周代的行動是很自然的。在8世紀后期，認為中國已進入像東周時期那樣的封建割據時期的思想相當普遍。[[47]](#_47_Jian_Pu_Li_Ben___Gong_Yuan_7)但這并不意味著河北的這些節度使名符其實地要稱孤道寡。從以后的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寧愿在帝國內追求更正規的地位。

雖然河北的軍事問題成敗未卜，但對中央政府最關緊要的行動卻發生在其他地方。成功地抗拒政府的榜樣和戰爭造成的困苦有助于把叛亂擴大到危及王朝生存的地區。在河南，李希烈在戰勝襄陽的梁崇義以后，沒有參加討伐東北叛亂者的戰役。政府受挫和諸叛亂者（鑒于李希烈控制著朝廷與其長江流域主要供應地之間的戰略要沖，他們積極尋求他的支持）稱王的消息最后促使李希烈在783年初謀反。但后來除了偶爾參加攻打運河外，他與他在河北的叛亂同伙似乎沒有作出過任何政策方面的協調。李希烈要實現自己的擴張目標，這樣很快就引起了所有的河南和鄰近地區諸軍以及派去征討他的神策軍的注意。他雖在一開始暫時受阻，但在783年的其余時期贏得了一次次的勝利，他的成就在784年初期占領汴州時達到了最高峰。這時，他的軍隊占領了從漢水直到汴渠的一大片領土，完全切斷了南方的供應路線，并且威脅著要往南向富饒的長江諸鎮推進。

與此同時，政府面臨著一個甚至更為緊急的危機。783年秋，經京師開赴河南前線的邊防軍因供應的口糧不足而嘩變，并且擁立心甘情愿地當他們叛亂領袖的朱泚，此人為朱滔之弟，又是前幽州節度使。由于物資日缺，以及一連串緊急的苛捐雜稅，京師普遍不安的情緒加速了秩序的崩潰。朝廷倉促逃到附近的奉天，在那里被朱泚所圍，這時，朱泚已宣布自己成立新王朝。

對一個已受到沉重壓力的皇帝來說，奉天的流亡期是艱難的，雖然當時干練的顧問陸贄起草的文獻一點兒也沒有顯示朝廷處于一片混亂之中。[[48]](#_48_Jian_Cui_Rui_De___Huang_Di_D)德宗沒有其他選擇，只能把河北的軍隊召回以對付京畿地區的叛亂者，這樣就放棄了最初導致當前這場危機的目標。但他不能停止與李希烈的戰斗，因為李希烈也像其他人那樣拒絕了朝廷的和平試探。20多年來，中央政府沒有東北而照常運轉，但是如果沒有長江流域的資源，它甚至不敢設想可以支撐下去。很難想像，政府地位的進一步衰落不會造成全面崩潰。可是在784年初期，又一次打擊來臨。從河北召回的主力軍之一的將領李懷光在他的根據地河中叛亂。朝廷越過秦嶺又逃到陜西南部一個更安全的地點避難，并相應地修正了它的戰略。李懷光的叛亂始終像一個謎。顯然，他感到自己及其軍隊受到歧視，這在相當程度上表現在當時普遍缺乏的基本軍需品的分配方面。他一旦拒不聽命，隨之明顯地就不愿意把自己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了。不過他很少參與反對朝廷的直接軍事行動。他沒有與朱泚聯合，這使朝廷能在京畿心腹之地兩面受敵的情況下幸存了下來。朱泚在長安成立新政體，但附從者甚少；它在784年底垮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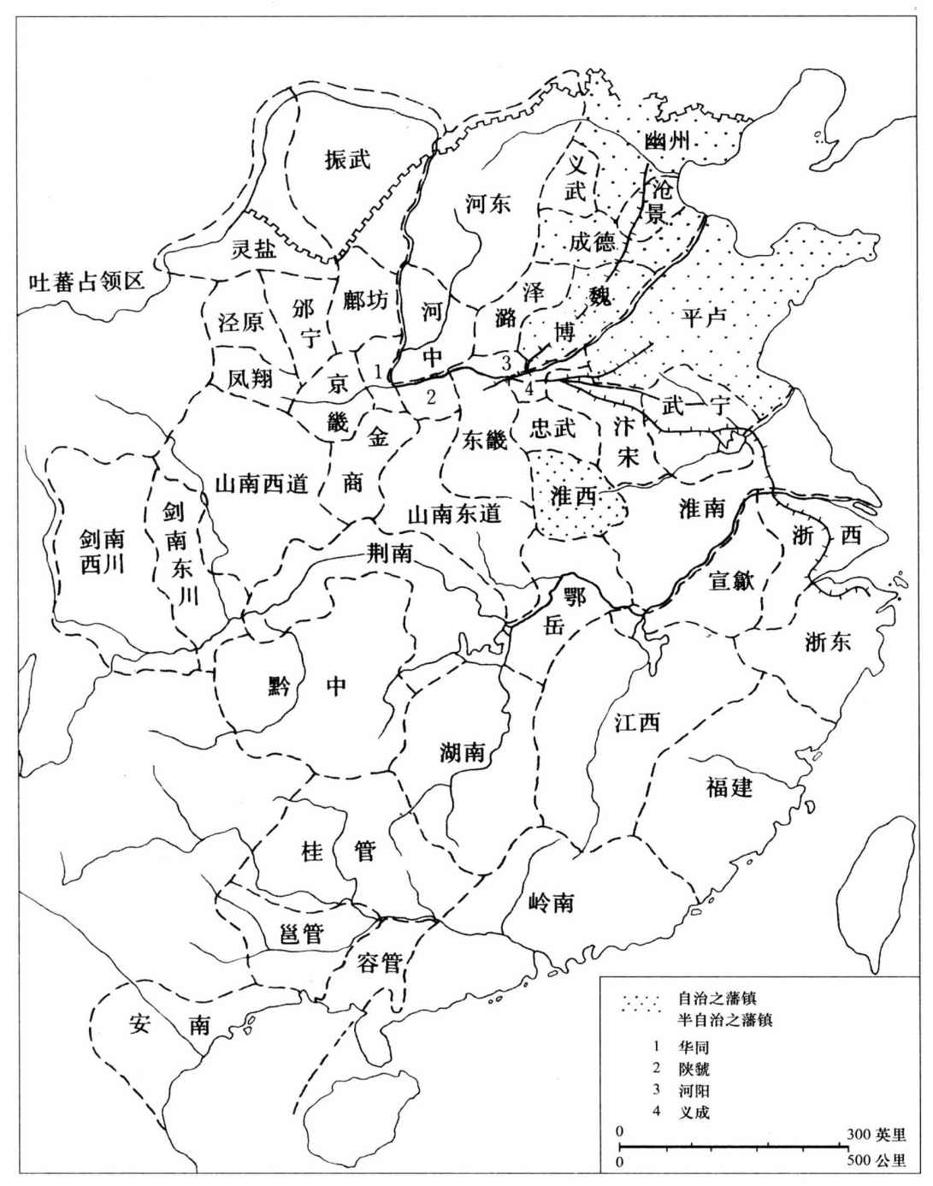
但是，如果說朝廷在對付關中叛亂者時靠自己站住了腳，它在河北這時發生的決定性的、并對整個一系列叛亂的后果證明是決定性的行動中，則只起了次要的作用。的確，朝廷提出了完全不咎既往和承認政治現狀的條件，給那些只懷有有限目標的叛亂領袖一個選擇。但更重要的是，叛亂領袖們認識到，他們固然擔心皇帝對他們行使完全的主權，但也幾乎同樣擔心他們的盟友會發展得過于強大。因此，當朱滔在784年初大舉進攻以期穿過洛陽和河南西部與其弟朱泚在京師的軍隊會合時，他發現其以前的盟友不愿合作，不久，他們之間就發生了沖突。最后，在784年陰歷五月，長期和變化無常的東北叛亂以反叛的成德軍和忠于王朝的昭義節度使的軍隊聯合在貝州大敗朱滔而告終，迫使朱退居其北方的根據地，從而結束了這一區域的戰斗。王武俊、田緒（殺害田悅的刺客、魏博的新節度使）和李納此時已與朝廷和解，不出幾個月，朱滔也采取同樣的行動。所有投誠的叛亂者都獲準在他們的藩鎮掌握兵權，并且取得了崇高的封號。不久，朱泚戰敗和被殺，這樣朝廷得以在784年陰歷七月返回京師；李懷光依然叛亂，不過他在785年陰歷八月遇刺前在河中沒有活動。

政府的日子此時好過得多了，雖然困難仍在以后持續了一段時期。李希烈仍舊叛亂，此時已自稱為新的“大楚”朝的開國之君。他在784年繼續控制河南中部和占有極為重要的汴渠邊上的一個要沖，然而在這一年夏天，韓滉帶領的一支英勇的部隊成功地使一支運送緊缺物資的大船隊通過該地。只是到了784年后期，局勢才開始變得不利于他，因為北方沖突的解決使政府能夠把更多的人員物資轉到南方戰線。不過在785年全年，李希烈仍繼續頑強作戰，絲毫不顧朝廷提出愿意對他寬恕的表示。直到786年陰歷四月他遇刺時，他的淮西的部將才向朝廷投降。于是這一陣藩鎮之亂的浪潮終于平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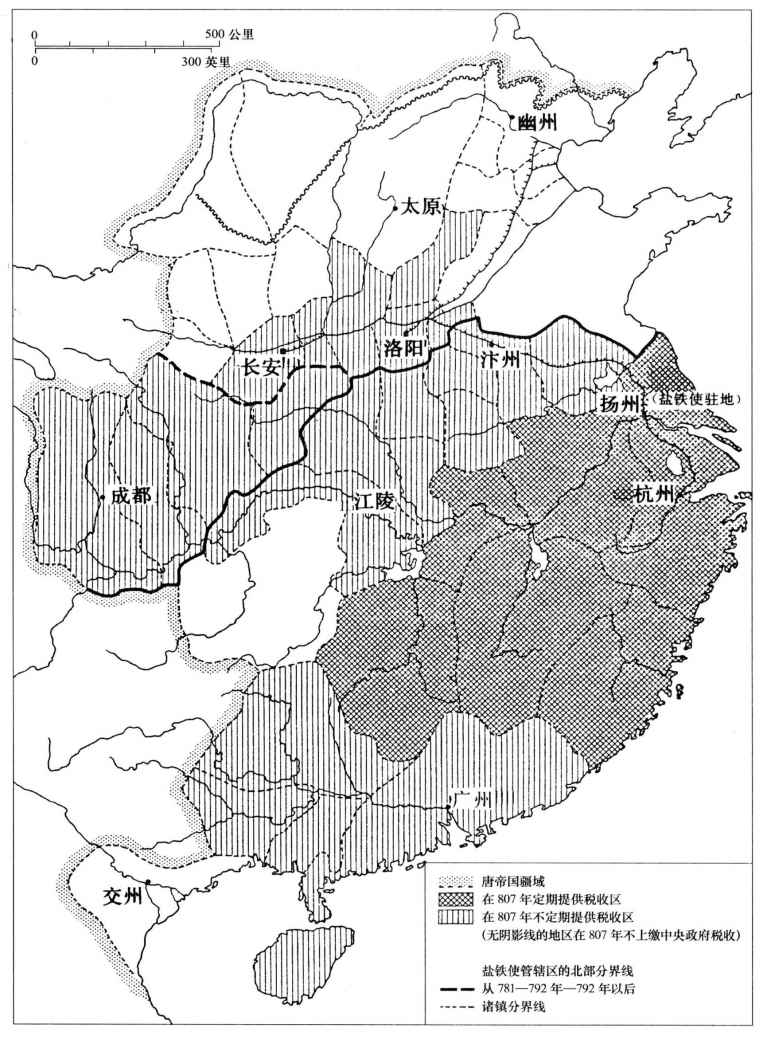
### 叛亂的后果

朝廷企圖重新樹立中央控制的最后結果到底怎樣？德宗顯然完全沒有完成他的主要目標。他不但沒有使搞自治的藩鎮重新置于堅強的中央控制之下，而且還不得不同意正式批準它們自治來解決問題。不過也有些收獲：襄陽作為一個自治地區已不復存在；河北因新設了兩個新劃分的藩鎮，其政治地理已大有變化。它們是義武（由易州和定州組成）和橫海（大而富饒的滄州），二者實際上與其他藩鎮一樣享有自治權，但由于幅員屬于中等，所以不得不與朝廷保持密切的關系，而朝廷也能在這一區域把它們用于有用的戰術目的。東北的幾個大藩鎮依然咄咄逼人，雖然特別是成德發生了相當大的地理變化（見地圖15）。盡管李希烈已死，淮西仍不受中央管制，它的領袖人物的獨立性不亞于以前的李希烈。

用武力推行中央控制的失敗對全國受朝廷控制的其他藩鎮的影響是很大的。中央政府國庫空虛，威信掃地，不得不重新實行保守政策，即與關鍵的地方勢力和地方利益集團盡量減少摩擦。德宗的政府就這樣接受了一些重大的妥協，如讓節度使們在一個職位上保持很長的任期（有時是為了避免某節度使在死前發生接任者人選的沖突），授予形形色色的篡權者和兵變者正式的職位，甚至試探地方的駐軍能否接受地方職務的可能人選。控制地方的問題（特別是對有強大軍隊的藩鎮的控制問題）不但繼續存在，而且由于朝廷無力或不愿采取有力的糾正行動的跡象日趨明顯，這些問題更是層出不窮。[[49]](#_49_Wang_Shou_Nan____Tang_Dai_Fa)國家的財政也遭受不利的影響。兩稅法仍在實行，但弊端百出。這部分地是由于從叛亂結束之后開始的長期通貨緊缺。但德宗本人鼓勵地方送上直接入他私囊的法定以外的貢禮（這無疑有損于應歸國庫的正規的稅收份額），從而助長了地方官員日益嚴重的財政自治和不法行為。況且，兩稅法的基本弱點暴露出來了，政府簡直不能推行改革制度的一切規定，例如，不能禁止開征特殊的或“附加的”捐稅。正如807年極有價值的《元和國計簿》所證實的那樣，中央只能保持對長江流域八個藩鎮的有效的財政控制（雖然其他地方肯定也以某種形式上繳歲入），而且從德宗統治的第一年起，在冊的總的納稅戶數至少減少了三成。[[50]](#_50_Jian___Ce_Fu_Yuan_Gui____Jua)



地圖15 唐之地方建置（785年）



地圖16 唐帝國的財政劃分（810年）

于是，總的來說，781—786年的一次次叛亂更加深了安祿山之亂造成的后果。唐皇室在這樣一個國家保持皇位：它在許多方面實際上維持著統一，從各方面看又只是在形式上維持統一，它的不受挑戰的政治中心依然在西北的長安。第二，由于大部分藩鎮的歲入基本上或全部由地方當局自行處理，中央政府唯一可靠的財源是長江諸鎮。因此，運河體系的突出的重要性和保護它的必要性得到了確認。這一時期在運河兩側已建立的河陽、忠武和武寧（見地圖15）從此被有意識地保存下來保衛運河，在以后的年代里它們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三，帝國的東北角依然不受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各鎮抱成一團，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實際上的獨立地位日益被接受。但是，據此看來，恰恰在與以往形勢的延續性方面，這一世紀第二個25年的大叛亂與第三個25年的大叛亂是不同的。安祿山之亂引起了朝一個新時期發展的全面變化，而781—786年的幾次叛亂雖然與前者相比都是軍事事件，但引起的是程度的變化而不是性質的變化。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到781年，雖然皇室權力歷經滄桑被弄得十分衰竭，但成為帝國特點的一種松散結構卻使它能夠經受得住戰爭和暴亂的猛烈沖擊而不致產生根本的變化。這種松散結構的基本特征是，諸鎮的大部分主要受益者無意于爭奪皇位，而是滿足于控制各自的地盤。這樣的選擇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這一次次叛亂進一步削弱了中央的控制和鞏固了地方的權力，其后果是嚴重的，但不是不可挽回的（雖然當時許多人有充分理由認為已經不可逆轉了）。事實上，它們的主要意義在于使中央企圖重新控制諸藩鎮的努力倒退了約30年。

### 德宗之治的晚年

德宗又統治了20年，但唐王朝一直沒有從最初的失敗中真正恢復過來。他對藩鎮的茍安政策的名聲在傳統歷史學家的心目中是很不好的，他們假定他應有其他的選擇，因而譴責他的政策為“姑息之政”。不管他是否過于謹慎，從這時起藩鎮和軍隊造成的一次次動亂的確突出地顯示了中央政府處于持續不斷的衰落之中。他在位的25年中，朝廷在恢復對高級地方官職的任命的控制和讓更多的官僚代替職業軍人擔任這些職務等方面，仍取得了穩步的進展。到804年，有一半節度使是官僚而不是軍人。[[51]](#_51_Can_Jian_Ci_Chu_Suo_Lie_De_C)此外，即使785年德宗對藩鎮的政策顯得軟弱，他也不是一個軟弱的膽怯的君主；因為從786年起，德宗采用了另一種行使君權的觀念，即把注意力集中在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國家權力和資源的部分。這樣，他的主要目的是加強與君權有最直接關系的基礎——它的心腹要地、保衛要地的軍隊和朝廷財政——以及加強他的個人控制。由于首都的安全直接取決于西北邊境的安危，所以他花費了大量經費和力量去擴大和維持那里的軍隊，這是帝國中由中央供養的唯一的對外軍隊。西北防線的這種改進與神策軍的強化有關，德宗把這支軍隊視為防止他再遭783年所受創傷的最可靠的手段。當這些軍隊擴大時，其中有幾支被派駐在邊境（這意味著朝廷的權力達到了直接負責對外防務的程度）。還難以確定駐扎在京師周圍的神策軍的規模。到德宗朝末年，在邊境和在京師附近的神策軍總數似乎已達到20萬人。[[52]](#_52_Tang_Chang_Ru____Tang_Shu_Bi)部分地由于這些措施，這一關鍵的邊境地區一直安全無事，到他統治之末，皇帝已能立刻調遣一支強大的和訓練有素的軍隊。

德宗在尋求財政收入方面似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就。有些對他有點苛求的史料把他描繪成一個愛財貪婪的統治者。他顯然決心永遠再不讓自己陷于經費拮據的困境，所以絕不計較取得經費的方式。但他這方面的成就卻有損于財政機構長期和正常的運轉。前面已經提到，他鼓勵向他進“貢”，這本質上是地方節度使們向皇帝納賄的一種手段。他對正在實行的兩稅法的缺點和弊病也沒有表現出什么糾正的意向，而陸贄對這些問題在794年的六點奏議中已作了有力的揭露。[[53]](#_53_Cui_Rui_De____Huang_Di_De_Gu)其中最嚴重的弊病是在通貨嚴重緊缺的情況下繼續以舊稅率繳納現金——這一情況使中央或地方征稅當局大受其益，而納稅者則深受其害。

德宗還全神貫注于日常的朝政，不愿放權，對官僚集團也不信任。他使自己囿于小天地中，決心要當一個無可爭辯的君主。他日益轉而使用宦官去執行重要的任務，因為他們除了向皇帝請示外沒有地位。在他在位時期，宦官取得了京師神策軍的指揮權，并越來越得力地被派往地方政府中充當皇帝的代表——監軍使。從783年以后，宦官對京師軍隊的控制幾乎成了定制，而且是他們在中央政府作為支配勢力崛起的主要因素，關于這個問題在本書其他章節另有論述。相反，這里主要關心的是監軍使的制度。[[54]](#_54_Zhu_Yao_Jian_Shi_Ye_Zhu_Shui)

使用宦官在軍隊指揮機構作為觀察者的措施在安祿山之亂以前就開始了，但這類任命在當時純粹是為了某一特定目的，而且是專門針對邊防軍的。隨著以后事態的發展，這一官職成了叛亂的產物，因為宦官可以為皇帝提供（或似乎可以提供）與軍方聯系的最可靠的聯絡員，不但在叛亂時期，而且在隨之而來的動亂時期都是如此。在代宗時期，宦官監軍使按常例依附于地方的和邊防的軍事結構。按照代宗對藩鎮采取的相對消極的政策，他們似乎不積極地干預地方事務，但主要是給皇帝提供情報，其途徑既獨立又不同于正式的官僚渠道。即使這樣行使職權，他們的存在一定對地方官員的行為也有所約束，因為他們呈上的情報肯定會影響朝廷對各個藩鎮的政策，從而影響以后對它們官員的任命。此外，身處君側的地位本身就是權力的源泉，監軍使作用的擴大和他們與供職所在地的節度使的沖突的潛在可能顯然都是存在的。

德宗在即位時非常相信這一措施的效用；雖然官僚們不斷警告他把如此重大的責任交給宦官會產生有害的后果，但他在統治時期仍授予他們越來越大的權限。鑒于他在正面打擊藩鎮權力時遭到幾乎致命的挫折，這一舉動是不足為奇的。他擴大監軍使的活動范圍而不僅僅讓他們充當觀察員，還使他們成為皇帝和藩鎮之間在一切政務方面、甚至在某些行政活動方面的關鍵的聯絡代表。更重要的是他們在任命新節度使時所起的作用，因為在考慮了監軍使關于地方情況的報告后，以及常常在他們與地方駐軍直接協商后，皇帝才能作出人選的決定。這就明顯地為營私舞弊創造了條件，監軍使受賄和受威嚇之事屢見不鮮；但這類事件可能不像史料使我們相信的那樣普遍，因為這些史料對宦官懷有強烈的偏見。某一節度使死后，監軍使還被指定臨時負責這個藩鎮；他們還奉命與那些不聽命的節度使進行談判，還在非常時期進行救濟工作。在例行的行政工作方而，他們對人事的安排有很大的影響，而且他們似乎承擔了特定的后勤供應的責任。通過皇帝授予或者默認，監軍使們雖然擁有如此大權，卻仍不厭其煩地承擔其他任務，其中甚至包括指揮作戰。對于這種干預時有措辭激烈的怨言。例如，在798—799年朝廷企圖鎮壓淮西叛亂的那次不幸的行動中，戰略的決定一般由幾支參戰勤王軍的監軍使在會議上作出，然后才傳給名義上的統帥。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如此積極地進行干預，如果戰敗，他們發現自己無一例外地成了替罪羊。

但是，德宗最不愿意聽取關于這一制度的任何批評。他不但繼續使用大批監軍使，而且還指派他們到更小的軍事單位，從而增加了他們的人數。795年，他給監軍使頒發正式的官印，使這個職位具有正規的地位。尤其是當節度使與監軍使發生沖突時，他一有可能就支持后者。800年義成發生的戲劇性對抗就是這類沖突能達到什么程度的一例。隨著節度使姚南仲和監軍使薛盈珍之間的沖突不斷加劇，攜帶各自報告的對立雙方的使者競相爭先向京師策馬奔馳，結果薛盈珍的使者被節度使之人所殺，此人隨即寫了一份抗議奏疏后就自殺了。雖然朝廷敵視薛盈珍，皇帝也只是把他召回朝中給予一個職務，拒絕再采取其他行動。

在與各藩鎮和節度使個別打交道時，以及由于這一制度能使他親自掌握與節度使的關系，德宗無疑喜歡這一制度帶給他的靈活性。但監軍使的效力是與君主的威望成正比的，而如上所述，在德宗朝的整個后期，他的威望正江河日下。此外，監軍使對那些不受朝廷控制的藩鎮幾乎是無能為力的。

德宗以這些方式表現了他幾乎是唯一的關心，這就是要加強皇帝的直接權力。他的行為也許只反映了他有限度的雄心，或者也許他真想干一番事業，以便打下基礎，讓他的繼承人全面恢復中央的權威。事實上，后來由于淮西的挑釁而迫使他在798年對一個藩鎮發起的唯一的一次攻勢卻以失敗告終，這次軍事行動對未來的皇帝權力來說是一個不祥之兆。此外，他立其殘廢兒子——未來的順宗——為太子實屬愚蠢之舉。可是，當恢復中央權力的奠基人憲宗在805年登上皇位時，憲宗的的確確發現，他采取強有力的政策所需要的制度手段以及財政、軍事資源基本上已經具備，這應歸功于德宗不事聲張和堅持不懈的努力。

## 9世紀之初的藩鎮

到9世紀初，新的藩鎮已經存在了約40年，并且已成為唐代地理上的長期特征，雖然個別藩鎮的地盤發生了變化。[[55]](#_55_Ta_Men_Tong_Chang__Dan_Bu_Sh)李吉甫在寫于814年的《元和郡縣圖志》中認為它們是活生生的事實，也是他編排材料的主要行政單位。在這一時期它們已發展了自己的制度結構和行政方式，所以我們必須對它們作出比較充分的闡述。這種闡述將集中在長江以北的藩鎮，因為我們可以在那里發現新制度的最發達的形式。在南方，藩鎮的行政機構力量較弱，更聽命于朝廷。

軍隊依然是藩鎮的核心。[[56]](#_56_Guan_Yu_Jun_Shi_Jie_Gou_Zui)由于它對藩鎮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所以通常占用了當地歲入的大部分。它的存在不但是任命該地區節度使的首要理由，而且在節度使與轄地內外的關系中給他提供了直接和具體的支持。軍隊的主要集結地在鎮治之州，駐防部隊稱牙軍。牙軍能夠鎮壓境內的任何反對力量，一般地說是藩鎮唯一具有強大打擊力量的軍隊。它的核心是親衛軍精英集團，負責節度使的安全，同時無疑地也是被用作保衛節度使駐節之地的總的安全力量。在更好戰和獨立的節度使麾下，這種軍隊通常稱牙內軍，常常由以下幾種有特殊地位的士兵組成：從節度使私囊出資維持的“私人”士兵；名義上的養子；為節度使效勞并隨他從一地調到另一地的“侍從”。由于精英侍衛都是節度使的貼身保鏢，他們在地方的政治中常起關鍵性的作用，同時我們可以發現他們的將領篡權的事件（未遂的和成功的）不乏其例。藩鎮的其余軍隊則駐守在州縣的治地和其他戰略要地。[[57]](#_57_Guan_Yu_Zhe_Fang_Mian_Zui_Ch)它們被恰當地稱為“外鎮”。它們的部署取決于不同的情況：本鎮的地方防務（特別在自治的和邊境的藩鎮）；境內的安全；對資源和收入的控制（如對商業中心和鹽池）。這些外鎮軍的規模差別很大，從數百人至數千人，但這種大編制的軍隊是很少有的。

上述這些部隊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話）是正規軍，他們的全部生涯都在行伍中度過。但有充分材料說明，地方的民兵（團練）也在藩鎮軍隊中被廣泛使用，所占比率可能比我們想像的要大得多。使用團練有明顯的優點：費用低；雖然他們不經常武裝，但在境內能很快地被動員起來。雖然他們沒有受過在境外作戰的充分訓練，但在保衛其家鄉時可以指望他們英勇戰斗。事實上從這一時期藩鎮軍的戰斗記錄來看，團練所占的比率似乎是很大的；這些軍隊在境外作戰的無能是有名的，但在守衛自己的領土時卻打得很頑強。

軍隊對藩鎮的長期發展在兩個方面有重要影響。第一，軍隊部分地使藩鎮的行政越來越表現出地方色彩。如前所述，一旦軍隊駐扎在特定的地區，其兵將的利害關系必然會與所在地區混為一體，而且越到后來越強化。最后，他們基本上代表了當地的利益，這一事實往往使他們與外面派來的節度使發生不和。第二，這個方面部分地減輕了第一個方面的影響。在大部分藩鎮，軍人成了世襲的職業，這倒不是因為它能使軍人取得很高的地位，而是他們有希望取得豐厚的物質報酬。軍隊可以要求高報酬和高待遇，他們也往往是這樣要求的。因此到后來，軍人，主要是牙軍，成了一種新的低級特權精英。這當然使他們極力反對任何現狀的改變，不管他們忠于皇帝還是忠于節度使，情況都是一樣（在9世紀，魏博軍和武寧軍在這方面更是臭名昭著）。此外，他們的要求必須由當地的納稅者來滿足，所以他們把自己作為一個特殊利益集團而置身于人民之外。從這些情況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為什么有的節度使專門擴充親兵隊伍，并且在調任時把他們隨身帶走。

我們可以回憶一下，前面提到了州的制度原樣未動，而在它上面加上了藩鎮這一組織，由于州至少在理論上從未被明確地規定應附屬于藩鎮，結果就有出現兩種平行機構的危險，而且也的確多次出現了這種危險。根據律令，這兩種機構幾乎獨立行使職權。在這種情況下，節度使限于在一個地區內維持治安，對刺史和縣令只行使監督的職能，刺史和縣令則繼續履行他們既定的地方職權。但實際上，由于節度使除了擁有兵權外，通常享有名義上的高官階、威望大，與朝廷關系密切的優越條件，所以一般能把自己的決定強加給刺史。此外，由于他還負責朝廷和州縣之間的通訊聯絡工作，他在下達朝廷的指令時使他能借此夾雜自己的命令。他有權考核自己治下官員的政績，這顯然又助長了這些官員個人聽命于他。最后，州支持藩鎮的機構和軍隊的義務使它在財政上依附于藩鎮。由于藩鎮一般負責接受和處理地方歲入中本鎮和中央政府的收入部分，州的財政依附關系幾乎是完全徹底的。

對自己的行政人員（使府）和軍官，節度使實際上擁有任命全權。這意味著這類人員取得官職的途徑不同于和獨立于中央吏部任用的人員。各鎮和吏部吸收人員的來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重疊的。但是，吏部重視出身，有相當明確的界限，即靠貴族門第、蔭庇、科舉中式或從胥吏工作提升而取得當官資格，而在各鎮任職的人員來源的界限則遠為不清和多樣化。這類人包括未中舉或者雖中舉但未得到職事官的文人（韓愈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轉搞行政專業的軍人和社會出身低賤但有一定程度的文才足以勝任一般行政工作的人。事實上，在這些藩鎮當局下的晉升在王朝后半期成為社會人才流動的最重要的途徑，因為這時許多以前沒有當官機會的人能取得官員的地位而升入各級行政機構之中。這樣，在地方上，州縣組織和藩鎮的行政組織這兩類平行機構不但在它們基本的政治和行政歸屬方面，而且在總的社會成分方面都有明顯的不同。當然，如果節度使在州縣職位上安插了自己任命的人，這種不同就趨于消失。根據中央政府的觀點，那些通過藩鎮非正式任用而進入仕途的人不全是正式官員，按理說依然是屬于“流外”官。結果，它對他們的提升和任期作了種種限制，并試圖在他們和有正式資格的官員之間保持一條嚴格的界線。實際上除了武官外，他們中沒有人獲準在中央政府任職。可是正如中央政府中的正式官員白居易指出的那樣，與正式的地方官員相比，在藩鎮機構中任職的官員人數更多，待遇更高，由此可以想像地方當局掌握的財政資源有多少了。[[58]](#_58_Chen_Yin_Ke____Cong_Tang_Shi)

因此，在朝廷基本控制的藩鎮中，節度使享有對自己藩鎮的指揮系統的直接權威，并能對其所屬的州縣官員施加強烈的影響。在本文討論的時期內，大部分節度使能比較自由地行動，特別是那些多年在一個職位上留任的人更是如此。不過其中的大部分人根據他們的意愿，或是在自己的地盤中鞏固和擴大個人權勢，如劍南西川的韋皋，或是大發其財，如曾在幾個鎮任職而變成巨富的王鍔。從這些例子或其他例子可以看出，這不一定在節度使和朝廷之間造成對抗的關系。

但如前面所述，一個官員一旦在一個相當大的、或是富饒的、或是地處戰略要沖的藩鎮牢固地樹立了領導的地位，他的行為就變得比較反復無常了。甚至在正常的情況下，由于藩鎮和州的職權范圍沒有被適當地劃分，中央和鎮當局一直明爭暗奪地力圖對州進行控制，這樣，中央和藩鎮之間就存在著一種明顯的緊張關系。直到9世紀初期，除了德宗登基的最初幾年，緊張關系的加劇主要是藩鎮當局的行動所造成。但從805—820年，由于中央采取了重新集權的新的有力行動，它加劇了這種緊張關系。

在自治的鎮，問題的表現形式完全不同，因為在這些地方權力的體系已經合而為一。與藩鎮的武官和幕僚一樣，刺史和縣令都是由節度使任命的，他們取得負責的職位正是因為他們是他的堅定的追隨者。可以這么說，在這些藩鎮，朝廷不能通過他們的刺史插手藩鎮的內部事務，因此只能通過節度使及其官署。但是如果節度使在這些鎮內的控制更加臻于完善，那么控制問題又比其他獨立程度較小的藩鎮要嚴重得多。權力赤裸裸地以武力為基礎，節度使單獨地負責，由他有效地任用人員。由于他將自己的地盤置于朝廷的控制之外，如果他的政體失敗，就不能指望得到朝廷的支持。他們所受的懲處或是遇刺，或是被驅趕下臺。結果這些藩鎮的節度使采用了一種精心設想的控制體系，812年李絳給皇帝的一份奏議對此部分地作了闡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己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眾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為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持此以為長策。”[[59]](#_5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此外，這些節度使還采用人質制以防止變節或叛亂，同時深深地依靠家屬，因為可以放心地讓他們擔任關鍵的職務。提升的諾言和賞賜的不時頒發也能積極地鼓勵忠誠。這類行動也能在朝廷控制的藩鎮中見到。但它們與朝廷的關系是，節度使嚴格地要向朝廷述職，而在困難時也保證能得到朝廷的支持，所以在朝廷控制的藩鎮中，這種關系與其他的藩鎮有本質的不同。

在財政方面，兩類藩鎮之間也有明顯的區別。這種區別與其說表現在特定的財源方面（因為歲入基礎不論政治秩序如何變動，基本上保持不變），不如說在它的處理方面。兩類材料都很少，但朝廷控制的藩鎮的財源的處理顯然要復雜得多。自治的藩鎮不論它們是否名義上上報朝廷，它們只是單純地征稅并截留歸己。中央政府從它們那里收到的唯一收入就是“貢”品，如果進貢，也是不定期的，時間和數量都取決于節度使。有些忠于朝廷的藩鎮的情況也基本如此，如劍南西川的韋皋就享有完全的財政自主權，不過這可能是合理的，因為那里亟須防止南詔和吐蕃對四川的入侵。但大部分藩鎮事實上仍然需要向中央當局上報。

藩鎮當局應收的歲入為所轄各州所交的“送使”部分，另外還有鎮所在州的全部收入。如果節度使及其僚屬想超過這些法定的限額，他們必須謹慎從事。一個額外增加歲入的常用辦法是另立戶籍而不向中央政府上報，它們的稅賦專作本鎮的收入。另一種做法為“應避”，也稱“應庇”。地方上的富戶通常將其土地名義上交給有官員地位的可以免稅的個人，另外付以錢財作為他們土地得到免稅的報酬。

征稅權給個人創造了很大的獲益可能性。有些其他權力分屬于藩鎮的各級官員，但這些財權只操在節度使一人手中，因為他是境內最高級的財政官員，只有他有權征稅。他把持的與朝廷聯系的權利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只有他及其心腹助手才能決定哪些課稅已得到中央的認可，哪些則沒有。非法的附加稅（有不同的名稱，如配率、加配、加征）之采用有兩種方法：第一種，在規定征課的基礎上簡單地增加稅率；第二種，不管是否打算作為正式的稅，以巧立的新名目開征。兩稅法的推行旨在結束當時存在的這些名目繁多的特殊課稅，但中央權力的衰落使這一希望變成了泡影。

藩鎮的官員還利用8世紀后期和9世紀商業發展的機會自行在境內設關卡稅，它與19世紀推行的厘金稅很相似。地處交通要道的藩鎮則機會更多。例如，宣武和武寧肆無忌憚地利用它們位于汴渠的地位。長期任宣武節度使的韓弘到819年退隱時積聚的財富達數百萬（以錢、絲帛、糧食和珍貴物品計）。[[60]](#_60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56_D)藩鎮當局還明目張膽地自己經營商業，盡管這類活動有明文禁止。最后節度使及其下屬有時干脆從百姓那里攫取錢財，雖然一般都有具體的借口。文獻記載中最明顯的例子是9世紀初年劍南東川的節度使嚴礪的事例。嚴礪以約88戶的家屬成員與叛亂者勾結為理由，查抄了122起地產和住房（內有各種財產），而完全無視皇帝已對所有這類個人的寬恕。[[61]](#_61_Bi_De_Sen____Yuan_Zhen_Zai_S)但這種行徑不能反復使用，所以很可能只是罕見的。

最難從文獻中了解的藩鎮的行政特征是藩鎮當局與當地人民的確切的關系，以及在它們的轄區得到多少人民的支持。新的藩鎮機構和人員無疑會被授受為正常的行政秩序的組成部分。前面我們已經指出，在軍隊方面，大部分行政的和軍事的中、低級分支機構一定由本地人充任員工，與地方利益有密切關系。但這種情況——再加上其他因素——是否會產生地區情緒煽動起來的要求割據一方的壓力？我們對此只能推測。我們從廷議的政策中的確知道，自治藩鎮的民眾緊跟當地領袖的情況曾被認真地考慮過。[[62]](#_62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盡管上層有斗爭，但由于藩鎮領導集團的組成有高度的延續性，這種情況助長了牢固的地方紐帶的發展。自治藩鎮的節度使對朝廷不負有任何物質義務，這可能使他們能夠比其他忠于王朝的藩鎮對一般的納稅人采取更加有利的稅收政策。

這種民間的支持在一個藩鎮內需經過一段時期才能發展起來，所以不能解釋為自治政體出現的首要原因。類似的可能性在帝國的許多其他地方也存在，那里也有許多產生高度割據的辦法，但實際上出現的自治程度則沒有那么高。事實上：割據稱雄的局面之所以沒有普遍出現，在很大程度上一定是由于全國的精英繼續把自己與他們所知道的既存體制——唐皇室主持的朝廷——視為一體。這種一致性不但是物質上的，而且也是文化和道德上的。對王朝的這種依附性也可能普遍存在于平民的情緒之中，其程度比人們所了解的更為強烈。

## 憲宗（805—820年在位）與藩鎮問題

從安祿山之亂以后到憲宗在805年登基的年代中，藩鎮的結構沒有發生基本的變化，盡管其間發生了幾件大事。同樣，由于憲宗的改革，經過變動過的藩鎮結構幾乎原封不動地維持到9世紀第三個25年唐朝崩潰時為止。于是，他的統治在755年以后中央和藩鎮之間的關系方面突出地成了第二個形成時期。[[63]](#_63_Ben_Jie_Qu_Cai_Yu_C_A_Bi_De)

在身患重病的順宗退位后不久，他的兒子憲宗于805年5月登基。事實證明，憲宗是一位重實干的堅強的君主，他抓住時機采取了干預的政策。但在一開始情況似乎并不顯得對他有利。在順宗時期出現的不和以后，朝廷尚需恢復和諧關系，而地方政府廣泛的行動回旋余地已成為全帝國被人接受的準則。憲宗對迅速恢復中央權力的可能性不抱幻想，所以行動很謹慎，只是設法見機行事，而不是強制推行自己做主的全面計劃。

可是憲宗頑強地堅持他的基本目標，即恢復對搞自治的藩鎮的控制，并要使所有藩鎮當局完全聽命于中央的指令。他幾乎不可能希望深入進行下去：對各藩鎮高級當局的需要，排除了恢復安祿山之亂前那種中央集權的可能，而且它們的軍事編制既龐大，又根深蒂固，以致不容許作任何重大的軍事復員。憲宗的又一個特點是，他沒有從純軍事角度去看待藩鎮的問題。他認識到，要削弱諸鎮獨立行動的能力，同樣需要作出制度的改變。的確，他的改革旨在增強中央的權力而不是改善人民的生活。但直到9世紀的最后25年，除了河北幾部分外，這些制度改革使中央政府得以在全帝國重新樹立決定性的制度，從而進入了一個相對和平的時期。

新帝一登基就發現自己在關鍵的劍南（四川）邊區面臨著重大的政治危機，因為那里正遇到強大的吐蕃王國和南詔王國的威脅。自安祿山之亂后這一區域已一分為二，較強大的劍南西川此時已經發展了相對獨立的傳統。叛亂后的15年中，崔寧一直任節度使，此人在一次與朝廷支持的對手進行的內戰中篡奪了權力，但他以后基本上保持對唐朝的忠誠。自8世紀80年代初期的內戰以后，朝廷在784年任命一個可靠的官僚韋皋為節度使，他出色地在境內保持了控制，同時抗擊了外來的進攻。但是，由于他終身留任此職，他具有無可比擬的機會使自己所治的藩鎮成為一個高度自治的地區，以致與東北諸節度使毫無二致。主要的區別是他一直堅定地忠于皇帝，并貢獻巨額財富以表示他的忠心（即使是作為貢禮而不是作為正式的稅收而貢獻）。

在任21年后，韋皋在805年夏死去，他的部將劉辟奪得了對該鎮的控制權，然后立即開始向朝廷施加壓力，要求正式批準他為節度使。皇帝最初采取強硬的姿態，但當看到劉辟準備動武時就改變了態度。但宰相杜黃裳呼吁要堅定，勸憲宗不能再妥協，他說：“德宗自艱難之后，事多姑息。貞元中，每帥守物故，必先命中使偵伺其軍動息，其副貳大將中有物望者，必厚賂近臣以求見用，帝必隨其稱美而命之，以是因循，方鎮罕有特命帥守者。陛下宜熟思貞元故事，稍以法度整肅諸侯，則天下何憂不治！”[[64]](#_64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47_D)直到次年（806年）春，對劉辟的討伐才得以進行。但那時，劉辟雖然因占領了鄰近的劍南東川而在開始時取得一定的優勢，但戰斗繼續進行。到秋季，劉辟被擊潰。這是25年中中央軍隊在地方第一次取得的重大勝利。這一次討伐的特點是，藩鎮本身未負叛亂之責。除了其領土稍有縮小外，官方對該地區沒有進行制裁（雖然劍南東西兩川被它們的新節度使殘暴地掠奪一通）。

在這一年的早些時候，憲宗已迅速地處理了西北夏綏軍的一個篡權者，所以憲宗的新政體這時已經歷了它的第一次軍事考驗，地位大有改善。可是當東北的第一個節度使要求正式批準他的地位時，它仍不得不進行妥協。806年，平盧節度使死去，其異母兄弟李師道控制了該地區，并要求朝廷授予相應的委任狀以取得正式的任命。憲宗很不愿意照辦，甚至在西南仍在進行戰斗時考慮開辟第二戰線。但主張謹慎行事的意見占了上風，從而促使朝廷同意妥協；作為交換條件，李師道同意朝廷對其下屬的任命，遵守朝廷的指令，并定期上繳稅額。沒有跡象表明他后來實現了這樣的任何諾言；但憲宗至少奠定了對自治藩鎮節度使采取強硬路線的基礎，并且樹立了通過談判而不是全盤接受他們提出的要求的先例。雖然他最初的一些步驟幾乎沒有改變政治局勢，但它們確實改變了中央—地方關系的整個氣氛。那些以前越來越藐視皇帝和朝廷的節度使們，此時更認識到他們的義務，并開始定期來朝觀了。

其中有一人拒絕照辦，他就是799年以來任浙西觀察使的皇室遠親李錡。李錡不但是一個富饒而重要的藩鎮的領袖，而且到805年為止，他還兼任鹽鐵使，這一職務能使他取得大量額外收入，而他也毫不猶豫地把收入用于私人目的。但他的軍事抱負甚至可能更使憲宗的朝廷不安。他從順宗得到節度使和觀察使的任命，并且已經大力擴充地方軍隊，其數量大大超過一般治安的需要。在中國最重要的提供歲入的地區，這種情況簡直是不能容忍的。鑒于他過去在財政上明目張膽的不法行為，他擔心自己的安全，所以拒絕應召上朝。最后，在807年后期，皇帝下令強制將他撤職。鄰近諸鎮的軍隊幾乎剛處于動員階段，李錡自己的將領就翻臉把他殺死，從而結束了這場危機。浙西沒有可據以防御的邊境，所以那里的孤立的叛亂者的軍事前景從一開始就不美妙，從這一意義說，其結果并不算是皇帝的偉大軍事勝利。但它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勝利，證明他具有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以迫使不聽命的藩鎮就范的決心。

可是，要想真正恢復中央的權力，這類零碎的政治勝利卻不能觸動地方割據的根源。為了打擊這些根源，制度的變化是不可缺少的。宰相裴垍提出并在809年頒布的重要的財政新立法的基本目的之一就是基于這種必要性。另一個目的是必須限制嚴重的通貨緊缺現象，它自8世紀80年代中葉以來一直在折磨著國家，此時已預示將有一場重大的社會危機。雖然中央政府主要關心通貨緊缺對納稅農民的影響，但它也對藩鎮當局利用通貨緊缺謀利之事很敏感。780年兩稅法改革過早地用現錢計稅，而貨幣的供應又一直不足，結果用現錢計算的稅只能用實物支付，但折換率卻由地方規定。通過使用這種擅自作出的折換率，那些不受中央控制的官員乘機大發其財。這是809年措施致力于解決的問題之一。京師規定的折換率從此在全國實行，各地嚴禁擅自增加折換率。此外，為了解決現錢短缺的問題，以實物納稅的百分比提高了。新措施的這一部分主要致力于解決經濟問題，但是，其中也有重要的政治含義，因為此舉剝奪了藩鎮官員非法收入的重要財源。

它在政治上更明顯的意義在于，有一部分立法要求重新分配地方的稅收。前面已談過直到此時已實行的歲入分配辦法。縣一級單位征稅并上解給州以后，稅收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留給所在州使用，另一部分上解給藩鎮當局，第三部分則給中央政府。雖然這一制度是作為供應各級行政機關的需求的辦法而制定的，但如上所述，它造成了嚴重的財政不平衡，并造成了州依附于藩鎮的傾向。809年的措施設法全面改變這種情況。第一，各鎮從此在其治所所在州取得一切必要的收入。只有在收入不足的情況下它們才能向所轄的州另外提取收入。為了彌補收入的減少，鎮所在的州免除對中央政府上繳任何稅收。第二，除了本地必要的開支或藩鎮獲準開征的特殊征收外，所有的州必須將一切歲入解繳中央國庫。這個措施的目的是一清二楚的：旨在削弱藩鎮與其所屬州之間的聯系和在財政上把藩鎮降低到不過是一個有特權的州的地位。實際上，這個措施又把三層制（鎮—州—縣）轉成二層制（鎮/州—縣）。從它改組全國各鎮財政關系和削弱地方割據的財政基礎的企圖看，809年的改革在政治意圖方面可能比755年以后整個唐代歷史中頒發的其他任何財政立法都走得更遠。

可是，如果夸大地認為這一措施已得到直接和廣泛的應用，那也是毫無根據的，特別是從下面談到的以后的軍事對抗中可以看出。顯然，在許多情況下各州繼續直接向藩鎮貢獻；但以后的朝廷的詔令也表明中央政府決心貫徹和保持新政策。另外，對這一措施的確切的影響也意見紛紜：有的人認為其結果是直接的：它使中央的歲入相對說來迅速增加；另一些人則認為它之迅速推行，恰恰是因為在一開始它沒有嚴重地減少藩鎮的歲入，只是從長期看，由于藩鎮的財政獨立性受到新的遏制才受到影響。總之，分歧取決于把著重點放在對中央政府的積極影響方面，還是放在對藩鎮的消極的影響方面。[[65]](#_65_Te_Bie_Jian_Ri_Ye_Kai_San_La)無論如何，可以預料，任何立法如果對大批執行它的官員有潛在的不利影響，那么中央政府只有繼續堅持貫徹和繼續表明它有支持其法令的辦法，這些法令才能有效地變成法律。自安祿山之亂以后，只有憲宗之治才開始做到這一點，在他統治時期的發展有力地說明，改革是有成效的。

同時，憲宗一點也沒有放松他對個別藩鎮重建直接控制權的努力，這個過程不可避免地造成與東北強大的藩鎮的沖突。809年初期成德節度使死去，他的年輕和能干的兒子王承宗要求接任。皇帝發現這正是在這個區域重樹皇權的大好時機，于是拒不批準權力的轉移，這對河北根深蒂固的慣例來說顯然是一個有敵意的反應。此舉又在朝廷觸發了一場持久的爭論，它之所以特別引起興趣，是因為它顯示了京師是如何看待這些藩鎮的。不論在這時還是在以后，憲宗表現了極大的決心，堅決要成為全中國名副其實的皇帝。隨著他初期的成功，他當然充滿了信心，但在他行使權力的決心后面還不止是專制君主的好大喜功，他在這方面的立場得到了朝臣們很大的支持。在他的眼中，帝國，至少作為一個健全的政體，不能無限期地讓這些自治割據勢力繼續存在下去，因為它們威脅著既存體制和成為抵制中央政府的榜樣。同樣重要的是，他相信通過適當的軍事和外交措施，很可能恢復對這些藩鎮的控制。因此，進一步的妥協只能妨礙最終目的。

但也有人對這條擬定的路線提出強烈的反對意見，其中當時的翰林學士李絳的意見似乎最為言之有理。李絳警告說，強有力的歷史因素和地緣政治學因素阻礙了中央想收復成德的任何企圖（言外之意，對東北諸藩鎮也是如此）。首先，自安祿山之亂以后，成德已享受了幾十年的自治，這已把當地民眾與成德的領導集團結合在一起，并使后者取得了實際上的合法性。任何改變這種事態現狀的企圖勢必激起該地的有廣泛基礎的反抗。其次，成德不像劉辟統治下的劍南西川和李錡統治下的浙西，周圍實際上是性質相似的藩鎮，它們之間盡管偶爾有對抗，但利害關系總的說是一致的。這使它們成了朝廷的不可靠的同盟，即使在它們表面上參與對成德的武力行動時也是如此。總之，成德不可能被孤立和擊敗。最后，李絳指出，國家的財政狀況不佳，難以采取這樣的行動，因為當時淮河和長江諸地洪水為災。[[66]](#_66___Quan_Tang_Wen____Juan_646)

皇帝最后的確接受了一項妥協的解決辦法，承認王承宗為成德的領導，但要王承宗同意對朝廷履行正常的行政義務，并放棄他前不久取得的德州和棣州。顯然王承宗是裝模作樣地接受這些條件的，因為他不久立刻用武力保留了這兩個州。這就給皇帝以軍事干涉的機會——他確實也沒有其他的真正選擇了。809年秋末，包括除魏博以外的許多地方的大軍以及神策軍奉命開赴戰場，發起對成德的全面的進攻。按理說，成德應該被摧毀。但從一開始就出現了協調各路兵馬的嚴重問題，各個將領證明都不愿意爭先動用自己的軍隊。另一方面，成德則不存在指揮的問題，它的精銳部隊在為守衛自己的家鄉而戰。最后，中央財政的枯竭成了決定性的因素；在810年年中，憲宗看清了他的軍隊的半心半意的行動，在不到一年后取消了討伐。王承宗仍保留他的兩個州，但同意遵守原來協議中的其他條件，以報答朝廷對他的正式任命。但對憲宗來說，這只是一個保全面子的解決辦法，并沒有導致當時存在的關系的真正改變。

這樣，隨著在東北重新樹立中央權力的又一個企圖的失敗，憲宗遭受了第一次挫折。這次挫折有進一步的影響。在沖突中，朝廷不得不直截了當地同意淮西和幽州的領導的更替，幽州在河北之役中或多或少地是一個積極的同盟。一些最強大的自治的藩鎮除了被迫對成德采取行動外，依然沒有受到任何嚴重的影響。但以后事態的發展表明，政府沒有蒙受不可彌補的損失，它的威信仍很高。例如，張茂昭在19年前已世襲了地方雖小但地處戰略要沖的義武的節度使之職，但他自動放棄了對那里的指揮權，這即是明證。雖然那里在后來偶爾發生動亂，但自治藩鎮就這樣永久地少了一個。

809—810年的沖突在另一方面，即對國家的財政，也有重大的影響。大規模的動員似乎已迅速地耗盡了中央的儲備，因此，特別是鑒于戰地軍隊戰績不佳，繼續征戰已經行不通了。這類軍事行動代價高昂的原因已經變得很清楚：中央政府不能對參戰的各鎮軍隊進行直接的控制；不同的利害關系支配著各鎮領導的行為。在這些情況下，中央政府不得不對為進攻目的動員起來的軍隊采用一種很無效的供應體制，這就使得中央的資源非常緊張。很簡單，這種直接的津貼稱“出界糧”，它按人頭以固定的數額付給這類軍隊。各鎮軍隊一般從它們的領地內取得給養（西北的軍隊除外），但它們的軍隊一旦開拔出境，就有資格取得中央的津貼。從安祿山之亂后，這一制度從一開始就遭到批評，因為它本身實際上是浪費，而且沒有道理。據說，地方將領毫不猶豫地派遣其軍隊至自己所轄的境外，然后以種種借口按兵不動。由于他們已取得財政支持的資格，就感到努力戰斗不一定符合他們的利益。但也沒有取代這種資助方式的好辦法。809—810年在與成德的沖突中，憲宗為一場國內的大討伐付出了高得難以忍受的代價，而在戰場上的所得甚至遠遠抵不上支出。他不但被迫中斷了討伐，而且實施809年財政改革的企圖也受到了不利的影響。此外，朝廷要經過幾年才能把枯竭的國庫恢復到再想進行重大軍事行動的程度。的確，810—814年這四年是他整個統治的最長的安定時期。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一個關鍵的藩鎮內部的不和，使憲宗開始取得分裂河北集團的機會。812年年中魏博節度使的死亡留下的接任者只是一個兒童，他的助手和隨從立刻與大部分守軍離心離德。當時朝廷只要故意拖延對接任者的承認，給他造成一種前途未卜的形勢，就能引起一場廢黜他的兵變。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藩鎮雖然在內部施政方面享有充分的自治，它們仍迫切需要得到承認并與朝廷建立正式關系。領導集團未能得到承認的情況被認為是不正常的，因此常常產生嚴重的后果。魏博的嘩變者立刻擁立一個得眾望的將領田興（田弘正）為節度使；田興非常清楚局勢的不穩定，于是與朝廷進行談判。駐軍同意他與朝廷的關系正常化，于是田興提出讓魏博真正聽命于中央政府，條件是取得正式的承認。對田興的提議的誠意，朝廷相當懷疑，但由于憲宗已經拒絕了進行武裝干預的建議，他最后決定接受田興的建議。魏博的局勢很快恢復正常，對朝廷來說特別重要的一個聯盟從而開始出現了。

魏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納入帝國正式的財政體系之中，仍然值得懷疑。在以后的10年中，它的確一直緊跟中央的政策，但它是出于盟友的關系而不是出于臣屬的關系。這種關系與其說是被思想感情或正式的控制手段所支持，倒不如說是被田興的個人忠誠和朝廷給軍隊的大量賞賜所維系。但魏博作為一個盟友，使憲宗進一步的計劃得益匪淺：他使其他東北諸鎮不敢輕舉妄動；魏博的軍隊直接參加了以后的征戰；這進一步提高了朝廷的威信。如果不是魏博改變了態度，憲宗統治的以后的成就簡直是不可想像的。到814年，皇帝又準備進行軍事干預，這一年的后期，隨著淮西領導人的變動和新節度使吳元濟的上臺，機會出現了。淮西長期以來是政府的一個棘手問題（雖然它地盤不大，只有三個州），但所處地位卻能對沿汴渠的任何地點進行打擊，還能輕而易舉地威脅富饒的長江的幾個藩鎮。但它在地理上是孤立的，在自治藩鎮中是最易受到攻擊的一個。淮西之役始于815年初期，戰役的三年也許是整個憲宗之治中最危急的時期。[[67]](#_67_Guan_Yu_Zhe_Ci_Zhan_Yi__Te_B)如果說魏博的效忠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義，那么在牽制其他潛在敵對勢力的同時朝廷對淮西的勝利就成了憲宗最后政治成就的拱頂石。這一艱巨的軍事努力，把他的朝廷的威信置于最嚴重的考驗中，使中央的資源和統治精英的團結置于極度緊張的狀態。但如果征討不能取得勝利，朝廷能否完全恢復對河南的控制就成了問題。北方的成德和平盧從憲宗之治開始時就擺著要與朝廷對抗的架勢，這時敏銳地認識到政府的勝利可能會帶來什么后果。它們千方百計地試圖妨礙朝廷進行的這次戰爭。815年，平盧單獨地負責造成三起引人注目的破壞和恐怖活動：焚燒了河陰（洛陽附近）的大稅收中心；在京師暗殺了采取強硬路線的宰相武元衡；使用武裝的恐怖分子試圖給洛陽造成一片混亂。戰略上的考慮使對平盧的立即討伐行不通，因為它在藩鎮中地盤最大、最為富饒和人口最多。后來皇帝感到對待它應不同于成德。

淮西之役一開始行動緩慢，第一年幾乎毫無進展。朝廷當然希望從邊境征召軍隊一舉結束反抗。其辦法可能是制造淮西內部不和。但當這一希望落空時，朝廷被迫不斷地施加無情的壓力以圖拖垮淮西。這次戰役于是成了消耗戰，直到817年后期才結束。

官軍表現出的無能，部分的是政治考慮的結果。為了避免危險地改變國內軍事力量的分布狀況和過分加強任何個別藩鎮的力量，朝廷從十七八個藩鎮抽調兵力組成進攻軍隊。但這些軍隊從來沒有足夠的凝聚力。另外，官軍非常難以建立起統一的指揮，包圍敵人的各個部隊很少協調它們的行動。

而且它們還遇到了堅決的和領導有方的防御，何況淮西還得到當地民眾的有力支援。淮西的防御依靠地方民兵和志愿部隊，阻止了進攻者的任何嚴重滲透達三年之久，在此期間淮西靠本地的生產支撐了下來。后來，占壓倒優勢的帝國軍隊始終沒有減輕的壓力開始對淮西的士氣和資源產生影響。士氣的衰落和資源的緊缺大大地有利于決定性的軍事行動，817年秋，官軍將領李愬對該鎮治地蔡州的一次漂亮的奇襲結束了這一戰役。

為了防止這一地區再次發生麻煩，政府干脆取消了淮西的建置，把它的領地劃歸鄰近三鎮治理。

從816年起，朝廷已同時討伐成德，這一次由河北和河東的軍隊及其同盟軍進行。討伐之發生是因為成德對鄰近諸鎮進行一次次挑釁并發生沖突之后，它對815年夏宰相武元衡之遇刺負有責任（后來證明錯怪了它）。雖然朝廷的容忍已經達到了極限，但對第二戰線的開辟仍有一片強烈的反對之聲，有的高級官員以辭職表示抗議。但憲宗力排眾議，可能他預料淮西之役會及早結束。官軍開始時對成德取得了幾次小勝利，但不久局勢急轉直下。由于對在河北作戰的軍隊的控制不如對鏖戰于南方的軍隊，朝廷甚至沒有故作姿態地任命一名全面的指揮將領，所以個別軍隊取得的少數勝利卻因互不支持而勞而無功。鑒于以下兩個有利于成德防守的因素，像809—810年那種勝負難卜的局面并不那么令人驚奇：它西面依偎太行山，具有一條難以攻破的自然防線；北面的幽州態度曖昧。再者，大量軍費用于作戰的軍隊，這里的軍費的負擔無疑會妨礙對淮西全面作戰的努力。這次討伐取得了一些微小的收獲后，再次停了下來。

當817年中期敵對行動結束時，沒有恢復依例頒布的大赦令。相反，成德到818年很久以后仍未獲得特赦，所以在官方看來王承宗仍然是一個叛亂者和不法分子。就在此時，淮西當然已被成功地擊敗和分割。818年初，在此之前已接任其父之職達13年之久的橫海節度使鄭權自動辭去了此職。朝廷第一次取得了任命自己的人選為橫海領導的機會。這些事態的發展，再加上因沒有正式的地位而在內部顯然出現的緊張局面，終于使王承宗認清形勢而就范。818年春，為了報答赦免和重新被封為節度使，他同意把他的藩鎮納入帝國正式的行政機構之中，并且交出了有爭議的德州和棣州，它們后來劃歸橫海治理。他同意將他的兩個兒子送往京師作為人質，這一讓步意味著他放棄了任何家屬接任節度使之位的權利。成德與朝廷關系的這一轉變很可能是對藩鎮恢復控制的第一步，并且成為當時政治形勢的一個重大轉變。就一方面而言，朝廷正在不斷提高的威信和積聚的力量肯定形成了這些變化的直接背景；但另一方面，直接的軍事干預——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也絕不是無關緊要的。盡管中央政府不能降伏藩鎮，但這些因素有助于說服其領導人自愿放棄其特殊地位。

剩下的一個應恢復中央控制的明顯目標是平盧，它是華北諸鎮中最大的一個，自安祿山之亂以來的中央和地方在東部的每一次沖突中幾乎都有它參與。剩下的另一個大的自治藩鎮是幽州，它還沒有造成緊迫的問題，因為它地處河北邊緣，在整個憲宗統治時期與朝廷保持著和睦的關系。自從消滅淮西和朝廷與魏博、成德建立新關系后，平盧再也不能指望從其他的藩鎮得到支持了，所以它對中央政府的遷就的重要性就變得十分明顯。節度使李師道的一些隨從力促他作出王承宗那種必須作出的讓步。但另一些人則認為，即使在戰場上的形勢不利，他仍有時間搞外交妥協，所以說服他采取更強硬的路線。地方的自治傳統和平盧能夠成功地保持地方世襲領導達半個多世紀的事實，遮蓋了這一派和李師道的耳目，使他們不能敏銳地看清新的現實。

政治解決的談判破裂了，政府就精心準備軍事行動。818年后期，戰役開始。事實證明，任務遠不像預料的那樣艱巨，部分原因是平盧政治上的孤立和朝廷總的地位的改善，部分原因是平盧保衛特別漫長的邊境所遇到的困難。在敗局已定時，李師道在819年初期被部將們所殺，他們立刻投降。朝廷無意讓如此大的一個藩鎮——特別在這一戰略地區——再存在下去。因此，經過了對它的物質和人力資源的一番調查后，平盧被分成三部分：東北部分保留原名，但其轄地減到五個州；西北置天平，治三個州；南部置兗海，治四個州。但這些新藩鎮獲準繼續把它們的全部歲入用于本地開支，直到832年才對中央政府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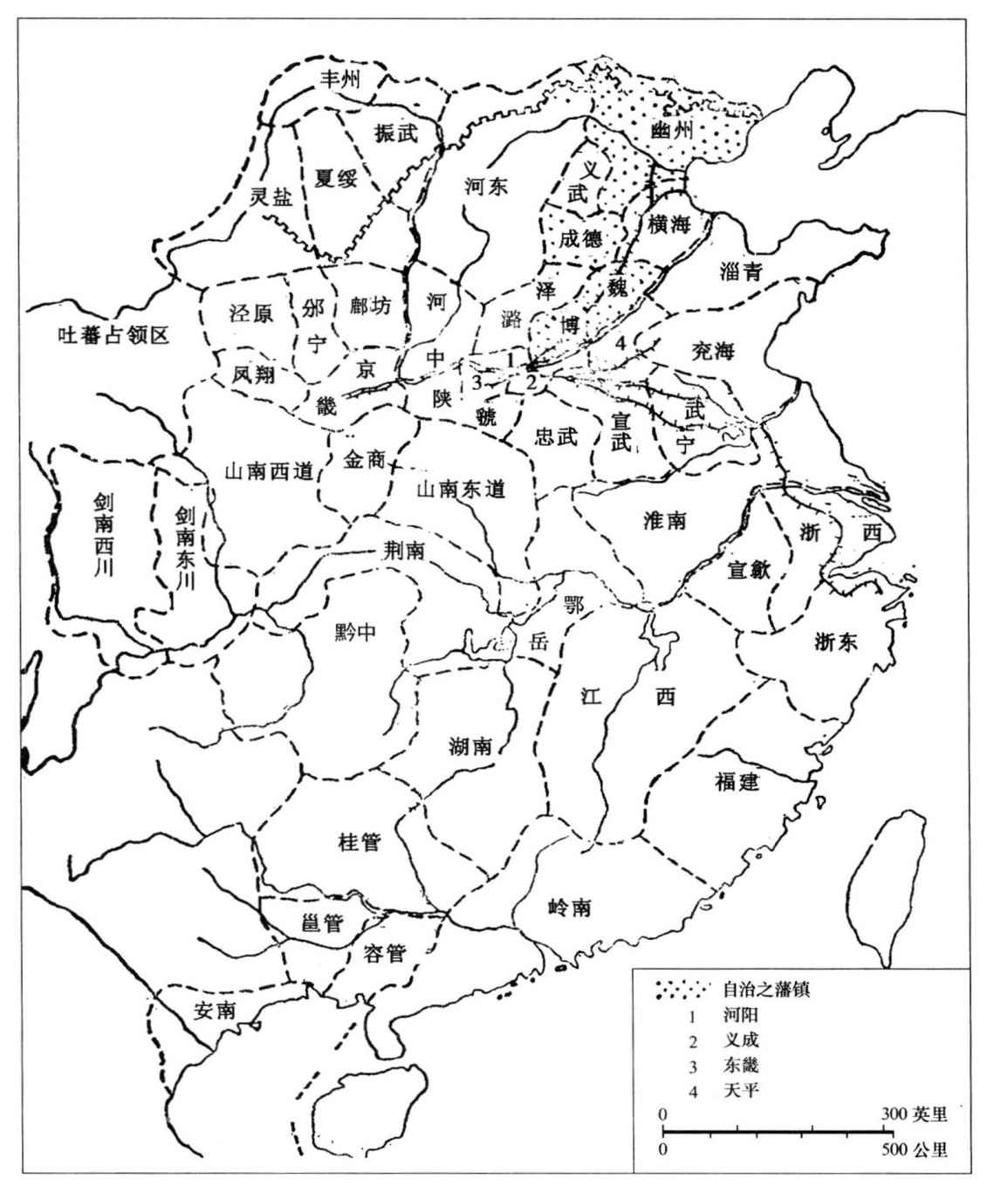
這是憲宗最后一次重大的軍事勝利，這一次勝利消除了在河南唯一留下的威脅，從而在黃巢叛亂之前使朝廷牢牢地控制了帝國的中部，它只留下河北三大鎮（魏博、成德和幽州）的節度使不是完全由朝廷任命的地方領導人。但甚至其中的兩個也承認了朝廷指定其接任者的權力。自安祿山之亂后，朝廷的威信高于任何時候，河北以外最后一個長期牢固地樹立自己勢力的藩鎮統治者韓弘自動放棄了他在宣武的統治并遷往京師。雖然他的興趣更在于利用他橫跨汴渠的地位來發大財，而不想建立獨立的權力基地，可是他完全可以證明朝廷的命令是撤不掉他的。因此，除了所提到的少數個別事例外，到820年，唐朝廷已經鞏固了它對地方最高級官員的任命和選派權。

在憲宗的整個統治時期，他試圖從中央通過政治、行政以及軍事手段來加強控制。他廣泛使用的一個政治工具是監軍使網絡。這是與他一般都嚴重地依靠宦官的做法和與他自己的獨斷專行以擴大皇權的脾性相一致的。他在位時期，他在這方面的行事方式必然會不斷遭到官僚們的反對。但憲宗敏銳地感到需要官員的高昂的士氣，所以證明他比德宗多少要靈活一些。例如，當809年他任命寵幸的宦官吐突承璀為討伐成德的指揮官而引起了一片反對之聲時，他就命他擔任一個次要的職位，不過其地位仍能影響指揮的決定。當討伐不順利而中斷時，他又采納了把他降級的要求。[[68]](#_68_You_Jin__Fei_Fei_Er____Zuo_W)后來，在結束淮西之役遙遙無期時，他接受了官員們的建議將諸監軍使從各戰場召回，因為他們作了有害的干預。似乎與此有關的是，不但在這一次，而且在以前和以后，皇帝本人似乎企圖取得實際指揮戰役的全權。如果是這樣，那么憲宗至少在這一次承認了失敗。我們難以確定他采用監軍使制后的具體變化，但他的堅強的領導使這一制度非常有效。他的政策的另一后果（他過人的自信使自己不能看到這點）是，宦官在藩鎮中牢固地扎下了根，這與他們在朝廷中已經取得強有力的地位的情況相似。

由于中央政府地位的提高，到憲宗末年中央立法的速度加快了。從這時起，我們看到了一些措施：有的旨在取消作為地方節度使補充收入來源的屯田；有的不讓節度使起任命縣令的直接作用；有的總的來說加強了刺史對節度使的地位。但是，最最重要的是819年春進行的一項改革措施，它改變了各藩鎮軍事權力的界限。這一立法所要消除的局面被元老重臣和新任命的橫海節度使烏重胤作了詳細的闡述：“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余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向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得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使職事，應在州兵并令刺史領之。”[[69]](#_6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烏重胤這里所談的是河北已經發展起來的極端形式，但在其他地方也很普遍；只要藩鎮當局擁有軍事全權，那么它們得以完全支配地方文官當局的危險性依然存在。在烏重胤上奏這份報告時，中央官員不可能不知道這種情況。但他在自己的領地中采取的主動行動顯然為這時在全國頒布的全面措施樹立了一個榜樣。

這一措施內有兩條關鍵的規定。第一，它取消了節度使在他所治州以外的一切兵權；第二，它將這些部隊分由各駐守州的刺史統帶。自六朝以來，刺史第一次被授予長期和明確的兵權。出于明顯的原因，邊境地區不受這項立法之限。這一措施的目的是一清二楚的：像809年的措施設法削減諸鎮的財政潛力那樣削弱它們的軍事潛力。要完成它，不能直接減少人力（這樣會造成另外的問題），而是通過分散地方集中的兵權（這種情況在此以前曾造成了大混亂）。那些負有軍事責任的節度使絕沒有因此而被弄得毫無實力。他們繼續控制著他們的牙軍，它是最龐大和最訓練有素的軍事力量；況且地方上的權力關系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就發生變化。但是那些想加強對割據地的控制或者想對文官當局施加軍事影響的任何節度使此間基本上失去了用以達到此種目的的手段。結果，藩鎮與州之間的財政關系可能也改變了，雖然還缺乏這方面的明確的證據。州這時負擔了在舊制度中根本預見不到的軍事責任，這在很大程度上使州對藩鎮的財權貢獻失去了基礎。藩鎮在緊急時刻或有特殊需要時仍可能號召其所屬的州；但在日常工作中，它不得不靠藩鎮所在地的有限的歲入來維持。因此，在憲宗之治的最后幾年，藩鎮的結構又經歷了另一個重大變化。這個變化大大地有助于消除使藩鎮不同于牢固地以州縣為基礎的較舊的行政體制的一些特征。

在這些成就和不斷實行新的主動措施以后，憲宗還可能采取什么行動，我們就只能猜測了。820年2月，他被兩名對他不滿的宦官所害，從而結束了唐代最后一個搞改革的統治期。雖然官場對憲宗的專橫的行事方式和貪圖收入開始充滿不滿情緒，但他的遇害似乎不是政治反對的結果。對他的成就怎么估計也不過分。憲宗恢復了君主的權威和力量，在此過程中使以后半個世紀對官僚控制的大力加強有了保證。最重要的是，他對藩鎮結構的變動使地方軍事威脅的可能性大為減少。作為皇帝，他的政治成果不但確保中央的法令能全面地和遠為充分地得到貫徹執行，而且如日野開三郎提出的那樣，這些成果的重要意義還在于使兩稅法的真正實施實際上擴大到帝國各地。[[70]](#_70_Ri_Ye_Kai_San_Lang____Fan_Zh)



地圖17 唐之地方建置（822年）

在評價他的成就時，我們應以他前面的幾個皇帝作為考慮的出發點，而不應以完全重新集權化這一不切實際的標準來衡量。根據這一尺度，憲宗出色地達到了他的目的，而且突出地表現為王朝后半期唯一的有成就的皇帝。我們如何來解釋他取得成就的原因呢？主要的原因似乎有三個。首先，他開始其宏圖時的環境比人們想像的德宗晚年政治失敗時的形勢有利。從德宗那里，他繼承了重新充實的國庫和一支強大的中央軍隊，所以雖然皇帝還不能命令全國普遍遵守法律，他的地位基本上是安全的。另一個主要資本是官僚集團，它內部盡管有派系斗爭和貪污腐化的跡象，但相對地說處于健康的狀態；其中有李吉甫、李絳、裴度和元稹等許多杰出的官員。于是，朝廷擁有采取有力的中央行動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資源。其次，憲宗深刻地了解整個帝國的政治—軍事形勢，這使他能夠制定有效的策略。他能保持計劃的靈活性，尤其避免把力量過分投入任何一個地點，而是一次針對一個目標（唯一的例外是816—817年他對成德開辟第二戰線）。他的行政措施雖然也打擊藩鎮力量的要害，但如果看起來行不通，就絕不輕舉妄動。第三，他很清楚如何運用皇帝的權力，樹立自己的領導權，并且在制定政策時一直處于主導地位。看來他基本上是知人善任的，這反過來又增強了所用之人的信心。李翱的贊歌“自古中興之主無人及之”可能是溢美之詞，但它反映了當時滿懷信心的情緒。

## 憲宗繼承者治下的藩鎮

憲宗逝世后的那一年，在新帝穆宗的統治下，憲宗造成的勢頭甚至取得了更驚人的收獲。820年后期，成德的王承宗死去，但沒有突出的人接任。雖然駐軍勸說其弟指揮，但后者也許關心他是否能控制桀驁不馴的駐軍，所以立刻要求朝廷另外任命節度使代替他，而他本人愿意調到其他地方。朝廷用可靠和老資格的田弘正接替他，另委淮西之役的英雄李愬取代田弘正為魏博節度使。這一變化使幽州成為唯一的依然完全不受朝廷節制的藩鎮。它的節度使劉總此時一心尋求精神超度（他的確穿起了僧衣），他預先防止了駐軍的干政活動，在退出公職生活時立刻把幽州交給了中央政權。朝廷為了把幽州一分為二，就劃出兩個州，由兩名正式的文官負責治理。到821年春，朝廷從此可以滿意地看到帝國的最高級地方行政長官無一不是它自己挑選和任命的人了。

但這些成就是短命的。不出幾個月，兵變導致了成德的田弘正（連同其許多追隨者）遇害，以及朝廷任命的幽州兩部分的節度使被拘禁。地方的軍事將領接管了成德和幽州。朝廷舉兵討伐成德，那里過去是死傷最慘重之地，也是最易進入的目標。在開始時，由于缺乏經費、中央的指揮不當和各地參戰軍隊出力極不平均，討伐遇到了困難，戰斗一直未見定局，到822年初期，戰役停了下來。同時，魏博軍的兵變造成了田弘正之子的死亡（他原被任命為節度使），結果使朝廷想取得這個要沖之地的希望落了空。隨著一個兵變者的掌權，魏博此時也擺脫了中央政府的控制。此后不久，由于無力繼續進行直接軍事行動和急于求和，朝廷就接受了既成事實，授予這三個地方的篡權者以正式的任命。

十分清楚，穆宗的朝廷雖然在把河北全部置于中央權威之下，這一方面取得了表面的成就，但它一直無力對付那些支撐這些藩鎮自治的持久不衰的因素。特別就幽州和成德而言，朝廷更沒有時間去消除這些因素。派毫無該地經驗的文官而不派職業軍人去治理幽州，純屬愚蠢之舉。他們的懈怠和遲鈍的治理很快就疏遠了駐軍，結果他們忍無可忍，才最后采取暴力行動。在成德，軍隊和新節度使之間也有很深的積怨，因為后者在以前曾率領一個敵對的鎮與成德交戰，并且他因私人目的把大量財物運出境外而使事態更加惡化。一旦田弘正放棄了他的一支相當大的魏博的私人親兵部隊（這樣做是因為朝廷不愿意提供給養）時，他就不再擁有繼續控制該鎮首府的手段了。隨之產生的魏博的兵變是連鎖反應的一部分。如果有更好的領導和更充足的給養，這次兵變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但無論如何，它表明自田弘正于812年臣服皇帝以來，藩鎮內部的權力結構的變化是多么微小。[[71]](#_71_Zhe_Xie_Shi_Tai_Fa_Zhan_Zai)

朝廷還不能像不久前憲宗表現的那樣對新危機作出有力的反應。自從在憲宗治下花費了大量經費和人力后，中央出現了一種松勁情緒，并且不愿再要求作出同樣的犧牲。可是應該指出，中央的力量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決定性地擊敗河北的這三個鎮——不論是各個擊敗還是一網打盡。因此，雖然憲宗曾在各個重要方面扭轉了分權的過程，但如果他還活著，他能否把它們真正控制起來，這也是值得討論的。

但是，憲宗時期的其他收獲足以保證在河北的這些挫折對帝國其他部分的影響減到最低限度。在不尋常的情況下，一個得眾望的軍事領袖王智興的確不久后在822年春奪取了武寧的控制權。考慮到武寧最近在河北出的力和王智興的優秀的戰績，朝廷給了他正式的任命。但這是以后半個世紀在東北以外唯一的一次成功的、并導致官方承認的篡權。顯然，憲宗采用的改革大大地削弱了個別藩鎮獨立行動的潛力。隨著藩鎮中心與所屬州之間的財政和軍事聯系的嚴重削弱，任何懷有割據稱雄之心的節度使會發現自己難以集結足夠的經費和兵力來實現其目的。改革之有效，主要表現在它防止了新的權力中心的滋長，但改革對牢固確立的權力中心也有長期影響。藩鎮財政的緊縮很可能是引起駐軍繼續發生（雖然不很頻繁）兵變和動亂的原因。這類問題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當時處于這種制度之下：大量軍隊駐守在全國的戰略要地；尤其是當兵成為社會上最不齒于眾口的人的純系雇傭的職業。但是這些動蕩沒有更廣泛的政治目的，一般只產生有限的后果。

在憲宗之治以后，帝國軍隊的人數無疑減少了（雖然現存的少數統計材料提出相反意見）。穆宗在820年登上皇位之時，發現國庫空虛和朝廷中存在強烈反對繼續執行強硬軍事政策的情緒。可能在那一年后期，他對此作出了反應，秘密下詔全面削減藩鎮的軍隊。這項工作準備用簡單的權宜之計來完成，即不補充軍中正常減員（死亡和開小差等）過程所造成的缺額，據估計，缺員率每年為8%。對可能會激起地方駐軍反抗的關心明顯地反映在以下兩個方面：把這項措施包得密不通風；為達到這一目的而采取了消極的方式。按理說，這個命令不可能產生突然的或戲劇性的影響。但據天平和浙東兩地的報告，它們迅速貫徹的努力表明命令是被認真執行的。可能它對各鎮軍隊構成的威脅助長了東北新危機的出現，這轉過來又導致了政策的明顯轉變。822年春頒布的詔令指出，未經批準，禁止突然削減軍隊，并規定維持原有的編制。[[72]](#_72_Guan_Yu_Liang_Fen_Zhao_Ling)據推測，各鎮的預算也作了相應的調整。其用意肯定是向全國軍人保證，他們不會有失去生計的危險。

但是這一措施的某些后果（實際上是重建隊伍）是很難預見的。許多藩鎮當局不是征募真正服役的人，而是把空缺售給有財產的人（其中包括地主、商人和衙門吏役），他們都企圖依附當地的地方政體來取得利益。這就是支配地方的經濟利益集團逐步滲入地方政府的手段之一，但這一過程是緩慢的，持續于9世紀整個時期。另一個后果，正如13世紀的歷史學家馬端臨看到的那樣，是軍隊力量的嚴重削弱，因為軍隊雖然名義上保持足額，但真正有戰斗力的兵員數卻大為減少。另外，朝廷根本沒有明確放棄削減武裝兵員人數的計劃。在行得通的情況下，它偶爾也亮明態度，鼓勵減少部隊人數；它還采用這樣一種人事政策，即給予那些能增加歲入的地方官員以最高的功勛，以此鼓勵削減耗費財政經費的士兵的人數，甚至減少其軍餉的標準。[[73]](#_73_Guan_Yu_Zhe_Xie_Fa_Zhan__Jia)下文將要談到，最后當動亂在9世紀中期以后開始呈現出威脅王朝生存的跡象時，動亂之得以迅速蔓延和持久不衰的一個原因是，朝廷沒有足夠的兵力去控制它們。

我們掌握的關于9世紀軍隊人數的概括的數字需要很仔細的說明。《元和國計簿》所列807年軍隊83萬的數字肯定是可靠的，但不能肯定東北諸鎮軍隊是否包括在內。也可能包括在內，但只是按照中央政府簿冊中規定的兵力而不是根據其實際人數計算的。更難解釋的是，837年王彥威的一份財政報告斷言，在9世紀20年代初期帝國共有99萬名士兵。[[74]](#_74_Guan_Yu_Zhe_Xie_Wen_Xian__Ji)可以料想，憲宗的歷次討伐當然全面地增加了兵員；但穆宗初期的政策應該說是起了相反的作用。這個數字不但大于807年的數字，而且遠遠地大于我們掌握的8世紀的任何數字。是否可以這樣來解釋：它指的是821—822年這一短暫的時期，當時河北諸鎮都掌握在朝廷之手，故而此數包括了它們軍隊的實際數量。這些數字完全可能超過官方規定的人數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這個數字是正確的，王彥威所舉之數大概是我們掌握的755年以后整個時期帝國兵力的最完整的數字，雖然我們還無法估計真正受過訓練的戰士的比率有多大。可惜史料中保留的王彥威的報告沒有837年帝國軍隊的總數字，而只有中央經費維持的數字（40萬）。但可以肯定，在9世紀后半期地方諸鎮對當局的嚴重挑戰出現時，武裝人員似乎已經大大地減少了。

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繼續按照我們前面所述的情況發展下去，一般地說，它們的關系日趨官僚化。由于對節度使的任命不再是壓倒一切的軍事問題，朝廷在任命官員擔任節度使之職時就可以采用行政的標準了。純粹的軍人只被任命在那些有重要軍事職能的藩鎮任職。隨著文官之治不斷地在大部分藩鎮中處于遠為重要的地位，官僚節度使的人數超過了軍事將領，其比率平均為2∶1。大部分高級將軍或在同時或先后在神策軍中任過職，他們因而失去了過去特有的地方屬性。通過地方駐軍支持而取得權力的那種桀驁不馴的節度使變得越來越少，到唐朝最后垮臺以前幾乎被消滅了。以前在高級官員中的中央和地方仕途之別趨于消失。朝廷和地方之間的調任成了常規，以至于任何一個有成就的9世紀的官員在他仕途生涯結束時，也許已在三個或更多的藩鎮擔任過長官。正規的輪換也限制了在一個特定藩鎮任職的時期。雖然沒有正式規定期限，最長的任期一般為6年。許多人的任期要短得多。[[75]](#_75_Can_Jian_Ci_Chu_De_Can_Kao_C)

節度使們還受到官僚機器的限制，有些最細致的限制則對其下屬施行。9世紀先后頒布的許多中央指令都證實了中央關心的是節度使們設置的大批隨員和地方行政官員總的素質。這些指令企圖規定幕僚的人數（特別是關鍵的行政官員）、被任命的標準和提升所依據的程序。對外放赴鎮的宰相，他們隨帶的助手人數也有限制，這顯然是在宮廷政治被激烈的派系之爭左右時力圖防止他們在京外結成或保持私黨。在地方任職期滿后，節度使同樣必須辭退或解散其幕僚。實際的執行無疑與那些肯定旨在防止流行的弊病的命令有很大的距離。此外，節度使對自己僚屬的委任權從未被懷疑過。但是，中央政府試圖限制他任用僚屬的自由，此事本身就證明了中央地位的加強，而地方節度使的地位與8世紀后期相比，則表現出了質的變化。[[76]](#_76_Guan_Yu_Zhe_Zhong_Zhong_Gui)

節度使們不斷地處于警惕的注視之下，還常常要接受宦官監軍使的瞎指揮。在820年后，隨著宦官在朝廷權力的擴大，他們在地方行政中的作用也一定有所加強。他們此時有一大批私人幕僚為之效勞，還有私人的隨從部隊，個別人的隨從達數千人。在843—844年的軍事戰役中，監軍使是如此明目張膽地濫用自己的職位，以致宰相李德裕竟能使樞密院的兩名高級成員同意限制監軍使的權力和活動。從此，他們不得發布影響軍事行動的命令，其扈從人員也不得大于規定的規模。后來在855年，由于監軍使不斷干涉日常行政，他們甚至要對他們所在地的地方行政的嚴重缺點和瀆職行為與節度使共同負責。這一措施旨在阻止他們的專斷行為和確保能得到更認真的報告，但卻默認了他們治理藩鎮的共同責任。前面已經談過，有偏見的報告使人們難以對監察制度作出任何全面的評價。也許根據官場效率的正常標準來衡量，這一制度尚有許多需要改進之處，但作為一種控制的手法，它顯然是高度有效的。

不論在藩鎮的上級或下級機構中，中央政權都容易碰到的一個最棘手的問題就是財政控制問題。在官員的瀆職行為中，朝廷最關心的就是貪贓枉法問題。這個罪名常常被單獨提出，不在重大慶典時頒發的大赦范圍之內。另一個特別根深蒂固的弊病是征收未經批準的附加稅，朝廷對此曾經三令五申加以禁止。節度使之職一直是一個肥缺，值得以重金通常向有權勢的宦官賄買。據說，這項投資在一個任期內就能使他獲利三倍以上，但開始的費用迫使許多官員負債累累。也許為數不多的節度使能像令狐楚在824年接管宣武那樣很快撈取了200萬緡錢，但種種跡象表明，稍微收斂的撈錢機會還是有的。朝廷偶爾也審理這些犯法者，但它在對待中央官員的不端行為時，態度要比對待地方官員的違法行為嚴厲得多。法令不斷強調節度使要對他所轄官員的行為負責，這可能有助于減少這類違法行為在其下級行政機關中的發生率，但節度使本人顯然很少受到審理。安祿山之亂后地方的財政處理開始有很大的回旋余地，這種情況似乎久已成習，而且由于官員的行為準則起了相應的變化而使外放官員有機會能為自己的不幸遭遇取得豐厚的補償。

政府從8世紀晚期以后起，在9世紀明顯地加強了對民眾的控制。在冊的戶數在807年只有250萬戶，到憲宗之治的末年已增至400萬戶。到839年已經達到500萬戶，這是唐朝后半期的最高數字。[[77]](#_77___Tang_Hui_Yao____Juan_84_Di)此數似乎遠未達到755年900萬戶這一大數字，但考慮到它根本沒有包括河北的任何數字，所以對全國來說，這個數字也不算小。更高的登記率當然意味著中央政府和地方當局兩者收入的增加，但由于現存的財政數字的材料甚少，人們難以作出任何可靠的結論。837年的總收入為3500萬（錢和實物混合的）納稅單位，據說政府收其中的三分之一，這三分之一中的三分之二用于維持中央和西北的軍隊。這些數字并非全不可信，但機智的日野開三郎指出，它們會令人誤解。如果把間接稅和通過各鎮用于特殊和緊急需要的儲備計算在內，中央的收入就高得多。僅以后的一個關于中央歲入的數字就表明，大致相同的收入水平至少一直維持到9世紀50年代。中央對地方的收入比率肯定小于安祿山之亂以前。根據杜佑的數字，當時兩者收入的比率大致相當（更嚴格地說為5 ∶ 6），而在以后的這一時期，其比率充其量為3∶5。因此，中央政府能直接處理的收入，不論是絕對數字還是相對數字，都要少得多。可是，由于財政制度已經起了如此徹底的變化，而且政府的施政已經趨于高度分權，較低的數字絕不意味著中央的衰落。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說明9世紀的前三個25年中央和地方關系特點的一種混雜的結構，它不但明顯地不同于初唐的結構，而且也不同于安祿山之亂以后的制度。基本的行政單位依然是州和縣，由中央任命的官員負責履行它們的傳統的職能。州享有高度的與中央政府的直接聯系權，但在重要的方面，它仍受制于藩鎮的節度使。節度使能以某種需要從州提取歲入；他掌握一個地區的重兵，能為安全的需要自由地作出反應；他負責考核轄區地方官員的政績，可以對他們施加強大的影響；他能因任何冒犯行動而懲處他們，甚至施以肉刑。按理說，州（而不是藩鎮）在809年以后是向帝國上繳稅收的單位。但一個州是否真正向中央政府上繳稅收，這要取決于藩鎮的職能和地位。如果藩鎮提取了全部收入以維持其軍隊（如在運河地帶），或者藩鎮實際上受中央的支持（如在西北），州與藩鎮的關系就相應地更牢固，而與中央政府的關系則較弱。我們現在可以確定的是，提取所在州收入的各鎮并不被指望對國庫有所貢獻。但作為報償，它應履行重要的職責。如上所述，它的軍隊要維持地方治安；它要派兵鎮壓叛亂；它甚至要提供軍隊抵御外患——如849年在西南和862年在南方那樣。在民政方面，它被委以各種任務，如掌管緊急救災和維持交通。從許多中央的指令中可以明顯地看出，節度使全面監督地方行政的作用再三被強調。從這一意義上說，鑒于所處的地位表面上并不比州高多少，節度使仍反映了專使（它的設置可以追溯到唐朝初期）的基本性質。最后，各藩鎮之間的巨大差別值得再提一下。我們在一開始就已提出，在有的方面情況就是如此。在9世紀以某種形式存在而可以確定的50個藩鎮單位，有的沒有地盤，而且缺乏真正的內聚特性，因此根本算不上一個“藩鎮”。但只有逐個地加以分析，才能充分認識這些差別。

### 822年后的河北

前面所談的內容幾乎不適用于河北三鎮。在五代以前，魏博、成德和幽州堅持獨立存在，與帝國其他地方的共同行動只能說是禮節性的。822年后，朝廷不打算進一步恢復對它們的控制，它們在軍人領導下處理自己的事務，實際上沒有外界干涉。它們與朝廷的關系和它們彼此間的關系的特點是一種穩定的平衡；也沒有材料提及地方民眾種種困難的情況，不過這方面的材料一般認為是比較空洞的。但是，領導層相對地說依然不穩定，權力斗爭在魏博屢見不鮮，在幽州則是它的地方流行病。只有成德才稱得上享有很大程度的統治延續性，那里的高級職位相對地說沒有激烈的變化，這顯然是境內接受了節度使世襲權的結果。782—907年，成德被兩個家系所統治，一個從王武俊開始，經過三個接任者一直統治到820年，歷時38年；另一個從王廷湊開始，其間經五個接任者，統治期達86年有余。世襲繼任在其他東北諸鎮也有發生；劉姓家系在幽州統治了36年（785—821年）；在魏博，田氏和何氏兩個家系分別統治了49年和41年（763—812年、829—870年）。但它并不能保證節度使的繼承像成德那樣有秩序和順利。

作為一個慣例，世襲繼任是河北的一種特有現象，也被稱為“河北舊事”。它表現為對一切權力來自皇帝的原則的否定以及地方的極度傲慢自大，所以被視為河北自治的最能說明問題的現象。它的產生原因不難找到。在帝國官僚制度已極度被削弱的部分，一個家族承擔主要政治角色之事反而變得很自然。從某種意義上說，世襲權是唯一剩下的表示合法性的權利。此外，在這種高度個人統治的區域中，節度使周圍有一批得力的隨從，當節度使死后，這些追隨者往往發現支持其子是正確之道和有利之舉。成德繼承之特別穩定，也許可用該鎮首府精銳衛隊的內聚力和紀律這一原因來解釋。不過兵變和篡權的情況在河北與和平接班一樣普遍；即使是和平接班，其最終的力量源泉還是軍隊。如果一個節度使失去軍隊的支持，他就沒有希望留在職位上帶兵了。總之，世襲繼任可能起的作用與其說是一種權利，不如說是繼任者對其潛在的競爭者擁有的一種實際優勢。因此，“河北舊事”在樹立節度使后裔的繼任權時，也幾乎同樣顯示了軍隊選擇自己指揮將領的權利，簡言之，這個特點是河北駐軍的慣例。

朝廷不時情不自禁地利用地方上的分裂，以便在這個區域重新擁有發言權。但是頭腦較冷靜的人提請朝廷注意：過去有失敗的教訓；恢復控制代價很大結果卻靠不住；這些長期建立起來的藩鎮得到民眾真正的支持。他們的意見一直占上風。當幽州發生兵變時，宰相牛僧孺在831年提出的論點典型地表達了這種看法：“范陽（幽州） 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蹔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78]](#_7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后面一個論點是極為重要的，前面已經談過，東北邊境長期以來是唐朝多事之地，它的稅收只能勉強用于防務。幽州的自治對唐朝廷來說幾乎沒有物質損失。但魏博和成德的情況就很難說，它們所據的地盤富饒得多，人口也遠為稠密，所以朝廷要在它們南面和西面諸鎮駐守重兵，以抵消其力量。

這樣，在822年以后，河北諸鎮就不在考慮之列了，這種現實主義態度緩和了東北任何危機的激化，使朝廷得以把力量放在得足以償失的地區。可是令人奇怪的是，朝廷依然能影響——即使是間接地——東北三鎮的事態的發展。因為它們雖然實際上處于獨立的地位，但并不打算斷絕與長安的正式聯系，并且孜孜以求皇上的合法任命。正如李德裕在844年所說的那樣：“河北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79]](#_7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事實不時證明了他論點的正確性。如果得不到朝廷的正式承認，地方就會出現嚴重不穩定的局勢。撇開與本地的特殊關系不談，這些地區的人民顯然認為，他們繼續是一個正統君主統治下的更大的政治體制的一部分。因此，朝廷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仲裁和操縱地方的政治斗爭，更垂青于那些可能是最聽命于它的人。它可以為一個曾經與它合作但此時被趕出其治地的節度使提供避難所，并再次任用他，同時卻能拒絕接納那些不很受歡迎的前節度使。那么朝廷為什么又對這些節度使不論誰都給以正式任命呢？主要是因為，如果完整地保持名義上的關系，它就能確保節度使們承認已經建立起來的那種和平共處關系。拒絕承認他們，就會造成兩種嚴重后果：藩鎮內部會出現嚴重的不穩定，而且會促使它對外采取侵略性的行動。

政府對兩個分裂出來的義武和橫海鎮的控制使它在河北取得了一定的戰略優勢。雖然對它們的控制偶爾有失敗之時，但朝廷任命的官員一直得以重新成為它們的領導。河北的這一橋頭堡是朝廷一大關注之事。826年，當李同捷在駐軍的支持下謀求繼其父為節度使時，橫海出現了恢復自治地位的危險。這時正值新帝即位，所以朝廷直到827年過了相當一段時間才開始對李同捷采取行動。在帝國的其他地方，這本來是比較容易處理的事，但在河北，要降服這一力量相對虛弱的單個的藩鎮，卻成了一個曠日持久和復雜的任務了。在三個自治藩鎮中，幽州為朝廷作戰不力；魏博扮演兩面派角色，但很不成功；而成德自己最后被宣布為非法。此外，魏博和成德自己互相動起武來。最后，付出了高得不成比例的費用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829年春對橫海的控制才得以恢復。

很顯然，朝廷下決心要保住河北的這一東部基地，主要是因為它對河南提供了意義重大的保護，具有防御價值。橫海在822年因增加了兩個州而擴大了地域，同時它又擁有重要的經濟資源，所以從830年起它不需要中央對它的軍事資助。可以設想，它從此甚至成為貢獻歲入的地區。相反，義武依然是一個小的戍守藩鎮，它的一半軍資由朝廷負擔。其駐軍有時也是制造麻煩的根源，特別是在838—839年它造成的危機解決前，它的確使長安的領袖人物煩惱了一陣。朝廷對這些藩鎮內部生活的確切影響不得而知；但我們可以肯定，中央政府一定給予軍隊和其他地方上有勢力分子以一定的物質刺激，以使他們保持忠誠。[[80]](#_80_Guan_Yu_He_Bei_Yue_820__874N)

隨著昭義企圖取得中央政府對它實際的自治地位的承認和要求政府同意其節度使之位的世襲權，朝廷和河北之間在843—844年間建立起來的平衡受到了最大的考驗，結果造成了舊式藩鎮的最后一次大叛亂。昭義的歷史與河北的特殊地位是分不開的，因為它自始至終被認為是對付這個區域危險力量的主要屏障。它橫跨太行山，地處河北和河東，既有優勢，也有不利條件。特別是如果沒有北面成德和東面魏博的支持，它不可能作為一個獨立單位存在下去。很明顯，如果它完全擺脫朝廷的控制，后果是嚴重的。

自劉悟820年在昭義掌權以來，它一直由劉姓家族控制；劉悟曾在自治的平盧任職，在818年轉而忠于王朝，當時他得到皇帝的赦免和任用。825年第一次世襲繼承的問題在朝廷已經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但當時朝廷動搖的領導集團最后同意對劉悟之子劉從諫的任命，后者隨之治理昭義達18年之久，漫長的任期只會削弱朝廷對該地的控制。他經商的范圍和種類更是臭名昭著。他經營鹽、馬、金屬和一般商業，與商人分享利潤；為了便于商人的活動，他還授予他們公職。自835年甘露事件以后，他公然對宦官采取強硬立場的意愿證實了他的獨立性及其地位的力量。他死于843年，這時朝廷已有了遠比825年更為堅定的領導集團，所以朝廷決定應由中央政府行使挑選接任者的權利就不足為怪了。但是，朝廷在制定進攻昭義的戰略時遇到了一定的困難。它知道中央軍隊之滲入河北將會引起諸自治藩鎮抱成一團去支持昭義。于是就說服成德和魏博從東面進攻昭義。節度使們無疑被許諾的物質報酬所誘惑，但同樣重要的是，他們也擔心在自己大門口的斗爭會破壞他們與中央權力的有利的妥協。戰爭艱苦而持久，打了843年的大部分時間和844年一整年。昭義進行了頑強的防衛，這不但證明它有堅強的軍事傳統，而且還得到民眾對此地方政體的高度支持。雖然因指揮分散、分裂和不受約束的官軍作戰而出現的那些往常的困難又出現了，而且朝廷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但主要的目的已經達到，對政治形勢也沒有不利的影響。對現存昭義部隊的指揮權按照819年改革定下的方式被精心地下放到各州。[[81]](#_81_Jian_Bi_De_Sen_Qian_Yin_Zhu)

唐朝后半期河北地位的特殊性使清代歷史學家顧炎武提出一個理論，即到了9世紀，唐朝廷與河北諸鎮已發展了一種真正的互相依賴的關系。[[82]](#_82_Gu_Yan_Wu____Ri_Zhi_Lu____Ju)最后，一方一旦垮臺，另一方勢必也垮臺。顧炎武肯定夸大了這種關系的絕對作用，因為王朝的整個后半期因喪失了這些藩鎮而是長期處于衰弱的地位。不過，盡管河北的情況特殊，它對唐朝的政治秩序和王朝的生存來說無疑是舉足輕重的。對唐朝統治的真正的、最后取得成功的挑戰后來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地區出現。9世紀的人們對河北的地方割據有充分的認識。由于具有頑強地抵制中央政府的傳統，它所以被稱為“反賊之地”。有些學者對河北這些軍事政體的粗魯特征的反應是不利的，甚至把它比作化外。令人奇怪的是，與全國其他地方的這種鮮明對比，840年經過河北的具有敏銳觀察力的日本僧人圓仁竟未注意到。根據他的記載，這位旅行家認為河北不過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他的確看到了一個重要的例外：9世紀80年代對佛教的迫害在河北行不通——這確實是河北諸節度使政治獨立方面很說明問題的證據。[[83]](#_83_Lai_Xiao_Er____Yuan_Ren_You)

## 藩鎮制的衰落

打算具體指出9世紀中央權威在藩鎮開始崩潰的時間，這大概是徒勞的。[[84]](#_84_Zhe_Yi_Jie_Qu_Cai_Yu_Yi_Xia)維持秩序的問題在9世紀中期以前在地方上已經出現，但在王朝最后幾十年中央權威的最后和徹底的崩潰則要到黃巢之亂才開始。中央權力的衰落不純粹是政治現象。它與深刻的社會和政治危機有密切關系，這種危機逐漸影響到淮河和長江流域富饒和高生產力的農業區的農村生活。

這場危機并非經濟衰落的產物，而是經濟迅速發展的間接結果。自8世紀初期以來，這些地區的農業生產力和商業已經穩步發展，人口迅速增加，但伴隨著這種發展的是土地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這一趨勢因政府在755年后放棄一切徒有其名的土地分配控制，以及因稅賦負擔不均和貧富差別擴大而隨之加劇。到9世紀中葉，地方盜匪橫行和人民離鄉背井的現象（這些歷來是農村苦難的表現）達到了嚴重的程度，而在京師，中央當局從這個地區取得的收入減少了。政府和它的政策部分地應對這種局面負責，但它們只是次要的因素。政府對根本的變化、迅速的發展和它們的廣泛的社會影響是控制不了的。可是朝廷堅持要取得越來越多的歲入，或者至少要維持當時的水平，而根本不考慮地方的具體情況，這樣就助長了地方官員的陋習。他們知道朝廷對他們成績的考核只以他們取得的結果來衡量，而不問取得這些結果的手段是什么。隨著危機的產生，政府也沒有采取幫助苦難者的積極政策。因此，農民雖然可能同樣受到私人利益集團的壓榨，但政府的公開的征稅要求證明是他們不幸的主要原因。地方官員通過對地方有財有勢的人提供保護和給予特權以及通過其他的貪污行為，也增加了一般納稅者的負擔。長江流域發生的這類事件有最詳細的文獻記載，這不僅是因為那里是中央政府最為關注的地方，而且因為它從那里獲利的機會更多。可以肯定，不是所有的官員都貪污腐化到不可救藥；倒不如說年深月久的個人偏私和不法行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消除的。此外，一個擁地者不論擁地大小，當他取得免稅地位時，往往把它擴大到為他種地的農民身上。由于納稅人的減少而造成當地人民稅賦負擔的不平衡，再加上其他許多農民干脆出逃和遷往別處，這轉過來又成為官員痛苦發愁的根源，因為他們仍一心指望能夠湊滿應上繳的稅額。處于這種壓力下，地方官員的對策可從9世紀30年代浙西一個過于熱心的刺史的事例中看出：他親自決定誰該不該納稅，然后派軍隊到該州各村各鄉直接催課。[[85]](#_85___Ce_Fu_Yuan_Gui____Juan_698)

地方的行政在9世紀經歷了相當大的演變，這大大有助于解釋帝國約從855年起的事態發展。前面已經談過，它吸收了地方各類人物，他們的社會出身與那些最正規的官僚的出身明顯不同；也談到了利用在地方政府中的地位通過財產的假轉讓來保護逃稅的方式。中國的地方行政機構一直必須依靠本地的胥吏去完成許多基本任務，所以它們一直受到強大的、來自地方的壓力。但在晚唐，地方的行政機構逐漸喪失了它們作為中央政府代表的特點，并且日益趨向地方本位主義。它們陷入地方利益集團的網絡而不能自拔，但這些地方利益集團總是根本不贊成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法令。結果，節度使和觀察使、刺史及其幕僚等朝廷任命的官員同地方政府的本地公職人員（包括軍隊）之間的一直存在的潛在沖突就變成了現實，因為前者日益被看成是異己的和敵對的利益的代理人。這一局勢反映了這一世紀自安祿山之亂以來正式的地方結構已經官僚化的程度，但它又突出地說明了長安的朝廷和帝國重要地區的地方集團之間的鴻溝日趨擴大。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家的官僚與這些集團之間缺乏牢固的社會紐帶。在理論上，科舉制度開辟了入仕之途，但仍只起小規模的作用。另一個因素是私人經濟部門的規模擴大和迅速發展。但是，如果說在地方政府的官員或在一般地方民眾中存在著一股強烈的反王朝情緒的暗流，那也未免過分了：他們只希望中央政府少來干預，這不一定與對皇帝的抽象的忠誠有矛盾。

與此同時，各地的軍事力量嚴重削弱。軍事預算和駐軍的削減大大地減少了能緊急動員應變的軍隊。長期只習慣于守衛任務的駐軍發現要保持他們的戰斗技術和斗志必然是不可能的。但各地軍隊戰斗力的下降還有進一步的原因，這種情況只有在9世紀50年代后期才充分表現了出來。憲宗時期所采用、并在他及其以后諸帝所推行的改革使戰斗部隊的規模變得很小，指揮權又廣泛地分散在節度使和刺史的手中。這些改革（雖然還有別的因素在起作用）旨在一舉解決另一個問題，即藩鎮兵力過于集中，但結果在以后的幾十年卻把地方政府的兵力減少到不能維持地方治安的水平。除了邊境的藩鎮、東北拒不聽命的諸鎮和內地一兩個特殊的鎮——如武寧（從870年起改為感化）——以外，諸鎮基本上變成文官性質的政府了。

因此我們必須根據這些變化來看待法紀蕩然無存和抗拒官府的行為逐漸頻繁的情況。845年，詩人兼文學家杜牧從他的長江任所呈上的一份關于江賊的報告中，詳細地敘述了多達百名的盜匪在沿江襲擊和洗劫居民地和市場而不受懲罰的情景。[[86]](#_86___Quan_Tang_Wen____Juan_751)據杜牧所言，這些居民地長期以來一直受到掠奪和盜匪的蹂躪。值得注意的是，據說盜賊是從淮河區來到長江地區專事搶掠的。這說明，他們在其他地方胡作非為，就能逃避在家鄉地區的懲處。他們還需要一個秘密市場以銷贓。杜牧斷言，他們與江淮地區的居民有廣泛的聯系，他們還樂于對一些村落公然進行武裝保護（但不知他是否看到過其中某些村落）。他還確定這些盜匪販運私鹽，從其他許多史料中，我們看到這一時期出現了鹽和茶葉的走私活動。后者主要是財政問題，但由于這種人在進行活動時藐視官府，并且不惜為他們的非法活動動用武力，所以他們也造成了一個治安問題。杜牧提出并得到宰相李德裕支持的一個解決辦法是，設立一支有50條船的巡邏隊在長江作戰和保護其居民地。如果它真正實行，問題很可能成功地解決。但總的說來，嚴重的不法行為不斷發生，一個重要的措施是，朝廷在852年下令在各戍軍地任命教練使，以便定期進行訓練活動。[[87]](#_8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2)事實上，盜匪活動在859年第一次引起了規模不詳的民眾起義，但在當時，駐軍本身卻是朝廷主要關心的對象。

雖然在歷來多事之地（東北和武寧）麻煩依然不斷發生，但這時地方駐軍的兵變和騷亂以一種新的形式出現。兵變和騷亂在原來很少發生的長江諸鎮和沿南方和西南邊境的駐軍中突然出現。后一種困境與9世紀中期以后來自南詔的日趨嚴重的外來壓力（對中國本部和安南）和這些地區的土著部落日益擴大的暴動直接有關。政府感到難以將資源轉用來加強南方的防務；辦法之一就是抽調內地各地軍中的分遣隊到那里服役。這個辦法和其他臨時應急措施造成了后勤安排不當和服役期過長，從而又導致了南方戍軍的不滿和偶爾出現的暴力行動。

在長江流域動亂的過程中，浙東的觀察使在855年被趕出其治地，湖南、江西和宣歙諸觀察使也于858年被趕走，其起因部分是相似的。858年朝廷官員張潛稟報皇帝，節度使和觀察使們為了取得優良考績，設法籌集財政結余，當難以增加稅收時，唯一可選擇的辦法是緊縮開支，而軍需和軍餉就是最易下手之處。[[88]](#_8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所以這類兵變與農村農民的苦難有關，但只是間接的。至少以858年宣歙的兵變而言，一篇近期的研究論文表明它還有另一方面的原因。[[89]](#_89_Song_Jing_Xiu_Yi____Tang_Dai)對當時的觀察使鄭薰的苛政的反應是一場兵變，它表面上是武將康全泰領導。但真正的領導人物是幕僚李惟真，此人同時又是一個富商，曾利用其地位的庇護作用和特權而積聚了大量財產，而且私下招集了大批人馬。此外，他的同謀者之一有大量土地，為了灌溉，此人又把持了原來要使130戶得益的水源。這樣的利益沖突無疑在各鎮轄地很普遍；朝廷官員很想嚴厲推行不利于這些人的個人私利的法律和中央政策，但這種企圖始終有引起反對甚至有力抵制的危險。

859年后期浙東裘甫的起義是一個世紀前袁樞之亂以來這一地區第一次出現的軍事大動亂。在整個唐王朝時期，東南一直異常平靜，甚至807年浙西李錡之亂也沒有發生什么真正的戰斗。裘甫的起義在唐代則是新的事物，新就新在它是一次真正的民間農民起義。裘甫本人是貧民出身的亡命之徒，他糾集了200名追隨者以劫掠為生，最后逐漸發展到攻打城鎮和鄉村。他在初期輕易地取得了幾次勝利，攻占了幾座縣城，并且很快發現他的隊伍迅速壯大到了數千人，據我們所知的史料記載，它擴大到了3萬人，此數也許有點夸大。他們被描述成無賴亡命之徒，但其中大部分一定是農村受苦難的窮人。運動從一開始就反王朝，也許還是被階級仇恨所激起的：官員和文人被殺；裘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了年號，鑄造了上有“天平”銘文的印璽。

由于浙東的兵力證明完全不足以平息這次起義，朝廷于是命高級將領王式負責鎮壓叛亂者，并從鄰近諸道和從河南調兵遣將。王式先下手為強，封鎖了主要集結在明州和越州的叛軍的一切退路。他還開倉濟貧，以減少民眾對裘甫的支持或潛在的支持。但戰役仍持續到860年的夏末，經過了叛亂者的頑強抵抗才告結束。雖然這次叛亂主要是地方性的，但它表明在王朝的生存必不可少的這個區域，社會和經濟問題正在接近危急的階段。可以毫不過分地說，作為第一次爆發的民變，這次叛亂常被視為是黃巢叛亂的前兆，或者更確切地說，這是一次被民眾的憤怒和苦難煽起和支持的叛亂。

人們有興趣推測，政府可能采取什么行動路線，以防止它在各地的權力和控制進一步削弱。但得益于現狀的政治上舉足輕重的人可能太多（特別是在各藩鎮中），因此不存在支持根本變化的真正基礎。總之，在一心尋歡作樂的懿宗治下（860—873年在位），對策根本不存在，而他的大臣也沒有表現出什么采取新的主動行動的才能。但如果認為王朝國祚急劇衰落的現象一定到處可見，并以此來描述當時的局勢，那也是錯誤的。裘甫的叛亂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性事件，而且長江流域經過了若干個別地方駐軍的嘩變后，秩序已迅速恢復。國內沒有明顯的重大政治威脅，盡管朝廷已把注意力轉移到南方地區的防務問題方面（這樣做有充分的理由）。但與此有關的措施之一在國內卻有重要的意義。

武寧長期以來是帝國的多事之地，其駐軍在862年趕走了節度使。朝廷任命在對付安南戰爭和鎮壓浙東叛亂中久經沙場的猛將王式以取代其位。雖然朝廷以前曾對徐州的軍隊進行過幾次討伐，但他們一直長期不聽從朝廷指定的節度使。王式率領從各地軍隊中調來的分遣隊進城；朝廷顯然同意了他的行動計劃，于是他開始大批殺戮武寧的軍隊，據說達數千人（雖然其規模很不一般，但像這樣大批殺戮并不是獨一無二的，其他幾次發生在831年的山南西道、819年的兗海、840年的義武和845年的昭義）。這個行動暫時穩定了武寧的局勢，不過許多武寧的士兵設法出逃，轉而去干包括當盜匪在內的營生。后來，為了再進一步削弱這支軍隊，約3000名士兵被派往防務問題又變得非常重要的南方邊境值勤。原則上，他們在三年期滿后應該返回家鄉，但一支已值了兩期勤務的800人的分遣隊又奉命留在桂州再駐守一年。事實證明，這個因素，再加上不滿他們的領導等其他原因，使他們忍無可忍。868年夏駐軍嘩變，并在他們自己的一名軍官龐勛率領下，自行開始了返回家鄉的旅程。[[90]](#_90_Guan_Yu_Zhe_Ci_Pan_Luan_De_J)朝廷事后批準了他們的行動，而只滿足于解除嘩變部隊的武裝。但他們又獲得了新的武器，繼續其返鄉路程，在不到兩個月里到達徐州。徐州的節度使拒絕他們進城，因為他有充分的根據懷疑他們的忠誠。于是他們轉而采用武力，他們的嘩變很快就轉變為公開的叛亂。叛軍這一次又獲得廣泛的民眾支持。嘩變者是本地人，而該地過去又有經歷大風大浪的歷史，這兩者很可能是促使民眾支持的因素。叛亂者奪取了宿州、藩鎮所在地徐州、濠州和其他重要的地方。他們又攻入今之山東、江蘇、河南和安徽諸省。對鄰近區域進行這些襲擊的主要目的是為投奔叛軍者的大集結取得必要的給養。政府不得不動員大軍，對叛亂首先是遏制，然后再鎮壓，歷時達一年多。叛亂最后在868年秋末被平息。在此期間，汴渠的交通當然中斷，這就迫使政府使用另一條航道（但它肯定是不夠的），以便把貨物從南方運往長安。另外，政府的幾次決定性的勝利是通過從邊境派來的3000名沙陀突厥騎兵的援助取得的，在唐代，這是第一次把外國輔助部隊派往黃河以南的行動。

近代有些歷史學家從這一事件中看到這樣一種民眾叛亂的過程：它一方面能夠蔓延到廣大的范圍，但又被叛亂軍事領袖的狹隘和自私的目的所出賣。[[91]](#_91_Song_Jing_Xiu_Yi____Tang_Mo)不管情況是否這樣，我們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帝國的心臟地帶潛伏著大批叛亂分子，他們是心懷不滿的士兵、退役的士兵、原來的謀反者、土匪、走私者和人數最多的那些在農村受壓迫和被剝奪生計的人。被這次叛亂波及的區域遭到嚴重的破壞，所以一定一直處于高度不穩定的狀態，不是短時期就能在經濟上恢復高生產力的。中央的財政遭到沉重的打擊，一方面是因為它直接喪失了富饒和高生產力區域的歲入；一方面是因為要支付巨額費用以供養戰地的軍隊。中央政府對諸鎮的控制一定變得更加松散，這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官員內部對帝國國祚的信心下降了。這樣的一次小事件竟被聽任發展為一次大的叛亂，這對當時朝廷的領導集團來說，幾乎沒有材料可為他們辯護。

但當事變和危機發生時政府難以應付的一大原因在于地方行政和軍事機構的虛弱，這時，它作為中央權威的延伸既沒有力量，又缺乏反應能力。由于兵權的分散和軍費的不足，地方官員在他們所轄地區再也不能保持足夠的安全；此外，駐軍本身的素質也嚴重下降。同樣重要的是，隨著各地行政中心日益處于地方富人集團的影響之下，內部的分裂使這些中心有發生內部破壞的危險。在此以前的一個世紀，藩鎮與中央的對抗是，節度使一般能組織其治地的資源來支持他。這時開始出現的形式是，最初的對抗發生在州鎮內部，矛頭指向朝廷任命的節度使（或刺史）。換句話說，州鎮中心成了內部不穩的根源，不過其意義與安祿山之亂以后的不穩根源很不一樣，但在9世紀第三個25年的整個時期，這些中心尚未呈現出一種公開反王朝的形式。反王朝的形式只是在黃巢叛亂引起的混亂中和混亂后才出現。州鎮中心成了利益集團和土匪盜寇的犧牲品，前者習慣于利用它們，后者像以往那樣先奪權，然后要求軟弱妥協的朝廷正式批準。有人說，藩鎮結構以提供摧毀王朝的手段而告終，但這種情況只是在其領導的組成發生迅速和徹底的改變和它在新的基礎上重新軍事化后才出現的。[[92]](#_92_Can_Jian___Xin_Tang_Shu____J)

從755—906年期間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權力轉移中，人們會注意到一種來回擺動、甚至是周期性的行動，即往一個方向的運動最后讓位于往另一方向的運動，等等。但是在我們的知識足以證明有關的相互作用的因素事實上的確產生一種來回擺動或周期性的形式之前，以上的觀念不過提醒我們“人事中的一種時勢”這個事實而已。此外，本書各章都清楚地說明，唐朝在這一時期有明顯的變化。黃巢之亂時的形勢及其后果與安祿山之亂時的形勢及中央權威因之而變弱的情況很少有相同之處。

可以毫不夸大地說，唐朝廷經歷755—763年原781—786年的危機后有了明顯的恢復，當時叛亂嚴重地動搖了國基。在它作出的種種努力中，它顯然在抓中國歷史中中央政體面臨的關鍵問題之一，即我們稱之為中國這一廣袤領土的團結和凝聚力問題。政府的行動無疑是維持這種團結和凝聚力的先決條件，但如果沒有至少大部分民眾的默認，它就不能長期保持有效。因此，當我們必須專心研究政府在努力重新集權中采用的方法和政策時，它所發現的對實施程度的反應也絕不能被忽視。確認它為政治中心和接受既存體制的情緒在全國一定十分強烈，否則唐政府在8世紀不得不面臨致命的挑戰時不可能幸存下來。9世紀中葉以后，在制度要求和當時主導的社會形勢之間許多人產生了分歧，這大大地削弱了上述的那些情緒。所以，當不法分子在地方上攫取權力和中央逐漸被混亂所困擾時，像前一個世紀那樣對復興唐中央政府的足夠的支持就不可能出現了。顯然，對唐朝權力的最后垮臺，不應作出簡單的解釋。

[[1]](#_1_7)關于晚唐及宋的代表性的觀點，見《通典》卷148，第1頁；浦立本的《安祿山之亂的背景》中有譯文及論述；《資治通鑒》卷216，第6888—6889頁；范祖禹：《唐鑒》（日本，1839年）卷9，第14頁；較近期的西方著作有福蘭格的《中華帝國史》卷3（柏林，1961年，第437—451頁）及浦立本的《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70—72頁）。

[[2]](#_2_7)唯一的例外是張說在722年提出的削減軍隊的建議（他所根據的軍隊總數顯然是夸大的），載《資治通鑒》卷212，第6753頁；戴何都：《〈新唐書〉百官志、兵志譯注》（萊登，1946年），第774頁，注1。

[[3]](#_3_7)《舊唐書》卷38，第1385—1389頁；《資治通鑒》卷215，第6847—6851頁；戴何都：《〈新唐書〉百官志、兵志譯注》，第786頁，注2；參見魯惟一《漢武帝之征戰》中關于西北邊防軍的較低的估計數字，此文載于F.A.基爾曼、費正清合編《中國的兵法》（坎布里奇，1974年），第93頁。

[[4]](#_4_7)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68—69、149—152頁，注32； 日野開三郎：《中國中世的軍閥》（東京，1942年），第16—21頁。

[[5]](#_5_7)但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95頁）和其他許多研究這一問題的作者都采納傳統的觀點，即宰相李林甫造成了這一變化，以保護他自己在朝廷的地位。

[[6]](#_6_7)[參見此處](#_3___Jiu_Tang_Shu____Juan_38_Di)的參考材料。

[[7]](#_7_7)戴何都：《中國唐代諸道的長官》，載《通報》，25（1927年），第279—286頁； 日野開三郎：《中國中世的軍閥》，第13—16頁。

[[8]](#_8_7)見日野開三郎載于《史淵》（87 〔1962年〕，第1—60頁及89 〔1962年〕，第1—26頁）的關于東北邊境史的綜合的（但其部分內容是高度理論性的）論述。

[[9]](#_9_7)關于安祿山的事跡，特別參見浦立本的《安祿山之亂的背景》一書（它敘述到752年），又見戴何都的《安祿山史》（巴黎，1962年）和霍華德·列維的《安祿山傳》（伯克利，1960年）。

[[10]](#_10_7)這一觀點構成大部分傳統記載的理論基礎；關于近時對這一觀點的修正，見岑仲勉《隋唐史》（北京，1957年），第257—260、264—265頁，注8。

[[11]](#_11_7)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重慶，1944年，1956年北京再版），第25—48頁。

[[12]](#_12_7)谷霽光：《安史亂前之河北道》，載《燕京學報》，19（1936年），第197—209頁；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75—81頁。

[[13]](#_13_7)唐代官方歷史中關于這些叛亂時和叛亂后青云直上的軍人的傳記清楚地說明這一點。陳寅格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第35頁以后收集了這類人物的大量材料。

[[14]](#_14_7)[參見此處](#_9_Guan_Yu_An_Lu_Shan_De_Shi_Ji)所列的傳記材料。

[[15]](#_15_7)《舊唐書》卷9，第230頁；《資治通鑒》卷217，第6937頁。

[[16]](#_16_7)關于勤王起事的最完整的記載，見彼得森《帝國的分離部分：中唐和晚唐的東北》第1章（在撰寫中）；又見谷川道雄《關于安史之亂的性質》，載《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叢》，8（1954年），第86—91頁。

[[17]](#_17_7)日野開三郎之文（載《史淵》，91 〔1963年〕，第8—17頁）仔細地追溯了平盧軍的歷史。

[[18]](#_18_7)戴何都：《安祿山史》，第241—255頁；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北京，1959年）卷1，第217—218頁（他與其他歷史學家不同，不去譴責楊國忠，而把攻擊的決定全部歸咎于玄宗軍事上的無知）。

[[19]](#_19_7)關于長期圍攻宋州的情況，見章群《唐史》（香港，1971年），第103—104頁；《舊唐書》卷187下，第4899—4900頁；《新唐書》卷192，第5534—5541頁。

[[20]](#_20_7)見戴何都《安祿山史》，第290—295頁及其參考材料。

[[21]](#_21_7)關于這一政策的堅持和重申，見《冊府元龜》卷87，第13—14、17頁。

[[22]](#_22_7)戴何都：《安祿山史》，第307—321頁。

[[23]](#_23_7)吳章銓：《唐代農民問題研究》（臺北，1963年），第94—101頁；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劍橋，1970年），第34—35頁。

[[24]](#_24_7)《新唐書》卷144，第4720頁；《資治通鑒》卷222，第7101—7104頁。

[[25]](#_25_7)見戴何都《安祿山史》，第335—345頁以及他的參考材料。

[[26]](#_26_7)《冊府元龜》卷88，第1頁；《唐大詔令集》卷8，第9頁。

[[27]](#_27_7)關于回紇插手叛亂的情況，見C.麥克勒斯《唐史記載中的回紇帝國》（堪培拉，1972年），第17—25、55—77頁。

[[28]](#_28_7)C.A.彼得森：《仆固懷恩和唐朝廷：忠誠的局限性》，載《華裔學志》（1970—1971年），第29—33頁。

[[29]](#_29_7)最完整的單獨論述叛亂后地方結構的論著（雖然有的觀點已經過時）是日野開三郎的《中國中世的軍閥》。王壽南的《唐代藩鎮與中央關系之研究》（臺北，1969年）十分有用，特別是它的表列數字，但它絕不能使吳廷燮的舊編《唐方鎮年表》（載《二十五史補編》卷6）過時。

[[30]](#_30_7)岑仲勉的《隋唐史》（第272—273頁）論述了道的數字和變動情況。

[[31]](#_31_7)《舊唐書》卷17下第567頁、《新唐書》卷164第5057頁和《冊府元龜》卷486第21頁估計的數字可能偏低，現向上稍作修正。

[[32]](#_32_7)見《資治通鑒》卷223，第7166—7167頁；卷224，第7214頁；卷225，第7225、7229頁的記載。

[[33]](#_33_7)《資治通鑒》卷223，第7165、7173頁；《全唐文》卷384，第20—22頁。

[[34]](#_34_7)彼得森：《仆固懷恩和唐朝廷》，第423—455頁。

[[35]](#_35_7)這些結論根據吳廷燮的表作出。見彼得森的《763至875年期間官員任命的控制與唐代各道世襲官職的發生率》，這是為1962年芝加哥召開的“唐宋時代傳統和變化”會議準備的未發表論文。

[[36]](#_36_7)關于這一事件，見彼得森的《帝國的分離部分》第2章。

[[37]](#_37_6)《資治通鑒》卷222（應為卷223——譯者），第7175頁。

[[38]](#_38_6)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第20頁。

[[39]](#_39_6)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41、52—53頁。

[[40]](#_40_6)《唐會要》卷84，第1551頁；《冊府元龜》卷486，第19頁。

[[41]](#_41_6)見呂思勉《隋唐五代史》，第264—271頁；又見本書第九章。

[[42]](#_42_6)見《唐會要》卷68—69和卷78的有關文獻；《新唐書》卷142，第4664—4665頁。

[[43]](#_43_6)關于這一改革的主要特征，見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39頁以后及它所列的參考材料。

[[44]](#_44_6)特別見日野開三郎的《兩稅法的基本四原則》，載《法制史研究》，11（1961年），第40—77頁。

[[45]](#_45_6)叛亂本身及逐步導致叛亂的原因，見崔瑞德的論述《皇帝的顧問和朝臣陸贄（754—805年）》，載芮沃壽、崔瑞德合編《儒家人物》（斯坦福，1962年），第91—103頁；彼得森的《帝國的分離部分》第3章有很詳細的論述。

[[46]](#_46_6)《舊唐書》卷141，第3843頁。

[[47]](#_47_6)見浦立本《公元755—805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與新法家》，載芮沃壽編《儒家信仰》（斯坦福，1970年），第102—104頁。

[[48]](#_48_6)見崔瑞德《皇帝的顧問和朝臣陸贄》，第96—101頁。

[[49]](#_49_6)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系之研究》，第206—207頁。

[[50]](#_50_6)見《冊府元龜》卷486，第19頁；《唐會要》卷84，第1553—1554頁；本書地圖16。

[[51]](#_51_6)[參見此處](#_35_Zhe_Xie_Jie_Lun_Gen_Ju_Wu_Ti)所列的參考材料。

[[52]](#_52_6)唐長孺：《唐書兵志箋證》（北京，1957年），第94—95頁；關于全面的論述，見小畑龍雄《神策軍的發展》，載《田村博士頌壽東洋史論叢》（京都，1968年），第105—220頁。

[[53]](#_53_6)崔瑞德：《皇帝的顧問和朝臣陸贄 》，第116—118頁；奏議全部譯文見S.巴拉茲《唐代經濟文集》，載《柏林東方語言學通報》，36（1933年），第168—206頁。

[[54]](#_54_6)主要見矢野主稅《唐代監軍使制之確立》，載《西日本史學》，14（1953年），第16—32頁；《唐末監軍使制》，載《社會科學論叢》，7（1957年），第17—25頁。

[[55]](#_55_6)它們通常（但不是普遍地）以舊的名稱“道”相稱。

[[56]](#_56_6)關于軍事結構最精辟的分析，見堀敏一《藩鎮親衛軍的權力構造》，載《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20（1960年），第75—149頁。

[[57]](#_57_6)關于這方面最充分的論述，見日野開三郎《唐代藩鎮的跋扈與鎮將》，載《東洋學報》，26（1939年），第503—539頁；27（1939—1940年），第1—62、153—212、311—350諸頁。

[[58]](#_58_6)陳寅恪：《從唐詩中看官員的俸祿》，載孫任以都和J.德·弗朗西斯合編《中國社會史》（華盛頓，1956年），第192—195頁。

[[59]](#_59_6)《資治通鑒》卷238，第7692—7693頁。

[[60]](#_60_6)《舊唐書》卷156，第4135頁；《新唐書》卷158，第4945頁。

[[61]](#_61_6)彼得森：《元稹在四川巡視時對貪污腐化的揭露》，載《大亞細亞》，18（1973年），特別是第43—45頁。

[[62]](#_62_6)《資治通鑒》卷237，第7659頁；卷238，第7664頁；《全唐文》卷646，第2—6頁。

[[63]](#_63_6)本節取材于C.A.彼得森《中興的完成：憲宗和諸鎮》，載芮沃壽、崔瑞德合編《對唐代的透視》（紐黑文，1973年），第151—191頁。

[[64]](#_64_6)《舊唐書》卷147，第3974頁；《資治通鑒》卷237，第7627頁。

[[65]](#_65_6)特別見日野開三郎《藩鎮時代的州三分稅》，載《史學雜志》，65.7（1956年），第650—652、660—662頁；松井秀一：《裴垍的稅制改制》，載《史學雜志》，76.7（1967年），第1039—1061頁。

[[66]](#_66_6)《全唐文》卷646，第4—6頁；尤金·菲費爾：《作為御史的白居易》（海牙，1961年），第117—119頁。

[[67]](#_67_6)關于這次戰役，特別在軍事方面，見C.A.彼得森《815—817年反對中央政權的淮西之戰》，載F.A.基爾曼、費正清合編《中國的兵法》（麻省坎布里奇，1974年），第123—150頁。

[[68]](#_68_6)尤金·菲費爾：《作為御史的白居易》，第125—133、153—154、226—228頁。

[[69]](#_69_6)《資治通鑒》卷241，第7768頁；《冊府元龜》卷60，第21—22頁。

[[70]](#_70_6)日野開三郎：《藩鎮體制下唐朝的振興和兩稅上供》，載《東洋學報》，40（1957年），第227—228頁。

[[71]](#_71_6)這些事態發展在彼得森的《帝國的分離部分》第5章中有相當詳細的闡述。

[[72]](#_72_6)關于兩份詔令的內容，見《舊唐書》卷16，第486頁；《資治通鑒》卷242，第7808、7811頁。

[[73]](#_73_6)關于這些發展，見《資治通鑒》卷242，第7811—7812頁；《文獻通考》卷51，第1321頁；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以江賊及“康全泰、裘甫叛亂”為中心》，載《史學雜志》，66.2（1957年），第95—98頁。

[[74]](#_74_6)關于這些文獻，見《舊唐書》（卷157，第4157頁）、《新唐書》（卷164，第5057頁）和《冊府元龜》（卷486，第21頁）。

[[75]](#_75_6)[參見此處](#_35_Zhe_Xie_Jie_Lun_Gen_Ju_Wu_Ti)的參考材料；王賡武：《五代時期華北的權力結構》（吉隆坡，1963年），第11—12頁。

[[76]](#_76_6)關于這種種規定，見《唐會要》卷79，第1446—1451頁。

[[77]](#_77_6)《唐會要》卷84，第1551—1552頁。

[[78]](#_78_6)《資治通鑒》卷244，第7874頁；《舊唐書》卷172，第4471頁。

[[79]](#_79_6)《資治通鑒》卷248，第8010頁。

[[80]](#_80_6)關于河北約820—874年的發展，見彼得森《帝國的分離部分》第5章。

[[81]](#_81_6)見彼得森前引著作第5章。

[[82]](#_82_6)顧炎武：《日知錄》卷9（臺北，1862年），第220—221頁。

[[83]](#_83_6)賴肖爾：《圓仁游唐記》（紐約，1955年），第205—213頁各處及第388頁。

[[84]](#_84_6)這一節取材于以下的研究著作：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第94—121頁； 日野開三郎：《中國中世的軍閥》，第208—215頁；栗原益男：《安史之亂與藩鎮制的發展》，載《巖波講座世界歷史》，6（1971年），第173—178頁；吳章銓：《唐代農民問題研究》，第137—209頁及各處；堀敏一：《黃巢之叛亂》，載《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3（1957年），第1—108頁。

[[85]](#_85_6)《冊府元龜》卷698，第17頁。

[[86]](#_86_6)《全唐文》卷751，第16—19頁。

[[87]](#_87_6)《資治通鑒》卷251，第8121頁。

[[88]](#_88_6)《資治通鑒》卷249，第8071頁。

[[89]](#_89_6)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第116—117頁。

[[90]](#_90_6)關于這次叛亂的記述，見戴何都《868—869年的龐勛叛亂》，載《通報》，56（1970年），第229—240頁。

[[91]](#_91_6)松井秀一：《唐末的民眾叛亂和五代的形成》，載《巖波講座世界歷史》，6（1971年），第246—247頁；堀敏一：《黃巢之叛亂》，載《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3（1957年），第52頁。

[[92]](#_92_6)參見《新唐書》卷50，第1324頁（戴何都：《〈新唐書〉百官志、兵志譯注》，第751、785頁），它沒有注意到地方行政不時發生的變化。

# 第九章 晚唐的宮廷政治

中國歷史上8世紀和9世紀的史料大多數已見于文人著作中，它們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了以前時期的材料，因此我們很容易設想唐朝末年生活的一般特性是怎樣的。除此之外，本文的主題——研究從755年到大約860年間的重大政治問題——比其他任何題目在文獻和歷史著作中或許都得到了較好的反映。可見，對政治歷史學家來說特別令人失望的是，有幾個晚唐宮廷中的主要問題我們將永遠不可能得出滿意的答案，因為文獻不足征之故。這不是一個枝節問題，也不是一個如何自圓其說的問題，因為9世紀的材料，無論就數量或質量來說都有嚴重的缺陷。所以我們必須把中國的眾多史料作非常仔細的推敲，盡可能不使它們的愛惡偏見和缺而不載的地方把我們引入歧途。自然，這個方法看起來并不出眾，但是對于某些晚唐的題目（例如9世紀的政治派系斗爭，千余年來都在那里各執一詞地解說紛紜）說來，由于缺乏過硬的新材料，所以究其實只能對傳統的曲解加以解析，此外就再也不能有什么作為了。有時，我們能從唐代的詩文集中勾稽一星半點關于這些困難問題的材料，但毫不奇怪，這些用來確證發生在很久以前的事件的材料又往往證明是站不住腳的，或者是不可信的。總而言之，現代學者才剛開始致力于8世紀和9世紀中國歷史上的許多重要方面的研究，因此，下面的論述應該看做對晚唐政治所作的一個初步的提綱挈領式的描繪。

## 安祿山之亂及其后果，755—786年

安祿山（703—757年）是一個有部分粟特人血統的職業軍官。[[1]](#_1_Pu_Li_Ben____An_Lu_Shan_Zhi_L)他在政治強人、宰相李林甫（752年死）的庇護下，從地方行伍起家，爬到了雄踞滿洲邊境的范陽鎮節度使這一權重一時的高位。[[2]](#_2_Pu_Li_Ben____An_Lu_Shan_Zhi_L)在8世紀40年代之末和50年代，安祿山裝成普通一兵和滑稽可笑的小丑模樣，成了長安最新奇的怪人，甚至被寵妃楊貴妃認為義子。可是在李林甫于752年死去以后，安祿山認為自己是唐朝朝廷中有力的爭權者，因為他在東北建立了強大的基地。他威脅著楊貴妃及其堂兄、身為新宰相的楊國忠（756年死）的地位。于是這兩方政治勢力展開了一場神經戰，因為在8世紀中葉，雖然唐玄宗（712—756年在位）不積極參加一般朝政了（史書責怪他專搞宗教活動和沉湎于奢侈生活），但國事的處理和政權的行使仍然需要得到他的贊助或批準。在這樣一場爭權力的斗爭中，在京城的楊家兄妹當然比安祿山占有地利的優勢，因安祿山身在范陽，相距800公里之遙。他不可能冒險地長途跋涉到長安去駁斥楊家對他的控告，但他也不能準許楊家的陰謀發展下去，讓敵人解除他的兵權，甚至將他投入審訊。毋庸置疑，這種猜疑不安的氣氛一定促使他下決心向朝廷造起反來。[[3]](#_3_Jian_Qian_Yin_Pu_Li_Ben_Shu)

安祿山掌握訓練有素的精兵，按不同的估計約有10萬—20萬之眾（包括從邊疆部落中征調的騎兵），另有在今日北京周圍地區的一個鞏固的基地。反之，由于中央軍和其他軍事組織都已腐敗，政府則準備不足。[[4]](#_4_Bin_Kou_Zhong_Guo____Cong_Fu)它自己沒有直接掌握的軍隊，只有由皇宮侍衛組織起來的一些小部隊。結果是在叛亂爆發后不到兩個月的755年后期，安祿山的軍隊就長驅直入地南下，過河北，下東都洛陽，并且進抵潼關東端的渭水和黃河交匯處，其地距長安僅100公里遠了[[5]](#_5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1)（這一叛亂的細節，詳下）。

唐廷只得唯那些尚忠于皇室的節度使的軍隊是賴了。節度使哥舒翰（756年死）曾為朝廷效力，用兵于西部邊境以反對吐蕃，現時派他來鎮守潼關，以遏阻安祿山的前進。可是，他一到任就陷入絕境，在他和朝廷之間爆發了棘手問題。為了消解長期存在的不滿，哥舒翰于756年初勸說皇帝誅殺另一節度使。楊國忠對這件事無左右的能力，他憤怒地把哥舒翰的復仇行為看做另一次銳利的打擊，即一個封疆大吏想犧牲朝廷官員以取得權力的殺手锏。因此，楊國忠進行反擊，他建議皇帝命令哥舒翰從安全的潼關據點向叛軍出擊。唐玄宗接受了楊國忠的建議；盡管哥舒翰反對，但他別無選擇，只得遵命出擊。他的軍隊馬上被擊敗和潰散。哥舒翰于是投降安祿山。通向長安的道路被打開了。

像驚弓之鳥的皇帝及其隨從于756年年中從京師向西南方向逃亡，經過崎嶇山路之后進入四川境內，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名播古今的事件。唐玄宗的逃難成了許多繪畫和詩歌的題材，其中最著名的有白居易（772—846年）的歌行《長恨歌》，此詩敘述了皇帝被亂兵所迫同意處死楊貴妃后的悲痛之情。[[6]](#_6___Bai_Xiang_Shan_Ji_____Shang)士兵們還要求殺楊國忠，作為他們護送唐玄宗，過離鄉背井的凄苦生活的代價。不論是《長恨歌》還是關于這一事件的其他傷感的詩歌，宰相楊國忠和楊貴妃都被說成是以前15年盛世繁華的凋謝的象征，也被看成是罪有應得的腐敗人物。他們自然要負一定的責任，但他們也是那些被破壞了舒適生活的人們泄憤的替罪羊和犧牲品。對于政治和社會精英集團來說，他們感到震怖莫名，因為他們看到了強大的唐帝國政府竟然瓦解于頃刻之間，更為震驚恐怖的是，皇帝已于夜間僅帶少數親人和心腹悄悄離開京城出走，他們自己卻被遺棄在原地。許多世家大族的成員驚慌失措地南逃，有些人再也沒有回來。長安陷落后不久便出現了8世紀后期經常能見到的悲觀失望的不信任情緒和嚴厲批評的情緒。[[7]](#_7_Pu_Li_Ben____Gong_Yuan_755__8)

離開了馬嵬驛行刑之處以后，唐玄宗的逃難人群便一分為二。實際上，在馬嵬驛向皇帝紛紛提出應該去的地方有幾個——有人說去太原，有人說去靈武，有人甚至建議折返京城；但是不管有多少人反對，皇帝仍然堅持楊國忠原來的意見，那就是他應該逃往四川，而由他的臣民尋找時機，重整旗鼓，并趕走叛亂者。當玄宗出發往成都時，他把太子暫時留在后面，讓他向老百姓的代表解釋這一戰略撤退的意義。代表們生氣了，結果，太子的心腹顧問們——包括他的兩個兒子在內——都敦勸他應促使唐王朝努力捍衛自己。他們爭辯說，如果他和他的父親都僻處西南而不與天下通聲氣，那么，唐皇室將很快被人遺忘。史料告訴我們，太子在經過應有的遲疑之后，聽從了他的顧問們和人民的意見而向北進發，只帶了數百人急行軍至黃河西套的靈武。在這個設防堅固的根據地，太子打算召集仍然忠于皇室的將軍們和節度使們糾集和裝備一支勤王軍，以期奪回京城，準備讓玄宗勝利地回鑾。正像顧問們所指出的那樣，要盡孝道，莫過于此。[[8]](#_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1)

形勢很快就明朗了，太子自己應該即皇帝位，而關于他一再遜讓的說法也恐怕是史書上的溢美之詞。756年夏，唐玄宗上太上皇帝尊號；雖然他在一段時期內繼續暫時保留了一個朝廷，但符璽卻被送往45歲的太子處；后者的廟號是肅宗（756—762年在位）。可以假定，對這樣一次篡權行為有過一些反抗，但是，老皇上畢竟能處之以很得體的方式，并且他也定能憶起他就是在非常時期即位的，所以他沒有試圖阻止此事。總之，幾乎沒有哪一個高級官員贊成一位宰相提出的建議，把唐帝國分給玄宗皇帝諸子，使之形成為一種封建的政體。[[9]](#_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1)大家一致的意見是，進一步分裂國家實乃災難。

遠方州鎮中效忠唐室的官員得知肅宗即位的消息是在約兩個月以后，但他們至少有理由開始希望在他的領導下能中興唐王朝。盡管西北的少數軍官在最初有所反抗，但帝國數以萬計的軍隊紛紛從東線抵達靈武和太原，從而壯大了那里的隊伍。這些部隊由將軍郭子儀（697—781年）和李光弼（708—764年）統率；這兩個人即令不像后世史家所說的那樣是百戰百勝的軍事天才，也仍不失為有能耐和富于經驗的將領。另外，通常構成中央政府的官僚群現在不在皇帝身邊了，這本身就是有利條件。軍隊可以向地方征發糧食馬匹，以滿足他們大部分的需要，同時，數量不大的給養品也從華中經過漢水運到了靈武。肅宗的流亡政府在757年初已積蓄了足夠的力量來打敗他的一個兄弟永王璘的挑戰，后者想在長江中游建立一個單獨的“封建”政權。

經過了許多令人鼓舞的勝利之后，757年春天肅宗決定以收復長安為天字第一號任務。由于得到其地位至少是可汗之子所率領的、來自北方大草原的回紇突厥騎兵的幫助，這次戰役在秋天發動。長安迅速攻克，但當要求回紇人繼續前往洛陽時，困難出現了。回紇王子聲稱，沒有人把這計劃于事前告知他，他便當面羞辱唐王朝的新皇太子。后來在克復洛陽之后，政府不得不在原議之外又厚賂回紇人，以示籠絡。可是，就在那個冬天，唐皇室嘗到了凱旋的甜頭。太上皇帝又一次祝福他的兒子繼位，官吏們都領受了賞賜，黎民百姓至少可免于叛亂者的擄掠和殺戮之苦。

但是，這樣匆匆忙忙地回到兩個首都來，是不是一個戰略性錯誤？很可能是的，因為朝廷突然放棄居無定所的狀態，采取了固定的駐地，這樣就負起了供應和防衛固定駐地的責任。雖然皇帝的軍隊足以打到洛陽，但他們還得深深地依靠外族的騎兵來建立打擊力量，所以他們根本自己無力向前進軍。而且最重要的是，唐王朝既然生存下來了，緊迫感即隨之消失。人們的思想開始注視著自己的未來；他們不再艱苦地作戰了；因此戰爭拖延了下來。現在已不像肅宗在靈武時，甚至也不像后來進軍長安時期那樣毫無其他道路可走。例如，李泌（722—789年）即令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也是肅宗的一位高明的宰相，他曾向肅宗提議直取叛軍的心臟范陽。叛軍的交通線似乎延伸得太長，而那種策略可以深入敵人領土，在側面包圍敵人在洛陽和長安的軍隊。在皇帝的部隊和懸隔于河北的勤王之師的飛地之間也可以建立聯系。但是肅宗仍然堅持，奪回皇宮表示光復故物，而打敗叛軍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可是，時間也恰恰是叛軍所需要的。他們撤退至今安陽地方重新糾集，諸叛軍領袖在這里企圖共商大計。757年初期，安祿山已在其子安慶緒的唆使下被人刺殺；據安慶緒自言，他刺父的動機完全是要保護叛軍高級官員免受他父親喜怒無常的荼毒之苦。但是，叛亂運動的凝聚力大部分靠安祿山與他的隨從者的個人聯系來維持，而這種聯系并未傳給安慶緒。安慶緒和叛軍最能干的將領史思明之間出現了不和。759年初期史思明刺殺了安慶緒，將其軍隊撤至范陽，自己即叛逆的“大燕”王朝的帝位。過了約一年時間，叛軍的處境似乎好了一些，他們就準備于760年夏再從肅宗的軍隊手中拿下洛陽。但河北和河南的軍事形勢那時主要已成僵持局面，于是史思明引軍向南，想第一次把戰爭引向淮河和長江流域，不過未取得顯著的成功。也許由于這個原因，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義所殺，雖然其情況和口實都和第一次弒父事件十分相似。5年之內出現了3個殺人兇犯和4個皇帝，這一定大大地削弱了叛軍，但是叛亂運動仍堅持了下來，因為政府未能采取有效的行動。[[10]](#_1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

事實上，隨著時間的流逝，朝廷取勝的希望也暗淡了下來。由于軍情緊急和便于收復長安而在靈武建立起來的明確的野戰指揮體系，[[11]](#_11___Tang_Hui_Yao____Juan_78_Di)因危機緩解而趨于崩潰。將軍們不聽太子的指揮（太子也不是一位很得力的總司令），他們彼此間也互不協調。政府感到非常難于鼓舞他們和酬謝他們；榮銜與爵位賞賜得太濫，而且硬通貨現在也越來越緊缺了。朝廷不能使它的將軍們忠勇善戰，加上文官們和有權勢的宦官們（詳下）積極干預軍務，所以把事情弄得更糟。何況長安還有許許多多政治上的陰謀詭計。由于所有這種種原因，政府的戰略約在759年初之后主要就只采取靜止而虛弱的守勢。這個時期郭子儀于759年和李光弼于761年領導的兩次最大的攻勢，都以慘敗告終。

這一格局直到玄宗與肅宗于762年春同時期晏駕才得以更張。當時即位的太子為代宗（762—779年在位），并不是一個能徹底改進朝廷形勢的能干之君，但他在接獲一則重要情報后也確實措置得很賢明。一個派往回紇進行修好的使節報告說，回紇與叛亂皇帝史朝義已有勾結，并且已被史朝義所誘叛；這使節又報告說，回紇人此時正動員一支大軍前來進犯。唐代宗立即派遣了一位有能力安撫他們的人仆固懷恩（765年死）前往；仆固懷恩是一位先世為突厥人的重要將領，他的女兒在幾年前已嫁給回紇的可汗。[[12]](#_12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21_D)由于用了大量的貨賄，仆固懷恩說服了他的女婿，叫他不要叛唐，反之，他應該助唐攻擊洛陽的叛軍。

可是，正在這次討伐的進行過程中，中國的新太子——即未來的德宗（779—805年在位）——和回紇可汗之間發生了很類似于757年的事件。身為中國軍隊的統帥的太子得罪了可汗，因為他沒有對可汗表示這些游牧民認為是得體的尊敬。其結果是，太子扈從中有幾位勸他保持天潢冑裔尊嚴的中國官員，被回紇人鞭打致死，以作為懲罰。自然，這對唐王朝的威望來說是一次重大的羞辱。渴望打仗而以此為劫掠口實的回紇人在收復洛陽后繼續大肆殺戮和擄掠，但他們不是針對官軍，而是針對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其實還應該公平地補充一句，中國軍隊把洛陽當做叛軍領土，所以他們也趁火打劫。三個月之后暴行才最后止息，但已對那個地方的經濟造成了廣泛的損失。

可是，中國與回紇人的聯合軍事行動迫使史朝義逃遁，也使得他的將軍們考慮投降唐軍而保命自全。政府鼓勵他們倒戈，答應原封不動地保留他們現在所居領兵官的地位。史朝義再經過幾次嚴重打擊之后，當他試圖逃往邊地民族中以求自全時，因眾叛親離而被殺。朝廷于是任命他的四員副將為節度使，各人領其州鎮，[[13]](#_13_ProvincesYi_Ci__Zai_Wan_Tang)事實上即今天河北與河南北部之幽州、相州、成德和魏博。因此，唐朝政府并沒有實際打贏這場戰爭，甚至也不能肯定地證明它可以打贏這場戰爭，但它又從最嚴酷的危機中掙扎著站了起來，而且武斷地宣告大叛亂已經平息。

可是，后來的事件表明，朝廷同東北的沖突仍方興未艾。盡管史朝義已傳首長安，同時政府還有其他自我陶醉的慶功活動，事實卻是中國的東北部已變成了自治地方。節度使的職位總是使他擁有廣泛的文職權力，而且據知，在762年之末他們都在所管轄的地區內對平民肆無忌憚地行使法律特權，在此過程中實際上擁有君主式的權力。長安在幾個方面都被迫把這些州鎮當做重要的半外國性國家，盡管這樣做有損于它的威望，或者更確切地說，有損于它的自尊心。8世紀后期和9世紀初期的皇帝們一直擔憂，怎樣才能把他們對全帝國的至高無上的權力和當時的政治現實調和起來，關于這一點我們即將在本章下文詳細申述。

朝廷也沒有多少空閑在763年去搞慶賀，因為這一次從西邊又出現了新的威脅。中國和吐蕃王國的關系從來沒有一個打得火熱的較長時期。到了8世紀中葉，710年中國—吐蕃王朝婚姻所帶來的暫時修好又被人們忘得一干二凈。[[14]](#_14_Shan_Kou_Rui_Feng____Tu_Fan) 8世紀的30年代和40年代不時發生邊境戰爭。安祿山叛亂爆發以后，吐蕃王乞黎蘇籠獵贊（754—797年在位）就決定利用中國的這一次內亂。[[15]](#_15_Guan_Yu_Tu_Fan_Zhu_Wang_De_M)他命令他的騎兵通過位于今天甘肅省東部和青海省的隴右道與河西道逐步向前推進。大約在760年以后，吐蕃人每一年都要打下幾個塞外州城，到763年便蠶食到了關內道（今陜西）西部邊境的城市。唐朝廷并不十分介意吐蕃人的威脅，可能是因為中國那時正受到鄂爾多斯地區邊境部落的外來壓力，[[16]](#_16_Ji_Tang_Gu_Te_Ren__Gang_Qi_J)至少從心理上說受到了回紇人的壓力。因此，在8世紀60年代初期，唐王朝對吐蕃人之會攻打長安是一點準備也沒有的。

763年晚期，邠州刺史開城門投降了吐蕃，使他們因此距長安只有125公里。代宗頓時驚慌失措。他和朝廷逃往去洛陽半道上的陜州，而老百姓和世家大族也又一次四散逃命。由太子和郭子儀匆忙地組織起來的地方防御部隊也隨之撤退，以圖鞏固陣腳。吐蕃人于763年陰歷十一月突入長安，留在城內約半月，對這個最近重建的城市大肆燒殺擄掠。吐蕃人選了一個中國公主的年邁的兄弟做傀儡皇帝；這公主在50年前嫁給一位吐蕃王。

唐軍不久重新進入了長安，但吐蕃人很心滿意足地帶著擄獲物而揚長而去。唐代宗于764年初期返城，并處死了僭偽之君，但這只不過是一個小小慰藉。吐蕃人的實力沒有受損，他們只退回到了陜西西部的主營地，這就是他們半年前出發的老地方。在以后的13年內，即直到777年，吐蕃人幾乎每年秋季都要出擊，這是游牧民照例進行軍事活動的季節。他們每一次行動的騎兵兵力都有所不同。有時他們只不過出動5000人，但正像郭子儀所哀嘆的那樣，中國軍隊在反對吐蕃人的勢力時極像驚弓之鳥。767年和774年有兩次軟弱無力的和平倡議，但都無甚結果。吐蕃人不僅意識到中國在繼續削弱下去，甚至于768年把他們的一位最好戰的將領從戰場上召回去當了大相，從此他們對中國人的壓力就更大了。唐朝要積以時日才能使它的防御發揮效力。直到774年末，郭子儀才估計出他的軍隊只及吐蕃可調動的人數的四分之一，而他所能支配的馬匹相比之下也是微不足道的。[[17]](#_17___Quan_Tang_Wen____Juan_332)我們沒有關于在8世紀60和70年代吐蕃人偷掠了多少東西的確切材料，但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他們的侵襲給唐朝緩慢的恢復進程造成了破壞性的后果。一個特別嚴重的打擊是唐帝國把在隴右的最優良的牧馬場地丟給了吐蕃人，從而使得中國更要仰賴回紇人的馬匹和他們的騎兵支援。

安祿山之亂以后最使唐王朝感到不堪的是他自己的一位將軍仆固懷恩的叛亂；此人在762年因約束回紇人而給唐王朝幫了不可估計的大忙。作為763年輔助部隊全面復員的一部分，仆固懷恩曾受命護送回紇可汗返回他們的大草原老家。可是，他在北上途中與回紇人會合時，與河東節度使發生了沖突，后者拒不按常規禮儀給予他的軍隊在過境時所應享有的犒賞。節度使之所以拒不犒師，其理由尚不得其詳。不過，這位節度使也和大家一樣，對一個與外國有關系的掌重兵的武人會搞另一次陰謀的可能性一定心存戒備，換句話說，他怕會出現第二個安祿山，這種心理狀態促使他控告仆固懷恩圖謀不軌。唐代宗命一名宦官調查此事，結果他支持了河東節度使的控詞。仆固懷恩上了一篇長疏為自己辯白，皇帝竟未置答。[[18]](#_1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仆固懷恩把這種沉默視為駁回其辯詞，于是也像安祿山一樣決定為自己的生存而斗爭了。764年初期，他派他的兒子率軍攻太原。他的兒子在太原戰敗，后來又被部下所殺，但是仆固懷恩逃往靈武，在那里重新糾集軍隊。他的主要盟友是吐蕃人，后者也已打算進攻長安，他們正需要一個知中國內情和有領導藝術才能的人，才能大獲全勝。有些回紇雇傭軍也加入進來。這支像滾雪球般的大軍在764年秋天使京師西邊通路上的居民大為震恐。次年，仆固懷恩準備率軍采用包圍戰術，但他忽然暴死于營地。這次攻勢便無形瓦解，他的許多士兵投降。中央政府后來把這些事件歸于天意。郭子儀收買回紇雇傭兵去攻擊吐蕃人，于是吐蕃人西撤而去。

這次叛亂實在是一系列同類叛亂中最嚴重的一次，這時地方文武官員或者丟了官，或者甚至丟了性命，因為在他們和被圍困的唐朝廷之間彼此都缺乏了解。[[19]](#_19_Li_Ru__Ke_Kan_Liu_Zhan____Zi)皇帝和他的顧問們曾經情有可原地警惕著戰場上的可疑行為，但有時他們的關心又近乎偏執狂。誠然，中央政府自己也助長了這類問題，因為它準許各種私仇影響國家事務，也不考慮必須制定對付臣下附逆或謀反的一以貫之的方針。盡管精心制定了對被控的附逆者進行調查和起訴的程序，但很清楚，在許多情況下起決定作用的是政治，而不是法律。如果叛亂高級官員可以不加追究，甚至能當上朝廷的官員，那么，王朝的忠順小官吏就會捫心自問，他們還值得繼續效忠嗎？流言蜚語、陰謀詭計和意氣用事嚴重地損害了士氣民心，而且也和其他任何事情那樣損害了唐政府在安祿山之亂后重建的能力。

### 唐代宗時代（762—779年）長安的政治現象

宦官

宦官在朝廷政治中的活動，無疑是唐代后期歷史上的一個特點。可是，他們的重要作用是逐漸形成的，他們在唐代前半葉的作用是很有限的。[[20]](#_20_Lai_De_Ao_Te____Tang_Dai_Hua)唐初的宦官一般是來自戰俘，或來自南方邊境地區（福建和廣東）的幼兒，他們被太宗皇帝在后宮和皇宮中當仆役使喚。太宗下詔規定，宦官的身份應永遠限為平民，也不許他們做高官，即不能任職在三品或三品以上。[[21]](#_21___Tang_Hui_Yao____Juan_65_Di)可是為時不久，這些初期的硬性規定就被篡改，因為宦官的用處對許多皇帝來說變得很明顯了。內侍省從唐王朝初年起就由宦官組成，它原本只限于搞些宮內日常生活事務，后來慢慢擴大了它的權力范圍，直到它變成了最龐大和最重要的官衙，統包了皇家的全部家事。在武則天皇后（690—705年在位）時期大肆任用雜差，宦官的數目增加大約3000人。[[22]](#_22_Tong_Shang_Shu__Di_1131Ye__W)由于他們是朝臣中唯一有權不斷接近皇帝的人，甚至在皇帝的燕居中也是這樣，所以宦官開始變成了皇帝和朝臣們之間的中間人。最初他們只是照料一下文件和口宣詔旨，但是到了后來他們偶爾也參加重要的議事。他們只向皇帝個人負責，而且完全從屬于他。唐玄宗則把他們當做心腹信使和情報來源來使用。

高力士（762年死）是初唐最著名的宦官，在從710年起的10年中為唐玄宗獲得帝位起過關鍵的作用，因而自此以后他在朝廷內有很大的個人影響，直到玄宗在叛亂時期去世為止。高力士是第一個獲得三品官位的宦官，從而破壞了太宗的禁令。從8世紀中葉起，宦官們還被授以貴族爵銜。安祿山之亂的危機自然為高級宦官謀求私利提供了機會。第一個這樣的宦官便是機靈的李輔國（762年死），他在肅宗當太子時就是東宮的一個隨從。在靈武的時候，新皇帝很賞識他的才能，把他拔擢為元帥府行軍司馬；在實行總動員的時候，他在這個職位上的權力可以匹敵正常任命的宰相。在皇帝回鑾長安以后，李輔國同時被授以許多專使之職，因此看來從這時起，禁城的物質設施、人事大權和供應都已全歸宦官掌握。自從李輔國弄到了殿中監之職以后，他的個人地位更高了。從758年到762年，上呈給皇帝的重要奏疏和皇帝的詔旨都要經過他的官署，并且要得到他的準許才能付諸實施。除此之外，他的辦事班子顯然已竊奪了御史臺和大理寺的某些調查的職能。

比起高力士來，李輔國在朝政中的表現要活躍和經常得多。李輔國經常插手于封疆文武大員的任命事宜，有一次他甚至要帶頭詆毀太上皇。肅宗的張后是李輔國長期以來的盟友，李輔國由于有了張后的幫助才能夠為私利而與最顯赫的李姓朝臣相對抗。大臣們最后挫敗了他想當宰相的計劃，但這一阻礙他野心的行動卻是不多見的。他是一個不斷制造陰謀詭計的人，他可以毫不猶豫地在今天反對昨天的朋友。肅宗死去以后，他挫敗了張后想殺害未來的代宗而立己子的企圖；他得到他的下屬程元振發出的警報，派了一隊禁軍[[23]](#_23___Wen_Xian_Tong_Kao____Juan)粉碎了這次陰謀，并殺死了張后。[[24]](#_2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李輔國的這些舉措開了重大事務上的先例：宦官控制了個人朝見皇帝的大權；他們插手中央政務；他們過問封疆大員的任命；他們以兵力干涉皇帝的繼位問題。所以對宦官表示深惡痛絕的歷史學家們，無不怒斥8世紀中葉的皇帝們聽任宦官大煽威虐，這是不足為怪的。但也絕對應該記住，這時宦官的權力還得依托當今皇帝對他的恩寵，因為宦官的權力的制度化是一個一直延續到9世紀的長期發展過程。盡管李輔國在宮廷斗爭中有擁戴代宗之功，他卻被這位新皇帝所恨惡和恐懼，所以代宗于762年雇用幾個刺客把他殺了。關于宦官擁有派生權勢的另一個例子便是程元振（約死于764年）。他在763年獲代宗之寵，但是，由于據說他不讓皇帝知道吐蕃人即將入侵的危急情勢，代宗于764年回到長安后即把他當做叛國者，予以充軍外地。雖然程元振接下了李輔國原來的許多職位，但他沒有借此有所作為，也沒有能夠選擇一個接班人來繼承他的很高的政治地位。

最后，像許多學者指出的那樣，唐朝后期宦官之所以大得其勢，是由于他們取得了獨立的兵權。[[25]](#_25_Wang_Shou_Nan____Tang_Dai_Hu)擁兵自重的最初幾個重要步驟是在8世紀60年代進行的。當唐代宗于763年逃避吐蕃人去陜州巡幸時，他受到宦官魚朝恩（死于770年）所率領的神策軍的迎接和保護。神策軍是哥舒翰作為西北邊防軍在754年建立的，但它在安祿山發動叛亂后即被調往東部。當它的老家基地被吐蕃人蹂躪以后，這支部隊被重新組織起來并駐扎在陜州，成為河北戰斗中的第二道防線。到了763年，它經受過幾次考驗，以堅強有力和可以信賴受稱于時。[[26]](#_26___Tang_Hui_Yao____Juan_72_Di)代宗回鑾京師以后，他把神策軍編入禁軍并交給魚朝恩指揮，以示恩寵和優遇。由于府兵制的破壞和邊防兵力的日益擴充，8世紀上半葉的禁軍遭到嚴重削弱，神策軍之加入禁軍就使得戰斗力大異往昔。現在是在幾十年內朝廷能第一次把自己控制的軍隊投入戰場，而不再需要完全乞憐于地方節度使等武人的幫助。在8世紀60年代，魚朝恩在長安正西的永久性基地監督建立了神策軍，使皇帝能招之即來。正和我們所預料的一樣，宦官權勢大到如此地步，當然從一開始便引起朝臣們的妒忌和疑懼。魚朝恩的作為果然不出他們的所料，他夸耀自己新近獲得的財富，而且插足政府的神圣領域（例如判國子監事），被百官視之為荒唐不經之舉。代宗有時也對魚朝恩的行為表示不安，所以經過復雜的陰謀而于770年將他處死。他的同伙或者被殺，或者被驅散。一名官員被任命來統率神策軍，直到783年又起戰亂時，宦官才重新負起了軍事之責。

財政專家

安祿山之亂引起的唐帝國混亂的經濟生活，需要代宗朝廷給予迫切的注意。政府的儲備全被戰爭開支和官吏侵吞所耗竭。戰斗弄得中國北部許多地方殘破不堪，促使農民成群流徙，特別在河南更是如此；交通運輸系統弄得非常緊張；而河北的淪陷又使中央政府喪失了最大的稅收來源。[[27]](#_27_Cui_Rui_De____Wan_Tang_De_Di)從8世紀50年代后期起，一個新興的財政官員集團著手解決這些問題和其他相關的問題。雖然他們的工作不完全成功，但是他們想方設法不讓不景氣的經濟形勢變成災難，不僅如此，他們還對政治有相當大的影響。

為了了解這些財政官員，我們必須對歷史情況作一小小的回顧。唐帝國諸特點的變化開始發生于7世紀后期和8世紀初期。在玄宗時代，這個大而復雜的國家在政府開支和官僚體制方面已經有了巨大的增長，另外，在土地所有制形式方面也不斷有所改變，而這種變化反過來又是和中國各地方的社會和經濟大混亂相聯系的。初唐政府比較簡單的制度結構已不夠用了，不僅僅在財政方面是這樣。不言而喻，玄宗沒有沿著更加合理的路線改進他的總的行政系統。相反，政府只是努力根據具體情況，通過任命專“使”，一個個地處理它最緊迫的經濟和政治問題。[[28]](#_28___Tang_Hui_Yao____Juan_77__7)這種專“使”在晚唐十分重要，但他們不是正式官制的一部分，雖然他們掛名領干薪——為了官階和薪水的緣故通常都入御史臺。不像一般的官員，他們的權限在法律上都被限制得很死，但御史們獲準可以打破傳統的部門界限，以便對政府的活動能在職能上予以協調。他們有權雇用文書和會計。他們特別適于解決涉及朝廷和地方雙方的問題，因為這種問題對于皇帝的顧問們來說是太專門了，而且也為一般行政官員權力所不及。初期御史中最著名的人物是那些登記流民、征收和運輸土地稅以及搞邊境防御（原來的十節度使）的人們。[[29]](#_29_Li_Bo_Hu____Tang_De_Lu_Ling)

安史之亂時期，土地稅收之損失給朝廷造成了特別嚴重的困難。在正確地推行舊的租庸調制度中所必需的人口登記和土地分配辦法，已顯得過時和無用。758年提出的一個方案要強迫實行食鹽專賣，作為土地稅的部分代替。新設的鹽鐵使監管食鹽的專賣（應該注意，這里包括“鐵”字不過是仿照漢代前例而言，在唐代并非實有其事）。中央政府在各地方設署管理食鹽專賣，領有執照的生產者必須把鹽統統賣給專賣官署；專賣官署把食鹽加上巨額稅收轉賣給商人，商人便把這些費用轉嫁給消費者。由于帝國政權控制了所有主要的鹽產地，又由于鹽是生活必需品而肯定有最小限度的市場，因此，建立有效的壟斷是可能的。在食鹽專賣創立后的短短幾年中，它便提供了帝國現金收入總數的半數以上，從而大大地補充了直接土地稅收入的不足。

對于財政官員來說，鹽鐵使署是應付政治緊急情況的工具。隨著越來越多的經濟職能納入鹽鐵使署，它們的官員的財權和官職的劃分也都經過推敲和斟酌。765年以后政府設立了兩個財政區：其一（技術上稱為鹽鐵使署）設于揚州，負責華中和長江中游的財政；其一（屬戶部的度支）設在長安，負責中國北部和四川的財政。[[30]](#_30_Cui_Rui_De____Tang_Dai_De_Ca)重要的是，經過了第一個世代之后，搞這些工作的官員都成了財政專家。他們的這種任務大大不同于唐代初年那些非專業化的行政官員的類型。在安史之亂以后的時期，他們發展了原來的專業水平和自負心理，被準許可以從正式職官之外選用下屬員司，因此在行政系統內引進了一種進入政府官署的新途徑，它一直存在到北宋時代。[[31]](#_31_Hao_Ruo_Bei____Zhong_Guo_Bei)

當這些財政專家擴大活動范圍，甚至包括像制定初級預算和經管財產稅等復雜的任務時，他們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障礙。其中有些困難，像無法穩定貨幣等，是當時經濟理論尚未充分發展的結果，因而成為直至唐朝滅亡為止的禍患。[[32]](#_32_Hao_Ruo_Bei____Tang_Dai_Zhi)其他困難是政治方面的。例如，在安史之亂時期，為了確保安全，大量政府收入曾放入皇帝個人金庫，而不是放在國庫內；這種辦法到戰爭結束以后還在沿用。但是，皇帝庫藏（內庫）的收入和支出的管理權卻落到了皇帝私人仆從宦官的手里。[[33]](#_33_Shi_Yong_Fang_San____Tang_Mo)由此而產生的結果是，財政專家們不可能從根本上放手完全管理帝國的經濟事務。他們沒有其他辦法，只能冒著被他們的政敵指控為腐化的危險而與宦官合作。受經濟犯罪——例如貪污盜竊、納賄招權、高利盤剝，甚至違反節約法令而鋪張浪費——的牽連而招致的聲名狼藉，在唐代是十分嚴重的。因此，財政官員特別容易受到絕大多數朝臣的攻擊，因為后者對財政官員和對宦官的興起都感到震驚。

政治人物

756年楊國忠死后直到元載（777年死）于762年拜相以前，朝廷沒有出現值得一提的人物。不像安史之亂以前數十年中的許多顯赫人物那樣，元載并非出身于名門。他原本姓景，后來改用北魏（拓跋）皇室之姓氏——元——以表示寵異，同時也更易為社會所接受。元載進入仕途的經歷也非比尋常：他最初是在唐玄宗時代考上了道教經典的特科考試。由于舊政體下資深的政治人物都在安史之亂中垮了臺，像元載這樣的青年人自然有了迅速晉升的機會。他在8世紀60年代初年的轉運使任上有突出的表現，而且又由于他和李輔國的關系而受到代宗的注意。為了加強他當了宰相后的地位，元載娶了王縉（700—781年）之姐妹為妻，王縉不僅富有，而且系出望族；元載后來把他引為同事。

盡管元載的野心很暴露，但他給了皇帝很深刻的印象。他有敏于斷事的個性和善于利用別人能力的稟賦。他曾庇護優秀的財政官員第五琦（約710—780年）和劉晏（715？—780年），在代宗面前推崇他們的新辦法，而且可以肯定地說，他曾經就他們兩個人之間的權限問題進行調解。元載還以新的眼光來看待西北的防務問題。在經過吐蕃人屢次攻擊之后，他在773年提出建議說：每歲盛夏之時，吐蕃人逐牧青海，去塞甚遠，中國應奪取城垣堅固的原州城，因為這里是陜西西部極易防守的前沿陣地，也是敵軍經過群山入侵路上的要沖。他這個大膽的計劃確有獨到之處，但被那時的將軍們所否決，他們說它是空想軍人的紙上談兵之策。元載的另一個建議是把京城從長安東遷到河中（今山西南部），因為在這里更易防守吐蕃人，而且對通過汴渠的漕運更加方便，但又不像傳統的陪都洛陽那樣地暴露。雖然這兩條建議都未被采納，但是它們說明元載有分析能力，比一般官僚更有眼光。這種說法當然不可能核實，因為元載只有少許著作尚存留于世，但是他的計劃的要點卻在8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一再被人重新提出，可見他是一位有遠見的戰略家和政治家。

與此同時，元載也想建立一個同李林甫和楊國忠一樣的強人政制。他死后被人指責為大刮裙帶風，貪得無厭，肆意收賄，嫉才妒能，特別是妒忌在他上位的少數元老政治家。這些指控當然也并非全無道理。一個典型的手法是他在766年請求代宗批準，讓他的官署審查包括御史臺在內的百官給皇帝所上的奏疏。他的意圖自然是在于截留對他本人和對他的政策的批評意見；他也果然得逞于一時。[[34]](#_3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

可惜的是，我們對于元載的政治反對派的情況所知不多，只知道反對派確實存在，而且隨著他使用權力日益暴虐，它也在不斷地發展。元載770年安排謀害了宦官魚朝恩以后，他顯然還想發揮更大的作用，致使代宗也開始對他有些冷淡。可是，多少年來皇帝一直不想公開地采取行動反對他。元載的最后倒臺是一樁突然發生的大陰謀所引起的后果，其直接導火線尚不清楚。777年初期，代宗秘密詔令他掌禁軍的外甥逮捕元載，草草審理后即判處死刑。他的尸體被肢裂，他的富麗的宅第被摧毀，他的家室被屠戮，幾個月之后連他的家廟也被夷為平地。這樣極盡丑詆之能事，甚至最后要完全清除元載的個人影響，這最好不過地證明了他在仕途上激起過人們多么大的反感。對于元載的至親好友們，皇帝只留下了他年邁的妻兄王縉；不久王縉也在貶謫中死去。

毋庸置疑，元載的權勢遠不如唐玄宗時代那些權傾一時的宰相們大。和玄宗的宰相們不一樣，元載受制于我們上面講過的那些新興勢力——即宦官和財政專家，而且在他最炙手可熱的時候，他也沒有個人掌握過兵權。最重要的是，他雖然位列朝班之上，但他那時的朝廷的實際權力已大不如前，這是外重內輕的形勢和長安普遍缺乏自信的情況所決定了的。[[35]](#_35_Ke_Can_Zhao_Pu_Li_Ben___An_S)

對于這種尷尬處境，代宗本人也有他自己的部分責任。他從來不是一位能鼓舞軍隊士氣的領袖人物，而且作為皇帝他從來沒有表現出從容不迫的風度，讓他的動搖的朝臣們信服他的力量，或者讓他們相信他對未來充滿希望。相反的，所有他的戰時經驗都教育他，他可以毫無理由地懷疑他的支持者；我們已經看到，朝廷是怎樣在對付仆固懷恩事件后幸存下來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那時轉向了元載，并且給他以自由專決之權達15年之久，但這似乎又是一種保守思想作祟所致，看來他不愿意放棄他祖父的那種政治統治方式。他受盡了宦官和財政專家的苦頭，看來這也是他兩面下注的結果；他不是像他兒子那樣自覺地和果斷地把他們作為治理國家的權力工具來使用。

另一方面，很可能代宗也和先前的玄宗那樣，把他真正的興趣從政治移向了宗教。他深受不空和尚（阿目佉跋折羅，705—774年）的影響；不空是中國密宗三位高僧中的魯殿靈光，他在8世紀60年代已是一位佛教密宗的著名學者和譯者。代宗遵循玄宗和肅宗的榜樣，從不空和尚那里受了灌頂戒：這是密宗傳授其神秘思想和智慧的方法，它表示已收錄皇帝為不空的弟子。為了回報代宗的虔敬，不空經常代表皇室和國家作法事，替他禱告上蒼。不空為代宗所作的努力中包括翻譯與政治有關的經文（如《仁王經》）和祈愿消災除難等等。甚至仆固懷恩攻打京師的失敗也要歸功于不空，因為這位和尚曾為免除外患作過祈禱。這種巧合甚至使得代宗更加相信不空教義的價值。另外，宰相王縉和宦官魚朝恩都是他們各自集團中最大的佛教施主，他們和元載一樣大大鼓舞了代宗的宗教信仰。建寺廟和作法事所花的錢和所表現的熱情都達到了新的高度。佛教教務與唐朝政府之間空前緊密地結合了起來。[[36]](#_36_Chen_Guan_Sheng____Zhong_Guo)

當然不用說，代宗的精神生活一直受到了世俗衛道士們的批評。元載死去和他的親佛教的內閣完結以后，更傳統的儒家政治家們在朝政中變得重要起來。常袞（729—783年）在777年被任命為宰相；此人是進士出身，他在8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經歷了一系列重要職務——即為皇帝知制誥——而從官僚中脫穎出來。他享有為官清正的聲譽，并且著手糾正了元載的某些最嚴重的弊病，特別是官員俸祿混亂的現象。但他也書生氣十足，而且好與人爭論；他經常在朝廷中當眾與他的同僚崔祐甫（721—780年）爭論。崔祐甫出身于世家大族。他之被人懷念，主要是因為他曾經以改進吏治的名義讓他的許多親朋故舊當官。這兩位大臣常常在皇帝面前就禮貌和儀式問題爭吵不休，但代宗顯然對這些問題不感興趣。盡管在777年和779年之間朝廷頗有些改革氣象，但很清楚，沒有皇帝的積極參與和支持，僅靠儒家的思想情操是完全不足以取得政治上的根本改變的。

### 唐德宗的改革企圖（779—781年）

正當37歲盛年的德宗779年夏天即皇帝位，這時長安擁有明顯的改革氣氛。他執掌政權的時候，堅定地想扭轉他父親在位17年中一直走下坡路的頹勢。他在幾個月時間內就發了十幾道詔旨，[[37]](#_37___Jiu_Tang_Shu____Juan_319)要求中央政務中實行節約，并且限制高級官員的奢侈浪費。他廢了酒稅。他宣布不再接受地方長官于正常稅收之外的“進俸”和“貢獻”。[[38]](#_38___Xin_Tang_Shu____Juan_52_Di)德宗打擊了宦官的不順從態度。他又下令停止政府繼續贊助度俗人為僧尼，不許政府參與建造寺廟，而這些都是他父親時代造成嚴重貪污的陋習。他任命他自己的親信為宰相，其中最突出的是知名的財政官員楊炎（727—781年）。作為他普遍改組人事制度的一部分，德宗迫使宿將和重臣郭子儀退休；因為郭子儀這時雖已屆耄耋之年，卻仍然領有北方和北方邊境的許多防御使職務。這是代宗遲遲未下決心而德宗斷然行之的事：他給郭子儀頒賞了很多榮銜，但把他的實職分給了他的幾個部屬。雖然郭子儀從無絲毫不忠于唐室的表示，但他功望太重，又是舊政策的過于明顯的象征，所以不能讓他繼續在第一線供職。郭子儀的退休是德宗審慎政策的一部分，他打算去掉或安撫官僚政體和高級軍界內部的一切不安之源。[[39]](#_39_Ke_Can_Zhao___Ce_Fu_Yuan_Gui)上面這樣一些改革是德宗想刷新政制的最初步驟，其目的不外乎是要恢復唐王朝中央政府的主動性、權威和力量。

這時期最重要的改革是楊炎于780年對稅收和財政會計制度開始實施的行政合理化政策，這就是所謂的“兩稅法”。[[40]](#_40_Cui_Rui_De____Tang_Dai_De_Ca)這個名詞有些使人誤解的地方，因為按照農業季節一年收兩次稅，這只是幾種簡化手續方面的一種特點。首先，兩稅法取代了舊的租庸調制的人頭稅以及唐朝前半葉所累積起來的各有專門名目的附加稅。這一改革廢除了用丁作為計稅的基礎，而代之以一種更有效和更公平的以財產和耕地計征的方法。各州鎮在稅收過程中的中介作用在過去一定時期內已成了既成事實，現在這種作用得到了承認，即分配給它的各自不同的稅額，以代替那種笨拙的統一稅率的征課辦法。在這同時，中央政府的正式財務官署也恢復了生機。宦官對宮廷金庫的管理權已被暫時剝奪，而國家收入則由政府的金庫接收。兩稅法的改革馬上取得了實際的成功。780年僅新制度所收的稅就多于前一年的一切財源。

所有這些措施都前景樂觀，但它們僅僅是開了個頭。要使中央政府的政治和經濟結構適應安史之亂后大異往昔的形勢，這是一個長時期積壓下來的任務，所以它絕非僅靠一紙命令就能奏效。德宗的大臣——策士們——特別是楊炎——的政治沖擊力在有些方面又過于強大。楊炎無疑具有理財方面的天才，但這個人的脾性不適宜做宰相。他沒有和解的氣質，而是好吵架，愛打擊報復，甚至對不同意他的人心懷惡意。他對自己的缺點毫無自知之明。他由于大發脾氣而弄垮了政府幾項方案，又因干預地方藩鎮上的扯皮而把事情弄得一團糟。[[41]](#_41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18_D)跟他爭吵得不可開交的是一位宿怨死敵，即原鹽鐵使劉晏。他們的爭吵起于777年，那時劉晏在調查楊炎的老恩主元載問題的小組中工作，結果楊炎被流放。780年初期德宗罷了劉晏的官，楊炎這時認為時機已到。楊炎不滿足于僅僅用他的新法兩稅法來取代劉晏的財政政策，他還直接攻擊劉晏的要害，放逐了他，最后并迫害他致死。后來楊炎竟愚蠢到把嚴厲地處死他的私敵的責任推給皇帝。這一犯大不敬罪的行為使他在781年年中受降級處分。這一回輪到楊炎受新宰相盧杞的猛烈攻擊了，他也被放逐和致死。這場政治紛亂是企圖與民更始的代價之一。德宗的強有力的個性和希望革新的心情使他急于求成，從而給為他效忠的人們以巨大的壓力。不久事實就表明，他沒有贏得足夠的時間使內政改革趨于成熟，便著手去解決自治的東北地區的問題了。

### 與河北諸鎮的戰爭（781—786年）

河北諸節度使利用安祿山之亂平定以后的喘息時間來加強他們的統治，甚至進一步擴大他們的軍隊。關于他們怎樣做到這一點的細節不需要我們在這里贅述，[[42]](#_42_Ri_Ye_Kai_San_Lang____Zhong)但很重要的一點是，原先屬于中央政府的許多特權，例如征收賦稅等等特權，后來都由自治的藩鎮征收，而不問長安的反應會怎樣。到780年已經建立的這種政權不僅河北本部有，而且在山東半島的平盧諸重要大藩鎮也有，漢水下游的襄陽和今河南南部、淮河上游的淮西地方也有。藩鎮之間互相也偶爾有些摩擦，特別是在交界地方有沖突，但他們大多數認識到自己的戰略利益是互相支援，結成松散的聯盟，以便對抗唐王朝中央政府。他們大家都一致贊同的要害問題就是，節度使的繼承權利要由他們自己決定；自然，這種思想是要保證他們能夠世代相傳；他們甚至寧愿在內部爭位，也不要朝廷的干預。藩鎮讓長安扮演的唯一角色就是，它們在地方上推舉節度使候選人，然后由長安照例批準。

如上面已經講過的那樣，代宗時代的中央政府還不能強行解決與河北的爭端問題。它充其量只能采取守勢，例如它曾阻止魏博節度使在775—776年肆意擴大地盤的行為。反之，德宗的內政改革則標志著朝廷將采取有所作為的新姿態。781年年中，皇帝否決了新近病故的成德節度使的兒子想繼承父位的要求。成德、魏博和平盧三鎮認為這是對它們自治的明顯的挑戰，所以它們開始進行敵對行動，而且馬上得到襄陽節度使的支持。

從朝廷的觀點來看，后來的5年時間就是一場噩夢，因為一個接一個的軍事危機威脅著要推翻它。[[43]](#_43_Zhe_Yi_Jie_Xu_Shu_Qu_Zi___Zi)雖然朝廷軍隊的力量已有所增長，但不足以應付全帝國范圍內用兵的需要。中央政府仍然需要依靠效忠的地方節度使的兵力支援，這種情況和安祿山之亂時并無二致，而且現時它所面臨的協調與供應的同樣巨大困難，仍然必須加以克服。正像朝廷所說，平定叛亂的最初勝利是靠幽州節度使的幫助取得的，因為后者的軍隊在北線對分裂分子施加了壓力。自封的成德節度使在781年被他自己的一個軍官刺殺，這又是一個有希望的跡象。但是，唐德宗決定不按這兩個忠君者的意愿來酬答他們的功勞，所以他們也終于宣告反叛朝廷。南方在782年也出現了類似情況，當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受朝廷命令征服了他的襄陽鄰居，但數月之后他反而投降了敵人。李希烈襲擊汴渠，切斷了從長江下游運往京師的漕糧主要運輸道路。這個經濟打擊實在厲害，以致朝廷不得不采取激烈的措施，由宰相盧杞等人提議在內地諸州鎮籌款，特別是在長安內外籌款。由于這里主要不是農業地區，大多數城市居民得擔負意外的巨額軍費。政府實行了以房屋大小計征的新稅，征收過重的買賣稅，強迫向商人“借款”，并且實施各種商品稅：所有這一切便引起了城市的很大困難和人民中間的不滿，使政府窮于應付。[[44]](#_44___Tang_Hui_Yao____Juan_84_Di)

到了這個時候，鬧分裂的節度使們紛紛自立為王，但是最嚴重的威脅是783年年中朱泚（742—784年）創建的一個新朝廷。朱泚曾經統率過西北的唐王朝駐防軍，但是因為他的弟弟朱滔已經叛唐，朱泚因此被解除兵權而羈留在長安。783年，他的舊部被召往東部馳援戰爭，但是士兵們中途嘩變，因為他們在京城得知朝廷所給軍糧不足以果腹。這時，朱泚從退休中出來領導了他們。他找到了城中的老百姓來支持他的叛亂。結果德宗在長安無可守的陣地，于是出幸西北小城奉天，因此他成了唐代中葉第三位蒙塵的皇帝。朝廷在窘境中的一線希望是吐蕃人因783年締訂的停戰協定而暫時保持了中立。

因此，從某些方面看，這時的事態遠比肅宗當年西幸靈武時更令人泄氣。只有幾個官員陪著德宗逃命。他現在求教于其中的一個官員，即陸贄（754—805年）。他不是一位高級大臣，而只是一位年輕的翰林學士。可是，陸贄是一位異常能干的人，而且他作為皇帝的主要顧問，很快就有效地指導著政府的工作。他在分析政治和財政問題時表現了非凡的才干，還在起草國家的文件時表現了極大的耐性。就是這個陸贄，他勸告德宗放棄控制全帝國的方針，而主張大赦河北諸節度使。他說，政府這樣做就可以騰出手來集中力量打垮朱泚這個巨惡元兇；然后王朝的軍隊就可以掃凈其余的叛亂者。這些建議都寫進了陸贄所起草和德宗于784年予以頒布的大赦詔令中；這道大赦令事實上便成了最后解決戰爭的基礎。

可是，麻煩事并未就此結束，因為負責唐王朝河中軍隊的李懷光妒忌德宗對李晟（727—793年）的關懷。李晟是一位很杰出的將軍，曾于783年后期掌過禁軍，并即將成為唐王朝將領中最堅定的支持者。李晟和李懷光都解救了皇帝在奉天被叛軍攻擊的直接危險，但李懷光的心懷叵測已一目了然，朝廷不得不再一次遷往與四川接壤的梁州，以便萬一李懷光為所欲為時可以預防他可能進行的加害。此后不久他果然叛變，但由于事前已采取戒備措施，李晟能夠對他發動猛烈的攻擊。僅幾個月工夫，李晟既打敗了李懷光，又打敗了朱泚；這兩次勝利使得皇帝在784年年中能夠回到京城。節度使們內訌起來，叛亂運動陷于瓦解局面，但直到786年被徹底打敗才導致戰爭完全平息。

8世紀80年代的叛亂事實上是安祿山十年以前發動的分裂運動的終局階段。叛亂的開始階段與結束階段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即它們都起于長安的政治壓力；政府的兵力和資源不足使戰斗曠日持久；官軍的叛服無常使得戰局決定地惡化；最后，戰斗都不是勝利結束，而是通過妥協不了了之。但8世紀80年代的階段也有很大的不同之處，即20年的和平間歇期使得這些分裂割據勢力有可能比安祿山原來在極東北部占有更大得多的地盤來鞏固和加強他們的勢力。另外也很清楚，這些獨立的藩鎮對當地居民的控制也比8世紀60年代更嚴緊，因為在60年代還有若干忠于唐王朝的被圍孤立點散見于河北諸地。可以想像，在這間歇時期內新領導階層已經多多少少地同原來的地方精英集團聯了姻，同時，住在此地的漢族居民與北方邊境非漢族居民的同化過程很可能也仍在繼續之中。很可惜，關于這些獨立諸鎮的現存材料是很少的，恐怕只有星星點點的例外，學者們又還沒有對現有的殘編斷簡做艱苦的連綴工作，所以我們對那個地區的社會史的論述只能是相當粗淺的。[[45]](#_45_Jian_Song_Jing_Xiu_Yi___Lu_L)另外一點也十分清楚，8世紀80年代藩鎮與唐王朝之對抗是贏得老百姓的充分尊重的，所以它們能夠令人敬佩地把這場長期的斗爭堅持下去。

我們已經看到，安祿山的將軍們在他的笨拙的指揮體制中是怎樣陷入混亂和發展成為尖銳的對立的。但是反觀8世紀80年代，河北自己稱王稱帝的諸鎮無不在自己的占領區內自建軍隊，自立法統。雖然這種新情況尚未能使叛亂者易于采取大規模的聯合軍事行動，但卻也防止了8世紀80年代的叛亂運動因內部糾紛而瓦解，至少在戰爭的后期以前沒有陷于瓦解。而且即使在叛亂運動最后消滅的時候，有幾個鎮仍未遭多少損害而能幸存下來。另一方面，除非中央政府能撲滅叛亂并且把舊帝國的那個廣大地區再度統一到長安的統治中來，否則，唐王朝不能被認為已取得勝利。

如果說安祿山的叛亂是由于背信棄義，那么，8世紀80年代帝國的失敗則更像是出于無能。這就是史書上為什么把河北諸鎮之亂描述為在8世紀中葉的大災難和唐憲宗在9世紀初年致力于中央集權化運動時期重振唐帝國榮譽之間的一個屈辱的插曲。不管怎么說，德宗在確有把握地贏得戰爭以前卻挑起了沖突，這顯然是他的一個嚴重錯誤。他沒有能夠解決早在8世紀50年代后期就已很清楚的一系列基本戰略問題，例如，東北叛亂分子之所以有力是因為他們憑借供應和指揮調動的較短內線來作戰，而中央政府則靠長安和東南之間的漫長而易受攻擊的生命線作戰。很顯然，對當時在南方爆發的淮西的敵對行動完全沒有給予考慮。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旦唐德宗放棄了他的討伐運動將軍的身份而接受了帝國統治權分裂的事實（不管接受這一事實是多么痛苦），他能非常熟練地從一個高度復雜的、分權的政治局面中掌握好分寸，從而為自己撈取最大限度的好處。

## 內廷的發展，786—805年

甚至在8世紀80年代戰爭的最嚴峻階段，即在車駕出幸奉天之前，唐朝廷已經被政治紛爭弄得四分五裂了，盧杞及其同伙的財政措施非常不得人心，而他們對付政敵所使用的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也引起人們對他們的強烈不滿；這些問題都在正史和官方文獻中有所反映。[[46]](#_46_Li_Ru___Xin_Tang_Shu____Juan)幾十名官員鼓起勇氣揭發他們，盧杞終于在奉天被撤職。德宗被迫要找一個能馬上解決其燃眉之急的問題的人，而不問其人的官階和年歲如何。如上所述，他召見年輕的翰林學士陸贄來指導他的流亡政府的事務和整理混亂的財政。宰相們和正式的官署都屈居陸贄的影響之下。

同樣地，唐朝的政府軍在戰爭中的表現也確實不好。這支軍隊不但遠遠沒有在唐王朝最悲慘的日子中支撐危局，反而內部出了很多叛逆。雖然也出現了幾個優秀的將領，但忠君部隊的整個記錄卻無任何可夸耀之處。783年后期朝廷受長安居民暴動的威脅，這時到了最悲慘的時刻。德宗絕望地把在京的神策軍召來馳援，但事實上神策軍的許多官兵都早已在戰爭中被殺，當時統率神策軍的官僚卻以商人和店員充數來填滿名額，這些人一見到真正的警報便四散逃匿。緊急集合在德宗身邊的唯一部隊只是由兩名宦官——竇文場（約801年死）和霍仙鳴（798年死）率領的一小股軍隊。雖然德宗最后被大部隊援救脫了危險，但他仍對兩名宦官感激萬分，甚至像他父親在764年對魚朝恩的賞賜一樣在786年對他們大加恩賞，讓他們分別監管新成立的左、右廂神策軍。[[47]](#_47___Wen_Xian_Tong_Kao____Juan)可是，這時宦官在神策軍中的影響就永遠延續下去了。

陸贄的任命和兩名宦官的身負重任，標志著8世紀后期開始了一個最重要的政治發展——所謂內廷的勢力的增長（當然，外廷是正式的文武職官體系）。翰林學士和宦官不僅名義上準許接近各種禁內機關，他們還緊緊地同皇權的行使掛上了鉤。至少在最初時刻，內廷被皇帝本人所直接和緊緊地掌握著，他把內廷作為他的私人所屬官制。內廷不論在平時或在戰時都有用。它是一個使用方便的機制，在制定和執行皇帝的政策時，通過它便能繞過日常官僚程序上的拖沓之病，同時，它也是獲得秘密情報和謀劃的來源。

我們也必須毫不遲疑地承認，內廷并不是一個有共同利害關系和緊密結合的集團。在許多方面，宦官和翰林學士的世界觀和社會威望都截然相反。他們在內廷彼此爭權奪勢倒反而是很自然的現象。人們也可以不時地討論，分清內廷和外廷有什么用處。特別是翰林學士，他們對外廷的官僚集團有政治和感情上的瓜葛。宦官雖然是個遺世獨立的階層，但也從陰暗中脫穎而出，使外廷能感到他們的存在。另外在整個晚唐的歷史時期，內廷所起的影響不是經常性的，也不一定是持續擴大的。有的皇帝，例如德宗和9世紀中期的宣宗，便廣泛使用翰林學士，而其他皇帝卻不是這樣。總的說來，隨著時間的流逝宦官的勢力越來越強大，但是他們的政治勢力是在以下兩個不同的時期達到了真正的高峰：一為9世紀的20年代和30年代，一為9世紀的最后25年。我們將要在下面對此詳加申論。

可是，盡管有了上面那些保留條件，但在分析晚唐宮廷政治的時候，內廷仍然是個很有用的概念。第一，正式的和常規的官僚們視皇帝的私人秘書和宦官為異己團體，他們在宰相大臣同皇帝之間插上了一杠子，因此認為他們嚴重地威脅著自己的權勢。第二，又是相反的，從各種情況可以得知，德宗和憲宗（805—820年在位）在很多時候和很多方面都不完全信任那些高級官員。從皇帝的眼光看，內廷里的這兩部分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好處，即可以信得過。最后，晚唐內廷的發展是一個例子，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制度史中皇權這一級反復出現的現象，即皇帝個人要設立一套班子，以推進政府的工作。過了一個時期，這些班子僵化后被并入職官體制之中，另外又被代之以更新的辦事班子。唐代中央政府的三省的演化基本上便反映了這種過程，[[48]](#_48_Sun_Guo_Dong____Tang_Dai_San)從明清兩代的內閣和軍機處也可看到這個過程。

正如我們所料，晚唐的內廷從一開始也引起了爭論。德宗時代，特別是朝臣們對宦官的強烈仇恨在某種程度上竟然轉到了皇帝本人身上；這個題目被后世歷史學家所利用，并且大大地加以夸大。因為德宗準許內廷在朝廷政治中占有一個位置，所以他始終未被人原諒。

毫不奇怪，從個人偏見出發的對德宗的許多批評已經使人產生誤解。傳統的史籍把他描繪成一個暴君——剛愎自用，言行不檢，文過飾非和貪得無厭；[[49]](#_49_Li_Ru__Zai_Fan_Zu_Yu_De___Ta)但這又與同樣廣為流傳的關于他為人既輕信又柔弱的說法不符。也有人說他在8世紀90年代表現出對事情無動于衷，因為他準許宦官們和鬧分裂的節度使們可以自行其是（又是夸張的說法），這又與關于他在779年和781年之間勵精圖治（他為此曾備受贊揚）的記載大有出入。我的意見則反乎此種論點，認為德宗的政策和行為事實上表現了相當程度的內在連貫性。首先，他志在振興中央政府的權力，這在他身上起著很重要的作用。把這樣的宏圖大志和古代某些“中興”皇帝的任務來做一個正常的比較，那么，他自視甚高的這種態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會使滿朝文武、言官們等等一切人都相形見絀。確實，德宗在戰爭中壯志未酬的抑郁心情使他更加倚仗自己的才智，給人一個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即的印象。但是，這是因為他的主要關心是要盡量保留中央政府所剩下的權力。這個任務很不輕松，需要他跟各藩鎮作些必要的妥協。雖然他在長安朝廷內仍要堅持他的權力，按他認為是適當的方式指導中央政府的事務。大約在786年和794年之間，他給政府機構幾次機會，以證明它們對他是有用處的。我們下面將要論述其事跡的四位杰出的宰相提供了幾個個例研究，它們足以證明皇帝認為官僚階層不能適應他的目標的需要。應該記住，德宗對外廷希望的最后破滅和內廷權力的迅速增加都發生在德宗在位的最后10年間。

### 官僚集團的失勢（786—794年）

戰后的第一任宰相是崔造（737—787年），他是博陵名門崔氏的成員。這個家族因與最高水準的傳統中國文化有聯系而著名，而崔造本人在安祿山之亂時期就以論證政府理想的哲學理論聞名于世。由于后來與劉晏有牽扯，他在楊炎的報復行動中被打了下去，從而在江南的信州流放了幾年。在8世紀80年代的戰爭中，他舉兵約2000人勤王，因此受到皇帝的注意而被召回朝廷。不久他即比其他年長資深的同僚優先被擢升為宰相。因為正如史書所說，德宗把他的理想主義的直言當做能經緯政府事務的才能。

崔造與幾位同心同德的同僚企圖把中央職官的權力重新確立并加強起來，這事約進行了一年之久。[[50]](#_50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30_D)崔造羈留在東南的時期，曾耳聞目睹諸財務使濫用權力和貪污腐化的放縱行為。他勸告皇帝統統罷掉前30年所設的一切特置專使，把他們的全部權力收回給長安的正式官署戶部。屬地方一級的諸使節的職能則收歸觀察使（這種“使”是他愿意保留的）和刺史。地方官獲準擁有按地方需要來分配資金的相當大的自由。按照他的保守觀點，崔造是想抑制財務專家及其政治追隨者日益擴張的權力。

崔造最重要的建議涉及首都宰輔們的行政責任的實質。要理解這一點，得做點背景介紹才行。唐朝初年，太宗曾設置一個非正式的顧問集團，其成員稱為宰相，通常由中央政府三個省——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的首長組成。宰相們的集體也稱政事堂，其名取自門下省內一個用來每日相聚和討論重要國務的廳堂。在這個時候，宰相的職位本身并不是一個具有許多行政職責的正式職事官。每一個宰相都是抽調到這一職位上來的，所以應在每天下午履行自己法定的實質性責任。對未擔任三省中最高職務的那些官員的任命，明文規定使用“同中書門下三品”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頭銜，這樣他們就有了出席有其他宰相或皇帝參加的會議的特權。宰相的人數時在變換，但很少超過五人或六人。

723年，即唐玄宗在位的初年，杰出的官員張說（667—730年）已注意到宰相集體的重要性在日益增長。他建議，他們的官署應作為政府的正式機構自行組成，并有自己單獨的預算和鈐印；這建議被接受了。宰相們的官署被稱為“中書門下”，其名取自中書省和門下省這兩個機構，因為這時尚書省的高級官員們已不再是當然的宰相。這個曾經是非正式的顧問集體現在有了更加適應它的權力的地位。可是，宰相們仍不負有直接的行政責任。政府的執行機構，即其職能疊床架屋和混亂不堪的尚書省六部和九寺，現在正式從宰相權限之內劃出。但如果正式任命的宰相恰好要擔任行政職責時則不在此限。另外，安祿山之亂以后，許多中央政府的官署名存實亡，因為它們的職能已轉給新的特定衙門。因此到了8世紀80年代，民政官署的負責大臣們在把政策付諸實施時遇到了巨大的組織上的困難。

崔造在786年的建議是要求所有行政權力都集中在宰相府署，而個別的宰相則各負具體的行政責任——例如鹽榷事務；半年收稅事務；軍事事務，公文事務和其他雜務。我們對他的方案的細節知之甚少，但差不多可以肯定，他是想把723年設置以幫助中書門下的成員的堂后房和正式行政部門中的相應部分合并起來。可以設想，整個中央政府也實行過某些合理化措施。這個建議是實行有計劃的結構變革的一項最重要的活動，也與中國政府前兩個世紀中所特有的那種互不統屬的機構緩慢增長的趨勢形成鮮明的對比。如果政策的制定和行政工作能像崔造所建議的那樣重新配合起來，正式的官僚體系就能恢復充分的權力來指導日常事務，并由此恢復集體的自信心，以博得皇帝的尊重。

這次改革沒有取得成功，它有如下幾個原因。第一，它是一個復雜的改組工作，要大刀闊斧地動一動人事關系。這當然要激起許多渴望抓住既得利益不放的官僚的嫉恨。其次，德宗是否有支持這個方案的誠意也值得懷疑，因為如果真要把這方案實施到獲得它邏輯上的結局，它會大大地改變政府結構的形式。人們常對晚唐諸帝之愧對列祖列宗的濃厚意識感到震驚。他們特別不愿意做任何哪怕是些許被認為是不符合過去成法規定的事情。只要可能，他們一定不損害政府的傳統。例如，利用“使”這種官職便是補充由來已久的政府結構而又不正式改變它的一個很巧妙的變通辦法。從這種意義上說來，崔造的建議是太激進了。在緊接著8世紀80年代戰爭以后的動蕩不定的時期中，大刀闊斧的改革看來的確是很危險的。[[51]](#_51_Can_Zhao___Zi_Zhi_Tong_Jian)

崔造方案失敗的最后一個決定性的原因，是長江下游財政界中那些有既得利益的人們的反對。為首的反對者為韓滉（723—787年），他是長江三角洲的強有力的浙西節度使，原居鹽鐵使之職。他有長期向京師供應漕糧的經驗。他是德宗不敢疏遠的人，特別是由于他在當時一次戰爭中的忠誠。786年秋天中國東南部獲得了大豐收，韓滉的政治機運來了。他討厭人們對他的行動有任何干涉，他當然想借此機會來攻擊崔造的加強中央官僚體制的政策。韓滉不久和元琇發生沖突。后者是崔造的心腹同事，已內定為新制度下判諸道鹽榷的宰相。崔造的體制迅速瓦解，因為德宗認為它有某些政治弊端。不到幾個月崔造就解除了宰相職務。元琇被充軍，786年崔造的改革被廢除。

德宗已有很多謀士，但他接著又去找受人尊敬的原宰相李泌（722—789年）。李泌或許是晚唐高官中一位使人矚目和最不落俗套的人物。他在文學上是個神童，7歲時唐玄宗曾面試他作博學的賦的能力。后來他多年隱居山中修道和求長生。他的政治生涯頗富傳奇性。當肅宗當太子的時候李泌被召入朝為翰林學士和顧問，他立即以詩見迕于楊國忠和安祿山兩個人。由于這樣有失檢點，他又被放歸田里。肅宗后來在靈武召見他求助時，他就更加小心謹慎了，但是如上所述，他只暫時做了戰時宰相。后來他又一次退隱，因為他畏懼有權勢的宦官李輔國。后來，代宗第二次把他弄進翰林院，但他與元載相抵牾，并且被降級使用。

盡管有強烈的理性主義癖好，德宗在做太子時就已經在長安西郊李泌著名的道教靜修勝地做李泌的學生，因此新皇帝甚至比他的前輩更易受享有圣人盛譽的李泌的影響。附帶地說一下，德宗早年對道教和煉丹術的興趣終其身仍然是十分強烈的。事實上，道教的學問和原始科學，特別是求得它的長壽仙藥，都是皇室全家的業余愛好，但這事卻是正史費盡心機加以掩飾或惋惜的。[[52]](#_52_N_Xi_Wen____Zhong_Guo_Lian_D)沒有疑問，李泌的入世態度在許多方面都很像不空和尚，也是他那個時代的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李泌歷事四位皇帝而又備三朝顧問，能夸這種海口的政治家當然是少而又少的了。

李泌強烈地信奉道教，這就使人看不清他也是一位真正能干和富有想像力的官員。從785年到787年，他做了京師以東陜州地區的觀察使，他在這里開辟了三門峽周圍的道路，并且平定了一起戍軍叛亂。李泌當宰相的時候力促進一步加強汴渠的安全措施，包括新設置一個武寧鎮作為防備山東鬧獨立的平盧的第一道防線。他是與回紇突厥人重新結盟的主要負責人，這在下面的對外事務中將予以論述。他又是極力主張大建營田的人，想以此節約邊防軍的用費。這個思想在當時曾有廣泛的討論，但李泌巧妙地提出營田制是舊府兵制的產物，使這個新制度有了必要的歷史根據。

李泌還進一步致力于皇帝所迫切關心的財政問題。他在稅收上作了些技術調整便節省了大量的錢。由于甘肅被吐蕃人侵占，有4000多外國人——主要是波斯人和粟特人——流落在長安，他停發了國家對這些人的贍養費用；僅這一項就為政府每年節省了50萬緡的開支。他倡議推行給政府官吏增加薪俸的措施，因為20多年來官員們的薪俸都很微薄。可是，盡管李泌智慮甚周，但對財政形勢日益惡化的某些方面他卻無能為力。8世紀80年代之末正當通貨膨脹的戰時經濟之后開始通貨急劇緊縮的時期，唐帝國的財政面臨著嚴重的拮據和混亂。[[53]](#_53_Cui_Rui_De____Tang_Dai_De_Ca)但是正在這時，德宗越來越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央政務的短期成敗上，而在出現困難的經濟問題時，他這樣做根本不對頭。例如，盡管李泌在787年曾勸說皇帝拒絕接受地方大臣的“貢獻”，他指出，這會隨之損害皇帝的威信，可是德宗在半年以后又偷偷地恢復了這個陋規。財政的急需迫使他接受這些貢品，但它們有時是要求特殊恩寵的赤裸裸的賄賂。德宗因此得了貪污和玩兩面派的壞名聲。[[54]](#_5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德宗朝廷更主要的缺陷是它只依靠一個人，即只依靠李泌本人。很顯然李泌總是做一個單干的哲學式顧問，從來沒有培植一大批政治黨羽。他也無法對別人施加自己獨特的政治影響。所以他的政策的連續性就受到了損害。戰后第三位重要的宰相竇參（733—792年）的宦途造成的麻煩，便是這方面最好的證明。李泌在臨終前的幾個月內請求德宗任命竇參為宰相以兼領財務，那時他已生病，不再能夠單獨履行他身上的重任了。史料上沒有交代清楚李泌和竇參之間有什么關系（如果他們真有關系的話）。但重要的是，德宗只是很勉強地同意了李泌的請求，因為他心中已另有宰相人選，所以竇參久于相位的機會從一開始就是微乎其微的。何況李泌和竇參兩個人的作風又判然不同，這一點更加使竇參不大可能取代李泌的職位。竇參雖然也出身名門，但他是通過在法律界的一連串職位馳名于官場的，而且他又似乎從未獲得什么文學上的漂亮頭銜，這種文學榮譽是同通往高級官職的體面而吸引人的途徑相聯系的。他能夠爬到卿相高位，是因為他是一個精明剛狠的政治人物；他無疑曾在他的司法調查中搜集了許多關于宮廷政治的內幕消息。而且他也不是長安的一般官僚。他不止一次地向中國東南部那些有勢力的節度使們發起挑戰，因此，他被任命為宰相在那些藩鎮中間是會引起不安的。

竇參和德宗曾經在一個時期內相處了下來。竇參常常在宰相們同皇帝議完事后單獨留下來，以便同德宗談機要問題。[[55]](#_55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36_D)幾乎可以肯定，在積聚由皇帝本人控制下的稅收儲備的活動中他是皇帝的很默契的合作者。在他當政府首腦的三年任期內，關于其他方面我們所知者甚少，只是知道他是因什么問題倒臺的。竇參犯了一個大錯誤，那就是他公然把他的親朋故舊提為高官，而且他的生活也極度奢侈浪費。這使德宗多心起來，因為他肯定地記得，另一個貪得無厭的元載也是因了這種問題而引起他父親的疑慮的。竇參的敵人控告他結成了一個掠奪成性的朋黨，此后不久，他的幾個死黨就被卷進了賄賂案件和詆毀陸贄的陰謀案件中去。竇參被罷免了宰相職務，并在792年被貶謫。他在去南方的路上竟愚不可及地沿途接受地方大員的財貨，這種行為被德宗稱為煽惑滋事。只是由于不久之后做了宰相的陸贄費了好大的勁，才說服了皇帝不要玉石不分地將竇參的黨羽一概處死。[[56]](#_56_Lu_Zhi____Lu_Xuan_Gong_Han_Y)可是，竇參的命運是決定了的，他在長安的大批財產也在他死后被沒收，存進了皇帝私人的庫藏中。

竇參事件促使德宗比以往更加下定決心，要親自對政府進行控制。他的反應完全是合乎情理的。在竇參執政時期，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使得有秩序的行政工作實際上無法進行。為了應付這個困難，唐帝國在792年再一次把財權分成兩片。但是這兩片的財政官衙首腦也繼續鬧對立，而且鬧得不可開交，致使事務不得不停了下來。與此同時，供應和通貨不足的問題迄未解決。華中的水旱之災、地方衛戍軍隊的幾次叛變和吐蕃人進攻西南邊境的壓力。這些問題都需要更多的錢來應付，還需要有妥善謀劃的恢復政策。

因此，對于任何想承擔政府職責的官員來說，這不是稱心如意的時代，甚至對有才能的陸贄來說也是如此。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作為德宗的一個年輕的私人親信，陸贄曾經出謀劃策，從政治上解決了公元8世紀80年代的戰爭。但是，在792年當他被任命為宰相的時候，他過去和皇帝那種親密無間的關系再也不足以使他能理順政務和重建他官場的良好的名聲。原因在于他從前的職位同現在做了宰相以后所負的新責任之間有了差別。

從7世紀開始以后的不多幾年起，翰林院就變成了一個兼容并包的掌握各種學術和實際才能專家的集團，以備皇帝對各種專門問題的咨詢。[[57]](#_57_Shan_Ben_Long_Yi____Tang_Son)在唐玄宗時代，翰林院（從前稱為翰林學士院）改變了它的性質，它摒棄了純技術人員，而寵愛有卓越文才的人。在這同時，翰林學士則參與了起草國家重要文件的工作。根據約定俗成的辦法，一般文件由中書舍人起草，或者由六部適當的秘書人選起草。但是從8世紀中葉起，翰林學士起草的東西就多了，其中有很多是皇帝的詔敕、高級官員的晉升令、對申訴的裁答，以及對外邦統治者的往來信件等等。翰林學士無定額，雖然通常在一個時期內平均約為6人。

在代宗和德宗時代，某些翰林學士開始成了皇帝在決策時的顧問。由于他們所處的地位是皇帝的私人秘書，可以接觸機要政治情報和國家機密，當顧問是很自然的結果。有幾位翰林學士有時竟能與宰相的權勢相抗衡。例如，陸贄就被人稱為“內相”。在德宗的孫子憲宗（805—820年在位）時代，被選入翰林院的青年人是出類拔萃的人，可能有一個錦繡的仕宦前程在望。中年的翰林學士可能有直接被任命為宰相的最佳機會。

但是，在翰林院和最高層正式官僚之間雖然在階級和文化見解上有明顯的互相聯系，但也有重要的差別。一位翰林學士只對皇帝一人負責，而宰相則公開地互相負責，也公開地對整個行政官僚階層負責，因為他們經常得代表這個階層的利益對抗皇帝的利益。對于任何要從翰林學士調為宰相，或從宰相轉成翰林學士的人來說，在禮儀和處事方式等問題上都要遇到許多困難。在翰林學士向皇帝進言的時候可以很坦誠，甚至可以直言不諱，或者反之，他可以采取古代的儒家王者之師那種充滿信心的態度和訓誡的口吻暢所欲言，因為這種活動方式是秘密進行的。相反的，宰相在朝堂直言無隱就會冒逆龍鱗的危險，使皇帝公開受到壓力，甚至使他處于遭受譏議的地位。

陸贄就是一位愿為翰林學士而不能、或不愿改變他的行為的一個例子。[[58]](#_58_Cui_Rui_De____Huang_Di_De_Gu)作為宰相，他和在翰林院中長期工作時（779—791年）一樣地自恃和嚴格。他對皇帝的目光短淺的規勸可能有理有據，但他進言的方式方法卻不太策略。說到底，官僚眼中看到的皇帝的貪得無厭，對德宗來說卻是無可非議的。這種使對方感到困擾的言論，就一位隨和一些的宰相來說是可以避免的，但這時它卻使德宗和陸贄的值得回憶的友誼化為烏有。陸贄不肯改變他的習性，結果弄丟了官，并且隨之帶來了給官僚政制的權勢真正蒙上陰影的時期。

但是，陸贄的最不適于擔任宰相的方面恰恰表現在他與皇帝的關系上。他流傳至今的文集中包含許多奏疏，它們雖然常常是長篇大論，立論紛繁，卻都是討論他當時的基本問題的，又以議論的功力和精辟見長。其中最著名的是794年就財政問題上奏的關于兩稅法現狀的六條長疏。[[59]](#_59_Cui_Rui_De____Huang_Di_De_Gu)陸贄在理論上是反對這個稅法的，認為它不是以健全的重農原則為基礎，但盡管如此，他也不想入非非地要求把它統統加以厘革。反之，他認為它是一個既成事實，只要求加以改進，因此提了許多具體建議來消滅稅收中的各種技術上的弊端。他還進一步地申論說，唐王朝當前經濟困難的真正原因是8世紀80年代的戰爭時期和戰爭以后政治形勢積弱，因此，不振興政治就不可能改進現狀。這當然是個很擔風險的意見，因為它直接反映了德宗的行事。直率地提出問題而又注意在事勢上有所克制，這二者的互相結合便是陸贄的特點。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雖然他生前在政治上沒有完全取得成功，但他的許多建議在下一個世紀卻被各種各樣的人物采擇施行，而且他的聲譽也在以后的朝代中有增無已。

陸贄感到自己在朝中很受限制。我們現就下面一例進行討論：在財政事務上他被迫承認792年的行政分工辦法，雖然這樣做會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力。后來不過幾個月之后判度支的位置忽然出了缺，德宗沒讓陸贄的門人李巽接管這個差使。盡管陸贄提出強烈抗議，皇帝卻任命了另一個人裴延齡（728—796年）來擔任。裴延齡年歲較大，是一個更有經驗的官吏；他也以非正式的、私人的方式做過皇帝的助手，但是他的身份是集賢院的成員，而不是翰林學士。他們兩個人背景不同，自然要引起對立，但是無論如何，任命裴延齡任判度支一事證明了是對陸贄行動自由的真正限制，因為他阻遏了陸贄所想做的一切事情。裴延齡一心一意為德宗聚斂錢財，或者在賬面上搞鬼，或者公然籍沒平民百姓的錢財。他甚至敦促皇帝更廣泛地利用單獨的皇室內庫。不用說，裴延齡活著的時候就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人物，最后在歷史的案犯類目內占有了一個大騙子的席位。因此，陸贄是處于惡性循環之中：他被令人絕望的財政形勢捆住了手腳，同時又因政治形勢而被剝奪了他所需要的全權；裴延齡的起用妨礙了他應用已有的權力來卓有成效地工作，而這種權力當時又是他要取得財政和政治成功的關鍵。陸贄的學識淵博而有些冗長的建議未能引起一個急于求得錢財而又憎惡百官的皇帝的同情。到了最后，陸贄攤了牌，他在一份冗長和逐條開列的長篇控告中攻擊了裴延齡。皇帝仍然愿意留用裴延齡為宰相，而在795年，陸贄被貶逐到南荒之地。他幸免于處死，但是對這樣一位卓著勛勞的官員竟然考慮要處之以死，這件事本身就說明，德宗皇帝已對全體官員不抱任何幻想了。

### 德宗最后十年的統治（795—805年）

如上所述，在8世紀80年代的叛亂時期，德宗已發現，神策軍在官僚的管理下已變得衰敗。他的解決辦法是在786年命竇文場和霍仙鳴來監管神策軍的兩支軍隊。10年以后，即在796年，他采取了一個決定性的步驟，命令他們統監這兩支神策軍，冠之以護軍中尉稱號。[[60]](#_6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這在實際上意味著，竇文場和霍仙鳴把宦官的權力擴及全部禁軍的十支部隊，因為神策軍是禁軍中勢力最大的隊伍。他們控制了這樣機動和強大的部隊，而又密邇京師，這就成了宦官在后來100年中掌握實權的基礎。

德宗和宦官的利益都在于不惜用一切手段確保神策軍的忠誠。因此，神策軍薪餉優厚，定期發給，所以它與許多遠征軍和邊防軍的苛刻服役條件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而且他們享有司法和財政上寬厚的豁免權，以致長安的富戶爭相賄賂宦官，使自己成為掛名的神策兵。因此，禁軍的全部數目劇增至數以萬計，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合法的兵士。不久以后，士兵們在不值勤時的紀律變得松松垮垮，少數幾支駐扎在遠離京城而不受其誘惑的精銳部隊則是例外。在8世紀的90年代，神策軍經常搶掠平民的財產。與此同時，在皇室當差的宦官又用所謂宮市制度來坑騙商人。這些肇事者受到保護而不會遭受報復，甚至最臭名昭著的敲詐勒索者也無不如此。所以幾百年來歷史學家都用這些事件來證明晚唐宦官欺壓人民，作惡多端。[[61]](#_6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有幾位當時的官員在朝中抗議此事，但他們或遭囚系，或被放逐。

宦官掌兵的新作用當然增加了他們的政治影響。譬如有的事情相當普遍：朝廷都是從原來的神策軍官中任命忠于它的方鎮的節度使。節度使為了得到這些官職或延長其任期，他們必須向宦官送報酬；甚至如果他們手頭無現款進行活動，他們可以給賄款計息。這些人被稱為差帥。另外，這時用宦官而不是用文官來做監軍，監察地方的文武大員。宦官現在實際上做了皇帝的政治耳目。795年當皇帝第一次給了一個宦官以一方關防時，他們的地位提高了。幾十年來，監軍制度在地方上招人厭恨，但是從這時起監軍也令人生畏。德宗還用宦官作為信使。一個宦官信使通常在宣讀詔敕之前能夠在他的目的地索取禮物，這辦法被稱為宣索。甚至還有幾件被嚴厲批評的事件，即宦官奉命全權去邊遠的南方執行軍事綏靖或民政任務。令人感興趣的是，高級宦官有時也想以家族形式延續他們個人的政治和經濟影響，辦法是把其他年輕的宦官撫為義子。這種做法日趨精巧，他可以包括娶妻，收養女，收顯要的軍人為子。791年朝廷正式批準了這種收養辦法，可能是為了限定每個宦官只能收養一個兒子，而不是為了鼓勵多收養，但是養子制度在那時已欲罷不能。這樣形成的家族也在朝廷政事中起舉足輕重的作用。積極進取的現代學者們已經整理出了二三十個宦官家族。[[62]](#_62_Shi_Ye_Zhu_Shui____Tang_Dai)

盡管有此種種緣由，整個唐代的官吏們仍然漸漸地被迫去學習怎樣同可鄙的宦官階級打交道。宦官不再是居于幕后的幽靈，而正在成為政治舞臺上的正式演員。

那么，德宗在位的最后10年間，正式的職官中發生了什么事情呢？除了著名的制度史類書《通典》的編者杜佑（735—812年）以外，在795年和805年之間任命的宰相中，沒有一位宰相是像李泌或陸贄那樣的能人。可是，在進一步深入研究那些在這個人們不太了解的時期官居政府高位的人以前，我們還很難做出持平之論。幾乎可以肯定，他們的名聲受到不公正的輕視，因為他們心甘情愿地完全屈從于皇帝。事實上，正是唐德宗本人自覺地置官僚們的情感于不顧，也正是他有意識地突出他自己的意志來決定宰相人選，才激怒了起居注作者和歷史學家，從而使整個這個時期變得暗淡無光。

德宗在他的最后10年中經常把自己關在斗室之內，長時期不接觸政府官員。可是我們知道他并未偷閑，因為人們批評他不識大體，只會關心政府里雞毛蒜皮的事。朝廷里的日常活動雜亂無章。皇帝臨朝和宰相上班的時間都不再遵守，雖然有若干證據表明，皇帝以及官員對這種過失都負有責任。很顯然，宦官們繼續占據皇宮內的關鍵職位，處理官員的文件和接受皇帝的口諭。他們占據著這樣的位置就使他們大約在795年以后能夠影響中央政府的大部分正常工作。[[63]](#_63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但是，要說德宗是像歷史學家所指責的那樣放棄職責，完全聽從宦官，那也可能不對。首先，德宗在這整個時期一直是最高統治者。宦官們并沒有損害他，就是受他保護的那些人也沒有受過傷害，這與宦官們以越軌行動對待某些9世紀的皇帝是不大相同的。第二，外廷的受壓抑狀態使得宦官的實際作為在相形之下顯得更重要，而這種情況可能在歷史材料中夸大了他們的影響。最后，應該記住的是，德宗使用宦官是為了私人的目的，不需要求得官員們的同意。例如在財政上，德宗重新任用宦官做他私人宮廷金庫的保管人，從而被公認恢復了他們在德宗早年統治時期受到限制的權力。但是，這與他戰后的總方針是一致的，因為他想繞開拖拖拉拉的公事程序，能使他愛怎么花錢就怎么花錢。[[64]](#_64_Shi_Yong_Fang_San____Tang_Mo)特別是，宦官—仆役和德宗對待獨立方鎮的審慎政策（即貶之為姑息的政策）兩者的結合，就不公正地玷污了這位皇帝的聲譽。

重要的是要知道，雖然宦官地位在德宗時代的上升為他們后來的政治權力打下了基礎，但是，他們在8世紀90年代的收獲是在一個并非傻瓜的皇帝之手中取得的。相反的，他是按照自己的理解來大膽地行動，不管這對于不能從德宗的行動中受益的官員們來說是怎樣地不舒服。德宗的確離開了朝政的老規矩，但是當唐帝國的均勢受到嚴重威脅時（例如在798—801年發生河南的兵變和暴亂時），他迅速地作出反應，并且果斷地恢復了秩序。沒有哪一個朝臣，也沒有哪一個宦官有足夠的勢力向他挑戰。

### 順宗時代一次未遂的政變（805年）

在進入9世紀前后的一個時期，一小撮不滿于政府的官吏開始聚集為太子——即未來的順宗皇帝——的扈從。他們經常討論社會和政治騷動、宦官所引起的暴行以及平民的痛苦，一句話，他們議論德宗政府，理想主義地談論如何使時局得到改進。據說順宗也親自參加了這種意見交換，他為唐帝國的擾攘狀態著急。這個集團的頭子和順宗是老相知，他是個下級官員，名叫王叔文（806年死），原籍今浙江的越州；他之所以能涉足長安是因為他善弈圍棋。王叔文巧妙地提醒他的庇護人不要過于任意發牢騷，因為這樣做總是會有被控為叛國的危險。[[65]](#_65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順宗雖然聽從了他的進言，但還是繼續在他自己的宮內著了迷似地傾聽王叔文對未來政府所擬的計劃，如說某某人將來應當宰相，又某某人應該是重要的將領，如此這般，不一而足。漸漸地王叔文結交了約十幾二十個人，有些人是純政治關系，有些人則多半是意識形態上的關系。其中最重要的人是王伾，他和王叔文一樣也來自東南（杭州），雖然就我們所知，這兩個人并無親屬瓜葛。王伾貌丑陋，他不會說長安上層人物的官話，只能說他家鄉的吳語。王伾雖然只是一個抄寫員，而且在朝臣中是個笑柄人物，但他由于與順宗關系密切而在805年仍被任命為翰林學士。這個集團包括一個宦官，即太子的私人仆役李忠言以及幾名中級政府官員。而可能最有意思的是，還包括著名的文人柳宗元（773—819年）、劉禹錫（772—842年）和呂溫（約774—814年）等，這三人在當時都不過是三十來歲的不知名人物。另外有幾個人也被認為是這個集團的參與者，但它的核心是很小的。這些人以長安為基地，和外地州鎮沒有廣泛的聯系。他們據說互相發誓保守秘密，至死不渝；同時集團內沒有一個政治上的頭面人物，使他們不大可能被發現和被打散。[[66]](#_66_803Nian_Da_Tui_Le_Yi_Ci_Guan)

雖然東宮在唐代歷史上前此已成為搞陰謀的地方，后來也一再是這樣，但805年的事件比一般的皇室內部奪嫡的派系斗爭要復雜得多。在德宗故去和順宗即位不久，王叔文集團把他們蓄謀已久的計劃付諸實施，企圖奪取唐朝政府的權力。可是由于順宗生病，他們要取得成功的前景從一開始就顯得不妙。他在804年有輕度中風，因聲音喑啞或幾乎喑啞而不能正常處理朝政。早在他即位的時候就有人擔心他是否適合做皇帝，只是因為幾位持強硬態度的翰林學士（可能是代表他兒子，即未來的憲宗的利益）的堅持，德宗老皇帝的遺詔才未被改變，才使順宗及其支系未被廢黜。但是，二王至少有幾個月實際上是利用了順宗皇帝的病殘，把他孤立在他的宮禁內。順宗只是由宦官李忠言和一個得寵的牛氏昭容侍候。他的命令和其他意見都由這兩個人傳達給王伾，而王伾竟以翰林學士身份享有隨意出入宮禁的自由；另一條聯絡渠道是王叔文，他也是一位翰林學士，但主要是負責監管國家財政。皇帝的指示從王叔文傳達給宰相韋執誼，然后再傳給這個集團其他占據要津的成員。這種安排使二王集團能為所欲為，因為它把其他朝臣一概排除在外，使之不能管理國家政務。于是馬上形成了公開批評這個統治集團就有危險的局面。少數幾個年長的宰相以辭職來抗議二王集團的高壓政策，他們的勇氣贏得了人們的尊敬。

可是重要的是，盡管二王集團獨斷專行，他們確實把他們的最初設想付諸實施，在他們最初當政的幾個月內熱烈地抨擊政府工作中的問題。他們嚴厲地禁止宦官犯欺詐罪，特別是廢除了誅求無厭的宮市制度。當地市民再也不受為五坊小兒為虎作倀者的欺壓了，因為這些人在耀武揚威地為御廚巧取豪奪雞鴨家禽的過程中總是欺壓店鋪老板和欠賬不還。二王貶逐了因貪污而聲名狼藉的長安京兆尹：此人遭人痛恨，在離開長安時幾乎被人們用投擲的石頭打死。不正當的貢獻——包括長江下游鹽鐵使的“羨余”饋贈在內——再一次被宣布為非法。事實上，約千名宮女和樂師被遣散出宮，或者送往尼庵，或者送回家中。德宗時代因政治違禁而被放逐的許多朝廷官員被大赦和召還京師；大批稅項也被減免。

可是，早在805年夏季，二王集團的政治地位就開始動搖了。它的成員們一度互相爭吵。例如，韋執誼越來越看不起王叔文，因為王叔文對他態度傲慢。順宗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壞，新出現的二王集團的反對派要求順宗毫不遲延地立太子，以免二王的統治在另一位不勝任的皇帝下面沒完沒了。翰林學士鄭絪（752—829年）把一張紙條偷偷帶進宮內，他在這上面字跡潦草地要求立皇后的長子——即廣陵王——為太子。未來的憲宗是眾所周知的敵視二王集團的人，但他對他父親的榜樣是亦步亦趨，從不亮出他的意圖，也不讓被任命為師傅的那些耳目們所覺察。對二王集團的最后一擊來自朝廷以外。王叔文幾個月來一直想滲透并接管禁軍的指揮系統，要把宦官趕出他們新近抓到手的軍事陣地。可是，受宦官之賜而取得職位的邊防將軍們主動地反對這個計劃，而二王集團任命的總指揮又被奉天的神策軍主力部隊斷然拒絕。二王集團不能贏得軍隊的事勢一旦清楚，他們就什么都完了。一個由多數宦官、某些翰林學士和幾個有勢力的藩鎮臨時結成的聯盟，順利地使順宗禪位于太子。[[67]](#_6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憲宗在805年陰歷八月即皇帝位，馬上罷了二王集團殘余分子的官。王伾死于腦溢血，王叔文則于次年被處死。其余直接有關的人則被放逐；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迄憲宗之世永遠竄逐在流放地，未獲赦罪而還。

這次短命的改革事件背后的問題是非常難以作出解答的。有關這些事件的原始材料數量很少，問題成堆。[[68]](#_68_Jian_Bo_Na_De__S_Suo_Luo_Men)很明顯，許多材料都被故意毀棄，而幾乎每一件流傳下來的東西都有敵視二王集團的語氣，所以要分析他們的動機就只能憑猜測了。對這些問題歷來有兩種看法：多數文人歷史學者認為他們是小人，是專為自己打算的政治流氓；可是，另外一些作者則把他們看成是反對前朝虐政的改革家，說他們敢于除掉可惡的宦官。[[69]](#_69_Pu_Li_Ben____Gong_Yuan_755)

這兩方面的說法都有些道理。撇開對他們的道德評判不談，我們可以肯定，二王集團缺少權力。他們馬上動手抓的那些官署——翰林院、鹽鐵使署、度支衙門和宰相府署——很明顯地表明，他們確實懂得前此半個世紀所發生的政權結構的主要變化。他們也善于利用外廷的威望，盡量利用掛名人物以掩蔽他們的活動。例如，受人尊敬的杜佑便被委以鹽鐵使職務，而財政大權實際掌握在杜佑名義上的副手王叔文的手中。由于二王除了在太子底下僅有的秘密結合之外沒有其他權力基礎，所以必須承認，他們的聲勢只是隆盛一時。他們最大的失誤在于沒有經驗。他們沒有完全掌握翰林院，沒有利用宰相的職權去安撫朝中的真正有權勢的集團，同時也沒有贏得軍方對他們事業的充分支持——哪怕只有一小部分禁軍的支持就足以使天平傾向自己方面，而阻止敵人再次獲得主動權。他們在財政上也有失檢點，即也有所謂的貪污腐化的行為。王伾因在職受賄而發了大財，據說為了防避盜賊，他居然命令他的妻妾睡在盛滿黃金和絲綢的大箱子上。即使可以認為這些針對個人的指控夸大失實，但這個集團很可能利用國家錢財與別人結盟，例如提升了幾個有權勢和鬧獨立的方鎮大員，同時對皇帝的諸弟和子孫們大量賜予采邑，從而使他們取得了名副其實的“實封”。政府職位只給予二王集團的支持者，很可能還出售，但是我們沒法說清楚這種做法涉及的面到底有多么廣泛。

對于這一蓄意進行的改變中的改革成分，就更難以說出所以然了。[[70]](#_70_Pu_Li_Ben____Gong_Yuan_755)他們公開的所作所為沒有什么說得上是激烈的改革；至于采取措施控制宦官、禁止未經批準的貢獻等等，這都在德宗初年已有先例。但是可能有人爭辯說，他們寧愿先通過制度變革來解決問題，而不是沉浸在模糊不清的道德教化問題上。有人認為他們互相鼓勵，準備干一番大事業，并以伊尹、周公、管仲和諸葛亮相標榜，因為所有這些人物都被看成古代“積極實干”的宰相。在唐代的知識界中，學者們常把這種態度和杜佑聯系起來，因為杜佑在《通典》（801年）和其中已失傳的論文選集《理道要訣》（803年）中都強調指出，古代的價值應作為原則的本源使用，而不能把它作為當前社會的一成不變的模式。他主張政府應發揮一種積極的、干預者的作用，珍視法律的效用，并且認為一個健全的社會的基礎首先要在經濟上家給人足。杜佑在二王集團的事態中處于什么地位還不太清楚，但是正像浦立本所說的那樣，“即令杜佑本人并非二王集團中的秘密參議人物，他的思想對他們也是很有影響的，而且他被認為是領導和激勵他們的源泉”。[[71]](#_71_Tong_Shang_Shu__Di_110Ye)杜佑的個人助手劉禹錫和柳宗元的情況更是如此。可是總的說來，他們之間的個人關系過于模糊不清，他們的總的觀點和實際政策的關系也過于脈絡不明，因此不好肯定地斷言二王集團的最終目標是什么，至少在我們對這個時期的文化史有更深入的了解以前，情況就只能是這樣。[[72]](#_72_Te_Bie_Shi_Zai_Liu_Yu_Xi_He)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研究這個問題的有中國歷史學家王蕓生所寫的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他認為二王集團的努力是真正的改革者的作為，它們反映了地主階級內部的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的利益。[[73]](#_73_Wang_Yun_Sheng____Lun_Er_Wan)按照他的意見，二王是為了庶族集團的利益而反對宦官和其他豪族地主集團的掩蔽性人物，其中包括順宗的勵精圖治的繼承人憲宗在內。我不相信他已證實他的說法，弄清了二王集團的社會—經濟根源。可是他搜集了一些重要的材料，因此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在對待統治精英集團中的經濟差異的問題上，我們應取虛心的態度。

無論如何，對二王的反應主要是政治性的。宦官的敵意是容易理解的。節度使（特別是在西部、西北和北部諸鎮）也是這樣，因為他們關心的是要看到他們與朝廷中的聯系（這往往包含與宦官的關系）不受干擾。但是，如果二王集團的改革果真是認真的，為什么絕大多數官員不支持他們？首先，二王所使用的搞密謀的方法有失人心，否則，就可以贏得很多良好的反應。其次，雖然二王的表面目的是恢復官僚的權力，但是他們更要按自己的條件和自己的利益來重振官僚的權力。當時的朝臣們對這一點是知之很深的。有意思的是，唐朝末年的政府官僚們雖然有很多共同的政治教條式的信念，但他們很少聯合起來反對皇權及其仆從，如宦官。在官僚階層內部各小集團里面，其成員都以朋友和庇護關系的情誼為重，并把它置于整個官僚階層利益之上，這便是政治上的決定性因素。在下面對8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朋黨問題的分析中，我們會看到，政治人物感到自己順應政治現狀比嘗試改革更加容易和有利，哪怕這樣做他們會損失一點點威望也在所不惜。對于個別官員來說，他們相當害怕自己官職的升遷會落后于人。在二王集團的重大行動失敗以后，一直到835年的甘露事變時，官僚們才又想以武力來改變政治結構。

### 8世紀下半葉的對外關系

公元8世紀50年代的安祿山之亂所引起的唐代各方面生活的變化，并不比中國與當時其他亞洲列強的關系的變化更激烈。唐玄宗的軍隊向北曾推進至蒙古，向東北曾推進至滿洲南部，同時，一條力量單薄的中國的綠洲前哨蜿蜒在塔里木盆地周圍，并深入到準噶爾地區。他的擴張政策完全以令人生畏的軍事力量為基礎，但歸根到底，他的基礎則是樂于提供資金的馴善的人民和一個切盼聽到皇帝的軍隊在邊疆不斷報捷的朝廷。安祿山之亂摧毀了許多思維方式，這種雄圖大略的拓邊觀念也在最先被放棄之列。外域人馬上出現在中國的大門口：吐蕃人占據了隴右道，回紇人前來幫忙，但是要價是很高的。

如上所述，安祿山之亂以后外事方面極度緊張的狀態終代宗之世都是這樣。它的經濟影響也很深遠。維持一支足以延緩——即令不足以停止的話——吐蕃人前進的邊防軍，其費用成了經濟上的沉重負擔，何況帝國的經濟由于安祿山之亂及其后果已經陷入混亂狀態。這時期為了保衛長安而花費的供應每年超過150萬緡，尚不包括每年得花100萬匹絹以交換回紇人的戰馬，因為中國的養馬地和牧場現在都已沒入吐蕃人之手。邊境地區的軍屯制度也已被破壞，而要使這一制度適應新情況的努力則需要幾十年才能見效。

到779年，吐蕃人對西北的入侵已使雙方的軍隊呈衰弱之勢。唐德宗在780—781年決定向吐蕃人議和。雙方的會議在最初是討論一些具體問題，例如怎樣遣返被拘留在拉薩的唐朝的使節問題。吐蕃人對中國人的意圖抱疑慮態度，但是新上任的吐蕃首相尚結贊立刻看出，那時與中國締約比繼續攻戰有利得多。783年開始談判并于次年簽署的條約規定了兩國之間的邊境和無人地帶應在沿甘肅和陜西的當前軍事控制線上。它還規定了交換俘虜和難民。條約還把吐蕃人現已占領的大片土地正式割讓給吐蕃人。德宗之所以同意訂立此約，主要是因為河北諸鎮在781年爆發了叛亂。事實上，這是一項很重要的外交成就，因為它保證了唐帝國的西部邊境的安全，使中國軍隊能騰出手來承擔東線的任務，其代價不過是承認既成的事實而已。

可是，在783—784年的戰爭危機之后，休戰協定又被兩個簽字國所破壞。吐蕃人曾經保證要幫助唐政府討平叛亂，但是在784年，有一支前往解救中國人的吐蕃部隊反而投向了叛亂皇帝朱泚。在唐政府方面，它收回了把安西和北庭的亞洲內陸殖民地割讓給吐蕃人的含蓄的諾言。結果又爆發了敵對行動。尚結贊因為深知唐政府已被內部戰亂所削弱，就采取了攻勢，在785年和786年深入到陜西腹地。他深深了解唐王朝的宮廷政治情況（順便說一句，這個例子說明在當時使用間諜和國家之間搞陰謀詭計的活動是多么廣泛），他派人刺殺了中國軍隊中最優秀的將軍們。他的計劃兩次得逞，而在787年，第三位將軍也幾乎在談判期間被殺，其實這次談判是吐蕃人所設的圈套。這個事件后來被稱為“平涼劫盟”，使得中國朝廷為之嘩然。中國和吐蕃長遠利益的各不相容，現在已是很明顯了。德宗遺憾地被迫放棄了他曾認真地考慮過大約8年之久的與吐蕃結盟的想法。

回紇人是中國另一個自然的擇友對象。回紇人在6世紀中葉到7世紀中葉時原是突厥大草原帝國的臣屬，但是從7世紀40年代起，他們自己也變成了突厥語游牧民的九姓回紇（突厥文為Toquzoghuz）新聯盟的首領。[[74]](#_74_Bo_Tuo_Er_De__Si_Pu_Le____Tu)突厥帝國大約在7、8世紀之交得到復興，但在744年被九姓所推翻，從此九姓便變成了亞洲內陸大草原北部占統治地位的大國。直到840年，回紇人（我們仍用它為九姓的總稱）在今蒙古地方的鄂爾渾河上的首都斡耳朵八里進行統治，這里很靠近未來成吉思汗的大帳。回紇人，在北方稱尊的時候逐漸進入半定居生活。他們有文字，有文化，并建有富麗堂皇的帳篷城做宮室之用。回紇人通過粟特人傳教士皈依了摩尼教；這些粟特人傳教士最后在回紇國家取得了很大的世俗勢力，他們或者做政治顧問，或者當可汗的使臣，或者贊助粟特的行商。[[75]](#_75_Jian_V_Mi_Nuo_Er_Si_Ji___Ta)這些商人以厚利吸引回紇投資者入伙經商，特別在進行橫穿亞洲的長途貿易時許以厚利：這條路線是從中國的西北部出發經過回紇領土，再穿過天山而直達撒馬爾罕、布哈拉，最后抵達波斯和地中海。回紇人為了維持他們的半定居活動，很注意保持他們賴以生存的游牧騎兵；這種騎兵在9世紀30年代還一直是東亞最強大的軍事力量。

如上所述，回紇騎兵部隊曾在安祿山之亂中幫助過唐皇室，但是德宗因回紇的傲慢的將領那時曾給他以羞辱而有一段辛酸的回憶，因此他在8世紀80年代無意與他們結盟而不計后果如何。吐蕃人的和約失敗以后，宰相李泌在787年和788年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來說服皇帝捐棄私嫌，而以國家利益為重。李泌對付吐蕃人威脅的計劃是泛亞洲規模的，并且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玄宗時代的將軍們在中亞的開拓精神。李泌論證說，中國如果與回紇、今天云南的南詔藏—緬部落聯盟、阿拔斯哈里發國家（即大食，“在西域為最強”）和印度（天竺）結盟，中國就可以孤立吐蕃并使之國力耗竭。李泌堅持說，與回紇會盟是他的這個建議的基礎，他以辭職相要挾而終于說服德宗放棄不愿討論此事的頑固態度。回紇新可汗為了自己的原因也愿改進同中國的關系。在788年，中國和回鶻[[76]](#_76_788Nian_Qi_Hui_He_Gai_Cheng)終于達成了三次重大和親中的第二次。德宗的女兒咸安公主嫁給了回鶻可汗為可敦，還有一大批絲綢和奢侈品作陪嫁；作為回報，回鶻人答應幫助中國對抗吐蕃。計議中要與哈里發及印度聯系的事從未進行，但是中國與回鶻同盟（它在840年以前一直是穩定的）的重建，對于晚唐的歷史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可以肯定地說，這種關系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其間也發生了許多把關系鬧得很緊張的事件，其起因是回鶻人發起的以馬換中國絲綢的貿易的條件，另外干脆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即中國人對居住在長安和其他城市的回鶻人的粗野行為有著強烈的反感。中國與回鶻的聯盟大大地耗費了唐王朝的國庫，但它至少使中國免遭北方游牧民的蹂躪，這與唐代初年突厥和契丹幾乎不斷的威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可是，在8世紀80年代后期還不能立即看清楚李泌的全盤戰略是否真能取勝。790年吐蕃人大舉進攻安西（今吐魯番）和北庭（）的中國軍事哨所，這兩地是唐王朝在7世紀為了分別監護天山南北路而設置的都護府的故地。[[77]](#_77_Bu_Er_Da__Ai_Ke_Sai_Di____Be)這些邊遠城鎮因吐蕃入侵甘肅而孤立于絕域，已有約30年之久，只是偶然有幾個向北橫穿回鶻領土的旅行者帶回一些消息。與此同時，回鶻人出于貿易的緣故，對安西和北庭特感興趣。790年，他們會合少數滯留的中國軍隊反擊了吐蕃軍隊，但是在次年秋天，吐蕃決定性地打敗了大批回鶻部隊。791年中國從此結束了在東突厥斯坦的行政權力幾乎達一千年之久。

由于南詔脫離吐蕃而回到唐王朝的勢力范圍內，亞洲內陸的戰略均勢在8世紀90年代又變得有利于中國。南詔是6個大的部落集團結成的聯盟，在人種上是藏緬族，它約從650年到900年統治著現今的大部分云南省。雖然南詔很早就向唐朝進貢，但它與中國的關系在8世紀的第二個25年加強了，那時唐玄宗派特使冊封了南詔王。這個國家逐漸提高中央集權的程度，并把國都建立在今昆明西北洱海邊的大理。8世紀初期的幾位南詔君主自覺地模仿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但是，在安祿山之亂以前不久，南詔王可能被中國在他的邊界迅速增加行政機構所激怒，攻打了附近的唐王朝都護府衙門。南詔借助吐蕃之力粉碎了中國隨之而來的討伐行動。后來由于唐政府越來越專心于對付河北叛亂，南詔就投入了吐蕃的懷抱。南詔統治者向吐蕃稱“弟”，他的某些部隊也并入了吐蕃的軍隊。[[78]](#_78_Zuo_Teng_Chang____Gu_Dai_Xi)自此以后，南詔便成了位于南詔之北的劍南西川（在今四川和西藏的西康地區之間的邊界上）的真正威脅。中國兩位很能干的將軍崔寧（從767年到779年為節度使）和后來的韋皋（從785年到805年為節度使），在西南邊疆對吐蕃和南詔部隊打了一仗又一仗。如果他們牽制南詔的努力失敗，唐王朝就會陷入深深的困境，因為劍南西川一旦被蹂躪，長安就不大可能阻擋來自西方和西南方的鉗形夾擊。可是，對中國說來很幸運的是，在8世紀80年代末期，南詔對吐蕃的附庸關系在新南詔王異牟尋（779—808年在位）的影響下開始有所削弱。韋皋寫了一系列信給大理，希望利用異牟尋對吐蕃人的沉重賦稅和征兵壓力的煩惱情緒。大約到了792年，唐朝的壓力開始初見成效，794年初南詔正式宣告不奉吐蕃的宗主權，而恢復了中國屬藩的地位。[[79]](#_79_Zuo_Teng_Chang____Gu_Dai_Xi)這兩個國家在795年聯合起來于昆明附近攻擊吐蕃軍隊，并且在韋皋的領導下于801年進軍深入到吐蕃腹地。這些重大勝利，再加上堅決反對中國的吐蕃贊普和首相在796—797年期間相繼死去，以及吐蕃的北部和東部邊境面臨著牢固的聯盟等等因素，促使這個國家放棄了戰斗，從而結束了唐王朝半個世紀的對外戰爭。到了805年，新皇帝憲宗得以安心地把注意力放在國內事務方面了。

## 憲宗時代的中央集權進程，805—820年

河北藩鎮叛亂爆發時憲宗不過是個幼兒，當叛亂結束時他也還只是個孩子。但是在他于805年即位時，他已經是27歲的成熟青年人，而在他的成長期間他耳聞目睹了他祖父的屈辱和他父親的孤立無助的處境。從他在位期間的作為可以充分看出，憲宗既很堅決地力圖振興皇室的威望，同時又對于朝廷內的政治勢力有詳細而深切的了解。他是晚唐最強有力的皇帝。

力圖中興唐室的主要工作就是要顯示中央政府在戰場上能有所作為。[[80]](#_80_Bi_De_Sen____Zhong_Xing_De_W)從806年到819年，憲宗在反對6個最桀 驁 的藩鎮時成功地在7次重大軍事對抗中取得了進展。在取得領土和政治的進展以后，政府還接著推行了各種制度上的改革以補其不足。結果僅在15年內就大大地恢復了長安的權力。當然，憲宗沒有能夠再建立玄宗時代的大一統帝國。事實上，在9世紀初的十多年中曾一度馴服的三個獨立的東北藩鎮，在20年代又離棄中央政府并且再也沒有重返中央的懷抱。其他許多藩鎮雖然效忠于朝廷，但也在各自的地盤擁有很大的行動自由。可是重要的一點是，再也沒有爆發像8世紀那樣大的叛亂的迫在眉睫的危險了。的確，在憲宗死后的國內40年和平時期中，843—844年昭義鎮的叛亂是唯一的一次重大波折。他在朝廷與藩鎮之間搞了一個新的變通解決辦法。我們盡管有種種保留，朝廷顯然在這里仍占了上風。此外，唐帝國已經充分地重建起來。唐帝國的觀念深入人心，雖經9世紀末和10世紀初的大動蕩而歷久不衰，直到宋朝開國前仍是如此。不論從哪方面看，這些都是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業績。

憲宗對那些弄權的藩鎮發動對抗時是很小心謹慎的，因為他決心不重犯德宗在部隊未準備就緒以前就魯莽從事的錯誤。在808年初期，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死了，他的部下劉辟將軍要求繼承韋皋的職位。[[81]](#_81_Dui_Zhan_Zheng_De_Ji_Shu_Qu)皇帝答應了他的請求，因為他認為在即位之初不宜馬上去對付這一最后通牒。可是兩個月以后，劉辟竟要求掌管唐政府把今天四川省一分為三的所有三個鎮。大約25年以來劍南西川一直是防備吐蕃和南詔入侵的重鎮，而且正像我們在上面已經講過的那樣，這種肆無忌憚的挑戰預示著會有一批持強烈敵視態度的藩鎮要求擴張大片領地。憲宗已站穩腳跟，拒絕劉辟的第二個要求，用禁軍給他以反擊。806年秋天，中央政府的部隊出乎預料地在對劉辟之戰中取得了輕而易舉的勝利。劉辟及其上層謀士均被處死，在朝廷選派的新節度使之下恢復了秩序。這里在往后的幾十年中也出過一些零星的麻煩，但它們大多數是由于難以在這種種族復雜的地區推行中國的行政制度所引起的，而不是因為州鎮無視長安權威的結果。

到了807年春天，全帝國的藩鎮開始看到了京師重整旗鼓的氣象。長江三角洲富饒而盛產稻谷的浙西鎮節度使李錡故意藐視皇帝要他朝見的命令，想在新皇帝變得過分強大以前給他一個難看。于是在他鄰近的一個節度使的指揮下，迅速對李錡組織了一次討伐。不到幾個星期，李錡的畏罪的下屬罷黜了他，后來他在長安被處死。如我們所料，朝臣們都無比高興，大家都在談論唐室的真正中興。特別是神策軍和從忠于王朝的淮南征調來的討伐部隊在這兩次戰役中表現得很出色，出現了能與皇帝的決心相得益彰的普遍的信心。

更加麻煩得多的對抗發生在809—810年，這時朝廷向河北三大自治藩鎮之一的成德發起了挑戰。這是憲宗自己挑動起來的第一次事件，而且也像德宗在781年向東北挑戰那樣，問題還是節度使的繼承權問題。成德鎮原節度使在808年死去，次年年中他的兒子王承宗要求朝廷任命他為名副其實的節度使。8世紀80年代的戰爭以后，成德鎮在前幾次移交權力時，每次都由長安照例予以批準，雖然批準是很勉強的。這一次受了最近幾次勝利鼓舞而變得膽大起來的憲宗，決定不失時機地革掉當地自決節度使繼承人的陋習。他想要王承宗做些讓步，其中包括交出成德鎮屬下的兩個州來換取批準，但這一妥協馬上破裂。809年后期爆發了戰爭。可是，政府的討伐軍在次年初春陷入困境。首先是軍費開支太大；其次，把各忠順的州鎮抽調來的雜牌兵協調統一起來的問題不能夠圓滿地解決。[[82]](#_82_Zhe_Zhong_Wen_Ti_Shi_An_Lu_S)使事情變得更加復雜的是，憲宗委派宦官吐突承璀（820年死）為討伐軍指揮官，這一舉措雖不是史無前例的，但在朝廷看來也是很不尋常的，特別是在這樣一場重大戰役中更顯得不可思議。下級將軍們的士氣因吐突的無能而受到挫傷。憲宗經過勸說終于相信，討伐成德鎮的時機未成熟，因而在810年年中雙方都撤出戰場。王承宗保留了節度使職位。

軍事行動在往后幾年中中輟，因為憲宗和他的高級顧問們正在為了安排好未來的戰斗而想盡方法加強他們的政治和財政地位。吐突承璀卷入了一樁貪污案件，被解職和流放，皇帝說，“朕去之輕如一毛耳”。[[83]](#_83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809年，宰相裴垍（死于813年）實行了一系列財政措施（這一點將在下面詳述），據說在811—812年稅收便增加了。憲宗時稅收、免稅、官員的編制名額和薪水等方面的一系列詔令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與朝廷政策的關系都尚未得到詳盡的闡發，雖然這些方面的大量材料散見于各種史料之中。可是，也許可以有把握地說，皇帝實行軍事中央集權化的運動把唐帝國——政府和人民一起——幾乎推到了它能力的極限。當然，從憲宗時代的中期起，朝廷對于國家財政的討論就越來越熱烈。財政問題是太復雜了，不能很快地求得解決。

810年到814年期間經濟上取得的任何進展，比之所感受到的政治進展很可能就大為減色了。比如在812年，東北另一長期鬧獨立的藩鎮魏博竟然自愿歸順朝廷，從而結束了經歷四世的這個世襲節度使職位。曾經討論過進軍魏博并使之完全按照長安的條件順服的可能性，但這個方案最后被否決。憲宗對它的歸順作出的反應是大量賞賜金錢，并且作出幾項禮遇的表示，例如準許該節度使更換更響亮的名字，以示對浪子回頭后的厚愛。這種不費吹灰之力的勝利看來成了整個中央集權化過程的轉折點，因為長安不戰而屈人之兵，指顧之間就搬掉了一塊戰略上和心理上的大石頭。

從814年直到819年，憲宗狠狠地打擊余下的不恭順的藩鎮。第二階段軍事攻勢的主要勝利是取消了淮河上游淮西鎮長達60年的獨立狀態。[[84]](#_84_Bi_De_Sen____815__817Nian_Fa)雖然淮西與長安的對立不如河北諸鎮那樣廣為人知。但這里的問題也很重要，因為淮西的形勢會危及運河的交通和漕運，同時也因為淮西的軍隊很強大和頑強。唐王朝對淮西的討伐也開始得很有特色，因為節度使剛剛故去，他的兒子吳元濟想取得繼承權。朝廷認為淮西的周圍是忠順的各藩鎮，它是孤立的，所以很快拒絕了他的要求，吳元濟便首開戰端。可是，淮西之役曠日持久，打得也很艱苦，從814年一直拖到817年秋天。中央政府的討伐部隊四面合圍了淮西，但他們的協調作戰一度很差。官軍的將軍們都不肯冒全力出擊的危險。另外，中央政府與成德鎮的沖突再次爆發，東北的這個第二條戰線也使他們分了心，因而不再進擊。還有一件分心的事是平盧（今山東）節度使用游擊隊小股竄擾。平盧所關心的是不讓官軍戰勝淮西，因為他認為自己本身會是中央政府下一步打擊的明顯靶子。平盧的恐怖分子在長安刺殺了一位宰相，破壞了倉廒，而且一再在東都洛陽縱火。朝廷里的一片混亂和失望情緒會壓垮一個二三流皇帝，但憲宗表現得很堅定。最后，在皇帝和宰相裴度（765—839年）的統一指揮下，政府在817年年中集中了一切人力物力專攻淮西的首府蔡州。3個月之后，在晚唐歷史上最關鍵性的一次戰斗中攻克了蔡州和淮西鎮。后來政府軍奉命寬待被攻克地區的人民，這是符合憲宗對降服各藩鎮的總政策的。只對叛亂的頭目們處以死刑。818年淮西鎮被正式廢除，它的人民此后由鄰近諸鎮和平地進行統治。

淮西鎮戰敗后，成德也迅即屈服。憂心忡忡的成德節度使怕挨打，搶先向長安送了兩個兒子為質，以保證恭順。由于河北地方最小的橫海鎮（8世紀80代的叛亂以后所建）也已于數月前向朝廷歸順，現在只有兩個藩鎮還未受長安的節制，它們是北京地區的幽州以及平盧。幽州從未被波及，因為它在這個時期中無論如何不算最對立的藩鎮。憲宗在819年輕而易舉地就平定了平盧。當細心準備的討伐正在進行時，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被他的部屬所殺。朝廷于是研究了平盧地方的情況，為了保證那里將來不再發生叛亂，他們把平盧藩鎮一分為三。在這次勝利以后，憲宗才能感到滿意，因為他幾乎使整個中國本部領土都重新聽命于他了。

### 中央集權化的制度保證

唐憲宗的中央集權化政策使三個關鍵性的、互相關聯的經濟問題趨于表面化了，這三個問題就是：從8世紀80年代后期即已開始的明顯的通貨緊縮；許多藩鎮在稅收過程中的胡作非為；以及政府用于平叛戰爭中的財源不足。上面提到過的809年關于稅收和財政的幾道詔令，是楊炎780年的改革以來對付這類問題的最重要的措施，所以我們不妨對它們在這里略贅數語。

由于戰時物資緊缺及隨之而來在8世紀80年代出現的高物價已告終止，并且繼東南航運恢復之后谷物供應大大增多——這些促使通貨緊縮的原始動力又因政府長期缺銅的困難而加速發展。唐代的交換體系在大宗交易中是使用混合的媒介（即絹、銀和銅）及大批運輸糧食；的確，這個體系內部的運行從未被當局完全控制過，但是這個時期的問題表現得特別尖銳。第一，絹的數量已經相對地很少了。政府的大量儲備已在叛亂中毀掉；河北諸鎮和平盧鎮的獨立又切斷了政府的標準貨幣——絲——的最佳來源。[[85]](#_85_Cui_Rui_De____Wan_Tang_De_Di)唐王朝被迫向回鶻人出口的大量絲絹也占了長江下游絲產量的很大比例。另外，銀的生產、檢驗和鑄造主要由私商進行，它兌換銅和貨物的比率也因不受政府的密切控制而波動不定。同時，對銅的需求也急劇增長。[[86]](#_86_Cui_Rui_De____Wan_Tang_De_Sh)盡管政府一再鼓勵開礦，阻止窖藏錢幣和嚴禁偽造低劣貨幣，[[87]](#_87_Cui_Rui_De____Tang_Dai_De_Ca)但在9世紀開始之后很久銅仍是供不應求。很可能8世紀后期和9世紀商業經濟的擴展更進一步增加了對銅的需要。結果商品價格直線下降，例如，820年的米價只有8世紀80年代通貨大膨脹時期的10%；物價大跌對稅收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原來的兩稅法的稅額雖然主要是收實物，卻已以現錢計算。折換率一直定在779年的銅幣價值上，這時是通貨緊縮開始前的一段時間。由于用來付稅的基本農產品的價格下跌，而負擔的稅項卻一直按現金繳納，許多農民因而苦不堪言。危險之處在于，如果不再給這一交換體系以一定程度的伸縮余地，越來越多的農民就會淪入饑餓之境，而從政府的觀點來看，他們就根本無力交納稅收了。

既然通貨緊縮這樣不利于稅收的基礎，對收進來的稅項實行三馬分肥的辦法便把陋習帶進了下一步更高級的稅收措施中去。已由楊炎的財政專使與各藩鎮分別商定的稅額劃分有如下述。各州縣可截留一小部分稅收，稱為“留州”；較多的另一部分由藩鎮自用，稱為“送使”或“留使”；而最大的份額則應由藩鎮解往中央政府，稱為“送上”或“上供”。但是，作為這一過程中的中介人，藩鎮的文武大員是很容易欺騙中央政府的：他們或者謊報本地區糧食與布匹的時價，或者有時干脆拒絕向朝廷交足稅款。除此之外，州鎮官吏——特別是衙門胥吏——常常都是一開始就在所收實物和現金稅額的折換率上搞鬼，盡量額外為自己搜刮，而把負擔加到農民身上。那些最強大的藩鎮用這種辦法聚斂了巨大的財富，這筆財富既是用于支付“貢品”的主要來源，也是正式官方稅收制度中的凈損失。這種陋習就像在中央當局不知情的情況下地方上猖獗一時的非法的苛捐雜稅，當然是與8世紀中葉以后藩鎮權力日重的形勢互相表里的。[[88]](#_88_Ceng_Wo_Bu_Jing_Xiong____Tan)

因此毫不奇怪，中央政府所能到手的稅收是很有限的。德宗的儉樸和吝嗇應該說可以使國家有所節余而足供憲宗早期的軍費之用，但這些儲備顯然并不是用之不盡和取之不竭的。這便是宰相李吉甫（758—814年）在807年的奏疏中所要說的意思，因為這時只有8個鎮能正常向中央解繳稅款；和玄宗末年相比，這時只有四分之一的家庭能成為可靠的納稅戶。[[89]](#_8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裴垍在809年的措施是想阻止唐朝的惡劣經濟狀況變得無法挽救，這樣就自然能給憲宗提供軍費。[[90]](#_90_Song_Jing_Xiu_Yi____Pei_Ji_D)他的第一個基本措施是給絹規定并推行一個“中間”價格，并且使絹和銅一起成為交換媒介，以便能向通貨緊縮發動反擊。像地方官員的薪水和地方軍隊的醫藥軍需品這種固定的開支，都從全部現金支付改成現金和實物混合支付的制度，以對付銅價過高之苦。地方被嚴禁操縱通貨。他的第二個基本措施是把兩稅法納入標準折換率和保證稅收收入的統一體制之中。這意味著一個重大的政治舉措，即解除地方對征稅的控制。自此以后，藩鎮應從會府（即首州）的財源中取得他們收支表上的收入部分，只有在入不敷出時才能指望治下其他州縣的支持。作為回報，會府便完全解除了向中央政府繳稅的義務。與此同時，其他各州則不用再向它們的藩鎮解繳稅款了，但必須把原來的“留使”部分連同它們自己應解的稅款一起直接交回給長安。

朝廷的這些公告在實行時并未取得完全的成功，801年和811年的補充詔令中提到的屢禁不止的違法事件便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企圖穩定物價的嘗試特別難以實行，而且它們更多的是針對后來10年中仍在繼續的迅速通貨緊縮的現象來治標，而不是針對它的產生的原因來治本。[[91]](#_9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另外，誰也難以肯定，在裴垍改革之后朝廷的整個收入實際上增加了多少。雖然如此，這些措施顯然至少減輕了淮河和長江下游農民的實際賦稅負擔。由于這些措施是在808年對李錡的重大勝利之后不久采取的，隨之實行的賦稅減免具體地向浙西的老百姓顯示了天子君臨彼土的好處和對老百姓支持天子統治的鼓勵。從政治上說，裴垍的改革重申了皇帝有權直接統治他的州縣，而不用中間橫隔著一個敵對的藩鎮行政組織來阻斷上下之間的聯系。但是就在這時，藩鎮仍然有許多辦法繼續搗亂，使中央政府的法律無法貫徹下去。

在憲宗歷次平叛成功之后的819年，節度使烏重胤建議也在藩鎮的軍政制度方面實行一次類似財政改革的改革。藩鎮統兵之權沒有了，節度使只剩下了控制要塞和統領會府戍軍之權。刺史往后則要統領本州的外圍戍軍和駐軍。只有邊防重鎮及非中國人的雇傭軍所守之防區不在此例。和前此的財政改革一樣，這道詔旨的重要政治意義在于，在犧牲藩鎮利益的情況下密切了中央政府和州治之間的關系。在8世紀后期和9世紀初期，節度使之所以能進行軍事威脅和政治恫嚇，就是因為他能動員本鎮全部兵力，其數目可輕而易舉地高達數萬人。任何忠于長安和不愿參加這種叛亂的刺史，會很快被節度使的其他部隊所消滅。可是819年以后，一個對朝廷心懷不滿的節度使就很難把不相統屬的許多州領部隊統一帶動起來，以投入一次奇襲行動。因為僅就單獨一個州的部隊來說人數相當少，有時是二三千人，通常比這還要少得多，但他們的向背也舉足輕重：他們能使藩鎮受很大損失，而使州治得到實利，也使中央政府間接受益。但我們仍然應該看到，如果節度使是奉詔旨行事，他仍然完全能夠召集并統領本鎮的全部軍隊。換言之，節度使的合法職能在改革中仍被保留，但他制造麻煩的權力則有所抑制。很可惜，關于819年詔令實施的情況我們所知甚少。看來，這種限權行動在華中和東南部確已被人接受，但在華北和西北這些有大量常備軍的軍事重鎮卻遇到了阻力。在河北似乎根本沒有行通。

從810年和819年所定的制度措施我們完全可以看出，憲宗有意要把他的軍事勝利的形象長期地固定下來。不過對于另外幾次勝利，我們知道的甚少。但是，雖然中央政府在9世紀的初期和中期已能較緊密地控制地方政府，這個過程很可能從未完成。在憲宗以后，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幾位皇帝都很軟弱，他們除了守成之外沒有其他作為，而且在很多情況下他們連這一點也沒有做到。在唐帝國的各個地方都發生了藩鎮與州之間程度不同的權力調整情況，不過除了極少數事例以外，我們已很難推想這種權力調整的情況了。

### 憲宗初年的政治轉變

在某種意義上說，唐代歷史上新君即位往往是中央政府的一次補偏救弊和實行人事變動的時機，但是在805年，憲宗遇到的問題卻異乎尋常。在前10年中，實際上每一個利害上沆瀣 一氣的集團有時已被置于無足輕重的地位，或者至少被暫時排斥而不能掌權，例如唐德宗以很壞的態度對待職業官僚，二王集團又以同樣的態度對待宦官。整個政界都期待憲宗能恢復他們被侵奪的特權。他們對他的要求常常互相矛盾，氣氛也弄得很緊張。[[92]](#_92_Jian___Zi_Zhi_Tong_Jing____J)

在皇帝和職官之間顯然需要有所和解，這便是他所面臨的最緊迫的政治問題。新皇帝擺出了大家所期望的姿態來顯示他的正直——遣散了多余的宮廷樂工；拒不接納所貢的50名婦女去充實后宮，等等。但是，德宗和順宗在最初都是引人注目地來顯示他們的熱忱，到后來反而使官僚們失望，而憲宗的詔令卻是卑之無甚高論，重點只談要恢復官署正當的辦事程序和重建朝廷的德治。例如，憲宗在拒不接受荊南所獻的兩只壽龜時，他不僅禁止將來再有人貢獻遠方異獸，還命令把所有這些“樣瑞”都交付有司處理；他不愿意見到它們，不愿意知道它們，除修王者之德以外不愿做其他雜務。[[93]](#_93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4_Di)

這些行動對于嚴謹的官僚的風紀來說一定很有鼓舞作用，同樣，他們對新皇的關于改變供職條件和獎賞忠勤的命令也抱有熱烈的希望。在唐代，它們包含在每逢國家大典——例如新帝即位、改變年號、皇帝壽誕和重大的軍事勝利等慶典——時必發的大赦（赦宥）令中。大赦令是一種被人們忽視的史料，對它們的廣泛研究會引起人們的很大興趣，因為它們經常包含總的政策聲明和國家形勢的總結，以及一些關于特殊豁免、大赦和對貴族、各級官吏、平民百姓——有時也對某些個人——的提升和發放俸祿情況的內容。[[94]](#_94___Tang_Da_Zhao_Ling_Ji____Ju)

806年的大赦令（因改年號為元和而頒布）確實包含了寬大的讓步內容。它確實是憲宗初期熱情的某種表現；德宗在他統治的最后13年中沒有頒布一次大赦，這個間歇期間之長很有些異乎尋常。806年的大赦令給現職文武官員都頒賜了相應的勛或爵，其中包括神策軍和地方軍隊的將軍們與軍官們。[[95]](#_95___Tang_Da_Zhao_Ling_Ji____Ju)對安祿山叛亂后的任何時候特別立過軍功的人的兒子都賜以官，對他們的孫子則賜以出身的權利。對于中央和藩鎮顯宦的已亡故的父母也給予身后的哀榮。對于安祿山之亂后所有位居宰相之職的人以及對于在代宗和德宗流亡期間仍然在他們身邊效忠的人，也另給榮銜。所有宰相和兼宰相銜的藩鎮官員（即所謂“外使宰相”或“使相”）以及其他三品和三品以上的大官都可選一子立即當官；這是正式“選”試之外的便宜辦法。它還規定在學校內設立100個“學生”的名額以招收無業的文人學士。

至于這些內容有什么實際意義，這還很難說。可能有許多人重復享受某些待遇，但也有些內容實際上幾乎無人可以享受。但是重要的是下列幾點：（1）憲宗給了幾乎每一位官員以某種關懷；（2）那些有可能被遺忘的不滿分子，例如那些舍此即不能得到一官半職的軍事英雄的后裔們也得到了安撫；（3）那些官居極品的人尤其受到優渥；（4）有了定時屢頒大赦令的希望。

這一安撫性的和論功行賞的政策也擴大到某些具體個人身上。鄭絪（752—829年）便是最好的例子。鄭絪原為翰林學士，曾在805 年2月支持順宗的繼位，后又安排順宗遜位于其子憲宗。為了酬報他的忠誠，憲宗任命鄭絪為新設的翰林承旨，后更為宰相。鄭絪居宰相位的三年半時間政績平平。他的任命顯然是政治性的，而且一經研究無疑會發現，那時的一些高級官員的任命不乏與此相類似的情況。[[96]](#_96_Cai_Liao_Lai_Zi_Yan_Geng_Wan)

和這些發展相聯系的是憲宗對政治上的不良分子實行了有節制的報復的明智政策。首要的打擊目標當然是王叔文集團，如上所述，他們已被斥逐異域。但重要的情況是，除了二王本人之外，憲宗不像其祖父德宗當年可能做的那樣，他并未處死一人。另外，清洗的范圍非常謹慎地只限于真正參與過805年事件的那些人，并不像歷來所為的那樣殃及罪犯集團的家屬或親朋故舊。在二王集團以外，憲宗甚至更加審慎。他下令終止了某些確實罪惡昭彰的行為（例如鹽鐵轉運副使潘孟陽宣慰東南時的淫佚放縱即是[[97]](#_9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但是皇帝顯然知道，如果要有力地處理最近的一切壞事，那可能失之公正和造成分裂，因為這樣不免有不少挾嫌報復和其他特殊情況會起作用。

在杜黃裳做宰相的805年后期和807年初期這一段時間，皇帝和官僚的新關系甚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杜黃裳（738—808年）是原為宰相而又與二王集團關系非常密切的韋執誼的岳父，在通常情況下他不大可能晉位宰相，因為株連同伙向來是一般規律。可是，杜黃裳曾經避免直接卷入二王集團，而且他助長了他的女婿對二王集團的疑慮。杜黃裳之能夠官居極品，充分證明了憲宗懷抱著和解的政治姿態。除此之外，杜黃裳不同于年邁的杜佑（他一直在長安做榮譽性的宰相，直至812年去世時為止），雖然也同樣處于高齡，卻享有實權。杜佑很受尊崇，但看來被視為知識界中我行我素的人，而杜黃裳則是傳統的經世論主流中的代表人物。他是進士，原為戰爭英雄郭子儀的門生故吏，也是政府許多重要衙署的老臣，例如他做過吏部侍郎，這在8世紀末年是尚書省內最重要的職位之一。他曾主持791年的進士考試。他也有許多直接的敵人。在8世紀90年代中葉他與裴延齡發生過沖突，在德宗的半隱退的時期根本沒有擔任過任何官職。在官僚集團中，人們再也選不出比他更能說明問題的典型的人了。

杜黃裳是憲宗要實行軍事中央集權化計劃的政治推動者，是第一個在朝廷公開提出皇帝應該遵循德宗的“姑息政策”還是應該另辟蹊徑的官員。[[98]](#_9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2)憲宗這時對于采取突然的軍事行動仍然持審慎態度，他認為對西川的叛亂將領劉辟采取任何行動必須有周詳的準備，但是杜黃裳堅決認為有前車之鑒，所以必須先發制人。他說服憲宗任命神策軍使高崇文統領全部禁軍，因為宦官只會在軍事系統和地方機構中間擴散貪污腐化的影響，而且他們也不宜于統兵打仗。不管這種說法有什么失實之處——杜黃裳死后被指控曾接受高崇文的賄賂——杜黃裳顯然已把他的前程押在了這場戰事的勝負上面，因為他還指授了這次進兵的方略。如上所述，神策軍對劉辟的討伐大獲全勝。憲宗對杜黃裳的勇氣既感激又欽佩。

君臣之間如此相契，使得杜黃裳有機會同皇帝更加認真地討論理論問題，即討論關于賢明和正義的統治以及正確行使政府功能等老生常談的問題。他的意見都是正統的：他主張皇帝應該是上天與塵世之間的聯系，是列祖列宗與今世之間的聯系，是國內百姓與四夷之間的聯系；他應該知道上下之分，輕重之別。具體說來，這話意味著憲宗應該把實權授給經過仔細挑選的下屬，特別是經過慎選的宰相，并應避免對政務統得過細。按常情說，我們可以把這些議論視為又一套陳詞濫調。但是，憲宗和唐代其他許多皇帝不一樣，他對這一類問題真誠地感到興趣，特別是在他即位后的頭10年中更是如此，[[99]](#_99_Li_Ru_Ke_Kan___Zi_Zhi_Tong_J)而在這種場合下，他與之談話的是一位經過考驗的實干家，而不是一個只知背誦儒家經義而無所作為的人。所有史料都著重表明，這樣的討論對唐憲宗產生過很深刻的影響。我們應該相信這種說法。憲宗對官僚的政治和解態度一直延續到后一個10年的相當一段時間。至少在9世紀第一個10年的中期，皇帝經常與宰相商量問題，又恢復了許多外廷的制度。正像將在下面要敘述的那樣，憲宗的興趣和官僚的興趣并不全然一致，所以中央政府內部的合作和和諧程度必然有限。但是比之僅僅五年前德宗時代的僵局來說，新的氣氛顯示了要變好的大轉機。長安官方的許多人都希望唐王朝的中興會指日可待。

### 憲宗朝廷的極盛時期

憲宗朝廷的鼎盛時期從806—807年的勝利開始，一直延續到815年宰相武元衡被藩鎮恐怖分子刺殺時為止。807年杜黃裳已年約70，而且也可能有些風聲涉及他后期的經濟問題，所以他被派往山西南部做河中節度使而光榮地退職，次年便死在那里。為了取代杜黃裳，憲宗同時拔擢御史武元衡（758—815年）和翰林學士李吉甫（758—814年）為宰相。這是憲宗時代曾用一系列優秀人士居相位的最初兩個人；以后諸人則有裴垍、李絳（764—830年）和裴度（765—839年），都值得大書特書。這顯示了皇帝真正想在高級官僚中盡可能選用最優秀的人才。比起前任的一些宰相，新宰相的年歲明顯地下降了。他們大多數是50歲上下的人，成年于8世紀的最后25年中。他們雖然不像皇帝那樣年輕，但我們可以假定，他們比原來當權而又生活在兵戈滿地和政局動蕩中的老一輩宰相們更投合憲宗的銳進之氣。憲宗時代的宰相們在致力于中央集權化的運動中起過重要的作用，這種作用反過來又有助于恢復外廷在8世紀90年代已喪失的某些影響。我們不妨在這里簡單介紹一下憲宗朝鼎盛時期的三位關鍵人物——武元衡、李吉甫和李絳。

武元衡是武后（684—705年在位）家族的后裔，也是她家族中的第四代官員。他在783年舉進士。此后他任過各種官職，例如做過藩鎮的幕賓、監察御史、縣令、部員外郎，804年則做過御史中丞。在德宗晚年，他曾辭去他的一個官職以抗議京師禁軍引起的騷亂。或許就是這個緣故，二王集團中的文人們曾在805年請求他就任一個禮儀性官職，他不無識見地置之不理。在他于807年被提拔為宰相以前，憲宗曾派他到御史臺和戶部任職。在他第一次做宰相的短暫時期內，他就與皇帝建立了互相信任的關系，所以他被委具體地負財政重責。為了配合他的私交和政治好友李吉甫，武元衡堅定地要求皇帝對負隅頑抗的浙西節度使李錡采取強硬的路線。他們兩個人普遍被認為是最后促使807年戰爭勝利的人。為了表示充分的信任，憲宗后來任命武元衡擔負一個艱巨的任務，即去新近收復的西川恢復秩序。曾經俘虜了劉辟的神策軍將軍高崇文是一個很好的軍人，但不是一個好的行政官員。武元衡在807年后期替代了高崇文，經過3年時間把西川安定了下來。

武元衡在813年再次被任命為宰相，這時正是淮西戰役即將發動的前夕。憲宗這時并不需要有人來說服他有用武的必要性，因此武元衡的新問題便主要是搜集情報并發動討伐（這些任務原是派李吉甫去負責的，但李吉甫在814—815年冬天去世，留下武元衡獨力承當這些責任了）。成德節度使和平盧節度使這時期也開始明白，中央政府對淮西如箭在弦上的攻勢也會使他們的獨立地位處境堪虞。為了爭取時間，他們雪片似的發來了互相矛盾的懇請、要求和承諾的函件，希望朝廷放松警惕。可是在815年年中，成德節度使又請求朝廷寬赦淮西叛亂者，但被武元衡堅決拒絕，其結果是引起了一連串事件。幾天以后，當武元衡從長安的私邸中外出準備上朝時，他被一伙騎馬的散兵游勇所刺殺。拘捕了成德那時駐長安的幾個涉嫌的軍士，并以不甚充分的證據給定了罪。皇帝因此極為震怒，沒有人能夠勸阻他在816年興兵討伐成德鎮。[[100]](#_10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平盧節度使后來被發現才是刺殺武元衡的真正幕后策劃者。[[101]](#_10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可是，這個魯莽的挑釁性的恐怖活動最后卻打擊了藩鎮的利益。為了平息815年京城的驚恐，憲宗大奮神威，決心再度懲治藩鎮的割據主義。武元衡為此而殉職，這使得他的能干的副手裴度被任命為宰相，并最終導致了對淮西的決定性的勝利。

這個時期第二位重要的宰相李吉甫原是代宗時代一位名宦的兒子。他在二十幾歲時以蔭庇入仕，后來擢升至相當高的位置，而以他的禮儀知識受到人們的注意。雖然李泌和竇參都很看重他，但他沒有得到陸贄的垂青而于8世紀90年代被貶為長江下游幾個州的刺史（陸贄的敵人在陸贄于794年被放逐以后任命李吉甫為陸贄的上司，希望李吉甫對一切有關人員進行報復，但李吉甫始終沒有這樣做，所以他的寬宏大量的名聲為之大振）。在8、9世紀之交的大約6個年頭中，李吉甫因病而未擔任任何官職。可是，他利用離開長安的這段漫長時期去熟悉南方的情況和問題，當他最后回到京師時，他變成了唐帝國最精明干練的行政官員之一。憲宗在805年任命他為翰林學士，次年又升任他為中書舍人。李吉甫馬上被卷入了當時最重要的爭端中去。他熟讀兵書，又有優異的文職成就，并且對推進四川和浙西的戰事給皇帝詳細條陳過意見。他洞悉跟吐蕃人談判的機微訣竅。807年他上呈《元和國計簿》（現在僅存片斷），813年又上呈《元和郡縣圖志》（大部分尚存），另外還著有關于政治史的書籍和一本職官手冊。他和武元衡一起推進了幾項關于中央政府和州的法律程序上的改革，其中的原則是繼續建立官僚制度的威信。

在他兩次任宰相期間（一次是807—808年，一次是811年直至他去世的814年；他是憲宗時期任職最長的宰相），他以主張中央政府應采取進攻性的軍事立場而聞名，這在史料中被泛稱為“用兵”之策。他的基本態度是切實加強戒備，而不是一味好戰，例如我們看到他在813年提出的關于重建北方邊防的建議便是如此，[[102]](#_102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但是，有時也很難加以區分。他對淮西采取了不調和的強硬路線，同時如上所述，他在去世以前與實際擬訂的帝國的討伐計劃是分不開的。李吉甫在這些問題上和武元衡同心同德，但他和憲宗中期的第三位重要宰相李絳卻經常發生沖突。

李絳也出身于四代為宦之家，與李吉甫的顯赫家世同源，但他的父祖輩卻不那么顯耀。他中過進士和宏辭兩科，他顯然就憑這些資格進入了仕途，并沒有想到使用蔭庇特權來擢升高位。[[103]](#_103_Jian_Cui_Rui_De_Zai___Jian)我們對他的早期經歷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專門談過他自己的專長是“論諫”。從807年到811年他做翰林學士，此時又與年輕的補闕白居易一起，不停地就不同的問題行使其勸諫的權力。當他在戶部的時候，他力求終止不正常的財政手續和恢復對合法組成的渠道的完全控制。

李絳在氣質和作風上都大異于李吉甫。憲宗很了解這一點，但是為了在朝廷內鼓勵發表不同意見，他在重新任命李吉甫為宰相后的半年內，又在811年任命李絳為相。事實上，他們兩個人的觀點在許多問題上并非真有很大的分歧，只是他們在如何進行討伐藩鎮的戰爭這一問題上有尖銳的沖突，因此就掩蓋了歷史記載中的其他問題。812年，如何處理魏博節度使自愿歸順的問題成了當務之急。李絳曾經反對過對河北地區用兵，認為這樣做太危險，因此他主張以賞賜和寬恕的懷柔政策來撫慰魏博。但李吉甫則想顯示武力，給魏博施加壓力。這一次是李絳的意見占了上風。魏博的當局熱情地接待了朝廷的使節，而沒有提及需要朝廷的大量恩賞。[[104]](#_10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可是，814年的淮西危機卻是另一碼事，這里的情況更適于用李吉甫的進取精神來對待。另外，憲宗那時對鬧獨立的藩鎮已采取了更加強硬的政策，同時李絳也已從宰相位置上降職到北部，因此他的反面意見也不那么有分量了。819年，李絳做了河中節度使。有趣的是，他在9世紀的20年代被人稱為怪人，最后因在西川處理叛軍失策而被當地的叛兵殺害。

盡管他們的政見常常不一致，但元和年間這些大臣和其他大臣們的仕宦經歷比起代宗和德宗時代的官僚們的經歷來說，要正常得多，而且可以進一步預測。而且，重振官員的精神面貌的工作也不限于在京師實行。憲宗想把藩鎮的高級職位——特別是節度使之職——重新納入正常的政治任命的軌道。這不僅會打破軍人們對這種戰略性職位的控制權，而且也將限制朝臣們只眷戀做京官的習慣。這個過程怎樣開始的，詳情不得而知，但一定與讓許多節度使定期輪換之舉有關，而這種辦法在德宗時代已棄而不用。我們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說，從憲宗時代開始直至大約9世紀70年代，原來的宰相們在長安任期屆滿后可以指望被任命為節度使。例如河東、河中和山南這幾個藩鎮的節度使很可能由京師新近退職的大官來充當，或者由希望及早返回長安的官員充當。[[105]](#_105_Wang_Shou_Nan____Tang_Dai_F)在這一方面，中央集權化的利益與官僚出路的利益結合在一起，因而可能有助于9世紀中葉各藩鎮的政治穩定。

總的看來，憲宗是唐代后期幾乎重建太宗之治的人，他享有此譽是當之無愧的。憲宗顯然以成為一個崇高的論壇的庇護人而感到自豪，他說他寧愿多花時間同宰相們討論問題，而不愿經常陷入日常瑣事之中。[[106]](#_106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他鼓勵朝臣們大膽發言，而如果有人不敢參加重要的辯論，他就會不高興。他想盡量活躍空氣，鼓勵朝臣們的自信心和置身事內的意識。對于那些經歷過8世紀長安的動亂的人來說，這種變化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 憲宗末年的不和諧狀態

雖然憲宗君臣的協作已像上面所述有了很大的改進，但合作的程度仍然是有限度的。我們不能低估皇帝在工作中的緊張狀態。他的喜怒無常的脾氣是有記載可查的，它足以讓朝臣們知道，沒有一位皇帝是可以等閑視之的，特別是對專心致志要干這樣一番大事業的皇帝更是如此。他的個人生活——包括內廷事務和他皇室領袖的地位——對于外臣來說更不可輕易地碰一碰。[[107]](#_107_Li_Ru___Zi_Zhi_Tong_Jian)但是即令在純屬政府的事務方面，憲宗雖然一再要求和嘉納直言議事，但他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早在他即位的初年，那些以匡正皇帝不足為職責的言官——御史、拾遺和補闕——就經常因此處于進退兩難之地。他們如果對敏感的問題直言忠諫，就會冒極大的風險。例如詩人元稹（779—831年）在806年上疏請廣開言路而備受嘉納，這無疑鼓勵他后來于809年在東川巡視時十分有力地揭發了種種丑聞。[[108]](#_10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在這整個時期他樹了不少有權有勢的敵人，而在他的庇護人宰相裴垍辭官以后，元稹于810年便因以東臺監察御史身份越權干涉有權勢的河南尹之事而被放逐。

這種緊張關系在9世紀第一個十年中葉開始出現在主要的政治舞臺。當憲宗有時還能容忍某個宰相的直諫時，[[109]](#_109_Li_Fan_Ji_Wei_Yi_Li__Qi_Chu)人們已能清楚地看出，他希望對國家大政的辯論嚴加控制，辯論應限制在最高級官員的范圍以內。當他的中央集權化的見解已經形成時，大臣們的不同意見更經常地被視為對他的旨意的冒犯。特別是在武元衡被刺殺以后，無人能勸阻他在東北開辟反對成德的第二戰線，盡管這會使在南方討伐淮西的軍情更為復雜。那些懷疑對藩鎮采取強硬態度的人都被人們勸說應克制己見；例如宰相張弘靖（760—824年）便在816年初辭官而去，因為他知道憲宗不會聽從他主張應取克制態度的建議。

這位意志堅強的皇帝甚至同最有能耐、最忠心耿耿的大臣們也鬧翻了。裴度（765—839年）的事跡便是頗能說明問題的例子。這里不妨談點背景材料，它或許是有用的。

裴度出身于三世簪纓的河東大族，此家族與唐王朝從開國之初就關系密切，曾在唐代產生過17位宰相，人數之多僅次于皇室。[[110]](#_110___Xin_Tang_Shu____Juan_71Sh)他不僅在789年中了進士，而且在792年和794年中過兩次更高級的制科。他在河南和御史臺做過官，后來又在808—809年武元衡平定西川時當過武氏的幕賓。但他那時在戰爭政策上并無一定之見，并在812年負責了微妙的談判以貫徹李絳在魏博的計劃。后來他再一次成為武元衡的幕賓，在815年的刺殺武元衡事件中他適在武元衡身邊，因此受了傷。憲宗盛怒之下決然立即起用裴度為相（盡管有些小心翼翼的朝臣很怕進一步激怒藩鎮），以此表明他繼續推行中央集權化政策的決心。裴度挺身用命，不怕有人再次對他行刺，他的勇氣贏得了皇帝極大的敬重。

討伐淮西和成德的戰事弄得曠日持久，一直從816年延續到817年，這時朝廷官員們就錯在哪里和怎么做的問題議論紛紛，意見越來越不一致。朝廷經常軍前易將，且不說淮西節度使進行的頑強防御，僅就陣前易將來說是絕不可能改進戰略上有問題和官軍內部協作很差的情況的。許多朝臣都深為悲觀，他們越來越認為只有放棄戰爭才是避免中央政府徹底垮臺的唯一出路。皇帝始終死抱著靠更佳的戰術來解決問題這一希望。817年，他終于被說服暫時放棄了與成德作戰的第二戰線，而專心致力于淮西之役。幾個月以后，宰相李逢吉（758—835年）和王涯（約760—835年）再一次提出軍費浩大和師老無功，這引起了朝廷內有一派人吁請停止一切戰爭活動。這時裴度說服憲宗批準他自己出馬去統領南方官軍，并且讓他戲劇性地深入作戰地帶，以便平息各將軍之間的無謂紛爭和組織軍隊作最后的努力。這是絕對必要的，因為淮西之役暴露了自安祿山叛亂以來帝國軍事行動中常見的各路兵馬各自為戰的一切最壞的毛病。對于他這次任務的執行情況頗多疑問，因為有關這次任務的記載代表了不同的看法。必須把采取決定性行動突然攻取淮西府治的功勞歸之于著名的將軍李愬李愬（773—821年）——8世紀80年代戰爭英雄李晟的兒子；但我們有理由說，裴度在政治和組織工作方面給他鋪平了道路。[[111]](#_111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70)可以肯定，是他負責把憲宗一貫使用的寬厚政策應用到淮西被征服地區人民身上的（可是反之，對叛亂領袖則處以死刑）。這一政策能在戰事一旦結束便使淮西安定下來。對于憲宗來說，裴度是時代的英雄，榮譽像雨點般傾瀉在他身上。那些不積極主戰的宰相們都臉上無光了。此后不久，裴度前往協調討伐平盧的最后一戰。

裴度所享有的當之無愧的政治顯赫地位是這一時期官僚制度向著更強大和更突出自己的方向轉變的最集中的體現。但是如上所述，君臣之間有不可跨越一步的雷池，過了這個限度就可能發生沖突。還有什么東西能阻止裴度的繼任者不效法他，而以楊國忠或元載為榜樣呢？憲宗不得不關心的是，比如說，高級文官在統帶大兵作戰時不是把統兵看成為了應付特殊情況的特殊安排，而認為這是某種必須擁有的權利。他的擔心正是步了他的前輩們的后塵，因為唐代以前的皇帝們都想分裂或限制所委托的權力范圍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防范官僚階層把權力聯合起來向至高無上的皇權挑戰。雖然憲宗比德宗或代宗更樂意支持振興官僚的特權和士氣，但他在保持國家的最后控制權方面，其決心并不小于代宗和德宗。

事實上，沖突很快就在文職事務方面爆發了。憲宗在818年想任命皇甫镈（約755—820年）和程異（819年死）為宰相。裴度和其他許多大臣都激烈反對，雖然任命五品及五品以上大員本是皇帝個人的例行公事，它有別于對六品及六品以下官員的任命。現職的絕大多數下級官員是由吏部照例委任的。可是，隨著宰相權力的加大，他們必然想左右皇帝對高級官員的挑選。

皇甫镈和程異的任命事件很令人感興趣。這兩個人都是財政官員，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們都是在淮西戰役中急需軍費時幫助政府籌款的人。他們的稅收措施快捷而方便，因此可能很粗暴，但是史料對他們成見太甚，很難對這種說法作出評價[[112]](#_112___Xin_Tang_Shu____Juan_54_D)（皇甫镈之知名主要是由于他雷厲風行般地改進了漕運效率；程異之知名則是因為他在817年去東南為財務出了一次公差，便弄到了200萬緡來應戰爭之需）。但是，或許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社會背景。不像裴度所屬的裴家是那樣的名門巨族，安定的皇甫家不是頭等世家大族，但也是第二等郡望。[[113]](#_113_Jian_Chi_Tian_Wen___Tang_Da)程異的出身不太清楚，但我們知道他不是生于最上等人家。另一對程異不利之點是他曾經與王叔文集團中的暴發戶有瓜葛。

這兩個人被提升到極品大官一事，引起了京城里對他們的政治和社會資格的一片議論之聲。裴度連同另一個也是大家族出身的官員崔群（772—832年）帶頭攻擊他們，說朝廷如果用了這樣的小人是會留下笑柄的。[[114]](#_11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裴度還指責他們倆人無能與不誠實，說他們的行事早已激怒了出征士兵，因此可能在將來引起麻煩。

憲宗自然懂得裴度反對的真正原因，結果反對皇甫镈和程異的聲浪未產生效果，因為皇帝決定自己建立一套任命大臣的標準。可是，裴度很不明智地逼著憲宗攤牌，把對皇甫镈和程異的任命同憲宗的整個政治成就因道德解體而毀于一旦的可能性聯系起來。他以自己的名望來對抗皇帝的聲望，這種立場很近似于大不敬罪。因此憲宗別無選擇，只有把他免職。裴度被免職后照例任節度使，他實際上做了重要的河東節度使，這事件便在公眾中無形消失。可是，它揭示了晚唐朝廷內的大量權力關系上的問題。

長期反對使用宦官的斗爭，也與上述情況相同。確實，憲宗要確保德宗時代常見的那些宦官丑聞在他的治下越來越少。這部分的是因為宮廷辦事手續已有所改革，而且宦官在憲宗初期也一度對朝政斂跡。可是這種對更正統的反宦官意識的讓步很快表現出基本上是象征性的。例如，被裴延齡在8世紀90年代恢復并由宦官擔任工作的內庫，于805年名義上予以撤銷，以取悅于官員們。但是，當德宗的儲備大部分在約于809年充了軍需以后，宦官們在財政事務中又活躍起來，雖然外廷官員一再抗議也無濟于事。

宦官干涉軍事，在憲宗朝始終是個特大問題。他們的活動范圍越來越大——做密探、招權納賄等等，組織嚴密；他們不僅抓神策軍，甚至也在許多藩鎮部隊和長安將要成為將軍的人中插上一手。憲宗偶爾似乎也愿對政治壓力讓步，例如在劉辟事件中他就曾暫時解除了宦官對神策軍的兵權，但事實證明，在其他情況下他又非常舉棋不定。他解除了吐突承璀討伐成德鎮之役的領導權，后來又打發他離開朝廷，但不久又在813年免掉了吐突承璀的主要政敵李絳的相位，因此這名宦官又回到朝廷擔任了一個要職。[[115]](#_115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憲宗時代宦官在京師里活動的范圍究竟有多大，我們只能猜測。但表示他們權勢日益增長的標志是810年設置樞密使職務之事。[[116]](#_116___Ce_Fu_Yuan_Gui____Juan_66)第一位任樞密使的人是宦官梁守謙。在9世紀大部分時間有兩個這樣的樞密使，他們主持的官署稱為樞密院。唐代的樞密院不是宋代那樣的掌兵機構，它只是宦官在外廷和皇帝之間發揮傳遞文件的作用時派生出來的組織。[[117]](#_117___Wen_Xian_Tong_Kao____Juan)它成了宮廷里協調宦官所參加的其他各種活動的一個機構，因此，看來應該把樞密院一詞翻譯為宦官宮廷議事會才是。[[118]](#_118_Wang_Shou_Nan____Tang_Dai_H)樞密院可能是向皇帝進言的一個非正式顧問性機構。它肯定地在皇室和監管神策軍的宦官之間起著聯系作用。兩樞密使和兩神策軍監軍總稱為“四貴”。總之，樞密院擁有徽章和其他津貼，足以使任職者對人夸耀，使外人羨慕，所以它是宦官利益的集中點。后來在9世紀，樞密使有了足夠的權力來抗衡或控馭宰相，但與往常一樣，他們的權力也是皇帝為了控制他們才授予的，而且直到憲宗去世之年，皇帝似乎能緊緊地控制大部分宦官的活動。

這不是許多傳統歷史學家所持的觀點。他們認為約在818年以后的一個時期各種大不敬的行為有所增加，而以820年初期皇帝的死達到了最高潮。許多世紀以來，人們都認為是宮監陳弘志弒了憲宗。[[119]](#_11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這事件不可能真正得到證實或反證，但它卻引起了一些有趣的問題。憲宗當時只有40多歲，在他把注意力從討平藩鎮戰場上轉移到進一步在長安搞改革之前，清除憲宗是為了宦官們的利益嗎？從這時起以迄唐末，宦官每次在擁立皇帝的問題上擁有的大權力顯然都有其政治后果，所以我們有理由這樣認為，這次暴力事件其實是這種政治行為的開始。但從另一方面說，宦官作為一個集團為什么要加害于對他們做過那么多好事的皇帝呢？像后來許多次擁立危機那樣，宦官們之間是否也已分裂，各以某一皇子的性命為賭注來搞垮對手？我們知道，宦官梁守謙在憲宗的兒子穆宗時期（820—824年在位）是很得勢的，他在這事件之后仍然活了下來，而吐突承璀則沒有活下來；大概吐突承璀成了內部權力斗爭的犧牲品。梁守謙還殺死過一個皇子，以使問題得到有利于穆宗的解決，而且他還給神策軍散發賞賜以籠絡人心——這個旁證看來是很有力的。

還有一種說法是講憲宗因服藥過量而死；憲宗死后，宦官們發現，他們未能就擁誰為帝的問題達成協議。像晚唐的大多數皇帝那樣，憲宗也潛心研究煉金術，非常醉心于長生不死之藥，許多這種藥物都含有恰恰會起反作用的毒素。據說他在晚年表現為精神不安定，而長期積累下來的劇毒物質的效應足以說明為什么他的煩躁病態經久不愈。宦官們當然要為皇帝的煉丹術試驗提供方便。但是，那時又有皇甫镈和其他一些外臣積極支持術士和宮里的合藥行家，其中一人甚至被任命為天臺山附近的縣令；[[120]](#_12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這一史無前例的優寵行為當然激怒了正規的官員。對于憲宗的不得善終，大家按儒家的慣常說法認為是道德普遍墮落的結果，這當然也很有理由，但不能幫助我們了解皇帝之死背后的更重要的政治問題。后來關于皇位繼承的斗爭并不難于評價，因為我們可以從結果逆推其理，特別是可以看看是哪個宦官集團取得了勝利。但是歸根到底，唐代的宮廷陰謀對我們來說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司馬光也承認，當一切都說了和做了以后，對于憲宗之死的說法仍然真假莫辨。

## 9世紀中葉的朝廷，820—859年

在9世紀的時候，宮廷的宦官幾乎在每一次皇位的過渡中都起著很大的作用。憲宗死后穆宗的即位，便是這些事件中的頭一件。[[121]](#_121_Ren_Men_Ke_Yi_Ba_Xian_Zong)宦官之所以能夠如此輕易地插手這一關鍵問題的過程，理由有如下幾個方面：皇帝的家庭深居兩宮（中宮和太子的住地東宮）之內，與世隔絕；宦官越來越多地掌握了內部傳遞文件之權，這使他們有機會能夠在遺詔上做手腳；宦官的政治力量和他們與外廷朋黨的聯系日益增長，這一點我們將在下面詳細申論；最后，宦官利用神策軍便有可能在長安推行他們的意志。在選立儲貳的問題上每多分歧，這使得宦官可以上下其手。太子的教養和教育是事關宗廟祭祀的大問題，有極詳細的規定，更不用說他的受封儀式和他參加的其他各種隆重儀式了。但是，太子的冊立以及他的真正繼位卻是最大的政治問題。通常冊封太子都是立嫡立長，但這一慣例被破壞的多，被遵行的情況少。

很顯然，某個皇帝的上臺如果是受宦官干涉之賜，他就要對他們感恩戴德。可是，傳統歷史學家對于9世紀唐王朝在這方面的憂郁的描述，過于一般化了。宦官們對唐敬宗（824—827年在位）的影響顯然要多于對武宗（840—846年在位）和宣宗（846—859年在位）的影響。但是，只要有人想避免一般化而多寫幾句，就會產生一連串的困難。穆宗與擁立他的宦官梁守謙的關系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如果宮內關于他的繼承問題像某些史料記述的那樣久而未決，涉及可以上溯到9世紀第一個十年初的對立的宦官集團，那么，梁守謙年復一年地為穆宗的利害而戰斗，真可謂功勞不小了。[[122]](#_122___Zi_Zhi_Tong_Jian______Kao)但是，如果這次宮廷斗爭是曇花一現的事情，它只是起于819年前后，則梁守謙為穆宗的賣命就明顯地帶有投機性了。如果連這種基本事實都弄不清楚，我們怎么能指望了解皇帝即位之后他們之間的關系呢？我們所能說的只有這一點：梁守謙對穆宗的影響是不小的，而且這種影響直至穆宗朝的末年還有增無已，雖然這時梁守謙開始與王守澄（835年死）分享大權。我們將要在下面經常涉及宦官問題，我們總的態度是不要輕信歷來對9世紀宦官所作的極端專制腐化的老一套指摘；這些指摘甚至在現代的有關著作之中也屢見不鮮。

無論如何，24歲的穆宗皇帝除了個人對宦官有恩當報之外，他還面臨著其他問題。憲宗的暴崩中斷了在唐帝國完全穩定以前所要繼續推行的軍事中央集權化計劃。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東北的藩鎮雖然已在9世紀的第一個10年中相繼被平定，但并未真正統一于中央的治理之下。由于缺乏皇帝的堅定政策，朝廷對如何正確處置東北這個敏感地區的方針便有所爭論和舉棋不定，這種情況再一次表面化了。例如，成德節度使王承宗死于820年，他的弟弟王承元在部將的擁戴下接過了他的位置。這就提出一個老問題：朝廷是應該同意地方上推戴的節度使呢，還是設法從外面委派一個新節度使？820年后期，朝廷搞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妥協方案。它命令東北諸節度使大輪換：以王承元充義成節度使；徙魏博節度使為成德節度使；任命王朝老將李愬為魏博節度使，如此等等。很明顯，這個意思是要承認東北諸節度使有權參與政治，但是不讓他們在本藩鎮境內參與。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唐王朝竟完全沒有考慮這樣的軍令必然會引起政治上的一片混亂。

821年，穆宗委派他自選的一名文職節度使去幽州；幽州在憲宗時代是東北藩鎮中唯一守中立的州。在近百年的大部分時間，幽州鎮將歷來都是當地軍人。忽然間幽州士民得接待一位驕慢的長安官僚：此人在萬人廣眾之中坐轎子；不理政事；甚至縱容部屬作威作福。這個火藥桶馬上沖著朝廷爆炸了。成德軍先是有兵變，后在821年又爆發為全面的叛亂；朝廷的鎮壓行動開銷大，收效少。[[123]](#_123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后來，幽州的另一次兵變推翻了朝廷任命的節度使，中央政府只好把幽川鎮一筆勾銷。魏博也起來反對長安，它和幽州、成德結成聯盟。到了822年年中，東北的局勢回復到了憲宗費盡人力物力才得以平定這些割據州鎮以前的老樣子。

人們提出了許許多多理由來說明這些使事件急轉直下的軍事失敗。[[124]](#_12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第一，討伐東北藩鎮之役主要即在使用諸鎮的兵力，這些部隊人數不多，協調不善，供給不足（甚至在后期起用的名臣宿將李光顏和裴度也不能統一軍心）。第二，通過宦官監軍的影響，宦官們被派往下一級的戰地指揮機構，這種非正規做法可能破壞了指揮系統。長安也曾試圖直接指揮作戰，但它所獲得的戰時情報又往往陳舊過時。許多精銳部隊被將軍們留作自己的衛隊。較差的兵士才被用于打頭陣。自然，這些弱點并不稀奇，自安祿山之亂以后在政府軍的討伐戰陣中是屢見不鮮的。宰相蕭俛（820—821年在職）成了這些問題的政治上的替罪羊，因為他從憲宗朝的中期以來就被認為不贊成對藩鎮用兵。蕭俛被指責說他誘使穆宗相信國家已是升平之世，因此再沒有作長遠計劃以使國家歸于大治。可是，這個問題確實很微妙。龐大的軍隊需要用賞賜來安撫，但又不得不削減它的規模和削弱它的影響，以免文官政制完全被它吃掉；與此同時，還要適當地防范藩鎮不滿情緒的蔓延滋長，因為不僅東北藩鎮已有不滿，而且東南方面也在822年后期有了小規模兵變的發生。不言而喻，僅僅罷免蕭俛的相位還不能解決問題，沒有多久指責就直接指向了皇帝本人。和德宗一樣，穆宗據說也主張對藩鎮取“姑息”的態度，這就是暗示他缺乏剛毅果決的氣質。

總的來說，穆宗并不被認為是受人敬畏之君，而受敬畏這一點正是唐代君主制度得以運行的必要條件。部分原因是由他的個性引起的。九五之尊的沉重的職責和他勵精圖治的父親所要求于他的榜樣，在他準備承接以前就已強加在他頭上了。他似乎是一位相當平凡的青年人，朝氣蓬勃而熱切地期望與宮廷和軍隊里的朋友尋歡作樂。他喜歡打獵、擊鞠以及盛陳歌舞盛宴。據正史自以為是的報道，穆宗也沉湎女色。不管真假如何，這種種說法損害了他的聲譽，使他不得不遭到關于他行為不檢的陣陣批評。[[125]](#_125_Li_Ru_Jian___Zi_Zhi_Tong_Ji)糾正他的行為的道德責任感極受重視，致使在當年的考課中竟把蕭俛和他的一位同僚以瀆職論處，予以降職。更糟的事情發生在823年初期，那時穆宗在擊鞠時[[126]](#_126_Ju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因墜馬而有了傷殘。結果他不能親自處理國事，因此許多職責都被宦官梁守謙和王守澄所完全接了過去。王守澄給穆宗找了一位醫生，但未見效用。穆宗在824年之初故去，按照他傷殘以后匆匆草就的詔書，他的15歲兒子敬宗即皇帝位。

但是，穆宗失敗的另一部分原因應該歸咎于官僚階層。在他最后病倒以前，這位青年天子曾經真心實意地想履行他的職責，但他沒有得到大臣們的通力合作。例如，他即位不久就曾請求他從前的幾位師傅擔任宰相，但都被謝絕。穆宗不得不向各種類別的朝臣一一求助；他先后找了年輕的翰林學士，又找了他父親時代即已發跡的宿將和勛臣，但大部分人都態度冷淡。[[127]](#_127_Jian___Ri_Tang_Shu____Juan)那時的許多官僚都只知道政治上黨同伐異；我們要對他們更進一步有所了解，就必須論述朋黨問題，這或許是9世紀時唐王朝歷史中最惱火的問題。

### 朋黨問題

821年的進士科考試據說有貪污作弊現象，這一事例標志著出現了為控制長安中、上層官僚而進行的階級內部長期政治斗爭。歷史上人們所稱的“牛李黨爭”[[128]](#_128_Ye_Cheng__Er_Li_Dang_Zheng)就是以牛僧孺（847年死）和李德裕（787—850年）為雙方領袖而得名的；這場爭端出自個人恩怨，它可以上溯到憲宗時代。在9世紀20年代他們的個人積怨就公開化了，使越來越多的人在政治上不是參加朝臣的這一派，就是參加那一派。這種派別不論在當時或在后世歷史記載中都被稱為“黨”（factions） ，但絕不是我們今天意義上政黨中的黨（parties）。9世紀唐朝的黨不是基于經濟的、政治的或思想意識的共同利害關系而結合成有嚴密組織、明確綱領和嚴格紀律的集團，它只是政治人物們的松散結合體，產生于難以確認的復雜的個人關系網絡。唐代的朋黨不像今天的政黨那樣根據政見的不同來吸收成員；它沒有很強的核心結構；它的成員的屬性也不固定。一個人很可能只為了個人原因參加到具有無休無止環節的另一個聯合體中去。其中的原因包含著家族關系、共同的出身、科舉或宦途中的師生關系、同僚關系以及單純的恩仇問題。[[129]](#_129_Li_Ru_Li_Jia_He_Niu_Jia_Bia)遺憾的是，組成9世紀兩個朋黨的關系網的許多細節尚晦暗不明，莫知究竟。這是因為我們現有關于唐代的傳記資料只限于統治精英集團中的一部分人士，還因為這種材料常常是矛盾百出和掛一漏萬，因而很難把朋黨的結合問題弄個水落石出。因此當我們闡釋9世紀的朋黨問題時，我們實際上只能談談雙方的幾位領袖人物——例如他們干了些什么；他們跟哪些人結成了聯盟；又和哪些人過不去，如此等等。下面還要看到，由于材料的質量差，它大大地限制了任何想挖掘牛李黨爭的深刻意義的努力。它特別使我們想弄清作為朋黨形成的起因的思想觀點和社會分化的企圖無法實現。

據我看來，朋黨的領袖們是在追求政治權力，因此他們能抓住那些想分潤杯羹的追隨者。這一點從821年的有爭議的科舉中看得很明白。在那一年的春天，當公布前一年冬天進行考試的結果時，前宰相段文昌（773—835年）當即發現，錄取名單中朝廷顯宦的“子弟”之數多得可疑。[[130]](#_130___Ce_Fu_Yuan_Gui____Juan_33)有一個及第舉子是段文昌的政敵李宗閔（846年死）的女婿，另一個人為副主考官的弟弟，還有一個人則是顯赫的前宰相裴度之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段文昌上奏了一道措辭激烈的本章，抗議錄取唯親和“通關節”的弊端，因而損害了考試結果。翰林學士元稹、李紳（846年死）和李德裕也參與了抗議活動，因為他們每個人都各有具體原因不滿于考試的結果。穆宗不能漠然置之。他叫白居易和另外一位朝臣重新主持了一次考試。這一次除了一個人以外，凡上次中舉的士子都落了第，因而使原來的試官都丟了面子。

可是事實上，821年的進士科舉考試并不是特別有弊的和特別受到外界影響的，也許只是在考試結果的人數上被抓住了把柄。我們應該記住，科舉在唐代還只是處于初期階段。它那時沒有明、清時代為科舉考試訂下的那些客觀標準。大體上說來，一個士子的是否中式既要看他寫答卷時的臨場表現，也要看他能投合試官的口味的程度。例如，士子通常要在考試前把“溫卷”送給主考官，以顯示他的文學才能。試官們是不能不考慮這種自我宣傳方式的，因為試官們主持考試的主要動機之一是要錄取一批優秀的年輕人：這些人不僅有著光輝的前程，而且將來還可能指靠他們政治上的支持。當然還應該假定，享有知貢舉這種殊榮的官員對公然濫用對他們的信任會感到內心有愧。事實上，這種非正式的控制方法效果也不錯。但是盡管有相反的正義凜然的辭藻，考生的家族和其他社會關系絕不能等閑視之。在這一次考試中，段文昌和李紳對考官的徇私情的抱怨特別顯得詭詐不實，因為他們每個人事先都曾經把自己欣賞的士子的優點對考官有過囑托。[[131]](#_131___Ce_Fu_Yuan_Gui____Juan_33)

821年的年輕應試士子只不過是些小卒而已。局外人把這次考試變成了一場政治事件。他們人人都在宦途半路的節骨眼兒上。他們或者曾經暫時掌過權而又希望再次掌權，或者正在即將初試身手的時候。我們知道，唐代的長長的官場階梯上有兩大杠杠：一條杠杠在六品到五品之間；一條在四品到三品之間。那些跨過了第一道杠杠的人，即那些從沉淪的下僚而能躋身于大約2000個四五品官員行列的人，可能要為自己獲得受人大大尊崇的勝利而暗自慶幸。他們可以進入首都社交界，能夠獲準參加某些朝覲，可以享有特殊的財政和消費特權，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指定一個兒子獲取蔭庇入仕之權。不過在這同時，許多四五級官職還是主要地負責日常事務。那些想在唐朝政府中掌大權的人有兩種辦法能達到目的：如上所述，他們要么能在皇帝左右找個很特殊的職務，如翰林學士或鹽鐵使，而在任期內試一試運氣；要么他們能在正式職官中爬到三品或三品以上的位極人臣的地位。這些顯赫的官職包括那些行使宰相職務的位置，它們為數當然更要少得多。那些懷有“望相”野心的人都兇相畢露。對于這些有希望做宰相的人來說，他們既要引人注目，也要力挫可能的對手。對821年考試的控訴便是要達到這些目的。

很難想像一位像憲宗那樣意志堅強的皇帝會容許考試中發生這樣的政治舞弊事件，或者說，他也不會容許朝臣們就此事搞一場政治混戰。正如許多學者指出過的，一個正人君子不應該和別人有以私利為動機的交往，這在傳統的中國是奉為圭臬的。這種思想在先秦的著作中比比皆是。后來它便概括為不能以任何政治結盟來破壞主宰一切關系的君臣關系。中國的政治理論通常都認為，如果準許在朝廷結成朋黨（朋黨乃是廣泛的政治活動的必然結果），那么，人們所期待的能實現長治久安的道德和社會秩序便要可悲地受到損害。所以中國歷史上的英明有為之君都不厭其煩地盡量消除他們朝廷中的朋黨污垢，這既是為了要保護自己的政治利益，也是為了后世史家能對他做出積極的評價。[[132]](#_132_Jian_Dai_Wei__Ni_Wei_Sen)不言而喻，官員們沒有停止過搞他們的政治結盟，也沒有停止過互相傾軋，盡管經常向他們描述無爭斗的理想之治是他們應樹為典范的政治。強有力的皇帝能取得的真正成就是要指出，堅持公開的朋黨活動是很危險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把自己的關系網或影響范圍泄漏于人，這是愚不可及的，甚至在競相向上爬時充分使用了這些手段也很蠢。如果要夸耀它們，這就更是災難性的了，因為朋黨活動很容易引起人們的疑慮。常有些官員想玩弄反朋黨的花招為自己謀利，但這也要冒風險。“黨”這個字表示道德敗壞，它對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受貶謫。

在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幾位庸懦皇帝的時代，情況就大不一樣了。穆宗和他的兩個兒子敬宗及文宗都不善于震懾首都的官員。這些皇帝大權旁落，表明他們不能像憲宗和德宗那樣無數次地摧毀朋黨活動，換句話說，他們既不能阻止憲宗以后朝廷上層的爭權斗爭趨于表面化，也不能阻止它變得越來越狠毒。而且，朋黨之爭大有愈演愈烈之勢；它積重難返，是這些皇帝所壓制不下去的。曾有一次想在朋黨之爭按照它自身規律發展下去之前終止它的決定性嘗試——即835年的所謂甘露之變，但我們在下面還要談到，這次事變以徹底失敗告終。大致可以這樣說，如果雄才大略而猜忌成性的宣宗（846—859年在位）能直接繼其父憲宗即位，9世紀朋黨之爭或可和緩得多，或者甚至會使中國人不知朋黨為何物。

使牛李黨爭異常激化而且后來鬧得聲名狼藉的另一原因，是宦官參與了朋黨政治。宦官權力的日益增大和為他們特設了許多禁臠似的官署，總的說來，這在8世紀下半葉很受士大夫們的反對。但是，自從二王集團在805年想制服宦官的計劃失敗以后，膽小怕事的官僚們都得承認，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宦官已是長安政界的組成部分。的確，終憲宗之朝有一些不大隨和的正統官僚總是持大家熟知的教條主義嘲罵態度，而且我們知道這曾引起他們和皇帝之間越來越多的摩擦。但是，他們也在幕后進行和解。例如，官員們無疑都痛恨吐突承璀，但他們也還得在一些實際事務上要和吐突承璀及其他重要宦官攜手合作。與此同時，宦官們也不再是鐵板一塊的了；宦官集團的瓦解過程幾乎隨他們的每一次得手而出現，因為隨著進入9世紀以后他們取得更多的權力，他們內部也出現了更多的爭奪目標。隨著宦官“家族”日益繁衍，他們內部的政治也變得十分復雜。宦官與官僚的接觸倍蓰增加。宮廷陰謀的參加者超越了內廷和外廷之間的界線，盡量尋求各方所能找到的最強大的同盟者。820年以后在沒有了憲宗這位形象高大的皇帝的情況下，沒有人能夠阻止他們自由而公開地拉幫結伙了。以后，到了9世紀20年代中葉，宦官們與唐王朝的最高政界融成一體，整個朝廷變成了朋黨斗爭的競技場。從那時起直到唐王朝的滅亡時為止，任何政治人物（朋黨的參加者或非參加者都如此）如果不同宦官之間有廣泛的接觸，就休想有效地處理政府事務。

互相斗爭著的人們花了幾年時間才結成兩大壁壘分明的陣營。總的說來，牛黨在穆宗時期比李黨更得勢，吸收了更多的同盟者和部屬，居相位和當翰林（這是中央政府中最重要的職位）的機會也多。我們將在這里考察一下這個異常復雜的過程的一個階段，并把它作為例子來了解朋黨政治怎樣在最高階層一般地進行的情況。

在9世紀20年代初期，牛黨主要由李逢吉（758—835年）領導，而不是直接由牛僧孺領導。李逢吉是唐皇族的旁支，于9世紀初年在唐政府的外交工作方面有廣泛的經驗。如上所述，憲宗在816年任命他為宰相。可是，他馬上在如何進行淮西戰爭的問題上而與首輔宰相裴度發生沖突。他和裴度的分歧鬧得很大，致使憲宗免了他的職務。這種長年積累的嫌隙在穆宗時代趨于表面化。因為穆宗需要軍事上有經驗的官員處理河北問題，裴度在9世紀20年代又時來運轉，而他現時的勢不兩立的敵人李逢吉的前途卻相應地暗淡下來。可是在這關鍵時刻，李逢吉從政治上說變成了另一起個人斗爭的受益者——這是新皇登基后政治行動加劇造成出乎意料后果的一個例子。詩人元稹像李逢吉一樣憎恨裴度。元稹在9世紀20年代做翰林學士時備受穆宗賞識。可是在821年秋天的某個時候，他竟然愚蠢地卷進一個計劃，試圖削弱裴度在東北戰役中有效的軍事職權。次年，他們的爭吵形勢大變，令人生厭；裴度指控元稹想方設法要刺殺他。雖然后來查無實據，但元稹和裴度都隨隨便便地被降了職。李逢吉因而因緣時會，在822年升任宰相職務。李逢吉進而使用他的權勢提拔他在御史臺的朋友牛僧孺當他的下手。形勢這樣發展的結果阻塞了李德裕入相的希望，因為這時他和牛僧孺的關系已經糟糕透了。李德裕在823年秋出任浙西節度使，滯留京師以外約七年之久。823年和824年，李逢吉邀得穆宗和權宦王守澄的歡心，在以后幾年中穩扎穩打，制勝了裴度和李德裕的黨羽。結果，我們今天所稱的牛黨大權在握。

要把這種朋黨混戰的所有細節一一復述出來當然是枯燥無味的，主要是因為20年中的人物和事件像萬花筒那樣叫人眼花繚亂。另外，作為我們主要史料的唐代史書中的傳記對于這些問題的記述又是矛盾百出。許多人物的命運很難追蹤到底，有時人們并不能肯定某人究竟屬于哪一黨，如果他參加牛黨或李黨的話。可是我們完全可以確信，李逢吉所使用的手法頗具代表性，雙方領袖們都無不這樣做，雖然李逢吉的活動在偏袒李德裕的史料中被大加撻伐。[[133]](#_133_Te_Bie_Ke_Kan___Jiu_Tang_Sh)特別是沒有理由接受現代歷史學家岑仲勉的看法，他認為李德裕沒有搞朋黨，其意是說，李德裕是受邪惡的對手圍攻打擊的正人君子。[[134]](#_134_Cen_Zhong_Mian____Sui_Tang)不能想像，作為精明強悍的政治人物的李德裕不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在史書上牛黨的名聲之所以備受抨擊，一個原因是他們是在浪蕩的少年天子敬宗（824—827年在位）手下掌權的。雖然人們總是傾向于懷疑正史中對某幾位唐代皇帝的評價，但對于敬宗卻無人想給他鳴冤叫屈。很明顯，敬宗只不過是一個無責任心的青少年，對國務活動不感興趣。[[135]](#_135_Ke_Shi_Ying_Gai_Zhu_Yi__Li)雖然他必須受制于擁立他為帝的宦官，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在滿足他們更加荒淫無恥的生活方面卻超過了前幾位皇帝。長安此時的宦官有四五千人，敬宗以宮中內庫錢財濫施賞賜。如果我們相信流傳下來的奇聞軼事，宮廷生活便是穢德彰聞。而國內的騷亂據說超過從前任何時候，甚至超過德宗晚年的時候。有一個著名事件涉及近畿的一個縣令。他只是想阻止宦官暴徒一時的暴行而被痛打和羞辱。治安保衛工作越來越松弛。在824年年中，長安爆發了一次武裝叛亂，為首的是一個河渠工和一個算命術士，他們領著約100個普通工人作亂。[[136]](#_136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這幫烏合之眾竟然能夠斬關奪門并直達御座。敬宗險遭擒獲，后來是神策軍撲滅了這一小股叛亂，但是守衛內廷的宦官侍衛為他們的重大失職只被從輕發落了事。任左神策軍中尉的宦官實際上卻以英勇御敵的名義受厚賞，這一奇怪的事件顯然被草草地掩蓋了過去。不久，甚至宰相牛僧孺也對這位心粗氣浮的少年天子有了戒心。他要求去長江中游做節度使，以易地避難。當最后高級宦官們受夠了敬宗之苦的時候，他們命令走卒們在他醉醺醺地夜游時刺殺了他。

表9 9世紀朋黨雙方的高級領導



繼敬宗之后登基的是他的異母弟、17歲的文宗（827—840年在位）。文宗的即位是第二次破壞了唐皇室父死子繼這一嚴格原則的事例（不算武后那一次）；不出我們所料，文宗的上臺是宦官干預的結果。[[137]](#_137_Tong_Shang_Shu__Di_7851__78)以王守澄為首的一個宦官集團戰勝了兩個可能的對手才得以擁戴他為君。其中一個對手是敬宗的幼子，他顯然不能進行統治，而立攝政的問題始終未予討論。另一個對手是敬宗的叔叔江王李涵，但支持他的宦官們力量太弱，不能壓倒有牢固勢力的王守澄。

在缺乏皇帝的領導達7年之久以后，許多官員抱有一線希望，以為文宗會遵照皇帝的崇高理想進行統治。事實上，他也的確不像他的父親和異母兄那樣，新皇帝對于讀書、學習和其他肅靜的愛好很專心。他即位之初就把許多宮女遣送回家，并絀奢崇儉，恢復了每日聽朝——這些都是其曾祖父德宗在半個世紀以前所定下的勤儉治國原則。[[138]](#_138_Can_Zhao___Jiu_Tang_Shu)但是，在最困難的日子里曾經支持精明的德宗的人民的理解，文宗卻從來沒有得到過。文宗聽到的忠告是不少的，而且或許多到太濫。他很容易聽信剛剛談過話的人，并且在變化著的政治熱情中表現出來。他在位期間交相使用李黨和牛黨，每二三年換一次班。827年李逢吉罷相，由裴度接替他掌權；830年裴度被罷官，李宗閔和牛僧孺上臺；832年后期，牛僧孺失寵了，李德裕第一次拜相。[[139]](#_13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在每一次大換班的時候，一大批高級官員隨著一個集團的領袖上臺，又有一大批高級官員隨著另一集團的領袖而下臺。另外，有一點十分重要，即當人們因自己一黨失勢而被降級時，他們通常都不受到真正的懲治，例如被貶逐到南方遠地。反之，憲宗的辦法是任罷職宰相中的重要人物為節度使，任不重要的人物為刺史或刺史以下之官；這種辦法一直沿用到9世紀的20年代和30年代。節度使的任命越來越成為擴大長安政治生活的方式。順便說一句，有些節度使職位受人珍視，因為它們在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可乘機大發其財。最著名的例子或許莫如淮南節度使之職，它往往還兼一個鹽鐵轉運使職務，從而使這名官員能對富庶城市揚州周圍地區擁有巨大的經濟影響。宦官們深深地卷入政治交易中去，他們繼續不斷地安排藩鎮的具體任命，以索取大量賄賂。這一切便是安排喪失了權力的人的一種制度。至少朋黨斗爭中較冷靜的一些人認為禍福無常，也知道如果對下臺敵手過于刻薄也會帶回更慘痛的報應。

人們也許抱著極大的興趣想知道這時期朋黨的規模有多大。可是，要找到答案，得有許多問題要解決。嚴格地說，我們只限于把幾位最高級政治人物涇渭分明地劃入這個或那個集團。日本的現代學者礪波護在考察牛李黨爭的細節和大旨時進行了肯定是最細致的研究，他編了一個約63名有朋黨活動的人的名單，其中牛黨有41人，李黨有22人。[[140]](#_140_Li_Bo_Hu____Cong_Niu_Li_Dan)甚至在這樣精心編制的名單內，人們也可以認為，對某幾個人被列入朋黨和被劃出朋黨的標準是可以加以推敲的。關于政府中最高層官員的婚姻關系和朋友關系方面，我們簡直沒有足夠的資料來回答它們的基本問題，更不用說等而下之的那些人了。按道理說，一個人與其師長和僚友的關系，相互之間的影響和忠順情況應該是朋黨賴以組成的基礎，但是除了極粗淺的一般概況外，我們不能詳細論及這兩個朋黨的結構問題，因為文獻不足。

話雖如此，但是，他們的人數到底怎樣估計呢？我們偶爾可以從史料中發現一些線索。例如，我們知道在李逢吉的幕賓中有所謂“八關十六子”，但是，關于那些名列朋黨中的人的材料就模糊得很了。825年，楊嗣復（和李宗閔及牛僧孺同榜進士及第，在9世紀30年代末期做過牛黨宰相）錄取了約68名士子，他們之中好多人后來做了官，但是除此之外就無更多關于他們的材料了，甚至我們并不知道他們是否同情牛黨。833年李德裕聲稱，三分之一的朝臣都加入了朋黨；這個數字似乎言之成理，但同時它又是從根本上易滋爭議的估計。所以，我們不大可能從正史史料中獲得關于從事朋黨活動的總人數的更精確的概念。

礪波護也引起了人們注意另一個雖無法計量卻也是重要的問題，就是重要政治人物去藩鎮出差時通過辟召方式羅致幕賓的問題。[[141]](#_141_Li_Bo_Hu____Cong_Niu_Li_Dan)不受京師官僚制度監督和規章制度所約束的私人征召辦法，其源可上溯至中國三國南北朝大分裂時期的制度史，因為那時廣大的私人追隨者通常都投靠富戶豪門。唐代初年在創建大一統帝國中曾對此加以管束，但在安祿山之亂后引起的地方分權時勢下，辟召辦法又很經常地被恢復使用。它對發展河北諸藩鎮的獨立的官僚體系和擴大財政專家隊伍都是十分重要的。一般的官僚們用這種辦法組建班子以處理他們的日常案牘工作，而所雇用的多是年輕有才的及第士子，以免他們在長安花多年時間去候差。大的藩鎮衙門有時很像具體而微的朝廷，在那里往往可以看到節度使的許多本族人，地方權貴的親友和其他等候差事的食客。這些人非正式地被稱為“門生故吏”；這是對中國大分裂時期社會現象的恰當的引喻。礪波護認為，由于這類門生故吏越來越多地依附上層朋黨成員，所以朝廷中朋黨的人數大大地增加了。此外他還認為，朋黨結盟的影響是向下層發展的，像金字塔那樣，老門生故吏開始組建自己的門生故吏隊伍。

他的這一席話當然有某些正確性，但也有許多疑問，例如朋黨的下級成員再吸收自己的大批黨羽的能力究竟有多大；他們是否有調整朋黨關系的自由，交換信息的可能究竟如何，如此等等。有些朝廷大臣勉強地算是屬于某一個朋黨，但在風吹草動之時又采取騎墻態度，從上面這樣的例子來看，我們是有充分理由懷疑那些小人物的忠誠的。此外，我們也可以問一問，為什么大規模的朋黨問題的后果在史料中不能寫得更清楚些。如果真有成群的官員和胥吏在短時期內來去匆匆，長安應該是群情嘩然，沸沸揚揚的了。那樣規模的騷動至少應該同廣泛的人員轉變有互相的關聯，或者應該同異乎尋常的變動率聯系在一起。我們現有的關于那時官僚政制的唯一一本材料集是嚴耕望所編制的尚書省最高官員姓名表，[[142]](#_142_Yan_Geng_Wang____Tang_Pu_Sh)它的容量大，有利于考核檢查。利用這些材料可以說明，當朋黨活動處于它的高峰時期，尚書省官員中的改弦更張者和動搖分子在這些年中并非比比皆是。事實上，除了830年可能是唯一的例外，這時期進尚書省和出尚書省的事遠遠不如安祿山之亂和順宗年代那種動亂時期的情況引人注目。雖然這些官職并不一定代表京師整個官場的情況，但就我們目前的認識程度來說，我們應該懷疑是否存在依附于牛李黨爭主角的巨大的垂直系統的派別集團。

歷史上曾經有人作過嘗試，想找出分裂成朋黨的意識形態基礎。最有希望的嘗試是把李德裕對李宗閔和牛僧孺的敵意追溯到808年舉行的一次較早的考試。[[143]](#_143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這次較早的考試不是試進士科，而是皇帝命令舉行的高級職稱考試，名為“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在這次考試中，考生牛僧孺、李宗閔和另一青年人皇甫湜（約777年生）在對皇帝的策問中有些略超常見的答案，他們指陳了他們所認為的當前政治中真正弊端之所在。他們的文章最初雖然被試官所識拔，但后來又被認為調子過于激切。據認為，這三個人是采用了這種辦法來非難宰相李吉甫的政策和人品。他們對李吉甫的攻擊使得13年以后他的兒子李德裕對他們以牙還牙地施行報復。

皇甫湜808年寫的這篇文章是僅存的一篇答卷，它引起了特殊的學術興趣。[[144]](#_144___Wen_Yuan_Ying_Hua____Juan)它盛陳音調鏗鏘的辭藻，同時備述君德之必要和關于郅治的忠言，但它不時歸結到具體的事務。它的整個調子都在儒家傳統范圍內，要求皇帝克制和謹慎。皇甫湜力勸憲宗不要陷入當時成為時尚的瑣屑改革之中，而要使國家自然地繁榮起來，其方法是有獎有懲，獎懲得宜，而且要勤求賢德君子為朝廷大臣。雖然這篇文章的名聲在于它尖銳地攻擊了李吉甫，但它既不是教條主義的，也不是純以個人好惡來發議論的。它的許多哲學背景，包括取材于《荀子》的內容；它所含蓄地提到的政治問題，如無限制地發展的黷武主義和出現于全國的經濟困難等等，都是當時知識界通行的觀點。另外，皇甫湜也沒有點名批評別人，有人認為他的某些不甚隱晦的詞句是指向宦官的，而宦官乃是這種文章最常用的靶子。不幸的是，現在已不可能弄清楚其他兩篇文章的內容了。

由于這份答卷是所謂的牛黨同伙留下的關于“意識形態”問題的極少數文章中的一篇，它便被看做是整個該黨共同的觀點。事實上，它的用處是有限的，這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皇甫湜本人后來消失于舞臺，而且在9世紀的20年代和30年代從未參加政治活動。如果我們認為皇甫湜反對主張實干的和務實的宰相跟同樣主張實干的和采取改革態度的皇帝之間的合作這一點是正確的話，那么我們就會發現，他的文章是呼吁官員們應采取更慎重、整個說來更合乎道德原則的態度。但是，它并未告訴我們李吉甫有什么觀點，而且正像現代學者馮承基所指出的那樣，皇甫湜的文章寫完以后所出現的一些混亂事件，使人不能不懷疑李吉甫就是它要打的靶子。[[145]](#_145_Feng_Cheng_Ji____Niu_Li_Dan)最重要的是，皇甫湜的試卷沒有什么預言性價值；文中所指的具體現象不可能反映到以后幾十年的熾烈政治斗爭中去。它可能反映了不同的氣質風格，而不是意識形態上的分歧。

幾位最重要的朋黨領袖所寫的更耐人尋思的論文（特別是李德裕、李宗閔和牛僧孺的論文），也引起了同樣的解釋上的問題。[[146]](#_146_Li_Ru_Li_De_Yu___Li_Wen_Rao)根據我們當前對唐代思想史的了解，它們發表了一系列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從文章的題目和對題目發揮的觀點看），遠遠多于其發表的政治哲學上一貫的歧見。這些論文多半對于任何深遠地促進社會進步的前景表示悲觀，認為在混亂之際不能有所作為；但是，文人學者不能簡單地規避責任而不去選擇拯救社會之道。因此，這些論文從古代摘取了一些嘉言懿行——其中有些是合適的，有些不可盡信；它們還把傳統觀念（如“私”字）加以牽強附會，以期與眼前問題聯系起來。[[147]](#_147___Quan_Tang_Wen____Juan_682)論文的作者們在朋黨傾軋不已和政治安全無保障的時候提出了值得思考的問題。但是它們都沒有把哲學和政治的組合加以任何聯系，也沒有說明是什么觀點和態度把這些人分成李黨或牛黨。

學者們推究兩黨之間對于實際政治問題的歧異，一般都集中在憲宗時代的戰爭問題上。如上所述，李吉甫一向主張對割據一方的藩鎮采取堅定立場，所以他毫不猶豫地主張用兵。反之，李絳則反對812年迫使魏博鎮就范的辦法，而且魏博確實不久自動聽命于朝廷了。這兩位宰相在812—814年之間的沖突有著一切傳統對抗的因素，引起后世歷史學家極大的關注。這個有限的一系列事件被概括地描述成：牛黨是主和派；李黨是主戰派。但是，我們為什么要把9世紀第一個十年這兩個人的爭論和十多年以后的牛李黨爭等同起來呢？有什么理由把李絳甚至稱為牛黨的一個精神追隨者呢？就我們所知，他從未直接攻擊過李德裕，也從未在9世紀20年代積極參與過牛黨的事務。事實上，他受到過穆宗和敬宗時代牛黨宰相李逢吉的嚴厲批評。至于說到和戰之別，為什么要忽視牛黨的成員也被卷進9世紀的各種軍事問題中去呢？（例如李逢吉就曾主張對822年的宣武鎮叛亂用兵！）或許人們會說，牛黨諸宰相對藩鎮敵手的態度要更慎重一些，但是，把他們看成和平主義者就未免過于簡單化了；如果只是因為裴度和李德裕都是有能力的軍事領袖便把他們當做始終如一的和不顧一切的武力論者，那就只會越說越亂。何況大多數同藩鎮交鋒的真正重大的軍事沖突，在9世紀20年代中葉朋黨斗爭開始加劇時已經發生了。對于9世紀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的那些小兵變如何定罪是有不同意見的，但很難想像它們能對全面展開的朋黨之爭有那么深的影響。或許這時期長安的政治人物都對重建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感興趣。在這個他們共同關心的大前提下，對具體的軍事和防務政策的意見的傾向性是很難加以評價的，而且我們也不能排除事后在歷史記述中因加入了專門的辯護和偽造的材料而造成歪曲的可能性。[[148]](#_148_Li_Ru_Ke_Kan_831Nian_De_Wei)

近年來學者們對牛李黨爭提出了社會學的解說；它是以中國歷史學家陳寅恪的著作為基礎的。[[149]](#_149_Chen_Yin_Ke____Tang_Dai_Zhe)陳寅恪很注意分析唐代統治精英集團的社會背景的變化，特別是舊貴族的沒落和無門閥的新興官僚相應的興起，這樣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考試制度的作用上，認為它是實現社會晉升的手段。按照這一社會學的解說，牛黨的權力以通過科舉入仕為基礎，而李黨則是世家大族的堡壘，用世襲的蔭庇方式取得做官資格。有許多表面上的理由使這個假說很有吸引力。牛黨最著名的領袖牛僧孺和李宗閔都是進士出身，他們的聯系要強固一些，因為他們都是“同年”；幾乎可以肯定，他們及其許多同僚維護科舉制度在感情上是利害一致的。另一方面，作為宰相之子和天潢貴冑的李德裕并非進士；他嘲笑科舉鼓勵士子們做官樣文章，嘩眾取寵，不務實際；而且他在833年第一次任宰相時就暫時改變了科舉考試的內容。可是，在這里我們又碰到一個以片言只語為根據的假設，它們只考慮到幾個重要朋黨參加者的觀點，而卻推而廣之使之代表整個朋黨的共同利害。

表10 9世紀中葉政治朋黨中可考成員數字一覽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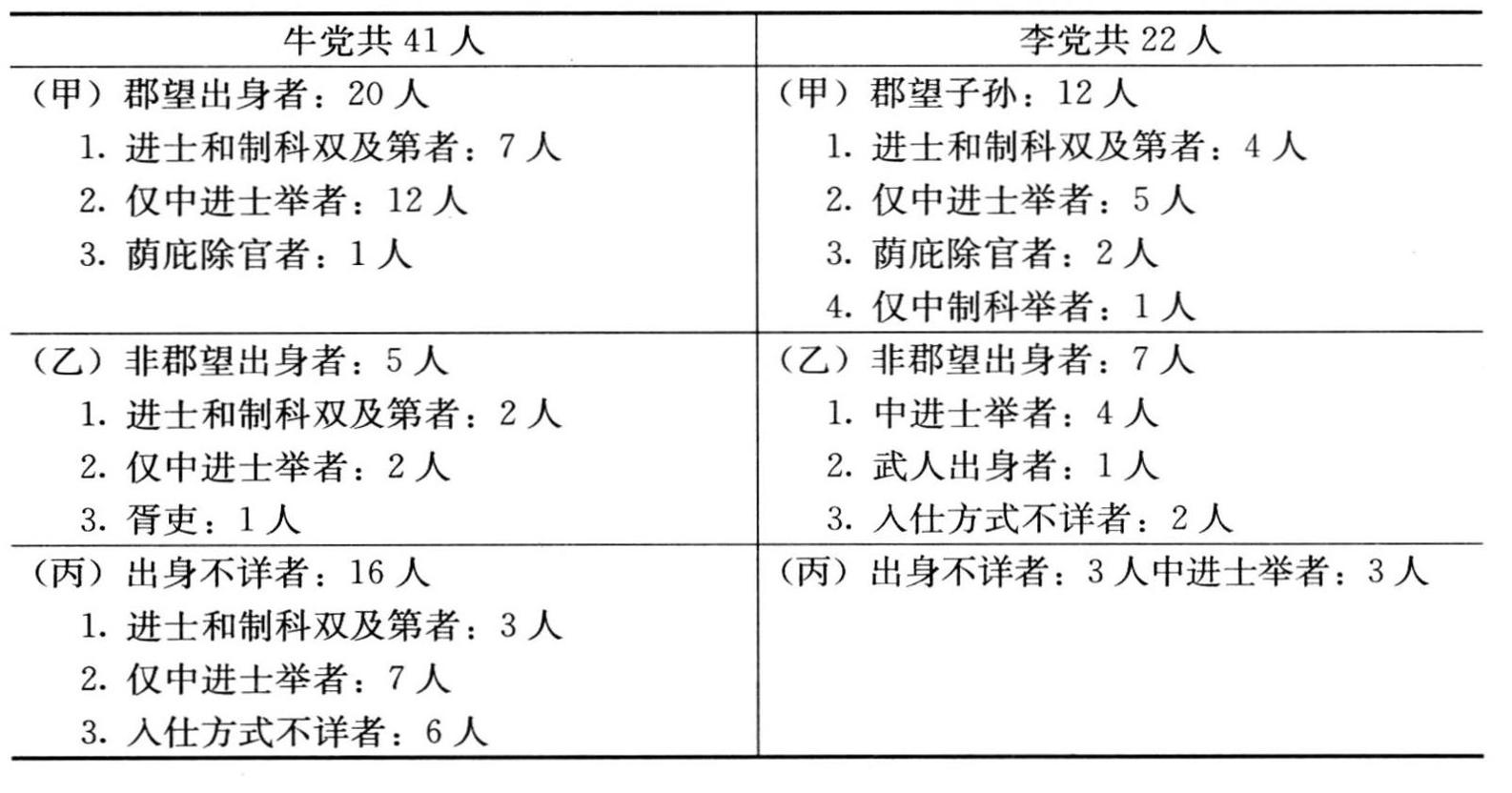


表10概括了礪波護的研究成果，它的結論表明，按照表中開列出來的情況看，兩個朋黨甚至在科甲人數和巨室后裔人數上都是旗鼓相當的。這就使朋黨雙方涇渭分明地有所謂擁科舉的一方和反科舉的一方的說法不攻自破了。無論如何，人們已嚴重地懷疑所謂大量下層人民通過科舉獲致大權，也同樣懷疑用科舉和蔭庇作為社會出身標志的正確性。[[150]](#_150_Qu_De_Gong_Ming_He_Li_Yong)實際上，在唐代文獻不足的情況下，人們往往不可能斷定某個人的背景，即說不清他的籍貫、直系家庭的財產狀況、他在家族內部的地位以及婚姻關系等。不能說中舉的士子一定出身寒素，而利用庇蔭的人就一定是來自名門和大族。我們所了解的關于朋黨成員的具體情況，還不允許我們做出社會或經濟狀況的分析。實際上，朋黨領袖們有許多類似的特性、經驗和目標，這充分證明最高層的斗爭主要是階級內部的斗爭。雖然以辟召的方式選用官員肯定可以使某些下層人物脫穎而出，但是，如果要在諸朋黨的上層之間作出前后一貫的社會學的區分，證據就遠遠不夠了。

### 835年的甘露之變

我們在上面已經講過王叔文及其一伙在805年想改變唐王朝政治軌道時發生的事情。9世紀30年代也發生了一件最有趣和有同樣悲慘后果的事件。這一次事件是由文宗皇帝發起的。事實上，他曾兩次想打擊宦官和朋黨：第一次是在830—831年，它得到了一位宰相的幫助；第二次在835年，它利用了搞甘露事件的一些密謀者。

那些廢黜敬宗皇帝的宦官甚至當他們還想繼續控制敬宗的繼任人時一定懂得，政府仍需要一位至少是能力極低的皇帝。可是，如果他們以為文宗不夠精明，不足以危害他們，那他們就打錯了算盤。除了少數例外，[[151]](#_15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這時期反對宦官的輿論的聲浪已經減弱，因為他們權勢太大，同時也很清楚，文宗自己也正在為他統治時期的缺點而大為苦惱。據說，他特別惱怒自己無能力控制宦官王守澄和給穆宗治病的醫生，即出入宮禁的常客鄭注（835年死）。在皇帝看來，這些內廷顯貴都是政治腐敗的象征。830年，文宗開始秘密地與宋申錫（833年死）討論此事；宋申錫此時是翰林學士，既不附牛黨，也不屬李黨，因而是皇帝可以信賴的少數官員之一。他們兩個人決定從政治上裁抑宦官。

宋申錫被擢升為宰相并開始擬訂計劃，但所進行之事竟以某種方式泄漏給宦官了。[[152]](#_152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67)他們馬上轉入反攻，聲稱已獲得表明宋申錫實際想廢文宗而立其愛弟漳王的證據。在這關鍵時刻文宗動搖了，對自己喪失了信心，他得不到可信賴的忠告，又害怕自己有生命之虞。他下令勘訊宋申錫，另外，宦官們從他的親友中搜捕到許多可疑的人。牛黨的宰相除了說幾句無關痛癢的話外，并無一人仗義執言出來救他一命，只有幾位中級官員冒著極大危險勸說文宗把審訊從內廷移往外廷——換言之，使宦官不能控制。宋申錫被宣判有罪，但幸免一死；他大約于次年卒于貶謫之所。

文宗除了對宋申錫事件感到震驚以外，他還對朋黨領袖的行為感到灰心失望。他不時聽到和看到不體面的損人利己的話語和小動作。他繼續在兩黨之間舉棋不定。831年為一次不大的邊境事件召開的廷議中出現了政見的公開交鋒，此后文宗便免了牛僧孺的相位，而第一次把李德裕提升為宰相。但是，833—834年的李德裕的執政期也和以前宰相的執政期一樣，充滿著斗爭。除了上述這些麻煩之外，這位年輕的皇帝又在那一年犯了病，如果我們相信這一次病與順宗的病歷有著非常奇特的巧合的話，他也是害了暫時口不能言的病。可是，由于鄭注的護理，文宗的身體狀況挨過冬天后稍有好轉。在大約此后的一年中，他默默地考慮著國家的政局，幾乎像一個旁觀者那樣注視著事態。李德裕下去了，李宗閔重新上了臺。文宗在834年抱怨道：“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153]](#_153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到了這時，文宗似乎已在后悔他在宋申錫事件中的失誤，同時他也認識到，朋黨和宦官專權必須同時予以擊敗，否則將一事無成。因此，盡管風險很大，他又搞了另外一次陰謀，其高潮是835年以失敗告終的甘露之變。

很明顯，建立任何第三種勢力需要的是既不受朝中朋黨也不受其各自宦官盟友控制的人物。可是，這一次皇帝與之密謀的人不是像宋申錫那樣以剛直方正而引人注目的官員，卻是兩位宮廷政治老手，即御醫鄭注和新任翰林學士李訓（823年登進士科，835年死）。鄭注雖然是王守澄的朋友，卻與其他許多宦官形同水火。833年甚至有一個神策軍將軍曾想害他的性命。李訓是原來牛黨宰相李逢吉的本族子弟，但他在9世紀20年代的被貶逐時對牛黨的政治喪失了熱情。這兩個密謀者自然都有野心，但卻不是他們的敵手后來所指控的那種壞蛋；鄭注的醫術很受人稱道，而李訓則是一位對經典古籍有一定造詣的學者。要打破朝政中歷時15年的朋黨之爭，而代之以鄭注和李訓的單一的新政制，這對文宗來說似乎并不理想，但因為這兩個人膽大而有謀略，所以皇帝認為至少有改變一下政局的可能性。

精心地利用了牛李兩黨關鍵領袖人物的嫌隙之后，鄭注和李訓被皇帝在職官制度內予以升擢，接管了原來被兩朋黨宰相所執掌的權力。我們在上面看到，王叔文集團在805年預先策劃的政變中因忽視了軍隊的作用而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相反的，經過精心策劃之后，鄭注做了長安以西的鳳翔節度使，他從他所統率的軍隊中暗中調集了禁軍突擊部隊。李訓那時在做宰相，他得到了京師許多官員的幫助，這些人被準許有自己的警衛隊聽候調遣。他們的基本想法是引誘宦官脫離神策軍的庇護，然后一舉聚殲；這個戰法一直嚴格保密到最后一分鐘。

鄭注和李訓奪取了他們原來的庇護人王守澄的權，接著投之于獄，最后處死于獄中。為了做這件事，他們暫時與王守澄的宦官對手仇士良（781—843年）結成了聯盟。可是，甚至在處死王守澄時，李訓和鄭注就在計劃收緊包圍仇士良的網。835年12月末某日早些的時候，宮內大臣通過事先的安排，奏稱“甘露”（天降的祥瑞）于前一夜降于外廷的石榴樹上。[[154]](#_15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文宗完全知道已為宦官設下了伏兵，他便遣仇士良和其他宦官到外邊去察看這一奇異現象。正當他們來到伏兵即將突起的后院時，一陣風吹起了李訓兵士藏身的帳篷的一角。兵器的當啷聲驚動了宦官，他們大多數人都乘宮門關阻之前驚駭地跑回了內廷。他們在里邊強迫文宗返回李訓和其他政府官員力量達不到的后宮。仇士良和其他宦官馬上召集令人震畏的神策軍，它的各小分隊便被派往官員住宅區屠殺可疑的朝臣。僅在政府區一個地方，據說士兵們就殺了1000多人，并毀壞了許多印信、檔案和文卷。以后幾個星期軍隊不僅逮捕了主要的密謀者及其屬吏，也濫捕他們的全部家族和其他許多完全無辜的人士。他們大搞逼供信。三位宰相及其家屬公開在長安西市被處決。宦官們允許血洗，直到836年初宣布寬赦和限制進一步審訊時為止。

宦官們隨即著重考慮如何維護權力的現實問題，這意味著首先要對宮廷的突發行動提高警惕，并且要在自己隊伍內部查出密謀活動。他們還決定以神策軍仗衛宮內，但馬上發覺不值得費此精力；如果把他們的部隊置于這樣眾目睽睽的地位，這只會激怒保守的輿論而不會有多少具體收獲。[[155]](#_155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舊的鑾儀衛隊（南衙衛）已不起作用，而且，如果再要發生危險，神策軍就近在咫尺。只要把宮禁衛隊骨干所擁有的長矛短劍一概沒收，仇士良和其他權勢宦官就能夠達到更加安全的目的。

總的說來，騷亂平息以后，宦官們就想照老樣子行使他們的權力，也就是說要避開公眾的視線。這部分的是因為有些節度使暗示要進行軍事干預，以阻遏赤裸裸的宦官專政。[[156]](#_156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而且還因為宦官也愿意與官僚階層重建一種李訓和鄭注上臺以前曾經存在的工作關系。一個引人注意的不同之處是，朋黨雙方的成員都同時做宰相，而在以前權力卻像走馬燈似的在兩個朋黨之間來回倒換。另外，朋黨的次要成員實際上被任命為宰相，而那些知名領袖的地位的恢復卻很慢，他們從藩鎮回長安要經過嚴密監督的步驟。這可能反映了宦官在政府內廷的會議上有了更大的勢力，影響當時官僚個人安全的狀況同樣也反映了宦官們的這種勢力。宦官說服文宗撤掉保護宰相的衛隊（這是自815年武元衡被刺以來就實行的辦法），其目的無疑是要使宰相感到自己更易遭受壓力。如果個別官員的言行太出格，宦官會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例如宰相李石（784—845年）在838年就曾險遭不測。

甘露之變的失敗似乎使文宗神情沮喪。836年宦官的意圖變得一清二楚之后，他對政務越來越沒有興趣了。他無精打采，凄涼慘淡，厭于廷議對問，甚至再也沒有興味談詩了，他飲醇酒求醉，并且悔恨過去的錯誤。他開始盤算他在歷史上的地位。839年他要求觀看《起居注》，以了解對他的寫法，但卻被編纂的官員謝絕。這表明，他擔心自己被寫成歷史上遺臭萬年的皇帝。[[157]](#_15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他在喝醉時曾對一位年輕的翰林學士賜酒并嗚咽地說，古代最不堪的君主只受制于諸侯，而他本人卻糟糕得多，竟會受制于家奴，即宦官。這一年他舊病復發，840年初去世，時年30歲。

皇位繼承問題的危機隨著文宗身體狀況的惡化而發展，這是晚唐歷史中繼承問題比較復雜的一次。原來的太子，即文宗唯一有資格繼承的兒子，在838年被殺死。太子之死的情狀疑莫能明，但文宗顯然同意處死他，因為文宗越來越不寵幸太子之母，又被太子的年輕浮躁所觸怒。[[158]](#_158_Tong_Shang_Shu__Di_7935Ye)在他死后的一段時間里，敬宗的一個沖幼的兒子當了太子，但由于他的年歲和有病的體質使局勢很不穩定。另外兩個皇位候選人出現在宮內，他們都是文宗的幼弟。安王溶是后宮中有權勢的楊賢妃之子，他得到母黨族人、又是牛黨宰相的楊嗣復及一些宦官的支持。另一可能的帝位繼承者為潁王，他是神策軍中尉等人擁立的對象，他們最后取得了勝利。文宗本人對這最后的選擇竟無能為力，因為他一貫不能在這樣重大的事件上下決斷；總之，到了839年，他耗費了大部分時間來哀痛他兒子之死。中尉仇士良及其盟友能夠假傳圣旨立潁王為攝政王。文宗死后潁王即位，他是穆宗的得以君臨唐帝國的第三個兒子。獲勝的宦官集團立即設法處死了另外兩位王子、楊賢妃以及他們在宮禁中的支持者。[[159]](#_159_Tong_Shang_Shu__Di_7943__79)

### 武宗朝（840—846年的李德裕）

武宗即位以后，政治報復行為從內廷蔓延及于外廷。最初的打擊目標是牛黨的宰相楊嗣復和李玨（785—853年）；這兩個人是在文宗時代的末年爬上最高官位的。仇士良既要罷他們的官，又要他們的腦袋，因為他們支持過武宗的弟弟和對手。武宗并不反對這個想法，也可能讓人們處他們以死刑，若不是最不可能為他們辯護的李德裕出面干預的話。李德裕在840年末被任命為宰相，他不顧朋黨的利益，激切地為他的政治對手們的性命請命，不是一次，而是三次向皇帝迫切陳詞，并且動員朝廷的輿論來支持他的行動。最后武宗咆哮著向李德裕說道：“特為卿等釋之！”[[160]](#_16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很少有更好的例子能說明李德裕在這位反復無常的天子面前所享有的如此特殊的恩寵以及他如此善于發揮宰相的作用。

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時五十幾歲的李德裕，已為獲得這樣的機會準備了一輩子。他的傳記和誄詞異乎尋常地談到了他的抱負、克制和干勁。但是，除了他個人的奉獻和自力更生精神以外，他還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他善于找出和利用每一個可能推進他的事業的關節。自然，他是憲宗時代的貴官和宰相李吉甫之子，從一開始就沾了很大的光，但在他的公務生活中再沒有什么偶然機遇之賜了。在9世紀的第一個10年，李德裕在藩鎮中入幕，度過了他早年的大部分生涯，主要是為了避免因他著名的父親而涉徇私之嫌。可是，他在藩鎮任職時期小心翼翼地巴結了一名宦官，據說給了這個宦官以巨賄，使之能關照他的利益。在這個宦官回到長安以后，李德裕被穆宗召為翰林學士，這不是一個年輕人能憑偶然機會得到的職位。

李德裕在翰林院中結好于李紳和元稹，像前面已講過的那樣，他卷進了日益擴展的朋黨活動之中。在這個時期內，李德裕在實際協調他們那一派的政治方略時究竟做到什么程度，這仍然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在9世紀的20年代和30年代，他離開長安比在京師做官的時間多得多。他兩次任浙西節度使，在長江下游的那個藩鎮幾乎長達八年之久；他又在西川供職三年，在這里獲得了對外事務方面的經驗。他在9世紀30年代初期文宗時代確曾做過短時期的宰相，但甘露之變的密謀者編造一個情節把他也株連在一個莫須有的叛逆罪名中，此后他便被貶為湖南南部的一個刺史。可是，他沒有被貶逐多久。甘露陰謀失敗以后，他又被任命為節度使。通過他與另一名宦官——仇士良的下屬——的友誼，李德裕最后在840年被召回長安，在新皇帝下面當了宰相。從那個時候起一直到武宗于846年春去世時止，李德裕是唐王朝京師里主宰一切的政治人物。

李德裕作為宰相的政治作風肯定的是贊成儒家的理論和實踐中主張搞集權主義的一派。他欽佩管子和西漢的一些強有力的宰相。他繼承的他意志堅強和說干就干的父親的品性以及他在幾個藩鎮任內擁有的長期行政經驗，使他自然而然地能夠把一人負責的宰相之治運用到高級行政中來。他的作用受到皇帝的嘉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不同于代宗后期元載的強人統治。它也大大不同于唐代的制度，因為按照唐代的規矩，國家大事都要由幾位理論上權力相等的宰相在皇帝面前展開辯論。宰相們在文宗晚年出于派性而爭吵不休。[[161]](#_161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76)與此相反，李德裕現在被賦予實際權力，能為政府做出幾乎所有的重大決定。據我們所知，他的方法是先搞一個最小規模的磋商，再徹底檢討有關的訊息和情報，然后獨自退往后花園擬定計劃。這種方法特別不尋常，因此值得他的同時代人予以評論。通過他留下的大量政事文書來看，我們知道李德裕之享有一位極端干練的行政官員的名聲，不光是同情他的歷史學家描寫的結果。他善于掌握細節；會斟酌別人的長處和短處而量才加以使用；能夠協調大規模的政府行動，并且向皇帝提交設想復雜的建議：這些才能都不時地反映在他的奏疏和代擬的制誥之中。在這些方面他足以與陸贄相匹，而在實際工作方面又或過之。主要由于李德裕的努力，唐政府才能夠頂住9世紀40年代之初經常發生的外國可能的入侵、藩鎮的叛亂和國內的騷動等危機。

如果李德裕在他恢復掌權時能夠使李黨獲得勝利，那么，這個勝利是低調的。他不斷地對他的個人政敵牛僧孺和李宗閔施加壓力，從而把他們一勞永逸地從高層政治中排擠出去，但從另一方面說，他對于進行特別過火的派性清洗活動似乎不感興趣。[[162]](#_162_Zhe_Yi_Dian_Ke_Yong_Yan_Gen)同樣地，他對與他共事很久的人報之以宰相之職，例如詩人李紳（842—844年在職）便是著名的例子，但是這些人無疑都當的是配角。不言而喻，李德裕不能全由自己來直接指揮唐政府的活動，但他對助手的挑選似乎表明他意在加強他自己的威望，而不在于改變中層官僚階層的結構。

同樣地，李德裕對政府事務進行的一些小改革是要給堅強的行政權提供便利，以符合他的政出一門——即政令應出自宰相府——的原則。[[163]](#_163___Li_Wen_Rao_Wen_Ji____Juan)公事程序的改革包括把常務（日常事務）的主要責任交還給中書舍人。這些中書舍人直接受宰相管理，因而改革的企圖是想解除翰林學士50多年來不受外廷監督的那種職能。[[164]](#_164___Li_Wen_Rao_Wen_Ji____Juan)與此相應的努力是要使宰相府囊括一切重要事務，特別是涉及國家安全和與節度使交往的文書，并且把有關這些事務的文件保管在宰相府的特設檔案內。很顯然，這些辦事程序在以前是雜亂無章的，主要是根據問題一件件處理的。[[165]](#_165_Tong_Shang_Shu__Di_3__4Ye)李德裕還想控制宮內主要的記注和歷史寫作過程。他恢復了《時政記》的編纂（這是由知印宰相每日撰寫的一種紀事，但要由其他宰相副署）。這是為了私下保存宰相處理的政務記錄，它按照他們自己的觀點撰寫，而完全不受翰林學士、宦官或皇帝寵幸的干擾。他還要求《起居注》（這是皇帝的行為和詔令的主要記錄，也是最后編成歷朝《實錄》的大宗文獻的基石性資料）應交給宰相審查和作編排上的改動，以免“軍國大政，傳聞疑誤”。他這樣關心宮廷記注，不完全是歷史方面的原因。李德裕特別注意去贏得定某些事務為“密”的特權（這些事務太敏感，不應讓公眾知悉，也不宜寫入起居注），從而增加他實際上指導政府的權力，不受別人干預。[[166]](#_166_Tang_Cheng_Ye____Lun_Tang_D)在這些程序的修改中有一些似乎在李德裕任期內頗有成效，但另外一些修改，特別是那些官僚們很感興趣的關于限制皇帝使用翰林學士的修改，受到了武宗的抵制及其繼承人宣宗的忽視。所以總的來說，是李德裕在宰相職務上的個人作為，而不是行政上的重大結構改變，形成了9世紀40年代的宮廷政治生活。

武宗和李德裕之間的關系使李德裕有可能取得他的一切成就，因此這種關系是很令人神往的。這位宰相很有魅力，能言善辯，知識淵博而又精于算計，城府很深而又傲慢自大；他酷愛奇花異草，所以他只喜歡幽居在自己豪華的后花園內；但他又決不放棄政治上的刺激。他蔑視宮廷詩的矯揉造作和舉子們的裝模作樣，但是他本人卻是一位相當好的詩人和散文名家；如果有需要，他也能夠采取因襲的態度和做作的感情。相反，皇帝卻是既魯莽，又暴躁，又執拗。但是不像他的哥哥文宗，他也很精明而有決斷。如同以前的幾位皇帝，宗教像政治一樣緊緊控制著他。李氏家族的弱點是煉藥求長生，武宗又對道教產生了真正的興趣。在他統治時期的晚年，他所服用的丹藥使他喪失了完全控制自己的能力。我們的材料表明，他既患有抑郁癥，聯系他對佛教的迫害，他也患有絕對的躁狂癥。[[167]](#_16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可是，在李德裕和武宗所分管的事項方面，卻從未見有混亂不清的情況。雖然李德裕很細心地準備他的奏疏，也強烈地要求應把它們比別人的建議置于優先地位，但他上奏武宗時是把它們作為出自武宗的圣斷而提出來的。李德裕從未犯過把皇帝置于被庇護地位的錯誤。至于武宗，他注意自己時不時地不受李德裕的支配而獨立行使權力，以促使大家能看到他們二人之間地位的差別。很顯然，終武宗之世他們之間的關系未受到任何重大損害。

李德裕在對付宦官方面也很細致。一方面，他必須注意他們的愿望，特別是仍為長安最有權勢的宦官仇士良的愿望。例如在840年，一名給事中曾想阻止仇士良的養子利用蔭庇特權（這又是宦官想僭用官員蔭子特權的一例），李德裕卻把此人降級使用，從而引起了官員們的憎惡。可是，李德裕又很注意限制宦官權力中涉及自己的那一部分權力。有時武宗也幫助他這樣做。例如在842年，朝臣們建議武宗加尊號，這自然是一個大慶典，而且要宣布大赦。仇士良和其他高層宦官開始懷疑李德裕計劃利用大赦的機會來削減他們的某些特權和財源。宦官們在宮內示威反對這個計劃，但武宗在公開場合大聲斥責了他們，他說道：他是他自己的朝廷的主人，也是大赦令的唯一頒訂者。不久，皇帝迫使受到羞辱的仇士良隱退。仇士良這位處于關鍵地位的宦官于843年死去以及他的心腹爪牙被清除以后，李德裕鏟除了宦官的各種權力基地。他撤銷了他們除神策軍以外的其他兵權，還企圖削弱他們對內庫的控制權，等等。[[168]](#_16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可是，如果把他的這些舉動看做是對宦官全面進行的討伐運動，那也是不對的。它們只要取得有限的和實際的成效。可是，在武宗治下的后期和整個宣宗時代，宦官的權力至少不像9世紀的20年代和30年代那樣肆無忌憚了。

李德裕作為宰相能夠有所成就的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是他上任以后事情接踵而來，而危機的氣氛有利于實干家。

840年秋天，大批回鶻突厥人突然地開始沿今天內蒙的河套地區進抵唐王朝邊境。那個地區的諸節度使只能眼看著在隨后的幾個月中回鶻大約10萬之眾集結在陰山南部塞下——這是數百年來在北方所見最壯觀的游牧民的大遷徙。[[169]](#_16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他們為什么要來到此地，他們又要求什么東西呢？李德裕從長安派去幾個外交使團之后，中國人已得知9世紀30年代回鶻領導層因嚴重內訌而導致分裂的詳情。在9世紀40年代，回鶻的一個臣服民族黠戛斯決定利用回鶻的弱點。戛黠斯從南西伯利亞根據地突然傾巢南下，把回鶻人趕出了他們舒適的首都，殺了可汗，并自封為草原上新的主人。驚恐的回鶻人分兩股逃奔。一支人馬前往西南，它的成員最后定居吐魯番附近的高昌（今哈拉和卓），他們的子孫在這里建立了出色的定居社會，迄13世紀時為止一直是一個獨立的實體。另一支人馬從他們的首都斡耳朵八里直接南下，與中國人相對峙。李德裕派往這第二支回鶻難民游牧部落的信使在841年獲悉，李德裕雖曾有計劃讓他們返回故居，但他們的統治者——即自封為可汗的繼位者——不想再回原地。反之。可汗要求中國人給一個有城垣的邊塞堡壘作為他們的大本營。回鶻人顯然想繼續留在那里盡可能過他們半定居式的生活，繼續進行貿易，侵擾中國邊境和等待時機。

回鶻人的這種想法恰恰與中國的傳統戰略利益南轅而北轍，也是任何長安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威脅。需要采取行動，但在這種形勢下卻有著嚴重的危險。在788年以后與回鶻人的長期和平期間，北方的邊境一直沒有得到安寧。因此在842年初李德裕開始一項應急的防衛計劃，同時給回鶻人送去了大批糧食和布匹作為羈縻他們的禮物。邊防要塞要重建；交通要恢復；部隊要增援。在這種形勢下，中國人取得了很快的進展。

當回鶻和中國軍隊之間的戰爭終于爆發時，李德裕做了總指揮官，集軍政大權于一身。他的領導藝術勝過了晚唐的任何宰相。他監督戰略和重大戰術決策的執行，督促長安運往前線的供應，但是他把戰術細節留給他精選的戰地將軍們去處理。一個特別的討伐軍指揮體系按慣例組成，但和安祿山之亂后的其他大多數政府軍事行動大不一樣的是，這一次行動協調得很好。增援邊防軍的部隊是從許多內地藩鎮抽調來的。鬧獨立的幽州鎮也參加了這次戰役，這證明了李德裕對他直接控制范圍以外的勢力也能進行政治說服工作。843年初戰役達到了高潮，那時一支中國特遣隊以突襲方式攻下了回鶻的大營。中國人無情地追亡逐北；一萬名回鶻人枕尸于南戈壁后來被名為“殺胡山”的地方，另有倍于此數的人投降。可汗在慘敗中幸得逃脫，但他在幾年之后在沙漠之中被捕殺。

外患尚未完全平息，國內又出現了昭義節度使職位方面的嚴重問題。[[170]](#_17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昭義橫跨山西東部的太行山。它是那些靠河北諸鎮與唐王朝的內地河東和關內之間的貿易為生的商人們的老家。可是昭義不像更加放肆的河北諸鎮，它自757年建置以后便一直忠于朝廷。825年，敬宗的大臣們第一次準許它的節度使職位由父傳子，盡管那時朝廷中對此不乏反對的意見。劉從諫（803—843年）這位新節度使在9世紀30年代越來越有勢力，在甘露之變失敗以后他在阻止宦官公開專權方面起過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他843年死去以后，他的侄兒劉稹示意要繼承統制該鎮的權力是沒有人感到奇怪的。大多數官員都這樣主張，即回鶻的局勢尚在未定之天，所以劉稹可以署理此職。宰相李德裕認為，按照原則，昭義不應該永遠劃為化外。[[171]](#_17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為了嚴懲昭義，政府又組織了討伐之役，這一次的最大特點是河北諸鎮的鐵桿核心成德和魏博空前地予以合作。李德裕答應以領土相酬，這兩鎮的節度使才被說服這樣做的。他們的參戰雖然不是全心全意的，但對切斷劉稹的退路和預防像8世紀80年代那樣的災難性叛亂的蔓延，是起了作用的。劉稹和他的家族被部下在844年夏末所殺，此后朝廷便任命了一位新節度使。武宗對李德裕在處理這第二次危機中所取得的成就評價極高，因為這是9世紀中葉最嚴重的一次藩鎮威脅，因此他在844年封李德裕為衛國公。

武宗時代的第三件大事是“會昌滅佛”；因為會昌是武宗的年號。我們從來中國游學的日本僧人圓仁（793—864年）的《求法記》中得知，對佛教的壓迫已在逐漸形成，但這一次則是在845年由政府擴大的全面鎮壓行動。[[172]](#_172_Lai_Xiao_Er____Yuan_Ren_You)武宗連續下令關閉和毀壞數以萬計的山野之間的招提、蘭若，后來又攻擊通都大邑的許多寺廟。僅有少數可予保留；上等州治可各留一寺，而長安及洛陽各準許保留兩個寺，每寺只留30名僧人。[[173]](#_173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8Sh)這一震驚天下的詔書強迫多達二三十萬名僧尼還俗。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被殺或被傷害。佛教寺廟的財產、經籍和圣物嚴重地被破壞。雖然最厲害的迫害大約終止于武宗去世和他的叔父宣宗繼位以后的9個月，但佛教作為一個組織恰像它經歷過一個最大的發展時期那樣，受到了最大的摧殘。在后世的中國歷史中，佛教再也沒有像那時那樣向國家權力提出挑戰，甚至與它相抗衡了。

對佛教之所以肆行迫害，其動機是很復雜的，而最重要的原因在經濟方面。[[174]](#_174_Chen_Guan_Sheng____Hui_Chan)大約在820年以后，中國嚴重的貨幣緊缺有所緩和，但是由于各方面更加直接地伸手向國庫要錢，財政的拮據狀況毫無改善：例如后宮的奢侈和宦官的建置開銷越來越大，加上后來反對西北、反對回鶻 和昭義的龐大軍費也都需要錢。在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鼓勵銅錢的鑄造也沒有取得根本性進展。可是與國家的財政狀況相反，佛教寺院集團卻日益富足。佛教的律在古代是禁止僧人從事經濟活動的，但它在中國已有數百年被置若罔聞。他們所持的理由是，佛教社團作為一個整體而不是作為個人來說，它能從貨物流通中受益。[[175]](#_175_Ya_Ke__Re_Nei____Wu_Dao_Shi)寺廟數百年來積累的財富不僅限于光彩奪目的金、銀、銅制的圣像和佛教祭祀用品，即便它們擁有這么多貴金屬的貯存對于嚴重缺乏貨幣的經濟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同時也直接違反了政府關于禁止窖藏寶物的規定。而且，較大的寺廟還擁有土地（通常稱為“寺莊”），它們大部分實際上都免稅。事業心強的住持便把這些土地組織起來以農、林產品牟利。[[176]](#_176_Cui_Rui_De____Zhong_Shi_Ji)這一發展是與世俗社會富豪之家大莊園的形成齊頭并進的，而且這兩種莊園制往往互相糾結在一起，因為富裕施主在死前仍保留名義上施舍給寺院的土地的利益。甚至佛教建筑物的建造費用也常由政府捐助。或許最令人氣憤的事實是，在“出家”并因而擺脫民政的控制之后，僧尼就再也不用付兩稅法規定的個人稅項了。由此產生的國家稅收的損失使幾代文官為之煩惱，同時由政府監督制度的許多嘗試也一概未生效力。9世紀40年代的沒收、還俗辦法和其他懲罰性措施得到許多官員的贊同，認為這是阻止佛教寺院在唐帝國的經濟事務中變成強大堡壘的唯一辦法。

迫害佛教的政治方面要更復雜一些。武宗顯然是支持滅佛運動的主要力量；他是一位熱誠的道教徒；他的個人信仰帶有狂熱性。[[177]](#_177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8Sh)但是除了他有幾個寵幸的道士以外，他似乎并沒有想在朝臣中促成一個名副其實的道教壓力集團，即一個從教義上來說敵視佛教的集團。反之，沒有證據表明大多數官員不認為搞魔法的道教是一劑政治毒藥——也許它是一種有趣的消遣，但不能貿然加入。對佛教的迫害也不大可能是由儒教意識形態的狂熱分子所發起的。韓愈在819年發表的著名的詆佛言論代表了一種極端的意見，但有一點很重要，即也不要一成不變地認為他在倡導一個全面地毀棄釋教而崇奉儒家的活動。反之，唐代后期的高級官員——包括李德裕和武宗的其他宰相在內——并未對佛教之侵入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表現出像韓愈那樣大的個人憤怒。自然，民眾的過火的信教行為可能引起了上層人士的敵意，[[178]](#_178_Chen_Guan_Sheng____Zhong_Gu)但是，從檢查唐代現存大量詩文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佛教中比較嚴肅的哲學思想和禮儀深深地引起了許多統治階層精英人物的注意。其次，如上所述，上層僧侶和掌握世俗權力的人的社交活動已變成司空見慣的事。把佛教諷刺為墮落的夷狄之教完全是為了應付論戰需要的說法，而這一次不過是企圖為9世紀40年代中葉的暴力行為巧為辯護之辭而已。

佛教史的歷史作者都指責李德裕執行了這次迫害運動，他們很可能是對的，雖然他們對他的參與并無多少具體證據。[[179]](#_179___Da_Zheng_Xin_Xiu_Da_Cang)李德裕當然有很多充分的政治理由支持滅佛運動，因為首先它會給國家財政帶來利益。它同時還使李德裕有機會精心提高國家的禮儀以支持他實際的政事活動，特別是加強對唐初幾位偉大的皇帝和政治家的崇祀。比如，他建議用從佛寺中沒收的錢在最近光復的昭義建昭武廟；另外，他還主張利用洛陽附近原來的佛教建筑以恢復安祿山之亂后被毀的重要的太廟神主。[[180]](#_180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8Sh)另外，特別在迫害佛教運動的早期，它與李德裕想削弱宦官仇士良權力的努力有關，因為仇士良既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同時還任政府的功德使之職。最后一個原因的證據雖然不是直接的，但情況很可能是，李德裕在843年打敗摩尼教的庇護者回鶻人以后對它進行的鎮壓為更廣泛地打擊佛教提供了現成的先例。

宣宗時代放松了對佛教的迫害，這幾乎又讓佛教徒全部恢復他們原有的組織力量。因此，新皇帝雖然贊成恢復佛教這一精神信仰，贊助進行佛事活動而又同時禁止殺生，但他在847年頒布的準許重建廟宇和政府不得干涉的詔令，卻在后來的實踐中受到了限制。經宰相的迫切要求，政府在9世紀50年代之初采用了一個更慎重的政策，即裁減過分的開銷，而且只允許在人口稠密之區新建寺廟。[[181]](#_18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雖然僧尼不再有性命之虞而且通常都能重操他們的宗教舊業，但政府盡力防止私人制度的恢復，規定缺額僧尼只能由禮部的祠部加以補足。甚至長安的大廟宇也在重建之中，宣宗下的命令實際上改換了所有這些廟宇的名字。[[182]](#_182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8Xi)菩提寺改成了保唐寺，法云尼寺易名為唐安寺，如此等等。這便表明世俗社會重新建立了對有組織的佛教的控制；這種情況自武宗和李德裕死去以后一直延續了許多世紀。

### 唐宣宗之治（846—859年）

武宗死于846年，卒年33歲，大約也因服藥而死。宣宗[[183]](#_183__Xuan___Hsuan_Yu__Xuan___Hs)和9世紀的多數皇帝一樣，也是被宮中一個宦官集團所擁立，但他這一次卻未發生繼承權的斗爭。他是唯一的合理候選人。武宗的兒子們都太年輕，不宜登基，并且如上所述，武宗所遺一弟又已在840年的繼承爭斗中被殺。37歲的宣宗是他的長輩。他是憲宗的第十三子，穆宗的異母弟，也是前此三位皇帝之叔。

宣宗在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被戲呼為光王，他在出人意料地即位之前在政治上被忽視，也被斯文人物所嘲弄。他在兒童時代多病而且能見異象。成年以后他把他的苦痛變為自己的能力。他假裝對當時任何可以把他卷入危險的宮廷陰謀中去的事物不感興趣，一味沉默，并希望被當做無害的怪人。可是，他即位以后就發泄出他的憤怒和不滿，特別對他父親憲宗的神秘的死更是如此，因為這個痛苦的回憶使他在幾次祭奠憲宗的陵墓時都禁不住淚如雨下。[[184]](#_184_Wang_Dang____Tang_Yu_Lin)宣宗確信，他的異母兄穆宗和穆宗之母郭妃對憲宗的病死負有一定的責任。當年老的郭妃848年去世時，宣宗拒絕讓她給他父親陪葬的榮譽，另有謠傳說是他加速了這位老太太的死。此后5年，宣宗把他所認為的同案犯都一一捕拿歸案。他甚至貶降了穆宗及其3個兒子在宗廟祭祀中的地位，這使統治皇室所精心培植起來的威信付出多少代價，我們就只能猜想了。和40年前一樣，對朝廷的這種全神專注之情一直持續到宣宗較平靜的年代。他搜尋一切能告訴他父親治下的遺聞軼事的人，他還堅決地優予錄用元和時代高官之子孫進入自己的私人班子或者任政府工作。[[185]](#_185___Dong_Guan_Zou_Ji_______Tu)

好像是為了彌補他自己的被虐待，他很體貼地照顧他自己的母親以及還活著的胞弟們。他也溺愛他的妹妹和幾個女兒，其中有一個女兒恃愛當他的面折斷筷子和打碎湯匙，從而迫使他放棄了把這女兒許配給她所恨的某人的打算。但有趣的是，宣宗從不正視立儲這個重大的問題，盡管一些神經質的官員對此嘮叨不休。他被認為不喜歡長子而寵愛第三子，但他為此毫無作為；他的遲疑不決最后又導致了一場宮廷斗爭，一個宦官這時成功地擁戴了宣宗的長子。[[186]](#_186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在他統治期間，宣宗顯然是想確定無疑地突出他個人第一的地位，特別是在他從前曾長期受歧視的家族內更要這樣做。

自然，這位古怪而急躁的人不只是懷有私人宿怨，他還必須對付朝廷的官員，而人們認為在這些人中，從前曾給他以保護的卻很少。宣宗在接見高級官員時常年堅持威儀整肅。他往往用尖刻的個人批評或者在討論中顯示備知底細的知識，來使他們感到難堪。他在正式朝覲中嚴厲盤問來朝見的節度使和新任命的地方官員時所準備的訊息，都是來自他對帝國重要材料的研究和他的工作人員所提供的細致的情況簡介。他以在禮儀或在實質性事物上注重細節聞名，例如在宣宗手下為相10年的令狐绹（802—879年）有一次被皇帝問得神態失常，甚至在冬天他也汗濕重裘。[[187]](#_18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但與此同時，宣宗也像他的父親憲宗那樣，頗有志于重建貞觀之治。他的助手給他讀關于太宗與其臣下相互關系的非正式史書《貞觀政要》；他有時又像從前諸皇帝那樣對他所寵信的官員表示極大的關心。他比某些從前的皇帝更加真心實意地鼓勵相應的官署提出坦誠的批評。但是，朝臣們普遍的情緒一定是狐疑不定，對他又敬又畏。[[188]](#_188___Dong_Guan_Zou_Ji____Juan)

當然不必奇怪，宣宗在846年的第一個重大決定就是罷掉了與他所痛恨的侄兒武宗沆瀣一氣的、大權在握的政治家李德裕的相位。李德裕按慣例逐步降級，越降品級越低，越降越往南方，最后由于仔細地復查了李德裕曾經略有牽涉的司法案件，他遭到了決定性的打擊。宣宗以綜合調查所得為基礎，對李德裕的罪行進行了長而詳細的譴責，所以他把李德裕貶謫為最底層的官（南海海南島上的一個縣令），使這位前宰相在850年初死于此地。即令在這樣的貶謫以后，令狐绹對李德裕的回憶仍是那么強烈，致使他夢寐難安。[[189]](#_189___Dong_Guan_Zou_Ji____Juan)

宣宗罷免了李德裕的相位以后，擁護宣宗的是李德裕從前以鐵腕行政方式所制造的許多政敵，當然還有一些牛黨的追隨者；后者希望看到李德裕和他的主要伙伴完全像牛僧孺和李宗閔從前那樣受到羞辱。牛黨年輕的成員如詩人白居易的侄子、在846年到851年任宰相的白敏中（約862年死），便在某種程度上煽起了往日的朋黨仇恨。可是，要認為這個時期牛黨在政治上已取得絕對的最后勝利，那也是錯誤的。首先，朋黨雙方許多老一代重要成員，在9世紀40年代后期已經死去。另外，更加重要的是宣宗本人正作為全帝國最強大而唯一的政治力量出現，結果是大規模的公開朋黨活動普遍減少。雖然宣宗確實恢復了幾個牛黨的老人的地位，并且寵待他們的幾個親屬（包括牛僧孺的兒子），但在高級官員中嚴格按朋黨界限調動職位的情況還是有限的，而且甚至這種現象在9世紀50年代也已消失。沒有發生文宗朝廷的那種政體的更替。從此以后，牛李黨爭只能在文學和歷史中聽到它的回聲了。

宣宗的統治看來可分為三個政治階段。第一階段從他登極到約850年，這時顯然是要致力于加強他的權力；罷免李黨的成員；解決佛教的問題；重新統一西北諸州（它們在吐蕃王國分裂后已投降），后一問題我們在下面將予以申論。白敏中是這時期的7個宰相中唯一任期大約超過了一年的人。第二階段包括9世紀50年代的大部分；這時期的特點是少數宰相任期較長，其中包括令狐绹和著名的財政官員裴休（787？—860年）。第三階段是從857年到859年，這時宣宗變得日益躁怒（他也和其他諸帝一樣，對道教的長生術感興趣），宰相的替換也很頻繁（其中多數人過去都是翰林學士）。

很難過細地評價宣宗的后兩個時期，因為正如我們在上面講過的，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史料不足。由于朝廷基本檔案被破壞，又由于9世紀最后25年叛亂期間行政解體，當90年代之初最后要求按常規修宣宗實錄時，竟不能以正常方式編出“一個字”來。[[190]](#_190___Si_Ku_Quan_Shu_Zong_Mu)一位奉命做這一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的歷史學家裴庭裕確曾編撰了一本共三卷關于宣宗朝遺聞軼事的書，署名為《東觀奏記》。這本書是我們了解宣宗個人品質的主要材料，可是它實際上沒有提供有關重大政治問題的情況。它的本紀和這時期少數人物的傳記（在10世紀中葉被編成《舊唐書》的一部分）都有這個缺點，特別是關于9世紀50年代更是這樣，因為它們通常只列有空空洞洞的官職。《唐會要》和《冊府元龜》這兩種非常重要的文獻匯編也倉促地漏掉了宣宗后期的條目。所以下面關于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唐代朝廷的一些論述是假設性的。

大家都強烈地認為，宣宗之治是一個清算和評估過去的時代，也是一個使知識變成可用形式的時代。這時期不論公家或私家的大部頭匯編式著作的數目大得驚人，多達一打以上。這和前此幾十年對這種著作只是偶爾有興趣的情況大不相同。在這些官修類書中，有幾種是關于中央政府和諸鎮材料的摘編，專供皇帝御覽。[[191]](#_191___Dong_Guan_Zou_Ji____Juan)此外，楊紹復續編了蘇冕的《會要》（853年奏呈），其中收輯了德宗以后迄至他本人時代的詔令和表章；這本書后來編進了今本《唐會要》中。

歷史著作中包括另一部續編書，即《續唐歷》（崔龜從851年編），它是一部編年史，上接8世紀譜系學者柳芳所著的《唐歷》止訖的地方。此書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的關鍵材料的來源。854年，史館奏呈文宗朝《實錄》40卷。除之此外，他們還想恢復原版的《憲宗實錄》，以代替李德裕影響下編輯的第二版。一種10卷本的關于歷代君主政務的編年體類書和另一種相關的300卷本《統史》，一并在851年上呈給皇帝，它們編寫的目標是想給皇帝提供從古代到隋末的“所有”著名的詔令、法律和一般政策。

科舉制度在姚康的《科第錄》中有所討論，此書在宋代尚存于世，也是后來一些匯編的重要材料來源。趙瑑辛勤地從各私家材料中選收了有關詠進士科的詩這一特定題旨的材料。最后，兩種很重要的法律著作成書于宣宗年代：一為《大中刑法總要格后敕》（851年），它使官員們掌握了文宗以來迄至當世的帝國立法；一為12卷的《大中刑律統類》，它是按唐律分類法分類的。[[192]](#_192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8Xi)這一書名清單可能并不完全，但它足以有力地體現改進工作的精神。

對于法律的重視也貫徹到了實際中去。人們為進一步明確犯罪行為的定義和使法律程序正規化作了努力。宣宗的總的傾向是要減輕對犯罪的處罰，辦法是減少處刑條令和實行赦免；但是如果真有顯然是蓄意觸犯法律的情況，他也是很嚴厲的。宣宗也鼓勵在政府的決定上更準確地援引先例；許多問題的奏疏通常都要引用早先的立法，特別要注明它們的日期。[[193]](#_193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8Xi)宣宗注重細節而且治理公務井井有條的優點歷來被傳統歷史學家所廣為稱道，也至少博得了某些中央政府的官員——特別是刑部和禮部的官員——的好感。但是，也許是由于宣宗明確反對李德裕所樹立的那種皇帝和強有力的宰相之間的伙伴關系的榜樣，他很難把實權授予任何在名義上負責的大臣。這當然會在實際上遏制官員們的主動性的發揮。

宣宗之治不以采取有革新精神的經濟和社會改革措施而見稱于世，雖然有許多問題要著手解決。例如到9世紀50年代，從長江下游征集的漕糧大約只有30%事實上送到了北方的廒倉內。汴渠河道上盜竊和貪污橫行，同時漕船因普遍缺乏維修而經常有損失。在9世紀50年代之初，鹽鐵轉運使裴休發布一系列法令以扭轉漕運形勢，漕糧接收額一度雖高達往日的三倍，可惜畢竟好景不長。同時，盡管宣宗時代人們曾想改革食鹽的專賣，但所產的大部分食鹽往往歸藩鎮而不是歸中央政府所用。長安此時的食鹽收益不過略高于憲宗時代收入的半數而已。[[194]](#_194_Cui_Rui_De____Tang_Dai_De_C)

至于朝廷政治與第一次群眾大規模騷動之間的關系則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雖然我們對這些年的情況知道得很詳細，但仍不能充分了解。一方面，唐代中央政權，從傳統的和表面的觀點看，被認為已比安祿山之亂以后更弱，但它已延續的時間卻比人們的看法長得多。圓仁描述了9世紀40年代中央控制農村的程度，它表明鄉村還是頗為穩定和繁榮的，甚至在半獨立的河北也是這樣。[[195]](#_195_Lai_Xiao_Er____Yuan_Ren_You)總而言之，縣令（唐代最低一級政權）對地方事務的最小限度的干預一直被容忍到反王朝的力量明確地要向國家權力挑戰之前的9世紀70年代。另一方面，唐朝后期的經濟和社會繼續發生著重大的變化，比如私人手中的大莊園日益發展，同時農民的生活相應地出現混亂。其中有些變化中央政府是故意視而不見，有些變化它又無法理解，在行動上也敷衍了事，無所作為。中央組織機構的固有缺點，在9世紀中葉的穩定時期也暴露出來，最初表現為點點星火，即兵變和抗稅騷動等等。由于這些事件至少在9世紀50年代以前相對地說不太經常而且又是孤立的，它們能被長安平定，因此產生了老一套救治辦法還有效的錯覺。許多帶根本性的問題既未診斷出來，也未得到糾正。[[196]](#_196_Xiang_Jian_Ben_Shu_Xia_Mian)

在宣宗統治的末年，武裝叛亂紛紛出現于今天的廣東、越南北部、江西和湖南，另外還有宣州（安徽）康全泰和浙東（浙江）的裘甫這兩次嚴重的兵變。它們歷來被認為是最后直搗唐王朝心臟的王仙芝和黃巢的災難性叛亂（873—884年）的先驅。這一時期正是唐王朝的命運開始不受長安控制的時候，我們可以恰當地說，它標志著我們論述的宮廷政治的結束。雖然唐王朝此后名義上存在了大約40多年，但9世紀末年應該視為五代時期的開始。

### 9世紀初期和中葉的對外關系

如前所述，中國人在8、9世紀之交在西南的勝利和同南詔結成的反吐蕃聯盟的鞏固，大大地緩和了吐蕃人對西部邊境的壓力。此后吐蕃轉而攻擊回鶻人。吐蕃在791年拿下原來屬于中國的北庭前哨基地，它便開始想擴大沿它北部邊界的勢力范圍。除了想增加自身的安全以外，吐蕃向北擴張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渴望至少要控制通過中亞的遠程貿易的一部分地段，夢想損害回鶻人和中國人之間的貿易。800年以后，吐蕃人對現今陜西的中國外圍城鎮的零星侵犯雖然被唐王朝方面警覺地注視著，但很可能是他們攻擊回鶻人這一主要目標的附帶行動。不言而喻，回鶻人也很不安。對于吐蕃人干擾他們的貿易和進貢商隊，他們的反應是在813年在吐魯番附近舉行了一次大反擊，但是這次戰役沒有取得決定性結果。[[197]](#_19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后來在9世紀頭10年的后期，這兩個亞洲內陸的強國都主動向中國發動外交攻勢：回鶻人用第三次請求和親的辦法重申他們與中國人的聯盟，吐蕃人則迫切地要求與唐政府締結策略性的休戰條約。

為什么吐蕃適值此時要接近中國，這個道理現在尚不太清楚，一個聽起來可信的假定是，憲宗時代的唐王朝內政已很有起色，因此它能夠比8世紀后期對外部施加更大的影響。這兩個國家早在808年就對各種問題開始進行談判，人們認為吐蕃新王可黎可足（約815—836年在位）特別希望和平。819—820年吐蕃人大舉進攻中國的西北，是針對性地向唐朝皇帝施加壓力，以迫使他同意簽約。821年雙方在長安就一個全面的條約進行談判，次年在拉薩最后商定初稿。它規定：結束戰爭狀態；停止對對方領土的侵犯行為；制定關于使節履行的規則；調查并遣返在邊境附近拘捕的“可疑分子”。[[198]](#_198_Zuo_Teng_Chang____Gu_Dai_Xi)

9世紀20年代西藏的政治史也很動蕩不安，其特征是佛教王室與權勢藩臣家族之間的斗爭——后者的許多家族都擁護土著的苯教。[[199]](#_199_Zuo_Teng_Chang____Gu_Dai_Xi)毫無疑問，這種削弱力量的內部紛爭是使得821—822年的唐蕃會盟在訂約之后沒有馬上破裂的重要原因，而783年的條約卻不是這樣。整個說來，吐蕃和中國之間的關系在9世紀的20年代和30年代是和平占了上風。大約在840年，吐蕃君權迅速式微，并且隨著達磨王之死而不復存在：據西藏和中國史學所述，達磨王是一位兇惡、放蕩的“末代昏君”。鑒于他反對佛教的態度，部分情況至少是這樣的。諸王子在達磨王死后的繼承權斗爭中把吐蕃弄得四分五裂。他們已不能再陳兵河西走廊了。吐蕃王國曾經長期成為晚唐歷史中的主要外患，此后在東亞的國家關系中已不起重大作用了。

從大約795年到835年，回鶻人的勢力正如日中天。他們在這幾十年和中國的聯盟中受益越來越多，但中國的財政支出卻是災難性的，不堪重負。最初，唐朝商人以絲綢交換回鶻人的馬匹，以此作為正常的經濟交往。但是在8世紀后期和9世紀初期，中國政府需要大量馬匹來對付討伐藩鎮的戰爭，又因吐蕃人的侵占西北而失去了最好的放養牧場，它只有依賴回鶻人供應馬匹。回鶻人利用這種形勢，把次等馬匹南運到中國，其數量之多大大超過了唐朝的需要。回鶻人對這些馬匹索取高價（通常是40段絲綢換一匹馬），而且隱含報復之意。中國沒有其他良策，只好“死的活的都按頭計算”，一律照價付清，否則就會使邊境被侵犯的風險大為增加。[[200]](#_200_Zha_Qi_Si_Qin____Dui_Hui_Gu)中國的國家財政在這種重壓下受到損害。在幾次強制性的馬市交易中，多達50萬段的絲綢因而易手。雖然有些絲綢供應了回鶻宮廷的消費，但大多數絲綢變成了回鶻人的亞洲內陸貿易的津貼。可以預料，許多中國官員非常不滿意這樣一種情景：長江下游的織綢婦女在織機上辛勤勞動，所產絲綢卻被政府支付給了“外夷”。回鶻派來中國的使臣和他們的代理人——摩尼教僧侶和粟特商人——的傲慢無禮態度，更加深了這種屈辱感。

可是，與回鶻的友好關系卻是晚唐外交政策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太和公主在821年婚配給回鶻 可汗，不管這多么有損于中國人的面子，但總歸是結盟的重大象征，而且由于巨大的妝奩和公主本人的高貴身份，這一結盟的重要意義也就更顯得突出了。事實上，在與唐王朝交往的外國列強中，只有回鶻人獲準婚娶了真正的公主作為可汗的配偶，而且他們也只有三次。其他國家如果也有幸結親，所娶的則是皇帝的遠房女性親屬。[[201]](#_201___Tang_Hui_Yao____Juan_6_Di)

回鶻人和吐蕃人一樣，在9世紀30年代也被內部的權力之爭大大削弱。一個甚至更加令人矚目的巧合是，840年正當吐蕃作為統一的國家而走向崩潰的時候，黠戛斯也成功地推翻了回鶻帝國。如上所述，李德裕在843年曾經驅散了聚居在中國邊境的大批回鶻難民。因此，亞洲內陸的國際政治在很短時間內起了很大的變化。在吐蕃和回鶻帝國衰落以后，唐政府才能使自己在北方和西北擺脫廣泛的外國的復雜關系——這是王朝建立以來的第一次出現的形勢。

經李德裕勸說，武宗做出了下面重大的決定：不去收復中國在東突厥斯坦的安西和北庭殖民地。[[202]](#_202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74)李德裕堅持，即令這些邊遠地區能重新從土著人的手中奪回，在那里再次建筑要塞，由此而來的開銷和危險與可能的收益相比，也是得不償失的。何況北方大草原的新主人黠戛斯已經表示，他們有意與中國共存共榮，甚至可以做中國名義上的藩屬，以符合唐王朝意識形態的傳統和外交上的禮儀。黠戛斯和唐王朝之間的這種互相克制的態度，實際上使邊遠的大草原保持了幾十年的和平。

對接近中國家門口的地區，中國人從9世紀40年代初期之后只限于恢復他們原來的西北方面的領土和重建北方邊境地區的天然防線。這種方針是采用幾種不同的方式實現的，其具體做法則視幾個外圍地區的具體軍事形勢和居民人口的構成而定。

西起敦煌東到蘭州的河西走廊，在840年以后變成了不再效忠于拉薩王的吐蕃各領袖進行激烈武裝斗爭的舞臺。不久，一個名張義潮的中國冒險家糾結了一支自己的軍隊，他招募的是住在商路沿線各城鎮的“中國人”（其中許多人可能是中國—吐蕃—突厥人的混血種）。到了851年，他已經把吐蕃的封建領主們驅逐一空。他派遣一名使節到長安自愿向唐王朝歸順，這使得朝廷大受鼓舞。他被授予“歸義軍”節度使及其領袖的地位。張義潮的彪炳功績后來使他變成了他的原籍敦煌地區人們崇拜的對象，并且變成了激勵人心的尚武歌謠的題材。[[203]](#_203_Wang_Zhong_Min_Deng_Bian)

位于甘肅東部的原州和泰州等一大批重要城鎮陷于吐蕃之手已達約百年之久，現在在9世紀40年代后期都直接歸附了唐王朝。唐王朝的將軍們能夠不費多大力氣就降服了那個地區吐蕃騎兵的殘余。

可是，政府在平定長安正北約300公里的鄂爾多斯沙漠以南的長城邊緣地帶草原時卻遇到了大得多的困難。這里，沿今日寧夏和陜西的交界，住的是唐古特人（黨項），這是一個相當大的半游牧部落聯盟，源出吐蕃人種。唐古特人在7世紀和8世紀被搞擴張的吐蕃王國趕出了吐蕃東北部（今青海省）的老家。多少年來他們都被三大強國所排擠壓迫。最后在9世紀初年，他們定居于長城附近的夏州—銀州地區。這個地方很貧瘠，不適于大規模農業生產，但可用來養馬，同時也是長安與回鶻首都之間進行貿易的理想地方。唐古特人在政治上從屬于唐王朝，他們的所在地被分為若干羈縻府州，歸中國任命的節度使管轄。這些節度使（他們大多有中外混合血統）成了9世紀那個地方不穩的根源。他們壓迫唐古特人，以謊稱的公正價格來騙取唐古特人的馬匹和駱駝，用敲詐行商負販之法來牟取暴利。在9世紀的20年代和30年代，唐古特人不顧嚴厲的禁令開始用從中國走私出來的武器進行報復。到了武宗時代，唐古特人原來斷斷續續的襲擾變成了一場真正的叛亂，而且由于唐古特人得到了來自無家可歸的回鶻人和吐蕃人的支持，這些襲擾甚至變成了危及長安的潛在根源。宣宗作出和解的姿態，撤換了搞貪污的節度使，但是襲擾并未停止，他于是命令一位前宰相統帶一支討伐大軍去懲戒唐古特人。但是，宣宗的方針是派一些可信賴的文職官員到戰場上去，希望他們能夠把文明的品德灌輸給游牧民，所以在軍事上沒有收效。它花了5年時間，耗費了大量資財，才勉強恢復了平靜。唐古特人雖經這次失敗，仍很強大。他們的騎兵在反對黃巢的叛亂中助了唐皇室一臂之力，他們的商人在9世紀后期的貿易中更加財源茂盛。到了五代時期，唐古特人掙脫了中國人的控制，建立了一個政權，這便是11世紀和12世紀西夏王國的基礎。

中國在安南（今越南北部）的南方殖民地前哨的事務，也和9世紀中葉云南人的國家南詔的有增無已的領土野心互相糾纏在一起。這種相互聯系的關系的形成由來已久。唐王朝向嶺南道（今廣東和廣西）以及進一步向河內地區的擴張，是它開國以來就一直追求的目標。這個廣大的熱帶地區被政府分為幾個軍事轄區，再被細劃為若干州，但此舉并沒有能夠防止北方統治者和他們南方臣民之間連續不斷的沖突；正像肖孚所指出的，“華人從來未能完全戰勝過蠻子”[[204]](#_204_E_H_Xiao_Fu____Zhu_Que__Tan)。安祿山之亂以后，長安的官員們似乎還把這個遙遠的南方視為一潭死水，因此他們多半都允許地方官員隨心所欲地虐待人民，這種情況與北方的唐古特各地區毫無二致。當土著反叛看來有成功的機會時，唐王朝就派兵去恢復秩序。[[205]](#_205_Jian_Tong_Shang_Shu_Zhong_Z) 858年，繼幾十年不分勝負的小沖突之后，安南爆發了一場大叛亂，它的領袖采取了向南詔求援的空前步驟。

南詔在進入9世紀以前本與唐王朝有聯盟關系，但它這時已變得強大得多了。南詔各統治者在9世紀之初熱心地學習了唐王朝的政府和文化的許多特色，最初是在韋皋和其他四川節度使的教化下進行的，因為韋皋等人認為，以中國生活方式的影響來開化這些異域民族乃是傳統的責任。例如，南詔顯貴的子弟們被派往成都學習，而當他們回去時便把唐朝的行政管理方法帶回了他們的故土。可是，這種和平的交往并未持續多久。在9世紀20年代，四川的中國戍軍由于得不到節度使的充分給養而變得不安分起來，他們向南詔的邊境部落尋求他們的必需品。不久，南詔的領袖們甚至比他們原來的老師更了解四川防務的優點和弱點。在829—830年，南詔多次進攻四川，深入到成都的郊區，揚言要把中國人民從他們自己長官的荼毒下解救出來。他們實際上得到了戍軍中兵變的支持。雖然達成了停戰協議，而且后來的諸節度使恢復了中國軍隊的風紀，但唐王朝不能再指望南詔成為恭順的盟友了。西南邊疆地區在后來的幾十年內仍然局勢緊張。

在這種背景下，唐王朝在安南的殖民地變成了南詔通過紅河和黑水流域進行軍事冒險的天然目標——這兩條河把云南高原的水引入東南的東京灣（北部灣）。安南叛兵和他們的南詔盟友組成的這支聯軍，在9世紀50年代之末和60年代之初使中國戍軍遭受嚴重的損失；他們在863年拿下了交州——設于今河內的行政中心。唐朝一位受人稱頌的將軍高駢僅在幾年之后就戰勝了這支大規模的入侵部隊。868年以后這個偏遠的南方安靜下來了，但是這個和平是花了很高的代價才獲得的。[[206]](#_206___Jiu_Tang_Shu____Juan_746)正像上面講述的那樣，唐王朝這時正被許多內部叛亂所困擾，而且不久又經歷了由一個名為龐勛的軍官所領導的兵變的蹂躪——它嚴重地擾亂了長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區。[[207]](#_207_Dai_He_Du_____868__869Nian)另外，王仙芝—黃巢的大叛亂僅在5年以后也開始了。

[[1]](#_1_8)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2章（倫敦，1955年）。

[[2]](#_2_8)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5章； 日野開三郎：《中國中世的軍閥》（東京，1942年），第10—27頁。

[[3]](#_3_8)見前引浦立本書，第7—8章

[[4]](#_4_8)濱口重國：《從府兵制度到新兵制》，載《秦漢隋唐史研究》；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北京，1962年），第215—246頁。

[[5]](#_5_8)《資治通鑒》卷217—222。

[[6]](#_6_8)《白香山集》（商務印書館版）卷12，第47—48頁；參照G.伯奇編《中國文學選集》第1卷（紐約，1965年），第266—269頁。

[[7]](#_7_8)浦立本：《公元755—805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與新法家》，載芮沃壽編《儒家信仰》（斯坦福，1970年），第83—85頁；D.M.麥克馬倫：《八世紀中葉的歷史理論和文學理論》，載芮沃壽、崔瑞德編《對唐代的透視》（紐黑文，1973年），第307—342頁。

[[8]](#_8_8)《資治通鑒》卷217，第6974—6978、6980—6981頁。

[[9]](#_9_8)《資治通鑒》卷219，第7004頁。

[[10]](#_10_8)《資治通鑒》卷218—221。

[[11]](#_11_8)《唐會要》卷78，第1422—1423頁。

[[12]](#_12_8)《舊唐書》卷121，第3749—3780頁；《唐會要》卷6，第75頁。

[[13]](#_13_8)Provinces一詞，在晚唐用于約50個相當大的觀察使和節度使的轄區。

[[14]](#_14_8)山口瑞鳳：《吐蕃和唐代婚姻關系》，載MTB，27—28（1969—1970年）。

[[15]](#_15_8)關于吐蕃諸王的名字及其生卒或在位等年代，均據佐藤長《古代西藏史研究》（二卷，京都，1958—1959年）。

[[16]](#_16_8)即唐古特人；岡崎精郎：《唐代唐古特的發展》，載《東方史論叢》（奈良），1（1947年），第57—205頁。

[[17]](#_17_8)《全唐文》卷332，第12—13頁。

[[18]](#_18_8)《資治通鑒》卷223，第7147—7150頁。

[[19]](#_19_8)例如，可看劉展（《資治通鑒》卷221，第7097—7102頁）和來瑱（《舊唐書》卷114，第3364—3368頁）的事件。

[[20]](#_20_8)賴德奧特：《唐代宦官的興起》，載《大亞細亞》（新版），1（1949—1950年），第53—72頁；又2和3（1952年），第42—58頁。

[[21]](#_21_8)《唐會要》卷65，第1131頁。

[[22]](#_22_8)同上書，第1131頁；王壽南：《唐代宦官權勢之研究》（臺北，1971年），第2章。

[[23]](#_23_8)《文獻通考》卷151，第1322—1333頁。

[[24]](#_24_8)《資治通鑒》卷222，第7123—7125頁。

[[25]](#_25_8)王壽南：《唐代宦官權勢之研究》，第53—70頁。

[[26]](#_26_8)《唐會要》卷72，第1294頁；小畑龍雄：《神策軍的成立》，載《東洋史研究》，18.2（1959年），第35—56頁。

[[27]](#_27_8)崔瑞德：《晚唐的地方自治和中央財政》，載《大亞細亞》（新版），11.2（1965年），第211—232頁。

[[28]](#_28_8)《唐會要》卷77—79；《國史補》下（上海1956—1957年版），第53頁。

[[29]](#_29_8)礪波護：《唐的律令體制與宇文觸的括戶》，載《東方學》（京都），41（1970年），第203—288頁；崔瑞德：《唐代的財政制度》第2版（坎布里奇，1970年），第107—109頁。

[[30]](#_30_8)崔瑞德：《唐代的財政制度》，第109—120頁。

[[31]](#_31_8)郝若貝：《中國北宋時期的財政專門知識、考核和經濟政策的形成》，載《亞洲研究雜志》，30.2（1971年），第281—314頁。

[[32]](#_32_8)郝若貝：《唐代至北宋時期中國的古典貨幣理論與經濟政策》，載《日本國際東方學家會議紀要》，13（1968年），第70—81頁。

[[33]](#_33_8)室永芳三：《唐末內庫的存在形態》，載《史淵》，101（1969年），第93—109頁。

[[34]](#_34_8)《資治通鑒》卷224，第7189—7190頁。

[[35]](#_35_8)可參照浦立本《安史之亂的背景》，第162頁，注21。

[[36]](#_36_8)陳觀勝：《中國佛教的改造》（普林斯頓，1973年），第3章；見《劍橋中國史》第4卷中S.溫斯坦所寫的一章。

[[37]](#_37_7)《舊唐書》卷319—324頁；《資治通鑒》卷225，第7528、7261—7265頁。

[[38]](#_38_7)《新唐書》卷52，第1359頁；曾我部靜雄：《唐代的貢獻制度》，載《文化》，36.1—2（1972年），第1—32頁。

[[39]](#_39_7)可參照《冊府元龜》卷89，第1—3頁。

[[40]](#_40_7)崔瑞德：《唐代的財政制度》第2章。

[[41]](#_41_7)《舊唐書》卷118，第3422—3423頁。

[[42]](#_42_7)日野開三郎：《中國中世的軍閥》（東京，1942年），第110—118頁。

[[43]](#_43_7)這一節敘述取自《資治通鑒》（卷226—232）和《舊唐書》（卷12）以及各節度使的傳記，再可參照崔瑞德《皇帝的顧問和朝臣陸贄（754—805年）》，載芮沃壽、崔瑞德編《儒家人物傳》（斯坦福，1962年），第84—122頁。

[[44]](#_44_7)《唐會要》卷84，第1545—1546頁；趙翼：《廿二史劄記》（臺北，1974年），第20頁。

[[45]](#_45_7)見松井秀一《盧龍藩鎮考》，載《史學雜志》，68（1959年）。

[[46]](#_46_7)例如《新唐書》卷52，第1352—1353頁。

[[47]](#_47_7)《文獻通考》卷151，第1322頁。

[[48]](#_48_7)孫國棟：《唐代三省制之發展研究》，載《新亞學報》，3.1（1957年），第17—121頁。

[[49]](#_49_7)例如，在范祖禹的《唐鑒》卷12—16中，這種描述到處可見。

[[50]](#_50_7)《舊唐書》卷130，第3626—3627頁；《資治通鑒》卷232，第7467—7468頁。

[[51]](#_51_7)參照《資治通鑒》卷232，第7490—7491頁。

[[52]](#_52_7)N.西文：《中國煉丹術的初步研究》（麻省坎布里奇，1968年），第3章。

[[53]](#_53_7)崔瑞德：《唐代的財政制度》，第76—79頁。

[[54]](#_54_7)《資治通鑒》卷233，第7510頁；《唐鑒》卷15，第141—142頁。

[[55]](#_55_7)《舊唐書》卷136，第3747頁。

[[56]](#_56_7)陸贄：《陸宣公翰苑集》卷19，第19—21頁。

[[57]](#_57_7)山本隆義：《唐宋時代的翰林學士》，載《東方學》，4（1952年），第28—38頁；矢野主稅：《唐代的翰林學士院》，載《史學研究》，50（1953年），第63—70頁。

[[58]](#_58_7)崔瑞德：《皇帝的顧問和朝臣陸贄》，第106頁。

[[59]](#_59_7)崔瑞德：《皇帝的顧部和朝臣陸贄》，第116—119；《陸宣公翰苑集》卷22。

[[60]](#_60_7)《資治通鑒》卷235，第7571頁；《冊府元龜》卷667，第2—3頁。

[[61]](#_61_7)《資治通鑒》卷235，第7579—7580頁；《唐會要》卷72，第1295頁；以及卷86，第1582頁。又趙翼《廿二史劄記》卷20，第420—423、432—434頁；唐長孺：《唐書兵制箋證》（北京，1962年版），第102—104頁。

[[62]](#_62_7)矢野主稅：《唐代宦官權勢獲得因由考》，載《史學雜志》，63.10（1954年），第34—48頁；王壽南：《唐代宦官權勢之研究》，第117—143頁。

[[63]](#_63_7)《資治通鑒》卷235，第7575頁；另可參照《唐會要》卷24，第466—467頁。

[[64]](#_64_7)室永芳三：《唐末內庫的存在形態》，載《史淵》，101（1969年），第100—102頁。

[[65]](#_65_7)《資治通鑒》卷233，第7497—7501頁。

[[66]](#_66_7)803年打退了一次關于韋執誼和王叔文搞朋黨政治的指控。見《舊唐書》卷135，第3732—3733頁。

[[67]](#_67_7)《資治通鑒》卷236，第7616—7617頁；《唐大詔令集》卷30，第113頁。

[[68]](#_68_7)見伯納德·S.所羅門《唐順宗實錄》（麻省坎布里奇，1955年）；浦立本：《順宗實錄》，載《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學報》，19.2（1957年），第336—344頁。

[[69]](#_69_7)浦立本：《公元755—805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和新法家》，第139—142頁。

[[70]](#_70_7)浦立本：《公元755—805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和新法家》，第107—113頁。

[[71]](#_71_7)同上書，第110頁。

[[72]](#_72_7)特別是在劉禹錫和柳宗元的思想中辨認出來的唯物主義成分方面是如此。見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4.1卷，第7章。

[[73]](#_73_7)王蕓生：《論二王八司馬政治革新的歷史意義》，載《歷史研究》，3（1963年），第105—130頁。

[[74]](#_74_7)伯托爾德·斯普勒：《突厥人出現以來的中亞史》，載《中亞史》（《東方學大綱》），第1部分，第5.5章，第148—162頁；J.R.哈密爾頓：《九姓回紇與回紇人》，載《亞洲雜志》，250（1962年），第23—24頁。

[[75]](#_75_7)見V.米諾爾斯基《塔明·伊本·巴赫爾在回鶻人中的游記》，載《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學報》，12.2（1948年）。

[[76]](#_76_7)788年起回紇改稱回鶻。——譯者

[[77]](#_77_7)布爾達·埃克塞迪：《北庭的回鶻人和吐蕃人（790—791年）》，載《匈牙利科學院東方學報》（布達佩斯），17（1964年），第88—104頁。

[[78]](#_78_7)佐藤長：《古代西藏史研究》卷2，第675—677頁。

[[79]](#_79_7)佐藤長：《古代西藏史研究》卷，第677—686頁；樊綽：《蠻書》，向達的《蠻書校注》本（北京，1962年），附錄4。

[[80]](#_80_7)彼得森：《中興的完成：憲宗和諸鎮》，載芮沃壽和崔瑞德編《對唐代的透視》（紐黑文，1973年），第151—191頁。

[[81]](#_81_7)對戰爭的記述取材于《資治通鑒》（卷236—241）和《舊唐書》（卷14—15）；另見彼得森《中興的完成》一文。

[[82]](#_82_7)這種問題是安祿山之亂后唐王朝軍事戰斗中習見的事，只有9世紀40年代的戰役除外。見《資治通鑒》卷238，第7671—7673頁；彼得森：《中興的完成》，第162—163頁。

[[83]](#_83_7)《資治通鑒》卷238，第7686頁。

[[84]](#_84_7)彼得森：《815—817年反對中央政權的淮西之戰》，載F.A.小基爾曼與費正清合編《中國的兵法》（麻省坎布里奇，1974年）。

[[85]](#_85_7)崔瑞德：《晚唐的地方自治和中央財政》，第224—225頁。

[[86]](#_86_7)崔瑞德：《晚唐的商人、貿易和政府》，載《大亞細亞》（新版），14.1（1968年），第76頁。

[[87]](#_87_7)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77—83頁。

[[88]](#_88_7)曾我部靜雄：《唐代的貢獻制度》； 日野開三郎：《藩鎮時代的州稅三分制》，載《史學雜志》，65.7（1956年），第464—666頁。

[[89]](#_89_7)《資治通鑒》卷237，第7647—7648頁。

[[90]](#_90_7)松井秀一：《裴垍的稅制改革》，載《史學雜志》，76.7（1967年），第1—24頁。

[[91]](#_91_7)《資治通鑒》卷242，第7799—7800頁。

[[92]](#_92_7)見《資治通經》卷236，第7614—7615頁；《舊唐書》卷14，第411頁。

[[93]](#_93_6)《舊唐書》卷14，第411頁。

[[94]](#_94_6)《唐大詔令集》卷2—5、卷9—10、卷29、卷68—74、卷75、卷79、卷83—86、卷123；《冊府元龜》卷83—91。

[[95]](#_95_6)《唐大詔令集》卷5，第29頁。

[[96]](#_96_5)材料來自嚴耕望《唐仆尚丞郎表》（4卷，臺北，1956年）。

[[97]](#_97_5)《資治通鑒》卷236，第7621頁；卷237，第7630頁。

[[98]](#_98_5)《資治通鑒》卷237，第7626—7627頁；《舊唐書》卷147，第3974頁。

[[99]](#_99_5)例如可看《資治通鑒》卷238，第7683頁。

[[100]](#_100_5)《資治通鑒》卷239，第7713—7715頁。

[[101]](#_101_5)《資治通鑒》卷239，第7717頁；卷241，第7767頁。

[[102]](#_102_5)《資治通鑒》卷239，第7700—7701頁。

[[103]](#_103_5)見崔瑞德在《劍橋中國史》第4卷中關于政府制度的一章；池田溫：《中國的律令和官人機構》，載《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論文集》，Ⅰ：《前近代亞洲的法律和社會》（東京，1967年），第151—171頁。

[[104]](#_104_4)《資治通鑒》卷238，第7692—7694頁；卷239，第7695—7696頁。

[[105]](#_105_4)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系之研究》（臺北，1969年），“表”，第658—669、672—683、730—740頁。

[[106]](#_106_4)《資治通鑒》卷239，第7697—7698頁。

[[107]](#_107_4)例如《資治通鑒》卷239，第7704—7705頁；李絳：《李相國論史集（遺文）》卷4。

[[108]](#_108_4)《資治通鑒》卷237，第7630—7633頁；彼得森：《元稹在四川巡視時對貪污腐化的揭露》，載《大亞細亞》，18（1972年），第34—78頁。

[[109]](#_109_3)李藩即為一例，其傳記見《舊唐書》卷148，第169頁。

[[110]](#_110_3)《新唐書》卷71上，第2179—2244頁；又見《新唐書》卷73下。

[[111]](#_111_3)《舊唐書》卷170，第4416—4418頁。

[[112]](#_112_3)《新唐書》卷54，第1379—1380頁。

[[113]](#_113_3)見池田溫《唐代郡望表——以九、十世紀的敦煌寫本為中心》，載《東洋學報》（東京），42.3—4（1959—1960年），第80、88頁。

[[114]](#_114_3)《資治通鑒》卷240，第7752—7753頁。

[[115]](#_115_3)《資治通鑒》卷239，第7703頁。

[[116]](#_116_3)《冊府元龜》卷665，第8頁。

[[117]](#_117_3)《文獻通考》卷58，第523頁。

[[118]](#_118_3)王壽南：《唐代宦官權勢之研究》，第75—76頁。這個譯法由劉義永（音）提出，見他的《神策軍與宮廷機構，755—875年》，倫敦大學1970年未發表的博士論文。

[[119]](#_119_3)《資治通鑒》卷241，第7776—7777頁。

[[120]](#_120_3)《資治通鑒》卷240，第7754—7755頁。

[[121]](#_121_2)人們可以把憲宗的即位算在里面。見王蕓生《論二王八司馬政治革新的歷史意義》，第112—115頁。

[[122]](#_122_2)《資治通鑒》，“考異”，第7691頁。

[[123]](#_123_2)《資治通鑒》卷242，第7796—7799、7807—7809頁。

[[124]](#_124_2)《資治通鑒》卷242，第7805—7806、7808頁。

[[125]](#_125_2)例如見《資治通鑒》卷241，第7778、7781—7782、7783—7784；卷243，第7828頁。

[[126]](#_126_2)據《舊唐書》卷18第501頁記載：“戊辰，上與內官擊鞠禁中，有內官欻然墜馬，如物所擊。上恐，罷鞠升殿，遽足不能履地，風眩就床。”——譯者

[[127]](#_127_2)見《日唐書》卷650，第3—4頁。

[[128]](#_128_2)也稱“二李黨爭”，因李宗閔和李德裕而得名。

[[129]](#_129_2)例如李家和牛家便是如此。《舊唐書》卷137，第3769頁。

[[130]](#_130_2)《冊府元龜》卷337，第21頁。

[[131]](#_131_2)《冊府元龜》卷337，第21頁；《資治通鑒》卷241，第7790—7791頁。

[[132]](#_132_2)見戴維·尼維森《和珅和他的指控者們：十八世紀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行為》，載尼維森、芮沃壽編《行動中的儒教》（斯坦福，1959年），第220—232頁。

[[133]](#_133_2)特別可看《舊唐書》卷174。

[[134]](#_134_2)岑仲勉：《隋唐史》（北京，1957年），第397—423頁。

[[135]](#_135_2)可是應該注意，李逢吉和裴度兩個人都曾請求立他為太子。《冊府元龜》卷242，第7822—7823頁。

[[136]](#_136_2)《資治通鑒》卷243，第7836—7837頁。

[[137]](#_137_1)同上書，第7851—7852頁；《舊唐書》卷17上，第522—523頁。

[[138]](#_138_1)參照《舊唐書》卷17上，第523—524頁。

[[139]](#_139_1)《資治通鑒》卷243，第7851頁；卷244，第7866、7869、7871—7872、7880—7882頁。

[[140]](#_140_1)礪波護：《從牛李黨爭看中世貴族制的崩潰與辟召》，載《東洋史研究》，21.3（1962年），第1—26頁。

[[141]](#_141_1)礪波護：《從牛李黨爭看中世貴族制的崩潰與辟召》，載《東洋史研究》，21.3（1962年），第10—15頁。

[[142]](#_142_1)嚴耕望：《唐仆尚丞郎表》。

[[143]](#_143_1)《資治通鑒》卷241，第7790頁；《登科記考》卷17，第11—12頁。

[[144]](#_144_1)《文苑英華》卷489，第8—17頁；皇浦湜：《皇浦持正文集》卷3；《唐大詔令集》卷106，第545頁；《登科記考》卷17，第14—22頁。

[[145]](#_145_1)馮承基：《牛李黨爭始因質疑》，載《文史哲學報》，8（1958年），第135—146頁。

[[146]](#_146_1)例如李德裕《李文饒文集（外集）》，載《全唐文》卷708—710。

[[147]](#_147_1)《全唐文》卷682，第10—12頁。

[[148]](#_148_1)例如可看831年的維州事件。《資治通鑒》卷244，第7878、7880—7811頁；又見《李文饒文集》卷4，第6—7頁。

[[149]](#_149_1)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1956年再版），第2編。

[[150]](#_150_1)取得功名和利用蔭庇特權這兩者不是互相排斥的。請看崔瑞德《唐代統治階級的組成：從敦煌發掘的新證據》，載芮沃壽、崔瑞德編《對唐代的透視》（紐黑文，1973年）。

[[151]](#_151_1)《資治通鑒》卷243，第7856—7858頁。

[[152]](#_152_1)《舊唐書》卷167，第4370頁；《資治通鑒》卷244，第7871—7872、7875—7877頁。

[[153]](#_153_1)《資治通鑒》卷245，第7899頁。

[[154]](#_154_1)《資治通鑒》卷245，第7910—7922頁；又見橫山裕男《唐代的官僚制和宦官——中世紀近侍政治的結束序說》，載中國中世史研究會編《中國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的社會和文化》（東京，1970年），第417—442頁。

[[155]](#_155_1)《資治通鑒》卷245，第7923頁。

[[156]](#_156_1)《資治通鑒》卷245，第7923—7924頁；《舊唐書》卷161，第4232頁。

[[157]](#_157_1)《資治通鑒》卷246，第7940—7941頁。

[[158]](#_158_1)同上書，第7935頁。

[[159]](#_159_1)同上書，第7943—7945頁。

[[160]](#_160_1)《資治通鑒》卷246，第7949—7951頁。

[[161]](#_161_1)《舊唐書》卷176，第4557頁。

[[162]](#_162_1)這一點可用嚴耕望的《唐仆尚丞郎表》中的資料予以證實。

[[163]](#_163_1)《李文饒文集》卷10，第9—11頁；《舊唐書》卷18上，第607—608頁。

[[164]](#_164_1)《李文饒文集》卷11，第6—7頁。

[[165]](#_165_1)同上書，第3—4頁；湯承業：《論唐代相制下的會昌政風》（臺北，1973年），第105頁；又見《唐會要》卷64，第1112—1113頁。

[[166]](#_166_1)湯承業：《論唐代相制下的會昌政風》，第105頁；又見《唐會要》卷64，第1112—1113頁。

[[167]](#_167_1)《資治通鑒》卷248，第8020頁。

[[168]](#_168_1)《資治通鑒》卷248，第8009—8010、8020頁；室永芳三：《唐末內庫的存在形態》。

[[169]](#_169_1)《資治通鑒》卷246—247；《李文饒文集》卷13—15；參照山田信夫《游牧回鶻國的滅亡》，載石母田正等編《古代史講座》卷11（東京，1965年），第199—228頁。

[[170]](#_170_1)《資治通鑒》卷247—248；《李文饒文集》卷15—17。

[[171]](#_171_1)《資治通鑒》卷247，第7980—7981頁。

[[172]](#_172_1)賴肖爾：《圓仁游唐記》（紐約，1955年），第237—257頁。

[[173]](#_173_1)《舊唐書》卷18上，第604—605頁。

[[174]](#_174_1)陳觀勝：《會昌滅佛的經濟背景》，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19（1956年），第67—105頁。

[[175]](#_175_1)雅克·熱內：《五到十世紀中國社會中佛教的經濟面貌》（西貢，1956年）。

[[176]](#_176_1)崔瑞德：《中世紀的寺院和中國的經濟》，載《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學報》，19.3（1957年），第526—549頁；崔瑞德：《唐代中國的寺院莊園》，載《大亞細亞》（新版），5（1956年），第123—145頁。

[[177]](#_177_1)《舊唐書》卷18上，第603—606頁。

[[178]](#_178_1)陳觀勝：《中國佛教的改造》，第254—255頁；歐大年：《民間的佛教》（麻省坎布里奇和倫敦，1976年），第3章。

[[179]](#_179_1)《大正新修大藏經》卷49，第386、637頁；《李文饒文集》卷20，第3—4頁。

[[180]](#_180_1)《舊唐書》卷18上，第606—607頁；《資治通鑒》卷248，第8017頁；參照《舊唐書》卷18下，第614—615頁。

[[181]](#_181_1)《資治通鑒》卷249，第8047—8048頁。

[[182]](#_182_1)《舊唐書》卷18下，第615頁。

[[183]](#_183_1)“宣”（Hsüan）與“玄”（Hsüan）在羅馬拼音法中相同，現按照感妥瑪一翟理思拼音體系，在“宣”字拼音上多加了一個“i”字母而成為Hsiuan字，使宣宗與玄宗的拼音有所區別。

[[184]](#_184_1)王讜：《唐語林》卷1（上海，1957年），第7頁。

[[185]](#_185_1)《東觀奏記》（《圖書集成》版）卷1，第2頁。

[[186]](#_186_1)《資治通鑒》卷249，第8075—8077頁。

[[187]](#_187_1)《資治通鑒》卷249，第8073頁。

[[188]](#_188_1)《東觀奏記》卷1，第6頁。

[[189]](#_189_1)《東觀奏記》卷2，第14—15頁。

[[190]](#_190_1)《四庫全書總目》卷51，第15頁。

[[191]](#_191_1)《東觀奏記》卷2，第12頁；《資治通鑒》卷248，第8032—8033頁。

[[192]](#_192_1)《舊唐書》卷18下，第628頁。

[[193]](#_193_1)《舊唐書》卷18下，第627、629頁。

[[194]](#_194_1)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57—58頁。

[[195]](#_195_1)賴肖爾：《圓仁游唐記》，第4—5章。

[[196]](#_196_1)詳見本書下面第十章。

[[197]](#_197_1)《資治通鑒》卷239，第7701—7702頁。

[[198]](#_198_1)佐藤長：《古代西藏史研究》卷2，第600—604頁；李方桂：《公元821—822年唐蕃會盟碑研究》，載《通報》，44.1—3（1956年），第1—99頁。

[[199]](#_199_1)佐藤長：《古代西藏史研究》卷2，第696—699頁。

[[200]](#_200_1)札奇斯欽：《對回鶻馬問題的一個看法》，載《食貨月刊》，1.1（1971年），第21—28頁。

[[201]](#_201_1)《唐會要》卷6，第75—78頁。

[[202]](#_202_1)《舊唐書》卷174，第4522—4523頁；《冊府元龜》卷994，第7—8頁。

[[203]](#_203_1)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第1卷（北京，1957年），第114—120頁。

[[204]](#_204_1)E.H.肖孚：《朱雀：唐代在南方的形象》（伯克利，1967年），第61頁。

[[205]](#_205_1)見同上書中之表，第61—69頁；又見下面第十章。

[[206]](#_206_1)《舊唐書》卷746，第17頁。

[[207]](#_207_1)戴何都：《 868—869年的龐勛動亂》，載《通報》，56（1970年），第229—240頁。

# 第十章 唐朝之滅亡

## 財政問題、鄉村的動蕩和民眾叛亂

只是在884年以后，進入了完全沒落時期的唐皇室，才最終放棄了控制全國的嘗試。在此以前，它從未真正喪失對任何地區的主權，盡管在若干地區它的實際權力已經很少。甚至那些最頑固的獨立地區仍照常采用唐朝的官銜稱號，并經常覓取政府在形式上的任命。這樣，唐王朝甚至在它已經不能實施政令的地區也繼續存在。但是，在“叛亂”地區重建權威必須作出經常的和費用巨大的努力，在外來侵略面前保衛帝國的不可避免的需要，以及甚至在中央政府有效的統治已被嚴重削弱后仍然需要維持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的努力，這些都給王朝實際所能支配的財力帶來了沉重的壓力。這些壓力導致了一系列惡性發展，使情況越來越復雜：從780年到820年，為了支持恢復王朝統一的戰役，農民身受增稅的負擔；從820年到860年，出現了不斷增加的騷動和地方性的盜匪活動；從860年到875年，受到廣泛支持的戍軍暴動發生了，他們認真地試圖在長江下游建立一個獨立的地區政權；從875年到884年，一場大規模的民眾起義爆發了。起義者攻陷了唐朝的首都并占據它達兩年多時間。王朝如今是真正毀滅了。從884年到907年，一批地區性的政權先后建立了起來，其中有一個地區政權給予了唐王朝以致命的打擊。

考慮到這一系列的發展，造成唐王朝沒落的大規模起義似乎是不可避免的；9世紀中期見多識廣的官僚們已經發覺事態及其根源的嚴重性，并向皇帝表示了他們的憂慮。許多傳統的中國學者，以及當代嚴肅的歷史學家，都從將近一個世紀以前便已開始惡化的經濟狀況來探索晚唐民眾起義的根源。

### 唐朝后期財政政策的背景

780年推行的兩稅法并沒有減輕納稅農民的負擔。此法將多種賦稅負擔固定為一年兩次的標準課征，廢除所有其他名目，放棄專賣稅，原意是以此來穩定農民的經濟地位。但在兩稅法實行后其他賦稅仍未停止征收。更為嚴重的是，征收基本稅的方法對農民極為不利，因為正式賦稅是按貨幣計算的（盡管征收時不一定是貨幣），并且計算的標準很高，因為在780年發生過嚴重的通貨膨脹。對于農民來說，不幸的是，8世紀80年代開始的嚴重通貨緊縮繼續了一個很長的時期，在其末期實際上以實物折付的稅額是原來份額的3—4倍。沒有免過稅，也沒有按商品重新調整稅額。理由很簡單，因為政府需要額外的收入來支持德宗（780—805年）和憲宗（805—820年）時期進行的范圍廣大而且花費巨大的國內戰爭。鹽的專賣也幾乎立刻被再次采用，成為中央政府收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進一步加重了農民的負擔。[[1]](#_1_Guan_Yu_Zhe_Xie_Cai_Zheng_Wen)

此外，政府找到了另一種重要財源，即由地方官員以“進獻”為名在固定的節慶之日向皇帝內藏庫進貢。[[2]](#_2_Zhong_Cun_Yu_Yi_Dui_Ci_You_Zh)這樣的貢獻在設立兩稅法以前不久曾被廢除，但很快被恢復，并成為更多的非法賦稅義務的一個來源，這些“進獻”成了政府收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地方官員以此來博得皇帝的恩寵，例如有一個最獻殷勤的官員每日向宮廷“進獻”。像所有其他賦稅的來源一樣，“進獻”最終也是從備受壓迫的農民身上榨取的。

以上這些稅項和其他臨時的開征，再加上普遍的增稅，為憲宗重建中央集權的成功的政策提供了資金。但是他的努力卻使政府的財政空虛，他的繼承者發現政府必須采取一系列經濟緊縮措施，包括大量精簡由政府維持的軍隊。

### 社會不安和反抗的增長

雖然憲宗的繼承者們沒有像他統治時那樣要支出大量軍費，但是，不僅對鹽，而且對茶、麯和酒的專賣收入繼續增加。[[3]](#_3_Ku_Min_Yi____Huang_Chao_Zhi_P)為了逃避賦稅而拋棄自己土地的農民不斷增多，他們成為鄉村地主日益增大的莊園的佃戶；這種被庇護的佃戶不為政府賦稅所擾，從而給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和財政問題。然而，政府并沒有減少地方的稅額，反而干脆采取一種“攤派”或“均攤”政策，即讓每個逃亡農民的賦稅負擔分派在他的同村人身上，這樣一種露骨的連坐辦法使已經惡化了的事情更加不可收拾。

9世紀的40年代和50年代相對來說是穩定的和平靜的。但是有種種跡象表明，政府已陷入嚴重的經濟困難之中。845年武宗滅佛的部分原因是為了解決這些緊迫的財政問題。在宣宗統治時期（847—860年），政府每年平均收入（包括兩稅和鹽、茶、酒專賣在內）為922萬緡。但這比通常和平時期歲出尚差整整300萬緡，因此，就必須預征以后年份的賦稅來彌補虧空。[[4]](#_4___Xin_Tang_Shu____Juan_52_Di)專賣稅繼續全面推行，但是弊端和有組織的逃稅造成了政府實際收入的下降。

在9世紀前半期，最沉重的租稅負擔落在富饒而且經濟上進步的長江下游地區。結果是極為悲慘的，因為那個如此富饒和安全的地區被壓榨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這個事態的發展對于唐王朝來說是最嚴重的。長江下游流域一般是不受外來敵人威脅的“安全”地區，自然資源豐富，特別重要的是這一地區效忠王朝，享受幾乎連續不斷的長時期和平。在安祿山之亂以后，由于失去了對豐饒的華北平原的控制，唐朝政府對長江下游地區的依賴加深了。在憲宗時期，這是唯一照章納稅的地區，而且政府有把握經常從那里榨取到額外的收入。這個地區承受的特別增添的兩稅份額多于他處。在宣宗統治下東南地區的財政負擔進一步加重了。

唐朝政府不斷接到警告說，它的政策正在導致東南地區的不滿和騷亂。835年，一件關于將茶林移植到官辦場圃中的建議在茶葉生產者中間激起了強烈的反對，有人勸告政府說，強制推行這一計劃“止有盡殺使人，入山反耳”。[[5]](#_5___Ce_Fu_Yuan_Gui____Juan_510)這一建議于是不得不放棄。在文宗統治（827—840年）的最初年代里，民間的騷亂已經蔓延開來。831年，長江中游鄂岳觀察使設置一支特殊的武裝，為的是攻打活動于他的轄地以內的江上盜匪。842年，一道大赦詔令表明，在長江地區存在嚴重的盜賊活動，詔令指示官員們應嚴密防備。[[6]](#_6___Quan_Tang_Wen____Juan_78_Di)在845年發布的另一件大赦詔令中，將盜賊和活動于整個地區的私鹽販相提并論。[[7]](#_7_Tong_Shang_Shu__Di_17__18Ye)私鹽買賣的所得用來供更高一級非法活動使用，用來支持盜賊的活動，許多不堪忍受沉重賦稅和遭受剝削的鄉村貧民參加了盜賊的隊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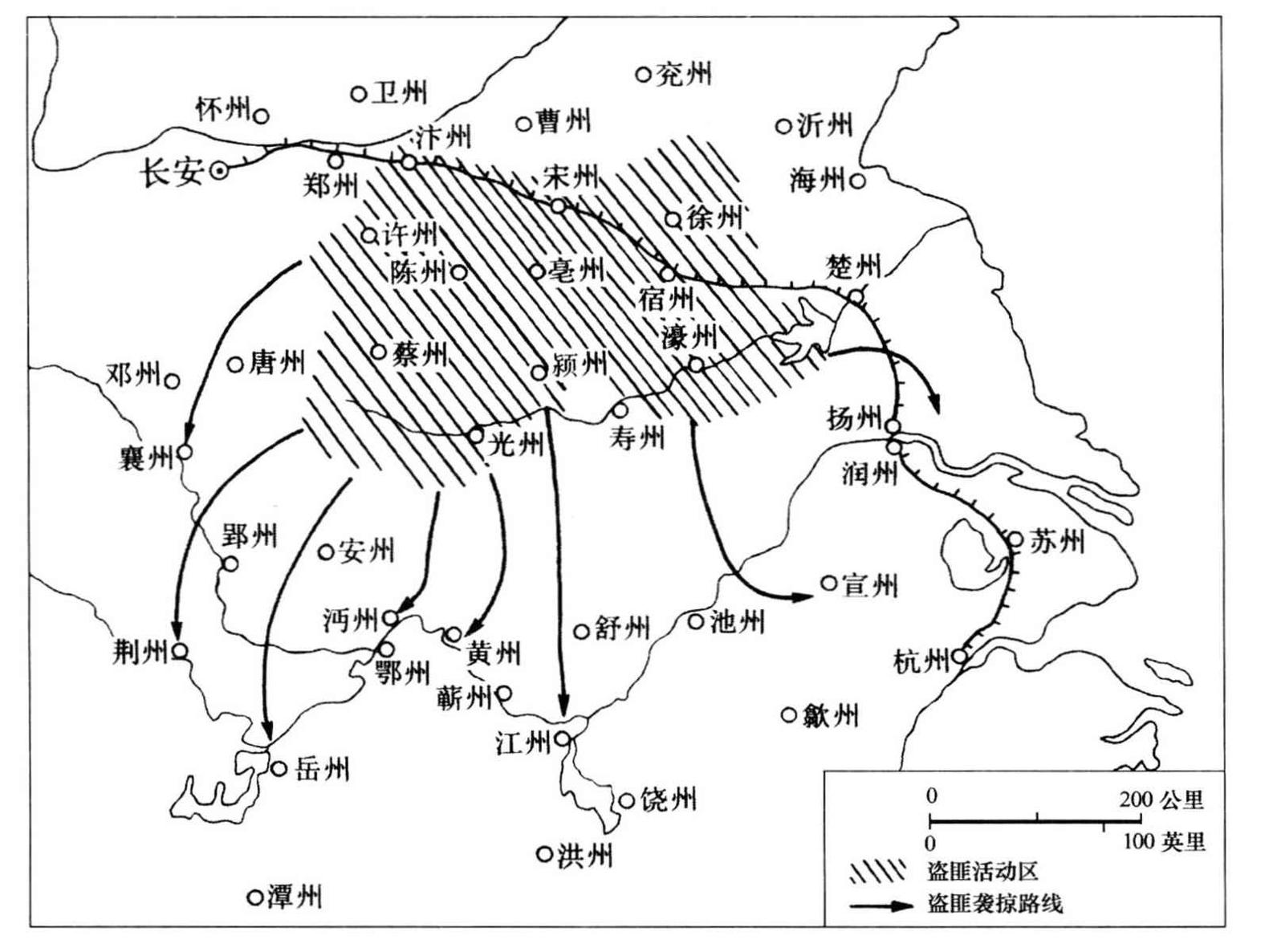
845年，杜牧給宰相李德裕寫了一封信，詳細敘述了活動于長江流域的水陸盜賊的情況，指出他們給居民和在那里經商的商人所帶來的恐怖，以及他們的活動給國家收入造成的嚴重損失。這種股匪通常由百人組成，其中包括許多來自北方的人。來自宣武和武寧（在河南）的盜匪襲擊長江下游地區，而來自忠武和淮西的盜賊則活躍于長江中游流域。在擄掠到贓物以后，由于長途運輸有危險，他們便等到茶葉收成時假扮商人用搶來的貨物換取茶葉；然后他們將茶葉運回故鄉，在那里很容易賣掉而不會引起猜疑。這樣的盜匪集團的特征在當代的許多傳奇和詩歌中有生動的描寫，但在正式的官方資料中卻很少能看到。

政府制訂了嚴厲的措施，試圖抑制盜匪活動和非法貿易。對黑市買賣的懲罰是嚴厲的，包括處以死刑。走私商人因此相應地將自己武裝起來，到9世紀30年代中期已能以武力與政府相對抗。840年，負責征集長江流域賦稅的鹽鐵使在一份奏疏中指出，盡管法令是嚴格的，但很難實行，部分的是因為走私者和商人以及官辦市場（場鋪）的官員三者之間有著密切的勾結。[[8]](#_8___Quan_Tang_Wen____Juan_967_D)武裝起來并有經濟基礎維持其活動的“盜匪”，有不斷增多的農民加入他們的隊伍。但是，賦稅“攤派”的政策繼續實行，使所有村莊敗落，村民或則投靠已有的盜匪集團，或則另立新的山頭。

### 南方戍軍起義的爆發

盡管長江下游的騷亂和盜匪活動日趨增加，政府仍然盡力在該地區搜刮盡可能多的賦稅。858年陰歷七月，皇帝的私人隨從張潛堅決反對政府以大量國庫收入的“羨余”作為估價每年政績（課績）以及將來任命長江下游各地節度使的依據。這種“羨余”是上交給皇帝內藏庫的，等于在8世紀后期已成為一項正式收入來源的“進貢”的另一種形式。在唐代后期內藏庫漸漸變得如此富裕，以至經常要從它那里將資金轉移到正式的國庫中去。張潛警告說，公開堅持取得這些額外收入必將在兩方面引起巨大的動蕩不安：一是會引起被削減了餉金的地方戍軍的動亂；一是普通百姓會惶惶不可終日，因為他們將被迫承擔更重的賦稅。

事實立即證明張潛是正確的。856年，中國南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暴動，幾乎一夜之間便從這個國家的最安定地區之一轉變成為最富有爆炸性的地區。那一年的陰歷四月至七月間長江流域有三次戍軍暴動。其他地區也是不安定的。858年安南發生了一次動亂，第二年屯駐在重要的運河沿線的彭城的武寧戍軍暴動，彭城多年來是一個孕育不滿情緒的中心，這次暴動是那里10年當中的第二次。



地圖18 9世紀30和40年代受盜匪活動影響的地區

戍軍暴動并不是最危險的因素；以前也發生過，政府有種種行之有效的辦法對付它們。但更不祥的兆頭卻是普遍的社會和經濟的動蕩不安，因為這些跡象威脅著整個社會結構。政府充分注意到水上和陸上的盜匪問題，但是基本的戰略問題使它很難得到長期的解決辦法。

唐朝長期奉行的一項政策是在南方只保持小量的軍隊，因為它不無道理地害怕大量軍隊可能導致獨立并接管該地區的生死攸關的的財源。唐朝的基本戰略仍是將它的絕大多數軍隊集中在京師周圍和大運河沿線的重要據點。長江下游地區有幾次派駐大量軍隊均與特殊的危機有關：756—757年，玄宗之子永王李璘之亂；8世紀80年代的幾次地方暴動；807年的李璘之亂。但一旦狀況改善，軍隊立即撤走。在其他情況下，南方的觀察使只保留小量的軍隊用以控制規模不大的騷亂。可是，當858年宣州發生以康全泰為首的最嚴重的叛亂時，軍事化的進程再次開始，在此期間政府被迫在鄰近的浙西重建鎮海軍。這是將近50年中在該地區建立的第一個節度使職位。

康全泰的叛亂對于歷史學家來說是意義特別重大的，因為它揭示了唐代后期地方一級權力結構發展的重要方面。[[9]](#_9_Guan_Yu_Zhe_Ci_Pan_Luan_Jian)康全泰本人是地方上的一個微不足道的罪犯，最后在宣歙觀察使的幕府中得到一個職位。他的名字與叛亂發生關系僅僅是因為他領導起義是被迫的。真正的煽動者是地方精英人物，即通常所稱的形勢戶，他們和地方當局之間已發展了密切的聯系。一個名叫李惟真的富有而又上了年紀的商人買了幕府的一個軍職，為的是能免除賦稅和法律起訴（影蔽）。為了這樣的原因購買地方官職在唐代后期是很普通的事情。李惟真壓制地方的貿易，甚至組織平民，可能是讓他們充當一種私人武裝。另一個煽動者是個地主，他被任命為地方的討擊使。他利用那個職位無恥地大撈好處，當他關閉了水閘門使水流向自己的土地時，130家的土地因此得不到灌溉。他的兒子公然殺人，雖被監禁但竟免一死。試圖釋放他這個被囚禁兒子的行動激起了叛亂。這是一種明目張膽的腐化瀆職行為，即通過秘密的私下成交能夠買到地方軍職和廣泛的豁免權。當這種豁免權受到威脅時，地方社會上有影響的成員和地方軍事勢力之間的聯系能夠很容易地發動一場叛亂，就像此時在宣州發生的把觀察使趕走之事那樣。在該地區慘遭搶劫，軍隊紛紛從淮南和浙東調進以后，宣州的秩序才在858年末恢復。[[10]](#_1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2)成為宣州騷動基礎的這個一般模式很難說是唯一的，它清楚地證明了唐代后期地方官員們被迫在腐敗的和微妙的環境中活動的情況。當時的政治家確實有充分的理由主張縮減地方軍官的數量。

裘甫叛亂

康全泰暴動對于隨后在859年發生于浙東一帶更為嚴重復雜的叛亂來說不過是序曲。裘甫是一個出身微賤的盜匪頭目，他所領導的叛亂在唐代后期首次短暫地將大量的農村盜匪團伙融合為一支統一的軍事政治力量，將被壓迫的農民組成一個戰斗集體。[[11]](#_11_You_Guan_Zhe_Ci_Pan_Luan_De)雖然裘甫叛亂在爆發之后一年之內便被鎮壓下去，但它卻為15年后發生的黃巢叛亂打下了基礎。

裘甫的名字首次出現于859年后期，他是作為活動于浙東中部的一個盜匪團伙的頭目而被提到的。幾個月內，盜匪——他們還不能稱為叛亂者——襲擊了浙東的大部分地區，從北部的明州直至南部臺州的天臺山脈。下一年正月，他們向北轉移，攻占杭州灣正南的剡縣，以此作為他們的指揮部。剡 縣是浙東觀察使理所越州的一部分。當地的地方戍軍在四年前曾發生兵變，現在不到300人，裝備很壞，不可能與數達千人以上的裘甫隊伍對抗。政府把該地區全部可用的軍隊集結在一起，其中包括那些駐守在海邊城塞防備日本或新羅經由海上來襲的軍隊。但是裘甫的將士被證明是優秀的隊伍，政府的軍隊一經接觸就被打垮。裘甫勝利的消息迅速傳播開來，“于是山海之盜及他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云集”，參加他的隊伍。這支組織松散的隊伍仍是在裘甫全面領導下的各獨立團伙的集合體，此時數量已過3萬。他的動向成為其他地區團伙注意的焦點。860年陰歷五月，一名諫官向登上皇位不過數月的懿宗解釋起義為何發展如此迅速時說：“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所在群盜，半是逃戶。”

裘甫的成功使他有信心開始采取步驟控制這一地區。他將3萬名支持者組成32隊，并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為了創造一種正統的氣氛，他宣布一個新的統治時期開始，行用鑄有“天平”字樣的印信。他貯存物資，雇用工匠制造武器，在地方上甚至在中國北方都引起了強烈的恐慌。

政府的最初反應是采用它前一年在康全泰起義時期曾經成功地采取過的措施。它從北部浙西和西邊的宣歙派遣支援部隊，但是各地軍隊低落的士氣和松弛的紀律使得他們不能成為一個整體，同時他們對于金錢和晉級保證的要求增加了普遍的苦惱。該當得到懦夫之稱的該地觀察使被召回京師，授予太子賓客的閑職。

860年的最初幾個月是戰局前途不明的時期，因為每一方都在籌劃自己的戰略。唐朝的官員清楚地理解他們在鎮壓起義的戰事中面臨的困難。浙江的復雜地形提出了特殊的問題：它的海岸線有無窮盡的海灣和入海口，巡邏困難，而舟山群島的海上島嶼又能在盜匪需要時為他們提供庇護。攻取這樣困難的地區需要一個有經驗的軍事戰略家的全部才能。由于在京師的武將中似乎沒有這樣的人選，所以決定派遣安南都護王式前去。

王式無疑是當時唐朝最重要的軍事將領。[[12]](#_12_Wang_Shi_De_Chuan_Ji_Jian)他已在兩個方面建立了不容輕視的聲譽：在北方，他在晉州（山西中部）的嚴密防御措施曾保衛京師，使之不受來自內蒙的侵犯；在遙遠的南方，他被派去平定852年在安南發生的起義。王式現在奉命前往長安討論如何處理浙東的局勢。當皇帝詢問他的應付方略時，王式答道：“但得兵，賊必可破。”此語表明，一場大戰役將是代價高昂的。王式的回答是簡單的，也無疑是正確的：如果不能迅速重建對該地區的控制，那么，長期的費用將遠遠超過任何出征的開支，而且丟失該地區對于整個政府來說將是一個難以估計的挫折，并將使京師官員和士兵的俸祿和軍餉都難以為繼。皇帝相信這一前景，便指派忠武、義成和淮南各地的軍隊作為王式的基本隊伍。由于知道起義者有騎兵，王式也把數百名吐蕃和回鶻的騎手調到了他的指揮之下，這是這些外族軍隊首次被用于如此遙遠的南方。

在起義者一方，裘甫的一個將領劉暀知道王式用不了40天就可到達任所，他便提出了一個占領全部東南地區的大膽計劃。首先應攻取浙東首府越州；沿錢塘江建立阻擋政府軍前進的堡壘，爭取時間招集一支船隊。然后他們能經浙西用船渡過長江，掠取淮南首府，即該地區最富饒的城市揚州。戰利品可以運回浙西，他們能夠在浙西等待來自南方其他地區的進一步響應。在此期間，他們的船隊能夠轉向福建。顯然，對于裘甫來說這是奢望，他告訴他的那個有才氣的戰略家說：“醉矣，明日議之！”一名參與起義的策劃與指揮的地方紳士王輅（他是一名進士）提出了一個遠為慎重的計劃。王輅極力主張，由于中國當時仍普遍和平安定，實現劉暀的有雄心的計劃將是很困難的。他為他的謹慎行動論證說，孫權能夠在3世紀時于東南建立吳國只是因為漢朝的中央權力已經全面崩潰。他爭辯說，最保險的計劃是采取守勢，占有若干戰略地區，在那里陸耕海漁以自給，而且在必要時可退入海島。

結果是裘甫不能對這兩種計劃予以抉擇，最后被擊潰了，盡管也進行了許多艱苦的戰斗。王式不負所望，表現了杰出的戰術和組織才能，能應付所有危急事宜。他對他手下那些形形色色的隊伍提出嚴厲的紀律要求，并用極端嚴酷的辦法來懲治違紀行為。他將老百姓組成民兵，并在越州治地宣布戒嚴。由于了解到起義的迅速發展部分的是農民中間的饑荒引起的，王式便在幾個縣打開官倉供應糧食。他的由正規步兵和騎兵組成的強大軍隊，以及幾千名新組成的民兵（土團），包圍了起義軍，而他的水軍則切斷了起義者向海上撤退的通路。起義軍進行激烈的抵抗，甚至他們的婦女也是如此，但終于被擊潰。860年陰歷六月，裘甫被俘后送往京師，無疑被公開處死。

裘甫起義源自政府的剝削和民眾的反抗，但反抗的性質很復雜。它顯然不單純是農民困苦境遇引起的零零星星的爆發。裘甫的支持者包括社會的各個階級，從地方上受過教育的名流到貧困的農民、無用的人和他自己團伙的成員。基本戰略是經過精心考慮過的，起義的領導者們在政治上是精明的，至少有數人受過相當良好的教育。這次起義通常被人引證作為黃巢起義的先驅，也許在某些方面確是如此。但必須指出兩次起義之間有著巨大的差異。裘甫起義有一個明確的地理中心，事實上沒有證據證明他和他的同伴曾想越出長江下游地區。黃巢則采用一種完全不同的形式，他在把目標轉向京師以前，曾率領軍隊持續數年進行長達數千里的史詩性的進軍。與黃巢起義的最初階段相比，裘甫起義還是有計劃和有組織行動的一個典型。如果及早決定按劉暀的計劃行事，裘甫有可能成功，盡管王式顯然是個可怕的對手。也許還值得注意的是，在裘甫起義被鎮壓之后不到30年，晚唐的第一個獨立國家建立于浙江，以羅平（長江下游的圣鳥）為名，而裘甫就曾以此為年號。該政權至少和黃巢起義一樣，也與裘甫起義有著一種真正的歷史聯系。

邊境問題：四川和安南

在長江流域發生動亂的同時，唐朝在它將近2000英里之外的西南邊境上面臨著來自南詔擴張主義政權的嚴重威脅。南詔的基地在大理平原，正處于云南西部湄公河上游之東。此地海拔7000英尺，東西由高達14000英尺的險峻山嶺保護著，南北則是很容易防守的峽谷通道，它的地形幾乎是堅不可摧的。這個平原極其富饒，它與洱海相接，洱海范圍不大，長只有30英里，寬不超過3英里。從漢朝以前起，這個地區為處于文化發展先進階段的非漢族建立國家所占據。[[13]](#_13_Guan_Yu_Nan_Zhao_Ren_De_Zhon)在唐代，它的人口必已相當可觀。

7世紀末，來自新統一的富有侵略性的吐蕃王國的壓力促使地方的首領們臣服于中國，作為唐朝的藩屬，這些集團之一在8世紀的三四十年代實現了對其他集團的統治，并迅速建成組織良好的南詔國。8世紀50年代初，唐朝試圖征服該地區，但未成功。8世紀的后半期南詔與吐蕃聯盟，在794年以前對唐朝邊境構成嚴重威脅；794年，它被說服恢復了對中國的臣屬地位，這種關系名義上維持到9世紀的50年代。然而，在9世紀初，南詔已開始了一個積極擴張的時期。800年，它迫使上緬甸的驃國臣服于己，832年攻下了位于伊洛瓦底江下游的都城舍利佛城。它還開始對最鄰近的漢人居地四川發動侵略。

四川在9世紀上半期反復遭受外來的襲擊，首先是吐蕃，然后是南詔。829年，地區的首府成都被洗掠，大片土地淪于荒蕪。襲擊的迅速和規模使唐朝震驚，包括一支京師主力部隊在內的軍隊從中國中部和北部移駐那里，用以防止訓練很差而且不忠誠的地方戍軍放棄整個地區。在此以后，李德裕加強了地方的防御，云南和四川之間的邊境在隨后30年內仍保持穩定。

南詔對四川的攻勢受阻，并被北方吐蕃的威力所懾，便開始對南方虎視眈眈，它不但進入緬國，而且也指向東南的中國安南和嶺南地區，雖然它們之間阻隔著崇山峻嶺。盡管交通困難，南詔仍能調動大量軍隊進攻安南，給唐朝提出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在四川，朝廷關心的是可能失去一個與朝廷有密切政治聯系的富饒地區。在安南，關心的性質則全然不同，它更多是為了威信，特別是貿易，因為南部港口是通過繁榮的海岸貿易而和長江下游港口聯系起來的國際海運貿易的中心。中國對經過中亞通往西方的陸上交通的控制仍很不穩定，朝廷對喪失南方的任何可能性都不得不予以認真考慮。主要憂慮是對海路貿易的最大中心廣州可能出現的威脅。

846年，有記載說安南出現了一些小規模的部落的襲擊，襲擊根源在于南詔。9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地方的騷亂日益嚴重，這主要是中國官員剝削和苛待土著居民造成的。其結果是安南人積極尋求南詔的幫助，而南詔立即開始對該地區發動大規模的襲擊。

859年，南詔形式上對中國的依附顯然已告終結。當時一名中國使節被派去傳達宣宗去世的消息，南詔對待他的態度表明，它已不再愿意與中國處于不平等的地位。當使節要求為逝世的中國皇帝舉哀時，南詔回答道，它最近也失去一位統治者，但中國并未因此舉哀。在故意怠慢中國使節之后，它便把他打發回長安。緊接著，南詔統治者自稱大理國皇帝。

南詔的侵略開始時，中國在南方的防御極差。858年，在嶺南發生了一次成功的戍軍起義，并有再次發生的危險。然而，眼下主要令人憂慮的是更南面的安南。政府任命王式為安南都護（這個任命在上述王式被派往浙江以前）。王式在安南的短暫任職期間是完全成功的，他至少暫時控制了局面。他在地區首府交州（今河內）的設防證明是令人生畏的，致使南詔侵略者“一夕引去”。然而，在王式被調去浙江處理裘甫起義之后，南詔對安南的攻擊取得較多的成功；861年，侵略者最后拿下了交州，但愚蠢地未予設防。下一年，中國軍隊重新收回交州，但在此過程中戰斗的規模令人不安地升級了。

在唐朝最后但非決定性地平定它的南部邊境以前，它和南詔之間繼續了數年之久的大規模戰斗已消耗了大量的金錢和人力。862年，從中國中部和北部的八個最大藩鎮中選出3萬軍隊前往南方輪戍。這些軍隊由曾經防守北方邊境的富有經驗的湖南觀察使蔡襲統率。

南詔在這一年年終發起了另一次大攻勢，該地區的大規模戰事通常限于冬天進行，因為此時炎熱的天氣較能忍受：它派遣了5萬軍隊深入安南。下一年（863年）初，他們又一次攻下交州，迫使中國人撤回今之廣西。這次出征的南詔軍隊中包括許多從它的臣屬驃國征募來的戰士。中國人繼續從更加遙遠的地區征調軍隊前去增援。[[14]](#_1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唐朝在安南的作戰和在嶺南建立牢固的防御耗費很大，但最后是成功的，盡管在9世紀60年代初有過失敗。當高駢在864年被指定統率在安南的中國軍隊時，轉折點來到了。像他以前的王式和蔡襲一樣，高駢在防守中國北部邊境方面已有相當多的經驗。866年，他獲得一場對南詔軍隊的巨大勝利，重新攻克交州并在它周圍建造了一道大城墻。866年以后，南方邊境相對平靜，盡管在9世紀80年代前唐朝戍軍數量不可能很大，而且屢因逃亡和兵變而遭到削弱。南詔在安南遭到挫折，便轉而進攻四川，直至9世紀70年代中期高駢接管四川的防務時為止；和在安南一樣，他在那里的作為證明也是有效的。875年以后，南詔不再是中國領土的嚴重威脅。880年，在朝廷中進行了一場針鋒相對的激烈辯論以后，唐朝決定與南詔聯姻，盡管此事從未真正實行。[[15]](#_15_Guan_Yu_Zhe_Ge_Wen_Ti_De_Zha)

龐勛叛亂

唐朝和南詔之間近10年的戰斗使中國人在幾個方面都花了很大的代價。人員傷亡是很明顯的。但是經濟的花費也很巨大，因為南方軍隊要求內地藩鎮經常增援和需要守衛邊境的大量物資。鑒于嚴重的經濟壓力和社會騷亂已使政府處于困境，對于人力和物資不斷增加的要求在形勢日趨惡化的時候是無法滿足的。

對嶺南和安南軍隊的供應首先要通過國內路線運輸，主要經由靈渠輸送。[[16]](#_16_Xiao_Fu____Zhu_Que__Tang_Dai)但是很快便發現這些國內路線是不夠的，862年，政府接受建議，改由海道向安南運輸給養。對于南方租賦握有大權的鹽鐵使在長江地區包租船只，將物資運往南方。所需谷物從已經遭受嚴重經濟苦難的淮河和長江下游各地征收，有些還征自較遠的北方沿大運河邊的河南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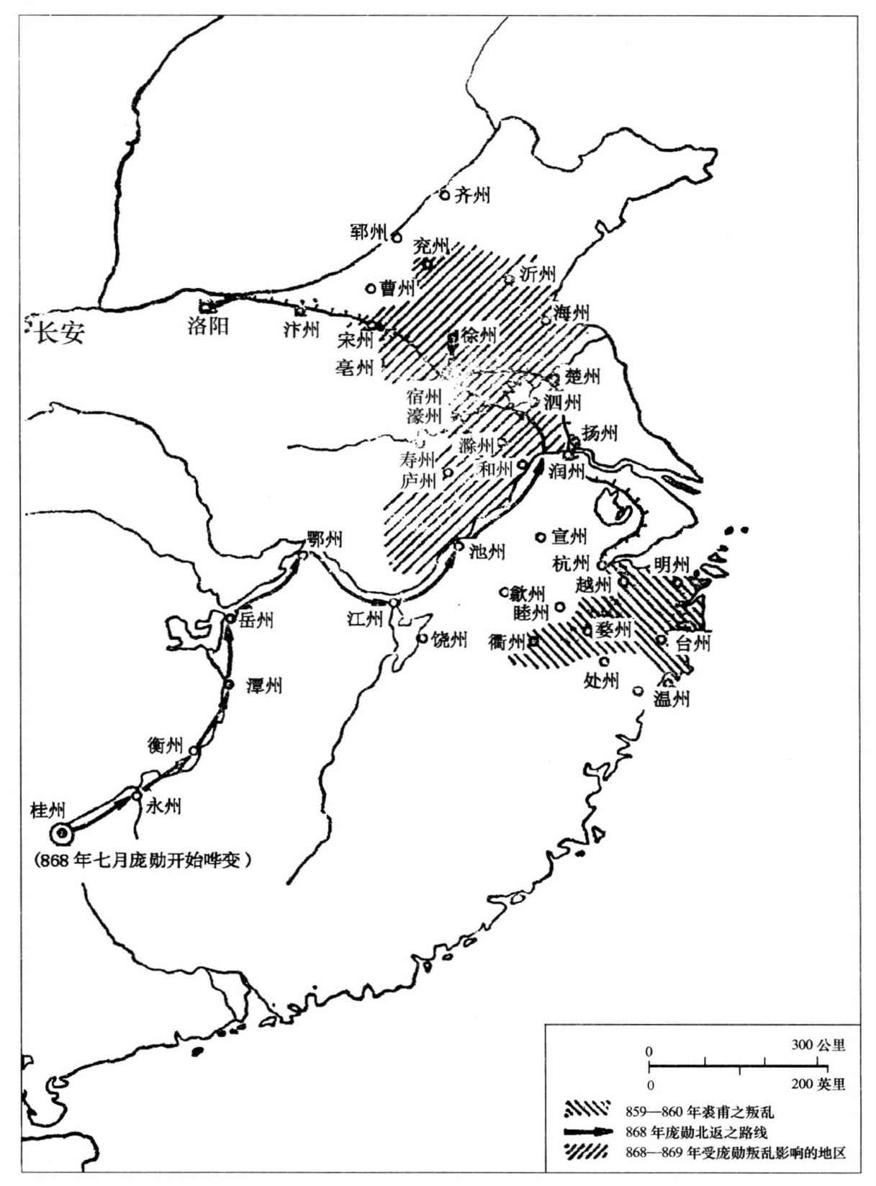
這些較北的地區比起江淮地區來當然更為貧困，那里不但遭受沉重的賦稅之苦，而且容易發生破壞性的自然災害。858年秋天，嚴重的水災遍及整個大平原；大運河沿岸人口眾多的徐州和泗州被洪水淹沒，數萬戶家庭被毀。862年夏，淮南和河南的許多地方發生旱災和蝗災，其結果是普遍的饑荒。然而，正是在那一年，運往南方的人力和物資主要是從這些地區征用的。下一年又發生了一次黃河大水災，波及從洛陽到淮河地區的泗州之間成千上萬平方英里的廣大地區。[[17]](#_17_Guan_Yu_Zhe_Xie_Zi_Ran_Zai_H)這些自然災害加上不合時宜地征發供應南方軍隊的糧食，無疑導致人民的普遍困苦和社會大規模的動蕩不安。

從這些地區派往南方的戍軍造成了9世紀60年代最嚴重的暴動——龐勛叛亂。[[18]](#_18_Guan_Yu_Zhe_Xie_Pan_Luan_De)雖然起義發生于遙遠的嶺南，但它的根源在武寧，這是一個緊要的戰略地區，位于今天的山東、河南、江蘇和安徽交界處。汴渠是長安取得迫切需要的長江下游流域財富的生命線，它朝東南流經武寧。為了保衛這條供應線，此地由重兵戍守。

從9世紀初開始，那里的戍軍已經周期性地發生兵變。政府經常設法恢復秩序并先后指派幾個武寧的節度使，但是他們對地方戍軍的權威是不可靠的。在9世紀整個上半期，武寧仍是一個有問題的地區。

武寧在849年、859年和862年陰歷七月發生一次次新的戍軍暴動。政府決定，唯一可行的途徑是使該地完全非軍事化，并置于觀察使管理之下。862年由于動員了2000名士兵前往嶺南戍邊，當地戍軍已經減少，留下的軍隊起來鬧事，似乎可能是他們之中有那么多人被遣往南方的決定引起的。為了鎮壓兵變，政府派去了它的最強有力的統帥王式（他在撲滅裘甫起義后二年仍駐在浙江）。當帶著鎮壓裘甫的令人生畏的軍隊進入武寧治地彭城以后，他立即采取嚴酷的手段，將大批戍軍處死，并將其余的人解散。863年陰歷四月，一道詔旨命令將彭城變成“文都”，并將它置于北邊的充州管轄之下。

但是事情遠未解決，它只是產生了新的更加麻煩的問題，從城市逃亡或被遣散的城市士兵成為盜匪，使周圍的地區感到恐怖。下一年，即864年，朝廷在該地區宣布大赦，并允許所有愿意重新入伍的前軍人前往嶺南服兵役，然后可能轉到北方的正規軍中。但計劃是去重建武寧軍，還是把軍隊駐屯他處，則不得而知。事實是有3000人投降，并被送往南方，和兩年前遣送去的2000名武寧軍士兵會合。認為麻煩將會因此而結束的任何愿望證明是過于樂觀的。868年，即在和南詔的敵對行動結束之后兩年，關于862年來自武寧軍的部隊應在三年服役期滿后北返的諾言又沒有兌現。據說這是因為官府沒有足夠的錢將士兵們遣返回鄉。868年陽歷七月，屯駐桂管（嶺南西北）的800名武寧軍士兵在他們的糧料判官龐勛領導下嘩變，開始回軍北返。[[19]](#_1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



地圖19 裘甫和龐勛之亂

朝廷決定對此次暴動予以赦免，允許士兵們在護送下返回家鄉，但條件是他們應在湖南放下武器。士兵們已經照辦，但他們懷疑朝廷的赦免可能只是一種使他們喪失警惕的詭計，還懷疑朝廷將在他們返回武寧途中加以襲擊，或在轉回途中將他們處死，因此他們采取措施重新武裝起來。他們乘船航行到長江口，進入淮南，當時該地歸節度使令狐绹管轄。令狐绹的屬官們力勸他粉碎龐勛一伙，他們認為這是相當容易的。但是令狐绹拒絕采取任何行動，只要龐勛不在“長淮以南”引起麻煩，對于其他地方發生什么事情他毫不在乎。他宣稱：“余非吾事也。”他派遣使者前去龐勛處試圖安撫造反者，甚至供給他們食物。令狐绹讓龐勛團伙和平通過他的轄地的決定受到了后來若干中國歷史學家的嚴厲批評，他們認為此事就一位前宰相來說是不可理解的玩忽職守。[[20]](#_20_Zui_Tan_Lu_De_Pi_Ping_Jian_S)但是，在長江下游和淮河流域普遍存在著不安和緊張局勢，同時鑒于令狐绹自己和朝廷的緊張關系，他的決定似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龐勛在868年陰歷九月進入武寧，從以前的戍軍袍澤中尋求支持，未遇到什么抗拒。他們的隊伍立刻超過1000人，但直到此時這仍是一次純粹的軍隊暴動。龐勛要求撤換一批他們憎恨的軍官，并以822年王智興在武寧叛亂的先例為自己的行動辯解；王氏的叛亂開始了該地的周期性動亂。觀察使拒絕撤換軍官，一切軍事對抗隨之而來。陰歷十月，龐勛拿下了宿州城，他的人馬在那里大肆劫掠。數千名當地農民參加了叛軍。當龐勛抵達武寧治地徐州時，住在城外的農民燒掉了城門。叛軍俘獲了觀察使，殺死了他們憎恨的軍官。龐勛進入徐州之后開始獲得大批追隨者，支持他的人來自廣大地區。參加他的隊伍的人有今天的山東以及淮西、淮南和往南遠到浙江的盜匪，還有當地的農民以及一些受過教育的紳士。一名地方名流從鄰近地區帶著自己的3000人前來投奔，龐勛名之為“義軍”。[[21]](#_2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戰斗延及十余州，北至山東，南到淮南。盡管這時已有普遍起義的真正可能性，但龐勛仍用比較克制的和傳統的方式來考慮問題，他僅僅希望由于他的勝利而被任命為武寧節度使。即使是為了實現這樣有限的目的，他仍必須迫使更多的人參加他的軍隊，并征用地方紳士和商人的財產，而在此過程中經常發生重大暴行。此外，他的士兵毫無紀律可言，一旦唐朝軍隊對他發動強有力的攻勢，農民們很快便拋棄了起義者，隨后離開的是龐勛自己的屬官和支持他的紳士。

在經過一年的戰斗以后，龐勛叛亂在869年陰歷九月最后被鎮壓下去。鎮壓起義者的戰役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政府依賴外族軍隊支持的程度。唐軍統帥康承訓要求并得到皇帝允許，從吐谷渾、達靼、契丹和沙陀突厥三部落招募外族軍隊。外族的領袖們還被授予重要的指揮權：提供3000騎的沙陀首領朱邪赤心還指揮中國十鎮所提供的討伐軍。在這場戰爭中沙陀突厥扮演了一個特殊重要的角色，甚至一度救出陷入叛軍包圍之中的唐朝統帥。在叛亂平定之后，朱邪赤心得到賜姓名為李國昌的榮譽。[[22]](#_22_Guan_Yu_Shi_Yong_Wai_Zu_Jun)他的兒子李克用后來在黃巢造反時拯救了唐朝，并進而建立了后唐王朝。

與南方的裘甫起義相比，龐勛叛亂更像是黃巢起義的真正先驅者。由于它是一次始于中國遙遠南方的戍軍發難的暴動，所以不那么有名。然而，最后導致唐朝崩潰的許多潛在問題和力量在龐勛叛亂中變得很明顯，并以更嚴重的方式很快在王仙芝和黃巢領導的大規模叛亂中重新表現出來。

## 懿宗（859—873年在位）統治時期的朝政

859年，宣宗在這些陰暗的事件當中死去。這被普遍認為是唐王朝的巨大不幸，因為宣宗盡管偶爾表現出嚴酷和褊狹，但是他聰明，處事公正，樂于接受臣僚的勸告，能夠自我克制，而且生活節儉，因而獲得了廣泛的聲譽。朝廷中許多人認為——特別是在回顧他當政時——他是一個偉大的皇帝，幾乎是太宗第二；還認為他是可能從困擾中國的種種問題中拯救唐王朝的一個人。

他在49歲早死，是由于服用他周圍道士們以礦物煉成的丹石中毒所致。他是40年中因丹石致死的第四個皇帝。他的死是突然的和沒有料到的；特別不幸的是，由于他沒有明確指定一個繼承人，繼承問題懸而未決。

造成上述情況的原因在于宣宗的個人性格，以及他和自己家庭之間復雜的甚至敵對的關系。他是一個私生子，為皇親們所輕視，他的父親憲宗曾不讓他住在宮禁，而強迫他住在“十六宅”，這是宮中大批年幼的皇族和恩寵較疏的皇子們的混合居所。[[23]](#_23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他繼承皇位的希望渺茫，因為在他登上皇位前已有一個異母兄長和三個侄子當上了皇帝。在不引人注目的漫長歲月里，他和第一個妻子結婚，她出身普通家庭，姓晁，生下了鄆王李溫和一個女兒。當他登上皇位以后，他將女兒嫁給有影響的鄭氏的一個成員，并特別告誡她不許干預政務，以免重蹈中宗朝太平公主和安樂公主的覆轍。

他的諸妻中沒有一個被正式指定為皇后，他顯然拒絕指定嗣君，盡管大臣們為此進言，催他急辦。他的理由是，他擔心指定嗣君后自己將“為閑人”——意為被排擠出權力之外。在12個兒子中，長子李溫最不受寵，也被迫住在“十六宅”，就像宣宗年輕時的處境那樣。

當接近生命終了時，他因服用由身邊的道教術士制造的丹石而長期患病。859年陰歷八月，他感到病情嚴重，便留在宮中不與大臣們接觸，由御醫和那些主要造成他這種狀況的道士照顧，只有宮中的宦官能接近他。

9世紀上半期，宦官們已能左右皇位繼承。懿宗以前的五位皇帝中已有四人為宦官所擁立，至少一人，也可能有二人，被他們謀害。隨著宣宗之死，敵對的宦官集團再次試圖策劃把他們各自的候選人推上寶座。

在臨死前，宣宗最信任的一個宦官三人小集團聲稱，皇帝曾交給他們一份密詔，指定最寵愛的第三子夔王應繼承皇位。這幾個宦官害怕朝廷中的官員和另一位著名的宦官神策將軍王宗實反對夔王，因為他們一伙與王宗實之間長期以來一直不和。宣宗死訊宣布以前他們帶著敕旨從宮中露面，指派王宗實為淮南監軍使；淮南雖是一個重鎮，但卻遠離京師。

王宗實是在宮外接到勅旨的，同時還被禁止進入停放宣宗靈櫬的內廷。但是這種臨終的旨意自然會令人懷疑。宣宗的狀況是眾所周知的，大臣們對稍過十年前武宗臨死時在同樣環境里的荒謬的和無法預言的行為記憶猶新。因此，王宗實認為見不到皇帝他無法了解這一任命是否屬實。他秘密地進入宮內，發現了事實的真相。三名試圖擁立夔王的宦官被處死。大行皇帝的長子李溫很快被召來，雖則他的父親已死，仍被正式立為嗣君，準備立即登基。當時他26歲，缺乏政事經驗，一位受尊敬的年高望重的大臣令狐绹——他并未參與嗣君的選立——被指定為攝冢宰。[[24]](#_24___Tang_Da_Zhao_Ling_Ji____Ju)

這次皇位繼承簡直可以說是不吉利的。懿宗借以登上皇位的“遺詔”的可靠性非常值得懷疑，甚至有人認為他不是宣宗的真正兒子。[[25]](#_25_Lu_Si_Mian____Sui_Tang_Wu_Da)他個人的權力從一開始就是不牢靠的。況且他所管理的政府既分裂又派系林立。沒有一個人能認真斷言懿宗是一個杰出的皇帝。他為人反復無常而又任性殘忍，并且變得窮奢極侈，昏庸無道。但如上所述，他繼承了大量難以處理的問題。

其中相當重要的一個問題是朝廷中的政治局面。他繼承下來的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是外廷和內廷之間劇烈的對立；外廷是正規的職官，內廷是皇帝個人的侍從，以及宮中人員和宦官。官僚們的仇視和猜疑集中在宦官身上。從8世紀后期開始，他們被安排擔任一系列官職。[[26]](#_26_Guan_Yu_Tang_Dai_Hou_Qi_Huan)他們不但照料皇帝的宮殿、苑囿和財產，而且管理驛傳、館舍和都城的佛教機構。更重要的是他們作為皇帝的秘書（樞密使）已在宮中負有審議的責任，而且掌管著皇帝私人的內庫。他們充當各地的監軍使和溝通皇帝與封疆大吏之間的關系的角色。但他們最重要的權力在于控制神策軍，它不但是皇帝的親軍，而且是由中央政府直轄的主要軍隊。[[27]](#_27_Jian_Xiao_Tian_Long_Xiong)

如同我們在嗣位一事中所看到的那樣，他們是分為集團的，但政府中真正緊張的局面在于外廷官員們對他們的敵視和猜疑。一個不受重視的皇子被一個宦官集團抬到皇位上，他不可能順利地得到他的朝臣們的效忠，在統治的第一年懿宗面臨朝中大臣們相當頑強的抵制。為了試圖解決這種局面，確保最上層大臣們的公開支持，861年陰歷二月，三名最重要的非武職宦官來到宰相們議政的中書省，交給他們的發言人杜悰一件詔令，要求這些在宣宗病危時（將近18個月以前）任宰相的人們編造一份回溯日期的奏疏，其內容是在他父親生病時曾請求鄆王（懿宗即位前的封號）監國。這樣將公開表明，嗣位不但是由于宦官，而且還得到最上層官員們的贊同。任何拒不簽署的人將要承受嚴重的后果。年邁的杜悰告訴宦官代表說，在新朝伊始、萬方歡欣的時刻，這樣一道詔令是不合適的。他還說，宦官樞密使與宰相宜于“共參國政”。詔令立即作廢，當懿宗上朝遇見大臣時，他“色甚悅”。[[28]](#_2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這件事使人感到對新政權的反抗是如此的強大，以致必須取得官員們支持的正式表態。回溯性的奏疏將使懿宗的嗣位打上由宰臣們認可的印記，如果以前的宰相們拒絕簽署，就會激起一場較大的政治危機。杜悰的答復以一種比較微妙的方式達到了預期的結果。通過把懿宗嗣位說成是“萬方欣戴”，他清楚地表達了對既成事實的承認，通過闡明宰相和樞密使應共同治國，他公開承認宦官們在政府中的明顯的政治作用。

杜悰從來不是一個處于支配地位的政治人物，盡管他在武宗統治（841—847年）后期曾短期擔任過宰相。可是他是以一種獨特的地位充當官僚們的發言人的。他是一位無可爭辯的年長的政治家，曾為懿宗以前的六個皇帝效勞，享有正直的聲譽。他還是憲宗時期享有巨大威望的宰相杜佑之孫，并和憲宗寵愛的孫女結了婚。

杜悰從他長期的經驗中清楚地覺察到問題的癥結所在，他謹慎和及時地支持新政權的姿態避免了一場危機，還可能防止了類似835年甘露事件那樣的一場大屠殺。但是他公開承認宦官們在政府中的地位，這對于其他官員們來說是難以忍受的，并且引起了強烈的不滿。半個世紀以前，憲宗自夸他自己能除去最有權勢的宦官吐突承璀，（他曾協助憲宗登上皇位）“輕如一毛耳”。[[29]](#_2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在此后的幾代君主治下，盡管宦官勢力穩定地增長，大臣們仍然堅持在政策的決定和實施上有最高的權力。重要的是，如李德裕在845年所提出的那樣，政府的一切政策應“政出一門”，即出自宰相府。[[30]](#_30_Jian_Qian_Di_Jiu_Zhang)但是，時至9世紀60年代初期宦官們已能公然侵犯被加意防衛的宰臣的職責，此后的高級宦官能夠傲慢地稱呼自己為“定策國老”了。不久，四名首要的宦官顧問和執行官——即二樞密使和二宣徽使——被稱為四相，鑒于宰輔的數目長期限于四人，這實際上是公開宣告他們新的權勢與外廷相等。[[31]](#_3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宦官與官僚們之間的關系在整個懿宗統治時期一直處于敵對狀態，雖則雙方偶爾能一致行動來阻止不是出于他們某一集團之中的一個皇帝寵臣的上升。但是他們之間仇視和猜疑的加強有時導致悲劇性的和異乎尋常的結果，如建州（福建）的葉京的事例。9世紀60年代初期某時葉京在一次由節度使舉行的宴會上遇到宣武軍的宦官監軍使。葉京后來中進士第，他和同年外出時在長安街道上遇到了這名宦官。他們二人僅在馬背上相互致意，但是普通的問候已足以敗壞葉的聲譽，并毀了他的前程。[[32]](#_32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2)在9世紀60年代發生于葉京身上的事情在半個世紀以前是不會出現的，當時出名的學者官僚如韓愈和元稹與他們時代重要的宦官之間保持熱烈的關系，卻沒有對他們的前程造成任何損害。

在懿宗統治時擔任高位的外廷官員乍一看似乎是一個高級貴族集團。他在位期間20名宰相中的15人或是據說是“名族”的成員，一人出身“公卿”之家；三人屬于地區“士族”，只有一人是寒族出身，不過他看起來也像是出身于有一定地位的家庭。[[33]](#_33_Zhe_Xie_Fen_Lei_Shi_Yi_Sun_G) 20人中的18人是通過科舉進入官場的，但是這不足以說明他們的社會地位，因為到這時有關的新進之士和原來的精英成員二者同樣傾向于應科舉考試來使他們得到威望。

但是，對懿宗時期的宰相作了仔細的研究之后表明，最初的印象，即有一個數目很小而排他的氏族集團控制著政府最高層，是錯誤的。事實上，在懿宗的朝廷中似乎有一條基本的政策，即宣宗朝的有影響的家庭或有勢力的官僚集團都不應繼續掌權。懿宗的宰相們不管如何自夸門第，幾乎都只有有限的政治聯系。許多人來自中央政府新提拔的家族——他的20名宰相中，6個人的氏族里面只有他們當了宰相；[[34]](#_34_Ta_Men_Shi_Xia_Hou_Zi___Jian)另外6人聲稱是隋朝和唐初的大官后裔，但都出身于久已喪失任何重要政治勢力的家族，[[35]](#_35_Ta_Men_Shi_Ling_Hu_Tao___Du)其他人則幾乎無例外地雖然出身于高門，但卻是政治上無足輕重的支系。[[36]](#_36_Li_Ru_Xiao_Ye___Xiao_Zhi___L)氏族的組織和凝聚力在唐代是相對地削弱了，一個名門中的微賤族人很難期望從他們疏遠的親屬那里得到支持。這樣就提供了一種可能，即起用著名門第的成員，而不使用任何能夠有力地反對皇帝或皇族官僚的權力的人。那些在唐王朝以前各代的最高層官僚中占有很高比例的豪門大族，其成員在懿宗的朝廷中幾乎完全被排除在高級官僚之外。

山東舊族如博陵和清河崔氏、榮陽的鄭氏、范陽的盧氏和趙郡的李氏，在懿宗朝沒有一人當上宰相；聞喜（山西）裴氏也無一人拜相，這個氏族比起其他氏族來與唐朝的關系也許更為密切。這種情況究竟是體現了皇帝深思熟慮的排斥政策，還是傲慢的貴族拒絕為可疑的政權服務，還難以斷言。這兩種因素無疑都起了一些作用。總之，其結果是和宣宗朝缺少政治上的連續性，這便對施政產生了有害的結果。

懿宗將不順從的官員調出京師的決定是清楚明白的。如此鬼鬼祟祟地嗣位的新皇帝在即位之初采取了堅決的措施來鞏固他的統治。他立即罷黜了宣宗朝宰相蕭鄴的職務，蕭是一個平庸的人，出自南朝梁（502—557年）皇族的一個政治上默默無聞的支系。代替蕭鄴的是杜審權，他是穆宗朝（821—825年）一位宰相的侄子，他已在政府中任職幾十年，并在宣宗朝占據高位。他的任命有助于官僚們承認懿宗的統治。另外，懿宗暫時仍讓令狐绹任宰相，他任此職已近10年。

一旦令狐绹協助完成了向新政權的過渡，他的調動就勢在必行了。令狐绹在懿宗嗣位過程中沒有起作用，而且他和宣宗政權的利害實在太一致了。幾個月之內他就被派到外地任節度使。令狐绹的罷免在某些地區可能是得人心的，他在宣宗朝任宰相的10年中與他的貪污腐化的兒子令狐滈一樣，激起了人們相當深的仇恨。但是他被罷免的原因幾乎肯定地與宣宗統治晚期的一個由皇帝授意的清除宦官的計劃有牽連。這個密謀的發現加深了大臣們與宦官之間的猜疑，控制懿宗的宦官們有一切理由不讓令狐绹繼續留任，因為他曾一度在此職位上實行他的計劃。

令狐绹罷職以后，他的舊政敵白敏中被重新任命為宰相，白敏中是宣宗時期第一位重要的宰相（從847年到851年），他的重新任命顯然是為了博得他對新政權的支持和利用他的影響。這時白已經老朽不堪，不會構成任何真正的危險，但當他不愿表示與新政權合作時，他也于861年陰歷二月被免職。他為順從的杜悰所取代，后者立即作出皇帝及其宦官支持者們所追求的極其重要的讓步。

白敏中罷相后數年中，朝廷先后由一些懦弱的人物領導，他們唯一共同的特征是缺乏獲取真正政治權力的機會，并且默認內廷對政府的統治。他們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楊收，他的經歷是這個時期政治的集中體現。[[37]](#_37_Yang_Shou_De_Chuan_Ji_Jian)楊收自稱是隋朝大臣楊素之后。他是一個神童，早年失估，受一度顯赫的長孫家族的母親教育。青年時代，他以嚴守禮法和精通禮學而馳名于世。他得到懿宗初期三位宰相——杜悰、令狐绹、夏侯孜——的庇護，但他之能當上宰相，事實上并不是由于皇帝或他的大臣們的委任，而是由于宦官神策將軍楊玄價的影響；楊玄價這時在宮廷中取代王宗實掌有實權。楊收盡管早年享有正直的聲譽，卻變成懿宗時代最腐化的宰相之一。不管他的上升是多么迅速，他一旦試圖在朝廷的政治斗爭中采取獨立立場，前途就突然毀掉了。開始他被遣往地方做觀察使，緊接著被貶謫到安南極南端的驩州任小吏，最后賜死。

如果說楊收的經歷典型地表現了這個時期恩庇的復雜形式和政治的不安全感，那么，路巖的經歷甚至更明顯地使人想起懿宗統治中期政治生活的不穩定性和權力被無限制濫用的情況。[[38]](#_38_Lu_Yan_De_Chuan_Ji_Jian___Ji)路巖出身于一個官場得意的官僚家庭。利用他父親的各種政治聯系，路巖很快升到高位，并在864年35歲時成為宰相，這樣的青年得志是令人驚異的。他任相職一直到871年。他利用皇帝忽視政事的機會，一貫濫用職權，從而為自己及一批支持者增加了非常巨大的財富。一個地方官吏曾大膽而強烈地要求皇帝沒收路巖集團中的邊咸的財產，他說這個人非法獲得的財產足夠支付政府軍隊兩年的費用，皇帝僅僅責備這位地方官厚顏無恥，就此了事。此后邊咸立即成為京師軍隊中的一名將軍，只是在謠傳他策劃一場政變時，他和路巖才最后從朝廷中被流放出去。

路巖明顯地超出楊收之處，在于他建立了一個個人支持者的集團。這些人物的迅速上升對于朝廷政治顯然起了擾亂的作用，盡管在這些新進之士與舊世族成員之間保持著一定程度的平衡。雖則舊世族中只有較不出名的人才被選來當官，但他們在朝廷中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他們的社會集團，即使他們沒有實權。

路巖政治上的失意部分的是韋保衡造成的，韋在路巖做宰相的最后年代里已成為他的主要政治對手。[[39]](#_39_Wei_Bao_Heng_De_Chuan_Ji_Jia)韋的擢升是由于懿宗更多地插手朝政，雖然他的過問幾乎是不負責任的。從9世紀60年代后期起，皇帝開始縱容一批寵幸，其中有些人被提拔到很高的職位上。大臣們不能反對他，甚至宦官們似乎也失去了他們從前對他的大部分控制。在登上皇位若干年后，懿宗開始要表現自己，這是不足為怪的。然而，由韋保衡之流不負責任的寵臣控制朝廷，這對他統治初年取得的脆弱的穩定局面造成了破壞性的結果。

韋保衡的祖輩也像路巖的祖輩一樣，都中過進士，仕途順利。韋保衡在864年也得中進士，盡管這是出于皇帝的特殊干預；他的試官和同年都對他的才能加以蔑視。在以后幾年里，他對皇帝的影響增強了，并于869年和皇帝愛女同昌公主結婚。他們的婚禮極為豪侈，并得到500萬緡錢和一座在京師高級住宅區中的裝飾豪華的府第的賞賜。

在結婚時韋保衡不過是懿宗的一名低級私人顧問，但現在他得到皇帝的信賴并迅速升至高位，不到一年，他成了宰相。韋保衡并非懿宗時期與皇室聯姻的第一位宰相，但這種情況是新近出現而尚未被廣泛認可的發展。直到9世紀40年代，一個駙馬成為宰相之事幾乎沒有聽說過。在此以前，政治上顯赫的門閥家族寧可在它們集團內部通婚，也不愿與皇室結親，這主要是為了保持它們政治上的獨立性，而且也由于它們還縈繞于懷，認為唐朝統治家族在文化上不如它們。以前宣宗曾命他的宰相從高門氏族中選擇合適的青年來作公主們的配偶，但這激起了強烈的抵制，并導致相當持久的仇恨，使舊世族和王朝之間的裂縫擴大，這種現象在懿宗朝的政治史上也清楚地表現了出來。毫無疑問，韋保衡對政府的控制是建立在他與皇室通婚的基礎之上的，因此更加為人們所不滿。

然而，韋保衡與皇帝女兒的婚姻是短暫的，因為公主在870年陰歷八月病死。皇帝因悲痛而喪失理智，把為她看病的幾個醫生殘酷地處死，他們的家屬也被投入監獄。反對這些嚴酷行為的抗議反而進一步激怒了皇帝，韋保衡利用這種形勢乘機清洗他的對手。宰相劉瞻和其他八名高級著名官員也因提過反對意見而被趕出朝廷。京兆尹被迫自殺，劉瞻原應處死，只是由于幽州節度使的干預才得幸免于難。在這場政治目標明確的清洗中，幾乎所有曾被懿宗從最高決策機構中排除出去的原世家大族的成員都成了犧牲品，懿宗朝和宣宗朝高級官員的親屬也是一樣。楊收的一位親屬便包括在內。在懿宗統治下，黨爭活動和以前一樣激烈。

在這次事件以后，韋氏家族的權勢達到了頂點，他們的貪婪和揮霍也是如此。在同昌公主死后四個月，她的遺體在韋府庭院中火化。這次儀式聲名狼藉，因為它是懿宗朝皇室奢侈生活中最放縱的活動之一。皇家的庫藏打開了，各種珠玉被拿了出來用作數百名舞女的發飾。800匹絁覆蓋在地上，當舞蹈結束之后，從舞女頭上掉下的珠玉竟將絁面覆蓋起來。各種金銀財寶都被用作她的葬禮，儀式結束后，韋氏家族的成員細心篩濾公主火化后的骨灰以尋找珍貴裝飾品。

和韋保衡同時為相的是于悰，有著類似的經歷，雖則不是那么引人注意。[[40]](#_40_Yu_Cong_De_Chuan_Ji_Jian___J)于悰是初唐幾個大臣之后，其中包括高宗朝宰相于志寧和武后朝資深的大臣于休烈。于悰希望利用蔭庇獲得職位，但是沒有高級官員愿意任命他。最后通過一個駙馬的干預，他設法考中了進士。于悰立即響應宣宗所提出的精英成員與他女兒通婚的要求，隨后通過與皇室的關系升到高位，在867—872年之間擔任宰相。然而于似乎沒有實權，他完全為韋保衡所控制。872年，他和他的支持者成為一次宮廷大清洗的犧牲品。

869年，王鐸被任命為宰相；這個任命之令人感興趣是因為他是太原王氏的成員，而太原王氏和山東貴族之間因有聯系而聲名顯赫。[[41]](#_41_Wang_Duo_De_Chuan_Ji_Jian)他是那個集團中在懿宗朝被任命為宰相的唯一4成員。很可能，他的任命是出于他的兄弟王式將軍的堅決要求，因為王式曾戰勝南詔，鎮壓過裘甫和龐勛的叛亂，因此權勢甚重，不容忽視。王鐸是在龐勛叛亂結束之后立即得到任命的。他的任命不可能得到韋保衡的歡迎，因為王鐸對韋表示藐視；864年，王是韋的試官，他拒不給韋中式，直至皇帝親自干預才被錄取。韋對王表示相當的尊敬，但他無法在朝廷確立個人權力，最終重新要求外放。

懿宗最后的一些宰相都是在政府中比較新進之士的子弟，因而根本不能代表舊貴族集團。然而他們和政府需要其支持的官僚權勢家族聯系密切。不管宦官、寵臣或皇室親屬壟斷了多少權力，這些官僚集團總是在宰相中有它們的代表。通常四個宰相中有兩個人選自這些家族。他們也享有一定程度的恩蔭，這便防止了王朝以前的支持者的完全離心離德。但是他們從未掌握真正的權力。

朝廷劇烈的政治斗爭有一個間接的影響在各地變得越來越明顯。當時罷相的最普通辦法是委派他當地方高級官員，通常是做觀察使或節度使。許多這樣的任命對于唐王朝之能否真正幸存下來是事關重要的；然而，從這些帶有劇烈政治斗爭傷痕的人們中，朝廷很難指望挑選出高度忠誠的人去任職。令狐绹對淮南北部發生的事情采取的中立態度，便是會產生什么后果的一個例子，當時他竟允許龐勛叛軍和平地通過他的轄境。夏侯孜在867年罷相之后被派去四川，在那里抵抗南詔入侵時他表現出的無能造成了災難性后果。幸運的是，在懿宗統治時期更多的地區并未卷入叛亂，因為京師周圍、長江中下游等地以及四川的許多節度使都是以前的宰相，而他們對王朝的忠誠是難以保證的。

除了統治精英的政治分裂及這種分裂對地方行政和官場風紀的影響之外，還必須著重指出管理職能的退化。懿宗即位以前，在宣宗統治下有一股改革活動的疾風，它主要是想恢復傳統的制度結構。但是官僚機構繼續崩潰：政府機關呈四分五裂狀態，法紀蕩然，某些機構改變了職能，其他一些則名存實亡。此外，例如選拔官員和起草詔勅這樣重要的基本職責不再屬于任何具體的機構，而多半是臨時向人交辦。[[42]](#_42_Sun_Guo_Dong____Tang_Dai_Hou)這不是新的發展，而是一個世紀或更多時期變化的結果。它嚴重地削弱了官僚政治的完整性、使命感和內聚力，降低了它們行政管理的效能，不斷地損害著一度有力的和組織完善的機構。制度破壞后的明顯標志必然是增加了官僚們的不安定感和不安全感。

這個時期的歷史學家強調懿宗個人的奢侈、他的不合常理的殘酷以及他的任性。這位皇帝的某些行動是完全反常的。有一次他想任命一個寵愛的樂工為宮廷禁軍的將軍，此事甚至激起了宦官和大臣們的一致反對。凡反對任何一個與真正權力中心有關的人物的官員是不會安全的。一位大臣奏請皇帝注意他的寵妃的兄弟涉嫌一件陰謀案，懿宗竟下令將該大臣處死，全家削籍為民。

除了皇帝的專橫和殘暴之外，懿宗朝統治的主要特征是它和以前幾位皇帝時期的政策截然不同。在使用寵臣方面，在專橫地使用權力方面，他的統治都使人容易想起武后之治，并留下了一個同樣強烈的痛苦的混亂攤子。但是也有重大的不同。武后很少采取悖乖的行動。再者，她的政治活動沖淡了舊貴族的力量，擴大了王朝的政治基礎。懿宗的政治活動則明顯地縮小了中央政府的政治基礎，至少它的最高層是如此。由于在最高的官職上排除了過去最堅決支持王朝的那些家族的成員，而代之以宦官、暴發戶和小部分貴族（它們主要以京師或京師附近為基地，有時也與皇室通婚）中地位較低的成員，所以他的統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毀掉了王朝長治久安所最依賴的靈活性和平衡。地方上存在的深刻的和普遍的動亂促使王朝的擁護者在以后僖宗皇帝統治下暫時重新聯合了起來，但是以前列朝的相對政治穩定性卻在唐朝統治的這最后40年中再也不能恢復了。

### 懿宗對佛教的支持

沒有跡象表明，懿宗在即位初曾認真過問政府事務，他的作用限于日常的禮儀。其他時間只是盡量尋歡作樂。看來他感到這種生活完全合乎自己之所好。他過于愛好音樂和宴游，在聽音樂和觀看宮廷樂人表演時是不知疲倦的。他經常參觀長安的園林，前往京師周圍使他感到愉快的風景名勝之地，伴同他的是為數眾多的皇子和通常超過萬人的隨從隊伍。他的奢侈行為的費用是難以計數的。

懿宗對佛教的庇護通常僅僅被視作他的奢侈揮霍的又一個方面，也是他的個人各種無節制行為的一種表現。然而，在845年大事毀佛之后，皇帝重新支持佛教卻是一樁值得重視的富有歷史趣味的事件。

宣宗幾乎立即改正了武宗對佛教寺院的廣泛的壓迫，但此事通常被人忽略了。847年陰歷三月的一道詔令宣布，所有會昌年間被毀的寺院可以重建，官府對此不得干涉。這種恢復只是宣宗及其大臣們改正武宗朝政策的全面努力的一個方面。[[43]](#_43_Guan_Yu_Xuan_Zong_Hui_Fu_Fo)在他的恢復佛教信仰的其他行動中間有一道848年的詔書，命令在長安、洛陽、成都、荊州、汴州和揚州建造新的廟宇。壯麗的佛教節慶在全國重新舉行，在京師，皇帝恢復了佛、道、儒鼓吹者之間的傳統辯論。在福建，有許多新的寺廟是唐末和五代建造的。其他地區無疑也存在同樣情況。這樣，宣宗之治標志著佛教恢復了它在中國社會中的傳統地位。

懿宗證明甚至比他父親更熱衷于做佛教的保護人。幾乎從即位之日起，他為佛教濫用公帑和個人虔誠信奉就顯而易見了。862年，在皇帝下令舉行大規模受戒儀式，并為僧尼在宮內講經提供新的設施之后，朝中有人提出異議，重申反對佛教的傳統的理由。但是這些反對者的雄辯毫無效果。

在懿宗晚年，他對長安佛教機構的庇護增加了。在他生日那一天，來自京畿各大寺院的僧侶應邀到宮內講經。871年，他參觀了坐落在皇子們所居的王府——他曾在其中長大——正西的安國寺，對僧人們濫施賞賜。同一年晚些時候他邀請1萬名僧人到宮中舉行盛大的齋筵。

懿宗的許多大臣在佞佛方面與他不分上下，首先是裴休，他是宣宗朝最著名的宰相之一，在懿宗朝繼續保持榮譽職務直到870年去世為止。裴休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居士，不飲酒吃肉。他寫下了若干關于佛教禪宗的學術著作，因為立論精密嚴謹博得了許多贊賞，它們已成為佛教三藏的組成部分。對佛教的贊助不限于長安，在地方上也廣泛流行。以后數十年，在禪宗的一大中心的福建佛教得到大量的支持；作為這個時期佛教流行的一個明確標志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印刷品《金剛經》，它印行于868年，也是世界最古老的印刷品之一，在20世紀初為斯坦因所發現。

懿宗庇護佛教的最后行動是最壯觀的。早在873年，皇帝不顧大臣們的拼命反對，決定恢復尊崇佛骨的儀式，此事在819年曾受到韓愈的令人難忘的斥責，以后未再舉行。873年迎佛骨儀式極其隆重，甚至超出了憲宗時舉行的那一次，政府在全國頒布大赦以示慶祝。京師富家競相炫耀侈靡，朝廷中的成員全都施舍大量財物。

懿宗舉行這個儀式也許是因為他感到自己臨近死亡而絕望所致，因為他在幾個月后就身患重病，終于在873年陰歷七月死去。皇位立即由他12歲的兒子李儼繼承，李儼在歷史上稱為僖宗。

## 僖宗（873—888年在位）

### 皇帝和宦官

873年12歲的李儼繼承皇位，比他父親860年嗣位要平靜得多。他是懿宗八個兒子中的第五子，他的嗣位應歸功于兩位資深的宦官神策軍將軍劉行深和韓文約。[[44]](#_4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劉行深出身于宦官世家，劉家的幾個成員曾博得朝廷大員的尊重，所以劉對李儼的支持是有相當分量的。新皇帝在873年陰歷七月十九日即位，這是他父親去世之日，也是他被指定為繼承人負責軍國大事的次日。懿宗的遺詔任命他的寵臣韋保衡攝政，但事實上韋保衡和已故皇帝的其他幾個聲名更加狼藉的寵臣一起，在僖宗即位后立即被貶逐出朝廷。

僖宗仍是個孩子，對宮外生活所知甚少。他愛好游戲，長于射箭、騎馬和舞劍。他特別為自己善于踢球——唐代特別風行的一項運動——而自豪。他還愛好數學計算、音樂和各種賭博，特別是擲骰子。他愛斗雞，和自己的兄弟在斗雞比賽中打賭。他似乎有幽默感，但又相當遲鈍。

當僖宗長大之后，他對游戲和娛樂的興趣減弱，開始堅定地過問朝廷事務。不幸的是，他看來是一個嚴酷而反復無常的統治者，過分關心細節，喜施嚴刑，甚至用它來對付那些對他的政府言之成理的批評。僖宗在他統治的15年中，常常被描寫成十分輕浮的人，但看來很清楚，在他將近20歲時他已成為一個意志堅強的統治者，雖然明顯地反復無常，沒有經驗和缺乏足夠教養。如果要對他統治時期朝政的處理多加批評的話，人們必須記住，僖宗面對的是如此復雜和危險的一種危機，足以最大限度地考驗任何統治者的聰明和勇氣，何況他還是一個年輕的孩子。

即使考慮到歷史學家有反對宦官的偏見，他們將僖宗統治時期的失政主要歸罪于他的首要宦官田令孜（他很快便主宰朝政并作為唐末最有權勢和最可怕的宦官之一而聞名），也可能是公平的。[[45]](#_45_Tian_Ling_Zi_De_Chuan_Ji_Jia)田令孜和他的宦官繼承人對唐末諸帝的控制是如此有力，以至于皇帝實際上成了他們的傀儡。在唐朝最后數十年間，雖則皇帝曾短期內重新得到一定程度的權力，但總的來說，皇權差不多降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低點。

田令孜在懿宗統治時期只是宦官中一個次要人物，他掌權的關鍵在于他和僖宗的非常親密的關系，因為僖宗把他當作養父。田令孜受過很好的教育，非常聰明；他設法讓僖宗忙忙碌碌，同時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他的支配地位在875年被委任掌管神策軍時顯示了出來。現在他不需請示皇帝便能任命官員，分贈賞賜，皇帝顯然無保留地信賴他處理朝廷事務的能力。田令孜千方百計給皇帝的內庫增加收入，其中包括計劃籍沒京師富商的財產。任何反對他的計劃的人都有被處死的危險，甚至政府中最高的大臣們也害怕公開與宦官作對。

除了滿足他個人的野心之外，田令孜尋求普遍提高宦官威信的辦法，880年他任命京師和地方的高級宦官職務時采用了迄今為止只是在任命宰相時才用的莊嚴儀式。[[46]](#_46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田的極端冷酷和他對皇帝的牢固控制當然引起僖宗外廷官員極度不滿，毫無疑問，他在朝廷的地位更摧毀了大臣們中間的一切共同使命感，而且粉碎了恢復唐朝皇權的任何希望。

唯一強大到足以和田令孜抗衡的角色是另一個宦官楊復恭。與田令孜不同的是，他是最有勢力的宦官“世家”的成員，他的祖先在神策軍充當高級將領近百年之久。[[47]](#_47_Yang_Fu_Gong_De_Chuan_Ji_Jia)他的經歷和一個普通的朝廷官員是很相似的，在被樞密使楊玄翼收為養子之后，他先后擔任過一些地方的監軍使，并在鎮壓龐勛叛亂中起過重要的作用。然后他回到京師任宣徽使，869年接替義父楊玄翼為樞密使。楊復恭代表宦官集團中與朝廷機構完全合作的那一部分人，他忠于王朝，而不是忠于任何皇帝個人。他認為，田令孜是暴發戶，就像懿宗朝的官員對懿宗的寵臣的看法那樣。田令孜對楊復恭在政府正規機構中的地位造成了直接的威脅，所以他們之間開始權力之爭是不足為奇的。然而，田令孜對新皇帝的個人支配地位和他對宮廷禁軍的指揮證明是決定性的，楊復恭被降職，暫時退休，像一個官員那樣退隱林泉。他受過很好的教育，在懿宗統治的晚年宦官與官員們共同起來反對懿宗的寵臣時，他似乎與某些外廷官員有很好的關系。也許楊家和其他重要宦官家族所表現出來的效忠王朝超過效忠皇帝個人的態度，有助于緩和他們和外廷官員之間的緊張關系。

正如楊復恭的經歷顯示出極像一個高級文官的經歷類型那樣，他的“堂兄弟”楊復光也擔任過許多高級軍事職務。[[48]](#_48_Yang_Fu_Guang_De_Chuan_Ji_Ji)和他的“堂兄弟”一樣，楊復光也受過相當好的教育，他的傳記描寫他是一個大義凜然和有決斷力的人。在懿宗統治時期，宰相楊收懷疑楊復光密謀反對自己，曾將他逐出京師。當黃巢叛亂時，楊復光被委以一系列極端重要的軍事的和交涉的使命。他對政府對付叛軍的政策有重大的影響，并協助付諸行動。他在這些年中的成就博得了人們很高的尊敬。

盡管楊復光在黃巢叛亂時為王朝效勞，宦官與官僚之間的緊張關系仍在繼續。雖然宦官參加政府是一個公認的事實，但他們的勢力和影響所及超出了可以容忍的范圍。甚至在政府從流亡中回來以后，田令孜仍然控制著僖宗，因此他成為京師和京外官僚們猛烈攻擊的目標，他在朝廷的地位仍是任何努力重新控制京師以外各地區的活動的主要障礙。僖宗統治下的三個最有影響的宦官——田令孜、楊復恭和楊復光——試圖把義子安置到重要的地方職位上，以此將他們個人的勢力伸展到外州。僅楊復光的義子任刺史、地方將領或更高職務的就在10人以上。[[49]](#_4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田令孜在京師以外地區的閱歷比起楊氏兄弟來要差得多，他也曾試圖用任命其兄弟陳敬瑄為家鄉所在州節度使的辦法來建立他的地方勢力。在建立個人與封疆大吏的關系方面，宦官們不過學朝廷大臣們的樣子，但是，以這種個人的結合和聯盟來代替對政府的效忠，其結果又進一步損害了唐王朝的力量。

### 僖宗時期的外廷：貴族統治的復辟

僖宗統治的最初幾個月和他父親親政時相似，都采用只委派豪門大族的次要成員或沒有多少個人力量和影響的官員擔任最高職務的辦法，來加強對新政權的支持。南朝蕭梁家族上了年紀的后裔蕭倣在873年臘月被任命為宰相，以取代腐化的和受人怨恨的韋保衡，后者已被逐出朝中。[[50]](#_5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2)蕭倣是一個正直和節儉的人，他堅定地反對懿宗對佛教的過分庇護。他曾是一個著名的節度使，在865—868年負責大修黃河堤防。他的祖父、叔父和侄子都曾擔任宰相，所以他的任命是穩健和保險的。蕭倣很快便和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名叫裴坦的人同為宰相；裴坦是在整個唐代與皇族有密切聯系的著名裴氏的一個小支系的成員。裴坦在得到任命后不久便病死，他由懿宗朝一個不甚知名的宰相劉瞻所代替，劉曾于870年被貶出朝廷。

然而，下一個任命暗示了一個重要的政治變化，即權力回到原來已有根基的政治和社會貴族集團手中，它們的地位在懿宗朝曾被系統地削弱了。874年陰歷八月，在新任命的宰相劉瞻可疑地死去以后，政府指定崔彥昭為相。[[51]](#_5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3)崔彥昭是憲宗朝宰相崔群的侄子，“東北”舊貴族集團的典型代表，清河崔氏的成員，因此也是山東（即河南和河北）那個排他性的“七姓”集團的成員。9世紀上半期這個集團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是很深遠的，在他們中間崔氏顯然有特殊的重要性。當9世紀30年代宦官與官僚之間劇烈斗爭時，崔氏的頭面人物領導官僚的一方。[[52]](#_52_Jian_Wang_Dang___Tang_Yu_Lin)武宗朝的宰相中崔氏有3人，宣宗時有4人。在懿宗時期有意使這個集團黯然失色之后，874年任命崔彥昭的決定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

崔彥昭不僅有給人深刻印象的家庭聯系，他還是一個聰明而有學問的人，在任職時表現出處理實際問題的出色能力，特別是在河東任節度使時（870—873年），他成功地抗擊了沙陀突厥的進攻。根據所有這些原因，他的拜相是多年來較為積極的宰相任命。但任命他為宰相的真正意圖是無法知道的。唐王朝面臨極為困難的問題，所以要求強大的和統一的領導，這樣一種普遍的意識一定是他得以任命的一個因素。此外，在僖宗童年時顯然掌握著任命大權的宦官們，對無法預料的皇帝寵臣——像在懿宗朝曾控制朝廷的那些寵臣——的興起的恐懼，也許超過了對舊的政治精英集團的成員上升的擔心。

有一位宰相的任命進一步證實政府不但決定要對前一皇帝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而且要恢復以前某些政策受害者的權力。874年陰歷十月，鄭畋被任命為宰相，他是另一個名門大族的成員。[[53]](#_53_Zheng_Tian_De_Chuan_Ji_Jian)盡管鄭畋早在幾十年前的科舉中名列前茅，他在宣宗朝仍被投置閑散，因為他的父親反對當時掌握朝政的白敏中和令狐绹。直到9世紀60年代后期劉瞻被任命為宰相后，鄭畋才開始得到翰林學士這一重要的任命。鄭畋以他的敏捷的才智、透徹的見解和令人眼花繚亂的文學風格在同僚中贏得了尊敬。但是，當870年劉瞻和他的政治伙伴被貶逐出京師時，鄭畋幾乎立即遭到另一次挫折。他被派遣到遙遠南方一個無足輕重的沿海州中去做刺史。

僖宗在874年的陰歷十月又同時任盧攜為相，從而首次補齊了4個宰相的職位，這是整個僖宗朝在京師的宰相的標準數。[[54]](#_54_Lu_Xie_Chuan_Ji_Jian___Jiu_T)盧攜出身于河北范陽盧氏望族的一個不引人注目的支系。盧攜是一個和他的同僚鄭畋很不相同的人物，兩個人之間的唯一關系是他們都是東北貴族集團的成員。他在855年中進士，在宣宗和懿宗兩朝接連升官，擔任重要職務。作為一個大家族的庶出成員，他與懿宗朝的許多高官沒有差別。但是他對9世紀60年代逐步造成的普遍危機以及外地州鎮的悲慘狀況是有清楚的認識的。

由于他的任命，政府中的四名宰相是滿員的，他們是蕭倣、崔彥昭、鄭畋和盧攜：他們都有很高的名望、豐富的經驗和能力以及個人的正直品質。他們組成了一個遠比懿宗時期的任何宰輔大臣更為能干的集團，因為懿宗很少任命這樣高水平的宰相，而且在一定時期內從不多于一人或二人。新任命的宰相們最緊迫的任務是結束在懿宗時期迅速蔓延的腐化現象。他們受命僅幾個月，政府就以大大提高了的公正和效率進行工作，與此同時，前朝一些精心追求形式的做法被廢除了。[[55]](#_55___Xin_Tang_Shu____Juan_183_D)

### 社會問題與盜匪活動的增加

朝廷中的新領導面對一種令人氣餒的局面。僖宗嗣位后不久在874年初，當時的翰林學士盧攜向皇上呈上一份感人的奏疏，詳細敘述了自9世紀60年代以來日益加劇的危急狀況。[[56]](#_56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這確實是令人沮喪的描述：前一年是一個干旱和饑荒的年頭，作物只有一半收成，秋天的莊稼幾乎顆粒不收，冬天的蔬菜很少。饑荒地區面臨著大批人餓死的危險，百姓被迫以野果和樹葉為食。但是即使面對這樣的災難，政府仍不能豁免任何附加的賦稅，農民為了完納正式的賦稅被迫賣掉房屋的木頭，將自己的子女賣為奴婢，他們的妻子受雇為仆人。

盧攜極力主張立即采取救濟的措施，在百姓“無生計”以前應停止征稅。朝廷決定聽從他的建議，但官員們發現這樣做是不可能的，皇帝發布的救災詔令被看成為一紙空文。

這有力說明了這幾位宰相在處理各地許多大問題時面臨的基本情況；甚至考慮最周詳的政策在面對如此大量的和難以處理的問題時也幾乎不可能貫徹下去。但是他們確實很周密地考慮了國家的狀況。

875年正月，一項涉及全面政策的詔令作為皇帝的大赦令的一部分發布了。[[57]](#_57___Tang_Da_Zhao_Ling_Ji____Ju)這是唐代發布的詔令中最長和最詳細的一件。它徹底地和有根據地仔細討論了當時許多嚴重的社會、財政和制度上的問題，并提出了詳細的改革方案。它表現出驚人的樂觀態度，如果不是在這樣不祥的時間里發布，它可能產生一種有利的效果。它顯示了對王朝面臨的主要問題和爭端的清醒認識，并證明了唐代后期的衰落不能僅僅歸咎于行政管理的無能。因為政府至少暫時是由一些明智的有才之士所掌握，他們全都富有經驗，了解民情，而且對王朝忠心耿耿。

到9世紀70年代時盜匪活動已很普遍。但它的發生率在黃、淮之間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區最高，在那里政府頻繁的壓榨和經常的自然災害結合在一起，引起了嚴重的社會混亂，致使許多人被迫亡命，出沒于荒地原野之中，流為盜匪。大平原的西邊和南邊是丘陵地區，盜匪能自由來往，而官軍進入則需冒很大的危險，沿海一帶是為數眾多的重要產鹽區，由于政府壟斷的鹽價愈來愈高，這些地區私鹽販賣盛行。武裝的盜匪集團從事這種非法的貿易，不時搶掠他們容易到達的長江流域的商人和村鎮。

在僖宗統治的初年，盜匪活動進入一個新階段。在此以前盜匪已是一個足夠嚴重的問題，地方上的高級官員因此得向皇帝提出詳細的奏疏，并精心地提出防止的辦法。盜匪固然危及公眾安全和行政管理的穩定，但更嚴重的是對商業和政府賦稅形成威脅。然而到9世紀70年代初，有些規模類似小型軍隊的盜匪，已能劫掠農村，甚至攻打有城墻的城市，從而直接與政府對抗。在盜匪集團與政府軍之間發生了嚴酷的戰斗，875年開始了持續將近10年的大規模鎮壓盜匪的軍事行動，在此期間中國幾乎所有地區的權力結構都完全改變了。這種沖突不僅僅是權力突然和全面崩潰的結果，雖則官員中間敗壞的風氣使得政府難以對混亂局面作出有效的反應，它也是幾十年前開始的長期社會混亂和普遍軍事化的最后階段。

撇開盜匪不說，許多跡象表明9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政權是不穩定的，正在多方面受到挑戰，而這在幾年以前是不可想像的。例如，在869年，在洛陽以東只有60英里的陜州的百姓驅逐并羞辱了一個傲慢而且殘酷的觀察使，因為這個官員在發生旱災時拒絕他們請求救濟的呼吁。政府決定與其懲辦百姓，不如黜免這個官員。在這個例子中表現出來的謹慎顯然是受到龐勛叛亂前車之鑒的影響，因為這場叛亂經過一年的殘酷戰斗以后，平定還不到一個月。下一年，淮西光州的百姓趕走了他們的刺史，有些官員極力主張應該嚴懲該地百姓，以防再發生同類事件。874年臘月，僖宗剛嗣位不久，京師正東南的商州百姓采取同樣行動反對他們的刺史王樞。當時他用低價購買百姓糧食，百姓便毆打他，并殺死了他的兩名助手。在平時，這樣的事情將被視作反對政權的大逆不道行為。但在9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這已是很普通的事了。[[58]](#_58_Guan_Yu_Zhe_Xie_Shi_Jian__Ji)

這一類事件盡管使唐王朝感到煩惱，卻很容易鎮壓下去，而不致成為大叛亂的中心。有責任的官員能被撤換，幾支軍隊可以進駐，肇事的頭目們則可以被孤立起來并處死。它們本身并未表現出大的危險性，但卻表明了更深更廣泛的動亂的可能。在這樣的城市騷亂中也表現出同樣的絕望情緒，它把在正常情況下僅僅是地區犯罪集團的盜匪團伙變成了大規模的組織良好和充分武裝的聯盟：它能夠在軟弱的政權面前為所欲為而很少受到懲罰。

盜匪武裝的力量和它能夠把眾多的軍隊投入戰場的突然性，像在此以前由裘甫和龐勛領導的叛亂那樣依靠的是那些被社會冷落了的居民的廣泛支持。被剝奪了生計的鄉村貧民數量有增無已，對于許多人來說最方便的出路便是去參加遍及各地的某一團伙。

### 盜匪團伙的社會構成和組織

關于大量盜匪團伙支持者的情況我們所知不詳，只能作最概括的說明。歷史學家稱他們為亡命，即離開家庭或家鄉而放棄了正規社會中的合法地位的人們。這種逃離本土的人們既能成為單純的流浪者，也能成為盜匪集團的成員。盜匪集團的首領們樂于供養這些被社會趕出來的難民，由他們來壯大首領們的追隨者的隊伍。

盜匪中曾以耕地為生的人占多大比例，究竟有多少人從事低下卑賤的職業，或沒有任何正式的生計，這些都無法知道。社會的分裂和動蕩在唐代已有很長的歷史。逃亡農民在從前通常是占領空地，或者在數量日益增加的莊園中受雇為佃農或勞工。但是農民的真正大規模流亡開始于安祿山叛亂之后。例如在8世紀70年代末，獨孤及奏報說，90%的舒州（安徽）農民僅能糊口，“不持一錢，以助王賦”。[[59]](#_59___Quan_Tang_Wen____Juan_386)這種被剝奪生計的無地農民比正常的受嚴重壓迫的農民更易淪為盜匪。當然，有些農民是被裹脅進盜匪集團的，但是大多數保有一片土地的農民不敢冒劇烈變化的風險。

如果不管參加盜匪集團的個別成員的社會背景如何而堅持給王朝的對手貼上“農民起義者”的標簽，那么我們就歪曲了對唐王朝挑戰的性質。這并非說農民完全是消極被動的。在那些年代里經常有這樣的農村暴動，農民時而參加，時而回去務農。但是王仙芝與黃巢沒有領導過這種自發的農民起義，他們也不曾被視為“農民英雄”。王仙芝、黃巢及其同伙率領的是盜匪集團聯盟，并不是一支農民的軍隊。它們在鄉間制造恐怖，用武力奪走一切能夠奪走的東西，他們對普通農民來說實際上已經成為經常的和令人生畏的威脅。他們從未致力于促進農民的利益，一旦條件有利，就急于接受朝廷的招安。

雖然我們對盜匪集團的廣大成員所知甚少，但對他們某些領袖的情況卻有內容充實的報道。這些人部分出身農村紳士，部分來自窮困的階級。其中某些人有一功名或受過正規的教育，因此渴望能躋身官場。黃巢和他的重要伙伴如朱溫、李罕之都受過中上等教育，黃巢本人甚至被地方選出參加過進士考試。[[60]](#_60_Guan_Yu_Huang_Chao__Jian___J)其他一些盜匪首領則來自我們可以稱之為農村社會中的“強人”階級：這些人有自己的能耐和地方勢力，但是他們跟地方上的官場沒有多少往來，又沒有受過能夠把他們引向仕途的正規教育。朱慶就是這樣的一個強人，他是令人生畏的人物，在宋州（河南）以劫掠為生。無論他們原是有文化的杰出人物，或是一些我行我素和無法無天的地方強人，所有盜匪的首領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他們精于武藝，而且以他們抗擊官軍的成就判斷，他們中有些人顯然是杰出的軍事戰術家。

這種“敵對精英人物”在唐代后期的出現絕非偶然。[[61]](#_61__Di_Dui_De_Jing_Ying_Ren_Wu)進入仕途的機會已經逐漸減少。政府對專賣稅的過分依賴導致了廣泛的私鹽貿易，而敵對的精英人物很快便加以利用；他們中許多人積累了雄厚的財富。這些人也在個別村莊與更大的社會之間作為中介而扮演關鍵的角色，所以我們發現他們在最大的盜匪聯盟中充當首領，是不足為怪的。

對于他們的同伙即對于聚集在一起用武力奪取不能用其他方法得到的東西的人們來說，這些強人既不是恐怖分子，也非盜賊，而是任俠的范例，而任俠強調的是相互忠誠和互相保護的思想。他們是不可忽視的，能夠“權行鄉里，力折王侯”。[[62]](#_62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某些盜匪首領在他們與政府之間發生公開沖突以前已經擁有這樣的地方權勢。然而，以后他們通常切斷了與家鄉的聯系，變為“流寇”。

另一類盜匪首領是從底層崛起的。盡管他們中某些人有過農民的經歷，大多數出身農民，但是他們自己并非農民。[[63]](#_63__Nong_Min__Yi_Ci_Zhun_Que_Di)他們有時被稱為“流氓”或“地痞”，這些人沒有正當的職業，不是正常社會結構的組成部分。[[64]](#_64_Li_Ru____Jiu_Wu_Dai_Shi____J)這種農村流氓將同伙組成一種專事劫掠的軍隊，可以隨時奉命出動，他們在唐代后期的盜匪軍隊中扮演主要的角色。

某些盜匪首領成為王仙芝以及后來黃巢的同盟者，某些人則在中國其他地方帶領規模較小的農村幫伙獨立行動；另一些人似乎就是罪犯。例如，與王仙芝同鄉又是他的主要支持者之一的畢師鐸所率領的黨徒以“鷂子”著稱。后來建立吳越國的錢镠，“少拳勇，喜任俠”，“以解仇報怨為事”。王建原是一個懶漢，他“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他最后在四川建立了前蜀國，在他的朝廷中充斥著唐王朝的著名的舊官僚。然而，人民并未忘記他的舊綽號“賊王八”。徐溫為南唐國奠定了基礎，“少無賴，入群盜中，以販鹽為事”。鐘傳在黃巢叛亂時獨自控制了江西，他“不事農業，恒好射獵”。[[65]](#_65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82_D)

唐代后期亡命之徒的杰出人物中另有許多人有著同樣的背景，他們都沒有正當的謀生手段，生活在刑事犯罪的邊緣上，再有一些人則出于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而難以適應任何常規的社會生活模式。有些人則是社會上的雜流，成為街頭藝人、屠戶或小偷。還有一些人是當兵的，少數人還是和尚，雖然我們知道有一人每次想入寺修行都遭到拒絕。[[66]](#_66___Jiu_Wu_Dai_Shi____Juan_15)

盜匪團伙的組織是難以準確說明的，當時中國官員也許對盜匪團伙知之甚深，但是官方史書中保存的報道不足以使人了解它們的內部結構，僅僅令人感到它們是一支組織很好的軍隊。例如，據《新唐書》敘述，在早期，好斗的王仙芝有“票帥”10人以上，其中7人留下了姓名。[[67]](#_67___Xin_Tang_Shu____Juan_225Xi)然而，其中有幾個人是自行其是的大獨立團伙的首領。例如，畢師鐸雖然支持王仙芝，但他有自己的追隨者，這些有名有姓者中間的另一人是柳彥璋，他是877年活動于江西的團伙。第三個人劉漢宏實際上參加了反對王仙芝的戰斗，搶劫了王的供應車輛，他是作為一支獨立的盜匪行動的，再者，除了《新唐書》的報道以外，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說明他是王仙芝的支持者，更不是他的“票帥”之一。在一個沖突不斷加劇的時代，盜匪團伙首領之間的關系的性質混亂是不足為奇的。但是它足以使人認為，唐朝政府可能完全誤解了盜匪集團這個陌生的組織。

王仙芝領導的并不是具有高度組織性的軍事機器，而是個別盜匪或盜匪集團的聯盟，它們每一股人都有自己的首領，其成員由個人忠誠或共同利益維系在一起。王仙芝自己的團伙聯盟總數有3000人，由各有二三十人以上的小團伙組成。一次百人之多的單獨襲擊如果不是一個特別大的團伙干的便是幾個較小團伙的聯合行動。王仙芝、尚君長和黃巢似乎都是這樣有能耐的領袖，他們能支配一批個別的團伙首領。這種高級的個人領袖作用和這種以個人關系維系的聯系，是中國盜匪或造反者聯合的特征，直到20世紀仍然如此。

加強這種個人紐帶的一種方法是把首領的姓氏贈予他的追隨者，這樣首領們便具有“家長”權。在黃巢控制下的八個首領共同使用相同的姓氏，互稱“兄弟”。沒有證據說明他們沒有真正的血緣關系，但很可能他們都是團伙首領中的伙兄伙弟，樂于接受他的姓氏以及他的“家長”式的領導。[[68]](#_68_Ku_Min_Yi_Ye_Dui_Xie_Yuan_Gu)這種虛假的親屬關系通常被皇族經常使用，在艱難困苦的時代里農村社會中行之更為普遍。唐代后期，賜姓之事在高級軍事統帥和他們的部屬之間也是很普遍的，至于皇室與它的最親密支持者之間，就更不必說了。[[69]](#_69_Jian_Shi_Ye_Zhu_Shui___Guan)

### 沖突的早期階段：王仙芝和黃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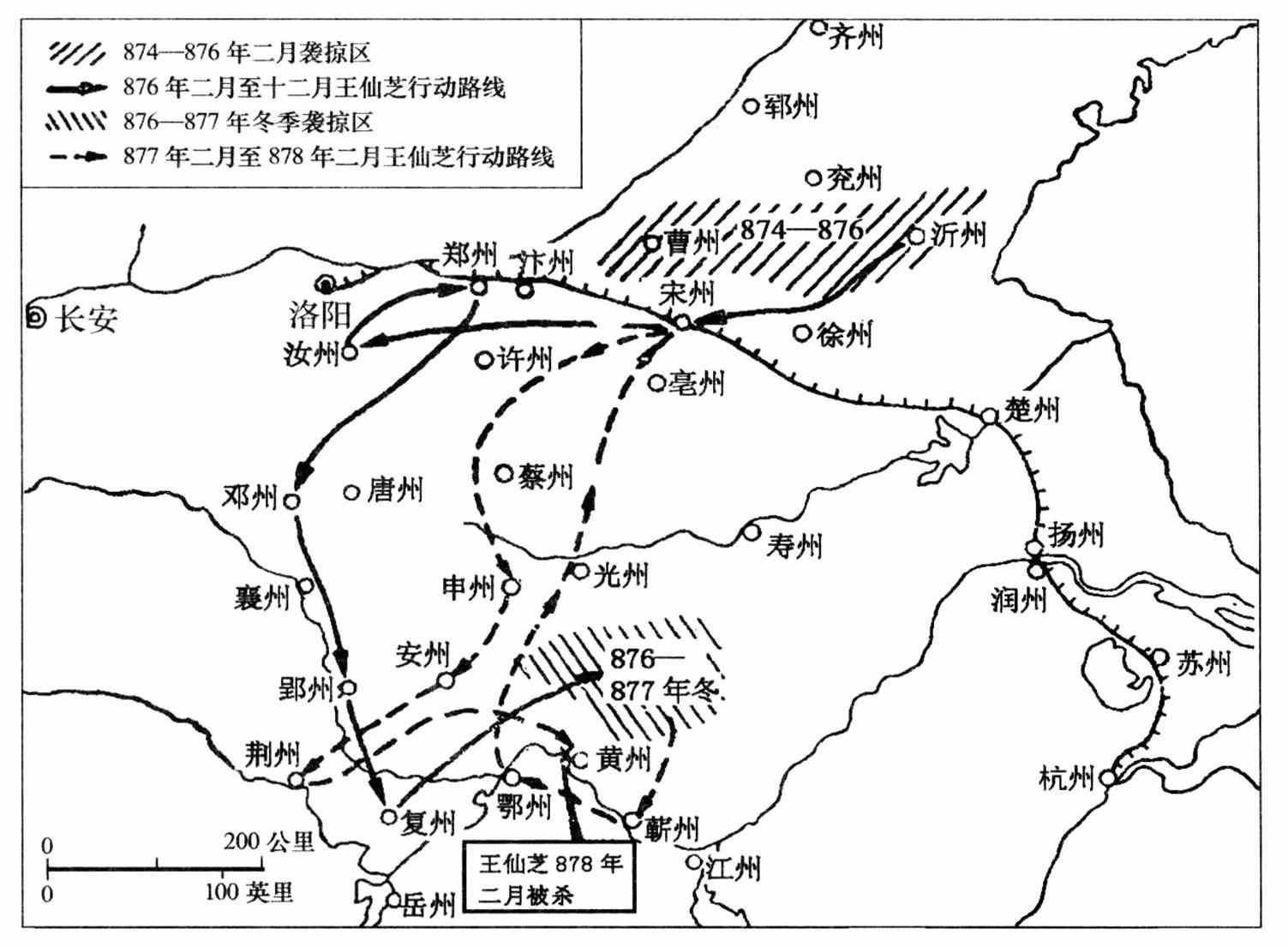
874年，僖宗即位整滿一年之時，有跡象清楚表明，來自盜匪集團的威脅變得不妙了。那一年年底，感化軍（改組的河南武寧軍）報告說，盜匪活動猖獗，它需要外來的援助。政府下令山東南部的幾個軍出兵支援。引起感化軍如此嚴重不安的盜匪可能是龐勛支持者的殘余勢力。[[70]](#_70_Guan_Yu_Zhe_Zhong_Jian_Jie_J)山東的節度使們對于派軍隊去感化軍并不熱心，因為他們也同樣面臨爆發的盜匪活動和地方騷亂。動亂立即擴大了：875年陰歷五六月間，不但在農村，而且在天平（山東西部）的州城都出現了真正的危險，至少半個世紀以來，天平的轄區一直是盜匪活動的一個中心。由王仙芝和尚君長領導的盜匪在875年陰歷五月攻打濮州和曹州；黃巢帶了幾千人立即響應。盜匪與天平軍的首府鄆州保持相當的距離，但鄆州的盜匪團伙卻參加了他們的隊伍。政府的最初反應與往常一樣。盜匪的攻打被認為是地方性的問題，應由地方軍隊處理。天平的節度使薛崇帶著軍隊進擊盜匪，但被打敗。

戰斗在875年逐步升級。開始對帝國的統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脅。王仙芝現在采用了大將軍的稱號，并發布檄文分送鄰近各地，指責政府政策不公平，行政貪污腐敗，這一檄文所宣布的目的類似于868年龐勛發布的“露布”，后者在叛亂地區的鄉村和寨堡中傳播，曾獲得巨大成功。看來王仙芝發出號召的意圖主要是想得到其他盜匪團伙的支持而不是爭取人民大眾。875年后期他拒絕接受兵變中的士兵參加他的隊伍，可能是認為他們的支持既無必要，又有危險性。當龐勛占領彭城之后，紳士們很快前來支持，但王仙芝則沒有他們的支持，黃巢在很久以后他占領長安前也沒有這種支持。少數定居的地方精英人物可能斷絕與自己地區的關系而支持盜匪領袖，后者襲擊一個又一個地區，既沒有占領疆土，也沒有在政治上鞏固自己的明顯愿望。他們期待的是一個穩定的新政權的出現。

這一年以后的一些日子形勢迅速惡化。黃河水災以及隨之而來的破壞性的蝗災大大增加了農民的困苦，造成了饑荒，并把更多的農民推向絕境而使之淪為盜匪。

在875年下半年，盜匪的襲擊已蔓延到十余州的廣大地區，往南遠及淮河。這些盜匪中的大多數都在主要首領王仙芝和黃巢之外獨立活動，他們組成了數百人到上千人的集團進行襲擊。政府試圖以優勢的兵力作出反應，命令河南和淮南地區五鎮的節度使和監軍使追捕盜匪，盡快地使受影響的地區安定下來。但是這證明是無效的，875年陰歷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神策將軍宋威極力主張建立一個指揮中心，協調該地區攻打盜匪的全部兵力。政府接受這一建議，并從禁軍中增派3000士兵和500騎兵作為支援部隊。宋威雖然年老有病，仍被指派為統帥。他是一位富有經驗的軍人，曾指揮過中國軍隊抗擊南詔，前不久在鎮壓龐勛叛亂中起了重要作用。

除了為現在的軍隊建立一個指揮中心之外，政府還采取了進一步的措施。876年陰歷正月，福建、江西和湖南的所有刺史和觀察使受命訓練士卒，帝國境內所有村莊“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群盜”。[[71]](#_7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在中國的南方，這是政府在該地區兵力不足的證據，同時也顯示出盜匪已成了普遍的危險。這是唐代首次由中央政府正式建立以地方自衛為目的的民兵組織。這一措施與政府通常不讓農業人口保持武器的政策相反，表明朝廷已覺察到危機是何等的嚴重。隨著法律、秩序和正常的社會控制在地方上的解體，地方一級必須采取行動了。



地圖20 874—878年王仙芝團伙之聯合

可是，政府仍然決定發動一場由宋威指揮的決定性的殲滅戰去擊潰盜匪的軍隊。876年，盜匪向東移動，進入沿海地區，攻擊沂州州城。那年陰歷七月，在沂州一場大戰以后，宋威上報說，盜匪已被消滅，王仙芝已被殺死。宋威因表面上的勝利而得意洋洋，便遣散了他麾下的各地軍隊，自己回到了平盧。朝廷為之狂喜，大臣們獻上了賀詞。但不過幾日，事情就已弄清楚，盜匪非但沒有消滅，而且仍像以前那樣危險，依然襲擊和洗劫整個地區。討伐軍現在自身也處于兵變的狀態，但在快要叛變投匪時，他們被挫敗了。對士兵的控制重新恢復，他們被送往戰場，并得到忠武軍的支援。為首次大規模討伐盜匪戰役的失敗而震驚的朝廷，現在開始調動軍隊來保衛通向洛陽和長安兩都的一些要道了。

宋威可能是為了邀功而故意捏造了王仙芝之死和盜匪軍隊被消滅的第一次捷報，其實這兩件事都未發生。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他是善于弄虛作假的。但宋威也可能把他的對手完全估計錯了。朝廷不清楚盜匪軍隊的內部結構，甚至不了解它的規模大小，經常加以夸大。

876年陰歷八月，盜匪向西移動，使東都洛陽大為驚慌。九月，他們在洛陽東南45英里的汝州取得一次引人注目的勝利，俘獲了刺史王鐐，他是宰相王鐸的堂兄弟。王仙芝和他的同伙尚君長得到朝廷赦免，但他們的反應是返回北方，攻打鄭州，只有在昭義軍派來了援軍后才被擊退。他們仍帶著俘虜王鐐，向南轉移，那里防御比較薄弱，農村也比較富裕。

876年陰歷十二月，盜匪集團到達長江中游，對鄂岳、淮西和淮南發起了一系列的襲擊。這一地區的守衛部隊比起北方的軍隊來駐守得更為分散，因而盜匪就可能為所欲為而不受懲罰。以前的宰相、淮南節度使劉鄴強烈要求增加兵力；政府下令重建的徐州戍軍（現在稱為感化軍）抽調數千人南下保衛它的轄區，對抗盜匪。這支軍隊在過去曾引起如此多的問題，新近又試圖把它遣散而未成功，政府卻在此時被迫動用它，這件事說明局勢已惡化到何等程度。

討伐軍統帥宋威拒不將他的軍隊主力移到宣武中部鄰近大運河和距離王仙芝當時攻擊的地區數百英里的毫州之南，這更加深了危機感。宋威可能希望保存他的力量，集中全力保衛河南，旨在皇朝一旦崩潰時為他自己建立一個強大的地區基地。但是他的公開理由是害怕遭到數年前政府處分與龐勛作戰的軍隊的最高統帥康承訓那樣不公平的待遇。在鎮壓龐勛起義之后，康承訓被提拔為河東節度使，并領宰相銜。路巖和懿宗的寵臣韋保衡懼怕他會在朝廷行使權力，便彈劾他故意逃避戰斗和有其他不法行為。盡管在870年，特別是出于政治目的，朝廷沒有能力對軍隊的最高統帥采取嚴厲的行動，但它仍然將康承訓免職，降為王傅，最后將他流放到遙遠的南方。[[72]](#_72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一位有功的將軍遭受這種愚蠢羞辱以后，常見的恐懼、懷疑和反抗在文官中也開始出現了，更危險的是，它影響了王朝的高級將領們。

在873年僖宗嗣位以后，康承訓被召回京師，但已經做過的事情是無法抹去的。宋威也曾率領軍隊攻打過龐勛，顯然他不會忘記在康承訓身上發生過的事情，所以害怕遭到同樣的命運。因此他和自己的副手曾元裕達成協議，聽任盜匪逍遙，以免遭到康承訓的下場，萬一不幸王仙芝稱帝，他們還可以給予支持。于是曾元裕移兵長江中游，但不進擊，而是等待事態的發展。[[73]](#_73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

僖宗統治開始時大臣之間明顯的協調與共同的使命感，此時因對付王仙芝的政策和戰略上的強烈爭吵而被破壞無遺。當宋威的背叛行為已經明顯時，鄭畋強烈地要求更換他的統帥職務，以便對叛亂者能夠發動更主動的戰役。他要求把指揮權轉交給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崔安潛是一位前宰相之弟，和鄭畋一樣都是社會和政治的精英人物。876年陰歷八月當盜匪經過他的境界時，崔安潛發動了強有力的攻擊，從而表現了自己的軍事才能。但是其他宰相不愿將最高指揮權交給一個文官。與著名的將軍高駢有密切聯系的盧攜激烈反對該項任命，緊張的摩擦在兩位宰臣之間出現了。崔安潛的任命始終未能實現，因為宋威直率地拒絕把職務拱手讓人，而任何將他免職的企圖幾乎肯定會驅使他公開叛亂。

在876年冬天，唐王朝的前景看起來確實是暗淡的。北方的大部分地區繼續為不斷增加的盜匪團伙所蹂躪，它們只遇到不起作用的抵抗。官軍的統帥宋威不愿追擊盜匪軍隊，而似乎更關心建立他自己在地方上的勢力，甚至不惜為一個由成功的盜匪首領所建立的新王朝效勞。由于盜匪團伙滋擾，國內局勢十分危急，但使事態變得更壞的是，為保衛邊境而派往嶺南的北方軍隊又發生了一次兵變——這與幾年前曾促使龐勛叛亂的局勢一樣。浙西還有王郢為首的一個較大叛亂（見下文），那里在859—860年時曾發生裘甫之亂。

正當形勢看上去最黑暗的時候，政府交上了沒有料到的好運，暫時減輕了壓力。876年陰歷十二月，盜匪攻擊長江中游的蘄州。這時宰相王鐸的堂弟王鐐仍是盜匪的俘虜，他代表王仙芝寫了一封信給蘄州的刺史裴偓。王鐸是裴偓應進士考試時的試官，這使兩個人之間建立了一種牢固的關系。裴偓同意給王鐸寫信，懇求為王仙芝提供一官半職。令人驚訝的是，當宰相們被召集起來討論這件事時，有些人居然認為，王仙芝僅僅是“小賊”，很容易壓服，他的威脅要比龐勛小，而龐勛的叛亂在一年之內就被鎮壓了下去。確實，盜匪集團中還沒有人達到像龐勛那樣的組織水平和取得那樣廣泛的支持。但是宰相們應該意識到，此時的盜匪機動靈活，領導有方，而最重要的是他們分布的范圍比龐勛時代廣泛得多。由于內部意見不同而造成的分裂，使他們完全看不到王朝生存所受的威脅是何等嚴重。然而我們可以設想，王鐸不懈的說情既是出于對于他堂弟安全的關心，也是考慮到公共的危險，他最后成功了，王仙芝被任命為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

無論王鐸或政府都沒有料到這樣做對于事情的解決是不夠的。另一位盜匪首領黃巢對于政府沒有同樣授予官職而大發雷霆，他毆打并用劍刺傷王仙芝。其他盜匪頭目懼怕首領做官以后他們自己可能的后果，便威脅要將王仙芝殺死。王仙芝終于被迫拒絕朝廷的任命，讓他手下的人洗劫蘄州，作為安撫。蘄州城被夷為平地，許多居民被殺死。裴偓逃往鄂州，這是最鄰近的駐有大量政府軍的州城；朝廷派去授予王仙芝官職的特使匆忙逃回京師；倒霉的王鐐仍在盜匪手中。[[74]](#_7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2)

王仙芝未接受官職的最重要后果是盜匪集團的主力分裂成了兩大股。留下3000人和王仙芝、尚君長在一起，繼續在長江中游劫掠，另外2000余人跟隨黃巢回到山東。這種分裂的意義不應過于強調，因為據說黃巢只是帶走了他自己原來的追隨者，盜匪首領們仍有可能重新聯合以實現大規模的襲擊，而明年發生的事情確實也是如此。但是對王朝的直接威脅暫時得以避免。

877年，即僖宗即位的第四年，叛亂活動遍及全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只有很少地區幸免于難。王仙芝和黃巢仍是令人畏懼的。他們現在能夠攻擊任何地區而不受懲罰，甚至能夠襲擊地方官軍戍守的鎮所在地。877年陰歷二月，王仙芝攻打鄂岳鎮所在地鄂州。同時黃巢攻陷鄆州（他起家之地天平鄉的所在地），殺死了該鎮節度使。然后他向東移動，攻打沂州；該城在一年多以前曾遭襲擊，那時政府令宋威為統帥發動了一場全面的懲罰性討伐，但是在今天卻沒有為保衛該城采取認真的措施。

877年陰歷四月，朝廷降詔概括地敘述了它企圖用以處理各地大規模動亂的政策。[[75]](#_75___Tang_Da_Zhao_Ling_Ji____Ju_1)詔旨首先表示了對問題嚴重性的關切，然后滿懷信心地斷言所有盜匪將肯定地被迅速鎮壓下去。由于詔旨繼續為投降的盜匪提出了有利的條件和官職，這種對必然勝利的自信心在當時就有所降低。詔旨中指出了當時的騷亂是何等的普遍：“江西、淮南、宋、毫、（宋威的討伐軍守衛的州！）曹、潁，或攻劫郡縣，抗拒官軍；或窘厄商徒，俘掠進奉。出彼入此，鳥逝風驅。”詔旨反復地強調，對于犯罪分子來說，失敗是不可避免的；表達了皇帝對臣民慈父般的關懷：“恨不均其衣食，各致豐肥”。然而，對于那些繼續進行破壞的人，皇帝發誓“用兵無悔”。

這道詔旨主要的真正對象是“王仙芝及諸道草賊頭首等”。政府提出寬宏大量的投誠條件。首領們將破格授予官職、爵位和賞賜。當然，這僅僅是指形式上的官階和有名無實的官職，近一個世紀來朝廷即以此等職銜授予不能直接任命的藩鎮官員，用以維持名義上的聯系。投降的盜匪首領將“于大藩鎮內，量材與職額衣糧”。一般匪徒將遣回田園安置。

詔旨的后一部分指示地方官員應如何處理拒絕投降的盜匪團伙。他們應選擇勇猛的將領和軍隊，采用靈活的戰術去對付敵人。能夠俘獲一個盜匪首領和他的300徒眾的將領，允許超授將軍，并以千緡為賞。襲擊并殺死盜匪，奪回資產、武器或搜集情報者，將按他們的功績授予官職和獎賞。政府完全知道它的將領們不肯努力作戰，詔旨中也包括嚴厲的警告：任何人逃避戰斗，將令“本州道勘尋，準軍法處分”。這只能意味著處以死刑。

這份詔旨的最后一節也許是意味深長的，它指示城鄉當局尋求能夠率領農民抗擊盜匪的才杰勇敢之人。他們也將得到官職和獎賞；詔旨提到地方民兵領導人的兩個突出例子，他們已經升到鎮的高級職務。

軍事形勢變得如此糟糕，這樣一種公開的政策聲明是朝著希望恢復原狀前進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但是它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盜匪的自信程度和政府的虛弱程度兩者都可以從盜匪的下一個目標宋州（由宋威的討伐軍守衛）看出。王仙芝和黃巢現在又攜手合作圍困宋州，頂住了被圍軍隊突圍的所有嘗試，直到長安派來的將軍張自勉帶著忠武的7000士兵向盜匪進攻，使后者慘敗和遭到重大的傷亡，情況才發生變化。但是，宰相們并沒有利用這一勝利來恢復他們的協調意志與統一目標，而是在如何繼續征討方面吵得更兇。王鐸和盧攜要將張自勉的軍隊交給宋威指揮，以期宋威終會開始積極討伐盜匪；鄭畋則堅決不同意，他堅持說，張自勉和宋威之間的關系很壞，如果張被迫屈居宋威之下，他將被殺掉。在爭辯中每位宰相都曾提出辭呈，但都遭到拒絕。辯論繼續了整整一年，言辭也變得愈來愈尖銳刻毒。在張自勉的打過勝仗的軍隊被置于宋威手下一位將軍的指揮之下時，張本人遭到宋威的造謠中傷，因此鄭畋爭辯說，張自勉是“因功受辱”，事實上正是他的功勞才使政府能夠維持對大運河的控制。此外，鄭在前一年曾徒勞地建議以崔安潛代替宋威統率討伐軍，因為崔安潛攻打盜賊取得多次勝利，但未曾記功。鄭畋又斷言，王仙芝提出投降不下7次，宋威都隱瞞不報。鄭畋對宋威的指責可能是有充分根據的，但是免去他的統帥之職實際上無法做到。[[76]](#_76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

877年后期，盜匪們回到長江中游，在那里他們幾次大敗于宋威的副手曾元裕手下。政府再一次向王仙芝提出投降的條件。這時王仙芝的同盟者也被包括在大赦之列，他的幾個主要黨羽，包括尚君長在內，出發去京師。然而宋威在中途劫取了他們，并且報告說，他們是在一場戰斗之后將他們俘獲的。這份報告引起了懷疑，一名御史被派去進行審查。但真相已不可能弄清，因為宋威在御史到達以前已將盜匪首領們處死。

877年的戰爭本身是重要的，但同樣重要的是朝廷中政治派別活動的加劇以及京師政治領袖和他們的統帥之間發生的不斷加劇的緊張和猜疑。唐朝對張自勉在宋州的決定性的勝利未加酬賞，這和康承訓在鎮壓龐勛之后受到侮辱的情況相似。由于對忠誠的和有戰功的統帥一再未能給予應得的獎賞，政府失去了日益減弱的對王朝的好意和忠誠，而這本是它最珍貴的財富。

877年的臘月，唐王朝終于在發動對盜匪的進攻方面取得成功。在黃巢劫掠他4年前首次起事的所在地匡城之后，政府恢復了張自勉的戰地統帥職務，并派他率領東北各路人馬大舉攻打黃巢。同一月王仙芝襲擊荊南的治地江陵，這是長江中游的戰略中心。政府已愚蠢地將荊南置于無能的楊知溫的管領之下，他甚至在盜賊抵達城市外城時仍繼續賦詩。楊知溫最后向北方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求救。李福迅速調兵攻打盜匪，他的軍隊得到500名沙陀騎兵的支援，所有遇到的盜匪均被消滅。王仙芝急忙在江陵劫掠，殺死了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然后逃之夭夭。

然而，這時逃走并非易事。當王仙芝率領隊伍回到山東時，他遭到討伐軍副統帥曾元裕的追捕；曾元裕經過一年無所作為之后終于果斷地行動起來攻打盜匪。在淮西南部申州的一次重要戰斗中，王仙芝的軍隊遭到慘敗，傷亡重大。曾元裕的勝利使政府指派他代替宋威為討伐軍的統帥，張自勉為他的副手。政府還將富有經驗的將軍四川統帥高駢調到荊南，他帶著1.5萬名全副裝備的軍隊來到長江中游地區。

878年初政府軍元氣顯示出重大的恢復。在王仙芝退往南方以后，政府軍最驚人的勝利來到了，曾元裕的追捕軍隊在蘄州的黃梅縣消滅了這支隊伍。王仙芝本人被殺。由于王仙芝的主要伙伴尚君長已在不久前被殺，沒有任何首領能將全黨集合在一起了。尚君長的兄弟尚讓帶著許多殘余的盜匪投奔在山東的黃巢，而剩下的人則分成小的團伙，獨立地活動于長江流域。

黃巢向南方推進

這樣，黃巢終于成為主要盜匪隊伍的無可爭辯的領袖，盡管這時它們最不走運。他現在采用了“沖天大將軍”的稱號，這也許是表明他決定全力進行反對王朝的斗爭。這是政策上的完全轉變：在此以前盜匪按傳統方式在各地區間進行騷擾，從黃河平原向淮河、長江流域作季節性的往返移動。對重要城市的襲擊有時被看做“造反”的開始，但還沒有認真地打算推翻政府。盜匪并不想建立對土地的控制，王仙芝幾次試圖投降表明，盜匪沒有長期的政治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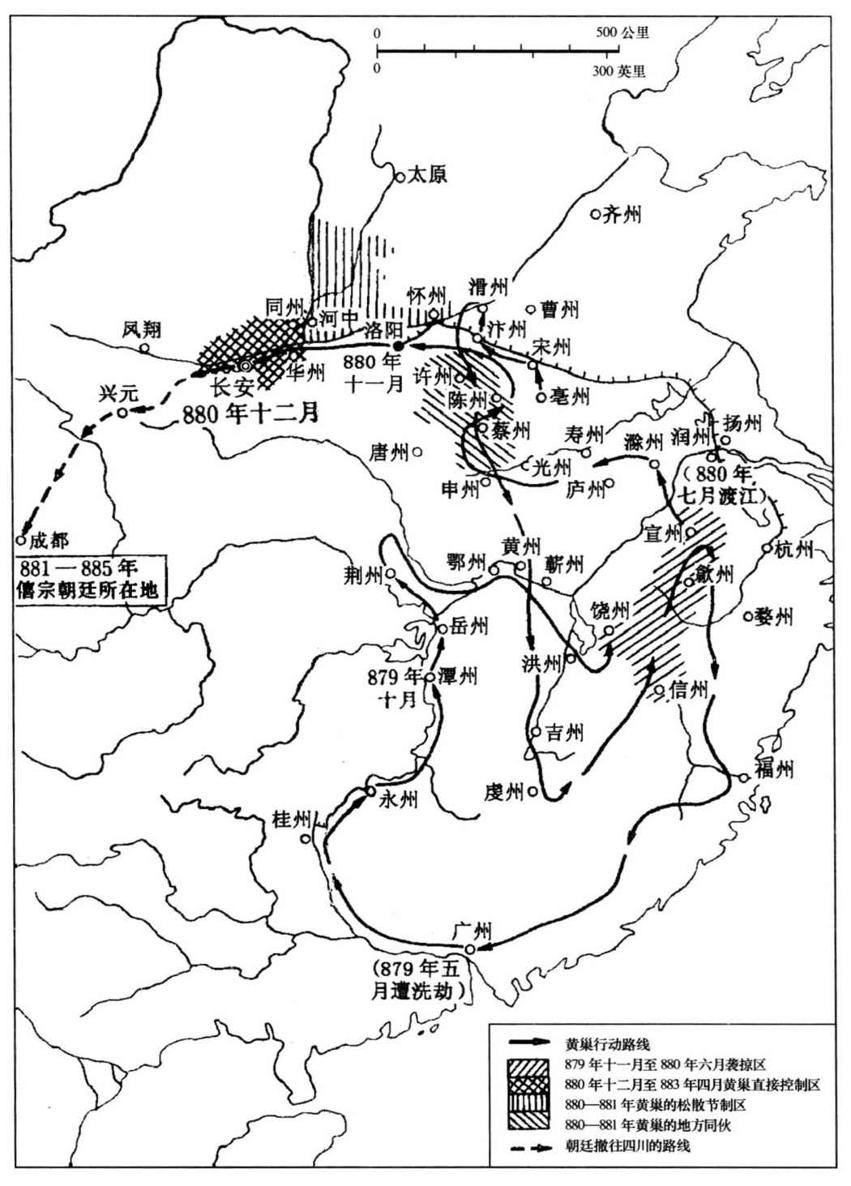
在當上盜匪集團的總領袖之后，黃巢和政府軍之間最初的小規模交鋒全被擊敗，他可能采取的直接對抗的任何計劃都被擱置起來。他和天平節度使通訊聯系，磋商投降的條件。政府封黃巢為禁軍的一名將軍，命他在鄆州投降。但是，也許是記起了前一年王仙芝的主要伙伴們試圖向宋威投降時被背信棄義地俘獲并遭殺害之事，黃巢決定不去冒險投降。增強了信心的政府終于認識到適當獎賞它的將軍們的必要性，于是授予山南節度使李福以宰相的職務；李福曾向圍攻江陵的盜匪發起決定性的進攻，并擊敗了王仙芝。

政府的復蘇使它能建立從黃河地區開始的針對盜匪軍隊的有效防御。張自勉被指派為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他將黃巢往西經河南朝洛陽方向驅趕。兩年以前，洛陽曾因盜匪軍隊的接近而陷入恐慌之中，但這時龐大的防御工事已準備好了，一支萬名戰士和新招募士兵組成的隊伍由一位特別任命的防御使指揮。這些準備使盜匪襲擊洛陽的任何想法成為泡影，黃巢于是改弦更張，向南轉移，但這次不是到長江中游，而是到長江三角洲地區。更加令人驚奇的是，黃巢渡過大江進入浙西。龐大的盜匪集團滲入長江以南，這還是第一次。政府有理由宣稱已將他們逐往南方。它的最高統帥曾元裕移兵進入長江下游地區，攻打仍然在那里活動的一些從前王仙芝的支持者，與此同時高駢則移軍浙西，阻擋黃巢回竄北方。朝廷有理由認為，局勢差不多又得到了控制。

在878年的其余時間內，盜匪集團總的來說處于守勢，盡管他們在長江以南未設防的地區贏得了一些勝利。然而，他們現在遠離京師，黃巢的威脅似乎正在消失。宰相們現在圍繞著對南詔的外交政策發生了劇烈爭吵，結果以鄭畋和他的對手盧攜二人同時免職告終，另外他們還面臨來自北方的強大的擴張主義者沙陀突厥的威脅。黃巢和他的盜匪軍隊繼續移離對王朝來說是生命攸關的地區，通過幾百英里廣闊的人煙稀少的地方，指向福建的首府福州。878年陰歷九月，政府中止了對盜匪的討伐，并指定曾元裕將軍為平盧節度使，接替剛死去的宋威。黃巢經過福建崇山峻嶺的進軍，只是他橫掃華南的全程更長的開端，進軍最后打到了大海港廣州。這種幾乎無阻擋的行軍在地圖上給人的印象是深刻的，有時被視為黃巢力量強大的證據，這種力量使他有可能隨意縱橫萬里地移動。然而，導致他向南方進軍的原因不是廣東富庶的情景，而更可能是政府對他的成功的追擊，以及北方難以對付的防御布置。

在878年最后的幾個月，當他往南移動時，黃巢開始認真地考慮擴大支持自己的社會基礎。經過福建時，他努力爭取地方紳士支持，不過收效甚微。[[77]](#_77___Xin_Tang_Shu____Juan_225Xi) 878年陰歷十二月，福州遭到劫掠，無防備的觀察使逃走。但是，高駢從浙西派去的討伐大軍屢次擊敗黃巢的隊伍，俘虜了許多他的重要伙伴，把他趕往更遠的南方。

盡管黃巢顯然處于逃跑奔波之中，他仍被視為對朝廷的威脅，宰相王鐸自愿親自率領一支遠征軍攻打盜匪。王鐸被任命為荊南節度使和南面行營招討都統。他選擇李係作為副手，任命李為湖南觀察使，此人是一個出身于顯赫家族的無能的官員，但其忠誠則是沒有疑問的。李係屯駐在潭州（長沙），以防止黃巢由嶺南搶先北上。



地圖21 878—880年黃巢的行動路線

879年陰歷五月，當黃巢迫近廣州時，他仍爭取談判，想取得有利的投降條件。他與浙東觀察使崔璆、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聯系，請求他們居間說情，使他能得到天平節度使的職位；天平在山東，是他的老根據地。[[78]](#_7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這個請求被拒絕了，黃巢接著要求任命他為廣州節度使。這個要求也被拒絕了，因為廣州貿易實在太寶貴了，絕不能把它交給一個盜匪的首領。朝廷建議代之以禁軍中一個較低的職位，但黃巢認為此議是一種侮辱。他立即對廣州發動猛烈的攻擊，一天之內便攻占此城。他俘獲了節度使李迢，并一再試圖達成一項有利的協議，但被對王朝表現出狂熱和罕見忠誠的李迢所拒絕。黃巢殺害了勇敢的李迢，并在暴怒之下洗劫廣州，使這一大港口變成廢墟。有的材料估計死者高達12萬人，其中大多數是來自東南亞、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世界的外國商人，而當時廣州全部人口約20萬。許多中國人逃往福建。[[79]](#_79_Guan_Yu_Zhong_Guo_Ren_Bi_Nan)那時期來自西拉甫港的著名阿拉伯商人阿薩德詳細敘述了廣州遭到野蠻毀滅的情景。[[80]](#_80_Guan_Yu_Zhe_Xie_A_La_Bo_Ji_S)

朝廷很清楚，黃巢無意留在熱帶地區。政府搶在他北返以前采取行動，希望在遠離支持他的基地的江南將他圍困，并予以消滅。在廣州洗劫之后，一場大規模的對抗已不可避免了。

黃巢北上

當劫掠嶺南時，黃巢手下許多人死于瘧疾。剩下的人要求回到北方，“以圖大事”，因此盜匪軍隊開始迂回北上，沿途他們搶劫了湖南和江西這些地區。[[81]](#_81___Jiu_Tang_Shu____Juan_200Xi)他們由靈渠通過南嶺的分水嶺，沿著湘江流域前進，就像龐勛在十年前那樣。879年陰歷十月，他們到達潭州。王鐸的副手李係駐守這座城市，然而他不愿戰斗。因此黃巢能夠在一天之內拿下了它。這種災難性的懦怯（這是選擇統帥不按照才能而根據其家族與朝廷的關系造成的）對于遏制黃巢的努力來說是一次重大的失敗。當時盜匪軍隊處于最衰弱的時候，如果李係能給予黃巢以強有力的打擊，那將是獲得最后勝利的一個真正機會。

然而，更嚴重的是長江中游戰略中心江陵（荊州）的失守，它是李係的上級，討伐軍統帥王鐸放棄的。由于對方在人數上大大超過自己，王鐸向北撤退，宣稱他要去和屯駐在北面30英里的荊門的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的隊伍會合；但是王鐸事實上一直退到百英里之外的襄州。江陵城留給王鐸的屬將劉漢宏鎮守，但早在黃巢到達以前，它已被政府戍軍洗劫和放棄了。

增強了信心的黃巢渡江直趨荊門，劉巨容在那里嚴陣以待。劉巨容派出自己的軍隊和500名沙陀突厥人對付盜匪。黃巢的士兵有許多被殺，但是盡管有人力勸劉巨容追逐并殲滅殘余的盜匪，他卻讓他們逃走了。他的理由反映出王朝已失去了地方的支持。他說：“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吝賞，事平則得罪，不如留賊冀后福。”[[82]](#_82___Xin_Tang_Shu____Juan_225Xi)如上所述，對王朝冷酷無情地處分它的軍事將領的抱怨是十分普遍的，另一些地方長官也故意避免與起義的隊伍正面對壘。但這是一個朝廷大員主動希望王朝滅亡——這顯然是劉巨容縱匪逃走的原因——的首次事例。劉巨容對王朝的敵視可能與宋威的情況相同，當討伐龐勛時，他們二人都在康承訓軍中任職，毫無疑問，劉巨容和宋威一樣，都擔心在攻打黃巢勝利后也成為政治犧牲品。然而，一旦唐朝滅亡，節度使將有可能在任職地區鞏固他們的權力，或者等待新的統一王朝的出現，或者繼續割據自雄。

由于直接通往長安的道路受阻，黃巢東移順江而下，重走10年前龐勛的老路，沿途糾集了各地的盜匪團伙（其中許多曾與王仙芝合作過），又恢復了力量。他們一度受到駐防在江西的政府軍將領曹全晸的沉重壓力，但曹全晸放棄了追擊盜匪的計劃，因為朝廷以未經解釋的原因決定更換他的職務，這使得黃巢得以通行無阻地順江而下。

長江下游地區一直是政府賦稅的主要來源，現在則是王朝防御的關鍵部分，它的重要性從選擇高駢來防守這一點就可以證明。高駢無疑是唐朝地位較高的軍隊統帥，享有非凡的聲望。[[83]](#_83_Gao_Pian_De_Chuan_Ji_Jian)他的家族源自渤海，有幾個成員忠誠地在神策軍中世代任職。高駢曾在北方邊境任職，是一名與黨項人作過戰的杰出將領。當吐蕃在西方入侵時他組織過防御，并在遙遠的南方指揮過反對南詔入侵的戰役。從869年到875年，他作為節度使抑制了山東的盜匪活動，可是在他轉到四川以后，天平又爆發了嚴重的動亂。當王仙芝在878年初在長江中游得手之后，他揮師前來，一年以后他曾在浙西征討黃巢取得成功，并把盜匪軍隊逐往南方的廣州。

黃巢在879年后期進入長江下游地區，一度襲擊宣歙、浙西和江南的廣大地區。但在下一年初情況發生了變化，高駢終于認真地對盜匪采取行動。880年陰歷三月，高駢派遣他手下地位最高的將領張璘前往長江以南，給了盜匪軍隊以沉重的打擊。政府想要大獲全勝，便以幾支北方部隊增援高駢，并任命他為諸道行營都統。高駢召集鄰近諸部隊并征募大量地方新兵，使自己軍隊的總數達7萬人。黃巢的軍隊雖則人數更多一些，但不能與高駢的訓練有素的軍隊相對抗，880年陰歷四月，盜匪似乎幾乎完全被擊潰。王仙芝的早期伙伴之一王重霸向張璘投降，同時黃巢失去了另一位重要伙伴常宏，后者也帶著自己的數萬人馬投降了。黃巢退到江西的饒州，隨即來到福建邊境正北的信州。每一件事看來都對政府軍有利，官軍的將領們紛紛向京師告捷。[[84]](#_8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在880年陰歷五月，局勢完全改觀。這個關鍵時期的事情已引起了人們對進攻黃巢戰役全過程的精心猜測，而許多疑點一直模糊不清。[[85]](#_85_Guan_Yu_Zhe_Ge_Wen_Ti_De_Xia)然而確鑿無疑的是，黃巢仍有可能避免幾乎確要被擊敗的境遇，他突破了唐朝在長江下游的防線，并開始向北方的東西兩都進軍。據一份資料說，黃巢曾大量賄賂張璘，使之停止進攻，然后同意向高駢投降，條件是任命他為節度使。據這份記載說，高駢接受了黃巢的投降，但是不愿同參與戰斗的其他部隊的將領分享功勞。因此他讓這些部隊各回原地。當黃巢得知這些軍隊已經被遣回淮河以北時，他突然中斷了與高駢的關系，并在一次隨之發生的較大戰斗中殺死了高駢手下最重要的將領張璘，給予他的軍隊以沉重的打擊。盡管人們對導致這個結果的一些事件仍有種種懷疑，但這一巨大勝利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在此以后黃巢和他余下的伙伴在浙西和宣歙發動了一系列成功的襲擊，最后于880年陰歷七月在采石渡過長江。[[86]](#_86_Zhe_Shi_Yi_Ge_Hen_Zhong_Yao)這是一個完全沒有料到的重大轉折點。

高駢的軍隊不但未能阻止黃巢渡江，而且當黃巢向洛陽挺進時也未能向北方提供支持。高駢的無所作為十分自然地激起了最猛烈的批評。對于沒有經驗的文職官員來說，像李係和王鐸那樣放棄職守，是一回事；而對于政府最有經驗的指揮一支龐大軍隊的將軍來說，他竟允許一個已經嚴重削弱了的敵人伺機渡過了長江并讓他在自己轄區揚長而去，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有些歷史評論家把責任全歸罪于高的親信方士呂用之，他對高有巨大的影響。[[87]](#_8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3)但是，高駢的無所作為是難以用玩忽職守來加以解釋的。

高駢在他負責的淮南地區面臨一種極其復雜的形勢，當時淮南是中國盜匪活動最猖獗的地方。高不但要和本地的盜匪作斗爭，而且要和從北方襲來的大批盜匪團伙以及和淮南以北開小差的嘩變士兵作斗爭。甚至在他來到淮南以前，給盜匪首領封官是被認為必須的，高駢繼續執行這一政策，任命數人為刺史。[[88]](#_88_Jiao_Zao_De_Ren_Ming_Jian)這些盜匪首領現在成為高駢的將領，協助他向周鄰地區擴展勢力。由于淮南是這樣一個具有爆炸性的地區，高駢很容易因為對黃巢征剿過猛而失去自己的位置。揚州對于唐王朝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但它作為一個獨立政權的基地已有長期的傳統，所以高駢不愿拿他的位置去冒險是不足為奇的。高駢還意識到，他不能再依賴朝廷的堅決支持，因為他的主要政治伙伴宰相盧攜得了重病。這樣，他有許多理由要鞏固自己在淮南的地位，因此他向朝廷送去一系列自我辯護的奏疏，聲稱黃巢渡江時有60萬人，這是一個十分荒謬的數字。[[89]](#_8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

一旦越過了政府在長江下游的防御，黃巢通往東都的道路便暢通無阻。唐王朝試圖在洛陽東南要沖的忠武的溵水布置大軍以阻擋盜匪軍隊。這個計劃慘遭失敗，這倒不是因為黃巢軍隊力量強大，而是由于守軍之間互不信任，再加上他們幾乎普遍地不愿為搖搖欲墜的王朝去賣命。感化節度使曾招募到士兵3000人，條件是保證他們在州城駐防。當他們接到命令開往溵水時，幾乎激起了一次兵變。他們到達以后，野心勃勃的地方將領周岌害怕這些軍隊一旦駐在他的轄區就會威脅他的勢力，便讓他自己的士兵滲入他們駐防的城市屠殺他們。感化節度使被追逐到襄陽殺死。周岌后來擔任了忠武節度使。另一個派去參加洛陽防御的唐朝將領齊克讓棄職而逃回了自己在山東的營地，而不是去與殘酷無情的周岌打交道。這樣，所有派去保衛東都的軍隊都因將領之間的猜疑和背信棄義而潰散，洛陽門戶洞開。

黃巢在渡過淮河以后開始表現出建立新王朝的野心。他采用了“天補大將軍”的稱號，并試圖加強軍隊的紀律，禁止他們搶劫。當他們在880年陰歷十一月進入洛陽時，該城官員無心抵抗，接他入城。齊克讓向朝廷報告洛陽已經丟失，他建議立即盡力加強長安的防御。

黃巢軍隊的戲劇性的進展，自然地吸引了我們的注意。然而真正顯示唐朝秩序瓦解的跡象倒不是盜匪軍隊如此大踏步地前進，而是各藩鎮的“勤王”部隊彼此之間爭權奪利大造自己的地方優勢的活動。只要政府能調度大部隊，它依然有其需要認真對待的力量。但879—880年的事件——王鐸和李係在戰斗中的失敗、劉巨容公開的不忠以及高駢保全自己地位的行為——標志著唐王朝力量的振興沒有任何希望了。

政府臨時加強長安防御的努力從開始便注定要失敗。宮廷的禁軍早已不再是一支有戰斗力的部隊，神策軍中的職務已成為長安富家子弟掛名的閑差。[[90]](#_9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他們中大多數人除了恐嚇京師市民之外，沒有戰斗經驗。當可能要他們去和叛匪作戰的消息傳開以后，許多人便到貧民中尋找替身。

京師的防務交給了宦官首腦、神策軍名義上的長官田令孜，但沒有證據表明他離開過京師去擔任京師東面諸關口的指揮，而控制這些關口對于防守京師是至關緊要的。田令孜的一名副將帶了幾千名完全沒有受過訓練的士兵去據守潼關，但只能供應他們幾天的給養。當他們看到叛軍迫近時，便亂作一團而潰散了。叛軍成群通過了潼關，進入京師所在的關內道，在那里被派去保衛京師的博野軍的嘩變士兵參加了他們的隊伍。由于帝國的軍隊完全潰散并處于混亂之中，京師的防御崩潰了。

黃巢在長安

880年臘月初五，長安落到黃巢手里。只有少數隨從陪同的僖宗帶著田令孜和500名神策軍，偷偷地從城中逃走，前往四川避難。相形之下黃巢的入城給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張直方將軍在許多官員伴同下出城歡迎叛軍。黃巢坐在一輛金色馬車上首先到達。隨后的軍隊——此時已達數十萬眾——全部穿著錦緞，他們的頭發一律扎著紅絲帶。他的騎兵直接開往城內，在后面長達幾里的路上塞滿了輜重，京師的居民表現消極但并未流露出害怕神情，他們擁上街頭，觀看接管的情形。[[91]](#_9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1)

王仙芝的余部首領、前一年參加黃巢隊伍的尚讓，現在作為黃的主要副手和發言人要求人民保持安靜；他說：黃巢為民請命，他起兵的目的是從不顧人民死活的唐朝統治者手中拯救他們。這個聲明被用來作為說明黃巢與普通百姓之間“階級團結”的證據，但事實上它和所有想要建立合法統治的人們所發布的自我辯護聲明是一種性質的，盡管他們有各自的背景和目的。[[92]](#_92_Jian_Ku_Min_Yi___Huang_Chao)真正重要的是，它首次清楚地表明，黃巢企圖在長安建立一個長治久安的政權。然而，這種帝王雄圖對于他手下的人是沒有吸引力的，他們追隨他的目的只是為了搶劫，而現在他們占有了最豐富的戰利品。在黃巢到達以前，長安的居民自己已經開始搶劫。黃巢完全沒有能力控制他手下的人，連續幾天他們洗劫了世界上這個最富裕的城市。各市場付之一炬，無數人民被殺死在街道上。

長安的精英階層是叛軍和城市平民兩方面的犧牲品。最受人憎恨的官員被拖出去殺掉。其他許多人則拋棄財產出逃。從京師被占領之后的大破壞來看，它顯示了長期蘊藏在平民百姓心中的對特權者的憎恨，同時也說明黃巢和他的支持者之間缺乏共同的目標。造反者的共同目的在這時是推翻唐王朝。但他們的不同利益變得愈來愈明顯，黃巢希望對他的支持者加強組織和紀律，使之成為一支堅強的軍隊；而他的許多支持者和普通士兵只希望洗劫城市，滿足于無政府狀態。

在這樣不祥的形勢下，黃巢采取了建立自己王朝的最初步驟。880年臘月十三日，他在含元殿登上皇位，宣布建立大齊王朝（齊是他家鄉山東的古稱）。他重新采用全部復雜的帝國制度，任命4名宰相，其中包括貴族家族的成員和他自己的副手。[[93]](#_93___Xin_Tang_Shu____Juan_225Xi)他的500名“驍勇”被選出作為“功臣”，這是給予開國皇帝的主要支持者的標準用語。他的主要官員得到頭等的軍事職務。黃巢只罷免唐朝最高層的官員；四品以下凡愿合作的官員允許留任。

黃巢試圖建立一個有活力的政權，但這證明是完全失敗的。公開顯示合法性和仿建一個復雜精致的政治體系是一回事，要使它運轉則是另一回事。他的基本問題是，他的人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愿望去擔任文職；而唐朝舊官員之所以同意為新政權服務，只是因為他們沒有別的選擇余地，或是出于被迫。

黃巢的政權證明是非常暴虐的。882年春天，有人在尚書省大門上題了一首詩，嘲笑這個政權。尚讓大發雷霆，殺死了在該省任職的官員們，并挖出眼睛，倒掛尸體；他還將大門的衛兵處死；殺死京師每一個能做詩的人；將其他識字的人罰作仆役。這一事件的結果是3000余人被殺。除了證明它絕對的殘暴之外，這次大屠殺標志著想在穩定新政權時得到受教育的精英人士支持的希望成為泡影。這也消除了獲得藩鎮支持的全部可能性，只有少數以與黃巢聯盟作為擴展他們自己在地方上勢力的獨立節度使除外。

黃巢占領的年代蹂躪了唐朝的這座都城，也破壞了長安所體現的政治秩序。這座城市再也沒有恢復過來。它的悲慘的毀壞在韋莊所寫的著名敘事詩中有最生動的描述；韋莊是當時的第一流詩人，叛匪軍隊攻占長安時他正在那里參加考試。這首詩名為《秦婦吟》，它描繪了“縱火、搶劫、強奸和吃人肉，農民裝作大臣，貴族軀體踐為血泥”。[[94]](#_94_E_H_Xiao_Fu____Chang_An_De_Z)這就是黃巢建立的新秩序。

### 僖宗在四川的流亡生活；阡能之亂

對于一個中國皇帝來說，被迫放棄都城通常是一種災難，但是僖宗逃跑的情況是特別丟臉的。當盜匪軍隊進逼而所有防御均已瓦解時，驚慌失措的官員們四處逃散。宦官頭目田令孜——更重要的是因為他是帝國軍隊的統帥——放棄了京師的防御，在夜深人靜時帶著皇帝逃出京師。隨從人員只有500名神策軍將士，四位皇子，幾位后妃。沒有一位官員獲悉放棄長安的決定。沙野軍的一些騎兵在長安數英里之外遇到扈從隊伍，要求皇帝返回京師。他們因為行為魯莽而被田令孜的軍隊殺死。

當僖宗再往西走時，他遇到了以前的宰相、現在的鳳翔節度使鄭畋。鄭畋勸說皇帝到鳳翔去，不要采取完全放棄關中這一后果嚴重的行動，因為西北平原是中國政府所在地。僖宗回答說，為了避免戰斗，他決定撤到在南方250英里之外的秦嶺山脈那一邊的堅不可摧的興元地區去，在那里他將招募軍隊，準備收復京師。皇帝要鄭畋和西邊的吐蕃聯合，并和西北一帶剩余的效忠王朝的軍隊協作，他還允許鄭畋可以便宜行事，因為朝廷一旦越過秦嶺進入山南，再要與它聯系就非常困難了。

皇帝和田令孜急于離開京畿地區，為了盡快離開，他們決定由駱谷道通過秦嶺山脈，這是一條最困難的和最險峭的道路，要通過幾乎高達9000英尺的諸山口。[[95]](#_95_Guan_Yu_Guan_Zhong_He_Si_Chu)它是只在緊急情況下使用的道路，而當時毫無疑問正處于緊急情況。皇帝日夜兼程，不到兩周的時間便到了興元。但他在那里只停了幾天，立即決定前往四川的成都。它在第二列大山脈大巴山那一邊的400英里處。這個決定一定使絕大多數人感到，唐朝的復興已沒有任何希望，至少在僖宗在位時是如此。四川是田令孜的勢力范圍，僖宗逃到那里表明他完全依賴于他所藐視的宦官。此外，四川從未受到中國其他地區的許多動蕩緊張局勢的困擾，但它現在正在遭受嚴重的內部騷亂。

四川的問題之成為一場危機，是由于政府任命陳敬瑄[[96]](#_96_Chen_Jing_Xuan_De_Chuan_Ji_J)為西川（其首府即成都）節度使。陳敬瑄原來不過是一個賣麥餅的，但幸運的是他是宦官田令孜的哥哥，因而在禁軍中得到高位。880年初，由于估計到政府可能被迫撤出京師，便決定選派一個與宮廷內部圈子有密切關系的人去擔任西川節度使，以代替自從878年以來擔任這一職務的崔安潛。崔安潛因拒絕過陳敬瑄到他的幕下任職，因而曾受到田令孜的敵視，同時他也是有勢力的宰相盧攜的老對頭。有一份資料說，四川的任命將授予一場蹴鞠比賽的優勝者，陳敬瑄碰巧贏了，但他與田令孜的親屬關系無疑決定了這一任命。[[97]](#_9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2)

甚至在陳敬瑄就職以前四川的問題就已經出現。由于他出身低賤，不為人知，當地的一個妖人前往成都宣稱自己是陳敬瑄，在一段時間內竟未被發覺。然而，一旦獲得任命之后，陳敬瑄實際上是令人生畏的，他在四川的統治既腐敗又殘暴，甚至在皇帝和皇帝的隨從到達以后仍是如此。在任職的兩年中他激起了一場大叛亂。問題部分的是由于田令孜對自己的軍隊和地方軍隊有厚薄之分引起的，后者是最忠于朝廷的軍隊，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882年陰歷三月，陳敬瑄在整個轄區遍布爪牙，表面上是了解其軍官們的缺點，實際上是為了斂財，因此使緊張的局勢趨于嚴重。資州的將領謝弘讓由于恐懼而加入一股盜匪，但在得到種種保證之后他被誘投降了。但事實上他被送到陳敬瑄處，遭到嚴刑拷打。[[98]](#_9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_3)

阡能是鄰州的一名官員。他聽到謝弘讓遭受酷刑之后，起誓要向陳敬瑄報仇。不過一個多月他的部眾已達萬人。他們侵入四川西南的邛、雅二州，進攻并占領了那個地區的城市。

陳敬瑄派遣7000人的軍隊前去鎮壓反叛。然而，他的嬌慣了的軍隊逃避戰斗，并且要求給他們所進行的任何戰斗發放額外的津貼。當阡能的叛亂開始表現出成功的跡象時，幾個其他盜匪團伙首領帶領幾千人前來參加。在四川其他部分有更多的盜匪首領起來造反，一度完全切斷了四川和中國中部的聯系。阡能叛亂最后在882年陰歷十一月被鎮壓下去。他和他的主要支持者被處死，但是四川仍然充斥著盜賊團伙。[[99]](#_99_Guan_Yu_Qian_Neng_Pan_Luan)

阡能叛亂發生在黃巢叛亂的巔峰時期，因此沒有享有它應享有的名氣。然而，它有幾個理由應該受到重視。首先，它的發生是皇帝直接控制下的一個道政府的官員的極端嚴酷和腐化造成的。但是它也表明，這時盜匪活動遍及全國，甚至比較平靜的地區也不例外，盜匪進行的聯合能在任何地方發生，特別是在和軍隊暴動聯合時，很容易在道一級地區形成嚴重的威脅。但是最后，我們也看到，即使中央政府已完全不能在全國范圍內維持秩序，這類叛亂仍能被控制在道一級水平上。事實表明，在我們現在將敘述的中國其他地區，這是一種標準的模式。道以下的控制并未遭到嚴重破壞，而一種新的秩序開始在這一級水平上形成。

地方民團的建立和地方的軍事化

阡能之亂并非朝廷在成都時四川發生的唯一較大規模的暴動。882年后期，另一較大的叛亂在黔州（今貴州北部）爆發，并迅速向四川南部和中部發展。[[100]](#_10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這次暴動是被一種新型地方軍事力量即韋君靖領導的民團組織鎮壓下去的。[[101]](#_101_Guan_Yu_Wei_Jun_Jing_Ji_Qi)韋君靖是四川西南部地方精英的一員，9世紀70年代末他開始在劍南東道的首府資州的圍部組織和聯合鄉的防衛。這是一種地方性的組織，旨在控制當地的騷亂和盜匪活動，它的形成是出于對黃巢或一些重要盜匪團伙（它們從前曾和徘徊于長江流域的王仙芝聯合）會打進四川的恐懼。

在882年的暴動發生時，韋君靖率領他的民團擊敗造反者，此后他保持著強大的力量。890年當一場大規模的軍隊叛亂在四川西部爆發時，劍南東道的節度使授權他保衛本道以抗擊叛亂者的侵犯。他有能力動員一支2萬名民團組成的軍隊，消滅了27個叛亂者的據點。在此以后，政府任命他為普、合、昌、渝四州的都指揮，他的隊伍被改編為荊南軍。892年，他在昌州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堡壘，這時他聯合起來的軍隊已有四五萬人，由34支民團隊伍組成。

這種地方民團力量當然是在8世紀以來的特定基礎上（例如在安祿山侵略河北以后）建立起來的。[[102]](#_102_Jian_Gu_Chuan_Dao_Xiong___G) 9世紀下半期，對地方民團的需要迅速增長，因為地方的社區在盜匪和散兵游勇的不斷增長的威脅下被迫采取保護自己的措施。[[103]](#_103_Guan_Yu_Tang_Dai_Hou_Qi_Jia)在僖宗當政時，政府終于認可這種大規模民團的組成。

這樣一種地區防御體系的核心通常是由一個地方精英人物領導的個人軍隊，他通常是一個著名的地主。強有力的地主在地方社會中有巨大的影響，特別是在8世紀雇傭眾多佃農和依附者的莊園大規模增長以后更是如此。他們常常有力量反抗地方政府的代表。在秩序日趨崩潰的時期，如果發生盜匪襲擊，這樣的地主損失最大，在鄉村組織地區防御時他們也就成為當然的領導者。

較大的地方防御體系在某些集市上出現，甚至把一個殷實地區的自衛武裝聯合起來的更大的防御體系，也圍繞著某些駐兵的鎮或鎮市逐漸形成。駐守在這樣的鎮市中的地方民團稱為義軍，這個名稱表示它是一種相對于官方組織而言的民間武裝，與地方官軍并無關系。

許多這樣的高級民眾武裝逐步并入地方節度使的指揮機構，其領導人稱為義軍鎮將、防御使或團練使。這類頭銜不但使地方民團首領們具有軍事權力，而且也有一定程度的司法和財政權力。鎮成為一種低于縣一級的行政管理中心，它的鎮將與其說是地方防御組織的首腦，不如說是地方軍事體系的一名軍官。[[104]](#_104_Ju_Chi_Ying_Fu____Suo_Wei_J)

大量民團已在860年鎮壓裘甫之亂時被使用過。僖宗朝為了控制875—877年在同一地區發生的嚴重的王郢兵變，使用地方防御隊的規模更大。[[105]](#_105_Guan_Yu_Wang_Ying_Zhi_Luan)

王郢是鎮海（浙西）節度使下面的一名將領。從874年初開始，節度使由趙隱擔任，他以前曾任宰相，僖宗即位后被派到那里。作為一個軍隊統帥，趙隱既沒有經驗也沒有能力，他不僅沒有給忠于職守的部下以適當的酬賞，甚至沒有供給他們足夠的基本物資。趙隱不重視屬官的要求，于是王郢便領著一伙人沖進倉庫奪取武器和給養。他立即擁有近萬名部眾，襲擊浙西北部諸州。叛亂者還有船隊，沿海游弋，襲擊他們登陸的任何地方。

由于政府的最高級軍事統帥們忙于在長江以北對付王仙芝和黃巢，一個名叫高杰的官員在876年陰歷七月被任命為沿海水軍都知兵馬使去征討王郢；高以前擔任過的最高職務是廣西某一偏僻地區的州刺史。他看來取得了某些成績。876年末，王郢試圖談判投降，要求給他一個浙西的地方職務。長時間的談判以失敗告終，王郢拿下了浙東的溫州。政府從京師派了一名自己的將軍宋皓指揮討伐，由他率領一支約1.5萬人的軍隊進攻王郢。王郢沿海岸而下移向浙東的明州和臺州，15年前裘甫曾劫掠過這一地區。叛亂者終于在877年初被鎮壓下去，這是在王郢因部眾背叛而喪失了一半力量以后發生的事。

盡管王郢叛亂與黃巢、王仙芝起義相比規模不算大，但它仍是在一個朝廷的重要地區發生的嚴重騷亂。對付王郢戰役中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鎮壓暴動的政府軍隊的構成。政府軍的大部分是常規部隊，有些是地方部隊，另外一些部隊則是從北方調來，包括來自河南的武寧、宣武和忠武軍的部隊。但是政府也接受了由地方精英成員所指揮的地方民團部隊的相當可觀的援助。這些指揮官中最著名的是來自杭州的董昌，此人自立為全部民團組織的首領。[[106]](#_106_Dong_Chang_Chuan_Ji_Jian)

在鎮壓了王郢暴動以后，這種民團組織既沒有解散，也沒有轉入地方自衛體系，而是合并到了道的軍事編制中去。董昌被任命為杭州正南的石鏡鎮的鎮將。他的副手名叫錢镠，以前是杭州的青年團伙的首領。該團伙以杭州八都而知名，他們曾對抗王仙芝和黃巢的軍隊，成功地保衛了杭州和它的主要城市臨安。[[107]](#_107_Guan_Yu_Hang_Zhou_Ba_Du_De) 879年，他們阻擋了對杭州的一次大規模襲擊，自此黃巢幾乎完全避開了這個地區。首先，董昌是完全忠于朝廷的，曾在數次攻打浙西地區割據獨立的節度使的戰役中出力，其目的是重建王朝對這一地區的牢固控制。887年，他成為浙東觀察使，他的副手錢镠接任杭州刺史。他們兩個人現在為控制浙西而開始了一場劇烈的斗爭，董昌在895年自稱獨立的羅平國皇帝。896年董昌被殺后，錢镠取得浙西大權，并在10世紀初年被衰弱的唐王朝冊封為越王和吳王。921年他建立了獨立的吳越國，這是十國中最繁榮和最重要的一個。這樣，在50年期間，它由起初的一個地方自衛組織，幾經擴展，轉變為一個大的地區性獨立國家，直到978年才最后為宋朝所征服。

我們對韋君靖的民團組織和杭州八都所了解的情況遠比其他這類民團組織要多。它們肯定不是孤立的，而且它們顯示了這個權力瓦解時代的基本特征。道的政府不管怎樣獨立，它本質上是政府設置的，可是，這些新的民團組織是地方武力的產物，是作為嶄新的權力結構借以產生的重要機制的一種，它扎根于地方社會，是從這個時期動蕩不定的環境中產生出來的。

四川的流亡朝廷

僖宗逃到成都以后實際上成了首要宦官田令孜的囚徒；田令孜指揮在四川的帝國軍隊，并通過他的兄弟節度使陳敬瑄控制這整個地區，但愈來愈多的重要官員逐漸都來投奔這個流亡朝廷，各地向僖宗送來貢賦并作出各種支持他的效忠表示，盡管仍只有數人相信王朝有復興的可能。

流亡朝廷的大臣們仍然爭吵不休和受派系活動的支配，就像在黃巢勝利以前那樣。宰相中如曾于880—881年、883—887年兩度任職的裴澈、881—889年任職的韋昭度，他們的地位都因和宦官結盟方得以保持。韋昭度是田令孜的堅定的支持者。[[108]](#_108_Wei_Zhao_Du_Chuan_Ji_Jian)奴態十足的裴澈沒有實權，被同僚們蔑視。站在對立面的是王鐸，他在881年末被派往關中指揮作戰；還有蕭遘。

蕭遘于881—886年任宰相，他是田令孜最強有力的政敵。[[109]](#_109_Xiao_Gou_Chuan_Ji_Jian___Ji)他有很高的個人威望，直系祖先中（包括他的父親蕭寘）有三人任過宰相。他充滿了出生于世家大族的人的自信，而且喜歡將自己比之于大貴族出身的宰相李德裕。他公開藐視懿宗朝的寵臣韋保衡，因而也是這個寵臣的眾多政治受害者之一；在懿宗朝的大部分時間中，他在外地度過，直到在僖宗時才被召回朝廷。盡管他毫不動搖地反對田令孜，后來還試圖用武力消滅宦官，但當朝廷留在四川時，他是沒有辦法采取任何積極行動的。

另一位宦官的有影響的敵手是鄭畋，他在將黃巢遏制在京師地區時起過重要作用，在此以后于882年回到了朝廷。鄭畋是在878年和他的老對手盧攜一起免去宰相職務的，這是他們在朝廷中就帝國軍隊的指揮權和對南詔的政策發生劇烈爭吵以后的事。毫無疑問，他的強硬的觀點和尖刻的性格造成了朝廷中很多的摩擦。當他到達成都時，他在一次與高駢的措辭激動的往來通信中重新揭開了舊創傷，他在信中繼續主張必須由文官來領導對付黃巢的戰爭。他也反對田令孜，而田令孜則與他的對手盧攜有密切聯系。他對僖宗有很大的個人影響，僖宗無疑尊敬他，而他也已證明自己是一個忠誠的和有才能的統帥。但他又是一個容易激動的人，一年多以后，他于883年退休，由柔順而無足輕重的裴澈取代。

在這些流亡的歲月中，有兩件事特別值得注意。第一，宦官和朝廷官員之間的敵視繼續迅速增長，在884—885年特別厲害。其次，無論他們內部如何傾軋，那些同一出身的舊貴族精英成員（在懿宗朝他們被排除在最高級官僚之外）繼續壟斷著最高層官職。即使在那些極端危急的日子里，每一位宰相都是最高層政治和社會精英的成員。盡管他們是由來已久的和著名的官僚陣營的代表，盡管當王朝在渡過空前的危急關頭時他們多少能賦予朝廷以一定程度的尊嚴和穩定，但是宦官控制了僖宗，他們在政治上是虛弱的。

宦官控制朝廷也妨礙了帝國在各地重新樹立其權威，因為和政治精英的大多數人一樣，京城以外的節度使們也都堅定地反對宦官控制政府。僖宗即位之初的短暫的政治復興已經蛻化為一種無可救藥的政治局面，從此王朝再沒有振興起來。

叛亂的瓦解

對于黃巢從一個固定的基地指揮大規模戰役的能力來說，第一次考驗是在占領京師后幾個月來到的。對京師的主要威脅來自鄰近的鳳翔的效忠王朝的軍隊，他們是由以前的宰相鄭畋統率的；鄭畋要求皇帝留在關中未成，即被授權負責協調西北的勤王軍隊。黃巢派遣一名使節前往鳳翔，答應赦免這個地區，如果向他投降的話。鄭畋決定戰斗，但他的一些軍官寧可觀望長安的形勢發展，眼下看來黃巢想使鳳翔中立，如果辦成，那將是一個巨大的成就。鄭畋終于能夠重新集合支持王朝的力量，這主要是因為他對王朝表現出熱烈的忠誠。他向四川的皇帝送去一份用自己的血書寫的奏表，發誓要組織忠義的部隊收復京師。除了西北各地的駐軍以外，還有許多禁軍留在京畿區，鄭畋能立即在鳳翔集合起一支人數眾多的軍隊。皇帝恢復了他的宰相職務，任命他為諸軍行營都統，有權委任自己的副將。[[110]](#_11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881年陽歷二月，黃巢派遣他的主要將領尚讓和王播率領5萬軍隊前去攻打集結在鳳翔的隊伍。他們相信這場戰斗能輕易取勝，因為鄭畋是一介書生，不能真正打仗。黃巢的人馬自從來到長江以北后不曾遭到任何真正的抵抗，所以他們幾乎是漫不經心地向鳳翔前進，甚至不屑列隊行軍。想不到的是，鄭畋事實上是一位高明的兵法家，他將自己的副手朔方節度使唐弘夫安排在適當地方，伺叛軍迫近時伏擊他們。在一場嚴酷的和決定性的戰斗中，黃巢的隊伍被擊潰了，政府宣稱此役殺死了兩萬人。

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勝利。除了造成黃巢力量的重大損失之外，它還是一年多以來（自從高駢在長江下游取得勝利后）政府軍首次表明有擊敗盜匪的可能。唐朝利用這次大勝的機會，要求進一步的支持以收復京師，派遣使節前往各地，勸說黃巢的三心二意的支持者，他們很快便背棄了叛亂的事業。880年末投降黃巢并被委任掌管洛陽周圍地區的諸葛爽，現在重申他對王朝的效忠，并被任命為河陽節度使。兩個月后，忠武的周岌也被說服放棄了對黃巢的支持，回頭效忠皇帝。目前最后一個黃巢的地方支持者是平盧的王敬武，但他只是一個次要人物。

881年最初數月發生的事情，對改變曾經導致叛亂者輕易征服京師的勢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叛亂者在長安統治的虛弱現在是明顯了。它不能建立一個有活力的政治機構，并且因在京師實行殘酷的和無意義的恐怖統治而失去了官員們的支持。它現在遭受了當頭一棒的軍事挫折，最后完全失去了各地節度使的支持。881年陰歷四月，京師曾暫時被政府軍奪回，但在一場流血的戰斗以后又被黃巢占領，緊接著便是長安許多居民遭到殘酷的屠殺，原因是他們歡迎過官軍的到來。使事情甚至變得更壞的是，京師開始缺之糧食，黃巢力求河中供應糧食，雖然那里的節度使王重榮是他從前的支持者，但是他的要求現在被斷然拒絕。王重榮殺死黃巢的使者，并和效忠王朝的河北義武（當時稱易定）節度使王處存結盟反對黃巢。

由于賦稅的喪失和各地支持的減少，當朝廷一邊的軍隊逼近時，黃巢只能繼續據守京師了。京畿地區在唐代從未遭受這樣的苦難。人民放棄了他們的土地和生活資料，逃往山林，躲避眾多的軍隊。盜匪占據的是一座空城，被切斷了一切供應，處于嚴重的和令人絕望的境地。谷物的價格猛增到天文數字的高度，吃人肉已是司空見慣的事情。[[111]](#_111_Jian___Jiu_Tang_Shu____Juan)

881年陰歷十月，鄭畋把鳳翔交給手下一個資歷較淺的將領李昌言管理，動身去四川與流亡中的皇帝會合。政府用王鐸（王在京師失陷后便到四川投奔皇帝）代替他。盡管兩年前黃巢從廣州北上時王鐸有過凄涼的失敗，現在他仍被任命為指揮唐朝反擊軍隊的諸道行營都統。忠貞有力卻又屢遭朝廷羞辱的將領崔安潛被委任為他的副將。選擇王鐸和崔安潛來領導恢復京師戰役一事表明，王朝只能依賴這些和唐皇室有密切政治聯系的官員，他們的忠誠是可靠的。此外就沒有多少人可指望，也沒有什么東西可再輸掉了。

當政府軍開始鞏固他們在京師周圍的地位時，黃巢幾次試圖向東擴展自己的力量。他的將領朱溫被任命為長安東北位于關內的同州的刺史，雖然朱溫在得到這個職務以前還必須攻下該州的州城。朱溫的下一步努力是渡過黃河進入河中，但被王重榮擊敗，這樣黃巢就不能進入一個能供應京師糧食和向東發動戰役的地區。882年陰歷四月，政府各路人馬成功地建立了半圓形的包圍圈，控制了通向京師北面和西面的要道。結果是切斷了黃巢在京畿的所有供應來源。西、北兩面包圍，南面是不可逾越的秦嶺山脈，再加上河中不能通過，政府軍明顯地希望黃巢將放棄京師，返回他在東方的老巢。沒有人熱切地盼望打一場大戰。

圍困京師一事有幾個有趣的特點，它們足以清楚地顯示該時期在政治上和地區上的極端的四分五裂。首先，沒有得到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支持，特別是高駢那里沒有派來一個人；高駢繼續一再向王朝表忠心，但并沒有派軍隊。他幾度試圖勸說僖宗將朝廷搬到他的道首府揚州城，但是控制著僖宗的宦官們是不會自己冒險投入像高駢這樣強有力的人物的手中的。[[112]](#_112_Jian_Cui_Zhi_Yuan___Gui_Yua)

另一個重要特征是勤王軍中出現了地區集團。當王鐸率領四川和興元軍隊屯駐在京師以北的富平時，涇原的軍隊則進駐京師以西的要沖，其他進攻部隊又構成了一系列聯盟。來自河東一河北地區的兩個強大的節度使，即河中的王重榮和義武（易定）的王處存，一起屯駐渭北；邠寧的朱玫和鳳翔的李昌言移駐長安西北的興平；定難軍（來自夏綏）節度使黨項人拓跋思恭和李孝昌的保大軍（來自鄜坊），共同屯駐渭橋，他們兩個人控制了關中東部和北部大部分地區。最后，忠武的周岌和蔡州的秦宗權派遣軍隊到長安西北的武功，二人原是參謀軍官，879年黃巢北上時他們奪取了河南各地的權力。

這些武裝中沒有人愿意在戰斗中與黃巢的仍然可怕的軍隊較量。所有的人都望黃巢向東撤退，誰也不愿意帶頭向黃巢發動進攻。王鐸致力挖掘一系列工事，目的是阻止黃巢向西方或南方移動，怕他指向四川。[[113]](#_113___Xin_Tang_Shu____Juan_225X)政府軍采取防御的姿態使黃巢有可能在京師周圍發動數次成功的局部性襲擊，但是沒有多少值得注意的收獲。尚讓率軍攻打長安以東的華州，但在一場沒有料到的夏季暴風雪中喪失了許多人。

黃巢在882年陰歷九月遭到一次較大的挫折，當時他派到京師以東兩個關鍵的州的刺史——即同州的朱溫和華州的李詳——都背叛了。朱溫背叛是由于他與王重榮對壘時沒有得到支持；當他的要求被拒絕以后，他知道黃巢的力量正在衰落，便決定向王重榮投降。當李詳也試圖效尤時，黃巢便將他殺死。但是即使在這些挫折之后，包圍京師的將帥們仍沒有一個人愿意向黃巢軍隊進攻。在這種僵持局勢下，政府終于同意召來李克用率領的沙陀軍。[[114]](#_11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用外軍來幫助鎮壓內部叛亂，這并不是第一次。李克用的父親在鎮壓龐勛叛亂時起過重要作用，為此被賜予國姓，并被任命為一個重要的邊疆地區的將領。但是他已證明是高度獨立的，在以前10年中他大部分時間從事于無休止的邊境戰斗，其中多半是在對付一個由唐朝支持的部落聯盟。[[115]](#_115_Jian_Liu_Shan_Li___Tang_Dai)唐朝在太原建立了強大的防御工事，旨在遏制沙陀，阻止他們侵入河東，因為他們能夠從該地輕易地襲擊京師。但是，如果想要打破京師周圍相持的局面，除了引進外族軍隊之外似無他法。883年正月，王鐸被解除統帥職務，戰役指揮由將領們聯合負責，李克用在他們中間顯然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人物。

883年初李克用帶了一支大約35000人的令人生畏的軍隊來到關中，他的軍隊是從邊境各族中召集來的。李克用移軍沙苑，這是同州以南的一個牧馬地，在那里他初戰便擊敗了黃巢的兄弟黃揆。黃巢決定在一場最激烈的戰斗中向李克用挑戰，派出15萬人向正在與忠武、易定和河中各軍會合的李克用進攻。883年陰歷二月十五日雙方軍隊終于在梁田陂相遇，打了一場大戰。黃巢軍隊完全被擊敗，被殺或被俘者不計其數。[[116]](#_116___Xin_Tang_Shu____Juan_225X)在屢遭失敗之后，黃巢首先確保了通過山嶺去藍田的道路，最后于883年陰歷四月退出京師。黃巢從京師的撤退是比較有秩序的；與之形成對照的是無紀律的各路官軍的迅速推進，他們搶劫和破壞了長安的剩余之物，使那些劫后尚存的宮殿盡變灰燼。

盡管失去京師，屢遭失敗，黃巢的軍隊仍是相當強大的。883年陰歷五月他派大將孟楷進攻蔡州，這是關中以外參加收復京師之戰的少數藩鎮中的一個。進攻一開始，節度使秦宗權立即投降，與黃巢合流。下一個目標是陳州，它位于河南中心，是忠武鎮的一部分。黃巢對它懷有強烈的仇恨，因為在以前向他進攻的許多戰役（從叛亂初期的宋威和張自勉等人的征剿一直到收復京師的戰役）中，忠武軍都曾起了突出的作用。陳州刺史趙犨知道自己的城市很可能是一個目標，便作了準備。陳州在四周建立了防御工事，制作了盔甲和武器，儲備了糧食。20英里范圍以內的人都遷入城內。大批壯丁被招募入伍，由趙犨的兒子和兄弟指揮。

趙犨的努力沒有白費。在蔡州輕易取勝的孟楷開始向陳州挺進。趙犨得知孟楷力量不足而且沒有準備，便發動一次突然襲擊，孟楷軍隊幾乎全被殺死或成了俘虜。孟本人也遭俘虜，并被殺死。

孟楷的失敗和死亡使黃巢大為震驚，他立時將全軍向東調動。他屯駐在陳州東南的溵水，這里是四年以前政府試圖建立聯合防御以阻擋他向洛陽前進的地方。883年陰歷六月，黃巢和蔡州的秦宗權聯合圍困陳州。趙犨誓死保衛陳州，并宣布凡建議投降者將處以死刑。他選擇精銳部隊開出城外，向圍城軍隊發動成功的襲擊。黃巢進一步被激怒了，決心讓軍隊長時期圍困陳州。于是他建立了指揮部并積草屯糧。

883年的整個秋季和冬季圍攻一直在進行，其間只是經常穿插了小的戰斗。盡管雙方都作了認真的準備，但供應越來越少。陳州城內有許多居民餓死。與此同時黃巢的兵馬蹂 躪了河南的12個州，不顧一切地為圍城的軍隊搜索糧食和物資。

當陳州的形勢漸漸令人絕望時，趙犨向鄰近各州迫切地要求援助。集合起來的援軍之所以一致行動，不是出于對唐朝的效忠，而是因為對黃巢的敵視和害怕。忠武（陳州平時歸它節制）節度使周岌從東面派來軍隊，武寧的時溥從西面前來支援，這時任宣武節度使的朱溫，也從北面來到。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三個人當時的官位都應歸功于黃巢：朱溫是作為他手下的一名軍官而得以發跡的，周岌和時溥是在879年黃巢北上的混亂時機奪得權力的。但在這時唯一重要的考慮是維持各自的地方據點，而對于這些將帥來說——他們實際上是地方軍閥——黃巢的軍隊是他們嚴重的威脅。僅僅因為各自的切身利益才激起他們共同來反對黃巢。

盡管援軍對他施加壓力，黃巢的軍隊對于任何反對他的單個將帥來說仍是非常強大的，而他們也沒有作出認真的嘗試去聯合進攻黃巢。朝廷再一次感到有必要請求李克用的援助，于是他便帶著一支5萬人的軍隊向東開拔。李克用和各地前來的節度使們同黃巢的軍隊前后進行了幾次大戰，其中多數給叛軍造成了嚴重的損失。黃巢終于被迫在884年陰歷四月解除了陳州之圍，從開始圍城到這時幾乎有300天。[[117]](#_117_Guan_Yu_Wei_Kun_Chen_Zhou_D)

陰歷五月，黃巢的主要營地被暴漲的洪水淹沒以后，緊接著又遭到一系列嚴重的失敗。朱溫贏得了對叛亂者的幾次決定性的勝利，一批黃巢的重要將領向他投降。當黃巢在過去6年中最重要的伙伴尚讓帶著1萬人向武寧的時溥投降時，黃巢知道自己末日將臨。他在聽到這個消息時暴跳如雷，殺死了他的其他幾個副將，帶著將近千人返回山東的老巢，李克用無情地緊追不舍。盡管失去了許多人和全部給養，但黃巢對這個地區很了解，仍能躲避李克用的追擊。

李克用在884年陰歷五月停止追擊黃巢，回到汴州。但時溥派了他自己的幾個將領（其中之一是新近投降的尚讓）前去消滅黃巢的殘軍。884年陰歷六月，黃巢最后在狼虎谷（在泰山東南約30英里處，離他大約十年前初次起事的地方很近）陷入絕境。據說他不愿讓李克用因俘獲他而得功，寧可自刎而死。他最早的支持者和他自己的家屬都被他的“外甥”殺死，而此人又為政府軍所殺。叛亂領袖們的首級先送到時溥處，然后又送往在四川的皇帝那里，皇帝下令將這些首級獻于太廟。[[118]](#_118___Xin_Tang_Shu____Juan_225X)

黃巢叛亂終于結束，但是高度地方軍事化的復雜模式由于叛亂已經定型，并將繼續許多年代。大規模的盜匪活動也沒有因叛亂結束而停止。黃巢的從子之一繼續率領一支7000人的隊伍襲擊湖南全境，大約在901年的某個時候終于為一個地方豪強所消滅。[[119]](#_119___Xin_Tang_Shu____Juan_225X)

## 晚唐時期中國權力的新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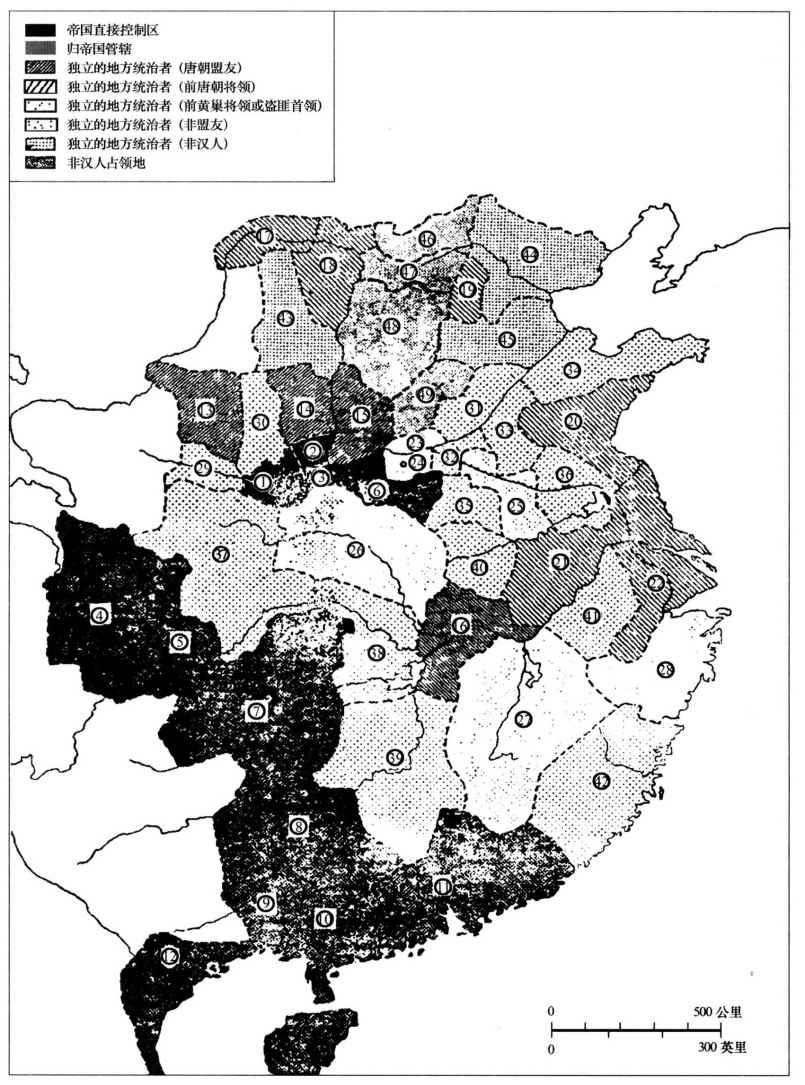
唐朝的最后20年是一個發生決定性變化的時期，在此期間中國每一個地區都在走向獨立割據的道路。在西北的關中京畿地區，所謂的全帝國的聯合（即在880年以后曾使搖搖欲墜的王朝得以站穩腳跟的皇帝、他的私人支持者、最靠近王朝的諸道及外族雇傭軍的聯合）的完全破裂，導致了907年唐朝的崩潰。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實，因為在唐代及其以前的時代里，關中地區許多世紀以來一直是中國政治權力和權威的無可爭辯的所在地，它此后再也不能恢復其中心地位了。

在黃河以南的中國中部和東部地區（今河南、山東和安徽北部）曾是唐朝向中國東半部擴展其勢力的支柱，許多強大而鬧獨立割據的節度使在那些年代里為了增加或保衛他們的領土而戰斗不休。朱溫（以前曾是黃巢的伙伴）是他們中的一個，883年唐朝任命他為汴州（宣武）節度使，他比其他節度使更能持久，更能戰勝他人，不斷地向四面八方擴展他的領土。907年他推翻了唐朝，完全毀壞了長安，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后梁；這個國家從907年延續到923年，在此期間朱溫和他的后繼者與沙陀的后唐國為了控制中國北部而戰斗。

在北中國的中部和東部（今山西和河北），唐朝的長期衰弱容忍了并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外族對廣大領土的占領。來自北方的外來民族有沙陀突厥、回鶻、鮮卑、黨項、吐谷渾等等，其中有一些長期居住在長城以內，另有一些則是新近侵入的，它們先后占領了北中國的大部分，只留下黃河以北的小部分地區仍由純粹的漢人統治。由沙陀偉大領袖李克用的兒子在923年建立的后唐王朝，是這些非漢族的強大力量最值得注意的結果。丟失給異族的大部分疆土最后由宋朝收回，但長城內的極北地區，即所謂十六州，則注定將繼續處于外族統治下達四個世紀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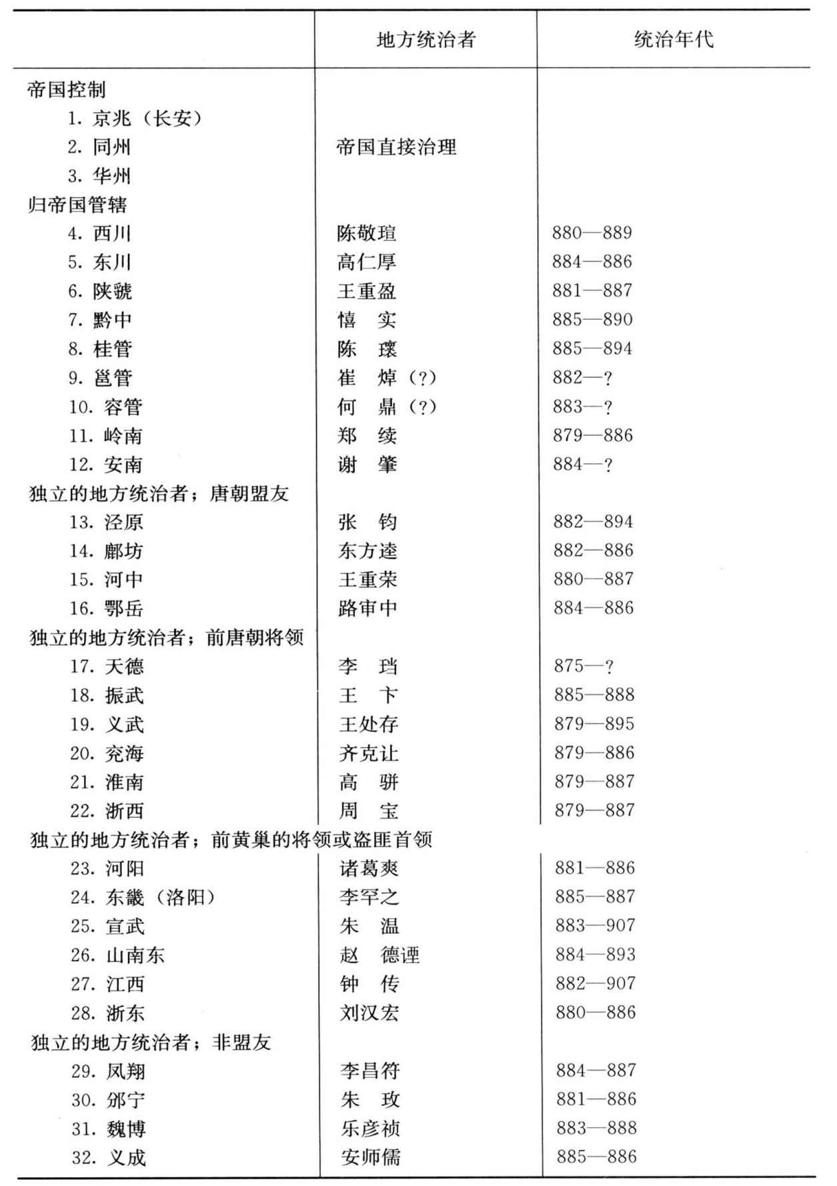
最后，在遠離北中國諸權力中心的地區，如南方長江中、下游地區和四川，以及中國本部的東北和西北角，在這個時期出現了若干獨立的不同文化的國家，它們統名為十國。

下面將依次討論這些地區的重大發展。地圖22和表11提供了黃巢叛亂以后中國權力分布的一般概念。不過應該記住，這時地區政府的正常模式幾乎完全破壞了。這份地圖上顯示的50個左右的地方統治者將他們力量的絕大部分放在各自轄地的首府中，這是在一個激烈的國內戰爭時代的一種正常的事態發展，同時也難以確定他們的權力究竟伸展多遠。不過，他們所控制的大的區域性的城市仍然是中國的主要權力中心，在它們周圍的地區即使不是由各自的地方長官絕對控制，也仍然處于他們的統治之下。因此，在地圖22上，有理由仍舊把“道”作為一種行政區劃保留下來。



地圖22 885年黃巢之亂后的權力分布

表11 黃巢叛亂后的權力分配（885年）



續表



### 帝國的聯合及其破裂

經過近四年的四川流亡生活以后，僖宗在885年陰歷三月回到京師。經歷了戰爭和洗劫的長安已經完全荒廢了：“荊棘滿城，狐兔縱橫。”[[120]](#_12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皇帝發布大赦令，宣布改元“光啟”（意為“輝煌的開端”）。皇帝盛陳軍容進入他被蹂躪的京師，他的軍隊是田令孜在四川組建的5萬余人的神策軍。這支軍隊是帝國賴以復興的唯一希望。但是士兵們實質上是被雇傭的，他們的服役完全取決于政府的支付能力。這使朝廷處于一種幾乎力不能及的困境，因為它的儲備早已耗盡。當僖宗在四川時，幾乎所有地區都逐漸停止了送往京師或流亡朝廷的綱運。皇帝現在僅僅能從最鄰近京師和全在窮困中的關中地區的極少數的道得到資助。沒有理由相信帝國的文告會在華北平原和江淮流域這些中國生產最發達的地區引起重視，在緊迫的財政需要被滿足以前，對這些地區重建某種程度控制的任何嘗試都會拖延下去。

神策軍既是帝國的主要武力，也是宦官（特別是田令孜）權力的靠山，由于田令孜把持朝廷在京師和各地都引起了極度的憎惡，這樣便使供應神策軍士兵的問題復雜化了。不僅如此，更糟糕的是，收復長安以后許多官員回到這座城市，他們對俸祿的要求又給賦稅收入增加了壓力；所以，盡快搞到巨額賦稅是絕對必要的，但是這樣做便產生了種種力不從心的問題。

由于全部財政結構完全陷于混亂，加上各地的上供為數極少，政府試圖采用非常時期的食鹽專賣辦法，如同肅宗政府在一個世紀以前所做過的那樣，那時安祿山之亂產生了類似的財政危機。最鄰近的重要產鹽區正好在黃河對面的河中（今山西省西南部）境內，自880年起，這一地區就在強悍而又獨立的節度使王重榮控制之下。[[121]](#_121_Wang_Zhong_Rong_De_Chuan_Ji)如果政府得以控制該地區，那么，蒲州的安邑和解縣兩處鹽池足以提供需要的賦稅收入。可是，這個計劃是難以實現的，因為王重榮是img孜的一個死敵，他曾反復地提出將田令孜處死的要求。這樣，在唐朝政府和京師周圍的節度使之間第一個重大的對抗便產生了。

朝廷知道不可能簡單地將王重榮免職，于是決定花樣翻新，搞了一系列精心推敲的重新任命，其中涉及王重榮和中國北部的其他兩個節度使，即義武（河北中部）的王處存和兗海（山東）的齊克讓。王處存出身于京師一位神策軍將軍的家庭，齊克讓曾是指揮與黃巢作戰的政府軍將領。他們是中國北部僅有的兩位可能接受調職詔旨的節度使。計劃是將王重榮調到兗海，河中代之以王處存，齊克讓則從兗海調往義武，以此來完成團團轉的換班。同時，預期帝國將恢復對河中的控制，田令孜擅取了兩池榷鹽使的頭銜。[[122]](#_122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如果這一計劃成功，它將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成就，因為這將證實王朝有力量調動高級官員，也將把三個有能力有經驗的唐朝任命的人安排在中國北部不可忽視的重要戰略地區。可是，王重榮拒絕接受調動，特別在田令孜的使者對他無禮之后。王處存早些時候曾與王重榮會師恢復被黃巢占領的京師，他擔心任何不利于王重榮的行動會削弱自己的地位，所以也拒絕調動，并勸告朝廷重新考慮這一計劃，免得“動搖藩鎮之心”。[[123]](#_123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82)

王重榮拒絕放棄河中的控制一事，使得田令孜去尋求京師附近其他節度使的軍事支持，準備對河中發起一次進攻。田令孜的第一個盟友是李昌符，他的父親李昌言在幾年前曾從原宰相鄭畋手中奪得了控制鳳翔的權力。第二個重要的盟友是位于京師正北的邠寧節度使朱玫。朱玫原是邠寧地區一處要塞的將領，他曾殺死一名派去控制這一地區的黃巢將領。對于最后收復京師的勤王聯軍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勝利。朱玫后來掌權成為邠寧節度使，此事得到朝廷的完全贊同。

為了反對田令孜一黨，王重榮和山西北部河東的沙陀節度使李克用聯合。李克用對朝廷在他與朱溫矛盾沖突時不肯支持他懷恨在心，因此毫不猶豫地轉過來對付朝廷。這就使得關中（今陜西）的主力軍隊和河中及河東（兩地合成今山西省）的軍隊發生對抗。河東的軍隊證明高出一籌。一場大戰發生在沙苑，即883年李克用曾經大敗黃巢之地，這一仗的結果是王重榮（原文如此，應為朱玫。——譯者）和李昌符被趕回他們在邠寧和鳳翔的首府，他們的敗軍則在潰退中造成了嚴重破壞。[[124]](#_12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

李克用此時并未返回河東，而是繼續前進，直指長安。皇帝和他的驚慌的朝廷再次放棄京師，此時離他們從長期流亡的四川回來還不到一年。京師在883年黃巢撤離后已部分恢復，現在又遭到掠奪成性的士兵們比以往更為徹底的洗劫。

皇帝的隨行人員不顧死活地向西逃往鳳翔。李克用和王重榮激烈反對田令孜對朝廷的控制，但實質上仍繼續忠于皇室，他們反復要求皇帝將田令孜處死并返回京師。僖宗試圖恢復田令孜的老對手宦官楊復恭的權力，任命他為樞密使，但這反而促使田令孜把皇帝進一步遷往幾乎是關中最西端的寶雞。

朝廷中的高級官員渴望阻止皇帝再次離開關中，他們尋求朱玫和李昌符的支持，以阻止皇帝前往秦嶺山脈以南避難。這兩位節度使雖則在朝廷新近企圖侵入河中時與田令孜和朝廷聯合過，現在卻轉而反對田令孜，并開始追趕皇帝僅有數百名官員和士兵的隨行隊伍，這些官兵是被誘騙或被迫而與皇帝在一起逃亡的。

僖宗和他的由宦官控制的隨行隊伍現在實際上沒有支持者，他們在非常困難的狀況下繼續向西逃跑，然后翻過山嶺向南方前進。在逃跑過程中增加了人數的禁軍必須奮勇開道，領頭的是由剛受命為神策軍將軍的王建率領的500名持劍武士。[[125]](#_125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這一次路過秦嶺山脈的經歷比881年的旅程更為艱苦。朝廷選擇了連云道，這是通過秦嶺的最險峻的道路之一，因為它的全程430里的三分之一是懸崖絕壁之旁的木棧橋，棧橋下面是咆哮的山間激流。[[126]](#_126_Guan_Zhong_Zhe_Tiao_Dao_Lu)李昌符企圖毀壞部分道路以阻止皇帝通行，但僖宗正好設法通過了。王建似乎對皇帝負有特殊的責任，皇帝將御璽委托他保管，當難得地停下來休息時，皇帝疲憊不堪地將自己的頭枕在王建的膝上睡覺。在朱玫的追軍到達時，他們剛過了生死攸關的大散嶺。旅程已開始付出代價；肅宗的曾孫襄王李煴有病留下，他被朱玫俘獲，帶回鳳翔。

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在皇帝進入他的領地時決定協助朱玫和李昌符追逐僖宗，這樣一來情況變得更壞了。石君涉堵塞了通過山脈的主要關口，焚燒了皇帝可能安歇的郵驛，迫使僖宗和他的衛士只能從不可靠而且很少使用的路上通過山脈，與此同時邠寧的追兵緊追不舍。當石君涉決定北上與朱玫聯合時，皇帝的窮途末路的狀況稍有一些緩和；朱玫現在開始作為一個統治關中的人物出現。僖宗最后抵達漢中盆地，在興元以西約30英里處遇到了朝廷任命的山南西道監軍使，后者護送皇帝到比較安全的興元。[[127]](#_12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這一次僖宗不想繼續向南前往四川，以后數周僖宗試圖臨時拼湊另一個流亡政府。他指定兩位隨他逃亡的官員為宰相，他們是孔緯和杜讓能，兩個人都出身于9世紀上半期著名官員的家庭。但是這些任命并沒有解決朝廷最迫切的問題，即為伴隨皇帝流亡的官員和士兵尋找糧食。漢中盆地人口稀少，沒有什么出產，這就是五年前僖宗放棄它而選擇比較富裕的四川的原因。為了設法得到所需的給養，朝廷現在寧可一廂情愿地任命王重榮為接應糧料使，并且命令他緊急地運送15萬斛谷物到興元。這道命令清楚地表明朝廷處于絕境，因為它曾試圖奪取王重榮所控制的河中地區，其結果是迫使僖宗逃出京師。當然，王重榮不愿自動提供朝廷用武力不能奪去的東西，所以再次提出，只要田令孜繼續在朝中當政，他便拒不執行皇帝的命令。

朱玫當時決定正式廢黜僖宗，立不久前俘獲的肅宗的曾孫李煴來代替他。[[128]](#_128_Guan_Yu_Zhu_Mei_He_Ta_Shi_T)蕭遘原來尋求朱玫的幫助以阻止田令孜帶著僖宗逃出關中，現在他首先抵制廢黜皇帝的計劃，但未成功，特別在朱玫宣布任何反對他計劃的人將立即被處死之后，就更不能再反對了。兵部侍郎鄭昌圖受命撰寫李煴即位的詔書，在鳳翔的文官們被安排伴隨李煴前往長安，準備舉行擁立他為帝的儀式。與此同時，朱玫自封為神策軍的高級將領，這樣便掌握了田令孜官職中最重要的一項職務，并使自己成為皇帝的幕后操縱者。

盡管擁戴新皇帝的想法起初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但事實清楚表明，這個決定得到許多支持，特別是在各道高級官員和節度使中間。除了結束田令孜對朝廷的有力控制這一具體目標之外，這也是在一個多世紀中皇位繼承問題第一次擺脫了宦官的控制。崔安潛是田令孜控制政府時比較著名的受害者之一，他代表在皇帝逃離京師以后逃往河中的朝廷官員，寫信贊成廢黜僖宗。另一個重要的支持表態來自高駢，他承認新政權的合法性，并且力促李煴登基。朱玫還派使者前往長江地區和河北的其他重要節度使處。大多數人保證承認新的朝廷。[[129]](#_12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886年陰歷四五月間，兩起重大的發展使情況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一是田令孜決定自動放棄他在流亡朝廷中的位置。他任命自己為西川（四川西部）監軍使，并離開了僖宗，西川這時仍由他的兄弟陳敬瑄控制。田令孜的離開朝廷，大大緩和了局勢，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僖宗朝就結束了宦官的統治。田令孜的老對頭楊復恭現在接管了他的職務，楊復恭把田令孜的伙伴（包括王建將軍在內）都放逐到外地，有的到四川，有的到貴州北部。第二起重大的發展是朱玫與李昌符之間的分裂，雖然他們原來共同策劃過立李煴為帝。當李昌符覺察到朱玫企圖個人壟斷權力時，便撤銷了自己的支持，并開始和流亡的皇帝談判，要求授予自己高級官職，僖宗當然立刻答應。

朝廷迅速利用這些發展。當時王重榮所討厭的田令孜已經離開朝廷，它便派使者到河中去，想取得王重榮的支持。更為重要的是，強有力的河東的沙陀節度使李克用拒絕支持朱玫。對李克用來說，一個軟弱的僖宗回到京師繼續主持禮儀，較之讓朱玫那樣強大的節度使控制一個傀儡皇帝更有吸引力。因此李克用同意與王重榮和楊守亮（宦官楊復恭的義子，新近被任命為金商〔山南東道〕節度使）聯合。這三位節度使的聯盟使僖宗終于有可能回到京師。

朱玫不顧聯合起來反對他的占壓倒優勢的力量，仍于886年陰歷十月立李煴為帝。楊復恭代表皇帝傳檄京師周圍地區，宣稱任何可能帶著朱玫首級來歸的人，將被任命為節度使。朱玫手下的一個將領王行瑜帶著軍隊從鳳州回到京師，在一場短促的戰斗以后殺死了朱玫和朱玫手下黨羽數百人。獲勝的士兵們隨即放肆起來，在城市中到處搶劫和屠殺，進一步增添了長安居民的苦難。

許多在朱玫當政時接受了官職的人和僭位的皇帝一起逃往河中，以尋求王重榮的不可靠的保護。王重榮立即將他們中的大多數處死，其中包括不幸的李煴，他的首級送往在興元的流亡朝廷。皇帝下令，朱玫當政時的宰相和所有接受官職的人都要受到最嚴厲的懲罰。[[130]](#_13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在朱玫被殺和他的權力被根除以后，僖宗回到京畿區，但沒有到長安，因為長安被接連的占領和搶劫蹂躪得不像樣子，實際上處于一種無政府狀態。887年陰歷三月，僖宗到達關中西部的鳳翔，在那里他仍處于節度使李昌符的“保護”之下；李昌符當時剛剛為了得到皇帝的任命轉過來斷絕了對朱玫的支持。李昌符希望利用朝廷在鳳翔的機會剝奪它的剩余財富和權力，但是他的野心很快導致了自己的毀滅。887年陰歷六月，李昌符的士兵和皇帝的軍隊交戰。李昌符襲擊并企圖焚燒皇帝的“行宮”，在鳳翔的街道上雙方之間更是惡戰一場。李昌符遭到失敗，被趕出鳳翔，兩個月后在一次短促的討伐中被殺。領導了對他的討伐的前神策軍軍官李茂貞代替他當了鳳翔的節度使。

僖宗回到京畿區，在這一地區的鳳翔和其他地方都產生了重大影響。殺死朱玫的王行瑜被任命為華州刺史，對于力量大為削弱的王朝來說，這個職位當時的重要性比平常要大得多。后來當昭宗繼位時，他和李茂貞成為十分重要的人物，雖則他們的權力從未越出中國西北部。

中國其他地方的政治和軍事局勢在繼續不斷地變動。對于這些地區來說，皇帝的回鑾并沒有多大意義。這些年藩鎮的不穩定程度，從885年掌權的節度使在890年已有半數以上被取代這一事實明顯地表現出來（見地圖22和附表）。在下面我們將討論在各地的最重要的發展。

887年的其余時間僖宗仍在鳳翔，888年正月回到長安。然而，他在鳳翔已經得了重病，888年陰歷三月便死去，只活了27歲。[[131]](#_13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僖宗在位15年，這15年中很難說他曾進行過統治。他在位的歲月是軍事、政治、社會和制度各方面的重重危機壓得人們喘不過氣來的時代，遠非唐王朝的能力所能解決。有人把王朝的迅速崩潰歸罪于僖宗的孩子氣的任性，或歸罪于他對施政的漫不經心，但是，是否有任何統治者能有效地阻遏唐朝力量和權威的崩潰，實屬疑問。

### 昭宗（888—904年在位）和昭宣帝（904—907年在位）

僖宗的繼承人是他的兄弟李杰，廟號昭宗，他的統治只是力圖使王朝茍延殘喘而已。這是一個無法保持平衡的時代，唐王朝之所以能比其自然生命力支撐得更久，是因為人們普遍擔心一個王朝被推翻后產生的后果。任何一個手中有些兵力的人幾乎都能隨心所欲地置唐王朝于死地。但在907年前這樣的事并未發生，這不是因為缺乏力量和機會，而是因為他們害怕會像朱玫那樣沒有穩定的基礎來維持篡奪的皇位。

昭宗嗣位時21歲，是一個聰明而又有才能的年輕人，他充分了解阻礙恢復唐朝力量和權威的形勢，并發誓自己要復興王朝。毫不奇怪，他完全沒有能力辦到。昭宗不僅根本無力重新樹立唐王朝對各地的權威，而且也管不了朝廷中或京師四周地區發生的事情。

在他即位的第一年，昭宗的主要政治問題仍然是宦官控制朝政的問題。這時的主要反面角色是楊復恭，他繼田令孜之后成為宦官機構的首領，并曾于888年安排昭宗即位。[[132]](#_132_Tong_Shang_Shu__Di_8376Ye)可是，昭宗這個人從來沒有像他哥哥僖宗依賴田令孜那樣依賴楊復恭。在即位之后，新皇帝立即向宰相們表明，他希望由宰相掌握朝政。宰相們于是勸告皇帝要果斷地抑制宦官的勢力，就像宣宗在半個世紀以前試圖做的那樣。在宦官成功地將皇帝的舅父、一個在朝廷有影響的政治人物王瓌放逐到外地接著將他謀殺之后，昭宗甚至更加下定決心要除掉楊復恭。昭宗連自己的至親都沒有力量保護，這使藩鎮對朝廷更加藐視，并大大增加了昭宗個人所受的挫折。[[133]](#_133___Jiu_Tang_Shu____Juan_174)

皇帝立即制定了削弱楊復恭在朝廷中的地位的方案，直截了當地將高官和實權授予楊復恭的另一個養子楊守立（這時楊守立指揮著靠近京師的最重要的帝國軍隊），并賜予國姓。更名為李順節的楊守立這樣一來立即由楊復恭的主要支持者轉而成為他的主要對手。[[134]](#_13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楊復恭隨后逃離京師，并糾集以前收為養子的幾個強有力的節度使來支持他；但是他們在892年一場節度使李茂貞和王行瑜從關中發動的戰役中被擊敗了。楊復恭逃到他自己在太原（山西）的一處莊園中，但被王行瑜的士兵俘獲，帶回京師處死。他的戰敗和處死是許多年代以來宦官們遭受的最嚴重的挫折。

當昭宗為重掌朝綱而進行斗爭時，他又陷入與李克用的敵對行動之中；這個沙陀突厥家族在龐勛和黃巢叛亂時曾給唐王朝提供了重大的援助。與李克用之戰的目的是錯綜復雜的。首先，藩鎮和朝廷雙方都對沙陀突厥的最終目的存有戒心。因為沙陀對朝廷的效勞只是在允許他們占領大部分山西的情況下才取得的，從山西他們可以威脅關中、河南和河北。華北許多地方都普遍對突厥人懷有恐懼之心，這就給朝廷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去采取主動行動和對他們組織一場得到廣泛支持的戰役，以顯示皇帝的領導地位，甚至使朝廷恢復對關中以外的疆土的控制。李克用曾是唐朝最有力量和最可信賴的盟友，但這對朝廷來說似乎已無關緊要了。

這一計劃的主要倡議者是懷有利己的政治目的的兩個宰相張濬和孔緯，因為他們希望勝利會增強自己的力量，使他們有可能徹底根除朝廷中的宦官，結束宦官對帝國軍隊的控制。征討李克用的決定是在一次高級官員全體會議上作出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包括宰相劉崇望和杜讓能在內）反對這一計劃。[[135]](#_135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皇帝雖然內心相當動搖恐慌，仍不顧反對而批準了這一方案。保證積極支持這一戰役的藩鎮有李克用的對頭、宣武（河南）節度使朱溫，和遠處東北的盧龍節度使李匡威。

890年陰歷四月開始動員，朝廷從京畿區征募了近10萬名士兵。第二個月，宰相張濬帶著約5萬軍隊從長安出發。六月，政府軍抵達山西中部的晉州，在那里與朱溫派來的宣武軍隊會合。矛盾幾乎立即在朱溫和政府軍之間爆發了，因為朱溫想要利用這一戰役使自己控制山西東南部，政府軍則要朱溫協助攻打突厥人同時又急于阻止他擴張自己的領土。戰役一開始便不利。唐朝一個將領在山西東部被突厥人所俘，因堅決拒絕李克用要他在河東道做官的建議而被殺。朱溫的軍隊在澤州被李克用的一個盟友打得大敗。

對于李克用來說，主要危險不是來自關中或河南的軍隊，而是來自北方盧龍節度使李匡威以及控制山西北部邊境地區的吐谷渾首領赫連鐸，這兩個人聯合起來對付他。[[136]](#_136_Tong_Shang_Shu__Di_8404__84)在初戰失利之后，李克用派他的兒子李嗣源率領一支軍隊去與他們交戰，后面緊跟著援兵。在一個月之內，他擊敗了李匡威和赫連鐸，保證了他的北部邊界的安全。與此同時唐朝軍隊在山西中部被擊敗，大多數來自關中的隊伍都逃散。剩下的軍隊仍由張濬率領，被迫逃到晉州躲避，只是在沙陀將領自動放棄對城市的圍攻和撤退之后才得逃脫。政府軍在混亂中逃出山西，從而不光彩地結束了一場注定要倒霉的和完全不必要的戰爭。

890年對李克用之戰是唐朝對京畿區之外最后一次積極干預行動。從那時起直到王朝滅亡為止，政府完全忙于抵御長安周圍那些越來越咄咄逼人的和懷有敵意的節度使。朝廷自身繼續為內部斗爭所折磨。891年陰歷十二月，神策軍的高級宦官將領暗殺了楊復恭以前的義子李順節，因為他們懼怕他圖謀個人控制軍隊，可能還想控制政府。893年中期，昭宗計劃繞過不可靠的將軍們而把指揮權交給宗室諸王。[[137]](#_137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到893年，朝廷最直接和最可怕的對手是李茂貞，此人從887年起便是鳳翔的節度使，他在關中西部的勢力已在迅速增長。他對軟弱的朝廷極為藐視，因為它既在不明智的進攻李克用的戰役中戰敗了，又未能清除宦官的權勢。893年陰歷七月，李茂貞在一封寫給皇帝的信中嘲笑朝廷對一次軍事反抗的軟弱態度，信的結尾挖苦地問道：“末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138]](#_138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皇帝勃然暴怒，于是組織一支由太子統率的討伐軍，前去攻打傲慢的李茂貞，但結果是鳳翔的能征慣戰的軍隊輕易戰勝了政府的缺乏訓練的新兵。為了繼續使朝廷丟臉，李茂貞堅持要處死三名高級宦官和宰相杜讓能，因為他認為杜讓能應該為進攻鳳翔一事負責。皇帝無力拒絕，杜讓能和他的兄弟被迫自殺。李茂貞被正式任命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也就是正式承認他已經控制了關中西部和山南15個州以上的土地。

894年唐朝的日子顯然是過一天算一天。昭宗仍然履行他作為皇帝的形式上的職責，但是他對新宰相的任命不再認真了，這可以從他于894年提升嗜酒的詩人鄭綮和散文能手李谿一事作出判斷。節度使李茂貞和王行瑜（邠寧節度使）繼續不斷地謀求消滅皇帝獨立行動的最后痕跡，他們的行動得到宰相崔昭緯的慫恿：崔昭緯向他們通報所有朝廷中發生的事情。895年年初有過派宗室諸王指揮軍隊去鎮壓京師周圍的盜匪的打算，但是，甚至這種打算也被官員們勸阻，因為他們害怕這一步驟會導致鳳翔和邠寧軍隊的干預。[[139]](#_139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

昭宗在895年差一點被聯合起來的關中三個最強大的節度使李茂貞、王行瑜和韓建所廢黜，只是因為沙陀首領李克用害怕關中會出現一股強大的聯合力量而進行了干預，他才得以保住皇位。當李茂貞和王行瑜爭論他們之中誰應控制皇帝時，突厥軍隊便進了關中。在帝國余下的軍隊之間發生的戰斗更加劇了危機，在此期間昭宗幾乎被殺。他最后設法集合了少數衛兵逃往秦嶺山區，先在一座佛寺中，接著在一個駐兵的小鎮避難。在勉強逃脫地方軍隊的追捕之后，他再次為李克用所救，被護送回到京師。長安的宮殿這時遭到如此嚴重的損壞，致使皇帝只好住在尚書省中，只有少數剩下的官員隨侍。皇帝把后宮的絕色美女作為禮品獎給李克用。李克用本人、他的同盟者和子孫全被封爵，這是朝廷僅存的少數職能之一。

由于有人對李克用說，他長期住在關中可能使人民過分驚恐，他便于895年陰歷十二月離開京師回到河東。他離開時還得到300萬緡錢作為賞給他軍隊的“禮物”。但是比起關中的事務來，李更關心的是朱溫可能把勢力擴展到河東境內，因此他急于回到自己的首府。不到一個月以后，他便與朱溫之間打了一場大仗。

李克用剛離開京畿區，李茂貞便繼續他的擴張，在895年陰歷十二月拿下了河西（甘肅）三州，并任命手下的一名軍官為河西節度使，這是沒有先例的對皇權的侵犯，但也是不足為奇的。

藩鎮對朝政的干預在895年以后甚至有增無已。朱溫試圖讓890年領導過討伐李克用的失敗了的張濬任宰相，估計是希望張濬會再次動員關中軍隊去攻打李克用。但是當李克用威脅說如果張濬被任為相他將襲擊長安時，這個想法就很快放棄了。后來的派別斗爭導致了895年陰歷五月宰相崔昭緯之死，那是與關中諸節度使（特別是與李茂貞）有密切聯系的宦官們安排將他處死的，原因是他經常致力于勸誘朱溫干預朝政解除諸節度使對朝廷的控制。昭宗再次被迫派諸王去指揮忠于皇室的軍隊，但這立刻引起了李茂貞移軍指向京師。長安居民為了預防出現最壞的情況，紛紛逃到城外山中。皇帝的軍隊在一場短暫的戰斗中輕易地被擊敗，昭宗比以往更加絕望。他決定逃往河東去尋求李克用的庇護。[[140]](#_14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昭宗前往河東時，被華州刺史韓建的兒子攔住了去路，因為韓建的轄境正在京師和河東之間。韓建之子試圖勸說皇帝接受他在華州的父親的保護。昭宗開始并不愿意，但后來被韓建說服。韓建在富平與皇帝相遇并警告他說，如果他去河東“邊鄙”向突厥人屈服，以后再也回不到京師；如果他留在關中，仍有希望使朝廷復興。韓建對皇帝的勸告隱含的威脅是明確無誤的，于是昭宗在896年陰歷七月十七日到達華州。

伴隨昭宗的大臣中沒有人對韓建“保護”皇帝的實質存在幻想，他們在處理任何朝廷事務以前都小心地和韓商議。韓建以皇帝的名義向各道發布檄文，命令他們將物資送到華州。這份命令受到鄰近節度使們嘲笑，他們公開地蔑視韓建粗暴地操縱皇帝的行為。第二年年初，韓建采取進一步削弱朝廷的步驟，使皇帝成為孤立無助的傀儡。897年正月，他向昭宗報告說，他已發現一個由仍然掌握軍隊的宗室諸王策劃的暗殺他的陰謀，并說他們還計劃將皇帝東移河中。當然，很可能他們確在搞這一計劃。韓建命令諸王回到長安，將他們的軍隊都改歸自己節制。而且，他禁止昭宗與任何外人接觸，免得他被“眩惑”。[[141]](#_141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897年陰歷六月，李克用試圖組織力量將皇帝從事實上的囚禁中營救出來，但只能得到很少的支持。下一個月韓建決定采取更激烈的步驟來對付長安的宗室諸王。他將皇帝與關中諸節度使之間的所有爭執歸罪于諸王和他們對帝國軍隊的控制，決定將他們殺死。在宦官劉季述的幫助下，韓建的軍隊在897年陰歷八月包圍了皇室的王府；劉季述的行為是希望得到韓的援助為自己謀取利益。諸王中有些人剃頭假扮僧侶，另一些人不顧死活地逃跑，但有11人被捉住并殺掉了。

898年年初，由于關中節度使們越來越擔心朱溫向東擴展力量，特別是在朱溫拿下洛陽并邀請皇帝前去以后，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導致李茂貞、韓建和李克用建立暫時的聯盟，他們決定寧可讓皇帝回到長安，也不能讓他落到朱溫手里。于是昭宗在898年陰歷八月回到長安，同時宣布改元“光化”，以資慶祝。

一回到長安，在宦官和官僚們之間的舊有矛盾又引起了另一場危機。宰相崔胤與皇帝策劃清除朝廷的宦官，特別是他們可恨的首領樞密使宋道弼和景務修。宦官們和關中的節度使們互相勾結，而崔胤則得到朱溫的支持；當朱溫在899年將他個人的疆土擴展到關中的邊界時，他對這個地區的影響增長了。崔胤做了很多手腳加深了朝廷中的陰謀氣氛，結果卻使得他自己暫時罷官，但通過朱溫的干預又恢復了職務，并在900年陰歷六月成功地將一位敵對的宰相和宦官首領宋道弼、景務修流放到外地，接著迫使他們自殺。[[142]](#_142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

余下的宦官們覺察到，只要崔胤能夠利用昭宗對他們的終身的敵對情緒，他們個人的和政治的地位就處于非常危險的境地，因此他們便策劃廢黜昭宗，擁立太子，以此來進行對抗。900年陰歷十一月，宦官們實現了他們的計劃，廢黜了皇帝，并將他禁錮于宮中，置于嚴密的防衛之下。被宦官挾持的新政權對它的真正的和涉嫌的政治敵人一概實行野蠻的報復，有步驟地將他們殺死，重要人物中唯一幸免于難的是宦官的主要對手崔胤，因為他仍然得到朱溫的保護。900年末，朱溫似乎準備干預朝政，這促使宦官們將控制朝廷的權力轉交給崔胤。可是，朱溫并不想在殘酷的宮廷政治中使自己陷得太深，他拒絕采取任何直接的行動。不過反昭宗的政變沒有維持多久，因為新政權沒有得到任何支持。實行政變的宦官們在901年正月遭到暗殺；昭宗獲得自由并恢復了帝位。在慶祝消除宦官獲勝的儀式上昭宗宣布改元，并宣布大赦，包括半個多世紀以前被處死的王涯和其他官員得到昭雪，他們是在甘露之變中因祛除宦官的計劃流產而招致不幸的。[[143]](#_143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

在901年以后，朝廷政局仍在進一步惡化。大臣（由宰相崔胤領導）和宦官之間的仇視和陰謀惡性發展，每一方為了損害另一方都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只有操縱雙方的節度使們從這種狀態中得到了好處。真正的問題是哪個節度使會得勢，朝廷中哪一派終將屈服。

到903年，這種悲慘的狀況接近結束，當時朱溫的軍隊已管轄關中的大部分，他自己控制了朝廷和京師。他派自己的侄子領兵保護皇帝，任命自己手下的官員看管京師剩下的東西。由于崔胤極力主張殺掉宦官，但無疑也由于他自己的沖動，903年正月朱溫命令他的士兵將幾百名剩下的宦官趕到內侍省，在那里將他們殘酷地殺掉。

904年正月，朱溫已沒有理由留在長安，他便把昭宗遷到由他控制的新近重建的東都洛陽。在旅途中朱溫殺害了所有剩下來的皇帝侍從。904年陰歷八月，昭宗被朱溫謀殺，他的第九子、12歲的李柷嗣位。李柷，按傳統稱為哀帝或昭宣帝，做了3年有名無實的君主，到907年朱溫將他廢黜，并建立了自己的梁朝。昭宣帝這個最后的短暫時期就其真正意義而言并非唐朝歷史的一部分，它完全可以看做是朱溫鞏固政權的一個階段，下面我們將敘述他鞏固政權的過程。

### 朱溫和五代的開始

朱溫在904年帶著昭宗回到洛陽時，他正接近權力的峰巔，這是他在過去20多年中謹慎地和有步驟地樹立自己權力的結果。隨后數年盡管朱溫在幾條戰線遭受挫折，在907年他仍然強大得足以宣布已經不存在的唐王朝結束和建立起他自己的梁朝。[[144]](#_14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梁朝（907—923年）是907年唐朝垮臺和960年宋朝建立之間這一時期統治中國北部的一系列短命王朝的第一個。

朱溫除了開創梁朝的歷史作用以外，他早期的生活和經歷特別清楚地說明了唐代后期新興的政治和軍事精英中最重要的成員取得政權的方法。[[145]](#_145_Guan_Yu_Zhu_Wen_Sheng_Huo_D) 852年，朱溫生于宋州（今江蘇省），這是宣武軍的一部分。他的父親和祖父是學者和教師，但從未當過官。可是，他們的地位很重要，以致能和本地一個更有名望的地方官員家族通婚。朱溫還很年輕的時候，父親死去，他的母親和兄弟被迫在他母親家鄉一個地主莊園中當雇工。甚至還在孩子時期，朱溫已顯示出他的自立和多謀好斗的終生不變的性格，甚至在他長大以后也不曾有過正式的職業，而是依靠打架的本領謀生。村里的許多人都討厭他。[[146]](#_146___Bei_Meng_Suo_Yan____Juan)

當黃巢叛亂爆發時，朱溫和他的幾個弟兄加入了叛軍的隊伍。當盜匪軍隊在880年橫掃長安時，朱溫和黃巢在一起，在黃巢占領京師后被任命為同州刺史。由于黃巢勢力削弱，他便向勤王軍投降，并于883年被任命為他家鄉宣武的節度使。

在鞏固自己對宣武鎮的控制方面，朱溫顯示出他工于心計和有充分的決心。該鎮有長達一個世紀的不穩定的歷史，它的動蕩主要是由高度鬧獨立性的、經常無法駕馭的地方戍軍引起的。他安排自己的追隨者指揮這些軍隊，使世襲的軍官們只保留從屬的職位。更重要的是，像這個時期其他節度使一樣，他建立了一支私人衛隊，即牙軍，作為他的主要武力。[[147]](#_147_Guan_Yu_Tang_Mo_Zhi_Wu_Dai)這些牙軍士兵的來源真是五花八門，其中包括正規的侍衛兵、地方精英人物、農民、商人、行商、盜匪、罪犯和形形色色的賊民。[[148]](#_148_Zhou_Teng_Ji_Zhi____Wu_Dai)有些人是從地方戍軍選拔或從本地征募的，另一些則是投降的或俘虜的軍隊。許多人顯然是節度使私人的半奴隸性質的隨從，全都效忠于他，而不是效忠于戍軍軍官。沒有他們，朱溫就難以維持自己在宣武的地位，更談不上向外擴張了。除了牙軍之外，朱溫還專門建立了一支騎兵，它的軍事價值在多次成功地對付沙陀突厥的戰役中已清楚地得到證明。這些騎兵是一個精英集團，由富家子弟組成，因為他們的家庭能為之提供武器、馬匹和給養。[[149]](#_149_Guan_Yu_Zhe_Ge_Qi_Bing_Jun)

在擔任宣武節度使的初期，朱溫面臨著許多外來的威脅。當黃巢軍隊在883年初放棄長安以后，他便以發動一次大攻擊來威脅朱溫，只是由于陳州的英勇的防御和黃巢決定將大批軍隊圍攻陳州整整一年而終歸失敗，朱溫才得到拯救。883年末，朱溫投入了在宣武中部的毫州打擊黃巢的戰斗，他用他在此地的勝利鞏固了對該地區的統治。可是，朱溫謹慎地不使自己的力量在與黃巢的戰斗中消耗過多。884年正月，他和該地區其他節度使一起請求新近從黃巢手中收復長安的沙陀首領李克用給予援助。如上所述，黃巢在884年陰歷四五月間的一系列戰斗中被擊潰，并于那一年六月自殺，于是叛亂結束。

黃巢死去以前發生的兩件大事對以后數十年中國權力的結構有深刻的影響。第一件是當突厥首領李克用在汴州時，朱溫曾憤憤地試圖謀殺他。李克用設法逃脫，并回到了他的河東首府，但是這一背信行為使他們之間的猜疑解不開了。[[150]](#_150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這也增加了突厥人和中國節度使之間已經存在的不和。他們之間的沖突已有很長的歷史，在10世紀大部分時間仍繼續存在。

第二件大事是，在叛亂快要平息時，黃巢殘余部隊的絕大部分都向朱溫投降。這些軍隊是黃巢其他臨時組織的武裝力量中訓練有素和經過戰斗訓練的核心，他們并入了朱溫的軍隊，他們的將領也被任命為他手下的軍官。在后來的困難年代里，他們對朱溫來說是一支極端重要的支持力量。[[151]](#_151_Wang_Geng_Wu____Wu_Dai_Shi)

在緊接黃巢叛亂之后的年代里，朱溫最厲害的勁敵是另一位節度使秦宗權，他的某些經歷和朱溫很相似。[[152]](#_152_Qin_Zong_Quan_De_Chuan_Ji_J)在黃巢叛亂初期，秦宗權是忠武節度使的幕僚。880年當黃巢渡長江北上時，秦宗權奉命帶一支萬人軍隊去據守蔡州（前淮西道的首府），它位于淮河南岸，忠武軍的正南。由于秦宗權有效地履行了他的職責，因而在他所處的蔡州讓他開府建制任節度使。盡管他是黃巢占領長安時派遣軍隊前去協助解救京師的少數藩鎮節度使之一，但當黃巢的軍隊在883年進攻蔡州時，他就毫不猶豫地投向了黃巢。在此以后，秦宗權和盜匪集團一起去劫掠農村，還參加了對陳州的圍攻。在唐末的所有軍事首領和盜匪首領中，秦宗權是有名的最冷酷無情的人之一。

黃巢失敗以后，秦宗權自建王朝稱帝。他的軍隊攻打和襲擊中國中部的許多地方，但是這可能反而削弱和分裂了他的政權，而不是加強或鞏固了它。885年后期，他奪得洛陽和正好位于東都與朱溫的基地汴州之間的鄭州。886年結束以前，秦宗權圍攻汴州，朱溫的反應是和鄰近諸州的刺史建立聯盟，因為這些人也和他一樣害怕秦宗權的力量。888年的臘月，秦宗權被他手下的一位將軍出賣，他被交給朱溫處死，作為酬報，此人即被任命為蔡州節度使。[[153]](#_153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1)

在取得對秦宗權的勝利后，朱溫的轄境附近已沒有強大的對手了。在隨后的15年中他穩步地擴展對中國北部廣大地區的控制，最后在907年建立了自己的梁國。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善于作戰和有決心，他也以此訓練和造就了他的強有力的軍隊。但也應該提到，他的成功還大大地歸因于他的殘酷無情和詭計多端，而這一點甚至在那個野蠻的時代也是數一數二的。對待自己的士兵他是野蠻的：任何吃敗仗的部隊會被處死。他是完全不可信賴的和不擇手段的，就像李克用好不容易在他手下逃出性命后所覺察到的那樣。甚至所謂的盟友們也發現，朱溫非常無情和狡猾。當戰略上十分重要的魏博節度使羅弘信對支持李克用還是朱溫尚舉棋不定時，朱溫將俘虜的李克用之子轉交給他，由他處死，從而在896年解決了問題。[[154]](#_154___Zi_Zhi_Tong_Jian____Juan_2)既會使用任何策略，又控制著一支強有力的軍隊，這使任何其他中國節度使都不能向他挑戰，盡管有些人能夠擺脫他的控制。可是，他所建立的王朝存在不到20年，在923年便為中國的主要外族沙陀突厥以優勢力量所滅；對沙陀突厥令人注目地取得對中國北部的統治，我們必須概括地加以論述。

### 李克用和中國北部的外來占領

有些尋求解釋唐朝政權崩潰原因的學者，特別強調唐王朝允許主要是來自內蒙古的外來民族占領北中國的規模。[[155]](#_155_Jian_Liu_Shan_Li___Tang_Dai)當然，以此作為唐朝崩潰的主要原因是荒謬的，唐王朝的生命由于外來的干預而得以延長的事實就很容易說明這個問題。但是唐朝結束時，外族存在于中國北部的規模仍有一個很重要的發展。

唐代后期北方沿邊的局勢是非常復雜的，我們對于這一地區漢人和非漢人民族混合方式的實際狀況所知甚少。可是我們知道，在有些地區，包括關中在內，有數量極大的非漢族居民。長城以內中國北部的其他地區已全部或部分地落在外族戰士手中，雖則我們還無法證實是否還有大量非漢族移民隨同移入。從純粹的種族角度來說，外來民族在北中國的分布規模是值得注意的。那里有重新定居的吐谷渾人和黨項人、鐵勒族和契丹族、鮮卑族和回鶻族。但這一時期尤為重要的卻是沙陀突厥人，他們繼回鶻人之后成為內蒙古草原的主要力量，并已成為中國本部以內的一個主要因素。

沙陀突厥于唐朝統治的最初數十年中即見于記載，當時他們是西突厥最東邊的部落，生活在遠離中國本部以西的地方。8世紀初，吐蕃人的攻擊把他們向北趕到靠近巴爾喀什湖的地區。8世紀中葉，沙陀臣服于回鶻，并和回鶻一起派遣軍隊協助唐朝鎮壓安祿山的叛亂。8世紀80年代后期，他們不再為回鶻效忠，大約有7000“營帳”移歸吐蕃統治。他們經常參與吐蕃人蹂躪中國領土的活動，其中有許多人定居在甘肅中部。可是，他們和吐蕃人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傾軋，在808年，3萬沙陀人決定歸附中國，吐蕃追逐并殺死了他們許多人，但大約有1萬人為靈州節度使范希朝安置在鹽州（關中中部），一個較小的700人集團則被安置在位于關中以北鄂爾多斯沙漠地區的振武。809年，范希朝奉命守衛太原，他帶了1200名沙陀士兵同行，在816年范希朝戰勝成德節度使王承宗時，這些士兵起了主要作用。另一個小的集團則歸河南的忠武節度使節制，817年曾使用于生死攸關的和成功的淮西戰役。在此以后，他們的命運就不清楚了。[[156]](#_156_Guan_Yu_Tang_Dai_Chu_Qi_He)

可是，沙陀突厥的主體部分并沒有卷入中國內部的這些早期的戰爭中去，而是繼續留在山西北部。在869年對付龐勛的戰爭中，他們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緊接著唐朝賜予他們的首領朱邪赤心國姓。其后他以李國昌知名于世，在9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初，這位沙陀首領繼續鞏固他對山西北部的控制，唐王朝立即對沙陀入侵的可能性產生了憂慮，于是使用正規軍和民間武裝加強了它自己在山西中部的防御。878—880年唐王朝連續向太原派了6名節度使，但都沒有在遏制沙陀入侵方面作出任何成績。880年朝廷最后派一名前宰相前往太原，他帶著一批精選的官員，還有來自洛陽的增援部隊，在880年中期，中國人成功地恢復了對山西邊境地區的控制。可是，很快朝廷就被迫答應赦免沙陀諸首領，要他們支持從黃巢手中收復京師以及在最后攻打黃巢時能給予協助。

與黃巢作戰的沙陀首領是李國昌之子李克用。早些時候他曾參加對龐勛的戰斗，并曾在唐朝都城長安寄住過，887年他被任命為他父親的沙陀軍的副統帥。[[157]](#_157_Xiang_Xi_Qing_Kuang_Jian_Mo)他立刻加緊了對北方邊境的控制，直到中國人被迫加強防御來對抗他的侵蝕為止。

李克用盡管在對付黃巢時打了許多勝仗，但他似乎并不想在已經占有的疆土以外謀求任何土地。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他在河東地區的根據地是容易防御的，而且在一個地方分權和地方戰爭頻繁的時期，此地是建立一個獨立政權的理想基地。李克用很輕易地便擋住了政府在890年對他的征討；他的力量在以后的10年穩步增加，和他的敵手朱溫的日益增長的力量并駕齊驅。895年，他已能指定自己的人選為河北北部盧龍節度使，并一度從那個物產豐富的地區正式地征收賦稅。[[158]](#_158_Jian___Zi_Zhi_Tong_Jian) 10年以后，在905年，李克用和從滿洲老家帶著7萬騎兵到山西北部的契丹首領阿保機聯盟。[[159]](#_159_Guan_Yu_Li_Ke_Yong_Yu_A_Bao)這一聯盟標志著沙陀突厥和契丹之間緊密聯系的開始，并且一直延續于整個五代時期，同時也使滿洲南部的民族越來越多地卷進中國的事務之中。

在10世紀最初的數十年，沙陀突厥的力量繼續增長。經過多年的戰斗以后，他們成功地征服了朱溫的梁國，建立了自己的后唐王朝，宣稱自己是唐朝的合法繼承者，并采用了許多唐朝的政策。后唐的統治只有十余年，到937年為止，但是這段時間內它成功地建立了對中國北部和西部的控制，征服了在朱溫統治時一直保持獨立的齊國（關中西部）和蜀國（四川）。因此，這個國家在合并中國北部政權方面標志著一個意義特別重大的階段，也是由宋朝完成的統一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步驟。在后唐崩潰以后，沙陀在山西依然保持著一個獨立的實體，即十國之一的北漢國。直到979年為中國人收回為止，這個地區被突厥人統治了100多年。

### 10世紀的諸獨立國：十國

地區割據和文化差異一直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部分，但從來沒有像政治極端分裂的唐代后期那樣明顯。在山西的突厥統治者與河北、河南的中國節度使之間長達數十年的斗爭中，華北的割據界線顯得非常明確。盡管在9世紀末10世紀初這兩個集團是權力的主要競爭者，但它們的斗爭不是孤立地進行的。在中國其他地方，唐朝權威的崩潰導致了一些地區國家的形成，每一個國家有它自己的文化和歷史的特性，同時它們在從唐末到宋朝的逐步過渡中全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這些獨立國被總稱為十國，其中最有名的和最持久的出現在中國中部和南部。第一個國家出現在長江下游三角洲和東南沿海地區，在那里9世紀50年代后期曾爆發第一次重要的反王朝的叛亂。董昌的短命的羅平國是在杭州地區組織起來鎮壓盜匪的民團統一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見前文），它便是這些國家中的第一個。前面已經談到，它于921年為吳越國所繼承，此國是由團伙頭目轉而成為民團首領的錢镠建立的，他牢固地控制了浙江的絕大部分。吳越國的北方和西方是富庶和繁榮的吳國，由“起微賤”的楊行密于902年建立。它是直接以唐朝將軍高駢在淮南建立的政權為基礎的。吳國最后據有廣大的領土，中心在長江下游三角洲，但是向北方和南方都伸展得很遠。[[160]](#_160_Jian_Luo_Bo_Te__Ke_Long_Pa)

閩國在926年正式形成，但事實上它的統治早在893年已經控制了福建；而在10世紀上半期，福建在閩國統治下具有豐富的和多種多樣的文化。[[161]](#_161_Jian_E_H_Xiao_Fu____Min_Di)在中國南方沿海地區，一個地方軍閥劉隱在896年取得了對廣州的統治。918年，他的兒子劉宣布建立南漢國，其領土包括唐朝嶺南道的絕大部分。在數十年間南漢的財富日益增加，擴張也越來越厲害，但在10世紀中期它的力量先后被一批殘忍的和腐敗的統治者所削弱，因而無法與宋朝軍隊對抗；宋軍于971年攻下廣州。[[162]](#_162_Guan_Yu_Nan_Han_Guo__Jian_X)

這些南方的地區政權在它們所統治地區的地方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在907年唐朝統治正式結束以前和以后的年代的中國地圖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可是，還有一個國家對于我們的研究卻更為有趣，因為它的歷史甚至與唐朝崩潰的準確的原委有更直接的關系。這個國家就是由王建于907年在四川建立的前蜀國；王建的經歷在這個時代無疑是最不同尋常的。[[163]](#_163_Guan_Yu_Wang_Jian_De_Jing_L)他的外表威風凜凜，起初是一個農村竊賊（一件永遠不會被忘記的事實），然后受招募成為中國北方一個重要將領手下的士兵，最后為有權勢的宦官田令孜收為養子。當僖宗第二次流亡時田令孜被廢黜之后，王建于889年被任命為西川（四川西部）節度使，到901年實際上成為一個獨立的統治者，以成都為都城。從許多方面看，他的政權是唐朝在一個地區基礎上的統治的擴大和延續。他得到許多唐朝官員的協助，其中最杰出的是名詩人韋莊；韋莊以唐朝制度和禮儀為基礎制定了一套正規的管理制度和儀式。[[164]](#_164_Jian_Jiang_Cong_Ping___Wei)韋莊還試圖在小范圍之內以大唐都城長安為榜樣來建設王建的都城成都，甚至城內的坊的名稱也有許多是相同的。王建在四川的正統性政權成了藝術家和詩人的一個重要的避難場所，更不用說那些能夠從北方的殘酷戰爭中逃脫的唐朝官僚階級成員了。他的政權是這些歲月中最穩定和最安寧的一個。

十國構成了我們描繪的唐末中國權力新結構的最后部分。盡管其中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機會建立中央集權的王朝，但它們全都在由宋朝完成的政治統一進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885年到907年之間，大約50個道的政權合并成了12個地區性國家。

但是，十國的重要意義超出了政治統一的內容。宋代中國的許多特征，例如長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南中國沿海的大量海外貿易和新的文人階層在東南的集中，都應追溯到十國統治者所實現的半個世紀的和平與穩定。

如果說宋代中國的許多特征是和十國相聯系的，那么它的另一些特征則是和中國北方的發展有關，對此我們已經在前面作了簡單敘述。中國西北部喪失了它作為政治中心的地位，這至少部分的是由于唐朝統治最后數十年的實力消耗與無休止的矛盾沖突造成的，在宋朝統治下這種地位再也沒有恢復過來。宋帝國的力量在唐朝正式結束以前就已牢牢打下了政治和軍事基礎，這主要是由朱溫及其繼承者完成的。最后，使宋朝統治感到苦惱的持久的和最后處于壓倒優勢的外來威脅，顯然起源于唐代后期的軍事上的虛弱，以致中國人在許多年中失去了對中國北部這一廣大而且至關緊要的地區的有效控制。

[[1]](#_1_9)關于這些財政問題，見堀敏一《黃巢之叛亂——唐末變革期之考察》，《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3（1957年），第28—29頁；《資治通鑒》卷242，第7799頁。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劍橋，1970年），第46—47頁；崔瑞德：《安祿山之亂以后的鹽務使》，《大亞細亞》（新版），4.1（1954年），第70頁以下各頁。

[[2]](#_2_9)中村裕一對此有卓越的評述，見《唐代內藏庫之變化》，《待兼山論叢》，4（1972年），第137—168頁；又見曾我部靜雄《唐代貢獻制度》，36.1—2（1972年），第1—32頁。

[[3]](#_3_9)堀敏一：《黃巢之叛亂》，第40—41頁；丸龜金作：《唐代酒的專賣》，《東洋學報》，40.3（1957年），第66—112頁。

[[4]](#_4_9)《新唐書》卷52，第1362—1363頁。

[[5]](#_5_9)《冊府元龜》卷510，第10頁。（譯者按，“使人”被譯作Population，誤。原意指政府派往各地推行此計劃的使者。）

[[6]](#_6_9)《全唐文》卷78，第4頁。

[[7]](#_7_9)同上書，第17—18頁。

[[8]](#_8_9)《全唐文》卷967，第8頁。

[[9]](#_9_9)關于這次叛亂見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以江賊及“康全泰、裘甫”的叛亂為中心》，載《史學雜志》，66.2（1957年），第23—24頁。

[[10]](#_10_9)《資治通鑒》卷249，第8072、8074頁；《舊唐書》卷18下，第644頁。

[[11]](#_11_9)有關這次叛亂的第二手研究包括王壽南《論晚唐裘甫之亂》，載《國立政治大學學報》，19（1969年），第283—308頁；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地區》，第94—122頁；堀敏一：《黃巢之叛亂》，第25—50頁。這些論述基本上都以《資治通鑒》卷249—250為據。

[[12]](#_12_9)王式的傳記見《新唐書》卷167，第5119—5121頁；《舊唐書》卷164第4282頁中也有簡略敘述，附于他父親王播的傳記之后。

[[13]](#_13_9)關于南詔人的種族識別問題曾經有過嚴肅的爭論。盡管有人主張他們是傣人的祖先，但新近學者已證明，他們之間的關系僅比對藏一緬民族稍為密切罷了。見F.W.莫特《有關傣人史前諸問題》，載《社會科學評論》（曼谷），2.2（1964年），第100—109頁；許云樵：《南詔是一個傣王國嗎？》，《東南亞研究》，4（1968年），第13—23頁。邁克爾·布萊克默在《與南詔有關的人種學問題》一文中，有說服力地反對將南詔民族與任何現代人各集團等同起來的嘗試。此文載雷德里克·德雷克編《關于華南、東南亞和香港地區歷史、考古和語言研究論集》（香港，1967年），第58—69頁。

[[14]](#_14_9)《資治通鑒》卷250，第8101—8109頁；《舊唐書》卷19上，第656頁。

[[15]](#_15_9)關于這個問題的朝內辯論，見《資治通鑒》卷253，第8204—8205、8227—8228頁。關于唐與南詔關系的一般論述，見芮逸夫：《南詔史》，收于凌純聲等編《邊疆文化論集》卷3（臺北，1963年），第358—386頁。

[[16]](#_16_9)肖孚：《朱雀：唐代在南方的形象》（伯克利，1967年），第27頁。

[[17]](#_17_9)關于這些自然災害，見《資治通鑒》卷249，第8072頁；《冊府元龜》卷498，第26頁；《舊唐書》卷19上，第654頁。

[[18]](#_18_9)關于這些叛亂的最好論述是：谷川道雄：《關于龐勛之亂》，載《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11（史學4），第27—42頁；堀敏一：《黃巢之叛亂》，第50—53頁；戴何都：《龐勛叛亂》，載《通報》，56（1970年），第229—240頁。龐勛在正史中無傳，但他的叛亂在康承訓傳中有充分敘述，見《新唐書》卷148，第4773—4779頁。

[[19]](#_19_9)《資治通鑒》卷251，第8120—8121頁。

[[20]](#_20_9)最坦率的批評見孫甫《唐史論斷》第3卷（叢書集成本，上海，1937年），第65頁。

[[21]](#_21_9)《資治通鑒》卷253，第8123—8144頁。

[[22]](#_22_9)關于使用外族軍隊鎮壓叛亂的情況，見加布里埃拉·莫萊《從北魏到五代的吐谷渾》（羅馬，1970年），第194頁；劉掞藜：《唐代藩鎮之禍可謂第三次異族亂華》，載《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1.1（1930年），第851—852頁。

[[23]](#_23_9)《資治通鑒》卷249，第8075頁。

[[24]](#_24_9)《唐大詔令集》卷12，第72頁。

[[25]](#_25_9)呂思勉：《隋唐五代史》卷1（上海，1959年），第449頁。

[[26]](#_26_9)關于唐代后期宦官職責的擴大和宦官力量的成長的全面評述，見矢野主稅：《唐代宦官權勢獲得因由考》，載《史學雜志》，63.10（1954年），第920—934頁；橫山裕男：《唐之官僚制和宦官——中世近代政治的結束序說》，載中國中世史研究會編《中國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的時代和文化》（東京，1970年），第417—442頁；王壽南：《唐代宦官權勢之研究》（臺北，1971年）。

[[27]](#_27_9)見小畑龍雄《神策軍的成立》，《東洋史研究》，18.2（1959年），第151—167頁；《神策軍的發展》，載《田村博士頌壽東洋史論叢》（京都，1968年），第205—220頁。

[[28]](#_28_9)《資治通鑒》卷250，第8092—8093頁；杜悰的傳記見《舊唐書》卷147，第3984—3985頁；《新唐書》卷166，第5090—5092頁。

[[29]](#_29_9)《資治通鑒》卷238，第7686頁。

[[30]](#_30_9)見前第九章。

[[31]](#_31_9)《資治通鑒》卷263，第8597頁；孫光憲：《北夢瑣言》（重印裨海本，臺北，1965年）卷6，第10頁。

[[32]](#_32_9)《資治通鑒》卷250，第8093—8094頁。

[[33]](#_33_9)這些分類是以孫國棟所定的集團為基礎，見他的《唐宋之際社會門第之消榮——唐宋之際社會研究之一》，載《新亞學報》，4.1（1959年），第213—218頁，和他的圖表，第280頁以下諸頁。

[[34]](#_34_9)他們是夏侯孜、蔣伸、畢諴、曹確、路巖和白敏中。

[[35]](#_35_9)他們是令狐绹、杜審權、楊收、高璩、徐商和于悰。

[[36]](#_36_9)例如蕭鄴、蕭寘、劉瞻、劉鄴和趙隱。

[[37]](#_37_8)楊收的傳記見《舊唐書》卷177，第4595頁；《新唐書》卷184，第5392—5395頁。

[[38]](#_38_8)路巖的傳記見《舊唐書》卷177，第4602 頁；《新唐書》卷184，第5396—5397頁。

[[39]](#_39_8)韋保衡的傳記見《舊唐書》卷177，第4602頁；《新唐書》卷184，第5398頁。

[[40]](#_40_8)于悰的傳記見《舊唐書》卷149，第4010—4011頁；《新唐書》卷104，第4009—4010頁。

[[41]](#_41_8)王鐸的傳記見《舊唐書》卷164，第4282—4285頁；《新唐書》卷185，第5406—5407頁。

[[42]](#_42_8)孫國棟：《唐代后期中央政府機構之演變》，載《中國學人》（英文），8（1971年），第5頁。

[[43]](#_43_8)關于宣宗恢復佛教主要事實的論述，見冉云華《中國佛教編年史：581—906年》（桑蒂尼克坦，印度，1966年），第97—105頁。關于福建建造的新寺廟，見魏應祺《五代閩史稿之一（續）》，載《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文海出版社重印，臺灣），第70期（1929年），第3051—3070頁。

[[44]](#_44_8)《資治通鑒》卷252，第8166頁；《舊唐書》卷19下，第689—690頁；《新唐書》卷9，第263頁。

[[45]](#_45_8)田令孜的傳記見《舊唐書》卷184，第4771—4772頁；《新唐書》卷208，第5884—5889頁。

[[46]](#_46_8)《資治通鑒》卷253，第8225—8226頁。

[[47]](#_47_8)楊復恭的傳記見《舊唐書》卷184，第4774—4775頁；《新唐書》卷208，第5889 5892頁。

[[48]](#_48_8)楊復光的傳記見《舊唐書》卷184，第4772—4774頁；《新唐書》卷267，第5875—5877頁。

[[49]](#_49_8)《資治通鑒》卷258，第8419頁；《舊唐書》卷184，第4775頁；《新唐書》卷186，第5428頁。

[[50]](#_50_8)《資治通鑒》卷252，第8167頁；蕭倣的傳記見《舊唐書》卷172，第4480—4482頁；《新唐書》卷101，第3959—3960頁。

[[51]](#_51_8)《資治通鑒》卷252，第8171頁。崔彥昭傳記見《舊唐書》卷178，第4628—4630頁；《新唐書》卷183，第5380—5381頁。

[[52]](#_52_8)見王讜《唐語林》（上海，1957年）卷3，第76—77頁；引自王壽南《唐代宦官權勢之研究》，第40—41頁。

[[53]](#_53_8)鄭畋的傳記見《舊唐書》卷178，第4630—4638頁；《新唐書》卷185，第5401—5405頁。

[[54]](#_54_8)盧攜傳記見《舊唐書》卷178，第4638—4639頁；《新唐書》卷184，第5398—5399頁。

[[55]](#_55_8)《新唐書》卷183，第5381頁；卷185，第5402頁。

[[56]](#_56_8)《資治通鑒》卷252，第8168—8169頁；《全唐文》卷792，第13—14頁。

[[57]](#_57_8)《唐大詔令集》卷72，第400—405頁。

[[58]](#_58_8)關于這些事件，見《資治通鑒》卷251，第8144—8145頁；卷252，第8158頁。

[[59]](#_59_8)《全唐文》卷386，第11頁；引自栗原益男《唐末五代的變革》，載《歷史教育》，12.5（1964年），第60頁。

[[60]](#_60_8)關于黃巢，見《舊唐書》卷225下，第6451頁。朱溫出身于書香門第，見王賡武《五代時期華北的權力結構》（吉隆坡，1963年），第27頁注。關于李罕之，見《新唐書》卷187，第5442—5445頁；《舊五代史》卷15，第4—7頁；《新五代史》卷42，第454—456頁；也見《北夢瑣言》卷15，第7頁。

[[61]](#_61_8)“敵對的精英人物”一詞是從埃里克·沃爾夫的《論農民起義》中借用的，載《國際社會科學雜志》，21（1969年），第288頁。關于唐代地方精英階級的形成和演變，菊池英夫在《所謂節度使權力的土豪層》中有很好的論述，見《歷史教育》，14.5（1966年），第46—58頁。

[[62]](#_62_8)《資治通鑒》卷251，第8129頁。

[[63]](#_63_8)“農民”一詞準確地說是用來稱呼在農村耕作以維持生計的大多數農村居民。根據這樣廣泛被接受的定義，其他鄉村居民不是農民，盡管他們是農業社會的組成部分。見西德尼·明茨《關于農民定義的一點意見》，《農民研究》（英文），1.1（1973年），第91—106頁和引用的文獻。

[[64]](#_64_8)例如，《舊五代史》卷133，第14頁（錢镠）；《新五代史》卷63，第783頁（王建）；《九國志》（《叢書集成》本，上海，1937年）卷3，第39頁（徐溫）。

[[65]](#_65_8)《舊唐書》卷182，第4712—4713頁（畢師鐸）；錢镠傳記見《舊五代史》卷133，第14—20頁；《新五代史》卷67，第835—841頁。關于王建，見《新五代史》卷63，第783頁；《太平廣記》卷224，第1723—1724頁。關于徐溫，見《九國志》卷3，第39頁。關于鐘傳，見《太平廣記》卷192，第1441—1442頁。

[[66]](#_66_8)《舊五代史》卷15，第4頁。

[[67]](#_67_8)《新唐書》卷225下，第6451頁。

[[68]](#_68_8)堀敏一也對血緣關系的確實性表示疑義，見《唐末諸叛亂之性質》，載《東洋文化》，7（1951年），第83頁。

[[69]](#_69_8)見矢野主稅《關于唐代假子制的發展》，載《西日本史學》，6（1951年），第86—97頁；栗原益男：《唐五代假父子結合的性質》，載《史學雜志》，62.6（1953年），第514—543頁；《關于唐末五代假父子結合的姓名與年齡》，載《東洋學報》，38.4（1956年），第430—457頁。

[[70]](#_70_8)關于這種見解見《資治通鑒》卷252，第8172頁。

[[71]](#_71_8)《資治通鑒》卷252，第8182頁。

[[72]](#_72_8)《資治通鑒》卷252，第8154頁。

[[73]](#_73_8)《資治通鑒》卷252，第8186頁。

[[74]](#_74_8)《資治通鑒》卷252，第8187—8188頁；《新唐書》卷225下，第6452頁；關于王鐐見《舊唐書》卷164，第4285頁。

[[75]](#_75_8)《唐大詔令集》卷120，第638—639頁。

[[76]](#_76_8)《資治通鑒》卷253，第8193—8194頁。

[[77]](#_77_8)《新唐書》卷225下，第6454頁。

[[78]](#_78_8)《資治通鑒》卷253，第8215頁。

[[79]](#_79_8)關于中國人避難的村落，見羅香林《唐代黃巢變亂與寧化石壁村》，載《說文月刊》，4（1944年），第265—268頁。

[[80]](#_80_8)關于這些阿拉伯記事的討論，見霍華德·列維《黃巢傳》（中國正史譯文第五種，伯克利，1961年），第109—121頁。

[[81]](#_81_8)《舊唐書》卷200下，第5392頁。

[[82]](#_82_8)《新唐書》卷225下，第6455頁。

[[83]](#_83_8)高駢的傳記見《舊唐書》卷182，第4703—4712頁；《新唐書》卷244下，第6391—9404頁。

[[84]](#_84_8)《資治通鑒》卷253，第8219—8225頁。

[[85]](#_85_8)關于這個問題的詳盡的討論，見周連寬《唐高駢鎮淮事跡考》，《嶺南學報》，11.2（1951年），第11—45頁。

[[86]](#_86_8)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渡口。唐朝一度曾在采石建立鎮戍，但在811年撤銷了；見《冊府元龜》卷507，第4頁。

[[87]](#_87_8)《資治通鑒》卷254，第8264—8268頁。

[[88]](#_88_8)較早的任命見《唐大詔令集》卷120，第638頁，高駢自己的任命包括李罕之（《舊唐書》卷187，第5442頁）、畢師鐸和秦彥（《資治通鑒》卷253，第8211頁；《舊唐書》卷182，第4715頁）。

[[89]](#_89_8)《資治通鑒》卷253，第8229頁。

[[90]](#_90_8)《資治通鑒》卷254，第8237頁；又見在此以前幾十年杜牧的文章，文中敘述了政府軍質量的下降，載《全唐文》卷754，第12—14頁。

[[91]](#_91_8)《資治通鑒》卷254，第8240頁。

[[92]](#_92_8)見堀敏一《黃巢之亂》，第64頁。

[[93]](#_93_7)《新唐書》卷225下，第6458—6459頁；《資治通鑒》卷254，第8241頁；據《冊府元龜》卷374，第14頁，大約三分之一京師官員接受了黃巢的任命。

[[94]](#_94_7)E.H.肖孚：《長安的最后歲月》，載《遠東》，10（1963年），第137—179頁（第157頁）。

[[95]](#_95_7)關于關中和四川之間的道路，見嚴耕望《唐代長安南山諸谷道驛程述略》，載《唐史研究叢稿》（香港，1969年），第611—626頁。

[[96]](#_96_6)陳敬瑄的傳記見《新唐書》卷224下，第6406—6409頁。關于他的任命，見《資治通鑒》卷253，第8221頁。

[[97]](#_97_6)《資治通鑒》卷253，第8222頁。

[[98]](#_98_6)《資治通鑒》卷254，第8263—8264頁。

[[99]](#_99_6)關于阡能叛亂，見《資治通鑒》卷254，第8263頁及以后諸頁。

[[100]](#_100_6)《資治通鑒》卷255，第8275頁。

[[101]](#_101_6)關于韋君靖及其民團組織的重要研究，有栗原益男《關于唐末土豪在地方上的勢力——四川韋君靖的情況》，載《歷史學研究》，243（1960年），第1—14頁； 日野開三郎：《關于唐韋君靖碑應管諸鎮節級之考察》，載《和田博士古稀紀念東洋史論叢》（東京，1961年），第760—780頁。后一篇論文主要研究一篇石刻碑文，其內容是紀念韋君靖在892年建成一座大城堡；那篇碑文的復本可以在劉希海（1793—1853年）的《金石苑》（據1846年印本，臺北重印，1966年）第189—193頁中找到。

[[102]](#_102_6)見谷川道雄《關于安史之亂的性質》，載《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叢》，8（1954年），第86—91頁。

[[103]](#_103_6)關于唐代后期建立地方民團組織的討論，見日野開三郎《唐代藩鎮的跋扈與鎮將》，載《東洋學報》，27.3（1940年），第341—346頁；以及《中國中世的軍閥》（東京，1942年），第229—235頁；菊池英夫：《所謂節度使權力與土豪層》，第50—58頁。

[[104]](#_104_5)菊池英夫：《所謂節度使權力與土豪層》，第56—58頁。

[[105]](#_105_5)關于王郢之亂，見日野開三郎《唐末混亂史稿》，《東洋史學》，10（1954年），第17—19頁；《資治通鑒》卷252—253，第8178—8190頁。

[[106]](#_106_5)董昌傳記見《新唐書》卷225下，第6466—6469頁；以及《新五代史》卷133，第14—15頁（《錢镠傳》）。

[[107]](#_107_5)關于杭州八都的討論，見谷川道雄《關于唐代的藩鎮——浙西的場合》，載《史林》，35.3（1952年），第297—298頁。在《吳越備史》中有些傳記資料表明，這些都的首領是杭州地區地方精英的成員；見《吳越備史》卷4（學津討原叢書本），第6頁。關于后來的吳越國，見沙畹《關于吳越國》，載《通報》，17（1916年），第129—264頁。

[[108]](#_108_5)韋昭度傳記見《舊唐書》卷179，第4653—4654頁；《新唐書》卷185，第5410—5411頁。

[[109]](#_109_4)蕭遘傳記見《舊唐書》卷179，第4645—4648頁；《新唐書》卷101，第3960—3962頁。

[[110]](#_110_4)《資治通鑒》卷254，第8242—8247頁。

[[111]](#_111_4)見《舊唐書》卷200下，第5394頁；《資治通鑒》卷254，第8268頁。

[[112]](#_112_4)見崔致遠《桂苑筆耕集》卷2（四部叢刊本），第11—12頁。

[[113]](#_113_4)《新唐書》卷225下，第6461頁。

[[114]](#_114_4)《資治通鑒》卷225，第8277頁。

[[115]](#_115_4)見劉掞藜《唐代藩鎮之禍可謂為第三次異族亂華》，第851頁以下。

[[116]](#_116_4)《新唐書》卷225下，第6461頁；《資治通鑒》卷255，第8288頁。

[[117]](#_117_4)關于圍困陳州的情況，見《資治通鑒》卷255各處。趙犨的傳記見《新唐書》卷189，第5473—5475頁；《舊五代史》卷14，第5—8頁；《新五代史》卷42，第460—464頁。

[[118]](#_118_4)《新唐書》卷225下，第6463—6464頁；《資治通鑒》卷256，第8311頁。

[[119]](#_119_4)《新唐書》卷225下，第6464頁。

[[120]](#_120_4)《資治通鑒》卷256，第8320頁； 肖孚：《長安的最后歲月》，第168頁。

[[121]](#_121_3)王重榮的傳記見《舊唐書》卷182，第4695—4699頁；《新唐書》卷187，第5435—5441頁。

[[122]](#_122_3)《資治通鑒》卷256，第8322頁；《新唐書》卷208，第5437頁。

[[123]](#_123_3)《舊唐書》卷182，第4700頁；《新唐書》卷186，第5419頁。

[[124]](#_124_3)《資治通鑒》卷256，第8326—8328頁。

[[125]](#_125_3)《資治通鑒》卷256，第8330—8331頁。

[[126]](#_126_3)關中這條道路的詳細情況，見嚴耕望《唐代長安南山諸谷道驛程述略》，第612—615頁。

[[127]](#_127_3)《資治通鑒》卷256，第8231—8232頁。

[[128]](#_128_3)關于朱玫和他試圖將一個僭越者安置在皇位上一事，見栗原益男《朱玫之亂》，載《和田博士古稀紀念東洋史論叢》（東京，1961年），第373—382頁；朱玫傳記見《舊唐書》卷175，第4548頁；《新唐書》卷224下，第6404—6405頁。

[[129]](#_129_3)《資治通鑒》卷256，第8334—3335頁。

[[130]](#_130_3)《資治通鑒》卷256，第8337—8342頁。

[[131]](#_131_3)《資治通鑒》卷257，第8364頁。

[[132]](#_132_3)同上書，第8376頁；楊復恭傳記見《舊唐書》卷184，第4774—4775頁；《新唐書》卷208，第5889—5892頁。

[[133]](#_133_3)《舊唐書》卷174，第4775頁；《資治通鑒》卷259，第8446頁中有藩鎮蔑視朝廷的敘述。

[[134]](#_134_3)《資治通鑒》卷258，第8391頁。

[[135]](#_135_3)《資治通鑒》卷258，第8396頁。

[[136]](#_136_3)同上書，第8404—8405頁。關于吐谷渾和他們的首領赫連鐸，見莫萊《從北魏到五代時期的吐谷渾》，第191—219頁及有關各處。

[[137]](#_137_2)《資治通鑒》卷258，第8409頁；卷259，第8445頁。

[[138]](#_138_2)《資治通鑒》卷259，第8446頁。

[[139]](#_139_2)《資治通鑒》卷260，第8466—8467頁。

[[140]](#_140_2)《資治通鑒》卷260，第8499—8491頁。

[[141]](#_141_2)《資治通鑒》卷261，第8497—8498頁。

[[142]](#_142_2)《資治通鑒》卷262，第8530頁。關于唐末宦官和節度使們之間勾結的情況，見王壽南《唐代宦官權勢之研究》，第47頁。

[[143]](#_143_2)《資治通鑒》卷262，第8552頁。關于大赦令的全文，見《唐大詔令集》卷5，第31—33頁。關于甘露之變后王涯及其他大臣之死，見《資治通鑒》卷245，第7916頁。

[[144]](#_144_2)《資治通鑒》卷266，第8674頁。

[[145]](#_145_2)關于朱溫生活的現有材料的討論，見王賡武《五代時期華北的權力結構》，第27頁注。

[[146]](#_146_2)《北夢瑣言》卷17，第1頁；《舊五代史》卷1，第2頁。

[[147]](#_147_2)關于唐末至五代時期牙軍的重要研究有周藤吉之《關于五代節度使的牙軍的考察》，載《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2（1951年），第3—72頁；堀敏一：《五代宋初禁軍的發展》，載《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4（1953年），第83—151頁；菊池英夫：《關于五代禁軍的侍衛親軍司之成立》，載《史淵》，70（1956年），第51—57頁。

[[148]](#_148_2)周藤吉之：《五代節度使的支配體制》，載《宋代通濟史研究》（東京，1972年），第576頁。

[[149]](#_149_2)關于這個騎兵軍團的研究，見堀敏一《朱全忠的廳子都》，載《和田博士古稀紀念東洋史論叢》（東京，1961年），第819—831頁。

[[150]](#_150_2)《資治通鑒》卷255，第8306頁及以下各頁。

[[151]](#_151_2)王賡武：《五代時期華北的權力結構》，第56—57頁；關于朱溫政權結構的重要論述，見堀敏一《朱全忠政權之性質》，載《駿臺史學》，11（1961年），第38—61頁。

[[152]](#_152_2)秦宗權的傳記見《舊唐書》卷200下，第5398—5399頁；《新唐書》卷225下，第6464—6466頁。

[[153]](#_153_2)《資治通鑒》卷257，第8382頁。

[[154]](#_154_2)《資治通鑒》卷260，第8489頁。

[[155]](#_155_2)見劉掞藜《唐代藩鎮之禍可謂為第三次異族亂華》，第821—858頁。

[[156]](#_156_2)關于唐代初期和中期沙陀活動的詳盡記述，見章群《唐代降胡安置考》，載《新亞學報》，1.1（1953年），第311—312頁。

[[157]](#_157_2)詳細情況見莫萊《從北魏到五代時期的吐谷渾》，第196頁注。

[[158]](#_158_2)見《資治通鑒》卷261，第8505頁。

[[159]](#_159_2)關于李克用與阿保機之間聯盟的詳細研究，見陳述《阿保機與李克用結盟之年及其背盟相攻之推測》，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1（1936年），第79—88頁。

[[160]](#_160_2)見羅伯特·克龍帕特《唐代的南方復興：穩定江淮地區的計劃、政策和外交》，加州大學（伯克利）未發表的博士論文，1973年，第54頁及有關各頁。

[[161]](#_161_2)見E.H.肖孚：《閩帝國》（拉特蘭，弗蒙特，1954年）。

[[162]](#_162_2)關于南漢國，見肖孚《南漢國史，根據歐陽修的〈五代史〉第六十五卷》，載《人文科學研究所二十五周年紀念文集》（京都，1954年），第339—369頁。

[[163]](#_163_2)關于王建的經歷，有用英文寫成的有用的概略，見馮漢鏞《永陵王建（847—918年）王陵的發現和發掘》，載《美國中國藝術學會檔案》，2（1947年），第11—20頁。

[[164]](#_164_2)見江聰平《韋端己詩校注》（臺北，1969年），第2頁。

# 后記

劍橋歷史叢書在國際學術界有一定影響。這套叢書之一的《劍橋中國史》已出各卷國外書評予以肯定。其第10卷和第11卷已由我們譯出，定名為《劍橋中國晚清史》（上、下卷），1985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也引起了一定反響。本書為第3卷，論述隋唐時期歷史。《劍橋中國史》已經出版的先秦卷、中華人民共和國卷，我們已經譯出，正在編印中；明代卷我們也已著手翻譯。其余各卷國外出書后我們也擬盡快翻譯出版。

本書各章的譯者分別為：楊品泉（第一至第二章、第六至第八章），張書生（第三章、第九章），索介然（第四章），胡志宏（第五章），陳高華（第十章）。全書由張書生、楊品泉總校。李斌城同志在百忙中為本書寫了前言，詳細地論述了本書的特點和價值，同時也指出了一些不足，這對讀者很有幫助。謝亮生同志對全書的譯文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由于我們水平所限，全書難免有錯誤，尚望讀者指正為幸。